



多彩的和平

—108名妇女的故事

Colours of Peace

陈顺馨/主编

「要让世界承认，和平是永恒的主题。战争是非理性的。」

一个女人、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当她能自己定位，才能去推动世界和平，推动和平。

「银行不见了，蚯蚓起来了。」

「生态不只是一棵红树，它还宣扬了女性对于自然的热爱。」

染呢，包括爱和笑，感动和疾病。就看谁比谁传染得更快了，是疾病呢，还是我们沉溺于痛苦。」

工百合，除了多一点收入，更重要的是，劳动与互助的形式让大伙有了一种归属感。」

「我要教好这些娃娃，直到她们长大。」

「以人为本，不等不靠，共建共筑，共创美好未来。」

均均势，能互相制衡，而不要被一个单边主义所统治，这其实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

人，有着多元的身份。一个生态环境，经常是在一个多元、复杂，但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以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互相整合，共同成长。」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感动。这种力量，只会来自信仰。这信仰来自历史，来自传统，也来自对大自然的敬畏。」

以智慧和实践经验提出这么丰富和另类的和平理念的？是曾经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女性一起，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

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大陆、香港和台湾）。

大部份的你或许不认识？因为她可能是大陆某个偏远山区的。」

某个农村里。」

区中的阿菊？或者是香港某个家庭主妇，某个曾被丈夫虐待的妻子，某个围村的。」

可能是台湾某个学校里的老师，某个环保机构的成员，有些是。」

富妇女；部分是献身事业而受到认可的知识女性；又有一些是得到普遍关注的。」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走上

「大写」的「和平妇女」(PeaceWomen) 这个特殊的集体，而她们的工作和故事，为我们将不再只跟国族之间的战争挂上关系，和平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自我的定位和对世界的。」

策划：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

编辑委员会：陈顺馨 刘健芝 戴锦华 钟秀梅

执行编辑：罗婉仪

责任编辑：贾向云

陋室铭 装帧设计
010-84626669



ISBN 978-7-80211-438-8



9 787802 114388 >

定价：68.00元



多彩的和平

—108名妇女的故事

Colours of Peace

陈顺馨/主编

刘健芝 戴锦华 钟秀梅/合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彩的和平:108名妇女的故事/陈顺馨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 - 7 - 80211 - 438 - 8

I. 多… II. 陈… III. 妇女—生平事迹—世界 IV. K8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6217 号

多彩的和平:108名妇女的故事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50(编辑部)

(010)66509349(发行部)(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 数:600 千字

印 张:34.75

版 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首席顾问律师鲁哈达

前言：和平、日常生活与妇女

陈顺馨

缤纷多彩的和平妇女

“要让世界承认：和平是永恒的主题，战争是非理性的中断。”

“和平应该是这样的：农民即使除了种田什么都不懂，自己的权益也不会受到侵害，也能够过上安宁和谐的日子。”

“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当她能自己定位，才能去推动世界和平，推动和谐生活。”

“银行不见了，蚯蚓起来了，就是和平。”

“生态不只是一棵红树，它还宣扬了女性对于自然的尊重和爱。”

“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被传染呢，包括爱和笑、感动和疾病。就看谁比谁传染得更快了，是疾病呢，还是我们沉静的一笑。”

“我们种植、加工百合，除了多一点收入，更重要的是，劳动与互助的形式让大伙有了一种集体感。”

“我要教好这些娃娃，直到最后一个。”

“以人为本、不等不靠、共建共筑、敢为人先。”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文化多元的发展，保持世界的均势，能互相制衡，而不要被一个单边主义所统治，这其实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和平。”

“其实人类社会里面，基本上就存在差异，不同背景的人，有着多元的身份。一个生态环境，经常是在一个多元、复杂，但是互为影响的关系中存活。这一个状态本来就是多姿多彩的，异常丰富的；我们可以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互相整合，公平的生活。”

“在个人的征服欲望和世界、文化、宗教、民族的传统面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情不自禁地低头，这种力量，只会来自信仰。这信仰来自历史、来自传统，

也来自对大自然的热爱。”

以上缤纷多彩的和平话语，会让你想起某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吗？

对，能够以智慧和实践经验提出这么丰富和另类的和平理念的，是曾经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妇女，一起被提名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地区（大陆、香港和台湾）和平妇女。大部分的人你或许不认识，因为她可能是大陆某个偏远山区的小学教师、某个农村里的基层干部、某个工人组织里的工作人员、某个少数民族地区中的阿訇，或者是香港某个家庭主妇、某个曾被丈夫虐待的妻子、某个围村的原居民；她，又可能是台湾某个学校里的老师、某个环保机构里的成员。有些你可能认识：部分是由于事迹曾被传媒报道而被人看到的基层妇女；部分是献身事业而受到认可的知识女性；又有一些是得到普遍关注的社会活跃人士。

这些不同背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走上不同岗位或被置放在不同处境的妇女，因着一个提名活动，成就了“大写”“和平妇女”（PeaceWomen）这个特殊的集体，而她们的工作和故事，为我们重新理解和平的含义和可能性，提供了另一种空间。和平不再只跟国族之间的战争扯上关系；和平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自我的定位和对权益的自觉；和平是一份对环境生态和生命的关爱、对和谐共处和互助合作的人际、生产和国际关系的追求；和平是对差异和多元文化的尊重、对歧视和征服他人的暴力文化的批评和排除。和平是一种希望的政治。

“和平妇女”诞生的历史契机：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

在瑞士发起的“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1000 Women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2005）活动，从 2003 年 3 月开始到 2005 年底结束，像一阵旋风，把全球约 150 个国家的妇女卷入，参与其中。令来自不同地区的妇女跟这个本来极为遥远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产生关系，不是荣誉和奖金，而是一个迥异的和平理念和一个“疯狂”的想法。活动的发起人、瑞士国会议员维尔莫一文高博士（Ruth-Gaby Vermot-Mangold）在 *1000 Peace Women Across the Globe*（SCALO, 2005）一书的前言中曾经指出：

“和平不可能是个人可以达到的，因此妇女走在一起，结成网络、团体和联盟。从每天的工作，她们看到，和平并非仅仅是战争和军事冲突的消灭……而是获得安然的日常生活”，而她看到，世界上很多妇女身体力行，正在为打造这样的和平而努力。这样，趁着 2005 年第一位女性（Bertha von Suttner）获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和 1995 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的历史时刻，她发起一个活动，或者说应该是一场运动，提名 1000 名妇女争评该年的和平奖，以引起世界对妇女的工作和贡献的认识。

为了推动这个活动，文高博士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并向全球不同地区的妇女运动活跃人士或关注和平的妇女团体招手，邀请她们共同把这个“疯狂”的想法变成真实。冲破不少语言、沟通、组织、财政等方面的困难后，千名单顺利地交到主办当局手里，并且引起了国际和不同地区团体和媒体的回响。尽管千名和平妇女最终没有成功获取该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她们的故事，已经通过传媒的报道、出版、网页、展览等渠道，传到不少人的耳朵和眼睛里。正如国际委员会成员 Dr. Christine Menz 所说的，整个过程像一次“独特的旅程”（unique journey），上路已经代表成功：缤纷多彩的和平妇女，向一个越来越灰暗的世界，展示着一线希望。

108 名从中国地区产生出来的和平妇女，构成了这线希望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至于中国和蒙古地区的统筹人刘健芝如何被邀请进入国际委员会、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如何成为这个地区的提名工作的筹组单位、过程中进行了什么工作和举办了什么活动，我不在这里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附录在本书的“活动纪录”（附录 II）。我只想指出，不要说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地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有多么艰难，面对拥有八分之一的人口、幅员辽阔的土地、文化区隔的中国，工作量的巨大、工作的难度，一言难尽。在资源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于香港统筹中国和蒙古地区的提名，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这是一次曾被认定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全无先例可援引，更无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期间，在协调和沟通上也遭遇过种种问题。然而，我们做到了。我们完成了。

在提名、评审期间，我们尽量做到公开、公平，让不同的人

有机会提名身边认识的或者是不认识的却知道其事迹的妇女。参照国际委员会定下的标准，我们确定进一步的原则：中心地区与地方的提名，以地方提名优先；知名与不甚知名或寂寂无名的提名，以不甚知名或寂寂无名者优先；上层组织者与基层工作者的提名，以基层工作者优先；努力使得更多不为人知的和平努力得以被看见。肯定的是，交到国际委员会的108人名单，只是中国地区妇女工作的象征性代表，正如全球千人名单，是无数无法进入名单的和平妇女象征性的代表一样。

2005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并未停止工作。同年12月我们于昆明举办了一次令人难忘的、中国和蒙古地区和平妇女的交流会^①，与此同时，策划继续在中国地区推动和平的工作，包括通过访问、中文书写和出版108名妇女的故事，较丰富地呈现和平所涉及的范围和策略，以促进我们对和平的理解，以至两岸三地进一步的交流。

把“日常生活”和“妇女”纳入和平的讨论

在现代社会，“和平”是一个相对于“战争”的概念，这可能由于过去的200年，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战争以及无数由族裔冲突或其他原因引发的内战，成为界定历史进程的主要事件，和平的日子，似乎只是两段战乱中间的缝隙，而这些或长或短的缝隙之所以能够出现，历史或政治教育又会告诉我们，是因为谈判桌上的国际名人或民族领袖（大都是男人）签署了文件和握过了手。因此，很多时候，作为概念，“日常生活”和“妇女”是被排除在和平的讨论之外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任何书写记载妇女反战或者在战争期间和之后参与修补性的工作（如救援和善后），甚至是妇女参与一些她们认为是正义之战（如民族解放战争），我只是想指出，经常被国际关系研究主导的和平研究忽略的是非战争时期的暴力。这些“和平”年代的暴力，对生活造成的破坏和伤害，跟战争时期

^① 详情可参看本书附录I中刘健芝《希望的土壤》、钟秀梅《生态是永恒的经济》、陈顺馨《女性与差异政治的实践》和戴锦华《和平的真义》的内容。

不相上下。这不仅指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更是植根于日常生活的、源于各种不公的制度和政策、不平衡的和一味追求利润的发展模式、形形色色的歧视与偏见、不尊重人权生命、不懂得保育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等等的暴力。这些暴力有些是可见的，有些是不可见的，却都严重地危害着人类的生存和生活。讨论和平，便不可能不把消灭或减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暴力的努力，纳入其中。

当我们用日常生活的框架去讨论和平的时候，妇女的位置与角色便变得清晰可见。2005 - 2006 年间，我曾经就香港十来个被提名的和平妇女的工作，深入研究香港这个被认为是典型的“太平盛世”社会背后暴力的一面，以及妇女在和平缔造上所扮演的角色。我发现，在香港，“妇女面对的暴力不仅来自男人，还有政府的各种政策、高度民主强调经济效应的发展模式、保守的教会等导致的种种失衡和分隔……另类的和平政治，是去检视那些失衡甚至变得暴力的生活环境，以至以不同工作方式恢复应有的平衡和和谐，并使维持这样的平衡与和谐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向。妇女在这方面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们是日常生活的主要承担者，她们拥有知识、能量、勇气、智慧和创造力，如果能够进一步互相支持、加强联结，并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她们将发挥更大的效用，成为建设和平的基石。”^① 通读了大陆与台湾更多的和平妇女的故事后，觉得由于历史背景、制度和生活环境上的差异，妇女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暴力形式以及应对的策略，各有不同，但作为妇女，她们同样具有生命力，在个人、孩子、家庭、朋友、邻居、社区、生态环境、文化、民族国家等层面，为和平奠定着坚实的基石。

和平是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抵抗暴力的结果

本书将 108 个多姿多彩的妇女的故事，组织在 4 个大部分合共 12 个小部分下，目的在于系统地呈现她们在面对着何种的暴力而为和平工作。和平的多彩性，不仅与她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大陆、台湾或香港）、在不同的场域工作（基层社区或专业

^① 陈顺馨 (2006): 《女性与差异政治的实践》，见本书附录 1。

性岗位)和选取不同的工作策略(个人坚持、团体合作、诉诸法律、文艺演出、技术改造等)相关,也与她们不同的人生阅历(她们的年龄从21岁到90多岁)、血管里流淌着不同民族(汉族、回族、藏族、泰雅族、白族等;也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美国人)的血液、信仰着不同的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不无关系。可以说,种种差异性,使一个共同的和平事业,变得多元和精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分类都有其局限,一些妇女的工作可能针对多种的暴力,但只能归在其中一类之下,读者想必能够理解。

第一部分“直面暴力”的故事,属于面对可见暴力而抗争一类,范围包括战争、族群矛盾、民族冲突、党派政治、殖民历史(“别样战场”)、妇女为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努力(“妇女维权”)和反抗家庭暴力(“对抗家暴”)。在这部分,我们看到王选长期针对日本侵华时期进行的细菌战对今天中国老百姓带来的伤害,王清峰等批评日本政府不愿意道歉和赔偿而让慰安妇今天仍然承受着伤痛和耻辱,高金素梅斥责日本统治台湾时对原住民的杀戮等,她们以抗议、游说、参与政治活动等工作,为受害者讨回公道。身为制度暴力的受害者的刘忠训、黄淑华、新界妇女原居民等,不怕通过烦琐的法律程序,跟社会恶势力、传统男权、不健全的法律制度斗争,而陈月、顾玉珍、郭建梅等,则以正义和人权等信念和专业知 识,维护妇女和青少年的权益。对抗家庭暴力也需要受害者与前线工作人员如警察、妇女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等的通力合作,廖银凤、华美清、吴美荣、陈明侠等,在她们不同的岗位上尽力对抗妇女经年累月、每天遭受的虐待和暴力。

第二部分“绿色生命”及第三部分“底层耕耘”,包含妇女面对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对环境、生态、生命、生计、教育、价值上的隐性暴力所做的和平工作。这两部分的故事数目最多,以在底层默默耕耘的妇女的故事占绝大多数。

随着经济急速发展和人民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环境上的破坏与生态失衡可以说是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草原变沙漠,生态湿地因所谓“治理工程”而遭破坏,树林被滥伐,动物被猎杀,村子里的地下水干枯,河流被工厂排放出来的污水破坏,电池等污染性废物没有妥善处理,兴建水坝淹没了生计和文化遗

产等。在第二部分“绿色生命”下的“营造绿洲”和“平衡生态”中，牛玉琴、殷玉珍、徐兰香、黄惠琼、王品松等基层妇女，最初并不是为了实现什么环保理念，而是为了自己及家人能活下来，或基于一份朴素的乡土感情，她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把沙漠变成绿洲，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反抗外来者对环境进一步破坏，成果让人赞叹；杨海澜、徐凤翔、汪永晨、史立红等知识分子，则以试点工作，成立环保团体，组织培训班，写文章，出版书籍等方式，倡议生态平衡的生活模式和引起社会的关注。环保工作的和平含义，除了指出发展带来环境上的破坏，直接影响日常生活外，还具预防战争发生的作用。2004年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肯尼亚的妇女运动与环保运动的推动者马塔伊（Wangari Maathai）在获奖后发表这样的言论：“很多战争都为争夺资源：中东战争为了争夺石油、水源和土地，非洲战争为了争夺矿产、木材……善用资源，我们便播下和平的种子。”^① 这番话我认为很有道理，它指向一种生活态度的改变：如果我们懂得在日常生活中珍惜和善用资源，不浪费或过度消费，资本主义逻辑便会瓦解，资源危机在得到舒缓时，某些战争便可能避免。

妇女作为生命的守护者，不仅表现在保育工作上，还呈现在坚韧的生命力和照顾病残者工作上的投入，例如在任何时间都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张文清、张积慧、李继跃、李晓亮和郭新志，以及自己在一场工厂大火中被严重烧伤，成了残疾人却决心组织工伤者以争取应有的权益的陈玉英（小英）等（“守护生命”）。当今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现代医疗没法控制的病毒或疾病，例如“非典”、艾滋病、癌症等，这无疑与环境 and 食品受到污染、生活紧张、身体素质下降等因素相关，显然也与利润先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为了让大资本、投资者获利，工人在劳动岗位上的职业安全和保障遭到严重忽视，像小英那样被困在锁死了门窗的工厂中而被严重烧伤甚至烧死的案例，绝非鲜见。她们无权无势，唯有自救组织，以保障自己的生命和权益。因此，以不同方式行动起来保障生命的和平工作，是抵抗类似社会暴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陈顺馨（2005）：《妇女、和平与女性主义》，见本书附录 I。

利润先于人命、权力压倒一切、盲目崇拜“发展”等现代化逻辑造成的暴力，还体现在底层人民生计的被剥夺上。在城市，是女工下岗或被迫转业；在农村，农民自愿（因为收入低）或被迫（因为失去土地）放弃农耕而出外打工，农业经济破产。在“永续生计”部分里，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女工合作社、江西“路下湾里妇女互助储金会”的成员，以合作经济的方式，不仅养活自己，还带动环保工作和有机耕种；徐纪英、李桂莲、苏艳霞等以开发和改良种植技术来协助农民脱贫；程炜等以搞好农村粮食和生产资料的流通来改善农民的收入；范琼花、李雪波、杨娥、吴玖华、李特特等妇女干部用她们的行政力量，以小额贷款、成立扶贫基金会、搞好治虫等方式，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这些和平工作可以让基层妇女的生计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得以持续，并且发挥互助的精神。

不少来自基层的妇女也看到农村妇女的教育在培育助人自助的生活能力和信念方面的重要性，并以最为朴素的方式进行她们的教育工程。例如张华在延安附近的窑洞学校里教书，直到没有学生再来；张桂梅在云南大山里建立“儿童之家”；马志英在宁夏一个“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自己温饱不足的家中，收留、帮助共80多名女孩上学等。农村妇女干部赵凤兰、王树霞、王霞等则以种种生动活泼的形式丰富农村文化生活；谢丽华、郑冰、梁军、赵玲等知识女性以办杂志、成立“社区教育中心”、参与“农民之子”学生团体等方式，提升农家女或打工妹的性别意识和大学生对农村的关注。在“育苗乡土”这部分，你会看到这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至于“价值重整”这部分所包含的和平妇女的故事，可以说是丰富多样，个个不同，但都涉及价值的重整的内涵，如族群的寻根（黄美英），农村基层工作的心得与情感（肖井荣），对土地和人类的爱与祝福（马庆荣），以一颗善良的心和一份信念为村民做好每一件事（刘凤兰、朱晓霞），与磨难一起成长（李春霞、常玉珍），以无私的精神为工人争权利（黄秋香），以爱心收养400多只流浪猫狗（张吕萍），改变人们对性工作者的偏见（丽君、纪爱恩、严月莲），留守少数民族地区（王莉文），在社区中建立信任、互助和民主（李军、张锦明）等。在崇尚竞争、急功

近利、充满偏见的现代社会中，这些妇女能以另样的价值取向作为工作和人生的依归，的确是和平光谱中亮丽的一道。

第四部分“文化光谱”包含妇女在广义的文化范畴中的和平工作，如教育与研究、宗教、文艺、文物等方面。隐性暴力不仅存在于制度中，还隐藏在社会歧视、偏执、意识形态以及对传统的轻蔑中，这些我们称之为文化性的暴力，通常通过媒体、教育、宗教等文化机构的权力化运作不断得到呈现或再生产。不少知识女性，或在自己的岗位上，或争取社会资源，在建制内外言传身教，以专业知识和基层行动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参与建设性的工作，如张淑琴、成露茜、乐黛云等（“言传身教”）。由宗教信仰带来的文化区隔，更需要有在宗教机构中工作的妇女直接介入，才能有效地带出改变，金梅花在回教、释如瑞在佛教、李清词等在基督教内的工作，艰难程度不一，背后却同样有一股信仰的力量在支撑着（“跨越区隔”）。至于“彩绘丹青”部分中的艺术和文化工作者，她们或以文字、影像、音符、绘画、新闻出版等创作形式，丰富我们对于文化和世界的想象，或以一份坚持，守护着珍贵的文化遗产。如果说，和平需要通过文化行动来完成，或者说，和平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话，那必然包含上述由知识女性进行的细水长流的工作。

缺席的在场：无名氏

9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上述四个部分所包含的 108 名和平妇女，当中的第 42 名是“无名氏”。这是仿效“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做法，即在 1000 名被提名者的和平妇女中，空出一个位置给千千万万因种种原因未有进入千人名单的和平妇女，这个第 1000 名，犹如其他的 999 名，可以是你，是我，是她。前些时间，在我们中国地区的 108 名和平妇女中，有一位要求退出，在尊重她的意愿的同时，我们决定把个位置空出来，留给大家去填补、去命名，因为在我们身边，有无数值得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写上名字。她，她们，是缺席的在场者。

出版历程

本书从构思到出版，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2005 年年中构思出版中国地区和平妇女的故事集时，我们只计划从 108 名中选取

40名作为代表，因为要组织志愿者（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到不同地区进行访问，并撰写108个较为详尽的故事，是一件过于艰巨的工作。后来，计划进行了一半后，一些北京朋友建议改变计划，把全部故事写出来，并承诺动员更多的志愿者，联系其他和平妇女进行采访。这样，一下子我们的计划膨胀了两倍多，联系志愿者的工作也诸多艰辛，结果我们多花了半年，才收全稿件，其中少数稿件因种种原因，未能以第一手采访资料写出来，在此，仅向未得到直接采访的和平妇女，致以诚挚的歉意。编辑工作方面，从审稿、修订到编排，都涉及大量的协调工作，万一出现错漏，期望和平妇女和作者多多包容。

可以说，最终能够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并得以出版，是我们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的又一例证。这几年间，在资金来自个人捐赠的条件下，“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大多由志愿者协助完成，和平妇女之间也发挥着互助的精神，特别在2005年年底的昆明会议，一些较有经济能力的和平妇女的捐助使其他没有经济能力的和平妇女前来昆明参加交流。我们总共有65位朋友参与了采访与写作（见本书目录III“作者简介”），并得到了16位和平妇女和15位个人赞助出版经费（见本书鸣谢名单），还有几十位朋友在香港、大陆和台湾三地提供行政上的协助。可以说，没有这个庞大的队伍，我们这本60万言的书，是不可能跟读者见面的。在此，仅代表编辑委员会向所有和平妇女、志愿者和捐赠者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表示万分的谢意。

最后要说明的是，出版计划原定下了书写大纲，由于作者众多，有些作者更是和平妇女本身，因此，故事所包含的内容和作者的写作风格各式各样，并不统一。我相信，每个和平妇女故事的书写过程都构成另一个故事，可能是志愿者长途跋涉到达某个偏远山区见到所要采访的和平妇女那份感动与惊喜，可能是稿子改了又改以更好地表达出她们对和平的含义的努力，等等。希望这里的每一个故事，像和平妇女本人一样，让你能对和平进行不一样的思考。

2007年4月1日

岭南大学（香港屯门）

目录

前言：和平、日常生活与妇女/陈顺馨 / 1

第一部分 直面暴力

I 别样战场

- 1 感动中国,感动世界(王选) / 2
- 2 青春,燃烧在战斗的原野(冯守娥) / 14
- 3 一条漫长的道路(许金玉) / 27
- 4 压不扁的玫瑰花(杨祖珺) / 37
- 5 给祖灵交代(高金素梅) / 44
- 6 致力于性别平等的外交官(张幼云) / 58

II 敢为人先

- 7 全能农民(刘忠训) / 68
- 8 安徽妈妈(王殿敏) / 78
- 9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朱银秀) / 87
- 10 追求和平 反抗性暴力(黄淑华) / 96
- 11 传男不传女 岂有此理(新界原居民妇女委员会) / 105
- 12 “英雄”过后(陈月) / 115
- 13 人权——对生命慎重(顾玉珍) / 123
- 14 青瞑不怕枪(王清峰) / 128
- 15 十年公益律师之路(郭建梅) / 136
- 16 法官妈妈(尚秀云) / 148
- 17 拓荒者(于桂新) / 157

III 御火而行

- 18 “我今年 16 岁!”(廖银凤) / 167
- 19 新型警营文化的使者(华美清) / 178
- 20 黎明之光(龙思海) / 186
- 21 妇女维权我承担(吴美荣) / 196
- 22 给妇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陈明侠) / 209

第二部分 绿色生命

I

营造绿洲

- 23 沙海琴声(牛玉琴) / 221
- 24 走进沙漠造绿洲(殷玉珍) / 234
- 25 沙漠里长出五彩斑斓的梦(杨海澜) / 245
- 26 土地是我的肚脐迹(徐兰香) / 255
- 27 一息尚存 不落征帆(徐凤翔) / 269
- 28 民间环保大使(田桂荣) / 279
- 29 和平路迢迢 携手相扶持(林淑英) / 291

II

保水护土

- 30 永远的奔走与诉说(汪永晨) / 300
- 31 愿为环保献余生(运建立) / 314
- 32 行走一条女性的路(王品松) / 323
- 33 绿色的守望(李小溪) / 334
- 34 生态文化捍卫者(黄惠琼) / 343
- 35 一个行动者(史立红) / 355

III

守护生命

- 36 不仅仅是活下来(陈玉英) / 366
- 37 止于至善(张文清) / 375
- 38 以爱心战胜疾病的暴力(张积慧) / 383
- 39 见证生命(李继跃) / 392
- 40 医疗界中的行动学者(李晓亮) / 399
- 41 与万名脑瘫患儿的情缘(郭新志) / 407
- 42 缺席的在场:无名氏 / 418

第三部分 底层耕耘

I

永续生计

- 43 “百合”的路子(王华连) / 420
- 44 社区共融 资源再用(香港女工合作社) / 429
- 45 开拓女性就业的新途径(洪建军) / 441
- 46 茶树花研究开发第一人(徐纪英) / 446
- 47 永无止境的追求(李桂莲) / 456
- 48 绿意人生(苏艳霞) / 460
- 49 情归黄土地(程炜) / 470
- 50 “和平”赋予实干的妇女(李雪波) / 479
- 51 外姓女人当村官(范琼花) / 483
- 52 平凡的工作因着不平凡的心(杨娥) / 491
- 53 全心全意的螺丝钉(吴玖华) / 495
- 54 “扶贫妈妈”——没有公平就没有和平(李特特) / 505

II

育苗乡土

- 55 山村窑洞女教师(张华) / 517
- 56 在大山里推动教育(张桂梅) / 530
- 57 我的西部回族姐妹(马新兰) / 539
- 58 母爱——献给农村女童(马志英) / 547
- 59 扎根延安我不悔(汪桂兰) / 557
- 60 老有所乐(赵凤兰) / 572
- 61 从改变自己开始(王树霞) / 581
- 62 农家女 百事通(谢丽华) / 592
- 63 文艺的力量(王霞) / 607
- 64 生存与发展——妇女的权利(梁军) / 617
- 65 女人不白活(郑冰) / 626
- 66 当农民之子(赵玲) / 636
- 67 人民科学家(寒春) / 647

III

价值重整

- 68 跨族群寻根——重塑社运(黄美英) / 657
- 69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肖井荣) / 664
- 70 愿所有人平安(马庆荣) / 672
- 71 叫人感动的平凡农民(刘凤兰) / 678
- 72 与磨难一起成长(李春霞) / 685
- 73 走上工运的不归路(黄秋香) / 697
- 74 幸福着你的幸福 快乐着你的快乐(常玉珍) / 705
- 75 一个女人和她四百多个孩子(张吕萍) / 716

- 76 “为着团仔,咱就爱牺牲啊!”(丽君) / 724
77 随心,按感动而行(纪爱恩) / 741
78 支援妇女劳工 支援性工作者(严月莲) / 752
79 知恩与知足(王莉文) / 769
80 丹霞一片映民心(朱晓霞) / 778
81 “小巷总理”无悔的追求(李军) / 787
82 走在中国民主建设实践的最前端(张锦明) / 800

第四部分 文化光谱

I

言传身教

- 83 教人求真 学做真人(王建华) / 802
84 让孩子活在太阳下(张淑琴) / 816
85 我们在同一个圆里(夏晓鹃) / 822
86 作妇女的同行者(王行娟) / 829
87 女性,和平运动的关键力量(周圣心) / 840
88 一个公共事务观察者与参与者(贺德芬) / 848
89 知识分子的良知(夏林清) / 858
90 勇者的故事(成露茜) / 862
91 语不惊人死不休(何春蕤) / 870
92 深深的敬意(谭深) / 878
93 直面充满暴力的世界的一份坚持(乐黛云) / 885
94 “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伊莎白) / 895

II

跨越区隔

- 95 吴南清真寺的梅花丛(金梅花) / 906
96 法师的身业、语业、意业(释如瑞) / 914
97 深耕牧者(李清词) / 920
98 从这里开始(辛淑雯) / 929
99 与自己和解(胡露茜) / 939

III

彩绘丹青

- 100 断指琴艺人百家(周广仁) / 951
101 和者日众(郑小瑛) / 957
102 用影像重筑记忆(宁瀛) / 966
103 文化品牌的捍卫者(董秀玉) / 972
104 肩负“公与义”(余范英) / 981
105 她和她的女朋友们(陈道瓚) / 987
106 湮没不了的声音(孙敏) / 998
107 敦煌奇女子(常沙娜) / 1006
108 古城守护(齐心) / 1018

附录

I

探询和平:和平妇女的相关讨论

在寻常中闪耀的和平的希望

——妇女的不言之教/刘健芝 / 1024

温柔的挑衅——象征与真实的行动/戴锦华 / 1030

妇女、和平与女性主义/陈顺馨 / 1034

希望的土壤/刘健芝 / 1038

生态是永恒的经济/钟秀梅 / 1046

女性与差异政治的实践/陈顺馨 / 1053

和平的真义/戴锦华 / 1060

从下而上造就社会和平发展/刘健芝 / 1067

II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 及

“全球和平妇女”中国地区活动纪录 / 1073

III

作者简介 / 1079

鸣谢 / 1087

索引 / 1090



王选 感动中国，感动世界

文：王平

她挥剑砍去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毒瘤，她要抹去死去和幸存的受害者们不堪回首的记忆和伤痛，还给他们作为人类的尊严。

要让世界承认：和平是永恒的主题，战争是非理性的中断。

诉讼不是为了更多的恨，是为了国家与民族之间更多的和平，是为了让生长在和平环境中的民众理解和平的价值。诉讼不是回首过去，更是为了和平的现在，和平的未来。因为世界的和平正在受到威胁。

王选是一个如此丰富而生动的人，如果用几个词来描述她，最贴切的应该是：快乐、敏锐、阳光、热爱生命……

她喜欢看书、思考，有很强的求知欲，如果听说哪里有一个学问高深的人，即使千里迢迢，她也一定要慕名拜访。

她是个热情洋溢的人，年轻时她能清晰地感到自己血管里的

血液在流动，她能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想要释放青春和热情的冲动。她拥抱生活，没有一点躲闪，失恋后，身体健康的她患了胃溃疡。几乎每一个接近她的人都会为她生命的美好所动。她甚至是她教过的小男孩们一生的梦中女神，小女孩们艳羡不已的天使。

她喜欢运动，喜欢游泳和打羽毛球，她的动作优美协调，常常是众人目光的焦点。她真率坦诚，总是活得兴高采烈。她喜欢挑战，不知道什么叫知难而退。她从小就嫌老师考试时出题太简单，太容易。如果两件事情放到一起，她一定要选择难的去做。

这些美好的词语用在王选身上，没有任何夸耀的成分。这样的女人，似乎生来是为了风花雪月，她与苦难、责任及血淋淋的历史应该不会邂逅，即使邂逅也会擦肩而过或者绕道而行。

战争的创伤

战争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血淋淋的，它带来的创伤使所有亲历过它的人一生都难以淡忘。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我国东北，兵临城下，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政策，于是东北沦陷。然而，日本侵略军的野心不是东北，也不是中国，它的目标是整个东亚，是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与这个梦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国土资源的贫乏，工业原料的先天不足。如果靠传统战争，日本根本应付不了巨大的资源消耗。于是，一个罪恶的想法在侵华日军寻找其他的战争途径时产生了——细菌武器。

在某种程度上，细菌和生物武器比原子武器更令人不寒而栗，原子弹在一定的范围内毁万物于瞬间，细菌武器却是瘟疫和死亡无边无际的蔓延，动物和人类在饱受病痛的折磨之后悲惨地死去，给幸存者造成的心灵创伤是永远不能愈合的。

细菌武器不需要大量的金属、火药，也不用大型的加工车间，一旦原病菌培育成功，就可以十分廉价地生产出来，而且杀伤力巨大。1933年，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当时一个叫平房的小镇，出现了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部队在军邮地址簿上出现的名字就是“满洲第731部队”。

在短短的几年里，731部队就建立起一条月产200公斤炭疽菌粉末的生产线。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制造霍乱、伤寒病菌各500

公斤，鼠疫菌 250 公斤。从 1939 年哈桑湖事件^①到 1942 年之间，731 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其中，炭疽菌、鼠疫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乱、伤寒被制作成菌液，通过飞机的“降雨器”进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肠类疾病；而带鼠疫菌的跳蚤则直接用鼠疫弹进行投放。病菌所到之处，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一时间，中华大地的很多村庄天天有哭声，处处有新冢。

据美国获得的日军细菌战资料显示，日本侵华期间，日军在华进行了 12 次大规模细菌战。侵华日军则认为他们有过 36 次细菌战的“重大胜利”。日本的一名历史教师森正孝的调查结论是：日军侵华时曾在中国 20 个省市 63 个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死于细菌战的中国民众达 27 万人，传播感染后死亡的军人以及农业细菌战造成的各地大饥荒死亡人数等，则无法统计。2000 年山东调查者崔维志的结论是，仅 1943 年日军在鲁西北实施细菌战中，中国平民就有 20 万人死难。2002 年，又有资料公布：日军侵华期间使用细菌和生物武器，造成 100 万人死亡。我国著名的细菌与病毒学家郭成周通过多年的调查，有充分的证据说明，除了 731 部队，还有长春的第 100 牲畜及农作物细菌战部队、驻扎北京的华北第 1855 细菌战部队、驻扎南京的华中 1644 细菌战部队和驻扎广州的华南第 8604 细菌战部队。

而这只是日本对中国实行细菌战的冰山一角。

一名细菌战的日军最高指挥官之一，日军 13 军司令中将泽田茂战后公开出版的日记记载，他虽然在战役中下令对中国军队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却反对实施细菌战。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明确表示了反对（实施细菌战）的理由，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以这些山野田间的百姓的性命为代价，什么好处也不会有。”

^① 哈桑湖事件，又称张鼓峰事件，是 1938 年 7 月至 8 月间历时约 10 天的短暂边境冲突事件。这是一场日苏之间为了争夺张鼓峰而起的边境冲突。日本先向苏联抗议，称哈桑湖和张鼓峰一带是日本的领地，要求苏联撤军，后见苏联回绝日方的撤军要求而爆发冲突。1938 年 8 月，日方向苏联提出停战的和平协议。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生长在和平时代的人们已经根本不知道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亲历了这种惨无人道却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人们，有人的伤口仍然在溃烂、仍在流淌着脓血，而仇恨和伤口一样，仍然在生长蔓延；施暴者只要仍有人性，则成天生活在噩梦和罪恶感中。

历史不幸被泽田茂言中了。

邂逅细菌战

1952年8月6日，王选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她的祖先来自浙江义乌市崇山村。童年时，她就经常听父亲讲述细菌战给家乡带来灾难的故事：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飞过这座浙中小村的上空。十几天后，村子里爆发了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村人当时不知道灾难的原因。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这里变成活体解剖的实验场。王选的家庭有8位亲人遇难，当时年仅13岁的小叔叔也因染上瘟疫而受尽折磨地死去。每当讲起这些，父亲的脸就会被痛苦扭曲，这一切深深地刻在了王选的心里。

青年时代的王选，同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一起，告别了大城市，到祖国的老少边穷地区上山下乡。王选下乡插队的地方，恰好是义乌崇山村。在这个承载着父辈痛苦而恐怖记忆的地方，王选度过了她的青春时光。后来她上了大学，毕业后仍然回到故乡快乐地教书，快乐地生活。

1987年，王选赴日留学并取得了硕士学位。经过8年的奋斗，她在日本站稳了脚跟，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王选在日本总有一种脚步悬空的感觉，经过一番思考，她回国了。1995年8月，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吸引了王选：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报纸上还提到了两个到崇山村调查的日本人的名字。这个消息令王选非常兴奋，她设法跟他们取得了联系。在电话里，王选介绍自己是崇山村的子孙，能准确地把当地方言翻译成日语，想参加他们的调查活动。对方听后要求和她见面谈一谈。

在车站，王选看到两个日本人向她走来，那一瞬间，她真切地感觉到历史的存在：她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要到日本来留学，

为什么要学习日本文化，拼命了解日本社会。她一下子找到了自己这么多年来经历的全部意义，王选的眼前豁然一亮，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条通向远方的路。

虽然当时王选的心中一阵豁然，但是她认定的这条漫长的路却充满着艰辛和痛苦。接下来的10年中，王选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件事情中，她的人生也开始由此绽放出奇特的魅力。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王选随后同这几位日本人一起去义乌崇山村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同时开始研究学习细菌战历史。随着对细菌战了解的深入，一种责任和使命感让王选再也放不下这件事。1997年8月11日，王选代表宁波、义乌、常德等6个地区的108名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法庭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对他们进行赔偿并谢罪。



其实，王选并不孤单。

1988年，72岁的中国公民郭成周偶然发现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南京等地进行细菌战的重要线索，感到十分震惊，随即展开调查。为了弄清真相，他不顾年迈，只身携带着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和笔记本、历史资料等，六赴东北，五下江南，跑遍了全国各地的档案馆、细菌部队遗址和细菌战现场，查资料，寻遗物，访证人。1991年，纪念“九一八”60周年国际会议在中国沈阳举

行，郭成周将已经调查清楚的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部分真相，制作成一部录像带在会上播放，并宣读了论文——《侵华日军细菌战》，后来他又出版了《日军细菌部队罪行录》，将日本侵略军最隐秘最残忍的罪行一一展现于人们面前，展现于世界面前。

在日本，一个历史教师也同样在追问历史的真相。森正孝是日本静岡中学的历史教师，当他看到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发表在《朝日新闻》上关于日军在中国暴行的报道后感到非常震惊。从1980年起，森正孝先后13次自费到中国调查，自费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侵略》。更重要的是，森正孝在中国发现了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存在，于是开始集中于细菌战的调查。他寻着日军撒播细菌的路线，来到了宁波、金华、衢州、义乌，看到了受细菌战之害到现在仍不能愈合的伤口。森正孝回到日本，发起了“日本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汇集日本600多名律师、教师、记者、医生、艺术家、学者和侵华老兵开始到中国调查取证。

这时的日本，不仅仅只有一个森正孝。1981年，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在给《赤旗报》星期天版写连载小说《死器》时，采访了31名原731部队的成员，为此他写下了长篇报告《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为了证明这些事实的真实性，不仅仅取得了原731部队成员的供述，还查阅了原731部队干部的询问资料在内的美军的资料、哈巴罗夫斯克军事裁判的记录和原731部队干部的医学学术论文，将731部队的恶行作了详细描述，使731部队的存在世人皆知。为此，森村诚一遭到了威胁和指责，但是他没有退缩：“我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追踪战后的731的足迹，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狂热的可怕和民族优越感的实质，不使此类错误重犯。”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兼日本皇太子（后来的明仁天皇）的历史教师家永三郎，于1945年受日本文部省委任编纂历史教科书《国家的历程》，1952年编写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教科书中，家永三郎写到了731部队：“日军在哈尔滨郊外设立了被称为731的细菌部队，他们用抓到的数千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做活人细菌实验并加以虐杀，这种残忍的勾当直到苏联参战才停止。”尽管他写得简单而粗略，文部省也不允许在教科书里出现731部队。

家永三郎被指责为“对民族爱得不够”，“把战争写得太阴暗”。文部省对家永三郎书稿的修改之处达290个。家永三郎拍案而起，1965年6月12日，他将文部省告上法庭，诉其违宪。1966年，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再审还是通不过，家永三郎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第二次诉讼。他要求法院必须澄清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日军暴行、侵略中国等8个历史问题。从1965年到1997年长达32年的时间里，家永三郎面对的是强大的日本政府，他屡败屡诉，屡诉屡败。

1980年10月，美国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长篇报道《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第一个揭开了日美之间关于细菌武器的交易，以及在这种卑鄙的交易下美国替日本掩盖细菌战罪恶的事实；美国人丹尼尔是1993年从BBC和NBC电视台知道731部队的，他把他看到的新闻报道讲给周围人听，但没有人相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丹尼尔也不敢最终肯定，这样残忍的事真的曾经发生过。2002年他终于见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实例，这位幸存妇女的脸烂掉了一半，生活完全被毁掉了。

……

与这段惨痛的历史相遇的，还有很多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这种相遇从此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轨迹，因为对于这样的历史“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然后再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开。为了能够启发人们，他们可能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去探寻人类历史的真相，揭开不为人知的秘密。

记忆不是为了仇恨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很多精英们一讲中日历史问题就是国家关系，或者似是而非的什么主义，几乎不提受害者。连‘愤青’都把受害者扔在了脑后，只是痛痛快快上街游行喊口号。有一次，我给大学生演讲后，居然还有学生愤愤不平地问我：你说不是为了仇恨日本人，那为什么要搞历史调查呢？”

“搞历史调查是为了搞清历史真相，为了修补历史黑洞；搞清历史是为了和日本清算过去，日本的历史罪过得不到清算，亚洲就不可能成为一体。清算不是为了恨吗？不，清算不是为了恨，清

算是为了宽恕。”

1980年，一股和平力量发端在日本国内，他们在日本社会传播受害者的声音，让日本人了解亚洲在日本侵略下的受害真相。日本的战争补偿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凸显出来。

中国民间最早的赔偿要求始于1988年9月。这些民间发出的声音，想要揭露的是人类历史最狰狞的一幕，同时也为了了却一段宿怨。当时，曾受过战争伤害的山东省茌平县张家楼村200多名村民，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呈了一份索赔书；后来又有江苏、山东、浙江的28封索赔书寄往日本大使馆；1994年8月，浙江义乌崇山村的3个农民以村委会的名义起草了联合诉状，由崇山一带1万多村民署名，然后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

1996年，王选加入了义乌崇山的调查和诉讼，会讲一口流利的崇山话和日语的她，给日本和崇山村之间架起了一座顺畅沟通的桥梁。王选同时又是一根丝线，把崇山村的原告们串到了一起，使这个民间的群体有了合力。一直关注和参与案件的日本历史教师森正孝也在其中，他在日本发动了律师义务承担诉讼，王选则带着律师到义乌取证。

从调查到审判，这场细菌战诉讼已经整整10年。在这10年中，中国的原告们42次前往日本，王选独自站在法庭上有18次。日本的律师们则40多次开庭和20多次赴中国调查取证，其中的苦辣酸甜，只有亲历者才能知晓。

从1995年王选参与细菌战的调查和诉讼至今，已经10年多了，对于王选十年如一日的奔波与呐喊，引来了各种评论与猜测，很多人都认为她是在复仇，充满她胸中的是仇恨的烈火。十年磨一剑，但王选磨就的不是复仇的利刃，她挥剑砍去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毒瘤，她要抹去死去和幸存的受害者们不堪回首的记忆和伤痛，还给他们作为人类的尊严；她要让无动于衷的施害者悔恨和动容，让背负着沉重的心灵十字架的人们解脱出来。王选说：“我们的努力与复仇和仇恨无关。我们是中国和日本战后的一代，我们共同寻找这段历史，一起反思历史，是想走出战争的阴影。这场诉讼是一种文化活动，是普世的、人文的，而不是狭隘的，其中也没有任何政治的成分。我们是从文化和生命的角度去推动

这个过程。”她要让世界承认：和平是永恒的主题，战争是非理性的中断。战争索赔为世界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和平时期的人们发现了战争的残酷，也知道了和平的可贵。

不仅如此，这场中日民间共同参与的寻找历史、反思历史的社会活动，起初完全没有女性的声音。王选用她对生命的感知和感悟，用她的抗争和努力，在这样一场意义深远的活动中，发出了女性的声音。她从一个热爱生命的视角去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的人性的闪光点。“其实几乎每一个亲历战争的人都是充满悔恨的，他们都对战争极其厌恶，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战争完全没有正义和人道。”

“不是说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爱有恨，有血有肉。日本的男人就像漫画里的人，他们看到新鲜的事物从不掩饰自己的惊讶和好奇，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因为对事物的敏感使他们的心态永远保持年轻。”

王选同样保持着一颗年轻而敏感的心，当王选看到在细菌战中被日军捆住手脚，要被送去做实验的中国人的照片时，看到这些年轻的男人脸的轮廓幼稚得像个儿童，圆圆的，身体的肌肉厚实，“这个人的生命这么健康这么美好，怎么能故意让他去染病呢？”王选在调查中不时要面对这种刺激，要克服心中的痛苦。

二审结束后，大家建议参加诉讼的成员每人写一段话，王选写道：我们把历史推进了一步。这是她对这次诉讼活动的领悟。

在最后一次的法庭陈述中，王选用纯正的日语响亮地说道：“一个公正的判决不仅要让那些死难者得到解脱，而且对于被告者的一方也是一个解脱；一个公正的判决可以让那些背负了几十年十字架的人们从此得到解脱，能够让他们在短暂的余生中，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地活着。他们应该得到解放，不应该因为经历了这场战争就永远活在自责和负罪中，因为他们也是普通的人。”

诉讼不是为了更多的恨，是为了国家与民族之间更多的和平，是为了让生长在和平环境中的民众理解和平的价值。诉讼不是回首过去，更是为了和平的现在，和平的未来。因为世界的和平正在受到威胁。

日本记者近藤昭二说：“细菌战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是现实问

题，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至今还在研究细菌武器，日本政府去年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许日本自卫队做细菌武器的实验。一些国家在细菌武器研究上的投入，已经高达几兆亿日元。而且现在研究的细菌武器危害更大，是没有疫苗可对付的细菌。因此，我调查当年细菌战的真相，并且出庭作证，目的是为了世界永久和平。180名中国原告到日本诉讼，我想除了民族的尊严外，也是为了告诫后人，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中国不能再沉默

对于细菌战的研究，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细菌战的许多重大问题至今尚未搞清楚，比如日军活动的组织、各部队的设置、具体的犯罪形式、受害者人数、受害者的现状及细菌战产生的深远长久影响等问题都没有具体的结论。并且，现在重大的档案材料、重大的秘密都是从日本先揭露出来的。

2000年，克林顿在卸职美国总统前签署了“日本帝国情报公开法案”，美国将搜集到的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的600万份文件与情报资料解密公开，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日本战争犯罪的文件，如在中国的战争掠夺、“三光”政策、毒气战、奴役劳工、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内容。

2003年，王选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细菌战资料。她是第一个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查看这批资料的中国人。她在600万份资料中查找了一个多月。“在档案馆里，查看这段历史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而日本的学者每天都有十几个，双休日时占到查档人数的一半。他们对历史的负责和关心，常让作为中国人的我，为身边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而伤心。中国的学者为什么不来？这些档案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呀。”

1996年12月，王选在美国演讲，她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是人！我们整整沉默了50多年，但今天我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些成千上万死得痛苦、肮脏而屈辱的中国人，那些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细菌‘试验体’，曾经在地球上尊严地活过。”

中国人为什么整整沉默了半个世纪之久？当中国人试着向世

界诉说的时候，才发现整个世界对这段悲惨历史的淡忘和漠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早已过去的旧事；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细菌武器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人们茫然不知其中的残酷和可怕。不仅仅是世界，还有中国人自己。

2002年8月27日，对作为原告的中国180名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经过数十次庭审后，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终于作出一审判决：首次认定“二战”期间日军曾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并全面认定了原告方提出的受害申诉，承认日本政府对此有国家责任，但驳回原告提出的谢罪赔偿的诉讼请求。这一天，世界各大媒体集聚东京地方法院门口，迅速将判决消息公之于众。中国民间通过法律途径清算日军血债的行动，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她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王选他们的诉讼为许许多多没有声音的甚至没有姓名的受害者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全世界都听到了。王选也在调查取证和法庭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作为中国女性的声音。

10年中，王选频繁往返于中日之间，悉心搜寻细菌战的各种直接证据，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所花费的财力、物力、心力、精力难以计算。她把个人积蓄和工作收入悉数投入，无怨无悔，调查、诉讼成了她生活的核心。

……

1998年2月16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进行了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第一次开庭，王选代表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1999年原告增加到180名）作开庭陈词，她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说：“……我们180名中国人原告是战争中日军731部队在中国浙江省、湖南省进行的细菌战受害者以及受害者的遗属。我们以日本政府为本诉讼的被告，要求日本政府作为日本国家的责任者，正式承认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对这一战争犯罪造成的损害承担战争责任。

……

我们原告团将和辩护团以及支持我们诉讼的日本、中国和世

界人民团结起来，伸张受害者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进而维护人类的尊严；揭露细菌战的罪恶，进而维护正义；控诉细菌战的非人道，进而维护和平……”

2002年底，王选被评为“CCTV感动中国2002年年度人物”之一，评委会这样评价他们：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公众，感动了中国。他们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诠释着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应该担当起怎样的责任，以坚强的民族精神挺起国人的民族脊梁；他们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情感，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他们共同的特质是：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

的确，王选用她洋溢的热情和艰辛的努力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冯守娥
青春，
燃烧在战斗
的原野

文：陈志平

我们的青春像烈火样的鲜红
燃烧在战斗的原野
我们的青春像海燕样的英勇
飞跃在暴风雨的天空
争取人与人之间平等、公平的对待，以及追求世界
大同世界和平的理想。

如果说歌如人生，那么属于冯守娥的主题歌不止一首，有时是独唱，有时是合唱，有时是重唱，每一首都是以生命的音符串成……

启蒙

冯守娥出生于1930年台湾省宜兰县冬山乡旧称奇武荖的小农村，她是母亲因繁重农忙连续夭折了两名男孩后生下来第二个存活的孩子，也是家里第一个女孩。即便如此，重男轻女的祖父仍

劝说父亲将终究要嫁人的女孩送人当童养媳，所幸父亲坚持无论男孩女孩都要自己养育，并一视同仁地细心教导。当时父亲一边务农，一边在公学校担任老师，他开明且认真求知的生活态度，不但改变了冯守娥的命运，也成为她生命的启蒙者。父亲教导的一首日本歌谣，更让冯守娥仍懵懵懂懂的小脑袋，开始摸索人生的意义：

我为什么生出来？

（私は何故生まれ來た？）

生出来的我究竟要做什么？

（生まれて私は何をする？）

只是吃？只是睡？只是动？

（只食い動き眠るなら）

这跟禽兽不是没有两样吗？

（鳥も獸も変りない！）

从有记忆开始，冯守娥似乎就少有空闲的时间，她的母亲18岁结婚，48岁过世，30年间共生下14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身为家中的长女，冯守娥身上总是背着要断奶的弟弟或妹妹，双手还要帮忙得喘不过气来的母亲做家事，因此从八九岁开始，冯守娥已隐约感受到传统女性的生命是如何的沉重。

虽然母亲短短的一生累得没有享过福，但在当时的环境，冯守娥的父亲还是很疼惜妻子的。冯守娥五岁的时候，父亲带着母亲和孩子，从冬山搬到宜兰县最繁华的罗东镇，白手起家做酱油生意，尽管生活忙碌且辛苦，父母仍会找时间聊天，每晚吃完饭，父亲母亲更会喊着“团仔（小孩子）来唱歌啦！”全家人就挤在榻榻米上一个个表演、唱歌，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幸福。

冯守娥的父亲从小教她和哥哥《孟子》，告诉他们“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父亲也常常出些算术题考冯守娥和哥哥，有时冯守娥算得比哥哥快，父亲更是大力称赞，一次父亲说完“孔融让梨”的故事，冯守娥和哥哥自此就常为了要让好东西给对方，争得面红耳赤，但这也是冯守娥和哥哥仅有的吵架记忆。

尽管女性意识已日渐萌芽，但和乐的家庭、父母对男孩女孩

平等的教育以及跟她大她两岁的长兄冯锦辉深厚的感情，让冯守娥对男性没有反感，但有时候哥哥偷懒不想做家事，总说“在大事上让父母高兴比较重要”，家里的事是“小事”因此不重要，只是这些“小事”最后往往由冯守娥接下，这也让她长大后对女性不平等地位的思索，更着重于探究制度和传统观念的不合理。

虽然从小感受到传统女姓的辛苦，不过随着年纪渐长，让冯守娥困惑的，还有大人们谈起日本政府或抗日事件时讳莫如深的态度。当时是20世纪40年代左右的台湾，自1895年日本占据以来已历经40多年，曾经真诚相信皇民化教育，冯守娥小时候一度虔诚得每当买了零食、获得全优成绩时，都会先拿到日本政府规定每家设置的日本神棚拜拜，感谢“天照大神”的庇佑；只是日本人视台湾人为“二等国民”，对台湾人无论在教育措施、战时生活物资配给上都采取歧视待遇，逐渐让冯守娥感受到身为殖民地人民的悲哀；就在日本战败前不久，有一天，哥哥被征召当日本兵，冯守娥的父亲偷偷要他多带一套中国衫，并叮咛哥哥万一碰到中国人打中国人，千万要逃走，因为大家是一家人，当时，冯守娥已真切地明白台湾人不是日本人。

自由的吼声

除了对女性问题的疑惑和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不平，战争末期美军频繁对台空袭、空袭后支离破碎的惨状以及随时随地躲空袭的日子，让冯守娥深刻感受战争的可怕以及和平的可贵。然而，迈入少女时代的冯守娥怎么也没有想到，当战争终于结束、台湾终于光复，迎接她的竟是一生中最悲凉的一段岁月。

1945年8月15日是个大晴天，当时冯守娥已从罗东女子公学校毕业，考上宜兰兰阳高等女学校，顶着炙热的阳光，冯守娥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整庄的人因为稻米缴得不够，被日本人罚跪还用力责打，她看了义愤填膺，一路上直气愤地想着要不要写封信向日本总督府抗议，没想到一回家就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玉音放送”，顿时全民欢欣鼓舞，大家高喊着终于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回到祖国的怀抱里了。

光复后两岸恢复交流，高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让像冯守娥和冯锦辉这样的知识青年，发奋地勤学中文，对来自大陆、

日本的社会主义新思潮，以及大陆传入翻译西方的名著更是求知若渴，冯守娥和哥哥冯锦辉勤读《复活》、《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傀儡家庭》以及《她的一生》等世界名著，在两年内学会用中文写作。在课堂上，大家念的是矛盾、巴金的文章，课堂后，同学热烈讨论“三民主义”的思想，在摆脱了日本、终于成为自己的主人后，怀抱理想的台湾青年满腔热血都在思索如何救中国，这群大无畏的青年，仿佛个个都想一肩担起复兴中国、唤醒东亚睡狮的担子。

从小就对妇女处境格外同情的冯守娥，此时开始投身台湾战后最早的学生妇女运动，她和同学们在三八妇女节时于学校开纪念会、唱妇女节歌，并数度代表在学校演讲，主张提高妇女的地位，当时冯守娥还写了一篇《论台湾妇女》的文章，强调台湾即使在日据时代仍教育妇女三从四德的思想是错的，但解放妇女也不能学美国妇权运动者极端主张“女尊男卑”，台湾的女性应从提升自己的能力做起，不要被琐碎的家务封闭心灵，应该多读书、多关心社会，提高自己的眼界，并应根本建立男女分担家务的社会制度及设施，包括托儿所、养老院等，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此时萦绕在冯守娥心中的，是学生们一遍又一遍热情地唱的妇女节歌：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
万物在春天里复苏
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
在三八喊出自由的吼声

从此我们永远打出非人的牢笼
困难使我们变得更坚定
旧日的闺秀变成新时代的英雄

我们像火花像炸药
像天空的太阳一样光明
武装起头脑
武装起身体
勇敢地把自己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里……

烈火的青春

但是战后经济萧条，来台接收的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人民对社会的不满急剧升高，动乱一触即发。一次冯守娥坐火车到宜兰，一名混混故意把一个乘客的东西踢下火车，乘客气得跟混混理论，这名混混还大言不惭地说“三民主义，自由平等啦！你要怎么样？”不久后，于1947年2月28日，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①就爆发了。

如同电影切割的场景，此时冯守娥还不知道，在西岸台中由谢雪红领导的二七部队中，一名担任突击队队长、率部队进攻日月潭的台中农学院学生陈明忠，日后将是见到哥哥冯锦辉最后一面的牢友，并成为冯守娥一生的伴侣。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由当年的满心期待转为失望、憎恨，但知识青年、大专学生却从从未中断的两岸交流中发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一样不得民心，并于国共战争中节节败退，台湾的知识青年因此兴起一股“向左转”的热潮，由认同“白色祖国（国民党政府）”转而认同“红色祖国（共产党政府）”，许多青年即使没有加入台共，仍然热切地追求社会主义标举公平正义的理想，由大学生组成的社运艺术团体“麦浪歌咏队”、“乡土艺术团”，在台湾全岛巡回表演，倡导社会主义思想，造成极大的轰动。

身在东岸冯守娥与哥哥冯锦辉，和西岸的大学生、知识青年一样，热烈地组织“读书会”，讨论着如何改造社会的问题，此时冯守娥还写了一篇长达19页《论中国教育》的文章，分析日本教育和中国教育的优缺点，当时一首名为《青春战斗曲》的歌，深刻地描绘这些爱国青年的热情：

我们的青春像烈火样的鲜红
燃烧在战斗的原野

^① “二·二八事件”是1947年2月至5月间于台湾发生的官民武装冲突，以及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的族群冲突。事件主要导火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政府垄断台湾的经济，实施烟的专卖，查缉私烟，而同时，台湾人和大陆人在政治方面受差别待遇，引起族群冲突。事件最后在军事镇压中结束。

我们的青春像海燕样的英勇
飞跃在暴风雨的天空

原野是长遍了荆棘
让我们燃烧得更鲜红
天空是布满了黑暗
让我们飞跃得更英勇

我们要在荆棘中烧出一条大路
我们要在黑暗中向着黎明猛冲

然而，当冯守娥的父亲读完冯守娥的文章，虽然说写得不错，但“二·二八”事件后当局镇压的余悸犹存，父亲因此也忧心地提醒她要小心，父亲说，他也很重视教育问题，但国事最好不要碰；没想到没过多久，父亲的担忧成真，而且就在同一天，冯守娥和她的哥哥冯锦辉都被情治人员带走。

1949年，在国共战争中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有美国做靠山，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展开长达二三十年、逮捕数万人并处死数千名精英的“白色恐怖”，就在那一年5月14日傍晚，冯守娥和哥哥冯锦辉，先后被带上同一辆吉普车，并载往台北关入“保密局”，数小时的车程成为冯守娥和哥哥最后的道别，同年10月2日，年仅22岁的冯锦辉遭到枪决，冯守娥被判10年徒刑，在送往台北监狱后又移送到在东台湾外海的岛屿“绿岛”监禁。

命运的安排，让当时与冯守娥还不相识的陈明忠，和冯锦辉关在同一个牢房里，曾经以为自己要被枪决而吓出一身冷汗，当陈明忠和要被带往刑场前的冯锦辉握手告别时，却惊讶地发现冯锦辉面对死亡，双手仍如热血般的温暖，“原来真的有人能做到视死如归！”陈明忠对只大自己一岁的冯锦辉满心佩服，因此当有人告诉他同在绿岛的牢友冯守娥就是冯锦辉的妹妹，陈明忠默默地记在心里。

被带离罗东后，虽然和哥哥关在同一处，但牢房的铁窗、高墙，让挚爱的哥哥至死无法再见冯守娥一面，每当牢房的看守急忙地关着走廊那一头靠着法庭的窗子，大家就知道又要有人从法庭被带出去枪毙，10月2日一大早，冯守娥和哥哥被指控的案件

秘密宣判，看见看守又急忙地关上走廊的窗子，“窗外是哥哥正被带往刑场吧！”在牢房的这一头，冯守娥忍不住泪如雨下，心中一边为哥哥唱着“安息歌”，虽然早知道走这条爱国路就要有可能牺牲的觉悟，冯守娥却仍痴心地希望此刻突然刮起大风雨，在一片混乱中，哥哥就像电影情节一样被人救走了……，只是这样的奇迹在现实人生中终究只是妄想。

在那个纷乱的时代，许多理想青年就这样失去了生命，只有同拥爱国情怀的牢友们，在刑场另一头的牢房里唱着“安息歌”，送他们走上最后一程：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的路
指引我们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荣
你为爱国而牺牲
冬天有凄凉的风
却是春天的摇篮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的路
我们继续向前走。

如今回想，当初哥哥冯锦辉炽热的手心，想必也是为妹妹终能保住性命，而稍稍感到安慰吧！但失去了如挚友的长兄，冯守娥心中的悲凄无可言喻，然而尔后，狱中一个个人格高风亮节的老师、牢友，同样被带往刑场的不归路，4年后冯守娥的母亲突然病逝，狱方却不准她返乡奔丧，种种伤痛、遗憾，让还正是双十年华的冯守娥历经沧桑，但这样悲苦的日子，在牢友们相互安慰彼此打气下终于过去。1960年5月31日，冯守娥坐满10年期出狱，此时她已经31岁。

民主和平的花朵

在那个年代，政治犯就算出狱，求职生活也常常四处碰壁，大家因此戏称是“出了小牢”却“进了大牢”，但在辛苦取得稳定的工作后，冯守娥和陈明忠相遇、结婚，并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尽管两人都因追求理想坐了10年苦牢，心中的热情却丝毫未消退，更因夫妻拥有相同理念，对人生理想执著的烈火持续燃烧，两人为女儿取名“志民”、“志平”，意含“志在民主”、“志在和平”，名字的源起是两人年轻时都唱过的歌“和平民主的鲜花儿开”：

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
地里的鲜花，是什么人来栽
什么花儿开放呀结出了自由的果
什么花儿开出呀幸福幸福来

山上的荒地是我们大伙儿开
地里的鲜花是我们大伙儿栽
民主花儿开放呀，结出了自由的果
和平花儿开出呀，幸福幸福来

和平民主的鲜花开
自由幸福的日子来
咱们大伙儿多自在
快来看好花果树呀
让它好好的站起来

站起来呀站起来
别让它遭灾害
别让它遭灾害
别让它遭灾害

然而，一家四口和乐的日子只维持了短短10年，1976年党外势力正逐渐壮大之际，同年7月4日，陈明忠因参与党外活动第二度被捕，7月5日，特务人员气愤地质问在牢里遭到刑囚审问

的陈明忠，家里房子登记在女儿名下是不是“预谋犯案”，由于当时政治犯若遭以叛乱罪判处死刑，财产将全数没收并分给特务作为奖金，陈明忠因此惊觉自己将被求处死刑，果然，历经六天五夜、及三次五天五夜四阶段，包括拔指甲、灌辣椒水、电击等残酷刑罚，当局却仍得不到要的口供后，10月29日，检方仍以“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唯一死刑罪，将陈明忠起诉。

此刻冯守娥再度面临人生最大的变局，先生陈明忠被抓进去一周没有消息，自己也被监禁疲劳审问二天二夜，但获得释放后，冯守娥发现自己被羁押期间，警总偷偷拿走家里的户籍证件，家人根本没有办法请律师为先生辩护，检方却已求处陈明忠死刑，冯守娥赶忙补请律师，却又再次遭到当局逮捕，结果请的3位律师最后一句也没能帮先生辩护。情势如此的严峻，想到哥哥遭枪决时无力挽回，冯守娥被释放就努力奔走请求救援，在特务严密监视中，她偷偷把讯息传给在美国的二妹和重视人权的国际友人，妹妹立即在美国召开记者会呼吁各界声援，于是，包括美国副总统韩福瑞写信给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要求释放陈明忠，国际特赦组织要求政府提出叛乱证据，并认定陈明忠为“良心犯”，美、日的人权运动者也先后发动救援游行，在美国的华侨与留学生，更热心地集资1.6万美元刊登《纽约时报》全版广告，要求释放陈明忠，最后警总被迫退让，11月27日，陈明忠被改判15年徒刑。

度过最冷的冬天

陈明忠死里逃生，却因遭严酷刑罚全身是伤，不但颈椎、脊颈受损，自此手和膝盖也都不再灵活，此次冯守娥虽然没有一同入狱，却一样面临艰困的处境，两个女儿一个9岁一个10岁，刚缴完最后一期房贷，全家存款只剩1万元，本来婚前冯守娥担任的会计及日文翻译工作一直维持到婚后孩子上小学，但因学校只上半天课小孩放学后无人照顾，冯守娥只好辞去工作，如今先生再次身系囹圄，冯守娥已是46岁的中年妇女，要重新就业岂是易事？所幸学生时代认真求学打下的日文基础，此时再度派上用场，冯守娥找了翻译日文文章、日剧录像带的工作，并看报纸应征补习班日文教师，由于教书认真，广受学生好评，学生帮忙宣传、

介绍，冯守娥逐渐在各日文补习班及私人公司开课，日常开销终于不至于成为问题，且日文一教就近30年，直至74岁冯守娥才退休。

但当年的生活仍是艰辛的，为了赚取一小时数百元的微薄钟点费，冯守娥常常必须换三班车去教书，连一包10元的铝箔包饮料都舍不得喝，一个台风天晚上，上完课从新庄赶回家，冯守娥还掉入因淹水看不出没有盖上孔盖的下水道坑洞里，最后请弟媳赶来帮忙送医急诊；即便日子过得这么辛苦，冯守娥仍坚持每年寒假、暑假，一定要和两个女儿带着学校一学期的作业、一大箱的食物饼干，从台北或坐车、或搭船到台东，再换乘小飞机到绿岛与先生会面，尽管每次花数万元旅费，3人只能见先生半小时，冯守娥的探夫之旅却是十年如一日，为的就是不要让孩子忘了爸爸的长相，了解父母为一生的理想无怨无悔。

一个人要撑起一个家，还要承受当局无止尽的监视压力，在这段辛苦的日子里，冯守娥每当遭遇挫折觉得快撑不下去时，就会唱一首“度过这冷的冬天”来安慰自己：

度过这冷的冬天
春天就要到人间
不要为枯树失望
春花就要开放

度过这冷的冬天
春天就要到人间
不要有一点猜疑
春天是我们的

但陈明忠当初被严酷刑罚的后遗症，在他坐牢第9年开始愈发严重，身体愈来愈差，冯守娥再一次为先生寻求援助，向当局申请让陈明忠保外就医，但一次又一次遭到驳回；然而冯守娥并未因此放弃，一个月又一个月，针对每次驳回的理由，冯守娥的陈情书一封又一封的寄，被驳回再寄、寄了再驳回、驳回了继续寄，两年间她不间断共写了30封请求保外就医的陈情书，平均每20天写一封，直至第30封，经由朋友帮忙，辗转交到当时任职总

统府一局局长的马英九手中，在马英九低调帮忙下，陈明忠终于获准保外就医，并在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获减刑为10年出狱，但此时陈明忠已被关了11年。

在陈明忠获保外就医前，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确实不佳，当局先将他送到花莲军医院医治，尽管台北花莲仍有相当距离，但对冯守娥来说，比起在台东外海的绿岛已经近了许多，她因此从过去每半年带小孩会见先生一次，改为每个周末清晨搭北回铁路第一班列车到花莲探视，如果花莲医院不准接见，冯守娥就会坐着不走，直到院方退让为止，相对于许多政治犯入狱后就落得妻离子散的悲凄下场，冯守娥的坚持，让看守陈明忠的人都不禁动容，他们忍不住感叹“居然有这样的太太”，并对陈明忠说“你们的感情一定非常好，否则你的太太怎么可能做到这样”。

但对冯守娥来说，当初选择陈明忠作为终身伴侣，就因为两人拥有同样的理想，11年来面对家人心疼的眼光，冯守娥始终强调她和先生婚前就约定，彼此不会成为对方的包袱，先生为理想坐牢，她坚定地支持从不以为苦，反而安慰婆婆不要认为自己苦命，终于经过11年分离，冯守娥一家团圆了，但总计，冯守娥和先生陈明忠前后已坐了31年牢，哥哥冯锦辉更为理想牺牲了生命。

压不扁的玫瑰

许多曾遭到政治迫害的人，出狱后都选择不再过问国是，然而冯守娥和陈明忠追求和平的热情却未被这样艰辛的经历消磨，相反的，他们从未忘记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下，被殖民人民的悲哀与痛苦，也始终坚信国共内战、两岸对立，是造成过去台湾白色恐怖悲剧，以及当前两岸紧张关系、台独势力高涨的根源，因此尽管屡遭打击，从陈明忠1988年出狱至今，冯守娥和陈明忠仍不间断支持各项促进两岸和平运动，并参加反战争、要和平、争人权的国际会议以及反殖民团体的抗争活动，同时，多年来两人也持续参与争取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事件平反运动。

也因此，当2001年小泉纯一郎当选日本首相，并宣布将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东亚各国质疑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后，冯守娥和陈明忠以“被害申告人”身份，结合百余位台湾爱和平的

人士与原住民以及百余名日本、韩国人士，于2003年2月共同向大阪地方法院提出“靖国参拜违宪诉讼”，并担任台湾原住民要求领回战死祖先在靖国神社灵位行动的翻译与顾问。

冯守娥在对大阪法院提出的申告书中强调，她虽然不是为日本战死沙场的旧殖民地战死者遗族，但她曾经是旧殖民地的人民，充分体会到殖民统治下人民的悲哀及受军国主义蹂躏的痛苦，作为当年的受害者之一，日本军国主义是否复苏因此也是她的切身问题，尤其在陈明忠遭受政治迫害面临死亡威胁时，曾受到包括日本、美国、英国等爱好和平人士发起救援运动资助，她因此相信，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防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不只是为确保旧殖民地出身的战死者遗族的权利与尊严，更是为争取人与人之间平等、公平的对待，以及追求世界大同世界和平的理想。

冯守娥和陈明忠不只向大阪法院提出诉讼，两人更以超过75岁的高龄，自掏腰包3年内赴大阪出庭九次，同时义务担任整个诉讼团队的翻译，历经3年的诉讼，日本大阪高等法院终于在2005年9月30日判决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展现有良心的日本人对军国主义的反省。

在此同时，冯守娥夫妻对促进台海两岸和平的努力也未曾中断，2005年2月27日，陈明忠在冯守娥的陪同下，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源起，发表了“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演讲，详细阐述国共内战是导致国民党统治台湾进行白色恐怖肃杀的根本原因，并呼吁国民党“解铃还须系铃人”，应从国共和解做起，进一步促成两岸和解、共同追求中华民族的强盛繁荣，在陈明忠演讲后，当时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当场宣布要访问大陆展开“和平之旅”，两个月后，睽违60年的国共两党在北京谈和解，连战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签订了“连胡共识”，冯守娥和先生陈明忠多年来为两岸和平付出与努力，终于见到成果。

许多人都惊叹于冯守娥和陈明忠过去几十年艰辛的人生历程，但冯守娥却形容自己的人生有如不断在爬山，过程虽然辛苦，但每爬完一座山总有极大的欣慰，尽管遇到爬不动的时候，但总有亲人和朋友适时地拉一把，让她在苦难中更深切感受到家人、朋友的温暖；此外，爬山时每会会遇到有同样信念、志同道合的朋友，冯守娥说，例如2005年12月在中国昆明遇到的和平姐妹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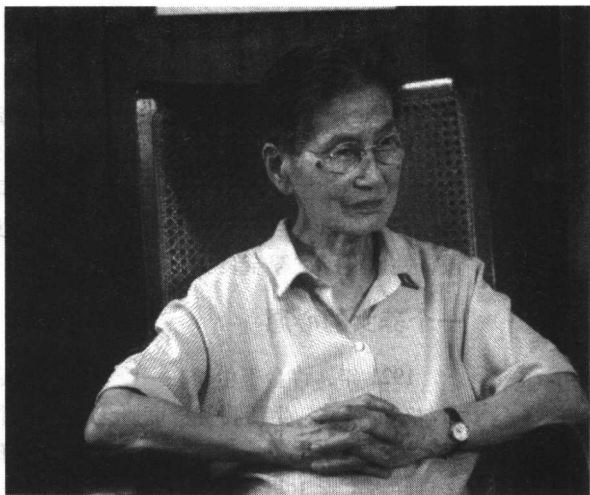
尽管努力的领域、方式不同，大家却都是秉持着追求和平的理想，不畏艰难持续奋斗，当和平姐妹们相互交换着“爬山”的经验与心得，这样的时刻格外让人感到无法形容的快乐。

冯守娥还是中学学生时，国文老师教大家一篇“聪明人与傻瓜”的故事，大意是奴才住的房子没有窗户，他跟聪明人抱怨，聪明人只是说“是，是”却没有动作；他向傻瓜抱怨，傻瓜帮他打了个窗户，奴才却反骂傻瓜“你怎么打坏我家？”当年冯守娥一听完故事就站起来问老师，究竟希望大家做聪明人还是傻瓜，老师只说这是个人的选择，没有给学生们答案。

但显然从那时候起，冯守娥已选择走一条吃力不讨好的傻瓜路，环顾四周，像冯守娥一样抱持愈挫愈勇的傻劲走傻瓜路的人还真是不少，这一群“傻子”，尽管走的路布满荆棘，一路上备受打击，但大家就仿佛台湾文学家杨逵笔下“压不扁玫瑰”，不仅挣扎着从石缝中开出一身的艳丽，更坚持以烈火样的鲜红，燃烧青春无悔的战斗。

许金玉

一条漫长的道路



文：辜金良文化基金会^①

社会主义是必须从生活中实践的道理，蛋行的工作便是一个实际的试炼场。

做一对有良心的商人，实现一个按劳动分配的世界。

在时代的浪涛中，人就像航行的船只，终究会沉没至海底的深处。而大部分的船只，即使风平浪静的时刻，也会无缘无故地浸水。但是有一些船，不但经得起风浪的考验，而危险的巨浪反而会将他们推上人生的顶峰，甚至引领潮流，直至沉没也终生不悔。而跨越日据殖民政府与国民政府时代的许金玉女士，便是其中的一个。

1921年，许金玉出生于日据时代的台北万华。简单说来，她

^① 本文改编自蓝博洲在《台湾好女人》中的《许金玉》一文，并参考辜金良基金会的《辜金良先生行谊》，以及作者平日曾与许金玉女士言谈的资料。

的生命阶段，大致可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是养女阶段，因为自身不幸的家庭命运，使她想成立一家孤儿院。第二个阶段是，在计梅真的影响下，使她的目光投射至改造社会运动，参与全省性的邮局抗争运动，最后并在监狱中度过15年。第三个阶段是出狱后，与社会主义者辜金良先生结褵，共同对抗不友善的社会环境，并成功以社会主义的理念经营“滋良蛋场”企业。第四个阶段，她创设了“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致力于海峡两岸统一运动。

一个养女的心愿

1921年，许金玉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家庭。许金玉的父亲是拉黄包车的苦力，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在那个没有节育观念的年月里，她的母亲生了4男4女，一共8个小孩。为了维护家计，父亲只好将4女1男送给别人抚养，而许金玉便是这样到了养父母家。

许金玉的养父是一名当包工的水泥匠，因为没有小孩，便将许金玉接回家居住，并疼爱如己出。相对来说，养父母家的经济情况相当富足，平日3餐饮食都相当营养。根据许金玉先生的回忆，她是一位幸福的养女，喝牛奶喝到九岁，后来怕同学笑，她才要求养父不要再送牛奶到学校了。从这点便可看出，养父母对许金玉相当照顾。

在传统的旧教育与日式的新教育的双重影响下，许金玉从小便是一位害羞的女孩。一方面，养母在家中教育她遵循封建的旧礼教。养母曾再三告诫她，女孩子即便是笑的时候也不能出声。另一方面，金玉进入公学校念书后，教导她的日本老师教学态度十分严肃。这位日籍老师按照日本的传统，要求女孩子的生活态度就是服从。在学校与家中教育的影响下，使少女许金玉内心害羞，看人的时候不敢正视，要她说话会脸红。

当时带给许金玉对现实世界有更辽阔的视野，是养父的另外一种教育。这位养父是一位反日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时常去听进步左派团体“农民组合”的“民众宣讲”。当时的这些宣讲人，往往会受到日警的监视与阻扰，并有牢狱之灾的惩罚，但他们仍有骨气地继续批判日本殖民政府。养父常将会场的情况及演讲内容讲给许金玉听，使她的反日民族意识也自然而然地萌芽。这

不但让她认识到日本殖民政府的不义，更加深自己身为中国人的想象。但是也因为民族意识，其养父并不允许许金玉继续在日人开设的学校就读。因此，许金玉在公学校毕业后，白天便到工厂当女工，晚上再去学习汉文。

在15岁时，许金玉的生母因为连续4次流产而过世，这带给她的人生观巨大的影响。后来她生父续弦，继母又不照顾家。这使得她的弟弟们沦落到社会底层，早早便结束了生命。所以，从那个时候，许金玉就认识到，家庭的不幸往往造成小孩的悲剧。因此，常常不开朗的她在心里立下了志愿，希望自己将来能办一个孤儿院，照顾那些没有父母照顾的小孩。不过，当时单纯的她尚未有能力认识到孤儿的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怎么样才能认识到从社会的根本来改造这个社会，这要等到她生命中的启蒙老师计梅真的出现。

生命的转折点

一个人生不顺遂的因素，却让许金玉从养女跃上台湾劳工运动的舞台。许金玉到了适婚年龄时，在其养父的要求下，她的婚姻不能自主，只能男方入赘女家。许金玉为报答养育之情，默默接受养父的安排；同时，她也为自己争取到社会工作的机会。1944年，在三四百个应征者只录取两名的考试中，许金玉顺利进入台北邮政局，担任保险科文书组的工作。而这正是她命运改变的开端。

一年之后，台湾光复，重新纳入中国的版图。在日据时代，台湾人处处被殖民者日本人欺压，因此光复后普遍洋溢着兴奋之情，但随即这份希望变成破灭。一开始，怀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许金玉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当她头一次听到陈仪^①在广播的时候说了一句：“亲爱的台湾同胞……”，眼泪就忍不住地掉了下来。那时候，她终于知道自己原来是那么深爱着祖国。

但是没几个月，许金玉的热情就冷却下来了，并对国民党政

^① 陈仪（1883年至1950年6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二次大战结束后，曾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在任期间发生二二八事件，后试图投靠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于1950年处决。

权相当失望。这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生活与语言上的差异，二是本地人与外地人差别待遇的问题。而这两者所反映的基本问题是，外省人自以为是统治者，而将本省人视为被统治者。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大批素质不良的人员占据台湾公家机关的上层，不但职位高于本省人，甚至薪水也是台湾人的数倍。目睹这种情状的许金玉，对这批人真是灰心透顶，但一位外地来的国语老师却改变了她的这种想法。

1946年夏天，当时邮务工会理事长陆象贤聘请同样是江苏籍的计梅真和钱静芝，来台湾担任工会的国语补习班教员。陆象贤、计梅真与钱静芝，皆是中共地下党人，与当时台共领导人蔡孝干一同发展邮局的组织工作。当时，计梅真看出许金玉是个认真负责的人才，而不断邀请她来上课。这让许金玉对外省人的看法改观，并进一步认识改造社会的根本问题。有一次，计梅真以“我的志愿”为题，要学生以中文来练习写作。计梅真看过许金玉想要开办孤儿院的心愿后，在赞赏之余，并告诉她孤儿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必须从社会的根本作改造的工作。从此之后，许金玉对计梅真更加亲近与尊敬，并被她引领逐渐走向改革社会的工作。

当时的请求“归班”运动，是邮局中本省员工人所发起的抗争，并由此组织台湾省邮务工会。由于国府接收以后，邮电部门从大陆调来的职员一律按照上海管理局的标准计薪；而日据时代就进入邮电部门的所谓“留用台籍员工”，却仍然按照当年日本政府所订的低标准发薪。所以，同样职等的外省员工与本省员工的待遇差别，最高的时候几乎达到10比1之多。这样的差别待遇不但令本省员工气愤，同时也无法忍受。在这样的不满情绪下，本省员工就推动“归班”运动，希望能早日从日本时代的制度回归到祖国的制度，使得本省员工也同外省员工一样，按照上海管理局的标准来计薪。然而，本省员工却不知道要如何去推动这个“归班”运动。当计梅真在课堂上讨论社会问题时，有人就向她提出该怎样推动归班运动？计梅真建议：“你们可以充分利用工会，通过工会争取发言权，并且争取你们应有的权益！”就这样，在计梅真的鼓励下，生性害羞与内向的许金玉，也像其他同事一样参与工会组织。

1947年“3·28”事件后，许金玉被选为工会代表之一，开始发挥她活跃的领导才华，逐步实践社会正义。在计梅真的鼓励以及许金玉认真负责的工作下，切实反映员工们的意见，也让工会其他代表刮目相看，逐渐成为活跃分子。

1947年11月，台湾省邮务工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此时，工会的首任理事长陆象贤已经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决定要把他拉下马来。大会当天，国民党提出不能让陆象贤当大会主席。但经由许金玉等代表的团结努力，当着与会的警备司令部、社会处和省党部等“贵宾”的面，选举陆象贤当大会主席。大会选举了新的理监事，许金玉也被选为理事之一。而陆象贤在必要的妥协之下，没有连任理事长，改由军统方面的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委员陆京士派来的侯崇修继任。很快地，这个“归班”运动便得到全省员工的支持，纷纷发出早日“归班”的要求。这么一来，工会和局方都被震惊了。他们也动起来，用恫吓与分化的方式想要瓦解“归班”运动，但是仍然无效。后来，侯崇修被情势所逼，答应到南京总局去交涉，回台后却只带来“按照省政府标准加三成”的结果来安抚台湾员工。1948年底，全国邮务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邮工第五次代表大会。侯理事长率领台湾省邮务工会的20名代表前去，其中女性代表有4个人，许金玉是其中之一。但是因为语言沟通问题以及侯理事的敷衍，使得解决“归班”问题的期望又落空了。

1949年3月24日的台北，许金玉等代表召集全省代表，举行争取归班的大会。他们向各地的代表说明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目的是为了推动侯崇修在南京的交涉。全省各地的代表们想要了解结果，也都踊跃出席。在会议上，许金玉发言说：“关于归班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尤其是本省员工，自己一定要出力来做。要靠侯理事长他们是绝对不行的！”她并强调，“侯理事长也需要我们的响应才有后盾啊；如果我们不支持他。他又怎么有力量替我们交涉呢？”

接着，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全省邮务代表选出许金玉等10人，前往台北邮政管理局交涉，要求局长把意见向南京总局反映。但他们却面临了局长的欺骗，当场打假电话来安抚他们。10名代表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回到会场后，与会人士纷纷询问怎么了。

在大家明白事情原委后，忽然有人大喊“游行！”结果，这股力量有如排山倒海，大家都冲出会场。准备游行到省政府，向当时的主席陈诚提出“归班”的要求。

这次游行，创造了台湾光复后第一次工人大规模游行的历史运动。原本实际开会人数只有400多人，但队伍出发时却有1000多人。沿途又不断有人参加，所以到了省政府时，人数更多且声势浩众，更引来许多媒体的采访与关注。游行队伍一路走到了省政府，然后当场推选3个代表去见陈诚。这3位代表是许金玉、管理局的宋世兴与台北局邮务股长李万顺。陈诚接见他们时，充满官僚气息，开口便是要他们回去。这时，许金玉按捺不住质问：“啊！你没有话讲，怎么就叫我们回去！我们怎么回去告诉大家？”陈诚只好说：“我很关心这个问题”。或许正因为许金玉的话，以及经过劳工团结的游行之后，“归班”的问题终于在1949年5月得到解决。全省的台籍员工一律通过半放水的考试方式，正式归入邮政人员的等级，考试不及格者也留用再考。

归班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邮政当局却奉命演了一出“秋后算账”的戏码。工会代表纷纷被调职到穷乡僻壤，减弱他们在工会的影响性。许金玉便被调职到彰化北斗，而工会的士气都受到打击而低落。此时，许金玉与计梅真筹划回到台北继续主持工会。但是在1950年2月初，计梅真因为被蔡孝干供出邮电组织而被捕。接着在1950年3月17日，许金玉被捕，经由彰化县警察局转送保密局南所。1950年9月，移送军法局，处刑15年。在移监中，某次她与计梅真同房。根据许金玉的自述，计梅真看到许金玉时非常高兴地说：“许金玉，你有什么问题尽量问我。”许金玉便问：“计老师，以后谁都认定我是共产党了，那我应该要怎么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呢？”计梅真听了这句话，便难过地说：“我没有资格回答你这句话。”不久后，计梅真在1950年10月11日被押到马场町枪毙。

虽然计梅真死了，不过许金玉至今还是非常怀念这位老师对她的教育与影响。计梅真让许金玉走上工运之路，彻底改变她对社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位计老师给了她坚强的信念与力量，才让她能够在寒冷漫长的15年监狱生涯中等待春天的来临。

从零开始——经营蛋行 实践公正平等

1965年3月17日，许金玉坐满了15年牢狱，从板桥生教所回到社会，已经是45岁的中年人。在1965年11月，通过难友陈明忠与冯守娥夫妇的介绍，许金玉和同样是20世纪50年代政治受难人的辜金良结婚。这时，她面临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与辜金良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的企业。许金玉曾自言，她生命中的第一个老师是计梅真老师，教导她如何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但真正引领她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是与辜金良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

辜金良坐满17年的牢狱后，于1964年从小琉球重新回到社会，并开始和一些出狱的难友合伙在屏东开“滋良蛋行”。可后来蛋行做失败了，赔了一笔巨款。结果，许金玉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辜先生一起收拾残局，日子过得相当辛苦。当时，许金玉本想改作其他行业，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爪牙警察却屡屡骚扰，使得他们求职不易。面对这种“小牢换大牢”（从监狱到社会）的困境，许金玉便毅然决定留在屏东从事蛋行工作。

一开始，辜金良教导许金玉社会主义是必须从生活中实践的道理。因此，蛋行的工作便是一个实际的试炼场。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做一对有良心的商人，实现一个按劳动分配的世界。但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困境是：鸭农与蛋商的关系与土地改革前的佃农与地主的关系有些相似：地主提供土地收田租，而蛋商提供周转金收购鸭农的产蛋，鸭农依然是被剥削者。大多数鸭农因此背负蛋商的一大笔债务，为了还债又不能不继续养下去，成了实质上的农奴。辜金良自然不愿当农奴，便盘算要使自己与鸭农摆脱这种恶性剥削。方法就是自己来办工厂。辜金良深信，如果管理得当、质量好、生产符合消费者的嗜好，即使不剥削农民，也能办好一个企业。

辜金良办企业的构想，马上取得许金玉坚决的支持。辜金良因此兴奋地说，我们可以做一对有良心的商人，在我们的小天地里，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动分配的世界。这时却发生了皮蛋含铅金属的风波，皮蛋生意面临严重的危机。同业无不彷徨不安时，辜金良却洞烛先机，体认危机也就是转机的辩证观点。他认为谁能制造出无铅而风味特佳的健康皮蛋，谁就是明天的皮蛋王。于

是辜金良加紧努力研究，并专程拜访请教食品专家与大学教授，千辛万苦探究最好配方，试验又试验、一点一滴累积经验，逐步改良质量，终于获得重大突破。1972年，一位同业来电话报喜说，“滋良”的皮蛋，被卫生署检验局评定质量全省第一名。听了消息时夫妻两人相拥而泣。从此“滋良”的皮蛋身价陡升，销路也好起来，企业因而稳固下来。

两人秉持社会主义的理念，从事企业经营，提倡平等互惠原则，并首创鸭农和蛋商共同创立公会。在养鸭之初，辜金良体认到蛋商往往剥削鸭农的辛苦钱。所以“滋良蛋行”成立后，在收购鸭蛋的价钱，都按照当天报纸上的行价结账。如果鸭农真有困难，便慷慨借钱从不另取利息，没有亏待过鸭农。辜金良也希望所有的蛋商，都这样善待鸭农，于是提议组织“蛋公会”。最后，“蛋公会”成立了，大家协议按照当天报纸上的批发价，订出收购价格。从此鸭农的收入增加，生产力也提升了，以前只养数百只的扩大到数千只，有的甚至养了上万只，更带动屏东地区蛋业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对待自家员工方面，“滋良”的劳资关系非常圆满。许金玉与辜金良都很尊重员工的人格，虽然对工作要求很严，但从来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待之如一家人。“滋良”的工资是同业中最高的，并且供应午餐，下午还有点心。整天与员工一起工作的许金玉就屡屡告诉员工说：“我们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你们的健康就是滋良企业的健康。”两人用实践来证明，企业不靠剥削劳动者，也可以获利。合理、科学以及善待劳动者的管理，才能带来正当的利润。

但辜金良与许金玉并没有继续扩大企业规模，因为他们的不是在追求个人财富，而是为了生存以及为群众做一点事。因此，两人常将利润捐给各种社会运动团体。当经济稳固后，两人更积极关注国家社会之前途。1987年台湾解严后，辜金良积极推动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并大力支持为社会改革与中国统一而努力的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等新生的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改革运动。

随着时局变化，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辜金良却因不慎跌倒，造成重大伤害，导致中风卧床，唯仍挂念国家社会。许金玉

为完成先生的重大使命，遂将工厂让出，设立“辜金良文化基金会”，盼能继续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在2005年寒冷的冬夜里，辜金良终于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许金玉虽然非常痛苦，但她仍将悲伤化为力量，希望能以基金会的力量来推动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工作。她始终相信，唯有中国的统一，才能给两岸两人民自由与幸福，但这无疑是条漫长的道路。

实践和平——一条漫长的道路

许金玉生命历程的最新的阶段，是她在2002年创立了“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而那时她已高龄82岁了。虽然处于创办初期，在经费的募款以及组织运作上常出现一些艰难的问题，但老而弥坚的许金玉却坚定地一步步走下去。简单来说，这个基金会是许金玉的精神的具体化身。

辜金良文化基金会的主要宗旨，是中国的和平统一以及关怀弱势团体。虽然各方面的资源缺乏，但在许金玉以及工作人员的推动下，基金会却有许多实质的具体成绩，分别从历史、影像、文学以及两岸文化交流等不同面向的方式，一步步朝向关怀社会弱势社群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首先，以文化交流来推动和平统一的工作方面。基金会从2002年至今，一共有8次（每年两次）前往大陆的交流团。这些交流团的成员以大专院校的学生与教师为主，每次约15人，足迹遍及北京、上海、云南、成都、秦皇岛、青岛各地区。这些旅游经验带给成员们对大陆近期发展的新认识，从而影响了他们在台湾的朋友，有形与无形中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条件。

其次，基金会也从“左统”的教育立场，举办过两次文艺营，让台湾学生了解台湾左派的历史发展以及关怀台湾本土的社会问题。在2003年1月，基金会举办“第一届辜金良文化基金会文艺营”，让学生们能以左派的观点，重新认识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接着，在2003年10月，基金会更进一步举办“五十年代白色恐怖见证营”，借由身经白色恐怖的受害人及遗属现身说法，追索遭湮灭的历史。另外，在2004年1月，举办“第二届辜金良文化基金会文艺营”，主题是“重返人间——从一条河流的上游说起”。这是透过17年前《人间杂志》勇敢地记录浊水溪的

生命史的经验，来教导年轻人也应该有勇气来谱写台湾现今的生命史。在这份情感的感召之下，这个营队的两组年轻人走入为民间服务的路线，分别写下《橘子红了》的报道文学以及拍下《永久之美》的摄影作品，呈现出台湾果农的困境与山地部落的美感。

第三，基金会长期培育“春天影像工作队”，以影像关注台湾重要的人和事，为台湾留下宝贵的记录与观察。春天影像工作队自2002年11月开始运作。在春天影像工作队的总监吴德淳的领导下，已连续两次招生，培养出约30名学生前往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苏俄电影理论、视听语言课程及短片创作。在2004年5月，春天影像工作队还策划“‘另一种可能’2004第一届春天影展——两岸青年创作联展”，在影像上进行两岸文化的实质交流。另外，2005年10月，时值台湾光复60周年，春天影像工作队更策划“鬼子击灭推进队”系列演讲与影片观赏，批判日本军国思想，并带给观影者一个认识台湾历史的新契机。

2006年，许金玉已经85岁，辜金良文化基金会也迈入第四年。虽然基金会的具体成绩颇多，但为了实现志愿，许金玉的脚步却无法停下。她的志愿已从养女时代的开办孤儿院，转变成如今的关怀社会弱势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对于这个漫长的目标，她依然会艰辛地继续走下去，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真是我的好伴侣，快快地
唱，我唱歌！愿做所有人的

杨祖珺
压不扁的
玫瑰花

文：锺秀梅

最需要被“解放”的，经常是革命不离口、论述不离手的人。

国族主义是阻碍人们携手合作的大敌，然而，“国家”却是规范资本主义运行的幕后黑手。

杨祖珺，现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传学系助理教授。20世纪70年代中期，杨祖珺投入“唱自己的歌”的文化运动和社会工作，到工厂、校园、乡村里传唱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的歌谣，但不幸被国民党政府看为揭发社会黑暗，结合学运、工运的阴谋。80年代，她投入政治工作，通过出版（《前进周刊》）、翻译（《绿色的抗议》、《少数人的民主》）、街头运动、建党、选举等途径，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90年代，杨祖珺在美国麻州阿默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传播研究所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以学者身份继续致力于社会运动。

民族主义与超越

上海商人背景出生的杨祖珺，从小成长的社会氛围是国民党党国体制所塑造的民族主义，爱国加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形塑着杨祖珺的国族认同，她回忆起：“当蒋介石去世的时候，我还戴孝一整个月，连晚上都会换到睡衣上佩戴，要戴孝就应该24小时不离身。”但是上大学之前，她对现实政治一无所知，也几乎没有接触，她喜欢唱歌，更喜欢独自在自己房间唱。从那个时候开始，60年代的美国反战、和平的民歌，已经潜移默化影响着祖珺。

1976年是祖珺生命中的大转折，她在淡江大学英文系修美国当代文学，放弃美国 Fulbright 奖学金攻读博士回台奉献的王津平在课堂教“当代美国黑人文学”，让祖珺受到相当大的冲击：“从他们的诗歌中，我才知道原来贫穷会遭遇到那么多的不平与屈辱！”王津平介绍标举着中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夏潮》杂志给祖珺，虽然祖珺看不懂，但是祖珺喜欢王津平对学生的照顾，也认同了他所介绍的思想。

祖珺在大学时期，活跃于当时唱英文歌的民歌界，并且在西餐厅驻唱工读。当时她在最高级的 Idea House 驻唱，驻台美国大使馆的官员还前去捧场。有一天，王津平打电话给她，要她为李双泽出纪念专辑。^①李双泽为了救一个溺水者不幸自己也丧生了，她与同是民歌手的胡德夫选了《少年中国》和《美丽岛》两首歌，祖珺居然在练唱的过程中仿佛同民族主义接上线，她说：“那时候的录音设备非常简陋，在录音过程中，中国和台湾这两条虚无飘渺的线仿佛就那么接上了。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有人问我当时为什么放弃了高薪及念书而选择到学校、工厂唱歌时，我都会回答‘为了少年中国的美丽岛’。”

祖珺爱唱歌，大声唱自己的歌，但是并不容于当时中国国民党当权者的意识形态，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是仍有人被关，或是

^① 李双泽所创作的《少年中国》、《美丽岛》曾被国民党政府禁唱，前者是“为匪宣传”，后者是“鼓吹台独分离意识”，而当时，“台独”的主张在台湾社会尚未听闻。

雏妓被抓却无人闻问，当时为了散布“唱自己的歌”中类似“少年中国”、“美丽岛”等歌曲而答应在电视上主持“跳跃音符”节目的祖珺，由于受制于节目必须演唱“爱国净化歌曲”，在主持年余后辞掉节目主持人的工作。由于《夏潮》总编辑苏庆黎^①曾向祖珺提到台北市广慈博爱院的“妇女职业训练所”中有许多被关起来的雏妓，祖珺已经是社会知名人士，所以院方就同意让她进去院区拜访她们。

那时候只是想去看看能够为她们做些什么事？透过交往，我才发现自己太无知了，那些被父母卖到妓女户的十三、四岁小女孩，反而比我成熟和了解世事。……我发现她们被关在号称“职业训练”的地方，既缺乏经费、又缺乏职业训练，只有在那儿编竹篮、缝布娃娃。三十几个人被锁在两层各三十坪大小的地方，竟连博爱院的院内都不能出入。在我与她们一齐唱歌的几个星期内，除了院内行政人员，居然也没有看过任何其它人到过该所。我就想，何不办场演唱会替她们募款找老师来做训练。

然而，祖珺并不知道，她所做的事情在当时不仅是当局眼中“揭发社会黑暗面”的举措，在户外办演唱会也是破天荒的第一遭。然而，当天的演场会不仅成功的将四千票卖出去，演唱会当天，许多买不到票的民众，在演唱会外头嚷着要进去。^② 祖珺在荣星花园的“青草地”演唱会，为这些雏妓募得了二十几万的经费。为了征信，她找了诗人蒋勋介绍的“信谊基金会”张杏如帮忙管理财务，除了“妇职所”寻找师资及购买器材外，经由苏庆黎的介绍，她也找到长期关怀妇女及劳工的夏林清^③，义务在妇职所内替女孩们进行心理辅导的工作。

青草地演唱会以后，报上刊登了有黑道威胁祖珺，但她并不记得有任何黑道找过她。此外，祖珺还奔走呼吁成立“中途之

^① 苏庆黎，台湾民主和社会运动参与者，在《台湾政论》、《夏潮》撰文，1978年后在《美丽岛杂志》任编辑。

^② 祖珺很感慨民间史家杨碧川整理的台湾社会运动史，1978年8月16号的青草地演唱会居然没有，其他的琐碎小事都有了。

^③ 夏林清，台湾辅仁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参与妇女运动。

家”，希望这些女孩在脱离私娼寮后，能够被安置在中途之家，而不是关在像监狱般的“妇职所”。但是在过程中，满口向祖珺“打包票”的警察系统，以及祖珺自认没有力量而经人介绍接手筹办“中途之家”的某民间妇女团体，到了最后，居然联手把这件事吃掉了。由贵妇组成的妇女团体，是国民党当权派的外围妇女团体，“没想到一个资产阶级贵妇阶级，一个是政府的白道，联手起来把我吃掉，这事情就没了。”^①



在进行服务雏妓的社会工作后，祖珺认为自己稍微建立了社会认识，她认为之前的民族主义是虚无飘渺的，透过那些经历人间折磨的小女孩，祖珺看到了当时台湾社会其实是“黑白两道”以及有钱有闲却罔顾他人死活的贵族阶级所掌握的真实景况，而这也让祖珺反思过去自己的个人主义和苍白的反叛。

党外运动及其它

1978年党外第一次由许信良献策串连有组织性质的全省党外助选团，由党外耆宿黄信介领头，突破中国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祖珺与之相关连的，是她参与国大代表选举的王拓的基隆选战。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夏潮杂志标举着工农写实主义路线，同国民党的反共文学对打，乡土文学作家王拓也是乡土文

^① 访谈资料

学战将之一。因为受到王拓的小说感动，祖珺答应了当时声称要为台湾渔民讲话的王拓助选：“我虽然不懂渔民的问题，但是一定要为中下阶层的人们发声，是我当时的认识。一个为渔民讲话的人当然要支持。”祖珺的家中从此经常被警方拜访，而也带来了同样是江苏省人的母亲，在与她的朋友相处以及日常生活上，带来了莫名的恐惧。问她在演讲台上讲什么？祖珺说：“我那时已经非常清楚知道，唱歌就是要为“大时代”的未来、要为中下阶层的人们唱歌。既然我不懂政治也不会演讲，我就在台上唱歌了！”

无惧朋友的警告，祖珺前往台湾最北的基隆助选，这对祖珺的政治生命又更跨进一步。因为接触政治，让祖珺知到“2·28”事件、国民党在大陆、在台湾的种种不义，但是当祖珺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些事情时，基隆的老一辈都紧张万分地警告她不能说出来：“我从小就没有听过这些事情，既然不义，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我当时实在想不透既然真有这些事情，为什么不敢讲出来？”祖珺也想不透为何一个合法的政治选举，连贴海报都会被打，祖珺回忆起：“连很合法的活动里都有各种你想不到的暴力，是真正的身体暴力。而报纸媒体，报导的跟事实有出入，完全颠倒是非。”那年的选举，因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而暂停，然而祖珺在心里已经决定要“更义无反顾加入党外！”

其后，她透过《夏潮》发起人之一郑泰安以及诗人蒋勋的介绍，阅读了许多影印的中国30年代的小说，当时看这些小说都会坐牢。祖珺也得到了一些大陆50年代以后的歌曲，但她说喜欢《一条大河》胜于《东方红》！问她为什么不喜欢《东方红》？“太教条了，没办法有感觉！”

初生之犊不畏虎，祖珺很早积极介入许多党外运动。祖珺也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社会参与的过程，参与杂志编务，倡议对社会改造的看法。1970年代末，党外杂志纷纷出刊，许信良、张俊宏办了《美丽岛杂志》，王拓同时还办《春风》，祖珺参加了《春风》，因为春风的文化底子较强。但，许多人一直进行论述，却在需要作为时缺乏行动，这样的情况一直困扰着祖珺。祖珺说：“我看很多人有一套论述，却又做不了事情，被论述卡死了，而且一辈子都还是那一套论述。年轻时我会被那些了不起的论述吓到，后来发现，一面学习、一面行动，自从开始怀疑一大堆掉书袋的

人到底懂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以后，我心理的力量又大多了。”

祖珺曾在 1981 年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就学，不到 1 年，祖珺同当时在解严前后引领政治运动风骚的“党外长子”林正杰结婚，当时，林正杰与另一位刚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念完书回台的党外年轻人邱义仁，正面临可能被国民党罗织逮捕的风声鹤唳之中。此后，祖珺正式被认定踏入了“政治圈”，但她认为：“我没有太多从现实政治权力出发的政治意识形态，我比较在乎社会问题的解决。谁当政与什么政党掌权不是我的优先考虑。”

祖珺因为政治系谱和省籍的关系，又卷入党外圈子，常倍感矛盾，《夏潮》的朋友对她不谅解，林正杰政治圈的朋友也是，她说：“我最记得我要嫁给林正杰的时候，丘义仁跟贺端蕃，当我在一旁打地铺时跟林正杰说：‘你怎么可以跟这个统派的女人在一起。’我听到吓一跳，我的反应居然是赶快到房间睡觉。一直到了快五十岁以前，我都还束缚在‘小脚女人’的心态之中。”

从参选、组党、到“外省人返乡探亲”运动、“司法改造运动”、及其它社运

祖珺自认不论担任什么职务，她都是以一位社会工作者的心情去从事的。1983 年，祖珺因党外征召而参与该年的台北市立法委员选举，在选举中，她的团队政见为玫瑰五愿：“愿海外同乡都能自由回台”、“愿海峡两岸家属都能互相联络”、“愿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无分省籍都能在美丽岛上生存发展”、“愿中国人之间不再有战争，党内外之争不再是政治斗争而是政治竞争”、“愿绿岛与台湾各地的政治良心犯通通释放”。当年，78 岁的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家杨逵老先生，以他因抗日而入狱期间书写的《压不扁的玫瑰花》送给祖珺，并全程陪伴祖珺竞选。在那次选举过程中，着重生态平衡的“台湾绿党”组党的诉求，第一次出现在台湾的政治舞台；而“2·28”事件的议题，也第一次在政治选举的舞台被提及；而海外黑名单的台湾人以及台湾的大陆人有权利回到家乡的诉求，也使得台下聆听演讲的群众不仅歆嘘、而且恐惧不已，深恐听完演讲后被抓。此外，祖珺与胡德夫等人在演讲结束后，以《美丽岛》、《少年中国》等年轻人创作歌曲的诉求，而造成至少近千民众紧随着宣传车行走大街上，而稍事突破当时不准集会游行的戒严令规定，也造成了日后人们使用“压不扁的玫瑰”

称呼祖珺的由来。

1986年9月3日，中国国民党以司法之名企图罗织林正杰的罪名。在林正杰及杨祖珺反省在过去一年中尤其是党外的陈水扁声言“绝不上诉”，募得了两百万新台币后，却又由妻子吴淑珍名义上诉的“欺骗民众行径”之后，林正杰决定在3日地院一审宣判时，以“司法死了”以及“绝不上诉”作诉求，掀起了戒严以后第一次连续大规模的“群众街头狂飙”之后的9月27日入狱。9月28日，国民党迁台后第一个成功组党的“民主进步党”在“党外选举后援会”临时起哄中成军。祖珺也在林正杰坐牢后的一年半期间，继续与《夏潮》及党外的朋友们，进行“外省人返乡探亲运动”以及“司法改造运动”，持续她称之为“对自己的承诺”的社会运动。

1991年，祖珺离婚。离婚后，“由于戒严、组党、自由进出大陆的目标都已经看到了”，祖珺反省自己的经历，而接受了为离婚妇女权益的“晚晴协会”的邀约，担任理事长。1994年祖珺期待将女性诉求经由政治及“都市游击战”的策略挑战父权社会的僵化心态，在夏林清担任总干事的条件下，宣布竞选台北市议员，但最终失败。其后，祖珺分别在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以及美国麻州大学取得传播哲学博士学位，回台后，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已经为人师表的祖珺，是行动研究教育实践者，经常带领学生积极参与“反对美英侵略伊拉克”、“声援杨儒门及台湾农民/农业”的反对WTO剥削台湾农民/农业、以及“反对教育商品化、支持教育公共化”等社会运动。

祖珺的生命有许多的痛，但是她的勇敢，突破了内外在的局限，50岁以后的祖珺活得更自在。



文：郑空空

“真的要走基层，就不应该只找上面的人，如果只找上面的人，就看不到真正的问题”。

和平“不是以战止战、以武制武，而是要抛出和平引来和平”。

我不是反对日本人，也不是反对日本民众，而是不希望战争再起。

我最近在读甘地，他说非暴力的抗争，我很认同。

演艺圈的训练，说实在的，是我从政最好的训练场，一个好的演员要有高度的热情和敏感度，如果没有敏感度，就无法揣摩要扮演的角色，好的演员和差的演员差别在这里。从政也是如此，敏锐度不够，就很难感受选民要的是什么。

第一次访谈：转换跑道的高金素梅

尽管演艺圈转而从政者不乏其人，但绝大部分是表现平平、没有作为，而高金素梅从政后的表现，却让许多原本不看好她的

人跌破眼镜。如果说，政治与表演相去不远，那么“表演行为”这样的说词，也很难适用于高金素梅在国会殿堂外、在媒体与基层民众的目光之外，仍认真做功课、紧盯法案修订的行为；因为这些事情都无法作秀。

高金素梅原为影视歌三栖的艺人，曾获圣地亚哥最佳女主角奖，演出李安执导的《喜宴》之后，影艺事业更是水涨船高，但她却在前途一片看好的时刻，选择急流勇退。

1996年，高金素梅经营的默林婚纱公司突然烧起大火，不仅烧光她的积蓄，也夺走数条人命。虽死里逃生，但对于罹难者，她自责不已，身心备受煎熬。然而也是罹难者家属的宽慰，鼓励她要把握生命好好活下去，才让她有勇气重新站起。戏如人生，1999年，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她发现自己罹患肝癌。没有哭天喊地，而是感谢老天爷，让她在一闪而过的念头下，排除医师的意见，坚持要做检查，因而发现肝癌并及早手术治疗。连续二次如此近距离地碰触生与死之间的那条线，高金素梅对生命比一般人有更多的体验。

手术后一个多月，台湾发生“9·21”大地震。高金素梅对灾民失去亲人虽生犹死的痛以及不知未来要如何活下去的彷徨无助，心有戚戚。“我觉得应该去看看他们，做些什么来协助他们。”于是她与慈善团体走访部落赈灾，然而也是透过这样的走访，让她看到更多部落的困境。在部落民众与亲友的期待、劝进之下，她决定参选。顶着演员的高知名度，2002年，她成为第一位女性原住民立法委员。

45

过去艺人从政的评价都不佳，因此高金素梅初进立法院时，不论是立法院同僚、媒体或社会大众对她都不看好，高金素梅清楚他们的怀疑，但她不想辩解，打算用行动解除大家的疑虑。

她认真学习，找来好的幕僚，并且不放棄跑部落，因为她认为一定要清楚基层的声音。在3年当中，她跑遍每个部落。“我们带着摄影机，把部落的状况拍下来，作为问政的依据。”

2002年，行政院提出设置“马告（Magau）国家公园”^①计

^① 原名为栖兰山，而原住民称其为马告山。“马告”意指山胡椒，为了要成立国家公园，政府遂采原住民语。该山区横跨台北县、宜兰县、桃园县与新竹县。

划。这个计划原来是在 1998 年到 2001 年之间，生态保育团体为了保护栖兰山（马告山）国宝级桧木群所推动，他们认为只有成立国家公园，才能真正保护桧木林。但就台湾既有的几所国家公园来看，居住其内的原住民对于国家公园的保育成效与积极度相当质疑，更对其挤压生存权非常反感，遑论再划定一个新的国家公园！由于该案范围横跨乌来（Wulia）、大同（Datong）、复兴（Fuhsing）与尖石（Jianshih）的四个原住民乡，皆为泰雅族地区，为此，高金素梅对于马告国家公园的设立有相当多的疑虑。

“有很多朋友来帮忙，拿国外的案例让我知道，不管是法案、国家公园法、整个原住民历史……这个案子是我真正学习的开始。”在参酌国外原住民运动的理论之后，2002 年 8 月，高金素梅开始到这 4 个乡进行 60 场次的“反马告国家公园”部落巡回说明会。她援引国外国家公园与原住民案例、法令，向部落民众说明，将议题拉至争取自然主权、回复传统领域的高度，并与支持马告的同胞也是当地的意见领袖，就“处长给原住民做”的“共管机制”激烈辩论。一时之间，生态保育与原住民权益似乎发生对立，泰雅同胞的感情产生裂痕。

但在辩论之后，高金素梅还是找来最早催生栖兰（马告）国家公园的生态团体，仔细检视马告国家公园的预定范围，他们发现，真正需要保护的桧木群并未被划入，在另一方面，她也找来学者、专家与幕僚共同就预算执行层面检视，发现该案的真正目的是要准备要大举开发，以招徕游客、增加观光收益。这些惊人的发现，让生态保育团体与原住民团体重新走在一起。

于是，高金素梅发动全台各部落的原住民，集结在总统府前，要求“光复传统领域、反对划定马告国家公园”，这次的街头行动，使社会大众感觉沉寂已久的原住民运动似乎重新点燃。之后她并联合各党立委，成功封杀马告国家公园的预算。

2003 年，她开始部落行脚，巡回部落会勘民生建设。不同于一般政治人物只找意见领袖，如乡长、地方民意代表等吃饭、谈话后立即走人的做法，她认为“真的要走基层，就不应该只找上面的人，如果只找上面的人，就看不到真正的问题。”

透过现勘调查，她了解山区部落在用水设施、道路交通、教育、医疗、就业、生计等各方面的实际状况，发现与政府部门的

预算、执行报告有极大的落差。

2004年2月，高金素梅参与“强化国防军购公投”辩论，她指出，军购非但不能为台湾带来和平，反而使台海两岸关系更为紧张；而天文数字的军购费用将吃掉民生预算，政府若要用7,000亿购买武器，原住民宁可把这些武器换成学校、自来水、解决失业这些攸关社会安全的民生照顾，最后她并提出和平“不是以战止战、以武制武，而是要抛出和平引来和平”。

在第一任立法委员期间，她勤走部落，进行教育，如将日军侵略泰雅部落的历史照片送回部落巡回展出；让部落民众发出声音，使这些想法得以反映在政策与法令上，如就国家公园法的修订在部落举办巡回公听会；或是如上述的基础民生设施调查。“到部落里面去，把理念告诉大家，那才是很棒的。”她说。

2004年7月2日，台风造成严重水灾，重创山区部落，当此急需救灾之际，执政当局却不顾救灾的紧急工作，忙于指责是谁造成严重土石流灾情以推卸责任；副总统吕秀莲更是公开出言污蔑原住民滥垦滥伐，并表示抢救他们不是慈悲、灾民不如移民中南美洲开创事业以及真正的原住民是早已消失的矮黑人……为了抗议副总统一再用语暴力践踏原住民尊严、歧视原住民与不顾原住民的生存，7月17日，高金素梅与数十位原住民前往凯达格兰大道静坐，高金素梅并绝食抗议，却遭警方强制驱离。在未得到执政当局善意响应情况下，7月24日，高金素梅与部落发起“出草”^①行动，要求“反歧视、争生存”。

7月24日，全台各部落数千名原住民自掏腰包租车，千里迢迢地往赴台北，在总统府前，群众用纸刀、山猪牙象征蕃刀，表达对吕秀莲言论的愤怒与不满，并将传统“出草”转化为争取尊严与生存的意义。高金素梅等人也发表“出草宣言”，以行动争取原住民尊严，除了要求副总统吕秀莲道歉，同时呼吁总统府明确提出原住民政策。

除了透过街头运动争取原住民权益之外，在法令修订过程中，她提出多项事涉原住民权益的法条，并进行修订，如“温泉法”加入“保护原住民族权利条款”、提出“森林警察选用80%原住

^① 指猎首。

民”等。2004年，在初任的最后一年，她结合其他原住民籍与无党籍立委的力量，完成“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制订。“这个法的完成，对原住民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原住民的法，除了宪法保障以外，只有教育法和工作权保障法，其他都没有，基本法是宪法以下原住民族的母法，有了基本法之后才会有子法。”

对于高金素梅第一任的表现，不论是“反马告”、“出草行动”、立法院的问政与修法等，都受到“作秀、抢风头”的批评，特别是这当中不乏其他党籍的原住民人士与原运前辈，然而高金素梅不想辩解，“虽然那样的说法对我并不公平，虽然我可以大大的反击回去，但我不想这么做。因为历史告诉我，任何一个殖民政府都是用以番制番的手段对待原住民，以达到统治与平衡的目的，我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的感触很深，在原住民的民族问题、尊严问题、土地问题都没有解决之前，我不觉得有谁能把政党放在自己身上。做这些事，是要对自己的良知交代、对部落的人交代、对祖灵交代……”

2004年，在没有政党奥援，没有大笔辅选经费情况下，高金素梅以多于前次竞选一倍以上的票数顺利获得连任，成为艺人转战立委顺利获得连任的第一人。

第二次访谈：靖国神社行动、面对质疑与未来

郑空空（以下简称郑）：前不久台湾钓鱼岛主权争议，中国大陆今年则大幅回顾日本侵华60年。你赴日本靖国神社抗议，在时间上与这些事情接近。这行动如何发起？

高金素梅（以下简称高）：这真的是巧合，因为我2002年就去日本，只是前面几趟媒体没有注意。

2002年3月，我在徐宗懋那里看到这张照片（会议室中悬挂的照片，一人跪着被处决，身旁的日本军人武士刀起，被砍者的头与身体刚分离，后面站着一排原住民观看行刑），我非常震惊，全身起鸡皮疙瘩，一股热从脚底冒到头顶。从被砍的人的衣着可以知道是泰雅族人，后面有一个人很惊恐；我是演员出身，我很清楚那不是安排的，而是真实的照片。我问徐宗懋，原住民在这块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和很多学者见面，他们给我愈来愈多的资料。

同年4月，媒体报道有几位原住民老人去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也有人被送到南洋打仗，这个官司在日本已经打一阵子，他们看到这个消息，就找到我办公室来，他们说，我们有一个团体对小泉提出控告，你们愿不愿意加入？

那年8月，我们大约五六人到靖国神社，先去了解状况。我们知道有2.8万多人放在靖国神社，绝大部分是高砂义勇队。遗族要求把他叔叔的名字带回家，靖国神社不答应，他们说，这些人已经是日本的神了，变成一团火球，分不开的。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是日本人，不可能变成日本神。但他们还是拒绝。

2003年3月，我们第一次提出控诉，并要求：1. 小泉首相没有做出具体道歉前，不可以参拜靖国神社；2. 要求靖国神社将高砂义勇队的祖先除名；3. 要求一万日币的赔偿金。我们被驳回，因为他不接受我们的控诉。奇怪的是，韩国与我们的控诉一样，但福冈法院却判决小泉不得参拜，理由是违反日本宪法。

每次去都是按照日本法律打官司，2005年6月17日是最后一次辩论庭，不知是不是祖灵给的灵感，我想，我们说我们不是日本人，但同样是黄皮肤、咖啡色眼珠，要分辨我们与日本人不同，那就是我们的服饰、语言与歌声。

去之前，我们透过外交部与靖国神社联系，靖国神社的回文上写着，只要不超过第一鸟居的范围，他们可以对我们“视而不见”。对我们来说，只要有场所发出我们的声音就好。

6月14日，从饭店出发之后，出现一辆警车引路，把我们引到警察很多的另一个地方，并把我们拦下来，只让我和翻译下车，其他人不准。我们被困在那边，没水喝、不让上厕所。日本警察说，因为他们人手不够，没办法让我们进去，如果我们进去会有危险。我说，我们经过靖国神社的同意，警察应该是驱离那些人，而不是把我们挡在这里。

车上有记者要求下去采访，身为媒体人有采访的自由，可是警察不让他下车，一位记者从窗户跳下去，日本警察就开始打人。因为现场有太多媒体了，他们粗暴的行为就透过媒体传到台湾、香港与全世界。

离开那里后，日本律师朋友帮我们借场地开中外记者会，遗族就用自己的语言，说出父母亲告诉他们的历史，也因为如此，

高砂义勇队的事情才会让大家知道。而这已经是我第7次去日本了。^①

郑：关于这次的行动，台湾有“作秀做过头、丢脸丢到日本去、你的政治立场”等反应，你如何看？

高：有这种反应的，是自称最爱台湾的这些人。1895年的历史不是只有原住民的历史，而是台湾这块土地共同的被殖民的经验，也是共同的历史伤痛，他们有很多祖先也为了台湾的尊严，不愿意被殖民、被奴化而牺牲生命，如蒋渭水。我很遗憾他们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出卖自己和祖先的灵魂，我很期盼和他们就历史做理性的辩论，但大部分是说我在作秀，其次是讲高砂义勇队是自愿的。金美龄就说，你懂不懂历史？当时他们是自愿的，而且感到光荣。

在被殖民、被奴化、被洗脑（番童化教育）^②的客观环境下，如何能说是自愿！

郑：去靖国神社的整个过程，你的想法？

高：透过一次次去，我愈来愈清楚这段历史。数十年前，一些台籍日本兵包括原住民的高砂义勇队对日本提出起诉，要求拿回邮政储金。后来发放时，有3位寿丰村的老人家，忍了很久，说，还是去领吧。他们去到日本，但走不进去，在外面哭说，我们一辈子就要这样子吗？那3人到死都没有领这笔钱，并告诉下一代，他要尊严，他不是日本人。从这段历史可以知道，他们会是自愿的吗？

也有一些爱好和平的日本朋友说，他们不知道靖国神社里面

① 赴日控诉行动，在2005年9月30日获得初步结果：大阪法院判定日本首相小泉违宪，但驳回道歉和赔偿要求。对此，高金素梅表示，会持续公开当年日军对台湾原住民的罪行，直到日本政府反省、道歉、赔偿为止。

② 日本据台之初，原本打算以武力歼灭原住民，但因原住民居住于广大山区，且剽悍勇猛，不易消灭，日人遂改采同化政策。殖民政府在部落广设“番童教育所”，教授番童日语、惠染日式礼仪、以恳切态度面对统治者，并大量印行《改姓名读本》、《台湾志愿兵读本》等，激励原住民青年从军，提倡经由“皇民练成”思想，对日本及天皇绝对效忠，如作为“天皇赤子，欢欣以效死”……，而经由番童教育刻意栽培的青年，日后在原住民社会成为日本统治者的化身，协助进行同化政策。

放了被殖民的人，他们以为里头都是日本军人。有一次，一个日本军人的女儿，她的父亲也是去打仗，她说，我站在这边心情五味杂陈，对你们来说，我的父亲是杀人凶手，但我的父亲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我的心比你们还痛苦，并且对你们很愧疚，我们要共同努力求得全世界的和平，要求日本政府能勇敢地面对这段历史。她还告诉我们，她的父亲曾告诉她日本皇军是如何对日本国民洗脑，她说，我们这些军人的后代也曾聚在一起聊过，很多人以为皇军出征很英勇，其实错了，他们出征时，都喊“妈妈！”；没有人愿意战争的。我听到这位老人家讲这的时候，我上去抱了她。

我不是反对日本人，也不是反对日本民众，而是不希望战争再起。战争带来太多教训，让后代承受太多痛苦。日本军国主义让我们以为他们很勇敢，可是从另一面看，他们不敢面对自己；日本政府若是勇敢，要面对这段历史，我们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洗清内疚，但他们并不接受，反而篡改教科书、扭曲历史、封闭自己的心灵。当他勇敢地去面对，就能解脱，这么长期以来，日本还无法解脱，他如果愿意面对良知，我相信全亚洲就不会纠结在这当中60年。

郑：部落里的人如何看待这事情？

高：高砂义勇队的老人家，若能回来，不是残疾就是心理有问题。他们与外界隔绝，封闭自己，刻意要遗忘这段历史。当我们把老照片送到部落，有一些老人慢慢回忆起，没有参加高砂义勇队的也还记得这段历史，很多老人家都哭了，开始讲，年轻人就听到这段历史。

但也有年轻精英分子说，你个人怎能代表原住民的声音？我理解他们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这样说。因为太长时间的贫穷，要走到那个位置上，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我理解他们的难处，给他们时间吧。

郑：以下我将提出几个质疑。第一个是，高金素梅真的那么热衷原运吗？以前也没见高金素梅参与原运、关心原住民。

高：这个问题我理解也谅解，因为这是事实。甘地（Mohandas K. Gandhi）、法农（Frantz Fanon）之前也未从事运动，因为他们接受被殖民的教育，当遭受痛苦之后才觉悟。

我没他们那么伟大，但我希望大家理解，我从小不是在部落长大，在教育过程中，不能讲母语，因为我的妈妈没有教我讲母语，更何况我的父亲是外省人；在学校里，我没有被教育原住民的语言、历史，也很自然而然地接受汉族的教育，因此我没有民族的情结。看看原运界，他们从小就在部落长大，而我并非在那样的环境长大，加上我后来在演艺圈，不同的职业、环境，怎么会做这些事？这样的质疑是好的，也给我更大的力量和鞭策，但请给我时间，时间会证明一切。

郑：有人说，你的表现很好是因为幕僚——部落工作队很强，但有人说，他们把持你的想法与行动，他们的立场有问题，所以导致你的行动偏泛蓝。

高：我人生当中经过那么多挫折，演艺圈给我48年的训练；一个人经过两次生命的挑战之后，你认为这个人的意志会那么容易给人左右吗？请不要小看我的智慧与决心。

部落工作队的成员都是以前的原运分子。以前原运的时候，他们和民进党走上街头，那时怎么不质疑他们的立场？原运前辈中，很多人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换了民族立场，可是部落工作队还在原运的路上走，只不过是他们跟我结合而已。

我刚参选时走访部落，部落工作队也在部落做草根工作与演唱，当时他们斜眼看我，质疑我的动机、我将来的态度，问我要把原住民带到哪里去，这些我都知道，但我需要向他们解释吗？现在也一样，我不认为需要做太多解释，用我的行动和决心吧，很多事情不是一两天可以看出来的，我相信历史会证明。

原住民运动不分统独蓝绿，只要知道原住民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我的态度。有很多人说，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红帽子、或说我爸爸是安徽人；把人单纯到以血统来论，这与希特勒没有两样。做有意义的事情，要以世界公民的角度，而不是以血液成分来论断，白人都会去协助黑人了，难道会质疑白人的血统不正确吗？汉人就不能从事原住民运动吗？血统不纯正就不可以吗？这种言语，只会凸显他们的愚蠢与幼稚。

郑：“反马告”牵涉原住民权益在国家公园内所受到的限制，以及我们的国家公园是否真的合乎生态保育。然而居住在国家公园内的原住民，即使有很多抱怨，却不愿离开，因为外面的开发

是更可怕的。

高：国家公园在原住民眼中倘若是恶狼，国家公园外面的就是老虎，所以他们还是选择在国家公园内，因为最起码还有一些保护措施。要把他们划出国家公园外，国家政策能给什么样的保障？能不能让他们无忧无虑地按照他们的文化生活？如果他们离开国家公园，面对的就是财团，整个经济的大压力，所以他们更是无奈。

郑：原民会积极地想促成各族成立民族议会，把土地交还族人共管，但财团若要把土地拿走实在是太容易了，因为可以买。究竟是要推民族议会或是不推？我们说必须尊重民族意愿，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尊重民族意愿，一旦财团花钱，将会买得大家心甘情愿。

高：这也是我们推动自治最困扰的问题。很多问题出在人，一方面是拥有权力的族人有没有民族立场？另一方面是族人同胞能否抗拒外来诱惑？因此，除了推动自治之外，还必须教育族人，让族人同胞了解在历史过程中我们的土地是如何流失的，并且认识到土地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文化的根，如此，问题的出现率才会比较低，否则我会变成民族罪人。我想时间换取空间是最好的方法。

到部落倡导时，手不要进去得太深，可以从旁抛出每一个人人都能够思考的讯息；当他能够提意见，表示他能思考，当他思考时，就能知道他在想什么、困境是什么，这是我走部落的方法。他能思考，危险性就少。

郑：有关出草事件，吕秀莲并未直接指明是原住民，为何高金素梅的反应会这么强烈？高金素梅带着原住民上街头，模糊了救灾焦点。

高：即使是针对整个灾区，自称民主斗士、既是副总统，又是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召集人，以她的身份，就不适合用如此粗暴的语言来对待受灾同胞。第二，她虽然没有说是原住民，但后来两天她讲的话是对着原住民。

她往往都是如此，不承认自己不对，都说是媒体误解、断章取义。身为公众人物，言行举止要非常注意。台湾有没有一个政治人物可以做很好的示范，告诉下一代说，做错了就要认错？认

错不是不好的事，反而展现了勇气，这是现今社会最需要的教育；教育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每一个公众人物的身教。有关这批评，我不需要做太多解释，历史会有公评。

对于模糊救灾焦点，如果这的确是灾区民众的感受、有因为我的行为而模糊救灾焦点的话，我道歉，虚心接受。但我认为除了物质以外，精神尊严是需要的，因为尊严会跟着人或族群一辈子，我不是说物质不重要，对我来说，灵魂比外来的物质重要得太多，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走上街头。

郑：能不能说说去石门水库集水区现勘的情形？

高：这大概又可以回到吕副总统。吕副总统在没有很清楚了解的情形下，居然就叫大家不要吃水蜜桃，说水蜜桃造成崩塌。这二次风灾后我们进去看，石门水库的问题不是来自拉拉山的农民，有94%来自国有林地，6%才是来自原住民土地，而6%的原住民土地崩塌在哪里？在建了拦砂坝以后。拦砂坝淤积土石，盖住整个河道的岩壁，当大水来时，水位提高，一再冲刷旁边的树木、泥土，致使上面崩塌下来。

为何农作物崩塌得没那么多？因为有人照顾。虽然有超限利用，但超限利用是否是罪魁祸首？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反而是没有管理的国有林地崩塌得很厉害。没有管理是谁的错？林务局怎能没有管理而任其自然崩塌？难道林务局的功能只是种树吗？

如果吕秀莲愿意和我一起去，她就更应该跟原住民道歉，跟复兴乡与尖石乡的农民道歉，在还没搞清楚状况之前，副元首不应该讲出如此不理性的话。

郑：你认为原住民未来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或危机是什么？

高：还我土地。政府、学者派代表出席国土规划，比较有良心的学者建议划定原住民自治区，结果发现原住民自治区居然占了全台湾46%的土地面积，这时有一些人跳起来说，这些土地给他们还得了！当有决策权的人这样思维的时候，可见得原住民的未来仍十分艰辛，那怎么办呢？总不能坐在这边等人把礼物给我们吧？原住民的运动还不够，教育还不够。很现实的是，我们只有2%的人口，如何让98%的人口都来支持、理解我们，这是我未来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仅仅是在街头，街头是最后一个步骤。我最近在读甘地，他说非暴力的抗争，我很认同。

以前我的抗争很不给对方面子，现在要换一些方式，同时我也要再充实我自己，才知道能给别人什么。一直上街头，人总是会麻痹，所以要考虑用别的方式。

郑：原住民族基本法虽已出炉，但到现在为止，施行细则与所有相关子法也还未出来，由于这个法限制了地方政府在原住民族地区的所有开发行为，地方反弹厉害，但立法委员动不了地方层级，未来有什么动作，可以让原住民族基本法真正成为利刃？

高：基本法完成后，有二十几个子法要订出来，这当中最有争议的就是土地法。原住民土地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传统领域，这牵涉了公部门愿不愿意释放出土地权，另一个部分则是原住民保留地。相较于传统领域，原住民保留地相对地复杂许多，而地方上的反弹，主要是在原住民保留地的争议上。

我正期待地方上的反弹，如果没有反弹就不会造成话题，没有造成话题就没有平台可以把我们的历史讲出去。原住民族最大的困境，就是历史没有让大家真正的理解，我们既要让汉人朋友了解，也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原住民的土地是怎么流失的。我觉得太长的时间原住民的议题没有被大家讨论。

我计划成立一个结合原住民、专家学者的团体，来检视县市政府的原住民族政策。统筹分配款到地方后是依照人口比例分配，原住民族地区幅员辽阔、人口少，往往只得到零头而已，但绝大部分的县议员并未被训练到可以审预算、左右政策，更重要的是因为人数少，所以原住民权益完全无法被提到台面上说。我想筹组这样的团体，来监督统筹分配款到县市政府之后怎么用，并把数据交给中央，想办法让统筹分配款受到评比的影响来分配预算，要不然中央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前面3年，我是在学习当中做事，能做能看的都还是表面，很凸显我个人特色，但平心而论，比较浮面。现在是第二任，我想我还可以做得更深入。演艺圈的训练，说实在的，是我从政最好的训练场，一个好的演员要有高度的热情和敏感度，如果没有敏感度，就无法揣摩要扮演的角色，好的演员和差的演员差别在这里。从政也是如此，敏锐度不够，就很难感受选民要的是什么。

但是，要试着让族人自己学习。我们族人同胞长期以来，碰到问题就习惯找人帮忙，你可以说他没有安全感，这还算是好的，

但不好的部分是他们不尝试面对；没有办法让他学习成长会害了他。因此我要求助理，处理陈情案件时，要站在从旁协助的立场，告诉族人如何面对，让他们从中认识法律，以及自身的权益，因为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是学习的机会；我们不能够每一只手都插进去，要不然会让族人忘记自己的生存条件。

后记

采访高金素梅并不容易，主要是因为她过去的演员身份会成为访问者挥之不去的阴影，面对她的时候，即使她再诚恳，我仍不免犹豫她的响应是真，抑或是表演。在理性层次上，我承认一再提及过去的演员身份对她而言并不公平，因为她的言行总是会被归因于这个过往身份，并连带地引发许多质疑，但是，作为访问者，我若不能看到其他人的质疑而行诸于文，那么，这层质疑便会转于我身；反过来说，倘若因为这些质疑，对她处处打问号，带着既定的看法下判断，那么，我的访问不只荒谬，且是打从一开始就不需要。

是的，访问高金素梅，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她这个人，还包括自身与外在所设下的障。我能穿透这些障吗？在重重关卡中，我能写出什么、让大家看见什么？为了高金素梅，我失眠很久。我能否一方面作为高金素梅的解读者，让他人观看我的解读，同时在另一方面作为一面镜子，只是单纯的反映，由观者自行解读镜中人物？也就是说，是否把访问者本身可见与未意识到的问题呈现在观者面前，同时让受访者自己讲话，会是较为适当的书写策略？

我与高金素梅总共进行两次访谈。第一次在2006年，当时她刚连任成功，之后我写下一篇短文，那篇短文除了记录高金素梅在第一任期间做过的事之外，也间接呈现了我在访谈后对她的理解，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我的立场偏颇、被蒙蔽。第二次访谈则是在她第二任会期休会期间，马莎台风甫过，她至石门水库上游集水区现勘崩塌状况，刚回到台北办公室，还来不及休息，即接受访谈。而在数个月前，她与高砂义勇队遗族至日本抗议，要求将祖先自靖国神社带回台湾，此举自是在媒体上又引发一波争论。

除了过去的职业——作为一位明星之外，转换跑道后的高金素梅，不论你同不同意她的行动与言论，她仍然是受到瞩目的新星。我关注的是她如何在3年多的时间里，成为立法院与原住民运动发展过程里的新星。因此，我将这份数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次访谈后写下的文字，与第二次访谈的记录。此二者，既是时间向度上的连续，也是交互参照，透过这样的方式，或许观者能在其中找到她为何如此做、怎么做的蛛丝马迹。



张幼云

外交官 致力于性别平等的

文：陈志建

性别问题不只是妇女问题，必须从人权、社会公正、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对待社会性别不平等

问题。
我们必须从传统的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要制定一个新的发展日程，使全世界的男女，在其生命周期的整个过程中，都能充分享受到发展的权利。

在她的领导和感染下，项目在中国执行得有声有色并富有创造性和中国特色。不仅吸收了国际上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经验，还在总结中国男女平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框架，积极推动了在国家一级建立社会伙伴间的网络和机制，培养了一支推动和倡导性别平等的富有激情和能力的专业队伍，使性别平等主流化、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理念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人生而平等，为了这句话，人类走了很长的历史，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这句话还远没有达到人们所预想真正的平等。性别、年龄、职业、民族、人种等各个方面的真正平等还需要人们不断的努力。

在性别平等方面，由于客观存在的性别之间的差别，还有历史长时间的观念遗留，男女平等还有很长的道路需要前行。所幸的是，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都在积极的促进着这个事业的前进。

我们听到很多声音：

——“女人，并不表明天生就有强烈的社会性别意识。”

——“妇女问题不只是妇女的问题。推动性别平等需要男女两性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推动性别平等，既有利于妇女的发展，也有利于男性从传统的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这是个双赢的事。我们要对现有的游戏规则进行挑战，包括一些现有的机制，因为许多机制产生和延续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男女社会性别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男女社会性别平等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最重要的是性别平等要纳入决策的全过程，并贯彻始终。”

这些话可能被很多人赞同，但是说这些话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断地努力着的人——张幼云，可能还不被很多人知道或者熟悉。不过，如果你看过一幅著名的照片，那么你就会对她留下深刻印象。照片记录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历史瞬间，小平同志微笑地与撒切尔夫人交谈，坐在他们中间的那个女翻译就是张幼云。她曾被称作“中国外交界第六朵金花”的英语高翻，曾在许多中央领导人的重要会谈中担任翻译，后来又出任中国驻英国使馆的政务参赞等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外交官。张幼云女士在国际舞台上，潇洒自信地树立起一个亮丽的形象，成为中国女性在国际组织高级官员中的一位佼佼者。

作为一个妇女，张幼云在展示妇女才能，树立妇女自信的同时，还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工作，她希望将女性从传统的性别观念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张幼云自己的人生经历，也证明了女性完全有能力也应该从

传统的性别观念中解放出来，并最终实现男女的平等。

无心插柳的外交工作

1940年，张幼云出生时，其父张傲云，为中华民国湖北省郧县县长。两年后，积劳成疾的父亲带着这样的遗嘱离开了：望汝等继吾之志，爱民爱国，勿怨勿私，戒懒戒贪。幼小的她虽然失去了父亲，但是，满腔热血报效祖国的父亲，成为她终生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人生难预测，幸福就在不断地追求之中。

张幼云是在武汉长大的。上小学时她爱唱爱跳，理想是成为一个舞蹈家。北京舞蹈学校的考试虽然顺利通过了，可她却因为当时武汉发生了一场大洪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而错失机会。当张幼云得知真情时，已是30余年之后，她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任参赞，巧遇当年的考友、后来成为舞剧《红色娘子军》女主角的钟润良，方知昔日的遗憾全是一场天灾所致。

中学的张幼云钟爱化学，可是教外语的班主任老师一再动员她报考外语学院。外院提前招生可以多一个机会，张幼云抱着“小算盘”服从了。可她一考就成了武汉北外考生的第一名。从此一锤定音，当化学家的理想又落空了。

在命运的捉弄之后，张幼云接二连三获得好运。先是她以优异成绩于1960年提前从北外毕业并留校；两年后有缘结识了一位学识不浅的小伙子宋明江，后成为她的丈夫，现任我国驻欧盟兼比利时大使；1973年张幼云有机会到英国巴斯大学深造一年，回国后便被调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在北外执教及在外交部任翻译期间，她有幸深得章含之、裘克安、过家鼎等许多英语高手的扶携指点，很快脱颖而出。

1982年开始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为张幼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契机，她参加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全部22轮谈判的翻译工作，同领袖们一起看到这段非凡的历史是怎样书写而成的。当然这个巨大历史的成功也包含了张幼云的心血和奉献。

在翻译工作中，张幼云十分重视创造会见双方的对话气氛，让自己“进入角色”，她总是交替地表达各自的情感，以造成双

方直接对话的氛围和场景。一位多年与中国打交道的英国官员这样评价：“张女士翻译的特点在于她不仅仅是翻译，她善于沟通。”为了达到这一点，张幼云在会见过程中一直随时掌握和了解双方的意图和情绪。为此，张幼云付出了无数心血和汗水。每次重要会谈前，她总是提前两个星期就全神贯注进入情况。张幼云说：“翻译的责任实在太大了。”她的认真有时也使她感到紧张，一次翻译前她找随团医生要安定片，事后才知道医生给她的是一片维生素C。

在外交工作中，张幼云用每一个工作细节为国际和平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1984年12月19日，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上，撒切尔夫人对站在邓小平身后的张幼云说：“我们一起看到了历史是怎样写成的。”

她出色的翻译工作赢得撒切尔夫人等人的多次赞扬。几年后当张幼云破例获得巴斯大学授予的荣誉硕士学位后，撒切尔夫人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和张幼云的照片，立即向她发来贺函。张幼云在1986年曾为英国女王访华当过翻译，1990年张幼云即将从中国驻英国使馆卸任回国时，女王还通过秘书写信表示非常遗憾和真诚问候。

向性别平等事业迈进

1991年，张幼云就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合作司第一副司长，次年升任司长，开始了全新的职业生涯。

1990年代初期，社会性别问题和她主持工作的部门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处于边缘地位，缺少人力、财力、缺少任何可借鉴的经验，没有可参照的做法，也很少得到最高领导层的支持。但她勤奋学习，与全司同志结成一个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团队，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受到劳动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表彰和奖励。

1994至2004年，张幼云进入国际劳工组织，先后担任女工问题特别顾问、性别平等局局长，为中国和世界妇女的平等、发展与和平兢兢业业地工作，对推进全球、特别是劳工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事业做出了产生深远影响的贡献。

张幼云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角色和专业的转变，很快成为国

际性别平等专家和国际劳工组织性别平等政策的制订者。她多次强调“你是女人，并不表明你天生就有强烈的社会性别意识”。她认为，性别问题不只是妇女问题，必须从人权、社会公正、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对待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她还认为，“社会性别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她认为，社会性别问题不仅涉及12个关切领域，而且涉及整个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模式如果不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当张幼云初涉国际组织的时候，真是“忍辱负重”。她说：“我是一个年纪最大的新兵，人家已在冲刺，我才开始起步。”她周围的同事都是有多年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各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而她接手工作时甚至刚接触“性别意识”这个词。当时就任国际劳工组织妇女问题特别顾问的张幼云女士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她每天不得不阅读大量英文资料，必须要尽快掌握新东西，要迅速抓住要点，要使用国际流行的最新语言，还要评论、拿出观点。如果你在这个岗位上不能胜任，就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她刚来时没有顾上使用电脑，秘书便来问：“你的新办公室还要不要放电脑？”张幼云回答：“请给我换一部更好的。”后来同事们吃惊地发现，不是她不会使用电脑，而是比他们中的一些人打字还标准熟练；她不仅自己写材料，还要提出各种战略思想，随后更是显出其雄才大略，考虑要在这里建立什么样的文化，带出什么样的队伍。

张幼云说她靠的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国外待的时间越长，越体会到中国的东西是自己的灵魂。”她还常跟人交换看法，谈东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使许多外国同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也促进了大家更好地共事与合作。

她发现，国际组织的文化使人们不太善于顾大局和考虑整体战略的完成，往往部门分割，只讲个人成果，缺少群体意识。有些人只顾个人占有信息，以显示自己的“价值”，认为它是权力；而张幼云则认为，信息就是力量，而力量不是特权。外国同事对她说：“过去我们同在一个部门，很少知道别人在干什么，现在你让我们在一个自由的空间去施展，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成果。”

回忆起在国际劳工组织总部日内瓦早期的日子，张幼云女士感慨万分：“在一个强手如林的地方，必须学会拳打脚踢，学会扬长避短，其实这个过程是很苦的。”

她所领导的团体，致力于改变国际劳工组织的组织文化，促使性别问题放在国际劳工组织战略目标的中心位置，这个影响既有战略的意义又有长远的意义。

在1996年“北京加五”特别联大期间，张幼云曾说：对于许多人来说，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是更加的不安全、不稳定，甚至使他们处于更加边缘的境地。贫困的程度仍然触目惊心，收入的不平等在国家内、国家之间日益扩大，妇女仍然占世界贫困人口的大多数。

她说，妇女在就业中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不稳定和没有社会保障的。失业人口中大多数也都是妇女。在经济危机和武装冲突中，妇女往往首当其冲。因此，要解决这些多层面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现状，加速北京《行动纲领》的落实，尤其在当今变化如此之快的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确实是一个巨大挑战。“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挑战，迎接这个挑战。”

要改变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状况，“我们要对现有的游戏规则进行挑战，包括一些现有的机制，因为这些机制产生和延续了男女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张幼云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社会性别不平等

63

问题。

张幼云总是从全局来认识和解决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性别与发展贯穿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由于它是个综合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用局部的孤立的办法来解决。因此把社会意识纳入到发展的主流，体现在我们的政策和各项发展计划中，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采取全面的、综合的、协调的战略。”

新型的男女伙伴关系

在张幼云看来，性别问题不只是妇女问题，必须从人权、社会公正、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对待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我们必须从传统的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要制定一个新的发

展日程，使全世界的男女，在其生命周期的整个过程中，都能充分享受到发展的权利。”

张幼云强调要建立男女之间新型的“伙伴关系”，在家庭、社区、工作场所和全社会建立男女之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是取得性别平等成败的关键所在。

为了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张幼云在国际劳工组织中进行了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工作：

(1) 在国际劳工组织内部制定和积极推行性别问题纳入主流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2) 建立了机构内部的社会性别网络，使其在推动劳工领域性别平等方面真正发挥了催化剂作用；

(3) 组织培训和开发了多种工具，提升了该组织成员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改善了男女性别比例，使该组织人力资源开发和人事政策更具有社会性别平等意识；

(4) 率先在联合国系统内推行体现社会性别意识的编制预算和社会性别审计，并制定了系统的社会性别宣传倡导战略。

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上层领导发生变化，加之联合国系统在推动社会性别平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为她开拓性的工作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国际劳工组织几年来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工作业绩与经验，以及这次会议期间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备受与会者瞩目。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司举行的关于社会性别平等纳入主流的研讨会上，国际劳工组织作为一个良好的范例得到了肯定。这无疑也是对负责这项工作的张幼云女士的肯定。提起张幼云，她的国际同事都对她有口皆碑：“我们都很爱她”，“与她一起工作很荣幸”……她说：“当今世界变化这么快，竞争如此激烈，我们怎样适应？怎样进入国际社会？就得刻苦学习。我们不靠华丽的场面，要靠扎扎实实的工作，靠全面综合的实力。”

张幼云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有一次，她到非洲塞内加尔考察项目的实施，看到当地妇女穿着又脏又破，用干草在烟熏火燎中烤鱼干。她想跟她们座谈一下，20分钟之后，这些妇女都换上了鲜艳的服装，谈笑风生好不热闹。她们生活得那么贫穷，却如

此乐观和热爱生活。这深深打动了张幼云，她更加感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0年内，张幼云不遗余力地在国际劳工组织内部积极推行性别问题纳入主流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她负责国际劳工组织北京世妇会的后续战略以及北京加压与会和后续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并建立了机构内部的社会性别机制和网络，使其在推动劳工领域性别平等方面真正发挥了催化剂作用；在她的主持下，国际劳工组织组织培训和开发了多种工具，提升了该组织成员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改善了男女性别比例，使该组织人力资源开发和人事政策更具有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国际劳工组织率先在联合国系统内推行体现社会性别意识的编制预算和社会性别审计，并制定了系统的社会性别宣传倡导战略，成为联合国系统内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成功榜样。

张幼云还负责设计和执行在成员国，特别是在中国，推行性别平等纳入主流的国际合作项目，例如：“女职工权益保护项目”（1996—1997），“在国际劳工组织中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项目”（2002—2005）。在她的领导和感染下，项目在中国执行得有声有色并富有创造性和中国特色。不仅吸收了国际上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经验，还在总结中国男女平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框架，积极推动了在国家一级建立社会伙伴间的网络和机制，培养了一支推动和倡导性别平等的富有激情和能力的专业队伍，使性别平等主流化、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理念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她用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理想之光点燃了自己生命的光彩，也用才华、激情与奋斗精神激发起晚辈们人生的追求。

虽然同丈夫、孩子长期分居，张幼云只身一人在国外艰苦奋斗，但是，为了推进性别平等主流化的工作，她忘我地工作。如今，张幼云已经回到中国，与她相濡以沫的丈夫、可爱的女儿、牙牙学语的孙女团聚在北京。年已65岁的她仍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地活跃在多个领域中，最近，她又荣任刚刚成立的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正在积极努力将性别平等纳入到促进就业立法和长效机制建立中去，推动妇女和男人平等的从事自由、公平、安全

保障和人的尊严受到尊重的体面工作。

张幼云是个充满激情、热爱生活的人。她爱说爱笑爱交朋友，喜欢漂亮的服装，爱用好的香水。她不论接受什么媒体的采访都反复强调：“咱们不谈个人，只是交换观点。”对于取得的成绩，她说：“个人进步与社会发展分不开，有个人努力，也有历史机遇，只要努力工作就行了，不是让你个人去炫耀的。”

张幼云诚恳、热情、求索、奋进的精神打动着每一个与她接触过的人。

第一
部分

直面暴力



II
敢
為
人
先

丁張家文

蘇聯下台，果乎入幕心為... 敢又果味策敢味制者
難治，新味另次大氣新制... 味，真工師技可及強敢進
... 吾醉飽益性好專夜五
誰心什印什了家到明為... 林和英敢敢“平味”
味平果上敢難話也，客到... 今不忠是味甜白自，敢不
... 于日味甜

“暴容不”个敢印對兩識。丁包容不夫同亦此。精讀而忠慎
讀公書標心同亦”查本意景而，張年印“守世日不歸”皇不印對
... “合職公甘 兼
純中工師奇交變上知矣。臨于許有果成”；由與公家風而敢成
... 十有果成，視果得者生到難時否解要只，敢事此有果成；丁符
... 難高只，料一搞甘會干，商工于有果成；知何敢得亦印對，查得
... 謝奉印新于體不有果成，許不另亦世許只。若丁碑本印印自書
... 得觀合得印有到重不將印印，書對當不有果成；費地品會敢對

刘忠训 全能农民



文：寇延丁

法律和政策如果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可能被当成欺压百姓的工具，如果能够被广大农民知晓，就能成为争取利益的福音。

“和平”应该是这样的：农民即使除了种田什么都不懂，自己的权益也不会受到侵害，也能够过上安宁和谐的日子。

刘忠训觉得，当农民太不容易了。她所说的这个“不容易”指的不是“锄禾日当午”的辛劳，而是意味着“农民必须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刘忠训是这么说的：“如果你当干部，完成上级交待的工作就行了；如果你当律师，只要懂得法律就能生活得很好；如果你干税务，懂得收税就可以；如果你干工商、干会计都一样，只需懂得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有当农民不行，如果你不懂干部的事情，他就会乱收费；如果你不懂法律，明明你有理吃官司还会败诉；

如果你不懂税务，就会被乱收税……”

她之所以会这么说，并不是什么“黑色幽默”，而是10年来一次次走上法庭的亲身体验。

刘忠训生活在重庆云阳县高阳镇鹿头村，位于长江沿岸，是个穷地方，风气也不好，当地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偷不抢，对不起共产党，不嫖不赌，对不起爹和娘。”仅在镇上就有17家麻将馆，村干部横行霸道已成常态，一位镇干部的口头语是：“除了江泽民和李鹏，谁也管不了我。”在这样的地方，老百姓的生存环境可想而知，但即使如此，人们也很少选择诉诸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地的老百姓把上法庭叫作“吃官司”，不管是当被告被告上法庭，还是当原告主动走上法庭，都称之为“吃官司”，从这种称谓中不难看出当地人对打官司的态度，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打官司的。

“吃”官司

刘忠训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异类。

刘忠训第一次走进法庭是在1995年，那一回是名副其实的“吃”官司，当的是被告，代父亲出庭。在供销社时代，刘忠训的父亲在村子里设代销点，后来供销社系统撤代销点，供销社欠了她父亲的，她父亲也欠了供销社的，相抵之后，供销社还欠她家一些，原以为这笔账就这么了结了，不料，却被经理告上了法庭。

第一次吃官司，用刘忠训的话来说就是“被法庭糊弄了”，在法庭上，有人拿来一张白纸让她签字，当时24岁的她什么也不懂，就按人要求的签了，然后，败诉了。

明明供销社欠我们的钱，为什么会败诉呢？家族的一位长辈是退休教师，他告诉刘忠训，官司断得不公平就要上诉，于是刘忠训上诉，结果还是败诉，维持原判。一家人愁云惨淡，准备认命，刘忠训咽不下这口气：我们明明有理，为什么赔钱？

她壮着胆子找到了法院的院长，院长说到了这一步你就只能反诉了。那就反诉。

所有的人都劝刘忠训算了吧，吃官司不是什么好事情，输了一回又输一回，人家经理的丈夫是派出所所长，到处都有关系，

你再打还是输。但这一回，刘忠训不再稀里糊涂地上法庭了，她先是收集了大量供销社欠自己父亲的证据，又找到重庆市关于撤代销点的有关规定，有了这些，反诉成功。第一回吃官司，3个回合，对方亏了1,000多元，刘家亏了200元诉讼费。

打一场官司脱一层皮，3场官司打下来，刘忠训切身感受到了吃官司的滋味不好受，心中暗想：以后，遇上麻烦绕道走，再也不敢来吃官司了。

但是，到了1999年，刘忠训却公然抗税，全家所有税费一概拒交，还对前来催缴的镇、村干部说：“不把问题处理好，我就是什么也不缴。不然就去吃官司！”是什么样的问题让刘忠训变了一个人，甚至不惜与干部作对“吃官司”呢？刘忠训把四个问题归结为8个字：户口、信件、房屋、土地。

先说第一个：户口。刘忠训1992年结婚，一直住在娘家，她的姐姐弟弟都在外打工，她在家里种田、照顾父母和孩子，刘家共有12口人，父母、刘忠训姐弟4人、6个孩子，但6个孩子一直没能在派出所落上户口。

第二个：信件。村里没有邮局，寄到村里的信件都必须通过村里的邮政代理人才能收到，每封平信收费2毛，挂号信3毛，如果有汇款，每100元提7毛钱。村长和支书总想把刘忠训赶到婆家去，邮政代理人是村委里的人，平时就爱私拆信件，他在村里散布流言蜚语，说刘忠训已经离婚了，离婚证就在他手里，还说其他不堪入耳的话，就想把她赶走。刘忠训要求撤换这个邮政代理人。

第三个：房屋。1998年村里修公路时放炮打垮刘家一间屋，其余几间全部损坏，不能住人。刘家几次到村、镇、县里要求修复，都一直没有答复。

第四个：土地。修公路占用了刘家的土地，但青苗补偿、土地补偿一样没有落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修路并没有占用支书家的土地，他却得到了补偿。

本来，村里人对支书和村委一班人横行霸道都是敢怒不敢言，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刘忠训这样站了出来，自然成了“刁民”，因为她的“不驯”，把村里其他的人都“带坏了”，给村支书带来了许多麻烦。村支书和刘家相距不到200米，中间隔着一条路，

没有其他人家，两家本来是邻居，现在成了仇人，支书、老婆、孩子动辄对着刘家破口大骂，有时轮番上阵搞车轮大战，一骂一整天。这样骂了还不过瘾，村里的大喇叭就安在支书家里，他们还在喇叭上骂。刘忠训只能装听不见，劝自己宽心，该干什么干什么。

据理力争

2001年5月，因为需要办身份证，刘忠训的弟弟去了一趟派出所。早先的户口本都是手工填写的，最近才变成了电脑本，电脑打出来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他们家的户口本上多出来6个不相干的人。刘家12口人只有6人有户口，需要上户口的6个孩子一直没能上户口，但现在家里的户口总数却成了12口。“多出来”的6个其中一人是支书的女儿，她原来有一份户口，再在刘家的户头上又上了一份户口，其他几个也都是类似情况。云阳县是移民区，这样玩户口花样是为了办假移民，骗取国家的移民补助。

因为刘忠训的几条理由都有确凿的证据，尽管她抗税不交，村里也拿她没有办法，双方达成协议用各类补偿款抵顶应交税金，就这样僵持到了2001年底。年底有一次换届选举，刘忠训还是投了村委原班人的票，原来的支书依旧还是当他的支书。之所以会这样做，刘忠训有自己的想法：如果通过选举把他换了下去，新上来的人主要工作就是收农业税，如果不交，就会给自己新添一个对头，如果想用原来欠的费用抵税款，他会推说原来的问题是上一届班子的事。为了不致增加自己的对立面，刘忠训希望还是老对手当支书。

但再次当选后的支书却不是这么想的，觉得自己又当选了，可以好好治治这个不听话的刁民了。当选不久村里再次修路，又把刘家的房子全部炸坏，刘家多次要求，都不赔不修，刘忠训气不过，分配给自家的修路任务留下一小段不修以示抗议。

2002年1月8日，高阳镇政府以阻碍交通和非婚生育为名，将刘忠训扣到镇里。关于“阻碍交通”一条，刘忠训认为：“你们的路还没有修完，根本没有通行，谈不到阻碍交通，这一条不成立。”关于“非婚生育”一条，要罚款11,200元。刘忠训认为：“根据《婚姻法》（修改前）规定：婚姻有事实婚姻和法定婚

姻。而我已经有小孩，这应是事实婚姻。即或我是非婚生育，再按照《行政处罚法》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我生小孩是1994年的事情，现在是2002年了，不应该再追究，你们这个时候处罚我本身就是违法的。”

那天刘忠训在镇政府被关了20多个小时，镇领导来硬的拍桌子大吼，刘忠训跟他对着吼。领导想“以理服人”劝她要“守妇道”，刘忠训也跟他一五一十讲理：“我怎么不守妇道了？论做农活，我种庄稼种得比别人收成好；论养猪，家里养了那么多猪比别人养得好；论教育孩子，你们的小孩不如我家小孩学习好。我该做的哪一条没有做到？”领导讲不过她，只好来软的，劝她好汉不吃眼前亏，赶快写个检查回家取钱交罚款就没事了，省得家里老人孩子惦记。

怕家里老人惦记是刘忠训最担心的事情。平时她是一家人的主心骨，现在被带到镇里这么长时间，就怕父母顶不住给镇政府交了罚款，钱一旦到了他们手里再想往回要就难了，她必须早点想办法脱身回去。于是她也软了下来，向镇领导请教自己应该怎么办。领导让她写一个承诺书，承诺愿交罚款，并且不申请复议，也不去法院起诉。

刘忠训一个劲地给他戴高帽子：“我文化水平不高，这么复杂的内容也写不好，能不能你先写一份，我照着抄好了交给你？”领导一听很高兴，就先写了一份，刘忠训抄好承诺书借机上了一次厕所，将他写的东西悄悄藏了起来。

镇里派了几个人跟她一起走，名义上是送她回家，其实是怕她半路跑掉去申请行政复议，同时也要早日把钱拿到手。中间刘忠训曾经以筹款为名给弟弟打过一个电话，问他家里的态度，是想交钱还是吃官司。弟弟回答：“全家人都跟你站在一起，不能逆来顺受，宁肯吃官司。”

到家后，刘忠训带着自己以前收集的证据，再加上刚拿到的镇领导写的承诺书，和父亲一起悄悄离开了村子。

镇里明明派了人盯梢，还是没能看住他们。刘忠训和父亲到了云阳县后，专门请了一位律师帮他们起草复议材料，赶在行政复议的最后期限交到了计生委。

老百姓都知道打官司难，拖不起，申请行政复议同样熬人，

材料交上去两个多月，刘忠训催了很多次才有回音，复议下来的罚款变成1,200元。

就连司法局的人也劝刘忠训见好就收，交钱买平安，但刘忠训还是据理力争，最后罚款的事情不了了之。2003年10月，计生委有人悄悄对她说：“你真难缠。你们村就是因为你太凶了，别人跟着沾了不少光。”

上法庭当原告

刘忠训第一次当原告上法庭是2002年9月的事，状告长期辱骂她的村支书名誉侵权。

刘忠训再次请了律师，也是她最后一次花钱请律师。最近几年总在跟法院、检察院、司法局打交道，她在这个过程中学用法，对相关法律都已熟悉，也清楚当地盘根错节的各种利害关系，包括对这一次的诉讼，她早已知道自己在镇法庭的一审是一定会败诉的，请律师，是为了给自己做一个程序上的样板。

开庭前刘忠训问律师庭审后能不能拿到笔录，律师说这是她的权利。然后她又来到法庭外的一个复印店，请人做好准备，下午会拿一份东西来复印，一定要快。

开庭了，原告方只有刘忠训、律师和另一位代理人3人，被告方一下带来了几十个证人。对这些证人刘忠训早就心中有数，庭审开始后，刘忠训问被告，某年某月有没有对村民乱收费，被告矢口否认，刘忠训就当庭出示证据，镇下达的任务是多少，村里实收的又是多少，确实乱收费了。虽然事实确定无误，但庭长说与本案无关，让她不必再谈。刘忠训却说有关，因为到庭的证人有村里的会计，在这次的乱收费中，他们两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人出庭。

就这样，刘忠训一一出示证据，将被告的几十名证人全都否定，但即使这样，还是当庭宣判她败诉。

书记员拿来庭审笔录让刘忠训签字，她不签：等他们签了我才签。等被告签字之后再拿回来，刘忠训推说要仔细看看再签，拿着笔录就进了复印店，等庭长反应过来想阻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回去之后刘忠训仔细研读这份庭审笔录，发现了很多对自己

有利的内容，就连被告请来的证人都在法庭上承认被告辱骂了原告，有这些就足够了。

按规定一审当庭宣判的应当在10天之内下判决，但这次拖了两个多月判决书才到，而且为了上诉，中间又经过了很多波折，直到2003年8月15日，才在万州中院开庭审理。

恰恰在开庭前刘忠训接到了一份税务处罚通知书，通知她第二天上午9点到镇里交罚款，她明白这是又在耍花样，没做理会，一早5点就经水路离开了高阳镇。本来村支书还找了十多个人在路上拦截刘忠训，如果她在开庭时不能准时到达就会再一次败诉，但刘忠训巧妙地避开了，按时出现在法庭上。

二审刘忠训胜诉，判决一，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刘忠训）两次诉讼费及精神损失费2,000元。村支书没有上诉。

这次官司从2002年打到了2004年，到2004年5月31日通过执行庭拿到精神损失费，2004年7月22日，撤销了被告村支书职务。打官司总是这样旷日持久，费时、费钱、费神，往往一场官司打得人心力交瘁甚至倾家荡产，有些人还因为打官司弄得家庭四分五裂。刘忠训在吃官司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经验。

首先第一，要学法懂法，靠钱、靠关系、靠律师，不如靠自己。她常说的一句话是“当别人坑害你的时候，你只有自己保护自己。要想保护自己，必须学好法律”。

第二，要冷静。特别是在面对辱骂的时候、在法庭上，刘忠训的冷静成为赢得胜诉的重要因素。

第三，团结家人，共同面对。最初走上抗争之路，刘忠训与家人充分沟通，赢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她常说自己一家人分工负责，弟弟们在外打工挣钱，她负责在家打官司花钱，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第四，不要让吃官司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在这次名誉侵权案中，二审立案的过程极其艰难漫长，要应对各方各面的关系，与各种人、各种机构打交道，面对谩骂、刁难、拖延、阻挠、跟踪、恐吓，足以毁坏正常的生活，压垮一个人的神经。刘忠训却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把吃官司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比如，2003年2月她曾经几次去法庭立案但没有回音，中间正值农忙，

刘忠训在拿到中院立案庭盖章以后先把官司的事放在一边，该干什么干什么。等到6月份，秧栽完、土豆收好、红薯种下，家里的农活全都收拾停当才再去催问，中间只是打电话联系。判决后漫长的执行过程中也是如此，平时用电话联系，农忙之后再专门跑官司的事，吃官司与做生活两不相扰。最“有趣”的一次是在2004年2月4日，支书带一群人闯进她家，以税费执行为名抢走了几百斤腊肉。当地曾经有过维权人士在类似情况下与来人发生肢体冲突，因“暴力抗税、殴打执法人员”被派出所抓走。当时刘忠训正在种土豆，既不生气也不阻止，只是拿出相机拍照取证，然后继续去干自己的活，对他们的举动概不过问。来人搬完腊肉拿来清单让她签字，她连看都不看，拒签，最后是村支书代她签的字（这个村支书的签字又成了她下一步行政诉讼的有效证据）。直到2月9日种完了土豆，她才着手处理这件事，而且把事情做得按部就班，不是急于诉讼，而是沉住气，一步一步来，先到镇政府要求处理。

沉住气学好法律

在抗争的过程中，刘忠训被造就成了一个“全能型”的农民。她对法律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律师，特别是当庭表现在很多时候比律师还更胜一筹，对方每每花大价钱请律师，但她以自己表达为主却总是能够在最后取得胜诉。她对国家方针政策的了解比国家干部还多，曾经有来劝她要“依法交税”的乡镇干部被她拿出的中央一号文件说服，让全镇人以此受惠。她在繁杂的头绪中分析判断，发现问题，调查取证的水平让派出所的警员都啧啧称赞。她熟知行政、司法程序和信访及公、检、法诸部门的职责权限，曾经有人伪造文书企图蒙混过关，被她一眼识破。不仅如此，她遇到什么问题就学什么内容，对邮政、教育、户籍、土地、扶贫、退耕还林补贴等相关内容都一一了然于胸。

法律和政策如果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可能被当成欺压百姓的工具，如果能够被广大农民知晓，就能成为争取利益的福音。村里有个特困户，连住房都没有，一直住在一间不足四平方米的草棚里，没有床，甚至也没有被子，在地上挖一个洞填上谷壳，人像狗一样蜷在里面。国家在1999年曾经有一笔款项，专门

为住草房的农民提供的帮扶款，但他应得的补助被村里当作提留统筹扣掉了。刘忠训知道这种事情在镇一级不可能得到解决，就与做社会调查的大学生合作，将他的情况向县有关部门反映，终于在2004年落实政策并帮他建起了一间新房。

因为刘忠训接连打赢了几场以弱胜强的官司，附近的老百姓遇到什么问题都来找她出主意，她则根据情况引导他们学习适用法律、了解有关程序，教他们怎样化解冲突、解决问题，教他们如何运用国家政策为自己争取利益。也有很多人想请刘忠训做代理人帮自己打官司，但她都拒绝了，她有一个原则：“我只为自己家的事吃官司。”

刘忠训并不是一个天生好斗的人，每一次走上法庭都是被逼无奈，她只是希望能够以此摆脱侵害，得到安宁的生活，并不想成为一个“诉讼专家”。但是，总是有许多新的侵害接踵而至，让她欲罢不能。

2004年5月31日，是她历时两年诉讼终于拿到名誉侵权案赔偿费的时候，本以为事情会就此了结。但是就在第二天，支书一家再次挑衅，支书的弟弟不仅砍了相邻地段刘家的树，还打伤了刘忠训的母亲。

本来，刘忠训想通过派出所调解解决，事发当时立即报案，并按法定程序验伤取证，直到半年过后，到了2005年1月中旬，在她不断催促下派出所才开始调解；但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此间支书一家对她的谩骂一度升级。眼看调解无望，家人商定只能再一次通过诉讼解决问题，刘忠训才于2005年3月9日向法院递交了诉状。

让人意想不到的，支书一家为了给自己打人寻找理由，竟然伪造证据，用明显带有涂改痕迹的土地证作为证据出示，证明他们砍的不是刘家的树而是自己的，还在法庭上辱骂刘忠训。让人更加意想不到的，刘忠训又败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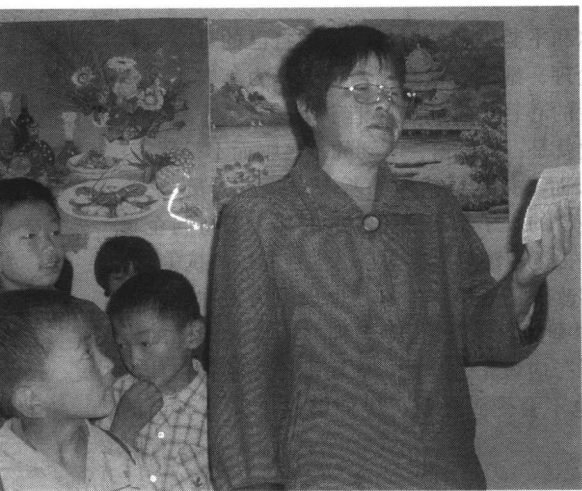
被逼无奈，刘忠训不止再诉打人案，连显失公允的法庭和与土地证有关的镇政府一起告了。

2005年11月，二审开庭，刘忠训胜诉。此次审理中，因为有政府参与，虽然胜诉，但不公正，没办法，刘忠训只有继续吃官司。

刘忠训接到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时候，正逢自己的母亲被打却得不到公平及时的处理，她深感在自己身边，暴力其实无所不在。和平，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就是和谐宁静的日子，最平常的日子。她希望的不过就是：推开窗，听到的是鸟鸣而不是骂声；打开门，迎来的是客人而不是强抢腊肉的所谓“执法人员”。当侵害来临，当这份最平常的日子都求之不得的时候，等待与企求都无济于事，只有抗争，运用法律武器为自己生存的权利抗争。

虽然通过抗争确实改善了处境，她自己也成了为人称颂的十八般武艺无一不精的“全能农民”，但刘忠训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她理想中的“和平”应该是这样的：农民即使除了种田什么都不懂，自己的权益也不会受到侵害，也能够过上安宁和谐的日子。

王殿敏
安徽妈妈



文：赵玲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就是要坚持下去，争一口气。
农民要组织化，我们做的符合农村发展的新思路，
坚持才是胜利。

2003年酷暑，我们全国20多所高校代表组成的大学生支农队来到安徽阜阳南唐村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支农支教活动。10公里以外王老村的王殿敏经常天不亮就带领本村文艺骨干拿着吹拉弹唱的家当，步行两三个小时赶来交流。在我们的鼓励下，她带动羞涩的老人们唱起毛泽东时代的歌曲和传统的地方戏曲，又手拉手地教我们扭当地的秧歌。她和文艺骨干们还把我们改编的歌曲《三个代表好》与秧歌动作结合起来，编成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歌舞，教大家一起眉飞色舞地扭起来。那天，兴奋的王殿敏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了！现在你们来了，给我带来的欢乐是从没有过的！我有3个儿子却没有女儿，如果能有一个你这样的女儿就好了——可你是大学生，我只

是个农民。”我心头涌起一股暖流，毫不犹豫地说：“您就是我的安徽妈妈啊！”

从此，我有了一位可敬的安徽妈妈王殿敏——她在最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与税费改革试点的安徽农村，亲身经历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种种变迁，并一直在积极地参与改变自己 and 乡亲们的命运。也许她所做的事情在外界看起来非常微小，但她和周围的乡亲们用了最大的坚韧与勇气克服着各种阻力，在艰难前进着。

刀刃滚到铡刃上

1957年，王妈妈出生于安徽阜南县一户清贫的农民家庭。由于家里很穷，父母把布证卖了才能让她上学，她还得一边读书一边带两个弟弟。她从小不爱说话，却非常勤奋用功，到初二初三时学习进步很大，一心梦想着将来当老师。在那个讲“出身”和“成份”的年月，国家提倡“推荐与选拔结合”。她19岁读完初中，因为没有“成份”好的人推荐无法继续念高中，只能在家给弟弟做饭，想学裁缝却根本买不起缝纫机。她时常感到自己比念过高中的人低了一等，但这也激发了她要更加努力争气的决心。当25岁嫁到柴集镇王老村时，她已经什么活都能干了。

王妈妈的丈夫踏实肯干，还当过村里的会计。日子虽然清贫，但夫妻十分恩爱，先后生了3个儿子，一家人其乐融融。1993年，与她感情笃深的丈夫因病去世，孩子最大的才13岁，最小的只有9岁，还留下了老母亲和看病欠下的债务。王妈妈的天塌了，真想随着丈夫一起去了，但她更明白作为母亲的责任，必须硬着头皮向前走，给孩子们撑起一片天。提到那段日子，王妈妈只有一句话，“我是刀刃滚到了铡刃上”。忙完了地里忙家里，忙完了老人忙孩子，王殿敏连哭的力气都得省下来，多干一点是一点。1995年她当上了村里的妇女主任，更是村里、家里、地里几头跑。

然而，自从丈夫去世以后，村里的各种税费一个劲猛长，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丈夫在世的时候，每亩地各种税费加起来大约在40块钱左右，但从1993年开始，猪头费、保险费、建校费，车船、地亩、河工、路工，变着花样地涨，最多的时候平均一亩地要交三四百块钱，大家辛苦一年还不够交的。村民日子

过不下去了，就开始上访，他们村成了有名的上访村。1995年村西一拨人上访，换下来一批村干部。1996年因为村主任乱收费，她不肯同流合污自愿不当干部了。1997年村东又一拨人上访，换下来另一批村干部，她再次被提为干部。王妈妈一直干到1999年，因为选举时有人拉关系，她就不再做了。虽然政府从1997年起就明文规定每亩负担不能超过130元，但规定之外还有很多名目，计划生育要收钱，死了人要收火葬费，虽然没见改建学校，年年的建校费却少不了，农民负担照样没有减轻。渐渐地，村里能走的人几乎全都打工谋生去了，只留下老人们看家带孙子，乡亲们的生活更加贫苦，没有一点生气。这些年来，王妈妈渐渐看清了中央的政策是好，但基层的腐败却是造成农民生活艰难的根源，她开始积极主动地带领村民学习法律政策，上访维权。

2001年法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杨云标回到王老村10公里以外的南唐村，带领村民成立了农民自己的法律维权协会。王妈妈更加积极地带领本村人不辞辛苦地前去参与。他们一方面积极宣传中央各项政策法规，鼓励农民敢于反抗乡村干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各种维权工作，清理账目、重新合计地亩、督促改进收税方式等。他们也因此得罪了当时的一些基层官员，受到百般阻挠，甚至经常有人暗中袭击王妈妈家里。虽然生活艰辛，维权艰难，但她带着为乡亲们争一口气的决心，一直用行动默默地坚持着。由于经济拮据，孩子们长大后相继进城打工，她更是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村庄的发展上。

开弓没有回头箭

2000年，安徽阜阳作为首批税费改革试点地区，率先取消三提五统，实行一税制，分3年逐步取消了义务工和积累工，一事一议以15元为最高限，其他问题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干群关系有了初步的改善。在这种新的变化下，杨云标、王妈妈和维权协会的骨干们商量着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他们发现，在维权的同时，更应注重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建设，以此推动农村社区的综合发展。杨云标带人几次到北京与专家商谈乡村建设的新思路，终于确定了一条“以文艺促进参与，以参与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互助，以互助促进发展”的工作思路。但是基层政府不支持他

们，很多工作难以展开，农民们也没有财力。正在这个转折的关键，2003年暑假，我们大学生支农队来到南唐开展支农支教活动。

经过了解当地情况并和村民骨干们商量，我们准备协助大家建立起自己的农民文艺演出队和老年人协会，首先要把村民们从上访维权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才能积极快乐地建设家乡。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王妈妈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学唱歌、扭秧歌，走家串户去访谈。为了能够尽快记住《三个代表好》的歌词，她还非常认真地戴上老花镜把歌词抄回家去，当晚一直在反复吟唱未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又赶来兴致勃勃地表演给大家看。不久南唐的文艺演出队和老人协会建立起来了，她经常带着王老村的骨干去参加活动。慢慢地，她从往常的沉默寡言变得活泼善谈了，她说，“我以前根本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有时都不敢过多地抛头露面——农村中闲话多嘛，可是后来我不但敢说了，还经常说、有时还一说就是一个多时辰，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变化啊！”

由于两个村子相距较远，道路坎坷不平，王妈妈每次往返都非常艰难，南唐的负责人就劝她不如在王老村也组建一个老人协会。她也想这样20多里地来回跑实在太辛苦，就趁农闲开始组织村里的老年人一起唱歌扭秧歌，张罗筹建王老村的老年人协会。2004年一开春，大学生支农队来到了王老村。在他们和杨云标的大力支持下，农历二月初六王老村老年协会正式成立了，王妈妈当选为会长。第一次参加协会活动的就有100多人，王妈妈和几位老人乐得合不拢嘴。谁知，第二次时却来了不足30人。因为许多人看到这次活动只是几个“刺儿头”（过去的上访者）牵头搞起来的，村委会也没人参与，怕“惹事”不敢再来。老年协会成立后曾经搞过一次十佳儿媳妇的评比，也学南唐的样子去发奖，但当他们敲锣打鼓把奖品送到人家门口的时候，家里却没有人。原来获奖的村民怕村委对他们有意见，临时用赶集为由关了门，让她和大伙扑了一个空。更有一些闲人到处传言，说寡居多年的她现在好招摇，爱扭爱跳是“风流”，她听了气得在家背着人掉眼泪。为了消除村民误会，她曾多次找村委，希望村委能从中协调，共同办好老年协会，可村委会成员却对此漠然视之。有些干部还管老年协会叫“老邪会”，让本来就心存疑虑的村民觉得这

个“老邪会”怕不是和邪教有什么关系，更不敢参加了。还有一次，一位包点干部在村民小组长会议上公开说，以后凡是参加村骨干会议的人都不许参加老年协会的活动。有人担心在种种压力之下，老年协会可能长不了，王妈妈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就是要坚持下去，争一口气，不要让人看笑话。我们搞的不是坏事，是按党中央一号文件来的，农民要组织化，我们做的符合农村发展的新思路，坚持才是胜利。”她想着村里不少老人生活不如意，有了这个协会就可以聚集在一起自娱自乐，或者遇到什么烦心事就可以通过大家的努力帮忙，她还是不改初衷，组织支持她的村民们一门心思把协会办好。



老年协会每月初六、十六、二十六3次活动雷打不动，每次活动都有唱歌、讨论、学习等内容。尽管活动中有时是王殿敏在唱独角戏，拿个喇叭又说又唱两三个小时，但让她欣慰的是，大家的参与性正在慢慢增强。除了老年协会的骨干，村里其他的人也会偶尔参与他们的活动，很多人虽然在参加活动时从来不张嘴不出声，但活动一次不落。王妈妈明白，这说明乡亲们需要这样的公共生活，说明王老村需要这样的公共生活。2004年暑假，大

学生支农队再次来到王老村，协助她宣传老年人协会，并且筹备举行了公开民主的会长选举。王妈妈以62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王老村老年协会的会长，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渐渐地，支持和参与老年协会的人越来越多了，评选十佳儿媳妇等活动在处理婆媳关系、赡养老人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村民们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很多。但是，王老村的村民还只是处于温饱阶段，在大家的现实需求下，王妈妈又开始为怎样改善村庄经济状况行动起来。

弄平路，把天青

2004年秋天，通过去河北定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和湖北房县实验点的学习，王妈妈和老年协会的骨干看到许多地方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通过集体购买减少支出，可以让农民得到实惠，他们也想在村子里办一个合作社。她回来后先在老年协会中征求意见，然后又从南唐兴农合作社请来了老师，给大家上了一天课，讲农民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合作社股金是用来做什么的、怎样通过理事会实现民主管理、如何发挥监事会的作用等内容。完成初步培训后，大家可以自愿入股加入合作社，因为当地情况比较复杂，王殿敏在合作社发起的问题上非常慎重，她事先公布：合作社入股全凭自愿，不以报名为准以交钱为准。本来王妈妈想过，只要有十户入股她就敢把合作社办起来，没想到会有30多人入股，王老村的兴农合作社就这样办了起来。他们尝试集体购进化肥和年货，既为社员节约了开支又增加了合作社的积累，通过两次运营大家尝到了甜头，又有十来户入股。

经过合作社一年的锻炼，王妈妈学会了领导的艺术，也在实践中学会了经营之道。第一年都是她一个人在干，到了第二年，合作社几位骨干分工负责，有人负责种子经销，有人负责化肥，有人负责年货。到2005年底，算一算账，除了还贷和利息，合作社有了1,000多元盈余。当然，这里有几位骨干的义务付出，但是毕竟让人看到了希望，特别是封住了那些说合作社怪话人的嘴。但是，老年协会和合作社依然有很多困难，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家搞活动，没有周转资金，合作社几位骨干以个人名义贷款周转。这同时也是依法注册的必要条件，没有足够的会员人数、资

金规模和办公地点，更重要的是没有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老年协会和合作社不能完成注册，就是一个“非法”的存在。

2005年换届，王妈妈通过民主选举当上了村里的妇女主任。事实上村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开展过妇女工作了，她准备重新把妇女健康、法律宣传等工作开展起来，并重新召开妇女大会。2005年8月，两位经过乡村建设人才培养的大学生来到王老村开始了一年的蹲点工作。王妈妈和他们一起去和镇政府谈准备在村里办妇女协会，镇里的书记、副书记、妇联主席都非常支持。特别是妇联主席，专门邀请王妈妈去她家谈到半夜，给了王妈妈很大的精神鼓励。

然而，作为村干部的王妈妈，她的身份也变得微妙起来。原来带领大家维权，针对的就是村委的一些不当做法，现在成了村干部，又要干收钱的事，真是让她左右为难。2005年每人要多收11.5元的修路钱，王妈妈与曾经一起维权的乡亲们坐在一起推心置腹地谈过一次：“从本心来说，我觉得交这十一块五不应该，按照法律不合法，可我不会再为这事带着大家上访了。我不带这个头，不光是因为我当了村干部，我有我的难处。上边压下来要交钱，我要不来这个钱，领导找我，不说收钱的事，而是说老年协会和合作社的事。按中央一号文件，农民要组织化、合作化，我们是对的。可我们的协会和合作社一直注册不了，又是不合法的，现在他按国家的条条框框卡我，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想发展，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后来大家得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待路修完以后，就把钱交齐。

多年来，王老村的四五百口人都在坑坑洼洼的泥路上行走，村干部没有威信，组织村民集资修路都没成功。从1996年开始，村里连续换了十一二个书记，几乎都是指手画脚，形式主义，干不长就走。2005年，蹲点的大学生向老年协会提议泥路应该修修了，王妈妈也看到村庄的发展和人们生活都不可能离开路。年底她跟协会出面，发动村民们每户兑砂浆自己出工修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然而，原来的路有高有洼，必须垫平，有的门口弯弯曲曲，还得保持直——推路机不保直不行。这样一些人家门口的地会被占，有的人就是不同意。王殿敏和老年协会的骨干们还得一一给不同意的村民做思想工作。还有一次丈量土地时多量

了100多米，发现后得全部重量，又引发了大家的矛盾。天寒地冻，烦琐辛苦而没有报酬的工作使一些协会骨干也想打退堂鼓了，王妈妈气得大病一场。她这时又赶上要外出参加乡村建设培训班，便买了几盒烟去跟骨干们谈心，还发动了各村民小组长带头组织大家修。几经周折，村里的土路和出村的两条大路终于在腊月间铺平修成。修路时得罪的几个老头子，后来见了面还不跟她搭腔，但大多数村民都说：“要不是王殿敏下那么大的决心，这路还是修不成！”

为了老年协会、合作社，王妈妈不仅付出了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更付出了她的勇气、容忍和妥协。她说她可以为此付出自己的一切，就像母亲对于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但是，这毕竟不能代替自己的孩子，“养儿防老”，在没有退休工资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农村，孩子是未来的生存保障。几年来，王妈妈一直忙于维权和老年协会、合作社的事情，无法在经济上和生活中更多地照顾孩子，2005年她还添了一个小孙子，但也只得送去儿媳妇娘家照料。如今，3个儿子都外出打工，他们对母亲所做的事情也不见得都能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当她触及到的人可能影响到亲属利益关系时，还会在母子之间引起冲突——对一个即将进入老年的农村妇女来说是最大的难题。为此，她也非常矛盾痛苦，她说：“我有时真想向组织请假，自己出去打工挣钱啊。但想到村里那么多支持我的人、南唐的杨云标、乡村建设的老师和大学生们，我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啊！”她说：“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向前走，也许，等我把老年协会和合作社办好了，我的孩子会理解我的。”她把对自己孩子、孙子的爱投向了更多村里的小孩子们，小孩子们也对她特别亲热。她把自编的歌曲《大红花》和《互助合作歌》的舞蹈动作教给村里的孩子。小孩子们学得快，表演得特别生动活泼，可以在村里教育更多的人。蹲点大学生李星还协助她和老人协会建起了图书室，不仅大人能够常来学习，周末时学生们都很喜欢来看书。

现在的王老村天晴了，路平了，老老少少们的笑容越来越多了。老人协会的成员已经达到七八十人，合作社也发展到60多户。我每次和王妈妈见面，她都会告诉我王老村的新问题和新发展——我发现她的自信又更增了一分。这些年来，王妈妈的坚韧

和勇气感染和鼓励了每一个到过王老村的乡村建设同志们，更坚定了我从事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心和信心。我记得她说过：“人活在世上就要争一口气！光为自己不为别人是不行的，我应该为大家多做事，看到乡亲们生活好了，我真的非常高兴。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我要做得不比男人差！”

后记

从2003年至今，多位支农大学生与乡村建设志愿者们通过各种支农支教活动到王老村，本文的完成应该感谢大家的共同努力。他们包括华东师范大学“乡土建设学社”、烟台大学“心系三农学社”、同济大学等高校支农社团的同学们，以及乡村建设志愿者寇廷丁老师、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孙恒。此文最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毕业生赵玲定稿。

朱银秀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文:寇延丁

和平,最重要的就是不受欺负,不会有人巧立名目来罚款,家里的东西不会被人拖走,不会接到恐吓电话,一句话,就是安安稳稳地生活在自己家里,不用到处漂泊。

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想找我们邻居一个老师帮我们写上访的材料,但他怕因此丢了饭碗,不敢写,我只好自己写。

2002年,我们的房子终于封顶了,儿子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里蹦蹦跳跳,又是笑又是叫,我却忍不住鼻子一酸,落下泪来,用了整整5年才把这栋房子盖起来,从结婚到现在眼看就10年了,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江西吉安是个穷地方,我们安福县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出去打工了,我娘家兄弟姐妹6人,只有残疾的大哥在家里守着父母。我1993年和洲湖镇大亨村的陈家来结了婚,他是长子,下面还有

两个弟弟，婆家穷，早些年饭都吃不饱，也没有能力给我们盖新房。婚后我们夫妻一直在外打工，上海、珠三角，哪儿有活干就往哪儿跑，一直在外面漂泊，1997年终于攒了一些钱，在洲湖镇买了一块房基地。

我们买的是一户已经盖了一层的房基地，当时洲湖镇开始搞规划，规定镇上的房子一律都要盖成3层楼，许多人因为没有钱盖那么高的房子，只好把自己的房基地卖掉。说实话我们也没有盖房子的钱，但又必须在镇上安家，因为只有这里才能离医院近些，我们的儿子有癫痫病，一发病就是急的，必须马上赶到医院才行。

买下了房基地之后我们继续在外面打工，两年以后盖起了第2层，又过了3年，才把房子盖好。2003年开春，我们借了一些钱，买了一辆南骏牌农用车，老公开着它给镇上3家砖厂拉砖、送煤。终于有了自己家，儿子的病情也控制住了，老公每天忙碌能有稳定的收入，再过几年就能无债一身轻，再也不用过那种漂泊不定的日子，想想真是开心死了。

老公的小弟弟叫陈加保，1999年7月与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签订了3年的台湾赴南非远洋渔轮作业合同，从他离开只往家打过4次电话，最近一年半一直没有消息，有人说出海九死一生，也许人已经不在了，平时我们在家里也不敢向公婆提起他，谁也没想到会突然回到了家里。

2003年5月12日晚上，我们接到公公打来的电话，说弟弟回来了。当时到处都在防非典，村里早就开过了会，让外面打工的人不要回家，一旦回来了人，要立即向村里汇报，还必须隔离观察。因为我们的电话4月份刚刚换了号码，弟弟事先也没能事先跟我们联系。我老公当天晚上就跟村里汇报了，我们家是独门独院，隔着小树林和稻田，离最近的人家也有400多米，村支书说我们家最好隔离了，在家里隔离12天就行了，每天由村医来家测体温，还让我们第二天跟镇里汇报。

第二天我老公又去了镇里，问镇综治办的康发林是不是需要把弟弟带到镇医院检查身体、做隔离，他说不用，在家里隔离就行了。

镇干部无理横行

没想到当天下午镇干部就到了我们大亨村的家。下午2点，我们家一下来了7个干部，有一个副镇长，有镇计生办的人，还有管片干部。管片干部给了我们让陈加保隔离的《留观通知书》，计生办的人说我没有查孕，要罚款630块。我们这里每个季度妇女都必须到镇里查一次B超，看有没有怀孕，我讲我已经查了。他们又说我们可以先把钱交上，等拿出证明来证明我查过就可以再把钱退回来。我说不用了，证明就在镇上我家里，我可以跟他们一块去取。他们没能罚到钱，就拿我弟弟出气，说他不该在这里时候回来，回来就要按乡规民约罚款，要罚5,000块钱。

他们张口张得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是几百块钱，我们也就认了，谁也不愿意跟镇干部过不去呀，可是5,000块钱我们实在拿不出来。他们就打手机，又叫来了4个干部，其中就有综治办的康发林，来了就举例子给我们听，说谁谁谁回来之后，不但罚了1,000块钱，还拉走他家一口大猪，谁谁谁罚款不给，就把他家房基拆了。后来又讲，看在我公公残疾的份上，罚款可以降到1,500到2,000元。

我们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有个干部把我公公叫到一边，对他说：“你儿子刚从国外回来，怎么也带回来了几万块现金，不过就是拿几千块钱应付一下吗。”我公公一听就傻了：他还没有去南昌的公司结账，一分钱也没拿到手呀。

没有钱，干部就让我们出去借，先让公公去借，又让我老公去，后来还让我也去，我没有去。我对他们说：“我们家里从外面回来了人，有没有在路上传染非典谁也不知道，本来村里的人都很忌讳，都怕我们，我们还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人家家里跑，村里人会说我们这一家人怎么这么不识趣啊！”见我不听他们的，有个干部就对我说：“跟政府做对，死日子在后头！”

晚上7点多，人都回来了，也没有借到钱，他们生气了，就去牵耕牛。那是头母牛，他们牵走了母牛，正在吃奶的小牛也跟着走，眼看走出去了200多米，我们才想过来去追，就这么把我们的牛牵走了，至少也得留下个凭据吧。

后来，镇上的干部看看天正下着雨，离镇上20多里路，牵着

牛也不好走，就把牛还给了公公，还对我们说，明天开着车再来。

他们一走平静了两个星期，中间干部到我们镇上的家里来过两次，催我们快点把钱送过去。我们就说现在非典正在隔离，没法去借钱。本来我们是想拖过这一阵子，等弟弟过了隔离期，证明他没有传染上非典，也就不能再罚我们了。弟弟挣钱太不容易了，在船上每天要干十七八小时的活，一月才挣 130 美金，镇上有 3 个像他一样在南非打工的年轻人就死掉了，他这点钱是拿命换来的呀，就这么扔出去，我们实在是不甘心。

弟弟很快过了隔离期，村医每天来测体温，证明他一切正常，没有染上非典，我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5 月 29 日傍晚，弟弟突然打来电话，说镇综治办康发林他们开车带走了大弟弟的摩托车，本来他跟在车上想到镇里开收条，但他们中途停车把弟弟架下来，强行开走了车。因为我们家的房子在通镇政府的必经之路上，弟弟让我们一定拦住车开收条。



当时正好我老公和老公的姐姐、姐夫都在我们家，就在路上放了一条凳子，把车拦了下来。他们不仅不开收条，还说要告我们拦路抢劫。我一听也急了：“到底是谁抢劫？车上的摩托车是你

们的吗？我们有这辆车的发票你们有吗？我还要告你们抢劫呢。”

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违反了哪一条法，但我敢肯定他们一定是违法了，就算是执法机关来家里抄走了东西，也得给我们开一个收据吧。后来我又想，就算他们不开收据，我也得留下一个证据，证明他们带走了我们的摩托车，就从家里拿出傻瓜相机拍了几个照片。

他们又打电话叫来了好多人，有镇干部，也有派出所的人，一下来了四五十个，加上围观的老百姓得有几百人，把交通都堵塞了。

派出所的人不错，也叫综治办打收据，但他们就是不干。这时候我弟弟打出租赶了过来，他们不但不开收据，还要以防非典为理由，把我弟弟也抓走。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要是防非典为什么他刚回来的时候不抓？现在已经过了17天，别说是隔离期了，什么期都已经过了。

我又拍他们抓人的现场，康发林来抢我的相机，我拚命跑回家，鞋都跑掉了，进了大厅被他抓住，我死死护住相机，他就踢我，我大声喊：乡政府的人打人！乡政府的人打人！我老公和政府、派出所的人都赶了进来，我老公扯住康发林，我才躲进门里。康发林还想冲进来，我死抵住门，手都被夹伤了。

后来他们把我老公还有弟弟都带走了，弟弟还被带上了手拷，我反锁了门，到了阳台上继续拍照，康发林暴跳如雷，往上扔石头：你等着瞧！

我知道他还会倒回来的，一定还会来找这个相机。等他们走后我就到了屋后的菜地里，挖个坑把相机埋在地下，又盖好了土，弄好，谁也看不出来。

我等了一阵，眼看6点多钟天都黑了，他们还没有回来，我切好菜后就骑上摩托车去派出所找他们。我一到也被扣了起来，要做笔录，不让我们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镇政府的人从我老公身上搜走了钥匙，7点钟左右，有6个人闯到我们家，把所有的地方都翻遍了，他们想找我拍照的相机。他们当然没有找到相机，就开走了我们新买的农用车，还把厨房里的一把不锈钢菜刀也拿走了。

我们在派出所一直待到8点多钟快9点的样子，我觉得派出

所的人比较懂法律，不愿担责任，就让镇政府把人和车都带走，我们就被带到了镇政府。

一到镇政府我和老公就被分开了，他们把我关在一个屋子里，也不让坐，就站着，找来一个在镇政府工作的亲戚让我把相机交出来。我知道他们肯定已经去家里搜过了，是搜不出来才跟我要的，就说当时一害怕就不知道丢在哪里了。后来他们还是跟我要，我说你们不是去找过了吗，说不定已经被你们捡走了。他们越是这样，我越觉得那是重要的证据，不能交给他们。

差不多到了11点，弟弟和姐夫被放了出来，我让他们去找我老公，才知道他被打了，打得很惨。镇政府的人要他写检查，说他抗拒防非典，还打人，没有做的事，他怎么能这么写，不写就打，6个人关了灯打他一个，这叫“黑打”。打完了问他写不写，不写，关了灯再打。

我让弟弟告诉老公，还是写吧，人先出去再说，一直到了凌晨3点多钟，才放我们离开镇政府，我们家的农用车、大弟弟的摩托车、我的摩托车还有我们家的钥匙都被扣在了镇政府。

从镇政府到我们家不过一公里，平时最多20分钟就能到家，可那天我们扶着老公走了一个多小时。十几年了，我头一回见他这么虚弱，脸色发黑，双手捂着肚子，走几步就要蹲下歇一会儿。等我们走到家，天已经亮了，可是我的心里却是一片漆黑，一点光明都没有。他们也不是真正的执法机关，不过是镇综治办的人，就能这么随意地抓人、打人、到家里搜查、扣没财产，到底还有没有道理可讲，有没有法律，有没有公道啊！

第二天镇里派人到大亨村，重新量了公公1989年盖的房子，说建筑面积超标，要罚款。得罪了镇政府，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头，将来不知道还有多少罚款等着我们。

我觉得这件事不能这么就算了，我们不能这样任人宰割，一定要抗争才行。我就和老公到了安福县验伤，但法院不给我们验，说要有镇里的证明，虽然我老公疼得不行，我们还是又返了回来，自然是开不到这个证明，又到县里找了律师，他说检察院也可以验伤，给我们验的是轻微伤，《法医鉴定书》上是这么写的：左胸前第三、四肋处见6cm×7cm青紫肿胀，左肩胛下区近脊柱旁见6cm×8cm青紫肿胀，左肩胛上区见3cm×5cm红肿，左上臂内

侧远端见 6cm × 7cm 青紫肿胀，右上臂远端内侧见 7cm × 8cm 青紫肿胀……

上访打官司

我们在县里咨询，都劝我们不要打官司，说打官司的时间赔不起，等案子判下来也许要一年半载，就算是打赢了官司，扣在镇政府的东西拿回来也该报废了，要想快一点就要上访。

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想找我们邻居一个老师帮我们写上访的材料，但他怕因此丢了饭碗，不敢写，我只好自己写。

我把上访材料写好，和老公、弟弟 3 个人一起上访，先去县里，但他们又把材料发回了镇政府，镇里的人说了，你就上访吧，早晚还得让我们来处理。我们就又去了吉安地区，但说我们是越级上访，还是要发回镇里处理。

上访的同时我还向媒体求援，我在广东的时候曾经在图书馆打过工，也一直都在订《读者》杂志，知道有许多冤案都是通过媒体干预解决的。一开始是向我们当地的《江西法制报》、《井冈山》报寄的材料，还有我在广东打工时常看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我心里着急，发的都是特快专递，《羊城晚报》很快就回信答复了，说不是广州地区的他们管不了。我就又向国家级媒体寄，《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法制在线》、《焦点访谈》，总之那一段时间一共寄了二十几份特快专递。

当时，我的亲戚朋友、村里的邻居，几乎所有的人都劝我不要上访了，告也没有用，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找了村干部，托他们到镇里去说情，村支书去了 3 趟，村文书去了 5 趟，我姐姐跟康发林的姐姐是邻居，也去向她求情。眼看着一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 4 万多块钱的财产押在那里，不仅耽误老公的经营，每天还要再交 30 多块税费，我们实在拖不起了。这段时间里还经常有人打恐吓电话，说在我们家挂了炸弹，要把我老公兄弟都废了，我的公公受不了，几次怀里揣着农药要去死在镇政府。我们不想让父母担惊受怕，只好向镇政府认错、交罚款、写检讨，领回了我们的东西。

我们一共交了 2,300 元罚金，其中我弟弟非典期间回来 1,000 元，老公打人赔医疗费 400 元，公公建房超标 600 元，农

用车的地税 300 元。明明是我们被打了，还要给别人交医疗费，明明我们没有错，还要写检查。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公道！

就在我们认罚之后的第四天，中国青年报的董月玲记者到了江西。

她真是上天派下来的使者，我发了那么多信都没用，在我都要绝望的时候她来了，给我带来了阳光。她不仅采访了那天抓人时在场的邻居，还到大亨村采访了支书和村医，到镇里采访了书记和综治办的人，还到了县“防非”指挥中心，看到了安福县的文件中制止乡规民约中收取保证金、隔离费的做法。

2003 年 8 月 6 日，《中国青年报》登出了董记者写的文章《回家之祸》。我把报纸夹在材料中间，申请行政复议，从镇上到县里、地区、省里都寄了，县长也寄了一份。报纸登出之后镇政府的人很快就把 1,000 块钱罚款给我们送了回来，我没有收。我觉得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在行政复议的材料里不光要求要退回罚款，还有我们这段时间车子被扣的损失、土地减产的损失、我老公验伤治伤的花费，更重要的，我要让他们向我们赔礼道歉。见我不收，他们就送到了我公公那里，老人家是穷怕了的人，又胆小怕事，不愿跟镇干部做对，就收下了。

我找了律师，想起诉，但法院不予立案，律师也不接受我的委托，法院和纪检委的人都劝我算了，说伤是小伤，又没出人命案件，再怎么找也没用的。我还不甘心，家里人都拚了命地反对我，就连我老公和弟弟也不再支持我了。他们见我在家憋气，就又把我也送出来在广东打工。

第二年，我老公卖掉了农用车也到梅州来找我，还把孩子也带来了，我们和镇政府弄到这一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子不好过。

后记

接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我先是不敢相信，怕是骗人的，知道是真的以后又不敢接受，我太惭愧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什么也不懂，只不过是为自己受到了侵害，就到处求援，遇到了董月玲这么好的记者，我的问题才解决了一部分。但其他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也想努力，但什么结果都没有，甚至连家人都不支持我。和平，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受欺负，不会有

人巧立名目来罚款，家里的东西不会被人拖走，不会接到恐吓电话，一句话，就是安安稳稳地生活在自己家里，不用到处漂泊。但我现在却做不到。

家，我们早晚还是要回的，故土难离，那里有我们新盖的3层楼房，有我们已经年老的父母。儿子在梅州的小学里借读，一家3口挤在一起，他特别怀念自己家的3层楼，有好多敞亮的房间，总在问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我又何尝不想回家，但起码现在不行，我们会尽量在外面多待几年，过春节也不敢回去，想等镇政府的人把我们忘了，或者等那些人都调走了我们再回去。

这次能到昆明来开和平妇女交流会，我特别高兴，见到了那么多知名人士，对我来说高不可攀的，听听声音都很荣幸，听她们谈“法律、公正、传媒、参与……”，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我来说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因这个机会，我能和她们坐在一起，心里的那份激动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只想说我太幸运了。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普通百姓太多太多，我只是比人家更幸运，是这些人里最幸运的人，有主持正义的记者帮忙，还能见到这么多好心的专家学者，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这样的人再多一些就好了。



黄淑华
追求和平
反抗性暴力

文:张祺

她在一个更大的讲台上熟练地使用法医学术语，使用“法言法语”，用自己的遭遇讲述妇女的权利、公民的抗争和司法公正。

我为女儿黄静申冤，是要让全社会都认识到，反对女性的暴力侵犯，是全社会的责任，所有人都要认识到熟人强奸、约会暴力的危险性。

我们保护自己的权利就是维护和平，维护和谐的生存环境。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揭露那些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就能提高全社会的觉悟，我们就能面对现实，敢于抗争。我们不能认为自己的力量小，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我们的力量就会放大，就会互动。

黄淑华今年55岁，是湖南湘潭人。湘潭是湖南省中部的一个城市，离省会长沙很近，农业、工业都比较发达，富有矿产。除此之外，湘潭也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诸多现代中国名人的故乡，

文化底蕴浓厚，民风淳朴强悍。

黄淑华的家在离湘潭市区 15 公里的一个名叫锰矿的小镇上。19 岁时，黄淑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从事农村基础教育工作 30 多年，退休前是当地风毛麟角的中学女校长。丈夫黄国华曾多年在军队服役，退伍后成为一名职业司机。这对夫妻出身农村，家境贫寒，婚后，丈夫又长年在外地工作，黄淑华照顾父母、抚养孩子，并在事业上取得成就。黄国华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妻子，“这是一个能干的妇女！”黄淑华一生最大的骄傲除了事业就是两个女儿，他们的两个女儿，黄芳和黄静在父母的精心培养下都成为教师。事业有成，女儿长大成人，这个四口之家的日子平静、和睦，受人尊重，充满快乐和希望。

那一天

一夜之间，这样的生活被粉碎得彻底。“2003 年 2 月 24 号这一天，是我们的好孩子黄静去世的日子，自从 2003 年 2 月 24 日这一天起，我们的家就再没有快乐的气氛了。”黄淑华说。

那天上午 10 点多，黄淑华接到“黄静出事”的电话，急忙赶到女儿宿舍，“她脸冰冷了，他们在这的就说她已经死了。我怎么也不相信，我赶忙跑到这里，我就抱着她的头，就用我的脸挨她的脸，就叫她。她一点声息都没有，脸冰凉的，这嘴角，这么躺着，这眼睛是这么睁着。这个嘴角有一点点血迹，我帮她擦了，我怎么也不相信，她会不答应哪。我一看，掀开被子一看，她没穿衣服。”黄静死时全身赤裸，存在多处伤痕，身上的被子整整齐齐地盖过鼻梁。警方在勘察现场时发现，宿舍的门窗紧闭，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黄静离奇地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

21 岁的黄静是一名小学音乐教师，健康开朗，多才多艺。这个懂事、乖巧、调皮、纯洁的小女儿，前一天中午还和妈妈一起吃了饭，在家里弹琴、唱歌……黄淑华不能接受女儿去世的事实，然而这样的打击只是一个开始。

我女儿是怎么死的？

最后和黄静在一起的人——黄静的前男友姜俊武称，过程是这样的：前一晚他和朋友一起约黄静吃晚饭，凌晨 2 点多钟送黄

静到学校卧室直至24日早上6时50分离开黄静宿舍；8时30分，姜俊武告诉校长，黄静可能出事了。当校长找人破窗入室后，黄静已经死亡多时。警方在案发现场遗留的数团卫生纸中检出姜俊武的精斑，在黄静的双下肢腘窝处有多处挫伤伤痕以及左手掌、双手腕、手臂、颈、胸部等处有多处伤痕。但公安部门当时认为没有致命伤，黄静之死属于自然死亡，不予立案。

黄淑华不相信事情这么简单，黄静绝不会让姜俊武留宿；而姜俊武的说法肯定摆脱不了其中的干系。“黄静遇害之后，我急昏了住进了医院，到处找人帮忙，结果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的观点。”在医院躺了几天之后，黄淑华意识到，为了女儿，不能病，不能哭，甚至不能死。在为黄静申诉的过程中，黄淑华曾经遭人追打，“我就赶紧跑啊。我被打的时候就想，我女儿被害的事还没弄清楚，我被他们打伤了，我女儿的冤怎么办？！”黄淑华决心为女儿讨回公道，她一方面请求法医进行尸检，并将女儿的尸体保存起来留作证据，另一方面强烈要求警方立案，探明黄静真正死因。

2003年2月至6月，公安机关相继做出的有关黄静之死的3份司法鉴定，都认为黄静是因为身体的健康原因患心脏病或肺梗死而猝死。黄淑华了解自己的女儿。黄静生前勤于锻炼，身体健康，无任何病史。在师范学校读书时还是校篮球、排球、网球队的主力队员。从来没有什么心脏病，孩子怎么会因为心脏病死亡呢？黄淑华及家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结论。黄淑华认为女儿是他杀而死，凶手就是姜俊武。

黄淑华转而向专家学者们寻求帮助，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挺身而出。在黄静的死亡现场还有很多疑点的情况下，黄淑华拖着瘦弱的身体，奔走于湘潭、长沙、广州、北京、上海之间，她希望有专家能从那些记录外伤的照片上，查出孩子死因的真相。同时，在律师的帮助之下，黄淑华向有关部门递交申请，要求出具委托函，自行委托有国家资信能力的法医单位对黄静尸体做出鉴定。2003年7月3日，黄淑华委托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专家对三份鉴定结论进行医学理论审查。南医大做出了与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完全不同的鉴定结论：认为黄静属非正常死亡，因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或肺梗死证据不足。2003年8月14日，第四次尸检的鉴定结果由中山大学陈玉川教授做出，陈玉川是法医

鉴定方面的专家，陈玉川认为警方出示的黄静突发疾病的死因缺乏证据。

2003年12月22日，检察院仍依据公安认定黄静属于“病死”的鉴定结论，以强奸（中止）罪起诉姜俊武。2004年3月5日，在看守所羁押9个月之久的姜俊武被取保候审。黄淑华没有就此放弃，又向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2004年3月22日，司法部上海鉴定中心的法医来到湘潭鉴定却意外发现，原本保存黄静器官标本的湘潭市二医院病理科，已将重要证据心脏烧毁了而终止鉴定。这时黄静案已经通过互联网为国人所知，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被“成为中国网络第一案”，这仿佛公案故事一样离奇的情节牵动着大众的心。2004年8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第五次法医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

一起案件，做出5次法医鉴定，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我女儿到底是怎么死的？”想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黄淑华首先需要面对一个法律制度。黄静案的代理律师、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著名律师吴革说，当个人，或者个人的亲友生命、健康遭受非法侵害时，需要公安机关及时公正侦破，但公安机关既主管案件、立案侦察，也主管司法鉴定。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所谓明显的错判还有审判监督的渠道，但对于一张司法鉴定，却往往没有纠正的办法。而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在黄淑华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终于被打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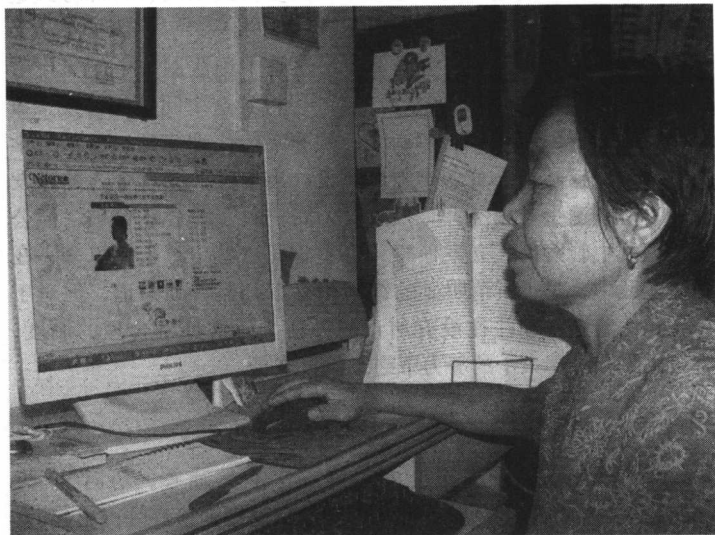
我斗争，我存在

从黄静死亡到湘潭市公安局第一次立案侦查，历时99天（2003年6月2日）；从黄静死亡到湘潭市雨湖区检察院提出起诉，历时302天（2003年12月22日）；从黄静死亡到湘潭市雨湖区法院开庭审理，历时653天（2004年12月7日）；从黄静死亡到湘潭市雨湖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历时1,233天（2006年7月10日）。

对于黄淑华来说，每一天都是锥心的伤痛、无尽的等待和艰难的抗争。其间，有关黄静的死因进行了5次法医鉴定，在调查

过程中的离奇事件一桩接着一桩：先是黄静的毕业体检表丢失，随后是黄静的心脏等器官被毁损……。每一天都是“非常辛苦的，非常非常伤心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得自己去办，去找，当然还得有人支持你。”这样的经历将黄淑华从一名教师变成了一名斗士。从19岁起，这个普通的农村女性就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直到“那一天”。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截然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她再也不可能返回讲台，她在一个更大的讲台上熟练地使用法医学学术语，使用“法言法语”，用自己的遭遇讲述妇女的权利、公民的抗争和司法公正。

在“那一天”之前，黄淑华从未想过与法律产生任何关联；在“那一天”之后，她首先想的是为女儿申冤；随着四处碰壁，黄淑华开始看到法律和制度的缺陷，遇到更多和她一样的受害人。她看得更多，想得更多。



回顾过去的3年和她所从事的工作，黄淑华说，“我参与建设了一个法制国家的建设，法制应该得到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我们的法制建设中存在问题，法律不健全，存在有法不依，执法违法的情况。我们老百姓是这种情况的受害者，所以我呼吁、参与和建设。如果我们不抗争，这种践踏法律的情况就会一直存在，那些人就更加肆意妄为。我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更

多的弱势群体。”

2004年2月24日，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发起了主题为“我们要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为湖南遇害女教师黄静争取法律公正一周年纪念会”，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清华大学宪法和公民权利中心等非政府组织代表，和一些社会人士14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黄淑华在纪念会上说：“我痛心的是，由于女儿死于性暴力，她所承受的痛苦竟变成另一些人、包括某些公安执法人员的笑谈……我为女儿黄静申冤，是要让全社会都认识到，反对女性的暴力侵犯，是全社会的责任，所有人都要认识到熟人强奸、约会暴力的危险性。”

这是黄淑华第一次听到“约会强奸”这个词，由此，她开始主动自觉地将为女儿申冤与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运动联系在一起。黄静遇害后，随着媒体的报道，黄淑华渐渐为人们所熟知。正如“黄静案”变成了“约会强奸”的一个符号，黄淑华变成了为女儿申冤的母亲的代表词。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一位年迈的妇女走过来对黄淑华竖起大拇指，“你是黄静的妈妈吧，你了不起！”一位湖南衡阳的母亲，因为孩子死因不明到北京上访，处处碰壁之后，人们告诉她，你们湖南有一个黄静的妈妈，你去找她吧，让她告诉你怎么办。

黄淑华不断地接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求助，人们有向她“取经”的，也有通过她找司法鉴定机构，找法律援助机构的。她熟知每个人的名字、案情，甚至连发案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告诉她们，第一，要求公安立案侦查，不立案得给一个不立案通知书，然后找检察院；第二，要求公安开出来一个委托函，找社会中立的法医鉴定中心做鉴定；第三，要找到敢讲真话的律师，自己也要做一点调查。”这些在律师们看来也许是不值一提的法律常识，却是黄淑华碰了无数钉子之后才得到的“秘籍”。

“黄静没有遇害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受冤枉的，这么多悲剧的化身。我帮助他们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得到安慰，我为我的女儿申冤，得到社会上很多好心人的帮助、支持。我要用我的努力去回报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有20多个家庭因为遭遇类似的情况向黄淑华直接求助。一位深圳的朋友因为妹妹被害找到黄淑华，黄淑华不仅和他分享自己的经验，并在开庭时专门

赶去给予帮助，由于黄淑华的及时提醒，这起案件最终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并相应提高了审判级别。对此，黄淑华感到欣慰，“这个案子后来办得就比较好，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吧。”

现在，黄淑华会和每个遇到的女孩子、母亲交流，告诉她们怎么来防范约会强奸，防范婚恋关系中的风险。“要有这个意识！总有些事情，我们没有遇到过，想不到，也不懂防范。可事到临头，就没有逃生的机会了。”她喃喃道，“黄静和姜俊武分手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要不要我和姜俊武谈谈，黄静说不用，我也就没管了。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认识水平，不知道这个危险。”现在，她决心把这个血的教训告诉所有人。“想到个人的遭遇，常常令人悲伤，看到了这些现实，我更想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觉醒，大家一起来行动。我愿意把我个人的不幸遭遇作为一个警示告诉大家，但愿大家能从中学到，当悲剧降临的时候如何抗争，在悲剧来临之前如何预防、防止悲剧的发生。”“约会强奸，不光是女孩子的事情，成年妇女也受到侵害。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案件全部搜集起来，引起社会的重视，大家的重视，反对强奸，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

追求和平 反对暴力 由你我来打造

暴力没有结束，斗争仍在继续。不久前，历时19个月的一审程序终于结束，法院判决姜俊武无罪。判决一出，舆论哗然，雨湖区检察院竟接受了这个结果。经历了1,200多个日子，竟然等到了这样一个结果，黄淑华不能接受这个判决，“这样一个判决，是一个最坏的法制教材，好像是恋人关系，男的就可以强奸，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女孩子最大的悲哀！”面对这样的结果，黄淑华依然坚强而自持，她对大家说，“请你们为了我，为了黄静，为了所有的女孩子，能做什么做些什么吧。”目前，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等非政府组织和众多热心人士纷纷行动起来，支持黄淑华，寻求更多的解决途径。

黄淑华认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和平的生存环境。虽然不是战争中，但我的女儿被剥夺了生命，犯罪分子就是和平的威胁因素；那些执法违法、渎职的人滥用国家权力包庇犯罪

就是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我们保护自己的权利就是维护和平，维护和谐的生存环境。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揭露那些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就能提高全社会的觉悟，我们就能面对现实，敢于抗争。我们不能认为自己的力量小，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我们的力量就会放大，就会互动。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在她的梦想中，和平是这样一副景观，“我想，能生活在一个比较规范的体制下，人们能够互相支持、互相信赖。法律法规健全，人们能够和睦相处。人的生命、财产得到尊重，不受侵害，当人们遇到问题能够得到法律的扶助和保护，对于丑恶的现象人们能够抨击。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现实的一种生存环境。”

这是一副最基本的和平景观：人们能够活着或者说有尊严地活着，而黄淑华对此的切身体会是，这样的和平必须靠我们自己来争取、打造。

附录：

黄静的声音永远不会沉默——写在女儿遇害两周年的日子 黄淑华

我的女儿黄静被害已经两周年了，作为父母，已经经历了730个日日夜夜的辛酸煎熬。该案已于2004年12月7日第一次开庭审理，但由于诸多案外因素干扰，法院至今未下判决书，谋杀女儿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女儿带伤的遗体还躺在殡仪馆，她的亡灵仍然得不到安息，她含冤屈死仍不能瞑目。

2003年2月24日，是我家蒙冤受辱的灾难日子，女儿黄静无辜被害的惊天噩耗打破了一个祥和家庭的幸福……我们无奈地踏上为爱女申冤，寻找法律公正的维权之路……我为女儿，也为天下所有妇女不受暴力侵犯进行的抗争已经整整两年。

2004年2月24日，是我被真情感动的日子。黄静冤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由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北京）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网站分项目和清华大学宪法和公民权利中心发起，在这个教室里举行了为黄静争取法律公正一周年纪念会。我被在场人们的正义与良知深深感动。这是我的不幸中的万幸。

2005年2月24日，在这里纪念女儿黄静被害两周年，我更是百感交织。今天我要说，黄静案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这一年来的艰难曲折，有无数的公民在坚持关注、坚持呼吁，这声音

已经感天撼地。

2004年3月，在北京有37位女性学者签名为黄静呼吁，由于女性主义学者和行动者的奔走，这份呼吁书形成了全国政协的1342号提案，5月底，央视的报道大大提高了黄静案的能见度。长沙政法频道对黄静的进展跟踪报道，已有8次之多。此外还有东南电视台、江西电视台中国法制日都市频道及凤凰卫视台等多次报道。湖南《潇湘晨报》、《北京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上海新闻晨报》等全国50多家媒体都先后跟踪报道。

去年一年来，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为黄静案提供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吴革亲自担任我们的律师，并促成了当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对黄静的第五次法医鉴定。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疑难刑事问题研究专家委员会更为黄静被害案提供了专家论证意见书。高法鉴定结论与刑法专家论证意见已成为惩罚罪犯的有力证据。特别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黄静被害案中出现的自侦自鉴问题目前已得到了充分重视，它部分地导致了司法鉴定制度将要实行的重大改革。

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的师生为“黄静案”能得到公正审理做出了持续的努力。艾教授针对黄静内脏标本被毁撰文《黄静之心，中国人的正义之心》，针对第五次法医鉴定撰文《“特殊性行为”与强暴致死》，在黄静案开庭前组织了“黄静遇害574天——我们仍然在努力”活动，这些都有力推动了黄静案得到公正处理。艾教授先后四次赴湖南调查，并到浙江、北京等地采访。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的师生一直是我的坚强后盾，这正如艾教授本人在文章中的深情呼吁：“让我们以推动中国法制的热血告别苦难，治愈我们民族的巨创深痛。”

目前，黄静被害案的判决书还没有出台，但正义的人们心中早有定数。我不乞求法官的同情和怜悯，只希望法官能秉承良知，作出对历史负责的判决。

在纪念女儿被害两周年之际，我再次衷心感谢社会各界正义人士对黄静案的关注、支持和援助；我希望受害者的家庭能更多地得到社会支持。黄静的生命虽然不能挽回，但黄静的声音永远不会沉默。为纪念女儿，我希望开设黄静热线，办好“永远的黄静”网站，为受害人说话，让沉默者发声。女儿黄静，愿妈妈的声音一直抵达你所在的天堂花园，你在这样的正义之声中安息吧。

新界女原居民会 传男不传女岂有此理



文：卢健凌

一班在新界围村长大的妇女，深受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影响，被家族中的男人抢夺了土地房子，并身上承受着各种压力后，终于忍无可忍，挺身向大众述说她们的故事，同时希望，为围村的下一代带来更平等、更和平的环境。她们的努力，最终成功争取了歧视女性的《新界条例》的修订，同时聚集各界的力量，成为香港妇运的里程碑。

原居民妇女亦是土地拥有者，她们虽然是妇女，但不表代她们没有继承权，可以任人抢夺她们的土地。这个组织的存在其实是一个象征，告诉大家女人仍然有需要继续争取，不能停；而实际所谓的传统现在是行不通的，女性是会站出来去争取的。

香港一直被视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一个先进文明的地方。可笑的是，直至今现在，各种歧视仍然存在，即使在这年头，香港有

“平等机会委员会”、有《性别歧视条例》，男女不平等的情况比比皆是。可以想象，尚未有这些组织和法例时，一群活在旧有父权制度下的女性，生活是怎样过的。1994年，一班在新界围村长大的妇女，深受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影响，被家族中的男人抢夺了土地房子，并身心上承受着各种压力后，终于忍无可忍，挺身向大众述说她们的故事，同时希望，为围村的下一代带来更平等、更和平的环境。她们的努力，最终成功争取了歧视女性的《新界条例》的修订，同时聚集各界的力量，成为香港妇运的里程碑。

1993年3月22日，立法局门外，发生一场冲突，千多名以新界男性原居民为首的示威者，对着几十名支持修订《新界条例》的妇女咆哮、推撞。一幕幕非理性的暴力场面，被各种媒体记录，即日的电视新闻报道、翌日的报章，将那班高举父权欺凌弱小的暴力，尽现于香港市民的眼前，同时亦激起市民对修订男女平等条例的热心和支持。

立法局当日原定下午4时半召开审议条例法案委员会，听取新界各乡事委员会意见。千多名以新界男性原居民为首的示威者，在下午约3时，由元朗和上水一带的围村，乘着旅游巴，分批到达立法会门外，抗议港府同意修订《新界条例》，有意废除围村土地传男不传女的传统。乡议局成员简炳燊等在立法会议员人口通道外示威，高呼“反对灭族法案”，并指责女性可享有土地继承权是破坏大清律例。警方早已架起铁马，划出示威区，并派出20多名警员到场戒备，但示威者情绪高涨，不时高声呐喊，并多次尝试冲出示威区，情况甚为紧张。及至3时半，6名新界原居民妇女委员会的代表到场，立时惹起反对修订条例的示威者的不满。来自示威者的嘘声、咒骂之声此起彼落。委员会没有理会，并拉起横额，要求妇女应享有平等权利以及支持修订《新界条例》。有示威者冲向6名代表，更将她们的横额撕破，冲击她们。警方奋力将示威者拉开，并派蓝帽子^①增援。

扰攘至4时许，30名支持修订条例的人士到场声援，并高举

^① 蓝帽子，即香港警务署属下的警察机动部队，任务是各区的反罪案巡逻、大型搜索、大型活动的人群管理等。由于所戴的是蓝色贝雷帽，故被称为蓝帽子。

男女平等的标语。此举却激起“反修订派”的不满情绪，有人高声呼叫，鼓动反修订派追打“支持修订派”。瞬间，“支持修订派”虽有警方保护，但仍被千名“反对派”围攻。以男原居民为首的“反对派”派出一班老妇手持雨伞追打“支持派”，更向对方吐痰，而男原居民在后方呐喊助威，有人声言要“强奸陆恭蕙（提出修订动议的立法会议员）”，示威者更不时向“支持派”投掷水樽。警员既要保护“支持派”，又难对“反对派”老妇采取强硬的制止行动。期间，立法会议员李永达亦被人拳打脚踢至倒地，亦有“支持派”的成员因手持大声公高喊男女平等而触怒“反对派”，惨被推倒在马路中心，险被驶过的巴士撞到。最后，“支持派”在警方保护下，贴墙绕道，避进立法会大楼内。

事件被传媒大肆报道，香港市民透过电视荧幕，目睹一幕幕赤裸裸的暴力场景，激起社会对修订《新界条例》的关注。不少妇运团体及社运团体，看到这次暴力事件都愤愤不平，并因此积极投入支持条例的修订行动之中。支持修订的行列一时壮大不少。不过，新界原居民妇女委员会的成员，部分仍居于围村，她们的安全令一直陪伴她们抗争的妇女中心社工王秀容和其他妇女团体十分担心。相反，一直活在围村的暴力环境中的几位原居民妇女，却没有畏惧。或者，相对于她们一生中所受到的暴力对待，在她们眼中，这不过是“小儿科”。

走投无路下的反抗——郑丽嫦

郑丽嫦，元朗马江村原居民，家有7兄弟姊妹，两位姐姐早嫁，家中兄弟又不事生产，终日在家中游手好闲。因此家中的粗活自然落在郑丽嫦身上。小时的郑丽嫦都无甚怨怼，或者是看到围村内的其他女孩子都是如此，自然觉得这是应份。不论种田所得，或是工厂打工的酬劳全交予父母。20多岁时，曾结识一位不俗的男子，但因为父母怕她嫁了后没有人养家，婚事就此作罢。几年后弟妹都成家立室，父母反过来劝她结婚。不过，郑丽嫦更爱读书和习武，孜孜不倦地修读跌打、中医等，在获得一张又一张证书后，她最后成立一间跌打馆。郑丽嫦更练得空手道黑带3段，闲时开班授徒。生活原是安然地度过，但在1991年，大哥和弟弟把他们和郑丽嫦现居的房屋卖掉，噩梦从此开始。

郑丽嫦的父亲在1984年离世，临终前表示留下的一幢3层房屋，顶楼让云英未嫁的郑丽嫦居住。岂料，根据《新界条例》地权传男不传女，物业归大哥和弟弟所有，两兄弟亦仗着《新界条例》，在没有征询郑丽嫦的情况下，将房屋卖掉。买家为迫郑丽嫦交接，出尽诡计，包括偷进屋内泼粪、弄破玻璃、剪断电话线等。郑丽嫦每一日回家都活在恐惧之中。每月换锁数百个，换锁匠都劝郑丽嫦不用再换，因为不管怎样换，对方都有办法开锁。最教郑丽嫦感到气愤的是，她每次报警求助，都不得要领。郑丽嫦忆述一次再被贼人破门入屋，借邻居电话求助，接报的警员非但没有派员来巡查，反指责她经常报警，怀疑她玩电话。郑丽嫦没有办法，唯有找律师帮忙。可惜的是，律师费花光积蓄，仍未能为郑丽嫦讨回公道。郑丽嫦心有不甘，于是在1993年去信当时的港督彭定康、立法会议员、新华社及妇女中心，开展了抗争的第一步。

活在暴力的阴影中——阿金

探访阿金，令笔者有很大的触动。阿金先带我在她居住的流浮山沙岗围走了一转，看到村内的乡亲，她都十分回避。走进屋内，她仍没有放下种种的担心。笔者询问可否开始访问，她立即关掉大部分门窗，更在窗旁放下开着的录音机，之后我们则坐在屋内的中心进行访问。阿金还不大放心地问道：“访问会否让屋外的人听到？”或许，阿金活在暴力的生活中太久，至今仍未能释怀。

阿金的父母本有4女1子，可惜最细的儿子因一次高烧，父母误以符水医治，延医不治。在围村重男轻女的阴霾下，阿金的父母因没有子嗣，引以为憾。父亲终日酗酒，母亲亦因丧子而变得自卑，对4位女儿亦极尽仇视，声声“陀衰家”^①，“谁叫你身为女儿家的”咒骂女儿。女儿的教育当然不被阿金父母重视，阿金亦只勉强念完小学，就开始去工厂打工。直到妹妹念完小学，父母又阻止妹妹继续升学，但阿金却宁愿负起妹妹的学费，也要让妹妹继续读书。为此父亲与她来了一场大冲突，父亲更声言：

^① “陀衰家”是广东俗话，意思是败坏家门声名，并将噩运带到家里。

“如果你再供个妹读书，就斩死你。”家里终日吵吵闹闹，阿金亦只能哑忍，并供妹妹读至中五毕业。

没有子嗣在父权社会是一大耻辱。阿金的母亲为了有人继后香灯，竟央求同姓工友过继儿子给她。当时过继仔的亲生父母更到她的家看过田地才把儿子过继。阿金形容，过继仔的亲生父亲好赌，她更曾目睹对方父亲向自己母亲借钱，她认为这根本就是卖仔。虽说如此，过继仔与阿金的家庭十分疏离，每次做节回来点过灯，吃过饭后，随即匆匆而去。及至过继仔结婚，无端搬进阿金的家，生活上种种摩擦日深，加上眼见父母事事偏袒过继仔，心里更觉难受。三姊妹早早出嫁，剩下阿金面对这个家。在1982年的暑假，阿金感到家无宁日，决定投靠移民荷兰的姐姐。岂料，这一别竟与父亲成永诀。阿金返港后，听到亲友所言，认定父亲的死定必与当日留在家中的过继仔的妻子有关，起码对方没有及时送父亲入院救治。

自此以后，阿金与过继仔一家势成水火。而争产问题，更令双方关系白热化。阿金的父亲财产不少，父亲死后，妻子充当遗产司理人。不过，阿金的母亲亦在1991年证实患上鼻咽癌。阿金对母亲不离不弃，即使受尽母亲的冷嘲热讽，无理取闹，但仍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更不惜辞工照顾母亲。可惜的是，母亲心中没有这个女儿，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过继仔。1993年8月的某一天，过继仔哄得阿金的母亲跟他办理继承阿金父亲遗产的手续。阿金母亲更欢天喜地跟阿金说“心安乐啦”。这令阿金与三姊妹，没法继承父亲的一分一毫。

抗争过程

新界原居民的丁权问题一直备受争议，香港一报章（《明报》）在1993年9月9日独家报道《新界条例》将影响新界土地上所有物业的继承权，包括在新市镇发展的居室屋苑，非原居民女性亦将无此权利，估计受影响人数高达全港四成。报道后引起各方极大回响，各方抨击在《新界条例》下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政府亦计划修例，但计划只有非农地的继承权获得豁免，新界女原居民仍然要承受百多年的无理传统所剥削。与此同时，郑丽嫦在1993年8月开始，以个人名义发起原居民妇女签名运动，反对

剥夺女原居民继承权的法例，又分别致函港督、新华社、港同盟及传媒等，述说自己的故事，并要求各方关注有关问题。

不知是否事有凑巧，阿金在电台听到有关丽嫦的故事，经教友的介绍，开始与丽嫦取得联络。加上丽嫦在元朗开设的跌打医馆集结不少围村妇女，其中一名女原居民邓英亦在一次看跌打的过程中，感怀身世，与丽嫦互相诉说自己的故事。这几名女原居民慢慢走在一起，丽嫦亦辗转联络到一直关心新界女原居民被歧视的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当时的协会主任王秀容跟进郑丽嫦的个案，认为过往新界女原居亦有挺身而出讲述自己的故事，但都只属于零星落索。她建议丽嫦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有助集结力量，其后邓妹、黄水丽、邓元带等女原居民在辗转介绍下，亦在妇女中心组织起来争取应有的权益。这几位女原居民终于在1993年10月成立“反歧视原居民妇女委员会”，11月易名为“新界原居民妇女委员会”（下称“委员会”）。丽嫦形容，当时王秀容给她很大的支持，像在背后撑着自己，感到那份力量。

至于一直很少对外透露自己身世的阿金亦称原居民妇女之间的认同感是在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那时大家都好痛苦，因为街外人没有人明白你。是这几个（原居民妇女）个案走在一起，感同身受，才明白你。”即使阿金与相熟的教友谈起，亦难有亲切之感。“他们不是当事人，都不会明白，明白不了，只会听罢水过鸭背，知道是这种情况，但都感受不到你的凄酸。”



经过媒体报道原居民妇女受到的不合理待遇后，新界男原居民士绅所组成的乡议局矢口否认围村内的妇女受到不公平待遇，

更力言她们都是自愿把父亲的遗产送赠兄弟或男丁亲属。“委员会”的成员为了打破乡议局的谎话，在10月23日亲自申请法律援助，以个人的遭遇为例，期望在法庭上告知大众原居民妇女所受的迫害与惨况。

“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丰富的组织行动经验，但在妇女中心提供的支持下，发起一连串抗争行动。她们在40条围村发起“支持原居民妇女有土地承继权”的签名行动，包括走访自己所属的围村，并取得124名原居民妇女的支持，这表示“委员会”得到默默受到压迫的原居民妇女的认同。不过，并非所有原居民妇女都有勇气签名支持，亦有人不相信签名就可以废掉百多年的传统。丽嫦的堂妹是一名护士，也算是知识分子，偏偏她不愿意签名，任丽嫦费尽唇舌也不管用。

为了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她们游行去港督府请愿，在门外做话剧；知道当时的港督彭定康到新界屏山文物径参与开幕仪式，亦赶往彭定康途经之地，拦路递交请愿信。她们又去立法会申诉部、召开记者会、出席城市论坛、讲座、电台、电视节目等。这班住在新界甚少踏出围村的原居民妇女不论是各间大学、中心区域如尖沙咀或维多利亚公园，她们都一一前往。丽嫦形容她们所说的没有理论，只有为正义，讲真心话。她们穿起传统服饰，朴实的蓝色斜襟衣，头顶草笠，与其他妇女团体合作，发起街头签名运动，演街头剧，唱山歌，自编自唱一段段凄酸故事：

“嗨！女原居民真系惨呢！哎哟哎哟/呢个世界不公平呢！哎哟哎哟/叔伯弟兄霸晒屋地，叔伯弟兄霸晒屋地/累地妇女无地位咯……”

“嗨！香港个法治社会呢！哎哟哎哟/男男女女都有权呢！哎哟哎哟/为我姊妹申诉公义/男女均一享有机会/万众一心欢乐唱咯……”（山歌）

“说新界 道新界 新界本是个好地方/自从有了新界条例 妇女从此没有地位/新界条例没有道理/得……令冬飘一飘 得……令冬飘一飘/得飘 得飘 得飘/得飘飘意得飘飘 飘一飘”“说新界 道新界 新界本是个好地方/如果修订了新界条例 妇女将会有地位/新界条例改得有理/得……令

冬飘一飘得……今冬飘一飘/得飘得飘得飘得飘飘意得
飘飘飘一飘”（寄调《凤阳花鼓》）

事实上，亦并非每个原居民妇女都愿意道出自己的身世，毕竟所承受的压力十分之大。即使“委员会”内的核心成员——阿金亦因为家庭的压力，没有将自己的故事向外公开。阿金虽然经常出席委员会的行动，但总会戴着黑眼镜，用草帽、手巾等遮着自己，亦要经常留意摄影机和摄录机的所在，怕被拍到给人认出。无可否认阿金紧张兮兮，但生于一个整天打打闹闹的家庭，而明知自己没法逃离这个家，做每项事情总会提心吊胆。有一次她被一个电视节目《星期二档案》拍到了，虽然面容被遮着，但她还是怕母亲看到会斩死她，她经常说：“总之无亲情，在暴力之下成长”“有个班人（争产的人）存在都无亲情”。

或者对社会制度的压迫，还有一大班姊妹一起面对和承受。回到家，处理最贴身的亲人间的关系，宁愿少说为妙。阿金如是，带头争取的丽嫦亦如是。丽嫦在家，尽量不和兄弟作任何争论，怕被冠上争家产的罪名。面对同住一条村的叔怕兄弟，丽嫦认为不能面对面与之冲突，叔怕走在前，自己就走在后。走过的叔伯聚脚的地方被他们出言侮辱，亦一声不吭避开。丽嫦称：“因为我知道忍一时之气，就天下和平。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修订《新界条例》，而不是要和他们对抗，女原居民拥有继承权，就代表我们成功了。”

“委员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她们最初只为争取个人的权益以及引起大众的关注，后四处奔走，游说各党派议员的支持，终于得到立法会议员陆恭蕙的支持，向立法局提出修订《新界条例》草案：除了新界的“祖”和“堂”外，女原居民亦应有继承权，而草案内容亦包括农村地。这项修订一方面回避了围村内最为敏感的家公地方，即“祖”和“堂”，亦同时保障私人产业的继承权不会受到传男不传女的习俗所害，令女子同样可根据先人的意愿获得遗产分配。港府最后接纳陆恭蕙的修订动议。

不过，此举惹来乡议局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在传统习俗的既得利益将会受影响。他们不仅认为修例后，外姓人将可夺取祖辈遗下的土地，还视此为港英政府借此打击新界原居民地位之举。

当事件被政治化为城乡以及殖民者与被殖民之间的矛盾时，新界男性原居民个个义愤填膺，要发起所谓“保家卫族”的非理性行动。

在1994年3月22日，立法局门外的暴力事件成为争取过程的一大转折点。各界都无法接受在香港这个法治之区，竟有人如此野蛮无理，赤裸裸地彰显暴力。多个妇女团体在事后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传媒亦在翌日大力谴责暴力事件，市民亦自发致电电台、在报章撰文和刊登谴责声明，一所中学的师生亦自发举行签名运动，谴责暴力事件。

另一边厢，临近九七回归，乡议局认为可借助中央政府的力量，迫令港英政府就修例让步。乡议局成立的“保乡卫族抗争总部”，更一度计划上京请求中方出面解决事件。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亦在数日后发表声明，指新界原居民权益受到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保障，有关修订案取消“原居民”的概念，因此不能与男女平等混为一谈。港督彭定康随即公开澄清，指出陆恭惠并无任何阴谋，政府亦无意打击原居民权益。

“委员会”最初只有不足10名成员，但在一连串的行动过后，特别在3月22日暴力事件发生后，接连不少社会团体，声势一时无两。妇女团体亦在4月11日宣布每周三均到立法局门外集会，直到条例通过。这是一个漫长的行动，但妇女团体没有轻言放弃，每次集会都会高叫口号，唱着原居民妇女所编写的歌曲，或一首又一首妇运的歌，有时亦会表演话剧，气氛积极和欢乐。反观，以乡议局为首的新界男性原居民，虽然自3月22日暴力事件后，已被警方以铁马与妇女团体分隔开，他们亦轮流派出27个乡事会委员会示威请愿，在与支持者隔岸对垒时，仍会不断叫嚣和口出脏言。4月24日，新界南约区居民在西贡举行村民大会。会后百多名村民到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拜祭，并“处死”代表彭定康、陆恭惠、李柱铭、冯智活、李永达及司徒华的纸人。乡议局在5月8日亦发起7,000多人的大游行，支持保家卫族行动。

《新界条例》被修订，妇女权益可争取

最后，政府向立法局审议新界土地（豁免）草案小组提交一份综合修订，令农村土地继承符合男女平等原则，而新界原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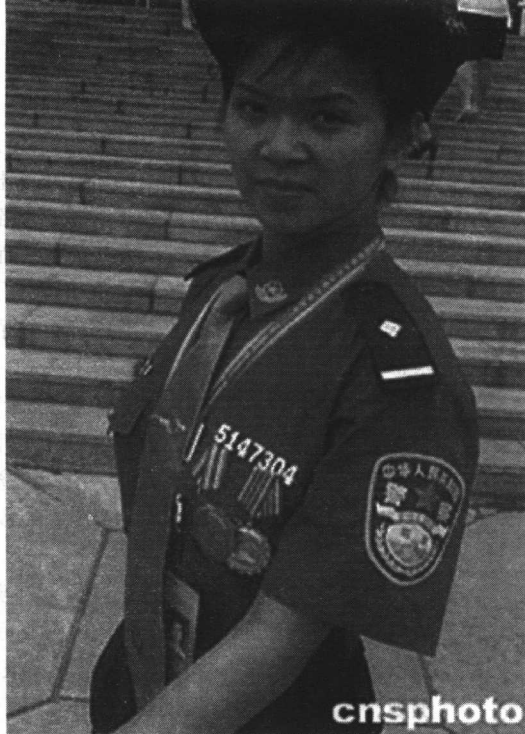
的其他传统权益将不会受到影响。在6月22日，立法会恢复二、三读草案，经过6小时争辩，修订草案最后以36票支持，2票反对，3票弃权而获得通过。

《新界条例》被修订后，曾有原居民妇女从荷兰回港，成功取回土地继承权。不过，并非每一个女原居民都如此幸运，不少女原居民因为不识字，以及政府在修订条例后没有作好宣传，令不少女原居民都不清楚她们的权益，白白丧失应有的继承权。即使“委员会”的成员邓妹，在法例通过后，取回土地，但因为法例没有赋予建屋权，令她所受到的滋扰不断。围村内的恶霸经常迫她、问她、求她、抢她，要她把土地给他，因他是男人。其实斗争还在继续，并没停止。

虽然《新界条例》已被修订逾10年，但事件仍未完全结束。新界原居民妇女委员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作出努力，个别成员仍在打官司，争取自己的合理承继权。“委员会”的成立，亦集结了这班原居民的力量，在生活上遇到问题时，仍会互相倾诉和扶持。丽嫦亦在争取的过程中，更深深明白到围村教育的重要，于是在近年发起围福音团契，希望通过宗教让围村带来和平。

协助成立“委员会”的王秀容形容，这个组织继续存在是要让别人知道，原居民妇女亦是土地拥有者，她们虽然是妇女，但不代表她们没有继承权，可以任人抢夺她们的土地。这个组织的存在其实是一个象征，告诉大家女人仍然有需要继续争取，不能停；而实际所谓的传统现在是行不通的，女性是会站出来去争取的。

陈月
『英雄』
过后



cnsphoto

文:吴振兴

从见死不救看客的冷漠，到上至高官下至平民百姓的热情相待，陈月戏剧性地体验到了骤冷骤热的人间情感。同时，她又面临着另一种考验和磨炼，这回考验她的不是胆量和勇气，而是一种反思与平常心。

真正的英雄其实并不存在，他们其实就是真正的人而已，因为真实而活着，因为真实所以成为英雄。

115

叫人心寒的社会

“见义勇为被人杀了是狗熊，命大能活下来的是英雄。”

在四川省养马镇女子监狱附近的一个妇女和我们谈起陈月见义勇为这个事情的时候，谈到了这样一句话。她继续说道：“在养马镇这个地方这些年死了十几条人命，抓到这么多人没有一个被枪毙的，钱在这个社会了不得啊……养马镇这个地方公安局的招牌就只是一个招牌而已。”她谈到邻居家的一个小儿子在2004年

的时候，年纪不到30岁，开一个小茶馆，就因为朋友惹上了小流氓，他去帮忙，帮忙的时候接了一下手机。那些黑社会以为他要找人过来，于是就把他砍死了。最后抓到8个人，这8个人里面有一个未满18岁的承担了所有责任，而其他人都用钱买通了关系，最后又赔了4万块钱。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他被杀的这一年正准备结婚，连新被子，新床都买好了。”旁边的几位妇女都表示赞同，另一位妇女补充说：前不久有一个刚考上大学的高中生，在这个地方，学校回来的路上，看到几个二流子缠着他们班的一个女同学要钱花，女生说没有，他上去和他们说道理什么的，就被刺了几刀，躺在路上没人救，女生也被吓跑了。很久才被送到了医院，结果医院不知道他的身份，以没钱为理由也没有救。“这个社会就是让人心寒哦。”

对社会的心寒，不仅是这些生活在养马镇大半辈子的妇女有的感觉，当我和四川女子监狱的陈月聊起她见义勇为行为的时候，她也感觉到一些失望与无奈。“当时你被人砍伤之后，这么多路人围观，却没有一个人帮助你一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问道。“说不清楚，但是心中感觉心里挺凉的，我不说让他们一起抓小偷什么的，就是让他们帮忙拦辆车送我和弟弟到医院也没有人愿意，最后是我自己慢慢挪到马路上，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力量支持，就是一步步走去，拦了辆三轮车才去到了医院。现在想起来，挺失望的吧。”我继续问道：“这种失望，嗯，那么从这点看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不会去抓这个小偷呢？”陈月沉默了几秒，“我想我会很慎重地去考虑当时的情况吧。”

肇事意外的其后

陈月是这次我要访谈的对象，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和她刚刚结婚两年的丈夫，他也是在女子监狱工作，最近他们刚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单名一个谦字，寓意做人要谦虚，谦谦君子。我手上一份曾经报道过陈月当时抓小偷的事迹的报纸读给陈月听，一边读一边希望能够对其中一些细节加以回忆。

在2001年12月6日的中午，四川省女子监狱的狱警陈月当时正脱产一年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读书。她领着17岁的弟弟陈亮，在成都五块石车站下车，向立交桥方向走去。路过一超市门

口时，姐弟俩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有人抢钱包了，快抓歹徒呀！”陈月姐弟俩回头一看，只见一个40岁左右、身穿黄色大衣的中年妇女在大声呼救，她的同伴被人打倒在地。两个歹徒拿着钱包骑着自行车夺路而逃。突然路遇歹徒抢劫，姐弟俩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为什么当时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呢？”我问。“其实可能也没想到这么复杂，那天我们两个都穿了警服，可能穿了这件衣服就是代表警察，不冲上去被人看到了不好意思吧。”陈月想了想回答道。这时歹徒发觉身后有人追赶，惊慌失措，车把一歪，身体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慌乱中，歹徒丢下钱包继续逃窜。陈亮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与其中一个歹徒扭打起来，陈月则死死抓住另一个歹徒，并大声呼喊：“抓歹徒啊！”两个歹徒见只是两个年轻人，气焰立刻嚣张起来，对姐弟俩大打出手。搏斗中，陈月被多次摔翻在地，但她仍然扭住歹徒不放；陈亮用尽力气将歹徒抵在墙角……但瘦弱的姐弟哪是歹徒的对手。他们的体力渐渐不支，陈亮大声向围观群众呼喊求助，现场二三十人，包括捡回自己钱包的中年妇女却在围观，没人报警，更没一人上前相助。气急败坏的歹徒抽出一把匕首，凶狠地向陈亮连刺两刀。陈亮倒在了血泊中！凶残的歹徒又扑向身单力薄的陈月，匕首刺进了她的胸腹部！姐弟俩在无助中倒下了！围观的路人仍在观望，歹徒骑上自行车逃离了现场。



陈月受伤后，血透过薄袄渗出来。她先走到路边杂货铺，打电话给110，占线。“姐姐，我好痛呵！”弟弟叫道，陈月这才发现弟弟也被刺了两刀，也在右胸下。两人互相搀扶着，坐上一辆

三轮车。伤口痛得厉害，不敢大喘气。三轮车颠簸着，震得伤口更痛。陈月抱着痛得直叫的弟弟说：不要叫，不要叫，越叫血流得越多。陈月自己也很难受，不仅仅是伤口痛。从事发到歹徒扬长而去的近半小时内，几十号围观者竟无一人上前帮忙或打电话报警。假如当时有一个人站出来，他俩也不会负伤。她觉得当时不仅仅是伤口在流血，心里也在流血，甚至觉得自己的心比伤口更痛。几经周折，姐弟俩才到了成都铁路中心医院。

到了医院后，因为陈月身上只带了200元钱，是给朋友结婚的份子钱。因为两人的手术治疗费这些钱不够。医院一开始拒绝为陈月姐弟治疗。当我问起对这个事情看法的时候，陈月觉得这件事情（医院不救没钱的人）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当时的确造成很大的痛苦，自己感觉也很可怜。后来陈月忍着身体的巨大痛苦，断断续续艰难地跟医生说了事情经过，医院医生将信将疑地给陈月单位打了电话，证实他们身份后，才让他们上了手术台。

陈亮右胸下被刺两刀，造成了“气血胸”，陈月先让弟弟躺到手术台上做手术，自己又等了一阵才躺到手术台上，准备缝针时，医生将手探进伤口，看有多深，这一探，触到了肝部，痛得陈月大叫，医生立刻抽出手，说：不行不行，她的膈肌破了。什么是膈肌？当时她还想问医生，这时，护士马上拿来面罩扣到她的脸上说：深呼吸！很快，陈月失去了知觉。

姐弟俩都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陈亮当天脱离危险，他流了1,000毫升的血，但伤口比姐姐稍浅。陈月则是胸腹贯通伤，肝脏被刺穿，多处组织受伤，失血700毫升，直到第二天才脱离生命危险。“你会不会觉得让你的伤势严重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受伤之后治疗的一直耽误呢？”我问了这个问题。“可能吧。其实有很多人都说我们如果能早点进行手术，其实就不用导致一些后遗症了。”“现在你有后遗症吗？”“其实常常站的时间比较长，腹中间还是会隐隐疼吧。”“或许如果当时你们在大街上不省人事了，你觉得会有人送你们到医院吗？”“应该有吧。呵呵，总不能不管吧。但是可能要晚一点到了……”陈月乐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出事的第二天，成都的新闻媒体就报道陈月姐弟俩的事。报社、电视台的记者都来了，《成都晚报》、《四川商报》等都做了报道。舆论在宣传陈月姐弟见义勇为的同时，也强烈谴责了那

些看客的麻木及冷漠，呼唤社会的良知。远在京城《北京晚报》，也于7日报道了陈月姐弟俩的事，这篇报道，被司法部有关领导看到并引起高度重视。很快，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委托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梁刚，专程赶到成都看望陈月姐弟。晚上9时15分，刚下飞机的梁刚一行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就直接到了医院。一进病房，梁刚便拉着陈月的手说：“你为我们28万狱警争了光！”陈月的事在司法部监狱系统被大力宣传。四川省委书记也作出批示，指出陈月姐弟不顾个人安危勇斗歹徒，精神可嘉，事迹感人，应加大宣传力度，以弘扬见义勇为的社会风气。经过陈月姐弟俩的事，全省的“见义勇为基金”也由原来的8万元，涨到了100万元。陈月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的第二天，省司法厅为她记个人一等功的证书就送到了她的床前。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优秀共青团员，省三八红旗手，全国严打先进个人……21岁的陈月，可以说是一夜成名。但是对于陈月来说，成名最大的好处其实很简单，就是单位终于把她从监狱一线工作转到了做团支部书记的办公室工作。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件相当满意的事情。当然，比起这些，在病床上的日子，许多熟悉与不熟悉人的探望都是让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当时有很多人来医院探望，姐弟俩住的病房摆满了姹紫嫣红的鲜花，连外边的走廊也摆满了花篮，七八十篮。整整10天，病房里人流不断，水泄不通，除了老师同学，亲友同事外，许多素不相识的成都市民也到医院慰问，来的人里，有被父母抱在怀里的孩子，也有拄着拐棍的老人。最让陈月感动的是回监狱上班时，在监狱的大操场上，上百个犯人把她围在中间，她们哭着，还不断地叮嘱她：你这样瘦，要休息好，要好好补养一下身体……在陈月住院时，一个服刑人员代表全监区399名服刑人员给她写来慰问信，信上说：是陈干事用鲜血再次洗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绝不辜负你的期望，努力改造，做一个具有正义感并对社会有用的人。

还有一位远在新疆监狱的重刑犯也给陈月写信，他说：我犯的就是抢劫罪，被判死缓。像你这么瘦小的人，又是女的，还能做出这样的事，而我是个男人，不但没有为社会做什么好事，还危害社会，我要深深地忏悔，我要好好改造……从见死不救看客的冷漠，到上至高官下至平民百姓的热情相待，在这个冬天，陈

月戏剧性地体验到了骤冷骤热的人间情感。同时，她又面临着另一种考验和磨炼，这回考验她的不是胆量和勇气，而是一种反思与平常心。报纸读完了，我问陈月，你觉得你现在过了五六年再听这一段报道，给你什么感觉呢？“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挺幸运的，最后大家给了我这么多东西，我也感觉挺意外的。”

监狱工作的矛盾

陈月说，其实她小时候并不想这么快出来工作的，她读小学初中的时候，成绩就一直特别好，初中还是班里的团支书。但是后来因为家里重男轻女，觉得女娃娃读书读太多没什么用，便让她读了一个水电技校，1999年7月，陈月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女子监狱工作，当时她还未满18岁。“我学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与‘监狱’这个地方毫不相干，那天我很别扭地与两个同龄的同学走进了这里。监狱的领导和同事还管我们几个叫‘崽崽’呢。”

陈月回忆说，第一天来到女子监狱时，刚走进女犯劳动改造的车间，迎面就碰到一名满脸长麻子的女犯。她和两个同学吓得不敢说话，更不敢多看一眼，匆匆“躲”了过去。“我想那个人肯定犯了罪大恶极的事，再想想自己今后就要面对这么多这样的罪犯，我害怕极了。原本想象着生活多美好，如今却不得不面对着社会最阴暗的一面，当天我们几个吓得饭都不敢吃，抱头痛哭了一场。后来，领导把我们几个‘崽崽’叫去谈话，当时一名同学就说要去读书，不在这里干了。但现在她回来了，我们几个‘崽崽’一个都没有离开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不会离开。”这样的工作是很辛苦的，而且监狱工作的要求又是非常严格的，女狱警一律不得化妆、染发、烫发；不准戴首饰、染指甲。而这一切对22岁的陈月来说，都是很向往的。虽然陈月不能违反工作纪律，但一些有美容经验的女犯常常会教她几招，比如用鸡蛋泡醋擦脸能使皮肤娇嫩的方法就是女犯教给她的，陈月觉得这招还很管用。在工作中曾经有这样一位女犯，很顽固，不服管教，抗拒改造。有一天，这个女犯口腔里长满了溃疡，不能进食，而且还对华素片过敏。陈月知道后，马上到医院买来双氧水和一些药品，并亲自用棉签对她口腔进行消毒。就这样一个举动从此改

变了这个抗改女犯。她痊愈后碰到陈月，竟一改以往桀骜不驯的态度，叫了声“陈警官”，并从此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还得了行政奖励。这是在2000年《成都晚报》曾经对陈月的一个追踪报道，在这次采访我把这个报道跟她说的时侯，她觉得现在的看法可能比以前更现实了。以前觉得不会离开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在30岁的愿望就是能换一份工作。

为什么想离开呢？我问。陈月说：这里的工作实在太累了，不是体力上的，是精神上的。日常每天工作大概8个小时，每个月的收入以前不足1,000，现在也只是1,000多。陈月说。一开始特别难适应的是这里监狱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女犯人又特别不好管，小事情特别多，一点点牙膏的问题，一点点咸菜问题都可能引发监狱工作的困难。监狱工作对于狱警的要求就是思想改造，日常管理，文化教育。其中思想改造最为困难，必须要求你像父母一样。而当你身处父母角色的时候，就常常会 and 犯人互相感染，互相同化，很容易受到犯人对社会负面情绪的影响。例如罪犯会跟你说很多社会不好的东西，说得让你想想觉得挺心寒的。“跟自己的经历常常会联系一起吗？例如你被砍伤后，没有人来帮助你？”我问道，“嗯，会有一点这样的想法吧。可能再加上一些人情冷暖什么的，例如：自己常常听到一些人在背后，或当着你的面说你被砍了几刀，名利双收，现在没什么感觉了。但是当时听起来挺让人伤心的。犯人们一说这个社会怎么怎么不好，自己一下子也陷进去了。”这也造成了陈月在监狱第一线工作的精神累。“很多时候，我都想换一份工作，这里工作精神太辛苦了，而且视野也太狭小了。”因此陈月也常常看《青年文摘》等这些书籍，“我觉得通过读这些，可以感受到别人的生活，这里的生活太单调了。”其实除了这些因素外，在办公室工作的陈月越来越感觉到监狱警察这个工作经费少，社会地位不高，比公安系统差，例如国家每年春节都会向武警、公安问好，从来不关注监狱系统的警察、司法系统的警察。还有就是整个监狱系统的宣传都不够，每年公安系统都会有一个电视剧的宣传，而有关监狱警察的故事却很少提及，社会对监狱警察的认知程度还不高。这也互相影响了陈月担任监狱工作的状态。

根据资料显示，警察最大的职业烦恼并不是较低的收入，而

是缺乏成就感，没有外出考察学习的机会。警察与罪犯之间的“资源”交流并不平等：警察的单向付出太多。罪犯的改造成为新人是如此明显可见，多少批罪犯流水般刑满了，而警察还是在围着“三大现场”转圈，真是“警察无期徒刑有期”。有多少警察，除了继续教育，数年来从没有机会走出“大墙”，与同行进行交流，呼吸一下监狱以外的空气，享受一下外面的资源。警察是面对“人”的职业，是再塑教育的职业，应该是最具成长性的。尤其青年警察，对这一点的渴求尤其强烈、迫切，这也是为什么调查中显示的青年警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如中老年警察的重要原因。^①

陈月在这个监狱工作中所感受到也是这样一种职业的疲惫与不堪。

后记

陈月说她近来正在看王小波的《青铜时代》，觉得这本书写得很精彩，让她感觉到生活还是可以很有希望的。她也在烦着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好的幼儿园，养马镇这个地方实在太不安全了。社会治安不好，教育不好。这里的幼儿园每天让孩子自己拿着碟子回幼儿园看，没有一个老师教教他们什么东西。小学也是很差，在这里上小学的孩子基本上都考不上好的初中。当我问起她如果遇到小偷怎么办的时候，陈月笑笑说：现在当然要看情况了，如果碰到的小偷是未成年人，那就不上，因为被砍死了还没有赔偿，如果是成年人那就上，如果自己穿的是警察服装那要上，如果自己穿的是便服那就不上。她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有点累，但是还是很平淡。每天下班回家就是和孩子玩玩，然后洗澡，然后睡觉。曾经报道的一切名誉对她来说，只是一种经历而已。陈月说自己现在看到孩子，真的感觉很幸福与高兴。

我对陈月的印象从一开始的媒体报道，到面对面的聊天，陈月真诚、坦白的个性让我们刚刚相见但却似乎相识多年。通过这次采访让我相信真正的英雄其实并不存在，他们其实就是真正的人而已，因为真实而活着，因为真实所以成为英雄。

^① 《探析监狱警察的心理问题》，<http://www.xingsi.com>。

顾玉珍
人权——对生命慎重



文：陈惠芳

大众传媒深入生活每一个环节，主导着个人与社会的价值观念，传媒中散播的错误信息，只会形成并强化偏颇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造成人与人、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分隔、排斥、敌对、仇恨和歧视……以至出现剥削、不公正和不平等的行为态度。

人权，就是对生命的诚恳，就是对生命慎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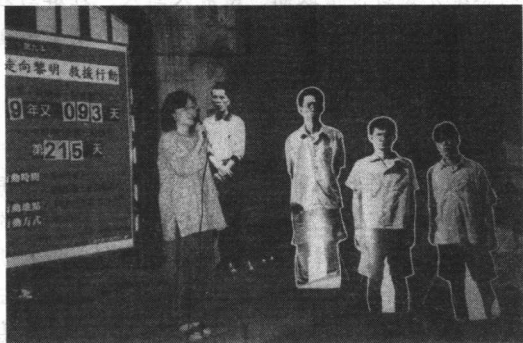
“能够选择人权工作是一种幸运与福气，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如愿选择想要的人生方式，或做与自己脑袋一致的事。我珍惜这福分，在纷乱不仁的社会里，得以与有志一同的朋友，共同前进。”1965年在台湾出生的顾玉珍这样形容自己过去十多年来走着的人生路。确实，能够把工作与理想结合，活着随心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是人生的天大幸运与福气。而幸运的顾玉珍，这些年来就义无反顾地一步一步去丰富去成就她不一般的选择。

错误的信息比无知更可怕

传播科系出身的顾玉珍最先选择的是媒体，她深信“错误的信息，比无知更可怕”。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大众传媒深入生活每一个环节，主导着个人与社会的价值观念，传媒中散播的错误信息，只会形成并强化偏颇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造成人与人、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分隔、排斥、敌对、仇恨和歧视……以至出现剥削、不公正和不平等的行为态度。

观察细敏、下笔明晰、论说情理兼备的顾玉珍，多年来一直坚持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台媒观基会）执行长这个岗位，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媒体工作，而对媒体手下留情：早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解读电视广告中的女性意涵》里，她就批判这种大众传媒中的商品，如何在其美轮美奂的包装下，塑造一个个被动的、次等的、性欲化的、物化的女性形象。她认为媒体应有社会责任，观众接受了错误的观念后，想再修正过来就很困难。

收在顾玉珍眼里、印刻在她心里、现身在她笔下的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偷渡者、精神病患者、原住民、被虐妇女等。她不只是一个记录者，还积极地针对社会的盲点，为改写社会加诸在这些群体身上的污名、偏见与不公，为他们的权利而奔走；冲着维权的政府机关、企业与不同的势力团体，她组织街头抗议活动、做公众宣传教育工作、建立支持网络……



在实现理想中的传媒责任的同时，顾玉珍一笔一画用心书写她的人权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顾玉珍是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编辑，并同时出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以下简称台权会）新闻联络

人。当时她参与的一项维权行动，救援被判死刑的苏建和^①等3人。对于这个疑点重重的案件，台湾人权促进会、人本教育基金会和民间司法改革会一直为他们的平反出狱请命。顾玉珍当时因工作之便，与一些出名的作家有较密切的接触，她将有关苏建和案件的资料寄给多位作家，得到相当积极的回响，有些作家亲自到监狱探望苏建和等人。案件拖延十多年，磨蚀人的身体与意志，对在社会上奔走的支持者如是，对狱中的当事人更甚。2004年，顾玉珍当上了台权会的秘书长，她并没有搁下苏建和一案，在苏案第5次调查庭上，她是法庭观察团成员，写下一篇发人深省、尖刻猛锐的法庭笔记：《遗忘与记忆的角力》。

在被认为主持正义讲求实证的法庭上，控方证人与法医官都以“不记得”回应反复的询问。“在缺乏证据的情形下，法庭成为遗忘与记忆进行角力的空间，语言论述的纠缠仿佛一场超现实的荒谬剧。10年的时间，证人的记忆被冲淡，苏建和等3人的记忆却在一次次的回忆中强化，更清晰。在一个不重视科学办案以至缺乏证据、轻忽生命与人权以至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社会中，记忆成为冤案受害者唯一可以自救之途。”顾玉珍这样结束她的笔记。“苏建和三人给台湾司法审判一次反省的机会。”她在另一篇文章中说。

顾玉珍背上苏建和案，不但是因为个别案子出现缺失，说到底是对生命权利，对于国家是否可以操掌人民生死大权这个更大的议题，表示质疑。“国家杀人并不比自杀或人民相残更符合正义。”“‘治乱世，用重典’的说法根本是一种治安的迷失，它只是统治者声东击西的便宜法门，不仅无助于了解犯罪背后的社会成因及改善社会治安，更在一次次‘不教而杀’的枪声中使人民更漠视生命的价值。”顾玉珍在她那篇《一样生命两样情请停止国家杀人》中这样辩说。

生死，是生命的终极表述。在生死两极的光谱中，生命的价值和权利以不同的面相展示；因为对人权的关顾，于是也得要投入到不同的压力点上去抗争。顾玉珍站在传媒观察这个平台上，

^① 苏建和是在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三死囚案中，与刘秉郎及庄林勋先被以“结伙强盗、强奸、杀人”等罪名宣判死刑，后又被判无罪的人。

关心和争取不同弱势社群的权利：

台湾原住民——2004年台媒观基会对原住民电视节目进行评鉴，发现节目中的原住民普遍无法掌握主体的发言权、主持人不够尊重原住民文化、原住民形象负面刻板，而节目深度亦不够，呼吁将摄影机与麦克风交回原住民手中，还他们主体发言权。

精神病患者——顾玉珍在2003年参与推动一个叫“不要叫我疯子”，为精神病患者“去污名化”的运动，要还他们基本人权。她研究半年来报纸新闻报道，发现媒体经常将犯罪事件归咎于精神病，甚至“未医先判”……让病友背上污名。

偷渡者——两个从中国大陆偷渡到台湾的民运人士遭台湾当局无限期拘留，顾玉珍以“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形容他们的处境，认为政府不能以“偷渡”属非法行为为理由拘留他们。

家庭暴力的幸存者——顾玉珍应民间司改会的邀请，撰写了一本有关家庭暴力的书《伤害我的是最亲密的人——家庭暴力危机与因应》，书中主角包括外籍新娘、中国新娘、原住民妇女……“她们痛，但无声。”顾玉珍在后记“女人复语术”中这样写来。“外籍新娘有口难言，只好装聋作哑，中国新娘说得越多，越被猜疑的社会否定；菁英妇女碍于面子，强颜欢笑。暴力在歧视与沉默之中肆虐蔓延……透过说与写，家暴妇女重新面对过去所不敢吐露的恐惧，使他们长期被漠视的痛苦与经验得以被看见。看见与了解，是受苦者获得安慰。看见与了解，也是她们对其他同病者的相怜。”

通过她诚挚的笔触，那些无声的重新掌握述说的主动权，让看见，让听到，让知晓，从而产生力量……就如接受顾玉珍访问的中国新娘叶香说：“希望借由我的故事，能唤起社会大众到家庭暴力的重视，也鼓励其他受暴妇女勇敢走出来。”

一路走来，顾玉珍积极参与的两个非政府组织都是在人力财力资源困乏的情况下艰苦经营。台媒观基会在1999年成立，经费主要来自成立第1年募捐所得，往后就一直没有在募款。至于成立于1984年的台权会，为了坚持独立与政府，从未向政府申请过任何经费。早期主要是救援政治犯，近期是人权的倡导，并处理个案。增强台湾人的人权意识是台权会的一项主要工作。“我们往往在人权受侵犯时，才了解自己拥有什么权利，而原因就在于台湾缺乏完整且健全的人权教育。”顾玉珍认为人权工作是社会的集

体工程、人民要彼此承认和学习，人权教育尤其重要。

人权工程的串联

人权这个工程既是集体的，也并无疆界。2003年顾玉珍自费参加一个在日内瓦举办的国际人权法与相关机制培训班。“在经济、文化与人口的全球化趋势之下，人权问题涉及的范畴亦跨越国界，成为全球化的问题。许多人权侵犯的来源、受害者、保障机制都已经超越单一国界，例如移民劳工或婚姻。人权不只是普世性价值，更亟须国际社会合作打造一个跨国性的世界公民社会（World Civil Society），借此来保障与促进人权。联合国成立至今50余年，在强国环伺各怀鬼胎下，犹如它广场上的“跛脚椅”（Broken chair）一样，站不稳，但是至少是目前举世公认的国际人权中心。况且，还有许多NGO^①努力着让它在人权的脚跟站稳。我们如何能自外于此？”顾玉珍在培训班后写的《当远方的枪声在耳际响起》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反思。

她批评台湾政府以人权换取政治经济利益，而相对政府间“虚伪”的交往，以及“教条式国族主义者的排他性”，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串联、合作、相互的鼓励、信任与支持，彻底发挥人权工作那体现平等、自由、人性与道义的精粹，“人权工作，说到底，也就是‘做人的道理’。人权串联，其实就是真诚结交朋友，人溺己溺，如此才能论及‘道义上的支持’。”

顾玉珍长年浸染在前线运动的斗争中，练就一身强烈的人权意识以及坚实的草根组织能力，凭着这份扎实而诚挚的心怀，她把这份关怀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地平线去打造铸炼，看到听到更多对不公不义的控诉：“伊拉克妇女团体举出死伤亲人的数据控诉美英联军、西藏的老政治犯控诉中共、香港民主人士举办人权基本法23条的说明会、尼泊尔的朋友批判歧视性的种姓制度……”也更加加强她对争取人权的信念与力量。

“人权，就是对生命的诚恳，就是对生命慎重。”这是顾玉珍的选择，是她的福分。

^① 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



王清峰 青瞑不怕枪

文：钟秀梅

人权是要去实践的，不是只用嘴巴说的。

王清峰认为：“日本利用军队、政府、财团的力量，利用国家机器集体凌辱被占领区的妇女，这种暴行是史无前例的。”

这段历史应该揭发出来、记载下来。对于我们上一代所遭受的耻辱，日本人应该有一个交代，我们这一代人也应该对下一代人有一个交代。

青瞑不怕枪^①

1952年出生于台湾台南的王清峰，是人权律师。台湾大众对王清峰的认识始于她在1987年投入声援雏妓的行动。当时媒体报道来自穷苦农村或山区的少女被逼从娼，王清峰介入了雏妓救援

^① 闽南话，指瞎子不怕枪弹，很勇敢之意。

及法律协助工作，在当年8月成立“妇女救援基金会”。王清峰回忆道：“我们做雏妓的工作，其实就是跟你黑社会的挡人财路的工作。然后，就有人会说你不顾自己的安全，你总要顾家里的安全，对不对？我就说：青暝不怕枪。你知道吗？你听懂吗？就是，这件事情是该去做的，因为我们如果喊人权、人权，但是人权是要去实践的，不是只用嘴巴说的。一个文明的国家，没有理由去糟蹋年轻的女孩。就是说，纵使有这种市场需求也不是这种搞法，对不对？”

王清峰的父亲是肺结核医生，大半辈子在旗山、台南等地行医，为村子穷人治病。王清峰关心人的特质跟父亲的善良、助人、义愤的特质有关。在王清峰那个年代，女性就读高等学校的比率还是很少的，特别是女律师少之又少。

王清峰职业期间，不断接到有关家庭暴力、虐待、拐卖少女等案件，特别是家暴案件中那些女性被打得很严重。王清峰记得：“我礼拜天在办公室加班。然后呢，就有一个女的打电话说，王律师，你赶快救我姐姐啦！我姐姐快要被打死了！我说：发生什么事？那就是她姐夫把她姐姐从楼梯摔下去。然后她就是这样子滚啊滚下去，然后就是这样子头裂了，然后就是流产送到医院。”

王清峰脸上发出跟这些受苦的姐妹一样难过的表情。她继续回忆：“有一个礼拜六也是在加班，一个男的，很粗暴地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打我太太，干你什么事！我要强暴她，干你什么事！喽！后来才想起来，原来我接受媒体的访问啊！就是她先生把她绑在那个楼梯的那个，他把她绑起来，然后强暴她。那我就认定这个是强暴喽！一般人就是认为夫妻之间有行房的义务，但是这个先生的行为牵涉到妨害自由。你这种强制的手段来威迫，一样是构成强奸罪。”

有了实务的案例，王清峰协同妇权分子向政府施压。过去的家庭暴力最早是台北市交通大队配合做，后来台北市政府成立家暴防治中心，建立庇护所、律师团等，但是成效不彰，因为没有执行经费。当时王清峰等一群妇权分子跟政府交涉，要求政府编列预算，当时台北市政府愿意编列，但怕给议会删去。王清峰便发动在议会大厦前绑布条示威，公布不愿意支持的议员，终于一些议员怕没有选票，也不敢反对这项预算。王清峰觉得只要把制度面建立起来，救援和安置的工作也就建立起来，然后把政府的预算、人力建立起来，监督单位的实行。王清峰感叹地说：“在没

有这行动之前：我们这里的法律这一块，其实是停留在农业时代，比如家庭有什么侵权纠纷，竟由家族会议来讨论。”

雏妓救援

王清峰回忆，投入“妇女救援基金会”是因当年台湾的雏妓问题，就像是烂到深处的疮，数不清的小女孩被亲生父母卖到娼馆，她们先被施打荷尔蒙，再让嫖客花5,000块钱“开苞”，然后一天接客三四十次，每接一个客人，女孩们最多分到20元。就算让警察查获，女孩一出了警察局，便立刻被人口贩子带回继续接客。日复一日，她们的世界只是娼馆里一间间不见天日的营业房。尤其是在原住民的女孩子中，这种情况更严重。王清峰说：“其实我的心里很清楚，走在马路上，你看到小孩子，我就觉得每一个都是我的小孩子。那你说这些被糟蹋的小孩子，像说我们冲到妓女院里面去，你看到这些小孩子，人整个都走了样，整个都变调了喽！但是你还是会很心疼，那整个是一个身体被践踏、糟蹋，人格被扭曲，然后看不到未来那种景象，那绝对不是我们要的社会。”

为了救出这些孩子，妇援会先设立检举专线，当时有些嫖客会利用这些检举电话，或帮雏妓带信出来，妇援会根据这些线索联络警方扫荡。当时扫荡行动约在凌晨，正义的王清峰也跳上机车，在阴暗的性交易街——华西街，无惧私娼寮的保镖和人口贩子，勇敢地救出那些孩子。王清峰也跑遍全台各地救孩子，她记得有名15岁的女孩小玉，13岁被父亲卖到台南的旅馆卖淫，每天接客30次，小玉绝望地从旅馆三楼跳下，因为她染上梅毒，虽然摔断了腿，但是爸爸和人口贩子天天到医院监视，小玉偷偷塞了一张纸条给护士，纸条上写着：“救我！”

经过妇援会和检警单位几番折腾，小玉的爸爸被抓，正当担任小玉监护人的王清峰亲自南下到医院接小玉时，她看到担架上的小玉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抱着王清峰痛哭失声，直喊“妈妈，我好痛！”后来，王清峰有越来越多的女儿，她安排这些女儿读书、购物，倾听她们的声音。这些少女以雏妓、被强暴、乱伦等性侵害的居多。

王清峰在妇援会担任3届的董事长，募款、打杂、拜会等工作都要干。她说：“一个基金会，这么多的董事，要推动什么样的工作？大家已都有本分的一份工作，大家都是女性嘛，也都有一

个家庭，能够贡献一点心力，其实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董事长要沟通、协调啊什么，就要耗掉很多时间和精力了。”王清峰也曾对整个社会对雏妓救援的工作的冷漠，产生过无力感。“我们为雏妓的问题，希望这些小学刚要毕业，或是国中的女学生，要懂得保护自己。因为我们知道人口贩子在什么领域，在什么系统，希望她们能够保护自己。我们就希望到学校去做宣导的工作。可是在做宣导的工作时，你就会发现无力感。老师觉得这很好，可是他们又不能随便答应。要去问上级，要县政府同意，要省政府同意啊！这些工作就是我们在做。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就等着说，你要公文给我啊！然后才可以如何如何……其实做事并不难，可是做人很不容易。可是不把人搞定，事情又做不好。”

阿嬷的伤痕

王清峰觉得在雏妓救援的工作基础上，有必要为不幸受难的妇女有暂时避难的场所，在1990年，成立“百合中途之家”收容中心。第二年，受到韩国妇女团体向日本法院提出诉讼，控告日本政府在二次大战时期，威迫利诱亚洲妇女担任慰安妇的恶行，一些亚洲地区的妇权团体受到鼓舞，王清峰也是其中之一，1992年她主动联络日本众议院议员伊东秀子，获得珍贵的关于台湾慰安妇的资讯^①，王清峰主动接下了协助台籍慰安妇的法律诉讼的工作，成立了“慰安妇申诉专线”，开始展开受害人访查及协助工作。

十多年的辛苦工作，王清峰和妇援会的工作伙伴到全岛访查，终于调查出60多位慰安妇的心酸故事，王清峰有时带着敢出面的阿嬷远赴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等地，要求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②王清峰回忆起1992年12月9日，她带着一嬷到东京参加“日本战后赔偿国际公听会”，这是台籍慰安妇第一次站上国际讲台，对日本罪行做见证。王清峰同工作团队拍摄“阿嬷的秘密——台籍慰安妇的故事”纪录片，该片曾获1998年金马奖最佳

^① 根据《铁盒里的青春：台籍慰安妇的故事》一书，伊东秀子得到日本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的资料，确认台湾慰安妇的事实，174页。

^② 估计有1,200位以上的慰安妇送去海南岛、菲律宾、缅甸、新加坡、安达曼群岛、内地广东省。资料来源同上。

纪录片奖。1999年出版《台湾慰安妇报告》一书。^①



王清峰认为：“日本利用军队、政府、财团的力量，利用国家机器集体凌辱被占领区的妇女，这种暴行是史无前例的。这是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来赔偿，不能随意说声对不起就完了。我们要让他们了解，战争犯罪应该负法律责任而不仅仅是道义责任。”她继续提到：“战后日本极力掩盖事实，有的被害人不堪凌辱死去了，有的出于传统观念不敢说出来。目前全世界慰安妇幸存的还不到1,000人。这段历史应该揭发出来、记载下来。对于我们上一代所遭受的耻辱，日本人应该有一个交代，我们这一代人也应该对下一代人有一个交代。”^②

参政道路与9·21震灾

王清峰人生中意外参政，是受曾任台湾第一届省主席陈诚的公子陈履安之邀参选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她是副总统候选人。王清峰说：“其实我那时候投入政治也是非常意外。对我而

^① 王清峰参与1998年8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属下的“促进和保护人权委员会”的第50期会期获得日内瓦代表 Jonathan Sission 的支持，组织苏格兰画家 Andrew Ward 为台湾慰安妇作画，并在1999年5月荷兰海牙举行画展。资料来源同上。

^② 资料来源，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BIC5/14867/14914/859792.html>

言，很简单，就是像我们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我们就很希望社会也是比较简单、朴实，人与人之间不是那种尔虞我诈。就是说，如果我去竞选，然后选上，我其实不一定是说我去做什么大改革，或是什么。只要风行草偃，你能够改变社会的风向，重新进入一个比较简单、朴素的生活的社会面向，那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选举结果，王清峰这组候选人拿到近10%选票，俨然成为当时不可忽视的第三势力。

1999年9·21台湾大地震，当时死伤超过1,000人，王清峰担任震区受损家园重建服务团团长，她在灾区待了一年，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她回忆起：“我不是专家，我不敢，没有把握。所以大家宁可白天在里面住，晚上还跑到外头来。那时候有一些建筑师父，他们也想做一点事，可是没有人愿意带头，那我就说我来带头。我们就去帮人家鉴定房子，这些房子要怎么修？怎么盖？然后费用大概要多少？你也晓得很多人想要发这个灾难财的。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说很多独居老人……没办法！其实独居老人不见得没有子女，有啊！可是他们也是在那边等，等看有人拿钱来帮他们修房子，盖房子。……原住民、残障、低收入户、贫民户等，你说政府有给他10万、20万的补助款。天啊！那个环境能拿来吃饭啊！你怎么能奢望他那个10万、20万来修房子，根本就不可能！连吃饭都有困难！对不对？”

当时台湾政府做法，是通过撒钱的方法，但是底层民众无所适从。王清峰便主动帮社区修房子、盖房子。当时她们的团队有一个基本的模式，王清峰主动帮他们找资源。王清峰说：“一个报社的记者打电话来说：王清峰，那个埔里喔！有一个操场，一边是原住民、一边是平地人，就要打起来了。”当时王清峰急忙赶去了解，才知道原住民被迫分散，因为原住民家晚上要唱歌、跳舞、要喝酒，与汉人的生活习惯不同，是冲突的导火线，让原住民他们心有不满。王清峰一大早从台北出发，从埔里走21号公路，又经过灾情十分严重的东势，这两地生活功能大乱：没有水管可用，灌溉系统也失效。

因为山区居民为了生计在山坡地上种青椒、高丽菜、番茄等，政府以山坡地水土保持法为名，不愿把水利系统整顿好，要这些人种树，可是补偿给山民的费用又不能过活。王清峰无奈地说：“你说一定要种树！你种树给人家的补偿又不够！没有办法过日子

嘛！也就是说这个政策不合人性嘛！对不对？政府你每次在搞土石流，你再来补一些钱，你不能就一次给人家足够，让人家种树我也可以保障山民的生活。”

后来王清峰通过关系，要求生产塑胶管线的台塑便宜卖水管，帮他们把管线建设好。因为王清峰在区团队的工作效率佳，名声远播，王清峰高兴地回忆道：“有一个女的村长问我，你是不是王清峰？我说：是啊！干吗呀！女村长问你们有在帮人家修房子、盖房子，对不对？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她说：上帝带我来的。”原来，女村长的家是远在南投山区的信义乡，王清峰答应帮她们盖了19间房子，还修了几个下水道、蓄水池和净水池等。

当时梅雨季节就快到了，王清峰团队拼命赶工，因为去山上修房子、盖房子，工资和运费都要加三成，愿意上山的工人不多，所以盖得很辛苦。可是原住民的牧师竟然同王清峰要她们星期天暂时停工，因为原住民要做礼拜。理性的王清峰遇到这种情况，也会不厌其烦地说服牧师，暂时忘记上帝，目的是要趁雨季来临时，让原住民有个避风的窝。

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真的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

王清峰表示，她其实蛮幸运的，哪管什么统独意识？她认为她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她觉得这一二十年来，在妇女、儿童、原住民人权，有大幅度的进步，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她也常跑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发现到台湾社会的进步性。但是王清峰感叹地说：“有 power，比较有能力的人，他们对这一块不见得真的关心，不见得真的在乎。所以玩政治的人、要权力的人，跟我们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王清峰认为过去对民主运动有贡献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处处用一些事件像是美丽岛事件^①累积政治资本，但是这类政治人有

^① “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是1972年12月在台湾高雄发生而遭暴力镇压的民主运动。《美丽岛》由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是党外政论性刊物，言论激烈，遭国民党恨之入骨。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遭到拒绝。当日《美丽岛》杂志如期举行集会，与警方发生军事冲突。

了权力后，王清峰说：“玩过了头了，一个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原理都没有了。大家就是拼命地做事啊！不是作 show，变成表演，然后抢位子，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如果你不是跟他一国，就给你戴帽子。例如公投绑大选，那时候我在中选会，我就觉得按照法律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可是整个气氛，你根本没办法转动。那我就辞职，偏偏我又是唯一的女性，又是我牺牲。”^①

王清峰曾在1993年4月到1995年10月当过监察委员，王清峰办案非常认真，民间有冤案都会找她，她等于是客观公正、专业清廉的民间人士。如果，政治气氛违反这原则，王清峰一定会跳出来说话，就像是2004年，陈水扁靠两颗子弹当选，民间愤怒的声音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当时，王清峰受邀加入“319枪击案真相调查委员会”，王清峰希望不要让政治恶斗，使得台湾丧失理性。

和平的基础是要有民主

王清峰对于和平的看法是：和平的基础是要有民主的。她强调：“每一个人都要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每一个人都有投票的权利，每一个人生计和每个人都受到尊重。不管你是哪一个阶层，通通都一样喽！哪一个族群都一样。你会发现在台湾好像很民主。我常不客气跟男人说：你们讲的民主是，人家要对我们民主，那你有没有对人家民主？男人要求民主，他对女人民主不民主？资本家要民主，他对劳工民主不民主？我发现的台湾社会都是讲民主，人家要对你民主，不是我对人家要民主，要人家开明，你自己开不开明？你可以表达意见，可是别人跟你意见不一样就又是另外一个面孔出来。其实和平喽！还是要从我们心底出来，那个和平是真和平，不是假和平。那个和平是要说：我真的是尊重你、我真的是在乎你，我不仅是为自己、我更是为别人。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嘛，走这一遭嘛！”

王清峰的生活与政治哲学像是妈祖的慈悲所散发的光与热，回顾她过往的生命历程，经过无数的投入，为台湾立下一个重要的典范。

^① 民进党在2000年执政，这个时期民进党的表现让许多（王清峰）在内的党外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失望。

郭建梅 十年公益律师之路

文：李莹



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这正是她开始这项妇女人权事业的真实写照。

贫弱妇女是一个最易被忽视而又最易受伤害的群体，在中国现阶段，法制环境亟待改善、侵害妇女权益行为不容乐观的现状下，她们特别需要一种知识上、意识和法律上的专业性帮助。

作为女性，郭建梅理解她们的无奈，作为知识女性，她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的力量，作为一个一直关注中国女性命运的女性法律人，她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郭建梅，女，43岁，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女律师联谊会会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执行主任、专职律师。

1961年10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省滑县一个清贫的教师家

庭。母亲是地区级优秀教师，50多岁就因工作劳累过度而病逝。父母的正直、清廉、善良、坚韧对她人格的形成影响极大。直到18岁上大学前，她生活村庄的贫困、落后、愚昧及对女性权利的漠视和伤害，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大学毕业后，她先后供职于中国司法部、中华全国妇联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期间一直关注并致力于妇女人权保障工作。1989年至1992年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工作，在全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发表多篇倡导妇女人权的文章。1993年至1995年，主持实施了《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项目，撰写了近20万字的专题研究报告并提交有关立法和执法部门。

以上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使郭建梅最终选择了为保障中国妇女人权而奋斗的人生之路。1995年9月，她作为中国女律师代表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律师论坛，这次机遇使她彻底走上了这条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专职公益律师之路。她永远不能忘怀的是这次会议的情景：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万名女性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着妇女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激情的演讲、理性的研讨以及NGO人那种充满激情、活力和责任感的精神和理念，都深刻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十几天的NGO论坛，她从头待到结尾，每天忙碌地穿梭于各个论坛，感受和思考着会议内容和氛围带来的震撼和冲击。之后，她辞去公职，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并担任该中心执行主任和专职律师至今。

拉着一轮沉重的车——推动妇女人权

北大法律中心创立之时，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一些新的制度和体系正在探索建立，各种新的观念、思想在逐渐被社会和民众认识和接纳。在此期间，中国和国际发生了几个重要事件，一是《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于1992年3月颁行，确立了妇女权益在法律上的保障。二是1994年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体现了中国对贫弱群体法律权利的公平和保护。三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妇女权益保护和NGO的理念开始进入国人

的视野并被关注。有幸参与其中的郭建梅认识到，这是一个契机，必须及时把握。但是，开创这样一项前瞻的事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是可想而知的，资金和人力的缺乏，人们的误解，法律上缺乏支持，社会对人权问题的敏感等，这些因素的干扰使刚刚成立的机构几次濒临关闭。但是，郭建梅采取各种办法使机构起死回生。在这个过程中，她经历和感受了种种艰辛和磨炼，至今不堪回首。她曾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过程：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这正是她开始这项妇女人权事业的真实写照。

10 年前的中国，NGO、公益律师、法律援助等概念，对于大多数老百姓乃至法律专业人士来说，都还很陌生，从事这项事业所需要的人力、资金、公众认知以及政策法律的保障等都很缺乏。可想而知，这是件多么超前而艰难的事业。

北大妇女法律中心主要工作内容包括：（1）设立妇女法律服务咨询热线，为全国妇女无偿提供法律咨询服务；（2）承办重大、疑难及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妇女权益案件；为经济贫困的女性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3）研究现阶段妇女人权保护的基本状况以及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妇女权益案件，探索 21 世纪中国妇女人权保护和妇女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方向，并向社会进行研究成果的推介；（4）开展涉及妇女人权的公益诉讼，并谋求以此影响和推动中国有关妇女人权和公益法律援助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郭建梅及她所领导的机构通过以上工作领域，10 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中国妇女人权的保护，唤醒这部分弱势群体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帮助她们走上自尊、自立、自强之路，从立法和政策层面上推进妇女人权的保障，力求对促进中国的社会平等、公民社会的形成以及法治的建设倾尽心力。

在 10 年的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历程中，郭建梅始终在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维权之路，重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典型性与普遍性的结合、机构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结合，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

1. 工作方法上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内涵，把法律援助以诉讼为主要内容扩展到咨询、诉讼和研究三结合，提出了“大”法律援

助的理念。法律咨询面向全国妇女，为她们进行法律上的答疑解惑；代理诉讼主要是针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案件，由于需求人群众多而机构人力有限，选择性地代理案件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工作的有效度；研究方面主要是通过对现阶段妇女人权保护的基本状况以及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妇女权益案件的研究，总结中国妇女权益保护方面的成就、问题以及障碍，探索中国妇女权益保护和妇女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方向，并向立法、司法及相关部门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

2. 构建了立体化的团队，保障机构运行高效有序。郭建梅充分依托北京大学强大的人才和知识资源，并建立了一个多渠道、立体化的资源支持网络，这个网络由紧密到松散，包括：（1）专职成员，他们为中心的核心成员，热心公益、具有奉献精神和良好专业素养。（2）兼职成员，由资深律师、研究机构和高校副高职称以上的研究人员和教师组成，并通过中心倡导成立的全国性法律援助协作网络，整合了专业资源和地方资源，放大了机构的运作能力。（3）专家组成员，由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以及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知名学者组成，这个小组对机构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强大的知识支持。（4）志愿者，这部分人员主要由各高校法律系、社会工作系的大学生组成，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

3. 加强各方的合作与交流。郭建梅认识到，重视与国内外相关机构、组织的交流协作，是提升机构能力的重要途径。北大妇女法律中心与多个国家的民间组织和相关机构进行双边的学习和交流，并与国内的司法、执法和立法部门等相关机构以及其他 NGO 组织、媒体建立了广泛而良好的合作与协作关系。

现实性与创新性的结合

郭建梅工作最大的特色是现实性与创新性的结合。

现实性体现在：

1. 郭建梅把服务对象定位在中国最弱势群体——妇女。她认识到，贫弱妇女是一个最易被忽视而又最易受伤害的群体，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她们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非常薄弱。在中国现阶段，法制环境亟待改善、侵害妇女权益行为不容乐观的现状下，她们特别需要一种知识上、意识上和法

律上的专业性帮助。作为女性，郭建梅理解她们的无奈，作为知识女性，她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的力量，作为一个一直关注中国女性命运的女性法律人，她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因此，她和她的同仁把目光投向了这部分人群，在10年的艰难发展历程中，痴心不改。10年的工作实践证明了把贫弱妇女作为服务对象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2. 郭建梅一直致力于 NGO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良好衔接。NGO 的理念和运作模式在国外已有一定历史，但引进中国的时间并不长，在很多国人对 NGO 的认识还很陌生的时候，郭建梅和她的同伴们已经开始运用这种理念和模式，而且始终坚持了 NGO 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良好衔接。她吸收了国际 NGO 的先进理念，构建了以理事会为决策机构的组织体制，但又考虑了中国 NGO 组织机构力量较为薄弱，人员不足，工作繁重的现状，对机构的组织形式设置为直线形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下，隶属关系明确，信息传递迅速，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



3. 郭建梅一直在探索中国式的民间法律援助发展之路。1994年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主要通过政府进行。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政府建立的法律援助机构远远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郭建梅和她的机构以一种“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和豪气，开启了民间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先河。在法律援助范围上，她认识到，中国民间法律援助不应仅仅是对政府法律援助的复制，更应承担政

府应做但未能做到的事情、民众有需求但政府法律援助范围又未能涵盖的领域；在法律援助内容上，她以一个对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有着深刻理解 NGO 领导者的独特视角，把保护中国妇女的合法权益作为工作的主要内容，并将妇女权益的范围主要确定在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人身权利和劳动权益 3 个方面；在法律援助方式上，她认为，代理案件解决的只是妇女的个体权利，民间法律援助应开拓法律援助新的模式，因此她设计了 3 种工作方法，即法律咨询、代理案件以及研究，3 种方式相辅相成，构筑了为中国妇女提供一个多渠道和全方位的援助。

创新性体现在：

1. 以新的理念建立首创性的公益性组织。妇女权益、法律援助和 NGO 在 10 年前的中国几乎还是一个理念性和概念上的事物，当时中国人的人权意识刚被唤醒，NGO 的理念刚被引入，而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初建，郭建梅敏锐地认识到这 3 个领域的先进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并抓住了这 3 者的契合点，在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尚未形成规模的时候，就以民间组织的形式承担了理应政府承担的法律责任，并准确地确立了保护妇女权益的方向和目标，顺应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民众所需，为机构未来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开拓机构信息化的发展平台。随着社会信息化步伐的加快，郭建梅及时开拓妇女权益保护新的平台。在郭建梅及其机构的倡导及努力下，分别于 2000 年 12 月和 2002 年 7 月，率先成立了中国法律援助协作小组和中国法律援助协作网络，积极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法律援助协作，目前共有 28 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近百家律师事务所和民间公益机构加入其中，并于 2002 年 9 月建立了全国首家专门的妇女法律援助网站，通过互联网为全国妇女提供更为及时和便利的法律服务，将妇女法律援助扩展到了空间广阔的网络世界。

3. 整合多部门力量，创建新型的维权联合体。为了有效地整合妇女人权保护工作中的政府部门、司法部门、NGO 组织以及媒体等多部门的力量，郭建梅和她的机构于 2004 年 4 月发起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妇女权益保护专门工作组，其任务是研究妇女权益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保护妇女权益的手段和途径，制定相

应的行动计划，开展促进妇女权益保护的相关活动，最后谋求通过立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推动该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在北大妇女法律中心的协调和组织下，在妇女劳动权益保护、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以及妇女财产权益保护3个重点领域成立了专门工作组，有近60个相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NGO组织、高等院校以及新闻媒体加入其中。2005年年初将举办妇女权益保护论坛，并将在未来几年内开展持续的行动计划。这将是中国民间组织与政府相关机构合作的一种新的、有益的尝试。

4. 以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工作理念和方式开展中国的公益诉讼事业。在总结10年妇女法律援助经验的基础上，郭建梅把视野由微观的个案办理转移到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关注上。在中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尚未构建的现状下，从2004年起，北大妇女法律中心的工作重点由法律援助转向公益诉讼和个案法律援助并重，承担了中国的公益诉讼开拓者和先行者的重任，试图通过进行妇女权益的公益诉讼，从影响、推动立法和政策制定的层面上维护女性群体的各项合法权益，并推动中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5. 创办中国第一家有关妇女权益、法律援助以及民间组织的理论性刊物。郭建梅认识到，自己的机构走了10年，现在到了十字路口，而中国NGO发展和法律援助事业也经过了近10年的洗礼，到了审视、回顾和总结的时候，因此，她创办了《观察者》杂志，通过这本刊物，以NGO人和实践者的独特视角，观察、监测中国妇女人权保障、公益诉讼及NGO的发展状况，总结和批评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探索和展望这3个领域的未来发展之路。

6. 在管理模式以及工作方法上引进了国外较为先进的理念、方法和工具。郭建梅注意把性别意识的理念渗透到机构的工作目标、工作领域和具体的工作中，促进服务对象、相关管理人群社会性别意识的形成，提高全社会对妇女人权保护的关注度；在法律咨询、培训以及中心的决策过程中引进参与式发展的理念，运用参与式方法的相关工具，赋予受益人群、机构成员参与权、决策权，提高了工作的有效性和决策的科学性；此外，在她的主持

下，北大法律中心运用参与式、SWOT分析^①以及评估分析等一系列科学的方法和工具制定了2004年至2008年的战略规划，实现了机构战略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妇女维权成绩辉煌

郭建梅及其机构所做的工作，对中国妇女人权保护事业的影响和改善是多重性和立体化的。10年来，共为全国的贫困女性当事人免费代理案件550多件，保护了妇女个体权益的实现，进而影响其生存状况和价值观念；通过法律咨询、针对性培训以及媒体的宣传和推动，包括出版物的推出，提高了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性别意识，增强了社会对妇女权益维护的关注与支持，这种精神和理念的提升，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公民社会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专题性的研究、公益诉讼以及立法建议的提交，在推动立法和政策制定的层面上影响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制化进程，这种深层次和根本性的影响，使得郭建梅所从事的事业具有了远非一般性的意义和价值。

郭建梅及其机构以卓然的工作成绩赢得了社会、有关部门和领导经及国内外同行的赞赏，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并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10年来有关她和她的机构及所办理案件的国内外各类报道达2,000多篇。中国司法部、全国妇联的领导多次莅临北大妇女法律中心指导工作，对郭建梅及中心从事的事业予以充分肯定；1998年6月和12月，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及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夫人分别访问了北大法律中心；2001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夫人也访问了中心，对中心的工作表示赞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2005年7月欧盟主席夫人巴罗佐夫人到中心访问，高度赞扬了中心及郭建梅10年来为维护中国妇女权益而做的伟大工作；2002年，中心被中国《财经杂志》评选为中国十大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而郭建梅也被誉为贫弱妇女的保护女神；2005年，她与全球千名杰出妇女一起共获本

^① SWOT分析又称强弱机危综合分析法，是市场营销的分析方法之一，透过评价企业的优势、劣势、竞争市场的机会和威胁，为企业深入分析和定位。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被《南风窗》杂志评为“2005 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并被《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列入 2006 公益维权年度人物候选榜。

成立 10 年来，郭建梅及她领导的机构以极具创新性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惠泽了中国无数的贫弱女性，在中国妇女法律援助领域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在法律咨询上，共接待来电、来信、来访及电子邮件等各类法律咨询 5 万余件，内容涉及婚姻家庭、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劳动权益以及刑事和行政法等多个领域，范围涉及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案件办理上，共为全国的贫困女性当事人免费代理案件 550 多件，特别对贫弱妇女合法权益中的代表性、典型性领域如打工妹劳动权益、下岗女工劳动权益、家庭暴力、婚姻家庭中的妇女权益保护、性骚扰及性别歧视等方面的案件进行了系列性和专题性的办理和研究，共办理这类重大典型疑难的案件百余件；通过开展研究工作，从国家、社会及家庭的角度研究我国妇女权益的现实状况，妇女权益保障和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迫切性和突出存在的难点、重点问题，积极探索妇女权益保护和法律援助的法制化途径，并提出建设性意见，特别是 2001 年《婚姻法》的修改和 2003 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行，中心发挥了其应有的影响力；此外，还出版了 9 部书著，包括《当代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理论与实践》中英文版、《中国法律援助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妇女劳动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常用法律法规汇编》等理论性专著，并专门编著了《妇女法律援助案例·指南》、《生活中的法律》（三卷）等多部深入浅出、针对性强的普法读物。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的妇女权益保障和法律援助的理论，提供了较为务实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根据。

更为重要的是，郭建梅及她的同仁们所服务的这些大多生活在中下层、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通过援助而受惠，这些获得包括了实质性权益的实现和精神世界的提升，而作为受益者，她们又会将所得知识和意识向周围人群播撒，从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此外，通过媒体的宣传以及研究成果和出版物等各种

方式和渠道的推介，促进妇女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整体提高，受益者则不计其数，而在立法和政策制定层面上的影响和推动，受益者将辐射至全国。

中国面对的压力和挑战

走过 10 年的民间法律援助之路，郭建梅所经过的并非坦途，所面临的困难主要体现在观念、经费和人力上：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更为开放，但很多时候人们对 NGO 的了解流于肤浅，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一方面是对 NGO 本身的误解。无论是政府或是社会公众，对 NGO 的稳定性和公信力存在质疑，认为 NGO 不是一个正经的事业，不稳定，NGO 是一个民间机构，没有诚信度；另一方面是对 NGO 人的误解，很多人认为找不着工作、能力差的人才会去做 NGO。这种观念上的误区影响了政府和社会与 NGO 的对话、交流与协作，成为 NGO 发展无形的阻力和障碍。经费问题是 NGO 发展的瓶颈。由于观念上的差距，中国未能建立一个较为畅行和规范化的 NGO 筹资体系和制度，NGO 的筹资途径还处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混乱阶段，筹资渠道仍显狭窄，国内资本未能有效渗入，这种筹资渠道的滞后与 NGO 潜在的巨大活力相冲突，成为 NGO 可持续发展的羁绊。人的问题也是 NGO 的一大难题。由于 NGO 大都清贫，吸引人才的很大因素是机构所倡导的理念和精神，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精神的力量是一种极为短暂的激励性因素，人需要生存和价值的体现，钱也是价值外现一个标准，因此人才总是朝着发展空间大、稳定性好、收入高的职业和行业流动，这是一种自然法则。由于 NGO 自身特点和缺陷的限制，很难招揽优秀的人才，人员的流动性也较大。作为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 NGO 组织的领导人，郭建梅的体会更深，因为机构所需要的人才是律师，律师又是社会的高收入阶层，让这个阶层的人认同机构的价值又甘于较低的薪水，难度更大。此外还有工作的压力和挑战。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自身，一方面来自外部。郭建梅本人是律师，但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使得她没有精力去顾及自己的本行，而知识更新的逐步加快和 NGO 的不断出现和快速发展，更增加了其自身和机构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只有

不断进取的开拓，才能立足和发展。

中心在妇女人权、法律援助和 NGO 3 个领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她至少给人以这样的启示：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生存在中国不仅需要，而且大有可为；中国妇女人权在政策和法律上的保障固然重要，但消除现实和法律的差距更为紧迫；在现实的中国，要开创一项前瞻性的事业，需要一批为之奋斗和奉献的斗士，并给予认可和激励。越来越多的人对此达成共识。继北大妇女法律中心成立并产生影响之后，陕西省妇联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河北省迁西县妇联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云南省西双版纳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中心等十多家同类妇女法律援助机构相继成立。

下面的一段话是郭建梅对她 10 年公益律师之路的一些回顾，我们可能更能理解她在这项事业创业之初的艰辛和她所从事事业的伟大：

“凭着一股激情，我带领着 3 名也同样激情的女律师，开始了我们的创业之路。我把这 10 年奋斗的历程比喻成‘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此时，站在坡上，心里交织着酸甜苦辣的感受和感动。回首看看，10 年中，我们战胜了多少个艰难困苦的考验，帮助解救了多少个受害无助的贫弱妇女，流过多少因被误解或辱骂而委屈无奈的泪水，向有关部门提交过多少立法建议和意见，得到过多少当事人送来的锦旗和国际国内的赞扬……数也数不清了，留在心底的，唯有坚定和欣慰。也许，当初的抉择只是感性的，并没有理解它对我的人生甚至对社会有什么大的意义。10 年后的今天，我真正理性地认识到了这项事业在妇女人权、法律援助和 NGO 3 大领域对中国社会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至少给人以这样的启示和影响：其一，民间公益法律援助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国不仅必要而且大有可为，它同时对于探索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模式及社会参与法制改革的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二，中国妇女人权在政策和法律上的保障固然重要，但消除现实的和法律的差距更为迫切，需要开启更新的理念和思路，挖掘更多的资源优势，探索更多的救济渠道，来切实保障妇女权利的实现。其三，在现实的中国，要开创一项

前瞻的事业，需要一大批为之奋斗和奉献的有识之士，更需要法律和激励机制的保障。在此过程中，国家采取更积极的、鼓励的、支持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其四，越来越多的 NGO 和公益律师跟随我们踏步而来，长江后浪推前浪，这项事业后继有人！认识到这样的价值和意义，我知道我这 10 年的选择没有错，我是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所以我为我 10 年的奋斗自豪，为我的勇敢喝彩，为我的成绩欣慰，为实现我的理想和信念继续激情着、奋斗着！”



尚秀云

法官妈妈

文：王平

在一个个少年犯的背后，尚秀云看到的是一个家庭、学校和社会存在的问题的失误。……然而，这些失和、失教、失德、失才的家庭、社会发展失衡以及经济发展指标的受害者，直到现在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对于一个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官来说，工作的目标应该就是为了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而努力。

文明的言行，因为一切好的行为都是来自于好的情感。

1983年，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5年后，中国社会长期积压的各种矛盾开始暴露出来，抢劫、杀人、盗窃、流氓等犯罪行为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当年8月，中国中央政府正式作出“严打”的决定。于是对违法犯罪分子的刑事打击就如同暴风骤雨般地来临了。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在一些监狱里，有一半以上的犯人都是严打期间抓进去的。这次与19.7万个强

奸、盗窃、流氓等团伙一起落网的，还有无数花季少年。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开始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未成年人已占犯罪总数的20%。这群在“文革”中成长的孩子，和那个时代一起，混淆颠覆了许多是非观和价值观，他们却替这个时代接受了惩罚。因为当时的司法领域并没有意识到该怎样区别对待这些时代造成的问题少年们，对他们的定罪与成年刑事犯没有任何性质的区别，在量刑上和成人的区别仅是“大人吃一片，小孩吃半片”，甚至关押都没有与成年犯分开。

可是，几年以后，当年那些被武断而严厉地惩罚了的少年犯刑满释放后，开始显现出更为严重的后遗症：由于这些少年成长的环境极度恶劣，他们每天所接触的都是与社会为敌的犯人，感受的都是和社会对立的情绪，结果，从一些恶性刑事犯的档案追踪显示，很多被判处10年以上的重大刑事罪犯竟然是严打时落网的少年犯。

“没有不良的少年 只有不幸的少年”

这些情况让刚刚从事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尚秀云陷入了深思。她开始切实感觉到少年犯的审判与成人犯罪审判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也开始认真地践行当时彭真^①所提倡的：对待孩子犯罪要像妈妈、像医生、像老师，在审判的过程中去教育他们，感化他们，挽救他们。

尚秀云，一个北京市基层法院的女法官，自1987年至今，从事了18年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经她判处的少年犯有700多个，其中有187人她判了缓刑，后来这些缓刑少年中有16人考上了包括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2人考取了研究生，有20多人考上了各类专业学校，其他人也都自立自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重新犯罪率仅为0.8%。

尚秀云经手的案子让她思考更多的是这些失足少年背后的家

^① 彭真自1983年起至1997年去世为止，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无产阶级革命家。1981年8月，彭真视察秦皇岛市劳动教养所时提出“三像方针”，写下“我们对待失足青少年，要像父母对待染了坏习气的子女，像教师对待学生那样，像医生对待病人那样，耐心地帮助他们改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的指示。

庭、社会、教育和时代的问题。当初这些孩子为什么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呢？在审判中，通过对这些孩子内心世界的深入了解，她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不良的少年，只有不幸的少年。”在一个个少年犯的背后，尚秀云看到的是一个家庭、学校和社会存在的问题的失误。

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总人口的巨大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资源问题，于是中国不得不在“十亿人口大爆炸”之后，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列为基本国策。如脱缰野马般的人口增势才得以逐渐减速。

然而，与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相应措施却没有随之产生，于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开始在中国泛滥。首先是对孩子的溺爱。由于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亲，有时甚至是两代人的焦点只有这一个孩子，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正确的传统和道德被批判，许多正确的思想被颠覆，所以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一代人的道德观念已经淡化，他们给下一代的除了本能的呵护和无微不至的关爱，很少再有道德伦理的灌输。

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经济发展成绩骄人，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加上道德传统的断档，自然造就数以百万计的“小皇帝”“小公主”，这些孩子自我中心倾向严重，从小到大没有机会经历挫折和困难，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他们根本不知道“贫穷”与“艰难”为何物。也不知道除了自己还有谁需要关爱和照顾。尚秀云接触了太多这样的孩子，一位孩子的母亲对她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妈妈生病发烧，儿子放学后回家看到晚饭没有准备好，就粗鲁地问：“怎么现在还没做好饭？”妈妈说自己病了还在发烧。儿子听了摔门出去吃了饭，回到自己的房间“咣当”把门关上，再没和他的母亲说一句话。妈妈不明白自己对儿子的无微不至的爱为什么换来这样的冷漠无情。而这样的故事对如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不是非常陌生。

经尚秀云审理的一名家庭条件优越的未成年犯，父母对孩子十分溺爱，曾雇3个阿姨照顾他，使他从小养成了任性、自私、蛮横的个性。一次在学校踢足球与同学发生口角，他竟跑回教室拿出刀子将对方扎死，本来很容易解决的小矛盾，却酿成了一起血案……

有一次，尚秀云在一个中学里给中学生上法制课，课后，一个孩子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尚妈妈，打爹骂妈违法吗？”尚秀云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对这个提问题的学生说：“那你知道你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吗？”

尚秀云注意到，根据一些在中国内地进行的民意测验，现在在有相当比例的孩子不知感恩父母，不能理解父母对自己的苦心和无微不至的爱，甚至有的孩子会这样讲：“谁让你生了我？你生了我就应该对我好。”父母亲恨不得把一切都给了自己的孩子，而很多孩子不知道父母养育的艰辛和生活的艰难，他们不会奋斗不想努力，成为享受型的一代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责任感。有一些贵族学校的孩子觉得考试太“难受”，就组织起来“罢考”。

问题少年的背后

但是，“问题少年的背后，一定是问题父母”。面对这些令人痛心的青少年，尚秀云反思的，是中国现代家庭教育中的缺失，和对现在的学校教育及社会文化污染的批判。

在尚秀云刚开始从事青少年刑事审判的1987年，她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有99起，这个数字已经让尚秀云和她的同事们感到不安，“一个地方法院，何况海淀区还是一个文化大区，人口素质相对比较高，就有这么多的少年犯，那全北京市，全国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更让他们感到担心的是，这个数字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攀升，并且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整个刑事犯罪收案比例也在不停地上升。

1986年，尚秀云所在的海淀区法院判处的未成年犯罪人数为99人，1996年上升至231人，2001年380人，2004年425人。20世纪80年代末期，未成年犯罪案件占整个收案刑事犯罪的6% - 7%；90年代，未成年人犯罪上升为10%左右；进入21世纪，达到11% - 12%。这些数字还未考虑一个因素，即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到现在，未成年人的总数量实际上是逐渐减少的。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末，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最多的是盗窃，其次是伤害，第三位是性犯罪，抢劫排第四位。而现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最多的是抢劫，大约占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半。而抢劫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一旦认定，

年满 14 岁就要负刑事责任，要被判处 3 年到 10 年徒刑。

抢劫是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双重侵犯，性质十分恶劣。可当尚秀云在审判庭面对这些孩子时，就会被这些孩子的无知和自我中心所震惊，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过生日请同学吃饭没有钱，拿些砖头棍棒打别人几下，诈点钱出来请客有多么严重，这的确反映出了这些孩子的家庭教育中的很多问题。

在这些法官们中间有一句行话叫“奸出人命，赌出贼。”每一起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恶性刑事案件更是一些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和教育问题的集中反映。



首先是现在社会上暴力、色情等负面的书籍、光盘、网络游戏的泛滥。在相关产业的经济快速发展快速增长的同时，却是以无数青少年的思想和前途受到难以恢复的污染为代价的。2004 年中国网络游戏产业产值年增长近 50%，网络游戏出版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24.7 亿元。至 2004 年底，网络游戏用户数 2,025 万，其中 16-30 岁的青少年网络游戏用户比例高达 87.4%。另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最新调查，全国网民每月直接与网络游戏相关的支出大约为 10 多亿元、网络游戏市场以高于 100% 的速度膨胀着。IDC^① 研究数据更显示，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在 2001 年仅为 3.1 亿元人民币，2002 年则达到 9.1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 187.6%。但“网络游戏只是冰山之一角。”它背后牵涉整个网络和电信行业的利益。这些数字与近年未成年犯罪出现的暴力型侵犯财产罪突出、共同犯罪占相当的比例、犯罪手段成人

^①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 是国际知名市场调查机构。

化、犯罪年龄低龄化的趋向等特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尚秀云痛心地说，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以牺牲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为代价的；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在用未来换现在。

其次，学校教育只重教书不重育人。近些年来应试化取向，在高考的指挥棒下，从家长到老师关心的是如何让孩子考高分、进重点，忽略和虚化了道德教育和他们其他的成长需求。在学校里，老师几乎全是以成绩论英雄，对于成绩不好的学生没有应有的信任、鼓励和支持。考试、排名次，成为现在学校的主要任务，这使很多学习成绩不出色的孩子失去了自信，“这些孩子的心灵压抑得越强越久，爆发力就越大，这些没有成就感和自信心的孩子，一旦把压抑在内心的情绪爆发出来，可能就会不及一切后果，造成恶性案件。”

时代的发展本来对家庭教育也提出相应的要求，而现在的父母和孩子们的对话几乎千篇一律：上学前，父母说的是：“路上注意车！上课认真听讲！”放学后就问：“作业写完了吗？今天考试了吗？得了多少分？考了第几名？”其实父母根本没有去思考现在孩子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忙着为孩子的将来挣更多的钱，根本不去观察自己的孩子的内心世界和思想发展的变化。他们细心呵护孩子的衣食住行，想让自己的孩子穿得更漂亮、吃得更有营养，但却往往注意不到孩子们在思想和精神上的需求。他们天天说的，是几乎没有变化的那几句话，可是孩子们更喜欢网络、电子游戏等生动、活泼和形象。“在形式上，健康的、正面的信息根本无法和那些负面的、有害的信息相抗衡。”

青少年还是现在高离婚率的受害者。美国心理学家索克说：对孩子而言，父母的离异带给孩子的创伤仅次于死亡。中国每年夫妻离异的超过百万对，这些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可想而知。”尚秀云说：据2003年的统计，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受理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来自单亲家庭的占少年犯总数的26.4%，来自继亲家庭的占少年犯总数的6.3%，来自婚姻动荡家庭的占少年犯总数的25.2%，三者相加为57.9%。

然而，这些失和、失教、失德、失才的家庭、社会发展失衡

以及经济发展指标的受害者，直到现在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自19世纪末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都相继制定了关于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这是国际司法中已形成多年的惯例。它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从整体上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基本措施，是现代法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1988年10月，中国成为“世界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同时也承担了“世界儿童权利公约”的起草，也就是说，中国完全承认并做到公约中的两个精神：即儿童利益最大化和儿童优先的原则。然而事实上，中国关于未成年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是严重落后的。中国的法律基本是成人法，真正以儿童为对象和主体的法律在1992年以前是完全空白的。

建立少年司法制度

现在我们虽然在大法上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针对未成年人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仍未出台，实际上的审判还是和成人用同一部《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等规定也是与成人使用同一部《刑事诉讼法》。这两部法律也仅有6个主要条款，专门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及不公开审理等内容，距离当前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与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比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中国由于少年犯的审理和判刑不当，导致初次犯罪的少年从此与社会和人民为敌的例子太多了！”

对于一个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官来说，工作的目标应该就是为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而努力。1998年尚秀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她就更有条件致力于少年犯罪立法工作的推动。1998年4月，尚秀云根据多年从事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经验，呼吁尽快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立法，并多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10条建议，引起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终于，在1999年6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2002年在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她写了3个议案，第一个议案是《呼吁国务院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实施细则》；第二个议案是建议中小学道德教育课中，把法制教育列为必修的内

容，共有 34 位代表签字；第三个议案是《建议国务院在“十五”期间，切实加大对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投入，为青少年提供更多健康有益的活动场所》，被教育部作为重点议案并致函予以答复，并召开了落实此议案的座谈会，研究落实此议案的具体计划和措施。

通过多年的努力和思考，尚秀云提出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十项对策：比如，建议确定每年的 6 月 28 日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宣传日（或“全国少年法制宣传日”）；整合社会资源，建立统一的家长学校；强化学校和教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改进教育质量评价制度，让所有的中小学校都积极开展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将学校的道德法制教育成果与学校领导、教师的工作业绩挂钩；将法律知识引进课本，聘请法制校长；净化社会环境，建立绿色网吧；将“未成年犯管教所”建成法制教育基地等。

现在，尚秀云几乎每周都会到北京市各个中学去讲授法制课，通过宣传和教育的途径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她专门为中学生做了一些教学软件，搜集了很多图片，中学生非常喜欢她的普法课。尚秀云每次讲完后都留下来和学生们交流，学生们就递给她很多纸条，提出各种问题，他们都喜欢亲切地叫尚秀云做“尚妈妈”。其实“尚妈妈”真的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孩子在她的精心教育与引导下，现在都非常优秀。很多同事都很羡慕，也十分佩服她的家庭教育方法。

言传身教的家庭教育

尚秀云对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要求很严格，大概是审理了这么多的未成年孩子的刑事案件的心得，她从不溺爱孩子。儿子两岁半被送到幼儿园，回来后哭闹着不想再去，尚秀云就告诉儿子：“你已经两岁多了，该去幼儿园了。别的小朋友都去了，所以你也必须去，妈妈可以早一点去接你。”小男孩就哭着想让妈妈妥协，可妈妈态度坚决，对他也不打不骂，儿子哭够了，看看妈妈也不会依他，就很快地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

尚秀云每星期都要给两个孩子各方面的表现进行讲评，奖优罚劣；孩子要每天签到，报告自己的行踪。她鼓励孩子从上学起就天天写日记。她制定了严格的家规，所有的家人不许说脏话。

儿子小时候有一次说脏话被妈妈听到，只好按照家规用肥皂洗嘴30遍。尚秀云对孩子说：“骂人说脏话都是不文明的，是对别人不尊重。我们的衣服脏了要洗洗才干净，语言脏了也要清洗一下自己的思想才对。”尚秀云说：作为父母，要培养孩子好的情感，文明的言行，因为一切好的行为都是来自于好的情感。

而好的道德和行为是在平常的一点一滴培养出来的。有一次儿子上学时忘记戴红领巾，跑回去在楼下喊妈妈替他扔下来。尚秀云说：“你不戴红领巾是你的过错，你犯了错为什么要惩罚妈妈？自己上来拿！”虽然儿子这一次可能上学迟到，但是他这次肯定记住了教训，再不会犯这类错误了。

尚秀云用特殊的方法教育两个孩子生活的不易，每个周末，两个孩子就轮流当家主事，他们要独立安排全家人一天的衣食住行，做预算，忙采购，还要安排去看望爷爷奶奶以及为他们准备什么礼物，所以他们都体会到父母的艰辛，也非常知道感恩父母。

尚秀云认为“一个家庭夫妻的恩爱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沃土。”父母亲之间亲密无间、互敬互爱是孩子尊重父母尊重别人的基础。而这又是孩子从小到大品行端正的基础。她说一个合理的家庭应该是以父母亲为主体，而不是一个“川”字结构，把孩子放在中间，父母亲都表现出对孩子最亲近而忽略了对方，其实是不好的。尚秀云这些家教秘籍的确可以为现在的家庭教育所借鉴和参考。也往往被很多爱子心切的父母亲们所忽略掉。

尚秀云还对现在青少年的性教育落后而感到极为忧虑，更为性道德教育的缺失感到痛心。由于家庭教育对独生子女缺乏约束，现在青少年的性行为极为普遍。现在一些职业中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21世纪恋爱速度快：星期一‘放电’，星期二表态，星期三握手，星期四做爱，星期五腻歪，星期六开蹿，星期天再找一个新的爱。”而这些未成年人的性行为往往又是一些刑事犯罪的诱因。

尚秀云法官真的希望能通过大家的努力，给孩子们一个健康而清洁的成长环境，那样我们的国家才会在未来更好。

于桂新
拓荒者



文：周丽婷

我理想中的社会，就是没有暴力，没有歧视，男女机会均等，和谐共事，共同发展。

政治权利实现不了，就会阻碍妇女其他权利的实现和妇女自身的发展。作为妇联干部，首先要有性别意识，要敢于为妇女争取权利鼓与呼。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妇女维权，必须有女律师，开展工作方便。

享誉世界的“中国板栗之乡”河北省迁西县，坐落在燕山南麓，长城脚下。9月收获的时节，青黛的山脉逶迤蜿蜒，让长久生活在钢筋水泥森林的我豁然开朗。有人说，北方有山的地方大多是贫穷的、闭塞的，因为大山像一堵厚重的门，阻塞了与外界的联系，阻断了人们的视听，也桎梏了人们的思想。然而，迁西却不是贫穷的。山带给他们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矿藏资源，让一些百姓走上富裕的道路。迁西也不是闭塞的、守旧的。最能佐

证的是这里的农家女一个个勇敢自信地登上农村政治舞台，带领广大的农村姐妹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谋求发展。这在河北乃至全国都是卓然领先的。

是谁敢于打破“坚冰”营造出新鲜气象？是迁西县的妇联干部，她们不仅有胆有识，还有愚公移山般的志气。于桂新，河北省迁西妇联主席，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之一。

高大、利落的于桂新说：“我理想中的社会，就是没有暴力，没有歧视，男女机会均等，和谐共事，共同发展。”

播撒民主政治的种子

传统的北方农村妇女的舞台就是灶台锅边，一代代她们在巴掌大的地方守望。多少年来，没有人去告诉她们：你生活的圈子不至于此，你生活的内容不只是做作家务，你可以有更大的活动天地。在迁西，这块“沉寂的思想土地”已被唤醒。日前，我有幸目睹了迁西妇代会直选的“盛况”。

10月25日，秋高气爽，河北省迁西县小付庄村热闹非凡。“大胆竞选，实现女性价值”、“珍惜自己的一票，选好妇女带头人”等标语在街上随处可见。在村委会大院，早已聚满了妇女们。似乎一向是主角的男人们则站在了门口或蹲在了墙头上，像看出新戏眼巴巴地等着上演。

9时许，村支书宣布开始。214名妇女选民一个不少地到场，6名竞选人抽签决定演说顺序。她们没有忸怩羞涩，而是在紧张和激动中展示着各自的优势和抱负。26岁刘玉娟说：“我高中毕业，接受事物快，爱读书看报，收集了许多有用的信息，我能帮姐妹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如果当选，我会关注姐妹们的热点难点问题……请投我一票，给我一次锻炼的机会。”49岁的郭书艳至今已当了10年的妇代会主任。相对于其他五人，她说有压力，但不能自动放弃，因为“我做过多年，一是有经验，二是对妇女工作有感情……”

小付庄村妇代会换届直选对于村民来说是新鲜的，对于我也是耳目一新的。但它相对于整个迁西已经迟了两步。1999年开始，迁西县妇联借鉴村委会直选的办法进行妇代会直选，21个村作了试点。

于桂新说：“当时的妇联主席是王淑珍。我和王主席同一天到妇联报到。我是她的左膀右臂，有许多想法一拍即合。她决策部署，我负责具体操作。”于桂新告诉我，当时敢于开先河尝试妇代会直选，是因为那时的妇代会主任实行委任制，一千十多年，不仅年龄偏大，而且文化低、素质低，甚至有些村子让男干部兼任，几乎村委班子中就没有女性的身影。妇女参政比例低、庸者不能下、能者不能上的现状，更加深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女人永远是生活的旁观者。于桂新说：“政治权利是宪法赋予男女同等的权利，政治权利实现不了，就会阻碍妇女其他权利的实现和妇女自身的发展。作为妇联干部，首先要有性别意识，要敢于为妇女争取权利鼓与呼^①。”

为了使妇女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使妇代会活起来，使农村妇女工作活起来，迁西县妇联选择全县倒排5%的21个村妇代会进行直选，由妇女群众直接选举自己的带头人。当时，她们还不敢向县委汇报，怕不同意，偷偷地准备。后来觉得这样不妥，便去请示主管书记。主管书记不敢做主，又向县委书记请示。领导批示“在乡镇党委同意下，可以做试点，但要保持稳定。”那段日子，于桂新谨慎而又忙碌，迁西妇联的全体同志也都出动，到21个村子里宣传发动妇女群众。于桂新制定了简单的选举程序和方案。1999年12月，一场破冰之举开始进行。竞选人上台一一演讲，有一个村涌现出20名竞选人。3个票箱，3个屋子，确定了选民资格的妇女们开始投票。于桂新回忆，在一个村里，妇女们全聚集到了一间屋子，开始拉票、串票，场面十分混乱。有妇女开始嚷嚷抱怨“这有啥公正？一个人写了她亲戚好几票。”听后，于桂新马上过去阻止，锁上门，清点人数，出去重选，票箱内原有的作废，事端才得以平息。

此次直选，21名至少是初中毕业、年龄三四十岁的妇女成为妇代会主任。于桂新说：“虽然当时有意外情况出现，虽然她们还有些胆怯，但总的来说比较成功。最大的收获是从中看出妇女们有参政议政的意愿，渴盼这样的机会。如果对她们进行培训，会更大地激发她们的热情和能力。”

^① 语出彭德怀将军的《万言书》，引申为挺身而出，为民请命。

2001年，王淑珍主席调离妇联，于桂新接任。薪火相传，有了第一次的尝试，更加坚强了于桂新推动农村妇女参政议政的决心和信心，她决定2003年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在全县铺开。可想而知，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但于桂新对自己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为了做好准备，她外出寻找项目基金，争得了福特基金的支持。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迁西妇联开始大面积地对农村妇女进行培训。她到北京请来专家学者，向农村妇女进行“社会性别与妇女参政”专题培训；她带队领着200多名农村妇女骨干到吉林梨树县，到农家女学校学习。半年来，迁西妇联组织了22场“社会性别与妇女培训”，于桂新、张建军等妇联领导也当起了老师，使全县3,000多名骨干妇女受训，激起了她们参政的信心和勇气。

转变妇女的思想是第一步，还要转变领导干部的意识。为了让县里领导认识妇女参政的意义，重视、支持妇女群众参与民主政治，于桂新组织他们到四川遂宁考察学习。于桂新说：“一路上，我像蜜蜂一样不停地在领导耳边灌输。”2003年遇上“非典”，村子进不去，于桂新就率领妇联干部对全县17个乡镇进行走访座谈，并与民政局、党校联合，对17个乡镇的干部以及每村4名骨干也进行了《社会性别与妇女参政》的培训，做通了乡镇干部的工作。

在这场农村妇女参与民主政治运动的前奏中，于桂新事无巨细地作了准备。1999年选举办法只有四条，这一次她充实完善成37条，涉及每一个环节；1999年，妇女竞选看通稿，这一次，她们专门进行了如何写演讲稿培训；甚至还考虑到农村支部书记是选举小组组长，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连主持词都给拟好。一切就绪，于桂新去找分管书记刘福瑞，希望县委下发通知，把妇代会选举工作纳入县委工作主流。刘福瑞听完汇报非常惊讶：“你们做了这么多这么细致的工作，看来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迁西县委办公室很快专门下发了《关于农村妇代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通知》，并出台了《迁西县农村妇代会换届选举办法》，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任组长，县委组织部、民政局、妇联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迁西县农村妇代会换届选举领导小组，乡、

村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

200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迁西417个行政村，除12个村因“两委”班子不健全等原因没有组织直选外，405个行政村同步直选，妇女选民到场投票率几乎达到了100%，上台演讲人数平均每村达到8人，最多的一个村达到了25人。这场大规模直选在全国也是开天辟地，民主政治的种子在迁西大地生根发芽。

有了这第一次的展示，一些妇女们更加强了自信，她们的知名度很快得到提高。在接下来的第六届村委会换届时，她们第一次勇敢地与男同志平等地站在同一舞台，接受全村群众的评选。第六届村委会换届后，迁西县有297名妇女进入了村委会，129名妇女进入党支部，其中10名农村妇女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职务，全县妇代会主任进两委的比例达到93%。这些竞选上去的妇代会主任，履行诺言，施展身手，带领本村姐妹们或搞种养加，或开山造林，迁西农村妇女的生活内容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3年通过竞选上去的尹庄乡高台子村妇代会主任刘秀花说：“如果不是我县妇联下工夫举办培训班，我可能还在沉睡。如果不是我县妇联大胆的选举创新办法，我可能不会有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因为以前的我，对弱势群体极具同情心，但叹息自己无力挽救；对改变家庭贫穷落后的面貌极具责任感，但苦思冥想无良策；对妇女在家庭、社会地位中不平等待遇深感悲哀，但没

有丝毫的参政意识。我有幸参加了培训班，并且接触了‘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并懂得：它是在一定社会文化中形成的，是可以改变的。解放妇女思想，提高妇女地位，就要从妇女参政做起，只有提高了妇女的参政比例，在国家管理层的参政人员中才能听到我们女性强劲的呼声，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刘秀花说，现在工作中遇到难题，她常会找于桂新，因为“于主席是我人生中最值得感谢信赖的人，是我们妇女姐妹的‘知心大姐’，和她在一起轻松愉悦，和她在一起会有力量。”

于桂新说：“打破男尊女卑的传统，促进男女平等，路程会很艰难，但必须有人去做。角度选得好，方法得当，会像催化剂一样，快速助推事情的转变。”

日前，迁西妇代会直选经验在河北全省开始推广。10月25日，于桂新成了明星人物，她一遍又一遍地介绍着她们的做法，一遍又一遍地写着她的联系电话。

于桂新，就像一个拓荒者，乐观地对我说：“做妇联工作不仅要有责任心，还要有能力。我觉得我适合做，也喜欢做。把妇联的工作做活做新做强，为妇女姐妹更好地服务，我有信心。”

种植法律维权的苗儿

于桂新，还有一个身份：律师。这在河北省的妇联干部中是独一无二的。

1988年，于桂新从一所乡中的英语老师调到县妇联工作。上班初始，经常会接待一些妇女群众的上访告状，于桂新常常听得是一头雾水，不能作出判断，更不知从哪里入手帮助。这种尴尬局面，使她认识到自己必须补课，于是找来初高中课本，利用工作间隙开始“复读”。1990年，已是28岁的她参加了成人高考，一举考上了中华女子学院。然而，因为单位人手少，工作紧，她只好放弃，转入电大学习。虽然继续深造，但她心中的感觉不一样，“一辈子没上过名牌大学，是个缺憾！”1991年她再度参加高考，又顺利考上中华女子学院。这一次，她没有放弃，甚至把刚刚上幼儿园的女儿留给丈夫和老人，在北京脱产学习两年，最终拿到了法律本科文凭。

1995年12月22日，迁西县妇联成立了妇女法律服务中心。

中心内设一个律师事务所。领导安排于桂新负责管理律师事务所。当时有3名男律师，整个迁西没有一名女律师。于桂新召集大家开会，律师们头头是道地讲，而她倒像是个哑巴，没有了发言权。这种情形又一次刺激了于桂新。她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妇女维权，必须有女律师，开展工作方便。再者，我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她不仅自己作出决定“参加律考”，还倡议法律中心的女工作人员一起参加律考。

小县城的生活节奏是舒缓的，是闲适的，一份不错的工作足以慰藉一生。可于桂新却要自我加压。一位朋友劝她：“别考了，有法律本科就可以了，受那罪干啥？”于桂新回应“不行，那个含金量不够”。她说：“我是一条道跑到黑的人，只要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干成。”

七八月，酷暑难熬。城里的人们晚饭后到广场上纳凉吹风，可于桂新把自己关在家里。外边夜市上的歌舞声、小商贩的吆喝声，不绝于耳。没办法，只好紧闭窗户，拿把蒲扇边背边扇。冬天来临，她就背后披着被子、腿上捂着褥子“挑灯夜读”。无论春夏，夜里12点之前没有睡过觉。功夫不负有心人。1997年，于桂新顺利考取了律师资格。考完后，她把书和资料转交给妇联年轻的女同志，鼓励她们报考。1998年、1999年，又有王春艳、姜静考取律师资格。这样，法律中心拥有了3位女律师。

有了律师资格，于桂新走上法庭，为受害的妇女群众代理申诉，争取权益。她说：“妇女姐妹有什么难事，只要我听到，绝对不会石沉大海，一定会有个说法。”

1997年，迁西县一位叫李霞（化名）的妇女跑到法律服务中心寻求帮助，要求与其丈夫离婚。李霞在世人的眼中是个不被同情的第三者。结婚后不久，家庭关系出现裂痕，大她18岁的丈夫开始对她进行人身控制，白天把她锁在屋里，晚上丈夫与前妻的儿子轮流监视。于桂新听后，和另外一名律师免费为其代理。结果，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法官进行调解后，两人应该重新开始，好好生活，可事与愿违，丈夫非但不改，还变本加厉，常常殴打李霞。李霞只好趁机逃出，在外租住旅馆。结果，丈夫找去打骂，并砸坏了旅馆的门窗。得知事情的发展后，于桂新马上赶过去拍照获取证据。一审6个月后，于桂新以新的侵害事实出现为理由，

为李霞提起诉讼，法院重新受理。在于桂新提供的大量有力证据面前，法院判决二人离婚。

李霞解脱了，其丈夫把所有的怨气转嫁到于桂新的身上，当场怒斥“这是我的家事，你管什么？”李霞走哪儿，他跟哪儿。为了保护李霞的人身安全，于桂新带着李霞在街上和其丈夫开始了“迂回周旋”。“就像电影里的特务和地下党斗争一样，我们在迁西的大街小巷转悠，尽快甩掉‘尾巴’。后来，通过县信访局绕到了我家。男的像特务盯梢一样，在附近等了一下午。晚上9点，我把李霞安顿在宾馆。”

第二天一大清早，那男人又摸到了于桂新家，并恐吓到“我会炸掉你家。”于桂新义正词严回击他：“你想威胁我，我会怕你吗？我代表妇联维护妇女权益，是我的工作，我该做。说句好听的，你态度好，可以在我这儿坐会儿，给我说说心里话。如果无理取闹，我马上通知公安局。”看于桂新坚硬的气势，那男人慢慢软了下来。于桂新又苦口婆心地开导了那男人一上午，风波终止平息。如今，李霞又过上了幸福的日子。2006年3月，李霞来看于桂新，感激地说：“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无法逃离虎口，为了能帮助其他不幸的姐妹，我捐助1,000元给法律服务中心。”

目前，迁西县妇女法律服务中心真的成了这方土地上妇女姐妹们的“靠山”，妇女们维权意识大大提高，一旦发生事情，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妇女法律服务中心。该中心在迁西构建起县乡村三级维权网络，即使深山沟里的妇女被伤害，也能得到及时有力的帮助。2006年，为了使中心这个民间组织永葆活力，永远发挥作用，于桂新探索与国际接轨，将中心变为理事会的方式营运。于桂新说：“这是个妇女维权的阵地，不能丢失。”

于桂新说：“妇联的工作主题就是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妇女维权是个社会问题，需要齐抓共管。但妇联要主动担当领头者，要积极地、有意识地去推动工作的开展。不要怕困难，不要怕成效不显著，只要努力做，就会有效果。”

2005年秋天，于桂新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维护妇女土地权益上。这在全国都是个不容易破解的难题。于桂新尝试开展相关法律培训和进行个案援助。她希望县委出台相关文件，加大部门协作和工作力度，于是，一次次去找有关领导，一遍遍解释她的想

法和动议，结果有人说：“于桂新，你神经了，都成了祥林嫂了。”这几个字眼深深刺痛了于桂新，心底感觉非常悲哀，在大街上她一边走，一边掉眼泪。

2004年12月，迁西县委下发了《关于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妥善处理地树承包问题的意见》，破天荒地县妇联被纳入进去。接着，《农村纠纷听证会制度》实施征求意见时，文件发给了于桂新一份。前些日子，县法院搞案件执行检查，小组成员除了政法口上的部门，唯独加上了妇联。于桂新自豪地说：“以往妇联是个被人遗忘的地方，现在县里的某些工作主动吸纳妇联参与进来，使其做一些事情的身份合法化。”

于桂新的女儿经常笑谑妈妈有“职业病”、“太好心眼”。于桂新告诉女儿：“我在这个职位，该做；即使不在这个职位，也会去帮。”同事们评价她：“好激动，同情心重，总爱管事，太累。”于桂新说：“妇女是我的姐妹，我别无选择。十多年了，做这份工作从不厌倦，常干常新。即使退休后，我还要力所能及地为妇女姐妹服务。”

第一部分

直面暴力

III 御火而行

廖银凤

『我今年16岁！』



文：陈顺馨

女人不仅不应该被男人打，还可以大声说话，做一些原来以为只是男人可以做的事情，例如做带头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潜质、潜能，关键在于有没有机会让她开辟天地、开阔眼界，认识什么是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当她能自己定位，才能去推动世界和平，推动和谐生活。

167

额上的一道疤痕

认识银凤差不多10年了，但奇怪的是，我一直没有注意到她额上那道疤痕，只是因为这次做访问，有机会长时间近距离地面对着她，才发现这个“历史遗迹”。她说，这是她前夫留给她最好的“礼物”。我说，用什么打的？她说，用皮鞋铍的，当时鲜血猛喷。

之前真的很难找到机会或时间听银凤详细讲她的“被虐”故

事。每次见到她，不是在讲座、研讨会、游行等场合，就是在她所属的团体“群福妇女权益会”的会址里，她总是忙着不同的事情，例如主持会议、跟她的“姐妹”倾谈等。她总是那么忙。提名她参与“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李伟仪在介绍她时作过这样的描述：“她的电话是长开的，跟她吃饭时，她总会接很多姐妹打来的电话，有求助的，包括问现在想逃走，应该怎样做；被社会保障部的社工拒绝申请综援^①，该怎么回应，等等。吃一顿饭，一个半小时，其中一个小时是在讲电话的，她身边的人都习惯了。”^②

究竟隐藏在那道还清清楚楚地横在银凤额前的疤痕背后那份伤痛，是怎样转化为每天努力为仍然活在丈夫的暴力和政府政策的暴力下的妇女奔波的能量？换句话说，银凤的受害者身份，是如何转化为致力于消除直接威胁妇女日常生活和人身安全的家庭暴力的和平使者的？

反叛性格与传统思想的矛盾

银凤1949年生于香港。她说她真的是本地人，小时候住在一个叫樟木头的围村里。这个在香港的樟木头位于西贡，村民的思想与规矩都相当传统和守旧。银凤忆述说，小时候，她性格外向，爱蹦蹦跳跳和玩球类活动，但由于她是女孩，大人不让她玩，何况这类活动是要跟男孩子一起玩的。另外，一些村里的传统仪式，如中秋节扎和放孔明灯，女孩子都不能沾指。面对这些不平等待遇，小小的银凤已经懂得在心里嘀咕：“为什么女孩子不能跳？”但不敢大声说出来。她的反叛性格除了让她意识到女人低人一等外，也让她觉察到村里歧视大陆人的问题。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政治动荡，不少人从大陆移民或偷渡到香港，银凤家附近就有一家来自东莞的客家人，在荒地搭了一间茅屋住下来。她家的小女孩没有人跟她玩，银凤在读书时认识了她以后，便很义气地说：“人家不跟她玩，我跟她玩。”

^① 香港社会福利署发出的“综合援助金”的简称。

^②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工作坊系列之一“家庭暴力、性权与和平”（香港城市大学，2005年1月23日）中的发言。

银凤10岁才开始读书，所就读的村校离她家有3条村那么远。升上中学后，英文和数学都追不上，因此中二便停了学。她想出外找工作，父亲却不允许，因为她是女儿，这也是父亲疼爱她的方法。同样，这个以为只有自己才能保护女儿的父亲，不喜欢银凤跟男人接触。那时已经18岁的银凤，刚认识了她的前夫，加上他是大陆移民而不是围村内的人，银凤的父亲就更加反对。今天，银凤回想说，正是因为父亲保守，不懂得处理她的需要，让性格反叛的她，很快就跟认识不深的前夫结婚，离开了父母亲。那是1967年。

然而，婚姻虽然让银凤脱离了父亲的控制，却把她带入另一个更严峻的父权环境。在台山农村长大的丈夫，原来是来自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和村子。台山人重男轻女，男人不把女人放在眼里，村里女人被打是平常事。银凤的丈夫不仅经常看到祖父打他的祖母，自己也从小受到不情愿供养他的祖母（因父母早逝，而祖母不是他父亲的亲妈妈）的暴力对待，包括毒打和经常不让他吃饭。婚后不久，他就露出他暴力的一面，开始打银凤。最初，银凤选择哑忍，一方面是传统观念作祟，另一方面是她不能找娘家出面，因为她是违抗父命而跟这个男人结婚的。婚后银凤曾经做过车衣，但后来因丈夫不允许她出外工作而待在家里，她也没有孩子寄托自己的精神，因为丈夫不喜欢孩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暴力婚姻不经意地强化了一直存在于银凤思想内的是非观念。前夫在国内受教育，少年时期戴过“红领巾”^①，具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当年“左派”在香港发起的“六七风暴”，他也有参加。1967年银凤跟他结婚后，经常跟他去看《白毛女》等样板戏，听他讲周恩来、毛泽东等政治人物的事情，也听他的话参加了工联会属下的一个工会的家属组，“三八”妇女节的时候登台演出。意想不到的，银凤被动地接受的政治熏陶，却增进了她对中国的认识，以至一种强烈的政治信念，那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爱子民。不过，这样现代的思想，仍然不足以让银凤冲破根深蒂固的传统妇道，冲出夫权的樊篱，忍辱负重地过了21年的婚姻生活。或许，我们没法想象性格

① 即参加过国内的青少年组织少先队。

反叛和具有清晰是非观念的银凤如何度过那 21 年，她心里明白丈夫是不对的，而自己也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却要压抑自己，不敢反抗。就算婚姻可以不要，也无处可走。

“女人原来可以这样生活”：从“逃命”到重生

一直到了 1988 年，39 岁的银凤才下决心离开丈夫。她用“逃命”来形容这个改变了她的命运的行动，因为最后的几年，丈夫觉得自己身体不好而放弃工作，家庭经济不仅出现问题，他的暴力行为更变本加厉，危害到银凤的健康与安全。银凤忆述说：

“我真的不是很有部署地逃离的，或是想反抗，只是为了逃命，不想等死。自己精神真的撑不住，压力太大。这一刻他对你很好，下一刻你不知道他会如何对你，吃饭时候也可以打你，例如这一刻他给你夹菜，转眼他就会翻脸打你。那次他用皮鞋打我，锉我的额头，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那时他也有工作……可能我明白他的暴力行为是源于他的成长经验，因此，我对他没有怨恨，没有爱，也无悔，只是死心。……本来想等我父母去世后才离婚，因为他们接受不了女儿离婚的事实，但后来真的顶不住了，就决定离婚，我走了这一步他们也不知道。”

银凤能够鼓起勇气，踏出夫家之门，也因为得到她曾经入住的庇护中心“和谐之家”的妇女的鼓励。离开前夫后，她没有再回中心，而是找了一份工作，在北角租了一个天台屋住下来，同时办离婚手续。生活好像是重新安排了，但她仍然感到前路茫茫，情绪低落。真正让她认识到女人的生活原来可以有不同的可能性的，是 1989 年她所目睹的一个震撼性民主游行场景：

“我住在春秧街，窗对着英皇道，我听见很多人在喊口号，喊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想过要下去，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我想，发生什么事情？由于我只能听到声音，看不见街道的情况，我便决定下去看看。哗，马路上很多人，很多标语。知道是为了支持北京民运后，我就加入人群中去，一路走上东区走廊。我身边的人原来很安静，没有喊口号，突然间，我前面有个女人，挺高大的，开始指手画脚，喊口号，带唱歌。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女人可以这样，但我跟着她喊，跟着她唱。当时脑海中出现很多问题：为何过去几十年，自己会那样生活，而为什么这个女人可以

这样生活？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女人可以这样，而自己一直被人打，几乎没命，才走开？自己将来的路又会怎么样？”

女人不仅不应该被男人打，还可以大声说话，做一些原来以为只是男人可以做的事情，例如做带头人。那次游行带来的反思可以说为银凤日后的生活和参与打开了一条广阔的道路。1990年，住在“和谐之家”的一群被虐妇女组织了一个自助小组（即日后的“群福妇女权益会”，下称群福）。由于银凤经常回去看望她们，便加入了做义工。自此，银凤便与群福结下不解之缘，群福也成为了银凤新生活的起点。

在2005年12月和平妇女的昆明交流会上，银凤介绍自己时说，“我今年16岁”。从前夫手中逃命出来后“重生”的信息，深深地留在我们每一个参加者心中。



组织参与性别启蒙

群福的工作目标是凝聚如银凤这些过来人的力量，“为受虐妇女争取有关改善生活的政策，以保障其应有的权益；透过集体的参与和力量，使妇女觉醒其问题的社会成因，加强其解决困难的

能力和信心，并协助妇女重建家园和新生活”^①。作为香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被虐妇女的自助组织，要长远地、独立地推动上述的工作目标，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首先要吸引曾经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参加，解决她们要独自面对新生活后所遇上的经济、居所、抚养权、法律、孩子上学、关系重整等实际问题，进而通告不同的活动或行动恢复被摧残的自信、自尊和自我形象，建立走上同一条路的妇女之间的姐妹情谊、生活的信念、互助的精神，以至培养她们的领导才能和一份承担，才能发挥组织的集体力量，服务无数仍然在暴力环境中生活而不敢出走的妇女。其次，作为妇女运动的一员，群福需要针对导致家庭暴力出现的各个环节而工作，以防止更多妇女受害，这包括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关条例时出现的问题、社会工作人员处理个案时的态度、社会观念的改变等。在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后，群福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得到不少社会认识支持的、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妇女团体。2005年8月我出席群福的15周年研讨会和会庆时，看见不少姐妹不怕讲述自己的故事、懂得质疑政府的政策，并且承担着不同的工作，心里很是感动，因为我知道对每一位在场的妇女来说，能走到这一步，都是不容易的，包括在台上主持会议的主席银凤。

群福建立组织之初，有人找银凤做干事，她拒绝了。她说，那个阶段的她，一方面没有信心，怕自己做不来，另一方面是受够了前夫的限制和压力，怕再次受压和失去自由。后来，才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她被动地上了马，一做便是3年。没想到，这段时间成为她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她抓紧机会出席不同的讲座、论坛，吸收知识，打开眼界，用她的话说，自己好像“一块很干的海绵，到处吸收养分”，让自己“开窍”。她认为自己真正在性别和公民意识上得到“启蒙”的，是参加了新妇女协进会举办的一个培训班和利用空闲时间看书，1993-1994年间，代表群福参

^① 见“群福妇女权益会”单张内容。

加香港妇女团体为争取新界妇女平等土地继承权^①和引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②而组成的“联席”的工作，也让她感觉到社会运动的力量和认识到国际视野的重要性。当看事物的角度不同了的时候，她变得越来越投入。由于自己的经验，银凤经常鼓励姐妹多出来看看，去参加游行：

“我觉得，我们身处一些活动、一些论坛、一些公共场合，每一个人亲身感受，亲身反思自己的路该怎样走，因为我总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潜质、潜能，关键在于有没有机会让她开辟天地、开阔眼界，认识什么是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当她能自己定位，才能去推动世界和平，推动和谐生活……其实一个社会，一个世界，你的事是和我相关的，我的事也影响大家。”^③

此外，银凤自觉自己能够把握学习的机会、有多些时间接触姐妹和投入工作，是因为自己没有孩子。除了时间安排上的优势外，心理上，银凤也不像一些离不开被虐的阴影或者怨天尤人的妇女，她知道“自己失去了太多，社工又帮不了自己，就得靠自己，改变一些不公平的现象。”更重要的是银凤意识到要改变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需得大家一起出声、行动。后来，银凤有机会成为群福的受薪工作人员，她注意安排一些较为资深的会员，带一些新入会的姐妹参与工作，好能积累经验，培养自信和使命感，

① 由于香港新界一直保留清朝的法例，妇女没有土地继承权。1994年3-6月间，为争取立法通告《新界土地（豁免）条例》，保障新界妇女的平等继承权，13个妇女团体组成了“妇女团体争取平等继承权联席”，发动一连串行动。在立法局的支持和民间力量的角力下，条例终在6月通过。详情可参看本书有关“新界妇女原居民委员会”的故事《废除文明社会下的无理传统》。

② 1994年6月，政府发表《男女平等机会绿皮书》的咨询结果，公布将引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到香港，拟定性别歧视法案及设立“平等机会委员会”。妇女团体积极就这些法案作出响应及行动，因为这能够在国际和本地法例上保障妇女免受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条例》和“平等机会委员会”在1996年5月和9月先后生效及成立。

③ 银凤在“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工作坊系列之一“家庭暴力、性权与和平”（香港城市大学，2005年1月23日）中的发言内容。

他日可以像她那样独当一面。但她知道姐妹能够参与工作或行动的前提是经济、孩子、心理等问题得到照顾，因此，很细碎的内部工作，如交通费津贴、托儿服务等，都得考虑到。

对外工作方面，最能说明银凤和群福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的策略的，是“天水围事件”。

姐妹为本：对抗家庭暴力的工作策略

2004年4月11日，天水围发生了一宗轰动香港的家庭暴力事件：男人用刀砍死妻子金淑英和两个年幼女儿后，也用刀刺肚，然后报警，说被妻子砍伤，最终自己也不治身亡。惨案发生之前，结婚后从湖南来到香港的金淑英，原来受到丈夫虐待多年，曾3次入住庇护中心，之后一直有社工跟进个案。案发前一日，她也正住在庇护中心，并且接受同住在中心的妇女的劝告，准备过了复活节之后提出离婚，并且答应第二天跟银凤和其他群福姐妹见面，一起参加游行和商讨离婚的事情。怎料在11日上午，丈夫致电给她，如果她今天不回家，就永远见不到两个女儿。她便决定回去把两个孩子接出来。在接受姐妹的劝告下，她离开庇护中心时，通知中心同事，同事并通知主任，主任叫她报警，她先报了警，警方叫她找社工。在遇害之前，也曾致电姐妹，说不能出来游行，但最终还是逃离不了自己和孩子同时死在丈夫刀下的命运。事件揭露了政府和社工在处理家庭暴力问题时的不敏感，例如妻子报案说丈夫会对她们不利，警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让她独自回家，终于出事。正如一位女性主义学者指出的，由于事主是新来港妇女，警察一般对这类妇女存在偏见，因此更加忽略她们的需要。^①

当晚，噩耗传来，一班姐妹悲痛不已。作为主席的银凤，知道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先支持这班姐妹，让她们情绪稳定下来后，才能一起商量做些什么。事件的一个关键是警方想推卸责任，指女事主没有报警，姐妹们都很气愤，因为好几个人完全掌握金淑英死前的行踪和报警的事情。这样，“为死去的姐妹争回一个公

^① 梁丽清：《天水围伦常案报告的缺漏》，《明报》论坛版，2004年12月4日。

道，不要给人冤枉”成为一个共同愿望。传媒和其他妇女团体也希望群福出来说话，但这些姐妹有犹豫，害怕出来向公众讲出真相。作为过来人及组织者，银凤知道不能够心急。她说：

“老实说，我是以这些姐妹为重的，而不是以行动为重。我不可以逼这些姐妹哭哭啼啼地去讲，这对事情也没有好处。因此，我只是安抚姐妹，让她们真正平静下来，可以说话，我们才召开记者招待会、到警署报案、找律师等。其实当时很辛苦，很担心姐妹的情绪，因为她们都有自己的困扰，现在又发生这件事情，不仅大人受影响，小孩也是，因为他们跟被杀害的孩子玩过。”

银凤的策略果然奏效。已经储备力量的几位熟悉死者的姐妹，在记者招待会上反击警方的言论，让警方后来不得不承认事主曾经报警，只是当值人员没有记录报案内容，这完全扭转了事件的发展方向。舆论不仅批评警方和社会福利署的前线人员疏忽处理家庭暴力个案，还谈论香港家庭暴力整体上的问题，大大地引起了社会对问题的关注，政府还得成立专责小组，调查事件和建议如何改善处理家庭暴力问题的程序和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这样的发展，不仅为金淑英讨回了一个公道，还推动政府和社会团体走前了一步，这当然为群福的姐妹打了强心针，为下一个行动做准备：在金淑英丧礼那天一起游行，让社会继续关注问题。

银凤和群福姐妹商量用辣椒来突出金淑英来自的地方——湖南。她们一起去买辣椒，回来后一起把辣椒串起来，并分工合作地准备游行的各种事情。银凤说，过程中姐妹们都很开心，大家关系也变得和谐，因为这件不幸的事情能够化作力量。另外，由于大家觉得这件事情跟自己有关，便主动想出很多主意来，增强了参与性。事件一周年时，银凤也征询大家的意见，是否愿意一起做些纪念活动，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很积极地要做这做那，而姐妹跟不上的话，那不是很好的事情，而姐妹是需要时间和学习的机会，才能够把自己的处境放在一个更多的社会环境下加以理解，才会行动起来。可以说，银凤这种看重过程的工作方式，不仅是为了搞好一个活动，而是长远地转化姐妹的受害人身份，成为防止家庭暴力的推动者。

“天水围事件”其实只是变得越来越严重的家庭暴力问题的一次恶性爆发，不少妇女就算没有被丈夫砍死，也受到身体、精

神以至性方面的虐待。根据社会福利署的资料，2001年虐偶个案数字是2,433，之后一直上升至2002年的3,034、2003年的3,298和2004年的3,371^①。相信这些数字只是说明了懂得求助的妇女越来越多，仍然还活在不同程度的暴力环境中而不敢或不懂求助的妇女是无法统计的，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嫁到香港来的妇女。银凤和群福姐妹知道，除了记者招待会、游行等容易引起社会关注的行动方式外，更重要的是妇女中间的教育和支持工作。例如她们出版《远离暴力——妇女求生手册》派发给妇女、设立“风雨同路”妇女热线、组织支持网络、提供信息等。另外，银凤知道群福跟其他处理家庭暴力的社会服务机构不同，要让求助的妇女感觉到被信任、被谅解和得到平等对待，群福姐妹从自身经验出发的支持工作，是非一般社工式的辅导技巧可以取代的。

和平工作：大声但温柔

银凤说，当被提名她评选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她觉得很好笑，因为自觉是个恶狠狠的人，很“暴力”，经常要大声骂人，特别是骂香港政府。我跟她做访谈时，她清楚地说：“政府很暴力”，当时，她骂的是政府提出的新方案：强迫孩子到了12岁的家庭照顾者找工作，不然就削减她们综援。这提议不仅直接影响群福的会员，还跟银凤的政治信念相反。之前提到，银凤一直相信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爱子民，其中的一条是保障她们的安全和过人性化的生活。一直以来，政府不但没有尽力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使妇女和孩子安全受到威胁，现在，还让感情上更需要互相依赖的单亲妇女和她们的子女得不到应有的相聚时间，妇女还有承受找工作的压力，唯一的理由是政府想削减福利开支。针对这样的“暴力”，银凤说只好发动姐妹“大声地在街上闹、在社会福利署楼下闹和利用传媒闹。”其实，她清楚知道，这是和平工作：

“有人说群福不和平，这是社会给我们的标签。我们正在做的是一件伟大的工程，是想让整个社会和平，而这个和平是从家庭开始的。……暴力解决不了问题，这是我们走出来，不停地跟人

^① 见《明报》2005年4月10日报道。

家讲，不停地工作的原因。是，我们很大声，但我们是在做温柔的工作，做和平的工作，我们也只不过是想过我们希望过的生活，用我们的文化，倡导我们想要的东西。大声不等于暴力，我大声不代表不和平，我们是在做和平的事业。”

或许，没有人比银凤她们，更能体会这样的和平工作对于自己、身边的妇女和社会的意义。如果要家庭暴力“零度容忍”^①不至沦为一句空话，银凤的“暴力”是那么可贵，那么迫切，而她“温柔”的和平政治，又是那么有力量地，跟她额上那道疤痕对话。

大声说话吧，银凤！16岁的你，还怕谁？

^① “天水围事件”后，社会似乎达到一个共识，那就是“零度容忍”家庭暴力，即在各个环节上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



文：华美清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拿起了笔，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事，不要暴力、不要歧视、要宽容、要理解、要有知识、要有生存的能力。

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在为争取妇女的权利而不知疲倦的劳作，我认识到了自己看似平凡的工作的价值，原来自己也是在为妇女的权利而奋斗，这是我的力量源泉。

有人说我不像是警察，原因是我的面相并不威严，其实，从我15岁的时候考入山东省公安学校，17岁毕业以后，到今天我已经当了24年的警察。我可能还真的不怎么威严，尽管最早的照片上，闪烁着一双同仇敌忾的眼睛，但是，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一个看到我就瑟瑟发抖的人。刚开始当警察时，总觉得自己是为对付犯罪而生，对福尔摩斯佩服得五体投地，期望着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威震一方的神探。然而，我所接触到的犯罪嫌疑人几乎没有智商超群的，但是，这些人的行为常常让我震惊。印象深刻的是

一起发生在旅馆的凶杀案件，一名60多岁的妇女被人杀死在旅馆的床上。最终的侦查结果是杀死这名妇女的是她的亲生儿子。原因大致是这样的：她的儿子是与前夫生的，儿子很希望这名妇女留下来，而这名妇女已经再婚，她要回到现在的丈夫和孩子身边。于是，儿子向母亲举起了铁锤。案件的一个细节对我触动很大，一个小男孩曾发现一个男青年在旅馆的大厅哭泣，天真的孩子问妈妈：“那个叔叔为什么哭？”，男孩固执的认为叔叔流泪是因为没有可以喷水的小手枪而自己手里却有一把，后来证实男孩看到的哭泣的叔叔就是凶手，这时，他已经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凶手的理由是母亲不应该再婚，而应该伺候他。

25岁时，我已经是一所农村派出所的副指导员了。全所只有6个人，除了我，都是男的，我发挥了自己科班出身的专长，与同志们一起摸爬滚打，破案上了瘾。那时，也不知道害怕，凭在警校开摩托车在操场练就的驾驶经验，我就通过了摩托车的驾照考试，先是两个轮，后是三个轮的，在乡下的机耕路上常常有我开摩托车载男民警的身影。期间，办理的案件形形色色。有一名男青年曾强奸了村子里数位60岁以上的妇女，但是，这些妇女没有一个人报案，询问原因的时候，都说太丢人，不好意思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认识到法制宣传的重要。我在乡广播站利用广播向全乡百姓讲《宪法》、《刑法》等，领导还让我在全乡机关干部大会上为全体干部讲，我还到村子里为村民讲。当时，只觉得着急，心里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样简单的事人们怎么会不懂呢？就是有不懂的，有的强奸案件发生后，犯罪嫌疑人理直气壮，说受害人的丈夫“他欺负了我老婆，我就要欺负他老婆”，让人痛心。

在收容教育所上的一课

1993年，我被调到刚刚组建的青岛市公安局治安处收容教育所。这是一所对卖淫妇女集中教育的场所，在这之前，我已经想了若干个去处，我就是不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单位成立。心理上对这个单位充满了排斥。报到的那天，见到主管收教所的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的时候，他看出了我的不高兴，说了一句“金子在哪里也会闪光”。我可能就是冲着这一句话，在万般无奈中开始

了管教工作。我当时不知道这一工作使我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更没有想到这段工作经历会成为我以后走向妇女维权之路的铺垫，我的整个生活从此洞开了一个窗口，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在收教所，我们称接受教育的卖淫妇女为学员。对这些学员，我开始在对她们的目光中最多的成分是一种居高临下，我认为，她们作为女性丧失了人格，甘愿为了金钱用灵魂和肉体迎合那些本来陌生的男人，让人气愤。当时我负责为学员上课，讲台下一双双眼睛，有的看起来天真无邪，看到那个15岁的学员认真记录的样子，我暗暗地想，她的课堂应该不是在这里啊！后来，我看了她们在我组织的征文活动中写的《给母亲的一封信》，才知道她们中有的因父母离婚被迫四处流浪；有的怀揣着对生活无限美好的愿望外出打工却屡遭不测；有的因为逃婚；有的为了摆脱丈夫的打骂；还有一个来自农村的19岁的学员她曾经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多次奸污……每一个学员的经历都是一个故事，她们走进这里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自己不好。我感到压抑，产生了想写点什么的冲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拿起了笔，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事，不要暴力、不要歧视、要宽容、要理解、要有知识、要有生存的能力。我与市公安局宣传处的同志合作，在《青岛生活导报》发表了1万多字的大特写《走近妇教所》；期间，通过调研，写了《农村妇女卖淫的特点和治理对策》、《浅析妇女卖淫的家庭成因》等文章在《青岛公安报》上发表。我还以打工妹为原型，写了《妈妈我想回家》的歌词，由教导员谱曲，后来成为学员们广为传唱的歌曲。

1998年竞争上岗，我成为青岛市公安局治安处的副科长，这一年我被市妇联聘为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志愿者，并被青岛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评为青岛市妇女维权先进个人。我对以前自己经历过的和知道的有教育意义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梳理，写成散文陆续发表，并就《妇女儿童发展纲要》中涉及的内容，提出公安机关的意见和建议。在市妇联组织的“金点子”征集活动中，我提出的《将青岛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作为妇女法制教育基地的建议》获得二等奖。以人性化管理教育收教学员为内容的散文《神奇的力量》在《青岛晚报》发表后，被青岛电视台《人生TV》

栏目拍成电视短片在多家电视台播放。

1999年11月，我被推荐到鲁迅文学院参加了公安部宣传局组织的全国第一期公安作家培训班，就在这个培训班上，我有幸结识了授课人之一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荣维毅老师，我第一次听说了社会性别意识，我感到很新鲜，一些传统的公安工作理念受到冲击，例如在分析强奸案件时，我们往往将女受害人穿着暴露作为原因之一；对卖淫妇女进行处罚被当作是打击卖淫嫖娼行为最强有力的措施等。审视工作现状，我发现了社会性别与公安工作的关系，在警察队伍的建设、各项规定、措施的出台、对待群众的态度以至具体案件的办理都需要社会性别意识的介入，实现性别的平等，需要警察做的事情很多很多。



反家庭暴力

2002年的5月，经过新一轮竞争上岗，我成为青岛市公安局四方分局平安路派出所的指导员，在派出所6名领导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女性。这是我熟悉的岗位，但工作是全新的。除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之外，我还分管户口管理等业务。工作中我发现，报警的女受害人当中有的是指控自己的丈夫，一些民警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暴力行为在处置上应该

与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暴力行为有所区别。走访中发现，社区多数群众认为，“女人因为有外遇、懒惰、不孝等原因，男人打她是应该的”。在研究、确立工作思路时，我所将反家庭暴力作为一项内容。

依照工作分工，家庭暴力案件应属分管治安的副所长处置，但是，有的受害人的伤情不到轻微伤程度，不够治安案件的立案条件；有的受害人希望公安机关介入、但又不愿意公安机关对施暴者进行处罚。面对这些情况怎么办？凭着自己对妇女维权工作强烈的愿望，我成为到派出所求助的妇女的第一接待人，属于我们派出所管辖的，我会移交给分管领导；不属于我们派出所管辖的，我会教给她们再次遭遇暴力时的处置方法、证据的收集和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等知识，并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和心理上的安慰。

以前，我所看到的家庭暴力，多是男人借酒发疯、酒后骂人、摔东西等，真正体会到家庭暴力对妇女的伤害，还是在与这些人接触之后。有一位60多岁的大娘，坐在我面前讲述她在40多年的婚姻中丈夫动辄打骂的情景时，突然惊恐地喊到“我的天哪，他来了！”说完，拔腿就跑，原来，透过窗户她把一位穿白色衬衣的老人误认为是自己的丈夫，她说“真的让他打怕了”。还有一次，我在午饭的时候发现一位身着黑衣黑裤的40多岁的妇女徘徊在派出所大杨树树下，我将她领进办公室后，她就开始无声地流泪。原来，她是个体经营者，丈夫下岗后，不但不帮她照顾生意，反而动不动怀疑她，回家晚了要挨揍，手机中发现有陌生的电话号码也要挨揍，她说，她已经磨好了一把刀，准备丈夫再次施暴时拼命，“反正孩子要出国了，也没有什么心事了”，可是，想到自己高龄的母亲，她犹豫着。看看这些妇女提到的被打的起因吧：“我与丈夫一起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还珠格格》的时候放了一个响屁，他就一把揪住了……”；“开着窗户为什么还要开空调？丈夫边吼边动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接待了近80名来自全市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每接待一个，心情都会沉重一段时间。我想，要真正的了解家庭暴力对妇女的伤害，最好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走近她们，我相信，谁也不会对妇女遭受的暴力无动于衷，我感到愤懑，也感受到自己的责任。

对轻微的家庭暴力、特别是经过法医鉴定不构成轻微伤的家庭暴力的处罚法律没有具体的规定（注：2006年3月1日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很多家庭暴力恰恰是从轻微的暴力开始升级，导致严重暴力的发生。所以，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制止意义重大。在领导的支持下，经过实践，我所创建了超前预防、事中干预、延伸服务的基层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模式，提出了对施暴者发放“告知卡”、对受害人发放“救助卡”的做法。要施暴者知道公安机关在管家庭暴力，并且已经将他所居住的区域列为重点巡逻的区域，目的是让实施暴力的人受到震慑；对受害人则让她感受到来自警察的关心，让她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在“救助卡”的背面留有报警电话和社区民警的电话。我们还与社区居委会联手，对居民家庭实施分层次管理，用文明家庭户影响和带动那些有家庭暴力苗头的家庭，居委会人员和楼长、居民小组长对各家各户的情况很了解，哪家有打老婆的，他们都会及时与社区民警沟通。

为了让居民对家庭暴力有所了解，我到社区为居民讲家庭暴力；为了让更多的女性知道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关注外来打工的群体，借助于公安机关为她们办理暂住证的机会。在青岛纺联集团一棉有限公司成立了全市第一家暂住人口法制学校，我为打工妹讲关于家庭暴力的问题。家庭暴力对儿童的危害很大，作为平安路第二小学的法制副校长，我到该校为孩子们讲家庭暴力的危害。我们的工作得到青岛市和四方区领导的支持。在每年的“爱民月”活动中，在市政法委组织的“公正执法树形象”和“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活动中，我所将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图片制成展板在海云广场摆放，青岛市政法委书记刘建华引导大家对“反对家庭暴力男人有责”的宣传画进行思考，四方区政法委书记张美英安排人员到我所进行专题调研。

让更多的人了解家庭暴力是预防家庭暴力发生的手段之一，为此，作为青岛市作家协会会员，我写出了《暴力家庭中的孩子》、《你拿什么容忍暴力》、《两个人的失败》、《反家暴，警察在行动》等文章，在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网络通讯、《青岛晚报》上发表。

“做弱势群体的贴心人”

在派出所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我倾注着自己全部的精力。市人大、政协领导的视察监督，媒体的报道，公众意识的提高，社

区居委会的参与及妇联的组织协调，是公安机关开展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基础。青岛市妇联和四方区妇联的领导一直关注着我们派出所的每一点进步，市妇联主席李玉珍为我们写下了“做弱势群体的贴心人”的留言；四方区妇联主席李新华到派出所与我一起接待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市妇联权益部谭成英部长将她所搜集的有关家庭暴力的资料不断的传真给我。“青岛市反家庭暴力示范点”、“青岛市优秀妇女维权岗”、“青岛市十佳女警官暨优秀三八红旗手”、“青岛市妇女维权先进工作者”、“山东省优秀女警官”的荣誉，是青岛市妇联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推动。

2002年，我和荣维毅老师再次相遇在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网络中。正是这个网络和网络的老师们让我看到了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我因此知道了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在为争取妇女的权利而不知疲倦的劳作，我认识到了自己看似平凡的工作的价值，原来自己也是在为妇女的权利而奋斗，这是我的力量源泉。正是这种强大的精神支持，在我感到精疲力竭的时候，在有的朋友担心我“把工作干偏了”的时候，我仍然会感到底气十足，我已经将维护妇女权益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想到自己作为女性同时又是警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女性的不同，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在这样的岗位上做一些别人没有条件做的工作，我希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在她们感到痛苦需要警察的时候，第一个能找到的人就是我。我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警察接待的技巧，即表示同情、适时的提问、适当的愤慨、不断的鼓励等。总结这些经验，2002年我撰写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难点和对策》，该文入选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网络主办的国际研讨会，平安路派出所成为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成员。从此，我们派出所的反家庭暴力篇章翻开了新的一页。

2003年初，青岛市公安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反家庭暴力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中将平安路派出所发放“告知卡”和“救助卡”，和对居民家庭分层次管理的做法向全市推广。2003年6月27日，青岛市四方区警察反家庭暴力维权中心在四方分局成立，以反家庭暴力为依托同时推出了“温馨送万家，满意在四方”的公安服务品牌，全分局16个派出所挂牌成为家庭暴力投诉站，揭牌仪式上青岛市和四方区人大、政协、政法委、妇联和公

安局的领导到场祝贺，平安路派出所做了典型发言，在全体起立奏响《人民警察之歌》的时候，站在台下的我，有好几次我的眼里噙满泪水，我咬牙忍住，不让眼泪流出来，我知道这是高兴的泪水，这个时刻应该是欢呼的时刻，在有不少的人还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务事的时候，有这么多警察能够从社会性别视角来认识家庭暴力，并在自己的岗位上倾注着全部的心血，不能不说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见证，我为此感到自豪。王永利局长的话语重心长，他说，在探索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要有迎接挑战的心理准备，这样才能做成事情。让我感动的不仅如此，四方分局的局长刘琪华、政委张继光多次到我们辖区的永乐社区，与居委会一起研究多机构合作干预家庭暴力的问题，永乐社区后来在成为青岛市反家庭暴力示范点以后，今年又成为山东省反家庭暴力示范社区，后来成为全国零家庭暴力示范小区。

2003年间，我先后应邀为青岛市的反家庭暴力示范点的负责人讲课、在崂山区零家庭暴力村庄创建大会上交流经验。即墨市妇联、城阳区妇联带领当地公安机关到平安路派出所参观，德州市平原县城关分局到我所学习后，成立了德州市第一家反家庭暴力工作站。2003年11月在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研究中心）全国网络成员大会上，我做了题为“探索基层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模式”的发言，至此，青岛公安的经验走向全国。

2004年3月，受全国妇联国际部的邀请，我参加了中-加妇女法项目对河北、内蒙古执法人员的培训，介绍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做法，受到好评。2004年4月，全国妇联副主席莫文秀带队到四方分局调研，我应邀参加座谈发言，我们创建的基层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模式得到专家的肯定。

静下来的时候，我常常回忆自己所做的工作，我十分感谢我所在的平安路派出所的所长姜福庭同志，我也十分感谢默默奉献的战友们，在基层工作任务重、人手少的情况下，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本来属于我应该做的工作，让我腾出精力来认真研究反家庭暴力工作，令人欣慰的是，我在反家庭暴力方面投入的精力并没有影响派出所其他工作的开展，反而加强了团队精神的培养，提升了民警素质，提高了派出所的知名度。我所于2003年被公安部命名为全国一级公安派出所，我被授予“山东省优秀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



龙思海 黎明之光

文：晋群 梁萍

公平、人权、自由、平等、秩序、爱，从我的外婆、父母传给我，就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头里。选择法律，就是想让骨子里的东西变为现实，而在父母奋斗的土地上，继续他们的事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通过团队力量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提请人们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权利保护的关注，正是龙思海及社区女性组织的重要义务之一。

西双版纳，位于云南省西南端热带雨林环抱中“理想而神奇的乐土”，青山碧水，倩影婀娜。

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属于龙思海自己的生活，是简单而幸福的。小狗点点，是龙思海宠爱的“家庭成员”，为确定点点的“家庭地位”，她及女儿同不喜欢小动物的丈夫进行了“顽强而长期”的协商、沟通，终于让丈夫接受了他们“生命具有同等价值”的说法。与女儿带着点点到草地上玩耍，成为龙思海一天里

最轻松快乐的时刻。

“点点让我们有被需要的感觉，也让我们感到负有责任。”龙思海说。

需要龙思海的，何止是点点？正是这份责任感，让龙思海走近更多的人，帮助他们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来反抗暴力的伤害，来努力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

“我的工作，能够让许多妇女儿童改变他们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看法。每个人都是有尊严和价值的，每个人不仅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还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甚至是改变世界。”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在中国的最西南端，龙思海与她的志同者一起，成为了这片土地上妇女儿童的“保护神”。

刀刻般的记忆

龙思海担任主任的“西双版纳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清一色的“娘子军”。中心绝大多数是20多岁的年轻女孩，热情，充满活力。中心从1997年成立以来，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换过好几拨，对此，龙思海很无奈，因为身边的同行者总在并肩前行时离开；对此，龙思海也很欣慰，因为看到一个来时什么都不懂的女孩不断地成长，甚至在离开中心后成为其他领域的佼佼者。

“我们在龙姐身上学到了很多。”中心副主任陈云茜现在的心情非常复杂，她刚刚参加完律师资格考试，如果考取，做律师可能得到的丰厚的经济回报对她不是没有吸引力，但是，自己在中心的成长和未来的广阔天地又让她难舍，离开还是留下，令她左右为难。

在中心女孩口中被称为“龙姐”的龙思海，在选择自己未来的道路时，从来没有犹豫过，“刀刻般”的家庭记忆，让她注定了要走上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法律维权这条道路。

龙思海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几乎都对她的事业选择有着巨大的影响。她出生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县妇女主任，父亲是中学校长。在龙思海12岁那年，母亲因癌症去世，留下龙思海和5岁的弟弟、2岁的妹妹。是外婆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

“我特别感谢我的外婆，她几乎为我们三姊妹牺牲了应该属于她的一切，直到我们大学毕业后，她才合上了眼睛。她无私的爱给了我们许许多多做人的启示。”回忆起外婆，龙思海依然有丝丝的激动。

对边疆教育事业非常执著的父亲，经常被龙思海和弟妹称为“公而忘私”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培育和资助了数不清的少数民族学生，所以，在很多亲戚眼中，龙思海的父亲古板、不会为自己着想。龙思海也曾这样想过，但是，当她做社会调查深入边境农村，她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山寨的文化人都是她父亲的学生，这些人中，有村长、妇女小组长、文书、会计……在封闭的山区里担当重担，传授文化。于是，龙思海理解了父亲：虽然父亲所做的一切，曾经看起来那么微不足道，那么“傻”，但深刻影响着边远山区的人们，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对父亲的理解，更坚定了龙思海维护边疆人民权利的信念。

1983年，龙思海从中央民族学院法律系毕业，被分配在西双版纳州司法局从事宣传工作。她做了很多社会调查，早婚、事实婚姻、妇女外流……边疆人民对法律的无知让她触目惊心，对法律的渴望更令她恨不得立即把自己所学全部贡献给他们。随后，龙思海转而从事法律权益的倡导工作，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她的困惑也在加重：明明人们都很需要法律援助，但我们的倡导为什么他们都听不进去？是我们的法律体系有问题吗？还是我们提供的法律服务是他们根本不需要的？

另一个促使龙思海思想改变的重要原因，是她妹妹的自杀。

由于母亲去世的早，龙思海作为大姐，一直在全心全力地关爱着弟妹。妹妹大学毕业后分回勐海县工作，但为了更好地照顾妹妹，龙思海托遍关系，把妹妹调到自己的工作地——西双版纳州州府景洪市。但妹妹并没有因此而开心，反而因为工作压力大，一直闷闷不乐。

突然有一天，妹妹打电话问龙思海：“我还能不能回到以前的学校去？”

龙思海一口回绝了：“关系都已经转过来了，怎么还能再回去呢？只能自己咬牙挺住！”

妹妹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凌晨，妹夫突然打电话来说，妹妹不见了。龙思海与家人在景洪整整找了一天，才在公园外发现了妹妹的遗体。那时，妹妹年仅24岁。

龙思海痛不欲生。她好后悔，要是答应妹妹调回去该多好！“我没有想到她会这么脆弱！我忘记她从小失去母爱，又一直是三好学生、优秀教师，没受过任何挫折。她心理上有问题又无处诉说，临死前连个求助的地方都没有。”

“从那时我就开始想，要是有一条心理咨询热线就好了。这也可能就是我不这么热衷于干这件事情的初衷吧！”龙思海说。

妹妹的自杀，让龙思海对赋权工作的思路重新思考，也让她认识到社区维权中心服务的可及性，从而选择从公众的权利倡导向个体的权利救济方向发展。为实现这一目的，龙思海非常渴望拥有一个能够提供实质性服务的救助中心，这个中心除了有法律方面的服务工具以外，还具有心理、社工、健康等多学科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技巧，可以做更多的危机救济工作。

龙思海的梦想很快变成了现实。1997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中心在版纳州司法局与版纳州妇联牵头、英国救助儿童会的资助下成立，这是中国西南地区第一家专门为妇女儿童无偿提供心理、法律及健康咨询服务的机构。两年后，考虑到当事人的种种需求，中心逐渐开始了由附属于妇联、司法的机构向具有相对独立权的民间组织转化。在中心及相关部门的积极倡导下，版纳州专门成立了由司法、妇联、公安、民政、卫生、教育等部门组成的中心管理委员会，支持并监督中心的工作，由龙思海出任中心主任，并同时兼任州普法办公室副主任一职。政府和NGO的双重角色，让她一方面既保持了工作的独立性和公平、平等、尊重人的工作思路，一方面又可以依托政府的资源优势开展工作，中心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让别人知道他应该享有的权利并进行合法的维护，是我特别喜欢的工作。因为公平、人权、自由、平等、秩序、爱，从我的外婆、父母传给我，就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头里。选择法律，就是想让骨子里的东西变为现实，而在父母奋斗的土地上，继续他们的事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由此，龙思海作了整整13年的赋权工作，从来没有改变松懈过。

看得见的公正

龙思海工作的社区有 83 万人口，其中有 7 万是文盲，一半以上是妇女。新中国成立 50 年多来，虽然民族地区的面貌日新月异，但是妇女在少数民族地区地位不高、背负沉重生活和心理负担等问题依然存在，许多妇女虽然有实现权利的愿望和要求，但由于不具备文化知识水平及相应的理解、分析、观察、判断思维能力，在实现自身权利及保护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得不偿失。

2004 年 8 月，龙思海收到一份印有 104 名村民签名和手印的申请书，要求对一名杀死自己丈夫的妇女减轻处罚。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名叫姿妞的妇女与西双版纳州基诺乡会珍村村民飘泽结婚后不久，飘泽由于外出做生意染上酗酒、赌博习惯，稍不如意，就对姿妞拳脚相加，从 1994 年至 2004 年近 10 年的时间，姿妞都生活在飘泽的暴力控制下。为了不让丈夫抓住头发痛打，姿妞还特意剪短了头发，但这种微弱的反抗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命运。7 月 15 日凌晨，已经在地里劳动了一天的姿妞再次被喝酒回家的飘泽施以暴力，身心已伤痕累累的姿妞在反抗中失手将飘泽杀死。

姿妞与飘泽有 3 个女儿，出事时，最大的 10 岁，最小的才 4 岁，这种经常、隐蔽、无法预测甚至是无法回避的家庭暴力，同样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龙思海受理了姿妞案件，至今，她依然清晰记得，开庭那天，

从会珍村赶来的村民早早地就在法院门口等待，姿妞的3个女儿也在其中。大的两个紧抿着嘴，一声不吭，眼睛却牢牢地盯着法院门口，只要有车辆从门口经过，她们立刻伸长脖子张望；最小的孩子蜷在外婆怀里，不解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当押送姿妞的警车开进法院，村民和孩子们立即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妈妈和孩子相互的呼唤声和哭声划破了清晨法院的宁静……

法庭上，龙思海情理交融地为姿妞10年来遭受的伤害进行了辩护。她说：“飘泽是死了，这对含辛茹苦把他养大的父母来说是不幸的，……但是，辩护人尤其要强调的是，被告人姿妞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健康权利，而对不法侵害行为的反抗。”

“姿妞在暴力的恶性循环中感到无奈，并变得消极麻木，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求生本能，这种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习得的无助’是对人性的摧残和泯灭。”

“辩护人认为姿妞是一个长期遭受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她对暴力作出的反应不仅符合传统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的条件，同时反映出了受虐妇女对暴力所作出的符合情理的自卫反应。”

……

龙思海的辩护词，掷地有声，犹如雷鸣般一声声震撼着听者的心灵。虽然法院最后没有采纳中心提出的正当防卫，但承认姿妞是家庭暴力的被侵害者，主观恶性不深，对她减轻处罚，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姿妞有期徒刑3年。

宣判后，善良的姿妞拒绝上诉，她说：“我不想上诉了，毕竟一条人命没有了。只是想想10年飘泽对我的残酷殴打及3个即将分离的孩子，我又觉得，3年太重太长了……。”

姿妞案虽然已经过去一年，但龙思海仍会常常想起这个饱受伤害的妇女，那个快被屋外野生植物侵占的“家”，以及3个正在长大的女儿。在姿妞案件之前，中心已经对147件家庭暴力案件的当事人提供了情感、信息、物质支持，陪伴许多妇女感受了她们所经历的一切。龙思海发现，这些家暴案件极为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案件中的受害妇女在暴力的循环中都有同姿妞一样的心理状态及救助无门的经历。她们在来中心求救之前，曾找过多个组织甚至是警察，有的即使是离了婚也无法摆脱暴力的威胁和恐惧。

姿姐在与龙思海会面时曾说：“进了看守所以后，我从来没有这么安全过，这里真好，唯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孩子。”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龙思海心里，即使审判已经过去许久，龙思海还会不停地问法官，问身边的人，也问自己：难道只有失去自由才能让姿姐一样的妇女走出暴力的阴影和恐惧吗？”

龙思海说，人们对家暴的知晓一般是在酿成大案后，但是关注点往往是女性杀人、伤害案件本身，却忽略关注和讨论像姿姐一样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的生活健康权应该如何保护等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对家庭暴力的立法及行政、司法、社会救助还相当滞后的今天，关注一个妇女在家庭中的人权保护非常重要。如果仅对妇女在没有任何资源救济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自卫行为加以制裁，而对长期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人不进行威慑和打击的话，那么法律和社会道德就难于实现惩罚性的正义，其公平的价值取向也就值得怀疑。

她说：“200多年前，英国一个著名的法学家说过：‘我们不仅需要公正，我们还需要看得见的公正。’姿姐在遭受长期暴力的伤害过程中，无论是社会救助、行政救助或司法救助都没有发生实然的功能和作用。法庭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给受虐妇女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也才能真正实现刑法惩罚性的正义。”

姿姐3个幼小的孩子，在短短的时间里不但先后失去父亲、与母亲分开，她们3个也彼此分离：大女儿到景洪读书，二女儿在乡小学与姑姑一同生活，而最小的女儿留在了村里爷爷奶奶的身边。一个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就这样各分东西。由于案件在西双版纳当地影响巨大，当地两家旅行社在法院宣判后，主动捐助了7,000多元，作为姿姐入监期间她的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补助费，并由基诺乡政府代管。

对此，龙思海沉重的心情总算得到一丝慰藉：“在这样的时刻，特别需要社区的关爱和照顾。”通过团队力量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提请人们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权利保护的关注，正是龙思海及社区女性组织的重要义务之一，由此可以倡导更多的人了解受虐待过程中妇女儿童的心理状态，针对他们的需要开展积极有效的工作。

“回家真好”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遮乡是中缅边境一个美丽的地方，随着

民间商贸的发展，人员往来日渐频繁，其中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挣到了钱，回到家乡盖起了房子，买了拖拉机、摩托车等生产生活用品，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经济利益的驱使，令出外打工的女孩日益增多，不少人贩子常常打着介绍工作的幌子，把当地一个个年轻幼稚的少女拐卖到缅甸、泰国甚至马来西亚等地。

拐卖阴影在勐遮长期挥之不去，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不断发生。据一个从马来西亚解救回来的女孩说，她被关押在马来西亚期间，与她关在一起的少女有400多人，其中西双版纳的就有20多人；当地一对老夫妇为寻找被拐卖到异国的两个女儿，走遍了缅甸、泰国的过境地带，在缅甸一个村子里，他们在7天内见到4批少女被送往泰国，每批都有10多人。

帮助这些被拐卖女孩回家，是龙思海发自内心的愿望。

8月的勐遮，阳光明媚，14岁玉香（化名）的笑如阳光般灿烂，令人不敢相信，仅仅两个月前，她还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妓院里过着天天以泪洗面的生活。幸好，她碰到了还没有完全湮灭良心的老板，放她离开那个恶梦般的地方，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帮助下，辗转泰国，回到家中。

龙思海喜欢极了这个漂亮的傣族女孩，拉着她的手，不停地问这儿问那儿。当发现女孩脚上有类似蚊虫叮咬的一个个疙瘩，龙思海一下子紧张起来，急忙交待同行的勐遮乡妇女主任玉罕扁带医生来看看，如果查不出来，她再请省里的医生来看。

并不太会说汉语的玉香一直在笑，问她还想不想出去，她笑着摇摇头；问她回家好不好，她笑着点点头；问她现在最想做什么，她笑着说：“读书。”龙思海一下子高兴起来：“在傣族女孩里，说想读书的，我还是头一次听到。”突然，她冒出一个念头：等玉香读到高中毕业，就把她吸纳进中心工作或做志愿者，这样好学的孩子，又有自己切身的经历，一定能帮助到其他像她一样渴望到外面闯世界的女孩。

当面对一起起无法通过补救途径解决的个案，特别是面对被解救回故里，却已经感染上艾滋病毒，或在外国屡遭性侵害的妇女及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儿童时，龙思海只能深深地遗憾：补救已经不可能帮助她们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更大的痛苦和挥之不去的恐怖记忆将永远伴随着她们。因此，从源头上避免或减少更

多类似案件的发生，正为龙思海及中心积极进行的工作。

中心再次发挥了与政府有关部门连动的优势。2000年下半年，中心对社区内发生的数起个案特点、发生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召开社区范围内各相关责任部门的联席会议，全面通报近几年来妇女儿童被拐卖事件的调查报告及部门之间连动的想法。在中心的积极倡导下，一个由司法局、教育局、普法办、州电视台、傣族民间艺术团、中心联合举办的大型“赞哈”（傣语意为“善唱的人”）防拐巡回演唱活动项目，在案件多发地社区开展。活动将发生在社区的许多典型个案编写成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傣剧，告诉人们如何识别人贩子，如何保护自己和寻求救济。

在中心的推动下，社区内的妇女权益保护部门也分别向国际组织申请到了专门的防拐项目，并在傣族、哈尼族社区开展以政府为依托的多层次培训。中心工作从以往重在补救转为补救、预防与发展三结合，并充分利用妇联与司法已有的基层网络，开展超前预防性工作。

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使社区内拐卖案件的发案率大大降低。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出外打工已经成为必然，如何保护这些妇女儿童在外的安全、减小可能遇到的风险？龙思海想到的是与跨境少数民族社区合作，通过同源地理、同源文化、同源血亲的关系开发民间的保护支持系统，使被救系统真正发挥作用。

布朗族成为这一特殊救援体系的先行者。布朗族主要聚居在西双版纳布朗山，他们很早便走出国门，如今，在泰国、缅甸等国生活着近二三千布朗族，远至日本、美国等地也留有他们的足迹。2004年，中心组织布朗山的布朗族组成“兄弟姐妹访问团”亲赴泰国访问，实地了解了从中国进入泰国的路线、当地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情况等，他们发现，国外的布朗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感依然很强，并积极与本地主流文化融合，是当地比较富裕而有影响的民族。于是，先天的血液关系让国外的布朗族自动担当起照顾在外打工布朗妇女和儿童的义务，而国内的布朗族也放弃了过去违法的外出“黑道”而选择正规合法的途径外出打工。

对此，龙思海笑道：“他们（布朗族）现在是国内外合作上了瘾，今年都不用我们组织，自己就开起大会总结去年两边合作的情况，制定新的合作方式了。”

这正是龙思海最希望看到的情形：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是一直扶着他们走路，而是教给他们走路的方法，让他们自己走得越来越好。

龙思海生活工作的城市——景洪，是傣语中的“黎明之城”，一座昭示着曙光的城市。

经过8年的发展，中心个案援助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家庭暴力到艾滋病、同伴教育、打拐等。“这些工作在完成时，会有片刻成功的喜悦，但接着，就会觉得更为沉重，因为一个美好的东西毕竟被打破了，而你想把它恢复原样是很困难的。”对于自己的工作，龙思海依然喜忧参半。

工作越久，龙思海越感到偏远民族地区妇女儿童得到的资源比其他人群要少，在现实社会中可供她们生存发展的资源极为有限。

要改变这个状况，仅仅依靠龙思海和中心是不够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让许多责任部门能从社会性别和儿童的视角去考虑儿童和女性要求和平、消除暴力的需求，并促动他们开展积极有效的工作。”龙思海说。

多年来，龙思海及中心始终与当地各相关政府部门和NGO紧密联系开展工作，形成了一种彼此依存，不可或缺的关系：当地司法与妇联两大基层网络是中心展开活动的基石；一大批不计报酬、具有公益意识及专业知识背景的青年，为中心充当着义工（他们当中许多人正是曾经接受过中心帮助的当事人）；英国救助儿童会、英国政府加拿大海外发展基金会、美国福特基金会以及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等一批国际民间组织为他们提供着援助经费。

“要让妇女儿童真正远离暴力，是全社会共同的义务，也是我们的目标；而作为人身权利的保护者和捍卫者，更要让人们尊重生命和作为人的权利。”在龙思海眼中，和平，就是“在水草丰美的土地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生命，有大人、小孩、男人和女人，还有好多好多的动物和植物，他们在暖洋洋的阳光下，自由快乐地生活着，享受着自己用心和力量创造的美景。”

这幅美景，犹如黎明前最耀眼的那道亮光，给予所有人信念和希望，期待着崭新一天来临。

吴美荣 妇女维权我承担



文：吴美荣

从根本上消除性别歧视，必须把法律赋予妇女的合法权益，认认真真地落到实处。

我曾经十分怨恨自己是个女孩儿，现在我却非常庆幸自己是个女性，因为亲身体验到了女性的艰辛和伟大，使我为女性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出生在河北省武强县西小章，这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因排行老大，父母和奶奶都很喜欢。但是，小我两岁的妹妹出生后，就不那么幸运了。因是女孩，就成了多头（多余的人），再加上大弟只小她一岁，使得她早早就没有了奶水吃，身体非常孱弱，四岁了还不会走路。有一次，妹妹已经3天水米未进，生命危在旦夕。母亲抱着她去找村里一个懂点医术的老婆婆，想请她给看看病，谁知她只摸了摸妹妹的脑门就说：“小闺女家，柳树秧子，栽上就活。”母亲又生气又难过，把妹妹抱回家，一点也不懂医术的母亲用纳鞋底的大针在煤油灯上烤了烤，在妹妹的人中、脑门和母亲认为是穴位的地方使劲挑，反正她已

经不会睁眼不会哭了，然后把她放在吃饭桌子上，准备第二天就埋掉，好在妹妹命大，居然活过来了。但是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弟弟们高，因为从远处说，闺女不能顶门立户，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从眼前讲，用母亲的话就是：“等着你们都找了婆家，我和你爹喝口凉水也得俺儿子给挑吧？”这就是现实。

向命运抗争 我永不服输

作为长女，我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1963年，我的家乡发了洪水，灾难过后，满目疮痍。我的小弟弟出生了，疼爱我的奶奶又去世了。8岁的我成了3个弟妹的大姐。白天，我要抱着一个，领着两个，不看孩子时还要拾柴、砍草，推碾子、推磨；晚上，我要在煤油灯下捻麻绳、学做针线活。我的父亲非常耿直、勤劳，但家长作风严重，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只要不听话，抬手就打。可我偏偏就是不听话的孩子。父亲不让我上学，我非上不可。有时带着弟弟妹妹到教室的窗外，看人家上课；有时，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到离学校不远的大水坑边上，听人家读书。一次，我听得着了迷，竟然把弟弟掉进了水里。当时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不会水的我鞋也没脱就跳进能没过我头顶的大坑里，愣是把一边灌水一边下沉的弟弟捞了上来，此时正值麦收，天气还很凉，我抱着同样是落汤鸡的弟弟冻得瑟瑟发抖，也不敢回家。直到11岁，小弟弟能到处跑了，在村里老师的再三劝说下，我才有幸进了课堂，因为年龄太大了，只好直接上二年级。好在我不仅能跟上班，而且名列前茅，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做四年级的应用题，我都能做上来，老师就让我跳级，我不肯，父亲却很高兴，因为跳级就可以少上一年学，可以早下一年地。不得已，我只能去上五年级。那时候，为了证明自己不比男孩差，也为了能给家里添几个工分，我12岁就利用寒暑假和星期天去生产队出工，虽然干得和大人一般多，却只给大人一半的报酬，我并不在乎，直到手掌结满厚厚的老茧，手背留下道道伤疤，什么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但是，我考上了初中后，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上了，理由有三：一是我家没劳力，不上学可以挣工分；二是没有钱，供不起；三是闺女早晚是人家的人，上学没用。他还给我举

例说明，你看人谁谁家的闺女，供了半天，找了婆家，爹娘能指上吗？现在，你们班的闺女都不上了，你还非上干吗？！我分辨说：为什么不让我上，让弟弟上？父亲说：谁让你闺女？你要是小子，砸锅卖铁我也让上！没办法，我只能放下心爱的书本，背着柴火篓子下地砍草。初级中学就在我们村上，眼巴巴地看着同龄人高高兴兴去上学，心里难过极了。我背着篓子，拿着镰刀围着学校一步一步地转了三圈，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但是，我没就此认输，偷偷地开始了“地下”活动，先给远在新疆的三伯吴书云写信，向他请求经济援助；再把我的大姑请来做说客，父亲一看压不服我，就哄我说：只要你不上学，我可以给你买新衣服和好吃的。我坚决不让步：“不穿新衣服、不吃好吃的，就是要上学！”经过最后的斗争，我赢了，但条件却是要把房前的宅基地垫起来。于是，我带领弟弟妹妹们开始了艰苦的劳动，经过两年起早贪黑的努力，终于把原本低于地面两尺多的一大片空地垫成了高于地面三尺多的宅基。197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高中，父亲又一次想停止我的学业，我的班主任杨西坤老师再次登门说情，才得以念完两年的高中。1979年，挣了几年工分，又已到出嫁年龄的我，有幸搭上了恢复高考的末班车，考入了河北大学中文系，这一次，父亲虽没有阻拦，但他和母亲都感到非常遗憾，叹着气对我说：“你要是个儿子，就能光宗耀祖了。可惜咱们吴家坟上没有那个风水。”

为不平而鸣 我勇往直前

1983年，我大学毕业了，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为社会做一点事情。但毕业分配却使我四处碰壁。真没想到，时隔半个世纪，当年《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林道静找工作时所有的遭遇，我都体验了一遍！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女的！”拿当时用人单位的话来说，就是“宁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重男轻女不仅仅是我父亲和他一样的农民，还有这些单位领导和整个社会，支持他们的坚强后盾是几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面对歧视，我义愤填膺，却又无能为力，只把李白的《行路难》反复吟咏以言已志。经过两个多月的拉锯战，我终于被分配到衡水市工商局办公室做文秘工作。

1985年，一个偶然的机，河北省当时的妇联主席和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主席看到了我在一本国家级杂志上发表的散文，以为发现了“大笔杆子”，便千方百计把我挖到省妇联宣传部。我从此笔耕不辍，以向社会宣传妇女，向妇女宣传社会为己任，为先进妇女典型树碑立传，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体的文章38万字之多。但是，11年的妇联宣传工作使我认识到：仅有宣传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消除性别歧视，必须把法律赋予妇女的合法权益，认认真真地落到实处。1996年，我谢绝了宣传部老部长的挽留，来到权益部当了一名新兵。

权益部的工作主旨是代表妇女利益，维护妇女权益，这也是妇联的基本职能，为了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能，我发挥优势，对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件做深入细致的报道。如《“隐形杀手”导演的悲剧》和《打工妹集体中毒事件敲响了警钟》等，分别在《民主与法制》1997年第8期首篇和1999年第17期焦点新闻栏目发表，前者还被《文摘报》转载。1997年春节前夕，我独自冒着严寒去唐县采访了贾改芬母女。贾改芬的婆家是个外来户，因是单门独户，一直备受欺凌，上一辈的3个姑娘曾遭强暴或猥亵，有的生下孩子后，被迫忍辱含垢远嫁他乡，现在，贾改芬的两个女儿还不满10岁，就分别被强暴了，是忍气吞声，还是依法维权？贾改芬在痛苦中选择了后者，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在省市县妇联的积极呼吁下，不仅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处，贾改芬还得到了民事赔偿。但打官司把村里的两大家族都给得罪了，为了改变贾改芬一家的生存环境，县妇联通过多方努力，将她们一家从深山里搬到了离县城较近的仁厚镇大马庄村，免费让她的3个孩子在村里上了学，还帮她做起了卖馒头生意，使贾改芬一家的生活有了新的转机，我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分别在《中国妇女》1998年第5期和《河北日报》周末版首篇发表，其中《法盲母亲学法抗强暴》被评为全省综合治理好新闻二等奖。新闻舆论的关注引起了强烈反响，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并前去探望，使贾改芬一家重又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她在给我的感谢信中说：“我的悲惨遭遇见报后，各级领导十分关注，多次来看望我们，从精神上、经济上给了我们最大的帮助，使我坚定了依靠娘家（指各级妇联）、依靠正义的人们而活下去的信心，使我这个面临绝境

的家庭起死回生。日子过得很红火，我们在山上没吃过的，现在成了家常便饭，在山上没穿过的，成了日常衣服，生活过得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

用行动改变 我乐此不疲

到权益部工作后，我时时刻刻有一种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感觉。唯恐因自己不慎或无知，给前来寻求帮助的妇女造成二次伤害，因此，于不惑之年，我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的学习，同时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充电的机会，使自己尽可能多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改革开放给中国妇女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空间，也使她们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其中，家庭暴力、打工妹的劳动权益和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受侵害等，是困扰妇女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将其作为重要的维权事项，并根据轻重缓急，借用企业“生产一代、开发一代、储备一代”的策略，针对不同问题，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在最恰当的时机和最合适的区域逐步推进妇女维权工作的开展。

行动一：推进河北省反家暴地方立法。1995年，第四次世妇会在北京召开，河北省各级妇联以其环绕北京的区位优势，得到了广泛参与的机会。世妇会关注的十二个问题之一就是家庭暴力。“打老婆也犯法？没听说过。”自古以来就是“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你没听说“老婆不打，上房揭瓦”？这些都是人们对“家庭暴力”这一陌生名词的第一反应。时代虽然前进了，但对于打老婆，却仍然是向杨三姐告状的故事（发生在河北的唐山）一样，只要不打伤、打残或出了人命，就不算什么大问题。人们对这件事的态度是“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不要多管闲事；也有“两口子过日子，哪有锅台不碰马勺的”泰然处之；司法机关有“清官难断家务事”“打老婆是个人私事，不好干预”的畏难情绪。传统的夫权思想加上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使家庭暴力日渐凸显，成为妇联系系统信访案件中的突出问题。世妇会的召开，为提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1996年，我们组织全省妇女维权工作者，对省辖11市及部分县区、乡镇家庭暴力的现状，通过问卷调查、入户访谈、座谈讨论、走访公检法司等部门查阅案卷、统计报表等形式，进行了广

泛深入的调查。在此基础上，我对全省调查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写出了《关于我省家庭暴力的调查综述》，以省妇联权益部的名义发表在河北省妇联 1996 年第六期《妇工之声》上，文章就家庭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危害、产生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家庭暴力的防范及其对策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次调研，拉开了河北省各级妇联向家庭暴力宣战的序幕。我们和省人大一起深入到县区、乡镇、村居，与基层人大、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以及民政、妇联、工会、村居民委员会相关人员进行座谈；我们多次进入女子监狱对监狱干警进行培训，对“以暴制暴”妇女进行访谈，并配合中央电视台录制了《女子监区调查》专题节目，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我们翻录了不下 300 张光碟，发放到全省利川市县区和重点乡镇，用于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辅以大规模的“白丝带”签名活动，为反家暴立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于是，省人大重视起来了，相关部门积极起来了，社会各界行动起来了。反家暴立法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么，如何使这支反家暴的利箭能够正中靶心，我们根据调查所得，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力争把它做到最好。



2004 年 7 月 22 日，《河北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经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自 2004 年

9月1日起施行。这是全国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条例，也是我国目前反家暴立法中最为完善和最具可操作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其中凝聚着河北省妇联和反家暴网络专家的心血和汗水，我不仅多次请她们帮助修改《条例》草案文本、亲自参与论证，并且还抓住一切机会邀请我省人大有关人员参加反家暴网络、全国妇联和国际项目培训，以提高他们对反家暴立法重要意义的认识，使其在立法实践中能够与我们达成共识，不仅把我们的意图最大限度地反映在法律条款中，而且出谋划策，想方设法争取更多的省人大常委的支持。《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河北省反家暴工作已经纳入法制化轨道。为了更好的把《条例》落到实处，我协调省人大以两家的名义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起草了《在颁布实施〈河北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从家庭暴力的危害、处理不力的原因及其后果、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修宪精神、履行国际公约、维护我省家庭和社会稳定等方面说明了宣传贯彻《条例》的重要意义，并以省人大的名义向全省尤其是《条例》规定所涉及的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为《条例》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可靠保证。

行动二：组织、实施法律工作者能力建设项目。1998 - 2004年，先后有“中 - 加妇女法”项目、美国福特基金会妇女法律援助项目、妇联专职维权工作者法律培训项目、妇女法律服务（援助）骨干律师培训项目和美国斯潘根伯格公司筹款资助的河北省妇女法律服务（援助）机构骨干律师提高班培训项目，相继在河北实施，这对全省妇女维权工作来说，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借助国际项目，直接培训了县以上全部妇联专职维权工作者，市以上和重点县区公、检、法、司、劳动、民政等职能部门官员，妇女法律服务（援助）机构骨干律师和各大新闻媒体部分记者编辑、项目点主管妇联工作的乡镇书记，村（居）委会主任以及大专院校的骨干教师等1,360人，全面地开掘了妇女维权人力资源，提高了相关机构和目标人群的性别意识和综合素质，促进了多机构合作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的开展，不仅提高了受训者的维权理念和维权技能，而且开拓了大家的维权视野，提高自信心和创造力。使河北省的妇女维权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一、

经过省妇联的积极协调争取，得到了省司法厅的政策支持，使得全省妇女法律服务（援助）机构，克服了由于脱钩改制造成的不利影响，以 11 个省辖市为中心，形成市、县、乡、村四级妇女法律服务（援助）网络。其二、各级妇联协调公安部门在市面上县两级纷纷建立家庭暴力 110 报警中心，并相继制定了公安部门《关于 110 报警服务系统受理家庭暴力电话报警实施办法》和管理规定，对受理范围、工作原则、处理方式和出警单位的工作职责都做出了具体规定，使警察不愿介入家庭暴力的状况得到了逐步改变；其三、与市县两级司法部门指定的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联合建立家庭暴力伤残鉴定中心，使受暴妇女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伤残鉴定，为胜诉提供了权威有效的证据；其四、为帮助家庭暴力受害人解决居无定所等生活困难，使其迅速脱离暴力环境，各级妇联与民政、公安或女企业家联合，建立各种类型的家庭暴力庇护所（站）54 个，在为其提供衣、食、住、行和医疗等方面的便利之外，还教给她们一技之长，为以后自立于社会做了准备，妇联组织则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为其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其五、建立零家庭暴力社区（村）5, 038 个，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了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工作；其六、石家庄市市、县区两级法院全部建立反家暴合议庭 26 个，专门用于审理家庭暴力案件，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妇联也已经联合发文，在全市建立反家暴合议庭；其七、使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共同责任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学习借鉴国际项目的宣传、培训模式，使河北妇联系统的普法工作有了三个方面的变化：（1）过去普法对象是单纯的妇联干部和妇女群众，现在拓展到社会各界尤其是男性，使他们对妇女和《妇女法》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主动帮助妇女解决了一些诸如土地、家庭暴力等以前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2）过去普法内容是单纯的实体法，现在加强了对法律程序的了解和运用，使妇女不仅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益，还知道了权益受侵害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寻求解决；（3）过去培训是灌输式，现在是参与式和课堂教学相结合，并辅以“诗画一条街”、“千名故事员”、“妇女普法小组长”、“模拟法庭”“普法大篷车”、“学法炕头组”等形式，收到了很好的普法效果。因此，河北省妇联被评为全国“四五”

“五五”普法先进集体，受到中宣部、司法部和全国妇联的表彰，我自己也被评为河北省“四五”普法先进个人，得到了省政府记一等功奖励。2006年又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行动三：加入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2000年，河北省妇联首批加入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作为京外网络成员，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多支持和帮助，分享了国内外反家暴的成功经验，用以启发和指导我们的反家暴立法工作。我把网络的各位专家作为我省反家暴工作的老师和顾问，经常向她们请教问题，和她们商议工作，从她们那儿得到了各种宣传培训材料和非常宝贵的信息，同时也把我省的情况及时反馈到反家暴网络，与大家一同分享成功的快乐。2002年，经网络批准，河北省11个省辖市全部成为京外网络成员。在法律条款的具体制定修改过程中，我把从反家暴网络中获得的信息和我省的成功经验，经过与立法专家反复筛选，在不违背《立法法》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在《条例》中给予体现，并使之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使其突出了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突出了对受害人的人权保障，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对受害人的救助责任、基层组织对家庭暴力案件的举证责任，同时使医疗机构、教育和媒体等部门和系统也责无旁贷。期间，恰逢我国《婚姻法》和《宪法》相继修改，对家庭暴力做出的禁止性规定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无疑为我们带来了反家暴立法的春天。我们不失时机地以家庭暴力行为直接侵害了公民生命健康权，对妇女的暴力是对妇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侵犯，是对妇女基本人权的严重践踏为由，加速了立法的进程。各地由此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培训活动，反家暴网络的专家就成了《条例》培训的当然老师，并且在张家口市以项目的形式，成功的做了全国首家京外网络成员医疗干预培训。《条例》实施两年多来，不仅使全省反家暴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全国有关15个省、市、自治区来我省学习考察，从一定程度上带动和推进了这些地方的反家暴立法。

行动四：针对国情省情，结合妇联特点，有的放矢、因地制宜地开展妇女维权工作。

中国的国体政体和现代历史，决定了妇联组织的特殊定位，即：三大群团之一、“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国

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妇女群众的“娘家”等。妇联有上至全国，下至村（居）规范的组织网络，其基本职能是代表妇女利益，维护妇女权益。她不仅可以每年通过提案、议案向各级人大、政协反映妇女群众呼声，而且可以和人大一起对公检法司及政府各职能部门进行执法检查 and 执法监督。我们充分发挥了妇联组织的这些职能作用。

1. **建立妇女维权协调组。**由主管妇联工作的省委副书记任组长，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妇联主席等任副组长，司法机构和部分政府职能部门副厅级领导为成员，办公室设在省妇联权益部。协调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商议解决全省妇女维权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侵害妇女权益典型案件，还可以根据需要召开全省维权协调组工作会议，对为维护妇女权益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各市的83%的县区也建立了配置相当的相应组织。2005年，通过召开省维权协调组工作会议，争取到省财政每年拨付妇女维权解困基金50万元，推动建立政府合理配置妇女维权资源机制的形成，至此全省共争取到妇女维权解困资金近500万元。省妇联权益部作为全省妇女维权工作的指挥中心，在河北省妇联系统维权工作中，注意及时发现、培养、总结、表彰、推广典型，使其成功经验迅速在全省开花结果。我省多机构合作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局面就是通过这种典型效应逐步形成的。2002年，新乐市发生了一起因不堪长期忍受家庭暴力愤而杀夫案，不同的是，被害人的母亲和叔叔却到县妇联为杀人者求情，村里700多村民历数死者的暴行，联名为这名妇女保释，这使苦于家庭暴力案件取证难的妇联组织感觉到柳暗花明，新乐市妇联积极协调市检察院，经请示石家庄市检察院批准，将此案放在新乐市（县级）法院审理，由于县级法院审理刑级较低，判处有期徒刑5年。此案启发我们根据不同案件可以另辟蹊径。立即向全省推广了他们的经验，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根据人们的从众心理，相同情况下，判例还是会起到一定借鉴作用的。现在，我省已经有五个类似案件，都在县区法院进行审理，最轻的判三缓五。

2. **地方立法和制定政策并行不悖。**在我国法制建设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政策起着特殊的调节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妇

女儿童维权协调组”，“挟天子以令诸侯”，要求各成员单位充分履行职能，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最大限度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维权协调组办公室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协调相关部门制定相应政策，以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当中妇女的群体利益不受侵害。立法条件成熟时，一些好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地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3. 把国内外反家暴成功做法本土化。努力探索河北省家庭暴力干预模式，进一步推动我省多机构合作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的开展。2004年三八节前夕，我们借鉴加拿大“拉娃莉”案件，从性别视角出发，多次协调省监狱管理局、石家庄监狱、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从23名以暴抗暴女性服刑人员中筛选出6名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员，给予减刑假释奖励。为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做得非常细致周到，在对23人依次进行了访谈基础上，又邀请经过性别培训的法律专家和心理专家对她们进行了法律咨询和心理咨询，之后，我们又和石家庄监狱的干警一起，驱车到拟假释者原籍，对被害人亲属、村民、村干部、乡镇派出所、县乡妇联都进行了访谈，并和县委主管书记交换了意见，在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下，2004年3月8日，在全国妇联三八妇女维权周六省联动石家庄监狱分会场，召开近10年来最为隆重的减刑假释宣判大会。省妇联刘保平副主席向即将出狱的女服刑人员赠送了农村致富科技光盘。我们和石家庄监狱女子监区干警们将被假释出狱的赵彦玲护送回家，为藏胞知诗拉姆购置了藏装、满足了穿着藏装回到阔别14年家乡的心愿，并为她补办了卧铺，将她送上南归的列车。

4. 从国家建设需要稳定，家庭生活需要和睦的结合点上，做好妇女维权这篇大文章。中国人历来崇尚“天下太平”和“家和万事兴”，主张“和为贵”。在这个大背景下，妇女维权要得到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老百姓的一致支持，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把这两点有机结合，去游说政府，宣传民众，取得了左右逢源、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反家暴立法中，我们一再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家庭暴力是社会细胞上的毒瘤，它的滋生和蔓延，严重影响了社会肌体的健康成长，影响了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并运用具体数据和典型案例来支持这一观点，

很容易被接受并且达成共识。在宣传贯彻《条例》时，我们也是紧紧抓住“建立和谐社会”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这条主线，将妇女维权工作贯穿其中的。

5. 开展妇女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群众参与广泛的活动。2004年，我们从全国妇联、国家卫生部争取到全国艾滋病防治示范区项目，对妇女开展防治艾滋病知识“面对面”宣传教育活动。省妇联充分发挥各级妇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进村入户和到学校，进行各种形式的互动式宣传活动，使妇女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掌握了防治艾滋病基本知识，积极投入到这场保护自我、保护家人、保护子孙后代的活动中。到目前，已经有10万名15-49岁女性接受了“面对面”宣传教育，2004年10月10日，全国妇联副主席莫文秀、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来河北考察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后记

以上工作都是省妇联权益部集体智慧的结晶。只是我待得时间长些，起到了承上启下、全力支持的作用。1996年以来，因机构改革和工作调动，省妇联换了五任主管主席、四任权益部长，处室的同事也换了两茬，当科员时，我努力熟悉业务，做好普法和执行国际项目等工作，1999年3月份任副部长，一直为各新任部长出谋划策，期间曾以副职牵头主持一年全面工作，直到2004年9月升任部长。我在维护妇女权益工作中牺牲了很多个人利益，但却交了许多朋友，那些和我一起并肩战斗的同事们、支持我努力工作的领导们，那些不计名利的志愿者们，都为河北省的妇女维权工作立下汗马功劳；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中-加妇女法项目和美国福特项目的项目官员和中外专家给了我们最大的帮助。还有那些通过我们帮助死里逃生、过上幸福生活的受害妇女们，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欣慰，感觉到妇女维权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以前，我曾经十分怨恨自己是个女孩儿，现在我却非常庆幸自己是个女性，因为亲身体验到了女性的艰辛和伟大，使我为女性感到骄傲和自豪。正像我在给河北省第十届妇女代表大会写的儿童献词中歌颂的那样：

我们会说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叫一声妈妈，能把千言万语表达。
我们会说的第一句话，是找妈妈，
找到了妈妈，就找到了自己温暖的家。
妈妈，是世界上最神圣的称谓，
她们把爱的种子播撒华夏。
妈妈的爱，像长城绵延万里，
爱我们、爱爸爸、爱大家。
妈妈的爱，像大海广博深邃，
爱生命、爱生活、爱国家。

.....

让我们用女性特有的爱，唱响世界和平之歌吧！

陈明侠
给妇女一个
没有暴力的世界



文：沈宝庆

妇女的暴力不仅是对妇女一般人权的侵犯，也是对妇女生命健康权的严重践踏。

反对家庭暴力项目开展后，随着项目的深入，我们受到越来越多的刺激、教育和启发，发现：必须解决法律领域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和社会性别主流化问题，必须从事性别与法律的研究。

我衷心地感谢所有从事这一伟大事业的每一位同仁，我从同仁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志愿者的奉献精神，看到了各位为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实现性别平等而努力工作的忘我精神、民主精神。

和平应该是人们相互尊重，没有歧视。我觉得和平是一种氛围，是一种境界。

十余年前，在国内谈家庭暴力还是件比较敏感的事情，但今天，情景大大不同了，我们不仅可以自由地讨论家庭暴力问题，

而且“反对家庭暴力”尤其是“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已经是我们的一项事业了。10年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这是所有从事这一事业的兄弟姐妹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欣慰之余，有个人是所有关注这项事业的人都不会忘记的——我们事业的先锋者之一，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陈明侠教授。陈老师1964年开始从事法学研究工作，1980年代开始关注妇女权利的法律保障工作，1990年开始聚焦于妇女人权法的研究，从唐山迁西县到河北省。其后，陈老师一直积极投身于反对家庭暴力和性别与法律研究事业中：反对家庭暴力项目及网络、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与性别与法律研究网络的创建……。她的足迹，就是我们反对家庭暴力事业足迹的重要一部分。

2005年，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在北京召开，陈老师在大会上作了《婚姻法修改与禁止家庭暴力》的发言，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家庭暴力”这个世界性问题的关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十几年，中国社会对于妇女权益的关注、对反对家庭暴力所作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陈老师在大会上的发言谈到：“在中国，‘家庭暴力’作为法律的概念，第一次写入法律之中。2001年婚姻法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是中国家庭法乃至中国法律的一大历史进步。而且随着人们对‘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危害认识的加深，随着人们民主、平等、人权观念的提高，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家庭暴力的法规、条例，正在相继调研、起草、制定和颁布之中。刚刚通过的妇女法修正案也增加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相关规定，相信家庭法中的有关规定也会更加完善。”这些话给了我们信心，给了广大妇女特别是曾经受到或正在受到家庭暴力的妇女以信心。

反对家庭暴力项目及网络：中国 NGO 的模式探索

做过志愿者的人经常会感慨：“自己就是一做苦力的！”这话既道出了我国广大志愿者的苦衷，也道出了我国许多志愿者 NGO 组织的困境。NGO 组织近年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已蔚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能在短期内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模式的却

不多。陈老师所在的反对家庭暴力项目及网络是其中的佼佼者。

说起反对家庭暴力项目及网络，还得从1998年说起。那年5月，北京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和学者一起赴印度出席了亚洲地区“制止对妇女施暴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会议揭示了对妇女施暴、伤害妇女的身心健康、摧毁妇女的人格尊严、进而毁灭及妇女的生存权、劳动权、社会参与权甚至造成妇女的死亡等违法犯罪现状。但这一现象尚未得到司法界、社会舆论等的足够重视。这个会议把医疗机构干预家庭暴力也作为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受到很大启发，认识到对妇女的暴力不仅是对妇女一般人权的侵犯，也是对妇女生命健康权的严重践踏。她们认为，会议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多领域多部门多机构协同努力。

于是，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回国后，在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举行的北京几个女性非政府组织网络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家庭暴力的现状与干预对策研究”课题的意向，大家一致赞同并立即行动。经过多次研讨，当年10月拟出意向性报告，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中国法学会有关领导、福特基金会、荷兰乐施会、瑞典SIDCA^①、挪威奥斯陆大学人权中心等的支持赞助下，《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于2000年6月份得以正式运行。



^① SIDCA，即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的简称，是瑞典创立的国际扶贫组织。

该项目由若干分项目组成，主要包括反对家庭暴力资料中心、社会性别培训、全国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和公众反家庭暴力意识现状调查（含司法干预状况调查）、反对家庭暴力培训教材、受暴者口述实录、对家庭暴力受害者实施法律援助，以及反对家庭暴力社区综合干预的城市和农村的试验区，其中包括医疗干预对策研究的模范试点、家庭暴力热线个案研究、媒体宣传等十几个分项目。在一定研究的基础上，项目开设了反对家庭暴力网站，这十分有利于国内同仁和上网的公众共享反对家庭暴力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的基础上，网络分别召开了国内和国际研讨会，大力开展了公众倡导工作。

2003年该项目第一阶段完成时，取得了一系列喜人的成果：在我国建立了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网络及资料中心；向政府提出了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建议稿以及具体的对策措施建议；创建了反对家庭暴力的试点社区，初步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实际的反对家庭暴力多机构合作社区干预模式；提高了公众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意识；探索了适合中国文化和背景的、关于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理论框架。

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涉及面如此广泛的项目，作为协调员的陈老师从一开始就常说：“我们大伙一定要意识到问题的复杂和艰巨。”在陈老师和项目管委会成员与所有项目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项目作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建立了公开、民主的项目管理委员会，规定了管委会工作会议制度。管委会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行政、财务管理实行彻底的民主、公开、透明原则。对项目参加者进行社会性别培训。积极争取项目负责单位的指导、支持，寻求公检法司执法部门、卫生部门和各级人大，以及妇联等群众团体的支持和帮助。定期召开网络全体成员会议及不定期的小型研讨会，发行项目简讯。

为了将项目的成果继续保持下去，2003年年终，反家暴课题研究实践了从项目运作到网络（研究中心）的转型转制，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原来的集决策、筹资、执行为一身的项目管理委员会完成了2000年以来的历史使命。在京网络成员选举产生了网络理事会，理事会负责网络的宏观决策、资金筹措、管理层的聘任、网络工作运行监督工作。陈

老师被一致推选为理事会主席。新产生的执行层负责网络各项工作按计划执行，并对今后工作的进展提出意见和建议。这种理事会和执行层各司其职的体制，是 NGO 正规化良性发展的方向，也能更好地保持网络公开、民主、参与的精神，建设更加规范的 NGO，促进反家暴事业的发展。

反家暴网络继承了反家暴项目的优良作风，而且作了许多新的有意义的探索。在原有网络 10 项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有关制度。目前，已经制定了理事会细则、理事会成员利益冲突声明、网络执行层岗位职责描述、网络执行主任选任条件等制度。受资助方帮助，网络还进行了能力建设，一系列机构、团队和个人的能力建设的活动，使大家以更好的状态，为大家服务，为这个事业助力，并从其中实现了大家的价值。

在采访陈老师的过程中，陈老师对自己的工作是充满自豪感的：“据来自有关资助方和研究 NGO 组织的一些同仁们的信息，认为从 NGO 组织的角度来讲，反家暴网络是中国按照真正的 NGO 民主管理方式建立和组织起来的，不说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一家。”确实是这样的，网络实行的理事会和管理层分开的组织管理机制，对我国 NGO 组织的民主管理模式就极具探索意义。网络在诸多方面，都是很值得所有从事 NGO 事业的同仁们学习的，例如与政府的关系，往往是 NGO 组织最难处理的一个问题，陈老师也说了：“对此我们应有一种策略，应该与政府形成良好互动关系，坚持自我又要争取支持，和谐相处。”反家暴网络就是这样的，在做第一期项目的时候，陈老师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体制内、体制外等，最关键的是，只要大家都有一颗维护妇女权益的心，大家就能合作在一起。今天，反家暴网络成员单位已和相关各级妇联、各级政府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所有的成就都凝聚着陈老师的心血，但是采访过程中，陈老师却一再和我们说：“不要说太多话，用不着，我特别不同意说太多个人的东西，因为我从来认为，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所有的成果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无论管委会，还是理事会、管理层，还是网络，我们永远强调的是一个集体，我们反家暴网络的特点就是集体，是民主和参与，事实上也是大家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我不过就是一个协调员，工作是大家做，声音也是大家发出

来的。”

与迁西一起成长

迁西县——河北省唐山市一个普通的小县城，在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史上却有着其特殊的地位。从1995年至今，迁西县妇女法律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通过“三级网络”的依法维权工作形成了一个为妇女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特色模式：县级有中心，乡级有法律服务工作站（维权站），村有妇女主任、妇女代表和民调员组成的妇女维权联防小组，这种模式被河北省妇女联合会誉为“迁西模式”。中心见证了中国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尤其是农村民间法律援助组织的艰难成长，也记录了与其一起成长的每个组织、每个人的心血。迁西的法律援助取得的成就让世人瞩目，如今许多的人去那里取经。

中心的成立要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1994年，迁西县被确定为“妇女法实施中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试点县。陈老师作为妇女法领域的专家，和她的同事们就妇女法贯彻中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宣传贯彻妇女法、让广大妇女自觉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等问题到迁西县进行调研，迁西县妇联为项目承担单位。但陈老师等专家学者、妇女活动家、司法部门实际工作者和迁西县妇联并没有把项目工作仅仅作为一个科研项目、或一项任务，而是作为探索、促进妇联妇女维权工作的一个转折点来对待。

当年迁西是一个美丽却贫困的小山城，“七山二水分半田，半分道路和庄园”就是对当地的真实写照。陈老师感慨说，虽然自然条件艰苦，但当时的工作氛围是很好的。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在那个连提及“家庭暴力”都有忌讳的年代，一个基层的妇联组织却有那么开放的心态。她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集体，敢于揭示、正视问题，敢于解决问题，富有创新精神、充满活力。

1995年12月，在县妇联积极协调，多方求助下，经省市司法行政部门批准，迁西县妇女法律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汇集了几位专职律师和法律工作者。陈教授从那时起开始担任中心的顾问，直至今日。当时中心成立的宗旨就是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和帮助，为她们维权。

中心成立不久的一天，一个农村妇女到中心，一进门就哭着说：“你们能不能教育教育我丈夫？”大家说：“你别哭，慢慢说。”她就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丈夫不要天天打我……哪怕三天打我一次都行……”

当时陈老师也在场，她马上联想到中国的一个充满歧视的俗语：“老婆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每每谈起这个事，她眼睛里满是痛惜，同时也闪烁着坚毅的光芒，她对我们说：“这件事更坚定了我做妇女维权这项事业的决心，我们做反家暴是做对了，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上述事实暴露了社会错误的观念对妇女的压迫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妇女被打后反而自责、自贱，不自信、没有权利意识，说明男尊女卑的思想已深入到人们心底，包括妇女的骨髓和血液里。因此，全社会，包括我们，必须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给妇女以资源——她们没有资源，以至于觉得受压迫是应该的。只有给她们资源，增权，提高其权利意识，才能使妇女有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和力量，妇女才能自强、自信。”

中心成立后工作面临的困难很多，主要是来自社会各界和老百姓错误的，但是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认为夫妻之间的事情外人不要管，男人就是家长……很多妇女也认为自家男人打她是自家的事，外人不该管。

于是中心要做的工作首先是宣传、教育。她们到集市去宣传，她们深入农家作一对一访谈……当地百姓逐渐从最初的怀疑甚至抵触到后来的接纳和认同，最后形成一种具有权利意识的法律氛围。这是一种观念的播种，也是一项制度的成长，成长的过程凝结了陈老师和她的迁西县的同事们的心血。

中心一直都开有“离婚课堂”，到这里来离婚的夫妇，要接受法律教育，告诉妇女有什么权益，如何争取自己的权益；告诉当事人如何尊重对方，如何“经营”婚姻。通过这样的教育，改变了以前离婚案件中妇女总是处于“被动”的或者“被抛弃的”的地位，妇女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益有哪些。加上有专门的机构为她们提供咨询，县法院又设立了专门的妇女维权合议庭……陈老师说：“这是一个例子，这说明我们做对了。”

和当地政府部门的配合也是中心面临的重要工作。中心尽量和当地政府和司法部门合作，尊重他们的工作，但是在某些触及

原则的问题上是一步都不会退的。实际上，中心充分利用了现有的政府组织资源：公检法司治安综合治理网络和全国各级妇联六级网络。结合这两个网络，形成了一个从县级到乡级再到村级的依法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网络。乡级和村级都由3个人组成，妇联牵头，司法所和派出所都有人参与。这个网络给妇女维权案件和需要法律代理的案件的发现和解决提供了一个畅快高效的通道。一般教育、调解问题村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报到乡的维权站；乡维权站不能处理的报到县里的中心。中心还负责对下级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社会性别、社工理念培训，以及到各乡镇集市宣传等。

当地法院设专门的妇女维权合议庭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关于妇女维权的典型案例，或虽不是很典型，但是对于妇女维权很重要的案子，都到这个专设的妇女维权合议庭开庭，这样就给来这里求助的人提供了便利和更有效的帮助；另外，法官经过培训也有维护妇女权益的社会性别观念。这是法律实践中一项让人欣喜的创举。

在“迁西模式”中，有很丰富的内容，比如妇女土地权项目、妇女选举、妇女维权……做这些的同时，妇女地位提高了，妇女的法律意识也提高了，于是慢慢地，妇女依法维权的环境也形成了。这就是迁西县的对妇女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一种模式，实践证明它是成功的。

“‘迁西模式’到不同的地方会有新的内容注入。所谓‘迁西模式’，是维护妇女权益、为妇女增权的一种理念、工作方式；‘迁西模式’值得推广的核心是她的社会性别、为妇女增权和形成依法维权的法律环境的这么一种观念，以及因地制宜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网络形式、条件为妇女维权的工作方法；是迁西县妇联和中心全体成员在维护妇女人权的法律实践中的一种‘创举’！”陈老师说。迁西现在已经形成了妇女依法维权的环境，有一套机制来保障妇女权益，今天，这个模式不仅在河北省推广，在很多地方都在积极实践。现在全国各级妇联都有法律援助机构，并已经纳入到司法部门法律援助的体系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迁西县妇女法律服务中心的创建、坚持、发展，是有贡献的。

为了妇女的和平生活，让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工作

在从事反对家庭暴力事业的同时，陈老师还不忘自己的法学研究工作。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成立“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已经从法学所退休的陈老师又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在陈老师及中心核心成员的组织与协调下，中心开展了社会性别与法律理论和行动研究课题，参与了婚姻法、妇女法等法律的修改工作。陈老师说：“反对家庭暴力项目开展后，随着项目的深入，我们受到越来越多的刺激、教育和启发，发现：必须解决法律领域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和社会性别主流化问题；必须从事性别与法律的研究。无论多么艰巨，我们这些搞法学研究的必须为其尽力啊。”

老前辈了，陈老师见证了反对家庭暴力事业在中国发展的全过程。回首过去，陈老师也说了：“困难还是有的。”比如说在刚开始做反对家庭暴力项目的时候，大伙儿想做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基于性别的暴力”，但在当时太敏感了，所以最后决定做“家庭暴力”。因为用“家庭”这个名字去做，社会相对好接受一些。又如反对家庭暴力事业必须有公、检、法、司参与，而公、检、法、司人员参加、介入需要接受社会性别培训，但是他们很忙啊，想要组织他们参与培训，是比较困难的。反对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职责，尤其是政府的职责，但是要让官员有社会性别意识，进行社会性别培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陈老师和她的伙伴们就从基层开始，从城市社区和农村试点开始做，慢慢就形成了有规模的多领域、多部门、多机构合作的模式，这样再一点点往上做。“我们就采取这种策略来克服这些困难，我们不是没有困难。”陈老师说。在反对家庭暴力网络运行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自己人员的时间控制问题。因为大都是兼职，本职工作已经很忙了，全职人员前3年只有两个人，现在是4、5个人，因此大家经常工作到很晚，很多业余时间、周末都被利用了。

但是，陈老师心里是充满喜悦和希望的。“我衷心地感谢所有从事这一伟大事业的每一位同仁，我从同仁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志愿者的奉献精神，看到了各位为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实现性别平等而努力工作的忘我精神、民主精神。多年来，我和大家一起

经历了反对家庭暴力事业从星星之火到蓬勃发展的全过程和反对家庭暴力干预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的创建和发展，也与大家一起分享了事业进行过程中的艰辛和甘甜，和事业一起成长。想当初被认为十分敏感的家庭暴力问题，如今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并写进了法律。反对家庭暴力的工作已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我们正在一步步迈向我们的目标。”

不了解陈老师的人可能会问，拥有很好的工作和美满的家庭的法学教授干吗要从事这一辛苦的事业？尤其是和这么多的基层妇女走在一条战线上。陈老师不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位普通妇女，和所有基层妇女没有什么差别，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为了妇女的和平生活包括自己的来工作的。只不过我受到的教育多一些，我得到的资源多一些，或者说我负有更重要、不，应该是更重的责任。其他的我觉得我和她们没有区别。我们都一样，都是在争取妇女的和平、妇女的解放、性别的平等，在做着同样一个事业和一样的工作。我并不比她们的贡献更大，只不过是不同的角色。”

采访结束后，我们问了陈老师是怎样理解和平的。陈老师说：“我对和平的理解是非常广泛的。我理解的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或者是不打妇女了。和平应该是人们相互尊重，没有歧视。我觉得和平是一种氛围，是一种境界，和平是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理想和实践，我想我是个和平主义者。我觉得理想的社会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每个人都享有自由，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能够愿意并努力做自己的事，但是人人都不要妨碍别人。人人都应有一个平和、和平的心，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同时又享受自己应该享受的一部分。我60岁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模式，我大半辈子的大部分时间坐在书斋里搞研究，书本里来、书本里去，都在书本里，我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有人看，但是我想我60岁以后要做一些真正和群众接触的工作，将法学理论真正与实践结合起来，我选择了妇女人权、反家暴等项目工作。把自己的法律知识贡献给群众。法律是什么，法律最终是为了人人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我要为自己的这个理想去做一些实际的事。因此从那以后我做了一些实证研究，这些工作如果

真能对政策的改变、对妇女的增权、每一个劳动者的增权、对促进性别平等的事业添上一块砖、半片瓦的话，我会感到很幸福，那就是向世界和平前进一步，那就是我的理想。”

陈老师说：“在研讨消除暴力的理论对策和消除暴力的实践过程中，没有哪一个团体或哪一个部门、组织可以独立完成，协调与合作是最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消除性别暴力，为了给妇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为了促进性别平等事业，为了家庭的幸福，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让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工作。”

第二部分

绿色生命



— 营造绿洲

牛玉琴
沙海琴声



文：张冬青

那林子里每一棵树都像是我的儿女，看见它们长得壮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就高兴。照管儿女哪管挣钱赔钱啊。

祖辈人告诉过她，靖边人以树为旗，以树为碑，对未来幸福的渴望和对绿色的希冀是靖边人永远的动力。

“毛乌素”，蒙语是“不好的水”。毛乌素沙漠，在陕西榆林和内蒙古伊克昭盟之间，面积4.22万平方公里，万里长城从东到西穿过沙漠南缘，在任何一幅中国地图人们都无法忽略它的存在。但它并不是没有水，其常年平均降水量仍在250-400多毫米之间，从地理学角度来看，自然形成沙漠的条件并不充分。古时这里水草肥美，风光宜人，是很好的牧场。后来由于气候变迁和战乱，地面植被丧失殆尽，就地起沙，形成沙漠。毛乌素沙漠，是人类1,000多年破坏了生态平衡制造出来的一个“人造荒漠”。

靖边位于榆林地区西部，其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相邻。历史上著名的无定河横贯该县东西。大漠为邻，黄沙侵袭，这里以环境险恶、生态恶劣而闻名全国。

牛玉琴，陕西省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农民，1985年开始种树治沙，如今已经整整20年了，她因治理11万亩毛乌素沙漠而闻名中国。

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用自己单薄的身体努力扭转着先辈错误的足迹，用自己的行动，用她营造出的沙漠绿洲，演奏出了茫茫沙海中最动人的乐章。

她因此被评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荣获联合国拉奥博士奖，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女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十大绿化标兵、全国十大农民女状元。

在万亩荒沙上 植树种草

牛玉琴的家就在毛乌素沙漠边上。“土细沙明色复黄，随时起风积成梁，远望千里无根草，只有马蹄三两行。”牛玉琴如此形容当年她家周围的情形。

1966年，由双方父母包办，牛玉琴从陕西定边县嫁给沙漠边上的金鸡沙十队张加旺。

牛玉琴面对的是村里最困难的人家，队里分的粮经常不够吃，多数时候得向别人借粮。牛玉琴没上过学，可身体非常结实，生产队劳动女人挣工分通常是7分，她却和男人一样挣10分。张加旺身体虽不如牛玉琴好，可上过一年初级中学，是村里的秀才。

1980年，农村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牛玉琴家分到30多亩地。全家人苦干了一年，各种粮食共收了几千斤，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1982年牛玉琴和丈夫商量，买来了40只羊，在沙窝窝里盖了一间房子，让公公、婆婆和大儿子赶上羊住进沙窝里。为了让孩子放羊有个纳凉的地方，两口子就试栽了几棵果树，结果都活了。他们因此想在沙窝里多栽些树，只是没有树苗，也没有钱。

1984年，随着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承包荒沙的热潮在靖边广为推行。

牛玉琴说：“当时没想到靠种树能挣多少钱，也没想到今天能

种这么多，就只是想将沙挡住，人能住、庄稼能活。”

这一挡就挡了20年。

这次植树种草高潮带着时代的印痕：“林业承包”。金鸡沙村正好在毛乌素沙地边缘，整天被黄沙的舌头舔着，由于“沙进人退”，植被被破坏、土地逐渐沙化，庄稼种下去没什么收成，屋子总是被风沙掩埋。国家鼓励农民植树治沙，“谁承包谁所有”。

想办法富裕起来的念头撩拨着每一个金鸡沙村人的心。

牛玉琴忘不了自己下决心的那一天。

当和她身边的人谈起那些往事时，人们都以不可理解的口吻追忆那时张家人的激情和勇气：

村党支部给村民宣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后，牛玉琴两口子立马召集左邻右舍，打算联产承包万亩荒沙地种草种树。

但周围人谁也不肯包。人们说：“万一政策变了，工夫就白费了。别人不干，他俩的计划就成了泡影。可他们不死心：“别人不干，我们一家子干。”他俩把想法告诉几位亲朋好友。得到回答是：“你们真傻！那千年不耕的干沙地，栽不活一棵树；就是栽活成材，你光凭一张小小的纸片就能保证归你所有吗？我看你们是没事找事，到头来鸡飞蛋打一场空，还少不了戴一顶什么帽子！”

亲朋好友的告诫不得不认真考虑。

只读过一年书的牛玉琴也许不知道“富”字该怎样写，但她明白，“富”是可以给她带来希望的。

她想着想着那关于林业承包的“道道”和“杠杠”，朦朦胧胧地感到，那个巴望已久的东西就在眼前了。

晚上，全家人都睡下了。牛玉琴边纳鞋底，边看着一间屋子半间炕，老少挤在一起的情景，看着盖在儿子身上那放羊时披的翻了花的破皮袄，一年到头，全家人顿顿是掺和着洋芋块的黄米饭。她在想：“人家能富，咱咋就不成，咱就该命这么穷？”心绪难以平静的牛玉琴推醒丈夫，其实丈夫张加旺也没睡着，牛玉琴和丈夫反复思考后认为：“承包荒沙造林种草，是件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也是件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大事。就是政策有什么变化，又会把我们怎样呢。”两口子下了决心：把村北1万亩荒沙包下来，栽树种草，防风固沙，日后也能有笔收入。

“人家替咱计算过咧，10年后，那林子能赚回100万元哩。”

夫妇俩越合计心里越热乎，“不就是种树嘛，不就是出力，流汗，多跑路嘛。只要能摘掉穷帽子，就是憋死骡子挣死马，咱也干！”

1985年元月，张加旺夫妇和村里以及乡里签订了万亩沙地承包合同，年限15年。怕今后出民事纠纷，还去县城公证处做了公证。

签订合同后，他俩做了认真的规划：将万亩沙地规划为3个治理区域，根据不同的区域，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法，大沙地以沙蒿、沙芥为主，自然覆盖区以柠条为主，小沙地带以种植杨树、榆树和沙柳为主。

1985年的乡三千会^①，领导要求张加旺两口子在大会上表态。他俩提出“一年覆盖，三年补齐，五年初见成效”的口号。

会后，全乡有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俩吹牛不拉牛屎巴。也有人夸他俩胆大能干。这些话有人当他们面说。牛玉琴一家人没有太多话说，但认准了一条：沙一定要治，说话要算数！

就这样，牛玉琴和张加旺带着淳朴的希冀和满腔热望，把自己的命运和万亩荒沙拴在了一起。

说着容易做着难，牛玉琴一家付出的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一没有资金，二没有技术，三缺劳力。

最头痛的是缺资金。一年之计在于春。如果事先不把树苗准备好，一耽误就是一年，计划就会落空了。一家人省吃俭用，把家里能卖钱的东西全卖了。经过多方努力，他们总算凑集了2,500多元钱。光这点钱怎么够呢？他们又向乡信用社贷了4,000元，同时贷了私人的500元。这时，县林业局为他们送来了1,000斤草籽和3万株榆树苗，于是，实现一年覆盖有了坚实的基础。

劳力也是一个大问题。牛玉琴以每天每人3元钱雇了16个帮工，又动员老幼病残共5个人。每天鸡叫时，他们一家三代7口人，一齐出动。张加旺担心地对妻子说：“你要照看老人，还要进沙地劳动，能行吗？”她说：“你放心吧。人家愚公还搬山呢，咱

^① 每年的2、3月间，大部分县乡在召开本级人代会后，紧接着召开由三级干部参加的会议，简称“三千会”，一般由县、乡、村三级主要领导参加。

们治沙造林比愚公省事得多了。”

他们植树也实行责任制。她承包的沙区离家有十多里远，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去工地，天擦黑才能回来。去时每个人得背上百十斤重的树苗。这些树苗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每棵树的根须上都用胶泥糊上，可以保墒。人手不够，他们又雇了16个劳力。分10个小组，每组两人，定时间，定任务，还组织专人一株一株地检查，不行的当时就返工。运树苗遇到了个大困难，牛玉琴就以每天每辆6元钱雇了5个架子车。她和大儿子连背带拉着。车空走一趟都够钱，再背上几十斤树苗谁能受得了？而在干沙梁上栽树，掀起铁锨就是半坑沙。

就这样，牛玉琴一行人早上吃饭满天星，晚上吃饭星满天，坚持了40多天，拿下了春季造林任务。

当第一批树苗和草籽“摆”进沙地里时，牛玉琴的家已是债台高筑了。

春季，沙漠里特有的大风暴又来了，一夜间，6,000亩幼林被刮得东倒西歪，许多树被连根拔起。看着这幅惨状，牛玉琴几天说不出一句话。咋办？补！她和一家老少把铺盖搬到林地里临时搭起的窝棚中，和帮工们一起没日没夜地趴在沙窝里，扒坑、扶苗、培沙，膝盖磨破了，10个手指裂开了一道道渗血的口子……硬是把树苗一棵一棵地补齐了。一个月后，4万株杨树，3万株榆树和几千株沙柳重新笔直地挺立在那片荒沙之上。

牛玉琴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不仅仅是自然的，有些来自人为。甚至有人说她承包万亩林是为骗取造林投资款。树种上了，有的人放羊群啃她的树苗，有的人故意利用地界纠纷为难她，在村里孤立她。牛玉琴担心树苗被乱窜的牲畜啃坏，担心有人把树苗当柴砍了，她终日奔波在林子里，不时地吆喝着，鞋子走烂了，嗓子喊哑了……她不知道到底要付出多少，只有一个信念，要在沙漠里建造绿色家园。

正当他们向荒山开进时，张加旺突然因小腿肿瘤，住进了医院做手术。

医院里要人伺候，家里栽树人手又紧，牛玉琴没办法，只好让12岁的二儿子退学去医院伺候他爸爸。当时一个手术就做了5个多小时，病人昏迷不醒。儿子怕得整天地哭。

牛玉琴每天4点起床，大儿子带着工具进沙漠后，她步行到镇上，6点坐车到县医院，把药买好，挂上输液瓶。9点她从县城坐车回镇上，再走回家，这时已12点了。

常言道：祸不单行。牛玉琴做梦也没想到丈夫还没出院，自己又因得了阑尾炎住进医院。这一下家里老的哭来小的叫，乱成一窝蜂。牛玉琴人在医院，心想治沙。不顾医生的再三劝告，与丈夫一起学打针。在大夫的辅导下，他们俩学会了打针随后就带药提前出院。每天，夫妻俩互相打针，牛玉琴进沙地劳动。张加旺因不能出门干活，就在家出主意。牛玉琴就在他的指点下，一边干一边学。

牛玉琴感觉不到疲劳，心里只想栽树，只想怎么栽活为好。她用歪歪扭扭的字在小笔记本上写着：杨树3,000亩、榆树300亩、柳树240亩、沙柳1,900亩、沙蒿2,400亩、沙打旺1,400亩、柠条650亩、沙米、沙芡共1,800亩……

小草拱出了沙地，嫩芽挂上了树梢。牛玉琴看着眼前这片充满勃勃生机的绿色，觉得仿佛自己的梦想明天就会变成现实。

然而，她哪里想到，愉悦竟是这样短暂。

张加旺的肿瘤恶化了。在短短的3年里做了7次手术，住了9次医院，前后花了7,000多元钱。但是他住院如坐监，每次住院，都急着要回家栽树。1987年，肿瘤向全身扩散，为了保全性命牛玉琴就送他去银川医院诊治，锯掉了左腿。

从银川市回家时，牛玉琴呆呆地坐在寒风飕飕的车厢里，眼前一片空白。她不知该怎么办。加旺劝她说：“别想那么多了，病来不由人，会慢慢好的。我锯掉了一条腿也要栽树。”一进门，一家人都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儿媳妇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叫公公给取个名字。加旺说：“我们子孙后代都要治沙造林绿化祖国，孩子就叫张继林吧。”

牛玉琴至今仍然记得那里的情景：“1988年，造林的最后一天是农历三月初二，加旺信心百倍，从林地里走回家。上沙梁时，他把拐杖先扔上去，然后往上爬；下沙梁时他抱着拐杖往下滚，就这样走回家。”

然而，当一万亩荒沙才盖上一半绿荫时，1988年5月17日，张加旺撒手离世而去。

19年的夫妻生活就这样结束了。牛玉琴深情地回忆说：“我们没吵过嘴，有事一起商议。我提出的建议也好，他提出的也好，只要可行，就采纳。”牛玉琴忘不了，丈夫只要稍有好转，就立即回到她身边，拄着拐杖，帮她扶树苗，出主意……

牛玉琴把丈夫掩埋在沙漠里，滴滴眼泪化作一棵棵新栽树苗的养分。“黄是沙，绿是树，树落叶，人落泪”。

1989年清明节，县林业局为了鼓励牛玉琴，推动治理荒沙的工作进一步开展，给张加旺立了治沙模范碑，还给牛玉琴送来一万株杨树苗、一些杨树条和沙柳。

牛玉琴一边要拼命地种玉米、种菜、养羊作为养家糊口和种树治沙的经济来源，一边还要拼命地在沙窝里种树。有人曾劝她：“把林子卖了吧，全家过几天安稳日子。”牛玉琴摇摇头：“这可是为子孙造福的事，加旺不在了，娃娃们还活着咧。”她更坚定植树造林的信念。

西部大开发 造福子孙

社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承认她的努力与坚持。

她当选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女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十大绿化标兵、全国十大农民女状元。

1993年10月15日，在曼谷金碧辉煌的泰王宫，做为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牛玉琴从泰国诗琳通公主手中接过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拉奥博士奖”。该奖授予那些在改造人类生态环境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这一年，全世界只有3人获此荣誉。

1998年3月，牛玉琴承包了内蒙古的一万亩荒沙地进行治理。一家人经过商议，征求了各界人士的意见后，决定把它建成一个家庭农林牧场。她从自己和丈夫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命名这块荒地叫“加玉林场”，目前，1万亩荒沙经过治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牛玉琴还由东坑中学两千多名生龙活虎的学生，想到了伊当弯村7万亩没人治理的荒沙，她想：“能不能动员学生去治沙，学生治沙，不仅仅能治沙而且能很好地教育学生，从小就培养他们的生态意识，这不是两全齐美嘛？”牛玉琴的性格是想到就做到，而且要做好。她开始谈协议，写合同，做准备。现在，7万亩荒

沙得到了初步治理。

2000年3月12日晚，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记者采访时，牛玉琴骄傲地说：“西部大开发我先走了一步。”

她是先走了一步，而且，是常人所没有勇气和能力走的一步。而且，至今没有停止的念头。

2004年12月，一条长10.8公里的柏油马路从东坑镇铺到了牛玉琴所住的沙漠小村。这是牛玉琴2004年干得最大的一件事，也是通过多年治沙造林将沙漠逼退10公里后，圆的又一个梦。她还补栽了5,000多亩林地的树苗，引进了白绒山羊、小尾寒羊等新品种搞养殖。她要开始把林地的树种更换成常绿树种，让毛乌素沙漠中的11万亩林地一年四季郁郁葱葱是她如今经常梦到的梦境。

牛玉琴已经是闻名全国的人物了，但她仍普通如常，经常是一脸汗水，衣服上印满汗渍地在林间劳作。如今，夫妇俩承包的万亩林场已全部栽齐，实际亩数是11,027亩。原先屋后是一眼望不见边的沙漠，现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20年来，牛玉琴一家有痛苦，也有欣慰；有艰辛，也有收获。每次走进自己和家人栽植的林地，看着一株株绿意盎然的树，牛玉琴如同看着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孩子，目光里充满了怜爱。人们走在其间，满耳灌进好听的风吹树叶哗哗响的声音，许多不知名的鸟儿在鸣啾啾。

牛玉琴是从一个小学都没有上过的农村妇女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环保模范人物的，社会需要她去影响更多的人。她的世界一天天变大，走出了金鸡沙村，走出了陕西省她才知道：自己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她拿出自己在沙漠种树的劲头，开始学习文化知识。

她一直记得，1986年，作为三八红旗手，县妇联主任带她去地区妇联开3天会。在街上，她分不清东南西北，到哪里去都得要人带着。报销路费时，工作人员请她签名，她既不知道在哪里签，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地区妇联主任当即要求一位工作人员立刻教会牛玉琴写自己的名字。末了还教她认“男”和“女”两字。因为她上厕所困难，得等有人出来或进去了才能判断是男厕还是女厕。

回到家里，牛玉琴对丈夫说：“你看我出去有多难，叫我写名

字都不会。”当晚，已锯了腿的加旺教妻子学文化。这点学习时间想挤出来也很不容易。牛玉琴除了劳动和家务外，还要为孩子做布鞋，为家人补衣裳、做衣裳。

牛玉琴拿出一本稿纸，上面有她学文化写的字，她说：“我从1985年开始自学，基本上是利用每年外出开会的时间学的。”

每年牛玉琴参加陕西省人代会。会议报告中很多字她都不认识。她就一句话一句话地背，背熟了，就写。会写了，再一个字一个字往后认。就这么一点一点地啃，每次会议，她识的字都能增加不少。

“沙区人苦，苦在有沙；沙区人穷，穷在没文化。”牛玉琴牢记着加旺临终前的叮咛：“等林子有了收入，先给咱村盖一所小学，好让娃娃们都有书念。”

1992年，经历了长期砸锅卖铁买树苗的牛玉琴用林场和卖羊绒等收入的2万元在村里盖起了一所有8间校舍的小学。牛玉琴又从她和加旺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命名学校为“旺琴小学”，为的是纪念埋在黄沙里，一直陪伴着她植树造林的丈夫。方圆5里的60余名儿童终于可以就近适龄入学了。

1994年，香港杨志明先生通过西安国施投资5万元，由县教育局承办为旺琴小学又修了9间楼式校舍，使村里更多的孩子能就近上学。1994年她还担任了镇办中学——东坑中学名誉校长，并为中学争取到一笔国外工程资金75万元，建起了一幢教学楼。

牛玉琴始终没有忘记办学初衷，她说：“我没文化，1988年推荐我为省劳模的时候，省里奖励我科学种田的书，我都看不懂。我想，我看不懂的书，要让下一代看懂，就这样办起了学校。我省吃俭用供儿子读书，儿子现在已经从林业大学毕业了。他是专学林业科技的，搞治沙研究，他能接我的班了。”

树木吐线 人进沙退

站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中，站在昏天黑地的风沙和烈日的烧灼中，人们看到一双双粗糙的手，一张张沟壑纵横的脸、牛羊般的眼神、平和的笑容，这一切都在十分平静中令都市过来的人们震撼。

在这样的景观面前人们感到的是自己的渺小，也就感受着牛

玉琴的伟大。

她那血肉构成的生命在默默的劳作之中一点一点地被耗噬着，她用自己女性瘦弱的肩膀支撑起家庭的重担，赡养老人，拉扯年幼的孩子，忍受着沙漠带给她的孤独与寂寞。但是一片又一片的绿荫在她手里扩大延伸着，大沙漠在一个女人脚下一步步向后退却。

她用自己的生命创造出来了奇迹。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随之出现：治沙使牛玉琴得到了国家和陕西省的各种荣誉，却同时使她在经济上陷入了越治沙越穷困的境地。

如今，这里是树木吐绿，人进沙退。当地村民们知道，如果没有牛玉琴二十年如一日治理黄沙，就没有村民们今天的好日子。

但是他们却无法减轻牛玉琴为治沙举债 300 万元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

牛玉琴谈起植树治沙兴致盎然，然而当说起扩大发展，她却感到阵阵心痛。这位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治沙劳模发出疑问：啥时我的“生态存折”能够取出钱来？

“我一家人从 1985 年开始治沙，3 年后男人累死了，我把他埋在沙里，带着孩子继续种树。到现在共治理沙漠 11 万亩，林草覆盖率达到 60% 以上。如今荒漠变绿了，家里却背上几十万元的欠款。”牛玉琴感慨万千。

她在承包的荒沙治理区内植树 1, 800 多万株，硬是将风沙逼退 10 公里，使林草覆盖率达到 40% 以上，流沙基本得到固定，荒沙变成了绿洲，并开发出一片耕地。

目前，牛玉琴依托沙地林子成立了靖边县绿源治沙责任有限公司，搞起治沙养殖业，但每年养殖的微薄利润却不够偿还债务的利息。牛玉琴陷入了困境，可她不能后退，她苦苦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她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卖掉了牲畜，甚至用鸡蛋换树苗；向亲戚朋友借、向银行贷款，高额利息使她一贫如洗、债台高筑。

牛玉琴说：“平时大伙儿都说我富，因为我有价值几百万元的林子。但这林子却当不了‘生态存折’，变不了现。快 20 年了，有的树已经成材，儿子结婚要砍几棵用，跑了一个部门又一个部门，都说国家有政策，生态林一棵也不能砍。从大道理上讲，我

也懂。但不能砍树，国家、地方政府能不能花钱把我的林子买下来，或让有钱愿买的个人、公司买，让我也享受到‘生态银行’的实惠？”

“我开公司不是为了赚钱，有了公司别人才能放心地给我种树投资呀。治沙挣不了钱。为了种树我还欠着30多万的债呢。每年过年都得上外头躲债去。”

“我们家的生活挺清苦。有人说我傻，净干往里头赔钱的事儿。可他们不明白，那林子里每一棵树都像是我的儿女，看见它们长得壮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就高兴。照管儿女哪管挣钱赔钱啊。可是，我还希望自己能更大治理沙漠能力，而这，没有投资是做不到的。我到哪儿找这个投资来？”

据媒体报道，目前，在全国沙漠治理中，个人造林的比重逐渐加大。三北防护林工程几乎成了以个人造林为主体的一个工程。然而个人造林越多，亏损越大，而他们搞的却是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生态工程。

在陕北，有许多像牛玉琴这样干了十几年的治沙大户现在都成了“特困户”：陕西省承包荒沙造林第一人石光银造林6万亩，评估价3,000多万元，可他却卖掉了几乎全部家当，欠账最多时有300万元；承包上千亩山地造林的刘世杰，投入了数百万元，现在四处躲债……这样的植树英雄还有许多，他们用自己的血汗织就了沙漠边的一片片绿色云锦，使沙海变林海的神话成为现实。

牛玉琴们的境遇，让许多人深思：他们把一切都投入到治理沙漠上，改善了生态环境，具备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再想进一步在沙地上得到回报，增加收入，只有贷款投资，结果不但很难收回成本，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吃了一个又一个“哑巴亏”。

治沙造林大户贴的是自己的钱，干的是生态建设的公益事业。社会是否应该让这些治沙劳模在敢为人先，在社会作出突出贡献之后，自己却陷入困境，生产生活难以维持？

以树为旗 以树为碑

走在曾经的沙海如今的林海里，人们不禁感叹：十年树木，十多年后树木竟有这么高大，十多年后绿色竟能遍及如此广阔的地方，而所有这一切，竟都和“牛玉琴”这3个字连在一块！

人们怎么能不敬重她顽强的意志？怎么能不敬重她的无私和奉献及无限的渴望？怎么能不敬重她十几年来始终劳作不辍，创造出的奇迹？

风沙每年都在吞噬着我们本来就不宽裕的土地，许多人还在懵懂之中沉睡，可是先知先觉的牛玉琴和她周围的人们，却已经在最前沿与沙漠搏斗。她坚持着，顽强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跟在牛玉琴身后，会发现，她走路时腰间常常“叮当”作响，那是30多年前，丈夫和她一起放羊时，送给她的铜铃铛，亮闪闪，发着金光。

但是，如今，牛玉琴已不是30年前学着祖辈的样子，只知沙底汲水、沙里刨食的陕北婆姨了。她筹划着要在村里建水塔，拉高压线，要盖起新住宅，要修通到林地的道路，要办柳编厂、木材加工厂……还要使旺琴小学成为当地条件最好、教育质量最高的小学。

过去大字不识一个的牛玉琴经过多年的学习，如今用她自己的话说，已经算小学毕业生了。政府工作报告、“两院”报告基本可以读懂了，一些简单的东西也可以自己动手写。牛玉琴还自己动笔向上级部门写申请报告。

她自己动笔写讲稿，在几百乃至上千人的大会上，讲述她那绿色家园的事情……

她说，我和加旺，和老人、娃娃们创建下的林地，在毛乌素沙漠上不过是沧海一粟。有人问我，今后咋打算，我说，我后半辈子还要种树，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让毛乌素沙漠全都披上绿装。

2004年元旦后，她用儿子张立强一年的工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在家里就可以上网，也可以得到更多关于治沙造林的信息。她说，自己是一张铁锹、一辆架子车治理沙漠，下一代要机械化、科学化治理才能加快治理的速度。

牛玉琴的视线现在已很宽广了。

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牛玉琴还向全国人代会提交了“加大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力度”、“加强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头区林业生态建设保护”、“将退耕还林工程坚持不懈地搞下去”等方面的建议。

祖辈人告诉过她，靖边人以树为旗，以树为碑，对未来幸福

的渴望和对绿色的希冀是靖边人永远的动力。现在，在牛玉琴身后，一支支绿化大军在靖边大地活跃着，一支支靠信念和希望而顽强战斗的植树队伍布满了毛乌素的山梁沟壑……



殷玉珍
走进沙漠造绿洲

文：寇延丁

不能让我的孩子像我们这样在漫天风沙里提心吊胆地活着，我要让我的孩子活得有做人的尊严、有做人的快乐，能够活得幸福。

生在沙漠里，不仅有苦有涩，日子照样也有甘甜。等到能和孩子坐在屋子里吃西瓜的时候，我们屋外不再有风沙了，周围十几里都长起了树，风一起，送来的都是树叶哗啦啦啦的声响。

我觉得自己没那么伟大，我不过就是被命运抛到了这个地方，最初只想在这里活下来，活得像个人的样子，活下来了，又想活得好，活得快乐。

我文化水平低，虽说上到小学三年级，但那是“文革”期间不怎么上课，识字都不多，说了不怕人笑话，恐怕连自己的荣誉都认不全，就拣主要的说吧，有全国劳模、十大女杰和“三、八”红旗手。得到这些荣誉，都是因为我治沙效果好、面积大，林业部

门来测量过，我治沙面积总共达到了7万亩。这些年得到的荣誉确实不少，有我们乌审旗的，也有鄂尔多斯市的，还有内蒙古自治区的，有全国的，有的我都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像那个“防沙治沙标兵”我能懂，“双学双比标兵”我就不明白了，这一次北京的人跟我联系说要推荐我诺贝尔和平奖，我就问别人这个奖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个外国人的奖，跟世界和平有关系，就更让人糊涂了，我不过是在沙漠里种种树啊，又没打仗、谈判什么的，怎么就跟和平扯上关系了呢？

我叫殷玉珍，今年40岁，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河南乡尔林川村的农民，我住的这个地方离村子还远着呢，隔着20多里路，这里是毛乌素沙漠的无人区，连个名字都没有。现在大家都叫这里井背塘，这个名字还是我起的，我一出去，别人问我住在哪里，我就说是“警备塘”，为啥这么说呢？多少年来沙漠里就我们一户人家，周围几十公里没人烟，没有人，也没有电，一到晚上就害怕，警备着，我就叫这里警备塘。别人就当成了井背塘，现在修通了公路，公路的指示牌上就写着井背塘，大家也都这么叫，其实都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我是陕西靖边东坑镇的人，虽然在家里也是当农民，可是我们家跟这里太不一样了，比起来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的村子就在镇上，一个村子里住着上千口人，房前屋后是菜地，想吃什么菜就去地里拔，路边种着杨树、柳树，风一吹哗啦啦地响，村外的玉米地一眼看不到边，到秋天收回来的玉米金灿灿的挂得满院都是，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天底下还有“沙漠”这种地方。

走进沙漠里去

是父亲给我定下了对象，说他叫白万祥，是个好人。我是20岁的时候嫁过来的，1985年正月，他牵着一头骡子去陕西迎娶我，把我接到了这里。

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看他模样周正，父亲也说他是个老实人，我稀里糊涂地跟他一起上了路。如果说我对“爱情”有什么向往的话，应该是一场婚礼。我期待着，等到了地方，能坐着花轿被人抬到他的院子里，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在随后的日

子里，两个人一起下地干活，生儿育女，柴米油盐地过日子。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什么也不知道，只是跟着他走。走过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走过一片又一片还没返青的土地，我跟着他一直走，一直走，走着走着路边就没有村子了，再走也看不到地了，脚下的路越来越窄，最后连路都没有了，一脚下去沙陷到人的脚脖子，我第一次见到了什么是沙漠。

我跟在他后头走，本以为走出这片沙漠就能到村子里去了，没想到他就在沙窝里站下，告诉我：到家了。

他说的“家”就是一个齐腰高的窝棚，爬着才能进去，里面什么家什都没有，我问他住在哪，他指指窝棚地下的一堆草，那就是他的床。我蹲在窝棚里看了一圈，没见到盛米盛面的东西，问他吃什么，他说可以采些草籽，我看看外边一片黄沙，连草都没有，哪来的草籽，他被我逼问不过才告诉我，要到20几里外的村子里，去讨吃。万一能在村外的垃圾场捡到扔下的死羊、死狗就成了改善生活，剥下的皮子还要用来做皮袄。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这样活着，还不如去死。

我想去寻死，可这里除了黄沙就是黄沙，连棵上吊的树都找不到。我跑到窝棚前的沙梁上哭了整整七天七夜，七天七夜，没吃没喝，一直跪在那里哭。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我有一副好嗓子，这七天哭下来，生生把我的嗓子哭劈了，这一场痛哭就成了我的婚礼啊。

想在沙漠里活下来比死还难，可我天生就是一个倔脾气，不管再难，活，就得活出一个人样来。

人不能总低着头过日子，要直起腰来住在像样的房子里。

没有钱，没有人帮忙，可我们年轻力壮，有自己的两只手，托坯、备料，第二年在沙漠里盖起了3间土坯房，不用再弯着腰钻窝棚了。

人有两只手，伸手向下在土里刨，累断了腰也不丢人，可要是抬起手掌跟别人讨吃就羞死人了，就是再难，我也要吃自己种出来的粮食。

听我父亲说，50年前，这里是水肥草美的好牧场，可惜“五十年代风吹草低见牛羊，六十年代滥垦乱牧闹开荒，70年代沙逼人退无处藏”。我想不出以前的样子，只知道这里不是个活人的地

方，风沙一起，天昏地暗，一场风过，流沙能把我们的棚子埋住，得顺着狗的声音才能找到家。

沙漠里苦啊，方圆几十里不见人烟，除了我们夫妻孤零零的影子，天地之间连个别的活物都见不着。那一回，整整40天，我们在沙梁上才远远看见有个人影子走过，等我们跑过去人早走远，只留下一串脚印，我们就找个东西把那人的脚印扣起来，不让风沙掩住了它，看着那人留下的脚印都觉得亲。

这里千不好万不好，可是井里有水，我相信只要有水，就能种出粮食来，可是一场风就种下的粮食都被捂在地里。不过，我把从娘家带来的两棵树苗种在井边，天天给它浇水，两棵树都活了下来，既然树能在这里活，那就种树吧。

在沙漠里种树太难了，有时候看着好像树也发芽了，可是一阵风过来，流沙能把它埋到树梢梢，要想真正种活一棵树要用3年。要先在风口固沙，头年春天，先在沙地里埋进柴草再种草籽，不然草籽在沙里根本留不住，一场风就被刮跑了。先种下沙蒿、沙蓬这些能活下来的草，等到秋天草长起来了，沙不再随风滚动了，10月份、11月份就可以插沙柳。第二年，等种下的沙柳活了，才敢再栽树苗，背洼地种灌木，高坡上栽树，还要跟上浇水、管理，栽活一棵树至少需要3年。

我丈夫是个好人，老实肯干，能吃苦，我们一起拼了命种树，真的是拼上性命在干，累到吐血。不干，在这个地方就活不下去，我认准了这个理：这辈子宁肯治沙累死，也不能让风沙给欺负死。

拼上了我们的性命干，孩子也跟着我们受罪。我的头一个孩子早产，生在种树的半道上，好在大人孩子都捡回了一条命。后来又累得早产了一次，那个孩子就没保住。1987年，在背树苗的时候，丈夫因为负重过大肺破损，从此再也不能干重活，他不能干了，我干。

那些年，我出的真正是牛马力，有的时候，连家里的牛都累趴下了，但我还挺着，因为我是一个母亲。老天爷让我活在这么一个地方，我怕。我怕出门在沙漠里迷路，怕这里黑惨惨的夜，怕大风叫起来鬼哭一样的声音，怕风沙捂死了我的庄稼，怕低下头来伸手讨吃，我怕死了这种日子，更怕让我的孩子也过这样的日子。

不能让我的孩子像我们这样在漫天风沙里提心吊胆地活着，我要让我的孩子活得有做人的尊严、有做人的快乐，能够活得幸福。

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在沙漠里生下了3个娃娃，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自己知道生不如死的滋味，不能让我的孩子们也这样活。我不仅要让我的孩子们吃饱、穿暖、住在像样的房子里，更重要的是，我和丈夫都不识字，吃够了没文化的苦，我要让孩子都能上学、成才、有文化。

要想培养娃娃，哪样都离不开钱，我们都是农民，什么技术都没有，我们能做的，就是拼命种树、种地，只有那样，才能挣到钱，才能让娃娃过上好日子，幸福的日子。

我们先在自己家周围种树，林子挡住了风沙就种粮食。树是沙漠里的宝，不光能挡住流沙，砍下来的枝叶还能喂羊，卖了羊换树苗，就能去更远的地方种树。一开始我们种树要靠买树苗，后来自己的树打了籽，又开始育苗。慢慢的，围着我们家的房子东西南北都种上了树，附近的沙漠种满了，就架上牛车装上草籽树苗到更远的地方去种，开始走5里，后来是10里、20里。



要说种树有多苦、有多难，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丈夫生生给累成了那样，我也浑身是病，有胃病，还有腰腿病。我的3个孩子都是在沙梁子上带大的，从小跟着我们一起种树。大儿子刚满月我就把他装到一个篮子里提着去种树，到了地头用件衣服把孩子盖好，我们就开始种树，沙漠那么大，无边无际地，我们种一行树就是2、3里地，一去半天，等我们回来，孩子已经哭背过

气去了。他3岁的时候，赶上一场大雨，本来下雨是好事，可孩子淋了雨一直发高烧，连续几天高烧不退，落下了肺病。我最小的女儿在沙梁上被太阳晒坏了，落下了皮肤过敏的毛病，不能见阳光，强光一照就满脸起泡。就算是这样，我们还得种树，只有种下了树，才有生路，才有希望。

我们的林子越来越大，家里的日子也慢慢发生着变化。我们在种树的同时，一直在往沙漠里运砖，光备料就用了3年，然后盖起了3间亮堂的大砖房。我们养牛、养羊、养鸡、养猪，除了种玉米我还种了果树，种了菜和西瓜。我这样拼了命往前奔，一开始丈夫也不理解，觉得本来已经够累了，再种这些东西，是自己给自己找累受，其实我多受点累不要紧，我希望一家人即使是在沙漠里，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的。后来日子长了，他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一是被我说服、带动了，更重要的是被生活说服了，谁不愿自己的日子过得好、过得有尊严、过得快乐呢？

我刚嫁过来的时候都是蹲在沙地里吃饭，这里满天风沙，我们碗里盛的是草籽，风把沙子刮到碗里，我们只能拌着沙子往下咽。现在好了，我们的娃娃不用遭那份罪了，他们可以安安稳稳坐在敞亮的屋子里吃西瓜。沙漠里长出来的西瓜格外的甜，我要让孩子们知道，就算生在沙漠里，不仅有苦有涩，日子照样也有甘甜。等到能和孩子坐在屋子里吃西瓜的时候，我们屋外不再有风沙了，周围十几里都长起了树，风一起，送来的都是树叶哗啦啦的声响。

孩子一个个长大了，我们最早种下的树已经成材，都能做盖房用的檩条了，我们又在正房对面盖了3间房子，除了厨房，还有一间库房，我们的粮食打得多了，原来的房子已经放不下。我们再不用害怕挨饿，害怕风沙了。

我们的林子也长了起来，还连成了片，绿油油的林子一眼望不到边。都说家有梧桐树招来金凤凰，林子一长起来，沙漠慢慢就变了样子。原来的沙漠里死沉沉的，除了风声，一点生气都没有，一出门疼得人脊梁骨发麻，现在好了，天上飞来了鸟，有麻雀、斑鸠、野鸡，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每天天不亮就叽叽喳喳地叫，热热闹闹的，有了这些生灵做伴，觉得天天都跟过节一样，我听它们叫声都是在叫“一、二、一，殷、玉、珍”；接

着林子里有了野兔、獾、狐狸，后来还看到了狼。

土窝窝里飞出金凤凰

本来我以为，我们的林子越来越大，娃娃们也都长大成人了，我们每年种树、种地、收获，日子就会永远这样过下去。可是，到了1998年冬天，巡查的时候，忽然发现我们的林子变样了，有人在我们的**大树里栽上了小树苗。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就去找人问，问过了才知道，现在国家在搞西部大开发，鼓励大家治理沙漠，谁治理谁所有，我种树的这块地，已经被卖给别人了，就连我住的地方，也已经成了别人的。我不明白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理，就去找那个人，人家说有合法手续，这块地已经被他承包了，要让我走。我走哪？我种下了这么多树让我走哪里？怎么走！我问是跟谁承包的，说是跟大队。

难道我在沙漠里这14年就白干了？难道我种的这些数不清的树就都成了别人的！

我开始到处去找人，找村里的、找大队，接着找乡里的、旗里的，一直找到鄂尔多斯市，找到林业部门，先是到处求人，求他们不理，只好找律师，打官司。

说起这件事，真是苦，比我种树的时候苦多了。种树的时候再苦、再难，都是洒一分汗水有一分收获，只要力气下到了，管好了，树就能活，日子就有希望。可到了城里办事不一样，尽管到处都是人，可我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尽管到处是路，可我就是不知道哪一条是我的活路。

但是，不管再难，人被逼到了这一步，不走不行。不管怎么说，我们两口子十几年心血都在这里了，还有我们未来的指望，那里是我们家，是我们的孩子的家。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理在那里，再苦再难也得争。

我找到了宣传部门，来了两个记者，他们跟着我到这里来一看才知道，这十几年里，谁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谁都不知道我们夫妻两个人，在这个没有路、没有电、甚至没有人烟的地方，硬是在沙漠里种出了几万**亩的绿洲。

这时候远远近近的人才知道了我，不光是旗里、乡里，包括

村子里的人，才第一次知道这里变了样，有些几十年前路过这里的人，再来一看，都说哎呀不得了了，山窝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呀，可是大变样了。

1999年，林业部门派人来测量我们治沙的面积，他们测量的结果是，当时的完全绿化面积是27300亩，加上初步治理和半治理的面积，我治理的沙漠一共是7万亩。

因为那一场官司，外界就知道我了，各种各样的媒体都来这里采访，荣誉也都来了，多得我都记不住，作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还受到温家宝总理的接见。

我也就算是成名了吧，其实，我在沙漠里种了十几年树，一直没过想过会有这样的结果。一开始种树，只是为了能够在这个地方活下去，和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太多的联系，如果不是别人侵占了我的企业，也许外界会永远都不知道我。

市里奖给我一辆拖拉机，给我通了电。我成了名人，这个地方也热闹起来，原来这里40、50天不见一个人影，现在那么多外界的人都来到我这里。有在这里一住两个月帮忙干活种树的，也有送钱送资料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么多人关心、帮助我。

我的家人一直都全力支持我，妈妈帮我带孩子，孩子一长到上学年龄就送到她那里去读书，大姐一家、二姐一家还有大外甥一家6口人都来到这里跟我一起干，做饭、放羊、放牛、护林、管苗圃、种地、种果树、种西瓜，我们又在沙漠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我还交了很多朋友，鄂尔多斯的施美珠就是我的好朋友。她是一位企业家，办了一个服装厂，她知道了我的事情到沙漠里来看我，第一次来就给我们全家人带来了全套的衣服，里里外外，从衣服到鞋都买到了，都是全新的好衣服。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的衣服她都包了，秋天刚到，就把娃娃的羽绒服买好，春天一来，连夏天的衣服都买下了。我没有文化，也没见过什么世面，遇到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跟她商量。

我们这里也通了路，给我带来了许多新的机会，路边有一块碑，上面写着“天士力爱心绿色大道”，说起这条路还有一个故事。

天士力爱心绿色大道

去年我去全国妇联开会，全国十大女杰的表彰会，认识了一起受表彰的天士力集团的吴总吴乃峰。她听了我的故事以后特别感动，她问我开始是怎么来的，我说得先从沙漠里走出来，再赶班车到鄂尔多斯，再到包头才能坐上火车来北京。她问我你没有车吗？我说我哪里有车了。她就说，你治沙太不容易了，我们天士力也支持了很多环保项目，可以资助你买一辆车。我说我那个地方，一般的车开不进去，因为我们没有路。她更吃惊了：你治沙十几年没有路怎么办？吴总就问我为什么不修路，我说去年政府批了20万说要帮我修一条路，可是公路部门测算过，修这条路需要100万，还缺80万。吴总当时表示：这样吧，我们可以考虑资助你80万，你自己看是买辆车呢，还是把路修起来。我说当然是修路了，有了路，可以干很多事呀。

那天我是早晨7点20到达北京，只在火车上吃了点早饭，然后和吴总见面听她说了这话，我心里那个高兴、那个激动就没法说了，激动得我根本吃不下饭，到了晚上还激动得不行，睡不着觉。

开完了会回到鄂尔多斯，先去找施美珠，跟她讲这件事，她也高兴得不得了，我去天津找吴总，就是她陪我去的，本来我想坐火车，来回得花二三百块钱，可是她从自己厂里提出来了1万块钱，陪我坐飞机去的天津。

后来经过协商，天士力集团把款打到我们当地政府，由政府负责出面修路，8月22日通车，只用37天修起了这条路。我给这条路起名叫“天士力爱心绿色大道”。通车的时候，吴总来和我们市长一起剪的彩。

因为有了这么多外界的支持和关心，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五六年里，是我这里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通了电、通了路、种植养殖都成了规模，治沙的速度也比原来快多了，原来我们十几年治了两万多亩，现在四五年就治了两万亩。

2005年的时候，北京来了一封信，说要推荐我评选诺贝尔奖，我问了别人，说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奖，有很多钱。一开始我想：我要是中了这个奖就好了，我可以用这些钱干很多事。后来

才知道，就算我们评上了钱也不给个人，评这个奖主要是为了和平，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女人为世界和平做了多大贡献。原来是这么回事，真是挺不好意思的。我觉得世界和平离我太远了，够不上，我能做的就是好好做自己的事，把树种好，给一家人造福，也给村子里的人做个样子，带着大家一块致富。

可是话又说回来，有这么多荣誉，有这么多人关心我，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成名以后我有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总觉得不踏实。

本来，我就是个农民，就是在沙漠里种种树、种种地，能干的时候我就拼了命干，干不动了可以歇一歇，可一旦成了全国劳模、三八红旗手就不一样了，那么多眼睛盯着你，你就必须得发展、得进步、得上规模。可是发展得快了，心里就不踏实了。首先是自己的能力跟不上，我和丈夫都没有文化，说就要签个合同吧，我们连上面的字都认不全。再就是规模扩大以后出来那么多新的问题，我以前治沙，都不是立即能见到效益的，现在这么多人，要生活，要发展，收入赶不上投入怎么办？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怎么摆？现在社会活动多了，天天出去开会，家里这一摊子谁来管？

有时候一想这些事情就特别沉重，总是怕自己干不好，往大里说，对不起国家给了我这么多荣誉；往小里说，尔林川村的老百姓都在看着我，希望我能给他们当一个致富的榜样，我也怕让他们失望；最实在的，我还怕自己干不好，不能给孩子带来幸福的生活。我的大儿子已经19岁了，他经常跟我说：妈，等我大学毕业以后回来搞建设，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可我还不敢说自己到底能给孩子一个怎么样的明天。

沙漠绿洲金贝塘

但不管再难，我还会一直往前走。我已经做了一个沙漠治理的规划，要把这7万亩沙漠完全绿化，要有林，有果，种植，养殖，加工，旅游都发展起来，建成一个真正的沙漠绿洲。人们现在都说我是山窝里飞出金凤凰，我说到了那时候，金凤凰才是真的飞起来了呢。我还准备给这里改改名字，不叫井背塘，当然更不能叫警备塘，我要叫这里金贝塘，是金光闪闪的珍珠宝贝。

平时我最喜欢干的是两件事。一件是看照片，我和温总理、和那么多人的合影，看照片上的吴总笑得那么甜，觉得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关心我，支持我。再一件是到林子里去转，我们的林子已经长起来了，走进去都看不到天，看看那些树，一棵一棵都长得那么好，心里就特别高兴。看看现在，想想20年前我刚来的时候，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个美国人（美国自由民基金会的赛·考斯基）来的时候说“你和你的丈夫的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你们是真正的英雄，是所有热爱大自然、热爱自己国家者的楷模……”其实我觉得自己没那么伟大，我不过就是被命运抛到了这个地方，最初只想在这里活下来，活得像个人的样子，活下来了，又想活得好，活得快乐，活得富裕，活得幸福，就这么简单。

杨
海
澜

斑斓的梦 沙漠里长出五彩



文：寇延丁

她知难而进，建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农业立体循环体系，硬是在沙漠里建成了一个种植和养殖一体化农场样板示范区。

农场生长着希望，结出了果实，并且孕育着妇促会的明天，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孩子，是我生命里最美丽的收获。

农场和杨海澜共用一个名字——“海澜葡萄庄园”，而用这里的葡萄酿出的酒则叫作“海澜金沙”。杨海澜说，她喜欢这个名字，五彩斑斓的，是沙漠里长出来的梦，美丽的梦。属于海澜的这个梦其实很小，相对于广大无边的腾格里大沙漠来说，这片520亩的小小绿洲连个零头都算不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海澜的梦又很大，当27岁的她第一次站到这里的时候，甚至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在这里做些什么，面对漫漫黄沙，她已经决定，要把这里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农场，这样的梦，不可谓

不大。

海澜葡萄庄园位于腾格里沙漠西缘，属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胜利乡。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沙漠也在扩大，越来越近的沙漠威胁着环境和农业生产，早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就已经开始了沙漠治理的努力。最初治沙以政府行为为主，治沙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需要投入和付出的实在太多，1996年，当地政府决定引入企业行为参与沙漠治理，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以每亩400元的价格出让50年使用权，承诺“通路、通水、通电”并免收10年农业税。

参与承包的共有13家企业，不乏财大气粗的大企业，杨海澜的义信公司是最小的一个，一次付清的20万承包费已是她公司的全部资产，当别人报出成千上万亩的承包量时，她的500亩是最小的。杨海澜不仅是所有商家中唯一的女性，27岁的她还是年纪最小的一个，说到未来的打算却是最大的：“我要在这里建世界上最好的农场。”大家笑了，当这只是一个小女孩的梦罢了。而杨海澜自己却不这么认为，清凉的黄河水带着黏稠的泥浆扑入干渴的沙漠，很快在沙面上形成一层厚厚的淤泥，捧着这些淤泥，杨海澜也笑了：“谁说沙漠是个无底洞。这都是千金不换的宝贝啊，有了它，这里就是一个聚宝盆，什么样的好东西都会长出来的。”

女人天生爱做梦，杨海澜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子，并且是一个执拗的人，一个执拗地要使美梦成真的人。

走进沙漠栽梦

1969年出生的杨海澜是个典型的城市女子，在此之前根本不曾接触过农业，在城市里上学，学的是会计专业，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她这样的女孩子做的工作，疼爱她的丈夫在税务局，儿子活泼可爱，在有着“塞上湖城”美誉的银川市过着平静安闲的生活，如果这片沙漠不出现在她的生活里，也许这种平静安闲的生活会继续下去。

但是杨海澜却说：“即使这片沙漠不出现，也不会永远这样，因为我天生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太爱做梦。”

她说自己可能命中注定会与农业、与种植结缘。从小她就是一个调皮的孩子，登高上房、爬树偷果子一类的事没少干，甚至

摔折了胳膊摔折了腿都挡不住她，提到自己的童年，杨海澜笑了：“为什么我现在会到沙漠里种葡萄？一定是上帝惩罚我，因为我小时候太不安分，偷吃果子太多了。”

以这样的个性，杨海澜是不会甘于那种过于平静的生活的，她的决定总是出人意料。比如家境优越的她会选一个来自农村丈夫，再比如，25岁那年，她辞掉了保险公司的会计工作，和朋友一起做生意，而当她的小公司刚刚上路的时候，又做出了承包沙漠的决定。

她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除了丈夫徐文彬，大家都为她担心，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的国营农场一个个难以为继，这个城里长大的娇弱女子到沙漠里到底能干些什么呢！

“其实我做这样的决定也不完全是心血来潮，此前看报纸看到了许多种植致富的消息，而且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我爱人的舅舅在贺兰承包荒地，那里水好，种了100亩水稻，一下就成功了，效益特别好。还有在荒地种甘草也很好，我都去看过的。那时候我就想，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摆在我眼前，我肯定也能做好。很多人都劝我，说10年以后你才后悔。那时候我只有二十几岁，想象不到1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人家都成功我为什么不能做好？”

杨海澜就这样走进了沙漠，回忆自己第一次进沙漠时的情景，就连杨海澜自己的忍俊不禁：“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样子吗？我穿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高跟鞋，抹了厚厚的防晒霜，戴着一顶太阳帽，这样还不算，一到太阳底下就撑起伞，怕晒呢。而且，最笑人的是，在路上看到路边的野草正开着花，我就大叫停车，然后我就下车挖那些草，连土一起用报纸包起来，要种到我的地里去。别人一看都笑我，说这都是野草，只要有水就能长，到时候怕你拔都拔不及。”

杨海澜就以这样的姿态走进了沙漠。一旦深入其中，她小小的身形立即被茫茫沙海吞没了，这份开花的梦想到底能结出一个什么样的果实呢？

严酷的现实面前，杨海澜收起了所有的梦想，沙漠只用不到半天的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她几乎所有的习惯，从衣着到饮食，从生活到工作。

那时候，到沙漠里还没有路，20个人挤在一辆吉普车里开进

了这片属于她的土地，支起帐篷，建起了治沙的营盘。

与杨海澜一同进驻沙漠的大都是她的亲属和丈夫的家人，原来的杨海澜一直是个乖孩子、好媳妇，手巧嘴甜，不笑不说话，但到了这里，她一开口，不管叫谁，她都是直呼其名，让所有的人都愣住了。“我不这样也不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一个治沙的企业，我是董事长，一张嘴全是爸爸妈妈哥哥舅舅的，像什么话。回家该怎么叫怎么叫，但在这里就只能这样。”

第一顿饭，就让大家领教了沙漠的厉害，大漠风沙无孔不入，他们的饭缺油少盐，却少不了沙子这味“调料”。端起碗来，不用抬头杨海澜也能知道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她像是自言自语：“沙子好，沙子有营养。”然后大口大口地把饭扒到自己嘴里。

第一个秋天，他们在沙漠里干到11月份，整平了沙丘，引来黄河水进行冬灌，未来的农场已经初具规模。严冬来临的时候他们撤出了沙漠，准备来年春天回来栽种防风林。

第二年，当杨海澜和春天一起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他们千辛万苦平整一新的土地已经被一冬风沙完全改变了模样，依然是起伏的沙丘，甚至连一丝改造的痕迹都找寻不见，杨海澜忍不住哭了。那是一段沙子拌眼泪的日子，但是，哭归哭，哭完了，擦干眼泪，还是得干。

杨海澜在这片土地上和风沙展开了拉锯战，春、夏、秋三季人进沙退，冬季里风沙卷土重来，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倔强的杨海澜艰难地、却又是坚韧地慢慢向前推进着。大漠风沙没有打灭杨海澜心中的梦想，她依然坚信自己会在沙漠里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农场。她求教于自治区最优秀的农业专家，科学规划，把垦荒、种植、养殖、施肥、用水统盘考虑，要为自己的农场打下一个最好的基础。到1999年秋天，她的农场已具雏形，农业银行在考查了她的初步治理效果之后也在准备向她提供贷款，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自从全身心投入治沙，杨海澜就将儿子托给了曾经做过教师的婆婆照料，1999年9月14日，入秋之后银川开始变天，一早杨海澜收拾了儿子换季的衣服，匆匆出门打了一辆面的赶往婆婆家，车祸发生了。

也许是因为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杨海澜根本不记得当时的情景，在昏迷的时候，她一直在做一个长长的梦。她梦到自己正在塔尔寺上香，一遍又一遍，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然后，她累了，想睡，正好，金黄金黄的沙子涌过来，暖暖地将她盖住，一层一层盖到了她的脖子上。但是这时候过来了一个无比高大的人，告诉她：你不能睡。伸手将她从沙子里提了出来，一甩手扔了出去。她被摔在地上，梦醒了。

杨海澜醒来之后第一眼看到的是丈夫：“哎呀文彬，我做了一个梦，好好好长的一个梦。”丈夫让她看看自己在什么地方，她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司机当场死亡，她因为坐在后排，怀里又抱着一大包衣服侥幸躲过一劫。

杨海澜浑身是伤，从头到脚全是绷带，满脸满嘴都是玻璃茬，好在都是皮肉伤，并无大碍，醒来第三天就出了院。

即使是在病床上，她最惦记的仍然是自己的农场，惦记的是车祸打乱了她的计划，会耽搁农场的贷款，如果在冬季来临之前不能争取款项，就无法进行下一步治理，等到来年春天还要再一次从头开始。

出院的第二天，杨海澜就去了农行，行长被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里的她惊呆了，也被她感动了，立即着手进行审核，她的贷款很快通过了审批。

1999年，在杨海澜的生命里是多事之秋，也是收获之秋。这一年，“葡萄”这个丰润甜蜜的字眼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宁夏的报纸上，出现在这片干燥寒冷的西北大地上，出现在多梦多思对自己的农场蓄满了期待的杨海澜的眼中。

种最好的葡萄 酿最好的葡萄酒

那些文章里都将宁夏和法国的波尔多做了一个比较，最后得出结论，说这里的地理环境比波尔多还好，最适宜种植葡萄。人们都知道波尔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葡萄之都、葡萄酒之都，这个消息让杨海澜欢欣鼓舞，感到一直闪耀在天边的梦想已经在向自己走近了：我们宁夏的自然条件这么得天独厚，如果我在这里种葡萄，就可以建成世界上最好的葡萄园，还能酿出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

说干就干，杨海澜立即找到有关专家，请教宁夏适合种植什么葡萄，专家指点说大青最好。于是她又找到林业部门，找到专门的苗圃，引种了20苗大青。

仿佛与杨海澜心有灵犀，这些葡萄长势特别好，沙漠里的葡萄园吸引了大量的参观者，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这会是一年生的新苗，站在葡萄架间的浓荫下，被大漠烈日晒脱了皮的杨海澜终于笑了。

但她却没能笑得太久，一场暴雨打落了所有的葡萄叶，几乎毁了她的葡萄园。面对暴雨洗劫后的农场，面对光秃秃的葡萄藤，杨海澜对员工说：“没关系，新叶子很快就会长出来的。”但是，回家之后，她却蒙着头哭了一个天昏地暗，把被子都哭湿了。丈夫一直默默陪伴着她，等她哭够，再次站起来，又同她一起踏上了去农场的路，因为那里有他们共同的未来和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动员了所有的亲属和朋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杨海澜的公婆把家都安到了农场；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卖掉了自己的复式楼房，将农场的办公室搬进了自己的家；为了这个梦想，徐文彬硬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位农机专家，发明了葡萄园专用的打药、锄草、施肥一体机。顾及妻子的事业，徐文彬多次放弃了去基层税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升迁机会，每到周末都会雷打不动来农场“上班”，他一到，就会接下农场内部的

大部分琐事，减轻妻子的压力，他们戏称这是“男主内，女主外”。在多年的治沙过程中，这个梦想已经融入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向前。

在确定了葡萄种植这个主要目标之后，杨海澜多方筹资，整体引种，成了当地唯一一家实行全园标准化栽培葡萄园，她拼命学习，请教专家，在短短的时间里，从对农业一窍不通的城市女孩，变成了一个合格农业技术员。

最初杨海澜出现在专家面前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出于自己对农业的热爱，一方面出于对晚辈的宽容心态看待这个娇小的女孩子，不敢相信她能一直坚持下来，甚至对她到底能做什么也不抱太大希望。让专家们感到意外的首先是杨海澜的认真。专家们给她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沙漠农场的规划，对她能不能在沙漠里实施这样的规划其实不抱太大的期望，几年后杨海澜请他们去现场察看的时候，见到了一个标准的农业系统的雏形，不仅有标准的林带、路、渠、条田整体规划，杨海澜还在自己的农场里修建20亩鱼塘。专家们感动了，给了她更多更好的建议。

专家告诉杨海澜，沙漠里的土地太贫瘠，必须用农家肥改良土质，依照专家的指点，她建起了标准的暖棚、牛舍、羊圈，养牛55头，羊220只。不仅如此，她还在自己农场开展了一项科研项目。宁夏滩羊是当地名优品种，是宁夏中部干旱带的主要绵羊品种，也是高品质的肉食品种，尤其是羔羊肉极受市场欢迎，但只能一年一胎，国家号召禁牧退耕还林还草，而宁夏放养的滩羊一年只能产一胎，圈养很不划算。在西北农大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和宁夏大学教授尹长安的指导下，杨海澜自己动手，在农场里尝试“滩羊非繁殖性季节产羔试验”，经过一个季节的尝试终于获得成功，54只滩羊在非繁殖季节陆续产羔，产羔率成活率达50%以上，实现了一年产两胎的梦想。

在分享她成功的快乐的时候，亲朋好友也不禁心痛她的付出：“你一个女孩子家，种种树种种葡萄也就罢了，又何必养牛养羊，挣钱不多，费力不少，还弄得一身粪一身膻的。”

杨海澜这时才告诉大家，这样做其实并不指望挣钱，只是想用这种方法给自己一些压力，治沙的日子太苦太难，自己难免会偷懒，得过且过，养殖可以积下大量的农家肥，那么多肥堆在那里

就能逼着人动起来，要把这些肥料运到地里。这个曾经的娇娇女是在逼自己背水一战呀，亲人们除了给她更多的帮助之外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最初完成承包时，沙漠里曾经热闹了一段时间，许多大企业投入了数千万资金。但是，这里的自然环境实在是太严酷了，冬日酷寒，夏季炎热，人们千辛万苦开出的沟渠，每到冬天都被风沙吹得荡然无存，每年春天都要重新开掘整理，春天种下的树也多灾多难，夏季烈日晒死一批，冬日里风沙吹走一批，有时候春天来临时连枯死的树桩都无从找寻。事情往往被人不幸言中，沙漠确实是一个吞噬人希望投资的无底洞，时间一年年过去，身边的同伴一个个无力支撑，退出了这场人与风沙的角逐，同时承包沙漠的12家企业都撤离了沙海。2002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沙漠里只留下杨海澜一家农场了。

那段时间成了杨海澜最难的日子。要开春了，热心的专家给她送来了他们心血凝成的规划，但在专家到来之前，杨海澜却先找个地方哭了一场，等流干了眼泪才敢出来。她不仅用尽了所有的资源，还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房子，面对风沙弥漫的沙漠，她甚至想到了卖地：也许选择这条路真的错了？

就在她再一次面临选择的时候，社会各界给了杨海澜理解和肯定。2002年3月，银川市妇联、永宁县妇联为了表彰杨海澜在治理沙漠、保护环境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授予她“双学双比”竞赛活动科技致富女能手荣誉称号，她还先后获得了全国“三八绿色工程”奖章、全国“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4月，自治区财政厅项目办将这里确定为“宁夏肉羊改良繁育基地”。各级领导、国内外专家相继来到沙漠里的农场，这给了困境中的杨海澜以宝贵的支持，她正式给自己的农场命名“海澜葡萄庄园”，坚信会在沙漠实现那个五彩梦。

生态农业立体循环体系 海澜葡萄庄园

她知难而进，建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农业立体循环体系，硬是在沙漠里建成了一个种植和养殖一体化农场样板示范区。海澜葡萄庄园不仅有300亩20余个品种的优质葡萄园，还有100亩优质牧草，30亩百果园，占地100亩的防护林带，80间温棚，20亩

鱼池，并建有3,000平方米圈舍，2座沼气池，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牛羊畜粪输入沼气池——沼渣用来做葡萄园的肥料——沼气用来照明取火——沼液是果树浇灌的肥料，还可做鱼儿的食料——抽取鱼塘水成为果园肥料。这里还建有一座简易小型酿酒作坊，建设了储藏保鲜水果冷库30万斤的水果保鲜库。

2002年10月，海澜葡萄庄园成为银川市“三八”绿色示范基地。同年11月，在银川妇联的支持下，在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的帮助下，杨海澜成立了银川市妇女发展事业促进会。这是杨海澜又一个梦想，最早，她是在2001年年末参加农家女学校的培训时接触NGO这个概念，学习结束后回到银川就开始联系有关机构、学者和附近乡村的农村女性，得出结论：我们这里非常需要一个这样的NGO。

经过一年努力，银川市妇女发展事业促进会成立了，协会围绕妇女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组织开展科技和市场知识传播；关注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帮助妇女掌握生存和劳动生产技能；为贫困妇女协助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农村贫困地区妇女提高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促进一特定弱势群体的自我发展。

2003年，海澜葡萄庄园初见成效，第一批葡萄开始挂果，同年11月，杨海澜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接受了“福特汽车环保奖”，她将接受的5万元奖金全部用于教育培训，为永宁县致力于家乡环保的200余位农民姐妹举办教育培训。

同年杨海澜还获得了日本政府利民工程无偿援助50万元，为周边农民进行治理沙漠、发展生态农业的实用技术培训。她在自己的农场辟出百亩场地，建设了中日友好生态教育基地，针对当时农民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结合农时，对前来参加学习的农民进行田间实地培训，从葡萄春季抹芽、修剪到叶面保护、幼果套袋、冬季修剪全程讲授，同时对枣树园、小杂果园中的桃、李、杏、梨、果进行技术指导，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培训，500名妇女掌握了一定的治理沙漠的技术，为她们参与环保事业提供更多的机遇。不仅使她们自身感到了科技致富的力量，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示范的榜样。

非典期间，许多人将这片沙漠绿洲当成了躲避瘟疫的世外桃源，启发杨海澜在这里开办了集食、宿、采摘、垂钓和观光农业、

沙漠旅游于一体的沙漠农家乐。第二年春天来临时，经过一年的筹备和试营业，银川首家农家乐正式落户海澜葡萄庄园。2005年，农家乐被银川市旅游局确定为指定旅游项目。农家乐的开办不仅为海澜葡萄庄园带来了上万名游人和可观的营业收入，更重要的是它让杨海澜能够有机会把她的梦想展示给更多的人，把一个美梦成真的过程展示给更多的人。

从1996年到2005年，杨海澜在沙漠里经历了10年磨砺，当时许多人都说10年以后你就会后悔了。而现在，眼看10年就要过去，杨海澜说，如果一定要说这段时间有什么收获的话，那自己最大的成就并不是在沙漠里建起了一个葡萄园，而是用这段时间完成了一个成长的过程，由一个满身梦幻的“女孩”，长成了一个有能力实现梦想的“女人”，还将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沙漠农场的“母亲”。她说：“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农场生长着希望，结出了果实，并且孕育着妇促会的明天，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女儿，是我生命里最美丽的收获。”

徐兰香
土地是我的肚脐迹



文：郑空空

对人民、对群众我是到处妥协，只有对资本家我绝对反对到底。

资本主义的政府从来没有一天为这个环境考虑过，而是透过剥削环境与众人的冷漠，所以面对土地的时候非常残暴。

银行不见了，蚯蚓起来了，就是和平。

以人为本、以地为本、为后代子孙考虑。

我是穷苦农人的小孩，那时代的女性少有受教育的权利，加上我是养女，所以求学过程很辛苦，只要遇到农忙、家里需要的时候，就必须放下来。

当时我住在新屋^①，那里到处是不很深的埤塘^②，顶上长有许

① 桃园县新屋乡。

② 客家话，意指池塘。桃园县主要为台地地形，早期水利设施不发达，为了灌溉，农民在农地附近挖掘许多埤塘承接雨水，以作为蓄水与浇灌农作之用，除此之外，农民也在埤塘内养鱼、养鸭等，因此埤塘也构成特有的生态系，而遍布的埤塘也成为桃园台地上的特殊景观。

多水草，里面有非常多千奇百怪的东西，我经常独自在埤塘里玩，其他人看不起我没关系，我可以自家嚼^①得很高兴，我完全是靠那些大大小小的生物来维护我的快乐，而搞^②这事情不会被大人骂，因为捞得的东西可以作为下饭的菜肴。

我的收养家庭经济本来就不是很好，他原来没小田，我去了以后，生了一大胎，有佬弟有佬妹^③，当然在经济上他便要照顾弟妹比较多。收养家庭提供我读到初中，但那是争取来的，包括老师在内，有一些人帮我争取，所以我才有机会，但求学过程很辛苦，不过我不觉得是因为我是养女，而是因为我们家贫穷，贫穷家庭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是这样。

初中毕业后到工厂做工，几年后去念夜间部高职，我不知道我为何读书，只知道当时很多人认为，学历高薪水会比较多。高中毕业后，因为我很会发现问题，所以心中常放下问号，比如我去染整厂上班，那配料造成我呼吸困难，里面的人都咳嗽咳到吐血丝呃，我跑去找董事长，问乙酸会不会放太多？他说：你是谁，是哪个部门的？我才知道原来这些话都不能说，第二天，他就把我调到另一个单位，手要去碰清洁剂；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感觉？非常惊讶。

在一些污染的工厂里我根本待不下去，所以我的工作一路换，换得的只是不同的臭味而已，当时我还没有注意到河川的问题，只是注意到我身体不能接受，也蛮怀疑他们怎能接受。

小时候看到父亲柴谷青^④，觉得为何工作做那么久，也种了不少的田，却是吃饱都成问题？爸爸人不敷出，只好跟人家柴谷青，等到谷子黄熟时再割下来给粮商、碾米厂，结果奇怪为何一年不如一年？等我慢慢长大，才发现原来柴谷青是高利贷；贷款这种事情，在不太有银行的时候就在进行剥削了。

① 客家话，意指玩得很高兴。

② 客家话，意指玩。

③ 客家话，意指有弟弟，有妹妹。

④ 过去农民因需要货币而向粮商借贷，借贷前，粮商会先到地里察看，决定放款金额，直到稻谷青黄未接时，始对农民放款，条件是交换地里的农作。比如说，某块田里的稻作，粮商估价一万元，但仅放款四千元，待谷子成熟时，农民要将该田里的所有谷子割下给粮商还款。

我离开农村到工厂工作，我又发现我没办法赚那种钱，那我该怎么办？很多人没有感觉，我甚至怀疑难道是我错了吗？于是我搬到新竹关西长寿村，在那里重新务农，养放山鸡、种橘子及番石榴。初到关西时，我的小女儿才5岁。

民国79年（1990年），北二高^①开路开到关西大桥，那是东南亚最高的桥墩，就在我们家上面。为了要装那个桥墩，他们挖非常深的基础，五六台马达日夜不停地抽水。我们是吃地下水的，结果全村30几口井都没水，大家因为没水而吵架。我说，再怎么争还是这一点点水，你喝我喝，一人一口就没有了，要争的是涵盖这30几口井的水源。

我跑到高速公路的上面，一边工作一边勘查，看他们如何施工。他们铲除地表上茂密的相思林，那是水的涵养区，上天下雨要透过它们渗透到地下已经没有机会了；为了道路安全，他们把路表夯实，使得地表更紧密，水没有机会渗透下去，再加上桥墩，那么深地往下挖，所以总的加起来，整个环境是被抽干的。我在那边看到了这样的事实，所以我有办法提证；我想应该要先搞清楚为什么，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一家一家地去看其他人家的井有没有水，与他们讨论，说争吵是错误的，应该叫政府解决这个问题。但也有人问：那你要不要开高速公路？我说：我要啊，因为我是你的国民，但不表示你开高速公路我们就要没水喝啊，如果是这样，天底下还有人要给你开吗？你要有对策才可以开，不能说找不到水，叫别人为你牺牲！

那段期间，我日以继夜不断地谈，串联村民向高工局要干净的饮用水，后来高工局帮我们接好自来水管线，水龙头开有水，包括水表等什么东西都做到好。

抗争破坏土地 还土地与人

关西正农农药厂围厂抗争是在民国81年（1992年）。我想，我和土地很有缘，和人比较没缘，或许是移情作用，我整个儿的记忆都在湿地上面，现在想起来，还很希望可以放弃一切过那

^① 北区第二高速公路。

样的日子，可见那时我不是穷途潦倒，最起码我没有潦倒。这记忆太太好了，我好希望在湿地里，在她怀里，我是快乐的，我靠她维持我美好的记忆，我想重建这样的家园。

在长寿村，我都到河边洗衣服。其实自然是有次序的，比如说，洗愈脏衣服的要愈下游，如果有人违反这个次序，我敢保证那人当天绝对不会快乐，因为有人会修理他，比如在上游洗小孩子的尿布，连子孙都会被咒下去。但这样的污染有限，因为小孩的粪便会经过水草、石头、沙子过滤与鱼虾分解，但农药厂却是连小鱼、水草这些东西都杀光。

农委会不断告诉我们一年吃掉多少农药，我们把它终结掉就不会有这种报告，且我觉得食物不应该跟毒品扣在一起，哪有人用毒品来制造食物的？即使说它已行之有年，也就是说这几年人都是愚昧、昏睡的，因为身体已经受害了，我很早就看到。

我组织附近受害居民向农药厂抗议农药污染，连续4个月强力抗争。厂方派人混到群众当中，对我污蔑、丑化，但在当时我不能选择说我可不可以给你进来，既然是公共的事务就要绝对的开放，我是冒着这样的打算。内部很多斗争，但我必须在中立的位置上，当时我非常的困难，到处妥协；对人民、对群众我是到处妥协，只有对资本家我绝对反对到底。我要取得民众的认同，我必须要牺牲我自己；当时是牺牲，但现在回去看却不是牺牲。

很多专家和所谓的学者要来指导我，被我拒绝，因为学者不知道这里的人的情感是什么，但我知道，因此我用非常独特的方式。所有的改造都要以当地人的文化、背景，作为依据、参考，虽然我的过程有点风险，但速度很快，我不希望在那边缠斗太久，再加上我是经济力很差的人，我不能缠斗太久。

在抗争过程中，旁边的高尔夫球场业者找一位镇民代表拿50万元要给我，说是要支持我们把农药厂赶走，我当场拒绝。我告诉他：“不必贿赂我，我也会把正农赶走，不过我的下一个抗争对象就是你们！”因为他们用封闭道路的方式逼迫农民售地、超挖山坡地、封填野溪、破坏水土保持、而且喷洒大量除草剂毒害环境，那绝对是下一个要抗争对象。

最后农药厂关厂歇业，我被告妨碍自由，因为我率众围厂，被判缓刑2年。

关西是全台湾高尔夫球场密度最高的地方，小小的关西镇就有8个高尔夫球场，为了开发高尔夫球场，业者利用假农民的身份大量搜购农地、威胁利诱从农民手上抢得土地，最可恶的就是不管农民死活，把原来的道路封闭，使得不肯让售土地的农民，无法继续耕种；乡村高尔夫球场就是这样。

农药厂事件后，我开始反乡村高尔夫球场。那个业者已经投资1亿多元，黑白二道对我进行所有可能的动作：把我挟持到荒郊野外，警告我“做事不要太超过，要懂得适可而止”；地方民代警告我骑车要小心，过了不久我就出车祸；家里的电话被窃听、电话线被剪断；我报警处理，警察却爱理不理。接着，他们抹黑我，说我向受害农民勒索、在抗争农药厂时期收受贿赂，把贿赂所得在南部开设养鸡场等。而另一边，也有候选人企图搭反高尔夫球场的顺风车，作为获得选票的手段。

环境是一切的基础，是人的基本责任，没有政党、选举、个人利益，所以我拒绝他们进入。这些候选人散布我有参选意图的谣言，发动上百位村民对我批斗。他们叫我去村民家，去到禾埕^①的时候，已有上百个人在那里等我，要我交代，一个人说完后另一个人接着说，每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我根本没有机会说话，甚至有人把口水吐在我脸上。虽然我做了心里准备，但真正面对时还是受不了，走出禾埕，我号啕大哭……

流言四起，在地方派系的介入与施压下，民众纷纷打退堂鼓，没有人敢继续抗争下去，我完全被孤立。有一次，我拿起喊话筒，邻居拿石头丢我，我血流满面。

后来我只跟“主妇联盟”^②合作，只要意识到有人带着选举意图，我通通不给他加入，那时我真的这样做了。我们没有任何大的宣传，也没有群众运动，全台湾反高尔夫球场运动，只有这一个业者花了1亿多元，还在开发中，就被停工的。

“主妇联盟”打电话通知我，说有官员要来踏勘7个高尔夫球场。整个踏勘的过程，我紧跟在水土保持科的负责人旁边，一路说：“帮我的忙，帮土地的忙，请你帮苍生的忙。”他说：“啊唷，

① 客家话，意指晒谷场。

② “主妇联盟”为台湾一个以环保工作为目标的妇女组织。

你不要说那么多。”我每天都去跟他说，“请你帮我的忙、帮土地的忙、帮苍生的忙。”他实在是烦得……他一站起来我便帮他拉椅子，要添饭我便帮他盛饭，他说，“你干什么！”我又跟他讲：“请你帮土地的忙、请你帮我的忙、请你帮苍生的忙。”

当时很多党派在外面拉白布条，我都不和他们打招呼，甚至白眼，跟他们说：“你们滚蛋，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要来抗争，前面都没有做功课，搞什么屁啊！你如果真的是关心这个议题，请从感情上出发，而不是从目的上。”从感情上，我明知道打不死他，我也要打，而你的目的是要达成你个人的目的，所以我不想……

其实水保科的主管有注意到我的动作，他发现我不是搞政治的，不是为了要当选什么、也不是谁派来的，只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家庭主妇。当时我很瘦，只有37公斤，脸很黑，他们都说我很凶猛，我只知道我非常的愤怒，穿得破破烂烂的，他们都说我疯掉了。

进到会议室，评审委员看着全场说，“我只能八个字送给你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觉得那批评欠缺力量，必须加重，因此我站起来，很大声的哭了。我说，“我就住在下面，狐狸不见了，乌鸦飞走了，原来我的孩子可以来这边捡虾的，没有机会了。凭什么把我们原先这么快乐自由的环境封锁掉？野溪被出卖了，那个野溪谁可以出卖它？我们的法令明明规定野溪不得租或售，你们公然犯法！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你们说要分期施工，但他们却是一次干掉！下游的人是承载了那么多的暴力嘍！土石流是这样子崩嘍！”我非常愤怒，很大声的跟他们讲，接下来“主妇联盟”的炮火非常猛；我看见女性的力量，在感情上是强烈的。

后来我们又一起到上面，当然我事先也跟他们讲这当中超挖多少。水保科问：“你们挖了多少？”发言人说：“21公顷。”水保科：“真的吗？如果说谎，我可是要修理你们的，用我的手，你们的比例尺是多大的？”发言人跟他讲比例，水保科说，“我的拳头是一公顷，我们现在一起来算。”算到第二十一的时候，还有一大片面积没算。他问：“这面积是多大？”我就在旁边说：“94公顷！”水保科：“这么大量的超挖，你们有没有法律！除了砍伐森林、破坏环境，没有照着你的计划书行事，公然且伪造文书了，

我今天是在执行公务喔，你却告诉我不实的信息！”

那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去勘查上方的时候，经济部水利司有来，那天刚好下很大雨，老天爷都在呼应我们，我说，“等一下，等一下！还不要走！”我看着上面的石头就要掉下来了，水很大的冲刷，石头砰地掉到河里面，立刻堵水，水利司开始愤怒……因为这样夹杀，他难逃停工的命运。

连续二场抗争，我心力交瘁，特别是对发动村民对我羞辱的政党候选人。他们明明知道南部的养鸡场是我在民国78年（1989年）就借钱与朋友合资开设，为了选举，居然说那是我拿农药厂的钱去买的，干！怎么会那么残暴啊？反而是因为我触犯了法律，养鸡场成为农药厂要去追的目标。我借的钱都还没有还完耶，债主还反对说，你钱都还没有还完，你跑去搞什么运动！

选举是最龌龊、下流的动作，在选举里面我没有看到政客，我只看到选举动物，这种动物是吃选举食粮长大的，所以他非常会选举，他就是破坏社会治安的最大原凶。我非常反对人家说什么神圣的一票，到底神圣在哪里？

回到家，我的先生也跟着别人起舞，说我吃钱，我气得拿起凳头对着他，往地上一摔，啪地四只凳脚都散掉。心灰意冷之下，我跑到南部养鸡场，准备好农药……



我的孩子是我心中的宝，我可以活那么久，是因为我的孩子。离婚时，我连棉被都没有带出来，那一年完全处在脱离正常人的

吃住状况，去捡人家不要的旧衣服、床垫，在地上铺一铺。幸好当时有一位朋友暂时把他的房子借给我住。因为经济困难，我开始卖番石榴，我的孩子很早就起床，跟我去批番石榴、拿回来加工，我跟孩子一直在看手表，看到一定要出去的时候才去上学，他们可以说是我最……，我的婚姻无悔是因为2个孩子，这样的孩子。

我的番石榴卖得很好，可是因为我早上6点多要起来，咕咕咕摇番石榴，邻居不能忍受那声音，我尊重，所以我就停止，但我需要有收入，有一段时间就跑去卖车。

我觉得卖车子非常不好，虽然它可让我回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可是我心中不能。他们教我的那套东西是骗人的，比如说，要消费者把好好的绒布椅套换新、原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让摩擦力增加，但车商没有告诉消费者安全系数在哪里，而贸然把座椅换掉，破坏环境、浪费资源；他们是这样干的，而且要你跟你的好朋友说谎；一部车子那么多钱，却想尽办法要对方分期付款，再想尽办法要把你那部旧车重卖一次。我摸了几个月就不干了。

我想我应该如何做？拿儿时的记忆，我看到了人。小时候做酸菜，父亲因为没有钱可以买容器，冬天在田靠路的边边挖了一个很深的坑，铺上不漏水的塑料布，那时没有使用农药，一棵芥菜大到可以包住整个小孩，我们将它倒置罩在身上玩躲猫猫，一棵菜会自己走路，小孩子就是如此将它顶着抬过来。整个萎凋的过程是用太阳和粗盐，全庄的小孩都把脚洗干净，把芥菜丢进去，一排排放好，妈妈把盐洒进去，边喊“小鬼，走卡快兜子喔！没，会噜到盐喔！”^①妈妈其实会让你，赶快叫，小孩就赶快躲到一边，虽然盐踩在脚下是很痛的，但是很快乐。为什么那时候能有更好的质量，是我们加了农药或化肥吗？

我觉得耕田种地要有伴，你想想看，一块田地那么大片的面积只有一个人一直在弄，很累、很疲倦，所以一群人来做就很容易；农耕不应该是变成人和机械对话，这变得很无趣，但又有人说这样比较快，说这样比较好。从过去美好的记忆，那样的方式腌咸菜想起来就……我们以为发明什么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结

^① 客家话，意指：你们这些小孩，躲快点，要不然会被盐洒到。

果没有更好。

酿酒造醋 检讨水源

我想要面对米来谈论我小时候受害的经验，透过酿酒来讲农民的议题。酒是米的精灵，我也知道台湾的农业很萧条，产量却太大，透过加工可以将米保存起来，这是全台湾人都可以去做的，因此我选择这个。

假设有一天很多人都在做酒，水源的问题就被面对了，因为那是所有个人酿酒庄的利益，倘若水源被污染，人们会拒买他的酒，因此他会站出来捍卫水源。到现在我们所吃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被检讨水源是否被污染了，吃的人还是不知不觉。我一直想强化这个环境的议题。

刚开始，我在新竹的山里酿酒，同时间我也已经酿醋了。当时有些朋友跟我谈醋，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已经有醋了；一般我们对醋的印象就是拿来煮东西、腌东西，没有这样拿来生饮，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做的醋有问题，因为别人做的醋很甜，我的醋不甜。因为我还在怀疑，那么酸、那么强烈的东西……，酸溜溜的要怎么吃呢？我不晓得啊，所以那时我把醋拿来洗狗、给猪防治口蹄疫病。

我现在都没有酿酒了，因为政府设的个人酿酒庄门坎太高，一般人达不到。酿酒有特别法，而醋没有，不会触犯法律，因此我选择作醋。为什么台湾的米那么多，可以转化成酒但政府不肯？假设当年扁政府^①第一次上台时承诺酿酒民营化是真的，WTO^②的问题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们进口太多外国酒；他曾经这样地承诺台湾人民，却设了很高的门坎，扼杀农民生存的权利，转成财团的利益，这证实了扁政府不是要民营化而是要财团化，财团不代表人民。

为了要有更适合做天然酿造的干净水源、空气与土地，我跟着大自然的显现，寻找要落脚的地方。因为我过去有环保经验，

^① 指陈水扁政府。

^②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中文为世界贸易组织，负责监督成员国各种贸易协议得到执行，并对不遵守贸易协议的成员国施行贸易制裁。

透过对公害事件的关心，累积一定能力可以判断这个地方能不能落脚。2002年，在机缘凑巧的情形下，我来到这里（台东都兰），设了这个打碗花^①农场。

刚来时，我透过新的邻居和这块地原先的主人，告诉他们我愿意用比较高的价钱来买卖农作物，请他们帮我找契约对象。后来来了10位农民，他们当然不知道我要种什么，我说，“我先不要讲。”就让他们看有关亚马孙河保护热带雨林的影片，看的反应有些是觉得有争议，也有人觉得感动。问他问题而他回答我接受的人，被留下来；当然感动的人是我们最要留下来的，跟你吵的就不是你要的。最后有5位留下成为我的契约农民。

影片中巴西政府为了要盖水坝而计划砍伐亚马孙热带雨林，当地原住民用身体去保护他们的生活领域，拒绝用钱来估价，这是很伟大的事情。套一句我爸爸的说法，“台湾系肚脐落地呢！”意思是说台湾是我肚脐落地的地方，我怎么可以离开他！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非常震撼我，原来很早以前人类就有这么高明的、人跟土地亲近的关系，我们读再多书也强不过他这句话；我肚脐落地的地方，也可能是我身体落地的地方，我绝对有保护它的义务，所以是对土地的情感，催化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

过去做环保运动累积出来的经验，还有幼年时期帮助父母农耕的记忆，非常深地影响着我，因此我对土地的印象非常深，只要有一个人颠倒弄，我都会知道，因为长出来的东西都会不一样；这部分很难说，我想那是经验。我自己来这边以后也是种了二季，再把这经验告诉他们，一定要自己下地做过，再去讲、经验分享。我也不敢说我是专家，他们会比我更强，回馈给我的东西更多。

比方一分地要15只鸭子，但二分地却不可用30只鸭子，因为鸭子这东西和人一样，15只等量加倍下去，相对地它的破坏性也增加好几倍，因此不能等量增加；我认为还必须要考虑人们耕种时候的行距。讲到蒔田，有些人用蒔田机，我这里则是以人力蒔田。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办法，当地人有当地的常识，因此我

① 客家话，即野百合，客家人称其为打碗花，因为野百合总是生长在水源处，为生态指标，当野百合消失，意味着水源遭受污染，依赖该水源的作物将受到影响，对农家来说，那是直接影响生计、打破饭碗的严重事情。

这边后来没有再以相同的做法做了，而是直接用淹水法，我的契作农民用我的有机肥、倒进酵素，原本野草在水里就不太会冒，酵素会分解野草的种子，酵素是人可以吃的；人、地、蚯蚓都可以用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拿来用。

自然农法 净化过的土地

除了契作农民之外，我也透过演讲告诉消费者你应该要什么。前一阵子“环保联盟”找我演讲，我的题目是“从一双筷子做环保”，就是想告诉大家，面对环境的事情是非常严肃的，把所有不该在盘子里的污染素全部剔开，这样他们就不会生产污染，地球才会得救。消费者要的应该是来自好的土地、活化过的土地、有蚯蚓的土地、在那里生产出来的东西。那样的土地，农夫走过，勤劳的农夫做出来的东西我们才要。所以应该要求农夫一天做几小时？去看他的手有没有摸过地，就知道他种的东西是不是干净、是不是来自于自然农法。

我觉得有机二字有待争议，应该是谈自然农法，来自干净大地，用这种方向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能量、好的质量。水、土、光、热是农业的大资财，但现在的人都不讲这些，甚至用温室在种东西却说它是有机，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最后里面的土地都酸化掉了，还要换土，这怎么会是有机？而检测的标准是谁来定的？这个标准不应由人来定，而是应该由大地来定，由蚯蚓来定。

在这过程中，我最大的困难是亲人不能理解我，他们怀疑我没有钱所以想要骗人，说是做环保运动，并要我花非常大的力气证实我不是；我并没有如此为何还需要证实？我所面临最大的挫败，是人性那种莫名其妙的谣言中伤，那些流言其实是财团与政客挂钩放出来的流言，以及人民无知所造成的谣言与伤害。

但我认为那还不够厉害，最厉害的是原来与我并肩作战的伙伴，甚至号称是社会运动的人，以社运的名义，说着和我一样的话，却做不一样的事，他是我最大的耻辱。我被他倒了六百多万元，连农场也差点跟着关闭。刚开始的时候，我用咄咄逼人的方式告诉他，我可能会用什么手法让你恢复我的名誉。但在另一面，真正安抚我的也是社会运动的伙伴，他们告诉我，那些人不是什么要角，他们是个人的目的强过于社会目的的人、是搞选举的人，

你看看那些人，他们从头到尾若不是当人家的什么桩脚就是自己要参选，他们是和资本家挂在一起的，只是挂不进去，因为还未当选，所以挂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因为没有详查而给他挂上，这就是你的伙伴；所以我才能释怀。到现在，我都不敢和政治亲近，因为我不想当政客的业务员。

也有人说，我做的是中产阶级的游戏，我反对这样的说法。现在参与自然农法的农民少，他们要单独对抗很多的虫害，因此应该给农民合理的利润，当变成一群人一起去抗衡、分摊掉的时候，成本自然下降，价格也会跟着下跌。而且自然农法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第一年做的成本高，之后会愈来愈少；我们有近程、中程、远程的目标。这是批评者应该听我们讲的，他们贸然用这种东西来讲我们，说我们贪婪，如此讲法我不能接受，而他们如何？恶习不改！喜欢跟人家戴帽子，那个我不要。他们眼睛没有看到穷人吗？我们是从穷人、苦难中出身，被剥削，所以我们想出一种方式，让原来要买药的人变成买农村的产品，原来从工厂做出来的东西，要从农村里面出去；这样的消费是我们一定要力挺到底的。

我们反而要感谢那些消费者，愿意用这种东西，甚至于有些人只为了正义的理由来消费这些东西，我认为消费者比商人好太多了，反而是商人在欺骗他们，很多讲有机的人经常是搞投机，有机要有生机，可是有机不是投机，我们应该赶走投机者，他拿了很多钱来欺负土地，应该终结他们，我这个部分很强烈。

工业的发展牺牲了社会，劫取社会成本成为他们个人的资本，非常可恶，这就是资本主义走的方向。资本主义的政府从来没有一天为这个环境考虑过，而是透过剥削环境与众人的冷漠，所以面对土地的时候非常残暴。如果把环境当作一个成本去算算，谁还敢如此的大量生产？大量生产都是抢夺后代子孙，我不敢说穷人或富人，因为富人的环境也被抢夺，好似地球人都准备绝子灭孙了，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以前做环保抗争的时候，我曾问人什么是运动，那人说，身体运动有益健康，社会运动有益社会健康。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社会运动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是一路的累积，让我看事情的角度好像有一点精准了，如果愈早做这些事情，愈早关心这些事情，

因为是关心别人的痛苦，她会渐渐地让你离开痛苦，因为透过帮助别人，知道什么是危险而不会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投资，而这是我初期没有想到的。

有朋友说，我开始做醋以后，变温柔了，我不喜欢这样。但人的心很硬，他不要的东西你进不去，如何改善、让他们软化？你不可以用很硬的东西进去，因为硬碰硬，像我现在做发酵的东西，就是要给一个什么样的微生物进到他心里面去，让他慢慢发酵；细菌是长得最快的。

当蚯蚓来了 和平就来了

你问我理想中的和平生活是什么样子？我理想中的是没有国家，但做起来又好像……我认为跨国际贸易其实是跨国际的污染，什么物畅其流！资本家的总站就在银行，我们应该要对这东西产生怀疑，终极是要生产和使用平衡。银行与蚯蚓是头跟尾，银行不见了，蚯蚓起来了——我不知如何形容——就是和平。

当银行不见了，不需要那么多钱，不会贪婪，资源会节省使用，不会消耗得那么快，但如果我们把他们变成钱，资源会被掠夺、被储存，用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被少数人所滥用。

当消费没有那么疯狂，每个人就会回到自己的岗位好好面对自己的专业领域，炫耀自己的价值，而不是把它变成钱；那个价值的炫耀将百鸟齐鸣。欣赏每根草的美，回到手工艺的时代，热情开始起来，交流开始起来，减缓了速度，动作慢下来了。教育的目的是让你认识更多的东西，而不是让你认识到你是一个机器去帮人家做东西，那目的就会不一样，孩子会更解放出来，真正回去做孩子，母亲会被解放出来，真正回去做妈妈，领导者率先表现他的朴素，这是很至高无上的价值，那是可炫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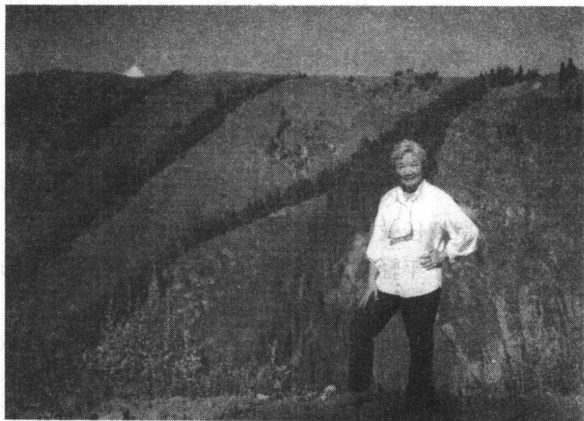
好好以人为本、以地为本、以后代子孙为考虑；现在则都是银行、银行。变成数字是很可怕的，拼经济是大有问题，应该是布置幸福。掌握从你眼前过的每一个人，会是很棒的事情。当银行不在的时候，金钱没有意义，因为不会赚到什么东西，我们会回到手工业时代，因为工厂机器环境令你比较不舒服，而手工业是令你比较舒服的。人常常被金钱取代掉，而没有发现自己有更好的方法，人类发明金钱是想透过金钱追求幸福，但往往是金钱

到手幸福却远走，那样的荒谬性一定要被讨论！

我很想建立一个酿造村，村子里自给自足，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人才，每个人能说、能唱、能跳、会画。人本能所具有的东西非常强，请政府不要介入、不要入侵。如果要独立，台东率先独立成台东国，只要二边一封就独立，独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他们不要开高速公路；阿扁说要独立，可以，依此类推，台东也可以，又没有讲说要多大独立多小独立，为什么是要一个台湾？从文化来看，我说我是一个台东，有什么不对？独立，应该是人格独立、人人独立。

徐凤翔

一息尚存 不落征帆



文：姚晓晓

和平是整个自然界里不同因素的和谐，包括人跟环境要素，人跟生命要素，以及跟非生命要素之间的和谐。

事业是不停顿的，生态保护是社会的需要。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愿望，生态环保对自己来说，是分内的事，责无旁贷。

“生态环保是我终身的事业，那是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要做的事，责无旁贷。”

“社会的需要，事业的需要，自然河山的需要，是我能够坚持50年搞环保的动力，在我看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分内的，而不是分外的。”

说这些话的是徐凤翔，一位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她五十年如一日从事森林、生态、环保的教学、科研、保护工作，开辟了中国高原生态研究领域，创建了西藏和北京灵山两座生态研究所。如今，徐凤翔已经74高龄，仍怀着“一息尚存，不落征帆”的坚

定信念，为中国大高原的生态保护进行实地考察探索。

开拓西藏小木屋

徐凤翔用“两座木屋，一世情缘”来概括自己与西藏和北京生态研究所的关系。

徐凤翔 1931 年生于江苏丹阳，1955 年毕业于南京林学院，并留校任教，从事森林生态的教学科研。

年轻时的徐凤翔就一直向往着到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特别憧憬到西藏去。

1978 年，南京林学院在校内招募援藏教师，奔赴林芝的西藏农牧学院教授两年的森林生态课程。徐凤翔当时 47 岁，听到消息后很激动，觉得机会来了，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

“我对很多艰苦的地方都没有什么恐惧感，工作就是要到艰苦的地方去，这是很自然的，也许跟个人性格有关。”徐凤翔这么解释自己最初的选择。

徐凤翔工作以外最大的爱好是文学。在赴西藏之前，与亲人分别之际，她做了四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自己献身林业的决心：

临别自咏

人生倏忽数十年，焉能虚度如云烟。
鸟过留声人留迹，献身林业了终天。

少年立志在山林，如今白发染双鬓。
愿效苍松傲霜雪，汗水浇得遍山青。

暮春三月江南绿，东风和煦花锦簇。
柳丝千条绾不住，壮心飞向珠峰麓。

任重道远赴边疆，夕照征途鞍马忙。
毋需返顾江东岸，留得余辉育栋梁。

徐凤翔毅然告别了锦绣江南，告别了挚爱的亲人，奔赴西藏。西藏的天总是蓝蓝的，树总是绿绿的，热爱自然的她很快喜欢上

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刚去西藏时，她的主要工作是在西藏农牧学院教书。她是一位既和蔼又严格的老师，注重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的学风，谁要是不认真学习，很可能考试的时候会被判个不及格。她十分重视实践环节，教书时注意联系西藏林区的实际，经常带领学生到各地森林去考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她倾注了自己大量的心血，培养了一批志愿献身生态事业的优秀人才。

在授课之余，徐凤翔马不停蹄地考察了林芝、米林和波密一带的峡谷森林，收集到了很多高原生态资源的一手资料。她常常陶醉于秀美的高原森林中，在造物主的神奇创造中感受着自己心灵的净化，她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与日俱增。同时，她深刻感受到这里的生态资源丰富，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在生态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她感到这里有她未完成的事业。

两年援藏任务即将结束时，徐凤翔已经积累了很多对西藏高原森林资源的认识，同时积累了对西藏这块神奇土地的深厚感情，她已经被西藏深深吸引住了。年近半百的徐凤翔决心留下来，在这里开垦一片事业的新天地。

徐凤翔开始为建立高原生态定位研究所努力，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西藏“小木屋”的建立。但是想要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徐凤翔是个书斋里出来的学者，不太懂得怎样跟上级拉关系套近乎，只能一有时间就到这些部门去“游说”，不厌其烦，于是得到了“咕叽教授”的外号，那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一看到她，就说，咕叽教授又来了。磨破了嘴皮子，可是建立“小木屋”的想法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小木屋”迟迟建立不起来。

“小木屋”最终得以建立，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作家黄宗英。

1979年中国科协在成都召开全国的学术年会，徐凤翔作为西藏的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大会上她谈到西藏生态研究的价值，提出自己对西藏生态系统进行定位研究的愿望。

当时在场的黄宗英听到了她的这些想法，非常感兴趣，表示支持她，2人约定了在西藏见。一开始徐凤翔觉得科学和文学分属两个十分不同的领域，很难有什么交流，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后来黄宗英果然来到了西藏。她同徐凤翔一起进行了长达70多天的考察，从拉萨一路考察到藏东南。她们同吃同住同工作。闲暇的时候就聊天，徐凤翔提到她想在林区里建定位研究所的梦想，哪怕只是搭个帐篷或盖座木屋。黄宗英很赞赏徐凤翔的想法，于是两人并肩努力，通过艰难的呼吁和企求，1985年，经过8年艰苦的筹建工作，一座平凡而意义重大的小木屋终于出现在藏东南的高原林区，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终于建立起来了。黄宗英写的报告文学《小木屋》风靡全国，人们开始知道徐凤翔这个在西藏高原的艰苦森林中为生态研究孜孜不倦的学者。这是一段科学与文学并肩合作的佳话。在后来的日子里，徐凤翔遇到困难的时候，黄宗英多次鼎力帮助。20年后，当古稀之年的徐凤翔谈到对自己的事业帮助最大的人时，第一个想到的仍是黄宗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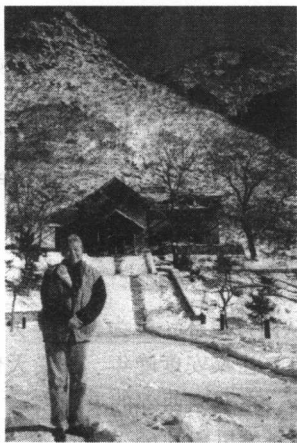
徐凤翔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将高原生态作为生态学的一个分支，而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西藏小木屋）作为一个以高原为研究对象的生态研究机构，在中国属于首创，它揭示了青藏高原在生态学科上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西藏小木屋经过了8年筹建、10年建设的过程，徐凤翔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做了大量独特的研究，成果丰盈，使高原生态研究在世界生态学中占有了瞩目的位置。

徐凤翔在西藏一待就是20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着艰苦的科学探索和研究工作。她考察了西藏的20处主要林区，野外考察行程达13万多公里，西从狮泉河经羌塘“无人区”，东至金沙江畔，上达珠峰大本营，下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获得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和多项发现，在不少方面填补了高原生态研究的空白。

徐凤翔还提出了切实独到的高原生态与环境保护的理论并加以实施。在考察中，西藏景观的神奇、壮观和物种的多样性让她陶醉，但同时她敏锐地发现，这里有许多珍稀濒危物种以及生态脆弱区域。她为此深感忧虑，于是她进行了反复的思考与实践，在生态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指标方面均有科学的阐明与界定。如对珍稀濒危的概念作了深入探讨，对西藏的高、寒、干、荒、陡生态脆弱区量化指标进行确定等。

她为保护珍贵的自然资源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过她的多方奔走呼吁，终于促成了墨脱自然保护区、岗乡高蓄积量云杉林保

护区等若干保护区的建立；她考察了多处珍稀古树巨木以及生长特异呈乔木状的灌木，并呼吁保护；更对高原的多种花、果、菌、药资源的优势与保护价值进行研究、揭示，为西藏自然资源的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做了大量的工作。她被认为是高原生态科研教育和环境保护的先驱，当地人亲切地称她为“辛娜卓嘎”，意思是“森林女神”，而她则认为西藏激发了自己生命里的第二次青春。



成就背后则是艰辛的默默付出。熟悉徐凤翔的人都知道她平时很爱干净，甚至有点洁癖，衣服掉在地上，她肯定要重新洗过再穿。在高原森林中，环境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卫生条件常常难以达到她的要求，但她都让自己尽力克服了。她还经历了常人不可想象的各种艰难险阻。为了揭示西藏高原珍稀生物资源，她三进墨脱，深入危险的高原林区，遇到的大险不计其数。她三次考察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林区，有一次经过时，遇泥石流阻道，曾险过溜索独木桥，越过深不可测的峡谷急流；乘马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在山上吃过毒蘑菇……林区各种吸血昆虫动物，蚊、螨、小咬、蚂蟥等，更是防不胜防，她有过一天被400多条蚂蟥附身的遭遇。她第一次进墨脱时，身罹重病，恶性疟疾，高烧（41.5℃）昏迷，险些“骨埋青山”。而当她初愈出沟后，却豪情地自赋：“九死一生，墨脱庆还，……一息尚存，不落征帆。”此后为了继续探索，她又于1985年、1990年，两次入墨脱，最终写

下墨脱珍稀濒危植物的调查报告。经历了九死一生，她对于这些艰险早就习以为常，无所畏惧。她早已将自己的生命与高原森林紧密联系在一起，艰难和险阻只能增强她的意志，坚定她献身林业的决心。

人藏18年，徐凤翔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却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对于老伴和孩子，她常常怀着很深的内疚情绪，感到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她的老伴范自强在南京林学院教化学，为了支持她进藏，也来到西藏农牧学院，教了半年化学。她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他们成长的重要时期，她却不能常常待在儿女的身边，不能全身心地倾注母亲的关怀。有一次，她开玩笑地说，如果自己是那个尼姑就好了，就不会拖累家人了，自己就可以放心地与山林终身为伴。幸运的是，她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环保绿地 灵山小木屋

1995年徐凤翔从西藏退休，她为林业辛劳了大半辈子，在别人眼里本该好好休息，在家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了，而她却应北京有关方面邀请，在北京西郊的灵山创建了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即灵山小木屋。徐凤翔以65岁的高龄，继续从事生态环保科研与教育工作，她要把自己的余生投入到生态环保事业中。

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徐凤翔觉得这里的情况跟西藏那边的情况较为接近，一开始她只是想在这里作为介绍西藏小木屋的窗口，但没想到，她在这里一干就是10年。灵山小木屋，在她与全所人员、各方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灵山小木屋现设有西藏高原景观生态展室、灵山生物多样性展室、“中国高原生态众览”展室和温凉植物引种园地等，被建设成了生态研究、西藏博物院及青少年生态教育三位一体的生态科教园。

灵山脚下原为一大片荒草地，经过10年的辛苦经营，研究所划定的这块地方被改造成了片环保绿地，山坡上，院子内外，都栽上了各种植物，每年夏季，这里绿树成荫，山花烂漫，一片生机盎然。

灵山小木屋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院子里很多小木屋上刻着徐凤翔自己写的诗，署名一律是“木屋山人徐凤翔”。一块石匾

上还有黄宗英题的诗句：大智者以献身达无量妙意，小木屋为理想蕴永远梦幻。

深深怀念西藏的徐凤翔，赋予了灵山小木屋浓厚的西藏风情。“北京灵山西藏博物院”里展出了各种具有西藏特色的动植物标本、生活用具等，使灵山小木屋成为介绍西藏的一个“窗口”。

徐凤翔对灵山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了考察，她在这里采集压制了400多种植物近千份的标本。她把采集到的标本放到生物多样性展厅里展出，很多人发出感叹，没想到灵山有这么丰富的物种。她还引种了很多西南、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植物，其中有很多是从西藏移植过来的。

如果说西藏小木屋主要从事科研的话，对于灵山小木屋，徐凤翔则主要把它定位为一个生态教育基地，10年来，开展了各种生态环保夏令营活动，进行生态保护方面的讲课，创建“灵山生物多样性展览室”和“西藏自然景观与资源展览室”，以培养青少年的生态环保意识和参与行动，学习人数达8,000余人。对于过往的旅游者，她同样友情接待，进行生态环保教育。同时还应北京及外地各大、中、小学以及有关省市、单位的邀请，做生态环保、考察经历等的报告。

她还在推动北京灵山的旅游经济开发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在小木屋的影响下，灵山曾经开展了“西藏风情节”和京西以西藏为主题的旅游内容。

2001年夏季，徐凤翔主动承担了世界自然科学基金制作“保护青藏高原”的青少年科普教材的科学指导任务，对青藏高原进行了生态回访。9年前，61岁的她首次探访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被同行认为“创造了一个第一”，而今70高龄又一次攀上珠峰大本营，更是奇迹中的奇迹。2002年夏季，她又考察了新疆，2003年考察了云南。

徐凤翔从事了半个世纪的生态研究，她的教学科研论著颇丰，并且有多部著作获奖。她著的《西藏波密高蓄积量云杉林的生长结构与生物量的研究》获西藏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西藏色季拉山林区生态植被类型及其利用与保护》获国家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西藏高原森林生态研究》获中国第十届图书奖；《中国西藏山川植被》获华东地区图书二等奖。

她还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2000年获第四届地球奖，还获得了“环境使者”、“绿色使者”等称号，被评为环保教育先进工作者奖。

现实的困境

成就和荣誉背后必然是常人领会不到的艰辛。提起徐凤翔，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她在西藏的小木屋，然而，她却感到在灵山的这10年，比起西藏来，要艰难得多，也更无助。

灵山小木屋建了10年，却始终处于比较窘困的状态，一直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按徐凤翔的话说，这个研究所是浮在半空的，既像个NGO，又不完全是，就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费用都是徐凤翔一个人跑破了鞋磨破了嘴皮讨来的，但常常是，别人听了她的事迹和想法，都觉得感动，对她客客气气的，却很少提供真正的帮助。各种科研课题几乎批不下来，拿不到经费支持，到灵山来从事科研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但这里条件艰苦，经费不足，一心想来搞科研的却分身乏术，每天都有各种杂事要做，科研难以开展，到现在都走得差不多了。一些志愿者，能撑到3个月也就不错了。灵山研究所的运转需要大量日常的维护工作，而现在稳定的工人也就三四个，一般都是当地的农民。夏季工作繁忙的时候，雇佣来的工人一般都干不长，工资低，条件苦，事情杂，不久便离去。按徐凤翔的话说，现在讨钱越来越难了，经济上的窘困束缚着灵山研究所的发展。现年74岁的徐凤翔，越来越感到灵山生存的危机。自己已经岁数一大把了，不知道还能干几年，而接班人却迟迟没有找到。能够耐得住寂寞，愿意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的年轻人太少了，徐凤翔有点无奈。

在灵山工作了5年的董师傅说，徐老师是这里的旗杆，她要是离开了，旗杆就倒了，灵山研究所可能就难以存在了。

在北京，还没有第二座生态研究所，徐凤翔很珍视这个科研教育基地，她绝不能让自己养育了10年的孩子中途夭折。她现在最迫切的想法就是为灵山研究所找个正规的隶属机构，能够获得连续的支持，这样灵山小木屋才能不断发展下去，自己苦心经营了10年的研究所才不至于后继无人，到那时，她才能放心地离开。徐凤翔身上更多的是学者之风，有时还会带有一点知识分子

的清高，她不会到处张罗人，但为了灵山小木屋的生存，这位曾经的名教授还要咕叽下去，要为灵山生态研究所找到一个好归宿，就像看着自己的女儿出嫁。

坚韧的和平天使

古稀之年的徐凤翔在回顾半个世纪的林海生涯时，感到最遗憾的是知音太少。

从西藏退休回来时她可谓功成名就，也该享享清福了。在西藏的18年，她没能好好兼顾家庭，内疚之情时刻萦绕心头，退休回来，似乎到了她给家庭补偿的时候了，然而她却继续为灵山小木屋奉献了10年的心血，投入了自己大部分的精力。老伴身体不好，有糖尿病，需要她照顾，小孙子的生活与学习也需要她操心。她，一位现年70多岁的白发老人，却仍然不辞辛劳地奔波于距离北京市区100多公里的灵山与位于北京市区的家之间，竭尽全力兼顾着她所钟爱的事业与她所珍爱的家，除了每天几小时的睡眠，她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休息的时候。春夏季，她几乎都在灵山的小木屋操办各种具体事情，秋冬季节，小木屋的工作少了，她就在市区里跑动于各个部门之间，为小木屋的生存寻求各种支持，还经常接受各种邀请出差到外地，在家里的时候，则一边整理几十年来的工作资料，一边照顾生病的老伴和年幼的孙儿。这么多的工作对一位70多岁的老人来说显然是超负荷的，然而，她却觉得自己现在很充实。别人都说，像她这样脚踏实地地干生态研究与环保教育工作并坚持了那么长时间的，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她却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她坚信自己所选择的，并感到生命的充实与快乐。

艰苦寂寞了一辈子，她说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如今到了这个岁数，更是把很多事情看得很开，很透，她不在乎别人的评价。过去，对她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有人怀疑她的工作是为了换取荣誉，现在这些负面的声音淡下来了，因为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别人都看清楚了，如果真是为了荣誉，从西藏回来她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又何必再为生态事业苦苦支撑10年？她自信自己做的是对社会有益的事，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很多人说她不像个妇女，但她不这么看，她觉得根本不应该

分什么是男的应该做的，什么是女的应该做的。人都是社会的人，而女性的负担更重，因为还有家庭的一面。

她觉得和平是整个自然界里不同因素的和谐，包括人跟环境要素，人跟生命要素，以及跟非生命要素之间的和谐。跟生命要素的和谐又包括保护动物，保护植物，还有人本身之间的协调。人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但就是这一个物种，就闹得天翻地覆，战争不断，极大地破坏了自然山河。过去讲和平，只是在人种内部，但现在和平的含义扩大了，关注到了人与自然等方面的问题，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总的来说，在社会整个种群里，这种声音还是太微弱，说的人不多，说的人里面做的人更少。

支撑着徐凤翔为生态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事业是不停顿的，生态保护是社会的需要。没有人给她加派任务，所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只因为她深刻体会到了生态环保的客观需要，她觉得生态环保对自己来说，是分内的事，责无旁贷。

74岁的徐凤翔头发白了，但她却觉得自己的思维没有老化，举动也没有缓慢，而是越来越利索，家里家外，该兼顾的都尽量兼顾到了。虽然觉得很苦很累，但她说她还要继续干下去，“一息尚存，不落征帆。”

这就是徐凤翔，一位身体力行地从事生态环保事业的学者，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妇女，一位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去实践着和平理想的天使。

田桂荣 民间环保大使



文：苏建军

我是修理地球的，是搞环保的野战部队。

建设生态农村、让大家喝上干净水、呼吸上新鲜空气……

279

子孙后代给她拍手

田桂荣 1951 年 4 月 26 日出生，河南省新乡县合河乡范岭村农民，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村办纸板厂搞业务，为企业做过贡献。

1992 年，她和丈夫带领一双儿女来到新乡市闯市场。开始，他们白天批发少量电池在路边卖掉，晚上在火车站附近铺张报纸睡在地上。慢慢地，他们用积攒的钱在新乡市一个批发市场租了一个固定的摊位。

1998 年是田桂荣人生的一个转折。那是她在河南省新乡市卖电池的第 8 个年头，已是当地有名的“电池大王”。这年，因假货

冲击市场，田桂荣配合打假，结果惨遭报复，被骗走1万元的货，此后又相继被客户、朋友骗走3万元。儿子担心她的身体，在请老妈吃了平生第一碗河南烩面后，送她上了去北京散心的火车。

生命的一页

田桂荣至今记得：7月23日，那是1998年北京最热的一天。她躲在钓鱼台附近的一个小宾馆里吹空调，无意中看到报刊上的一篇文章，标题叫《电池虽小污染大》，说的是无论是裸露在大气中，还是埋在地下，其中含有的汞、镉、铅等重金属，都会随废液一起流出，造成对地下水、土壤的污染。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使用价值；一粒纽扣电池能污染6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废旧电池所含重金属，在人体累积能致人多种病变，如果把这些废旧电池随意丢弃，就会严重危害居民及子孙后代的健康。

简单的推算震撼了田桂荣：我一年要卖上百万节电池，如果埋到地里，那么将污染100万平方米的土地！这篇小文章像有魔法，从此打开了田桂荣人生的另一页。

想到自己销售出去的数不清的电池，可能已经破坏了家乡秀美的山水，她的内心失去了往日的平静：田桂荣的家乡新乡市合河乡范岭村也曾是个美丽的村庄：那时的空气特别清新，几十里外的太行山都看得清清楚楚，冬季有成千上万的大雁在坡地里栖息；和丈夫谈恋爱的日子里，两人在河堤上慢慢行走，身边有烂漫的桃花……这一切让田桂荣如此难忘。可是，后来环境污染、空气污浊、河水变黑、转眼美丽成为记忆。

自费回收旧电池

出门不到一个星期的田桂荣匆匆赶了回去，着手调查以前的废旧电池的去向。结果让她吃惊——在新乡，这个电池主要生产基地，一些生产厂家不是把废电池扔到井里河里，就是拉到黄河岸边埋了。

此后，田桂荣去拜访河南师范大学化学系的杨教授。杨教授向她证实了电池污染环境的说法，并对她说，“回收废旧电池，对推动电池无害处理、保护地球环境有推动作用。”

由此萌发了自费回收废电池的想法。

她告诉家人：“我想回收废旧电池，无偿交给国家处理。”

田桂荣迅速行动：田桂荣自己起草“倡议书”，向新乡市各界呼吁：“全国每年产电池140多亿节，新乡产量就达10多亿节，但巨大产量的背后却是用完后一扔了之。这样做，直接影响了地下水源及生态平衡，给子孙后代埋下隐患。作为新乡市电池销售行业的一员，我决定从自身做起，回收废旧电池。望您把废旧电池卖给我，让我们的地球更加洁净！”

田桂荣就拿出自己做生意赚来的钱，以每节二分钱的价格自费收购。

田桂荣制作了1,000面印有“以旧换新、拯救地球”字样的绿色环保三角旗，写上回收废旧电池的地址及电话；制作了200只透明的废旧电池回收箱，放在人群比较集中的公共场所。发放给来商店批发电池的客户；印制了3万张倡议书发放。从此，新乡市的大中小学、机关、商店等地方，都留下了她宣传保护环境回收废旧电池的身影。几个月下来，田桂荣花了两万多元。

田桂荣的批发部是两层小楼，门口有两块牌子：“加入环保行动，拯救我们的地球”、“手中的钞票要成为环保的选票”。批发部成了环保宣传部。田桂荣的不懈努力，激起了人们对废旧电池危害的极大关注，新乡市乃至河南省的很多市民，也都纷纷加入到收集废旧电池的行列。

田桂荣开始回收废旧电池的头3个月，回收箱一直空空如也。

1999年春节，田桂荣想出宣传新招——哪里有人就往哪扔电池，同时发放回收宣传单。

冰天雪地里，孤军奋战的田桂荣骑自行车迷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干。

终于有了回应。这年春节，一个老头给田桂荣送来了第一批回收成果——9节废电池。不久后，河南师范大学的一位毕业生找到田桂荣，第一句话就是“你没有宣传，我就是你的宣传员。”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慢慢地，田桂荣的环保事迹为人们所认识、所了解。美国的一家报纸报道了她的事迹。国内的采访也接踵而至，有关部门也开始关心她的事业，新乡市环保知识电视大赛上，还专门设计了

一道题目：“田桂荣回收废旧电池的地址在哪里？”

新乡市的大中小学、机关、商店都留下她宣传保护环境回收废旧电池的身影。田桂荣迷上了环保，不但挣钱少了还倒贴钱，家里人不理解，不支持。但田桂荣“痴心”不改，她的义举得到了群众的热情支持。丈夫和孩子们也终于被感动，每逢在家里、店里接到送废旧电池的电话，不但热情接待，还深夜租车把一袋袋废旧电池拉回来。

2001年5月，她收到美国格雷特曼基金会寄来荣誉证书、奖金及一封信的喜讯轰动了整个新乡市。格雷特曼基金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旨在奖励表彰国际上为公众事业做出显赫成绩的各国民间人士。

据悉，田桂荣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这位因自费回收废旧电池而无法给废旧电池找到归宿的农村妇女曾遭到不少人的冷嘲热讽。如今突然间获得了国际大奖，才使周围的人明白：原来，环境保护是一个关乎全人类的大问题。

2001年7月中下旬，田桂荣与河南师范大学环保协会的的大学生一行30余人，驱车50公里，走过11个乡镇26个村庄，发放传单3万份，回收废旧电池和废弃垃圾近两吨，整整装了9麻袋。活动结束后，师大的同学们哭了起来，他们为田桂荣身上那股非凡的力量深深打动。

“很多人认为我疯了，只有地球理解我，但它不会说话。”田桂荣说，“我总觉得子孙后代在给我拍手。”

同年田桂荣还荣获“福特汽车环保奖”。

她并非“暴发户”，有一年春节，田桂荣只买了几十元的年货。在回老家冰天雪地的路上，看见身上背着最好的家当——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个炒菜锅的丈夫和儿子，她哭了。“如果我没有收集这些废旧电池的话，我们也能买起自己的车开着回家了。”她说这话时显得特别愧疚。为了回收电池和环保宣传，田桂荣因不借钱救急得罪过亲兄弟，把废旧电池往父母屋里堆放挨过骂。

“她从外地回来后，像中了魔，生意不做家不管，整天张口环保，闭口环保，把挣的钱全部贴在环保上面，这个家都快让她给折腾垮了。她这样做有什么利可图呢？”田桂荣的老伴范子诉苦。

回收旧电池难 处理旧电池更难

3年时间，田桂荣那里已累积50余吨废旧电池。

让她意想不到的，废旧电池的处理比回收更难。

为了给这些固体污染物找一个理想的“归宿”，田桂荣四处奔波：先是找到当地一家电池厂，该厂技术负责人告诉她，回收处理一节旧电池比生产三节新电池的成本还高，这家企业不愿干这件事。

她又找到省市环保部门，甚至专程到北京找有关部门咨询。但问来问去，得到的答复都是“受技术条件限制，目前无法处理。”

一方面，她回收的废旧电池处理不成；另一方面，市民们送来的废旧电池越来越多。

一开始，她把废旧电池放在自己的门店和租住的两间屋子里。屋子放不下了，她又临时联系了一家电池厂的空闲仓库。

时间长了，电池厂也不让再放了。

没有办法，她只好一车一车地把废旧电池送到离市区十多公里的乡下老家：一栋两层10间的小楼全堆满了各种型号的废旧电池，搁不下了，她又找到中华电池厂，借该厂的一间仓库暂存。由于屋子里堆满了废旧电池，致使田桂荣儿子的婚期被一再推迟。

她儿子小范早就谈好对象了，只等着用这房子举行婚礼，就是因为废旧电池没地方放，婚期只好一拖再拖。“再咋说，我也不能让儿子在别人家里举行典礼啊！让媳妇先进别人家的门，乡邻们会笑话的。”说起这些给她带来荣誉感和自豪感的废旧电池，田桂荣面带愁容。

这不是长久之计，田桂荣一时陷入尴尬的处境之中。

田桂荣感到压力和彷徨，进退两难，实在憋得受不了，田桂荣就跑到太行山上放声痛哭。

丈夫老范再也无法忍受，提出回老家种地。“实在不行，离婚了也要搞环保。”田桂荣的倔劲，九头驴也拉不回。她还生气地打了个比喻：“以后人们盖个庙，我是个慈善菩萨，你不支持我搞环保，人们都像打秦桧一样打你的头。”

虽然不怕被“打头”，刀子嘴豆腐心的老范说：“老都老了，

就这样凑和着过吧。”

从2000年到2002年，每年春节全家都要一起过年，老范先把电池从房里背到院里，一家人挤一张床过完年，老范再背回去。

2001年，骑虎难下的田桂荣去北京“取经”，某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了田桂荣的呼告：《谁能帮我处理20吨废旧电池》。田桂荣没想到，“真经”没取到，媒体的关注再次引发更多的电池涌向她这里。

有人找上门来，要以300元一吨的价格买下旧电池。田桂荣问：“你怎么处理呢？”回答：“抽掉铜针，废料深埋”。废料深埋就会污染水源，破坏生态。田桂荣断然拒绝：“不卖！就是1万元一吨也不卖！”

面对这小山般的旧电池，田桂荣寝食不安。专家说集中存储对环境的威胁更大。

不少环保专家向田桂荣建议，最好将废旧电池集中封存，比如像德国20世纪70年代做的那样——把岩石钻孔，再塞进废电池，然后封死。但这种处理办法需要不少资金。可是，田桂荣已经掏干了家底。

“急人呐，真希望快点造出个机器。”田桂荣很沮丧：“早知道没有，我就不费这么大劲收集了，听人家说我这是集中污染，罪过更大，现在是进退两难……”



田桂荣坦言自己是为“义”所困，现在是骑虎难下。

2001年，正值被几十吨废旧电池压得直不起腰的田桂荣，获得了一份荣誉：福特国际环保奖三等奖。

但是田桂荣希望得二等奖或一等奖，如果那样，就能获得比2万元更多的奖金来回收废电池。某报记者曾和她开玩笑，别人都是有环保组织的，你没组织，所以只得三等奖。听罢，田桂荣心中一动，如果成立环保协会，自己就不再是孤军奋战了，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环保，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双枪老太婆——成立环保协会、环保网站

于是，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田桂荣又“自找麻烦”地开始筹建环保协会。一个农妇想成立环保组织，没这样的先例。田桂荣跑环保局，跑民政局，前后跑了200多天，光环保局就跑了不下80趟。

有人讽刺她，废旧电池都没法处理，还想成立环保协会，努力的结果只换来一堆“难吃难咽的话”。

这时，有人建议，建不了协会就建网站。

2001年9月12日，田桂荣投入3,000元，请人建起了“田桂荣环保网”，并开始学习打字和网站管理。由她建立的环保网站开通至今，该网站已在田桂荣的指导下改版了5次。

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农民建立的环保网站。她在网上呼吁，及时拿出解决废旧电池无害处理的科学方法，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这项有益于人类自身的事业。

2002年2月，筹建环保协会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协会成立的时候，田桂荣在台上讲话，老伴老范在台下流泪。他说，老田跑得太辛苦了。

协会的一些成员都是专业人士，说起这点，田桂荣特别得意，人家都说田大姐是外行领导内行，每次开会的时候身边坐的是八大金刚。

有了协会和网站，大家称田桂荣为“双枪老太婆”。

此后，“双枪老太婆”先后帮一些学校、公司建立了环保组织。目前新乡市几乎每个县都有该环保协会的分会，全国会员已达1万多。

协会和网站每年的运转费用支出，最少需要3万。为了协会的活动，田桂荣也去企业拉过赞助，但收效甚微。所以，目前大部分活动经费还得田桂荣自己掏。

2002年10月22日，新华社报道了田桂荣的困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几十家媒体或转发或评论，支持田桂荣的环保行为。

许多单位和个人打电话或写信给田桂荣，要为她提供帮助。国家环保总局领导专门作出批示，要求河南省局尽快对田桂荣回收的废旧电池进行处理，保护环保志愿者的热情。

河南省环保局在新郑建成了一个300多平方米、可暂时存放几千吨废旧电池的仓库。这个仓库接纳的第一批“货物”就是田桂荣的这65吨废旧电池。

2002年11月，河南省环保局将废旧电池运走。65吨废旧电池，装满了两辆加长的载重卡车。

从关注流域生态到关注村庄污染

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鼓舞了田桂荣的信心。随着对环保认识的深入，田桂荣最初关注废旧电池的目光，拓展到河流污染状况、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

有一年，田桂荣回到农村，当地乡亲对她说：“你在新乡市里回收废电池保护环境，你该来农村看看，农药有多少，污染有多少，河都成什么样子了，得癌症的一年比一年多。”

田桂荣震惊了，她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回收废旧电池的问题。田桂荣通过学习，渐渐了解了更多的环保知识，如绿色消费、保护湿地等，她的环保之路也越走越宽。

从2000年起，田桂荣每年暑假都组织学生考察河流。第一次考察黑水卫河，大家徒步走了三四天，脚都磨起了泡。因为闻多了排污口的废气，田桂荣中毒晕倒在路上。

从2003年起，田桂荣把调查重点投向黄河和卫河。她多次带领环保志愿者，沿黄河两岸进行企业违法排污调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她们绘制出了详细的企业偷排污水管道示意图，提供给有关部门作为调查的依据。

2002年获得全国第二届“保护母亲河奖”后，田桂荣觉得自己不能白拿这个奖。

2003年2月，田桂荣去北京领“《中国妇女》时代人物奖”，列车员要田桂荣补卧铺票，没钱补票的田桂荣特别难受。后来接

受记者采访时，她说为了环保愿意卖奖杯、卖肾。此话经媒体报道后，田桂荣遭到领导批评。回想当日的这句话，田桂荣说：“我只是想向我崇拜的英雄黄继光、董存瑞一样，表个舍命也要保护环境的决心。”

2004年7月，她带领志愿者，行程1，300多公里考察黄河。

成为一名环保公众名人后，田桂荣却又“舍命”干起了“卧底取证”的险活儿。为了取得一些厂家的排污证据，田桂荣全家老小都当上了“地下工作者”。尤其是老范，常骑着自行车去转转，装一瓶污水回来，由田桂荣拿去向环保局举报。

因为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告密”工作，田桂荣没少接到威胁电话，但她没有妥协。然而，有一次的遭遇却让她很伤心。

那次拿到证据后，她带着环保局去厂家，结果事先得到风声的厂家提前做了准备，让他们扑了空。环保局的工作人员以为田桂荣戏弄他们，在半途中将她赶下了车。田桂荣饿着肚子徒步回到家，辛苦半天的夫妻俩泪眼相对。

“有些都是每年出口创外汇几十万的企业，全县都指着他们发工资，能让人家关门吗？我妈她太执著了。”儿子范海涛摇头叹息。

在外面“多管闲事”的时候，常有人问田桂荣，你是环保局的吗？这个50多岁的农村妇女不乏幽默地说：“我是修理地球的，是搞环保的野战部队。”

去年的一天，老家合河乡范岭村一位乡亲找到她说，你整天保护这保护那，为啥不保护保护咱范岭村的环境？如果再任由他们污染下去，咱们村快成癌症村了！对呀，保护环境为什么不能从自己身边做起呢？

田桂荣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清清的卫河水从村庄北边流过，夏季的夜晚，经常可以看到从河里爬出来乘凉的乌龟和螃蟹。可是，自从近几年村庄附近建起了不少化工厂、镀锌厂后，河里不仅鱼儿绝了迹，发臭的河水让人几乎不敢走近。前几年，一位村民在早晨起来锻炼时，被化工厂排出的氯气熏倒，第二天便离开人世。村里的庄稼，更是成块成块地被熏死。

从2005年秋天开始，田桂荣对卫河和共产主义渠的污染情况作了全面调查，并把自己的调查结果汇报给有关部门。没曾想，

有关排污企业不但没有关停，当地一些人还对田桂荣横加指责，说她举报企业偷排污水，是为了自己出名而断大家财路。有人甚至跑到田桂荣家威胁她说，要想搞环保，你去别的县市搞，别在自己家门口搞。否则，活着不让你进村，死了也不让埋在村里。

此外，也有人风言风语传说：田桂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把企业都关了，当地经济还咋发展？村民还咋奔小康？有人干脆当面对田桂荣说，别看你得过这大奖，那大奖，有本事你来试试，看你有啥本事不让企业偷排污水？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真的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吗？抱着一试的心情，田桂荣报名参加了范岭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在竞选演说时，她提出了建设生态农村、让大家喝上干净水、呼吸上新鲜空气的竞选宣言。

和田桂荣竞选村委主任的，有一位是村里一家镀锌厂的负责人。虽然镀锌厂对环境也有污染，但这位负责人经商办厂多年，经济基础雄厚，曾为村里公益事业做过贡献，在群众中也有一定号召力。竞选村委主任正式候选人时，这位负责人得 290 多票，位居第一，田桂荣得 270 多票，位居第二；第一次正式选举时，有些污染企业老板为了不让田桂荣当选，专门放假三天，让工人们回村做群众工作，结果双方得票均不过半数，选举失败；范岭村举行第二次选举，素有“民间环保大使”之称的田桂荣以微弱优势胜出，当选为这个重污染村的村委会主任。好多村民激动地说：“咱老百姓终于胜利了。”

田桂荣：能否实现生态梦

2006 年 6 月，记者到范岭村采访。已经当选村委主任的田桂荣正忙着为村民打井。看到她穿着一身蓝天白云图案的衣服，正在村部简陋的办公室里对着麦克风，向父老乡亲们做动员讲话，她要让深水井自来水管铺进每一户人家。在村委会对面的墙上，用红纸书写的村委会主任竞选演讲词还完好地张贴在那里。在演讲词里，田桂荣表示：虽然“民间环保大使”的声誉使田桂荣竞选成功，但是，要想实现竞选时的诺言、让“村民有一个新鲜干净的生活环境”，却并非易事。农妇张家瑞对记者说，选田桂荣就是选环保，谁能实实在在的办实事，说的和做的一样，我们就

选谁。

当上村长一个多月了，田桂荣非常感慨。在村外卫河边上，她指着河上一座桥对记者说，我当村长就是深入虎穴，上任我打了两个漂亮仗：一是修这座桥的桥栏，不知谁夜里偷割了铁栏杆拿去当废铁卖，我要给修补上，带着老百姓把栏杆焊补上，这样人走上去才放心；第二仗是打深水井，已经在村口选好打井地方，都破土动工了，钻探架子都已高高竖起，结果是这块地的耕种承包者又不同意了，于是就连夜召开村民代表会，重新选址。新打成的深水井有134米，管道铺上后，乡亲们就能喝上清清凉凉的自来水了。

提起一个多月前竞选村长的事，田桂荣说，我没有什么优势。选举的时候，有人半夜三更挨家挨户发小传单，诋毁我，污蔑我，我一家一户地说，宣传环保，宣传村务公开，宣传说实话。初选的时候我选上了。第二轮我输了：全村一千余口人，我得了460多票，比竞争对手少了30多张；但还是不甘心，找着机会，就对村民说，为了环保，为了家园，为了子孙后代，请你们为我投上神圣的一票。

唱票出结果的那一天，4月19日，田桂荣正打点行李准备回新乡市，永远地离开这个生她的小村庄。谁知中午的时候，她弟弟给她打来电话说，你选上了，530多张票，比对手多了30多张票。一位村民这样说，我们选村委会主任是为了子孙后代，将来都得癌症了，光要钱有什么用。

田桂荣领着记者在小村庄周围转了一大圈。在卫河堤上，田桂荣沉醉在幸福的回忆之中：我当姑娘的时候，这里河水清清，桃花红艳，成千上万的大雁在河滩上觅食，乌龟螃蟹都爬到河岸上了，有时候乌龟一直爬进屋里来，人与自然真是和谐呀。

“治理污染的关键在治河，治河的关键在化工厂，可化工厂老板不是劳模就是代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田桂荣指着远处的一座化工厂对记者说，“老板们都说我，田桂荣不让工厂冒黑烟，要让工厂冒白烟。”

当村长对田桂荣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过去在外边到处跑，宣传环保，现在回到家里，实打实地搞环保，保卫家园，这是一个更深刻的角度：田桂荣说，与以往不同的是，我这是深入一线，

就是要带领乡亲们，拿起法律的武器，与破坏环保的人做斗争，所以说，我当村长就是深入虎穴。

胜利只是第一步，田桂荣在村口对记者说，修桥打井之后还想办更多的事，前面的路难走啊，但是有媒体支持，有老百姓支持，有我自己的心劲，我想，最后我会干好这村长的，争取把咱的污染村变成生态村。

邻村的陈庄有一位30多岁的农妇，叫张利敏，有过近10年乡计划生育工作经验。她专门来给田桂荣当助手，她说，我是来学习的，3年以后，我也要回到村里竞选村长，我也要带着老百姓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环境，保护我们的家园。

田桂荣的环保之路

- | | |
|---------|-------------------|
| 1998年 | 开始回收废旧电池 |
| 2000年 | 组织学生暑假考察黑水卫河 |
| 2001年 | 获得福特国际环保奖和美国格雷特曼奖 |
| 2001年7月 | 组织绿色申奥万人签名活动 |
| 2001年底 | 成立田桂荣环保网 |
| 2002年 | 获得全国第二届“保护母亲河奖” |
| 2002年2月 | 成立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
| 2003年 | 获得“《中国妇女》时代人物奖” |
| 2004年7月 | 组织“保护黄河，爱心传递”活动 |
| 2005年3月 | 当选“首届中国十大年度环保人物” |

林淑英
和平路迢迢，
携手相扶持



文：林淑英

“和平”的信念便是尊重万物的生命，澄清这个信念的能力端赖有真善美的知识，沟通这个信念依赖的是讨论事务的平台和修养。

放眼人类世界，生态足迹不断扩大，战火迭起，实有“和平路迢迢”的忧伤，更有“携手相扶持”的期许！

幼失怙恃 学习护理 四姊引导“民主”萌芽

我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时代的客家村落，有4个姐姐；生母再度为我增添两位妹妹之后，在月子期间撒手人寰。我的父亲因帮朋友担任贷款保证人，朋友却卷款消逝无踪，气得英年早逝。

失去怙恃，家道中落，1964年我在美国学校毕业时得到余登发县长奖。1968年考上省立台南女中和国防医学院高护班，因家境关系选择公费学校的后者，学习护理专业。毕业时抽签抽到海军军种，被派到海军医院服务。军医院的管理制度上由医生担任

院长、副院长，也设立军阶和内外科部主任相当的政战部主任，决策影响力很大。

在我服务军医院的晚期，即1980—1985年之间，工作非常忙碌，但是每星期四的上午，编制内的人员都必须上“莒光日”^①课程，病房只有少数资浅的工作人员值班；我们去上这种课时，偶尔会担心病房内人手太少，万一有紧急状况时怎么办？私底下有些人开始讨论：把上课重于服务病人，到底合不合理？

与此同时，我在南部教书的四姊，经常去参加党外人士的演讲，阅读党外杂志，还有一整套的李敖先生写的书籍；她听我说曾帮医院内的清洁工人写陈情书，遭院长在“荣誉团结会”上提醒“军中是不能写陈情书，军中只有绝对服从”的事情后，叫我谨慎一点，免得哪天横死街头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家四姊，是让我对“民主”萌芽、思索人权问题的女性。

传母语 走街头 摇笔杆 办学校

1989年，我到主妇联盟担任志愿工作者，恰逢台湾开始“反对兴建第四座核能发电厂”、“反对在左营续建第五座轻油裂解厂”等环境运动；我们第一次上街头游行抗议时，都做简单的面具戴着遮住脸庞，怕被摄影存证。随着社会的自由度增加，集会游行变成常态，我们参加游行时常常被排在第一队，说是避免杀气腾腾！

我们的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曾经隐瞒台北市中山区的“民生别墅辐射屋事件”。受害民众组织“辐射安全促进会”争取补救措施，其中包括医疗照护；有几位长期关心辐射伤害的医生，曾经帮忙安排他们到台大医院作健康检查，我曾前往帮忙；参加健检的人的年纪从5~6岁及15~17岁，刚好要换永久齿小朋友的家长被叮咛：掉下来的乳牙不能丢到屋顶或床底下（台湾的习俗：上排的乳牙脱落时，捡起来丢在床底下，下排的乳牙脱落时则将之丢到屋顶，如此做永久齿才会长得漂亮），要捡起来寄回医院，

^① “莒光日”是台湾政治作战中对军队的思想教育课程，在每星期四，先收看军事新闻和政策法令的电视节目，以及介绍军纪或保防要求的短片；再研读奋斗月刊，一开始是嘉言选读，通常选录了总统的讲话；嘉言选读后由单位的主管作总结。

让医生侦测辐射含量，用辐射的半衰期原理推算最初接受到的辐射剂量。在这个气氛有些哀伤の場合，我看见家长们忧虑的神情，掩盖了孩子们换牙的喜悦！促进会理事长王玉麟先生曾为了发函给所知道的受害者，在台北市仁爱医院提供的办公室内忙得冒出血昏倒，这个事件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世界，雪中送炭的少，锦上添花的多”！

1994年，是台湾积极争取广播频道开放运动的年代，也是广播的天空几乎听不到客家母语发声的年代。我们到立法院请愿，在得到行政院新闻局的许可后，用了半年的时间，获得9,000多人的捐款挹注，共募得新台币4,000多万元，顺利成立了宝岛客家电台。这期间，我曾经接待一位远从苗栗北上的乡亲何连基老先生，他穿着非常旧的衣服和鞋子，提着一个旅行袋，在我帮他付完出租车费之后，跟我一起搭电梯到17楼，吃完鸡腿便当后，从穿着的鞋子里各取出1万元，再从旅行袋中的蚊帐底下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20万元；他说他是一位拾荒者，从收音机中听见客家的声音，于是跟儿子商量后拿土地去贷款来捐给宝岛客家电台。何连基先生是常让我热泪盈眶的长辈，而在这个电台，艺术创作者赖添云先生为我写一幅春联，在舍下大门贴了3年，邮差都不会送错信：“宝岛春秋生瑞果 客家门第多淑英”。

一眨眼，在这里担任义工12个年头过去了，好快！

守护景美溪的故事

景美溪乃发源于台北县石碇乡境，原住民族称她为雾里薛溪；她流经石碇、深坑、木栅、景美后，注入新店溪，全长约30.3公里。公元2000年10月底，神台风肆虐北台湾时，造成景美溪水暴涨，让两岸居民提心吊胆。

全国首创的台北市文山小区大学经营团队，在历经上述水患之后，拿出地图检视再三，大家一致决定：要为“守护景美溪”订定学习项目，并积极规划行动方针。担任理事长的我，当然全力支持，策划行动。

……

我们召开“守护景美溪行动计划”会议，邀请景美溪两岸大中小学代表一起讨论。开会那天，各级学校出席踊跃，有几所国

中校长亲自来参与。会议后，形成“守护景美溪联盟”，参与成员包括：小区型组织、大中小学等各级学校。同时，我们实施景美溪生态与人文系列课程，初级的生态环保课程是以生态教育的基本概念为主，并直接到景美溪进行水质检测和做观察记录。进阶的课程则重在导览解说人员之养成和小区环保的推展。而人文河川系列课程以培训文史调查与田野工作之人才为主，我们透过举办“寻访故乡的历史记忆——文山乡土文化工作坊”，目的在累积文山地区文史数据，充实乡土教学之素材。



我们又发展小区讲座和体验活动，内容包括：“春之景美溪”导览活动、“木栅发现之旅”、“采风博嘉里”、“全校性小区本位教学活动”、“探秘景美溪”导览活动、2003“春之享艳—文山艺术节”系列活动、2003“文山夏日人文风”系列活动和2004“展读昔日影像卷 洋溢木栅乡土情”——《木栅人》中文版出书情事等。

上述种种教学方案，以及“一步一脚印 体验乡土情”的活动，都让参与者均感动万分。我们也经由民政局向文建会提案申请补助，以“守护景美溪”为主轴，进行“小区总体营造点子创意构想”的规划方案。在此方案进行期间，位于景美溪畔的台北市立动物园陈宝忠园长跟我们有了接触，研商合作事宜。会后不久，合作随即展开，至今仍未间断，并且参与的单位越来越多。

“开张纳文潭 入林访淑英”

这是2006年，台北文山社大詹志明老先生为舍下写的春联。让我回顾1975年10月10日与相恋多年、互通情书数百封的张文潭先生结婚；婚后赁屋居住于台北县泰山乡，夫妻常携手从山腰间眺望台北盆地里的万家灯火，偶尔感叹：“台北的房子千万间，没有一间是我们的”昔日情景。

1980年首次购屋，地点在台北市木栅坡内坑溪畔，有许多蜻蜓和野姜花，还可以享受“轻摇罗扇扑流萤”的情景。而随着台湾社会工业化的脚步，外子的工作越来越忙，同时要不断进修；1985年我辞去医院的工作，专职经营家庭。从此，有比较多的时间进入孩子的学校，随之发现许多的问题如单亲、贫穷等弱势儿童的生活照料跟学习资源缺乏的状况、饮食问题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念头顿起，于是采取了下列做法：

一、写信给校长罗华木先生，毛遂自荐说，我可以义务协助学校营养午餐的一些工作如食材验收、厨房工作督导等。

二、与辅导室黄雪琴主任研商，合作成立“爱心妈妈团”，初期有七人参加。

三、“吃过午餐三分钟内刷牙习惯之养成”，由学校向牙科医师募集牙刷，各班导师督促养成习惯。

四、吃过营养午餐后，用卫生纸把餐盘擦干净，减少流出油污到水沟。

五、由“爱心妈妈团”负责规划，再邀请政大“指南服务社”社团成员帮忙，在学校举办露营活动，餐饮费用由学校负责，帐篷由爱心妈妈负责借用，全校中高年级都参加，有老师带领观星，有熊熊营火，留给许多人难忘的回忆。

六、家长会参与“木栅垃圾焚化厂监督作业”、“象头埔废弃物资源处置场设置听证会”等公共事务，为地方贡献良多。

如今，我已当外婆了，仍然担任这个学校的顾问，跟家长会有很多互动。屋旁的溪流已经被加盖变成停车场了。

外子和我结婚于去年满30年，他是我们家最重要的支柱。他孝顺父母、友爱姊弟、善待亲友；他学识渊博，不断进修，在年过半百时完成政大企业家班、政大EMBA的学业；今年开始到台湾

科技大学修工业管理的EDBA。在90年代中期，他曾被公司派驻美国的办公室，之后越发地感受到自己国家的环境问题，于是支持我为环境勠力。

台湾拥有的生物多样性和栖地多样性，使得它成为北半球陆域生态的缩影；它的地质非常年轻，却拥有非常古老的物种，栖兰山区的桧木林可做代表，据研究推测应是冰河时期避难到台湾来的。孕育2.5公分的土壤需时300-1,000年，处在强风、骤雨、地震频仍地带的台湾，土壤的自然冲蚀状况本就比较严重，事实也显示我们所流失的土壤，远超过所能孕育成的。

在台湾不断弹唱山河悲歌、政府的产业政策却不重视永续发展的年代，我们曾为了新竹县有个要填平3个山谷、填方高达数十公尺的“关西精密机械园区开发案”，在内政部营建署门口（敦化南路底）设灵堂，祭奠台湾“山林不保 水土流失”；继而数度绝食静坐抗议，一群人为此案曾被警察抬离营建署14楼的电梯口……此案在1996年7月底的贺伯台风重创台湾后，终于停止。

女儿15岁生日时，我带她前往桃园复兴乡山区，到高山林径间，领会“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同时踏勘“山老鼠盗伐千年红桧”的不法行为。而在舍下居住的台北市文山区，数个小区组织合作之下，保护一条绿色的巷道，并为市民省下1亿2千万元的工程经费；文山社大的环保社团积极参与“在地发声——台北市焚化炉外围居民工作坊”，学习提出更理想的垃圾管理政策说帖，并获得马英九市长的承诺。更与其他全国性的组织共同努力，促成环保署停建了数座垃圾焚化炉，节省公帑数百亿元。

结语——和平路迢遥

荣获被提名“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让我非常惊讶，并且不断思索获提名的理由。拙见以为，仔细深思地球资源和环境公义、把思考化为行动的环保人士，是最热爱生命、重视和平的一群，这种人我的身边有很多。“和平”的信念便是尊重万物的生命，澄清这个信念的能力端赖有真善美的知识，沟通这个信念依赖的是讨论事务的平台和修养。回顾自己的大半辈子，大致就是不断搭桥沟通、坚定脚步、整合资源、学习照顾无法为自己发言的环境的努力过程；如此尽一个地球公

民的责任而已。获此殊荣，实在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放眼人类世界，生态足迹不断扩大，战火迭起，实有“和平路迢迢”的忧伤，更有“携手相扶持”的期许！

附录：

2003“春之享艳—文山艺术节”系列活动内容：

- 研讨会——文山社大 91 学年小区工作专题发表会
 - “在地发声—垃圾焚化炉议题工作坊”专题
 - “小区型厨余做堆肥”专题
- 非营利社团公共参与经验交流座谈会
- 邀请台北县永和小区大学志工社和生态社参与座谈
 - 景美溪文史导览。
 - 美术创作展——有 11 个社团参展
 - 文山茶堂——进行 6 个场次的演讲
 - 生态展览——地点在北市南海路 60 号林业陈列馆，展出生态社的“恋恋台湾——我的自然观察”
 - 生态讲座——地点在北市南海路 60 号林业陈列馆
 - 街头艺术黑白画——由黑白画社担纲演出
 - 艺文展演
 - 纪录片展演

2003“文山夏日人文风”系列活动内容：

- 阅读《木栅人》影像——50 年代木栅小镇的生活写实纪录
- 《击钵吟诗》
- 《文山人文志》——文山名人雷震先生
- 《文山文学》——夏夜诗文书画宴
- 再现木栅人的生命故事——《木栅人》纪录片发表会
- 我们学校曾和授课的老师进行座谈，请老师们在未来的课程设计中，注入两个要点：“地方特色”和“公共议题”。2004 年 6 月，已经有 11 门课提出相关的教学方案，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等领域。

景美溪教学活动内容：

1. 进行“景美溪自然观察研习营及湿地生态普查”，由“生态社”张森田社长负责指挥，并建文件记录，相关经费由动物园支出。

2. 2004年9月下旬，在环保署和北市府环保局编列经费支持、东南技术学院环境管理系主办之下，结合台北市动物园保育教育基金会和文山社大共同培训“景美溪巡守志工”，将万福桥到溪仔口段的景美溪分成6段，分别由小区居民、学校师生认领负责。

3. 2004年10月中旬，上述3个单位再度合作举办“景美溪湿地生态教学研习营”，号召溪流沿岸的学校老师们，融合景美溪的人文历史、河川环境与卫生安全、地形地质、都市计划手段杜绝洪水后患等课题，学习以这条溪流来设计教案。

4. 参与“鸭鸭放流活动”，广邀师生、亲子参与，从万寿桥下放流塑料制的鸭子，到指南溪《醉梦溪》汇入景美溪处回收；沿途观察水文及水岸环境，借以学习守护河川的重要性的方法。

5. 促成“淡水河守护联盟”于2004年10月23日成立，有17所小区大学以及数个民间团体参加。

6. 2005年1月9日“景美溪大会师”活动是文山社大的学员社团共同策划的全校性学习活动；我们选择文山3个次分区中的4条步道进行导览解说，最后在道南桥下七号水门的景美溪畔会师，并签署《河流守护宣言》。

7. 2005年，我担任“相约2005守望淡水河”的“淡水河河川志工培育及巡守工作计划”项目主持人，这是环保署委托的项目，培育河川巡守志工200多名。参与地方“文山100新意象启动坊”公共论坛，探讨景美溪的议题。

8. 2005年水官生日前夕，帮景美溪过生日，举办“净溪庆生Party”。

9. 2006年，续担任“2006有你有我悠悠长河展欢颜”的“淡水河河川义工深化学习教育寄小区巡守义工种子教师培训计划”的项目主持人；课程结束，学员组织社团，名为“趴趴走俱乐部”，部长是黄锦云女士。目前她正在带领监察桃园县和台北县的界河——塔寮坑溪，这条溪常年被盗采砂石、排放工业废水，是大汉溪被严重污染的支流。

吾亦累
永政幽燕去已斯

第二部分

绿色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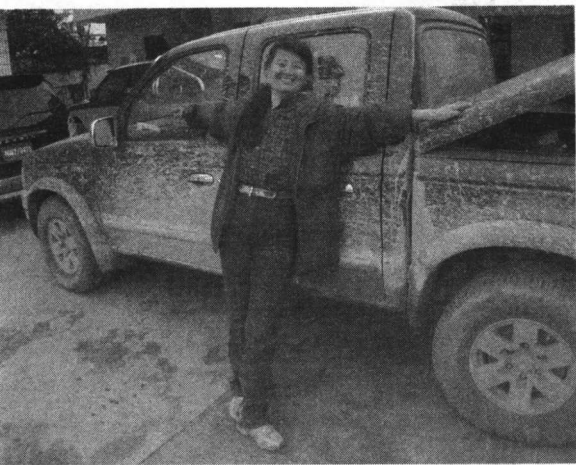
|| 保水护土

曹冬凌 文

这不就是那最善又生灵的…… 融入的……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绿色生命……

汪永晨
永远的奔走与诉说



文:张冬青

汪永晨让更多的人知道，环保主义者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保护动物、植物，还应该有生活在周边的人，他们有参与的权利，不是因为他们弱小，他们穷，他们偏远，他们生存的权利不被高高在上的人和所谓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所关注，人应该是平等的。

这是她的梦想。她希望有一天，能和朋友们坐在声音博物馆内，静下心来，倾听大海的呼啸、山野的松涛，动物的私语。

找汪永晨的资料很容易，她的声音、她出版的书籍、她写作的文字，遍布各处。想见到汪永晨这个人不容易。她似乎总是在路上，永远在行走，永远在前线——在她最爱的环保事业的前线。

汪永晨随中国第一支女子长江源漂流探险队到达长江源头；她深入生态被破坏的香格里拉和贵州草海；她去阿尔金山寻找野骆驼；她登贡嘎山观看海螺沟冰川；她为云杉繁茂的内蒙古浑善

达克沙地默默祈祷……

她不停地奔走着，也在不停地诉说和呼喊，每一个脚印和每一声呐喊都朝着一个方向：环保。

触动心弦那一刻

汪永晨是从1988年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的。那一年，她的一位听众，一名北京社科院的研究员告诉她，游人在同一个时间去香山观红叶，将很多植物的根都踩出来了，破坏很大。他又带汪永晨来到颐和园的昆明湖，看工人们在湖面上“捞脏”^①，工人们说最多的一天能捞一百多船。

“这两件事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如此不和谐。”汪永晨立即制作了两期广播节目《救救香山红叶》和《还昆明湖一池清水》。“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很多听众表示他们之前从没关注过这些事情。”

1993年的青藏高原之行成为对她震动最大的采访经历：她从西宁到格尔木，沿途碰上无数淘金者。淘金者在青藏高原淘金，不但严重地破坏了植被，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野牦牛、藏羚羊、白唇鹿等也都成了他们枪下的猎物。她第一次看到被人枪杀的野牦牛，从尸体上流下来的鲜血也一滴一滴地流进了她的心里。

汪永晨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记录了青藏高原对她的感触：“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可也是那次，我还看到了裸露的秃山坡，遍地的珍稀动物遗骨，它们的血，一滴滴地印在了小溪边的砾石上。我曾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我就跑自然保护区了。要把自然保护区的美和它存在的意义告诉更多的朋友，同时也要把自然被我们人类糟蹋的样子让更多的人看到。”

最终将汪永晨带上环保之路的是江苏一所农村小学的孩子们。

这些孩子尽管贫穷，却非常爱护小鸟，打破了汪永晨“有钱和有闲的人才做环保”的想法。汪永晨制作了广播特写《这也是一项希望工程》，节目中介绍了这所农村小学的师生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爱护环境保护小鸟的事迹。节目播出后，全国乃至世界已有300多所学校和他们结成“手拉手”学校，这所小学校已被

^① 捞脏，即工人坐在船上，打捞湖里被游人丢弃的垃圾。

世界自然基金和联合国环境署定为绿色教育示范。这个节目也获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优秀节目一等奖，中国环境新闻一等奖。

1994年7月汪永晨用朋友给她的一万元把那个乡村小学的30个穷孩子和10名老师请到北京来，亲自让他们讲述爱鸟的故事，组织了“我们再次手拉手，爱心献给大自然”的活动。

之后她又策划了“森林与孩子”活动，请一所私立中学的学生每人出两份钱，一份给自己，一份给贫困孩子，共赴丹东的森林，去感受大自然。

从此，她手中的录音机直指环境问题，热情也全部投入到环保活动中。

渐渐地，很多人用“狂热的环保主义者”来形容汪永晨，开始，这个称呼让她非常不理解，听了一位朋友的解释：“你是在为大自然的明天做储蓄，而不仅仅是为了它今天的美丽，因此你比别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种更多的付出在别人看来就是疯狂。”

汪永晨不再反感给自己定义成“狂热的环保主义者”：“‘狂热’就说明有一定的热度，环保现在需要热情，我喜欢这个解释。发烧还会有一定的传染性，我希望它能够传染到我周围的朋友，及朋友的朋友们，为保护环境而发烧。”

她，终于以此为自豪和骄傲，她，也不再是之前那个生活在首都北京的一个普通的记者。

她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有关环境保护、生态问题和自然常识的文章近上百万字，生态环境的变化主宰着她的喜怒哀乐。

绿家园，心家园

1996年，汪永晨和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金嘉满共同发起了“绿家园志愿者”（下称绿家园）活动。这是一个民间环保群体，挂在中华环保基金会。绿家园的宗旨是“没有口号，没有说教，没有功利，有的只是对自然的一片赤诚”。绿家园的理念是“走近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

环保NGO基本没有资金来源，绿家园1996年成立的时候，没有一分钱，没有办公室，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但他们还是组织了很多环保知识普及活动，吸引了一大批会员。

他们率先在中国开展了民间观鸟活动。该活动受到联合国环

境署的关注并得到国际环保组织的赞助。“人类最容易见到的就是鸟，鸟也最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环境状况。”去山东荣成观大天鹅、去江苏盐城看丹顶鹤，从1996年10月开始，绿家园的志愿者们在野外认识了苍鹭、豆雁、柳莺、大山雀等上百种鸟，绿家园开了中国民间观鸟的先河。

在美国访问的时候，汪永晨了解到旧金山的一个环保组织号召居民在社区里种树，受此启发，她找到环保局，表示可以号召听众去种树。

“环保局的人告诉我，北京乃至全国义务种树十多年了，树是种了不少，但种了以后没人管。一棵树，三分种，七分养。于是我们想出了领养树的办法。”

绿家园在十三陵水库旁边的蟒山森林公园里率先开展了领养树的活动，此后领养绿地、领养小动物等风行中国，汪永晨和她的绿家园又做了一回开拓者。

随着北京的沙尘暴越来越严重，绿家园将种树、领养树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内蒙古，除了在当地种树、种草，还帮助当地的小学建立绿色阅览室。

1998年到2000年，汪永晨的绿家园和香港的一个环保组织共同发起一项“绿色礼物献给新世纪”的活动，他们在赤峰翁牛特旗千分之一香港大的地方全部种满了树。在采访中，汪永晨得知赤峰敖汉旗的一个地方，土地沙漠化，当地老百姓很贫穷，没有钱买草籽和树种，孩子上学也很困难。2003年4月5日，绿家园组织了100多人的志愿者来到当地植树，志愿者除了自己负担的食宿，还要买草籽和树种。当志愿者看到当地小学的孩子除了课本，从来没有看过图书，现场就捐了3,000多块钱，帮他们建立起一个图书馆。

现在，绿家园志愿者义务植树的足迹已经遍布内蒙古、河北、山西、四川和云南等省区的山山水水。志愿者队伍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成百上千，成员从记者、环境科学工作者扩展至学生、老师、公司职员和普通百姓。

到现在为止，“绿家园”会员已经增至3万，也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

2000年，汪永晨和几个做环境报道的记者朋友冒出个点子，

开办绿色记者沙龙。2000年夏天，绿家园记者沙龙正式启动，开始他们每月请一位专家给那些没有生态学知识的记者进行科学普及，讲解环境问题，以避免在日后的报道工作中犯常识性的错误，逐渐地，汪永晨发现，记者沙龙还是一个平台，同行们可以在这里交流信息、探讨行动、互相鼓劲。

2002年绿家园记者沙龙和中国青年报“绿岛”联手，记者沙龙的规模继续扩大。

一系列的监督、干预行动也让汪永晨体会到记者沙龙的力量不可轻视：北戴河一块东北亚鸟类迁徙的重要湿地上要建立一个国际会议中心，得知此消息的一位记者在沙龙上一宣布，大家分头行动，采访、写稿，最终惊动了有关领导，湿地被保留下来了；北京郊区最大的一块湿地被开发商看中修高尔夫球场，又是在记者们的齐心协力下宣告流产，成为未来北京的第一个湿地公园。

平息不久的北京动物园搬家事件，同样是在绿家园记者沙龙的努力下圆满解决的。

北京市政府计划将动物园搬迁至大兴。动物园搬迁，本是打着“提高动物福利，改善动物生活环境”的旗号，但汪永晨认为在尊重自然、保护动物的同时，更应重视以人为本。

“我们认为动物园搬到郊区这一举动劳民伤财，更不利于公众前往，人们将多花时间和金钱。动物园很大的一个功能是教育，搬家让孩子们接受教育变得困难，况且落脚的地方并不适宜动物们的生存。”她将消息发布在记者沙龙上，媒体相继报道，公众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面对公众的反对，市政府最终否决了搬迁计划。

5年来，这个沙龙吸引了一大批关心环境保护的记者和专家。绿家园记者沙龙邀请学者、官员都是不给报酬的，有时甚至连打车费都不给，但还是有好好多专家学者愿意来。一般记者沙龙中的人都是双重身份，既是记者或环保官员，又是一个环保志愿者。在《绿家园之窗》一书中引用了一位政府官员的话：“我8小时以内是环保官员，8小时以外，我是一名环保志愿者。”

正是记者沙龙的出现，使实际环保行动可以借助媒体的影响力，民间环保组织才开始发挥推动力量。汪永晨说：“这是中国的实际情况。”

泪洒怒江

在一件事情上，一个人大哭，这个人应该是付出太多或者是受了莫大委屈。

汪永晨说自己在反对怒江大坝上马的过程中哭过好几次。在怒江丙中洛哭过，那是喜极而泣；香港哭过，那是伤痛的哭。人们从她的痛哭中，体会她的感性环保。

民间称这场近乎无望的战争为：怒江保卫战。

怒江，2003年7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但同年8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了在怒江中下游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方案。按照规划者的设计方案，在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区怒江中下游建立的两坝十三级梯级水利工程，总装机容量2,132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029.6亿千瓦时，比三峡工程的规模还要大。

汪永晨和其他环保人士就此展开了反对建坝的“怒江保卫战”。

汪永晨和她的伙伴们认为，发电的方式可以选择，但怒江一旦被破坏，将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大坝的修建，不仅意味着沿岸的生态环境会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建成后不一定会像预期的那样给当地百姓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

世界之最的大峡谷将在我们的手下遭到破坏，我们能干点什么？贫困的老百姓也需要生存，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

汪永晨说：“水坝对于人类还是有贡献的，它有防洪、蓄水的作用，在灌溉方面对农业还是有一些影响的。现在问题就出在为什么我们老要建大坝？我们反对大量修建水坝，而地方官员则是打着帮助百姓脱贫致富的旗帜，谋取自己的利益，当然还有后面的水电能源部门的巨大利益。民间流传，现在是‘草楼、银路、金桥、钻石坝’。新一轮的圈水运动，比乱砍滥伐森林更严重。森林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态基因库，随着时间的更替，它还可以修复，而开山、断水、砍树、综合破坏下修起来的大坝周围的环境是绝对无法修复的，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修大坝的危害。人为的干扰河以后，对生物性和地质结构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后代，不光是中国，世界上找到一条没有经过人类干预或者去破

坏的河非常的少了。我们有幸还有两条，这两条河所处的地质结构非常的特殊，像青藏高原，世界上哪找这样的地质结构？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峡谷，我们为什么就为了2,000万度的电给破坏了呢？”

修建大坝可以解决那里的贫困问题吗？她非常反感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一个权威人士和高层的领导到当地看了以后，说必须开发这个地方的水电，因为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太穷了。但是，据做调查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动植物学家论证，这些水电开发以后，首先老百姓用不上这电，因为这电要进入主电网，不可能单独为老百姓拉一条线满足当地老百姓的要求。如果要拉一条线满足他们，他们用的电费就要比城里贵四五倍。我们国家给移民的帮助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补偿老百姓的地，比如补偿一亩地，我们补偿三四亩，表面来看对老百姓是很大的补偿。但补的三四亩地是猴子住的地方，也就是更高的地方，土质更贫瘠，是岩层的地方，三四亩地比一亩地长出的粮食少很多，而付出的代价却多很多。”



汪永晨让更多的人知道，环保主义者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保护动物、植物，还应该有生活在周边的人，他们有参与的权利，不是因为他们弱小，他们穷，他们偏远，他们生存的权利不被高高在上的人和所谓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所关注，人应该是平等的。

汪永晨还与来自北京和云南的20名新闻工作者、环保志愿者

和专家学者，一起走近怒江，进行了为期9天的采风和考察，收集了大量图片、文字和声音资料。他们自己筹资举办的“情系怒江摄影展”在北京举行。“即使怒江上最终还是建了十三级水电站，我们还是要告诉公众，告诉子孙，曾经的怒江是一个什么样子！”汪永晨说，这条江河不仅仅属于中国，而属于全人类。

2004年2月18日，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正在怒江山谷中行走的汪永晨得到大坝缓建的消息，失声痛哭。

美国一家颇具影响力的豪华旅游杂志每年会在全世界评选出世界环境人物奖，2004年他们将这个奖颁给了汪永晨。汪永晨把两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给了怒江项目，还把在怒江拍摄的照片进行义卖。

她奔走、联络，和以往为冰川的退缩、高原草甸的消失、野生动物的濒危奔走疾呼一样，此刻的她变成了一个对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行为深恶痛绝并冲锋陷阵的斗士。

怒江建坝工程被搁置后，有媒体评论说，民间组织的声音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汪永晨却半开玩笑地说，不要高估了中国的NGO，他们和那些利益团体较量，感觉就像业余队和专业队在一个赛场上比赛，“不是一个层次的”。果然，没过多久，怒江工程依然上马，但级别降低，并部分听取环保人士的意见。

此事意义还是重大的，毕竟，草根力量在这一事件中得到彰显，NGO开始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政府公共决策，它正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新生力量，同时也标志着环保NGO逐步走出环境教育阶段，开始进入鼓励公众参与、呼吁程序化阶段。

汪永晨说：“我们希望政府的决策、任何一项大工程的实施都要有公众的参与，民间的声音越来越多地被表达出来，这也是社会民主化的表现。”

“敬畏自然”之争

2005年第一期《环球》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科学家何祚庥院士的文章《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文中称“我要严厉批评一个口号，即所谓‘人要敬畏大自然’”，文中同时强调“人定胜天”。作者说：“有人把‘天人合一’解释为人和自然相处和谐。对这样与词语原意不甚相符的解释我并不反对，但是我认为，人类要看到天与人之间不完全是和谐的一面，还有不和谐的一面。如果我们在人天关系上没有一个冷静的估计，就会放松警惕，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文中说：“从历史来讲，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抵御能力很有限，所以一些进步思想家强调人定胜天，鼓舞人类与自然界作斗争。”

对此持不同意见的汪永晨在1月11日的《新京报》上发表《“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一文，双方争论开始。一时间，“伪环保主义者”、“极端环保分子”、“宣扬反科学的迷信的帽子”纷纷向汪永晨扣来。

随后，以方舟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加入，使争论逐步升级，并最终演变为一场论战。

汪永晨坚持认为，敬畏自然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工具和手段。

她说：“无论是环保主义者还是生态学家，并没有一味地强调保护，我们强调的是尊重自然，我们希望和大自然达成的是和谐。而不像《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一文所说：如何进一步改造自然，使大自然的改造后果符合人类发展利益。以人为大，以人独尊。一次又一次的灾难说明人类还没有了解多少大自然的奥秘，更抓不住制止大自然发怒的时机。

大自然也是一个家庭，它不只有我们人类这一个孩子，在这个家庭中还有其他成员。如果在这个大家庭中，所有的存在都是为了我们人类这一个孩子，这不公平。人类再进步，科学再发展，大自然也不仅仅为我们人类而存在。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类本是自然界的一员。大自然存在多久了，而我们人类才生活在这

个地球上多少年。为什么一有了我们人类，就要以我们人类为本。自然界拥有人类，而不是人类拥有大自然。

虽说人乃万物之灵，但人类与万种生物一样，都是由大地母亲哺育，靠阳光雨露滋润，才能获得生命和生存条件的。

内蒙古草原肥美的原野，千百年来孕育了敬畏自然、“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文化。而云南“三江并流”地区22个少数民族共同构建的多样性文化与宗教相互融合，使得民族之间在有限的资源面前长期和谐共存。

事实上，今天在我们拥有的很多已经被边缘化、非主流的，甚至被科学或者现代工业文明嘲笑的文化遗存当中，都可以发现人类以自己的智慧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例子。而恰恰是那种不以自然为母，反以自然为器，乃至要征服自然的反自然观念，使人类承受住一次又一次环境灾害惩罚。”

她举出一系列数字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平均每年造成2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国家财政收入的1/6-1/4。中国也是世界上对自然生态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沙漠化，水土流失，淡水、森林、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严重缺乏，已经涉及了国家的安全。而国家环保总局和教育部共同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依然有1/3的人认为“人应该征服自然来谋求幸福”。

事实上，对于天灾实为人祸的警觉，40多年前已引起西方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广泛关注。1962年，一本《寂静的春天》唤起了多少民众的环保意识和政府的高度响应。10多年前，1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共同呼吁：“人与自然正处于迎头相撞的险境，人类的活动为环境的资源带来无可逆转的伤害——人类必须彻底改变管理地球与生命的方式，才能逃过未来的苦难。”

一颗悲悯的心，一种衡量的标准

很多神奇美丽的地方正在改变它们的模样，汪永晨的双脚也伴随着这些改变走遍了江河山川。

她将她看到的拍摄下来，将她的思考制作成节目、汇集成文章。她充分利用和享受自己记者的身份，涉足常人难以达到的地方。

然而，在阻止破坏生态行为的同时，另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汪永晨和环保组织的面前。

1999年在四川迪庆的林区里，汪永晨遇到了因捕杀野生动物而被捕的藏族青年次里。次里一家世代以打猎为生，不许狩猎之后，他去伐木，后来又要保护森林，树也不让砍了。作为山民的次里，没有地种，又不能打猎和伐木，他上有老下有小，为了全家的生计，不得又拿起了猎枪。次里因偷猎被捕，森林公安都为他流泪，全村人都来替他说情，说他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但法律是无情的，次里最终被判两年刑期。

汪永晨将这个真实的故事带回北京，有人指责她同情偷猎者，而她思考的是如何解决这些世代生活在自然保护区里的老百姓的生存问题。

她写过一篇文章，谈的是世界遗产给当地人民带来的财富：“西班牙、肯尼亚都是靠高收费的生态旅游来解决当地人的生活问题，而且确有成效。我们同样也可以效仿，将来我想请国外有经验的专家给地方的官员和老百姓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开发生态旅游。为什么要忽略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天然财富，而是按照人类自己的意旨去重塑它们？那往往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评价有很多标准，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评价一个国家的标准，也许不够高度。而当你置身于异国他乡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向你伸过一只手来；当一位陌生人走进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问那里的妇女和儿童：我能为你做些什么的时候；当你义卖图书为贫困地区的小学校建阅览室，不分国界，不论相识不相识的人都纷纷解囊，并还希望用其他方式加入你们的行动时，那一刻，你感到的就是什么？是关爱！”汪永晨说，“其实关爱自然就和我们自己一样，发自内心的去做，看到成效，那份快乐真的很享受。当然，无法见到成效的时候会觉得很艰难，但是想想大自然的胸怀和它比起来什么样的风吹日晒雨打不是都要承受吗？这也是多样性，我觉得生活中有了这样的多样性，才更有刺激，更有味道，更有干头，不是吗？”

从事环保事业十多年，能坚持这么久，汪永晨觉得靠的就是和周围的朋友分享大自然的想法，这也是关爱大自然的人共同的愿望。

关爱自然不是负担，是乐趣，只是很多人还没有享受到，她真诚的希望她已经感受到的快乐能和她周围所有人一起分享。

这种传递和分享细化到她的行动中，就变成一本书。

她从数以万计的照片中精心挑选，汇集成了《绿镜头——大自然的昨天和今天》。每一个篇章都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关于自然的故事。从我国长江源头、珠穆朗玛峰脚下、贵州草海、四川九寨沟和黄龙、内蒙古草原、高黎贡山、武夷山，到在芬兰、美国、北极等国家和地区采访、考察和参加会议期间拍摄的百余幅照片及其为这些照片撰写的富有情趣的文字，表达着她那颗关爱自然的拳拳之心。

然而，《绿镜头》更是充满忧虑的呼唤，这或许是她通过本书最终要向我们传递并分享的信息：如此充满知识和诱惑的人类家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劫难：土壤沙化、热带雨林毁坏、空气污染、物种快速绝灭、垃圾成灾、臭氧层变薄、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阻挠了人类的健康文明发展，影响了地球村居民的正常生活。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也说明上述情况在我国同样严重：冰川退化、过度放牧、水土流失、黄河断流、长江污染、草原蝗虫成灾、珍稀动植物濒危、洪水连年不断……

这一切都使人们在享受大自然杰作的同时，内心深处也充满了沉重感：为了美丽的大自然永远美丽，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边缘人的快乐生活

汪永晨形容自己是一个边缘人，她只想做环保节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她没有专门的节目，“人家谁要我，我就给人家去打工”。

但是她很乐观：“也许养家糊口是重要的，但我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的人，没有那么强的挣钱欲望，台里只给工资条上的1,500元生活费就足够了。”

她很在意的是生活要快乐，这种得到的快乐是没有名利的快乐，是相互的关爱，是从大自然中获取的快乐！

汪永晨还有一样不大方便展示的收藏，“我跟别人说我的梦想是采集大自然的各种音响，办一座声音博物馆”。因为做广播记者的关系，汪永晨对声音有着更为特殊的感情。

长江源头冰川融化滴水的声音，曾经回旋在库区小巷叫卖的声音，高原上牛粪燃起篝火火焰跳跃的声音，她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喘气的声音……她收集的音响资料里，有些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些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

这是她的梦想。她希望有一天，能和朋友们坐在声音博物馆内，静下心来，倾听大海的呼啸、山野的松涛，动物的私语。但是她说，收集声音的过程，或许还要持续很久，希望有一天能让更多的人走进来，一起分享那些奇妙的声音。

“生活就是这样，有什么喜欢的，总想攒着，舍不得丢。”汪永晨说，她的理想是希望能尽量保留自然界一切美好的东西，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它的美丽。

“汪永晨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力量。”沈孝辉，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一个积极的环保主义者，多家环保NGO成员。以汪永晨绿家园等为首的环保NGO在怒江大坝上所付出的艰辛，只有像沈孝辉这些经常和她在一起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身为记者，汪永晨感受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宣传和教育的功能。多年来她做了大量关于环境保护的报道，在中央电台开辟了“环境听众热线”、“走进自然保护区”、“环境警钟”等环保栏目，其中很多栏目在中国具有开创性。

1997年，汪永晨乘船在长江上航行，发现江轮上没有垃圾筒，垃圾一律扔到江里。回到北京，汪永晨采访了交通部和长江航运管理部门，得知在长江航运的江轮上的垃圾如何处理确实没有条文规定。“长江上的白色”污染这组节目播出后，交通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不久，有关“禁止在长江航行的船只上使用塑料饭盒的规定”出台，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大规模的沿江考察，以便进一步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

1998年夏，汪永晨随中国女子长江源科学探险漂流队进入长江源区。采访后制作的广播特写“走向正在消逝的冰川——寄自长江源家书”获得亚洲太平洋广播电视联盟广播节目大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建台以来，在亚广联节目比赛中，只获得过两次新闻信息类节目大奖，这两个节目都是由汪永晨制作的。她成为中国唯一一个作品3次获得世界广播界最高奖项——亚太广播联

盟新闻节目大奖的中国记者。

“我的父亲总是告诫我说，将来不管做什么，至少要在一件事上做足工夫。从开始做环保那天起，我就知道，这就是我要做的那件事了。”她快乐地做着。

“快乐不会从天而降，要自己去寻找。”汪永晨在永远的环保之路上，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永远的快乐。

这就是汪永晨，一个在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大树上睡觉，录下风声的人；一个在江边篝火旁，写下所思所感的人；一个真性情的人，一个感性而纯粹的女人。

运建立 愿为环保献余生



文：强洪

每一个民众，都是一个生态环境的享受者，同时也在制造污染。我们需要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

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好这里的一山一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生活在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之中。

采访运建立非常顺利。老人快言快语，在电话里听说了记者的来意后，她热情地邀约记者尽快到襄樊来：“来看看我们的汉江，看看我们‘绿色汉江’的志愿者们，你会为我们的行为骄傲的。”

见到63岁的她，正在接一个电话：“要我们在广场参加公益活动，我们就要实实在在地为大家做环保宣传，我们不做秀……”她口干舌燥地向电话中的人解释着。

放下电话，老人直奔主题地向记者介绍她和她的“绿色汉江”，“我的时间非常紧张，容不得我们客套了。”老人开门见山

道，“下午和明早我们还要到学校和社区为学生和社区居民做环保宣传呢。”

运建立生于湖北襄樊，在汉江边长大，对穿城而过的母亲河汉江充满感情。12岁时，她随家人到了四川重庆。由于生父在台湾，运建立没能上大学。那个年代，对生活充满激情的运建立放弃了留城的机会，义无反顾地投身上山下乡的洪流。后来，她回城当了教师，再后来，她选择回襄樊生活。“因为那里有我深深热爱、多少年来都不能忘记的汉江。”

环保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汉江，长江最大的支流，全长1,577公里。古人称它是“天河”，天赐之江，从丹江口水库坝下的陈家港流入襄樊市。

襄樊市地处南水北调中线调水的丹江水库紧邻的汉水（汉江）中游地区，汉水流经襄樊市195公里，两岸堤防221公里，境内流域面积17,270平方公里，全市580万人口的90%居住在域内。襄樊市水资源相对缺乏，主要依靠客水——汉水。汉江对襄樊的生产、生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悠悠汉江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襄樊人，是襄樊人的母亲河。汉江，在襄樊人的心里，是给带来福祉的梦中之江。

运建立搞环保非常偶然。曾经当了20年政协委员的她，1998年从襄樊市侨联退居二线。2000年的春节，她坐车经过汉江大桥时，发现桥下有排污口，车上有人说：“滚河（为汉江支流）的水比这还臭！”就从这年3月开始，她投入了对滚河的调查。

从那以后，她把全部精力用在保护生态环境上，在当地环保局支持、配合下先后深入本市各地调查污染企业100多场次，写出《汉江襄樊段水污染调查报告》、《生活污水治理刻不容缓》、《市区空气质量令人堪忧》、《莫把工业园变成污染源》、《尽快规范黄姜加工企业，严防又一大污染源滋生蔓延》等多份调查报告、提案，多次直接面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建言献策，引起重视，多次在许多会议上就保护生态、防止污染慷慨陈词，引起关注。

2002年春，运建立认识到一个地区要想保护好环境，不能光靠政府和职能部门，要保护好汉江仅靠个人努力也远远不够，她联络了几位政协委员，发起并筹备成立了经民政局审批注册的湖

北省首家也是汉水流域唯一一家群众性、公益性、非赢利性的环保 NGO——襄樊市环境保护协会^①。

协会成立之初，什么也没有，经运建立宣传、发动，有了最初的一部分志愿者。一穷二白，她四处化缘筹资，办公室的桌、椅、凳，全是市区机关支援的，许多办公用品也是她和其他志愿者从家里拿来。志愿者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坚持每天在协会工作，风雨无阻。

在他们献身环保的精神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环保这个造福后代的“伟大工程”里。目前，在襄樊市环保局的帮助和市政府的协调下，协会在市人大院内有了近 30 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已拥有团体会员 51 个，普通会员 120 多人。其中，有政协委员、退休教师、高级工程师、机关干部、民营企业家以及新闻媒体的记者。

现协会有运建立和李治和（男，64 岁）、叶福宜（女，54 岁）、钟少莲（女，52 岁）4 名专职志愿者，运建立和他们每天坚持到协会上班，她主持协会工作，联络、筹款、策划、运作，常常是工作 8-10 小时，经常晚上还在协会加班，很多双休日都没好好休息。

钟少莲是协会里第四个专职志愿者，退休前是襄樊市三中的物理老师，几年前她从电视上看到了环保协会的事迹，深受感动。2003 年提前一年从学校内退休后，钟老师加入环保协会成为了一名天天“上班”的专职志愿者。

今年，钟老师正式退休，学校一放假，她便来到环保协会帮忙。私立学校多次请钟老师去讲课，她都谢绝了。

现在，每当有朋友同事问起她在忙什么时，她都会自豪的说：“我在做一项伟大的工程！”

筑起心中的拦污坝

运建立认为：不能只关心一个工厂，不能说把污染的厂家的一个老板拿来，怎么样打一顿，或者是骂，我们只能呼吁，但是每一个地区仅仅靠环保部门保护当地的生态，还远远不够，为什

^① 该协会的网站名为绿色汉江。

么呢？因为每一个民众，都是一个生态环境的享受者，同时也在制造污染。每一个人制造污染，我们不能把责任仅仅推到政府环保部门。我们需要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

协会坚持不懈地送环境宣教进汉水沿岸的城乡。每到一地在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组织当地居民（主要是中小學生、妇女）参加。

2003年农历正月初八，春节的喜庆氛围还未退尽，来自襄樊市128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師已经在聚精会神地倾听来自北京的环保专家讲课。4天的参与式、互动式的教学，使100多位教师受到了一次环境启蒙教育。教师们说：“这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让人受用终生。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去教育学生，影响周围的人。”他们把“环境教育从娃娃抓起”牢记心中，并作为教学工作中新的的重要内容。

环境保护不能仅仅从青少年抓起，大人们应当担当着这种责任，孩子们也必须从小树立环保理念，将来长大了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对孩子们进行环境保护宣传时，运建立和她的同事们注重现身说法，所以小手牵大手，他们回去也向他们爸爸妈妈请教。她们到襄樊一所区重点中学进行环境教育讲座，讲完以后，一位家长就打电话感谢运建立：“我的一个孩子上重点初中，中午不回来吃饭，我每天给她送饭，都是一次性饭盒，一年300多个白色污染的饭盒，感到很惭愧。现在孩子给我讲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后，我家今天上午马上买了不锈钢的饭盒，用家里的筷子让他带饭。这样就能做到环保了。”

襄樊是农业大市，农业人口300多万，是全国重要的粮棉油商品生产基地之一。环境宣传仅仅在城市是远远不够的，面源污染主要在农村。全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汉江的水污染防治，农村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2003年，湖北省襄樊市的山区县五山镇的堰河村，100多人拿着小板凳聚集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村民们第一次听有关环保的事情。运建立的开场白一下子吸引了大家：“我和大家是同一个村的。”正在村民们不得其解的时候，她接着说：“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我很羡慕你们，因为这里山好水好，生活环境好，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运建立的话深深吸引着在座的每个人。

“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好这里的一山一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生活在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之中。”除去了浮夸和华丽，质朴的话语更能让人感到真诚。运建立讲如何保护水资源，种植绿色农作物从何处入手；讲把牲畜粪便制成有机肥，减少化肥使用以保护耕地；讲白色污染，垃圾分类……不知不觉中，已经将近两个小时了。当运建立刚要结束时，一位农妇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不行！”运建立和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那位农妇急急地说：“我们还没听够呢。以前城里的人来了，都是讲大道理，唱高调，我们不爱听。今天你的每句话都说到了我们心里，你还要讲。”运建立被这质朴的话感动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但得到了认可，还受到欢迎。运建立连忙说：“大家如果觉得有道理，就要立即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护好身边的一草一木。以后我们会再来的。”运建立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以后，环保协会又多次到山区，还在五山镇举办了村镇干部环保讲座，运建立同那里的许多姐妹交上了朋友。

在谷城五山镇堰河村，记者看到了一个奇景：这里居然实现了垃圾分类！每家门口都摆着3个垃圾桶，分放不同的垃圾。每天，村里的保洁员会挨家挨户收垃圾。村民们从“要我做”到“我要做”，从思想上实现了转变，正在积极建设生态新农村。村长闵洪艳说：“现在生态环境好了，来村里休闲的城里人也多了，村民们多了条增收门路。”

运建立说，堰河村的环境保护做得好，是因为村里有一个好领头人。其实，协会工作的成功，也得力于农村基层组织的力量。我们只是一个宣传者，他们，才是真正的支持和实行者。

情系汉江

因为南水北调，汉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环保协会是在保护母亲河的活动中诞生的，成立后对保护汉江更加关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开始调水，而襄樊位于丹江口大坝以下，汉江襄樊段的水质直接关系到南水北调，保护汉江更为迫切。

2003年和2004年，在襄樊市环保局的支持下，在运建立的策划下，环保协会发起了“徒步汉江襄樊段环保行”和“徒步唐白

河环保行”活动，运建立带领考察队冒雨跋涉在汉江边上，取水样，搞调研，头顶烈日深入沿途的学校、工厂和乡村宣传环保，散发环保宣传材料。

徒步汉江襄樊段考察队出发时，环保协会秘书长李治和双手捧起一碗汉江水，喝了下去。他说：“如不减少污染加强治理，南水北调后的汉江水将难以下咽。我喝的是赎罪的水，因为我自己也是污染的制造者。我喝的是忧虑的水，希望全民行动起来保护好母亲河。”带有悲壮的情感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运建立和队员们在颇有几分悲壮的氛围中，心里沉甸甸的，更感到肩上的责任重于泰山。

活动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汉江的污染状况，还可以沿途宣传环保。她不过放过任何机会。在学校讲，田间地头讲；给园林工人讲，养鱼专业户讲。甚至碰到一位养鸭专业户，她也没忘记宣传：不要把鸭粪随意丢进水里，鸭粪制成有机肥施到田里，保护了土地也保护了水……考察途中，运建立经常是奔波在几个学校之间讲演，嗓子哑了，腿也迈不动了，可她不愿停下来。

考察队是宣传队，更是环保种子的播种机。他们的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5月，米公小学五年级四班学生段泽坤就唐白河污染问题向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写了一封信《我想和唐白河的鱼儿一起畅游》。6月底，李克强亲自签了意见，责成有关地区解决，唐白河治理有了希望。



环保从自身做起

都说环境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可运建立把幼儿园的孩子带到汉江边时却说，孩子们，环境教育不能仅仅从你们这些娃娃抓起，因为我们这些大人应当为现在的污染负责。对不起，我们没有把环境保护好。她指着汉江说：“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襄樊人的母亲河，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把它保护好，让汉江碧水长流，千秋万代。”接着，运建立教孩子们唱起了自编的环保儿歌。当孩子们稚嫩的声音在汉江边阵阵响起，运建立更感到环境教育责任重大，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虽然任重道远，也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环境教育就像播种机，把保护环境、关爱地球家园的种子，深深播种在人们心里。有幼儿园家长打来电话说，听了你们的环保课，我的孙子每天在来去幼儿园的路上捡拾垃圾，还告诉大人不能浪费水。听了这位家长的话，运建立和环保协会的人欣慰地笑了。

协会是在保护母亲河的活动中诞生的，成立后工作重点也是保护母亲河。在运建立的带领下，协会在汉水沿岸地区的边缘人群中开展了“沿汉水流域边缘人群的环境维权宣传教育及网络建设”活动。

在运建立等人的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赠款帮助下，先后免费成功举办了12期环境教育培训班，482所学校（单位）885名教师和环保志愿者参加了培训，基本达到市区和谷城县90%的学校每校有一名环境教育种子教师，并先后到农村、社区和近两百所中小学、幼儿园进行讲座，向10万多名师生、市民、农民、妇女、儿童等进行了面对面的环境保护宣传。

把环保进行到底

以公益之心，行公益之事，自然打动群众，获取最大支持。

政府的支持，也是协会能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协会举办的环境教育骨干教师培训班，得到了襄樊市教育局、市环保局的大力支持；协会到学校宣传，同样取得了教育局的支持；他们的

《保护生物多样性，拒食野生动物》的万人签名活动，是与市林业局联合举办的；2003年襄樊环保世纪行活动，与市环保局、林业局、园林局等单位组织开展的……这种联合，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大范围的宣传，功不可没。2003年10月15日，市教育局和市环保局还联合下达了《关于在中小幼儿园开展环境教育活动的通知》，并明文指出“中小幼儿园进行的环境教育活动由市环保协会具体指导。”

同时，协会的工作也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市长付明珠作“环保协会是加强环境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注意充分发挥作用”的批示，阮成发书记也就南水北调工程一事到北京开展联谊活动，发挥环协作用的问题作了批示，现任市委书记田承忠也多次对环保协会的工作予以关注。运建立撰写的《尽早规范黄姜加工，严防又一大污染源滋生蔓延》的调研报告；被市政协十届五次全会选为大会发言材料，面对面向市领导进言，引起重视。

通过调查和新闻曝光，不少造纸企业被取缔了，延期治理达标的工业企业污染源得到治理，而环保意识，逐渐深入汉江两岸……

经费常常是民间组织最尴尬的难题，“绿色汉江”同样如此。她的经费主要来自于会费，每个个人会员一年的会费是10元。最初，协会用的茶叶算盘都是运建立从家里拿的。幸运的是，经过几年的宣传，协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并争取到世界银行6,000美元的小额赠款项目以及国外机构的捐赠。运建立说，因为经费筹资渠道有限，有些活动不能更好地开展，有部分理事因为工作忙，关注参与协会工作不够；但正是有了这些热心人士的参与，才坚定了大家的信心：愿为环保贡献自己的余生。

后记

为了更好地开展环境教育，运建立四处收集环保资料，认真阅读、记笔记、整理、自编了各种讲课稿，针对不同的听众采用各种不同的讲法，颇受欢迎；为了扩大宣传内容，上北京开会时，到“自然之友”等各NGO组织求援，每次都背回一大包书籍或图片，回来后制成图板，现有78幅；为了节约经费，把每一分钱都

用在活动开展上，2004年年底在北京参加“中美环境论坛”后，又停留3天联络工作期间，她一人住在小地下室里；60多岁的女士亲自带队考察河流时，多次住宿在河边路边一晚上5元宿费的小旅店中；下乡到农村宣传，住在农民家中。为向大家汇报“绿色汉江”的旅程，经苦思冥想，与2位专职志愿者一起用薄塑料布当底板，照片粘贴的方法，做出了一幅幅软展板，向国内外NGO朋友、向本市民众做了无数次宣传。2004年元月，中、日、韩环境教育论坛在韩国召开，运建立应邀参加并在论坛上作了典型发言，受到好评。今年4月22日，她获得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颁发的“首届SEE生态奖（滋根奖）”，6月，又被湖北省委授予“湖北慈善公益之星”的荣誉称号。

运建立认为，污染环境的行为应称做“生态暴力”。它是“一项比暴力还要严重的恶劣行为，它不仅影响人类健康，甚至能夺取人的生命，并直接影响子孙万代的生活环境。2000年3月，我踏上了环保之路，一路走来，历经艰辛，有苦也有甜，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但我会生命不息、环保不止……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污染制造者，因此，我们也应该是环境的保护者，保护母亲河应该世代代做下去。”

在这位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环保奶奶”的老人心目中，和平的世界就应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暴力、没有污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人都能尽享美好生活环境的美好世界。

王品松
行走一条女性的路



文：寇延丁

忍气为高，再大的难处，再大的苦，都要能容、能忍，总会有峰回路转的那一天。

身后是她劳作了一生的土地和山坡，面前是不息流淌的金沙江，以及那条通往远方的路，那条曾经行走着她的美丽、梦想、抗争、追求、快乐、悲恸、苦难、希冀的路。

王品松 1924 年出生在云南省迪庆州中甸县（现香格里拉）金江镇车轴村的吉皆乐自然村，这是个金沙江边的小山村，一个小极了的村子，只有五六户人家。都说女孩子懂事早，照看弟弟妹妹、洗衣做饭、打草放牛，乡间的女孩小小年纪就能做很多事情了。那时候，王品松的路是村子里的泥土路，弯弯曲曲的，又窄又细，从自家的院落通向村后的山坡，眼前是黄牛沉重的脚步和鼻息，身边是同行的女伴，苗族的小伙伴。

吉皆乐村子很小，却有 3 个民族，王品松家是白族，两户萧

姓人家是汉族，这3家是村子里的殷实人家，除了自家的地，还租种了百余亩土地着力经营，另外的几户都是苗族，是转租王、萧两家土地的佃农。在当地，苗族的境遇不是很好，走到哪里都被人排斥，大多住在土地瘠薄的高山，很难在富庶的江边坝地上安身。十来岁的孩子是懵懂的，对民族不同阶层差异全然不觉，王品松和那些同龄的苗族女孩是共同劳作的伙伴，是一起长大的朋友，她还拜了几个苗族的干姐妹，一起放牛、下地，去山坡上割草，歇息的时候坐在一起分享王品松带来的果子，阳光洒满小路，草地上开着星星点点的野花，在风中轻轻摇动。

求学治家

18岁那年，王品松踏上了古城丽江的石板路。从吉皆乐到丽江要走三天，而王品松从山村走到古城里的初等师范学校，其实用了5年。当地一直有尊重文化的风气，但能进私塾学经的都是男孩子，女孩都没敢做过读书的梦，13岁时，有人在附近创办学堂推行新式教育，提倡女童入学，王品松背着自己的小兄弟走进学校。小学毕业后，她和女同学想到丽江投考师范，遭到了家人一致反对：女孩子，在家门口的学校认几个字也就行了，哪能去那么远的地方？

家人把这些不安分的女孩子锁在屋里，但王品松和两位女同学还是半夜逃了出来，划着木筏渡过了金沙江，连夜踏上了去丽江的路。她们都没有去过丽江，只是知道沿着江那边的山路一直向东走，有人说要走两天，有人则说需要三天。那是一条被希望和梦想照耀着的路，又是一条艰难的路，一边是江，一边是山，狭窄崎岖，即使是在白天也人烟稀少，而且危险。有一段地方不太平，几个女孩子是不敢走的，她们在雄古停下来，等到马帮路过的时候，跟在马帮后面一起走过了那段强盗出没的路。

在那次考试中，王品松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但没能继续求学，因为自己的家庭和未过门的婆家一致反对。后来，王品松受聘回到曾经就读的小学当了一年数学老师，是金江沿线的第一位女老师。她和学生们一起上课、唱歌、打篮球，还带着学生渡

江去格子、或者再远一些的石鼓以及其他完小^①的地方参加比赛，同样是艰险崎岖的山路，但有那么多人一起，说说笑笑的，走在上面的感觉全然不同。

19岁的时候王品松离开了心爱的学校，她结婚了，嫁到同村萧家。萧家是个大家族，丈夫是长房长孙，下面弟弟妹妹又多，家务繁重。吉皆乐所在的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区，以纳西族为多，纳西男人很少做工，多醉心器乐歌舞书法绘画诗词创作等文艺文化活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纳西古乐演出者都是清一色的男人），江边受此影响，很多地里的活也都由女人承担。王品松的公公是不做活的，丈夫又一直在外求学、工作，家务和农活就都压在了她和婆婆身上，割稻、种麦、打草、喂牛、养蚕、抽丝、纺纱、织布，里里外外什么事情都要做，劳累程度可想而知。繁重的劳作中，王品松有时也会回身望一望江边，远远地看到江那边的那条路，那是一条通往山外，通往梦想的路，自己也曾经走在這條路上，曾经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但还是又回到了江边女人世世代代共同的生活中心。

支持革命 努力生产

王品松24岁的时候，一直在中甸国民政府教育科工作的丈夫又回到了村子里，他在外求学时接触到进步思想，成了本村第一位共产党员，为了金江特区的革命工作重回故乡，在村子里度过了解放之前最困难的日子。丈夫和同伴藏在村后的山里，昼伏夜出，王品松成了地下党的联络员。那段时间里，王品松和丈夫一起经历了太多的风险，有一次，反动派得到消息，先闯进家搜人，又要去山里地下党开会的地方，王品松背着儿子从后门跑出去，先将孩子放在山边自己的娘家，又跑去给丈夫送信，她一个瘦小的女子奔跑在山路上，身后是一群持枪的壮汉。提到那段九死一生的经历，王品松没有描述当时的凶险，而是开心地笑了：“我跑得快，反动派跑不过我。”

解放后，丈夫重又回到中甸工作，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依然还

^① 小学一至四年级称初（级）小（学），四至六年级称高（级）小（学），包含六年教育的小学，称完（全教育）小（学）。

是王品松，她人虽瘦小，但做起地里的活来照样一点也不含糊，像犁田、耙地这些本应男人做的事都由王品松一人承担，包括收获之后交公粮。她把公粮驮在三匹骡子上，自己赶着马帮就上路了，去粮库的路很远，要走整整三天，来来回回交公粮的马帮有不少，只有王品松的马帮是女人赶去的。

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中，王品松的婆家和娘家都划成了地主，后来，丈夫也受到牵连，开除公职，回村劳动，由于他不谙农活，生产队里分配的很多活路都是王品松完成的。在她42岁的时候，“文革”开始了，这样的家庭自然首当其冲。平时在生产队里，成分不好的人家还要承担许多额外的工作，丈夫和儿子都被抽出去做义务工，王品松除了和大家一样参加劳动，还要额外加班，要做的活好像多得做不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身，直到天黑还在忙碌，身上的背篓重得不堪负累，脚下的路长得没有尽头。外村有很多地主受不了，跳江死了，王品松听到直摇头：“他们怕我不怕。只要没做坏事，以后肯定安逸。”她告诉自己的孩子，忍气为高，再大的难处，再大的苦，都要能容、能忍，总会有峰回路转的那一天。

生产队时代，集体劳动，提到那个时候的王品松，人人都说她“很凶”。这个词里有赞扬，指这人能干，也含有一丝惧意。那时候，干部们好像永远都在开会很少下地干活，在地里劳动的人出工不出力也都习以为常，但王品松干活从来都不惜力气，自己做得最多，还要催别人做，大家坐在地头歇息，坐一会儿她就要大家继续干活。有人说她虽然不是队长可比队长还要凶，她不说什么，站起身来就往田里走，她已经40几岁了，长期的劳做和负重让她的背已经有一点佝偻，走在窄窄的田间小路上，那背影里有一份掩不住的落寞和疲惫，王品松拍拍衣服上的土，好像要把身上和心头的疲惫一起抖落：“活路早晚都是要做的，早些做完早安逸。”

王品松的活路好像总也做不完，年幼的女儿甚至没有看到过阿妈睡觉。早晨起身时她早已经出去了，院子里会有一捆甚至是两捆打回来的青草，到了晚上，干完了生产队的活，做完了加班，终于回来之后还要再忙自己的事，好像她整晚都在搓草绳、打草垫，打好的草垫送到供销社，一床能卖两毛钱，总是要在灯下干

到很晚很晚。王品松不仅自己干，有时还会拖着女儿一起去供销社送草垫。因为这是在做私活，去供销社都要等到半夜没人的时候再去，王品松背一大捆，女儿力气小，只能背一小捆，母女俩一脚深一脚浅走在漆黑的路上，心头怀着一份现实的期待，走过这段路，五张草垫就能变成一块钱，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言传身教

王品松 49 岁的时候迎来了孙儿的降生，她成了祖母。吉皆乐女人一生都像是生活在男人的身后，就连对她们的称呼也是这样，小的时候是谁的女儿，年轻时被称为谁的媳妇，谁的阿妈，做了祖母，提起王品松的时候，人们都叫她“亮中阿奶”。在生活中，这些女人又都是男人面前的女人，因为她们都守在回家的路的尽头，是家的化身，对丈夫来说是坚定的支持，对儿女来说是温暖的依托，对孙儿来说，也许就更多。儿子媳妇忙于家中地里的活路，忙于盖房造新屋，三个孙儿都是王品松一手带大的。她照料孩子们的衣食住行，给他们讲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和传说，言传身教做人处世的道理，在春种秋收中、在渔樵农牧的生活方式里将对这片土地的爱和依恋植入他们的心田。走在回家的路上，孙儿们都会在门口扬起声音喊一声阿奶，在这一声呼唤之后，迎接他们的是熟悉的笑脸、温暖的火塘、散发着香气的饭菜，是慈爱与血脉的吸引，是乡情与依恋的回归。

村子里的人也开始称王品松“阿奶”，一方面这是当地的风俗，另一方面人们在这样称呼她的时候也包含了一份特别的意味。王品松为人正直，做事公道，遇到什么家庭纠纷大家都愿找她说道说道。她人缘好，又热心肠，曾经在村子里为人接生，亲手迎来了几十个生命，有时候，一个家庭里甚至两代人都是由她接生的。人们叫这一声阿奶，又带着一层特别的敬意。

孙儿们一天天长大，脚下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但他们回归的脚步依然急切，伴随着他们的呼唤，王品松和纳西族的儿媳一次次打开家门、张开怀抱迎接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迎回了他们的不同地域、不同国别的朋友们，迎回了回族、白族、普米族的孙媳妇。他们生活的村庄也在慢慢变大，吉皆乐从一个几户人的小村子发展到四十多户，融进了汉、白、藏、苗、傈僳、纳西、

普米多个民族，有时一个家庭里就会有多个民族的血统，而且家庭与家庭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相处非常融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乡邻关系，不是亲情、类似亲情，或者还有更多的一层什么。

像王品松家，本来就因血缘或者婚姻与十几户人家有了亲戚关系，这儿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从婴儿出生开始就在同年出生的人里认“老庚”，不论民族、不论血缘，老庚会成为一生的朋友，不是亲属、胜似亲属，同时老庚家的人也就成了这个孩子的老庚妈、老庚爹或者老庚姐、老庚哥，会延伸出许多不是亲人的亲人。不仅如此，还会为孩子认干爹干妈，由此又派生出诸如干哥、干姐甚至其他亲戚，如此一来，走到路上，遇到的全都是亲戚：阿爷、表婶、老庚妈、干舅舅……小小的村庄于是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文革”后期恢复了考试制度，王品松的女儿赶上了好时候，不管是考初中、考高中还是考大学，都赶上了第一批。上初中的时候，村子里五个人考上了外面的二中，就有她一个。但那时候她还太小了，从没有离开过家，13岁的她是哭着走的，她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住在学校里也不习惯，常常找个借口请假回家。王品松牵着女儿的手把她送回学校，想到30多年前自己是怎样走在路上，她有很多话想跟女儿说，又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她有很多故事要告诉女儿，告诉她这条路会通往山外很多美丽的风景，通往人生很多美丽的梦想。

“文革”结束了，生活渐渐好了起来，那条通往山外的路也在发生着变化，越修越好，越修越宽，通向越来越多的机会和梦想，王品松在这条路上送走了上大学的女儿，送走了3个外出求学的孙儿，送他们去迎接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也送走了自己的如今年华，当我沿着这条路走向她时，见到的已是一位82岁的老人。

见到王品松之前，所有熟悉她的朋友都提醒我：在她面前一定不要提一年前去世的萧亮中。他们都说，亮中去世带来的打击太大了，她整个就像变了一个人，精神和身体情况都大不如从前。

萧亮中是王品松的长孙，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作为一名人类学者，当建坝风起、金江沿岸面临被淹没的命运时，萧亮中站了出来，用他的图片、他的文章和书向这个世界讲述金江沿岸的故事，让世界看到建坝对这里的人和这种生活

的毁灭性的影响。萧亮中以一种忘我的姿态奔忙，让沿江两岸的人们知道建坝的危害、认识自己的权利，让北京和世界听到金沙江的声音。他是金沙江忠实的儿子，同时也成了知识分子回望乡土、回到乡土、热爱乡土的优秀代表，当教育日渐成为一条向上攀升的通道引领着年轻一代候鸟般飞往城市的时候，他的这种回归显得尤其可贵并意义深远。



2005年1月5日，操劳过度的萧亮中遽然去世，牵动了沿江数万人的心，也几乎摧垮了奶奶。

跟随王品松的脚步，我们走近了吉皆乐，这个依山傍水梦境般美丽的村庄，走进了这片土地肥沃、种一年粮食够吃三年的富庶之地，走进家家户户白族风情的建筑、藏式的酥油茶和纳西风格的服饰，走进了这个带着前工业时代色彩、保留了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和独特乡土文化的弥足珍贵的自在社区，这里的美丽、富足、闲逸、包容、和谐、自足，让人特别容易联想到传说中的桃花源。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赶上了秋季，稻谷和玉米收获的季节，赶上了王品松的普米族孙媳喜得爱女，她由阿奶成为阿太，也看到了一个历经沧桑的生命正在走出致命的创痛。

王品松从人们的痛惜和担忧中再一次挺了过来，用她的笑容迎接重孙女的降生，迎接有些小心翼翼的我们。她在阳光下安详地微笑，讲述自己的经历，也讲到亮中小时候的事情，她居然主

动提到了亮中。老人心里明镜似的，知道我们这些外来的人即便不是亮中的朋友也都会对他怀有一份特别的敬意与感情，知道我们在面对她的时候那种复杂的心情。

中秋之夜，王品松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村民自己组织的晚会，看乡亲们用文艺的形式表达对家乡的热爱：“说家乡，道家乡，金江是个好地方。民族团结似缆绳，保护金江靠大家。农民有地才是宝，黄金来换不理他。”

乡亲们在用他们的方式继续着亮中的心愿，亮中去世以来，王品松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场合，岁月在她清癯的脸上刻满年轮，掩住了内心深处的喜或者悲，让我联想到雷击后重又伸展出新绿的树。

走过一条女人的路

我曾与王品松携手走过村子里的小路，这是一双老年人特有的那种干枯光滑的手，曾经遍布手掌的老茧都已经消退了，只有手腕上因为过度劳累而变形膨大的关节再也无法恢复，向我传递着过往岁月里的信息，当一位这样的老人抓着我的手走过村庄的时候，我说不清是自己在搀扶她还是她在引领我。一个女人，一个历尽沧桑的生命，要走过多少路，走过怎样的路？

就像脚下的路已不再是当年老人走过的路一样，村庄，以及我们身边行进中的生活也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曾经的一切多已无从追寻，面对我的探问，这位身高不足一米五，体重只有六十几斤的老人对我说：“我们这里的女人都这样。”

我们这里的女人都这样。我从一天到晚不停忙碌的大妈身上、从背着高过头顶的柴捆的老老妈身上、从田间抢收稻谷的农妇身上、从集市上绽放一脸美丽笑容的藏族女孩身上、从新生的重孙女身上，看到了30年前、50年前、80年前的她，这是王品松的曾经，也是这片土地上的女性正在进行中的故事。

我们这里的女人都这样。82岁的王品松坐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对我说出了这句话，相较于山路上佝偻的身形和凝滞的步履带给我的衰老、苍凉之感，她阳光下沉默的坐姿宁静安详，甚至是温暖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王品松几乎就是这个升腾着炊烟、飘荡着鸡犬之声、谷仓里储满了金黄的收获、房檐下闪亮着火红

的辣子、空气中跳动着新生儿的哭声和笑声的农家院落的一个组成部分。身后是她劳作了一生的土地和山坡，面前是不息流淌的金沙江，以及那条通往远方的路，那条曾经行走着她的美丽、梦想、抗争、追求、快乐、悲恸、苦难、希冀的路。而今，一切都已远离了这位瘦小安详的老人，她的生命、她的人生，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坎坷之后，在孕育生成了那么多美好、丰硕的生命之后，复又回到了这个宁静的小院。这样的画面似乎构成了一个女性命运的寓言，这是一条寄托着美丽和梦想的路、承载着苦难和忍耐的路、包容了创伤和悲痛的路、穿越了生死轮回的路、回归于宁静平淡的路，更重要的，这是一条孕育并生长着希望的路，其实也就是成就了未来的路。这是王品松的路，是吉皆乐女人的路，也许，是所有女人的路。

附录：

王品松小传

萧亮东

王品松，女，1924年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金江镇车轴村人。她的祖父、祖母原籍今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白族，19世纪末因战乱迁到中甸金沙江边，并在车轴村边一偏僻的山包上安家。她从小就性格坚强，敢做敢为。11岁时，母亲难产，来不及请产妇，她就亲手接生自己的小兄弟。后来遂在乡间为产妇接生，经她的手抢救了很多产妇和小生命。按旧时风俗，她在10岁时即由双方做主，与同村萧凡定亲。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到中甸境。王家地处偏僻，当时曾接待红军官兵。大部队走后，不断有掉队红军前来家中，她和父亲、叔父竭尽所能，将掉队红军由小路送出去追大部队。1937年，当地教育学者萧启韩在县政府申请到在车轴村兴办县立第三两级小学资格，即创办学校，逐步废除私塾学经，推行新式教育。萧启韩在乡下动员适龄儿童入学，并且大力提倡女童入学。王品松听到这个消息，坚持去新式学堂接受教育。时值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她积极和同学组织宣传队，在乡下到处

宣传抗日救国、反法西斯的道理，并举行义演和募捐活动。尤其在日寇侵略到云南腾冲时，她和一些女伴响应号召，曾组织护士队准备去下关（今大理州大理市）接受培训，奔赴抗日前线。小学毕业时，她听到丽江初等师范学校招生消息，准备去参加考试。家中强烈反对，并将其锁在屋里。她毅然联络两名女伴，深夜从家中逃出，夜晚划木筏渡过汹涌的金沙江，连夜步行到丽江参加初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三名同学中仅她一人考中，但因为家中未过门的婆家一起阻止，无力交纳学费而未去就读。接着，她接受车轴小学聘请任课，是当时金沙江两岸唯一的女性小学教员，为车轴村培养人才尽了自己的心力。抗战结束后，萧凡从丽江中学毕业，考中西南联合大学，但因支持其求学的叔父萧启韩病逝，不能继续就读，旋返回中甸，就任县教育科科长，同时与她结婚，婚后到了萧家生活。1948年，丈夫参加中共地下党，为车轴村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并利用在国民政府的教育科职位掩护，从事金江特区革命工作。她积极支持革命，为求得金沙江两岸的和平，与丈夫一起投身正义事业。1949年，革命形势高涨，丈夫从县城回到金沙江边成为职业革命者。同时，敌我斗争也日趋激烈，她积极帮助丈夫，并肩站在第一线，当时曾掩护交通员，收藏文件，担任联络员，做了很多工作。当时家中曾数次遭到旧势力搜捕，敌人甚至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威胁，她坚贞不屈，不管任何情况都不说出地下党的联系方法和骨干分子。

中甸解放后，丈夫在新政权的重要部门粮食局工作。当时，因为她有一定的文化，并为革命做出了一些工作，完全可以到县城做工职人员，但因丈夫家成分是地主，压力很大，加上丈夫弟妹均尚未成年，家庭负担很重，她不愿意让丈夫为难，仍然留在农村。在20世纪50年代，无论是修筑公路，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她均巾帼不让须眉，超值超量完成，是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1956年，丈夫离开中甸，调任维西县财税局局长，但农村家中处境却更加困难。1958年，丈夫更是被莫须有罪名定为“普反分子”（1985年平反）开除公职回农村劳动，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她一直坚定地站在丈夫一边，含辛茹苦抚养弟妹、儿女。丈

夫因长年在外求学、工作，对农村劳动较为生疏，性格坚强不服输的她经常是做完自己这一份，附带还要帮助丈夫做农活。有时，她甚至还代替丈夫和公婆去接受批判。在整个“文革”期间，任劳任怨，艰难地维护着全家人的生活。

“文革”结束后，王品松支持任生产队队长的儿子响应中央政策，顺利在中甸县第一个完成土地承包改革，当年生产队的粮食获得丰收，农民能吃饱穿暖，生活极大改善，为金沙江两岸农村做出了表率。她的家庭也在她的教育下，在社区里起到了标兵和带头人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老人岁数渐大，但她还应别人要求去为产妇接生、照应；在家中也仍然劳动不懈，是村里的劳动表率。对以前整治丈夫和自己的人，老人更是不计前嫌，从来不把老一辈的恩怨向下一代灌输，主动团结别人。金沙江一带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像车轴村就有七种不同的民族，老人平日非常注意维护民族团结，调解邻里之间和家庭内部纠纷，很为乡间敬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品松的带头作用和言传身教最直接影响了后辈和社区民众。尤其是今天，面对一些利益集团、水电开发商计划在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进行疯狂的水坝修建和破坏生态的行为，他的儿子和孙子挺身而出，分别在金沙江边和北京为保护流域生态环境、民众切身利益而奔走。老人虽然年纪大了，没能亲自跑在第一线，但她非常支持后辈挺身而出，鼓励后辈们像当年她和丈夫为中甸的和平解放奔走一样，为金沙江边的和平和长治久安，勇敢地去斗争。老人在各种场合向村民宣传：“没有金沙江，没有村子，也就没有我们这个小家！”老人的家庭从解放前到现在，一直都起到社区领头人的作用，这与老人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现在，全村人自觉地支持这个正义的行动，表示宁死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坚决抵制由利益集团和水电开发商主导的新一场“建坝大跃进”。

李小溪 绿色的守望



文:佟吉清

只要每个人都能从点滴做起，青山绿水就不会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中国每年需要砍伐2,500万棵树和大量的竹子来生产消费所需的约450亿双一次性筷子，少使用一次性筷子，就少砍树。

不要小看我们的力量，更不要把环保的事情笼统地推给别人与政府部门，环保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与你一点一滴的浪费，与你随意扔掉的一个塑料袋子，一节电池，一个玻璃瓶，与你浪费的每一粒粮食、每一张纸、每滴水都有着极大的关系。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

雨后初霁，清凉的微风飘浮在初秋的天空上。

翠绿的芦苇摇曳着自由的身姿，成群的野鸭划开静谧的水面，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湛蓝的天空鸣叫……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想象在距离中心城区几十公里的顺

义杨镇汉石桥水库，会有这样一番别有洞天的景色。

这个被称为北京最后一块苇塘湿地，是李小溪坚守成功的其中一个案例。在呵护自然赐予人类的青山、碧水、白云的过程中，她遇到的更多的是冷漠、不解，甚至是怀疑和拒绝。“因为爱，所以不能看它受伤；因为爱，所以希望它好。”对大自然的热爱是李小溪不曾退却的理由，是她十余年奔走不息的动力。

没有什么比环保更重要

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无限膨胀的物欲，满足着人类的一时之需，却导致自然生灵之间的厮杀，销蚀掉生命本身的存在状态，最终衍生出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对立。

“我活明白了，这辈子没有什么事情比环保更值得我为之奋斗。”采访过程中，李小溪用平和的语调讲述着自己对环保事业的一如既往。

耳顺之年的李小溪，曾跟随身为军人的父母到过许多地方，记忆中生活时间最长，最富色彩的一段时光，要属在辽宁省鞍山市的那几年。

那里有玲珑剔透、被称为“东北明珠”的千山，泉水清澈透明的汤岗子温泉，山峻水秀的二一九公园，蜿蜒山间的自然风光区……说起那个东北小城的山山水水，李小溪如数家珍。

“那时的鞍山天很蓝，水很清，树特别的多，真可称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课余时我和同学经常满山遍野地疯跑，上山采野花，下河钓鱼划船，在山间小路旁不时就会窜出来松鼠、野兔、山鸡，一到夏天，各色的蜻蜓在头上飞舞，傍晚的蛙鸣此起彼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懵懂的孩童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可是这一切现在已经都不存在了。”

19岁那年，李小溪考进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只身来到张家口。干燥多风的春天、炎热短促的夏日、寒冷而漫长的冬季，使她切身感受着大自然的善变和残酷，加深了她对家乡的思念。毕业后，李小溪曾到海南岛原始森林中工作。在那里，她目睹了自然和人类的博弈。森林是当地唯一的燃料供给，为了满足生活所需，棵棵林木被无情砍伐，她曾经为此而感到过惋惜，但当时环

境问题还并不突出，她对此认识也并不深刻。使她深切感受到环境问题日益严酷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到空军指挥学院任教后，李小溪经常到各地出差，有了更多的接触自然的机会，也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思索和担忧。每一汪污水，每一缕黑烟，每一处乱砍滥伐，每一桩滥捕滥杀，都让她寝食难安，都坚定着她投身环保事业的信念。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李小溪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呵护青山绿水的事业当中，为野生动物的生存奔走，为干净的人类生活呼喊。

她笑称自己有点不务“正业”，主要的注意力不在本职工作上，但她觉得这样的付出值得。终于，在想明白了“没有什么比环保事业更重要了”的前提下，李小溪决断决定，提前结束大学副教授的职业生涯，为此，她提前 3 年提出退休申请。

常有人问她为什么对环保工作如此执著，她说是“爱”和责任。军人以保护国家的安全为天职，李小溪则以另一种形式守护着和平。

螳臂挡车的勇气

河水清澈充沛，河堤灌木浓密，河岸乔木参天，青蛙多的时候甚至会爬上路人的脚面……绵延 100 公里的京密引水渠，曾经给居住在昆玉河段附近的李小溪留下如此美好的印象。

然而，从 1998 年底，北京准备投资数亿元，对京密引水渠进行全面衬砌：河岸的天然灌木被砍光，大量乔木也正在被砍伐，代之以人工景观，河底和河岸也将全部铺上水泥和石板，目的是“防止河水渗漏、提高水质、减少水草、便于清淤”。

此时，李小溪刚好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二届人大代表，挽救这个给生活在钢筋水泥建筑中的都市人以大自然的气息的绿色河流，成了她首当其冲的关注焦点。

“一棵棵碗口粗的大树倒在我面前。看着它们的伤口，我很难过。”李小溪开始在水利、环境、园林各个部门间奔走，游说施工者停止砍伐，同时联络其他环保者加入阻止砍树的行列。

为了了解情况和增加知识，她拜访和请教了十余名有关专家，“专家的观点让我很快意识到，衬砌河道的弊端绝不仅仅是伐掉几

棵树，这种做法既不利于保护水资源也不利于净化水质，其结果是使一条活的、有生命的河流变成了人工水池。”李小溪说。她写了《如此治理，弊大于利》等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等刊物上。她还多次到市水利局、林业局、环保局等部门，恳请有关领导改变思路，停止砍树和硬化河道。

然而，她的呼吁并未奏效，京密引水渠工程还是上马了，并在2000年11月16日全部衬砌完工。但她的努力还是有一些作用，原计划砍伐28,000棵大树，在李小溪的奔走之下只砍了3,000多棵，她的努力拯救了24,000多棵大树的生命。

几年后，李小溪担心的硬化工程的恶果逐渐显现，“那里的自然风光随着治理工程的进行已荡然无存，河流失去了自净的功能，水生生物种类减少，青蛙已经绝迹，水质急剧恶化”。她感到了那种螳臂当车的那种无奈，“但是，螳臂当车我也要挡”。这不仅需要毅力，更是一种精神和勇气。



好在后任领导吸取了教训。2002年，新上任的北京市水利局局长在媒体上指出，北京市今后再也不修建“铜帮铁底”的河道，即不再用水泥修筑河道，要逐步恢复以往天然的河道。在无可奈何和叹息之余，李小溪多少有些欣慰。

“搞黄”了一个大项目

湿地，因其特有的环境调节功能被科学家称为“地球之肾”。

随着城市的扩张，北京的湿地面积大大缩小，自然湿地只剩下顺义杨镇汉石桥水库湿地一处。

那里曾经是个非常幽静的所在，一片面积近3,000亩的野生苇塘，群群游弋的野鸭，各种翩跹的飞鸟，构成了自然界最奇妙的景观。

然而，这一切几乎片刻间便会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

2001年10月的一天，李小溪从《北京晚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得知，北京东郊顺义区汉石桥的杨镇即将建设一个投资20多亿元人民币的高尔夫球场和娱乐城。她还了解到，这个名叫做“京东大芦荡休闲旅游度假村”的建设项目，计划在湿地北边建一个大型娱乐城，东面和南面建高尔夫球练习场，西边建人工绿化广场。

对于北京这样一个干旱少雨的城市，这块湿地显得极其难得和珍贵，一旦遭受破坏，其损失无法估量更无可挽回。

“湿地周围的设施会切断湿地的水源补给，使湿地完全干涸；人类的频繁活动、车辆的轰鸣和废气，会污染环境会污染环境，给栖息在芦苇里的鹰、隼、池鹭、灰鹤等鸟类，还有野鸭、青蛙、蟾蜍及各种昆虫带来灭顶之灾。”

敏锐的李小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她拿着代表证来到顺义，找到当地主管工业领导和开发商，痛陈建设高尔夫球场之弊。“凡是破坏环境，让我感到痛苦的事，就绝对不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她说。

2001年11月7日，李小溪在《中国青年报》和《中国环境报》上发表文章《何不建一座湿地公园》和《要湿地还是要高尔夫球场》，建议有关部门调整思路，考虑在此建设湿地公园，其核心地区——长满芦苇的湿地禁止游人进入，在湿地四周退耕还林还草，种植大量本地原生乔木、灌木和野草，建成和谐的自然湿地景观。外围还可考虑建一些观鸟台，供游人观鸟。

此后，北京林业局、环保局和规划委员会等部门对此事进行了干预，这片湿地被列入“北京市湿地保护名录”，拨款2,000

万元用于保护。原来的工程项目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湿地公园。

就这样，李小溪和她的朋友一起“搅黄”了一个价值20亿人民币的大项目。

湿地保住了，李小溪依然关注着这块湿地的命运。

2004年3月18日，一条被当地领导看成是促进顺义经济发展的“致富之路”，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前期的土方工程，其距离湿地最窄处只有2.8米。

公路离苇塘湿地太近，肯定会对湿地造成不利影响。李小溪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救救北京最后一块苇塘湿地》，为保护湿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奔走。最终，在国家环保局、北京市环保局、人大、政协的干预下，公路向东平移了50米，并种植了大量大树作为隔离墙。

这是李小溪投入环保事业以来为数不多的一次胜利，虽历经曲折但结果令人满意。“与其说是我认为自己有多少能耐，能解决多少问题，还不如说我是为了求得自己内心的平静，我尽力了，我没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她说。

面对一代名园的叹息

圆明园，这座拥有近300年历史的皇家宫苑，充满历史的悲情。

无论是作为普通市民，还是海淀区人大代表，李小溪都喜欢到这里走走，遗址那种浑然天成的凄美，经常让她驻足沉思。

2000年底，圆明园西部整治工程启动，主要是清理福海附近的住户，恢复圆明园的山形水系，李小溪作为人大代表应邀参加了有关会议。

会议期间，有关部门让人大代表在圆明园西区转了一圈。此前，因一直没有开放，李小溪也是第一次走进这里。

200多种野生的植物，160种鸟类，那里是城区生物多样性保持最好的地方。“真让人惊喜：原来北京还有这样一个纯自然的所在！”然而，她得知，这些自然景观在圆明园整治工程中“荡然无存”。她为此忧心如焚，在人大提出“在圆明园整治工程中要注意生态保护”的建议，并给国家文物局长写信，建议在圆明

园整治工作中，一定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绝不能破坏其自然植被。她的建议得到了国家文物局长的支持，在她的努力下，圆明园管理部门、文物保护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环保人士为此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在圆明园整治工作中如何保护生态环境。然而，奇怪的是，有关部门仍然按照原计划对圆明园进行整治，大量树木被砍伐，自然景观遭到严重破坏。李小溪伤心至极，从那以后，就再没进去过。

2005年3月，一位学者的偶然发现，引发了防渗工程的激烈争论，再次勾起了李小溪心中这个永远的痛，也再次让她走进了这个她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这么大的工程没有征求公众意见，没有向社会公示，没有开听证会，我们以前很多工程出现失误，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从防渗事件暴露、叫停、召开听证会到国家环保总局根据清华大学出具的环评报告要求全面整改，大约100天的时间里，李小溪始终予以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走过了一段艰辛却有意义的历程。

2005年4月13日上午，国家环保总局召开了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公众听证会。代表在会上对圆明园整治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强烈质疑。

李小溪作为代表参加了听证会，她认为东区防渗工程是西区砍树事件的继续，其用意就是毁掉自然景观，打造人工景观。她问：有关部门声称工程是为了“节水”，为何把西区大量不仅不耗水、相反将能够涵养水源的原生植被毁掉，而种植人工草坪等高耗水的植物？她还就工程本身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圆明园的防渗工程在施工之前有没有经过招投标，如果有招投标，为什么三家中标的公司都是北京市水务局、海淀区水务局和圆明园管理处的下属单位；第二，3,000万元的防渗工程，费用是怎么使用的。

在听证会后，公众一直在关注着，在清华大学环境评价报告之后环保总局要求圆明园防渗工程全面整改工程的进展。然而，千万人关心的圆明园防渗整改工程，最终却在没有公开验收报告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李小溪告诉记者，圆明园不必保持1米多的水深，有几十公

分的水深也可以保持湿地的功能，保持1米多的水深那是圆明园管理部门想在湖上行船，那样就有收入。“毁掉自然景观，打造人工化的景观，说白了，就是一个字‘钱’。”

“表面整齐了，但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的那种浑然天成的景色消失了，历史的沧桑和凝重感也已经不复存在。”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提起这件事，李小溪依然痛心疾首，“真的不想回去，一看就想起以前的样子，那里成了我的伤心之地”。

时间将证明她所做的一切

康德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在这位集天文学家与古典哲学家于一身的先贤，离开现实世界200年后的今天，迷醉于浮华表象中的现代人，似乎距离纯美的自然愈发遥远。

李小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感召人类反省自己的作为，用行动平息自然生灵和人类之间的对立，实现世间万物的和谐共处。

节约水电等资源、垃圾分类、大气污染、白色污染、光污染、废旧电池的处理、野生动物的保护、森林植被的保护、筷子等一次性用品的限制使用、全国中小学教科书重复使用等，都在她关注的视线之内。

为此，她的电话本上记满了各部门、各单位的电话号码，国家环保局、林业局、水利局，凡是和环境有关的大概不下几百个电话。电话打的多了，以至于许多单位的负责人拿起电话听筒，就能分辨出她的声音。

担任海淀区人大代表期间，李小溪先后通过各种渠道提交了140多件建议和议案，其中大多和环境问题有关。此外，她还向各相关部门和外省市投递了上百封信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落款写明自己的身份及家中的电话号码。任期结束后，她仍旧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今年不解决明年提，明年不解决后年提，一直到解决了为止。”

“她曾给中国的3位总理写过信，其中2位总理对她提出的问题做过批示，她真的非常了不起。”一位同样从事环保事业的女性

这样评价她的工作。

“10年以前，许多人说我是小题大做，耸人听闻，甚至说我是‘极左’，但现在多数人包括一些职能部门的领导都承认我是对的。”李小溪为此感到欣慰。

她相信，只要每个人都能从点滴做起，青山绿水就不会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李小溪随身携带的挎包里，始终装有两样东西，一双金属筷子、一个布兜子。外出就餐，绝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中国每年需要砍伐2,500万棵树和大量的竹子来生产消费所需的约450亿双一次性筷子，少使用一次性筷子，就等于少砍树。”这句话，她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影响了多少人的生活习惯。

无论在超市购物，还是到市场买菜，李小溪都会谢绝对方提供的塑料袋，使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布兜子，“仅在北京一地，每年就要用30亿个塑料袋，在500万吨垃圾中，就有40%以上是塑料袋等包装物。”她坚称，“塑料袋是20世纪最糟糕的发明。”

在位于北京西北四环家中的厨房和厕所里，大大小小的水桶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李小溪和老伴早已习惯了把洗菜、洗碗、洗内衣水储存起来，再用来冲洗厕所这样的生活流程。

“不要小看我们的力量，更不要把环保的事情笼统地推给别人与政府部门，环保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与你的一点一滴的浪费，与你随意扔掉的一个塑料袋子，一节电池，一个玻璃瓶，与你浪费的每一粒粮食、每一张纸、每滴水都有着极大的关系。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咱们的国家就会多拥有一片蓝天、一汪碧水。”

尾声

如今，北京顺义汉石桥水库湿地那片丛生的芦苇愈发茂密，成群的野鸭翩然窜出水面，欢快的鸟鸣透露出肆意的生机……

这一切，验证着李小溪努力的力量，守候的力量和坚韧的力量。

黄惠琼
生态文化捍卫者



文：李伟仪

生态不只是一棵红树，它还宣扬了女性对于自然的尊重和爱。

我做的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有人陆续接力去关注，这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我没有遗憾，我不介怀曾经失去机会追求书本里的学问，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学问乃源于真正的生活。我自豪于作为女性、家庭主妇、生态保育者的身份，我觉得女人的最高智慧是她们懂得欣赏大自然。

香港社会经历急速的都市发展，土地成为地产商攫取高额利润的投资项目。回归后，香港政府与地产商的官商勾结问题屡遭民间诟病。政府并未因市民不满而停止滥权，土地发展问题更延至香港最大的生态幅员——大屿山。位于大屿山的大澳生态首当其冲受到破坏。在政府讨好地产商、传统父权脉络统治社区的不利情况下，大澳这片保存了渔村文化特色的土壤面临极大生态及文化破坏。

为了保留大澳社区不堕入都市化的陷阱，一位大澳女性站出来保护生活的社区。我们聆听黄惠琼的和平故事，便可了解她是怎样勇敢地宣扬生态保育的和平使命。

黄惠琼，1958年生，在大澳成长，家庭主妇，早年曾任幼稚园老师。她是一位尊重自然、捍卫生态的母亲。她受教育机会不多，却对贡献社区怀有热诚的心。自1982年，她开始关注到大澳作为位于城市以外而又偏远的社区，居于大澳的老人家及弱智人士未能得到适当照顾并受到歧视。她以爱心对待弱势者，关心他们，并与当地的社工合力提供关怀。

至20世纪90年代，大澳因地处偏僻，本土经济没落，大部分年轻人离开家园，黄惠琼尝试重振本土经济，统筹“大澳经济发展计划”，倡导社区经济。同一时期，政府与地产商对大澳及整个大屿山的发展虎视眈眈，黄惠琼奋力推动大澳居民和香港市民一起发声，显示民间对于文化保存及生态保育的重视。在缺乏资源与人力匮乏的情况下，她仍坚持理念，捍卫大澳不被政府、地产商、男性乡绅的摆布和破坏。她对于父权、不民主、封闭、看扁女性、破坏自然环境的做法反感。黄惠琼认为生态不只是一棵红树，它还宣扬了女性对于自然的尊重和爱。

今天，黄惠琼的“大澳文化工作室”已成立好几个年头。她自1994年开始透过村民搜集生活物品和文物，又把300多名村民的故事摄录成大澳的口述历史书，于2000年倾尽积蓄出版了文化及口述历史书籍《大澳水乡的变迁》，于2004年11月出版了第二本新书《澳水灵山》。写作目的是为了发扬爱护社区的精神。她现时主要的工作包括教育推广，搜集区内的历史文物作展览用途，探望区内长者并搜集口述历史作保存。她教育市民、游说政府和议员、透过亲力亲为的义务带团方式，让市民明白挽救大澳社区的重要性。她已接触过十多万人次的市民，让大众明白到我们的生活如何受到都市化的蚕食。

愚妇移山

黄惠琼是生态保育的和平先驱，她自年轻时已参与社区本土经济和生态保育的工作。黄惠琼在1993年推动“愚妇移山大行动”，发动大学生及志愿人士徒手重修象征大澳历史与生活面貌的

堤壘。

“大壘是为保护盐田而建筑，我爸妈于1958年来大澳，自小看见盐田，不过有些已荒废。村子对开有条很高的堤壘，麻石砌，街坊叫它大壘。夏天黄昏和晚上，村民会来大壘散步、看日落，我十多岁时常与朋友到大壘倾心事、看星星。那里没有街灯，很黑，是看星的好地方。大澳人都不知它于何年何月兴建，不知它的历史。大壘本身很整齐，是一条大麻石壘，随着20世纪60年代政府不再修葺，加上有街坊把盐田改为鱼塘，挖松了大壘的基础，到80年代初它因日久失修而损毁。1988年，我从新村天后庙一面载于乾隆之岁的碑文中，发现大壘叫‘护盐围’，有近300年的历史，它是建筑文化遗产，又有观赏价值，它是人来人往的通道，可观赏日落，实际阻挡海浪，应该予以保存。可惜，当时的地方团体如乡事会、区议员都不认同我的看法，我前往负责大澳事务的离岛民政事务处亦未被理会，我只好到立法局请愿。请愿之先，我召开记者会。我之前有争取社区不同设施的经验，希望传媒报道可令香港人关注。我写信约见立法局议员，申诉部职员却说这事不值得议员接见，我不甘心，一边打电话给立法局议员，一边预备记者会。在1988年夏天休会前几天，我开了记者会，差不多全港报纸的记者都来了。其后一位女记者，她现在成了我的好朋友，她见我这样一个师奶老远从大澳乘车到梅窝，再坐船到中环，来回5个小时，却是为了一条堤壘，深感不解，便跟进个案。她亲身来大澳住了，访问了街坊怎样看大壘。她发现大澳人都很喜欢大壘，可以在壘上拍拖、散步，是个很舒服的地方。但要街坊去请愿，未必可以，于是我收集了780个签名，呈给立法局议员，其后得到几位议员接见，虽然议员有跟进，但地方团体和政府部门都说没有需要，坚决不抢修。我再次去请愿，也没回音，我没灰心，1988年至1993年间不断争取，抢修大壘，名为‘愚公移山之抢修大壘大行动’。传媒问这行动是否绰头，我答不是，从没想过什么绰头吸引报道，只因我于搬石头抢补大壘，别人说我笨：‘你是白费心机吧！政府反对，地区团体不支持，你不会成功，你自己搬个够吧！’我希望用人手抢修，因大壘本身也是人手砌成的。有人讥笑我笨，像愚公移山。我想，不错！我做的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有人陆续接力去关注，这精神是值

得提倡的。写新闻稿时，就以‘愚公移山之抢修大壘大行动’为题，我还有一本签名册呢！新闻稿发送传媒，看谁先联络我就由谁做吧！”

“我找了香港7间工业学院的公民教育主任麦太，她说行动很有意思，便与7间学院的老师谈谈，看看老师和学生会否愿意自费参与行动。当日，记不起天文台是挂了黄色还是黑色暴雨警告，麦太说港岛倾盆大雨，问我大澳情况。我说大澳没下雨，天阴阴，若为学生安全不来，我已很感谢他们。那时没手提电话，通电后便出门，还找来了圣士提反教会的教友们和几十名街坊帮手，学生来不到，我们也会继续行动。很开心也很感动，早上10时多，巴士站有百多位师生下车，场面使我感动得失控！我之前已预备一番说话，让学生明白为何一个师奶要抢修大壘。那天是5月1日，麦太说这日子很有意义，是劳动节。对学生说不了两句，我已哭得声泪俱下。有些同学笑说真不明白这师奶为何拿着扬声器边讲边哭！但当我再讲多些，学生明白了活动意义，他们便严肃地听我讲长达20分钟的说话。接着大家很努力地帮手，载沙，造沙包。之后，我掏腰包请百多人分几家酒楼吃饭，这边四围吃饭，那边五围吃饭，真是感动！真奇怪，那天雨下得厉害，但开工那几小时竟没下雨，收工时便下雨！香港那边是暴雨，港岛区水浸，大澳乌云密布却没下雨，经历很深刻。其后我有空便去搬石头；有团体来又去载沙，捡石子。我要保障协助者的安全，不随便搬大石头。每星期我与教友搬石头修理大壘。可惜，修好一段，又刮台风，1993年差不多每隔两星期便有台风，3号风球、8号风球，半年内不断刮台风，若非一次过完全修理好，台风一来，抢修中的大壘又会毁了。”

过程是最重要的

“我一个女人推车搬石头，我丈夫自己去钓鱼。他说，我认为要搬，就不要喊辛苦，他也着我不要做得太辛苦，免得胸口痛，要适可而止。他知道无论怎么劝，我都会继续做，他说政府不肯拨款，地方团体反对，但如果我觉得值得坚持，他会支持我，但他不会帮我搬，我亦同意不要影响家庭，饭要煮，儿子的功课要看，做好事情才去搬石。维持了一段长时间，11月前后仍然刮台

风，这是鲜有的。那一次，风浪把所有工具冲走，连英泥沙都没了，我想，怎么办？应否继续？那时我未有宗教信仰，坐着看天，心想世上有没有神？如果有神，为何会这样？忽然天上有一线曙光，说起来奇怪，脑海浮现两个字——‘过程’。自1988年争取，到1993年抢修大壘，付诸行动，过程中我已尽心尽力做，问心无愧。有人说我是出风头、博出名、搞出位，认定我失败，我为了证明不如他们所说，坚持要做到，想法却渐渐成为心理包袱。其实我不必向这些人交代，这刹那‘过程’让我明白用了多年时间，这么多的金钱，走出走入请愿，过程中有超过600人参与抢修大壘，有街坊捐钱、捐英泥，这已很不错了。结局未如理想，未能成功重建大壘，但我们已将关心别人和社区的讯息带出。于是我立即跑回家告诉丈夫，说我想通了，原来‘过程’才最重要，事实上我亦缺乏体力和金钱去继续，于是我停止抢修。”

“近年政府其中一项计划包括重建大壘，并将那里的自然湿地改为人工湿地，大壘被完全拆毁再重建，我不认同这种毁坏天然红树和损毁历史文物的建筑手法，大海景观因渔船停泊区而破坏，而且工程大花了接近3亿港元。但经历了18年，大壘终于重现大澳，街坊也看到我于18年前说要抢修大壘，方向和做法都是对的。18年是很长的时间，但终于居民可重踏这宝贵的地方。”

让公民社会集结力量

黄惠琼以身作则爱护社区，她认为社区工作和关怀属群体参与，每个人都去参与社区事务，不论哪个层面，替邻居照顾小孩，问候邻近的婆婆，婆婆有病时煲汤给她，都是很有价值的。每个人都贡献社区，人才会生活得开心。大澳的特色是人与人之间较相熟，伦理关系和好，大家碰面说声早，有种亲切的感觉。我希望将关心别人的讯息透过我的行动表达出来。

黄惠琼尝试把公民社会的团结力量，从大澳延展到整个香港社会。

“我脸皮很厚，到不同部门和团体敲门，政府、学校，我会亲身拜会，为的是让大家明白我的诚意。失败的经验很多，但我没有怪责别人，我想到社区有不同的人，人们做不同的事，未必是我做事的形式保留社区、关心社区或新界文化方面的工作，人们

所作的可能是其他我做不了的工作，这不等于人们不爱大澳。庙诞时有人筹募金钱搭棚做大戏，使居民有粤剧看；端午节有人筹钱开龙船会，健儿出钱出力买龙船、划龙船，大家用不同形式保存大澳的社区文化和特色。我近年于工作上提升了自己的层次，明白到大澳不只属于大澳人，而是属于香港人。再宏观一点，全世界的人都是大澳一份子。从这角度去看，自己会释怀，不再觉得孤军作战。我接触到出面的老师和学生，我就好像播种般，就算他们没帮到大澳什么，也能将讯息带返自己的社区，形成社区文化的观念，社区精神和归属感，这样会比较开心。豁开去，开心一点去看，其实好多人认同自己，支持自己，爱大澳这地方，看看签名册就是一个鼓励，久不久看看签名册我就会有动力。”

大澳文化工作室

“大澳文化工作室”资源紧拙，每月必须筹得 5,000 多元维持基本运作。愿意帮忙的是谁？黄惠琼描述得很生动：

“有些市区来的小朋友会捐钱呢！小朋友很可爱，叫我琼姨，很有亲切感。我向小朋友讲解工作室不是政府开的，是民间组织，小朋友拿了些零钱来捐钱，他们不是为了拿到沙白贝壳而捐钱，小朋友觉得工作室很美，想支持琼姨。”



“又有一些游客，不要看他们穿得很尊贵或受过高等教育，进到工作室未必表现得很欣赏。进来捐钱、买纪念品、买书的，较多是草根阶层，婆婆公公捐钱使我很感动。有一位婆婆，她不识字，却叫女儿用 100 元买本书回家。女儿说书很贵，又说婆婆不

识字。婆婆却说要支持我。小朋友也是这样，他们从小钱袋中拿1元出来捐献，我亦感动。当然，亦有游客会横着进来，横着出去，看见捐助箱便说：‘又是要收钱。’接着走了。有中上人家带着工人来，主人吩咐工人站在工作室门外不准进来，我不断叫工人进来，主人却说工人要站在外面。我心想：‘工作室没收你入场费，你可以进来，怎么工人不可以呢？’我叫工人进来，她不敢，过一会主人才准她进去。我真不明白那主人的心态！主人和工人同是游客，身份一样吧！”

“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士，他逛完工作室，说希望将来我可以再写一本书，说毕便放下钱，支持我出版下一本书。最初不知道有多少钱，后来发觉有2,000元。这使我十分感动，我在新书的感谢篇中，把他的名字记下来了。这是很大的鼓励，我做的得到认同。”

细水长流的社区工作

黄惠琼认为，民间行动爆发出来能带来瞩目的效果，与此同时，细水长流的教育往往更能带来长远的成效。所以黄惠琼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社区工作，至今未停。

“即使做到我死那天，我也会在大澳做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工作。像我早年探访老人和弱智人士，为他们举办活动；现在他们都得到不错的照顾，弱智人士有圣雅各福群会社工来给他们上课，带他们出香港学东西；老人独居服务和家居照顾现在也做得很好。二十多年前社区资源匮乏，我便担当起照顾弱势群体的角色。近年我办工作室和写书，如有朝一日工作室结束，而政府又肯兴建盐业文化资料馆，我希望他们会邀请黄惠琼当导赏员教育市民吧！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我会再写第三本书，我喜欢与人倾偈，街坊还是妇女，我都喜欢。社区工作细水长流，行动是单一事件，能让更多人去关心，但两者对于建立社区归属感，皆很重要。大澳常有议题，新渡轮停航要行动；政府要在大澳兴建十号货柜码头，我们又到申诉部请愿或开记者会。我很希望政府考虑发展一个地区时，较多协调教育署、地政署、路政署和运输署等大大小小的部门，并与居民商讨。十号货柜又去请愿，新渡轮停航又去请愿，中学缩班杀校又去请愿，大澳居民会筋疲力尽，

很吃力。社区工作是很长远的工作，除非我离开大澳，要不然也应该亲力亲为为社区做事。”

我是师奶

常常有人看扁家庭主妇的能力，说师奶不懂事，黄惠琼却常常自称大澳师奶。她有爱护她的丈夫、两位孝顺的儿子。黄惠琼对师奶这身份，以及家庭主妇参与社区有何独特看法？

“人们觉得家庭主妇与时代脱节，但香港的家庭主妇，情况并不是这样。她们一般也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程度，是为了小朋友才辞工。照顾家人起居饮食是不简单的，当然除了照顾小朋友，我觉得已婚女性可以在家庭以外做些事情。当年我参与社会工作，从家里无水无电开始，我丈夫很支持。但当我说要参与社区发展，他初时是反对的！他觉得我会少了时间照顾家人，他觉得女人属于家庭。我的想法是，当年透过争取家人居住的盐田垦村有水有电，令我明白到不去反对不合理的事情，就像我爸爸，一二十年來我们也是无水无电，无论是天晴、下雨还是刮台风，我们也要到水井推水。以前我们就是过着这种生活，晚上点着大火水灯，30多度炎热天气也照着大光灯；供应全大澳的水在我家地下流过，发电缆在我们村子上空越过，若不幸电缆压下来电死我们便讽刺极了。我当时据理力争，爸爸也反对，说乡事会不支持。但争取后，我们于3年后有电，3个月后有水，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不能因事情看来不可为而放弃，也许有些事情需时较长，有些事情短时间便见效果。在1984年参与‘大澳经济发展计划’，我丈夫也不赞成，说我又花时间，又做义工，又带团，又不是有钱收。我去请愿时，他宁愿请假两天照顾儿子，喂奶，他不放心别人看管两个儿子，所以要放假。我的儿子1984年出世，1988年时他不过是3岁，丈夫不放心。对于社区工作，他觉得若地方人士不认同，继续去做会很吃力，我会受伤害，事事强出头也不好。当我参与‘大澳经济发展计划’时，他亦面对不少阻力。我认为女性结婚后，该有自己的生活和理想。总而言之，我会让孩子上了学才出去工作，他们回来后我便不会外出，我会预备好两餐饭，有糖水，有汤水，不会走出去不负责，我有适当的节制。”

丈夫的支持与认同

“丈夫的看法渐渐转变。1988年，我一次又一次去请愿，短时间内4次往立法局请愿，又开记者会，我丈夫也有请假。他不知道我不善坐车坐船，常常作呕，有次在梅窝码头呕吐得厉害，回到家已经筋疲力竭，但他认同这是值得去做的。太平街浴室公厕事件，其实与我没有关系，我又不是没有厕所用，但街坊说蛇无头不行，我丈夫还主动劝我帮助别人。丈夫明白了一些观念，反过来说服我去帮助街坊，这也是一次很成功的经验，公厕到最后被清拆了，但有重建一个新的。还记得当时我带了十多个大澳居民到香港港督府递痰罐请愿，能够动员十多个大澳居民，是大澳社区历史上最厉害的一次，这是1989年的事。原本那个浴室公厕于20世纪70年代初建在太平街附近，即现在龙田村入口，地方团体和区议员没有咨询居民的情况下拆掉，兴建第二期公屋。但从前太平街和永安街很多旧式的住屋都没有厕所，没有化粪池；棚屋和沙田村也没有厕所，大部分人都是去那个浴室公厕的。拆的过程根本没有咨询居民，怎样解决临时需要？将来会否重建？根本没有理会。我先到乡事会找主席商讨，他居然说以前大澳居民都没有厕所用，都是用痰罐的，于是我便拿痰罐到港督府请愿，那时而言是很厉害的了。记得那名警长说：‘痰罐就不可以收了，那封信就收吧！痰罐你自己拿回去呢！你不要难为我啊！’其实那痰罐是簇新的！”

对抗父权文化

黄惠琼对女性自主有她的看法。她认为女性不论教育水平高低，都应能自由选择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我没有遗憾，我不介怀曾经失去机会追求书本里的学问，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学问乃源于真正的生活。我自豪于作为女性、家庭主妇、生态保育者的身份，我觉得女人的最高智慧是她们懂得欣赏大自然。”

黄惠琼身处的离岛区域，男女性别角色悬殊，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浓厚，不少乡事派的男性因历史遗留原因以及传统父权脉络而获得政府笼络，互相交换利益条件，无视生态与保育的重要

性。黄惠琼曾因争取保育，而遭到乡事派的留难，她的大儿子亦受到袭击。该次事件中，黄惠琼因反对政府的大澳渔船停泊区计划，而遭到数名男性村民闯入其新成立的“大澳文化工作室”会址，用粗言秽语肆意侮辱，其子亦被人打伤。

“我经常都会与他们商讨，每件事也先会跟他们商讨，但他们常常不接受。这里乡事势力很大，离岛区议会和乡议局有决定权，他们常批评我什么事也反对，好像曾有建议把污水从昂平排来大澳，他们竟然赞成，但我反对。他们认为那些污水是净化了，但我却认为污水排到大澳河中对我们没有好处，对岸边的居民也没有好处。他们说我凡事都反对，事实上我经思考和研究后，觉得应该反对便反对，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逍遥豁达的女性力量

“我的动力和信念，是因为我喜欢大澳，爱这个地方，越做便越想认识这成长的地方。用了1年时间写《澳水灵山》，就这样认识很多红树品种，带团时懂得告诉大家大澳红树的生态价值，红树在哪时开始成长，经过多少时间孕育出来，使我在带团时多了不同话题。参与者会说：‘黄姑娘，你很棒，很厉害啊！’赞我认识红树，什么也都认识，我告诉他们，我本来不知道红树是什么，从前只从欣赏角度看，不知道它们的品种和名字，只知道我喜欢这些绿色植物，后期多留意环保知识，便可与大家分享了。”

“撰写《澳水灵山》我还学拍录像，这是大突破，以前我常逃避说不懂摄影，说自己技术不够好。我拍摄录像，没有人教我技巧，我也没有用脚架，只把相机放在石头和栏杆上拍摄船景。渐渐，我由完全不懂拍录像，直至现在懂得如何剪接，连录像工作者也说我做得不错。从来没有人教我树木反射出来的光是美丽的，怎样拍摄映照湿地上的光线，山景似水墨画般，这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这是很宝贵的经验，所以我鼓励年轻人，我是师奶什么也不懂，不懂英文、普通话和电脑，但在较少人的时候，我会尝试说英文和普通话，下一代要对自己有多点信心，不懂也不打紧，不要自卑。不懂电脑便算吧，不懂这些或那些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你一定有个人长处，你会有自己做得好的地方。我常说：‘其实不用这般不开心，失恋便失恋，失业便失业，休息一

下，没什么大不了，你能渡过的。’做人不要不断想着那麻烦的事，令自己不知所措，我们应给自己时间和空间。我把个人经验拿来与青年人分享。在大澳做这些事一点也不易，但只要得到朋友支持，自己便会继续做得好。现在我订下两年短期目标，至少做到2007年，以后再作打算。若然盐业馆址真的落实，或政府真的需要我帮忙，我愿意做。若找到年长的晒盐工人，我们可以做录音访问，做资料收集，在大澳建立一个特别的馆址，这是可以做到的。”

生态和平 社区和平

“一般人觉得没有战争就是和平，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像这小社区，邻里关系很重要。若与邻居合不来，各不瞅睬，这不太好受。大澳则不同，邻里关系和睦，彼此间相识，使我很开心。在社区走动时，大家碰面会打招呼。此外，我觉得每个人也应该爱人，爱社区，这便是和平。还有，我们要珍惜大自然，我们也要和大自然和平共处，大自然与我们息息相关，无论雀鸟也好，红树也好，其他生态也好，甚至天上的蓝天白云也好，这些东西出现并非必然。若我们不欣赏，它们可能会消失，不能在它们消失后才感到后悔，我们不能这样。无论人或大自然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欣赏和尊重的态度。大澳正给我这个条件，在这儿生活，我常对别人说，大澳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别人也回应这儿确是个好地方。有游客签名时说26年前来过大澳，现在又再来一次，他们会写下对大澳的感觉。其他人也问大澳越来越少人，得2千多人口，这地方会否逐渐衰落？我说，若我们的下一代能继续延续大澳的活动，有一间屋，他们便会回来。像我的两个儿子般，他们会带同事回来，儿子对大澳有感觉，甚至同事们也喜欢大澳。他们上星期来过，这星期又再来玩，不论什么心情也好，始终喜欢这地方。这样，大澳便能持续发展。大澳的流动人口也不少，平时有2,000多人。假期回来的大澳街坊，为数不少，特别是暑假、新年和端午节。龙船会的人在露天帐篷下吃饭，令人完全感受地区文化，整个地方的居民也去参与活动，即使我不是水上人，不会划船，但也会去跳舞，去吃饭。社区参与非常重要。我鼓励居民的儿女和孙儿，好像楼上伯娘有3个女儿，几个孙儿，

于迁出后多回来，一起烧烤、游泳，孙儿也很喜欢放假回来探望婆婆，这种情怀是需要培养和延续的。若有一天，我和丈夫去世，公屋要交还政府，我的儿子可能会留在香港，减少回大澳了，一家人便要成为大澳的过客。未来的日子，我始终会在大澳生活，儿子放假回来饮糖水，与朋友来玩乐，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若大澳发展成为另一个新市镇像东涌时，儿子便没有机会带朋友来大自然游览，这不是很可惜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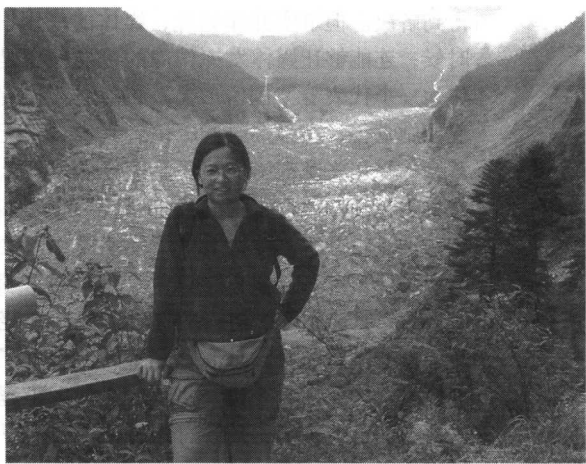
因为黄惠琼的努力，十多年来社会大众、市民及下一代渐渐明白大澳保育的意义。环保议题不是个人化的责任，黄惠琼关注到资本主义社会和政府生态所带来的破坏。黄惠琼经常强调，香港政府对于大澳以至整个大屿山的发展构思，都是从商业角度考虑，引入财团进行环境破坏，根本没有关心过本地居民的需要，没有尊重大自然及生态的宝贵，渔村特色变成消费的绰头，迪士尼乐园于大屿山兴建所带来的破坏更令黄惠琼担忧。

女性主义强调和平，包括人和生态的和平相处，这一点经常备受社会忽视。黄惠琼以女性角度，揭示出都市化过程经常伴随官商勾结，这是不公义，且是一种父权式的破坏。

20多年来，黄惠琼怀着一股和平使命感，关怀社区内备受忽视与冷落的弱势群体，努力为生态保育和社区保存作出贡献。笔者很欣赏黄惠琼对于社区文化及保育的观点，她说：“要保存文化，人是最重要的元素。若政府不能把人们留在村内，到时人去楼空，发展便要失去它的意义。”

黄惠琼一直参与大澳的保育和文化保存工作，她身体力行争取保护大自然，这是女性主义强调保育社区环境理念的一种实践，带出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她是一位生态和平倡议者，很多都市人受到她的启蒙，并与她成为好朋友。黄惠琼超越了个人生活范畴，为社区出力，心中有着无比的平权和公义意识，是一位具毅力去保护自己家园的女性。

史立红 一个行动者



文：寇延丁

广义的环保可以让人在一个更好、更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可以说就是一种和平。

和平，还意味着每个人都享有最起码的权利，包括大众的知情权和移民的知情权。

1994年，清华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史立红考进《中国日报》，成为一名记者。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史立红对自己的工作自然怀有很多理想的期待。她关注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女性，关注法律纠纷中的弱势一方，面对生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她希望能够借助“无冕之王”的身份和自己手中的笔，为那些受到了侵害的人做些事情。

记者生涯带给她很多成就感，也带来了许多困惑，她发现有不少人像她一样，对媒体寄以厚望，甚至有人是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记者身上，以为只要能够通过媒体曝光了，自己的问题就能

得到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媒体的作用毕竟有限，而且，有的时候，连能够让媒体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也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作为一个代表着“国家形象”的媒体，会受到诸多限制。这些发现让她觉得，在很多时候，记者其实是很无奈的，顶多写一写文章，如果连文章都不能写了，还能做些什么呢？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一个理想主义者岂不成了空想主义者？

记者生涯也让她接触到了环境问题，接触到中国最早的环保组织。1996年，史立红结识了“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那时候“环保NGO”还是很前卫的提法，包括廖晓义全力推广的垃圾分类，都非常超前。当时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中国的环境问题，史立红身边的朋友也在说，北京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了，但也只是说说而已，这毕竟是政府的事情，我们以区区个人之力又能怎样呢？

199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这一天，史立红被廖晓义慷慨激昂的发言所打动，会后又对她进行了采访。史立红见到了一个环保主义者，更重要的，廖晓义和她的同伴是一群行动者，认为自己应当、并且能够为保护环境做些什么。史立红不仅接受了廖晓义的观点，也接受了她的方式，从一位采访者、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行动者，她也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一起去做垃圾分类的宣传。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小区，分头去敲别人的家门：“大妈你好，请问你们家的垃圾是怎么处理的？”虽然是第一次面对陌生的面孔和诧异的表情，史立红却很坦然，一点也没有怯场的感觉，因为她坚信自己是对的，在做一件值得做的事。

行动的魅力

这是一种全新的经历，行动起来，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通过行动，可以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这就是行动的魅力，这个发现让史立红欣喜不已，她积极参加环保组织的有关活动，在北京女记者中发起“买东西用布袋”，并身体力行。

对于一个行动者来说，天下兴亡，都是“我的”责任。“不管是环境问题、还是性别歧视、还是司法不公正，你知道了一件事情不公平，就有责任去做一点什么，可以说是一种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你认为这个世界不公平，你发现它有问题，你知道它错

在哪里，那就不能视而不见、推卸责任，就要去争！你去努力了也许不能赢得整个事件，但我坚信这种努力不会白费，这个世界总会有所改变。”

史立红在行动中改变环境、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她在环保组织里遇到了“东方时空”的摄像记者奚志农，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奚志农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云南追踪拍摄有雪山精灵之称的滇金丝猴。1995年，云南省德钦县政府为解决上千干部的开支问题准备砍伐白马雪山南部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那是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针叶林，也是滇金丝猴最后的家园，它的毁坏对滇金丝猴、对整个滇西北的生态都是灭顶之灾。

为保护这片原始森林，保护这种除人类外“世界上仅存的红嘴唇的灵长类动物”，奚志农拿着滇金丝猴的照片四处奔走呼吁，直至上书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政府、舆论界、科学界都做出了积极反应，北京的一些大学生举行集会，在会场上点起几百只蜡烛，一起为滇金丝猴祈祷。

经过奚志农多方奔走，最终这片宝贵的原始森林得以保留。针对滇金丝猴而发起的保护运动成为中国民间环保运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美国《新闻周刊》在1996年以“中国正在萌芽的绿色革命”为题报道此事，并认为“这将成为中国人环保意识的分水岭”，发起这场运动的奚志农也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1997年7月12日，是史立红和奚志农第一次约会一周年的日子，也成为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昆明湖上那个隆重的婚礼几乎吸引了北京所有的环保名人，他们的婚礼变成了环保界的一次盛会。

他们曾想回奚志农的故乡滇西北在白马雪山举行婚礼但没有实现，因为他们都太忙了。史立红已经离开报社，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项目办事处任联络主任。世界自然基金会是全球最大、最有经验的独立环保组织之一，在加强中国自然保护的管理、尤其是在提供基金和培训方面，做出了不容低估的贡献，史立红希望自己能够把中国民间环保人士的呼声带入该组织的决策层，使之更能贴近中国实际，真正促进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

那时，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藏羚羊惨遭大规模盗猎的情况开

始引起国内外关注，1996年12月，奚志农远赴青海，随同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西部工委（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野牦牛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历时20多天全程跟踪拍摄他们的反盗猎行动。

这是第一个全面、真实地表现藏羚羊现状和反盗猎行动的电视节目，无情的现实震惊了所有的人，包括史立红。最初听奚志农说到藏羚羊被大规模武装盗猎的情况，史立红根本就不相信，她不敢、也不愿相信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居然存在有组织、有规模的武装盗猎。

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是严禁进行贸易活动的濒危物种。藏羚羊种群从20世纪初的100万只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5万只左右，缘于一种名叫“沙图什”的披肩。“沙图什”（hahtoosh）在波斯语中是“羊绒之王”的意思，在西方时尚界，是财富和美丽的象征。1997年，在伦敦的一次突袭行动中查获的一批沙图什披肩，有的标价高达17,600美元！在暴利的驱使下，盗猎者疯狂猎杀藏羚羊，并将羊皮运到西藏、青海等地粗加工，粗选过的藏羚羊绒被藏在汽油桶或者羽绒服里走私出境，经尼泊尔或巴基斯坦，被运到克什米尔织成沙图什。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时尚界对沙图什需求激增，使藏羚羊陷入灭顶之灾。克什米尔1997年的加工绒量是3,000公斤，意味着至少有9万只藏羚羊被杀死，意味着这美丽的物种即将灭绝。

保羚行动

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才能帮助这些无辜的生灵免遭灭顶之灾？

史立红在世界自然基金会找到了印度方面发来的有关沙图什的资料，到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主管部门林业部进行调查，又通过其他渠道搜集了很多资料，梳理出了一个清晰的藏羚羊绒从盗猎到走私、出关，到加工、销售的链条。他们综合大量材料撰写了国内第一份关于藏羚羊盗猎情况的报告公之于世，成为随后的藏羚羊保护运动中重要的原始资料，也是众多媒体报道的依据。

1998年，奚志农辞去了他在《东方时空》的工作，以自由职业的摄影师身份参加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和香港中国探险学会

联合举行的对藏羚羊繁殖地的考察，并分别于夏季、冬季两次进入高原无人区。

史立红促成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爱护动物基金和自然之友三家环保组织共同开会商讨对藏羚羊的保护，动员政府、环保组织、媒体、大众所有可能的力量保护藏羚羊。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切，史立红和奚志农注意到了刚刚开始流行的网络传媒，决定开办一个专门的藏羚羊网站。

他们找到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藏羚网》奔波，每天处于一种高度忙碌的状态。他们没有专门的机构也没有固定的场所，每个人都是在做志愿工作，网站的工作只能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开会的地点也都是在几位志愿者的家里，今天在这里，明天又换到了那里，商量怎么收集整理资料，怎么样把这些信息数字化。那时的网络技术远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作为非专业人员做网站经历的困难可想而知。这时，史立红已经怀孕了，未出世的孩子和她一起经历了《藏羚网》从无到有的过程，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奔波和努力，直到保护藏羚羊成了世人瞩目的话题。



1999年，政府有关部门最终下定了保护藏羚羊、打击盗猎分子的决心，三省区联合行动“可可西里一号行动”震惊世界。2000年4月，中国政府在华约第11届缔约国大会上提交的《保护及控制藏羚贸易》的提案获得通过，敦促各缔约国减少藏羚盗猎

及制品的走私，杜绝加工并严惩走私分子。政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也有无数人为藏羚羊的命运揪心、流泪，较之几年前的滇金丝猴保护运动，这次保护藏羚羊的运动影响更广，表明在环保组织持续努力之下，媒体已经开始觉醒，公众的环保意识也在增强。

随着环保意识逐渐走进生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最缺的就是在下面第一线做具体事的人。史立红希望自己能够沉到最低层，为环保切切实实地做点什么，但是，在北京，不论是在《中国日报》还是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都离真正的基层太远了。1999年，史立红也辞了职，和奚志农一起离开北京回到云南，在德钦县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环保组织“绿色高原”，开始他们的环境教育工程，一直工作了3年。

白马雪山下有一个叫那仁的小村子，以前奚志农拍金丝猴的时候经常路过，史立红和奚志农住进了村长鲁茸家，史立红这样表述自己的工作：“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扎扎实实地在一个村子里，帮助当地老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寻求不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发展之路。”

高原的天空碧蓝如洗，滇西北美如梦幻，尽管要在滴水成冰的冬天里打井水洗衣服，经历一次次几乎丧命的历险，面对数不清的困难，史立红还是把这段与心爱的人共度的青春岁月涂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和自己喜爱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是对行动的无限贴近、对理想的无限贴近，也是一个百感交集的过程，让她体味到了行动的魅力，也体味到了行动者困难、局限和无奈。

在当地百姓的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中，必定有适应和保护自然的一面，否则这里的森林早就被破坏光了，滇金丝猴和其他野生动物也无法生存到今天。他们尝试把科学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搞自然保护，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探讨建立生态文明的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一方面，他们和香港民间环保组织“长春社”共同举办“自然保护教育培训班”，培训迪庆州的老师和环保干部，启发迪庆文化人的责任感。同时又把自己的项目点定在那仁村，长期、细致地做工作，要把一种环保的、可持续的生活和发展理念慢慢地、一点一点由最底部推广开来。

2002年10月，他们历时10年拍摄的纪录片《神秘的滇金丝

猴》获第12届英国自然银幕电影节TVE奖，这是中国纪录片首次在国际最权威的自然历史电影节获奖，与他们竞争的其他参赛者包括BBC、美国国家地理、探索等世界顶级制片公司。因为这次获奖，史立红得到了一个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一年，她选择了伯克利新闻学院学习纪录片制作。

拍纪录片——理想的保护环境工具

在学习中央立红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事——拍纪录片。

史立红最初接触到纪录片是在1997年，曾经与一个国外的纪录片摄制组一起到过三峡。相较于报纸、杂志、广播、网络等媒体，她觉得纪录片是最接近于真实的表现方式。在美国学习期间，史立红看到，在纪录片的发展历史中，不管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团体和个人在社会运动中会运用纪录片来表达他们的诉求，社会纪录片的导演不仅仅是观察者、记录者，很多时候，他们也和史立红一样是其中的一员，甚至把纪录片本身也当成了一种斗争的武器。尽管此前曾获得了许多纪录片的奖项，但史立红更愿说那是奚志农的作品而不是自己的，她在关心环保的同时关注的还有更宽泛的社会问题，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表达来影响更多的人。现在，她终于找到了纪录片这种最好的方式。

钟情纪录片，史立红还有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原因。由于她和奚志农的特立独行之举，夫妻二人都成了新闻人物，他们在云南的3年，是备受关注的3年，《两个理想主义者的雪山之恋》、《雪域高原，年轻夫妻奏响悲壮的环保之歌》，媒体用巨大的篇幅和抒情的笔调把他们像英雄一样讴歌。也许，作为一个行动者，一个NGO的领导人，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人物，不得不经常站在镜头前面说话，但史立红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她不愿做被人关注的焦点，希望自己所处的位置能够稍稍退后一点，在摄像机后，她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在美国学习期间，史立红也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2003年7月，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就在同时，中国五大电力公司之一的华电公司提交了要在怒江建13级梯级电站的开发方案。这里不仅

是世界级的自然遗产，也是地震多发的敏感地带，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立时，关于是否应当在怒江建电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建电站是否是怒江摆脱贫困的唯一发展机会？水电开发是怒江人脱贫致富的唯一途径和最佳选择吗？开发怒江到底谁将受益？世世代代生活在怒江峡谷里的人民有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他们是否了解水电开发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8月份回到北京，史立红立即加入了汪永晨发起的保护怒江行动，并同时进行了纪录片拍摄。建坝和“反坝”之争的焦点，除了建坝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对淹没库区的人文历史资源的影响，还有库区移民的问题。以前兴修水坝都是国家行为，上千万库区移民响应国家号召，舍小家为大家，是在为国家建设做贡献。但在市场经济时代，水坝建设已成为公司行为，水电开发成为能够给开发商和当地政府带来巨大利润的一个行业，而很多地方执行的还是20年前的移民标准，建坝的利润之所以如此巨大，实际上是以牺牲移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2004年6月25日，史立红制作完成了纪录片《怒江之声》，记录了怒江州泸水县六库镇小沙坝村14名村民代表与环保组织一起，访问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和小湾电站的经历，考察建坝前后水库移民生活状况的变化。

在华电公司提交的13级梯级电站的开发方案中，六库电站计划2003年底开工，小沙坝将是第一个被淹没的村子。肥沃的土地会被淹没，安静富足的生活会彻底改变，如果搬迁，除了失去土地、林木、牛羊的栖息地、道路、水池、庙宇、学校、家族的坟茔、风景名胜之外，由于移民数量太多需要打散，又会失去原有的亲情、友情、社会关系圈。小沙坝行政村由7个村民小组组成，人口构成以傈僳族为主，这里气候适宜，地肥水美，于晓刚博士问正在田里插秧的农妇当地的收成，她说一亩水田一年可以收20麻袋稻谷，差不多2,000公斤，他不敢相信这个数字：“那是放卫星的数字了，怕是没得。”正在忙碌的农妇七嘴八舌说开了：“太好的田了，怎么没得？”“我们舍不得搬，就是这个道理。”

与小沙坝相隔300公里的澜沧江漫湾水电站1986年正式开工

兴建，1987年实现大江截流，1993年第一台机组发电，共移民7,500多人，该电站因为投资最省而成为“七五”、“八五”期间的重点水电项目“五朵金花”之一。投资最省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给老百姓的补贴是全国最少的，人均不到3,000元。其中田坝村被水库淹没后，由于出现山体滑坡，搬迁后的农民被迫搬了三次家，生活状况堪忧。对照当时的征地协议，13亩地只有1.4万余元补偿款。失去了土地，每人每月30元补助远不能解决生活问题，当地村民从20几岁的年轻人到60多岁的老奶奶只好去捡垃圾，一天最多只能卖一块钱。有位6岁女孩的母亲住的房子其实就是一间窝棚，她对着史立红的镜头失声痛哭：“搬迁的时候我是小孩，还没有我的姑娘大……到现在20多年了，我们还是一样什么也没有。”

几天考察结束回到小沙坝，史立红当晚就在村子里播放了考察过程中拍摄的内容，在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我们不愿意过这种生活，我们不同意。”“像她们那样拾垃圾的生活我们不想过。”《怒江之声》编辑完成后，史立红带着这部片子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一个有关怒江建坝的会议，并在会上首映，这是她独自完成的纪录片处女作，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其中包括来自怒江的代表。

让史立红多少有些意外的是，这部片子的影响力并不止于怒江。同属三江并流世界遗产核心区域的金沙江虎跳峡，是世界上仅有的自然景观，也有水电公司准备在虎跳峡建水电站。对开发商来说这是最好的坝址，建坝最省，但是要在哪里建坝的话，不仅自然景观被淹没，滇西北最富裕的河谷地区的10万老百姓也要搬迁。反对修建虎跳峡水坝的青年学者萧亮中将《怒江之声》复制了100份，在金沙江沿江村落散发放映，成了他手中最有力的教材。自己初试社会纪录片就有这样的效果，高兴之余史立红还有一点将信将疑：一部30分钟的片子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2004年12月5日，萧亮中专门带她来到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村子，这里的老百姓对建坝的后果并不清楚，在开始交流之前，先放了这个片子。确实像萧亮中说的一样，原来对水坝所知不多的老百姓

曾经以为就像宣传的一样，“水坝建成之日就是我们脱贫之时”，片子中展现的水坝移民的生活现状真实直观，当片子中的漫湾电站的移民哭诉他们20年来的无望生活时，许多看片子的妇女流泪了。每一个看过片子的人都感谢史立红让他们知道了真相，对她来说，这是一种至高的荣誉，是比自己的片子获国际奖项更高、更重要的荣誉。

广义的环保可以让人在一个更好、更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可以说就是一种和平，具体到现在正在做的反坝这件事情上，史立红认为，“和平”的意义体现在：我们现有的决策过程特别不透明，缺乏参与性，水坝将要涉及的10万民众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因为某些公司、某些人的利益，让这么多人背井离乡，远离他们的故土，是对文化的践踏、对人文精神的践踏，与这些受到了侵害的人站在一起争取自己的权利，当然就是反暴力，反对践踏人的生存权利的暴力，就是对和平的贡献。

和平，还意味着每个人都享有最起码的权力，包括大众的知情权和移民的知情权。在主流媒体提供的资讯中，有建坝的消息，有建坝会产生怎样的效益对当地经济有多大的推动，但没有为此被移民的老百姓的声音，应当让大众了解这些东西。同时，对于即将成为库区移民的老百姓而言，当一个大的事件发生，他们的命运将被改变，他们应当得到足够的信息，来了解这一切到底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他们的权利。史立红愿用自己手中的摄像机、运用纪录片这个武器，为实现这样的权利作出努力。

潮至其
不好对景画不来

第二部分

绿色生命



III 守护生命

于漪 文

（此处为正文内容，因图像模糊，文字难以辨认，推测为关于教育或生命守护的论述。）

人本对生命是忠贞为誓，一念善或不善，随其而致，或注或
焚，小德而积成大，来世而生，半生半世，人贵黄钟在焉

“一言受命，百发百中，工始夫出”

大凡其说而说西书，大凡其说而说于彼，莫小德而
积一德而积之，夫人大德积一德而积之，夫人大德积一德而积之，夫人大德积一德而积之

陈玉英
不仅仅是活下来



文：游侠子

资本家对于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这种隐藏在经济效益下的暴力，让生命和价值、尊严和劳动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被这个社会所遗忘。

小英对身边的残疾朋友充满了友爱，小英经常告诉处于自卑中的残疾人朋友：“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用自己的乐观精神和现身说法，给予许多残疾朋友很大的支持和精神鼓励。

“能为其他人做一些事情，自己内心得到平静。”

陈玉英，致丽玩具厂的生还者之一，重庆市忠县自强残疾人服务站负责人，4岁半孩子的母亲。大家都叫她小英。

“出去做工，钱没有，命也没有了”

知道小英，始于致丽玩具厂大火。1993年的致丽玩具厂大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区的第一场特大火灾，曾经轰动一时。

今天，我们只能从一些资料片中略微感受到那场大火残酷的情况：浓烟熏黑的厂房、大火烧弯的钢筋，还有一具具被白布掩盖的曾经鲜活的生命。搜集到的资料中有一张很珍贵的照片：小英被层层纱布包裹着，纱布中露出被烧得焦黑的额头。那时的小英才17岁，显得无助又迷茫。惨剧吞噬了87名工人的生命，另有51名工人受伤。小英幸运地从火灾中捡回一条命，但又不幸地成为生还者中受伤最严重的一个。

小英出去打工是为了支持哥哥上大学。大火发生以后，小英在医院接受了17次的手术。对于出事前连一片药都怯于吃下的小英来说，简直就是噩梦一般的经历。高达75%的烧伤让植皮的成活率降到了最低，长期卧床使全身长满了褥疮，小英几次在鬼门关外徘徊。原以为恢复虽然艰难，至少可以留在医院等待奇迹出现，然而有一天，工作组却来人通知小英出院，称小英在住院过程中已经花掉了20万~30万，若不出院，就只能转入到乡镇上的小医院：“再不走，死了就概不负责。”工作组给了一定的赔偿，并派了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小英和爸爸回家。

回家的过程十分艰苦，小英的伤不断恶化、发炎、化脓，在路上用过的被褥都只得自费从宾馆买下，再直接扔掉。而身在忠县的家人们并没有想到小英被烧得这么严重。两年未见的哥哥特意买了花回来看妹妹，当见到面目全非的小英时，他不禁泪流满面。祸不单行，此时妈妈又不小心摔伤了腰，躺在床上行动不便，一时间家里愁云惨雾。忠县是个小城，小英被烧伤的消息一下就传开了，闲言碎语很多，真有“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感觉。还好，哥哥读的是大专，已经毕业了。这让这个苦难的家庭有了些许的安慰。

接下来等待着小英的是更多的折磨。而致丽玩具厂大火，就随着这些消逝的生命和四散到家乡的伤者，暂时消失在人们的言谈和视野中。

“只想看一看蓝天是什么样子”

为了给小英进一步治疗，全家从乡下搬到了县城里。因为受伤，小英得到了一笔赔偿金，生活补助加上护理费，这就是小英今后所有的生活来源。小英回家后又做了十多次手术，但情况并

未见好转。当时小英整天卧床，全身关节硬化，身上缠着绷带，连翻身都要两个人来翻床单。“就像木乃伊那样”，此时坐在面前的小英笑着解释说。

小英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年，从县城到市区，硬是找不到一家愿意收留她的医院。医院不收治，家人就四处找赤脚医生来治小英的伤。找来求去，终于在当地人民医院找到一位医生，答应以私人身份治疗小英。但这位医生提出，若是出了问题也不负责任，而且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本着为自己提高医术的目的。尽管如此，小英家人也甘心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放手让他治，反正也已别无他法。医生看到小英实在是很可怜，每每到家里治疗的时候，就给小英讲讲笑话，让她放松心情。同时，家里人竭尽全力给小英最好的照顾。父亲和哥哥都亲自给小英上过药，到外面求医的时候，也都是哥哥背着小英，一趟路背下来，哥哥身上全都是脓血。妈妈听医生说绿豆粥对小英的烧伤有用，一个夏天家里的主食就全成了绿豆粥。哥哥笑言，绿豆粥成了那个夏天他最“恐怖”的记忆。

也许是烧伤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在这位医生的治疗下，一年多以后，小英开始慢慢地恢复。曾经反复化脓、始终不见愈合的伤口也逐渐长好，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小英的伤有了很大的改善。而此时，小英与遗留的伤痛之间的抗争才刚刚开头。

小英的床对着窗户，在床上躺了两年多，小英能够看见的始终就是窗框里那一方窄窄的天空：“连外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当时的愿望特别简单，就是想知道外面的蓝天是什么样子。”怀着想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的念头，小英开始锻炼身体。然而，长期卧床已使小英关节变得僵硬，最初连坐起来这个看起来简单无比的动作都无法完成。妈妈给小英找来很多被褥，一层一层地加垫在身后。虽然每加一层小英要忍受巨大的痛苦，然而半年后，被褥加到了肩部，小英终于可以成功地坐了起来。此时家里从重庆给小英买来了轮椅。靠着轮椅，小英总算看到了阔别已久的大千世界，鸟语花香，蓝天白云，这几年噩梦般的经历，让小英打心底里感受到生命的美好，“经历了这些，再遭遇到什么都觉得没什么了，当时看到什么都觉得特别好，我哥哥他们经常说我能看得开，这可能也是因为我有这段经历吧。”之后小英继续进

行这最原始的康复训练，在无数次的跌倒又爬起之后，小英竟然一天天地恢复过来，终于又能够作一个能够自己行走的人了！

尽管给家里的负担已经在一天天减轻，但是小英心头总是沉沉的。乡里经常有闲言碎语传到耳边，觉得“残疾”就是“残废”，走在街上也总有异样、好奇的目光围绕在身边；再加上伤口从来就没有完全恢复过，身体的疼痛，对家人的负疚，以及乡人中的陈腐观念，让小英备感沉重，时常独自闷在家里默默流泪。

而此时的中国，打工浪潮仍在继续。小英花了近三年时间才得以重见的外面的世界，已经生产出了让人应接不暇的物质，一波又一波新的观念流行来流行去，但工人的待遇以及资本家对于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这种隐藏在经济效益下的暴力，让生命和价值、尊严和劳动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被这个社会所遗忘。小英这样的受害者，只能待在家乡的一隅，忍受着这种浪潮和这个世界加在个人身上的痛苦。

阿班和 NGO

1997年，小英的生活视野一下扩大了不少，因为一个叫做阿班的香港女孩。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年，阿班作为香港乐施会的志愿者，风尘仆仆来到了小英的家乡。从阿班这里，小英第一次知道了NGO，知道了叫做香港的那个陌生的城市还有人在为致丽大火的受害者争取权利。

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阿班独自翻山越岭来到忠县，还因为语言不通坐错车，被人载到另一个很远的山村，来来回回经历了几番折腾。与小英同龄的阿班给了苦闷中的小英很大的鼓励，她耐心地给小英解释她此行的目的，让小英明白了自己的受害和世界资本发展的关系。从此，小英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事隔几年，小英说起来还是带着深深的感动：“为什么不感动呢？她一个女孩子，那么小，人生地不熟，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找到我，鼓励我，我为什么不感动呢？”

阿班同样也为小英同伤痛孤军奋战的毅力和坚强而感动（事实上，只要看过小英本人，就会完全明白阿班当初的感动来自何处。小英当初面对的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痛苦。现在小英截肢后的左腿靠假肢支撑，右腿也受损严重，左手只剩下两根手

指)，她还给小英写了一首歌，叫做《再见萤火虫》，歌词很简单，却记录了小英非同一般的、悲喜交杂的经历。

在这期间，香港乐施会开展了一系列与致丽玩具厂大火相关的活动。当阿班准备组织致丽大火中的受害者及其家人给 Chicco 玩具厂香港总部直接写信、要求赔款时，很多人却退缩了。他们害怕可能要 and 厂方当面对质，也担心受到来自政府的非难，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留下影像资料，连拍照都予以拒绝。只有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痛苦的小英，勇敢地站到镜头前，清楚无误地说出厂方在安全生产上的重大失误和事后没有承担责任的失职行为。小英说：“这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差点连命都没有了，还会怕这些吗？有很多好心的人帮助我，为了自己的权益我愿意站出来。”

乐施会两次邀请小英到香港。在香港，小英现身说法，向人们展示致丽大火的严重程度和对工人造成的伤害，与此同时她也直接来到 Chicco 公司在香港的总部，和公司负责人直接交涉赔偿问题。在几次交涉中，小英并没有陷入到负责人试图转移话题的陷阱中，也没有因为他们的抚慰之辞而动摇自己的立场，她并不是以个人身份要求公司的赔偿，而是要为当时致丽大火吞噬的所有姐妹讨一个说法。“我不怕他们。”小英的这份勇气和坚持，支撑着她顽强地抗争，也不断感动着周围的人。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虽然有那样的遭遇，但是毕竟我熬过来了。我获得了很多人的帮助，这是我能走到今天的主要原因。那时我就开始想，别人为我做了这么多，那我又能为别人做些什么呢？”受到触动的小英开始思索自己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才能改变人们头脑里“残疾人”就是“残废”的观念。

慢慢地，从前那个会躲在小屋里怨天怨地的小姑娘已经脱胎换骨。在乐施会的帮助下，小英又做了几次手术。由于技术进步，小英左腿安上了假肢，行走更加自

如。小英开始计划建立自己的 NGO，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重庆忠县自强残疾服务站

从 1994 年出院到 2000 年间，长达七八年的康复期，让小英感受到残疾人在社会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深刻理解了残疾人的艰难。小英决定为残疾人做些什么。同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活中的细心观察，小英发现，当前外出打工者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拖欠工资和劳动安全问题。因此，小英将自己的 NGO 的目标设立为“均等机会，全面参与”，专为外出民工、工伤工友、职业病患者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咨询服务，在给别人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提高自身的能力。

2002 年 5 月，忠县自强服务站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服务站主要以电话热线、资料印发、组织活动等方式为农村外出打工群体中由于工伤而致残的人服务；以写信、面谈等方式参与与当时致丽厂生产的产品的意大利品牌公司的交涉，为受害者争取赔偿；小英还以受害女工的身份参加了在泰国、香港、广东、北京等地保护工人权益的会议和活动，与国内十几家 NGO 组织建立了联系，成为一位社会活动积极分子。

小英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开展服务站的工作。在参加了重庆市残联的大会后，她开始通过残疾人网络，与大量残疾人建立联系，提供服务。她了解到其中一些特困残疾人的需求，因而建立起小型“帮扶项目”，至今已向一些特困残疾人提供了每人 200 元的资助，以帮助他们发展小商业；当得知一起发生在重庆的严重职业病事件后，她与合作伙伴一起探访受害者，到医院请来医生为患者讲解康复方法，并将普及防治职业病纳入自己的服务内容；她还与县残疾人学校合作，给残疾儿童举办讲座，鼓励他们建立自信，并已开始为特困家庭的残疾儿童提供每人 500 元左右的助学金；对于那些住在偏远山村的残疾人，小英经常在哥哥和服务站志愿者的陪同下，不顾长途汽车颠簸前去探访；他们每年还利用春节到汽车站、码头工友流量大的特点，在两个地方派发服务站印发的一万多份小册子《外出务工知识读本》，扩大了服务站的影响，也增强了工友们外出务工的自我保护能力。

2003 年，距致丽玩具厂大火已经是 10 年了，小英牵头组织了

当时火灾中受伤的工友和遇难工友的家属 100 人左右，从重庆和河南来到忠县，举办了纪念活动，追思遇难工友，增强伤残工友的生活信心。这次聚会让小英更清楚地看到了受难工友和家属的伤痛。压抑了 10 年的悲痛终于在这次 10 周年纪念大会上完全释放出来，而且，受害者之间的相互倾吐和安慰也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这一年，小英也回到了深圳致丽厂的原所在地。令她心情倍感复杂的是，昔日的废墟又变成了厂房，旁边只有零星几条标语提醒着大家注意安全。从前的老板也已改头换面，去了另一个城市办厂。与 10 年前不同的，也许只是工厂的名字而已。暴力的痕迹不在，暴力却依旧。这也让小英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可能面临的压力。

小英的服务站最初设在家里，两部开通了咨询热线的电话机就是她最亲密的伙伴。每天都有来自远方的工友电话，咨询在外打工所遭遇的困境和不平的对策，向小英诉说打工的辛苦和困难。小英耐心地给他们解答，提供各方面的建议。她越做越有信心，两年后就把服务站迁到了居委会的一间办公室。服务站设立的热线（023-54245856）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残疾朋友和工友，他们不断给她打来电话，询问有关残疾人的就业信息、情感问题。曾经有深圳的工友打电话到服务站来咨询，说他们那里有 20 多名工友被老板拖欠工资，小英问清他们的具体情况后，多次打电话到深圳劳动局和厂方，最后工厂老板迫于劳动局的压力把工资发给了工人们。工友们拿到工资以后又打来电话：“小英，你给我们出了一口气！”

因为自己的深刻的亲身体验，小英对身边的残疾朋友充满了友爱，小英经常告诉处于自卑中的残疾人朋友：“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用自己的乐观精神和现身说法，给予许多残疾朋友很大的支持和精神鼓励。此外，小英还组织了很多残疾人定期参加服务站组织的交流活动。他们从中获得了大量有用的信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谋生方式。随着规模的扩大，服务站也越来越多地收到招聘残疾人做工的信息，很多残疾人都是通过服务站得到了新的工作岗位，重庆几家福利企业里有很多残疾工友，其中很多都是服务站介绍过去的。在赴偏远地区进行的探访中，给小英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对残疾兄弟。第一次去他们家时，小英虽然有

心理准备，但见面时还是吃了一惊：两兄弟从小因为生活不能自理，完全依赖父母照顾。而自父母去世后，他们无人料理，头发长得拖到腰后，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很久没有换洗过，家里更是又脏又乱。小英跟他们谈了很久，第二次再看他们的时候就带来了理发师，还带来了许多旧衣服，让两兄弟焕然一新。当然这样照顾也不是个办法，小英就建议他们养鸡，然后又张罗着给他们的鸡蛋介绍销路，慢慢地，两兄弟能够料理自己的基本生活了，靠着养鸡卖鸡蛋的收入也能往下过日子。现在小英还会经常去看他们，看着他们慢慢变化的家，小英心里觉得无比的欣慰。“其实残疾人并不是总需要人可怜，他们更需要的是理解和帮助，残疾并不是残废，只要方法对了，不仅能活下去，还能活好。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想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只要能帮上忙，让他们自强自立，我就会非常开心。”

在开办服务站的过程中，也遭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也听到过一些非议。有人对残疾人还抱着很陈旧的观念，对小英一个残疾人奔波来去不理解，也有的残疾人朋友对小英热情的帮助表示怀疑，但是小英以自己的真心和坚持赢得了这些人的理解和尊重。现在服务站就设在忠县一个小区里，小英和居委会的人经常互相帮忙。

小英是个爱学习的姑娘，之前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小英从来没有放弃过看书，这使得小英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才得以自如地运作自己的服务站。为了不断提高自己自强服务站的水平，小英去年还报了一个培训班，自学了电脑。对于左手只剩下两个手指的小英，电脑操作真不是很容易的事，可她并未放弃，而是坚持到了最后。一位同在培训班上课的同学曾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主动赶上小英，告诉她：“我真的很佩服你的毅力！”

小英说：“经常在生活中得到很大的鼓励，我相信只要努力，残疾人也可以做得和正常人一样好。”

未来：“人就是要有自信心”

事故发生后，全家人都以为严重烧伤将永远剥夺小英婚姻生活的权利，可是现在，小英拥有了一个完整又甜蜜的家庭。尽管最初相亲时也尝到了不少的灰心：“大多数还是别人嫌弃我。当时曾经想过一辈子都不结婚”，但最终小英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缘分。

2000年，经人介绍，小英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当时的他一见小英就说：“当年你受伤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婚后丈夫一直在外打工，最近2年为了照顾家人及孩子，他便返回县城一企业做工，4岁半的女儿平时都由母亲照顾着（女儿是2002年10月出生。）小英可以专心于自己的工作。

平时哥哥陈剑也经常来义务帮忙，用哥哥自己的话来说“付出了很多心力”。站内的志愿者小吴也是个活泼的小姑娘，她只说，自己是被陈姐感动了，才开始志愿者的工作的。

小英现在成了真正的名人，很多国内外媒体都来采访过她、给她做过专题片，她也曾担任过许多访谈节目的嘉宾。不过小英说，自强服务站的工作才算是刚刚开始。在小英眼里，眼下的所有困难都不算什么，对扩大自强服务站的工作和影响，她还有很多计划。

从一个“打工妹”到一家NGO组织的负责人，从一名残疾人到许多人的精神和物质支持者，小英在这中间经历了太多，而现在的小英还不满30岁。

小英面对的暴力是复杂的，它隐藏在生产发展的背后，是全球化大趋势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它不仅对小英造成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不可挽回的伤害，对个人背后的家庭、社会也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这种暴力是无形的，甚至被社会所忽视。暴力带来的是苦难，也是经历，所幸小英得到了帮助，靠着自己的坚毅，现在成了一个“有用”的人。小英的故事和经历，对所有的残疾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样板。小英现在的工作，也帮助到了更多的人。

“能为其他人做一些事情，自己内心得到平静。”这，或许就是小英心中的和平。

张文清
止于至善



文:尚慧辉

用善良的心，善待一切。

我们希望全社会病人减少，人人都享有健康同时也希望仅有的患者得到规范、健康、真诚的诊治，使他们重新获得健康。

375

十一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蒙蒙细雨飘飘洒洒落在初秋的太原，因为有雨就有晴，而“晴”和自己名字谐音，所以，下雨天是张文清最喜欢的天气。8时整，张文清顶着小雨准时来到太原市中心医院内科3楼消化内科教室，参加每天一次的交班会。她，是消化内科的护士长。

尽力提高护理专业标准

开过交班会的护士们聚集在了护办公室，围坐在一起开起了护理例会。“灌肠时要记住带屏风，注意保护病人隐私”、“每新来一个病人，都要清楚地告诉他们‘我是你的责任护士，有事请找

我’”、“皮试液一定要贴好标签和时间”、“集体背诵《护理制度》对一级护理的规定”……墙上的宣传画中，扎着两根大辫子的南丁格尔仿佛在微笑着听她们说话。

护理例会后，护理人员开始查房，张文清轻轻走进701房，招呼起了2床神情沮丧的老人：“大娘，吃早饭了吗？给您梳梳头、剪剪指甲吧！”老人配合地梳了头、剪了指甲。接着，张文清依次给各床的病人换了床单、枕套。给5床的大嫂掖了掖被角后，张文清一扭头看见房门背后空空的6床，她的思绪顷刻间飞回到一年前。

2005年7月1日，84岁的老人张淑贞就住在这张病床上。患十二指肠溃疡的老人是被120的工作人员从急救室推到这里来的，当时神志不清、皮包骨头，背上还有碗口大的一块褥疮，露出白生生的脊椎骨。张文清主动挑了护理老人的担子，一小时翻一回身，一天换两次药，每次都是先用消毒棉球把腐肉去掉，洒上营养液，待局部干燥后，再抹上防腐生肌膏，在无菌条件下包扎好，每次换药都要半个多小时。26天后，老人出院的时候褥疮全好了，自己走出了病房。老人的女儿感激不尽，专门送了一面锦旗：“医德高尚、救死扶伤。”

对每一位住院的病人，特别是老年人，张文清总是满腔热情地照顾、护理，张文清觉得，这不仅是自己的职责，而且，这些老人多像自己的父母啊！父母都是淳朴善良的人，在市政当养路工人的父亲每天尽职尽责地上班，供应全家生活和7个儿女上学。张文清小时身体不好，父亲常常背着她去诊所、医院，“那时打针不消毒，针管、针头在开水中涮一涮，下一个就接着用，打了针的针眼常常会发炎，又得再打针。护士还都是凶巴巴的，知道我们家里穷，就用很轻蔑的口气对父亲说话，那时，父亲已经50多岁了。”幼时的记忆张文清留下了很深印象，在她心里埋下了种子，小学时候，她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好护士，帮助穷人和老人。父亲、母亲都支持她的志向，常常对她说：“当了护士要多帮助病人！”1985年，15岁的张文清考入太原市卫生学校，3年中，她勤奋学习，掌握护理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专业知识，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

慎守病人及家务之秘密

走进 711 房，正碰上年轻护士来发静脉药物的治疗卡，张文清提醒她：“发卡、发药、输液、打针时，一定要喊患者的名字，不能凭印象。”17 号床病人的家属韩大妈笑着拍拍张文清的肩说：“还是这么认真，好！好！”韩大妈是太原市中心医院退休的老护士长，因为老伴患有脑梗塞、糖尿病、高血压，她经常陪着老伴来住院，神经科、泌尿科、内分泌科都住过。韩大妈告诉张文清：“27 号早晨 7 点多，老头子的胃炎又犯了，大口吐血，我们打上车赶紧来，也没去急诊，直奔你们内科来了，值班护士马上叫大夫看，大夫披着衣服就冲出来了，马上扎上液体马上血就止住了，一分钟都没耽搁。这么多科室，就数这儿最好，住着又放心又舒心。”

韩大妈是张文清的老上级，从太原市卫校分配到太原市中心医院内科时，张文清就是韩大妈的徒弟。那时的张文清刚刚 18 岁，病人出院她高兴，病人危险她紧张，抢救病人时她一直拉着病人的手，说是希望能把力量、信心传给他们。抢救成功了，她比病人家属还高兴，不成功了，她比家属哭得还伤心。张文清总结自己：“我就是喜欢护士这个职业！”

楼道里，一个穿着病号服的高个女孩引起了张文清的关注，她多像可爱的小丽妹妹呀！那个清瘦的高个女孩小丽是去年年底住进 701 房 6 床的，因为失恋她喝了 100 片安眠药，虽然抢救过来了，但仍是两眼无神、满脸绝望，女孩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张文清思量很久后，和女孩进行了一次单独的秘密谈话。

“一个国王被侵略者追到了河边，昔日繁荣昌盛的国家落到敌人手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跟随的士兵只有几百人。从未受过如此打击的国王万念俱灰、只求速死，就在他要跳河自尽的一刹那，忽然想起一个巫师曾经送给他的戒指，巫师说过，这戒指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国王打开戒指，看到一句话：‘这一切，总要过去’，若有所思的国王咬紧牙关，带着士兵冲出包围，最终战胜了侵略者。”

女孩低着头静静地听着，没有出声。张文清说：“我知道你遇到了很难的事情，但和一切相比，生命是最宝贵的。你看，为了

你，爸爸、妈妈、弟弟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要是你有不测，要把痛苦分给多少人？记住‘这一切，总要过去’，我就是常常用这句话勉励自己的。”当天晚上，女孩给张文清发来短信：“你就像春姐姐一样来到我身边，我从没在医院见到这么漂亮的医生和护士，以后，我就叫你春姐姐吧！”女孩不知道，张文清看到这条短信哭了。

以后，女孩每天都给张文清发短信谈心，“春姐姐，好多事我都没有告诉我妈妈，我想和你商量商量，你帮我出个主意吧！”8天过去了，女孩在出院的时候，紧紧拥抱了张文清。为了女孩今后的生活没有阴影、心里没有负担，女孩出院后，张文清主动减少了与她的联系次数，只是在心底暗暗祝愿她挺过坎坷，勇敢地面对未来。



竭诚协助医师之诊治

“护士、护士……”张文清疾步走出病房，楼道里，一辆担架车上躺着一个呻吟不止的中年妇女，家属眼巴巴地看着她。张文清接手推上担架车，一边往病房送，一边问：“什么病？”家属应声道：“肠梗阻。”

从担架车被抱到病床上的病人扭了扭脖子，胃管有点松动，张文清走过去说：“大姐，我给你把胃管插好一点，有点难受，挺

一下就好了。”病人呻吟声稍稍轻了些。

张文清告诉护士们，人生了病情绪都不好，咱们一定要对病人态度好，不但冷脸厉声不允许，还要时常保持微笑，病人来了要有招呼声，病人走了要有叮嘱声，年纪大的要称呼大爷、大娘。病人把咱们比作白衣天使，咱们一定要配合好医生的治疗，把病人照顾好。

曾有一名名叫苏金枝老人患胃癌住院，被病痛长期折磨的老人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不吃药、不打针。张文清来到病房，抚摸着老人的额头，鼓励老人要珍惜生命、战胜病魔。之后的3个月，每天早晚张文清都会走近老人，鼓励、安慰、抚摸，老人在弥留之际，握着张文清的手说：“谢谢你，孩子。”然后，合上眼睛安然去世了。

一位老年患者因肺结核和糖尿病住院，食堂的饭菜老人不想吃，张文清就坚持为老人送饭、送菜，一送就是两个月，老人家属都很过意不去，要给张文清钱，被她拒绝了。老人康复出院时，高兴地说，是文清做的汤面治好了我的病。

然而，张嘴就骂人的病人也不少见。张文清记得，在713房23号床住过的陈建华脾气就不小。因为肝硬化，陈建华多次住院，去年7月11日，因吃多了涮羊肉引发吐血，陈建华又住进了消化内科，多次呕血导致食道、胃静脉曲张，脾功能亢进，贲门静脉曲张，需要切除脾脏，手术风险很大。陈建华身体不舒服，心理压力也很大，整天烦躁不安，见人就骂。张文清和护士们耐心地照顾他，不但骂不还嘴，还时常安慰他，和他商量分析病情。

为了治病，陈建华的妻子把几处房产全卖掉了，家里几乎空徒四壁，一时连输液的钱也拿不出来了。眼看要做手术了，钱却交不上来，陈建华的妻子愁眉不展，张文清从家里拿出2,000元来到病房，对陈建华的妻子说：“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用吧。”虽然没有接受，但这位哭成泪人的妇女还是真诚地感谢了张文清。陈建华终于不骂人了，很配合地接受治疗，有一次，听到隔壁有个蛮不讲理的病人骂护士，陈建华按捺不住，走过去狠狠地训斥了这个人。

陈建华做完手术后，张文清和消化内科的全体护士给他送去了祝贺的卡片：“你要坚强，消化护理的十几个姐妹永远和你站在

一起。”后来，陈建华病情恶化，呼吸困难需要抢救，张文清拉着他的手陪着他进了手术室，她说，我相信人和人是有心灵感应的，自己的体温一定能传递给他。张文清在心里默默地给陈建华打气说：“一定要挺住！”然而，抢救最终没有成功，一直把陈建华送到太平间的张文清，一直在默念着：“祝你在另外的世界里一路走好。”她知道，陈建华是带着感激之情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不孤单、不遗憾。

对于处于晚期的病人和孤寡老人，张文清的精心护理了却了他们离开人世的遗憾，有好几个患者是拉着张文清的手闭上眼睛的。2004年4月，由于工作成绩优秀，张文清被任命为消化内科护士长，那时，她已经通过参加成人自考学习班，获得了医护专业本科学历。

在消化内科做护士，仅仅细心、负责是不够的。昏迷的病人需要处理大小便，插胃管常常能被病人喷一身胃液，正吃饭有病人需要灌肠……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考虑到科室护士多是刚毕业的小姑娘，遇到导尿、灌肠等让人发愁的脏活、累活，张文清都主动抢着去做。

走进709病房，张文清给15床病人送上药，并指导病人服下。她又想起了去年这个时候，住在15床的病人白延令。这个没有亲人的57岁老汉，自幼被继母虐待剪断了舌头，去年10月，因肝硬化、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被单位的同事送进了医院，他孤苦伶仃没有人照顾，要吃饭了没有人给他送饭，尿床了只能泡在水里。那时正是十一长假期间，值班的护士们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着白延令，从食堂给他打饭，尿湿了床就先把他抬在一边换一半床单，再抬到一边换另一半。张文清也常常在家做好饭给白延令带到病房来。一个月后，白延令出院了，说话含糊不清的老汉自己掏钱买了锦旗送到护办公室：“感谢护理班的姐妹。”

为了跟出院的病人不“再见”，每一个病人要出院，张文清都要详细地叮嘱他们，要严格遵医嘱，不能吃什么，不能喝什么，不能接触什么。一次护理例会，张文清还专门让护士们讨论，列举出肝硬化的患者不能食用的各种蔬菜、水果、面食等。

看到病人们的笑脸是包括张文清在内的护理人员最开心的时候。今年5月12日护士节这天，患前列腺肿瘤多次住院的老病号

杨永财忽然送给护办室一瓶空气清新剂。老杨笑嘻嘻地说：“你们不是说我的病房真香吗？让护办室也香一香吧！”护士们无意间的一句话被病人记在心里，张文清心里暖洋洋的，感动了好几天。

看到病人出院是张文清最高兴的时候，然而总有回天乏力的时候，科室每年都有40多名病人去世。每失去一个病人，张文清都像失去亲人一样悲痛，一连难过好几天。这时候，储藏室墙角的蚂蚁就成了自己最大的减压器，那得益于女儿威威的奇思妙想。

有一次张文清要扔掉吃剩的饼干渣，被女儿挡住了，女儿说：“妈妈，给我的小鸟吃吧！”拿着饼干渣，张文清和女儿上了楼顶，女儿把饼干渣撒在屋顶，吹起了葫芦丝，过了一会儿，张文清惊讶地发现，几十只小鸟真的飞过来吃饼干了。有了女儿的启发，张文清把在储藏室的蚂蚁也当成了自己养的“宠物”，一块饼干就能喂一个星期，心里烦闷了，看看这群勤劳的小精灵不停地忙碌着，就踏实了许多。

小眼睛的女儿也是张文清的动力器。这个8岁的乖巧孩子最会给妈妈打气，妈妈灰心了、彷徨了、迷茫了，威威说：“妈妈，你的心要大气些，你得挣钱供我上学呢！咱们家还要靠你和爸爸支撑呢！”每次送她上学，到了小学校门口，威威总要在张文清的脸上亲一下说：“妈妈，祝你一天高兴！”今年护士节，母女俩合作表演了节目小品《感谢妈妈》，全院的人看得掉了眼泪。

务谋病者之福利

在太原市中心医院内科病房住院的患者大多是普通百姓，17年的工作时间内，得到张文清护理的病人多达3,000余人。在临床工作中，张文清深深体会到了疾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因经济拮据左右两难的酸涩。

走上护士长工作岗位时，张文清和同事共同制定了工作理念：患者必须得到科学、规范、真诚的护理；患者健康第一；希望全社会的病人减少，人人享有健康。张文清及其护理队伍的工作口号是：团结、和谐、文明、进步。

为缩短病人住院时间，减少他们的开销，张文清在科室实施了人性化护理和科学护理，平均病人住院天数缩短4天，医疗费降低8%，更多的病人又慕名而来，科室收入反倒增加了28%，

经常有病人辗转数家医院后来到太原市中心医院内科住院治疗。而且，内科病房在近两年内无一例医疗纠纷发生，2004年连续被评为医院先进科室和病区管理标兵。

2003年非典时期，医院内部所有医护人员都接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张文清把年仅6岁的女儿托给婆婆，主动申请进入非典病房，一去就是两个月。针对非典病人无人陪侍的特殊性及患者复杂的心理反应，张文清和同事们制定了一套特殊的“零距离接触”友爱护理方案，她们按时为患者送饭、喂饭、擦身、剪指甲、刷牙、洗脸、送大小便，当时工作条件很特殊，厚密结实的防护服捂得人喘不过气来，身体每天几乎都是在汗水中泡着，靠着坚强的意志和人道主义信念，张文清和同事们硬是挺过来了。太原市中心医院创造了医护人员零感染的奇迹，取得了抗击非典的最后胜利。

消化内科的墙上贴着科室的工作理念：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出自《礼记·大学》，意思是精益求精，做到最完美的地方保持不变。张文清说，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是护理学创始人南丁格尔的工作的要求，也是我们工作的信条，我对自己还有一点特殊的要求：用善良的心，善待一切。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和我交往的每个人都能感到快乐轻松。我们希望全社会病人减少，人人都享有健康同时也希望仅有的患者得到规范、健康、真诚的诊治，使他们重新获得健康。这是我们的责任。

趁午饭后的时间护理知识的张文清打开笔记本，南丁格尔誓言赫然在目：

终身纯洁，忠贞职守，
尽力提高护理专业标准，
勿为有损之事，
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
慎守病人及家务之秘密，
竭诚协助医师之诊治，
务谋病者之福利。

这，就是张文清为之奋斗的目标。

张积慧
以爱心战胜疾病的暴力



文：周玉珠

己为人母的张积慧，秉守着医护人员“把安全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的信念，在“非典”席卷广东省的高峰期，连续83天，不眠不休地为抗疫工作付出了心力，实践了“医者父母心”的伟大使命。

“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被传染呢，包括爱和笑、感动和疾病。就看谁比谁传染得更快了，是疾病呢，还是我们沉静的一笑。”

“嗨，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短发女子步履轻快地走上前来，热情地和我握手，一脸的笑意盈盈，让人觉得亲切。

用不着她自我介绍，我也知道，她就是张积慧——那个在两年前，爆发非典型肺炎（下称“非典”）疫情时期，带领一批护士，在抗疫前线上悉心照料病人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

提到张积慧，许多人都会记得她那本脍炙人口的《护士长日记》，里面记录了她在抗疫前线上的所见所闻，当中情节动人的小

篇章；虽然事隔两年，但张积慧谈起那次引发全球恐慌的疫潮时，依然感触良多。她说：“这活脱脱是一场疾病的暴力！当中，最教我们医护人员感到无奈的，是我们看不见敌人，不知道敌人究竟是在何方，既然找不着目标，自然不晓得该怎样去打这场硬仗。”

虽然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可是艰巨程度比起荷枪实弹的真实战场也不遑多让，尤其是中外专家对这种新兴传染病的认识极不足够。面对荆棘前路，张积慧倒没有气馁，因为她一向“喜欢接受挑战”，亦确信，爱，可以为人间带来希望，护士能够给予病人的正是这种稳定人心的精神力量，最终为社会带来和谐。

已为人母的张积慧，秉守着医护人员“把安全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的信念，在“非典”席卷广东省的高峰期，连续83天，不眠不休地为抗疫工作付出了心力，实践了“医者父母心”的伟大使命。

白衣天使的承诺

“无论何时何处，无论男女老幼，无论高贵与卑微，我之唯一目的，为病人谋幸福。”

——张积慧投身护士行业时的宣誓^①

张积慧，1963年生于广西荔浦县，是四姐妹里的老大。由于家里经济环境并不宽裕，她在报大学落榜后，决定报读护士课程，以便毕业后能有一技之长，帮补家计。

在20世纪80年代，护士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薪酬也不特别吸引，张积慧原先对这个行业的职责也不甚明了。“邻居跟我妈说，护士是伺候人的工作，替人家清理大小二便。”但当时的条件也不容她顾虑太多，没想到一位老医生的启蒙，让她深刻体会到医护工作的意义，而且一做就做了20年。

她回忆说，那是她刚入行的1983年。一天，医院住进了一位正在发烧的病人，当张积慧准备替对方打针时，他突然钻进床底，两眼直瞪着她，嘴巴更发出了古怪的声音。初出茅庐的张积慧害怕极了，及时跑到办公室向一名老医生求助。老医生进入病房后，

^① 《护士长日记》附录一，第67页。

立即把张积慧支开，然后亲自替病人打针、抽血及进行身体检查。

她后来才得悉，该名病人患的原来是疯狗症，病发时会咬人，而被咬伤的人会受到传染。“疯狗症是传染病，她岂不知道自己也有危险，可是她宁可把危险留给了自己。”老医生这份舍己为人的崇高情操，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张积慧，令她了解到医护工作是一份爱心职业，“只要能换得病人开心，即使替人清理大小二便，也是值得的。”张积慧说。

就当买了一张单程票吧

“妈妈，你不会没命吧？”“妈妈，我好想你，你回来吧，以后我再也不惹你生气，我唱支歌给你听，好吗？”

——张积慧的独生女儿米米^①

2003年2月15日早上，张积慧在广州市天河城的商店内，为独生女儿米米选购衣物和文具。想起米米，她的心头不禁泛起一阵温暖。

正自沉思间，手提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医院护理部冯主任的紧急来电——原来“非典”疫情告急，病人数目与日俱增，广州市许多医院都不胜负荷，她任职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幢原拟拆卸的旧楼，因而被辟作临时病区，专门接收怀疑染上“非典”的病人。而张积慧临危受命作为临时病区的护士长，主要负责协调院内护士，做好各种前期准备工作，在抗疫前线上照料突然涌至的大批病人。

在这个“需要以生命作代价”的“决定性关头”，毫无思想准备的张积慧，也感到害怕，可是“没想过不来，也没有可能不来”^②。于是，她匆匆吃过盒饭后，马上就赶回医院，和十多位护士到各个仓库领取必需的医疗物品及器材，从中午1时30分，一直忙到晚上10时。大家都将近筋疲力竭时，年轻的姑娘的手机收到这样的留言：“亲爱的，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噢，是的，那天正是农历正月15日，中国的元宵佳节，象征“人月两团圆”的日子。而张积慧和她的护士战友，却要厉兵秣

^① 《护士长日记》，第16页。

^② 张积慧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访问时说。

马迎战“非典”。

在回家的路上，张积慧看见迎面而来的一对正在闲逛的母女，更是百般滋味在心头。到家了，张积慧和女儿米米说着轻松的话，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时，米米突然问：“妈妈，你不会没命吧？”听到这句说话，张积慧的脑际一阵混乱，心头发酸，11岁的孩子，已经意识到死亡的威胁。

临行前，张积慧拉着丈夫，正色道：“我这一去，不知道回不回来，现在一切还是未知数，之前都传得这么可怕，这个病还不知道治疗得怎么样，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既然米米都说穿了，我是有这个打算的。就算我先买张单程票吧。”显然，这是一场生命赌注，不知道有没有归期。



在这个艰难的抉择关头，张积慧幸而得到丈夫的全力支持，他说：“你去吧，我会管好米米（女儿）的，你放心。”除了给予精神安慰之外，他还运用本身作为传染病医生的专业知识，为她准备注射针筒及说明照料病人时应有的隔离措施，以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

那一个深夜，张积慧趁女儿熟睡，悄悄出门，没想到，一去就是3个月。

与疾病作战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张积慧最是清楚不过，然而，坚强如她，也有脆弱的时候。在进入临时病区头几天，女儿米米的电话来了：“妈妈，我好想你，你回来吧，以后我再也不惹你生气，我唱支歌给你听，好吗？”然后就在电话筒那头，唱起歌来。

“听到她稚嫩的童音，知道她健康、快乐，心里也就比较宽怀。”想起女儿孩子气的那句“非典打死了没有”，张积慧禁不住失笑起来。就是丈夫和女儿的精神鼓励，令张积慧得以支撑下去。

以集体精神迎战“非典”

“你知道吗？我走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逃兵。”

——与张积慧并肩作战的护士

和以往的疾病不同，医学界在“非典”疫潮爆发时，对这种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的夺命疾病，知之极少，因而感到束手无策。在2月15日被召回病区的第一批17名护士，许多都在夜里悄悄哭泣，有的吓得双腿发抖。

而张积慧作为临时病区的护士长，更要兼顾护理及调度工作。她说：“在临时病区运作的头一个星期，最为困难，因为无法预知消毒液、药物、氧气筒和隔离衣等的用量，我每天都接到一两百个电话，都是要求增加物资，吵得我头也疼了。”

此外，由于当时被抽调到临时病区工作的医护人员，许多都来自其他病区的不同科目人员，俨然就是“杂牌军”，故张积慧亦要肩负起培训任务，以免工作人员因操作错误而受到病毒感染。她坦言繁重的工作压力教她几乎崩溃。

她知道，战幕才刚刚拉开，一点也退缩不得。

终于，在2月17日上午，第一批疑似“非典”病人被送进了临时病区。而医护人员的工作，是全天候照顾病患，包括协助洗头、喂饭、床上擦浴及清理大小便等。

随着三四月的来临，广州的天气愈来愈热，但包括张积慧在内的护士，每天都要穿上四件工作服、两条长裤和戴上两个12层纱的口罩。由于每次上厕所都要花费许多时间脱掉那层层的衣服，护士们唯有在上班前尽量减少喝水，以节省时间，应付每天长达12-16个小时的工作量。

不过，面对这场罕见的疫潮，即使身经百战的资深医护人员，

也不免感到恐惧。也许是工作过劳，张积慧在接收病人的第3天，竟然发起烧来，摸着灼热的额头，她的心头不禁痉挛起来：“会不会是非典？”晚上，她把自己锁在小房间内，双倍服药，再盖上厚厚的棉被，焐出一身的汗。翌日，果然烧退了，原来是扁桃腺发炎，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

“人生能有几回搏，挺住，一定要挺住，坚持就是胜利。”张积慧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非典”带给医护人员的沉重心理压力，张积慧了然于胸。她心想，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以集体力量战胜“非典”；否则，大家未战死之前，已先自给活活吓死了。因此，必须想个办法，消除大家的恐惧。

一天，她召齐同僚，对大家说：“既然来了，我们就得好好地干。”她提出抗疫的三道妙方是：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其次，做好消毒隔离工作，保护自己；第三，好好休息，注意饮食，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她特别指出，“非典”的潜伏期是11天，要是过了潜伏期而不受感染，身体就有了抵抗力。为了激励士气，每次有护士过了11天的关键期而安然无恙的，她就作出表扬，一起喝牛奶以示庆祝。

张积慧说：“每过了一天，就胜利一天。但即使取得小胜利，我们也不得松懈。总之，大家同坐一条船，必须携手努力，不然就全军覆没。”这个策略果然奏效，到后来，当她要替换护理梯队时，志气高昂的护士竟拒绝退离前线，坚持“干下去，除非倒下。”一名因为身心疲累必须退到二线休息的姑娘甚至发了这样一条短讯给她：“头儿，你知道吗？我走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逃兵。”

在这样的团队精神下，侥幸地，张积慧和她的护士战友在临时病区并肩作战的3个多月，没有发生任何一例医护人员染病倒下的个案。

在2003年抗疫期间认识张积慧的同僚吕小春如此形容张积慧：“她意志坚强，能吃苦，什么事都能挑下来。”“那次午饭时，她向几个护士提及换班的事，没想到姑娘们大不愿意，表示要干下去，除非倒下。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感受到她们的高尚情操及自己的渺小。”

在那个人人谈“非典”而色变的困难时期，张积慧还以乐观的态度感染身边每一个人。她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被传染呢，包括爱和笑、感动和疾病。就看谁比谁传染得更快了，是疾病呢，还是我们沉静的一笑。”那沉静一笑显然威力无穷，为“抗非”战士和病人打下了一支有力的强心剂。

以关爱融化暴力

“自我得病以来，家里人都不敢来看我，男朋友和我分手了，真的感到很孤独，很沮丧，好像被社会抛弃了。”

——临时病区的四床“非典”病人^①

张积慧热爱体育，曾经是篮球队的主力，闲时喜欢聆听抒情的乡村音乐，亦爱阅读励志书籍，借着培养这些嗜好，提高自己的精神力量。没想到，她平日没有在意的精神力量，在抗疫时期着实发挥了不少作用。

从各地送到临时病区的病人，都得有一脚踏进鬼门关的心理准备。那是一个外人所无法了解的世界。

“那天，一名病人不治去世，临时病区内的40名病人实时沸腾起来，似乎精神崩溃。有人大哭大闹，有人试图跳楼，有人默不作声。”此情此景，教在场的医护人员看得心旌摇荡，对自己最终没有能力治好病人，感到非常无力。

可是，张积慧知道，那不是悲伤的时候。她清楚记得，一名病人怎样紧拉着她的手，对她说：“别走开，我怕。”也忘不了认为自己“反正都会死”而坚持不肯打针的病人。

在医护人员的温言安抚下，大部分的病人都逐渐安静下来，除了那名28岁的广州护士患者。

“她在别家医院工作，人很漂亮文静，因护理非典病人而染病，送到临时病区，本来已经治愈，但听到有人病死就受到刺激，怎么劝也劝不住，结果患上了创伤后精神分裂症，时而笑，时而哭，语无伦次。”张积慧忆述说：“她患病住院时，家人和男友没来看她，她有点闷闷不乐。但这也怪不得人家，那个时候，我们也不鼓励探病，避免感染。”

^① 《护士长日记》，第27~28页。

幸而，该名护士病患在精神病院护理人员的悉心医治之后，已经病愈，并且重新投入医护工作。

的确，对当时被送进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人来说，进入临时病区意味着自己可能染上连医务专家也束手无策的不治之症，承受的沉重心理压力，可想而知。而张积慧对这一切清楚不过。事实上，在临时病区需接受心理辅导以纾解压力的护士当中，张积慧的压力指数是最高的。

可是，张积慧对自己的精神状况没有太在意，反而将心系在这群不幸与疾病擦肩而过的病患身上。在那个四海一心的艰难时期，临时病区病房出现了“亲爱的病友，康复路上，我们与你并肩同行”、“有事请找我”的温馨话语，借着营造一种家庭氛围，安定病人的情绪。自1995年认识张积慧的同僚王博文说：“她为人能干、敢作敢为，有方向感。见到她，就感到安定，不再恐惧。”王又指张积慧常常说“压力就是动力”：“她劝勉大家，上班前要抛开生活垃圾，回家前则要抛开工作垃圾，总之，不要将垃圾加入生活和工作当中。”

是的，面对这个特殊的战场，医护人员能进不能退，必须比平日更努力地恪尽己责，坚守岗位，给予病患最大的支持。张积慧指出，虽然在最初阶段，医护人员并未找到特效药，亦不知道该开哪种药物医治病人，但却可以借着与之共渡危难，给予病患更多的关爱，稳定对方的情绪，使之对“非典”不存惧怕，最终将有助社会达致安宁。而这亦是她心目中对“非典”所作出的和平愿景吧！

重新认识护士工作

“护士的职责不再像平日般，只是单纯的为病人打针、派药，反而要镇定地面对疫症，更多地彰显人与人之间的爱心，从而发挥精神动力的作用，以稳定人心和促进社会和谐。”

——张积慧

从事护士工作20年，张积慧一直认为，医护人员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病人把病治好。可是“非典”一役，对她却如当头棒喝，重新检视这一番想法。

“医护人员的专职是治病救人，过去也没听说过替人治病的人

会死；即使在替人治病过程中不幸受到感染，那病还是可以医治的。然而，这次的疫潮却会随时把医护人员的性命夺去，医护人员随时会为治病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危急关头，医护人员展现的团结和舍己为人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张积慧。在那教人如坐针毡的83天，她在夜阑人静的时候，随手就拿个小纸条，将战友的动人肺腑的故事一个个地记录下来，再整理到日记本子上，写成了《护士长日记》。2003年4月15日，文章的部分内容在《人民日报》刊载之后，引起极大反响，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随后亦专访了张积慧。据称，自从“非典”一役后，广州市在2003年至2004年报考护士的人数有所上升，这大抵亦是张积慧及她在抗疫前线上奋战的同僚，所始料不及的。

2003年8月，张积慧以广东省医务界妇女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九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并作为以六名基层妇女代表之一，在中南海受到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接见。虽然张积慧在抗疫后被调到院宣传科工作，但外界对她的事迹仍津津乐道。对此，张积慧一再将成就归功于集体。她说：“它留给我们一种精神。大家在这个集体里从不认识到认识，到像兄弟姐妹一样，这么融洽的关系，好像有一种力量把大家拧在一起，谁都不愿走。”

是的，只要肯团结，再大的暴力都终将成为过去，展现着人性关怀的和平愿景，亦凭着集体力量，登临人间。

参考书目

- 张积慧著，《护士长日记》，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
邬毅敏主编，《谱写“抗非”最前线的篇章》，《时代先锋》，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2005年3月。
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抗非”英雄张积慧》，《时代风流》，广州出版社，2005年6月。

李继跃 见证生命



文：马宏萍

她用自己的努力让当地人知道，生命的诞生不是以死亡为代价的，每个人都有享受生命和健康的权利。同时，农村的贫穷让她更加理解农民的疾苦，农村妇女的疾痛使她更同情她们，因此也更加坚定了她奉献妇幼保健工作的信念。

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妇女，都热爱生命，追求健康，无论家庭，还是社会，都呈现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人人生活在一个宽容的环境里。

她年仅43岁，但是她在妇幼保健战线已经工作了22年，从20岁的大学毕业生到今天担任宁夏永宁妇幼保健所所长，她从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相反，面对艰难的自然条件和贫穷导致的愚昧，她始终微笑着迎战，在一次次见证生命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情操和医技，她就是被老百姓称之为亲人的李继跃——现任宁夏永宁妇幼保健所所长。

最初的选择

李继跃出生在宁夏灵武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支宁青年。她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1983年，她从宁夏卫生学校妇幼专业毕业后，没有依靠父母为自己找关系，跑个好工作，而是听从组织分配，来到宁夏南部山区贫困县——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盐池县实习。第一次踏上盐池地界，老天爷就像考验她一样，刮起漫天黄沙，让她着实领略了毛乌素沙漠的厉害，也知道自己今后面对的困境。与她同来的两个同学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没有待上一天就立即返回城里，她没有后退，而是与县妇幼保健院的医务人员一起，来到盐池最偏远的贫困乡苏步井。她回忆说：“当时，坐车到半路，车陷进了沙坑，我和其他的人只好下来推车，等再坐上车到乡卫生院时，我们个个都成了沙人，满头满嘴都是沙子，吃饭时怎么漱口都不管用，就像就着沙子在吃。”

刚开始实习时，她每天没有事情可做，主要任务就是做脐带卷。当时妇幼保健人员下乡就是向人们宣传不要用土法接生，新出生的婴儿要用脐带卷。她就整天做脐带卷，别人都回家了，她仍然在做，而且总是没有怨言，乐呵呵地做。“那时，可能还年轻，又刚从学校毕业，对工作充满美好的憧憬，还怀抱着一腔热情。”

在盐池实习的一年，成为李继跃生命历程中的永恒回忆。那时，她无数次亲眼目睹孕妇在自家炕头上，由宗族长辈用坐沙或坐土的方法接生，她看到许多贫困妇女因为生育时不就医，不注意方法和卫生，因此造成子宫脱垂、尿瘘等疾病，只好一辈子忍受病痛的折磨。接生婆给新生儿接生时，顺手拿起剪刀就剪断脐带，从不会有消毒的概念，因此，许多新生儿因为脐带伤口感染而得破伤风夭折。

一年中，李继跃主要是做新法接生培训和普及家庭新法接生工作，她挨家挨户做孕妇产前检查。盐池县是宁夏地域最广阔的山区县，这里沟壑纵横，路况极差，村与村、户与户之间距离很远，而且常年风沙不止。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工作，苦自不待言，有些时候，遇到特别顽固的家庭，听着人家对新法接生的种种偏

颇看法，她也有委屈，也想大哭一场，但是，她从来没有哭过，甚至没有在老乡面前流露出一丝的委屈，她笑着给人家解释，笑着给年轻的孕妇讲述新法接生的好处，一趟，两趟，三趟，李继跃的踏实和笑容感染了老乡，他们开始听她的话，她来到老乡家时，总有许多婆媳围着她问长问短，她用自己的努力让当地人知道，生命的诞生不是以死亡为代价的，每个人都有享受生命和健康的权利。同时，农村的贫穷让她更加理解农民的疾苦，农村妇女的疾痛使她更同情她们，因此也更加坚定了她奉献妇幼保健工作的信念。

长期的坚持

1984年5月，她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到了宁夏永宁县妇幼保健所。在盐池实习一年的经历，让李继跃从最初很被动的选择妇幼保健工作，转变成喜欢这份事业，山区贫困妇女面对贫困、愚昧和封建传统，而对生命表现出的那种无奈和漠视，让她心悸，让她深感责任重大，她希望自己能够尽一个医务工作者的所能，改变那些苦命的山区贫困妇女姐妹的生存状态和命运。

怀揣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永宁妇幼保健所开始实施“包乡”工作时，李继跃选择了永宁县两个经济不太好的乡镇——李俊镇和望远乡。

在她包乡的那段时间，永宁全县的婴幼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她做了一个抽样调查，发现婴幼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六七。大部分的农村家庭，都遵从着传统的习俗，即：孩子没有满月是不能见“生人”的，怕生人“踩了奶”，不吉利。这样的习俗使得许多新生儿在月子里得病之后，因为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而失去生命。李继跃曾经就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一个新生儿在出生第3天，身上出现了黄疸，正常情况下黄疸到第7天就会逐渐褪去，如果到第7天黄疸还越来越多的话，就要赶快就医。然而，这个孩子年轻的父母却听从其爷爷奶奶的话，认为出现黄疸是正常的，从而拒绝到医院“花冤枉钱”。到了第10天，孩子终于处于危险境地，李继跃下乡来到孩子家时，这个孩子已经没法再挽救了。

从事妇幼保健工作以来，让李继跃最难忘记的是和传统观念

抗争，一次次深入农村，为当地妇女讲解“新法接生”和“住院分娩”。她记得，最初她们到山区老乡家做讲解时，许多老乡不理解她们在做什么，认为她们是来让妇女到医院生孩子，是赚他们钱来的。他们用好奇又敌视的眼光，审视着保健医务人员。面对老乡的不理解，李继跃告诉自己，要站在老乡的立场理解他们，要和他们多沟通，多交流，要用诚意和事实说服他们，而不是单纯地认为这是封建思想和愚昧观念，因为生活在干旱贫困的山区，缺医少药的现实让这里的人们没有任何选择。



永宁有个闽宁镇，这是一个与福建结对而建的移民吊庄镇。1995年，当了永宁妇幼保健所所长的李继跃负责包这个镇。因为这里的老乡都是从宁夏的“西海固”地区搬迁来的困难群众，为了接近农民，得到他们的认可，李继跃在包乡期间，学会了当地农民的方言，这样和他们沟通起来就方便多了。她对自己刚去闽宁镇做老乡思想工作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李继跃遇到一个特别不愿意接受新法接生的老大娘，大娘和她争执道：“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坐土或坐沙生孩子的，这不是都活得好好的？”李继跃就反问她：“您当时生了几个孩子？”大娘说：“7个”。“那现在您身边有几个孩子？”“有3个”。“怎么只剩3个了呢？”大娘想了想，喃喃地说：“是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就是这样，李继跃一次次不厌其烦地给老乡讲道理，摆事实，让他们从旧习惯中走出来，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

2006年年初，闽宁镇武河村孕妇李雪，因为是中度贫血，血

色素只有8克，生产时一天一夜没有生下来，被送到闽宁镇医院。正在该镇医院的李继跃看到产妇已经生命垂危，就当即告诉其家属要赶快送妇幼保健所动手术。家属面露难色地对她说，家里穷，没有钱住院开刀。李继跃说先救人要紧，随后立即用车将产妇带到了保健所，此时，产妇已经深度浮肿，全身僵硬。做手术时，产妇又大出血，以致缝合伤口出现困难。虽然李雪生了个儿子，家里人却没有能够高兴起来，因为她的伤口总是流水不愈合，住在医院难出院，家里已经债台高筑。看着她们一家人愁眉苦脸的样子，李继跃掏出200元钱，交给李雪的婆婆，让先垫付药费。看到产妇营养跟不上，她又自己掏钱，让保健所职工买来母鸡，配上中药，给李雪炖汤补身子。“像这样的贫困病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时候，我一方面会为她们积极争取我们正在实施的‘降消’项目，能够减免的费用尽量减免，一方面还得自己拿钱，给他们救急。没有办法，这里的人穷嘛。”

一周，两周，李雪的伤口总是不愈合，随时有感染的危险。李雪的婆家明确表示没有钱给她治疗了。李雪的亲身父母也表示放弃，他们对李继跃说，谢谢你，你们已经尽力了，李雪的伤口实在不愈合，我们就回去，能不能好，看她造化吧。明明知道，回去等待李雪的就是死亡，李继跃怎能答应老人的要求呢？她利用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县上开会时，就给县长、给民政、给卫生局汇报，呼吁多方救助李雪。每天李雪换药时，因为疼痛总是拒绝护士碰她，李继跃就每次守在她旁边，让李雪抓着自己的手，不停地给李雪擦汗，鼓励她要坚强。23天后，李雪的伤口终于不再流水了，创面只剩两三针了，李继跃同意让她出院回家，同时，安排当地的保健员定期到李雪家去给她检查。

一个差点就放弃的生命，就这样被留住。看着李雪父亲送来的“天使解囊奉献爱心，医术精湛妙手回春”锦旗，李继跃再次欣慰地笑了，她说，就是这样的坚持，才一次次把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姐妹拉回现实生活。现在，吊庄孕妇死亡率已经降低到了零，婴幼儿死亡率也从千分之六七十下降到千分之三十七点五。

永宁县曾岗乡近义村村民李小花的丈夫提起李继跃就有道不完的谢。每年他都会把自己种植的枸杞和自酿的蜂蜜送给李大夫一些，请她保重健康。1997年12月的一天，他妻子李小花因为难

产快不行了，他背着妻子来到保健所时，大夫们都已经下班了，只有李所长还在病房查房。他哭着求李大夫救命。李继跃看到产妇危险，立即召集医务人员回来抢救。此时的李小花因为失血过多，血压、脉搏几乎都没有了，血色素只有4克，必须立即输血。可是，血必须到县医院的血库去买，李小花的丈夫来的匆忙，身上没有带钱，他不知所措地蹲在门外，怎么办？产妇危在旦夕，李继跃二话没说，立即倡议大夫们凑钱，并带头拿出200元钱，几分钟凑了1,000多元，买来血给病人输血，同时进行剖腹产手术，一个健康的男婴出生了，大夫们都长出一口气，李小花的丈夫更是喜极而泣。10天后，李小花也康复了，年轻的丈夫为感谢大夫们，就在过年的时候给她们送自己种植的枸杞和自酿的蜂蜜，尤其是李大夫，他非得看到她亲口尝了才肯走。李继跃知道他不容易，就自己掏钱买一些，并给其他人推销蜂蜜和枸杞子。

像这样的事情，从医21年来，李继跃不知碰到了多少，每次，她都尽心尽力，以热情的态度对待。因为长期的坚持不懈，她在当地老百姓中赢得了赞誉，群众视她为亲人，都亲切地称她“大眼睛所长”。李继跃说：“正是老百姓朴实的感激，激励我不断努力，不断进步，老百姓的肯定是我工作的动力”。

矢志不渝的追求

李继跃在工作中是个好大夫，在家庭里，也是个好儿媳，好妻子。李继跃的婆婆今年已经83岁了，结婚20年，她一直与婆婆同吃同住，婆媳关系好的如同亲母女，多次被自治区妇联、县妇联和银川市妇联评为“五好文明家庭”。说起这些，李继跃非常自豪，她说自己能在工作中全身心投入，就是因为有婆婆的理解和丈夫的支持。1991年，她的孩子4岁时，所里安排她到四川职工医学院进修，在她犹豫难定时，婆婆让她放心地去学习，孩子由婆婆带。她记得那时别人在学习期间总是偷跑回家看孩子，她每次打电话，婆婆都说家里很好，她只在每年放假的时候回来看看。1995年，她学习回来后，被任命为保健所所长。从此，工作更忙了，她桌上的台历，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都安排的满满的，有时，还得加夜班，逢年过节，别人都回家了，她还得值班，遇到病危的产妇，她不得不连轴转。她的辛苦，婆婆看在眼里，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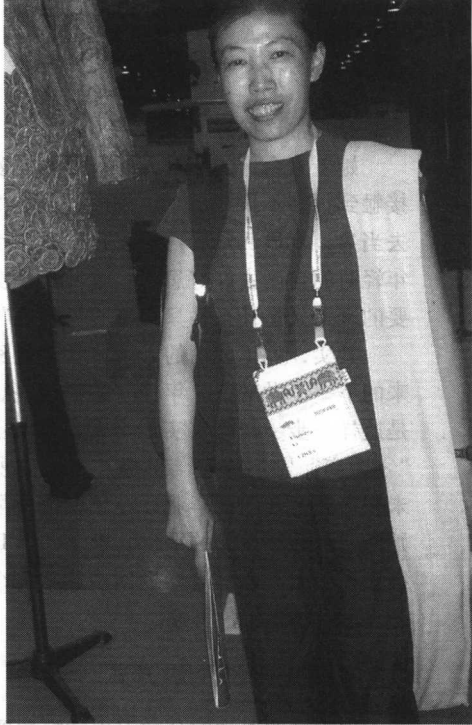
在心里，回到家就让她好好歇着，家务活都由丈夫做。她呢，婆婆有心脏病，李继跃不管多忙，每天总是不忘记提醒婆婆吃药，并定期给婆婆检查身体。和睦温暖的家庭，让李继跃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一心一意实现自己的追求。

工作多年来，李继跃养成了一个习惯，工作间隙总不忘记做社会调查，后来，她成为永宁县政协委员后，更是利用自己的身份，不断为全县的妇儿保健问题进行呼吁。去年，在她的积极争取下，永宁县被列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实施县，县政府专门拨款1万元配套资金用于启动培训健康教育。从此，她一边负责保健所的日常工作，一边和当地妇联联合，下乡为农村妇女举办卫生保健培训班，用事实和科学，教育广大农村妇女转变观念，摒弃旧的生育观念和方式，再也不要“炕上生娃娃，地下摆棺材”，真正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

任何努力都不会白付出，总会有所收获。李继跃说她多年来的努力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一种变化。以前，在农村，妻子生孩子，做丈夫的不但不管，还嫌脏离的远远的，等孩子出生后，看一眼就走。尤其是一些山区的男人，认为妻子的生育是由婆婆或产婆负责的事。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得到明显改变，随着来医院分娩的产妇的增多，丈夫们来医院伺候老婆生孩子的也多了。过去，下乡去做妇幼保健宣传时，真个是“狗咬没人挡，吃饭没人让”，现在，只要宣传车一到，那些农村的妇女们总是围着医务人员问这问那，咨询各种卫生保健知识，有人还把大夫请进家门，看看自己的病。她列举了一组数字，说明这个变化：2004年，永宁的吊庄地区——闽宁镇孕产妇到医院分娩的不足15%，2005年，住院分娩率达到70%，无一例母婴死亡。

在李继跃的心目中，有一幅理想的和平生活情景：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妇女，都热爱生命，追求健康，无论家庭，还是社会，都呈现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人人生活在一个宽容的环境里，她说，为了过上这种理想的生活，她将不断努力，不懈追求。

李晓亮
医疗界中的行动学者



文：晋群、梁萍

我们的项目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同样也让我们自己受益，所以，我们同样应该感激我们帮助的对象，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学生做工作才会真正成为一种自愿、平等的行为。

“和平”对于李晓亮来说，应该是一幅人们互相信任，互相帮助，愿意一起努力做事情、一起改变世界、享受生活的图景。

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在 40 岁重新选择，算不算晚？

如果一个人在不惑之年才“如梦初醒”，毅然选择艾滋病预防控制为工作领域，为此去不断挑战人生和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努力与艾滋病感染者、性工作者等弱势群体并肩前行、力图让他们（她们）学会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而改变命运的道路，算不算“傻”？

对比自己曲曲折折走过的道路和今天面对多样选择的年轻人，

李晓亮常常这样感慨。

她羡慕今天的年轻人拥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在20多岁就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她说自己“傻”，高中毕业后进工厂，去当兵，复员回家后再进工厂，再上大学，丰富的经历却没有让年轻时的自己去好好思考：这些经历到底给了自己什么？自己想要的未来又是什么？只知道“一根筋”走下去。

其实，真正成功的人生，就是曾经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在为未来的下一步做准备。年轻时的李晓亮也许没有想得太多，但她就是这样一步步踏踏实实地走来：部队卫生员的经历，让她第一次“零距离”贴近病患与健康；在大学所学的公共卫生，决定了她未来事业的方向；毕业后在昆明医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又为她搭建起施展拳脚的平台。于是，当1994年她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结束在澳大利亚的进修返回中国，一个完全崭新的天地已经在李晓亮面前悄然铺展开来。

“参与”是一种生活方式

现为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的李晓亮，是一个好老师，说起她，她教过的学生和指导过的研究生都赞许有加。这不仅是因为她的课讲得好，更是因为学生们在李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以前只是概念的东西，比如社会责任感，比如做人的原则。

李晓亮说：“我喜欢带学生去做各种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这不仅是带领他们去完成一项项工作，而且是在实践和亲身参与中培养他们的平民心态和感恩的心理。我们的项目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同样也让我们自己受益，所以，我们同样应该感激我们帮助的对象，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学生做工作才会真正成为了一种自愿、平等的行为。”

参与式教学是李晓亮教学和做项目的最大特色，即利用游戏、讨论、小纸条等方式让每一个听课的人或被培训者畅谈自己的体会和人生经验，在轻松而生动活跃的气氛中舒解自己的困惑，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或学到某些知识和技能，对此，李晓亮说：“我很享受这种时光。”而听过她的课或培训的人也同样有这样的感受。

10年的时间，“参与”对于李晓亮而言，已经不是单纯的一

种传授方式和技巧，而已经成为她的一种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人生风格，在不断参与各种项目活动中，她不但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新方向，而且通过亲力亲为的参与，不断成长，不断提高。

1994年回国后，李晓亮通过昆明医学院、云南红十字会等机构，开始与一些国际组织接触，参与到各种项目中。1996年李晓亮与其他云南省艾滋病工作者共同进行的“以学校为基础的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项目，是她在项目中成长重要的一步。

1996年4月开始，李晓亮等人率先在昆明市的3所中学里开展了中学生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当时，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对世界、对社会、对自身刚刚懵懂的中学生，而艾滋病预防教育所需要涉及的敏感的“性”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国讳莫如深，难以启齿，对于项目可能得到的结果，李晓亮等人在开始时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于是，他们对这群孩子提出了3个问题以作试探。这3个问题是：“你知道安全套吗？”“你知道安全套怎么使用吗？”“你见过安全套吗？”

孩子的回答在李晓亮与其他项目实施者的意料之中，也令学校的老师们感到了进行性教育的必要性。有90%以上的孩子表示听说过安全套，一半的孩子知道怎样使用。李晓亮等人和学校老师马上一起设计了教育的方案。

该项目采用参与性教学法和同伴教育的方式，先对项目学校的骨干老师、校领导进行培训，然后由骨干老师对各班主任进行培训，再由每班各选出1名男同学和1名女同学担任同伴教育者，对他们进行为期5天的培训，然后在班主任的配合支持下，由他们回到自己班里开展同伴教育活动，利用课余时间把有关艾滋病预防、青春期性生理、性心理发育、防止药物滥用等信息以及如何拒绝不良诱惑等生活技能传达给同班同学。在培训过程中，李晓亮等人为达到“行为培养最为重要”的目的，采取角色扮演、讨论、游戏、黑板报等参与性的教学方法，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加深了他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项目的开展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绝大多数学生认为项目使他们学到了很多课堂以外的知识，他们尤其对项目所采用的参与式方法特别感兴趣，认为“这样的方式很有趣，一点儿也不枯

燥”，有的同学还说：“对于性这个话题，国家和学校一直采取保守的态度，在家里，父母连这个字都不敢提，限制了我们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很高兴现在能有机会学习这些知识。”老师们也从初期的担心、怀疑转为肯定和积极参与，认为这个项目“归根结底是教同学们如何做人”，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健康行为和生活能力，对学生来说是受益终身的；家长们也对项目给予了肯定和支持，甚至还有学生回家后把学到的知识教给自己的父母。

这一项目从1996年到1997年的一年时间里，通过层层培训，从3所学校扩展到6所，再扩展到云南全省的200多所学校，甚至远赴四川、安徽、新疆等地培训当地的老师和学生。项目印制的“中学生须知”知识小册子和同伴教育者培训手册以及学生们自己绘制的“艾滋病基本知识”、“远离毒品”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三本一套小册子，以国家卫生部疾病控制司的名义发放到全国各地。项目产生的良好而巨大的效果，更对国家教育部制定有关在全国中小学和大学开设青少年健康教育课程的政策做出了贡献。



事隔近10年，李晓亮还与这群孩子保持着联系，看着他们读大学、工作，看着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受益。但这群孩子也许不知道，为了保证当年的项目成功，李晓亮和她身边的朋友把自己八九岁的孩子当作了“实验品”，将预防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和生活技能先在自己孩子身上“实验”，再教育学校里的孩子。如今，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已经步入大学，早年的健康教育同样让他们健康而快乐地一路走来。

虽然李晓亮在项目实施两年后因参加其他项目而退出了，但该项目至今仍在进行。回想起来，当年一大早骑车近1小时赶赴

项目学校的辛苦，顾不及照顾家庭和孩子引起丈夫不满的委屈，依然历历在目，而在她心中，更多的是对项目的不舍，是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欣慰，是从中感受到的愉悦。

“那时候做事，真的是不为名，不为利。虽然当时很多观念不够开放，要推行像性健康教育这样的理念困难重重，但通过这一项目，我的眼前像打开了一扇窗子，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对于这次对李晓亮本人同样受益终身的项目，她总是很乐于与人分享，“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当时是国内第一家，算是很先进的了，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有改进的地方。所以说，只有参与，才能学习到东西，才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否则，只能是被动地接受。”

“艾滋病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离开中学生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项目，李晓亮有百般的不舍，也有很多的无奈，但是，她知道，通过这一项目，自己已经又往前迈出了一大步。“通过这一项目的实施，我对艾滋病的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真正发现，这种病不仅仅是医学上的一种疾病，而已经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和范畴。”李晓亮说。

云南是中国发现艾滋病最早的地区，也是目前中国艾滋病重灾区之一。在与缅甸接壤的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因吸毒、卖淫等而感染艾滋病的情况非常严重。李晓亮选择了这样一个领域，也就选择了经常要去面对触目惊心的一幕幕。

她常常会想起，一个40多岁的性工作者，没有任何姿容，放弃所有的尊严，在终日惶恐中出卖着自己的身体，供养着两个分别读大专和中专的孩子；她常常会看到，一个家徒四壁的房子里，一个枯瘦的身躯躺在一张破席子上等待死神的降临……面对惨残的现实，李晓亮突然很庆幸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看到了这个光鲜世界的另一面。“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可能只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校园校园里做一个所谓的学者，是艾滋病给我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让我不断地挑战自己的责任和心态，一次次拷问自己，是不是有资格为这些人服务，从而发现自己的使命在哪里。”对于自己的再次选择，李晓亮坚定而从未后悔。

随着在艾滋病预防领域工作的不断深入，李晓亮发现自己的心肠变得越来越“硬”。以前看到艾滋遗孀遗孤，她会立即把包

里所有的钱掏出来给他们；可是慢慢的，她越来越少这样做了，因为她发现，给予金钱或物质上的帮助，无论是帮助的程度还是帮助的范围始终都是有限的。

李晓亮说：“现代医学证明，要促进人群健康，50%要通过改变人的行为来实现。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或社区之中，他们的行为和生存状态都不是一天半天能改变的事，只有通过倡导，调动他们的健康意识，树立为自己负责的理念，建立健康行为来保护自己。”

用“说话”来防治艾滋病？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但李晓亮说，她分明看到了很多人眼中闪动着希望的光芒。李晓亮不久前在为某机构评估一项感染者小组项目时，碰到一个原是驾驶员的感染者，他正在寻找一份驾驶员的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李晓亮与他聊天，对他说：“你能学会开车，也就可以学会其他的技能，所以，为什么不去学习其他本事来拓宽自己的职业选择范围呢？”简简单单的话语，令他茅塞顿开，感激的眼里，泪光闪动。

李晓亮从事艾滋病预防的10年，也是中国在艾滋病问题上从否认到积极面对的10年。10年前，李晓亮与其他同行者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也缺乏可借鉴的经验，顶着来自各方面有形和无形的压力，艰难地开展相关工作；10年后，李晓亮说，工作环境宽松了很多，限制少了很多，自己的工作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承认。如今，在她的积极倡导下，艾滋病预防已经成为其所属的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包括相关新的理念、新的干预对策和方法等知识，源源不断地传授给学生；在她作为志愿者参与的云南本土的NGO组织——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中，她和一些同道也在努力将其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积累的经验，运用到更多的研究与实践中，并取得不少具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可是，李晓亮的忧心并不因此而减弱。她说：“我们已经错过了预防艾滋病的最好时期，现在虽然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但都是在补救，所需花费是非常巨大的。其实，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在前头，既不会有今天这么严重的状况，也不需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李晓亮说，现在艾滋病预防工作主要在吸毒、性工作者、同性恋等人群中进行，但这已经属于二级预防；一级预防属病因预

防，主要通过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规范自己的行为来实现。因此，她关注的目光始终锁定在青少年身上。

艾滋病预防与性健康教育从来就是相伴相生，从1996年的学校项目开始，李晓亮就开始了与青少年健康教育不可分割的缘分。之所以这样选择，她说，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可塑性大，正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另一方面，青少年即将进入性活跃期，对性的正确认识、对自我的保护意识会影响整整一代人。于是，她教孩子们各种各样的生活技能，帮助孩子们面对与家人及周围人的各种关系，与父母一起探讨“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她说，她就是要让孩子们有一种人生的思考，有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有追求理想人生的能力。

“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是不是太有野心了？想靠我一个人就能改变一代人吗？后来，我明白了，个人的能力是有限，但我能做多少就去做多少，如果我能影响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可能就可以去影响另一个人，像这样一个影响一个，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们一样思考人生，为自己选择一种正确的行为方式。”

李晓亮认为，艾滋病预防不仅可以在学校教育中实行，也可以与工厂的安全生产、农村的疾病预防结合，这样，不但影响面会扩大，而且节约了大量的资源。

李晓亮说，其实她还有很多其他的研究兴趣，比如女性肿瘤、预防使用烟草、以改水改厕为代表的农村公共卫生与发展问题等。“不过，‘艾滋病’似乎已经成为我与别人、与其他事联系的纽带，做什么都脱离不了它了。”她笑言。

公共卫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

以艾滋病预防为使命，李晓亮所从事的艾滋病预防工作从健康权利的视角出发并注重实效和影响，一方面从最基层的社区开创新的预防模式；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倡导政策改变，全方位开展艾滋病预防。

这样的工作需要长期的锲而不舍，而效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到。似乎为了检验人类在面对危机时的应急能力，为了给长期麻木的社会应急体系敲响警钟，2003年，一场全球性的灾难爆发——SARS，让像李晓亮这样学习并从事公共卫生的人顿感痛心和忧虑。

在 SARS 最厉害的那段时间，李晓亮和公共卫生学院的同事一起，带领学生进行公众宣传，上街发放宣传单，到民工人群中调查他们对 SARS 的获知程度……SARS 的爆发，暴露了太多的问题，不要说应急体制，就连常规的公共卫生体制都缺乏。这样的话，危机来了信息传给谁？由谁负责？”

当病毒侵害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而是一个社会的稳定，一个国家的安危，这种病毒，已经成为一种威力无穷的暴力，时刻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以艾滋病和 SARS 为代表的公共卫生危险正是这样的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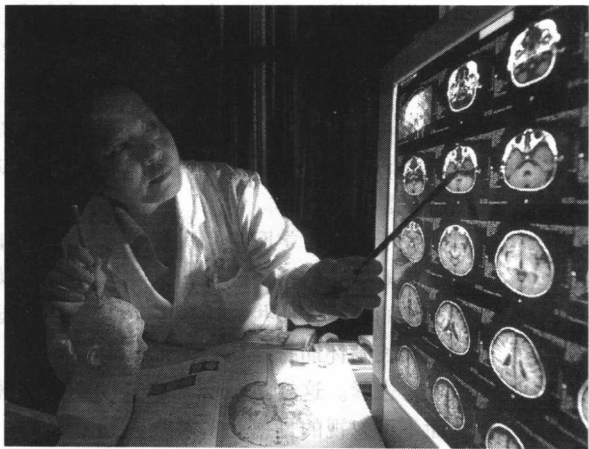
在李晓亮看来，“公共卫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公共”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与前苏联强调实验室研究、不注重社会发展的模式不同，今天的公共卫生更强调以社区为基础，强调社会公平和实践性。在日常公共卫生机制建立和危机处理过程中，政府、公民社会和社区缺一不可，都担负着重要的责任。“13 亿人如果都等着政府来救济，肯定是不行的。政府应该重视并鼓励社区的互动性，建立起事先的预防机制，那么，当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谁都不会手忙脚乱了。”李晓亮说。

“和平”对于李晓亮来说，应该是一幅人们互相信任，互相帮助，愿意一起努力做事情、一起改变世界、享受生活的图景。而“人”正是李晓亮所从事的所有工作的核心，无论是作为一名大学老师，还是一个项目的实施者。她喜欢直面自己服务的群体，喜欢看到自己的工作让人真正受益，而不是站在高高的金字塔尖俯视他们，不是用所谓的论文来搭建看不见摸不着的空中楼阁。

她说：“我以前觉得，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行；但现在，特别是通过做一个个项目，我发现，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强调人的改变、人的社会责任。这也是预防疾病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只有建立起怎样看待疾病、看待自己、看待健康的自我意识，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健康。”

在参与一个项目的过程中，这种意识被不断加强，正如李晓亮所说，是项目给了她一个发展的方向，她从项目中学会了思考，学会了与人沟通，从而提升自己，让自己成长。“项目改变了我的。”她说。

郭新志 与万名脑瘫患儿的情缘



文：韩小红

她以女性博大的情怀，为成千上万个脑瘫患儿付出了全部心血；她以医生的天职攻克世界性“顽症”，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并创造了无形的社会价值。

特殊孩子和老人是一群更需要社会关爱的群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他们享受人生。这是一项永恒而神圣的事业，我为从事这项事业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并将终生不渝，奋斗不息。

“献出你我心中的火种，点燃患者头脑的灵光，让这光亮照亮患者的人生，照亮你我的灵魂，照亮人类的未来！”

提起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山西省脑瘫康复医院院长郭新志，人们都知道她是远近闻名、受人尊重的新闻人物。在几十年的奋斗生涯中，她为残疾人事业付出了青春、献出了爱心，以无私的医德和不断的追求赢得社会的承认和肯定。她先后获得

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十大女杰”、青年科技专家等近40项荣誉称号，还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等接见，受到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健康报》等众多媒体的关注，也曾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赞扬。人们把她誉为党和人民的宠儿，万名脑瘫患儿的妈妈。

位于太原市学府街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山西脑瘫康复医院几乎成了脑瘫患儿的希望之地，医院里几部看似寻常的电话也成为特殊繁忙的热线，那些为让孩子走出脑瘫疾病苦海而走上寻医问药路的家长满怀期盼地从天南地北走进那里，以致山西脑瘫医院床位经常告紧。这样的景况对医院、对医生来说可说是一种信赖，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患儿多对社会和家庭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同时也不排除有为数不少的父母怕造成各种负担而遗弃残疾孩子，这种看似无奈、别人也无法干预的行为，实则的形成也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冷暴力。为此郭新志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怀着一种沉甸甸的特殊心情、肩负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寻求一种人类和平生存环境，而开始攻克脑瘫恶魔的医学尖端课题。

青春无悔

为了获得成功，必须在提高综合素质上下极大的功夫，要有潜心求索、脚踏实地、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要有热爱专注于自己的专业，摒弃外在干扰，不计得失、人道为先的情怀；要有锲而不舍、精益求精、虽九死而无悔的意志。

——郭新志手记

1959年，郭新志出生在山西省运城的一个医学世家，父母亲的“诚实做人、踏实做事”无刻不在熏陶着她。1982年，郭新志从山西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山西省儿童医院工作，天真烂漫的她，顺利完成了从学校到社会的人生跨越。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听人讲了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在一家医院，一名身怀双胞胎即将分娩的妇女要求住院，因为押金不够被医院拒之门外，待家人取足住院费回来时，母子3人已惨死在地。郭新志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暗暗地流下同情的眼泪。于是，从那时起，她就从内心发誓要做一名热心、诚心并有真本领的人民医生，为人

们创造和平的生活境地。然而，在儿童医院又使她的心灵感到一次次的震撼，她经常看到脑瘫患儿被遗弃，同时还多次亲自送这些可怜的孩子去儿童福利院。更令她难忘的是，有一次她刚洗完病房走进医务办，看到桌上放着一个包袱，不经意地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这个孩子着实把她吓了一跳，孩子四肢瘫软，整个头部萎缩在那看不见的瘦小的双肩中。郭新志用手在他眼前晃动，又在他耳边拍掌，但孩子没有反应，只是从他嗓子里发出了一种“怪异”的呼噜声，这时郭新志才感觉到这条小生命还活着。她轻轻把孩子抱起，发现被角里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可是我们又无法面对这孩子，好心的大夫，我们只有把孩子给你们留下，希望你们能救救孩子。”看到这里，郭新志深感不安和恐惧，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她怜爱地将孩子紧紧抱住……事隔不久，在她身边又发生了一件惨痛的事情，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溺死自己的脑瘫孩子后，自己也服毒身亡了。还有医院里一位受人尊重的老护士长的3个脑瘫儿相继死去，她自己也因过度的悲伤和劳累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作为一名女性，天然的母爱使她常常为此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中；作为一个医生，强烈的责任心又使她食不甘味，寝不安息。郭新志的心里再也无法平静，下定决心攻克脑瘫顽症，哪怕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

脑瘫顽症是世界性的未开发领域，选择它，就等于选择了艰难、选择了付出。从1982年起，郭新志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研究之路，她根据所学到的中医针灸和其他西医学长，把工作和学习有机地融为一体，白天在医院向专家教授老同行请教，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刻苦自学。通过近乎玩命的学习，她有了扎实的医学功底，为脑瘫顽症的科研治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着，郭新志便利用业余时间，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和几位老专家一起，自选了“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儿童脑瘫”的高难科研课题。她知道自己不一定能成功，也许会白费心力，但她更清楚，如果每一个医生都知难而退，脑瘫便会成为永远的顽症，自己的内心就永远不会平静！尽管当时有许多人说她是冒傻气，但她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为了寻求科学的、有突破性的理论依据，郭新志承受着常人

难以想象的工作量，也不知在自己身上试扎了多少针，历来被医学界视为针灸禁区的一些头部穴位也被她扎了无数次。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郭新志轻轻地回到了丈夫和女儿熟睡的房间，她默默地望着亲人，心中祈祷着平安，而同时她萌生着一个“破天荒”的想法。她悄悄地坐在镜子前，拿出一根长约三寸的银针。平日里她手中的银针是那么的娴熟，而此时却让她感到了特殊的寒意。她开始用手轻轻按压住颈后的风府、哑门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历来被医学界认为是针灸的禁区，经常可以看到，因在这两个穴位上用针不慎致残、致死的报道。可郭新志为了患儿能早日康复，她大胆地要在禁区找出一个突破点——亲自试针。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平缓而迅速地将针深深地刺入到自己的哑门穴。不料，瞬间的剧痛使她顿时昏厥了过去，摔倒在地的响声惊醒了爱人和孩子。看见躺在地上的郭新志，女儿哭喊着：“妈妈，妈妈，你怎么了？”爱人在旁边急得团团转。看到还插在颈后的针，爱人一下子就全明白了，禁不住泪如雨下：“新志，你醒醒呀！”她在女儿的哭喊声和爱人的呼唤声中渐渐苏醒。一头的冷汗沾湿了女儿的一双小手，躺在地上的郭新志明白了，但她泪中带笑反倒安慰女儿和丈夫，因为她的实验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风府、哑门等穴位不能进针的说法被彻底推翻。同时，她还意外地发现了几处经络学上尚未记载的新的有效穴区带，这就更意味着脑瘫康复医学治疗新体系有了曙光，可怜的脑瘫孩子们多了一份康复的希望！

郭新志成功了，她破解了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儿童脑瘫的高难课题，从此开通了先天性小儿脑瘫能治的先河，1992年她当之无愧地担任了山西脑瘫康复医院院长。她研究的《老年性痴呆症的综合康复》课题已取得良好开端。多年来，她先后诊治海内外小儿脑瘫和老年性痴呆患者5万多例，系统治疗3万多例，已有1万多例达正常化，入托、上学、参加工作，已有结婚生子；1万多例生活基本自理，其余正在治疗康复之中。经专家临床和随访验证，总有效率达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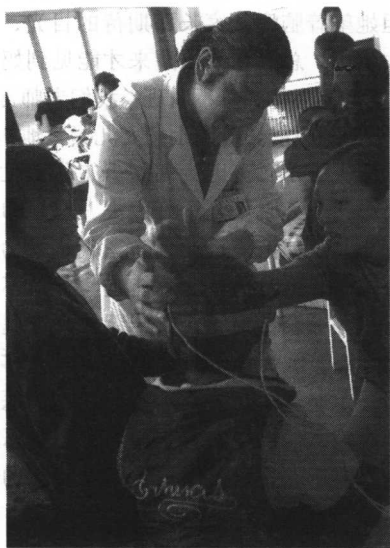
20多年来，她在国际国内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26篇获优秀论文奖。尤其在1997年国际微量元素交流会上，在世界仅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的情况下，唯独她一人破格获取

三项医学科研论文二等奖。她的业绩收录于《世界名人录》、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二十一世纪人才库》等20多种权威辞书中。多少年的追求，多少次的探索，她感到青春无悔。

爱心无限

科研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与痛苦。选择脑瘫科研，便意味着选择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考验，不仅需要顽强的意志，而且还需要奉献出全部的心血和汗水。既然时代选择了我，我就应该有为国为民的责任感，有为人类健康而努力的雄心壮志，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一切。

——郭新志手记



走进郭新志那个特殊的医疗室，顿时让人冷汗直冒，十几名面相痴呆、体型瘦小的孩子赤裸着全身，从头到脚扎满了2寸多长的银针，哭叫声撕心裂肺，再有自控力的人都会心疼地掉下眼泪，目不忍睹这个场面。然而按着孩子身躯的父母却若无其事，是不是这些家长也“麻木”了？不曾想到她们的回答也能让你开心：“这种痛苦忍受一段就习惯了，看到了孩子病情好转就会变为高兴。因为有郭新志这样的好医生，我们的孩子有希望呀！”

郭新志不顾一切地选择如此的高难度医学课题，她以母亲般的心灵和爱心注定了她的成功。她认为，作为一名人民医生，没有恒心研究不出成果，没能爱心绝对当不好一名称职的医生！脑瘫患儿几乎成为她的全部世界，并占据了她大多的休息时间。

几十年来，她除了工作室就是治疗室。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几十名病人在焦灼地期待治疗，郭新志则是忙碌地扎针、捻针、注射、开药，仅仅捻针一项，每天要捻动七八万次之多，这样站立着工作，一般要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9点多才结束。之后就是查房、整理资料，制定次日治疗方案，晚12点多才能休息。从1985年到现在，公休日她几乎没有休息过，没有请过假，远在西安的老父亲已经多年未见她，老人家多次要求新志全家回去一次，但她望着脑瘫儿家长那期待的目光，便只能让自己的亲人一次次失望了！总是在深夜醒来才能见到妈妈的女儿曾经天真地问：“妈妈，你为什么总不歇班？我们老师常问，为什么你妈从来不接你？”而她只能含着眼泪把女儿紧紧地抱住。她爱人是一位有事业心的国家干部，可因为郭新志工作太忙，他承担起了全部家务。郭新志在病人眼里是个好大夫，但她却从内心里感到欠亲人的太多了。儿童脑瘫属运动发育落后、智力低下、行为异常、视听、语言障碍，也就是有腿不能走，有口不会说，有耳听不见，有眼看不见等综合性损害，它给无数个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幸。可怜天下父母心，因为孩子看病已经有过太多的失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几乎是跑遍全国后才打听到郭新志的医技，有的人是倾家荡产为孩子看病，他们抱着希望而来，怎能忍心让他们再感到失望呢？于是，郭新志也只有像一架飞速旋转的机器不停地转下去。

瑞典籍华裔男孩小峰患有先天性脑发育不全，已经1岁了连基本的生理功能都不具备，不会翻身、不会吃饭，甚至连牛奶都不会吞咽。郭新志对小峰经过第一阶段的治疗，使孩子学会了喝牛奶。

牡丹江市患儿小宝，长到8岁还不会说话，经过郭新志的精心治疗，有一天突然喊了一声“爸爸”。八年了，第一次开口说话，当爸爸的竟然大张着嘴激动得不会应声，他定了定神，突然边跑边喊：“郭院长，会叫了，小宝会叫爸爸了。”而此时的郭新

志也被小宝爸爸的神情感动得满眼含泪。

一位叫汉尼的15岁德国男孩，入院时两手不停地乱动，一刻也不能安宁。治疗一个月后，汉尼有了明显好转。每天自己走向治疗室，主动卷起袖子，用生硬的中国话边说边比画着：“先扎手，后扎头，不扎嘴。”汉尼的爸爸高兴地说：没想到奇迹却在中国出现了。

白路德是一位美国从事脑瘫患儿教育的工作者，她带着自己的脑瘫孩子不远万里来到山西找郭大夫求医。经过40多天的治疗，她的孩子的头和手由刚来不能伸出转动，到能手扶站立和手指运动自如，由入院时失语，到口语自发单音字，并能识别百余个单词。见此情景，她要重金感谢，被郭院长婉言谢绝了。白路德女士竖起大拇指说：“郭大夫的医术了不起！”

许多孩子扎针时都是不要命地嚎哭，可排队时却和妈妈一起往前挤，好让郭大夫先给自己扎。为了让郭大夫别扎疼了自己，就“郭阿姨”、“郭妈妈”、“郭院长”叫上一大串。还有那些康复后已经入学入托的，回访时都要情不自禁地叫“妈妈”。

为了给患儿和家长一个舒适的环境，郭新志把医院设计改造成“家庭病房”，每两户为一单元，有一个共用厅，厅里有电视，楼层有厨房，煤气畅通，自来水不断，家长可为孩子做可口的饭菜，同时还可到食堂点菜选饭。一位从香港来的患儿家属不无感慨地说：“这家医院不仅医术高，生活方面为人们想得也很周到。”

郭新志和患儿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于治疗过的每一个孩子的名字、症状、病情，她就像一部活字典一样都能说出来。为了孩子们的康复，尽管郭新志承受了难以言表的苦和累，而她却无怨无悔。她常说：“当我看到那些脑瘫患儿不知事理的大脑产生了思维，从无知到自理，从站不稳到能行走，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离开医院，都天真地叫我妈妈时，心里就会感到满足和无比欣慰，这份常人难以拥有的情感，是患者对自己给予的最大回报！”

医德无价

作为国务院特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就应该努力学习，追求知识，加强修养，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上为政府分忧，下为患

者家庭解愁，提高中华民族素质，改善人类健康，造福于社会是我终身执著的追求。

——郭新志手记

早在1985年，初为人母的郭新志，看着女儿的笑靥，更深切地体验到了那些脑瘫患儿母亲内心深处的感受。她爱自己的孩子，眷恋自己温馨的家，然而为了千万个脑瘫患儿的康复，为了千万个家庭的祈盼，她轻轻地吻了一下女儿，在丈夫哀怨的目光下，远赴山西113个自然村采集数据。这一去就是半年，随机调查2万余人次，精选卡1万张，预备卡1万张，为小儿脑瘫生长发育迟缓的筛查和早期诊治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攻关课题《儿童保健研究》荣获“国家科技金花奖”。从“七五”到“十五”期间，郭新志每个阶段都承担和完成了攻关课题并得到推广，还获得了各种奖项。

20多年艰难跋涉，无数次痛苦试验，郭新志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儿童脑瘫”这一高难科研课题。1990年经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认定该成果填补了国内外一项医学空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具有较高的科研推广价值，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她运用该成果为国家创造经济效益已高达百万元，现已在全国各省市推广应用并为世界所瞩目。另外，她在康复医学研究方面先后完成省部级科研项目6项，多次获省级、国家级科研奖。

成功的硕果自然有人想采撷。河南省一家药厂要出10万元买她的一号药品配方时，她拒绝后无偿捐赠给山西省儿童医院药物研究所。

奥地利、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医疗学术团体，多次愿出数十万美元美金，聘请她出国传授技术和为他们的医院服务时，郭新志都一概婉言谢绝了。她说：“我的科研有了成绩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离不开医学界老前辈的栽培，我的事业在中国！”

近年来，国家和省里在拨专款给医院搞科研的同时，还先后奖励了郭新志数万元科研奖金，但她全部捐献给了社会福利事业。从1992年起，她就应该按国家规定收取专家门诊挂号费，仅这一项，一年至少可以收5万多元，可她从未收过一次。

先进的医疗成果，随着各种渠道的不断传播，前来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作为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面对群众的赞扬和政府的表彰，她没有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而想的是如何更快、更多、更有效地救治患者，她给自己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作为一院之长，她懂得爱护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因而她对下属的使用，采取学历与能力同时并举，不拘一格重用人才。郭新志言传身教、一丝不苟，在全院开展了文明行医优质服务活动，所有医务人员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精心为救治患儿服务，受到家长的一致好评。

目前，由郭新志院长等经过20多年艰难潜心研究的“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脑瘫新体系——老年痴呆康复”的科研新课题研究实验已获得成功，并应用于临床，给千百万老年痴呆患者的康复带来了希望。

中央电视台曾拍摄26集系列电视剧《中国母亲》，第16集讲述的就是郭新志的故事，并且要从26位母亲中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郭新志荣获二等奖。

奋斗无休

特殊孩子和老人是一群更需要社会关爱的群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他们享受人生。这是一项永恒而神圣的事业，我为从事这项事业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并将终生不渝，奋斗不息。

——郭新志手记

中国残联公布一项中国儿童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约有0—6岁残疾儿童139.5万名，每年新增0—6岁残疾儿童约19.9万名，其中智力残疾、所占比例最高。发病率在2.7%—5%之间。也就是说每生1,000个孩子，就会有3—5个可能发生脑性瘫痪。调查发现我国6岁以下儿童中约有脑瘫患儿31万名，并且每年还以4.6万的速度递增。

众所周知，老龄化问题在我国日益显现，老年性痴呆发病绝对数与日俱增，老年康复工作任重而道远……

小儿脑瘫是一项世界医学课题，老年人的综合康复工程是我国即将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有着20多年医疗实践、科研工作经验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郭新志感受到：建立小儿脑瘫及老年人综

合康复研究中心，是解决这两大社会难题的根本途径，是提高人类自身素质，造福子孙后代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关注。

然而，我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研医疗机构却有许多难言之苦。以山西省脑瘫康复医院为例，尽管有世界瞩目的科研及医疗成就，有敬业、勤奋、富有责任心的带头人，但由于这项事业少有政府的支持、社会的关注，使其出现了一软一硬的非良性发展，即软性的科研成果令人瞩目，硬性的医院规模设施严重滞后。山西省脑瘫康复医院目前仍靠租来的场所进行高难度的科学研究，并诊治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医院经常因为床位爆满而不得不将患者推迟治疗时间。这一切，不仅深深地刺伤了院外患者的心，而且也更令献身于这一伟大事业的郭新志院长心存遗憾。当郭新志看到经她治疗能恢复记忆并生活自理的老人就激动万分。

太原市小店区的王玉花因脑出血昏倒在工作岗位，在某医院治疗不愈，仍在昏迷状态下家人送其到山西脑瘫康复医院，经郭新志精心医治，王玉花病情逐渐好转，治疗10多天就能唱“洪湖水浪打浪”歌曲，现已生活自理。山西朔州市57岁的郝荷花，患脑梗塞，右侧偏瘫，失语，在半昏迷状态下找到了郭院长，治疗一个月后，郝荷花自己走着出了院，人们看到这情景，都高兴地给老人祝福。太原黄陵土地所潘守信所长，因脑外伤引起脑积水，语言障碍，左侧偏瘫，郭新志为其治疗两个疗程后，潘所长痊愈回到了工作岗位。无数个患儿和脑瘫老人经郭新志的治疗得以康复或减轻病痛，让郭新志感到一次次欣慰。

“我们没有理由让那么多的弱智儿童失去生存的价值；我们应该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有所准备；我们必须为提高人类生存质量予以更多的关注。”郭新志呼吁社会各界，对曾有脑瘫疾患、上学后学习成绩在70分以下的儿童成立特殊学校，实行特殊教育，毕业后送到适合于他们的特殊工厂工作。同时，建设老年人康复保健院，真正提高患儿和老人的康复保健院，真正提高患儿和老人的生活质量。郭新志希望各级政府对这项造福人类健康的事业给予更有力的支持与关注，让更多的残疾儿童和痴呆成年人生存的质量好一些、高一些，使人生存的质量好一些、高一些，使人生的两极即儿童和老人充满希望、充满光明，健康安乐地生

活。“一支蜡烛的光毕竟是有限的，但是无数支蜡烛汇聚一起，就会放射出强烈的光芒！”郭新志希望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心。她说：“献出你我心中的火种，点燃患者头脑的灵光，让这光亮照亮患者的人生，照亮你我的灵魂，照亮人类的未来！”

郭新志以她医学理论的创新性、疗法体系的综合性、治疗效果的突破性、康复效果的持续性、绿色医学的特别性迎来了一个播种的春天。“以人为本、重视人才，勤奋学习、博采众长，规范务实、创新开拓，交流沟通，钻研新技术、造福于人类”是郭新志的发展理念。山西脑瘫康复医院的科研成果已在北京、上海、沈阳、海南等21个省、市和美国、日本、韩国等18个国家推广应用于临床，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该院科研组完成省、部级科研成果6项，在国际、国内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80多篇，其中60多篇获优秀论文奖。先后举办国内、国际不同类型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儿童脑瘫”国际学习班9期，接收国内外人员进修，先后培训中西医综合治疗脑瘫康复技术人员1200余名。学员们在医院各科室虚心学习、认真实践中，对我国传统医学针灸、按摩、头足疗产生了浓厚兴趣，对“脑瘫康复”专家郭新志院长的快速“面针”疗法惊叹不已，对该院系统、科学、新颖、完善的治疗方案更是赞不绝口，一致称之为“the best hospital”。

2003年郭新志被全国妇联推荐到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全班共23名，均来自祖国各地，她的毕业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优秀论文共3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2004年又被宋庆龄基金会推荐到维多利亚大学攻读经济管理学博士研究生。

郭新志以母亲的博大胸怀和爱心，为广大脑瘫患儿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她以女性博大的情怀，为成千上万个脑瘫患儿付出了全部心血；她以医生的天职攻克世界性“顽症”，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并创造了无形的社会价值；她20多年如一日超常工作，淡泊名利不图回报，为的是推动全球残疾人事业和平发展，造福于人类。

无名氏
缺席的在场

在这里，我们留下一个尚待填补的名姓，一个充满呼唤与期待的位置，给千千万万平凡而卓越的中国女性，给万万千千种创造性的和平实践。“她”，在乡村，在城市，在边陲，在中心，在草屋陋室，在聚光灯下，操持一餐一饭，介入历史时刻，穿行平凡岁月，置身危机关头；“她”，可以是你，是我，是她，是你们、我们、她们；是逝者或生者，是前行者或后继人，是中国妇女中的一个，是人类八分之一中的一员。

请在这里写下一个、许多个名字：你自己的名字，你记忆着的名字，你的母亲、祖母、姊妹和女儿，你的同伴，你的榜样。

目光交汇，心手相连，让我们汇聚在这里，为无名者命名，为我们自己命名。

编者

王华连
『百合』
的路子



文：薛翠

王华连精辟地说，共同劳动慢慢孕育了集体的感情：“我们种植、加工百合，除了多一点收入，更重要的是，劳动与互助的形式让大伙有了一种集体感。”

储金会成立12年，除了改善妇女及其家庭经济生活外，更开拓了妇女个人及群体的新空间。

2004年，王华连和李慧娥代表江西省“路下湾里妇女互助储金会”（以下简称储金会），到河北省定州市翟家村参加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举办的农民培训班。爽直的王华连说：“当官的，或者专家学者，一般高高在上，看不起农民。可是，我觉得温铁军老师很理解农民，说话发自内心，态度真诚，我最记得他说过：‘不合作在一起，就永远没有路子。’”

温铁军常常举“三条驴腿”的故事说明“集体生产，共享资源”的好处。1952年合作化运动时期，河北省遵化县西铺大队的23户老贫农联合起来，办起初级合作社。他们在农闲上山砍柴，

换来简单的农具，另外拥有一头驴的三条驴腿所有权（另一条腿归没加入合作社的中农所有），因此被称为“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第二年，“穷棒子社”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从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1955年，毛泽东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表扬“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的合作精神，写道：“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可是，自从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奉行商品经济，崇尚个人主义，“向钱看、个人致富”逐渐成为不用质疑的“常理”。1994年成立的路下湾里妇女互助储金会却逆流而上，深信扎根农村、团结妇女、集体发展既是当前的、也是未来的“路子”。

王华连，1968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万载县白水乡，家有6兄弟姐妹，排行第二，从小与大姐挑起家务重担。华连初中毕业后，做过裁缝，从1994年便担任储金会会计，连任5届。王华连觉得成为储金会委员是一生的转折点：“要不是搞了妇女储金会，我想自己只会在街上缝衣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既忙碌又充实。”当地大部分妇女都不识字或者只有小学程度，她们认为王华连初中毕业，有“文化”，而且，为人正直、敢作敢为。和王华连同年入选又同样连任5届的还有许国兰主席，许主席是优秀的共产党员，精明能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便积极参与合作社与妇女活动，是村内德高望重的妇女代表。储金会既有像许主席那样具有搞合作社的经验，又有像王华连充满活力的年轻人，10年以来扎根农村，以“百合”为名开展一连串集体经济、教育和文化的活动。

缘起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举行，之前几年讨论妇女的问题异常热烈。当时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民间组织，简称CSD）刚成立不久，与江西省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省妇联）商谈合作项目，希望推行妇女文化教育、经济互助发展等计划，鼓励妇女建立经济独立能力，增加在社会发展的机会和自信。

1993年，CSD与省妇联开始到农村去选点。CSD参考菲律宾/日本民间香蕉贸易的做法，尝试重整城乡不平等的关系，因此选点的原则大致是贫困村、当地妇女比较主动积极，有特产等。经过多次的考察与讨论，结果选了盛产龙牙百合的万载县白水乡为试点。CSD希望组织的规模较小，让每个人都能够直接参与，经过几番讨论后，最后选择永新村2个村民小组：路下和湾里。永新村地处山区，人均年收入约500元人民币。路下和湾里相邻，旁有一条白水河，房子排列有序而集中。两组人口共约300人，16岁以上的妇女约100人，其中有些妇女骨干做过基层组织，可靠又能干。

“妇女储金会？啥东西？由女人来做，行吗？又搞集体，葫芦里卖啥药？”在不少男村民狐疑、猜测的气氛下，CSD和省县乡妇联多费唇舌，向乡政府和村民解释和宣传。1994年5月，在祠堂里，2个村民小组的妇女分为3组，讨论储金会要做什么，管理委员会应如何运作，对委员有什么要求。一般会员都要求委员有服务精神、廉洁、有文化程度等。接着，每个小组提名人选，然后全体会员进行不记名投票，选出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会计、出纳、保管5职务，每两年一届。全国第一个妇女储金会——“路下湾里妇女互助储金会”便成立了。

储金会自行订立规章制度，根据其会章，凡16岁以上的妇女，认同储金会的宗旨：“集体参与、互助互爱、独立自主”，均可入会，会费每人每年1元人民币（现在加至2元）。储金会规定每周五为委员会学习日，开会讨论会务，每次都有会议记录。周六则为委员会、组长学习日，周日为会员学习日。还有，储金会规定账目每月结算一次，年终在会员大会上公布，并张贴账目清单，一目了然。CSD每年与储金会商讨合作项目，但对于储金会会务如行政、财政等，只给予意见，并不干预，全由储金会独立处理和运作。

“百”人的“合”作

据《本草纲目》记载，百合性味甘平，无毒，又治百病，润肺治咳。龙牙百合乃江西名贵特产，自宋朝开始，就成为万载县的朝廷贡品。白水乡种植百合已有500年历史，乃著名龙牙百合

之故乡。白水乡除了适合百合成长，又以加工技术如干晒、摇粉等著名。当地农民种植水稻，百合则是主要的经济农作物。种植龙牙百合甚具难度，其生长条件特殊，同一块土地不可连年种植，而是轮流耕作，一般5年轮一回，另外，本地百合不适宜留种子，最好采用外地百合种子。还有，天气太热，雨水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百合收成。当地农民一般不吃百合，都将百合卖给人村收购的广东商人或者乡镇企业之食品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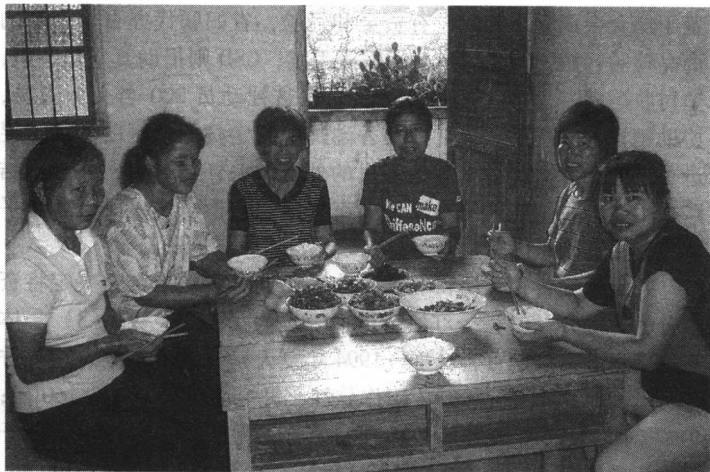
储金会成立后的第一个经济互助发展项目，就是组织会员，收购传统种植的龙牙百合，清洗包装后，运至香港，由CSD姐妹组织“绿色扶贫社”（以下简称扶贫社）集结义工，义卖销售。鉴于储金会成立之初，没有资金和经验，省妇联代办百合产品的商品检验、植物检验、出口运输等手续，CSD则捐助真空包装机，垫付收购费、工资、运输费等，而扶贫社动员200名义务人员，协助销售百合产品。扶贫社在香港销售特定贫困地区的产品，促进香港消费者对产品来源地人民的处境的关怀和认识，并且集结购买力，为贫困地区的产品开拓市场空间，让当地人民借着公平贸易，而非别人的捐赠施与，去累积自力发展的资源。

几年来销售百合所得利润，均返回储金会。储金会决定将资金分为3部分：（1）分红给会员；（2）妇女教育经费；（3）集体互助项目。第1期百合计划（1994年夏天），4吨新鲜百合运到香港义卖，共得4万元，30%用作分红，每1位会员分红约160元；40%，即1万6千元作为集体项目资金；另外30%，即1万2千元作为教育基金。第2期（1995年）百合计划，新鲜百合以外，加上百合干片和百合粉，这次储金会负责生产和运输费用，销售利润共5万元，30%为分红，50%为集体资金，20%为教育基金。

1999年，储金会不再收购会员种植的百合，改为由储金会租借4亩地种植百合，集体耕作，并且完全不用农药、化肥，不管收成、销售如何，CSD先垫付基本的费用，像种子、工具、水电、工资等。储金会则动员每个会员捐出3担肥沃的大粪。百合是当地珍贵的经济农作物，为了确保不会被人偷走，在下种时期（11月）和挖百合时期（6月底到7月中），全体分4个小组，由4个组长带领，每晚轮流躺在竹床，看守百合田，晚九早五，夜夜被蚊子叮也苦撑下去。一包包的百合产品，满载了她们共同劳动的

痕迹：下种、除草、施肥、看守、挖掘、清洗、煮熟、晒干、摇粉、过滤、刮粉、包装。王华连精辟地说，共同劳动慢慢孕育了集体的感情：“我们种植、加工百合，除了多一点收入，更重要的是，劳动与互助的形式让大伙有了一种集体感。”

储金会利用百合义卖的滚动基金，自行开展一系列小区和妇女发展项目，例如建造一座3层红砖楼房成为储金会场所，聘请老师开办儿童学前班、妇女文化扫盲班，邀请基层医疗人员给妇女讲健康教育，协办妇科检查项目，负责宣传联络，搞早餐资助计划改善儿童的营养；又铺设管道引入清洁水源，购置碾米机、粉碎机 and 打浆机，承包10亩山坡种植果树等。



储金会刚成立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场所，办活动例如开会员大会、学前班，都要借用祠堂，十分不方便。祠堂属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储金会每次借用都要交租金。祠堂经年失修，破旧不堪，学前班的所谓教室，只是用布围起来，再加几张陈旧的桌椅而已。每次储金会开会员大会，周边的男人都跑过来看热闹，插嘴议论，例如，有些会员的丈夫认为妇女成不了大事，倡议由他们几个男人搞红萝卜加工，由种植到包装一一统揽，所谓生产一条龙。后来，储金会会员通过建房子的决议，动用5年来种百合赚得的集体基金6万多元。在筹备建房的过程中，像预算财政、选择地点、协调意见、与乡政府和村民小组讨价还价、请师傅测

量土地、设计场所的图则、购买及搬运材料、调配会员义务劳动等，不论委员或会员都积极参与、亲力亲为。

1999年，储金会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凭着集体力量，建立自己的场所，确立在村里的地位。现在场所面积达400多平方米，地下摆放打米机、打糠机等机器，还有图书室、厨房，外旁另建厕所。二楼有3间房子，学前班、妇女文化教育班以及计划生育服务所。第三层是储金会会务室和会议室。天台则用作晒百合片和百合粉。

储金会除了搞小区经济计划，推动文化教育，还有协办医疗项目。1995-1996年，储金会、CSD、万载县妇幼保健所（以下简称保健所）曾经合作医疗项目，为储金会会员做妇科检查、治疗以及跟进复查，当时储金会场所还未建成，只好借用乡卫生院。2000年元月，储金会、CSD、保健所再度合作，为会员及其子女做健康检查，储金会借出场所用作检查，保健所则提供医疗设备及车辆，派出2位妇科医生、1位儿科医生及1位化验师入村为村民义诊。检查结果显示，八成妇女月经不调、贫血，严重的有宫颈炎、生瘤；儿童则普遍有沙眼与肠胃病。药费由储金会与CSD共同承担。后来，三方共同合办两年的农村医疗项目，范围则扩大，为整个白水乡12条村的妇女与儿童做免费检查。

隐忧、忍耐、对策

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底下，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辛，粮食不值钱，仅有的劳动力也以贱价卖出，不论是在城市当民工或者留在农村小工厂做临时工。10年以来，很多年轻的会员涌到沿海地区像深圳、广州、东莞打工，有些就算结了婚，也一样出去打工。有一位会员，曾经做过委员，之后一直在东莞打工，过年过节或者家里出事才回乡。有些年轻妇女刚嫁过来不久，也城乡两边跑。现在，留在村里的多是中年妇女、老人和小孩子。当地很多乡镇企业都倒闭，唯一私人承包的花炮厂却吸纳年老或中年的农村妇女做计件工，委员许冬秀告诉我：“以1天8小时计算，1天做1,000条烟花棒子，就有6.5元，或者做小炮竹10,000支，就有11元。插引线的话，2角一窝巢，1天能有8元，另外做包装，价钱最低，一札只有6厘。如果你天天做，手脚勤快，1个月就能

赚200多元，那已经很好了。”这些炮竹、烟花内销或者外销都有，农村小工厂可说是世界生产线的起端，也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全球化渗透或蚕食偏远地区的经济体系，在此得到印证。

出去打工或者到花炮厂做计件工都是村里妇女主流的选择，但王华连却不选择走这样的路，因为她另有一套人生价值观。她指出花炮厂的工作，长远来说很危险：“我们很多妇女都跑到花炮厂工作，赚点现钱，应付日常生活开支。但是，我认为这不卫生，不安全，对身体不好，因为做花炮用的胶水有毒，长期接触等于慢性中毒。”

早几年前，王华连好想去打工，内心几番挣扎之后，最终打消念头，留在家乡，靠开一家小饲料店赚点生活费，另外继续参加储金会，丈夫和孩子都纷纷支持。王华连说心里对家庭和储金会放不下：“我本来想出去打工，赚点现钱给孩子交学费、看病或者买生活日用品，可是最后放弃了，因为丈夫不想我走，当时小孩又那么小，需要人照顾，还有，我对储金会有些牵挂，我参加储金会才开始学习记账，到现在已经11年，积累了经验，不是我吹牛，一旦我走了，暂时还没有人能够接班，我也是练了好几年才懂得怎么管好账目呢！”

回顾过去十几年，王华连评价储金会有两个项目做得很好，改善民生，一是购买打米机和打糠机，既减轻农民的劳役，加工费又相对便宜，很受会员欢迎；二是学前班，老师悉心教导，学费便宜，地点邻近，会员都争相送孩子来学习。打米机和打糠机是储金会的共有生产工具，得来确实不容易。储金会成立初期，会员为集体基金的分配争论不休，大部分人说要买打米机和粉碎机，但有一部分人说要买煤球机，然后由几户承包做煤球加工，双方争持不下，竟然有会员企图把集体基金瓜分。后来，在会议上、私底下，储金会、CSD、省妇联、县妇联经过激烈的辩论，又吵架、又流泪，终于通过购买打米机和打糠机，原因是大家都认为全体会员应该分享共有的生产工具。

此后过了几年，又有会员提出搞煤球加工厂，既提供就业机会，又赚钱致富，说煤球是当地的基本能源，家家户户都采用，而附近一带只有两个煤球小加工坊，如果投资设厂，扩大生产，使其企业化，保证有市场又有钱赚。可是，煤球加工污染环境，

而且所谓设厂、搞大量生产、企业化，实非长远之计，但无可否认，煤球一事说明了：村民对经济实惠的能源十分殷切，另外，就是在种田不值钱、乡镇企业不景气、事事讲现金的情况下，农民自然渴望打工赚钱，补贴家用。相反，有些会员到过文义村一家用沼气的用户，又参观过赣州“猪、沼、果”的示范户，很想搞沼气池试试看。虽然沼气既环保又省资源，可惜造一个沼气池动辄要三四千元，农民哪来那么多钱呢？

储金会成立12年，除了改善妇女及其家庭经济生活外，更开拓了妇女个人及群体的新空间。储金会成员经常串门，商议怎样铺水泥地面，拉电到村内启动打米机、粉碎机，怎样用集体资金、分配集体的劳动、计算工资分红，怎样安排师傅教会员做馒头，筹划值班表，出去市镇购买各种各样器具、材料，联络邻村宣传妇科检查，处理不同意见以至不满等，在这样互动而复杂的过程中，彼此的关系密切了，眼界也开阔了。正如王华连观察到邻里的关系得到改善：“以前我们各顾各的，很少串门，储金会搞了活动，会员互相往来，互相了解，关系比以前密切多了。大家一起工作，一起玩，像包装百合、上扫盲班、唱歌、聊天，都很快乐，感觉很有劲儿！”

王华连参加储金会十多年，学会忍耐、包容，凡事以大局、集体的利益为重，“有些会员心胸比较狭隘，怕吃亏，老是批评委员不公平，我当时很生气，又觉得受委屈，不是跟会员争论，就是哭。现在，如果发生争执，我会先等会员气消了，然后心平气和地讲解，这样才能把矛盾缓和下来。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懂得忍耐，我以前非常冲动，容易出乱子。你不忍耐，就无法做下去了，要知道，单独一个人做是不行的，只有集体去做，才能够把事做成。”

王华连在储金会多年的努力，获得社会的认同，1996-1999年，王华连担任白水乡人民大会代表；1998-2002年，担任万载县人民大会代表；2000-2005年，担任宜春市妇女代表；从2004年开始，担任永新村妇女主任。王华连曾经在会议上直言农民的负担太重，税收繁多；投诉晚上听不见青蛙哇哇叫，因为很多青蛙都被活捉卖给城市，造成蚊子、害虫多不胜数，为害农作物；又要求修补残破不堪的、摇摇欲坠的桥，让老百姓安心过桥等。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亚洲地区人民相继响应抗争，交流彼此经验委实重要。1995年、1996年，王华连和其他几位储金会委员应邀到印度、尼泊尔、菲律宾、香港等地访问，与当地的农民和组织者交流经验。例如，王华连访问位于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喀拉拉邦人民科学运动（KSSP）倡导把科学知识切合平民的生活需要，研究省柴炉、太阳能、有机耕作、堆肥等，还有推动人民计划，鼓励人民积极参与分配公共资源的决策过程。

展望

十多年以来，路下湾里妇女储金会扎根农村，为长远的乡村建设默默作出贡献。储金会既依存原来农村千丝万缕之权力/利益之罗网，但又尝试透过扎根农村生活的集体项目，扭转原来的权力关系和思想习惯，在依存/扭转的纠缠中、在生活实践中慢慢游离原来既定的轨迹。

正如许国兰主席阐扬储金会共同的目标：“通过储金会改变农村妇女的精神面貌，为社会多做一点好事，这是我们全体会员都要做的。”为纪念储金会成立10周年，许国兰特意编一首歌曲，歌词寄意“集体斗争”的精神：

一条清河水

一座虎头山

会员在山下边比争

九年、十年比争，比争，比争斗……

而王华连不忘承前启后的责任，对未来甚是殷切期待：“会员非常信任我，几次选举，都选上我，我不能让她们失望，也不能放弃这份责任。我希望未来更有能力的年轻人加入储金会！”

资源再用 社区共融



文：蔡毓毓

在没有战争的香港社会里，暴力依然存在，歧视、压制随处可见，社会种种人为分隔有碍社区关系长期和谐发展。

香港经济转型底下女工经历……所有人在短时间内不需要你，其实是一种无形的暴力，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暴力。

深水埗，香港最贫穷的社区之一。这里到处是香港社会下层生活的写照，40年以上的旧楼，卖廉价货的店铺，年纪偏大、衣着朴素的行人，甚至是交融在空气中的嘈杂声、陈旧味。邻里、街坊、工友或小老板组成了这里大多数人日常的生活网络。区内35万人口中接近3成住户属贫穷户，收入不及全港住户月收入中位数的一半。

在深水埗及其相邻的长沙湾传统老社区，小黑、阿孔、秀群等一群40岁以上的妇女组成了女工合作社，管理着她们的社区二

手店和互惠市场。这群主要来自制衣行业的女工和家庭主妇的合作社成员，一起经历了13个春夏秋冬，共同见证着自身、女工群体以至香港社会多年来的发展变化。

时势造英雌

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工业北移中国大陆，社会出现经济转型，工业萎缩。以往风光的香港制衣女工开始面对开工不足的问题，为了自保，她们开始调动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新的技能，为转业做准备。这促使一些女工们开始走进劳工组织。女工合作社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香港劳资关系协进会（劳协）推动产生的。

合作社成立初期以“蓝钻互助社”为名，一方面重点关注蓝领背景女工的转业问题，另一方面借肯定女工的过去来激发大家重视共同的未来，成立之时，成员共有14人。

1993年蓝钻工友成立中文打字社，以一位全职成员为主，承接中文打字的工作，1995年末，10名女工以中文打字排版工作室为名，重组打字工作。女工们要凝聚在工作室内，建立一个事业，当中有不少非常实际的问题要面对。工作室从一开始发给成员的工资每月至少近万元，这样的一盘生意如何开拓与维持，如何满足顾客的要求，如何使生产更有效率，如何管理和如何分配利益等，花去了大家不少时间和精力。除了学习技术、生产和关心业务发展，女工们还不时检讨成员之间的各种关系；也会一起讨论转业工人的社会处境，思考改善的途径。

1997年中，工作室在乐施会的资助下，投入更多资源在培训和组织工作上。随着业务和组织发展的深化，成员在各种互动之中面对了大家的相同和分歧。1998年，多位成员因各种原因离开，经过了重重考验之后仍然留下来的成员，拥有更稳固的参与基础，也对女工这个身份有较强的认同，为了表达女工组织起来的目标和性质，工作室改名为女工合作社，共有8位成员。合作社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期间不同的时段也有新人陆续加入，有人离开。

她们和她：小黑

小黑，本名不叫小黑，合作社的核心人物，45岁。1974年，

当年的她读完小学就出来做事，那时是制衣，加班钱多又可以吃夜宵，所以满心欢喜，工作一直很稳定。到20世纪80年代末，就业危机开始出现，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都开工不足，吊了几年盐水^①，要靠兼职来帮补赚不够的钱。

小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以制衣女工的身份参与劳协各种活动，到了1993年，她又与一群转型女工一起，学计算机，学中文打字，到劳协鼓励她们接外间的打字工作来做，把大家凝聚一起，开始了合作社的路。其间小黑有时是成员，有时是职员，也曾经离开过另找工作维持收入，之后又回来留下至今。

合作社当初的计划是希望从打字发展到排版，通过逐步提高成员的技术水平，逐渐扩大市场，增加生意额。但是，有的成员掌握科技快，有的成员慢，技术高低形成了小圈子，互相比较，却交流不足，为了赶货、质量问题，她们由感情深厚，到不断吵架，整体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你为什么要求我这么高？”小黑质疑，过分以追求高技术来达到提高生产额目标的做法，在她看来，在合作社成员之间到底在促进什么？

小黑人瘦削，做起事来浑身带劲，说话时一脸坚定：“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和学习过程中，合作社是一个新的阶段，它让我们知道，不是父母说的那种，她们长大了，会赚钱，接着就结婚生子那样，有些部分并没有依着父母说的走，有些空间，比我想象中，譬如工作、集体，开阔了，机会也大了，少了个人的无力感。”现在在合作社的各种事情上，她说自己不擅长整理和包装二手物品，却可以负责搬搬抬抬、讲话、社区表演、唱歌跳舞。

问卷调查看社会

当历史悄悄展开新一页的时候，往往不为人所知，甚至连当事人也难以预料其后果。

1999年中至2001年初，女工合作社承接了香港城市大学的大型贫穷家庭问卷调查计划，其中不乏经济的考虑，因为这份调查

^① “吊盐水”，本指医生注射盐液，补充病者的水分，延续他的生命，但不是疾病的解药。这里以“吊盐水”比喻开工日少，不够维持基本生活开支。

直接养起了合作社4个全职女工，期间成员锻炼了自己的调查工作能力，接触了大量贫困的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一做超过一年，1万份问卷，3,000份成功问卷结果为她们带来了什么收获？

透过问卷，合作社女工看到社会上劳工被边缘化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清楚看到整个社会基层的困境，本地的、外来的、男的、女的，大部分劳工都难以幸免，当然也包括了她们自己，因为所有合作社女工都来自基层，深切明白被边缘化的处境和结果。她们做完问卷带回合作社的，不只是自我维生的部分，在访问过程中给有需要的受访家庭提供社会援助等信息，访问回来一起讨论，还把自己的意见集合起来，向政府反映。

透过这项工作，合作社女工开始一步步跨出去，把合作社的问题和社会变化结合起来，她们也开始明白，帮别人也是在帮自己，合作社不能只顾做自己的事情，合作社运动是整体劳工以至基层进步运动的一部分，不同的努力和奋斗需要凝聚，才能改变现状。

她们和她：阿孔

阿孔带眼镜，细腻白皙，外表看来没有劳工那种粗糙，不过48岁人的经历一样随着社会变化起起落落。年轻时的阿孔也在制衣工厂工作，到结婚时，香港制造业还很光辉，阿孔有了小孩后才辞去工作。

阿孔结婚后住长沙湾的公共屋村，就刚好在劳协的楼上，本来安逸的家庭主妇和劳工组织老死不相往来，当时阿孔和很多香港家庭主妇一样，经济上有丈夫支撑，自己在家相夫教子，感觉良好，至后来在劳协听说工厂北移，也还不知情况严重。1992年、1993年的时候，阿孔小孩长大上学了，她到劳协做清洁工，开始接触女工合作社。做了几年清洁，加入合作社，在合作社当打字员的时候，她自言并不投入，一直要到做问卷调查时才来劲了，因为调查中所看到的基层生活状况刺激了她。而早年北移大陆做玩具工作的丈夫近年退回香港后，一直找不到工作，更令她的感受愈来愈清晰。

“这样的（低）收入去养一家几口，看到的事情，让我慢慢

开窍，之前对社会事务是很迷糊的，不知道原来外面的环境如此恶劣。”在劳协做清洁时，阿孔的子女还小，丈夫工作稳定，家庭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做问卷调查时才知道，很多家庭，“有些住板间房，有些有病，求助无门，连很小的事，都掌握不了，也不懂。”

“我们去拍门，很多家庭都会跟我们谈，很容易入手，我们一介绍自己的身份，一和他们接触，他们都会很放开去讲自己，……或不知如何获得支持，我们知道的，就会告诉他们，或介绍到什么部门。有些不敢对外讲（拿综援^①），也会讲给我们听。我觉得在过程中，除了向他们提供数据，我们还拿了他们的数据，就会一起分享社会上的问题。我觉得不只是合作社的妇女需要这些发展支持。”

合作社女工的视野在扩大，力量在积蓄。

英雄造时势

20世纪90年代开始，地产资本借着香港政府的新市镇城市规划政策及市区重建政策，进入像深水埗、油麻地、长沙湾这些旧区土地建造楼房，大大改变了旧区的空间，原来旧区的经济活动也随之变迁。而在政府大力整顿市容去体现全球大都会的发展的同时，超级市场、连锁店等大型零售企业也一步步侵蚀这些旧区原有的经济，大资本的垄断发展亦打击了不同类型散工或小贩等的生存方式，破坏了街坊熟客对小商贩的支持，居民过去在原区建立多年的生活及工作网络也被瓦解，不仅低下层的生活日益失去保障，整个地区的生活空间也不断受到打压而变得越来越小。在香港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下，一个人没有就业，就失去了经济活动，也意味着失去日常聚集的工作间，网络逐渐瓦解，大大弱化透过集体解决个别成员问题的能力。

女工合作社所在的长沙湾原本是个工业区，和几个旧区相连，一天天看着社区弱化，更甚的是，来自资本、政府互相结合在一起时所隐含的暴力，让女工合作社无法回避、难以视若无睹，不

^① 综援，即香港社会福利署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为经济上无法自给人士提供安全网，使他们可以应付生活的基本需要。

过，出路在哪里？

世纪交替之际，香港经济不断滑落，社会问题交错丛生，边缘劳工的去向引起各方的关注。在垄断式经济发展引起各种剥削问题的现况下，社区经济被视为劳工重建自主经济、和谐社区的一个重要出路。女工合作社有了合作社的经验，结合问卷调查的冲击，她们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将劳工结合社会资本，参与社区经济，投身这场和自己息息相关的边缘劳工运动大潮中。

踏入千禧年，女工合作社和劳协在长沙湾社区进行了一连串的二手物嘉年华活动，这个嘉年华活动和一般的慈善义卖不同的是，它植根于女工们对自身社区的理解和投身。合作社女工透过参与问卷调查，了解到地区上有很多基层街坊、新移民、老人及失业者，他们无法受惠于综援，即使有的人需要综援，也因为社会丑化综援者而备受压力，所有这些人的经济以至其他生活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小黑很感激香港城市大学的讲师做的那个问卷调查，一方面给了她们一段期间稳定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让她们明白社区里面的人和自己的关系。另一方面，小黑说：“原来很多街坊有的东西会丢掉，因为多出来呀，屋子又小，经济好的那时，哗，买买买好像储仓般，然后又有人送，多余的不可以变成现金再用，这样地方不够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东西丢掉。”



二手物嘉年华活动的尝试在地区上换来相当不错的成绩和口碑。其时香港社会已掀起了社区经济实验之风，一些基层社区如湾仔、屯门等在不同机构、各大学讲师的推动下，都开展起各种形式的经济实体，如时分券^①、合作社等，以响应香港边缘劳工问题。2002年女工合作社配合劳协在深水埗青山道创设了社区二手店，鼓励市民捐赠弃用旧物，整理后以低价卖给有需要者，实践惜物环保、资源共享的理念，这个做法，得到了区内区外的支持，有的人买，有的人捐，有的人当义工修理二手物，一时间红红火火。

青山道的二手店很快就显得过小，没有仓储的地方，可以展销的空间亦非常不足。后来合作社在深水埗元洲街一家工厂大厦的二楼租下了现址，面积比之前的大了几倍，小半用来做仓储。因为成本高，二手店不像其他商店在店外挂上大字霓虹招牌，只是在工厂大厦的门口立了个小小的指示架，沿着旁边的楼梯走上二楼，走过长长的走廊，才来到二手店，门口是各种二手物推介，墙上贴着二手物捐赠者卖出金额资料。走进二手店，天上地下，几行金属架陈列得满满的，小配饰、玩具、衣物、家用电器，连家私也有。另一边是更满的仓储，堆放着待整理的二手物。

就像是新生小孩一旦有了力量走第一步，便无法停止下来一样，合作社女工走向社区的步伐迈开了就没有停下来，寻求更广泛的基层互助与团结的心更为迫切。历史曾使她们走在一起，经过多年的孕育，现在有如水到渠成，合作社的女工反过来带动着香港社会的社区经济向前发展，创造着历史。

2003年底，结合二手店的成功经验，合作社女工拿出七八年来合作社成员和支持者共同积蓄与及友好同志慷慨借贷的几十万元，在二手店附近开设互惠市场，以低价为区内街坊提供日常生活食品及用品，目标是推动社区成员“自主消费、共同购买”。至2005年，社员已逾1万人。互惠市场现在仍在亏损中，能支撑多久也说不定，但胜在发展出了开拓本土社区经济的信心。女工

^① 时分券是香港圣雅各布福群会“社区经济互助计划”的其中一个项目，参与成员利用时分券交换技能，互相帮助，各取所需。成员可提供服务或购买物品赚取时分券，亦可以时分券兑换物品和服务。

合作社共3名全职，四名兼职负责店务，她们参与管理，并协助组织劳协“生活消费合作社”的社员，重建较为理想的生产和消费关系，重建对劳工基层女性身份的认同。

她们和她：秀群

秀群人如其名，个子小小，秀气带点羞涩，和大家配合无间，是合作社新成员。秀群结婚前做文职，已很多年没有工作，当初因为家里小孩在劳协学计算机，自己也到劳协学计算机，加上自己的小孩和阿孔的小孩同校同年级，就认识了女工合作社。后来当劳协搞起一连串的二手物运动时，她被拉去当义工，到二手店开张时，她加入了女工合作社，为合作社注入新血。

二手店的店务对秀群来说充满了新鲜感，原来二手物也有人用，她觉得整件事情很有意思。不止如此，“现在做久了，我走在街上，这里很多街坊会和我打招呼，才知道原来真的这么多人家庭环境真的不太好，到这里买东西可以帮他们减轻经济负担。”

“以前躲在家里，不太了解外面的环境，现在不同了，也会参与一下社会，整个人就丰富、见识多了。”二手店扎根在贫困的深水埗社区，有许多生活经验丰富的义工协助修理二手物，秀群也在义工身上学到生活上的东西，原来二手物可以这样用！

作为合作社的一分子，秀群少不了跟着大家去游行、参加讲座、看女工表演，好像让人看到当初每一个女工加入合作社时的模样。

合作社让人迈出第一步，然后从参与中获得能量。

困难与动力

女工合作社在这13年间，也少不了外界的支持者，除了一些个人外，一些资助机构如乐施会便资助过她们。寻求基金会资助，是民间组织长年生存方法之一。但是合作社女工清楚明白，资助不长远，因为不是想要就有，而且如果心态上觉得要靠资助才能生存，便很难鼓起勇气开拓自己的路。

现在，合作社虽然也获得一些资助，但互惠市场和二手店全由合作社自己交铺租，发薪水，加上水电杂费，经济负担可谓不小。三四年时间下来，目前是二手店赚钱，补贴着还在亏损的互惠市场，为了继续这个集体事业，一直以来女工一起减薪的情况

没有少过。

小黑、阿孔都表示人力严重缺乏，工作量大，虽然有义工，基本上工作还是完全压在合作社的成员和职员身上，特别是全职职员。这些困难在遇上女工外出参加社会活动时，更加凸显，比如小黑为了社区表演及排演，要被迫放下店务，其他人便更忙了，这在各人之间都产生了压力。合作社各成员虽情如姐妹，但是她们不讳言，一起合作有一定的难度，要合作，欣赏、容忍是一定的，有眼泪，也有脸红的时候。

开店做生意，除了内部的种种合作问题，面对社区里的一些反应，也难免令女工们气结不已，像有的人不知二手店和互惠市场是自负盈亏，以为这样的非谋利组织一定有外界大笔钱的资助，质问女工为什么把不用钱收回来的东西卖得那么贵。有些人即使是支持合作社的社员，看完二手店的货品后，胡乱摆放，令女工的工作量百上加斤，其纯粹消费的心态更伤了女工们的心。女工们希望大家能对这样的二手店放点感情，多点配合。

女工们都坦言，以一份工作来说，打理二手店及互惠市场比在外面打工还辛苦，但她们的不只是为了一份自我满足，而是参与了合作社，认识面宽了。阿孔说，动力来自越做越学懂得越多。二手物店对女工来说是以前完全不懂的事，现在累积了经验，可以传给拍档、社员，有时客人来买东西有什么不知道，她们可以告诉人家，这样便增加了自己的信心。

小黑指出，“把合作社的精神放在地区上，给予低收入家庭一点经济支持，他们得益时我们也得益，我们能就业，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在地区内需要我们的货品，如果他们不需要我们的货品，我们也很难做这些工作，所以彼此有着互相联系的关系。”

合作社与社区

显然，这群女工现在的发展路线已不单单是聚焦在合作社的内在力量，而是面向整个社区，以卷入更多社区里的居民，建立互动互助的社区关系。

对这群妇女来说，二手物有些很新奇，有些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接触，至于和居民交往做日常买卖，也正是在女工的能力掌握范围内，处理起来和呼吸一样自然，她们融入社区，发挥本能贡

献社区，过往作为弱势群体的被动状态因此得以扭转，这一转变无疑是女工合作社发展的分水岭。

从合作社自助到在社区助人，被社区需要，能够响应社区需要，肯定了自己，女工身上流露着无尽的喜悦和自信自豪。小黑对此转变细细道来，“以前我们接生意多是跟学院联系，很少会是街坊，一般街坊不会需要打字，现在的接触面完全不同，这里卖东西的对象是街坊，捐物品的是中产，日常来买物品的，一般来讲不是很多钱，他们要精打细算，譬如自己收入不多，老公没有稳定工作，又要帮子女买教科书，而我们有一定的知名度，中产觉得某物品在家是多余的，与其送到堆填区，不如捐给我们，我觉得我们做到这个接驳关系。而接触街坊和我们本身搞合作社原意也很有关系，也是和打字最不同之处。并且跳越出来，当我们考虑一个基层地区里面，老人问题、失业问题，又或是综援家庭问题，这几样在这里都有所接触，有时在买卖过程中，知道原来是领综援的，感觉上就很想帮他们，接着就会再了解有什么需要我们再提供，当然我们不是提供所有的社工服务，我们会让他们知道，我们会提供日常需要的东西，或他们还需要些什么。”

“社区经济这个概念，其实不只是在社区里自己做自己的事……我们用劳动换到经济收入、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社区发展多些，令我们的社员和我们本身的资源，还有一些中产的资源流入社区，希望这些资源能和社区、社员分享。”

扎根在深水埗，面向基层街坊，团结有志人士。从2004年开始，劳协“生活消费合作社区”社区经济计划的全面铺开，同年发行社区货币——社区生活券，社区成员凭券可向“生活消费合作社区”成员及伙伴，包括二手店和互惠市场，换取公平协议的劳务和物资。作为“生活消费合作社区”的组成部分，女工合作社配合劳协积极把住得较近的社员整合在一起，发展共同购买的班组，令社区居民能走在一起，进一步探索劳动与消费的问题，建立另类社区关系的可能性。

暴力·和平·和谐社区

13年不是一段短的日子，合作社女工在资源短缺、社会歧视中挣扎走过，她们改变了自己，而且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她们

借此发展出自己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也正在改变社会，推动社区走向互助、和谐。

在香港社会的背景下，要理解和平的多重意义并不容易，对女工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被提名千禧诺贝尔和平妇女竞选，“原先我并不察觉我们做这样的工作，是和平的，在这里和社员、街坊接触，买卖交易都会擦出火花……说真的，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这样的劳动，都可以称为和平。”阿孔说。

但是，虽然没有硝烟四起，炮声隆隆，和平并不一定存在。说穿了并不难明白，推动社区和谐、共融、互助的工作也就是对和平的追求。阿孔因而认为，公平的资源分配，是一种和平；合作社里及其网络不那么冷漠，也是一种和平。

反过来说，在没有战争的香港社会里，暴力依然存在，歧视、压制随处可见，社会种种人为分隔有碍社区关系长期和谐发展。近年，香港政府对待领取综援者和争取居港权人士的做法，引来了社会分化，女工也对其中的危机有所意识。这个集体也曾火热地讨论过，从反感到接纳，直到最后的支持。

小黑认为，“我觉得讲到新移民问题，我们起初都认为他们来抢饭碗，但我们觉得就算他们来抢饭碗，香港已经北移了好多工种，我们失业，是因为他们来，还是资本家不断耗掉香港工人的青春，跟着去第三国家，如中国呢？”

阿孔的丈夫本身在大陆做事，她说香港人也北上，拿大陆的资源，将心比心，有自己家庭的她支持争取居港权人士来港团圆。

她们和她：阿念

阿念是劳协的负责人，12年来推动女工合作社发展，她是组织者，也是女工合作社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和女工经历了每一个重要发展时刻，她提名了女工合作社参加千禧诺贝尔和平妇女竞选。

说到女工合作社面对的暴力，她认为表面的，深层的都有：

“组织者与被组织者之间，可能来自两个不同的社会位置或阶层，如果无法打破，这里面都有一种暴力。”

“香港经济转型底下女工的经历……所有人在短时间里不需要你，其实是一种无形的暴力，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暴力。”

“其中一种暴力，就是分隔，社会的分隔……”阿念多年来带动合作社女工参与社会行动，强调过程中重视团队合作、重视平等互助、重视共同参与和决策。前几年的港人内地出生子女争取居港权运动是其中之一。她们透过讨论，去理解香港、大陆两地人的关系，去发现基层民众面对的社会分隔等困境，而女工作为基层的一分子，其实也就在共同的困境中，面对社会的分隔。

创出和谐社区文化

女工合作社近年不断参与社会文化行动，唱歌、跳舞，释放自己，用不同的方法来参与社会。最近，小黑更参与了名为“社区共融”的话剧演出，讲自己的故事，讲小时候做制衣，香港工业刚开始发展，一班妇女“好使好用”，故事一步步开始……她们发现是可以不同形式去讲社会问题。小黑说自己排剧过程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一步步放开出来，变成香港历史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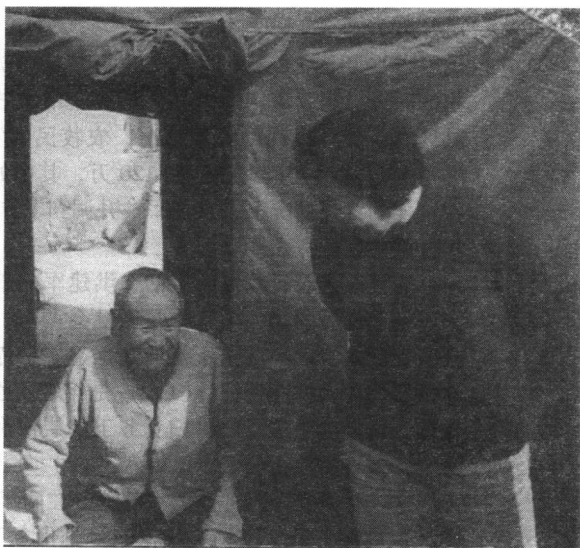
她们这样唱自己的歌：

从前是制衣厂的工人 勤劳为老板赶工
如何料到今天境况 为着两餐通街跑
频频地打工奔波生活 人人面对经济窘境
从前学会的好本领 但愿有天可再用
不灰心 不怨命 工友互守望
团结社区争取保障 合力去创出我未来
原来是社区中的资源 遗留在四方角落中
全球乱扩展的经济 未惠及草根社群
人民是社会中的主人 齐来为社区建幸福
权利意识心中记 在地看远景有策略
不贪新 不弃旧 多爱二手物
齐投入社区新经济 运动里社区有力量

(词：劳协/女工合作社/噪音合作社；曲改编自：南韩工运歌曲)

女工不再是以前的女工，合作社不再是以前的合作社。社区在改变，和平的文化也随之深化。

洪建军
开拓女性就业的新途径



文：游丽金

在制定“家政服务业的相关政策、法规、办法”时体现妇女与经济社会、与男性、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城乡、区域、阶层间的妇女共同发展。充分体现务工妇女群体的利益，消除一切歧视。

希望会有那么一天，再没有眼泪仇怨，再没有流血离散，共有一个美丽家园。

洪建军，1954年8月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草原上，辽阔的草原赋予了她蒙古族人特有的热情、开朗和坚强，而之后她也将她的大半生奉献给了这片她深爱着的土地，尽管这土地是贫穷的、落后的，但也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妇女儿童建设了一个美好的家园。

赤峰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是以蒙古族为主要民族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全市12个旗县区中有8个国家贫困县，2个区级贫困县。

199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也正是这个贫穷落后的地区灾难深重的时候。连续3年的大旱天气，全市农牧业收入锐减，部分旗县区农业甚至出现绝收的情况，农牧民因灾返贫现象十分严重。那年全市贫困人口总量达到120万，其中妇女、儿童占70余万。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洪建军被升调到了赤峰市妇女联合会工作，担任副主席职务。

为了改善农村牧民的生活，洪建军的着手点在广大的妇女身上。她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做社会调查，将全市妇女的劳动力分布底况摸清。经调查所得的数据显示：赤峰市家庭服务员的个体差异呈现多样性特征。(1)一是年轻女性居多。二是文化程度较低，这直接决定了农村妇女务工的层次和质量。三是未婚女性为主，未婚女性比例大于已婚者。(2)外出务工时限短，流动性大。这表明做家政服务业的大部分都在两年以下，流动性比较大。(3)家庭服务员工资收入低。(4)外出务工目的多样性，调查得知：30%妇女外出打工收入主要用于补贴家庭生活，10%用于子女受教育，60%的妇女希望通过外出打工见世面、长知识，这表明农村妇女外出打工不再是单纯追求解决家庭温饱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越来越多的人把注意力放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上。(5)家庭服务员主要来源仍是经济落后地区。调查显示，75%以上的外出务工妇女来自贫困山区，这表明在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妇女由于自然条件和自身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增收渠道少，于是很多人把摆脱家庭贫困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外出打工上，认为即使从事最粗重、报酬最低的活儿，也比在家务农收入高，还能增长见识，寻求发展机遇。这是调查中被调查人员表现出的普遍心态。

女性劳动的转移

洪建军于是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女性劳动力转移，将大批的妇女由农牧区转移到城市，提供相关的就业保障和途径。2001年，该想法得到了香港乐施会《内蒙古贫困妇女民工综合援助项目》的支持，先后在赤峰成立了“内蒙古贫困妇女能力建设培训中心”、“打工妹活动中心”，在北京成立了“打工者之家”，形成了输出地与输入地相呼应、培训与维权相结合的服务体系，创立了“组织、服务、赋权、维权”劳务输出新模式。而在那个受传统文化和落后的性别观念“男主外，女主内”的影响的时候，工

作一开始开展就有许多传言，农牧民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做法，社会舆论对她极其不利。但面对这种种舆论和压力，她都没有退缩，在反复进入农牧民家中调研的基础上做群众动员工作，几年如一日。而最终，赤峰市女性外出务工局面打开了，经过妇联有组织输出已经有 24,000 多人，这项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得到老百姓由衷的感谢。



但在项目实施之后，洪建军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她发现：虽然赤峰市妇联成立了“贫困妇女能力建设培训中心”、“打工妹活动中心”，在北京成立“打工者之家”，为服务员提供岗前技能培训和岗后跟踪服务，形成了一个从“农村——城市”、“输出地——输入地”的服务网络，对促进农村剩余女性劳动力有效地实现非农转移，并得到城市社会的包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家政服务属于非正规就业领域，社会上维护打工者权益的氛围不浓，加之政策法律的不健全、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维权难度较大，所以在服务员的权益保护、再教育以及公民权益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劳动权益缺乏保障，出外服务员的再教育问题，服务员的精神需求不容忽视。

针对这些，她采取了对策：建议政府尽快出台“家政服务业的政策、法规、办法”。成立的“打工者之家”是专门派驻北京维护服务员合法权益的机构。但在工作运行过程中，针对家政公司合同的随意性、工资低、休假时间少等问题，他们只能通过合作关系协调公司或通过与公司解除合作关系来维护服务员的合法

权益，没有执法的效力。所以她呼吁政府通过立法部门制定专门针对服务员的相关法律，进一步规范劳务关系、劳务合同，使劳务关系、个人雇佣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权益。在制定“家政服务业的相关政策、法规、办法”时，充分体现妇女与经济社会、与男性、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城乡、区域、阶层间的妇女共同发展。充分体现务工妇女群体的利益，消除一切歧视，以条规的形式明确家政服务员的社会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其次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家政服务业的维权工作中来。以社区妇联为主在社区建立打工妹培训中心、读书站等活动阵地，组建各类打工妹文体队伍，成立流动人口“巾帼志愿者”队伍，进行法律法规教育，使她们清楚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广泛开展“四自”女性精神、“热爱第二故乡”、“新市民巾帼五大工程”等（素质、创业、维权、文明、成才工程）主题教育活动和丰富多彩的社区文体活动、开设妇女卫生保健知识、公共卫生知识讲座，开办多门类、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她们的整体素质，以适应城市发展需要。发挥妇联组织的作用，变单项管理为双向管理。再就是加强“打工者之家”的工作。“打工者之家”在整个劳务输出的模式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不仅能满足打工妹的社会需求，缓解她们的心理压力，还能帮助打工人员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针对流动服务员所处的环境和特殊需要，开展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知识，树立她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努力消除与城市人的心理隔膜，逐步解决“边缘人”状态，尽快融入城市生活。通过建立打工妹互助小组，教育服务员学习掌握法律知识，团结起来依法共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打工者之家”与农友之家、打工妹之家等相关的组织开展联谊活动，扩大活动领域，学习交流工作经验，为服务员提供交友空间。并希望以后在非正规就业领域中加强妇女组织、工会组织建设，增强妇女组织在非正规领域中的分量和影响，确保能听到服务员的呼声，反映她们的意见，维护她们的权益。

自助互助

洪建军在大力着手的工作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任何工作离开了群众自我意识的觉醒，离开了群众的参与和合作都是一事无

成的。所以她从来都是尊重受益人的意志和意愿及需求，倾听她们的意见和建议，相信她们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如地震救灾工作中，她看到灾民都很悲观、绝望，有的在等待政府和他人的援助，于是她深入灾区与妇女座谈，倾听她们诉说，更重要的是启发和激活大家自救、自助、互助的内在动力。在她鼓励下，人们终于恢复了必胜的信念，团结互助，终于战胜了这场灾难。她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组建农牧民妇女互助网络组织”的工作思路和模式，即在嘎查村，妇代会帮助引导从事相同或相近产业的妇女，在自愿、互利、民主、公平的基础上组成各类妇女互助小组，她们自助、互助、寻求帮助、共同发展。至目前，全市组建妇女互助小组4,146个，小组网络3,330个，妇女互助网络组织12个，参与小组的妇女8.6万人，受益人口34万人。

洪建军所从事的工作决定了她总是要下到农牧区嘎查村和农牧户家中，走访各阶层农牧户。如在震灾紧急援救中，她在1个月的时间里先后2次走访察看了3个旗县区17个苏木乡镇32个嘎查村的600余户农牧户，根据他们的需要终于形成了有效的方案。在10天时间内将救灾物资面粉和棉被发放到21,000名灾民手中。在农村牧区女性劳动力转移工作中，几年来，她走遍了赤峰市12个旗县区2/3（150多个）苏木乡镇，了解内蒙古赤峰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劳动力转移难的原因，同时她先后到北京、天津、大连等地考察劳务市场，处处从打工妇女的角度出发，为她们争取劳动报酬、休假等各方面权益和待遇。

后记

这么多人获得了利益，但是，洪建军自己却不得不舍弃家中80多岁的婆婆和两个尚在读高中的儿女，特别是长期超负荷工作使她身体极度疲惫，且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经常都要忍着病痛工作。

这就是洪建军，对于自己所做的工作和未来的理想，她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激情澎湃（虽然她在2001年获取全国“三八”红旗手的荣誉），她只希望未来可以像这句歌词那样美好“希望会有那么一天，再没有眼泪仇怨，再没有流血离散，共有一个美丽家园。”为了这个美好的希望，她一直都为“促进我所服务的人群和平、幸福”而努力。

徐纪英
茶树花研究开发第一人



文：于怀清

作为茶人，为农民找到了亮点，无论多忙多累，我们都是高兴的，因为我们做了一点实事。

中国走向世界，让茶树花成为全人类身心健康的爱心花、和平花。

翻开厚重的历史线装书，穿越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浩如烟海的茶叶专著中，我们搜寻着茶树花的身影。

尽管我们采茶、饮茶已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茶树花的广泛应用，在数千年茶文化和用茶史上还没有查到有任何文献和文字记载。直到20世纪末，经过中国茶人徐纪英的发掘研究，这一历史终于被改写。

“中国走向世界，让茶树花成为全人类身心健康的爱心花、和平花。”这是徐纪英的信念。

徐纪英，中林绿源（北京）茶树花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历经艰辛，从事茶树花研究和产业建设应用研究20多年，将被人们忽

视和遗弃的茶树花变成了人类新的重要资源。从此，我国1,700万亩开花茶园的茶树花有了给茶农增收、让世人健康的无限利用价值。

深秋的一个夜晚，记者穿越京城著名的茶叶第一街，在茶香四溢中来到徐纪英位于马连道的家，（这里也算她在北京的个人办公室，由于她行走不太方便很少去单位办公）。在众多茶类书籍、奖杯、奖状的环境中，在著名茶叶专家陈椽教授的大幅照片下，徐纪英向记者娓娓讲述了她和她的团队是怎样研究茶树花资源、建立茶树花生产基地、开发产品及组建国际市场行销通路的前前后后。

今生与茶结缘

徐纪英的出生就注定了她与茶树花的缘分。

1949年冬，皖南山区，茶园里婀娜妩媚的茶树花正迎风怒放。

住在山下数代以茶为生的徐家，孩子不幸夭折，悲伤的父亲在乡亲们的陪同下出门散心。突然，路边一株最大的茶树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只见盛开的花朵间，睡着一个用破衣包裹、口吐白沫、奄奄一息的女婴。乡亲们认为这是上苍怜悯徐家积德，重新赏给他们的一个花仙子。

这个女婴就是长大后与茶分不开、被人称为“茶痴”的徐纪英。

徐家是皖南茶叶世家，她的祖辈在那片热土上以茶为生，以茶代药，以茶树花作为一种药方救助于四方山民。徐纪英自幼耳濡目染，对茶树花充满了深深的爱恋。

青翠欲滴的茶树，蜿蜒曲折的小径，千啼百啭的鸟鸣，这一切都让幼时的徐纪英流连忘返，而使她最难忘的还是一簇簇红白黄相间的茶树花。

每年农历9月间，已完成一年茶叶采摘任务的茶树开花了。花山树海，成了徐纪英和小伙伴们的乐园。

徜徉在茶树的海洋里，顶酷暑萌芽、迎寒霜绽放的花朵，让她充分享受到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每逢冬季，她和小伙伴们就到茶区捡茶籽，口渴时，一朵朵的茶树花就成了他们的天然饮品。

花蒂后面，沁凉的汁液，甜彻心扉，让徐纪英至今回味无穷。

在儿时的记忆中，大人们每年都要采撷许多茶树花，烘干后用大麻袋装好吊在山房后面，这些茶树花总是在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从此，神奇的茶树花便盛开在她的心中，儿时对茶树花的切身感受，与淡雅而温馨的茶叶香气，共同长久地充溢在她的心田。

懵懵懂懂的徐纪英萌生了一个美丽的梦想，那就是长大后也成为茶人，研究茶叶、研究茶树花。

带着儿时的梦想，她终于考取了梦寐以求的——安徽农业大学茶学系，师从一代茶叶宗师陈椽、王泽农等教授。

大学时代，徐纪英的脑海里常常萦绕两个问题：一是茶树花为什么能在伤口上止血和洗澡治疹；二是历代茶业科技人员为什么不去研究与应用它？茶树花只能是传宗接代的生殖器官吗？敏于思索的她曾向老师问起茶树花的问题，但老师说现在只能研究茶叶，还没有精力去研究茶树花。在那个注重茶叶研究的年代，茶树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但老师的话，并没有让她放弃对茶树花的梦想。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分配回当地的农林局从事茶叶生产技术工作。在那里，除正常的工作以外她便开始了对茶树花的默默研究。

从1981年第一次试验开始，时间的齿轮碾过20多年岁月。在漫长的岁月中，支撑她始终如一进行研究的不仅是解开茶树花之谜，更有对贫苦茶农的一腔深情。

从少时开始，徐纪英不停地行走在茶区，茶农的贫困，让徐纪英感到无比的心酸。“虽然我国茶园面积大，但收入并不高，以茶为主的茶农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茶农仍然很贫困。作为茶人，作为茶叶科技工作者，怎样为茶农增加收入，建设好茶区的家乡，是我们目前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不从科学上解决问题，是不大现实的。”

勾起她对茶树花研究的还有浓浓的民族情结和爱国情怀。“茶叶从发现、栽种到生产加工技术以至茶文化，都是从我国开始的，现今，全球对茶叶成分特别关注，茶树花的成分与茶叶相同，营养成分还高于茶叶，如果外国人把茶树花研究开发利用出来，那么专利权便属于外国人，那岂不遭到全世界的耻笑？”

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渴望茶树花走向世界，再创茶叶界的辉煌，为全人类造福。

从对茶树花的朴素眷恋，到后来决定为茶农创收、为世人造福，徐纪英不仅有了最初的研究动力，也有了后续研究的勇气。徐纪英说，研究茶树花，是历史、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为茶树花正名

中国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说到茶树花时只有淡淡的一句：“花如白蔷薇”。而先秦、两汉以来，墨客的诗词歌赋，也只是寥寥数语，赞美其婀娜多姿，可养在瓶中供人观赏“清玩”。

数千年来，人们种茶只是采用了茶树花的芽叶，而茶树花只是一种结籽传后的生殖器官。在无性技术替代有性种子繁殖后，花果过多确会影响茶叶产、质，正常情况下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要各占光合作用产物的50%，茶农常采用修剪或喷洒化学药物来除花落果，以达保产增收的目的。这些措施虽然能减少花果生长，但需要一定的费用和人工投入，更重要的是不利茶叶品质，在这种情况下茶树花的存在便是茶树的累赘、茶农的负担。除掉花果与不予利用同样是浪费了95%以上，全国可达4亿多吨的天然资源茶树花。这资源虽然没有占用土地、没有进行种植管理，但它带走的确是茶树体内的水分和营养，如果进行开发利用，进行人工采摘（按全国现有茶园的60%茶树花资源计算）每年不仅可以为茶区增收100多亿元，而且还能促进茶树第二年增产提质30%以上。

茶树花含有独特的成分和高活性物质，应用领域广泛，这种面积大、数量多的茶树花是茶树奉献给茶农的一种可持续再生的天然资源、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大宝物。我们应该对其关注和重视。

1981年，徐纪英悄悄地将茶树花拿到母校，请对她了解的化学老师林鹤松帮她进行成分化验。当拿到结果的一刹那，喜悦和振奋一下子充塞了徐纪英的心田，她激动地一下子抱住化验员蹦了起来。后来她又在一家中医院和植保研究部门做了重复化验，检测得到了大致相同的数据。让徐纪英看到了未来研究的希望。

从这一年，徐纪英开始了她 20 多年持续的资源研究和产品开发漫长的旅程。

科学研究是有趣的，而在常人看来，其过程也是无比枯燥和漫长的。徐纪英说，要想将茶树花研究出来就要有攀登科学高峰的思想准备，不是一个月，也不是一年。全球有茶树品种 200 多种，而我国就有 180 多种，茶树生长地域环境、管理水平、开花时间等情况的不同，其内含成分不同，花的生长量和能采摘的利用量也不同，不将这些情况调研清楚、是没有研究意义的，所以（他）她们跑遍了全国 19 个产茶省的重点茶区，对所有不同品种的茶树花进行了内含成分的检测化验，了解和掌握了部分品种的茶树花生长量和利用量情况。所有材料经国家权威部门鉴定证实：茶树花浑身都是个宝，且产花量可观，为此，在不同茶产区建立了茶树花的生产加工、试验、观察和试生产基地与产品试生产合作厂。目前，正在搭建产品市场的国际行销通路。她们成果中的创新点和核心技术都获得了国内外多个国家的同族发明专利，相关产品也取得了商标权，产品标准和茶树花新资源应用证书正在办理之中，这些工作虽然完成的不是很全，但所到之处已洒下了她（他）们无数辛勤的汗水。

“一生只干一件事”，这是徐纪英的信念。这种信念支撑她走到了最后，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茶树花，这朵在中国几千年的茶叶历史上隐其叶后、从未做过主角的绿色奇葩，今天在徐纪英的发掘研制下，从此走上前台，成为人类新的重要资源，将在医药保健、食品饮料、日用化妆品等行业的大舞台上展尽新姿，舒尽其华。

徐纪英因此被誉为“茶树花研发第一人”、并于 2002 年获中华名医世界论坛、中国自然医学大会“自然医学事业的杰出贡献奖”、2003 年录取美国世界名人科学院“科学发明博士”，2004 年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上海茶叶学会“科技贡献奖”，2005 年获国家科技部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创新奖”等多次奖项。徐纪英所获得的这项发明不仅能使茶农持续增收，为健康产品提供原料，更为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纽带作用。

预备一个大缸，准备流汗

我国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有句名言：

科学事业是一种永恒探索的事业，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一刹那。无穷的探索，无穷的烦恼，正是它本身的魅力所在……

研究茶树花，徐纪英不仅要面对守旧思想的挑战，还要经常面对贫困、负债。

研究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资源性原料，仅靠一家人、一个小团队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自1981年开始，随着研究的不但深入，费用开支就随之加大，有些季节性工作又不能停止，负债就成为她生活的常态。徐纪英告诉记者，当时她的每月工资才40多元。由于茶树花研究所在没完成阶段性工作时，不好向单位汇报，即便说了也不可能得到支持，所以，只能自掏腰包和借贷。

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茶树花研发没有结论，也就一直没有向上申报，所以她们进行的这项工作的一直是个人出资，到目前已花去费用，入账的就有2,000多万了。



由于徐纪英将自己的工资都投到了试验上，生活非常朴素，丈夫探亲回来经常给她钱，让她增加些营养、买衣服什么的，不为自己也要为孩子的身体着想，因这项工作不是在短期内能完成的。可是，徐纪英嘴里说好的，可一转身又都拿去用了，后来被

丈夫发现，她就说钱丢了。她丈夫明白了，“又丢了，你不就丢到那茶树花上去了吗。”

为了这朵与众不同、大有潜力的奇花，徐纪英和好朋友们都拿自己的房产抵押借款，那时，每当贷款到期时，她们都不敢待在家里。为了持续研究，她只好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与茶厂合作，然后再帮茶厂销售茶叶，所得利润收入又可用在茶树花研究上了。

为了进一步让领导知道，让高层研发机构了解茶树花，2002年，徐纪英将大本营搬到了北京，成立了中林绿源（北京）茶树花研究发展中心。当时，她从合作茶厂挑选了10几个茶农的孩子。由于经济上的窘境，十几个人的吃饭都很困难。

为了维持生活，这些孩子们就在夜深人静时，到菜市场捡别人白天扔下的菜帮子，洗一洗，拿盐和辣椒腌腌，就成了我们下饭的美味。

从徐纪英谈话的字里行间，记者感到在多年的研发生涯中，她的事业并不为人所理解，“虽然我是在研究茶树花，我知道，我背后是一片骂声、耻笑声，甚至有的茶专家说，既然茶树花有那么好，那么有用，自古以来怎么没有人研究，还等着你来研究啊？”

面对这种不解和质疑，徐纪英感到又好气又好笑。“无论什么事情，都得有人去做。科学的道路本来就是不平的，前人没有研究的事我们不能等，应拓宽茶领域创建新产业。”

这种不解和非难还有来自周围人的责备和猜疑。她的丈夫是军队军医，在部队里，她丈夫的同事不解地说，你家属疯了，整天搞个什么花？化验化验的。而在丈夫服役30多年时间里，徐纪英只去探过两次亲。有人说，你不回家，你老婆也不来，当心她有情人啊？丈夫笑着回答说，她有好多情人，她的情人就是茶树。

“别人都说我是工作狂、精神病、茶痴……可我不在乎，我和家人虽然吃、穿、住不太好，但我们把钱用在了该用的地方，值！”

她对从茶场带出来的孩子们说，对于这些我们不要怕，我们要准备一个脸盆，准备流泪；准备一个大缸，准备流汗。我们要能吃苦，不怕累，还要持之以恒。茶叶就是苦的，只有苦后才

有甜。

采访中，记者的目光不时被徐纪英乌黑闪亮的秀发所吸引。年近60岁的女性，有一头这样的乌发，真让人羡慕啊。

看到记者探询的目光，徐纪英指指自己的头，笑着说，我这是假发，我这个脑袋，有个十几公分长的刀口，现在我的头上有德国人的骨头，还有两个中国民工的头骨。

坐在记者面前的徐纪英，原来曾逃过死神的阴影。

1991年，正当徐纪英对自己的工作开展如火如荼的时候，如锤的剧痛让她昏倒在单位的楼梯上。她不幸患了晚期脑瘤，医生宣告，生命的大门将要为她关闭。她不甘心，来到上海。当她听说国外专家来临时，她急切地找到专家，恳求专家拿她做试验。她的坚强感动了医生，医生流着泪同意为她作摘除脑瘤手术。

当一纸手术通知单上盖上鲜红的“科研实验”四个字时，徐纪英心中陡然一惊，一刹那的害怕紧张之后，她便很快恢复了平静，她很严肃地对施行手术的专家们说：“如果把我的脑瘤治好了，我又可以回到科研岗位上来，如果手术失败了，我身上其他的健康器官可以贡献给需要它的人……”

也许是她对事业的执着精神感动了上苍，奇迹尽在她身上出现了：手术成功了。虽然她至今还有一条腿走路时不太灵便，但是拥有了生命，她为此感到满足，因为她又可以回到自己喜爱的茶树前，又可以做想做的事了。

453

幸福就像茶树花

2005年深秋，基地的茶园进入了盛产期，茶树花盛开，漫山遍野，白花点点，把江南的山乡装扮得分外妖娆。

采摘茶树花的季节到了。

浙江开化金茂茶场，场长余华军通知各村茶树花采摘工今年又开始采花啦，通过前几年培训的茶农兴高采烈、快乐无比。村民们，多数是妇女，三三两两地来到茶园，将茶树花一朵朵采摘下来，卖给茶场。

一位70多岁的妇女，几乎每天上山采茶树花，最多的一天有近30元的收入。盘算着这笔额外收入，她高兴得合不拢嘴。她高兴地逢人便说，“我挣钱了，一个星期，就要挣两百块钱。”有的

老茶农说，“没想到，到我这个年纪，茶树花还能卖钱，非常高兴。”

原来，2003年11月，中林绿源（北京）茶树花研究发展中心与浙江开化县金茂茶场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利用茶树资源，而茶树花是生产的重要原材料。

随着生产工艺的完善，茶树花焕发出勃勃生机，目前，以茶树花为原料，生产的日用品、保健品、化妆品正陆续进入百姓家，徐纪英的茶树花事业已更上一层楼。徐纪英的目标是茶树花产业化，最终达到万店、千品、百基地的目标。

“昔日零落成泥，今朝枝头抱香。”无人问津的茶树花居然“攀”上高枝，闯出大市场。

目睹过茶农被拖欠的苦头，徐纪英给收购茶树花的茶场定了一条规矩：当时采，当时给钱。

面对迅速到手的收入，农民们用自己最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他们向徐纪英深深地鞠躬，并说“真是活菩萨送钱来了”。面对茶农溢于言表的高兴，徐纪英说，“作为茶人，为农民找到了亮点，无论多忙多累，我都是高兴的，因为我们做了一点实事。”

“我们技术转化的规定是：发达地区收费，经济落后茶区是送技术上门，西部茶区来京开会，我们有时还负担路费。”

徐纪英总结说，“茶树花是：“富民花、爱心花；保健花、和平花。”对茶树花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徐纪英向记者列举了一串数字：我国有开采茶园1700万亩19个省、市。

根据安徽、江苏和四川等省多年采收茶树花的情况表明：每亩茶园可采摘干花20-30公斤，除加工费外，可使每亩茶园增收300-400元；采摘茶树花后，又可使茶树第二年增产30%以上。茶农利用冬闲，按照专利技术要求对茶树花进行采摘，每亩茶园年可增收400-500元。如果全国70%茶园的茶树花得以利用，可产干花原料30多万吨，仅以初加工每吨3万元的市场价计算，每年可使茶区增收100多亿元，可占到我国茶叶总产值的70%。

同时，中林绿源（北京）茶树花研究发展中心与农业部茶叶理化重点实验室、中国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等权威

机构合作，在医药保健、食品饮料、日用化妆品等行业中对茶树花技术转化、产品开发等进行了应用尝试，在一些重点茶区建立了茶树花试验点，并着手建立生产加工基地。

茶树花系列产品被国家科技部列为中国星火计划名优产品，被中国国际营养协会和中国自然医学会列为推荐产品。

目前茶树花产业发展还刚刚起步，建成一个新产业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徐纪英还将要付出很多。我们真诚地祝愿茶树花这朵绿色奇葩能物尽其用，为悠久的茶文化谱写新的篇章，在我国厚重的国茶科技史上开创一个崭新的途径。

如今，徐纪英的丈夫已退休，作为中医的他也加入了这项事业的行列；配合研发部研究茶树花功能产品可是他的对口行当，这点让她尤感欣慰，能与丈夫团聚，她觉得自己最终能对丈夫有所弥补。

采访最后，徐纪英告诉记者：“对事业，我始终没有后悔过，我觉得自己很骄傲，很自豪。将来有时间，我还要写两本书，一本是《茶与人的身、心健康》，一本是《茶与人生》。用我的经历让大家知道茶的故事是那样悠长、深邃、回味无穷。”

透过她坚定的语气，明亮的目光，记者的脑海里不禁闪现出她拖着病腿、毅然前行在茶区的身影。



李桂莲 永无止境的追求

文：时晓明

看见农民脱贫致富，自己的科研项目为农民带来实惠，那种快乐是无法比拟的。

经过多年的科研实践，李桂莲意识到：农业科研必须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才能发挥它的价值。

看见农民脱贫致富，自己的科研项目为农民带来实惠，那种快乐是无法比拟的。

李桂莲生于1942年，陕西省华阴市人。李桂莲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母亲没有工作，是一位家庭妇女，父母供养三个子女上完大学（李桂莲和她一弟一妹），家庭生活比较清贫，但父母对子女要求严格，3个子女自小学习用功，勤奋努力，学习成绩都很好。李桂莲1960年考上原贵州农学院植保园系果蔬艺专业。1964年毕业分配在贵州省农科院工作。从此走上充满艰辛和挑战的农业科研之路。

1979年，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以粮为纲”的初期。罗甸县

是贵州一个边远、落后的山区，属国家级贫困县，少数民族人口占64%，文化落后，特别是农村文盲、半文盲率高。农村妇女文盲更多，地位低下，很少参加开会，当时的罗甸农村是人无厕所、畜无圈，牛、马、羊都是放养在山上，卫生状况很差，群众没有种养习惯，以辣椒、黄豆为菜，更谈不上商品蔬菜生产，农业生产一年就种一季水稻，农民收入很低。经济落后，全县城仅有两家餐馆，一家旅社。交通闭塞，大部分乡（当时是区）不通公路。

因地制宜

这个时候，李桂莲带着她果菜类蔬菜反季节早熟栽培技术来到罗甸县。她担任罗甸县的蔬菜技术顾问，一步一步地改变了耕作制度。李桂莲利用该地海拔低，冬春气候温和，具有“天然温室”的气候优势，试验、示范、推广果菜类蔬菜反季节早熟栽培技术。她常常跋山涉水，走村串寨，向农民传授科学种菜技术，手把手地培养农村科技二传手。她实施新的耕作制度：如罗甸县、镇宁县、望谟县、册亨县等，过去一年只种一季水稻，她建议改变为先种一季早熟蔬菜再种一季水稻，即由一年一熟制变为了一年两熟制，新增加了一季蔬菜收入；并且因蔬菜要多施肥料，又促进了下一季水稻的增产、增收。另一方面，因为种蔬菜需肥料多，这样家家户户建起了厕所，修起了圈，牲畜由传统的放养变成了圈养，改变了农村过去不良的卫生习惯。这样，有机肥多了蔬菜增产又增收。蔬菜生产发展又带动了养殖业发展，猪多肥多蔬菜多，形成了农业良性、可持续发展。

在李桂莲的努力下，“利用低热地区天然温室优势发展早熟蔬菜和冬果菜”试验项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她的系统研究总结出的果菜类蔬菜反季节早熟栽培技术在全省20多个县（市）推广，使广大农民脱贫；她被当地农民亲切地称为“女财神”。

12万罗甸农民因为早菜稳定脱贫，全省20多万人通过种早菜走上了致富路。还有大批农民正在通过种植夏秋反季节蔬菜脱贫致富奔小康。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妇女，她们通过种植蔬菜而增加了自信心，通过销售蔬菜而走向市场，提高了她们的能力，也提高了她们的地位。过去，这里的妇女很少出门，现在进城学科学的妇女到处都是，她们相互学习，关心集体，关心国家大事；这样积极的妇女越来越多。

因为建立了大规模的早熟蔬菜基地及夏秋反季节无公害蔬菜基地，每年3-5月，春淡季节及9-10月秋淡季节大量蔬菜供应市场，也缓解了城市及工矿区蔬菜供应紧张状况，丰富了花色品种，丰富了群众菜篮子。李桂莲的种植推广，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时间一年年过去了，从正季蔬菜栽培到早熟蔬菜、冬果菜栽培，再到夏秋反季节无公害蔬菜栽培，李桂莲潜心于贵州山区的蔬菜种植科研和技术推广，而她工作的“阵地”也从罗甸、镇宁、关岭等低热地区转移到毕节、龙里等海拔较高的冷凉地区，足迹踏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产品在蔬菜春淡季除满足本省需要外，还销往全国十多个省市，使大批农民脱贫致富。截至2003年辐射、带动全省反季节早菜及冬果菜生产，累计面积约452万亩，累计产量约549万吨，累计产值约46亿元，农民纯收入30多亿元。另外，带动农膜、化肥、农药、菜种等年均销售约3,000万元，又带动饮食、旅馆、交通、运输产业，当年经营额约6,000万元。早熟蔬菜已经成为罗甸、关岭、镇宁、望谟等低热地区县的支柱产业，成为广大农民群众脱贫增收的一条有效途径。



1996年李桂莲又提出“利用贵州高海拔地区夏秋气候凉爽，具有‘天然空调’的气候优势，发展夏秋反季节无公害蔬菜”的科研创意，1998年以来，作为省长基金项目的主持人，李桂莲又

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发挥天然空调优势建立夏秋反季节无公害蔬菜基地”项目的实施上来。

年近六旬的她放弃了节假日，三天两头地往大方、威宁、龙里等地的农村跑，到田间地头去传授种植技术，开办技术培训班。几年下来，系统研究总结出了16种蔬菜夏秋反季节无公害蔬菜栽培技术。如今，在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的配合下，项目进展顺利，2004年面积达12万亩左右，产值约2.5亿元。产品在蔬菜秋淡季除满足本省需要外，还销往全国十多个省市，使大批农民脱贫致富。

李桂莲40年来一直从事蔬菜育种、栽培技术的研究推广工作。她将果、蔬菜反季节早熟栽培技术在全省20多个县（市）推广。带动农膜、化肥、农药、菜种、饮食、旅馆、交通、运输的发展。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做出贡献。经过多年的科研实践，李桂莲意识到：农业科研必须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才能发挥它的价值。

2003年全省推广种植面积已达18万亩，产值约3.6亿元。目前已辐射带动全省20多个县（市）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李桂莲又深深体会到：现在贵州农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农民收入较低，应加快科技兴农的步伐，运用科技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后记

李桂莲常对人说：“看见农民脱贫致富，自己的科研项目为农民带来实惠，那种快乐是无法比拟的。”

多年来由于长期蹲点，李桂莲成了农民的良好益友。最让她难忘的是，1987年她不幸遭遇车祸住进了医院。罗甸的4个农民听说了，提着鸡专程来看她。

李桂莲现任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兼任贵州省科协副主席，省农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贵州省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并从党的“十三大”起，连续4次当选为党代表。为了感谢李桂莲多年来为地区经济作出的贡献，1995年，安顺地区行署重奖她2万元，而她把钱全部捐给了她的母校安顺八小；1996年，她又将罗甸县奖给她的5,000元捐给了罗甸县“希望工程”；每年的补助她也全部捐给了乡里的小学。

李桂莲一生情系农民、农业、农村，她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她勇于开拓、创新，她敢于战胜困难，她的成果是显著的、巨大的。



苏艳霞 绿意人生

文：吴伟娟

人生没有苦难会显得贫乏和苍白，苦难在成为前行的障碍时，也能够成为走向更高的台阶。

多少个清晨，苏艳霞在温室里迎来了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多少个日夜，苏艳霞和研究所的人员跋涉在大兴安岭的丛林和内蒙古的沙漠中，寻找和搜集濒危的树木和种子，他们风餐露宿，乐此不疲。

我要用更多的花草装点人们的生活，这是我一生的绿色梦想！

苏艳霞，1970年3月，出生在黑龙江省肇东市四站镇一个离省城哈尔滨240多里远的乡村农民家庭。为了支撑这个家，母亲天天除了做饭、喂猪、去地里干活还要去野外打一大捆喂猪的野菜背回来，夜里还得缝缝补补。勤劳而善良的母亲是她不屈和奋斗的源泉。

苏艳霞是位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虽然她始终没有离开过

农业生产第一线，但是她站在你面前，也许你会觉得她与你所熟悉的农民形象相差太远。没错儿，她的脸上没有传统农民被风沙和汗水侵蚀的道道沟痕，她所干的农活也不再是扛着犁耙上山去，背着月亮下山来那样出大力、流大汗的粗活。她是凭借现代科技知识在黑土地上耕耘的普通农民。苏艳霞在家乡创业与成功的大背景，是农村青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找工作的大潮，这些农村青年精英的流失，使得很多偏远的农村成了“空心村”，几乎没有发展和繁荣的希望。但苏艳霞留了下来，留在了生她养她的黑土地上，并且使这片土地焕发了勃勃生机。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生活，使她走上了绿色之路，谱写了她的绿意人生。

向土地“打工”的甘甜苦乐

1987年7月，对苏艳霞来说，是痛苦和彷徨的。用当地老百姓的话来说，那叫“闹心”呀。她原本为自己设计的一条考大学、进城当高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半路夭折了。因4分之差而和大学无缘，被无情的挡在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之外，痛苦和彷徨是暂时的，她没有沉沦。她告诉自己，日子还要过，人还要活，不能在痛苦和彷徨中艰难地活着，要从中站起来，走出来。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她本打算到城里打工攒学费再复读一年，可短短的几个月的打工遭遇彻底改变了她的思想。她无法忍受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歧视与不公，决然放弃了挣学费复读考大学的机会，放弃了自费上大学的机会，放弃了到四站镇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选择了脚下这片黑土地，决定回到农村去，她就“不信当农民就不能挺直腰杆！”

1988年6月的一天，苏艳霞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园艺栽培，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她无意中看到了关于葡萄大王田玉雷靠种葡萄劳动致富，并带动了其整个乡的经济发展的一个报道。她灵光一闪，心想，如果自家的地里种上葡萄……但她不清楚当地是否也适合种葡萄。她即刻给葡萄大王田玉雷，以及田玉雷的辅导教授，东北农业大学的王玉岫教授各写了封求教信。他们很快就回了信，从各个方面给予她细致的解答。面对满纸的专业技术术语，苏艳霞一点也看不懂，但她看懂了肇东地区是适合种植葡萄的。

当苏艳霞把自己想种植葡萄的想法告诉给父母时，立刻遭到

父母的强烈反对，但她却没有丝毫的动摇。搞园艺栽培是她多年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从未出过远门的她，就带了仅有的168元钱，只身踏上了去密山县的路。半个月后，她带回40棵葡萄苗，并不走样地按着老师教的方法栽到了自家的田地里。当她将葡萄苗栽下后，引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镇林业局的站长也来了，他们都说如果她栽培成功，明年他们也种。这让她信心大增，更让她灵机一动，萌生了培育葡萄苗的想法。她立刻又给王玉岫教授写了一封信，问她能否学习育苗技术。8月末，当一棵棵葡萄苗茁壮成长之时，苏艳霞来到东北林业大学，开始学习葡萄苗培育技术。

第二年，她架起了一个200平方米的塑料大棚，培育嫁接葡萄苗。干啥？卖呗！为了打开市场赢得信誉，在售苗的同时，她不但负责送苗到户，还负责帮助栽苗和技术指导。一次她去肇东市民主粮库送完葡萄苗天已经黑了，回来的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冻得直哆嗦。为了不让颠簸的三轮车把自己甩下来，她就死死地抓住三轮车的扶手，由于天黑路滑，三轮车在路上颠簸了5个多小时才到家。当时整个人都僵到车上，胳膊腿也不听使唤了。这样的罪遭的那可是太多了，但她觉得也“真个儿值”。在她的不懈努力下，那一年，葡萄苗卖了一万多块钱。望着手中这沉甸甸的收获，心里那个“敞亮”！

当40棵葡萄树挂满葡萄的时候，苏艳霞培育的葡萄苗也开始出售了。镇林业站一下子就买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就只能靠苏艳霞自己卖了。苏艳霞骑着自行车，后面带两大筐葡萄苗到集市上去卖。最初，她还不好意思，挺难为情的。慢慢地，当一个个感兴趣的买主围着她问这问那时，她不再感到难为情了，变得落落大方。对一些很有兴趣，但又对葡萄苗缺乏信心的买主，她就让买主先把葡萄苗拿回去，等结葡萄了再给钱，如果不结葡萄，她就不收钱。

那一年，苏艳霞纯收入6,000元。这不仅是她第一次自己赚钱，也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捧着那6,000元钱，她好兴奋啊。她想到，父亲工作了20多年，现在每年才能够赚2,000多元的工资，而她只是培育了一年的葡萄苗就……苏艳霞信心大增，同时，她的脑中另一个更宏伟的计划产生了。

1989年春，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在她几乎磨破嘴唇和镇妇联的协调下，镇政府才将原来砖厂取土的80亩土壤严重板结、土质严重破坏的堆满砖块瓦砾的摆放砖坯的废弃土地承包给了她。她和家人起早贪晚，日夜奋战，硬是咬着牙，把半米厚的破砖头一锹一锹地挖出来，肩挑车拉地运走，然后又拉来好土填平。由于当时资金紧张，人手又少，她身体虚弱还到地里领着农工插杨树苗。为了不延误栽种时间，她雇了几个农工。为了节省下一个雇工的开销，她每天都和农工一起摸爬滚打地干。每天，农工们都下工回家了，她还要继续干，总是要等到天黑下来，看不清了，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废弃地距离苏艳霞家有6里地远，每天晚上回家的那段路，是她提心吊胆的一段路。就这样，80亩土地被一块一块地栽种上葡萄等果树，她又在行间套种了各种蔬菜。

在废弃地中，有一块地只适合栽种杨树。那天，苏艳霞在给20公里外的一家用户送葡萄苗回来的路上，下起了大雨，没带雨具的她立刻就被浇得透湿，到家的时候，两条腿麻木得没有了知觉，当天晚上发起了高烧。第二天，高烧没退，母亲让她歇几天，她不肯，因雨后是栽植杨树苗的最佳时机。她迷迷糊糊地来到了填好整平的地里。栽植了没多大一会儿，她实在站不住了，就跪在地上一步一步往前挪着栽植杨树苗，两个膝盖很快就沾满了泥，她也顾不得。栽着栽着，她一抬头，发现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来了，正站在她前面不远处，怔怔地看着她，一脸的心疼。她愣了愣，站起身，僵硬挤出笑容，安慰着母亲：“我知道你来了，就故意干活，想让你看看我多能干……”她的话还没有说完，母亲的眼泪就落了下来。随着母亲的眼泪，她的泪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人生没有苦难会显得贫乏和苍白，苦难在成为前行的障碍时，也能够成为走向更高的台阶。”

一天中午，苏艳霞和民工们一起去远处拉土，一阵旋风刮倒她培育的葡萄苗和草莓苗的大棚，把大棚的塑料布掀了起来，刚刚破土的葡萄苗和草莓苗全被吹折了。等她拉土回来，望着眼前惨不忍睹的大棚，她一下跌坐到地上，大脑里一片空白，好大一会儿才清醒过来。她跪着，一棵一棵地去扶育苗，一步一步向前爬，渴望着能够有幸免于难的。可从大棚的这一头爬到大棚的那一头，一棵完整的育苗都没有找到。那一晚，她将自己蒙在被子

里偷偷地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又出现在果园里，又开始忙碌起来。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一年，苏艳霞赚了2万多元。父亲也满脸骄傲地说：“我女儿种的葡萄树，结的葡萄又大又甜。用手摸一下，10天之后还有香味呢！”

在经过1989年冬季的东北农业大学果树技术函授学习，以及东北林业大学园林专业函授学习后，苏艳霞意识到：从庭院走向田野只迈开了走向富裕的一小步，只有走园艺栽培和精细农业的路子，才可能拥有更大的发展。为此，苏艳霞走进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省园艺研究所学习进修，并与北京良种工程研究所等8家科研单位建立了业务联系。通过学习，她不仅掌握了农业基础知识，还学会了苗木繁育、嫁接、栽培等一系列技术。她要营造一个平台，一个改变农民意识的平台，她要让农民们相信，土地里一样藏着金子，就看你能不能发现，看你怎么去向土地“打工”。



1991年9月16日，苏艳霞不仅开始培植树苗，还开始为各家研究所种植各种蔬菜种子。同时，她还成功地培育出“704紫长茄”。她试种了40亩，仅此一项纯收入就达12万元。1993年，这一新品种荣获省农学会新产品新技术展评金奖，并很快得到推广。接下来，她又运用学到的知识，建起了占地20多亩的花圃，

培育芍药、百合、榆叶梅等十几种花卉。

“苏萌园”

为了创业，她自学了300多本书籍，先后拜18位专家教授为师，与8家研究单位建立了紧密性技术联系，承担了36个试验项目。1994年苏艳霞创办了黑龙江省苏萌园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过苏艳霞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她的公司由小到大，现在已经拥有土地1,700亩，固定资产3,300余万元，建有粮谷作物园、林果园、花卉园、水生植物园5大园区，建43型节能日光温室20栋，引进、试验、示范、推广紫杉、云杉等名、优、新、特品种1,200多个。更有大学以上学历、来自城市的打工仔30多人。

苏萌园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苏是她的姓，萌是萌芽的意思，寓意广阔成长。她希望她的事业会由萌芽长成大树、长成森林，可命运又一次伸出它的魔掌，想验证她是不是一块真金！

1998年5月14日晚，忙碌了一天的苏艳霞已经疲惫不堪，都准备休息了，可9点多钟，室外的风吼声越来越大，她担心温室出事，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赶往基地。在路上，雨就下了起来，风也更猛烈了。好不容易赶到了基地，远远地，苏艳霞就看见温室的塑料布已经整体被风吹得鼓了起来，好像随时都要被撕裂，鼓到一定程度又狠狠地甩回来，压得温室咯咯作响。随着一次次地鼓起和甩回，苏艳霞的心也一次次地抽紧着。突然，最害怕见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钢筋架塌了下来，苏艳霞招呼工人们赶忙往上支撑，可人力在庞大的支架和狂风面前显得是那样无力，温室在一点点地塌落着，工人们将苏艳霞从温室里拖出来，苏艳霞瘫软在地上。那是2万多棵最优良的葡萄苗和5万多棵新引进的18个品种的园林树种啊！顷刻间就都没有了，一年的希望也随之而去了……泪水顺着苏艳霞的脸滑落下来。

挫折打倒的只是弱者，对于强者，挫折只是一块砺石。大病一场后，苏艳霞像没经历过任何打击一样，又精神饱满地出现在了田间。她创出的葡萄、草莓立体化生产模式，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产出率。她培植的国家一级保护树种紫杉填补了国内尚无紫杉自繁基地的空白；改良嫁接的紫长茄获省农学会新产品、新技术展评会“金秋杯”金奖。此外，她还开发了高档花灌木和

鲜切花，成功试种了智利桃、辽梅、陕梅、桂花柳等省内独家品种。

苏艳霞的公司和东北林业大学合作，在她的家乡肇东市建成一个东北三省最大的园林花卉科研发展中心，主要目的是使黑龙江省园林绿化树种多样化；还合作成立了两个研究所：一个是濒危植物研究所，主要是把大小兴安岭、长白山一些濒危的绿化树种，如乌苏里皂角，通过高科技手段，使它保存、繁衍、推广起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贡献是不可估量的。第二是成立耐低温植物研究所，把同纬度的国内外一些好的园林绿化树种做一系列的耐低温训练，像金云杉、北美香柏、日本塔榆等，使它适应黑龙江及北方的气候条件。

多少个清晨，苏艳霞在温室里迎来了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多少个日夜，苏艳霞和研究所的人员跋涉在大兴安岭的丛林和内蒙古的沙漠中，寻找和搜集濒危的树木和种子，他们风餐露宿，乐此不疲。

目前，苏萌园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经过8年的试验示范，终于推出了既可观赏又可食用的果树“苏萌小苹果”，由她发明创造的用针叶树的叶子做接穗进行嫁接，并获得成功，攻克了针叶树珍稀品种快速繁殖的难关。在科技界引起了轰动。在此项技术基础上，积极拓展外埠市场，承揽并出色完成了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2万平方米的园林绿化业务，受到省、市领导和中外旅客的称赞。在大庆市政府绿化招标中，雄厚的实力、良好的信誉，一举获得7.5万平方米绿化投标项目。

为发展冬季农业，她一次性投资130万元，率先引进“43”型钢架结构日光节能温室配套设施和技术，探索出北方高寒地区冬季农业生产新模式，一是葡萄套种草莓立体化生产模式。利用空间分布差异，实行高矮结合，提高土地利用率、产出率。二是利用温室生产优良品种的玫瑰鲜切花，由于北方昼夜温差大、光照足，所以生产出来的玫瑰花大、色艳，保存时间长，6-8月远销到广州。新型生产模式的采用和土地集约化经营，使高效节能日光温室亩创利润一跃达到5万元，较好地解决了我国北方高纬度地区四季生产的难题。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由她推广的新技术、新项目共为农民增收十几亿元。

在销售花卉的同时，她还为绿化单位进行园林规划、设计、施工、年施工任务十几万平方米，并且施工范围由肇东逐渐向大庆、哈尔滨等地扩展。你可能不信，哈尔滨新建飞机厂的绿化就是她的公司做成的。多年不懈的奋斗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靠着钻劲、拼劲、韧劲和闯劲，滚雪球似地向前发展。目前她的公司已发展成了集园林规划、设计、施工于一体的规范化的园林绿化公司。

如今，苏艳霞的公司已经取得国家二级园林绿化资质，事业越干越大。她兴奋地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向‘绿色奥运’进军的准备，好几个树种已经被北京奥组委指定为绿化树种啦！”“我要用更多的花草装点人们的生活，这是我一生的绿色梦想！”

可以说，在依靠科技致富的道路上，她成功了。但她并没有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没有停住前进的脚步，而是朝着更高、更远的目标迈出了更坚实的步伐。她有雄心成就更大的事业。

1999年她又在新城乡购买土地50亩，投资100万元建起了10栋高效日光节能温室，将其逐步建成管理科学化、生产区域化、繁育优良化、产品系列化、农科教一体化的新型旅游观光农业，把她的园艺栽培技术带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2006年，苏萌与农户签订了种植3,000亩绿色黑玉米的合同，准备速冻保鲜加工黑玉米1,200穗。这个品种的黑玉米经农业部谷物检验中心检测，可溶性黑色素的含量是黑芝麻的三倍，硒的含量是普通玉米的八倍。今后她将对这个品种的黑玉米进行系列的深度开发，为发展质量效益型农业、发展妇女特色经济再立新功。2000年开发研制的“黑玉米粥”因其独特的丰富硅含量，刚一推出便供不应求，当年销售额达到400万元。

当她的种植园里鲜花怒放、花果飘香的时候，当她的色艳的玫瑰销到广州市场的时候，当她引进的意大利黑玉米远销到日本和东南亚的时候，作为新时代农民的苏艳霞说，她心里涌动的不仅仅是成功的喜悦，更多的是作为中国新型农民的自豪。

“成功”之后

成功，使苏艳霞走出贫困的同时，也为她赢得了荣誉：1989年黑龙江省三八红旗手，1992年黑龙江省第八届人大代表，1995

年全国劳动模范、农业部“如心”农业奖励金获得者、世妇会妇女参与农业技术发展国际理论研讨会全国6名女性之一，1998年全国人大代表，2000年黑龙江省十大女杰、黑龙江团省委十大绿色创业明星，2001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以她为原型的20集电视连续剧《庄稼院里的年轻人》，5月4日她走进人民大会堂领取了由团中央、全国青联颁发的第五届“五·四”青年奖章……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她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将人大代表的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联合更多的代表为三农问题而奔走呼告。也开始了她为农民争取国民待遇而奔走呼告的历程。她结合自己的实际，为国家的农业发展献言献策，维护农民的利益。她说：“都说市场需要什么种什么，什么挣钱种什么，我说这话太难为农民了。我们企业已经进入市场多年，还把握不准什么挣钱呢。农民那么脆弱，几千块钱的风险他们都承担不起，农民怎么找市场？”

苏艳霞还说，“现在农村需要一大批有能力的人来引导农民致富。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让我们感到十分振奋。我想在这次大会上提一个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建议，希望我们的老百姓早日步入小康社会，过上好日子！”她主张农民成立专业协会和经济合作组织，与“三农问题”专家讨论，怎样积极促进“农民合作社法”的出台。她奔走于全国人大代表之间，联合为农民的利益提案呼吁；她认为龙头企业也是农民的市场，农村经纪人就是农民的市场，呼吁国家应该大力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和建立农村经纪人队伍。无粮不稳。她建议国家在鼓励农民种粮的同时，多给农村制定更优惠的政策，多些项目，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到农村投资、发展，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带动当地的农民经济收入的提高。

她的事业的土壤和成功的源泉是生她养她的故乡和乡亲，正如她所想的那样，她要给乡亲们一双发现蕴藏在土地里的金子的眼睛。苏艳霞说：把科技送给农民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是农民的儿女，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她把自己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无偿传授给乡亲，传授给慕名而来的外地农民。四站镇凡有果树的农户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在她的带动和帮助下，全镇有2,100户从事蔬菜和林果生产，红星村90%的农户建起果园和葡萄园，年收入达70万元。对四站镇老贫困户一家，

她主动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赠给他3,000棵果苗，并亲自指导他生产，使他一跃成为年获得3万元的富裕户。齐齐哈尔梅里斯区达呼尔镇复兴村的康颖在她的帮助下，现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肇东市德昌乡合胜村王冠的年收入超过20万元。十几年来，她为全市500户栽植果树农户和千余名菜农免费提供技术咨询。回复全国各地科技、信息咨询信21,000多件，免费寄送科技资料和种苗人民币40余万元，接待外地前来考察学习人员1万多人次。她说，帮助农民致富是我的心愿。2000年，她与农户签订了227公顷绿色黑玉米合同。她在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商店、旅游景点设黑玉米销售点80余处，帮农民打开销路，还安置了120名下岗女工再就业。农户种1公顷黑玉米多收入4,200元左右。1994年，她为“希望工程”（资助农村贫困子女上学）捐款3万元。从1995年到现在她每年都资助两个贫困学生，由她资助过的贫困学生已有两名考入高等学府。

为了加快广大妇女“科技兴家奔小康”的步伐，省妇联于1994年在她的公司创办省妇女“双学双比”种植业协会，由她任理事长，现已吸纳会员810人，培训妇女四千余人。通过传、帮、带，她向广大妇女姐妹传授的园艺技术已经成为她们致富的“金钥匙”，很多妇女姐妹靠它走上了科技致富的成功之路。她推广的新品种、新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已达到上亿元。

绿色之梦 回报社会

苏艳霞说：“我创办的公司和我的性格一样，创业无穷期，追求无止境。”

她说：“我真心地希望，我和我的公司能为我的家乡乃至全国的各个城市增添一点绿色、亮色和美感。绿色的梦，是我永远的追求。”用她自己的话就是：“我现在想的，已经不是怎么样赚钱，因为那是永无止境的。我最想做的，是怎样回报社会，怎样帮和我的父老乡亲一样的中国农民过得更好，过得更舒心。”



文:余旻

她不是个有钱的人，却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绿化了一片土地，改变了生态环境，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理解是暂时的，一个美好的心灵支撑一次有意义的选择，对她而言，这就是和平事业，为了当地人，为了黄土地，她接受这样的挑战。

贫困面前不能有旁观者。一滴水、一棵树汇聚成河川丛林，一颗心、一份爱温暖出美丽新世界。

山西临汾地区，大宁县榆村乡金圪塔村，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坡耕地占80%以上，早年不生苗，涝年脱层皮，自然环境的恶劣造成人们生活的贫穷、精神的匮乏。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女人，会穿过层层煤灰尘雾，绕过重重曲折山路到这样的地方来工作，而且一来就是8年，还要一直待下去，待到生命的终止！

梦魂萦绕为哪般

程炜和她这个年纪的同龄人一样，有着与共和国息息相关的经历：1968年，年仅18岁的她来到山区汾西县农村插队，她很积极，很快在汾西入党，1972年初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专业，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一定高高兴兴地留京了。可是，出乎人意的，1975年底毕业时，面对山西汾西县委的邀请和留在父母身边工作的机会，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对她有大山般感情的汾西，第二次回到山区，担任马沟村党支部书记，后来，被任命担任县化肥厂基建指挥部副总指挥，并在1978年任县委副书记。1978年底，因身体、家庭等多种原因，程炜调回北京市朝阳区幸福村中学当了一名灵魂工程师，尽心尽职，这样一晃便是18年。

按理，她应该会就这样相夫教子、教书育人，平平静静度过自己的生命，然而表面平静的她，心中沉甸甸的记着依旧在山区生活的父老乡亲，她多次梦回山乡，醒时又身不由己。

偶然是潜在的必然，她终会从一个必然走向另一个必然。

1996年8月，一张“汾西县解放50周年纪念会”邀请书让程炜又一次来到山西。在去汾西开会的路上，随着滚滚黄土，过去的岁月激荡起来，她没急于回京，而是想再看看那曾熟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想看看多少年魂牵萦绕的地方。程炜去了马沟村，挨家挨户拍照、录像，想留下乡亲们变迁的影子，访着、拍着，她的心越来越沉，她的希望同当年她带领村民种的泡桐、杨树一样，在那条熟悉的小河边，荡然无存了。

“阔别18年，北京等地人们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却山河依旧，当我走进当年老支书乔月明的家时，想不到他住在原是仓库的破土窑里，他得知我来看他，从蜷缩的炕头一点点爬起来说：‘娃住窑，我老了，见一分钱也不容易……’我拿出一百元钱塞在他手中时，老人声音颤抖着却一句话说不出来，两行老泪顺颊而下。”

“我们到金圪塔村里唯一的小学校时已经9点多了，仅有7个孩子，教室里有几根直径约20公分、长2米多的木头，地上铺的是玉米秆子，孩子们就坐在玉米秆子上，木头当桌子上课。这是两间平房，已经成了危房，屋顶的大梁已经弯了，4个墙角已经

拱出，窗户上没有玻璃，用塑料布钉着，而且塑料布已经氧化，脆的正一块儿一块儿往下掉。屋里没有火，孩子们衣衫单薄，脚上多数只穿着单鞋，没有袜子。冻得红肿的小手还在那里艰难地写着字。我用摄像机留下了这些镜头，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一位仅有十六七岁的姑娘是这里的老师，她是村里的小学毕业的，是这个学校的代教，每月的工资是45元。学生们自己带饭、带水，这里没有火，中午只好吃凉的。孩子们住的远，来齐了也就10点多了，下午两点多放学，路远的到家就天黑了。这个学校有十几个学生，分3个年级。一个这样的学校毕业的小学生，现在教3个年级，还奢谈什么教育质量呢！心里沉沉的离开了这所学校。路上村里的人说现在村里因为穷和路远，有20多个孩子失学……”

“那次返京后，穷山村的影子白天夜里追着我，郁结着我，我没法从中跨越出去。一有空，我就抱着相册看，放录像看，看这些曾熟悉的，插队时待我亲如父母的乡亲们还过着贫穷的生活，每看一次，心灵就被冲击一次。十几年的京华岁月我从未忘记他们。但这次却被震撼了。我一遍遍问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是47岁的人，日子安稳，但一想到他们，心就被揪住，我明白，我将再次选择，我要出征！”

“旧地重访”促成了她几个月后第3次重返山西的扶贫义举。1997年3月18日，程炜带着自家的20万资金，离职舍家，放弃北京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第3次踏上了开往山西的列车，她要去的，是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山区——大宁县榆树乡金圪塔村。

她带着20万元钱，提着两个箱子来到这个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朋友、完全陌生的贫困小山村的同时，流言蜚语似乎也同时到来：“她想出名，捞点政治资本。”“谁知道她大老远到这穷山沟沟里来，是为了什么，没准来挖什么宝吧。”“兴许是家庭问题，她跑来避避的。”……在坦荡的二郎山面前，在愁苦的赤贫面前，这样的语言卑微如尘埃！程炜的耳中没有这些杂话，她的脑海中只有初来时遇见的那个和女儿同是13岁却一天学都没上过的小姑娘、那所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学校、那个一身病痛却只可以自生自灭的老太太、那座隐藏着优越旅游条件的二郎山……她辄

转反侧，不为谣言苦，只想自己能帮他们做点什么。

汗水与耕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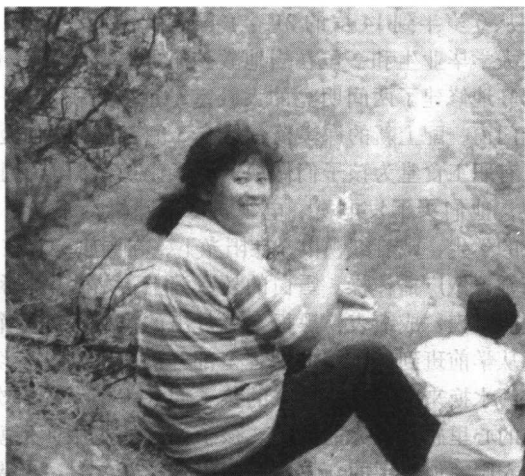
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靠天吃饭靠国家给粮的观念！程炜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办学校。她要让这些孩子可以上学，由教育孩子来改变成人。借着国营林场的两间窑洞，1997年9月1日，五星红旗在“金圪塔幸福小学”操场上冉冉升起，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年龄从6岁半到14岁的21个孩子，统统上一年级，两名来自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和一位在当地教孩子的老师。其后不久，程炜在公司驻地修建了两间明亮的大教室，每间面积72平方米，4个铝合金门窗，配上新的课桌椅，另有3间窑洞作为路远学生的宿舍，又有职工食堂为孩子们做饭，为了让孩子们能看上电视和晚上自习，他们买了发电机、电视机、影碟机。那以后的每天，穿着校服的学生，戴着红领巾，在阳光下，在国旗旁，在音乐里，由老师带领着做广播体操。雪白的教室墙上，贴着中国和世界地图、学生值日表、成绩表，黑板上每月出的黑板报，每个老师身兼数职，从学前班到三年级的课程全部开满。看到这一切，这辛勤劳动和汗水换来的一切，换来的孩子们一张张幸福、欢快的笑脸，程炜的心里感到莫大的欣慰。孩子们穿的衣服，是朝阳区教委捐来的衣服，他们用的新书本、新书包、新文具、新课桌，是程炜一件件亲手置办的。这些远比城里孩子懂事、能干的山里孩子，在这里改变了命运。他们从现在开始，已经不是那些放羊、挣钱、娶媳妇、生孩子、再放羊的孩子了，他们前面有不可限量的前途，正如在幸福小学教室顶端的白墙上巨幅鲜明的大红标语那样：知识是你们的希望，你们是中国希望。

程炜刚到这个村的时候，道路不通、没有电、有20多个适龄儿童失学、吃水困难、全乡占地100多平方公里，只有乡政府一部铜线电话，一刮风下雨电话就不通了。全村200多口人，分散在19个自然村，村与村之间最远的距离30多里地。全村占地22,500亩，只有耕地1,400来亩，大部分是荒山和荒坡，农民没有任何娱乐，为了生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村没有任何机械、电器，没有一间砖窑，村民衣着破烂不堪。

经过长达8年的艰苦努力，现在的金圪塔村不但从基础设施

上有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收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道路通了，虽然现在还是土路，毕竟是宽8米的土路，拉10吨货物的卡车可以放心的走了，山里农民的粮食、土豆、苹果、核桃、药材、木耳、蘑菇，在家里就可以卖出，农产品变成了商品，农民所需要的化肥，生产资料门市部可以直接送到农民的地头上，过去这些都是要农民赶着平车用牲口来回拉的，每次拉的很少而且很慢。



其次是电，程炜想方设法找省电业厅给这个村拉上了电，结束了这里点煤油灯的历史，尤其是看上了电视，现在家家户户都买了电视、卫星接收器，可以看农业教学片，学习管理果树、如何养殖，山里的孩子再也不会只知道“中国——金圪塔村”了，山里的农民从电视上获得大量信息，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不再盲目的满足现有的生活，议论的话题开始改变，已经开始考虑除了在地上做文章以外，如何寻求更大的发展——了解了外界的变化，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程炜还请求国家信息产业部帮助安上了手机信号塔，解决了周围方圆几十公里农民的通信问题。农民可以通过电话联系农副产品的销售，减轻了坑农害农的问题。发展了养殖业，农民养的羊、牛有了病，电话可以找来兽医及时治疗，大大减少了农民的损失。

她给资金、拉水泥帮助农民家家打旱井，现在每家都有两至三口旱井，人畜饮水的问题解决了，人们再也不用用牲口到很远的地方去驮水吃了。有了水，更可以在自家的地里种一些蔬菜，安排得好的家庭，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吃，再也不会只用咸盐拌面条吃了。她还积极引水上垣，把海拔1,248米的山沟里的泉水引到海拔1,438米的山顶上，克服了气候、资金、时间紧迫等难题，更亲自参与工程，不仅让一部分农民可以喝上清甜的泉水，而且使得黄土高原上的植树造林成为可能。

她找农业科学院请专家论证，这里适合种植什么作物，科学种田，调整产业结构，使农民增产增收。又从北京农业科学院、大同高寒作物研究所、交城枣树研究所、山西农业科学院等许多地方引进优良品种的种子、树苗、优种羊，分发给农民，带领他们植树种草、发展养殖，使生态形成良性循环。现在他们植树、种苜蓿、种药材、收山桃核、收山杏核、采木耳、采毛肚菇、搞养羊、养牛、养鸡、养猪，每年的植树季节、春种、秋收季节到公司打工，每年只干上20来天，就能有近千元的收入，肯努力的家庭，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热血壮志、美丽心灵

程炜住的窑洞墙上挂着的是金圪塔村地形图，大宁县交通图和她自己的举措——第一，要把金圪塔村荒坡荒地，开发成高科技农、林、牧、副的试验基地。取得经验后，逐渐推行，让农民直接受益。第二，为要把二郎山尽快开发成自然风景旅游区，把金圪塔村现在的破学校和几个特困户的住房与摆设保留下来，作为城市学生的教育基地，这叫做旅游扶贫。第三，要把金圪塔村居住分散的19个自然村，移民并成3个村，集中解决通路通电通水问题，彻底改善他们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这叫做迁移扶贫。第四，要在3个村建3所学校，使现在失学的20多名孩子和现在上学的18名孩子，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叫做教育扶贫。3年内，要使金圪塔村达到小康标准。

她的设计正一步步实现着。她的举动价值连城。如果选择自己的小家只有几个人需要她，但选择如此贫困偏僻的金圪塔村却有更多人需要她，她本可以像北京街头任何一个人那样生活着，

安详地工作、洗衣、煮饭，安逸地度过一生，但她关注着更多的同类，想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更多人的命运，这便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生命价值。

她常说：“如果有钱的人，除了自己享受外，拿出一些资金，选择一些好的项目投到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用不同的方法做一点贡献，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摆脱贫困的力度就会加大，投资人也会收到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她不是个有钱的人，却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绿化了一片土地，改变了生态环境，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况且又身患心脏病、胆囊炎、胆结石，却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最大的贡献。1997年底，她回家时手里的20万只剩下70元，连火车票都不够了，是一位记者给她买了火车票才回到离开一年的家。她不是称职的妈妈，她为贫困地区的人民做了许多实事，让村里受了益，却牺牲了自己的好母亲的职责，苦了自己的孩子。刚到金圪塔的那段日子，因为那里没有电话，她想给孩子写封信，可是提起笔就想哭，一封信写了3遍都没写完，信纸全被泪水浸湿。妈妈想孩子，撕心裂肺地想——别人说什么都行，就是不能提孩子，只要一提孩子，她的眼泪就不由自主的流下来。她不愿去人家家里，看见别人一家其乐融融就想家，不能听见人家孩子叫妈妈，一听就想孩子，就想哭。一到夜里，空空的大院子不剩几个人，心里更加空荡荡，更觉孤独、凄凉，也是加倍地想孩子。这8年，她每年都是忙一年，直到腊月底才能回来和家里人团聚。

在金圪塔的日子并不只条件的恶劣，程炜遇到过误解、遇到过委屈、遇到过无可奈何，甚至有一次惊险无比的车祸。这样的時候，她硬是咬牙坚持着挺过来了。真正让她落泪的，却是得到许许多多人的许许多多理解、帮助和支持：母亲、丈夫、女儿的深深理解是她巨大的精神支柱；曾经下乡到这里来的知青们捎来的问候和鼓励让她明白自己并不孤独；同事们的默契和配合是她艰苦努力终有所回报不可缺少的部分……。

程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她常说：“到我们这个年龄，对什么名啊利啊，都已经看得淡了，宠辱不惊。这件事我做了，不为求什么，是内心特别坦然。我没有什麼满含激情的豪言壮语，更没有什么一板一眼的套话。别人问我，我都是实实在在地回答

‘我来，就是想为当地老百姓办一点实事，办一点我竭尽全力能做到的事情’。我该做的，我都尽力去做到。”的确，大到筹划决策，小到选苗栽树，她都事必躬亲；喜欢干脆利索的她，在同事眼里，是个踏踏实实做事的“领路人”。在她的桌上，放着不少书，有《大宁县志》、《哈默博士传》、《企业法律事典》、《情满黄土地》等，她敬佩那些艰苦创业、不忘回报社会的杰出人物，因为他们身上流淌着和她一样的热血。

有一位记者为她拍了一组她站在二郎山顶上的照片，画面中她飞扬的神采表露着内心的不羁。她还经常对记者说：“我不是红色的，千万不要把我写成红色的，应该写成全颜色的，我就是一个人，可能比一般人多做了一点事，一般人有的毛病我都有，我就是一个人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

对于未来，她的脑海中有个美如诗画的图景：山里建成一个小小的庄园和有机产品基地，果树全都特别好，枣、樱桃什么的全都特别甜；整个生态平衡地养殖、放牧、种树造林。还开发出二郎山的旅游区，让外面的人们进来看看，让山里的人们多多接触外面、接收外来资源……。

脚下的路

程炜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8年来，她战胜了自然、资金、人为的、自身的多重困难，坚强地克服着艰难困苦，终于，各项扶贫工作有了非常大的进展，为了贫困地区的人民，她还要接受各种严峻的挑战。尽管有支持，以及形形色色的称赞、爱护和热情。但表面的热烈以后，她的路依然是艰辛而曲折的，资金短缺常常限制着项目的进展，甚至她支付自己的一点开销花费都会变得困难；她打动人心的坚强背后有着掩不去的脆弱。作为一个女人，她想成就的这一番事业注定她必须备受考验，她所承受的艰难，外人很难明了其中的滋味。有一次程炜上县里买羊，不知怎么有了些误会，招待所没跟她打招呼就给她换了房间，夜里精疲力竭的程炜找不着休息处，便一个人在寒冷的大宁河边静坐了一夜。也有个别人说：“你扶贫，我干吗？”或调侃“20万元扶贫，一碗胡椒面也撒不匀。”有时一些报道的失实之处，也使其陷入极大的困顿中。对于各种风凉话，程炜的态度很坚决：“没啥，事实

会改变人们的看法，为干事业，我不后悔……。”

不理解是暂时的，一个美好的心灵支撑一次有意义的的选择，对她而言，这就是和平事业，为了当地人，为了黄土地，她接受这样的挑战。她把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写在墙上、记在心里：“人生的价值，不是看他当过多大官，也不是看他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看他对人类做过什么贡献。”

这当然也是全世界的和平事业。贫困面前不能有旁观者。一滴水、一棵树汇聚成河川丛林，一颗心、一份爱温暖出美丽新世界。程炜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不平凡的经历，是在用生命谱写扶贫济困的壮丽的诗篇；她是先行者，但她不会是独行者。

李雪波

『和平』
赋予实干的妇女



文：游丽金

为贫困妇女走出家门、走向市场、参与社会活动、参与商品交换提供了机会，妇女参与家庭决策的意识增强，反贫困能力提高，家庭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479

赤峰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自然条件恶劣，是一个以蒙古族为自治民族、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全市12个旗县区，有8个国家贫困县，2个是自治区贫困县，全市总人口460万，其中贫困人口51.2万。贫困人口当中，妇女儿童34.2万人。

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李雪波——赤峰市的副市长，她从上任开始，就一直在为改变贫困人口的状况而努力，采取的诸多措施也是定位在他们身上，她希望让这片贫瘠的土地焕发出美满与富足的光辉。作为副市长，她有着自己日常范围内的工作，但是，她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从来没有间断过，妇女，老人，儿童，本来就是弱势群体，而农村中的这三者，更是弱中之弱。她寻求资源，

给予政策优惠，工作重心倾向，无一不是针对贫困人群的。

也许，赤峰市的百姓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副市长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因为她离他们的生活太遥远，因为老百姓对政府工作的不了解，但是，老百姓能够感觉得到政府为他们办了实事，办了好事。

扶贫脱贫

2001年10月，赤峰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雪波调任赤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兼任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面对新的工作岗位、工作形势，特别是妇女工作领域，她迅速适应工作角色，确立了既符合赤峰实际，又满足广大妇女群众的意愿，更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工作机制，调动各方积极因素，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特别是通过小额信贷扶贫、劳务输出扶贫、救灾扶贫、“手拉手”扶贫、救助失学女童等工作，希望帮助妇女脱贫致富，使她们的生存条件以及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改善。

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李雪波树立了“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对外开放意识和新的发展观、人才观、市场观，改变过去的“等、靠、要”思想为“找米下锅”、“借船出海”，积极利用一切有利时机与国内外有关组织机构进行广泛交流，借助外力促进赤峰市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



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的“内蒙古扶贫与妇女参与发展”项目得到后续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因势而宜，成立“赤峰

市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持续以小额信贷的形式开展扶贫活动。先后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本政府、孟加拉乡村银行、德国复兴银行的支持。截至2004年6月底，已累计向8,500多个贫困家庭近4万人口提供了2,880万元的小额信贷，并保持100%的还贷率。为贫困妇女走出家门、走向市场、参与社会活动、参与商品交换提供了机会，妇女参与家庭决策的意识增强，反贫困能力提高，家庭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为帮助贫困妇女脱贫和实现妇女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李雪波同志集思广益，积极部署，号召各地区要把劳务输出工作作为引导广大妇女脱贫致富和提高素质、培养女性人才和促进对外开放的战略性任务来抓，并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倾斜。从1999年至2004年，赤峰市妇联组织共输出劳务人员12,000余人，她们已经成为推动农村妇女自身进步发展的重要力量。

李雪波还非常重视女童教育工作，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将救助贫困女童作为贯彻《赤峰市儿童发展规划》、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抓好抓实。她多次亲临现场参与救助活动，反复强调、极力呼吁关心儿童、爱护儿童、支持儿童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每年，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都要召集成员会议，要求各成员单位发挥职能优势为儿童多办事、办好事、办实事。赤峰市自1994年开始实施“春蕾计划”，截至2004年6月底，全市各级妇联组织共接受国内外捐款530万元，已使9,000余名失辍学或面临失辍学的女童得到救助，保护了女童的受教育权，同时也唤起了人们的爱心和责任心，倡导了助人为乐、互相帮助的良好社会风气。

2006年11月，赤峰市举办实施春蕾计划“三十佳”表彰暨亲子活动展示会。活动以“亲子携手共建和谐”为主题。来自城区6所幼儿园的儿童及家长，包括来自辽宁等省市的10多名打工妹及其子女共700多人参加了展示活动。李雪波在开幕式上号召更多的人积极奉献爱心，关注女童教育，多为女童办好事办实事，在全社会倡扬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新风尚。会议表彰了“十佳春蕾女童”、“十佳春蕾园丁”、“十佳春蕾计划工作支持者”。小朋友表演了充满童趣的幼儿舞蹈、说唱小品。当然，这项计划还将延续。

关爱女童行动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雪波实施的关爱女童行动工作。该项工作从2004年开始分阶段进行，从提出，到宣传，到实施，配合具体的措施，朝着明确的目标前进。她作为行动组的组长，认为女童关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未来，她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在实际工作中，她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把宣传教育、依法行政、利益导向、技术服务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对人口问题的综合治理，实行标本兼治，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趋向正常，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在这一行动中，她提出要继续开展扶助贫困母亲和救助贫困女孩行动。号召“妇联、工会、共青团及扶贫部门要同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积极配合，争取和广泛筹集幸福工程和希望工程资金，开展贫困母亲及贫困女孩的救助工作。要在经过认真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落实救助对象，明确帮扶责任，建立救助档案，选好帮扶项目，制定帮扶措施，使贫困母亲能够尽快摆脱贫困。各相关部门要把关爱女孩行动纳入工作的职责范围，为女孩的成长创造有利的条件，教育部门要把保障女孩受教育权利作为关爱女孩的重点，提高女童入学率。对贫困女孩家庭要采取社会捐助和一对一帮扶的形式，解决贫困女孩的学习和生活困难，为其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倾心情系女性，献才智驱贫穷，这是李雪波同志在促进妇女发展工作中的不懈追求。作为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多年来，她求真务实，勤奋敬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赤峰市的妇女儿童，铺就了一条发展之路。

范琼花
外姓女人当村官



文：赵玲

有范妈妈，我们可以像么儿么女一样伸出小手，撒娇地扑进妈妈的怀；有范妈妈，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最幸福的童年温暖。我们虽然远离父母，但并没有丢失母爱。

走在标美村道路上，喝着清澈甘甜的自来水，宽敞明亮的教室传出朗朗读书声，让方广村的山笑了，水笑了，人也笑了！

方广村坐落在凤凰山麓，是蓬安县条件最差的一个小山村。我们从成都一路转了两次车，经过了14个小时的车程才到达这个小山村。范琼花跟我们说她在1986年嫁到了这个村子。这个村子在1996年以前，以穷和烂而闻名徐家镇乃至全县，村中因为村领导的腐败，使得村集体经济负债累累，村民对村社干部怨声载道，村中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十分僵硬，村里各项工作年年在全镇排列倒数第一。因此在1996年3月，面对艰苦的条件、混乱的局面，

前任村支书决定一走了之，辞职到广东打工去了。一位复员军人接替工作，刚干两天也觉得无能为力，放下担子就走。村里面没有了支书，没有了一个带头人，村里更乱了，方广村的村民纷纷推荐时任村主任的范琼花来担当村支部书记这个重担。

范琼花的丈夫邓东平回忆起当年，笑着跟我们说：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不好，晚上就做她思想工作跟她说：“琼花，支书走了，男同志都不接，你也千万不要接啊，这个活又累又得罪人，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还不如把自己屋里的产业搞好。”

范琼花当时也想了一下，按她的说法，她就是那种不愿意认输的人，从小碰到什么别人做不来的，她就要碰一碰。因此，面对这个村里领头人的挑战，范琼花想了几天后，就把这个活给接下来。她跟我们说：“呵呵，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思想也比较传统。当时看到我们村这样落后，老百姓这样穷，我这个共产党员心里着急啊！如果老百姓要我来领这个头，我就只有尊重民意，碰一碰这个硬骨头咯。”结果，在等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人愿意接这个村支书的情况下，她毅然接过了村支书的担子。

外姓女当家

范琼花当选为村支书，从未有过女人当家的方广村“炸”开了，有的村民很怀疑：“我们村男人都搞不好，一个女人就有法？”其中一个村民叫邓爱平更是出语伤人：“邓家沟的男人死完了？让个外姓女人当家？”这样的风言风语在整个村子里面流传开来。许多人都等着看这个女人怎么去扛这个领头人的角色，都等着看范琼花当上村支书第一件事情办的是什麼。面对村子里面对自己作为一个外姓人，作为一个女人的不信任，范琼花并未退缩，她清醒地认识到：要改变全村的落后局面，首先要用实际行动赢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先把村里的干部“修理”、“修理”。

在范琼花的带领下，一系列整顿干部作风的活动迅速在方广村开展起来。针对村里账务不公开，村民有怨言，范琼花积极组织人员清理村上账务，“强迫”村社详细公布账目，许多灰色收入就此堵住。同时给村组干部立下规矩：“谁敢公款吃喝，我就把谁的名字贴在墙上让村民说说看看。”当范琼花亲自把村里近10

年没有公开的账目贴到村中公告板上的时候，村民争先恐后的去看。范琼花回忆道：他们一边看，一边用手指，嘴里骂着那些挪用公款的前领导人。有些不认字的村民让别人念给他听。账目的明明白白换来了以后村中干部的“清白”，村民气顺了，心平了，与干部的关系好转了。当我们问到为了公开这个账目，她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的时候？范琼花只是一如平常的发出爽朗的笑声，说了句：“都过去了。”

账目公布出来了，但是村里面还有些干部常常贪一些小便宜，处事不公，导致一些村民对干部不信任，认为干部都是帮自己人，不会主持公道。范琼花当时刚刚上任，只能通过以身作则，自己对自己严格要求，秉公办事，来影响村里其他干部，加强村里领导人的威信。1996年，范琼花丈夫的堂哥，想超生一胎，范琼花坚决阻止，不惜和他们家翻脸，以致堂哥砸了她家的玻璃，与她家中断了关系。范琼花的行动，村民看得清清楚楚。曾出言不逊的邓爱平亲自上门道歉，带着两个女儿硬要和范琼花的孩子认姐妹。通过这样种种长期的努力，过去不信任的村民纷纷议论：“范书记与以往的干部不同了，我们方广村有希望了。”

当村子里面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稍微缓和的时候，范琼花就开始在想有什么办法能让全村百姓尽快致富。为此她常常自费出去学习参观别村的好的经验、订阅杂志、关注新闻了解农村的发展方向。当她出去看到别村人都富裕起来，看到电视上那一个个模范乡村的时候，让村子变富裕的想法变得更强烈了。依据当时的中国农村的大趋势和村里面的实际情况，范琼花觉得让村上剩余劳力外出务工是一件吹糠见米的良策。于是，她便开始鼓励村民外出务工挣钱。可谁也没有想到，村民倒是外出务工挣钱去了，范琼花却当上了36个孩子的“妈妈”。

范琼花告诉我们，当上这些孩子的妈妈，她一点也没有想到。事情本来很简单，方广村里5组的邓天受老两口膝下有4子4媳，个个身强体壮，可却穷得为了柴米油盐成天婆媳争闹、兄弟反目。1998年的7月，他们家又为了一些小钱争吵起来，范琼花去当协调人。一边劝架，一边动员邓家兄弟外出打工，跟他们描述了别的村里人家去打工的情况，分析他们自己去打工可能赚的钱。把出去打工的好处一条条道理说出来。第二天，邓家兄弟妯娌不顾

父母反对，全部南下广州。不料，邓天受夫妇因年老体弱实在无力照顾孙儿孙女，一怒之下，将孙儿孙女全部送到了范琼花家：“你‘拐’跑了我的儿子媳妇，就得照管他们的娃儿！”范琼花至今仍记得那股直窜脑门的火：好心还要遭“恶报”？但看着无助的老人和无辜的孩子，心地善良的她很快就平静下来，6个孩子当晚就在范琼花家吃上了热饭。

没过多久，村民袁召兰拉着3个正上中学的孩子来到范琼花家，讷讷着开了口：“范书记能不能帮忙照看一下这三个娃儿……”面对她祈盼的眼神，范琼花默默地将3个孩子拉到身边。第二天，已无后顾之忧的袁召兰夫妇就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南下打工之路。

这件事启发了范琼花：要改变方广的穷苦面貌，鼓励村民外出挣钱，就得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当好“看家人”。就这样，在近两年时间里，村里27户外出打工农民的36名孩子先后被范琼花“接管”了。从那时起范琼花手里就有了一本账册，详细记录着孩子们的日常开销，也记载着她对孩子们的悉心关爱。一次，邓春林的儿子邓波把同学的头打破了，范琼花得知后赶紧上门给人家赔礼，并“破费”付了37元医药费。2001年底，一名在徐家中学住校的孩子突发高烧，劳累了一天的范琼花连晚饭都顾不上吃，打电筒冒寒风踏泥泞赶到学校，两天的住校护理使孩子病情迅速好转，跟上了学业。如今，这名叫唐志华的学生正在西华师范大学读大学二年级。就这样，在范琼花的教育和照顾下，36名孩子已有8人考进初中，19人升入高中，3人考入中专，6人考进大学。当我们想继续了解范琼花更多照顾孩子的事情时，范琼花笑着回答道：这些事情，说多了不好意思，反正当时不做也得做，那就做了得了。



这么多孩子的到来成了范家生活水平的“分水岭”。范琼花一家曾是方广村“先富”起来的家庭之一，范琼花聪明能干，丈夫邓东平吃苦耐劳，庄稼地里、养猪养鸡都是一把好手，在许多村民还住在土墙房的年代，他们一家就修起了让人眼热的砖瓦房。可自从范琼花当了村支书后，一家人的生活反倒停滞不前，不见长进了。许多村民都住进了新楼房，而她们一家仍住在1987年修的老瓦房里，摆设着一台旧黑白电视，一把老吊扇，稍微像样点的衣柜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老样式，而且捡的还是她妹妹的“淘汰货”。为了孩子，范琼花作出了感情与金钱的双重付出。当初邓春林夫妇将两个孩子交给范琼花，一走就杳无音讯，如今孩子已花去她6,000多元。“有啥办法？他们打工没挣着钱，总不能让孩子饿着、冻着、辍学吧！”几年时间，慈母般的范琼花贴在孩子们身上的各种开销达2万多元。

家里面的孩子多了，自己家的两个孩子常常抱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关爱。范琼花提起她的两个孩子，感觉有很多愧疚。很多时候天气转冷，睡觉的被子不够，范琼花总是把自己孩子的被子拿出来盖在别人孩子的身上。自己家孩子与其他孩子吵架，打架，她也是二话不说地把错都放在自己孩子身上。“这些孩子可怜，爸妈都去打工了，好久没回来一次，心理非常敏感，我不能被别人说闲话，就对自己的孩子凶一点吧。”起先她的孩子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妈妈不爱他们了，等到长大后慢慢就了解了。

爱的付出，终有回报。孩子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范妈妈”的爱，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我们36个兄妹来自不同的家庭，拥有一个共同的妈妈——范妈妈。有范妈妈，我们可以像么儿么女一样伸出小手，撒娇地扑进妈妈的怀；有范妈妈，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最幸福的童年温暖。我们虽然远离父母，但并没有丢失母爱。”一天，上学的孩子们一个不少全都回来，范琼花以为出了啥事，孩子们却把藏在背后的各种小礼物齐刷刷地举到她面前，一曲稚嫩的生日快乐歌，唱得她热泪直滴。当范琼花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眼中不禁泛出泪花。

范琼花这样无私的行动为村民解除了后顾之忧，全村230多人外出打工，每年抱财回家近100万元，70%的农家翻修了住房。每当那些出去打工的父母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总是先到范琼花

家里耍一耍，坐一坐，表达自己的谢意；在外打工的邓怀全写信感谢范琼花对他子女的细心照料，表示“今后一定要全力支持您的工作。”在广州务工的邓晓阳夫妇在信中写道：“请范书记放心，我们在外面一定守法务工，合法挣钱，绝不给家乡人丢脸。”范琼花对人的责任，对村子的责任感感染了村子里面的其他人。从1996年起，方广村的村干部再也没去农户家催粮催款了，村民们总是主动纳粮完税，农民税费提留上缴率都在99%以上。1999年以来，方广村成了“无一例计划外生育、无一例农民负担导致村民上访、无一例因违法受到刑事和治安处罚”的“三无村”。

富民之措 方广村直奔小康

随着一拨又一拨的村民外出打工，挣回了一扎又一扎的钞票，许多村民笑了。但范琼花笑不起来。她知道，一人富裕不算富，要让全村老百姓都富了那才叫富啊！方广村还穷啊！

方广村离县城30多公里，“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是该村最真实的写照。村民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的收入仅够糊口，过去村上的不少小伙子都把去外乡女方家落户作为“脱贫”捷径。

方广村人的小康之路究竟在哪里？为了让方广人民尽快脱贫致富，范琼花到处学习取经。在不断学习对比中，范琼花慢慢觉得出外打工毕竟只能是几年的事情，村里的人最终都要回到村子里面的。而且这几年出去打工越来越不容易挣钱了，范琼花开始慢慢想怎么才能把村子里面的经济建设抓上去。她开始结合本村实际，确立了“努力突出基础设施建设、广播电视村通工程两大重点，集中力量发展养殖、水果、蔬菜三大产业，确保实现全村经济总量、集体经济、农业税、人均纯收入四方面增长”的发展思路。

方广村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成了制约村域经济发展的瓶颈。范琼花和村干部决定先修路：每位村民只出1元钱用作炸石费；再将路分段给社，社分段给村民，大家义务投工投劳。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苦干3年，终于筑成了一条宽5米、长6公里的标美村道公路。方广村缺水。旱时，人们总是排着十几米的长队“抢水”。为了水，范琼花跑了不少路。1997年，当镇政府补贴方广村打井建池的8,000多元下来时，范琼花兴奋地当即邀

上十几位村民进镇买石材。钱不够，范琼花又自垫3,000元。一年又一年地干，赢得了县水利局的大力支持，到2005年，方广村打卫生井70口，新建供水站3个，整修山坪塘4口，新建蓄水池20口，彻底解决了全村人畜饮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问题。

“凤凰山上光秃秃，栽一株树死一株。”以前的方广村一到雨天特别是下大雨就洪水泛滥，不但破坏土壤结构，还严重威胁村民的财产生命安全。于是范琼花就动员大家搞绿化，既改善生态环境又可美化家园。如今，30万棵柏树、5万多株马桑、7万株果树把方广装扮得美丽怡人。

“破庙为教室，下雨水乱流，教师不愿来，家长心中愁”，是原方广村小的真实写照。看到孩子们坐在破旧、阴暗的教室里念书，范琼花心里着急得很，带头捐款1,000元，修缮学校。在范琼花的带动下，村民们踊跃捐资，短短数日，就多方筹集资金近33万元。于是，一所集教室、宿舍、运动场为一体的新型标准化村小不到3个月时间就矗立在村民面前。同时，总面积180平方米的党员、村民活动室也一并建立，并在县委组织部的支援和帮助下，配置了电教设备，添置了活动设施。

当基础条件得到改善后，范琼花又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头等大事。听说养殖黄羊能够赚钱，范琼花就多次到县畜牧局争取支持。于是，在县畜牧局在大力支持下，经过科学规划，全村养殖黄羊2,000余只。仅此一项，人均增收就达1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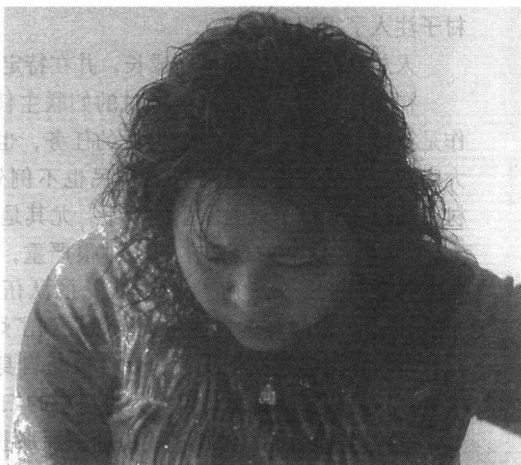
为了发展水果和蔬菜业，范琼花决定在自家地里先试种一年，让村民看看再说。于是，范琼花在坡上栽柑橘，地里种莴笋、海椒，当年仅蔬菜收入就超过了1万元，村民们大开眼界，种植热情高涨。在分析市场行情和实际种植效果后，范琼花决定走“山上栽树子，山腰找票子，山下饱肚子”的立体开发路子。同时请来技术人员传授技术，为每户人培养一名“科技明白人”。村民刚尝到甜头，卖难问题却又接踵而来。第一个遭遇的便是水果大户邓自由。1997年，雪梨丰收5,000公斤，而当地市场价格每公斤仅0.2元，比去年足足低了一半。本以为可以卖个好价钱的邓自由目瞪口呆。这时，范琼花来了，叫了辆货车，二话没说拉了3,000公斤雪梨，亲自奔赴南江。6天后，当满面尘土的范琼花把2,000多元钱交到邓自由手上时，邓自由失语哽咽。

这事也让范琼花意识到，买难卖难问题应该及早解决。于是，党组织加协会的运作模式又在方广村开展了起来。“农民要合作起来才好办事情。”范琼花常常这样说。在她的多方面努力下，在村子里面不断动员，开会，发动村民为了自己的利益与村子的利益，一起合作，成立各种协会，一起想办法解决各种市场问题。如今，村上不但有了水果协会、蔬菜协会和养殖协会，还组建了运输协会，每年村里决定种什么，怎么找市场，怎么谈价格都在范琼花的带领下和协会的会员一起商量办法，一起解决。在范琼花的引领下，全村结构调整红红火火，人均纯收入年递增300元左右。目前，全村共栽桑树39万株，总面积达到500余亩，种柑橘、李树、枣树8万余株，成片栽植核桃100亩，种西瓜300余亩，商品蔬菜1,000余亩，养殖黄羊2,000余只，年出栏生猪1,500余头，出栏小家禽1,5000千余只，涌现出25户蔬菜、水果、养殖专业大户。去年方广村人均纯收入已突破2,600元，比她任支书前增长了近3倍。

后记

昔日光秃的凤凰山，如今已满山柏树果木；昔日苦寒的小山村，如今已被新修的村道，幢幢新盖的农家院楼，茂林、池塘点缀其间；昔日“外嫁”的小伙子，如今已带着妻儿回家了；昔日的“荒广”村，如今到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走在标美村道路上，喝着清澈甘甜的自来水，宽敞明亮的教室传出朗朗读书声，让方广村的山笑了，水笑了，人也笑了！范琼花的爱民之举、富民之措，全村老百姓都记在心头，印在脑海。村民们的心被春雨滋润了。在范琼花的带领下，全村富了，范琼花却穷了。为此，范琼花平静地说：“只要村民过上好日子，我吃点亏又算啥？”在新修的高标准村党支部活动室里，范琼花站在全村近期规划图前，又在计划着下一步打算：利用有限的资源，扩大规模，让方广村更进一步过上好日子。

杨娥
平凡的工作因着不
平凡的心



文：游丽金

她们是一个组织了，不再是一个个体，出现家庭暴力时，姐妹可以帮忙去调解，谁家有了困难，大家集中到一起商量对策，谁受了委屈，也不再是有苦无处诉了，文艺队里都是知心姐妹。

杨娥是一个平凡的人，她从事着最平凡的工作，但是她有一颗不平凡的心。

电话中杨娥浓厚的内蒙古口音，让我这个南方人听得十分吃力，但并不妨碍我们畅谈和沟通。杨娥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健谈的女人。

杨娥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高中毕业后，杨娥嫁到了灯塔村。在农村，她的文化程度相当的高了，农民看重的是文化人，能够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但在自己睁眼瞎的生活里，只能去依靠别人。

灯塔村是个远近闻名的落后村。所以，这个女性的到来，为

村子注入了很强的一脉。

人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并在特定的环境中发挥作用。

初到灯塔村，杨娥担任了村的妇联主任。妇联主任的首要工作是抓计划生育，这是上级指派的任务，也是农村普遍面对的最大问题。生活窘迫，灯塔村的村民也不例外，但在生育问题上，村民却想多生孩子成为家里的帮手，尤其是生男孩。

“重男轻女”的现象在灯塔村很严重，大多村民甘愿被罚也要生男孩，于是，“超生游击队”的队伍十分庞大。在与这些“游击队”“作战”的过程中，杨娥看到了灯塔村妇女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在那男权文化统治，女性缺乏自身意识，不知觉醒的灯塔村，她心碎了，她总想着要为灯塔村的妇女做些什么。

能做些什么呢？像抓逃犯似地去抓那些超生的妇女？她们本身就无法明白“生男生女一个样”的道理，在她们生活中，她们自己也是处在从属、次要的地位，难道再凭借妇联主任的权威，在她们身上施压，告诉她们该这样，不该那样吗？

杨娥做不到。她不是心肠硬的女人，她也不只是执行工作的人。她还有自己的想法，于是，她通过对这个村子进一步的观察，在茶余饭后与村中妇女的接触中，去发现问题，去思考问题，再想方设法解决问题。

妇女文艺队

灯塔村的村民同全国各地的诸多普通村庄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个偏僻、上级管辖不到、国家优惠政策到达不了的地方，村庄自身就已经封闭。在这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村庄的公共文化生活会是缺乏，找不到一个集体的感觉。

在看到电视上妇女们高兴地跳舞，城里的老年人在傍晚去公园扭秧歌，杨娥得到了启发，产生了在灯塔村成立文艺队和秧歌队的想法，丰富村里妇女的精神生活。按她的话说，咱的经济一时上不去，那咱不能因为家里穷整天愁眉苦脸，咱也得活得高兴！

在动员妇女们组织起来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大老爷们站出来说话了，搞文艺队，唱歌跳舞？那还不是出去丢人？在家安分待着不行？不管是在家的，还是在外打工的男人，一句话，不准他们家的那口子出去丢人。本来有几个跃跃欲试的妇女积极分

子望而却步了，十分为难，而她们只能选择放弃，因为她们们的生活离不开她们的家，她们家里的男人。

杨娥于是走街串户，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遭受冷眼她忍着，遭到指责她受着，遭遇鄙夷她痛着，无论如何都动摇不了她成立文艺队的坚定意志。最终，在村里几个妇女不怕嘲笑，主动站出来，并同她一同做动员工作后，文艺队终于建立起来了。妇女们自己掏钱买道具、服装，最后由杨娥向上级去申请资金，为文艺队的前期活动做物资准备。

妇女的业余生活丰富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地位也随之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因为她们是一个组织了，不再是一个个体，出现家庭暴力时，姐妹可以帮忙去调解，谁家有了困难，大家集中到一起商量对策，谁受了委屈，也不再是有苦无处诉了，文艺队里都是知心姐妹。这个团体在这个村子中发挥的作用，是我们难以用经济发展物质计量的指标去计算的。

在组织文艺队的过程中，杨娥就趁机宣传计划生育的相关知识。通过文艺演出轮番宣传，老百姓爱看，看的同时也就自然明了其中要表达的意思，要宣传的道理。最后，在妇女文艺队“大获全胜”的同时，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由冒罚超生转变为普遍的“生男生女都一样”，“少生优生”的生育观念深入人心。而这，仅仅是一年多的时间。

灯塔工作社

村里的公共文化生活的建立起来了，但是，依然改变不了贫穷的面貌。妇女们在一起开心了，回家面对的依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和唉声叹气。

在灯塔村，农户是清一色的分散经营，种植品种单一，形不成规模效益。每家每户的土地本来就少，加之分散，于是在致富的道路上行走得甚是困难。

杨娥心里暗暗着急，经济的发展不是唱歌跳舞能解决问题的，是要实打实的村民收入的提高，否则村庄的反对力量的加大，会将这本来就薄弱的妇女组织打散的。

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其他几个北京高校的学生来到了这个村庄进行支农调研。在充分调查文艺队的基础上，学生们传

递了新的信息，也给了杨娥建议——成立合作社，是目前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选择。

杨娥想通了：为何不将农户团结起来，办一个合作社，大家共同走致富的道路呢？在村子中已经看到了文艺队凝聚人心的力量，那么，成立合作社，也是将村民团结在一起，共同走出去，共同致富，互帮互助，相信是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有一定提高的。

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农村改革已见端倪，尤其是学生带来的资料，杨娥从中看到了希望，有了信心。

但是，建立合作社就远不如文艺队来得简单和轻松了，这一次，杨娥就不只是受到来自村民和社会的压力了，她更是“招来”家人的不理解：“你这样没日没夜的折腾到底是图啥？”是的，没有报酬，没有赞扬，没有普通人认为的名和利，她到底是图啥？

面对冷嘲热讽和不理解，杨娥也心酸，尤其是看着自己年幼的孩子无人照料的时候她更是心如刀割，她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母亲，她没有更多的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庭着想，她的心，是为着全村的村民。她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为了全村人，为了全村的女同胞没有我现在的压力，一定要为她们服务！

她跑过无数次的信用社，去为全村妇女争取了小额贷款，带领灯塔村妇女植树近万棵，并组织参加了“三八综合工程”生态林建设。这些举措在周边范围的村镇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许多村庄纷纷效仿她的做法。

2004年7月，在她的努力下，终于成立了内蒙古第一批合作社之一——灯塔合作社，从形式和内容上进一步凝聚了灯塔村民。

合作社的成立只是个开头，她没有懈怠。她与全村的村民和妇女一起，坚定心中的理想和信念，向着未来，走致富道路！

结语

杨娥突破了工作岗位的限制，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起抓。更主要的是，她充分发挥了妇女的积极性，以文化带动妇女推动了新农村建设，此举对于农村改革具有革命性意义。

杨娥是一个平凡的人，她从事着最平凡的工作，但是她有一颗不平凡的心，相信她会拥有不平凡的人生！我们祝福她，也祝福灯塔村的未来。

吴玖华
全心的螺丝钉



文：褚彩霞 游丽金

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她组织成立了“妇女维权接待处”，并开展了“我为妇女维权做贡献”活动。

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她工作的诀窍都是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走到他们中间去。她对和平的理解是：只有当每个人的权利得到维护时，才是真正的和平！

救命乡长

1999年河北省望都县赵庄乡出现了一个被当地人称为“救命乡长”的女乡长，这就是时任赵庄乡副乡长的吴玖华。吴玖华生于1962年，河北平泉县人，曾先后担任乡妇联主任、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纪检书记、人大副主任、副乡长、县妇联主任等职务。她是一个性格直率刚强的人，家里有兄弟姐妹七人，她排行老三，自幼养成了爱护弟妹，勇挑重任的性格。第一本启蒙小说

《桐柏英雄》更是给了吴玖华一种博大的英雄气概和济世救人不为私利的情怀。一步步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吴玖华懂得自己肩上的责任，她知道“有为才有位，有位必须有为”，这样才对得起这个位子，才对得起咱老百姓。

在担任副乡长的期间她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村里，了解民情，解决民需。可能是老天在故意考验吴玖华，在这一年恰逢全乡数千亩小麦都染上了吸浆虫病，如果不加以治理这数千亩的小麦收成堪忧。眼看着就要长成的粮食被虫子吃掉，村民们心急如焚但又束手无策。吴玖华深切体会到农民的焦虑，她也知道民无粮不安的道理，于是赵庄乡的田埂上便多了一个每天骑着自行车，带着把铁锹的人。一连几天她和技术员穿梭在各个村子的田间地头，询问有经验的老农，察看各地的病情，几乎走遍了方圆几十里的农田。中午的时候就在树荫下休息，烈日炎炎让人窒息。晚上就住在村子里，早上一大早就到田里去。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帮助技术员做各种试验，他们终于找到了防治吸浆虫病的办法。然而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农药商却说必须先交付押金才可以领药。没有拿到药就交钱，农民是不放心的，而不拿药，虫子就要把粮食给糟蹋掉，眼看着药在眼前，却不能拿去灭虫，吴玖华又开始着急，谈判无效，她毫不犹豫地押上了自己的3,000元钱的存折。药终于洒在了麦田里，病虫得到了及时的控制，保证了当年小麦的丰收。就这样，赵庄乡的村民们都感激地称她为“救命乡长”。然而这个称号的背后有着她的辛酸。当时正值小麦扬花，而她又对花粉过敏，整个脸红肿得厉害不敢见人，但是她还是每天跑在田里，她知道轻重缓急。但是好人难做，当她压上自己的钱给村民买药的时候，有人谣言她和药商串通挣钱，吃回扣，要不然为什么她这么上心。有口难辩的她一肚子的委屈，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居然落这样的名声，不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自己会说话。在村里的春节联欢节目中，乡亲们把她的事迹编成了快板书演唱出去。对于吴玖华来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巾帼不让须眉

作为一个女性，能够在田间受这种奔波劳苦不是一般人能做

到的，吴玖华就是这样偏，再难的事也要做好，男人能做的女人照样也能做，而且可以做得好。

为了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国家规定村委会要进行直选。这对于各个村子来说存在很大的挑战，一是村民们没有进行过这样的选举，不了解自己手上的选票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样的选举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二是很多利益的既得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破坏选举。所以选举就面临着两大难题，一要跟村民进行民主宣传，二是要和破坏选举的人进行斗争。这在任何一个村子里都是相当困难的工作。乡里把全乡分为几个选举组，每个选举组都有一个领导干部负责。吴玖华负责的几个村都顺利而出色地完成了直选。最后有两个村子迟迟选不出来，派了几个人过去都无功而返，乡里最后决定派吴玖华过去试试，果然使这两个村子成功地选出了村委。这其中融汇着吴玖华的机智和胆识。其中有个村子里的几个年轻人老是捣乱，破坏选举秩序，在第一次选举时当场把选票撕掉，致使选举无法正常进行。为了促进正常选举的开展，吴玖华义正词严地对那个小伙子说：“你姑在这里选举你还敢捣乱啊，你这个行为属于破坏选举，是要被抓的。”这样既给那孩子一种亲切感又给他一种威慑，软硬兼施，那小伙子一听，心生几分畏惧。吴玖华又找小伙子的父亲沟通，讲明道理，告诉他这样做的影响和后果。父亲很感激，把儿子臭骂了一顿，并且看着他不准他胡来。紧接着吴玖华各处上门工作，向村民讲解选举的意义、选举的程序。最后第二次选举顺利完成，那小伙子一直在隔壁的房间打牌，没有再干扰选举。

2000年春天，吴玖华任副乡长，他们到一个村组织选举，第一次只选出了村长和副村长，而委员的选票没有超过半数，所以还要再次选举委员。当天晚上8点选举又开始了。这个村共有选民两千多名，场面很大，秩序很难维持。到夜里11点多，在第一次选举中落选的一些候选人组织一群人开始捣乱，他们砸玻璃，到村民手里抢选票，整个会场一片混乱。为了保证选举的严肃性，吴玖华他们决定立即停止选举工作。停止选举的决定向选民宣布以后，有的村民就开始离开，但当吴玖华他们也准备离开时，突然有一位村民跳到院里的一张桌子上：“乡亲们，他们想什么时候选就什么时候选，不行，不能让他们走！”吴玖华一看，当时火冒

三丈，他这是在煽动闹事，派出所的人不在，如果不能有效制止，场面将难以控制，他们也将面临危险。时间来不及延迟，没有几秒钟的反应时间，她往高一跳，一把抓住那个人的衣服笑着说：“你给我下来，你姐在这组织选举，有谁捣乱的还有你捣乱的吗？你给我走！”说着一下子把他拽了下来，桌子翻倒在地，她语言坚定果断，那人没有想到吴玖华会有这样的反应，会这样果敢、豪气，而又亲切地称他为弟，马上就笑呵呵地说：“大姐，我走，你放开我。”吴玖华没放开他，一直抓着他的衣服推着他往外走了20多米，这时群众也开始陆续地离开，更有意思的是，在人群中还传出很有号召力的声音：“乡亲们，撤吧！”于是“撤吧！撤吧！”的声音此起彼伏，大家纷纷离开了会场，一场一触即发的聚众闹事事件就这样风平浪静了。他们出村的时候，正碰上派出所的车赶来，看到他们安全出村，很是佩服。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吴玖华还常常想起来，也为自己当时的机智果断的反应而欣慰。但她至今也不明白当时哪来的灵感和勇气——用妙语一句化干戈为玉帛。不过事后吴玖华也心有余悸，她很难想象当时自己是怎么跳起来把那个男的从一米多高的桌上抓下来的。

在基层，很多的事情都有着它运行的一套潜规则，在基层工作可以算是摸爬滚打。村子里的事情是最复杂的，“你要是管好了一个村子，什么样的组织都可以应付了。”做乡建的人都这么说。“基层的工作是最难做的，越往上的话反而越简单些。”吴玖华也这样感慨。作为一个女乡长，整天和那些男干部比拼，吴玖华有太多的苦楚。从那次选举过后，她决定不再从事乡里的工作。在政治领域中，女干部是很稀缺的。当少数的女性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她们不得不放弃很多，同时又付出很多。要做得和男人一样好，她们的成本要高很多。我问道她作为一个女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困难时，她只是摇头，说很多东西不好说。后来她又给我讲了一个小小的例子，那时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发动农民种经济作物，作为主管农业的副乡长，她必须亲临一线，火辣的太阳底下—待就是一整天，吴玖华的脖子都被晒得脱皮了，后来又患了重感冒，已经身心疲惫的她点滴—打完，马上就又下去了。她不是不想休息也不是不该休息，她是不能休息，这其中有着太多难言之隐。和那些爷们儿们一起工作，她不能做得比他

们差。到工作结束后她大病了一场。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付出换来了农民的高收入，村子里的人到现在每年都还给她送一筐自家产的苹果，看见之后还是那么的热情，还称她“吴乡长”，虽然她一再解释她已经不是乡长了。

为妇女儿童撑起一片艳阳天

2002年初，因工作业绩突出吴玖华被调到县妇联从事妇女工作。刚走上妇联主席的岗位不久，她就带领机关的有关人员，对全县的妇女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大量第一手资料发现，不仅全县妇女能参与经济建设的人数少，而且就业的行业也比较单一，这很大程度上是与广大妇女的文化、技术素质有关，如果能够提高广大妇女的文化科技水平，调动她们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就一定能够为县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她经过认真的研究思考，向全县妇女发出了“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的号召，在全县开展了“双学双比”活动。为了谋发展，她先后3次带人到定州、崔庄樱桃园、绿旺高科技苑等地参观学习。与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科协等部门的有关人员联系，开办各类技术培训班40人次，培训妇女达1万多人次。她还深入到农村开展“科技架桥”活动，与农业局的科技人员联系、在农村中开展了“一帮二、一带十”活动。使全县50多妇女成为技术能手的典型，500多名农村妇女在这一活动中走上了科技致富的道路。为全县广大妇女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培育出妇字号基地10个，发展科技致富村8个，在全县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吴玖华的实干创业精神，是出了名的。随着市场条件下的行业调整，社会压力很大，妇女下岗也较普遍。为了进一步扩大就业机会，安排下岗妇女再就业，她着手创办实施了“巾帼社区创业行动”，利用助困志愿者队伍和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对110名下岗女工进行了毛纺织和家政服务技能培训。另外还与劳动人事局、县联社、商业局、经贸局、工商联等部门联系，成立了望都县妇女再就业指导中心，共帮助180名下岗女工实现了再就业。

为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她组织成立了“妇女维权接待处”，并开展了“我为妇女维权做贡献”活动。几年来，

她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 100 余件，结案率达 90% 以上；通过开展“三八”维权周三次，举办法律知识培训班 10 余次，培训 2, 000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15, 000 余份。特别是成立“妇女维权援助中心”以来，妇联在电视台开辟了“妇女学用法知识专栏”，到妇联反映问题的妇女明显增多。有因为孩子抚养费问题的，有因为家庭暴力的，有的因为丈夫有外遇等。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她都热情接待，倾心尽力解决。两年来，在她和妇联的帮助下，有 13 名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寻回了公道，5 个濒临破裂的家庭重归于好，9 个孩子的抚养费问题落到了实处，9 人因财产受侵害的得到了公正的解决，3 件拖了 1 年之久的上访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

看到很多的孩子因为家庭贫困或意外事故面临辍学，吴玖华带领妇联发动各界人士捐款，支持“春蕾计划”。先从领导开始，县委郭书记率先救助两名最贫困学生，其他县级领导每人救助一名。武警 8, 644 部队官兵集资 4, 000 元，救助贫困学生 20 名。教育局、公安局、交通局、建设局、电力局、技术监督局、粮食局、国税局等单位领导都实施了救助。另外，一些企业和单位也被发动起来，新华书店邝秀兰经理救助 2 名贫困学生，海龙纺织品公司董事长张秋景救助 3 名，中医院、国税局办公大厅及各所站、望都镇派出所等单位长期以来一直对贫困儿童进行救助。几年来，她四处奔走，多方筹集资金，向县领导建议，成立了“救助贫困儿童基金会”，并呼吁政府部门各界人士捐款，一次性筹集资金 24 万元。三年来，她筹措资金 30 万余元，救助贫困女童 1, 200 余人次，还将 6 名辍学在家的贫困女童送到石家庄家政学校学习，协调校方减免学杂费 3 万余元。今年 8 月，一孤儿小张（化名）考上了河北大学，因经济困难，无法入学。她得知后，组织全妇联干部为张佳同志捐款 1, 000 多元，在她的带动下，县中医院又为小张捐款 3, 000 元。她还和学校取得联系，校方为她的真情所感动，为小张免了部分学杂费。

吴玖华用自己的爱心，为全县妇女儿童撑起了一片艳阳天。

灾难来临勇担当

2003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肆虐大江南北，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望都县距重灾区北京比较近，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在北京打工、就业的人员约5万多人。“非典”怎样防？这么多打工返乡人员的工作怎么做？这对全县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他们大规模返乡，势必产生极大的危险。作为一个女人，吴玖华知道这些打工者的家里都有母亲、妻子，做好了这些妇女的工作，就可以做好打工者的工作。于是她起草了《县妇联致全县在外打工人员母亲、姐妹的一封信》，号召打工人员的亲属劝说自己的亲人不要返乡。《一封信》印制发放了一万多份，妇联的号召传遍了望都城乡的每一个家庭。她们发自肺腑的心声，不知感动了多少姐妹，阻住了多少准备返乡的脚步。



吴玖华还带领县妇联“一班人”和“巾帼志愿者”队伍，深入社区和农村，开展宣传教育和义务服务等各项活动。她负责的两个村共有2,650名在外打工人员，为了做好返乡人员的隔离及家属的思想工作，她深入到田间地头，农民家中，给他们讲解“非典”知识，有时深夜一两点钟才离开村子。单位没有车，就自己骑自行车下乡。二十多里的路，每天都要往返一个来回，吃自己从家带的饭。村民们看着心疼，纷纷要她在自己家里吃住，但是特殊时期她不愿给村民添麻烦，不管多晚，还是坚持回家。她不在乎自己却时刻都惦记着别人。为帮助所包村搞好防“非”

工作，她带头捐款1,000元，给两个村购买了口罩、中草药、消毒液等防护器材和防护药品，印制了防治“非典”宣传资料2,000多份，制作了8条抗击“非典”的大幅标语，还给被隔离人员送去书报杂志。这样，两个村成功地对20名返乡人员进行了隔离，没有出现一例非典病人。县里发起抗击“非典”捐款活动时，她毫不犹豫地将一个月的工资全部捐出，全县妇联干部共捐款近1万元。“六一”儿童节前夕，她又筹集资金5,000多元，对全县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医护人员的子女进行了慰问，让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

紧张繁重的工作终于把她累垮在了工作岗位上，但她输完液、吃完药，继续上班，晚上还坚持住在值班室里。县领导劝她休息但是她始终坚持。她爱人是驻地武警部队的一名部队长，考虑到“非典”时期部队实行封闭式管理，不允许随意出入，就通过组织给在地方上班的四名军属请长假。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她作为妇联的一把手，坚持不请假，最后决定吃住在单位。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多少人冲破各种阻碍要回家和亲人团聚，然而她却选择了主动的分开。临离开家时，她反复叮嘱年幼的儿子自己照顾好自己，然后就揣起一张全家的合影照，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这一走，就是50多天。“非典”肆虐的时候，她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母亲身患重病，多次打电话催她回去。她是多么想回家照顾含辛茹苦把自己抚养大，自己深爱着的老母亲，可是她不能。她明白，这个时候自己必须战斗在第一线，自己不能请假！她每天两个电话，传递问候、期盼和祈祷。她盼望着“非典”早一天结束，她好回去看望自己的老母亲。在解除“非典”禁令的当天，她买好车票，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回家，然而一个电话打来，上级妇联又安排了新的工作，于是她马上退掉车票又忙了起来。当她忙完工作准备回家时，姐姐打来电话，告诉她母亲病故，她忍不住泪如雨下，失声痛哭，她给自己留下了后半生的永久的遗憾。

我不是女强人

有人说吴玖华是一个女强人，但她说她就是一个女人。传统上女人都是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一旦有谁追求事业且取得了成就那么她们就被称为女强人。似乎女人天生就是弱者，变成女强

人的女人是女人中的另类。她们也往往以家庭的牺牲或残缺为代价。但吴玖华就是一个女人，她做了一般女人做不到的事情，她还要拥有一个美好的家，执拗的吴玖华让二者合而为一。女人可以而且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同时也要有自己的家庭，吴玖华这样说。虽然工作忙碌，但吴玖华也是一个合格的好儿媳和好军嫂。作为一名军人的家属，吴玖华非常清楚意味着什么。她常说，自己多吃点苦没啥，绝不能让丈夫为家事分心，因为家事再大也大不过国事。结婚十多年来，不管工作再忙，不管家务再多，她从未让丈夫插过手。刚结婚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一家7口人的生活负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她毫无怨言，山区的冬天冷得厉害，没人去买煤，她就利用下班后的时间进山买煤，她成了这个山里第一个进山买煤的女人。这一切，她从未告诉过丈夫，每次写信都是报平安，勉励丈夫在部队好好工作。随军后，为了不让丈夫分心，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做饭，骑车跑20多里送完孩子上学，再跑20多里上班，晚上再重复一遍把孩子接回来，常常是吃完晚饭已到了10来点了。整整3年，不管刮风下雨，她都雷打不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也从未影响过丈夫的工作。在这中间，她还挤时间完成了大专和本科的学历考试，达到了计算机二级。

吴玖华是一个强人！

功绩斐然

1994 - 1997年当选县政协委员、1998 - 2002年当选县人大代表、2003年1月当选县政协常委、市政协委员、2003年当选省第十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2004年当选保定市第十三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2002 - 2004年被县委评为“优秀公务员”；2003年被县政协评为“优秀政协委员”，被市卫生局、市妇联评为“关爱妇女健康行动先进个人”，被全国武警部队评为“好军嫂”；2004年被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勤廉双优先进个人”、“结缘工程先进个人”。吴玖华还先后被县政府授予记大功表彰。多次被县评为“三八红旗手”，2003年被省妇联评为“抗击非典先进个人”、省“三八红旗手”，所领导的单位多次被评为“实绩突出单位”并受到省市妇联的表彰。这是吴玖华取得的成绩也是大家对她的

认可。

吴玖华觉得她最爱的还是妇女工作，让更多的妇女站起来。在这个领域中工作，她说：“自己做得很自由，这里有很广阔的空间让你发挥。”现在她的工作又有了变动，她现在是在保定市工作，她没有办法选择自己从事什么，但是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她工作的诀窍都是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走到他们中间去。她对和平的理解是：只有当每个人的权利得到维护时，才是真正的和平！她也一直致力于让每个人的权利得到维护。

当别人的权利得到维护时，自己的权利也得到了维护，有的权利是群体的，大家都好了，才能真正的好。虽然路很漫长，但走下去总会看到希望……

李特特
『扶贫妈妈』
——
没有公平就没有和平



文：燕玉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是革命的后代，父辈的未竟事业当然要由我们这一代来继承，而参加扶贫工作正是我继续革命的需要。

贫困是无硝烟的战场，是人类和谐和平的顽固敌人。在这个战场上，李特特以其令人敬佩的热情勇气智慧和执著，默默地战斗着抗争着。从最初单纯的技术支持，改善生存条件到扶志脱愚。

李特特理想中的和平生活：公平，和谐。她认为有公平才有和平。法西斯战争体现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和不公平，而城乡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这些不公平现象的存在是潜在的暴力，会加深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

李特特，其名特别，其人更与众不同。她端庄的容貌、高雅的气质以及从容不迫的举止，流露出一一个历经沧桑的人才拥有的

宁静与豁达。现年 82 岁高龄的她双眼明亮，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连续两年的 4 月底在樱花烂漫风光妩媚的玉渊潭公园游泳，一口气能游一两千米。她说起话来，眉飞色舞，神采飞扬，谈到高兴处手舞足蹈，言及气愤事眉头紧锁。你的心会被她的喜怒哀乐所深深地牵动和感染。她时不时地会给你幽默一句，和她谈话是一件令人轻松愉快的事。她幽默地自称“扶贫老太婆”，人们却都亲切地称她是中国的“扶贫妈妈”。在她的言谈举止中，你能深切地感受到一位真性情的、活泼亲切而又极为善良的“扶贫妈妈”。

美丽的容颜会随着时间的脚步渐渐褪去斑斓的色彩，拥有善良美好的心灵的人却会因岁月的沉淀而变得更加光彩动人。李特特留给人的印象是那么的美好，这不仅是因为她优雅的气质，更是因为在她那娇小玲珑的身躯中藏着一颗美丽透明的心，一颗善良美好的心，一颗爱憎分明的心，一颗渴望公平与和谐的心。

就是这样一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引领着李特特勇敢地走过战争的硝烟，带着对德国法西斯的恨与对和平生活的爱，积极参加保卫当时共产主义中心莫斯科的神圣的战斗，用满是裂缝和流着血的双手挥镐挖反坦克壕，用冻得像萝卜一样红肿的双脚行走在去伐木的路上。就是这样一颗善良美好的心，又引领着她回国后满腔热忱地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在她 76 岁高龄离休后，本该安享晚年，却还不辞辛苦地为中国贫困地区人民获得公平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断奔走呼号，迄今她那娇小而又坚定的身影，仍然常常执著地出现在贫困地区第一线。“人活着就要有精神，没有精神，那不是人。”这是李特特发自肺腑的感言。

神圣的任务

60 多年前的李特特，一位清秀可爱的中国少女，在莫斯科被人起了个美丽的名字——罗莎。罗莎在俄语里是“玫瑰花”的意思。这朵幼小美丽的“玫瑰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苏联人民并肩英勇奋斗，捍卫了人类的和平。

1940 年夏，时年 16 岁的李特特抱着学成回国后要干革命的理想，进入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第二年，德国进攻苏联。李特特和儿童院的其他伙伴停了课，开始上山伐木备燃料，进工

厂劳动，制造子弹。接着，李特特和其他一些年纪稍大的孩子开始军训，准备参加后备军。17岁的李特特每天要负重20、30公斤，完成80、90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由于任务完成出色，军训结束时，李特特获得了“轻机关枪手”证书。

战争开始后，一个人一天食用一斤用黑麦、土豆加工之后的渣子混合在一起做的面包。这样的面包男孩子一口就可以吃完。男孩子消耗的体力大，有的饿晕倒了。李特特她们就从牙缝节省出一点面包给男孩子。

战争期间，德国法西斯狂轰滥炸，大量房屋被夷为平地，防空要有准备，李特特她们就准备一些铁钳子、大水桶、沙子堆到房顶，要是燃烧弹来，她们就用钳子把它拿到水桶里面。要是炸弹还没有炸，就把它迅速埋到沙子里。做这样危险的动作手一定要快、要准。冬天的服装不够，战士需要棉衣棉裤。市里通过工厂把剪好了尺寸的布拿到女孩子们那里缝。子弹、手榴弹这样的东西都要及时运到前线去，所以就让李特特她们钉一些木箱子，这些木箱用来装子弹、手榴弹等。子弹等一装好就连同衣物一同被送往前线。

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离莫斯科只有60多公里，他们一个小时就可以打过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全体机关干部、妇女儿童都去挖反坦克壕。男孩子一天挖三立方，女孩子挖两立方半。要完成这个任务非常的艰难。当时零下40多度，李特特的手上布满裂缝，冻的流血，就拿棉花缠上。女孩子们还要伐木。女孩子一天定量砍木头是两立方，男孩子是两立方半到三立方。天寒地冻，而女孩子们那时没有裤子，穿的是裙子，腿上穿着长统袜。她们穿的鞋的底是两块木板中间钉一块皮，鞋面是薄薄的帆布，脚冻得要死，肿得好大。穿着这样的硬板鞋行走在冰冻三尺的地面上很困难，而李特特她们就是穿着这样的鞋一个小时要走十几公里的路。

后来，李特特又被安排到军医院护理伤员，她仔细而又认真地给他们换药、喂饭，一丝不苟地完成保卫莫斯科要做的一切任务。在伤员们痛苦的呻吟和喊叫声中，李特特更加感到战争的可憎与和平生活的可贵。

“在艰难的日子里，是‘誓死保卫莫斯科’的口号激励我们

挺了过来。”李特特激动地说，“莫斯科是共产主义的中心，所以保卫它是神圣的任务。当时没有一个偷懒的人。再有一个就是对法西斯的仇恨，法西斯对红军和苏联老百姓折磨得厉害。所以我们带着一股热情，一股恨，满腔愤恨地投入劳动。”苏军在莫斯科坚持了6个月后，开始转入全面反攻。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取得胜利，保卫了人类的和平。“在红场，人们高兴得满脸流泪，见人就抱，见人就亲，见人就跳，都疯了，庆祝胜利了。”回忆起60年前那历史性的一幕，亲身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李特特仍然难掩内心的激动，音调升高，手舞足蹈，眼中噙着泪水。

战后，李特特得以继续被迫中断的学业，直到1952年回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驻华大使代表政府向当年的老战士颁发了由总统叶利钦亲笔签名的纪念奖章，李特特是18名中国获奖者之一。

投身义务扶贫工作

从苏联学成归国后，李特特热情满怀地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李特特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从事核爆炸后放射性物质对动、植物的影响等项目的研究。那时候，每次搞核试验，她都要去西部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现场监测和试验。从北京往西，途经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铁路沿线的乡村景象凋敝荒凉，人们的生活十分贫困。每次往返奔波在这条路线上，李特特的心都是沉甸甸的。

途中下车的时候，他们走进附近的老乡家。李特特常常是无限心酸地走进老乡家的。“我们沿路到老百姓家去，看到的情况真糟糕。有一个县的村长带领全村集体去城里讨饭。去农户家，炕上只有破席子和破被子。被子上的窟窿比鱼网还大还多，棉絮四散。灶台上的瓢子，锅里都是空的，碗里只有点黑油底子和一点盐，屋里看不见粮食。村民已经讨饭去了。我看了真是心酸得很。他们这样苦、这样可怜啊！中国太穷了。”严酷的现实深深刺痛了李特特的心。中国这些被遗忘的角落太穷了，这里的人民“这样苦，这样可怜”！1949年解放以后，贫困地区的人民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经济上却远远没有翻身，农村生活水平与城里差别太大，城乡发展不协调。“社会主义起码应该让人吃饱肚子，

让人民远离饥饿、摆脱贫困，这应该是共产党最基本的方针政策。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了，这里的人民需要外力的支持和帮助呀！”李特特觉得应该做点事帮帮他们，扶贫的想法在她的头脑中浮现出来。李特特意识到，她找到了自己最应该干的一件事情。

1988年，李特特离职休养。这时，有人找上门来请她去特区办公，还有人请她做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她都婉言谢绝了。她并不富有，却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利用自己的地位为自己谋私利，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义务扶贫工作。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是革命的后代，父辈的未竟事业当然由我们这一代来继承，而参加扶贫工作正是我继续革命的需要。”李特特曾这样对前国家主席李先念说。

到最贫困的地方去

十几年来，仅国家级的贫困县，李特特就去了少说有90几个，其中大部分是在云贵川地区。李特特的手边常有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中国各省区的县名，共有592个，这就是《中国国家级贫困县一览表》。参加志愿扶贫工作这些年来，她走遍了湖南湘西的所有贫困县，踏过了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福建、江西等十几个省区。这些尚未脱贫的地区大都是过去的革命老区、深山区、石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生产方式原始，文化教育落后，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差。

中国西南部的贵州、云南、广西的山区，分布着世界最大范围的喀斯特地貌。这种特殊的地貌造成土地跑水、跑肥、跑土，粮食产量极低。在贵州安顺等地的关岭、安龙、罗甸三县，李特特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其他同事开始实施搬石造地项目。一亩亩的基本农田被一点点地从石缝中刨出来。

中国四川凉山，山高风寒，频繁的自然灾害常使农民一年劳作颗粒无收，许多凉山彝胞过着无床无被褥的生活。在凉山昭觉县，李特特和她的伙伴们帮助彝族兄弟改善居住条件，实施“安居项目”，一期工程已开始进行。李特特和扶贫基金会的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在西北和西南等缺水地区修建了1,000多口防

渗漏水窖，解决了当地的饮用水问题；在贵州安顺地区实施搬石造地项目，解决了当地人的口粮问题，使百里荒滩、石坡变成了梯田；在河北省阜平县修建了总长度为50公里的乡路，使当地人走出山窝，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道；通过李特特的努力，国家投资2、3个亿。福建省长汀县修建了一座长2公里的公路隧道等。尽管资金短缺，但作为基金会常务理事的李特特和她的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了贫困地区的水、地、路、屋等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去。

对于这些地区的贫困人民，李特特非常理解他们的处境。她经常给别人指着一张上有破衣烂衫的照片，不无同情地说“你看这件衣服它有多少个补丁？它里里外外都是补丁，有四五十个啊。”她幽默而又悲凉地称呼它为“绫罗绸缎”。“他们的生活真原始，真不卫生。你说他们怎么能讲卫生，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条件。”“仓廩实而知礼节”是不无道理的。



在困难中坚持

李特特参加扶贫20多年，遇到的困难不计其数，但每次她都会顽强而又坚定地继续自己的扶贫之路。“我干了20年扶贫工作，搞了好多个项目，大概有一半是不成功的。”李特特十分平静地这样说道。行动，失败，反思，再行动。李特特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循环。

中国扶贫基金会自1989年成立以来，国家只拨了10万元开办费。因为是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所以，扶贫基金会也不能从事任何经营活动。这样一来，资金成了基金会最大的问题，而扶

贫的关键就在于资金。“为了募集扶贫资金，我们到处‘磕头作揖’、到处‘化缘’。有时为了说服人家出资，我们真是‘磨破了嘴’、‘跑断了腿’。我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哪干过跟人家要钱的事。可为了那些贫困的人，我只有‘厚着脸皮’了。”“找老板‘化缘’时，男孩子可以喝酒，酒桌上就可以谈成问题。我不会喝酒，只能拿着扶贫宣传本给老板说：‘老板，有困难能不能帮助一点？求你了，发点善心。贫困县离我们社会太远了，太苦了。’老板看了本子无动于衷，冷冰冰地说：‘你跟我有什么交换的啊？’我说：‘你有什么事？’他说：‘批个文。’我说看是批什么文了。最后我还是帮他们跑批文。”为了能帮西部贫困地区的人民筹到钱，李特特只好无奈地帮企业老板跑腿批文，如果批好了，企业就会将批来的一部分资金捐给扶贫基金会作为扶贫款，这样筹集到的扶贫基金最高的有50万，最低的有几万。

尽管遭到许多的冷眼，碰壁无数次，也常常被人误会和不理解，20年来，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理事的李特特，仍然不顾年迈、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地为扶贫事业奔走着。她为西部贫困地区争取到2,000万元扶贫款，帮助上万人摆脱了贫困。她把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怀、帮助带给了贫困地区的人们，使他们的心底重燃起希望之火！就像她主编的一本扶贫宣传册上写的一首诗那样：

大海因为有了日出
才更加灿烂
雄鹰因为有了蓝天
才飞得更远
贫乏的脊梁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
才走进地平线
在山的那边
因为有了春天的故事
美丽的梦幻
才能实现

扶贫先扶智，脱贫先脱愚

湖南西部农村地区十分贫困落后，当地农民粮食种不好，副业搞不上去，特别是乡镇企业也办不好。李特特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引进先进技术，引进优良品种，并帮助他们申请一些项目资金。“可是气死人，播种吧，他们把粮食往天上撒，这一撒，种子要么落在树叶上或草上，要么落在沟里，鸟兽把种子吃了。粮食收不回来，浪费了很多。”李特特有些惋惜和无奈，“教他们开沟，点播。前面教完后面他们就忘了。”当地农民文化程度低，导致部分项目中途夭折。恨铁不成钢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李特特在类似这样“教完就忘”的经历中逐渐地认识到脱贫要先脱愚，单纯的技术支持无助于长远地改变当地的贫困现状，关键是要从改变人的素质入手，扶志脱愚方可从根本上扶贫脱贫，知识改变命运。

“中国的贫困区域面积太大，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太多，大多生活在缺乏农业生产基础条件、难以自立发展的地区。”李特特说像过去那种给钱、给物的“输血”式扶贫方式已经被实践证明不行了，必须把“输血”改为“造血”，就是借助全社会的力量，把贫困地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地制宜地脱贫。

她提出的“以工代赈扶贫”方式、“异地开发扶贫”等都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90年，李特特作为第一批被国家民委授予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而受到表彰。

李特特在自己主编的一本扶贫宣传册中写道：“贫困太可怕了。贫困是人类最顽固的敌人。中国改革开放20年经济发展，全面奔向小康之路的今天，贫困依然是我们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的贫困地区多分布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地区。贫困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条件的制约，也有历史沉淀了过多的深层次贫困因素。根据各贫困地区贫困现状调查显示，我国贫困地区的贫困现象绝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所造成的，更重要的是文化贫困的原因。文化贫困使贫困地区的人们愚昧、迂腐、思维简单、视野狭窄，缺乏进取和创新意识，守常守旧，这无疑给彻底摆脱贫困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也给扶贫攻坚战略中‘重视治穷，忽视治愚’提出了质疑。”

治穷先治愚，治穷是基础，治愚是动力。治穷是改变客体，

治愚是改变主体。改变客体必须与改变主体相结合。在扶贫工作中必须抓治愚软件建设，要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重视智力扶贫。比如：通过“101 远程教育网”开展全民全方位教育，组织开展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科技扶贫奉献爱心资助贫困地区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等。

李特特特别强调，“治愚是重中之重”。“组织扶贫开发必须从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着手。真正办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要从事物质生产的角度帮助贫困群体拔掉穷根，而且要从精神文化的方向铲除贫困赖以滋生的意识形态土壤。”

李特特根据自己 20 多年扶贫的经验和“扶贫先扶志，脱贫先脱愚”的理念，提倡发展远程教育。“可以通过远程教育，帮助农村普及知识、发展生产，让农村的孩子学到更多知识。”李特特说。

“我们可以建设现代远程教育，来拓展农村人知识面和视野，教育农民。贫困人群是被社会遗忘的人群。这容易造成社会的矛盾。所以，一方面要帮助他们，另一方面要教育他们。”“简单地给他们改进技术，总是走样。给他们钱，有人就拿去买酒喝，喝得醉醺醺的两手一伸躺在大街上。”

2000 年开始，李特特陆续开办远程教育网站，每年一站，现有 4 个网站（分别是河北承德、陕西榆林、云南怒江、贵州六枝县）。她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民办教师的贫困状况反映到省里，从而使省政府重视偏远贫困地区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提高他们的待遇；1998 - 2000 年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组织北师大博士生、教师到贵州省贵阳市和安顺市，对当地中专和师范学校的教师进行集中培训，从提高管理水平和师资质量的角度，促进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仅 1998 年就办了 5 个素质教育培训基地，有 262 所小学的 2, 100 多名校长和教师、全省特殊教育教师培训班的近 200 名教师、全省幼儿园园长岗位培训班 250 名园长接受了培训；先后在贵州省六枝县梭梭嘎村建立了“希望小学”，在四川省凉山州实施了安居工程，在贵州、湖南、江西、河北等贫困地区建立“希望小学”，资助民办学校建设教学实验楼及其他教学设施。她还用自己的钱资助贵州贫困地区失学的苗族儿童。她动员两个孙女一人交一个“手拉手”的穷孩子，资助了 3 个孩子上学。

贫困是无硝烟的战场，是人类和谐和平的顽固敌人。在这个战场上，李特特以其令人敬佩的热情勇气智慧和执著，默默地战斗着抗争着。从最初单纯的技术支持，改善生存条件到扶志脱愚，从“输血”型扶贫，到“造血”型扶贫，李特特逐渐发现贫困的根源不是简单的物质匮乏或自然条件的恶劣，而是人的志气、人的精神的不足。人外在的幸福远不如内心的福祉。就像哲学家叔本华说的那样“人生幸福最基本的要素——就整个人生来说——就在于人的构成，人的内在素质”，“‘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乃是幸福的契机。”人命运差别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人有什么（如财产和各种所有物），而在于人是什么，从广义上说就是指人格。印度典型的思想认为人类真正的解脱是从无明，即无知中解脱出来。扶贫先扶志，脱贫先脱愚。李特特找到了与贫困作战的一个根本的强有力的武器。

公平才有和平

岁月的长河见证了李特特那闪光的美好的心灵，这颗美好的心灵同时也是颗爱憎分明的心。

对于那些贫苦的人们，李特特满怀深切的同情和关爱，她会给每一位和她接触的人看她深入社会底层，行遍千山万水时拍来的反映贫困的图片，“他们太苦了，太穷了”，“他们喝的水这样差”，“心酸得要命”。对于那些只追求经济利益而不关心他人幸福的人，她痛心不已，“他们宁愿喝酒吃饭，也不愿出一分钱。他们只获取，不贡献。这一点钱，他们都舍不得拿出来。这样一些大款没有一点这个贡献心理，只想掠夺。哪里能赚大钱，就跑到哪里去；哪里利益高，就钻到哪里去。他们说这是国家的事，我说国家的事也是人民的事啊！唉，我真不理解这些人怎么这样没有良心啊！”对于那些曾经贪污扶贫项目基金的地方官员们，李特特十分气愤：“这些官员们太可恶了！他们经常自己打报告说要搞什么项目资金，等批了钱了，他们又装进自己的口袋。你说这算什么干部？”

之所以爱憎分明，也正是因为她那执著追求公平的信念。

李特特理想中的和平生活：公平，和谐。她认为有公平才有和平。法西斯战争体现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和不公平，而城乡

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这些不公平现象的存在是潜在的暴力，会加深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不公平，就不和谐，又何谈和平。无论是面对战争的赤裸裸的暴力还是贫困的潜在暴力，李特特都表现出勇敢执著的精神，顽强地、不屈不挠地努力着，为着她向往的一个公平的、和谐的、真正和平的世界努力着！在爱中，在行动中，亲证着她的信念。

她执著的信念和行动，使得她具有独特的魅力，让人倍感“最美不过夕阳红，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

有多少人年轻时意气风发，而暮年后则只图个安享晚年；又有多少人，竭尽全力从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世中捞取一切可以获得的利益。而李特特不仅年轻时身怀对和平和建设祖国的一腔热情，耄耋之年仍然“聊发少年狂”，激情不减，爱心不已，为贫困地区的人们早日脱贫倾心倾力。她的父亲李富春是原国务院副总理，她的母亲蔡畅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出生于法国，在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成长学习过，见证了苏联二战，可谓身世传奇，经历不凡，然而她心态平和淡定，总是非常认真地谦虚地说自己做的不算什么，住在一栋靠在喧嚣的马路边上的普通的居民楼里，生活上“很简单，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

就是这样一位可爱的满头华发的老人直到今天还担任着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项目顾问等社会工作，经常到贫困地区考察，每天为筹措扶贫资金发愁烦恼。但她的烦恼不是许多人的自私自利的自寻烦恼，而是一种摆脱了一己得失的大爱，一种无我真我的境界——烦恼即菩提。

伟大诗人泰戈尔曾经写道：

愿全人类幸福，永无仇敌，
愿人们坚不可摧，在快乐中生存，
愿一切活着的人摆脱苦难，
愿他们应得的权益不被剥夺。

这是李特特，更是全人类心中美好的愿望。当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真的透明美丽，变得真的公平和谐和平，我们敬爱的“扶贫妈妈”——李特特才会最终解开烦恼结真正地开心起来！

第三部分

底层耕耘

II 育苗乡土

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余，总喜欢到郊外去，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那里有清澈的小溪，有郁郁葱葱的树木，有勤劳的农民在辛勤地耕耘着。每当我走在田间小路上，看着那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

记得小时候，每到农忙季节，父母就会带我去田里帮忙。那时候，我虽然年纪小，但干起活来一点也不含糊。在烈日炎炎的阳光下，我们挥洒着汗水，感受着泥土的气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看似简单的劳动，背后蕴含着多少艰辛与付出。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白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农民们为了让我们能有饭吃，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年劳碌，只为换来那一季的好收成。每当我想到这些，心中总会充满敬意和感激。

如今，每当我回到家乡，看到那些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他们那古铜色的脸庞，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但眼神却那么坚定。他们是我们国家最可爱的人，是我们最应该尊敬的人。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珍惜每一粒粮食。

在党的领导下，农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农民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要继续支持农业，尊重农民，让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个假期，我再次回到了家乡。看着那些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我要向他们致敬，感谢他们为我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我要告诉他们，他们的劳动成果，我们一定会珍惜的。我要告诉他们，我们一定会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珍惜每一粒粮食。

每当我走在田间小路上，看着那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记得小时候，每到农忙季节，父母就会带我去田里帮忙。那时候，我虽然年纪小，但干起活来一点也不含糊。在烈日炎炎的阳光下，我们挥洒着汗水，感受着泥土的气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看似简单的劳动，背后蕴含着多少艰辛与付出。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白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农民们为了让我们能有饭吃，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年劳碌，只为换来那一季的好收成。每当我想到这些，心中总会充满敬意和感激。

如今，每当我回到家乡，看到那些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他们那古铜色的脸庞，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但眼神却那么坚定。他们是我们国家最可爱的人，是我们最应该尊敬的人。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珍惜每一粒粮食。

在党的领导下，农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农民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要继续支持农业，尊重农民，让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个假期，我再次回到了家乡。看着那些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我要向他们致敬，感谢他们为我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我要告诉他们，他们的劳动成果，我们一定会珍惜的。我要告诉他们，我们一定会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珍惜每一粒粮食。

张华
山村窑洞女教师



文：朱谦 孙央丽

我要教好这些娃娃，直到最后一个。

张华用捐款得来的钱，开始对窑洞大整修，把窑洞内用水泥砌平，把地面用砖水泥铺好，修了操场，建起围墙、厕所。还买了国旗、足球、地图、录音机、奖状、水桶、碾子、锁子等，还为家庭贫困的学生免去学杂费。

张华喜欢这种读书声，在她看来这是世界最动听的声音，最具生命力的声音，是她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是这读书声伴随她走过10年，给了她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给了她希望。

她像炭火燃烧自己，化为灰烬也美丽。

延安市柳林镇寨子崩村，是深山里最后一个村庄，走到这里就到了山的尽头。村里的年轻男女都进城打工去了，许多人家窑洞已是大门紧锁，炕沿锅台积满尘土，窑外周围荒草萋萋，偌大的一个村子显得无比的空旷和冷清。唯有27岁的女教师张华还留

在村里，她一个人守着这份孤独和寂寞、守着村庄里的学校和上学的娃娃。

一整天张华没遇上一个可说话的人。没有人能理解她，知道她心里想的什么。她整日面对的是门口凝视人的黑狗、炕上盘卧的睡猫、院子里走来走去的鸡，生活清苦而无聊。唯有学校娃娃们朗朗的读书声，清脆的歌声以及他们活蹦乱跳的身影，给她带来欢乐，让她觉得活着是美好的，是有意义的。

1995年张华在村里小学教书，月薪100元或150元，到现在已有10个年头了。她一个人总共教学前班、一、二、三年级4个班，每天带数学、语文、思品、体育、绘画、音乐等8门课，学生最多时近30名。这些年，由于计划生育的成果和村里人都带着婆姨娃娃往城里搬，来村里小学念书的越来越少。眼下，仅剩曹苗、任静、任星、刘伟4个。张华说：“现在镇上并村撤校，学校在山外，来回要走二三十里路，娃娃们太小，走到半路都能睡着，我要教好这些娃娃，直到最后一个。”

挥之不去的伤痛

1995年，张华17岁，那一年她上初三，参加了高中升学考试，考上延安市重点高中。拿到入学通知书，张华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兴奋，而是陷入沉重的矛盾中。是不顾一切继续上高中，还是放弃，帮妈妈干家务农活，张华举棋不定……

20世纪60年代，张华的父亲15岁，随着张华的爷爷奶奶叔叔姑姑一家8口，从榆林横山县一路步行讨饭好几百里，流落到寨子峁，住在后沟的山洞，靠开荒种地过活。张华的奶奶患有精神病，又哭又闹，搞得家里不得安宁。张华的父亲从小忍饥挨饿，住在后沟潮湿的洞里，冬天没有棉衣裤，连冻带潮，得了关节炎。得了病，看不起大夫，到现在脚都不能完全着地，腿是弯的。疼痛难忍时，就发脾气乱吼。唯一的安慰是喝闷酒，本来喝酒是为了活血化淤，解疼痛，没想喝成了酒瘾。爬高下低繁重活一点也干不了。张华母亲绥德人，姊妹10个，家境贫寒。15岁那年，服侍姐姐坐月子，用杈子擦萝卜，把右手磨破。正值寒冬腊月，零下20度，到河里洗尿布，伤口受冻感染造成溃烂，40多年过去，至今未好，只能凭另外一只手做事。多年来，跑遍延安找大夫，

医生说锯掉胳膊。没了胳膊，谁来操持这个家？母亲没有去锯，一直腐烂着。

怀张华时，母亲发生孕期反应，吃不下饭。奶奶不知心疼，爸爸不懂，也没人问一声。躺在炕上3天柴米未进，爬起来，照样给家里地里干活，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弟兄们长大，分家，张华家分到的唯一家产是两碗荞面。

在后沟山洞不知住了多少年，张华家在村里的山顶上盖起了土窑。张华全家5口住在一个浅土窑里。每逢刮风下雨，土窑就发生震动。窑内集满了水，窑顶上的水土，不断地往下坠，常常半夜传来轰隆的坍塌声，把张华一家从睡梦中惊醒，到最后，一家人吓得干脆晚上就不睡觉，硬等着天亮。第二天，开始铲门外塌下的土，紧挨门口的灶火已被塌土掩埋。

奶奶的精神病一直在犯。她老人家黑天白日坐在土窑洞不出来，还要点着灯，自言自语一夜。让她关掉灯，不要浪费电，就又哭、又闹、又吼。父亲没文化，脑子简单，人软弱，受了气就喝闷酒、乱吼，吓得张华和母亲都要压低嗓门，背着父亲说话。家里的重担全落在母亲手里，而母亲只有一只手能干活。所以张华从小就非常懂事，体谅母亲。上学时，张华只要做完作业，就去锄地、担粪、割草、掏粪、蒸馍、砍柴、喂猪喂鸡、洗衣服，小小年纪已是妈妈的左膀右臂。上中学，她背了20斤粮上灶，能吃半年。学校距寨子少说也有来回40里路，但她还是要坚持天天步行回家，帮妈妈多干活。两个弟妹都要上学，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到哪里为她挣上高中的学费。每每想到这，张华就气馁，她决定放弃。

家里的贫穷给张华带来压力，让她自卑，让她在人前抬不起头。下课铃一响，同学们都跑到外边玩耍，张华却端端正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时间长了，她的桌子底下有一双深深的脚印。下雨天，别人的桌下都是干的，她的鞋被雨浸透，又不出去活动形成两个湿湿的脚印。张华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玩耍，只有好好读书。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唯一的兴趣都用在在学习上。张华聪慧好学，学习成绩总在前几名。尽管她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但老师和同学仍然喜爱她，许多同学都愿意和她要好。李艳是张华的好朋友，张华家里的情况她一清二楚，听说张华考上重点高中，就动了心

思。因为她没有考上高中，但她的家境比张华好，想让张华把上高中的名额给她。

名额放着也是白放，反正自己没钱上。张华答应把重点高中的名额给李艳。高中开学报名那天，张华天不亮就从炕上爬起来，像是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她匆匆赶下山，用自己的通知书给李艳报名，忙前忙后，唯恐有半点闪失。当她站在学校人群后边，听到老师叫张华的名字，而答应的是别人，张华心如刀绞。她不知一路上是怎样高一脚低一脚爬到寨子岭，伤痛的心久久不能平复。每当半夜、每当独自一人，辍学的痛悔和无奈，就会一阵一阵地袭来，让她寝食难安，彻夜不眠。成为挥之不去的悲痛。

教书育人

回寨子岭后，村上小学的曹老师成为张华的知己，他对张华辍学非常同情。张华曾是曹老师教过的优秀学生。曹老师告诉张华他在寨子岭教了20多年，已到退休年龄。可没有教师愿到寨子岭教学，他一走学校就得散伙，他想把这个工作托付给张华，只是工资很低，每月100元。在他看来张华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希望张华能让寨子岭小学继续存在下去。

张华认为，到学校教书，既能让自己和书本学校结缘，又能缓解因辍学而造成的伤痛。她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学习，不至于因辍学而荒废。张华答应了下来，她让曹老师放心。

寨子岭在山的尽头，有30户，200来口人，村民依山而居，住在窑洞里。再往深处走，还是山，可没了人家，是野猪、野鸡、野兔、狐狸神秘出没的地方。村民靠在坡地上春天种一季土豆、小米、玉米生活。至今村里还没有通路、通水、通邮。许多姑娘看上村里的小伙，到村里来相亲，走到半路，就返回。连路都没有，嫁过去怎么活。村里至今还有快40岁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全村唯一的一个水井在山下，是一口窖水井。夏天或是过年，井水多干枯，村民掏泥浆，往家里担，沉淀后食用。邮路也不通，至今没有邮递员来寨子岭送信。盐油酱醋一并生活用品，得到30里铺或延安城去买。许多娃娃长到很大，许多老人好些年，都没进过延安城。困苦的生活让村民对城里的生活非常向往，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纷纷往山外跑，进城打零工。现在山里人唯一的

希望是到城里打工挣钱，在延安城买几孔窑洞和房子，然后租赁出去，等儿子成人后，在城里结婚。等把媳妇在城里娶到手，能在城里混，就继续混；混不下去，就回山里，反正生米做成熟饭，不怕媳妇不跟。山里人唯一的娱乐是看电视，电视在山里信号不好，只能收到一个台，而且声像极其模糊。娃娃的教育，山里人看得不是很重要，男娃娃有能力，家里继续供着；女娃娃，完初中，考上考不上，家里都叫回。认为那是白淘神，迟早都是婆家的人。

寨子岭小学坐落在村子半山腰的一孔20平方米的窑洞里。教室地面坑坑洼洼，门窗纸已破烂不堪，所有的桌凳歪歪扭扭，站不稳，全校学前班到三年级共27名同学，日复一日地挤在一个窑洞，老师办公的地方和教室在同一窑洞。17岁的张华初次上课，娃娃们哗然，“她自己就是个娃娃怎么能教我们？”那些年龄14岁还在上三年级的学生，对张华一脸的不屑。

上课时，大年龄的学生有意给张华难堪，张华说东他说西，上课离开座位乱窜，还和张华有事没事吵，搞得课堂乱哄哄。张华心里很懊丧，对自己能不能教下去失去了信心。但一想起给曹老师临走时的承诺，就又告诫自己，不能打退堂鼓，要坚持。张华让年龄大的同学回答课堂问题，人家不回答，装着没听见，张华当着全班的同学面对那些大龄同学说：“我和你的年龄差不了多少，只是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的任务是教知识，你的任务是掌握所教的。我们是平等的，不存在谁怕谁……”年龄大的同学听了张华的话，觉得自己这么大了好不懂事，张老师比自己大不了多少，可人家一肚子墨水，又有本事，说话多在理，一感动，哭了起来。从此，再也没人胡闹，还带头维持纪律。张华知道，都十三四的人了，才上三年级，多是家里贫穷，耽搁了。她就耐心，一遍一遍地教。不久张华就得到学生的认同。

山里人没文化，他们的孩子见识少，反应不灵活。五六岁的娃娃进学前班，接受教育几乎从零开始。写字不会捉笔。铅笔用完不会削。张华就手把手地教怎么握笔，怎么写字；用小刀给他们一支一支削好铅笔。有些刚来的娃娃，刚上课就要吃东西、要上茅房，要回家睡觉，以为上学是“窜门子”。智力迟钝的学生，留了一级再一级，课讲了三四遍，还是听不懂。张华就慢慢地教

育娃娃们，怎么当学生，什么是纪律，让他们逐步走上正轨。

张华一天要教数学、语文、音乐、绘画、体育等8门课，教学前班、一、二、三4个年级，采用复式教学。一个年级上课时，其他年级同学就上自习。数学、语文分年级上，体育、音乐、绘画一起上。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和自身素质，张华报了成人自考，汉语言专业，利用间隙，刻苦攻读。因为没经过高中直接学大专的课程很吃力，但张华一想到能以高质量水平带娃娃，其中的困难也就不算什么。

在艰难中前行

10年教学崎岖而又漫长，张华经历了困苦和煎熬。到学校教书是曹老师提出，寨子崮同意的，村上答应给她的工资每月100元。工资靠村上在村民中收取。由于工资太低，村上给学校老师分几亩地作为补偿。可自从曹老师走后，村上就把这几亩地收回，没有张华的份。

张华年龄小，心想村干部都是长辈，自己只是个娃娃，收了地也没吱声。可后来，每月的工资，也不给。工资由每月开，变成每学期开，最后成了一年开一次工资。往往是新学期开学了，上学年的工资还没给。没有工资，张华就凭着每学期收学生10元学杂费，以后变成20元，买粉笔、红墨水、教案本等教学用具。学校仅有一间窑洞，27个娃娃挤在一个教室，张华的办公室是和教室在一起，娃娃们最后一排窑洞靠窗户处，摆一张桌子，就是张华办公室。她就在桌上改作业、看书。冬天，窑洞娃娃们太多要烤火，张华实在站不下，只好在窑洞外来回踱步。她多次请求村上把另外一间窑洞给娃娃们当教室，最后村上才腾出来。张华觉得是10年间好像就没有夏天，总是阴沉而寒冷的。在零下20多度的冬天，一个人在窑洞比在外边还冷，她只好到外边来回踱着，结果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在窑洞也不是，在外边的操场也不是，站在哪都冻。

工资要不上，张华很急，因为她的弟弟妹妹就指望她教学挣钱，交学费。张华觉得自己是个娃娃，不能跟村干部翻脸，只好忍着，她的妈妈就鼓足勇气要，还是要不来。就问村干部，既然

给不了工资，为什么要收回补偿地呢？希望没钱，给些地也行，可什么也要不来。

冬天来了，张华问村上要钱，给学校买煤取暖，村上不给，要张华用学杂费买，以前从来都是村上出钱买煤，学生的学杂费给教师买书本等教学用具都紧张，怎么可能呢。村干部什么都不管。晚上张华一家人正在看电视，郁闷的父亲为这件事大吼：“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没一个好人。”然后，父亲又跑到土窑外吼：“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没一个好人。”他一个庄稼人，没有什么能耐，遇到问题只有吼，妈妈吓得赶紧跑出来，像哄小孩一样地哄。村干部一遇到父亲这种态度，就说：“算了，算了，跟他没什么可说的。”

煤村上不给买，可窑洞太冷，娃娃们没办法上学。张华只有每天到到山上砍柴把砍好的柴捆成捆，背回来，给娃娃们生炉子取暖。她心里很难过，自己教书，给家里挣不来钱，帮不上忙，还给家人添来一肚子的气。

学校有一个破旧的铁炉子，铁皮都烂完了，周围还有几个地方裂开了洞，整个铁炉几近散伙，张华找一节铁丝，将炉子重新捆绑起来，又掺水和泥将炉子的窟窿糊住。破炉子年年修年年糊，她觉得生活就像这破炉子，让人心烦。她幻想着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新铁炉子，不要让她再受这份难。



10 年坚持

不给工资，却时常到家里催要农业税。张华家除了坡上的庄稼没有任何资金来源。村干部对张华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一次村干部看见张华，从怀里掏出400元钱说：“给你工资！”张华很纳闷，平时，要钱比登天还难，这次怎么这么爽快。等张华放学后回家，才明白，村干部到张华家催农业税款，已从母亲手里将钱原封不动地要走。以后，这种前脚给钱，后脚钱没暖热就要走的事，常常会降临到张华的头上。

张华知道许多事情都离不开钱，弟妹要上学，家里最起码的油盐酱醋，平时感冒头疼脑热等，在这个世界上谁又能不需要钱呢，何况，只是一月100元。在别的村和自己干同样工作的教师，工资都增加到250元，比张华的工资高出了一倍还多，而自己这么可怜点钱都拿不到。张华觉得自己和别人真没法比。

有一年放寒假，张华指望村上发工资，但连发工资的影子也没有，而弟妹下学期的学费，一分不能少，毕竟一年到头得给家里有点贡献。她决定下山，到延安市里打工。她给人家推销方便面，在延安市市沿大街小巷卖。老板对她不放心，只让她推车子送货。张华肯吃苦，10天下来，挣了300多块钱，相当于她3个月教书的工资。老板欣赏张华的聪明能干，决定派她到西安去进货批发，把生意干大，可张华没有同意，10天后，她回到寨子岭。

一年一年拖欠工资，可张华的教学从没停过。村里人以及她的父母都劝她罢课，或等给了工资再上课，但张华没有，她说：“这是不可能的，娃娃并不知道什么，他们按时上学，当老师的不上课，对娃娃的影响太大了。老师是为人师表的，做不得。”有时张华实在耐不住，下狠心对自己说，下学期无论如何都不教了，可一等开学，就改主意。打扫教室，迎接娃娃们上课。有一次，她去到镇上开会，会期延长了半天，可等她回村后，娃娃们硬是在窑洞门口等了一个上午。一想起这件事，张华就难过，觉得自己对不起娃娃们。还有一次，别人给张华联系好了去外地打工，张华都答应下来，收拾好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发，可清晨一醒来，又改了主意，解开行囊，照常上课。

曾经有3个娃娃，将要辍学，这是张华最生气的事，她跑到学生家里说服家长，可好话说了一箩筐家长仍不为所动。张华想，如果村里没了老师，这种事更没人管，娃娃们又到哪里上学。村干部不给工资是他的不对，但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殃及到娃娃们。

张华每学期要给娃娃们到城里买课本。骑自行车走来回80里路。书店在延安市北街，买书的学校很多，书店先给规模大的学校。第一天买不上，张华只好往回走；第二天张华又下山到城里排队，又没轮上，张华又得第三天来。她备了蛇皮袋，把所有买的书都装进去。由于教学大纲的变化，买的书一年比一年多，需要两个到三个蛇皮袋。书捆在车后，没办法骑，张华就推着走，在山道上，上坡路多，车子一推，就翘起来，头掌握不好，就连人带车一起翻，书散了一地，又碰不上个帮忙的，真是好难。实在拿不动，张华就让母亲和自己一起去。一起走80里的路。自己的工作，还得把母亲给搭上。

来自各界的爱心

1999年，新华社记者来到柳林，问能否找到一个穷困学校。“有啊！”当地人说，最穷的就是寨子崙。两位记者，上山来到寨子崙小学。初次见记者，张华害羞地不敢说话，问一句，低头回答一句。记者见她正忙着上课，不好意思打搅，就走了。没过多久，记者们又上山，在学校拍来拍去，和张华说了一些话。以后《延安日报》等多家媒体对寨子崙小学和张华都来关注。

山里人见识少，张华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新华社，媒体的到来让张华耳目一新。随着媒体的到来，外边世界知道了寨子崙和张华，许多善良、富有爱心同情心的人，从四面八方给张华写信问候。从延安到西安，从陕西到广州到新疆到湖北到东北，一时间人们的信像雪花一样飞到张华手中。有中学生、大学生、打工者、企业老板、公务员、退休教师以及远在大洋彼岸的华侨。张华坚持深山教学的事让人们感动，他们纷纷寄来钱款、书籍、桌子、凳子、风琴等，希望能帮助张华和寨子崙小学。

张华对此非常感激，对他们的来信非常的珍视，她给每一个来信的人回信，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捐款的钱到后，她第一件

事就是买了个新铁炉，一扫当年的晦气。新炉子生的火真旺，温暖了张华和娃娃们的心，她觉得为了人们的支持，她一定要把学校办下去。

捐款的钱一天一天增多，有初中生、退休教师二五十元；有公务员、打工者二三百元；有企业老板两三千元，甚至有国外上万元。不过，上万元钱没寄到张华处，是由镇教办收的。由张华收管的捐款已积攒了好几千。给张华邮寄是件困难事，寨子岭没有邮递员，信件只送到距山里有20里路外的30里铺的杂货摊上，这里车辆往来人多混杂，信被拆被丢，是常见的事。有时候寄来的信好些日子才能看到。自从媒体关照后，张华的信件一来一大堆，她成了寨子岭村有史以来，与外界通信最多的人。

张华用捐款得来的钱，开始对窑洞大整修，把窑洞内用水泥砌平，把地面用砖水泥铺好，修了操场，建起围墙、厕所。还买了国旗、足球、地图、录音机、奖状、水桶、碾子、锁子等，还为家庭贫困的学生免去学杂费。

捐款给学校带来了变化，给张华却带来难以言表的苦涩。上边警告张华不许说拖欠工资的事，训斥她捐款的账没记好。那段时间，人们都紧张地盯着张华手中的信，关心她得到的捐款。她发现村干部把信传给她时，信已被拆看过，有重新黏糊的痕迹。村干部还给张华提示说：“你只是村上聘的老师，没有资格管学校的钱。”但村干部同时又经常找张华，问她最近有没有人寄信过来，信里说没说要给捐款。催张华写信哭穷，向来信人要捐款钱。张华觉得本来是很好的事，但让她心酸。有捐款时，人们一会修这，一会修那，干上一会，就开始问张华要工钱，知道她手里有钱，最后，一看张华拿不出工钱，就再也不到学校来修了。事实上，那段时间，要求捐款，要求帮助学校的人非常多，但张华觉得统共只有20多个学生，围墙、窑洞已修好了，没有什么可修可建的了。于是，张华没有按村上的意思办，而是告诉人们学校已修好，什么都不缺。让把捐款给比自己学校更穷的地方。

不管别人是怎么看待张华，张华总是问心无愧地干着自己应该干的事，她要能对得起娃娃们，对得起曹老师的重托，对得起这个世界。

奉献的是全部

弹指间，10年过去，10年对一个年轻的生命该是宝贵的，张华把这宝贵的10年青春全部奉献给了山村的教育事业。

当年和张华在一起的同学早已嫁人，孩子都大了；张华教过的学生有的已结婚，抱着娃娃，晒暖暖。而张华仍是孤身一人，村上从来没有到她这个年龄还未嫁的姑娘。如果张华在大城市里，这不是个问题，可在农村，张华却要承受舆论的压力，人们会在她背后指点，会对她说：“这么大了，再不嫁人，再待下去谁还要啊！”而张华的母亲非常理解女儿，她从没抱怨过。

曾经有媒婆给张华介绍过对象，张华接受不了这种见面方式。媒婆把人引见到张华面前，然后走开，把两个陌生人留在屋里。两个人尴尬地在一起，不知说什么，胡乱答一气。很快时间过去，媒婆要订时间，想以最快速度了结。可这是人，不是其他。张华没办法回答。有一段时间几乎今天见面，明天又见面，搞得张华头疼。

媒体来后，张华面对许多信件，信相当一部分出自年轻人的手，他们中不乏对张华表示爱慕之心的。拜读这一封封炽热滚烫的信时，张华无所适从。他们都在广州、新疆、湖北等距寨子岭很遥远的地方，张华怎能远离残疾有病的父母和她无限热爱的寨子岭小学。张华感到太遥远，太不实际了。在这个穷山沟里张华的爱情婚姻成了一张白纸。

大山的女儿

张华为了寨子岭小学，不计后果，不计得失，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她把自己的全部才华和智慧乃至青春都给了寨子岭小学。学校的设备差，张华就因陋就简，比如，上数学，教除法，张华就和娃娃们到村口，折一些棍棍当香蕉，练习运算。在给三年级娃娃教自然课“溶解”时，就用家里的白糖、蓝墨水做实验，通俗易懂。六一到了，张华组织学生举行书画大赛，27名孩子向燕子一样飞出窑洞，用木棒、石块画出他们心中的理想。音乐课，张华没学过五线谱，别人赠送的风琴，她也不会弹。她的音乐课是将过去在学校学唱的歌，教给娃娃；或跟电视学唱，然后把歌词记下来，写在黑板上，凭着感觉教给学生。寨子岭的学生虽然对

希望工程不很了解，但人人都会唱张老师教给他们的《山妞妞》：

山里的妞妞山坡坡走
跟在弟弟后
背上的猪草颤悠悠
迎着落日头
妈妈也曾是妞妞
从没进过校门口
妈妈那个心里想上学
要走出山沟沟
是谁伸出希望的手
温暖着妞妞的心
等到秋天柿子熟了
妞妞就熬出了头

寨子岭小学的学生们，说起他们的张老师，喜爱中带着崇拜：“张老师对我们要求可严了，上课必须认真听讲，作业必须按时完成。她懂得可多了，给我们教知识、教唱歌。我们学的歌都是张老师教的。”“张老师给我们洗脸，给我们喝水、给我们吃苹果吃糖。”

张华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越是贫穷越是有困难的同学她越是关照。有一个叫任静的同学，脑子迟钝，已留了两级了。张华对她很有耐心。有的课文任静已学过3遍，但还是忘字，不会读。张华从来没有训斥过她，而是一遍又一遍地给她讲，领她读课文，有时张华明明知道再讲也没作用，但她还是把任静叫到一边，单独教。在张华的教育下，10岁的任静已慢慢读懂课文，而且数学学得非常好，只要任静一有进步，张华就立刻鼓励表扬，而且让同学平等待她。

在娃娃们心中寨子岭小学是最好的学校，张老师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漂亮、最美丽的老师。尽管生活艰难而辛劳，上完课，还要担水、蒸馍、挖土豆、割草、摘苹果等干不完的家务和农活。但生活没有泯灭爱美的天性，张华总是穿得非常整洁、漂亮，与她坚定晶莹剔透的内心世界融为一体。受她的影响，学生们服装虽然不统一，甚至有补丁，但仍然干干净净，女孩的头上大多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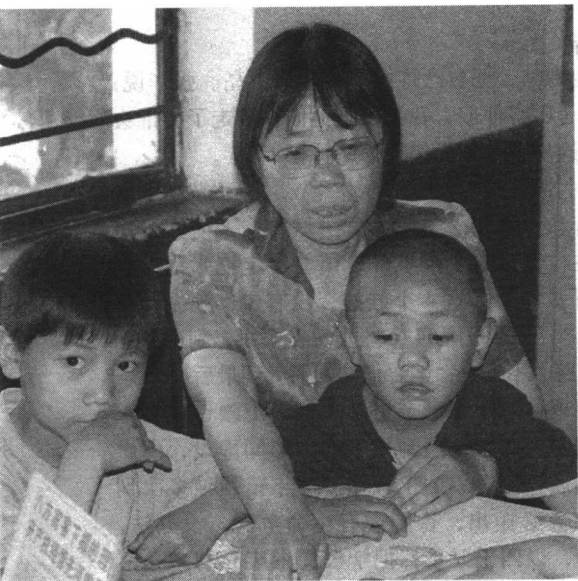
着野花、塑料花和其他饰品，把自己打扮得整洁又漂亮。张华说：“娃娃们太可爱了，我舍不得他们，我扔不下他们，我走了，谁会到这儿教他们。”为了这份爱张华无怨无悔坚持了10年。

2005年柳林镇并村撤校，6个小学撤掉2个，寨子岭小学就在被撤之列，计划生育和村里领着婆姨娃娃进城打工，使寨子岭小学的生源减少。现在村里只有4个娃娃。镇上决定把张华派到另一个村上去教学，可张华为了这4个娃娃，没有走，她主动请示镇上让她再在寨子岭教下去，因为4个娃娃实在太小，到山外上学，要走十几里路的山路，不安全，她要把娃娃们教到最后一个。

张华家一直在土窑里住，她和母亲想办法给半山腰钉进去木杠，搭上草扇，用泥固定住，可一遇刮风下雨，形同虚设，山崖上照样掉土，门口的锅灶，被坍塌的土埋住。今年镇领导多次到山里视察，让张华一家务必搬出，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没办法，张华和村里人讨价还价，以四千元价，把学校周围废弃的4孔窑洞买下，现在还欠人家两千。弃窑是当年村上给知识青年盖的，知青回城后，被村上村民买了，几易其主，最后都嫌窑洞破旧，没人再住了。买下的窑洞里边满地水，墙壁多年脱落，门窗已朽。张华和母亲用盆子把窑洞里的水全部清理完，让弟弟和泥把墙壁砌平，刷些白灰，把窑洞弄亮堂，一家搬进和学校相连的弃窑。时间不到半年，张华原来山顶的家，已是荒草萋萋，坠土散落，一派“山顶洞人遗址”的感觉，叫人不敢相信张华一家是怎样在这里度过了数十年。

早晨天蒙蒙亮，传来村里第一声鸡叫，不一会老树上聚集的鸟唧唧喳喳，接下来早鸭子在窝棚里按捺不住嘎嘎嘎，再下来是驴的嘶叫，父母窑洞的开门的响声，张华一天的生活开始了。不一会围墙外，传来脚步和稚嫩的话声，接着教室门被推开，里边在挪凳子，然后就是娃娃们在朗朗地早读，尽管只有4名学生，但声音依然洪亮有力。清脆的声音回荡在宁静的山村，和太阳一起，走进张华的世界。张华喜欢这种读书声，在她看来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最具生命力的声音，是她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是这读书声伴随她走过10年，给了她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给了她希望。于是，张华很快整理好教案，胳膊窝挟着课本，匆匆向窑洞学校走去……

张桂梅 在大山里推动教育



文：吴美玲

民族教育就是要把原来美好的东西保留，少数民族淳朴、勇敢和勤劳，他们用自己优美的语言，用这些家乡语言交流很亲切，可以反映当地的风采和风俗习惯，也给我们带来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

张桂梅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和谐相处，她把心力和时间毫无保留地投入民族教育，义务当儿童之家的院长，她所有的执著和付出，都是为了缩小孩子们在人生起步点上与别人的差距，让他们得到公平发展的机会。

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拉一条对角线到西南的云南，是几千里路之遥。多年来张桂梅立志扎根云南一个多民族山区小县，当一位“人民教师”。她孤身一人，肩上同时扛着一个儿童之家，担起教养 50 多个孩子的责任。

张桂梅，满族，1957 年出生于黑龙江，现在是云南省丽江市

华坪县民族中学的教师，兼任华坪儿童之家院长。作为民族学生的老师，作为孩子的家长，在课堂内外她都劳心劳力，想方设法以知识改变来自大山的孩子的命运，以身教打开孩子追求善与美的心窗。张桂梅的时间和心力全都投放在孩子的身上，她并非有过人的体力，相反，却是拖着病弱之躯，曾经多次在生死之间徘徊。对于疾病和死亡的威吓，她早以平常心看待。对于自己的身体，她像是一个旁观者，她的心思和精力全都灌注在孩子们年轻的生命上，当一位好老师的信念，成为她生命力的源泉。

山区小县的“人民教师”

跟张桂梅老师见面时正值炎夏，学生在放暑假，儿童之家大部分孩子也回乡暂住，院内比平日宁静。白天张老师还是很忙，仍四处奔走，要到县上别的乡镇演讲，分享她自己和孩子们的故事。儿童之家的工作人员在暑期休假，张老师跑到哪里，都得带着院内年纪最小的小华林——张老师更爱喊他小萝卜头，年仅3岁的他则老是“妈妈，妈妈”喊着。其他几个仍留住任在儿童之家的孩子，白天互相作伴照应，晚上跟张老师一起做饭，很有点家的感觉。

张桂梅个子不高，头发短直，戴着近视镜，衣着整洁朴素，真是一个老师的模样。张老师说自己是“北人南相”——个子小小的、黑黑黄黄的，事实上她留在云南的日子，远比在东北的家乡长。过去10年，她不断受病痛折磨，面容清癯瘦削，在山城陡斜的街上走着，她会气喘吁吁，下楼梯也显得脚步不稳，不过这些体力上的问题，似乎并没有把她难倒。开学后她仍然会一如既往，跑到大山农村里，把辍学的孩子带回来。谈到教学的理想，她的嗓音依然清脆响亮。

华坪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与四川接壤，境内四处是山，26个民族包括彝族和傈僳族人口共15万，分布在2,200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中。华坪县不是国定贫困县，但是县内不同乡镇的条件仍有差距，一些位于偏远山区的农村，仍然处于赤贫的状况。华坪县县城是一个小小的山城，在炎夏午后阳光的照耀下，街道和楼房显得整齐清洁。张桂梅是看着这个小城过去10年来的变化。10年前张桂梅从云南省大理市调到华坪任教时，当地的街道竟是泥泞。她当时任教的中心中学，是一所残旧的老教学楼，位

于小山包上。这与她先前在大理市任教的中学，无论在外表或教学条件上，有着天壤之别。

10年前张桂梅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挚爱的丈夫因病离她而去，结束了她人生中短暂而美好的日子。这个人生上的落差，是张老师在贫困山区教学生涯的开端。在华坪县这个条件远不及大理市的小城里，她鼓足勇气面对生活和工作环境上的逆转。而她的学生，同样面临成长路上重要的转折。在张桂梅任教的民族中学里，有9成的学生是来自大山的民族生，山区与城镇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些年轻人从偏远农村来到县城求学，需要克服生活、学习和语言上的重重障碍。对于学生的困境与彷徨，张桂梅比谁都有深刻的体会。张桂梅与学生的命运，在各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重叠。在这转折时刻，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张桂梅选择了与学生一起克服教育和社会发展上的鸿沟，缩小因发展不平均而存在的差异，让山区里的孩子，能与城里条件较优越的孩子同步往前走。

中国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当前国家在发展轨道上要跨越的一大关口。过去20年，全国的教育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地区学童的入学率都有大幅增长，但是由于地理、历史、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原因，地区间存在教育发展上的差距，仍是一个需正视的事实。西部地区的省份，包括云南在内，在各方面的指标，如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和校舍状况等，都明显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假如说教育的功能是让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得以发挥潜能，同样获得发展机会的话，那么教育资源投入的不均，亦将造成社会成员间发展权利的不平等。教育作为发展的动力，是缩小还是扩大社会结构上的不平等，并不单纯反映在统计数字上，也关乎质量上的改变。而教育工作者，正是站在最前线的改变动力。

“我们国家的发展，有人生活提上去了，有人还是留在原来的层次，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过好的生活。”这个理想看似简单直接，但是要付诸实践，张桂梅个人所做的承诺和付出的时间心血，远超想象之外。

与学生共同进退

1996年张桂梅从大理市调到华坪县当教师，最初她在当地的

中心中学任教。那个时候，她刚从丧夫的伤痛、无助与绝望中走出来，她要在一个新的地方建立自己的生活，不要活在别人怜悯的目光之下，只想把全部精神投入她热爱的教育事业中。她承担了4个初三毕业班的政治课教学，同时管理女生、协助学校搞文艺活动。她夜以继日地埋首工作，一心要把学生的成绩提上去，对于学生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她都事事关心。她整个人沉浸在忘我的工作境界中，并没有察觉到原来生命中另一个艰巨的磨炼，就在眼前。

就在距离学生参加升学考试还有3个月的时间，她被检查出患有子宫肌瘤，肿瘤大得令她腹部看起来像是怀了5个月的身孕。医生劝她立即动手手术把肿瘤切除。在治病和留在讲台上与学生并肩努力之间，她选择了后者。“考试对学生来说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200多个学生，花了10年的时间，为的是应付这个关口，在这个时候换老师，对他们非常不利。”她把医生的信藏起来，抵着剧烈的痛楚，如往常一样继续站在讲台上。直到七月把学生顺利送进考场，她才到医院动手术。

张桂梅的病情非轻，“腹腔器官全都移了位，肠粘连住并且都贴了在后腹壁”。手术后医生劝她至少休养半年，可是第24天她就回校上班了。在两年之内她做了两次大手术，两次都在学校假期内进行，她刚能走下床便马上赶回学校，哪怕是一天，她都不愿意耽误孩子的学业。她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学生的学业有很大的进步，也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而她虽然患病，仍然自强不息，在其后几年一边教学，一边完成云南大学3年本科汉语系课程。

病魔并没有把张桂梅对教学的热诚击退，1997年病后初愈的她，主动要求转到刚成立的民族中学任教，任务更为艰巨。张老师在民族中学任初三班的语文和政治教师兼班主任。民中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子弟，他们全部住校，要带粮上学。“没有见过有这样穷的孩子，每天光靠泡米饭吃，没有正当的被铺。”在民中任教多年以来，她把自己的工资和因教学表现出色而获得的各项奖金，全都用来资助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她把丈夫买给她的，她最珍贵的毛衣都给了贫穷的学生，连东北的姐姐寄来让她回家的路费，她都用来资助孩子。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因为我是老师，我只是比普通群众有更多的执著和任务罢了。”

大山里寻回失落的孩子

医生对张桂梅说：“事业是大家的，生命是自己的。”在她来说，倒是说不清她那重生的生命是她自己，还是学生的，抑或是早已混成一体。每一次张桂梅获邀请作公开演说，她讲的更多是学生的故事。她认为要克服重重障碍，改善山区少数民族子弟的教育，努力是属于大家的。

疾病的折磨令张桂梅壮年的身体变得非常瘦弱，肿瘤引致的并发症和身体疼痛，有时更令她举步维艰，真的难以想象，她能经常独自一人跑到山区的农村里，寻找没有上学的学生。“走不动我就爬，有时天黑了我还在山里跑。”附近乡镇的人，都熟识张老师，都惯见她从一个山头跑到另一个山头，要把孩子带回学校。她口中亦有说不完的孩子和他们家人的故事。



“5年前我班上有一个彝族男孩不读书，要让成绩比他好的妹妹上学。他家里很穷，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我去他家里找他，见到他父亲一脸病容。这个女孩子，我资助她完成了初中。”后来男孩子家里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孩子的父亲对张老师说，是她的风范激励了他的斗志，他开始有能力供孩子上学，现在女孩子读高二，男孩子也考上了大学。

“有一个女孩子，读书很认真，考上了丽江高中，为了不耽误学业，她连亲人过世也不回家。可惜后来她还是放弃了学业，跑

去海南打工。后来我们在昆明重遇，女孩子一见到我便哭起来了，她终于明白读书的重要，我鼓励她重读初三，现在她考上了大专。”“对人的教育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育学生不是学校那几年的事，而是要在成长的过程中扶他们一把。”

大山里的孩子离开了家庭来到城镇求学，新环境新事物对他们来说充满诱惑。张老师学校的男生，有一段时期爱流连县城内的网吧，彻夜不归。为了让孩子养成作息定时的习惯，张老师搬到学生宿舍跟31个男孩同吃同住，晚上督促学生温习，与他们聊天，谈生活，孩子感觉就像跟妈妈住在一起。“有几个月时间，我白天连开水也不多喝，怕晚上惊醒学生，或是他们又趁机溜出去。早上跟学生跑步，生活过得很开心。”

教育有多样的功能，对不同人群不同社会来说，其意义亦不尽相同。在目前存在城乡差距的中国社会来说，教育对很多贫困地区的学子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是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途径，亦是社会晋升的阶梯。“山区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读书。”作为老师的张桂梅，她承担的使命就是要给孩子公平竞争的机会。

“作为一名教师，我就是管得多了。”张桂梅的事迹社会上很多人都知道，各界捐款给她治病，她就把治病的钱捐出来资助贫困乡镇兴建小学。她得到1万元的奖金，便都用来资助学生家乡的贫困户建水窖，不但要想办法管学生读书，还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我是不是管得太多了一点？自己干的远远不够。”

民族教育就是平等和尊重

民族中学的学生来自山区，在他们独特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成长，语言上的障碍，造成语文教学的重重困难。张桂梅有她活泼的一面，她爱文学、唱歌、跳舞、谈天、说笑，这些成为她与学生沟通的有效方法。

“山里的孩子不说话，课堂非常安静，跟我在大理教学时的学生不一样。但是这些孩子能歌善舞，我便把他们民族舞蹈的劲头引进课堂来。我跟他们学习民族舞蹈，用歌唱来沟通。比如说爱情观在不同年代的发展，我们就用歌声来表达，我说我的年代，他们说他们熟识的，引导他们说话，他们的兴趣来了，便能进入课文里。我不会否定他们说的话，只要他们说话就成。我们的课堂，又是唱

歌、又是跳舞、又是辩论，什么形式都有，哗啦哗啦的。”

“民族学生特别喜欢表达，大山里的人家很分散，一个山头上只一家两家，孩子们的父母白天干活，他们就每天放放羊，没人交流。跟这些孩子交流比较费劲，要诚恳，有耐心，不要瞧不起他们。”

在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的洪流里，民族教育的意义和定位是什么？是要把山区里少数民族子弟都改头换面，变成城市里面过着“现代生活”的人，是要以城里人的价值标准硬套在他们身上吗？教育要让孩子和他们的大山生活完全割离吗？张桂梅与来自大山的孩子接触多了，深深体会他们宝贵的本质。“我很喜欢山里的孩子，他们感情非常淳朴，不爱说假话。”

“民族教育就是要把原来美好的东西保留，少数民族淳朴、勇敢和勤劳，他们自己有自己优美的语言，用这些家乡语言交流很亲切，可以反映当地的风采和风俗习惯，也给我们带来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我不赞成一元化，全部都说汉语。孩子保留自己的语言，也学国语和外语，这样他们能掌握的就比城里的孩子更丰富。我希望他们保留优良的传统，也有现代的一面，这是我理想的民族教育。”山里来的孩子，常常感到让城里人看不起，他们急着与别人看齐。张桂梅就鼓励他们要相信自己的优点和能力，他们的勤劳与刻苦，是城里的孩子要学习的。

她心里有着憧憬，孩子将来回去的大山是美丽的图画。“孩子回到大山以后，知道这片山怎样处理，知道怎么样是美，不会把树全都砍掉，知道什么树可以保护水源，什么树使风景更美，什么树使土地不塌荒，他们会用心建设自己的家园，保留民族风味。”

群体母爱的凝聚

张桂梅尽心尽力当好一个“人民教师”，她的努力得到各方的认同，她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师德标兵等称号，而学生们在学业上的进步，亦代表她努力的成果，她大可以继续守着教师的岗位，以荣耀作为付出的回报。可她没有停下来，除了作为人师外，她更当上了50多个孩子的母亲，她现在兼任华坪县儿童之家的院长。

1999年一个海外华侨民间团体“美国妈妈”计划在华坪县建了一所孤儿院，当他们听到张桂梅的事迹后，一定要张老师出任

院长。2001年起，张桂梅不拿一分报酬便当起了54个孩子的妈妈。这样，老师每日便奔走在学校和孤儿院之间，学生和孩子加起来差不多100人，全占去了她的时间和体力。她只想到“能多做一点事情就抢着来做，能支撑一天就撑一天。”

她说没有想到孤儿院工作原来是那么难，而且越做越难。孤儿院开办之初，送来的孩子从一岁到小学六年级的都有。张桂梅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在安排孩子的日常生活上碰到不少棘手难题。跟说民族语言的孩子沟通、帮他们洗澡、让他们学会卫生习惯、安排他们吃饭、按时上床睡觉等，都不是易事，每次都得斗智斗力，然后一天下来，人都已经垮掉了，又得面对第二天的挑战。张桂梅说自从有了儿童之家后，她晚上总是穿着衣服睡，怕孩子出了什么事要半夜起来。

生活上的难题，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累积，张桂梅都能一一克服。但是诚如张老师所说，人的思维不一样，不是计算机，所以教育是很复杂的一回事，不只是光满足孩子吃和穿的需要。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和环境不一样，教育并没有一套可以照搬的模式。更何况儿童之家里的孩子，大都有他们不愉快的经历，脆弱的幼苗曾经风吹雨打，更加需要别人的理解和开导。

儿童之家里曾有一个孩子，他父亲在村里偷了邻居一头牛，被人家打伤，后来伤重不治。他母亲因此跑掉，随后也病死，孩子被送来儿童之家。孩子心里恨别人破坏了他的家庭，认为谁都是坏人。在学校里恶作剧，扔石头，砸女孩子，连学校的卫生室都砸破。孩子不止一次恶作剧，老师向张桂梅投诉，孩子一见到她就哭起来，她只说了一句：“跟我回家”，没有责备孩子。孩子后来又偷了别人的东西，张桂梅帮他赔偿。孩子心里的郁结，张桂梅是理解的。她以谅解和宽恕来对待孩子所犯的错，她要让孩子知道，社会并没有对他不公平。

华坪县位于云南省与四川省的交界，那里人口流动频繁，社会状况也较为复杂，城镇里不少居民对山区来的人存在成见。儿童之家里的孩子，偶尔会在小城里犯错事，学校的家长和邻里，曾向张桂梅抱怨：“张老师，你错了，为什么把这帮人弄到这里来。”当一个尽责的好老师，张桂梅得到别人的尊敬，当孤儿院孩子的家长，她还得挨骂，办孤儿院并不是讨好的事。她说：“社会

和谐要有人付出，有人愿意牺牲。”

孤儿院是“官助民办”的事业，资金全来自社会募捐，张桂梅得想方设法，善用每一份资源。她曾试过趁人家鞋铺结业，用30元把人家50元一双的丽江鞋子买回来，然后50元卖出去，赚到的钱用以补助孩子上学的开支。为了让别人了解这个家，了解孩子的事，她现在常四处奔走演讲，又向企业募捐，这都是她从前想也没想过的事。

孩子们需要的是母爱，儿童之家里年幼的几个小孩总是“妈妈、妈妈”地喊着张桂梅，晚上几个小人儿挤在她的床上要一起睡觉。年纪稍长的，她不让他们喊“妈妈”，让他们喊“张老师”。她说“养你们长大的不是我一个人，我只是代表整个群体的母爱，把它凝聚在身上罢了，所以孩子要感激的，是社会的关怀。”

教育是终生事业

张桂梅原来是在企业机关里做文书的工作，文革刚结束，子弟学校缺老师，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便当起教师来，那时她才20岁。第一天当教师的每一个细节，现在说来还历历在目。

“我第一次的经验是失败的。对着全班学生，我一开始说：‘男同志提水冲地，女同志擦玻璃！’孩子们顿时笑作一团。我没有当过老师，黑板字写得很糟糕，孩子们偷偷在笑，大声纠正我的错。我不习惯跟小孩打交道，被他们批评一句，就哭起来了，想不干。”年轻的张老师还是好胜的，她不服输，用早晚的时间练习黑板字，每次窗外都探出一个个小脑袋好奇地看着这个新老师。

年轻时的张桂梅开朗活泼，她爱唱歌跳舞，也爱跟学生在山林里玩耍。慢慢下来她跟孩子相处得很愉快。这是因为她能放下架子，与谁都能平等相处。

张桂梅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和谐相处，她把心力和时间毫无保留地投入民族教育，义务当儿童之家的院长，她所有的执著和付出，都是为了缩小孩子们在人生起步点上与别人的差距，让他们得到公平发展的机会。

她一个人的奋斗，同时也是大山里的孩子和他们家人的奋斗，她说这些故事，为的是要让更多人了解，让更多人消除歧视与偏见。

马新兰 我的西部回族姐妹



文：臧健

只有安定团结才能有和平，只有有文化、受教育才能安居乐业。为了和平与安宁，一定要搞好女童教育，以女童教育带动妇女素质的提高，成为马新兰的坚定信念。

539

让韦州的人们永远远离暴力和流血，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马新兰相信，发展西部女童教育的路还很长，她要做的绝不是等待，而是一直走下去。

初识马新兰

我第一次见到马新兰是在1993年的秋天。9月下旬的宁夏南部山区已经略有寒意，我们参加“西部农村女童教育行动研究现场交流会”的一行人，从银川出发，坐着吉普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近六七个小时后，终于来到作为项目实验学校的同心县韦州镇回民女子小学。

同心县临近宁南山区的西海固，同属于国家级贫困县。这所在韦州最好的女子小学，被环绕在一片黄土坯盖起的土屋当中，城市来的人很难想象，就是这几排破旧的房子，七八位老师，在校长马新兰的带领下，支撑着韦州女子教育的希望。

如果不是马新兰代表学校致欢迎辞，在人群中你很难看出马新兰就是回民女子小学的校长。她的穿着丝毫没有特别之处，和当地妇女一样戴着白帽子，中等身材，不胖但是很结实，有着在高原久住人们的黑红的面孔。从她的笑容当中，你能看出她年轻时是一个漂亮的女子。因为参观只有半天，我和马新兰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匆忙之中结束的，我们没有机会讲太多话，但她的热情、精干、朴实，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于对西部女童教育的关注，也或许是宁夏南部山区不同的历史、民俗、文化对我有着太大的吸引力，1994年夏天，我和北大历史系的另一位老师带领4位研究生，再一次来到韦州，这次是以回族女子教育为题目做口述史的访谈。与上次的匆忙不同，我们一住就是3天，这期间与马新兰长谈了3次，算起来总共有9个多小时。我开始了解了马新兰的身世和她从事女子教育的经历。

身世与经历

马新兰1952年出生在韦州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在韦州，90%以上的居民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于地理环境的偏僻闭塞和教育资源的匮乏，加上当地流行的习俗，女娃到了9岁就不能抛头露面与陌生人接触，更不能到男女混杂的学校，所以当地到学校读书的女孩子少而又少。然而就在马新兰6岁那年，镇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当中医的父亲欣然同意把马新兰送到有女老师任教的学校。这位女老师从此成为马新兰幼小心灵中的人生楷模，“等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老师。”这是马新兰在小学时就立下的志愿。

1965年，马新兰小学毕业，那一年算她在内，全镇只有4个女孩子读完了小学。马新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同心县的中学，尽管到县城要翻山越岭走8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可她却一点也不觉得苦和累。然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波及贫困的山区农村，学校停课的现实无情地打碎了马新兰的求学梦，她不得不离开学

校，回到家乡那贫瘠的黄土地。也许是马新兰心中太想当老师的愿望帮了她的忙，在1971年的一次县里招工中，她幸运地被录取为乡村教师，每月工资5块钱，那一年她19岁。

改革开放以后的1985年，在教育部门的关注和当地宗教界人士的呼吁下，停办了30年的韦州回民女子小学恢复成立了。已经有了14年教书经验的马新兰，被调来担任女小的校长。走马上任之初的马新兰，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新选的校址只是两栋低矮的土房，周围杂草丛生，垃圾成堆；教室的窗户上没有玻璃，里面空空荡荡，连一张桌椅也没有；四十几个女学生，都是从镇里其他学校“借来”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韦州，由于历史、社会、传统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当地回族女童入学率还不到20%，而小学三、四年级以后的辍学率更高达80%以上。

从马新兰来到女小的第一天起，她就没有被困难吓倒过，因为她从自身求学的经历中，早已深深体会到了回族女童就学的艰难。她的眼前常常晃动的都是那些渴望读书，却不得不每天待在家里，干农活、忙家务、带弟妹，因期盼无望、哀求无用而变得沉重的一张张稚嫩的小脸。每当看到由于不能入学读书，而不得不早婚早育的十几岁的女孩子，马新兰的心都在颤抖。她发誓要用自己的全部心血，来努力办好这所来之不易的女子小学。当一个人决定用生命来完成自己的事业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克服的呢！

马新兰带领5位老师，亲手铲除杂草，运走垃圾，修建破旧的教室。没有钱买桌椅，就先从别的学校借；没有钱买教学用具，就请镇上的人用废旧材料自己做。1985年9月1日，韦州回民女子小学终于如期开学了。这无论在韦州的历史上，还是对于中国西部贫困山区极度贫乏的女子教育来说，都是一件有意义和值得人们纪念的事情。

为了和平与安宁

马新兰常常引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教育一个男童，就是教育了一个人；教育一个女童，就是教育了一个民族。”因为女童会成为母亲，好的母亲才会使家庭幸福，这是马新兰的理解，也使她牢牢记住这句话，并不断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有和

谐安宁的生活，要实现安居乐业，不能没有文化，不能没有教育。她多次痛心地向我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1992年，在紧靠同心县的西吉县沙沟，发生了穆斯林教派之间的相互残杀，仅仅是因为教派之间有了矛盾，意见分歧不一致，就产生了流血冲突。参加屠杀的都是些没有文化的人，见不到外面的世面，就在村里横行霸道，没有文化就要产生暴力，亲戚之间也要打。这样一个事件在当地人们的心中成为难以忘记的记忆，也深深震撼着马新兰。只有安定团结才能有和平，只有有文化、受教育才能安居乐业。为了和平与安宁，一定要搞好女童教育，以女童教育带动妇女素质的提高，成为马新兰的坚定信念。



从此以后，马新兰更是一心扑在女童教育事业上，她期盼自己的努力能够为韦州多培养些有文化的人才，能够带给韦州人更加和平和富裕的生活。为马新兰带来支持和希望的，还是韦州女子小学作为宁夏、甘肃、青海、贵州四省区“西部农村女童教育行动研究项目”课题实验学校之后所发生的变化。课题组从1992年3月至7月，对四省区16个贫困县的28所农村小学所在社区的女童教育现状进行了系统调查，韦州女子小学被选为实验学校之一。马新兰协助课题组，从多个方面寻找影响女童就学的主要障碍和原因。在对调查结果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水平低下、群众尚未解决温饱，对教育需求不高；地方财力拮据，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家长文化水平低，对教育缺乏认识；

宗教戒律的束缚和早婚早育风俗的影响；山区、牧区不利的地理条件及教学点不足；办学形式单一，师资缺乏，特别是缺乏女教师；课程内容脱离当地生产、生活实际等影响回族女童入学读书的主要原因。

外力的介入和科研的成果，无疑会推动贫困地区女童教育的发展。将调查研究与办学的实践结合起来，韦州女小变了，马新兰也变了，她不再只是一个苦干的人，而是对于女童失辍学的原因，有了新的思考。她的经验告诉我们，贫困地区女童之所以比男童更少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其原因不仅仅由于贫困，更来自于历史影响、传统习俗、社会观念、宗教习惯、地理环境、家庭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性别与贫困，是扶贫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扶贫并不能完全解决女童问题。贫困地区的失学女童，也不仅仅局限于学龄期儿童，12~18岁的大龄女童失学问题往往更为严重。因此，解决女童入学问题，要靠改变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更要靠政府与全社会多方面的支持与努力。要建立适合本地区需要的，经济、实用、有效的女童教育模式，其中，为使教育与生存的关系更加紧密，贫困地区小学教育中渗透职业技能培训已成为大势所趋。

视女童教育事业如生命

543

1994年和1995年，由于准备以及亲身参与在北京召开的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NGO“女童”论坛，我和马新兰在青海和北京又见了两次面，这时我们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如果说我初识马新兰时她的热情和对女童教育事业的执著感动了我，那么1995年以后，当轰轰烈烈的世界妇女大会结束了，人们不再蜂拥而来地关注贫困地区女童教育；当女童教育研究的项目告一段落，经费没有了，研究人员撤走了；当刚刚有些变化的韦州女小由于失去所有的支持，重又回到发展的困境之中时，我才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马新兰的人格。她没有气馁，更没有退缩，仍然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实践着她从小就立下的人生志向，“做一个好的老师，让韦州的女娃们有学上”，以及不屈不挠地来实现她心中永难忘怀的和平安宁理念，“让韦州的人们永远远离暴力和流血，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多年来，她一家一家地说服动员，使韦州回族适龄女童入学率达到了98%以上，在校巩固率达到95%以上。由于2005年以前，国家在贫困地区只是普及5年义务教育，小学毕业后只有十一二岁的大部分女孩子仍然无法继续升学，马新兰为这些重新失学的大龄女童办起了职业技术与文化知识相结合的培训班，用韦州女小原本就很紧张的办学经费，请同心县的老师来授课。她通过结识的朋友四处联系，为韦州女小的图书室争取来更多的捐赠图书。马新兰不是用钱，而是用心在支撑着韦州女童教育的发展。

当我把马新兰的艰难和努力一并讲给《农家女》杂志的主编、北京“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负责人谢丽华时，她立即决定给马新兰以行动的支持，让20个韦州失学的回族大龄女童免费来北京培训2个月。2000年3月，马新兰亲自把20个（其中1人临上车时不敢去了）惊恐不定、忐忑不安，一直到了北京仍然疑惑是不是被拐卖了的女孩子，从偏僻的韦州一路送到了位于北京小汤山大东流村的农家女学校。因为在韦州，马新兰说破了嘴也无法使人相信，免费到北京去培训的事能是真的。在出发来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十几个女孩子的家长久久地围坐在马校长家，不放心地反复地问这问那，这些从未走出过大山的母亲们，更怕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女娃们被人骗。她们不是不相信在当地人心目中极具威望的马校长，而是怀疑马校长一定也是被什么人蒙骗了。长长的夜晚，马新兰苦口婆心地、一遍一遍地诉说办培训班的是北京的好人，是有爱心的人要帮助我们。她向家长们承诺，我亲自把娃娃们送去，也会亲自把娃娃们接回来。

两个月以后，当马新兰在银川又接到这19个返家的女孩子时，她开心地笑了，因为与两个月前的眉头紧锁、满脸惊恐截然不同，19个女孩子像绽开的19朵小花，欢呼、雀跃着扑向她，唧唧喳喳、争先恐后地向她诉说着北京的生活。19个女孩子长胖了，长高了，而最让马新兰感到不一样的，是第一次走出大山的女孩子们成熟了，自信了，她们不仅初步掌握了裁剪的技能，更有了努力把握自己人生的信念。

2001年7月，我和北大、北航爱心社的21个学生再一次来到韦州。这一次主要是石嘴山中学送给韦州女小11台电脑，马新兰和韦州女小的老师第一次见到这么现代化的设备，高兴坏了也愁

坏了，因为全韦州也找不到一个人会使用电脑，他们更拿不出钱从银川请老师来教。北大爱心社的同学们了解到这个信息，联合北航爱心社，决定将韦州女小列入暑期到贫困地区义务支教的项目点。而同学们到了韦州才发现，韦州女小的11台电脑全部是已经淘汰的286型号，而且有多一半都不能正常运行。北大的同学克服电脑设备上的困难，将在北京找到的一些DOS环境下应用的打字练习软件装进几台尚能运行的电脑，教韦州女小的老师上机练习熟悉键盘，并使用DOS^①下的WPS^②软件进行文字处理。同时利用从北大带去的一台笔记本电脑，讲授WINDOWS^③系统以及基本的应用软件。此外在专门举办的大龄失学女童班上，同学们除了讲授英语、数学、语文、生物、化学、物理等常规课程，还特别开设了一系列的专题讲座。

面对蜂拥而来的远近村子的孩子们，面对马新兰校长和女小老师们在生活上颇费心思的照顾与关心，同学们感动于韦州人的热情和对知识的渴望，又忐忑于辜负了这份真诚与期盼。在授课之余，同学们分成小组入户访谈，以女童教育为主，了解了西部的恶劣环境和教育的艰难，更深切体会到像马新兰一样的西部人的奋斗与奉献。

奋斗与希望

545

马新兰的努力没有白费，10多年过去了，尽管韦州还是那个偏远、贫瘠的韦州，但韦州上过小学的女娃们越来越多了，小学毕业以后能上到高一级学校的女娃们越来越多了，学校里的女老师越来越多了。即使不能再继续求学的大龄女童，由于在回民女校受到了自信、自立、自强的人生理念教育，也都纷纷寻找就业、经商的门路，和家人一起承担起家庭致富的责任。马新兰还告诉我，年轻的妇女有了文化，就知道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好处，她们再也不像老一辈的母亲们，一生中要生育十几个孩子，而是

① DOS，即 Disk Operating System 的简称，在1985-1995年间曾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磁碟作业系统。

② WPS，即 Word Processing System 的简称，即文字编辑系统。

③ 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的简称，是美国微软公司开发的电脑作业系统的统称。

有两个孩子就行了（国家政策允许少数民族妇女生育3个孩子），甚至有两个女娃的家庭，妇女也自动结扎而不再生了。妇女们有了文化，在家庭中孝敬父母，教育子女，妯娌之间、婆媳之间、邻里之间能够和睦相处，打架的少了，闹矛盾的少了，社会就和谐了。有了和谐，这个社会才会有和平和安定，家庭才能安居乐业。

韦州自然资源的缺乏与贫困，是马新兰所不能改变的。而她的努力和奋斗，却又确实实在改变着韦州人们的生活。或许这种改变是一种更深意义上的改变，是一种文化与心灵上的升华，它使得韦州的女人们活得更像个人了。

2003年8月，在我与马新兰认识已有10年的时候，我得知冰心的女儿吴青教授为韦州女小争取到全球妇女基金会支持穆斯林女童教育的一笔资助，钱不多，但对于马新兰和韦州女小无异于雪中送炭。马新兰已经在计划，要用这笔钱修学校快要倒塌的围墙，要为大龄女童培训班购买几台缝纫机，要为从未上过幼儿园的女娃们办起学前班，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马新兰相信，发展西部女童教育的路还很长，她要做的绝不是等待，而是一直走下去。

马志英
母爱——
献给农村女童



文：赵玲

“家庭的贫穷不是真正的贫穷，没有知识的贫穷才是真正的贫穷！”她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告诉娃娃们要自信、自立、自强，希望她们能用知识充实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争取到她们应有的权利，改变她们的命运。

她正是用这个不同血缘、民族、性别的大家庭的平等、和谐、幸福来诠释着和平的意义，用自己默默的坚守来争取贫困女童平等的教育权利。

宁夏海原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山区，十年九旱，非常缺水，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称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干旱的土地收成极少，顶多只能放放羊，全县38万人多数是农民，男的大多出外打工做一些重体力活，女的在家务农。环境的恶劣与生活的艰辛往往伴随着教育的落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使女孩子们更难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贫困家庭的女孩子们往往很早就结婚生子，当一辈子家庭妇女。

但在这茫茫戈壁上，一位 37 岁的回族妇女马志英用她的母爱与坚忍搭建起一个特殊的大家庭，8 年来先后帮助 80 多名贫困女童圆了读书梦，改变了她们的命运，更改变了当地人对教育的看法。

未实现的梦

马志英出生在海原南部山区郑旗乡撒堡村的窑洞里，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兄弟姐妹们从小就得帮父母割草，喂牛、马和骡子，全家人忙忙碌碌仅够维持生计。两个哥哥都只读到小学二、三年级就回家放羊了，姐姐们也没读几年书就早早结婚嫁人了。文静的马志英从小特别喜欢读书写作业，空闲的时候就爱画画做手工活，一心憧憬着将来能够念大学。

然而一直以来，当地人都认为女儿 20 岁左右，迟早是别人家的，投资在娘家，收益却在婆家。女孩子们结婚嫁人了。虽然勤奋的马志英念到了高中毕业，但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与贫困的家境最终使她长久以来的大学梦破灭了。马志英还没从辍学的苦闷中走出来就必须接受生活的现实。1988 年，她在父母的介绍下与本村的杨万海在大窑洞里结婚了。因为杨万海在海原县编办做公务员，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马志英的肩上。她任劳任怨地照顾公公和 90 多岁的老奶奶，把 3 个年幼的小叔叔抚养成人，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多年来，性格温和的马志英和爱好文学与音乐的丈夫从未吵过架，全家老小非常和睦地住在一起。为了贴补家用，擅长手工编织的她还曾经到当地的地毯厂做过工人，后来地毯厂倒闭她便下岗了。她也曾到海原县工商局属下一个市场做过清洁工，每月工资仅 200 元。

已为人母的马志英并没有在长年的艰辛劳动中磨灭对知识的渴求，她变得更加坚忍，并把母爱亲情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她每次走到大街上看到一些女学生心里就难过，难过家庭与现实给予她的不公平，更担心这些贫困女孩子的将来。

1997 年 9 月 1 日海原县的各个学校都开学了，马志英和丈夫儿子刚刚搬到县城不久，她路过海原第二中学时发现一个女孩徘徊在学校门口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马志英上去一问，才知道这个女孩叫杨丽丽，家离县城 20 多公里，学习成绩是她那个乡村学校的第一名，考上了海原第二中学却因家庭困难无法上学。杨丽

丽步行着来到县城，就是为了看看自己考上的学校是什么样子。她因小儿麻痹腿部有残疾，考上初中后父亲让她回家务农。爱读书的她吞下农药，幸好被她姐姐及时发现，才保住了性命。马志英又回想起自己未完成的读书梦，当即把杨丽丽领回了家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后来，马志英经过一个小巷时看见几个女孩在一家门口围着一个煤油炉子做饭。她带着疑问走到了她们中间，了解到由于学校没有宿舍她们只能在外面租房住，她的心情沉重了起来。她下意识地走进了孩子们的住所，看到仅有1米5宽的房子住住着5个人。再加上房子是新盖的，相当潮湿，摸摸床单、被子都湿漉漉的，马志英的心开始颤动。她想着，这样的环境孩子们还能住得下去？而且女孩们在外面住，生活和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马志英觉得应该尽快帮帮这些女娃们，就将5个女孩带回了家中。马志英看着女孩们在自己家里幸福地学习生活，想起长期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和忽视女童教育的落伍观念，她萌生了一个念头：创办“女童之家”，免费为家境贫寒的女孩们提供吃住等服务，让更多游离在辍学边缘的女童能够继续学习。她深深感到只有知识才能改变这些女孩的命运，她真心地希望自己未完成的大学梦能够在这些女孩身上实现。就这样，她开始陆续救助越来越多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贫困女童。

用爱搭建女童之家

马志英一家四口和进县城求学的农村贫困女孩们组成了一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为了建立“女童之家”，马志英和丈夫商量，腾出了家中最好的3间房子免费供女孩们住宿和学习。她、丈夫和两个儿子则搬进了年久失修的土坯房里。土坯房只有14平方米，屋顶破了一条很大的裂缝。乐观的马志英描述起当时情景面带微笑——每晚都能看到天上的星星忽闪忽闪地眨眼睛，他们便在星星的陪伴下进入梦乡。当时年幼的儿子们看到母亲的爱一下子被分走了，感到有些委屈。马志英便耐心地教育两个儿子，让他们多跟这些勤奋刻苦的姐姐们学习交流。女孩子们也很乐意辅导两个小弟弟的功课。当她们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时，大学毕业的丈夫杨万海则会细致地给她们讲解。

两个儿子很快就懂事了，帮马志英打水、做饭、收拾家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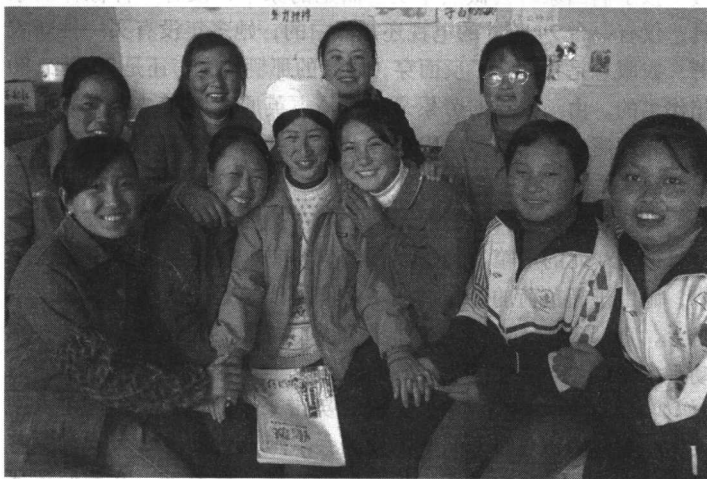
为姐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杨万海还专门买回了一台老式的“东方红”牌风琴，弹琴唱歌给大家听。空闲时，女孩子们经常跟马志英学画画，跟杨万海学弹琴，和两个弟弟一块打羽毛球、跳绳。马志英还在女童之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名叫“露露”的虎皮鹦鹉，每当屋里琴声响起时，小鹦鹉就会跟着节奏跳来跳去跟“弹琴”一般。平时，大家只要到小鹦鹉跟前，做出弹琴的手势说：“露露，弹琴，快弹琴吧！”小鹦鹉就真的快乐地“弹”起来，“唱”起来。马志英还种了些果树、蔬菜和耐旱的花儿，她常常把女娃们比作美丽的花儿，也把花儿当做娃娃一样呵护。在这里，回族与汉族的女孩子们，女孩子们与两个弟弟，丈夫与孩子们，他们所有人与花儿、鸟儿全都亲似一家，大家庭充满了鸟语花香和积极、平等的气氛。

至今，马志英已救助了80多名贫困女童，每年都有近20名女童住在她家。女孩们不用交房租、水、电、燃料等任何费用，每人每月至少能省下20元，一年就是240元。筹得这点钱对于生活在连年遭受旱灾的贫困山区家庭来说是非常艰难的。而马志英这个大家庭全部20多口人的生活全靠杨万海每月1,200元的工资维持。刚开始，很多人都不理解马志英一家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些农村贫困女童的父母也非常怀疑。8年来她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人们的疑问。

每天早上四五点，马志英起床为20多口人准备早饭；白天送孩子们上学后，她就开始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晚上，她给孩子们备好热水供洗漱或饮用。冬天她买了充足的煤给孩子们生火取暖，晚上孩子们睡着了，她把煤火封好，因为怕她们煤气中毒，她站在寒冷的屋外把窗户打开，觉得屋内的煤烟少了才把窗户关好回屋睡去。生活上，马志英像妈妈一样对孩子们嘘寒问暖，家里做点好吃的，她忘不了这些女孩子；谁带的口粮没有了，她立即送去；孩子们没有零用钱，她3元5元地接济；孩子们有个头痛脑热，她一定自己掏钱为她们买药治病。除了物质上的全力支持，马志英给予她们更多的是精神鼓励，她喜欢叫这些女孩们“娃娃”，她常说：“家庭的贫穷不是真正的贫穷，没有知识的贫穷才是真正的贫穷！”她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告诉娃娃们要自信、自立、自强，希望她们能用知识充实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争取到她们应有的权利，改变她们的命运。当遇到一些贫困的农村家庭想让女孩辍学回家时，她亲自跑几十里路去交通不便的山区苦口婆心地跟家长讲道理，让女娃继续念书。她还说：“我这样做，想尽力让贫困女娃得到与男童相同的受教育权利，我当年想上大学没有条件，不能再让这些女孩子重走我的路，我要让她们圆我的求知梦。虽然仅靠丈夫微薄的工资支撑着整个家庭，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条件差，但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充实、很快乐。这些女娃是我的心头肉！”

马志英的娘家在陶乐的月牙湖吊庄，2000年12月母亲身患重病卧床不起，曾不知多少次打电话叫她去——她娘很想女儿。但一向孝顺的马志英却一推再推，说等到学生放假了再去，因为她走后女孩们的炉火没人架，饭吃不到时间上，怕影响了学习，再说有个感冒发烧了更无人照料。还没等到放假，母亲病逝的噩耗传来了，她悲痛欲绝，泣不成声。老人带着牵挂永远地走了，她却没能尽到一点孝心，这成为她终生的遗憾和内疚。现在唯一能让她感到慰藉的是这些贫困女娃们不断取得的好的学习成绩。



女孩们在马志英亲生母亲般的温暖中更加刻苦勤奋，学习成绩都特别优秀，不少女孩是班里第一名，每年高考都有好几个考上大学，至今已有40多人考上大专院校。每当马志英得到她们被录取的消息时，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她说：“这些女娃被高等学府

录取了，不知怎的，似乎我觉得我也要上大学了……”为了给女娃们更多帮助和鼓励，她还制定了《女童之家奖励办法》，考上名牌大学的女孩奖励1,000元，重点大学500元，一般本科300元，评上自治区（市）、县（校）、班级“三好学生”还各有200元、100元、50元的奖励。

她相信，一个村子里只要有一个女孩考上大学，其他人都会以她为榜样，就能带动整村百姓对女童教育的重视。她还常常教育女娃们考上大学后一定要回报家乡、回报社会，为更多贫困的弟弟妹妹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为农村的父老乡亲们办实事。许多女孩也是带着这样的理想报考了师范和医学院校。当初认为女孩读书无用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女儿也能够考上大学，终于解除了疑惑，理解了马志英的一片苦心。淳朴的农村家长们会带着自家产的沙果、枸杞到马志英家，表达自己的由衷感激。

为了维持这个特殊的大家庭，8年里，她和家人省吃俭用为这些女孩子支出水、电、燃料及学杂费共5万余元。她还在寒暑假女孩们回家时去做点零工。而她的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仅有一台14英寸的电视还是黑白的，她多年没有买一件新衣裤，衣服总是正面穿了反面穿，她家的那辆自行车还是20世纪80年代买的。由于长年的劳累辛苦，马志英原本健康结实身体日渐消瘦，病痛也越来越多。1992年、2000年、2002年她因肠息肉动了3次大手术。

在6名女孩上大学之前，马志英东挪西凑给她们每人买了一个价值100元的皮箱。凑这点钱谈何容易，况且当时刚刚做完手术，她由于超负荷的劳作病倒了。但因钱总是一次次投到孩子们身上，直到2002年9月份病情严重了，才被送进医院治疗。在她动手术住院期间，她救助过的女孩们陆续来医院看望了她们的“妈妈”，这些女孩的到来，给马志英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手术刚做完，她就因担心孩子们坚持要回去。考取大学的6名女孩哭着恳求她别给她们买皮箱了，把钱省下来买一些补药。女孩们还哭着要将自己的血抽给马志英补上，面对女孩们这种纯洁的回报，她说：“我死也不会让女娃们给我补血，她们正处在长身体，学知识的阶段。以后，凡考上的，如果她们家里供不起，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供她们上学。”

尽管步履艰难，马志英和这些女孩们一直在用爱互相温暖着。女孩宿舍的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画、剪纸，以及她们的心语：

这里是沙漠中的一片绿茵，这里是跋涉长途中的一个驿站，这里是风雪雨中的一个避风湾，这里是一方憩息心灵的净土，这里是……其实这里只是一户普通人家。这里除了一位积病痛苦难于一身的回族妇女和她许多没有血缘的女儿们，并没有什么派头人物。

其实这里只是几间平常的房屋。这里除了几棵耐寒的果树并没有什么美丽的风景可观。但这里有更为珍贵的景观，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这里开满了爱的鲜花。

从这个大家庭出来的女孩无论走到哪里，总惦念着这个没有血缘的母亲与这个改变她们命运的家。每年放假，考上大学的女孩都会回来看她。8年来，“娃娃”们用笔写下了无数篇感人肺腑的文章，记录下“妈妈”为她们所做的点点滴滴以及她们对“妈妈”的无限深情。马小霞在《一叶不落的帆》里写道：

今夜难眠，今夜无语。我静静地呆坐窗前，想说的太多。正如那‘意犹未尽，欲语还休’。站在高三的巷口，我不知道是犹豫还是徘徊。因为我舍不得这个陪伴了我多年的家，这个让我感到异情难忘的家。我更不想远离这位在贫困和磨难中苦苦挣扎了大半生将一切献给农村女童们的马姨。

……

十年寒窗素裹，马姨用她毕生的精力维护着这个让她忧虑和欣慰的家。说出“忧虑和欣慰”难免会有人问这不矛盾吗？但请相信这是我真切的体验。她之所以忧虑是因为她肩上的担子太重，她不光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妻子，更是一位承载了数十个女孩和一对双胞胎的母亲。她之所以欣慰，是因为她在我们这群女孩身上续了她的大学梦，圆了她一生的心愿。

……

对于马姨我似乎是在读一部名著，一本让我爱不释手、彻夜难眠的名著，一本为我的前程指明方向、扫清道路的巨作……马姨的心灵深处，除了目的，纵然岸旁有玫瑰，有绿茵，有宁静的港湾，那我也是一叶不系之舟，但对于马姨这棵常青树，长明灯，

却成了我生命中一叶不落的帆。

马志英之女·马小霞 2004年4月13日

另一个女孩在《再生母亲——一个伟大的平凡者》里写道：

人间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心胸；人间最温暖的是阳光，比阳光更温暖的是挚热的爱；人间最美的是红花，比红花更美的是一张和蔼可亲的笑脸；人间最伟大最平凡的人是她，没有多少人知道她，只有我们穷苦山村出来的穷孩子知道她；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了解她的人仰慕她，敬佩她；她是一个病痛全身的人却总昂着头颅以一副灿烂的微笑迎接生活。她是一个没有女儿的母亲，她是一个贫苦的穷人，却用一颗鲜红的心为别人排忧解难，倾囊相助。她是一个最平凡也是最伟大的母亲，一个最伟大的女人……

马志英救助女童的义举渐渐传播开去，得到了一些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宁夏日报》、《新消息报》、《银川晚报》、《华兴时报》、《固原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宁夏电视台、海原电视台等均对马志英进行了详细的报道。2003年由宁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宁夏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视节目《改变命运的阶梯》播出后，先后在重庆、贵州、河北、新疆等30多个省市电视台进行转播，马志英的义举传遍全国。2005年1月27日她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为全国“三·八”妇女节拍摄了特别节目，节目播出后在全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005年5月，马志英还被评为全国“为国教子、以德育人”的“双合格家长”。自治区妇联、关工委、出版社等单位在她家挂上了“女童书屋”、“家长学校”、“安康教室”的牌子，并捐赠了2,000元钱、上千本图书和医药箱等。自治区主席参观完马志英的女童之家后个人捐款1,000元。社会各界广泛赞誉马志英为贫困女童的“好妈妈”。不仅周围的人开始明白马志英所作所为的意义，连当地城里的家长也想把孩子送到女童之家感受良好的人文氛围。

反思探索女童教育

面对这些荣誉和名声，马志英还是保持淡淡的微笑，她明白虽然当地人对教育的看法有所改变，但要改变西部贫困女童以及整个农村的教育窘境仍然非常艰难。

马志英看到现在一个行政村只有一所小学，许多山区的孩子上学得走上几十里路，而且在去学校的路上还有大河阻隔。只要大河里一涨水，孩子上学就更加危险。许多农民就因为路途太远没有时间接送，就不让年幼的子女上学了。

马志英救助的女童曹玉萍的姐姐2001年考上了高中，可父母却认为她没有必要再上学了。于是，曹玉萍姐姐回家务农，可性格倔强的她怎么也想不通，2002年2月的一天，跳进自家的水窖里自杀了。当马志英听到这个噩耗时，性格一贯坚强的她伤心地哭了……

面对这些问题，马志英和杨万海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背后的原因并寻找解决的办法。他们搜集阅读了大量有关农村教育与女童教育问题的文章资料，结合他们8年的实践经验，开始着手写一篇有关《浅谈怎样培养贫困女童》的文章。马志英认为农村教育的落后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小农经济的落后使农民没钱读书，另一方面是因为师资力量不足，所以大队里只有一所学校。然而，农村贫困面貌的改变还是必须从教育开始，向家长宣传教育的重要性，让他们从被动地接受贫困，变为主动让孩子读书、升学，积极地改变现状。马志英夫妇俩在女童之家里不定期地向周围家长讲解家庭教育的方法，在家长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随着今年“两免一补”政策的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必将进一步促使农村教育境况好转。马志英听到这个好消息，高兴得立刻拿出纸笔画了一幅带有象征意义的双鹤图以作庆祝。

现在每到新学期开始，总有许多穷乡僻壤的家长把女儿送到马志英家。但因为家里地方有限，马志英家一次最多只能住十七八个女孩，稍微来晚一点的就住不了。看到这些不能住进来的女孩与他们的父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马志英感到非常难受。

马志英夫妇看到女童和家长们对教育的热切渴望，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与反复思考，计划把“女童之家”扩建成一个“女童

学校”。谈到未来的女童学校，马志英非常高兴，她设想发挥自己特长教女孩子们甚至她们的母亲学习绘画、刺绣、缝纫、裁剪等实用技能。这样不管最终能不能上大学，她们都能有一技之长，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存的能力；已经念大学的女孩子们可以抽空回来做志愿者，参与女童学校的管理，帮助更多姐妹们；丈夫杨万海还可以来教女孩们英语和写作。“女童学校”将结合道德教育与诚信教育，集女童的住宿、餐饮、娱乐、技能培训与家长培训于一体。

今年初，马志英家年久失修的土坯房彻底坍塌了，她和丈夫便打算在老房旧址上建立起这个3层楼的女童学校。他们详细计算了一下建立一个3层楼房的成本，至少需要二三十万——截至目前他们接受的资金捐助总共只有3,000元——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太难了。于是修建“女童学校”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

去年9月，马志英又病倒了，长期的劳力劳心使她的胃和心脏也不大好。此后她的身体更加虚弱，现在体重已不足90斤。但是她仍旧在用充满母爱的微笑地坚持着，她认为自己所做的只不过是些小事，她会一直坚持做下去，她相信只有自己做出榜样来才能带动周围人民的改变。她正是用这个不同血缘、民族、性别的大家庭的平等、和谐、幸福来诠释着和平的意义，用自己默默的坚守来争取贫困女童平等的教育权利。这么多年来，丈夫杨万海一直在旁边默默地支持着她，2005年他写下了一首诗《爱的奉献》送给自己的妻子：

人皆向钱看，
享受己在前。
汝却掷千斤，
为女智囊满，

真情撒人间，
操劳衣渐宽。
世人皆笑傻，
辛苦为谁甜？

汪桂兰
扎根延安我不悔



文：朱谦 孙央丽

汪桂兰平等待人，把教师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凝成一股绳，一心一意抓好教学。在汪桂兰全力拼搏和不懈努力下，康崖底由一个贫穷落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小学一跃为黄陵县知名学校。

汪桂兰一直保持着“扎根农村干革命”不变的坚贞；她把自己全部的才华和智慧贡献给了黄土高原；她是黄土地最忠实的女儿。

踏遍了黄土吃遍了草
我也是你怀里的羊羔羔
羊羔羔吃奶双蹄蹄跪
出林的鸟儿又飞回
青春难再两鬓白
一生痴情更向谁

放声对着崖洼洼喊——
扎根延安我不悔^①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甘肃会宁《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编者按中发布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作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首都北京,北京第一师范68届数学系毕业生19岁的汪桂兰也和她的同学们,走上街头,敲锣打鼓、游行宣传,并写血书、决心书,要求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把自己培养成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就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布不到20天——1969年1月10日,汪桂兰和北京第一师范的同学们作为首批上山下乡知青,搭乘南下的列车,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从这一天起,汪桂兰的人生发生了变化,从此走上了一条苦难而艰辛的人生道路。

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

西去的列车在冬季的田野上奔驰,汪桂兰和她的同学们异常兴奋,她们在列车上一会儿高唱革命歌曲;一会儿朗读毛主席语录,直到疲倦,在伴随着阵阵列车前进的节奏中沉沉睡去……

等汪桂兰醒来,列车到达铜川车站。知青们按各自所在县、公社换乘大卡车,继续前行。时值一年最寒冷的日子,气温下降到零下20度。光秃秃的黄土高坡、纵深的沟壑随着卡车的前行在知青们的眼前出现。汪桂兰看到孤零零的树在风中伫立,干枯的树枝裸露在苍茫的天空,随着北风的呼啸瑟瑟发抖,仿佛来到人迹罕见的原始地带,情景十分凄凉。她纳闷,上山下乡动员时,不是说要去的地方到处是水,到处都是绿,是大平原?怎么没见树没见水也没见大平原?汪桂兰插队的地方是宜君县尧王公社思弥大队兹畔村,以后他们同学之间就开玩笑说,这个地方是“思弥大平原”。

^① 北京知青诗人梅绍静作品,本文略有改动。

卡车在宜君县的五里镇停下。夜幕降临，大家在五里镇住了一宿。下乡第一顿饭是玉米珍拌面片，说面条不是面条，说稀饭不是稀饭，这在当时已是最好的招待。吃完饭，各村的人已赶来，好一点的村是骡子套车，穷的是毛驴赶车，再穷的村是人拉车，知青的行李铺盖搬到车上，朝着各自的村走去。

汪桂兰和插队的知青小组2个女生5个男生一起赶路。只觉得越走越荒凉，越走越寒冷，仿佛整个空气都凝固了。不一会儿，天上飘起零星小雨，落在地下结成了冰，走在上面不留神就打滑。知青们脚下穿的是条绒面塑料底的棉鞋，一忽儿一个跟头，不是你被摔得四面朝天，就是他跌个爬扑，一路哭一路笑，仅仅15里的路程，却艰难地走了一天。汪桂兰不知摔了多少跤，打那起，她再也不穿带塑料底的鞋了。

队上把最好的四孔窑洞给了知青，还为他们请来一位全村做饭最好的妇女。初来乍到，知青们看到窑洞望而生畏，里边黑糊糊，没有电，照明用的是棉花套子捻的煤油灯，火苗窜上来直朝人鼻子孔扑，第二天一看，鼻子是两个熏黑的洞。第一眼见到村里人，各个衣服都起明发亮油光油光，原来这里没水，没条件洗刷，时间长了，就成那样。村里许多人走路都一瘸一瘸的，以后才知道是由于水土问题，得了地方大骨节病，当地人叫这是“拐子”。清晨知青起来刷牙，村里人好奇地围观，他们不知知青拿刷子在嘴里蠕动，满嘴的白沫是干啥。初来的北京娃好洗刷，全村人唯一的一口窖水井，本来够全村人饮用半年，却被汪桂兰他们不到一个月就用光了，害得一村人没水吃。以后，知青就把脏衣服拿到离村二里路外的河里洗，回时再担一担水。

下乡不到一个月就是春节，村里人心疼细皮嫩肉的北京娃，热情地拉知青到自己家吃过年夜饭，汪桂兰在农民家吃的是“黑面饺子”，面是麦子磨剩下的黑粉，馅是没有放油的萝卜，这是人们最好的年夜饭。

生活的艰苦让汪桂兰和同学们始料不及，不过她想本来说的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还在乎这些。汪桂兰身板硬，学得快，没用几天就学会了地里的农活。她像山里人一样在崎岖陡峭的山路担粪、挑水；在山坡上犁地；在村里推磨，干活比一个男的还

厉害，割麦子男劳力比不过，村里人不叫她的名字，称呼她“大汪”，意思是大干家。村上把她的工分和男劳力一样算，一天能挣10个工。

中国如此之大难道就没有我立脚之地？

思弥大队的塬畔生产队是宜君县最边远的村落，山上稀稀落落点缀着16户，100来口人。山下一二里外躺着一条洛河，河对面是洛川县。整个周围一片荒芜，走上几十里路不见人影，经常有狼群出没。来队上不久，村上给知青买了两头小猪，发展养猪事业。一天早晨醒来，走出窑洞，发现两头猪的脑子让狼给吃了，猪的尸体横陈在猪圈外。晚上睡觉时候得把门关好，用木杠顶得紧紧的，以防狼进来。汪桂兰把这里的生活写给了北京的家人，她的母亲伤心得直掉泪。

窑洞又黑又潮，被褥潮湿得几乎能拧出水。在淅淅沥沥的雨天，窑外泥泞迈不出去，知青们被围困在窑炕上；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耳旁不时传来狼的嗥叫，躲在窑洞，又凄惶又恐惧。农民们口粮不足，整日为生计艰辛劳作，却依然肌黄黑瘦，面对现实，汪桂兰最初的雄心与好奇荡然无存。她后悔地流出平生最痛苦、最富情感的泪水。有时她和知青们默默无语相对而坐；有时蒙头痛苦、呼地叫天，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白天还得和社员战天斗地，肚子饿了不能说，手磨破了不能叫，再苦再累也得咬着牙、挺起胸，装好汉。有时劳动收工，她坐在高坡上望着不远处起伏的山，暗自发问：难道就永远这样过下去？难道这就是自己所希望的生活？读了十几年的书，就是为了在这里修地球？她想起了童年时光，想起在学校的岁月……

汪桂兰1949年出生，她的母亲是家庭妇女老北京人，父亲从山东来，在北京一家工厂上班，每月用40多块钱的工资养活汪桂兰的母亲和他们姊妹兄弟9个，生活十分紧张。1962年汪桂兰上初中，她的父亲死了。汪桂兰的家本来在北京前门天桥，自父亲死后，母亲在城里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养活9个孩子，搬到北京朝阳区郊区，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养活孩子。汪桂兰排行老三，自打上学，学习成绩在班上年级都名列第一，是全校的少先队大队长。1959年人民大会堂刚修好，中国少先队在这里举行成立10周

年庆典，汪桂兰和她姐姐作为学校的代表出席大会，这在当时对一个小学生是最高荣誉，人们都羡慕她们姐妹俩。上初中，汪桂兰的学习成绩和表现仍名列前茅，学校考虑让她入团，可由于汪桂兰的母亲的成分是富农，没有入成。但到了初二，学校批准汪桂兰入团，并让她任团支部书记。

汪桂兰在学校擅长体育，被同学们选为体育课代表，运动会上给学校拿了不少奖项。初中毕业，由于她品学兼优，学校保送她上最好的师范学校——北京第一师范。汪桂兰学的是数学系，除了主课外，她还接受了音乐、绘画、体育、地理、历史等其他门类的课程。按汪桂兰当时的设想，是在北京某学校教书育人，条件允许，继续深造。然后，成家立业荡起生活的双桨，划向理想的彼岸。然而，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她生活的轨迹。

汪桂兰想自己读这么多年的书，绝不是为了在农村修地球，应该有更宏伟的目标和志向，宜君这个偏僻、狼群出没的地方，不可能有什么造化。也不知是想的太多还是想的太少，插队3个多月后，汪桂兰离开了陕北。

回到北京，汪桂兰又面临一些困难，当时北京户口管理特别严，没有户口就没有粮吃，家里弟妹多，又多了汪桂兰这个白吃粮食的，就很紧张。家里人在上边没做官的，缺少关系，什么希望也得不到，在北京待，也是白待。看到母亲终日辛劳，白白养活她这个闲人，汪桂兰坐卧不宁，她实在不想给母亲造成过重的负担。她想：“中国这么大，难道就没有我立脚之地？”她想到陕北祖祖辈辈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想到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坡，想到点缀在高坡上的窑洞。她想，不管怎么说，户口不在北京，已不算北京人了，也许延安才是自己真正的家和归宿。于是，她痛下决心，毅然回到了陕北。

这次回来，是汪桂兰真正人生转折的开始，她不再为那些不着边际的事情瞎想，也不在回避艰苦生活的现实。铁了心地和社员白天、黑夜、风里、雨里、水里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用强度的劳动涤荡心里的污泥浊水。就在她插队7个月后的1969年7月，宜君县教育部门招工，她被接收，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到宜君农村的焦坪中学教书。

用爱心温暖大地

初登讲台的汪桂兰遇到很大的阻力。首先，是语言问题，山村的娃娃听不懂她的北京话，她也听不懂山村娃娃的宜君方言，交流受到影响。比如一个极为简单的事，彼此需要用手势比划半天。有一次打扫卫生，汪桂兰让学生把“筐”拿来倒垃圾，学生听不懂，汪桂兰反复说了几遍，学生还是不明白，汪桂兰只得自己亲自去。事后才知道，陕西方言把“筐”叫“笼”、“拿”叫“撼”、“水担”叫“扁担”、“暖壶”叫“电壶”。从那时起，汪桂兰就有意识利用茶余饭后、课间休息、星期日到学生中间和家长中间请教，积累和收集陕北方言，做好笔记，带在身边随时记忆，背诵理解，熟能生巧，汪桂兰很快就掌握了陕北方言。

当时陕北特别贫穷，商品奇缺，经济困难，学生们整日衣衫不整，穿着破烂，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理解问题的能力很差。走到学生跟前，就会闻到一股怪味，是常年不洗不刷的结果。特别是见到这些脏兮兮的孩子简单的问题讲了四五遍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汪桂兰就气不打一处出，不由得出现过激行为。这样，与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学生们也疏远她，也就谈不上提高教学质量。于是，汪桂兰就静下心来想，到底是学生的问题还是自己的不是。她开始主动接近学生，哪个学生的衣服破了，就主动拿出针线给缝补；哪个学生脸脏了就叫到办公室里给把脸洗洗净，一个问题讲四五遍听不懂，就反复讲，直到听懂为止，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玩游戏，一起扫地、抹桌子、一起在地里干农活等。这样和同学渐渐建立了亲如一家的感情，学生有问题也爱找汪桂兰，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也爱给汪桂兰诉说。

解决了语言阻力和学生的关系，汪桂兰的教学质量很快得到提高，受到家长、学校、老师的好评。她还经常请教老教师，与他们研究，探究有关课题，听他们讲课，请他们批改教案，和新老教师一起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她自己还系统重新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教学大纲》等，教学质量随着教学实践和理论学习逐步得到提高。汪桂兰认为，既然选择了教书育人这条路，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有了这份执著、这份信念，汪桂兰活得非常充实和坚强。在

棋盘中学，环境相当差，冬天学校供应不起炭，学生无法在教室里取暖。汪桂兰就自己每天到山上砍柴、背柴，或到地里抱玉米秆，把火炉生好，让同学取暖。山里的孩子来学校读书非常不容易，有的家离学校三四十里路，都是自己带馍，汪桂兰就把同学的馍放在自己锅里腾软。有的同学家里穷，饿肚子，汪桂兰就给学生做饭吃。汪桂兰和学生的关系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在宜君县，汪桂兰先后在焦坪中学、棋盘中学、甘泉中学当老师，一听说她要离开，学生们都恋恋不舍，一定要拉她到家里吃饭，还为请她，互相闹气。平时，她去走访家长，一进村，这家请吃饭，那家送她土豆南瓜，有时一天下来被请吃了7顿饭，吃得她都走不动了。汪桂兰感到，在人情世故上，城里人总缺点儿什么，可能是见的人多了，老让人觉得有点冷漠，哪有陕北的乡亲们，这么亲切，这么信任自己，把自己看得这么重。

山丹丹开花山洼洼香，这辈子跟定了山里人

来陕北时汪桂兰19岁，转眼几年工夫她已二十三、四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当年像这个年龄已经很大，汪桂兰的家人给她张罗介绍对象，介绍了两个都没成功，原因是人家嫌汪桂兰的户口不在北京。1973年的一句玩笑，使情况有了转机。那一年，宜君县武装部到棋盘招兵。县武装部的同志常爱到学校转，和汪桂兰成了熟人。有一天这位武装干部和汪桂兰闲聊，问汪桂兰：“寻上相了没有？”汪桂兰说：“没有，没人要嘛！”那位同志问：“老陕要不？”汪桂兰说：“要！”就这样的玩笑话，促成了她的婚姻。介绍的男方是黄陵县太贤乡瓦梧村人，延安师范毕业，是黄陵县中学老师白昕辉。

接触了白昕辉，汪桂兰不再想到北京找对象的事，她认为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北京离她越来越远，而陕北离她越来越近。白昕辉正一步步走进她心里。他是一个非常心细、非常能替别人考虑的人。每次从黄陵来，都带些她爱吃的点心、豆腐干等，帮助她料理家务，与她探讨教学问题。汪桂兰非常感动，她知道陕北人都是女的在家做饭，男从不做家务，而白昕辉从不计较，挽起袖子，走进厨房蒸馍、擀面、炒菜样样行。人家也许是太爱自己了才这样做的，人是那么的敦厚、那么的善良、那么一个心

眼地关心自己，汪桂兰被深深地打动了，她发誓这辈子跟定了山里人。1974年他们正式结婚。

婚后3年，汪桂兰生下两个儿子，由公公婆婆带。她和丈夫一心一意地教学育人。除了工作，她还经常照顾公公婆婆。汪桂兰认为，自己的亲人离自己远，没有机会够照顾。只有把做女儿的心，奉献给二位老人。婆家离学校要四五十里路，可她每个月都要步行回去看望。每次回去都要到一里路外的村口去给老人家担十五六桶水，把缸挑满。给老人洗衣服、推石磨喂面、做饭等，把所有活干完才走，和当地的婆姨别无二致。

尽管汪桂兰婚后一心一意照顾公婆和这个家，可丈夫白昕辉心里一直不踏实，他总担心汪桂兰有朝一日会回北京，毕竟，汪桂兰是北京来的。1979年，传来一个令北京知青欣喜若狂的消息，北京市允许知青返城，当时，很多知青为了能尽快回北京，纷纷和当地人离婚，汪桂兰的丈夫为此忧心忡忡。汪桂兰非常矛盾，回北京是她梦寐以求的愿望，更何况，北京还有她十分思念的母亲。但当时的汪桂兰已有两个孩子，她很清楚她一走，对这个家意味着什么。汪桂兰最不愿回首这段往事，这让她心里特别难受，因为她确实就是想走。她也知道了当年让他们插队，是错误分配。上山下乡是当时高中初中毕业生的事，他们不属此类。他们作为国家的专门人才，是要分配到北京各个学校的。但命运就这么怪诞，错误的分配导致了汪桂兰别样的人生。



北京市教育局曾先后给汪桂兰来了4封信，希望她回京执教。接收单位只允许汪桂兰一个人回北京，家属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她一直没有答复。她把两个孩子送回北京母亲家，她觉得孩子们在北京会有更好的前途。当时，丈夫白昕辉没有阻拦，但婆婆知道后，却背着他们哭过好多次。两个孙子是老人从小带大的，见不到孙子，老人受不了，老人更受不了一个本来和睦的家却要面临解散。这个家曾给汪桂兰带来很多快乐，她和婆婆一直相处得很好。北京那边叫汪桂兰回去工作的消息也传到了婆婆的耳朵里，婆婆背着汪桂兰含着泪水对村里人说：“我这儿媳妇要是真的回北京，我就抱着她的腿不放她走。”

为了陕北这个家，为了老人，为了悉心照料她与她相濡以沫的丈夫，更为了她教过爱过的学生，为了他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汪桂兰决定放弃回北京。因为陕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这里的人们，已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她是没办法割舍的。这是一次机会面前的选择，选择是痛苦的。她想，那些曾在陕北结婚生子又离婚的北京知青，他们虽然回到北京，但家庭破裂的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很快汪桂兰就到北京把两个儿子接了回来。她的儿子白京涛说：“我们已习惯了北京的生活，肯定不想回陕北，记得刚回来时，有一个下雨天，我跟妈说，我要到公园。我妈骗我说对面村子有一个公园，等天晴带我去。几天后也就忘了。最后自然知道这儿根本没公园。”1992年，又有一次好机会，政策允许知青可以将一个孩子的户口转回北京，这次汪桂兰没有丝毫激动，她已不需要这样的照顾，她的根已扎在了延安。

康崖底 21 年的坚持

1981年汪桂兰被调到与宜君相邻的黄陵县康崖底中心小学，在那里一待就是21年，她把青春和热情尽情挥洒在那片土地上。

康崖底中心小学是有几孔窑洞，三四名老师和20来个学生的小学。窑洞年久失修，出现裂缝和坍塌迹象，成了危窑，窑洞又旧又黑暗，没有桌椅，学生就爬在人工垒起的水泥墩上看书写字。离学校近学生回家住，离家远的学生要翻几个山头，走三四十里路，住在学校的窑洞里。汪桂兰一到学校，就带着高年级的同学去到山里拍木椽，竖起来，顶住危窑。平时放学或课余时间，汪

桂兰带着同学到山上捡拾桃核、杏核；领着同学在学校背后开荒，种南瓜、土豆、树苗，成熟后卖钱，用这些积攒的钱，买石灰粉、油漆等，把窑洞教室粉刷得雪白亮堂，把门窗油漆一新。汪桂兰觉得孩子们爬在洋灰墩上边太冷不卫生，她就到山上拉木头，让村上的木匠给制成板。她又和同学们一起挽起袖子和泥，用砖砌两边的台墩，把木板搭在台墩上当桌子，让同学们有一个明亮舒适的学习环境。

汪桂兰来到康崖底给这里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孩子们都对说着与当地口音不同北京话的汪桂兰由衷地喜爱，家长们也非常佩服这个既能给孩子教数学、语文，又能给孩子教音乐、绘画、地理、历史、体育的老师，人们都觉得这个北京来的女老师太了不起了。尽管学校设施很落后，但许多家长都冲着学校的教学水平而来。学生到康崖底上学的越来越多，四五孔窑洞已无法收下近百名学生。

1985年，康崖底开始建新校，一个高2层20个教室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汪桂兰每天放学后，带着高年级的同学到村外拉石子，她亲自驾辕同学们在后边推，自己动手和同学一起给学校盖大门，还用石子铺好了校门外的路。教学楼前面是一个比教学楼还大的深坑，汪桂兰又带着同学们每天拉土填坑，他们像愚公移山一样，每天拉土不止，一年后，填平了大坑，平整出一个偌大的操场。一生爱花爱绿的汪桂兰还带着同学们，在校门口栽种了两排树苗，在树的附近和校内空地建起了花园，20年后的今天，这些当年的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高高地伸向蓝天，校内花园里硕大的鲜花在风中摇曳，仿佛是汪桂兰对这片黄土地的一片痴情的咏叹，仿佛在抒发汪桂兰对乡亲们永远抒发不完的爱。

汪桂兰冲天的干劲和热情被乡亲们看在眼里，人们无不交口称赞她是一位好老师，优秀难得的人才，也就在这一年，汪桂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汪桂兰更是把心血倾注在工作上，不久她就被提升为学校的教务主任，1992年汪桂兰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被任命为康崖底小学校长。

冬天，天冷教室里必须生炉子，汪桂兰想一个教室一个炉子，20个教室就得20个炉子，请一位工人砌炉子，砌一个需要20块钱，20个炉子至少要400块钱。而炉子年年坏，年年要砌新的。

汪桂兰挽起袖子，领着同学们自己干。他们拉来土砖，给每个教室砌炉子，大家在一起享受着劳动带给他们的快乐和成果。许多学生经过锻炼，俨然成为砌炉子老手，砌的炉子比大人砌的还旺还好用。汪桂兰常教导她的学生，大家都在穷山沟里生活，经济困难，更要自立自强，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依赖家长。

学生们在新校住的是窑洞，每逢下雨窑上边积水，朝窑下面渗造成土质松软，时间久了窑洞就要倒塌。为了保证窑洞完好干爽，需要每次下雨过后，“压窑背”，当地人用碌碡套在肩上来回碾平，使已被雨水浸泡松软的窑顶上的土被压硬。学校请人压一个窑的窑背至少需要10元，教工和学生总共有15个窑，一次压窑背就得花去150元，而且每下一次雨都必须压，一年至少要压20次，这样仅压窑背一项，学校一年就得花去3,000元钱，这对一个贫穷的山村学校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汪桂兰决定带领同学们自力更生。天晴后，汪桂兰到村里借来碌碡，给碌碡两边栓上绳，来回地滚压。20年来，不算修操场、修学校大门等工程，汪桂兰仅压窑背和砌炉子两项就为学校省下近7万元，7万元对一个贫困的山村学校不是一笔小数目，7万元凝聚着一个北京知青对当地教育事业的全力投入和深深的热爱。在生活细节上，汪桂兰也显示处处勤俭的作风。每次到教室上课，她手里都拿着打针用过的废纸盒，里边装着红、黄、白3根粉笔，如果粉笔这节课没用完，下节课接着用，有时一根粉笔实在拿不住了，汪桂兰还是坚持一点也不剩，全部写完。汪桂兰的这种节约习惯影响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汪桂兰对学校的事费尽心思，可对她自己的事却很少留意。学校给汪桂兰一间13平方米的房子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还是厨房，但汪桂兰没有任何抱怨，而是一门心思地关心学校和同学们。

黄土高原的女儿，黄土高原的情

汪桂兰勤工俭学，采取不同的节约手段，为学校积攒了一些款项，这些款项做什么用呢？一是为学校增添必要的教学设施，一是为贫困学生减免学费。学校的许多开支就是靠这种积攒。汪桂兰对学校能不花的钱一分也不花。新校建立，需要在操场设高低杠，汪桂兰请乡上的木匠用山上的木头，自制高低杠。为了省

钱她上西安批发市场买文体用品。为了省去住旅馆费，她和学校都是晚上搭夜车去西安，如果当天回不来，她们就找一家10块钱左右最便宜的旅店，将就一夜。到了市场，她与人讨价还价，争得不亦乐乎，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为自己家买东西，当售货员知道她是为公家买东西，都非常的不理解。

汪桂兰用积攒的钱，为学校建起了有4,000多本书藏的图书馆；购置了足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跳马等一应俱全的体育器材；买了大号、小号、对鼓、手鼓、大鼓、风琴、舞扇、戏装等文艺道具。汪桂兰还组建了学校的体育队、秧歌队等，大大丰富了学生们的文化生活。当学生们进行节日演出，或到村上扭秧歌时，康崖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来到学校兴高采烈地观看娃娃们演出。汪桂兰利用逢年过节组织学校的秧歌队，秧歌队到每一个山村去巡回演出，寂静的山村沸腾起来，演出的队伍，像一条彩色的长龙，在山道上盘旋。

康崖底小学有了健全的教学设施，教学质量也在逐年提高。有一年县上举行运动会，康崖底学校的学生在一项比赛中获得第一，在场的裁判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拿奖次的都是县上的学校，偏僻山村的学校是无法与县上的学校抗衡。教练让康崖底学校的学生再来一次，结果同样，教练服了。康崖底学校出了名，人们刮目相看再也不小瞧了。

在汪桂兰的心中，有一个康崖底小学的蓝图，她要把这个山村学校建成一座优秀的教学质量高超的学校。她狠抓每个教师的自身素质，鼓励他们通过参加进修、自考等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教学水平，她教导教师们要把教育作为一项事业来干。在她任职期间，学校形成了良好的教学氛围，几乎所有教师都进行各种函授离职等学习，取得了大专等学历。汪桂兰自己也在1995年，到省上参加校长进修，获得上岗证。她还组织新老教师结对子，互相拜师学艺，她经常告诉青年教师，要给学生新的知识，自己就要广采博纳，孜孜不倦地创造自己的教学模式，不要老跟着别人后边走，让新教师尽快适应工作环境，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

汪桂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作为校长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带课，而且争取带一门主课。她认为脱离了教学实践，就

不能把握学校各学科的知识结构和体系，就必然缺乏令人信服的教育影响，很难影响教师，感染教师。她规定教师每学期至少听20节课，而她自己每学期就听50节以上。她要求45岁以下的教师早操时跟班跑、做操。她自己首先做到，从未缺席。开会时，她总是第一个到场，劳动时她总是第一个动手。她从不指手画脚。她的行为就是无声命令，就是榜样。

在学校管理中，她知人善任，不但了解教师的基本情况，还包括特长、个性、爱好、能力、人品，甚至还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她用最大方式激励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学校的一位教师认真、细心、精通会计，她就分配当会计；有一位教师不怕得罪人，她就分配他主管考勤，汪桂兰深深体会到“士为知己者亡”，汪桂兰平等待人，把教师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凝成一股绳，一心一意抓好教学。除此之外，汪桂兰还主动与当地的乡镇村的领导和乡亲们搞好关系，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依靠他们办好教育。在汪桂兰全力拼搏和不懈努力下，康崖底由一个贫穷落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小学一跃为黄陵县知名学校，多年来，教学质量一直在全县遥遥领先，全县学期统考名列第一。学校多次受到县委、县政府、县教育局的表彰，多次被评为教学质量先进单位、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县中小学体育运动会、元旦越野赛一等奖等。在这些奖项背后凝聚着的是汪桂兰全部的心血。20几年来，她的听课记录达五六十本，所备教案比她人还高，写下几十万字的教学笔记、教学心得，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做黄土高原的女儿

康崖底小学的学生都能感受到汪桂兰那颗拳拳之心。汪桂兰对自己非常节俭，舍不得花一分钱，她的房子既是她的办公室也是她的厨房也是卧室也是客厅，她从不计较，对同学她却非常慷慨。五年级的学生季明亮，父亲是个半身不遂，家境贫困，买不起校服，交不起学杂费，家长准备让他退学。汪桂兰得知后，用自己的钱给季明亮买了校服，交学杂费。季明亮脸上绽放出幸福的微笑，他的家长感动得热泪横流。

学生陈春娥父母双亡，随姐姐生活，经济困难，不能继续上学。汪桂兰和班主任一道家访，了解情况后，免去了学杂费等一

切费用，并用自己的钱为陈春娥买了本子、钢笔，保证陈春娥继续读书。康崖底村的李福栓身有残疾，他的3个孩子都是靠汪桂兰的资助上完小学的。他的一个孩子如今大学毕业后，在县上参加工作，让他的家有了改变。提起汪桂兰他万分感动，他说：“要不是汪桂兰的帮助，我的娃绝不可能成材，到县上工作。”

学校门口附近，有一个学生，家长是精神病，学生自己生活无人料理，没有学习兴趣，整日逃学。汪桂兰发现后，就带上班里的同学一个村一个村地去找，同学们都走累了，找得不耐烦了，可汪桂兰坚持一定要找到，不达目的绝不放弃，终于费劲心思，找回那位同学。以后，每当汪桂兰家的饭做好，就叫那位同学吃，还给那位同学洗头，洗衣服。班上的学生十分不理解，他父母都不管，你一个当老师的管那么多干啥？但汪桂兰知道，贫穷的孩子，最需要别人的关爱，这份爱也许能帮助他渡过难关。汪桂兰经常跑三四十里的山路，不避刮风下雨。进行家访，了解学生的情况。康崖底乡所有的山村她全都走遍，20年的山路她走得有味。

虎尾巴村有一对无儿无女孤寡老人，常年住在山上，生活孤独而艰难。汪桂兰一有空，就上村里去看他们，给他们拆洗被褥、担水、做饭，而且汪桂兰几乎每个周末都要看两位老人，俨然像是这家的女儿。这件事做起来很平常，汪桂兰没有告诉任何人。有一天，两位老人抱着南瓜、土豆来到学校看汪桂兰，仿佛老人怕别人不知道这件事，专门在操场上大声地说话，他们要让全校的老师同学都知道，他们有汪桂兰这么个好女儿。

上王村的王小莉、王小锋姐弟俩父亲得病身亡，母亲横穿马路被车轧死，姐弟俩成了孤儿，生活无着，上不起学。汪老师免去了他们的学杂费，还把自己的500元送给他们，帮助姐弟二人渡过难关。那是在一次家长会上，乡亲们都被感动了。汪桂兰告诉家长们，有困难不要怕，大家共同想办法克服，康崖底小学一定要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学。在汪桂兰执教期间，康崖底的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普及率达百分之百，在学校半径内无一孩子辍学。

李文英曾是汪桂兰的学生，师范毕业后也回到康崖底学校当老师和汪桂兰成为同事。她说：“提起汪老师的好我是三天三夜说

不完，最难忘的是汪老师给我梳头，我在教室外玩地满脸是汗，汪老师叫我到她的房子里去洗脸，她的房子既是她的办公室也是她的厨房也是卧室也是客厅。汪老师给我把脸洗净，就把我拉近她身边，给我梳头，我感到幸福极了，我们每天都到汪老师的房子去喝水，汪老师从没烦过，水都是她到山上一桶一桶担的。汪老师拿个打针盒装粉笔的事也刻在我心里。我现在也像她一样，用废弃的盒子装3根不同颜色的粉笔，直到用完为止。”

当了近30年的老支书说：“山里人嘴笨，知道她人好，可说不了，感情都在心里。学校在公路上，来回的汽车多，每次放学，汪桂兰都要把学生送到一里路外，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不容易啊！”

前任老村长刘荣德说：“当年，汪桂兰当校长时，康崖底出奇的好，娃娃们的伙食，每月交些粮食和10来元钱就够了。学校由20名学生，几孔破烂的窑洞，治理成有学生400多，全县第一，谁不服都不行。”

2000年汪桂兰被调到县幼儿园当党支部书记，要离开她生活了21年的康崖底学校。临行前，她向平时一样和教师们交谈着工作学习，她认真地地上完她最后一节课。离开那天学校正上课，可同学们早一风闻，大家相聚在教室门口，目送着老校长，学校的大门口聚集了汪桂兰熟悉的乡亲们。当汪桂兰快要出校门时，她回头深情地再看了一眼她熟悉的校舍和站在教室外目送她的学生。许多学生垂下头，眼眶含满了泪水。一位叫李小云的同学的话代表了人们的心声，她说：“汪老师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她完全可以回到北京去，不必要在这里受苦，她之所以一直待在山里，大概就是同情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觉得农村的孩子必须有文化。”

汪桂兰一直保持着“扎根农村干革命”不变的坚贞；她把自已全部的才华和智慧贡献给了黄土高原；她是黄土地最忠实的女儿。她的人生平凡而又辉煌。她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开拓者去汲取。



赵
凤
兰
老
有
所
乐

文：何慧丽

农村妇女们有文化需求的潜力和创造力……

普通的农村妇女的参与经验感染了她，激励着她。赵大娘的文艺团队与赵大娘个人在平凡生活中的不起眼的文艺生活经验，正在改造着众多农民，尤其是妇女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这是掌握着平常的了不起的大激荡！

赵大娘平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人有钱不是幸福，大家都快乐才是幸福。

河南省兰考县大李庄村农民赵凤兰，1938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其一生事迹在兰考的十里八乡广为流行。

带社员自力更生，助学校德高望重

河南省兰考县曾是黄河泛滥区，风沙、盐碱和水涝灾害非常严重，从20世纪50年代起，农民的温饱问题就一直难以解决。

1960年代，年轻的赵凤兰自嫁到了大李庄，就当到了10年村妇联主任。又于1973-1978年当了5年的村党支部副书记，曾全面主持村里工作近两年。当时她上有年迈的公婆要服侍，下有幼小的6个子女，丈夫又不幸英年病逝。

赵凤兰让母亲照应家里，自己走群众路线，登门到户地讲团结起来自力更生的道理。当时，以她为典型的农村干部们总结了一套自力更生改良生态环境，解决吃饭问题的好经验，就是“贴膏药，扎上针”。所谓“贴膏药”，就是把黄河的淤泥翻上地表，把沙土压住；所谓“扎上针”，就是在沙土上种植耐盐碱的泡桐树，搞农桐间作。大李庄2,000余口人在他们的带领下，大搞生产建设，其农田基础建设、植树造林、粮食产量、工副业收入等项工作在全县都名列前茅。这不但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改良了土质和生态环境。

“那时候，她大公无私地干工作。她为此吃的苦、受的累、家庭背的亏，大李庄的群众说起来都掉泪。当时她被人们称为‘铁姑娘’，县里曾将她的事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大李西村老人周正礼这样说。“俺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俺是跟着焦裕禄、张钦礼干的。”赵凤兰这样解释。

以周正礼为代表的村民的评价是对的，赵凤兰自身的解释也是对的。赵凤兰之所以“铁”，自与她的意志和个性分不开，但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生态环境和她个人所受到的帮助分不开。毛时代的中国农民群众，在生产方式得到解放的情况下，面对相对现在而言苦得多的生产、生活环境，只有以集体利益为重，用动员群众的办法，用行动表征的办法，一点一滴地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兰考出现了焦裕禄这样的走群众路线的好干部，也是必然的，因为只有群众的踏实的日常生活中的劳动经验的积累，才能解决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另外，她必须要做得出色，因为她的母亲住到她家里，默默无闻地替她照料老人和小孩，替她料理家务，免除了她的后顾之忧。是环境塑造了当时的赵凤兰。

赵凤兰带领村民在集体化时期自力更生地解决了生存问题，是应该的，也是让人钦佩的，是应该中的钦佩；赵凤兰是出色的，赵凤兰也是普通的，是普通中的出色。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赵凤兰曾被当做与张钦礼一派的造反派

的农村代表，受过沉重的打击。当时，全国上下开始清查造反派，赵凤兰受到了牵连，她曾上过一个月的学习班，在全村的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进行自我批评和检讨。事过之后，赵凤兰艰难地带着6个孩子，扶养他们长大成人。赵凤兰的这段历史，堪称个人悲剧和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不管个人受到多么沉重的打击，可是生活仍然是要过的，人还是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如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赵凤兰在辛苦抚养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教育子女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认真做人，要对社会、对国家有用。改革开放以后，兰考的生存环境有了大幅改善，当年严重的自然灾害问题早已治理得差不多了，赵凤兰的孩子也都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中相继长大成人，有在村里当村干部的，当小学教师的，有在乡镇里当副镇长的，还有在城里当企业总经理的。

如今，赵凤兰她自己已60多岁了（下称赵大娘），她还在寻找能为村民作贡献的机会。2001年，赵大娘募捐了50万元为村里盖了一座小学教学楼。事情起因是这样的——

改革开放后，大李庄村的部分村民富了，但是，村里集体经济亏空，村里没钱干公益之事。村小学教学楼还是集体化时代盖的，已成了危房，下雨的时候房子漏雨漏得厉害，冬天刮风时里面的孩子冻得直打哆嗦。

赵大娘的三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海南省的一家中外合资的企业里当经理，她特地去他那儿做工作。

“儿啊，你爹死得早，大李庄人养成了你，现在你是人才了，为国家作贡献了，可不能忘了大李庄啊，大李庄那教学楼要塌了，你看能不能捐点钱呀？”赵大娘这样劝说。儿子决定帮帮大李庄。最后，她儿子所在单位捐了25万，儿子的朋友们捐了25万，共50万。在这种好风气的带动下，村里搞板材加工的企业主周留柱也捐了3万元，这样就基本上凑足了盖村小学教学楼的钱。

在政府的资助、支持下，大李西村招标到一支好的建筑队，盖成了结实的两层教学楼，学生们就可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了。赵凤兰还买了一些苗木花草美化了整个校园。大李庄的儿童们终于自2001年起就有了一个安全、美好的受教育环境。学生们小学毕业后，都会记住德高望重的赵大娘的期待和祝愿。

操劳农民文艺队，喜得众人幸福感

赵大娘年纪大了，孝顺的儿子让她去海南的海口市玩。她发现市民利用空闲时间在公园里、天桥下又跳舞又唱歌，很开心。她想：农民为什么不可以组织起来搞文艺呢？她决定试试。

2002年，赵大娘建起了大李西村文艺队。文艺队成立前期的一些活动用具，如锣鼓、演出服等，都是赵大娘花钱买的，请老师也是她花钱。开始，有人说闲话，妇女们不好意思唱、跳。于是，赵大娘就先说服自己的两个儿媳妇、一个妯娌，做示范。后来，村里稍富裕点的人家，都纷纷或多或少地向文艺队捐资，文艺队就添置了些娱乐设备，并逐渐组织了秧歌队，壮大了娱乐队伍。每逢茶余饭后，她们就敲锣打鼓扭秧歌，慢慢地，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到现在，有40多人参加，年纪从30多岁到70多岁。

文艺的形式很多样化，有反映劳动场景、劳动人民生活方式的秧歌舞：文艺队队员们头戴花帽，身穿红、绿缎子的演出服，在鼓点的伴奏下尽情展现他们的舞姿，有种豆、收割庄稼、晒麦、扬场、赶车等生产动作；也有梳妆打扮、绣花、捉蝴蝶、赶大集等生活动作。还有较为艺术性的群体娱乐节目——打腰鼓，以及豫剧、河南坠子、来源于生活的快板、表演唱等农民们喜闻乐见的节目。

文艺队使部分村民锻炼了身体，愉悦了心情。有个中年妇女，腰椎间盘突出，花了2万元做手术还没治好，自从参加了文艺队，病就减轻了，变好了。有一老年人，参加了文艺活动，以前的愁眉苦脸也变成了现在的眉开眼笑，她经常说：“今天又蹦又唱了，就是明天死了也心甘。”

文艺队还弘扬了好的社会风气。针对某些村民不孝敬老人的状况，赵大娘编了一支曲，成为文艺队的必唱节目：

竹板打，响连天，我把生儿故事谈一谈。没有生儿身先死，阎王爷那儿打转转。阎王爷那儿打一架，回来生个好儿男。生下儿子好作难，又睡湿来又暖干，整天整夜不能眠。一岁两岁娘怀抱，三岁四岁娘身旁。五岁六岁去玩耍，七岁八岁送校钱。送到

学校把书念，一直养活二十年，取个媳妇就算完。他娘说话不算数，他媳妇说话蜜枣甜。我说这话您不信，你到庄上去转转。村前村后去打听，各个媳妇蜜枣甜那个蜜枣甜。

文艺队还宣传了计划生育的好政策：

一二三三二一，阁楼乡大李西，计划生育数第一。一对夫妇一个宝，奔着小康向前跑。文明夹道齐欢笑，三个代表来保镖，家乡人们齐欢笑。

由于操劳文艺，赵大娘的冠心病、头痛病加重了，当她去城里看病时，队员们争相写诗，写话送给她，表达感激和祝福。有不识字的，就请人将话写在手上、烟盒纸上、火柴盒面上、小片纸上。有诗写道：

赵凤兰操持多，文艺队您领着，全村老少乐呵呵，我的团长呀。操起文艺班不用说，还得照顾你自个，身体不好影响着，全村老少都难过，我的团长呀。家中有班最亲的人，心里话儿道不完，望在海南身体健，家里人心才会安，我的团长呀……



大李庄文艺队还闻名远近乡里，成为活跃乡村文化生活的生力军。他们去了数十个乡村进行演出；还亲自动手、组建了城关

乡陈寨村文艺队，许河乡蔡姜楼村文艺队。尤其是蔡姜楼村是离大李庄100里远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农民们几乎从来就没有组织过文艺活动。当时任兰考县副县长的何慧丽只给了大李庄文艺队最基本的交通补助费和吃饭费，赵大娘就先是带了全体文艺队进村表演一天，然后带领几班子文艺骨干力量风雨无阻、轮流进驻蔡姜楼，采取先吸引、再组织、再教练的办法，历时十多天，教他们扭秧歌和打腰鼓，直到蔡姜楼的农民朋友们学熟练了，而且帮他们买好了锣鼓、腰鼓、彩带、演出服装等必用物，赵凤兰们才满意地离开那里。整个过程，赵凤兰累得患了感冒，喉咙嘶哑，脸庞冻得疼痛不已，但是，看到蔡姜楼的兄弟姐妹们喜气洋洋的样子，她说：再受累也是幸福的！

现在的农村，农民是吃喝不愁了，但是缺钱花，更缺利用平时闲暇、满足大家文艺需求的表现机会。农村妇女们有文化需求的潜力和创造力，很需要赵大娘这样的人去以组建文艺队的方式引导。赵大娘因有孝顺的子女做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她带领着成立了农民文艺队；然后队员们的热情、感激和因参与文艺队而滋生的幸福感，又成为她不断地为文艺队的普及操劳的巨大动力。是普通的农村妇女的参与经验感染了她，激励着她。赵大娘的文艺团队与赵大娘个人在平凡生活中的不起眼的文艺生活经验，正在改造着众多农民，尤其是妇女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这是掌握着平常的了不起的大激荡！

老人协会好处多，乡村建设功绩赫赫

赵大娘平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人有钱不是幸福，大家都快乐才是幸福。因为自己是从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苦过来的，自己的经历也使自己尝够了“孤儿寡母”艰难度日的滋味，因此赵大娘对村里鳏寡孤独的人，残疾人，上了年纪的老人是非常同情的。为了让这些村里的弱势者多一份快乐，少一些悲伤，她干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

2003年，赵大娘主持着建了大李西村老人俱乐部大院。她把子女平时给的零花钱一点点积攒下来的4,000元先捐出来，一些村民在她的感召下，也捐了5,000元。她组织村民拉来几十车土将院子垫平，又盖了3间庙房，为本村老人提供精神寄托。这样，

每逢初一、十五，本村老人有心情不舒服的、身体不大好的，就来这儿许许愿，有个精神安慰。

2004年，赵大娘和兰考县副县长何慧丽商量着成立了开封市第一个农村老人协会，赵凤兰被选为会长，现有150名会员。协会宗旨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用”。在组建老人协会上，赵大娘显出了组织才能和管理智慧。

大李庄西村老年协会正式成立于2004年7月2日。在正式成立前，老年协会曾组织过两个活动：一是在2004年4月底，将河南大学大学生捐赠的衣服发给老人，何慧丽要求在分发衣服时组织全村老人开个会，结果赵大娘前一天晚上就组织人将分衣服的清单写好了——穷的多分两件，不需要的就不发，到会的老人有将近200个，没有出现任何混乱现象；二是在同年5月13日，何慧丽将一次宴会过后的酒菜打包后，送到大李西村，赵大娘将本村的鳏寡孤独老人和残疾老人都请来吃喝，然后将何慧丽从河北晏阳初新乡村建设学院弄来的30多套西服发给了他们。

她将两个稍年轻一些的文艺积极分子选进老人协会的领导班子，一个是村支书的爱人，一个是很会跳舞唱歌的人，因为村支书的爱人参加了老人协会，则村支书就会在各方面尽可能地支持老人协会；那个很会跳舞唱歌的年轻人则可以教大家跳、唱，给老人们跑个腿。其他的领导成员都是任过多年生产队、大队干部且辈高有威信或子女有成就的老人，他们自然提高了老年协会对老人的吸引力和在村民中的地位。

老人协会在文化娱乐、做民间手工艺品、帮助困难户、调解矛盾等方面都有可观的成绩。

老年协会正式成立后，文化娱乐出现了四大变化：一是老年人成了文艺队的主要成员和最忠实的观众。以前文艺队以中年妇女为主，现在老人占了主体，其中70多岁的有10多位，一些老大爷也开始成为文艺队骨干，如周正礼的小品、王二朝的快板等节目成为文艺队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以前，文艺队表演，观众以中年妇女和小孩为主，现在，每次表演，都有100多个老人观看，而且老年协会能组织他们较整齐有序坐在板凳上观看。二是文艺队活动更频繁。老年协会规定：农闲时间的每月阴历逢五和逢十，文艺队都要到老年协会活动中心去活动，晚上8点开始，10点结

束。村里要有活动，如生孩子、盖房子、娶媳妇、嫁女子、上大学、参军、开业典礼，老年协会都会派腰鼓队或秧歌队去表演。三是文艺活动受到了大学生、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关注。如有大学生、学者或政府官员来村考察，只要事先知道了，文艺队队员都要敲着腰鼓或者扭着秧歌去村口迎接，并在老年活动中心表演。何慧丽经常带人来参观，文艺队的表演也更卖力气，客人看后大都会喝彩称赞，老人们受到表扬，练习会更用功、表演会更投入，更会提高自信。四是他们根据生活编了一些与老人协会有关的事情来唱，如《我们的会长赵凤兰》唱道：

叫声同志们您听着，我有话儿对您说，若要问我啥内容，坐下来听我慢慢说。我的会长啊！赵凤兰操心大，不为自己为大家，吃不好来睡不安，个人利益全放下。我的朋友啊！老年队来不简单，打起腰鼓响连天，扭起秧歌龙摆尾，划起旱船真好看。我的同志啊！锣鼓一敲声振远，老年人们来锻炼，强身健体心胸宽，我们能活一百年！

老人协会还组织了一些旨在提高老人福利的其他活动，其中最有特色和最有影响的活动是制作中国民间手工艺品——十二生肖。何慧丽在兰考其他村庄考察时偶然发现了一串用碎布绣成的十二生肖。她认为，它很富有人性和环保原则，也能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组织老人制作这些手工艺品，然后到市场上去卖，也许既可提高老年人参与市场的能力，改善老年人的物质生活，也能解决老年协会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于是，赵大娘负责发动部分会员做，从式样、质量、包装上把关，何慧丽负责推销。迄今为止，产品已卖向北京、海南等地，获利四五千元。老人王金菊用挣来的钱给孙子买了衣服，又交了学费。70岁的周王氏挣来了钱，让女儿陪着去旅游，高兴地老泪横流……

此外，每到中秋节、重阳节和春节，老人协会领导就会利用社会上捐赠的钱买些月饼、糕点及花生等礼品送给会员。当王世荣等孤寡老人重病在身，卧床不起时，协会领导带着糕点、鸡蛋来到了床前嘘寒问暖，老人感动地说：“做鬼也不能忘老年协会和赵凤兰。”赵凤兰还利用外来专家学者的捐款，帮40名老人协会

会员买了200只小柴母鸡，每户5只，希望能长大了下鸡蛋为老人滋补身体，或者换几个平时的零花钱。

在调解矛盾上，仅半年多来，协会的领导成员就调解了矛盾纠纷十几起，其中有经济纠纷、子女敬老问题等，使不少家庭和好团结奔小康，免遭了损失。如：马某是独子的媳妇，结婚后和婆母一直合不来，常因经济问题吵闹不休，互相怨恨，矛盾激化到难以解决。协会的领导成员给双方分别作工作，谈心，拿婆母的好典型教育媳妇，拿媳妇的好典型教育婆母，不客气地指出双方的缺点错误，终于使双方认了错，媳妇向婆母陪情，婆母感到内疚落下眼泪，从此重归于好。媳妇把家业和孩子放心地交给婆母协管，儿子和媳妇高兴地去外地打工挣钱去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全家都说：是赵大娘和协会领导帮咱过上好日子。

有了老人协会的好处，社会媒体广泛报道，其他乡镇的老年人纷纷要求本协会的领导分赴各地传经送宝，赵大娘率领的一班人欣慰地答应了。他们曾到固阳镇的贺庄村、秦砦村、雷砦村、三义寨乡的南马庄村，葡萄架乡的贺村，等等很多村庄，教他们老年人扭秧歌，打腰鼓，跳健身舞等。他们说：助人为乐，为人民服务是为了继承和发扬焦裕禄精神，焦裕禄为兰考人民累死了，我们吃点苦，受点累算啥？为此曾多次被开封市电台、兰考县电台报道。

如果说，进行乡村建设，让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尤其是老人、妇女们组织起来，在乡村文化建设上、社会关系的和谐上、农民身心健康上多出成效，这是一个当前举足轻重的大事的话，那么，赵大娘的老人协会的乡村建设之功是显赫的！

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历经沧桑的普通农民，一个具有爱心、情感和责任心的普通妇女，赵凤兰以并不轰轰烈烈的惯常手法，有效地维护了儿童、妇女、老人的生存权、发展权。

王树霞 从改变自己开始



文：寇延丁

我们也许没有能力改变世界，但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王树霞认为这种改变自己的过程一定会成为一个良好的开始，相信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不等不靠，从改变自己开始，转变观念，勤劳致富，不图回报，发展乡村文化事业的经历。

“每个人提高一点点，社会就会前进一大步。”身高不足一米五，体重只有70斤，王树霞是个在人群里很容易被淹没的人，但当她用轻轻的语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却让任何人都无法忽视这个矮小瘦削的女人的存在。

王树霞的生命曾经经历过很多次危机，1964年，不满4岁的她几乎在洪水中丧命。那年，她所在的山西省汾阳市栗家庄遭逢大雨，父亲牵着她和多病的母亲拼命跑上高坡，眼看着洪水吞噬了自家的窑洞。在王树霞成长的过程中，不断体会到乡村的贫穷和落后被洪水般威胁，在如此强大的力量面前，人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王树霞高中毕业的时候正逢恢复高考，金榜题名给了她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希望，她连续参加了5次高考，都以微小差距落榜，通往未来，通往幸福的门就这样关闭了。

当王树霞回转身，准备回到乡村，务农、成家，走千百年来农村姐妹共同的路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后几乎无路可走了，在早婚的乡村，她连个合适的对象都找不到。

呆坐在村外的山坡上，王树霞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死。死可以结束所有的苦恼和尴尬，一了百了，但就连这条路她也不能走，因为她是父母唯一的女儿，自己一死了之，父母的余生将怎样度过？

“我连死的勇气都有了，为什么不能用这样的勇气活下来呢？”

王树霞决定与本村的韩建生结婚的时候，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无比担忧，不仅因为韩家的贫穷，也不只因为他的文化水平远低于王树霞，还因为他的家庭实在太复杂。他被养父收养来到这里，与继母的关系一直不好，不正常的家庭环境扭曲了他的个性，自私、暴躁、不近人情，而王树霞善良、热情、热爱文学，除了年龄相当他们没有一点相配的地方，大家都担心王树霞的未来。

确实，新的生活充满了争吵。首先是夫妻之间的问题，王树霞原以为嫁给一个自幼缺少温情的丈夫，他一定会格外珍惜自己的付出，给他一分关爱就会换得他更多的回报，但是事与愿违，丈夫就像一个冷血动物，即便给他百分的关爱，也得不到一丁点回应，就连他平时说话，也都是硬邦邦的反问句。下地回来，王树霞要生火做饭，丈夫反问：“做什么饭，没馒头吗？”丈夫抓起冷馒头就啃，尽管疲惫，王树霞还是对他说：“你等一等，我去给你热一热再吃。”不料却被他拨到一旁：“冷的不能吃吗？”王树霞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到了晚上写丈夫就给他拉灯：“在你家学了这么多年也没用，到我家来还写，又不成龙又不变凤，写这个有什么用？”这样的话堵得人心口疼，王树霞有时暗自流泪，有时忍不住了就跟他吵，吵起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两人动手，挨一顿打。

还有与公公婆婆的矛盾也层出不穷，王树霞想办个小卖部补贴家用，婆婆不愿意，想养肉鸡，被公公否决了：“家有万贯，肚皮跑风的不算。”想养奶牛，他们不约而同地反对，她的每次提议

都会引发一通争吵，甚至为了丈夫打几个院子里的枣吃都召来婆婆一通大骂。

这样的日子怎么过?!

从植葡萄开始

既然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自己吧。

既然争执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带来新的问题，王树霞先是不跟丈夫吵了，然后与公婆分家，不在一起生活，磕磕碰碰自然也少了许多。

贫贱夫妻百事哀，农民土里刨食不容易，当地主要农作物是玉米，一年忙到头挣不到什么钱，王树霞和丈夫没少为钱的事争吵，后来，王树霞觉得，自己文化水平高，就应当发挥这个优势为家里做贡献。她从书上看到种葡萄收入高，就买来300株巨峰葡萄苗种在自己的地里，根据书上的方法精心管理，第二年就开始挂果，第三年就进入了盛果期。

沉甸甸的收获挂在枝头，两个人的矛盾又来了，丈夫不肯去城里卖葡萄：“我又不会说话，是你种的要种的葡萄，为什么你不去卖?”

万般无奈王树霞只得将葡萄装进纸箱带进了汾阳市，在街上推过来又推过去说不清走了多少遍，就是张不开嘴叫卖。直到路边一位老大爷叫住她：“闺女，你这来来回回的是要干什么?”王树霞告诉老人想卖葡萄。老人笑了：“这里正缺葡萄，一定好卖，可是你不喊一声，谁知道你要卖葡萄呢?”

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没人的地方先试着喊出来，再回到街上叫卖。王树霞就这样开了头，她的葡萄卖得好，一开始一天卖二三十斤，后来50斤、70斤都不够卖，很快从零售发展到批发，最后，她改装了自己的自行车，装上两个特制的大筐，虽然她只有70斤体重，但一车就能带170斤葡萄，一天要在县城和村子之间十几里地往返3次。

他们的葡萄园收入了2,500块，这在1988年的农村是一笔巨款。

在这个过程中，王树霞依然没有放弃感化和改变丈夫的努力，日久天长，他们的夫妻关系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争吵和抱怨少了，

丈夫的反问句少了，平时王树霞忙着进城卖葡萄，丈夫就做田间管理，带孩子、做饭，有时候看她忙不过来还会帮她洗衣服，王树霞买书的时候他不再阻止，晚上她看书写日记也不再拉灯了。

接着，王树霞又种西瓜、种菜、栽果树，夫妻俩同心协力奔小康。原先看王树霞连续多年高考落榜，村里人都笑她读书没用，但很快就看到了读书的效用，本来村里许多人一同栽下的梨树，王树霞根据书上的指导在树间覆膜种瓜种菜，施肥浇水，别人的树5年还没有长成，她的树已果实累累，第六年进入盛果期，正好赶上梨的行情格外好，仅卖梨一项就收入1万多块。

原来他们家只有两间旧窑洞，一直是村子里最穷的人家，如今有了钱，添置家用电器、马车，又在院子里起了一溜十几间新窑洞，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王树霞没有想到，经济条件的改善依然没能改变他们的政治地位，在有些人眼里，韩建生依然是二等公民，永远是一个可以被任意羞辱的拖油瓶。甚至一位邻居硬说韩建生偷豆角当街羞辱他，被人冤枉的韩建生百口莫辩，只能回家大摔大砸，被玻璃划伤胳膊大出血住进了医院。安顿好丈夫王树霞找邻居辩理，一定要他提供偷豆角的证据，被她追问不过，那人只好推说是另一个人看见告诉他的，王树霞就去找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却说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有人劝她忍忍算了，但王树霞没有忍，她找到了派出所据理力争，告邻居诬告，并要求赔偿损失。

一场风波之后，他们拿到的不止是300元赔偿金。王树霞说：“300元不重要，不过是我卖一筐葡萄的钱，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我们通过法律的帮助在村子里抬起了头，终于可以挺胸抬头过日子了。”

但王树霞又不是一个得理不让人的人。和那位邻居在官司过后，既不横眉冷对，也不出言讽刺，见到他主动开口，并说大家以后还可以是好邻居。大家至此对她刮目相看：这个全村最矮小的女人有胸怀，有气量。

对外人如此，对家人更是如此，他们经济情况尚未好转，分家后的春节王树霞就给婆婆送去了20块钱，那时他们一年到头不过收入百十元，婆婆非常感动，当时就将分家时属自己所有的一棵枣树和一棵酸枣给了她。这件事对王树霞触动很深，人心都是

肉长的，看来婆婆也有善良的一面，不光是一个出了名的恶后娘。

多年来，韩建生一直不肯管继母叫妈，王树霞让他叫，他坚决反对：“你知道她是怎么对待我的吗？从来不让我吃饱，给我吃的都是变酸的剩饭，中午放学不打够一筐草就不许吃饭……”丈夫一提起这些伤心事王树霞就忍不住流泪，但她现在已经学会了等丈夫平静下来再跟他讲道理：“那时候你也不对。听了村里人的教唆，不光不叫她妈，还用耙子把她的头耙破了，人心换人心，这样她能对你好吗？再说了，我是她做主给你娶来的媳妇，只要你还认这一点，就算是为了我，也该叫她一声妈。”

王树霞终于说服了倔强的丈夫，当他叫出第一声“妈”的时候，婆婆哭了。后来，婆婆查出了膀胱癌，王树霞开始忙前忙后地为婆婆凑钱做手术，并把她接到家里休养。医生说她最多能活两年，在王树霞的照料下活了9年，逢人就夸儿子好、媳妇好。

王树霞用10年时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过上了受人羡慕的幸福生活。她成了村里、乡里、市里的致富女能手和五好媳妇，1996年还在全市妇联的大会上做报告，在做报告时认识了汾阳市靳爱兰副市长。靳市长在了解了王树霞的情况之后推荐给她一份杂志《农家女百事通》：“以你的经历和你的文笔，应该给这份杂志写稿子。”

北上京城的变化

这本专为农村女性办的杂志让她如获至宝，王树霞一气读完了这本杂志，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提笔给杂志主编谢丽华写了一封长信向她倾诉。很快，谢丽华以《其实你也很棒》为题，向全国的农家女讲述了王树霞的故事。谢主编还给王树霞打来电话，邀请她到北京参加杂志举办的培训。

1997年，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王树霞要去北京了，这件事一下子成了轰动全村的新闻。

在北京，谢丽华第一次见到王树霞就将她拥在了怀里，对她来说，这是北京，是整个广大的世界向她敞开了怀抱。

那是一段让王树霞永生难忘的经历，培训班请到了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做老师，有冰心老人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学院吴青教授和著名作家柯云路，开办的课程既有实用的农业技术，也有写作

知识、健康常识、法律知识、心理知识、女性地位、公民权利等内容，对王树霞来说，每一门课，都是在她面前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

从那时起，王树霞每年冬天都要去北京参加农家女举办的培训，每年都会为当地的姐妹们带回外面世界的消息，还带动村里的其他姐妹也去参加这个宝贵的培训。1998年农家女杂志社创建了农家女学校，王树霞立即给学校捐了100块钱，从那时起每年都会捐钱。2003年，她是和丈夫一起去的北京。王树霞说：“这十几年来，我生活中最大的成绩就是把一个自私、暴躁、不近人情的人改造成了我的爱人和我一起为公益事业做出了很多付出。”

其实，王树霞生活中的成绩远远不止于此，1997年的北京之行改变了王树霞的生活，那次培训就像火种一样点燃她心中的蜡烛，她从此开始将自己微弱但又温暖的光照耀到了别人身上。

王树霞成了农家女杂志最热心最积极的义务发行员。最初她将这本杂志介绍给村子里的姐妹们，一开始是5份、10份，后来到了几十份；一开始只是自己的默默地做，后来学会了寻求村委的支持，她找到了新上任的村支书：“这么好的一份杂志，看看里面的内容，都是教给大家怎么科学种田，怎么邻里和睦，怎么婆媳相处，对愿意订这份杂志的人，能不能村里补贴一点。”那一年，村长为她提供了支持，王树霞一下订出了上百份杂志。



配合杂志的发行，王树霞结合自己生活的变化现身说法在村里展开活动，村风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开始给杂志写稿，姐妹们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对这一点，王树霞感慨颇深：“有人说中国农

村最重要的问题是穷，是缺钱。我不这么看，起码在我们村不是这样的。解决了温饱之后，同样是100块，花法是不一样的。100块钱给我，我会去买书，我觉得，掏空你的钱袋武装你的脑袋，然后再来装上你的钱袋，这句话挺有意思。但别人可能就会去买一件衣服，一般的农家女买衣服100块、200块舍得，买书她们不舍得。在这一点上，改变她们的观念尤其重要，都说改变一个女性可以改变一家三代人，真的是这样的，我就改变了我的公婆、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王树霞的努力见到了成效，尽管第二年村里不再提供补助，但依然有很多人自费订阅了《农家女》杂志。

王树霞不仅在本村推广，还将她的工作做到了邻村。她会先与邻村的村长联系，在农闲的时候召集农家女，并不只是为了推广这本杂志，更重要的是将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感悟与大家一起分享，她一般都是从讲自己的经历开始：

“我们农家女经常为和丈夫闹别扭生气，比如说我跟我爱人，以前就老吵，吵急了他就打我，我跟他一拼到底……”

“现在是商品社会，都觉得物质决定意识，钱很重要，可是我觉得精神更重要，提高认识更重要。比如说我种葡萄就是这样的……”

“平常家里容易出婆媳矛盾，都是因为婆婆给得少了，偏心眼了，可是，我们也应该想一想，她已经把最宝贵的给了我们，就是她的儿子、我们的丈夫……”

“如果你觉得你生活还不够幸福，要想想你对家里有多少贡献……”

王树霞的工作做到哪里村风都会有明显好转，走到哪里都受欢迎。时间一年一年过去，王树霞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多，眼界越来越开阔，从外面的世界带回的新鲜事物也越来越多。

当王树霞第一次在农家女学校的课堂直听到“社区”这个词的时候，在她的印象里，社区，就是城市里的居民小区，她甚至还这样说过：“要是我们那里也有社区的话，我是最适合当社区领导人的，我关心大家，有奉献意识，也有领导才能。”后来她才想过来：本村两千多人，分4个村民小组，作为二组组长，自己不就是一个社区领导人吗？我们就不需要快乐和谐的社区吗？人家北京社区里的老年人都组织起来唱歌跳舞，我们这里为什么就

不行？

搞社会组织办培训

说干就干，王树霞回村后组织人员、提供创意、找老师指导，组织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平日里组织老年人跳健身舞，节庆时排练文艺节目，她的村民小组还在市文艺汇演中得了一等奖。以往每到年底，村子里都会有威风锣鼓，而出乖露丑的旱船就没人做，王树霞考虑到这种表演形式一则大家爱看，再则还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自排内容，每到腊月，都要组织二三十人进行排练。每到排练季节，王树霞的家就成了办公室，她家的大院子也就成了排练场，王树霞忙前忙后既是导演又是演员，少言寡语的韩建生虽不参加，但他要给大伙烧水，找资料，有时候还要为大家准备吃食，也忙得不亦乐乎。

每次排练的时候，王树霞和另外两位骨干都自掏腰包给每位参加排练的乡亲买一双鞋：“其实我清楚，大伙根本不是为这双鞋来的，主要是觉得我们的活动有意思。”

2003年冬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时机，王树霞随同吴青老师一起参加了首届“新农村建设论坛”，结识了温铁军、李昌平等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作为与会的唯一一名农家女子，她的简短发言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当即邀请她作为教师参加在湖北三岔举办的首届农民培训，王树霞走上了讲坛。

那是王树霞第一次做教师，也是第一次做志愿者。原计划她讲完了课就可以回家，但她看到培训班只有两位工作人员根本忙不过来，就留了下来，做了那期农民培训班的志愿者。培训结束后，她又身兼二职参与了此后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培训。在培训班工作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王树霞既是教师，又是工作人员，还与学员一起创作、排练文体节目，编排乡村文化教材。

培训结束后，王树霞收到了许多学员的来信，其中一封这样写道：“王老师，短短几天培训，我们已经和你结下了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你走的时候我们眼睛（原信错字，应为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们会永远怀念你的。”短短的几句话既有“文革”词汇，又有错字，还有让人忍俊不禁的误用，但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王树霞的工作给参加学习的农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参加

学习的农民的高度评价。

从那时开始，王树霞对于社会工作的投入也大大增加了。此前她一般是用每年农闲时间去北京参加一次农家女的培训，平时尽量利用农闲时间开展文化活动，对自己生活的影响较小，但自2004年开始，她一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外面跑，有时还会赶在农忙时节，说到这里，王树霞对丈夫充满了歉疚和感激：“我动不动啥也不管就走了，家里就他一个人。现在我家庭事业面临的压力都很大，好在他能理解我。”

对王树霞这样撇家舍业往外跑，村里的人都不理解，有的说她傻，有的说她疯。对此王树霞最好的办法就是带他们一起去学习，学习回来，他们不仅理解了她，还成了她坚定的支持者，成为她在村里开展工作的骨干力量。

2004年春天，王树霞来到位于河北定州市翟城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习，学习结束的最后评比中，王树霞在参加学习的50名学员中以最高票当选优秀学员。回乡后，王树霞带头成立当地妇女协会，被选为妇女协会会长。

2004年8月，王树霞带着本村的两位同乡们再次来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回乡之后，于2004年10月成立了种养殖合作社，任合作社监事长。

这段时间是王树霞的认识提高的阶段，事业发展的阶段，她就是在这一过程被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奖活动提名的，同时，这段时间也是她最为困惑的时期。

除去频繁外出和大量社会活动影响了她的收入和生活，妇女协会和种养殖合作社成立后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

再从自己开始

此前王树霞在村子里所做的以文化工作为主，受到了大家一致好评，而现在不同，商品经济时代，一牵扯到钱，往往会凭空生出许多枝节。种养殖合作社成立后正逢卖梨难，3毛一斤都卖不出去，眼看许多梨烂在了地里，大家找到王树霞让她想办法。但当王树霞找来的客商来到村子里，大家突然改了主意，3毛5也不卖了。王树霞一下子进退维谷，既不能让请来的客商空手而归失了信用，又不能逼迫乡亲们卖梨好像自己从中得了什么好处，

只能将客商请到自己家里，好吃好喝好招待。几天后王树霞与几个协会的骨干开始摘梨卖梨，大家担心自家的梨卖不掉才行动起来，这样才没让客商空手而归。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在很大程度上，合作社的成立是源于乡亲们对她的致富经历和社会活动能力的信任，而非对合作理念的认同，甚至在很多人心目中，加入合作社就是等待王树霞弄回钱来干大事挣大钱，至于干什么、怎么干则全无打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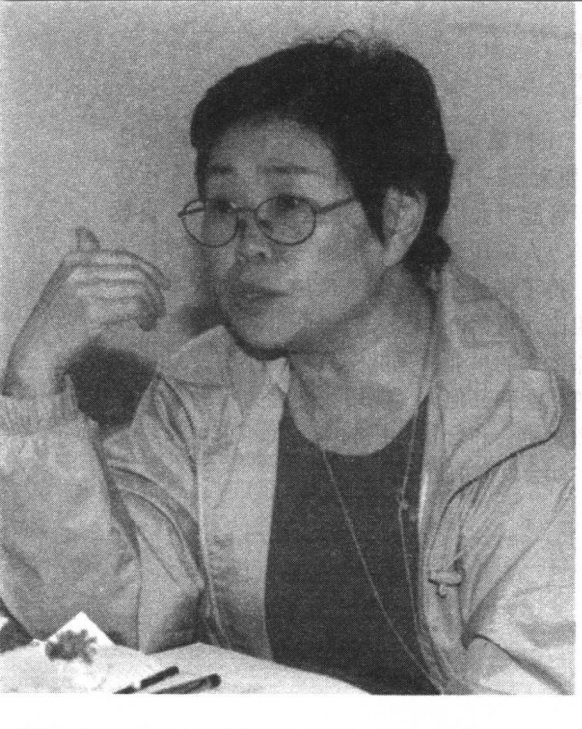
王树霞曾经试图在村子里推广葡萄种植，但无人响应，因为种葡萄太累人，种一亩葡萄顶10亩地，一家若有两亩葡萄，从春到秋一天都不得安生；王树霞还从乡建学院带回了沼气使用的新技术，尽管还有国家配套的贷款，村里还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尝试的人。王树霞再次深切地认识到：“农村不富，一是观念不行，二是太懒，提高思想素质特别重要，特别迫切。”

王树霞很清楚，这个问题积重难返，不是一时一事的努力所能改变的，面对困难，她所能做的依然只能是从自己开始。她率先在自己家里修建了沼气池，并重修了猪舍养种猪，准备向社员提供仔猪。王树霞家里的沼气池建成后很快产气，家里用上了沼气灶，吸引了村里大量的人去她家参观，她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被事实说服，接受这个新事物。

我们也许没有能力改变世界，但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王树霞认为这种改变自己的过程一定会成为一个良好的开始，相信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今年9月份农家女杂志举办的和平妇女联谊活动中，她所出的节目就是诗朗诵《相信未来》。

北京的活动之后，正当三秋大忙时节，王树霞又做了一次教员，不过这一次她去的是湖北，而是更远的福建永安，在永安，她为上坪和龙共两处新成立的合作社社员上课。向数百名合作社社员讲了自己的经历，不等不靠，从改变自己开始，转变观念，勤劳致富，不图回报，发展乡村文化事业的经历。“我给他们讲：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们农民要想富裕、要想发展，就要从自己做起，从改变自己做起。我讲完了，听讲的大老爷们儿都流着泪鼓掌。我相信我所讲的、所做的一定是触动了他们，也会改变他们。心里觉得特别欣慰：这事虽小，不也是在为和平做贡献吗？”

提到未来的打算，王树霞是这样说的：“我记住了这句话‘不要为成功而努力，要为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而努力。’人在社会上生活一次不容易，不管能力大小都应该为社会做点贡献。我敬佩那个肯尼亚的女部长，人家还坐过牢，但她一直都不放弃，为保护环境做了很多事，得了诺贝尔奖。我不像她，上过大学，又有那样的地位，和她相比，我觉得自己入选诺贝尔和平奖既高兴又惭愧。我做不了她那么大的事业，只能一点点做小事，只希望通过我能带动我们村的妇女和其他人，能用我的能力帮助自己身边的人提高，把我们妇女协会和合作社搞起来。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提高一点点，社会就会前进一大步。”



谢丽华
农家女
百事通

文：曹疏影

妇女们人人参与的，是不同利益的妇女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取权利的。

男权社会的暴力是从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施加于女性身心之上的。反观中国，那些生长在农村的女性就成为这些暴力最直接、最普遍的受害者。

隐形的暴力——即历史性地伏匿在很多中国人思想深处的官本位思想和对官僚体制、官僚作风的默许、盲从、纵容甚至支持。这种暴力式思维的存在，成为谢丽华开展农村女性工作时的严重障碍。

中国将近 13 亿人口中，9 亿是农民。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村，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中国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问题。

……

近年来，随着农民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这些关于“中国现

状”的描述几已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可是，即使在农民这个曾饱受忽视的弱势群体内部，还有一个更为边缘的群体——农村女性。她们虽人数众多，但农民加女性的双重角色，使她们遭受着身份和性别上的双重歧视。

无论留守乡村还是走入城市，农村女性的处境似乎都比同一性别的城市女性和同一身份的农村男性，更为尴尬和微妙。大量案例显示，在普遍存在的粗暴、强权、唯利是图、冷漠、麻木和歧视之中，她们更容易缺乏信息资源，更易受到机会不均等各种不平等待遇，她们更容易被社会风气和传统思维“教育”或塑造出自身的脆弱和自卑，她们更容易欠缺自我保护能力，她们的形象更容易遭到大众媒体模式化、喜剧化的“想象”。

一年又一年，故事悄悄发生着……但即使就在我们身边，却也未必为我们听到、看到。准确地说，这里没有故事，有的只是与一个生命息息相关的“事实”。一个人如果对这些事实有充分的了解，她/他必会为这社会而不安。随之，脆弱者会绝望；居高者会反转身给予她们同情式的“帮助”或姿态性的“教育”；但还有一种人，会拨开一切诸如此类的迷雾，正视事实，发掘问题，从力所能及的做起，尽最大能力去解决问题。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这第三类人永远不够。何况同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她/他们真的还太少。然而，谢丽华和她身边的同事便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从1993年创办杂志《农家女百事通》至今，十余年的时间里，无法统计她们接到过多少封寄自全国各地的信件，紧急救助过多少找上门的农村姐妹，又通过办杂志、办学校和推进农村女性发展项目令多少农村女性受益。对于她们的故事，谢丽华了解得足够多；对于她们的处境，她将心比心。她和她的同事们给予这些农村女性的，不是同情，而是为他们寻找机会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我们来到谢丽华位于北京平安大街的办公室时，难免想起离此不远便是北京近年新兴的时尚“浦点”——后海（什刹海）。而那里的红灯绿影，与眼前这位说话做事雷厉风行、却又十分平和朴素的女人，与她口中的“故事”，却又如此遥远。

从一本杂志开始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陆政治空气骤然紧缩，在政府的鼓励下，追求经济效益上的成功成为全国上下最为突出的公众意识，有志于此的人们正蓄势待发，目光纷纷瞄准大中城市——它们不仅是生活时尚的引领者，更加意味着机会和财富。谢丽华所在的《中国妇女报》也正开始提倡员工自己办公司，好让报社可以发展第三产业，能够多种经营。

此时的谢丽华刚过不惑之年，有着14年的行伍经历和8年的记者历练，无论精力还是经验、阅历，都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期。创办一本自己喜欢的、愿意投入热情的杂志，几乎是每个媒体人的美梦。然而，今天回忆起来，谢丽华坦言自己当初并非一下子就想到为农村女性创办一本杂志。其时，她正同朋友一起开办一家服务于北京大龄女青年的“单身俱乐部”，便想办这样一本关注大龄女青年婚姻问题的杂志。报社很支持这一想法，因为预测它将有很好的广告客源和经营前景。但这一想法遭到反对：“上边绝不会支持，因为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全国妇联书记处分管宣传的书记却告知谢丽华，为了配合妇联上下开展的“双学双比”（“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活动，有一本名为《农家女百事通》的杂志刊号早在1990年就已申请下来。只是在这个人人都向大城市、国际化、高科技看齐的年代，没人愿意办这样一份听起来就“土”得掉渣的杂志。

农村妇女，谢丽华对这个群体并非全然陌生。在《中国妇女报》当编辑时，她就从历次采访中了解到农村妇女的困境之一就是没有书看：“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上过高中的农村妇女，在云南，她结婚生子已经13年了，没有再看过书，原因一个是从早忙到晚没时间看，一个是没书可看，只能看孩子上学的书本，花花绿绿的妇女期刊都是给城里人看的，离我们很远。还有一次在河北采访家庭教育的时候，和妇联评出来的好家长座谈，我问她们你们给孩子讲什么故事，她们说还是讲狼外婆和雷锋叔叔，没有新故事可讲。”在经济大潮中，有多少人认真关注这些既是农民又是女性的边缘群体？谢丽华接下了这份“不合时宜”的杂志。

为了进一步考察创办这本杂志的可能性，会有哪些人读？应

该办成什么样？谢丽华回了一趟山东老家。她母亲的一脉亲戚仍居住在那里。“如果去采访，人家会专拣好听的讲，回到老家父老乡亲们会和我心里话。我找到自己出生的老房子，在那里照了张相，感觉一下子踏实了。我办事一定要找到办这个事的感觉。因为别人不相信你在大城市里生活，能办出个让农村女人愿意花钱买着看的杂志来。当我和姨家的几个嫂子弟媳聊起家常，当我在出生的小屋门前照了相，当我听着浓浓的乡音，吃着可口的饭菜，我的心才一下子落了地。我知道我本来就是她们中的一员。有了这种平和的心态，我就知道这个杂志应该是什么样子了。”于是，在杂志创刊伊始，谢丽华就将办刊方针设定为“办一本贴近农家姐妹心窝子的杂志，让农家女成为杂志的主角”，“从封面到内容，我们的口号是‘用生命影响生命’”。

在经费上，虽然报社并不宽裕，但还是给谢丽华投入了6万元开办经费。“6万块钱起步，一切都要精打细算，报社印的宣传画和我们印的一样大小，1块钱一张，我就到印刷厂一点点抠，最后抠到5毛钱一张，印刷厂问我到底是给公家干还是给私人干？”

在发行上，谢丽华首先想到的是借助妇联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利用全国妇联开展的‘双学双比’活动，让上面发个红头文件，只要有百分之一参加‘双学双比’的妇女（当时统计有1亿3千万妇女参加‘双学双比’）订阅杂志，它就会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妇女杂志。”可是一年下来，妇联帮助订出的杂志不足100份（一年12期，称为1份），而第一年杂志的总发行量是16,000份。“因为我在《中国妇女报》已经8年多了，跟好多基层妇联建立了联系。当时我们还大胆推出了一个发行政策，发行一万‘百事通’，来年下半年有车送（奖励一辆北京212吉普车）；发行5,000‘百事通’，办公打字用四通（四通电脑打字机）。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基层妇联帮我们做发行。后来，给我们发红头文件的全国妇联城乡部部长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真的市场经济了，红头文件、行政命令都不管用了。’”

真正的困难仍来自于人本身。筹备阶段，谢丽华兴致勃勃地问了一圈报社的同事，却没人愿意同她做，编辑和记者们大部分都是城里长大，一本又姓农又姓女的杂志很难让他们找到兴奋点。

期间，一个好不容易答应来做的同事却又因有了其他岗位不来了，谢丽华遭受了创业的第一次打击：“当她把已经搬来的办公桌又搬走的时候，我一下子掉泪了，我觉得这是一本很有发展前途的杂志，可人家并不这么看。”

一个偶然的会使她发现农村姑娘韩春。韩春本来是给谢丽华认识的一个作家朋友抄写书稿连带做些家务，但她很爱学习，很爱写东西。经推荐来到谢丽华处，听说办这样一本杂志非常兴奋。于是，原来在雇主那里管吃管住月薪150元的韩春，便成为《农家女百事通》管吃管住月薪160元的编辑。谢丽华从家里拿来一张折叠床，韩春就在编辑部住下了。因为和农村妇女心心相印，韩春成长很快，成了一名优秀的编辑，她主持的专栏《春子姐姐信箱》深受读者好评。此后，陆续又有更多的农村女性参与进这本杂志，成为她的作者和通讯员。

全球化思维和本土性经验

创办杂志初期，谢丽华的想法还仅仅是为农村妇女姐妹办一份她们需要的杂志。具体运作上最紧迫的问题当然是资金。最初的6万元很快就用光了，积极引资又险遭商人算计。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杂志顾问吴青教授给谢丽华推荐了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白梅。经过洽谈，杂志上增加了生殖健康专栏，白梅当即答应一年可以订1万份杂志，并由杂志社发送到全国各县乡妇联去作宣传，而且连订两年。这样，《农家女百事通》一年便得到了9万6千元经费。杂志“有救了”。

这样，在福特基金会的扶持下，在谢丽华和同事们的努力下，第二年《农家女百事通》的发行量就达到了5万6千份，第三年达到8万份，1997年、1998年甚至达到22万份，据调查每本杂志约有7个读者，那么《农家女百事通》读者就有了几百万人。

除了资金上的帮助，福特基金会这位负责女性生殖健康的项目官员白梅还带给谢丽华一些几乎是全新的理念。此前，《农家女百事通》有一个名为“寻医问药”服务性的小栏目，但从白梅那里，谢丽华接触到了诸如“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最有权对她负责，不要把她交给医生和男人”等有关女性生殖健康的观念。于是，谢丽华在杂志上开辟了专门讨论女性生殖健康的专

栏，向读者宣传女性大健康理念。

也是通过福特基金会的推荐，谢丽华开始了解全球妇女运动的历史、现状、最新动向以及各种行之有效的推进妇女发展的工作模式。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后，谢丽华陆续走访了泰国、西非塞内加尔、印度、越南、孟加拉国、韩国、墨西哥等欠发展和中等发展国家，也走访了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参观、学习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NGO妇女组织，同她们交流与分享。

“这样我的思路就打开了，我才知道世界妇女运动是怎么个搞法。此前，我只知道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的概念，因为做传媒，也没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妇女运动的推行者。那时，提到妇女解放运动，我以为都是老前辈们做的，是全国妇联做的。出去之后，我才发现人家的妇女运动都是自发的，是妇女们人人参与的，是不同利益的妇女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取权利的。”

眼界的打开促使谢丽华更深刻地认识到世界妇女遭遇的共同困境，男权社会的暴力是从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施加于女性身心之上的。反观中国，那些生长在农村的女性就成为这些暴力最直接、最普遍的受害者。生活中，她们除了要承受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还被传统男权思想规定的标准妇女形象所规整、教育和压抑；政治领域中，未经性别立场检验的官僚体制和社会制度轻视、剥夺着她们的选举权和决策权；经济领域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年轻女工经常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首要剥削对象和牺牲品；文化领域中，农村女童远比男童更容易被剥夺上学的权利，从而加入已然十分庞大的农村女性文盲者的队伍……

“农村妇女发展中最大的障碍是脱贫和教育。这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世界性的，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对我们来说，只要抓住这两个环节，并且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抓出成效，我们就融进了世界妇女运动的潮流。”

从此，谢丽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工作的特殊的性质和意义，她渴望为改变这种状况做更多的实事。“我看问题、想问题的角度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只办杂志，要有些更具体的行动”。于是，她们从中国农村女性最真实的苦闷和挣扎入手发现问题，将国际理念与她们的本土工作经验相结合，并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和她的团队主动配合、申请多个国际NGO组织针对中

国农村女性的扶贫、扫盲、教育、卫生、自杀干预项目。

步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人口入城打工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也有一些《农家女百事通》的读者来到北京打工，遇到困难和委屈便主动找到编辑部求助。“我们就发现打工妹这个群体特别容易受伤害，而且受了伤害都不知道去找谁。中国是按户籍管理，你是安徽的就要回安徽去上访，可是安徽又觉得你是外地出的事，他们管不了。”于是，1996年谢丽华在北京创办了“打工妹之家”。一开始，很多打工妹得知这个信息后，因为各种原因不敢或不愿前来参加这个组织，谢丽华便和她的同事们自行联系了11家家政服务公司，又亲笔给打工妹和雇主分别写信，发出2,000多封信件。打工妹之家成立那天，有128个打工妹成了第一批会员。这些打工妹来到这里，通过沟通、交流和培训，建立自信，发掘自身的潜能。2002年，“打工妹之家”招募律师志愿者成立了“打工妹维权小组”，设立了打工妹紧急求助基金，“对那些受到意外伤害、工伤、被强暴、失业后无家可归的打工妹进行临时性的紧急救助，并对她们进行法律援助或媒体支持。”与此同时，为了“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劳动法》的修改”，她们还召开两年一次的全国性的“打工妹权益问题研讨会”：“每一次我们都邀请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参加（当然能请到他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目的是让他们能直接听到这个群体发出的声音。”



有使命感的人不会停止前行的脚步。在为打工妹服务的过程

中，谢丽华发现很多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后，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上一时都难以“适应”，又有许多农村妇女来信说想学技术但找不到学习的地方。适逢杂志内部正在商议她们的几十万积累资金做何用途，谢丽华便联想到自己曾在孟加拉国访问过一个“妇女就业培训中心”，于是，她萌发了办一所为农村女性进行针对性的短期培训的学校的想法。1998年，“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在北京北郊小汤山一家报废的皮件厂落成。截至2005年底，这所学校“一共举办各种培训班122期，培训学员4,135人，其中贫困地区辍学大龄女童就业技能培训班40期，免费培训1,000余人，将近一半的学员留城打工就业”。摸着石头过河，7年下来，谢丽华和她的同事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功的培训模式，她们期待能将这套培训模式推广，让更广大的农村女性受益。

此外，12年来，谢丽华还主办了11次各种促进农村妇女发展的全国性研讨会，并出版了各种专集15本。通过这些手段，她们呼吁更多的人从理论和实际上关注农村妇女这个边缘群体，积极促进大家反思我们这个社会中依然存在、并经常横行的各种男权主义及其变体。

从社会性别教育入手

对于农村女性问题，谢丽华根据常年与她们交往的切身体验，发现农村妇女问题的深层心理原因在于：长期的负面信息造成她们对“自我”的否认：

“每次我去农村采访都能碰到，谁家的女儿跳河了，谁家的媳妇上吊了。让人奇怪农村妇女怎么这么容易就死掉呢？有一次我们去一家采访，她家正在办丧事，原来她家里的媳妇在我们去的前天刚死，留下两个孩子，一个还在满地爬的，一个刚四五岁。她的丈夫已经痛苦得不行。而她死的原因就是因为她丈夫在县城里给机关做饭，她种着地还要带孩子，丈夫就说你别种地了，到县城里来我的工资也能养活你，她说我怎么能离开土地，我们都走了就没有家了，也就没有根了，于是就和丈夫争吵，两口子谁也没说服不了谁，丈夫前脚走后脚她就喝了农药。这样的事情太多，我们知道国外自杀更多是因为抑郁症，我们了解的农村妇女不是这样，70%以上是冲动性自杀，就是为了一句话或者和谁吵了架

就自杀。甚至有你想象不到的原因，比如一个女孩就是为了一个手机自杀：她把舅舅的手机拿来玩，那时刚有手机，觉得很稀罕，但不小心弄丢了，回去以后她家里觉得这手机是根本赔不起的，她妈妈就骂了她，她自己也特别害怕，不知道怎么跟舅舅说，就这样一个16岁的孩子就死了。没有比挽救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事情，于是，我们开始搞‘农村妇女自杀状况调查’，在杂志上登一个启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事例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下子就收集了300多个这样的事例和线索，我就聘了一个记者专门在这300多个典型里选出20几个来，一个一个去走访，走访家庭，亲人，有些是自杀未遂的，就走访本人，后来出了一本《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开始分析这么多冲动性自杀除了直接原因之外，还有没有深层原因，后来发现深层原因就是妇女对自己生命的轻贱。在农村，有的女孩子连出生的权利都没有，所以性别比例失调。女孩出生了之后又都是在负面的环境中成长，所有人都说你就是个丫头片子能做什么，你就是个赔钱的货。于是，女孩子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如男孩子生命有价值。所以，她们特别容易轻贱自己的生命，觉得她的生命不值得尊重。”

于是，谢丽华发现，农村妇女发展工作一方面固然要从“外部”入手，为她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技术、机会、资金和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内部”，帮助她们树立自信，建立关于“性别”和“自我”的正面认识。在她主张贯彻于所有农村妇女发展项目的“五个意识”（性别意识、公民意识、参与意识、学习意识、行动意识）中，性别意识居于首位。“在任何项目中，我们都尤其重视性别意识的培养。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我们就是要让妇女自己看得起自己。只有自己看得起自己，别人才能也看得起你。”

很多参观过谢丽华创办的“打工妹之家”和“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的人都会问谢丽华：为什么这些农村女人一个个地都是低着头走进你们那里，出来时就变得神采飞扬了？谢丽华回答他们：“其实，农村妇女就像没有开采的一座矿山，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矿石开采出来，让她们本来能够发光的就让她们发光。培训其实就是开发她们的潜能，所以每次培训，我们都会有惊喜。我和她们说：培训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们从小到

大受过很多压力和偏见的影响，使妇女头上压着一个很大的盖子，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盖子揭开，让她们本身就有的潜能、热量，喷发出来。因为社会上对她们的影响基本上都是负面：电视剧、小品上的农村妇女都是可笑、愚昧、无知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骂人张口就是‘简直是个农民’。我们告诉她们这很不公平，让她们还自己的本来面貌。这样的培训效果非常显著，她们真的会发生变化。在鼓励农村妇女参政议政培训班里，我们设计了一些小品，让妇女们设身处地地把小品演出来，让她们自己解决问题。她们演得真好，完全没有城里人的做作，非常真实，很快就进入了场景。”

为了保持和农村女性最紧密的精神联系，谢丽华除了常年走动在农村了解第一手情况，还非常注意农家女机构工作人员的构成比例。除了杂志社的韩春，“打工妹之家”的6名工作人员都曾经身为打工妹，“农家女学校”除了一名聘用的校长，其他也都是来自这个群体自身，有的本来是学校救助的对象，学习后留在学校工作。她们的经验和感受成为最好的教材，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这支工作队伍能够与她们的服务对象进行“心连心”的交融。

官僚暴力和对策

如果说农村女性遭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暴力，还是比较显形的社会暴力；那么，在民主化进程在中国迂回推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隐形的暴力——即历史性地伏匿在很多中国人思想深处的官本位思想和对官僚体制、官僚作风的默许、盲从、纵容甚至支持。这种暴力式思维的存在，成为谢丽华开展农村女性工作时的严重障碍，也成为农村女性的真正需求和利益被无情忽略、牺牲的一个“病根”。

比如，在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中，由于妇联领导都是“上头”任命，因此对上负责、自上而下以“政绩”为上的工作方式极为普遍。报喜不报忧、上报虚假数字，诸种情况之严重，谢丽华用了“病人膏肓”4个字来形容。在这样的工作方式下，农民难免也以“应付”的态度来对待“上面”下来的人，她们很难相信真正有人为她们的利益着想，为她们做实事，所以一旦遇见“上面”下来的人来搞活动，“她们就觉得不定是谁又想升迁了，要

在这里搞点政绩出来，那我们就配合你搞个样子就是了。”

对于这种情况，谢丽华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妇联工作应注意的“三个转变”：由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妇女参与式；由轰轰烈烈的运动式，转变为扎扎实实的项目式；由锦上添花的表彰式，转变为雪中送炭的帮助式。其中最重要的是“自下而上”。“我们已经太习惯了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也太习惯了表彰先进的工作方法。在作决策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去倾听基层妇女的意见，尤其不会去倾听弱势妇女群众的意见。当我们真的扑下身子注意‘倾听’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会我们兴奋不已的‘新大陆’，原来我们是这样工作的。”

在推广扫盲项目时，谢丽华就遭遇了她们的“集体”欺骗。1997年春节过后，谢丽华和同事去到河北某县了解扫盲情况，“这个县是全国一百个扫盲先进县之一，我们去了之后，她们可能认为我们全国的奖都拿了，对付你们还不容易？然后就像演戏一样骗我。”我们按文盲学员名单查访到一个叫“王素平”的妇女家，“到了‘王素平’家，‘王素平’不在，她丈夫接待了我们。我问他这是王素平家吗？他说不是。我问他叫什么，他说他叫邢盛。我又问他妻子叫什么，他说了个名字我没听清，我拿出笔和纸让他们夫妻的名字写下来。正在这时，他的妻子回来了，一进门她就大声叫嚷‘我叫王素平’，我告诉她：你的丈夫说你不叫王素平呀，她一边推着她的丈夫一边蛮横地说：‘他根本不知道我叫什么。’我问：你们结婚多少年了？她说十多年了，我越发震惊和生气，十多年的夫妻丈夫不知道妻子叫什么名字，这不是天下奇闻吗？同去的中国妇女杂志社的顾大姐也沉不住气了，她问那个已不知所措的丈夫：你知道你的老岳父姓什么吗？‘不知道’，在场的人无不瞠目结舌。那位妻子恼羞成怒，恨恨地教导她的丈夫：‘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看着这一出人为导演的闹剧，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们千方百计从外面找来钱，舍家撇业跑到这里来扫盲，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愚弄？而目睹这一切的乡妇联主席却十分坦然，她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男人不知道女人叫什么是正常现象……晚上回来和县妇联交换意见的时候，她们也很难为情，她们一再解释，这个县已是全国脱盲达标县，乡妇联没弄清你们的意图，怕你们检查出几个真文盲来给县里抹黑。”这种

弄虚作假在农村妇女扫盲工作中绝非个别情况，从读者来信中，谢丽华知道有的地区让学生代文盲答卷，答一张给一块钱，或者答五张管一顿中午饭，“很多打工妹说我在家里就做过这样的事，而且告诉我们不要把字全写对了，有几个错字才像真的”，“有的扫盲班学员是清一色上过高小以上的人，真正的文盲根本别想进扫盲班。因为，没有人相信上面会有人真想来农村为妇女扫盲。”

事实上，这种被默认为合理合法的下欺上瞒方式，在谢丽华开展的几乎所有农村妇女基层项目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方面是现有体制和与之适应的习以为常的旧观念，一方面是真心意为农村女性带来帮助的热情和愿望，如何协调两方面的矛盾以确保项目的有效开展，如何选择、说服当地政府部门和基层妇联干部与“农家女机构”合作，所有这些都需要柔韧而高明的技巧。而这些，正是拥有丰富的本土生存经验的谢丽华等人独有的“资源”，也是她们成功开展工作的保障。在所有“技巧”中，和农村姑娘、大嫂面对面地“掏心窝子”，将心比心，往往是最为有效的，用这种方式也最能调动起妇女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此外，“勤快”地督察也是一种辅助措施。“在做扫盲工作时，我同她们说我们不要政绩、不要达标，也不是为了评比，就是要实实在在地为自己的姐妹做些事情。我们知道在农村文盲妇女一定是最贫困的妇女，她们没能力也没办法独自应对市场的变化，所以才关注这个群体。扫盲，我们就培训老师，让他们从文盲妇女最需要学的字开始教起。我们会检查老师收到讲课费没有，会去一个个班进行督导检查，看文盲妇女坚持学下来的有多少人，搞明白她们为什么流失，针对需求随时改进项目的操作方式。”八、九年来，“农家女机构”已经做成一种行之有效的中国农村妇女扫盲模式，她们希望这个模式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因此，有学者评估时认为谢丽华等人的组织是“不是原来固有的，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镶嵌在现有机制上的一部分”。

十几年与这种暴力式官僚思维打交道的经验，让谢丽华进一步认识到，如果想对整个状况有所改善，就必须根本性地从章程上进行改进。“目前，村妇代会的选举仍未实现普选，只是由村妇女代表进行选举，而实际上大多数仍是上级指定，妇女代表选举

也是空话，这样委任的妇代会主任基本上不会做妇女工作，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做计划生育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有些经济补贴。”而谢丽华主持开展的妇女健康支持小组就改变了这种方式，通过让妇女们共同参与来推选出小组长。但这样却又遭遇到另外一种状况，通常，妇代会主任也同时是小组长的地区较能顺利地开展工作，反之则很困难，因为“不是名正言顺的”。虽然这种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影响全局，但谢丽华认为她们从基层做起，对妇女参政的培训就是为这种状况的改善做出自己应做的一份贡献。“我们就和农村妇女讲，现在在农村实行村委会“海选”，这权利现在还不是人人都有，我们可以选人大代表，但是代表能不能和我们利益紧密相关还是一回事，比如我们报社 200 多人，我们不能投票中选出我们的总编辑和社长。现在这个权利给了你，你一定要珍惜手中的一票，因为民主现在是从最基础的农村开始的。选举时，你们不要让丈夫帮你去投票，你们也不要觉得选举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通过培训妇女们的参政热情和参政能力，参加投票的妇女的比例大了。”

在与河北满城县妇联的合作培训中，谢丽华和县妇联共同摸索出一整套有效的农村妇女参政议政培训方法，其效果可以用简单的一组数字来说明：“满城县有 204 个行政村，在 2000 年的换届选举中，妇女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的仅为 3 人，占 1.5%；184 名村妇代会主任进两委的仅为 59 人，占 32%。培训之后，在 2003 年已完成换届选举的 164 个村庄中，妇女任正职的增加到 8 人，占 4.9%，妇代会主任进两委增加到 71 人，占 48.2%，还有 17 名参加培训的妇女当选为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中有不少妇女是自己投了自己一票。”

上升到制度层面后，谢丽华开始这样认识自己的工作：“实际上，做农村妇女的发展工作，我觉得是整个公民建设的一部分。在整个国家推进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中，我们是在做最基础的工作。基础做的越好，底子打的越牢，国家未来才会越好。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民主法制的社会，才是真正民主法制的社会。”

同时，她也认为现在的努力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而言，其作用仍然可谓杯水车薪，可是，能做一步就做好一步。现实永远非难着理想主义：“有的妇联主任和我们做了好几年项目，告诉我，和

我们做事会得到工作上的快感和农村妇女的认可，但她们又说，可是我们也会跟你一样多少年得不到提拔重用。有的非常能干的妇联主席，因为不会做另外一套，年龄到了也就这样退休了。我在报社副总编的位置上已经做了11年，我觉得我很满足。可是人家妇联主席在底下如果干不到一定位置，50岁就退休了，再上一个格就可以55岁或60岁退休。所以有些人说我们得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还得应付上头，不然我们总是说真话，每次排队总是排到最后，另一条腿就和你们做实事。这种态度我觉得还行，起码我们的妇女也是受益的，如果不按照那个套路去做，我们没办法解决这些合作者的升迁、待遇问题。”任重道远，但她们努力着。

把事业“留”下来

从事农村女性发展工作多年，谢丽华自言这个工作真是魅力无穷，不仅十几年都没做腻，反而越做越有兴趣。

“有时，我也会作为《中国妇女报》的副总编去中宣部开会，那里的气氛非常严肃，因为不能说自己的话，甚至根本不能说话。参加会就是为了听上面的声音。表扬了哪些东西，批了哪些东西，然后回来照本传达。有些人到了那种场合就很兴奋，我就不行，但我到了农村就兴奋，和那些农民朋友在一起不用弯弯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将心比心地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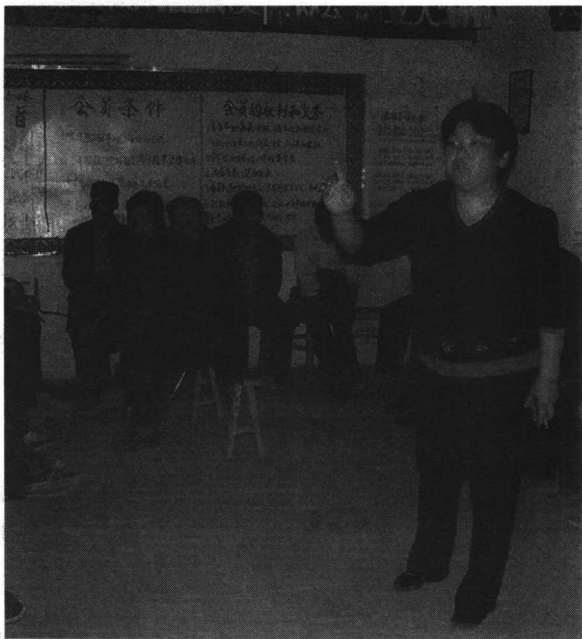
从起步到今天，谢丽华当然受过各种各样的委屈。因为整天做这些“编外”工作，多少也会影响报社的分内工作；因为经常和一些国际基金会打交道，全国妇联也不会没有任何想法，甚至于国家的安全部门也会找到她。可是，她坚持认为“这些都能过去，因为我觉得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她的先生说她有宗教情绪，她自己觉得这么说也无不可，因为这桩事业虽说不是宗教，而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她难道不是把使命当成了自己的宗教吗？

今天的谢丽华已经不是那个当初刚刚创办杂志，天真地希望《农家女百事通》能有一幢自己的大楼的那个谢丽华了。十几年过后，今天的她更加沉稳，怀揣理想主义，扎扎实实做最实际的事情。目前，她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把“农家女”的事业“留”下来：

“现在越来越觉得人一辈子把一件事做好，并能把这件事留下来，才叫做了一件事。如果你不在了，这个事就没人做了，没有将事业的遗产留下来，就等于半途而废。如果你走了，这个事业发展的更好，那才叫你这辈子做了一件事。现在我们这拨老一代做 NGO 的人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让机构持续发展，怎么才能持续发展。创业的时代是英雄时代，而让机构能持续发展，就要过渡到无英雄时代，依靠制度来发展。所以，我现在最希望就是把机构理顺，成立起真正能起到治理作用的理事会，把各项制度建立起来。作为创始人，你在机构时间越长，对机构来说可能越没好处，因为你越强大，越有能力，就会使机构形成依赖，别人很难有创造性的工作。在我还比较理性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把班交下来。我从执行层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还会做理事会的工作，我有责任为这个机构把握方向，带来一些资源。作为一个机构，重要的是看它能否持续发展，你不在了，它发展的更好了，你应该从心里为这件事感到欣慰。”

说到这里，谢丽华稍稍停顿了一下：“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特别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农家女发展教育基金会，推广我们十多年的成功模式和经验。比如，地方上如果要办农家女学校，我们就去做培训，让他们来接受我们的理念，然后给他一笔启动资金，再让地方上配套硬件设施，这样就比较容易做开，然后我们进行监督。光给理念是不行的，要有资金支持，就像福特基金会当初支持我们那样。我对自己的能力有自知之明，有生之年也许很难做成这个事了，但很希望年轻人把这个事做成，因为这是中国农村妇女发展的需要……”

说着说着，谢丽华眼中又闪现出一种神采，她也许想起，在为农家女事业奋斗的十几年里，她遇到了多少次自己都觉得已经无法迈过去的坎，但每一次她都会躲在屋里大哭一场后，又整头发精神抖擞地出发了……



文:游丽金 陈志建

“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的创伤，没有歧视，没有贫困，没有绝望，还要有真实的源自生活的快乐和幸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生活的向往。

607

中原腹地，嵩山脚下，郁郁葱葱的登封，显得更加的宁静和细致。太、少室山的众多沟谷形成的村落，围绕着中心盆地内的小城。公路联系着城乡，联系着内外。城乡的界线在这里显得模糊，或者说，城与乡在这里紧密地联系着。公共汽车载着人们上班、下班、旅游……这里生活的节奏，是从容的；在公路之外，是广袤的田野和果园，绵延至大山根下，不时可以看见农人在田地里耕种，他们，盼着庄稼、果树顺利得生长。

文化是这块土地的一个主题，儒道佛三教在这里齐集。人们没有冲突地信仰着各自的宗教，这是中国在宗教方面强大的“同化力”所表现出的对宗教历来的博大和宽容。各地的人们慕名而来，蕴藏在小城内悠久的历史文化，影响着形形色色的人，本地

的，外地的。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成就一方人民。

也许正是这种文化，让登封市、登封人民有着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区别于其他城市，区别于其他人们……这里没有吵得轰轰烈烈的房价、少有人头攒动的招聘市场，也鲜有街头露宿的流浪汉；这里，体现更多的是，不同的人按各自不同的方式，劳动着、生活着。

在这片平静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在描述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平凡的，或是不平凡的……

平凡的人 不平凡的故事

王霞，河南登封人士，现为登封中岳办事处妇联干部。1969年出生，自小在城里长大，20岁经介绍嫁给在登封市郊的一个农村长大的丈夫，之后就一直居住在夫家的东庄村，有一女16岁，一子6岁。

每一天，在无数辆穿梭于登封和东庄村之间的摩托车里，其中有一辆，一路上间断不停地按着摩托车的喇叭，那“笛笛声”不是鸣笛开路，而是车主王霞在路上与村人一个特殊的打招呼的方式。这些相互打招呼的“熟人”中大多也是妇女，她们有的也正骑着摩托车从对面过来，有的正在路边和男人一起筑墙盖房，有的正扛着锄头走在回家的路上……

这是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用车喇叭和眼神传递着相互的信任和尊重。

身为妇联干部，也是曾经的计生干部，王霞，她清楚地知道，她和这些劳动的妇女，是一样的，如果真要说出有什么区别，她认为那就是她多了一份基层干部的责任和服务群众的义务。

中国的基层干部，从基层来，到基层去，服务于基层；反映群众的声音，宣传政府的政策，联系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但难能可贵的是能始终坚持融入在群众中，与群众不离不弃，用螺丝钉和润滑剂的精神服务群众，改善干群关系，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

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随着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的开始，也激发了一次基层的干群矛盾。计划生育事关国家大计，势在必行；但是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又根深蒂固，非一旦一夕就能转变。

有些地区的部分干部，急功近利，没能找到最合适的与农村的沟通方式，却采用强硬的手段，用很多群众不能接受的方式去“宣传”和“制止”。那几年，基层的干群关系，一度紧张。

但是，在这里，在河南登封的东庄村，却演绎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场面。王霞，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一种真正与村民融合的理念，默默地工作着，改变了这里村民的观念、生活。

十多年来，她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做农民工作的方法，将国家政策、村庄文化、日常生活糅合于戏剧艺术之中，用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调动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这种和平的、和谐的、娱乐的方式，加强了农民间的合作与交流，缓和了干群关系，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国家政策和乡村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村庄的和谐发展。

文艺演出之路的开始

20世纪80年代后的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继续深入，农民家庭成为了独立体，彼此顾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集体活动少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减了。这，造成了之后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

1993年，王霞任村妇女主任。第一次召开村民大会时，她挨家挨户地通知了，但第二天到会的，却仍是寥寥无几。会议的内容很重要，政府的政策传达不了，她发愁了。情急之下，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于是又跨步出门，敲遍每一户村民。这次，她说的是，会场有人在唱戏，大家可以去听。

开会的人终于齐了，但是唱戏的角儿，却没有着落。为了不让更多村民有上当受骗的感觉，王霞自己登上了台——“我来唱！”一曲《穆桂英挂帅》终于赢得了众人的掌声。村民热情的反应让她喜出望外，因为她发现农民喜欢文艺，如果用唱戏的方式召集开会，是不是就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那一天，她走出了她独特工作的第一步。

在之后不断的实践中，渐渐地，她又意识到，仅是唱完戏再开会不是长久之计，不如将会议内容也融合到戏曲中，让不识字的，看不懂文件的人也能看得懂，听得明白。

于是，在她之后的“舞台”上，从最初的秧歌、戏曲节目

后，又引入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品，话剧等，其中王霞自编自导自演的顺口溜《计划生育好》，流传很广，影响了很多村民。

一场成功的舞台剧——《山花》

2000年，王霞和村中的另五位“姐妹”应邀参加河南省首届农村协会发展培训。期间，她认识了协会发展培训的组织者梁军教授。培训结束时，梁老师问到每个人回到村庄以后的希望，王霞说她想把培训班上学到的新知识编成文艺材料“唱”给村里的姐妹，并提出希望成立村文艺演出队的想法。她说：“搞培训吧，妇女们不爱来，来了也不爱听。但要是用唱大戏的方法，她们就非常地喜欢。”这种想法，就是基于她当初多年妇女工作得到的经验。

梁军教授对王霞的这个“唱”特别的感兴趣。她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就努力帮她联系到了香港乐施会，投入了2,000元的初始资金购置了文艺队所需的道具。同年6月，东庄村“彩霞文艺演出队”正式成立。王霞开始招募第一批演员，梁军负责编写第一部戏曲。这部戏曲就是后来引起当地轰动、迄今共连演了100多场的《山花》。

《山花》原名《张家的故事》，取自真实的题材，反映的是农村土地分配问题的不合理性，2001年正式演出，并制作成光盘，到2004年2月拍成电视剧。剧中反映出：“在今天的农村，大多数农民仍然要靠土地为生。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现实中许多农村妇女却会因为结婚、离婚、丧偶、男到女家落户等原因，而失去责任田、口粮田和土地补偿金。她们的家庭就会因此陷入贫困，甚至造成子女辍学；还有的妇女因害怕失去土地而不敢离婚，不得不长期忍受家庭暴力的摧残。从第一轮土地承包到现今，20多年过去了，土地问题，依然是农村妇女心中的痛……”这个“痛”，就是这个剧本的核心。

《山花》在村里第一次上演，结束后，村民久久不散，有的希望本剧连演3天3夜，有的喊“老规矩要改改了”，有的围住了演员，要咨询很多相关的法律。这种用剧本舞台的形式，促成了农村部分妇女的觉醒，激发了村民学习国家法律的需求，这，比任何一种直接的宣传都要深刻和深入。

文艺队缓慢地发展着，王霞的目标是要建设一只专业化的团队。在对现有演员进行训练的同时，对新入队的人员也严格要求。固定演员，固定排练时间，专人编排剧本。而演员也积极配合，台上演，台下点评和建议，每个人都是演员，而每个人又都是导演，相互鼓励，在探讨中进步，不断推动着演出队的发展。

就是这支文艺队，让我们听到了《草根儿的声音》，让我们看到了民间的艺术，看到了村庄活跃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这个文艺队，发源于民间，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驱使，抱着一种娱乐自我娱乐大众的想法，用自己的热情和汗水成就了一幕幕精彩的舞台：

2002年，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全国各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王霞编写了《红叶》，她以自己为原型，讲述的是一个女村长的故事，反映了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利和能力。

2003年，王霞编写的另一部反映女童失学的教育类剧——《山村的希望》，被搬上了舞台。同年，她还联系了电视台拍摄了许多关于计划生育的戏作宣传。她还亲自学会了健身操，并教给村里的姐妹；针对道德规范问题写了长诗《不养娘》来提倡农村的养老敬老的优良传统。



2004年2月开始，在香港乐施会和全球妇女基金会的赞助下，《山花》拍成电视剧，并完成了另一部电视剧《小两口算账》的制作及拍摄。

2005年元月十五，在王霞的积极倡导下，“农家乐文化协会”成立，成为一个正式的自发性公益组织，成为文艺活动的依托。同时新小品宣传剧《俏巧女》诞生，旨在打破农村部分落后的健康观念，宣传科学健康知识，也为促进家庭和谐，调和家庭关系，在村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06年元月，为纪念“农家乐文化协会”成立一周年，也为宣传健康文化，协会联合附近村庄组织了一次联合小品大赛，所有参赛作品反映了各种农村社会陋俗的危害，反对家庭暴力，提倡健康知识、邻里信任，引导村民转变旧观念。

……

演出队的成立为农村妇女乃至整个乡村人们创造了一个文化平台；协会的成立更是突破了原本的以家庭或家族为核心的封闭组织，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这个新的中心，丰富了村庄固有的活动内容，在积极地倡导村庄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融合了现代艺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有创新，有挑战；而这一切，又都顺其自然地辐射向周边的村庄，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

而一个又一个的作品，取材源自现实，真实朴素；表现方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土生土长的演员，对这些反映乡村生活的题材有着更为深刻的感触。他们也许没有社会上所公认的专业“演技”，但他们却着实是劳动人民心中最真实的演员；他们也许只是挤出了忙于农活的时间用于排练，但演出时的辛勤却足以让人动容；而他们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接受到的培训和外界知识，留意到能够用艺术表现出村中的人和事，都逐渐地丰富了他们原本的生活，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让他们对人生有了更多的追求。

舞台背后隐藏的故事——演出队的艰难

《山花》的主题，定位在农村的妇女权益。在之后创作的剧本中，无不反映了这样的主题，除了唤醒妇女在自己权益方面的意识，还有反对家庭暴力对妇女的摧残。

在这些表现主题上，王霞有很深刻的感触，因为她看到了和感受到了身边的人和事，再加上她身为妇女主任，她觉得有责任，也有优势做这类“妇女”相关的工作。

在表演之初，王霞要亲自去找演员，整个剧组需要20多人。

这时，她遇到了困难。村里人的不理解，认为女人出去演出是抛头露面，绝不同意。王霞的哥哥，为了反对嫂子入戏出演，怒气之下踩踏了演出队新买的“马”和“驴”（道具），还将嫂子打伤，差点致残。最终，王霞不得不让嫂子放弃这个角色。她不想看到一个家庭的破裂，因为这违背了她“和谐的家庭关系、快乐的乡村生活”的初衷。

但是，演员们的勇气让她感动。有些女演员的丈夫不让去，她们就从窗口逃出来参加文艺队的排演。更有两个妇女，为了坚持演出，毅然与有偏见的丈夫离了婚。

但最终能坚持下来参加文艺队的人，只有十多个。

王霞有一点动摇了。这个动摇，不是她想放弃自己的理想，也不是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她想到的是，自己热心做的事，招致如此多的不理解，辛苦的付出得到的却并不都是原来想要的结果。本希望通过文艺建立一个和谐、快乐的乡村环境，却因为误解带来了如此多的不快乐。

她知道这其中的冲突很多都是妇女的觉醒，但是这个过程让她心痛，因为这个觉醒的代价却是很多家庭的破裂。鲁迅的《娜拉走了以后》，说明女性觉醒了，并不代表了幸福，对于还不能完全独立的妇女，可能招致的是更多的不幸和不快。王霞担心的就是这个结果，或者说正是她引发了这个结果。

这时，一直支持她的大哥王成欣对她说，“做老百姓的工作不容易，不是群众不支持，而是他们现在还不理解。这种思想的工作，要多方面开导，一次不成再来一次，两次不行再来第三次。唱戏是好方向，是一项有意义的事情，应该坚持下去。”

她的这位大哥，王成欣，是一位癌症患者，却一直乐观地对待人生，对待生活。

但王霞仍有疑虑，王大哥的一番话语，还不足以让她完全打消停止文艺队活动的想法。这个时候，她丈夫说话了，“最困难的时候都走过来了，现在是大好时机，应该把握”。他相信她的努力，鼓励她继续这份事业。

王霞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受，在犹豫中得到的鼓励的力量是惊人的，她决定坚持下去。后来通过沟通，离婚的两个妇女中，一个复合了，而另一个坚定地说不再回去了，她忍受不了家庭暴力，

说“演出使她彻底地清醒了，她要去寻找自己的幸福路”。这样的结果，王霞很难评价出好坏，但是对于其中造成的不幸，王霞一直耿耿于怀。她觉得自己没有做到最好。

现在，演出队自始至终坚持的演员只有4个，许多的演员不得不在中途离开，因为物质上的相对贫乏还需要他们为自己的生计着忙，村庄的落后还需要他们有更多的勇气去面对。这些，都让这些民间的演员，波动很大。

而在王霞自己的内心，也一直暗藏着一种矛盾。在很多人的眼中，她是有魄力，有事业心的女性；她的女儿也为自己的母亲感到自豪，虽然她与母亲只有很少的时间相处，但母亲在她心中一直是一个榜样。而王霞的婆婆，更是她坚强的后盾，每一时刻都在默默的鼓励着她。

但王霞自己清楚的知道，她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一个合格的媳妇。每天的早出晚归，对协会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使得她再难顾全家庭。人类的情感，在这种矛盾下，促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精神世界。内心的坚持和徘徊，更成就了现实的人格和精神。

路继续着，但已经渐渐平坦了

2005年1月15日，王霞终于在前几年文艺演出队的基础上，联合主要文艺队成员，自发成立了“农家乐文化协会”，其中兼容了宣传组（即原来的文艺演出队）、老年互助组、健康小组（提供妇女医疗保健）和“反家暴”小组，涉及农村生活的多个方面。协会简陋的办公室，墙上的文化宣传却异常地丰富和生动：有协会自主编订的章程和会歌；有一张张大大小小展示协会历程的照片；有明晰性别意识、尊老爱幼的漫画；有提醒出外打工人员应该谨记的事项；还有党中央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等。她说：“只要对农村发展是有利的，我们都宣传；只要是农村群众需要的，我们都去做。”如今，协会在探索中寻求发展，气势十分蓬勃。

在搞文艺队工作的同时，她开辟了新的道路，带领妇女们走经济致富之路，跟随产业结构调整，搞种植，搞养殖，希望借此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能让她们有说话的勇气和更多参与活动的机会。

如今，张庄村已经成为养兔专业村，葡萄专业村，还种植了大面积的苹果树，桃子树，板栗树，梨树等多种果树。收成的季节，村民不用再为销售发愁，协会已经联系了专门的商家来村里集体收购。

现在，依托“农家乐文化协会”的发展，她带领着大家继续走着文艺宣传的道路。

循着她们的足迹，我们看到一串串美妙的音符：

农家乐，农家乐；农家小院喜事多；
打花棍，扭秧歌；唱唱跳跳多快活；
自娱自乐心舒畅，男女老少笑呵呵。
农家乐，农家乐；成立协会好事多；
学法律，讲科学；破除迷信反赌博；
团结友爱树新风；日子越过越红火。
农家乐，农家乐；男女平等幸福多；
我敬你，你爱我；互相帮助多和谐；
携手共奔小康路；一路欢笑一路歌。
(“农家乐”自编的会歌)

她们一路唱着一路走，迈着大步……

后记

王霞和“农家乐”的故事在继续着，每一天的劳动和劳动之余的空闲，构成了简单的乡村生活。劳动之中、劳动之外，王霞和她的“农家乐”成员用自己的文艺，营造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快乐。

这种快乐，对于那些为了一栋房一辆车终日奔波的、为了丝毫名利却苟延追逐的，甚至为了寻求生活刺激而挥金如土的人来说，这种简单的快乐绝对是昂贵的奢侈品。

那曲谱上的每一个音符，剧本里的每一个文字，都是他们自我创作的记录；那铿锵鼓瑟的每一个节奏，动作与语言的每一个配合，都是他们自己内心的表达；他们用自己的天赋和灵感，用源于自身真实生活的题材，表达出了自己的心声。这种精神上的

富有，比任何物质上的保障都更有意义。这种快乐，也绝非是泡沫电视电影的“片刻揶揄”，或是所谓高雅的音乐会舞会的“附和快乐”所能比拟的。他们用这种形式，造就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快乐，并且，这种快乐，一直萦绕着整个村庄。

这样的一个和谐的环境，是乡村生活对“和平”的最好的一个诠释。“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的创伤，没有歧视，没有贫困，没有绝望，还要有真实的源自生活的快乐和幸福，有一种发自内心对生活的向往。

这种“和平”在这里得到了实现……

老人们不再只是独坐在大树下，叼着旱烟，两眼注视着远方，默默地回忆往昔；不再有孤老的恐惧，不再对生命留有遗憾；他们用手中虽然蹩脚的乐器，用音符和节奏表达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声音，一种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充实和安定。

妇女们也不再只是劳动和生育的工具，她们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舞台上下，觉醒、成长、争取幸福，她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撑起另一半属于自己的天空。

孩子们，在母亲的怀里，老人的腰间，在各种民间乐器的熏陶下，在舞台上下和谐的环境里，无邪的成长。

……

这种建立在文艺之上的乡村发展之路——虽然目前还不能绝对的预说——其将来的发展将是完全的顺利，或者说这条路就是一条最好的选择。尽管他们还没有完全地摆脱物质的贫乏，甚至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对的贫困还将一直困扰着他们。但是在他们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信心，一种在丰富的精神文化氛围下团结起来的群体必能创造出更加丰富物质的决心。而且这种文艺的形式，或者说是丰富的精神世界，不仅只是改善了普遍紧张的干群关系和强化了村民改变自身的能力；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王霞给村民，给那些妇女带来的觉醒，带来的快乐，带来生活的意义。这一点比任何概念上的说辞都重要；这一点，也只有亲身感受过了，才会有由衷的感叹那种自娱自乐的乡村文化，在每一个人心中，种下的自信，和谐，幸福，还有生活的价值。

这一切，尽管不是王霞一人所能成就，但这一切，与王霞的努力，却息息相关。

梁军 生存与发展—— 妇女 的权利



文：苏建军、周心静、赵玲

通过妇女自身的力量来改变自身，而不是“救助”式的姿态与方法。

617

我们强调是妇女的发展权，发展权就是人权，就是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是她们的权利。

梁军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妇女教育战线，在新时期女性意识启蒙和女性教育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梁军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是煤矿工程师，母亲是位医生。她是父母 6 个子女中唯一的女孩。父母对她的要求，是要做一个具有“东方传统美德”的女性。她能够像哥哥弟弟一样去上学读书，但放学后则要跟着母亲学习各种“女功”——蒸馒头、擀面条、缝补衣袜。行为举止上，父母要求她“喜不大笑、怒不高声”；走路时，不能让鞋底和路面摩擦而发出“不雅”的嚓嚓声；吃饭时，如果咀嚼饭菜的动静大了一点，父亲的筷子也会毫不留情地敲在头上。这些要求，常常使她感到不快和压抑。

(但现在见到的梁军，常常是毫无顾忌地开怀大笑，真不知她是怎样改变了自己。)

1963年，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然而学习历史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却花了3年多的时间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大学毕业后，在中学，大学，她一直做教师。课堂上，她努力去做诲人不倦的好教师；回到家里，则按传统的要求去做一个贤妻孝媳。她吃力地挑着生活重担，一头是职业，一头是家庭，不堪重负，却又不愿丢弃。

1985年，她调入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接触了女性主义，从此踏上了一个新的人生起点。

为妇女做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推展，各类妇女问题凸现。经历了半个世纪“男女平等”的中国妇女，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惑。梁军开始应着四面八方的邀请，在全国各地开设“认识我们自己”、“改革与妇女”、“提高妇女素质”、“妇女参政问题”、“妇女就业问题”、“农村妇女教育”等讲座。

1985-1992年间，她走遍了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和难以计数的县城，深入到机关、医院、科研单位、大中学校、油田、铁路、厂矿及乡村，举办了将近2,000场妇女专题讲座，直接听众达数十万人。并先后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南省、山东省、郑州市等地方电台电视台的邀请，举办“女性·事业·家庭”、“女性生理心理健康”、“漫谈当代妇女要走的路”等系列或专题讲座。她一边讲，一边学习女性主义理论，调整着自己的观念与认识。

1995-2000年，由于各种难以尽述的原因，她经历了长达6年的事业和人生低谷，直到2000年底于无奈中选择了退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她可以继续工作到2005年60岁时退休）。

但是，“为妇女做事”，已经成为梁军生命的最大需求。即使在人生低谷的时期，梁军一直都在努力地“挣扎”，想尽各种办法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说是“挣扎”一点也不过分，当时真的是一无所有：不仅没有一分钱的经费，连一个正当的身份都没有。唯一的资源和财富，是一群默默的、却以全力支持着她的朋友。

为了找到一个做事的载体，梁军和她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创办了民间组织“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该组织的宗旨是：关注社区发展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援助弱势妇女群体；以教育/培训和推动基层社区组织为主要方法，增强妇女的权力和能力；推动将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

自从中心成立以来，她们积极致力于基层社区组织的建设，创造出形式多样的推动农村妇女发展的道路。

组织农民唱大戏

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发起的活动之一就是推动“彩霞农民演出队”的成立。

2000年6月，在河南登封市举办的“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班上，一个叫王霞的农村妇女表示：希望把培训班上学到的东西“唱”给周围的姐妹们。梁军对这个“唱”字特别感兴趣，立即询问王霞为什么要用“唱”这种方法？王霞说：“如果我们说是开会或者搞培训，人们都不愿来，但我们要是唱大戏，男女老少都喜欢。”梁军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征得了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与彩霞农民演出队共同努力，编排出了在当地引起社会反响、连演20多场的《山花》。

《山花》反映的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虽然《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男女在土地分配上的平等权利，但这种权利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执行。剧中女主角山花的丈夫是外村“倒插门”女婿，依照当地的老规矩，妇女婚后主要居住在夫家，土地也在夫家分配。因此，山花的丈夫还有两个孩子都不能分得土地，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女性贫困问题、女童失学问题以及家庭暴力问题等。

《山花》演出后在当地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促使人们反省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不少群众认为“老规矩真的应该改一改了！”演员们抓住机会向农民宣传国家的相关政策法律，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梁军她们以此为经验，在推动反家暴的工作中，也以“组织基层民众参与文艺演出”的形式，编排了以反家暴为主题的系列节目，举办了“让暴力远离家庭”电视晚会，使农民演出队第一

次进入主流媒体——电视台演播厅。

后来，在全球妇女基金的资助下，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又将由农民演出队表演的《山花》（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三妮的故事》（家庭暴力问题）、《小两口算账》（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问题）制成了VCD，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农民演出队的经验。

文艺演出在农村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唱戏”不仅是农民抒发、交流感情的渠道，也是她/他们反映需求、表达愿望的载体。生动的故事情节，歌舞化的表演形式，浓郁的乡土气息，有着很强的感染力，观众易于接受，也便于在民众中传播。由农民来演自己，将自己的生活、问题、需求、心声真实地表达给观众，体现了更强的参与性，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同时，这类活动还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由于需要男女演员同台演出，这就将男性“不知不觉”吸引到“维护妇女权益”的活动中来。

因此，利用这种形式去推广社会性别意识、权利意识、环境意识等，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创办妇女经济合作组织

这项工作是在登封周山村开展。那里地处山区，水源缺乏，不利于发展农业。虽然有地下资源，则因过度开发而破坏了环境。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摆脱贫困的出路很少。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下，农村妇女所掌握的传统手工艺技能（纺织、刺绣、编织等）迅速被遗忘和流失，农村妇女自己的“发展”经验也日益被忽视。

梁军与她的伙伴们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提出了“组织农村妇女开发传统手工艺品，促进妇女经济和文化双向发展”的思路。

与其他地区开发妇女传统手工艺品的活动相比，梁军她们特别强调了手工艺品开发背后的理念：

- 增强妇女能力

开发妇女手工艺品不只是一项生产活动，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提升生产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增强她们的自信与能力，鼓励她们对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抱有信心，发展自身潜能，逐步改善她们在社区和家庭中的地位。

- 互助合作

建立“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协会”，探索适合当地的“合作经济”模式，推动妇女们走共同发展之路，同时鼓励不同地区草根组织之间的互动与联合。

2004年，手工艺品开发协会的成员编织了10,000枚“红丝带”，献给了在泰国曼谷召开的第十五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包装袋上写着：

我们的红丝带，
是希望，是梦想，
是支持的力量，
是心灵的阳光！

● 公平贸易

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常常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受损，而中间商得益。公平贸易的目标是减少贸易过程中的剥削，拉近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改善生产者的生计，使贸易真正惠及穷人。



梁军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一定能在很大的范围推广，但只要在这个社区适合，对这个社区有益，我们就努力去做。

“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协会”虽然还在起步阶段，但妇女们的成长却是显而易见的。妇女们说：为了生存的劳动，我们是不得不做；而制作手工艺品，我们则是喜欢去做。不完全是为了挣钱，

因为在手工艺品中寄托了我们对生活的感情，是一种美的享受。尤其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产品被外国朋友们珍爱、收藏时，我们别提有多高兴啦！后来，我们更懂得了，制作出手工艺品并不是唯一的目的。在生产的过程中，还能促进妇女之间的合作，壮大我们的力量，提高我们的发展能力。过去面对“会挣钱”的丈夫时，我们要“仰视”；现在则可以“平视”了！

探索农村社区艾滋病防治

自2002年开始，梁军和她的伙伴们在河南省中部某村庄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该村庄属于艾滋病高发区，艾滋病感染者占到全村人口的10%。由于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因而带来了一系列的个人、家庭、社会问题。

梁军她们的工作不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也会突如其来地“光顾”。几乎用了一年的努力，她们才算“走进”了村子，得到了感染者和村民们的信任。对此，梁军说：“我们没有窍门，只有对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真诚与尊重。”

她们挨家挨户地访问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与感染者/病人手拉手、面对面、心贴心地谈话，嘘寒问暖。她们只是用“心”去做，没有丝毫的“做秀”。熟悉以后，一位感染者对梁军说：“我们远远地望着你，看你說什麼、做什么。你蹲在地上，抚着病人的膝盖，说着贴心话，就像自家人一样，我的心里立刻暖和了！”

一件事情留给全村感染者很深的印象：村里有一对感染者，女方本来是男方的弟媳。在男方的妻子、哥哥、弟弟相继去世后，他们两人共同抚养着三家的孩子，慢慢建立了感情。碍于传统观念的压力，两人始终不敢光明正大地结合。梁军和她的伙伴们认为，他们两人走到一起，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对双方的情感、健康，乃至整个家庭都是有益的。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在村里公开为他们举办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张扬了HIV感染者爱情和婚姻的权利，在村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对新人也说，这场婚礼令他们终生难忘！

感染者活动室的墙上，挂着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书写的

“心理良药”：

爱护你的身体，
保持良好的状态；
爱你周围的人，
努力使他们快乐；
忘掉不愉快的事，
原谅曾经得罪过你的人；
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不要只想着已经失去的东西；
发现人世间的真、善、美，
凡事存感恩之心。

每次活动结束后，感染者都会一齐高声朗读这些话，心里充溢着“愉悦”的感觉。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梁军特别重视发挥感染者的主体作用。她认为，艾滋病患者不是被动、可怜的“受助者”，而是一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力量。如果有了足够的空间和参与机会，她/他们就能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达此目的，梁军带领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的项目人员，推动建立了全部由感染者组成的、以“自救、自助、互助、助人”为宗旨的“红丝带协会”，并由协会承担了修筑村内道路、开展生产自救（养猪）的工作，使感染者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来。

梁军后来总结道：对艾滋病患者来说，医疗当然是重要的，但医疗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自助和互助”能燃起她/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有希望的日子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反家暴：城乡受虐妇女互助组

2001年漯河市成立了河南省第一家“110反家暴指挥中心”，在当地引起较大社会反响。为了将这项工作推向深入，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与漯河市妇联合作，开展了以下活动：

为漯河市7支社区演出队举办“家庭暴力干预培训”，并组织

编排有关剧目。将其中《三妮的故事》一剧制作成VCD，广为发放。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也播出了这个剧目。

举办以农民演出队为主的“让暴力远离家庭”专题电视晚会，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为公安干警、法官、律师、医生、社区工作者等举办“社会性别与家庭暴力干预”培训，改变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识、提高有关工作人员的社会性别敏感。

但这些只是反对家庭暴力工作的开始，随后，梁军和她的同仁们展开了新的探索，希望能够探索一种家庭暴力社区综合干预模式，更深层次地解决问题。

其中，有一个思路就是受虐妇女的自我成长。梁军与伙伴们认为，对待受虐妇女不能只是从“救助”的角度出发，认为她们是“弱者”，“好吧，我来救助你！”她们自己呢？是否也有自己的愿望、能力和经验？应该把她们的能动性调动起来，使她们在获得社会援助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力量。

由此产生了一个项目设计：组织农村受虐妇女和部分贫困妇女养殖土鸡（土鸡喂养不使用含有添加剂的饲料，因而受到城乡居民的欢迎），鸡蛋由城市受虐妇女组织销售。城乡受虐妇女在参与生产、经营和管理的过程中，开展小组间的互助，增强她们的自信力、合作精神和经济自主能力，

梁军说：这只是一个试验，如果能够成功，不知道算不算消除家庭暴力的一项“治本”性的措施。

对男女平等的反省

在两性关系上，梁军也和她同时代的人们一样经历过困惑。她曾经以为，男女平等就是“男女一样”。她坚定地相信“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同时将这样的观念化为自己的行动——在生活和劳动中，不屈不挠地向女性性别特征挑战。

不断地学习与实践，让她慢慢明白了男女平等的真实含义。她认为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是客观存在，正如千差万别的自然现象构成了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一样，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差异（人种、民族、性别、年龄、相貌、体质、性格等）。可以说，

没有差异，就没有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的。

但这种差异不是差距，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差异本身不是悲剧，因差异而造成的不平等才是悲剧。倡导男女平等，不是抹杀男女间的客观差异，而是在正视差异的基础上强调两性间的平等权利。

男女平等，是指男女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而权利的平等是一切平等的起点和基础。

男女平等是人类走向成熟后才提上议程的话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客观要求。目前，人类已进入“以人中心”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人”，包含着不同的种族、民族，等级和阶层，同样，也包含不同的性别。

男人、女人分别是人类这个巨人的两条腿。两条腿只有协调起来走路，人类社会才能协调前进。在家庭里，夫妻关系平等和谐家庭才会幸福美满；在社会上，男女关系平等和谐，社会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与文明。

梁军认为，推进男女平等，是一场人类自身的革命。人类为了改善自身关系，曾经为消灭阶级的、民族的、种族的的不平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如今推动男女平等，涉及了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现有的习俗、观念，以及某些政策与制度会发生对立与冲突，因此也要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她对“和平”有自己的看法。她说：“和平”应该有更多的层面，包括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他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用“和平”的方式去推动，求得人类社会的真正和谐。

郑冰 女人不白活



文：杨露 赵玲

作为家，我们会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解决一些自己的问题；作为桥梁，我们是连接政府和群众的一条纽带；作为学校，我们将教给农民一些科学文化知识。

我开始的想想法很简单，就是家和万事兴，想不到会将这个事情越做越大，竟成了一种事业。如今我只希望带动农民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裕，还包括精神上的富裕。

山西永济市地处晋、秦、豫三省交界，永济西行13公里就是蒲洲镇寨子村，村民们大都在附近黄河滩上种植芦笋等农作物。寨子村北3公里处的普救寺就是数百年前《西厢记》爱情故事的发源地，而今天的寨子村则是新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农民协会——永济市农民协会的诞生地。这个辐射两个乡，30多个村庄的农民协会还是由一批“没有白活”的农村妇女带动起来的——38岁的会长郑冰就是这个协会的灵魂人物。

2005年10月初，我们到运城下火车后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汽

车行程，来到了目的地寨子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所干净的大平房，招牌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永济市农民协会”。一个年轻的女孩把我们迎了进去，她一边端茶，一边说：“郑老师马上就回来了。”她口中所说的郑老师就是我们要采访的主人公郑冰。不一会儿，从屋外进来了一个30多岁的中年妇女，带着一脸的灿烂笑容，她就是郑冰，看着屋内堆放的化肥农药等物资，郑冰开始讲述她的经历。

技术培训的开始

1997年以前，郑冰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教师，丈夫谢福政在村子里开了一家农需物资店，郑冰有空便在店里帮忙。让郑冰觉得惊异的是，村民们到小店来买化肥农药的时候，从不问是哪种产品质量好价钱便宜，而是问别人都买什么产品。这让郑冰意识到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村民们的农田产量永远不会提高，要种好地必须提高农民的种田素质。而1998年春天的一件事，更让郑冰坚定了这个想法。那是村民苏长业，他一进店就要买800元的化肥，郑冰告诉他2亩半的土地只要300元的化肥就够了，苏长业却坚信自己的经验，见郑冰坚持不卖800元的化肥给他，他扭头便走了。“平时他们连孩子买个本子铅笔的钱都要斤斤计较，而这几百块的化肥钱却不会省。”郑冰感到特别心疼，农民不懂科学施肥，而自己开店赚老百姓的钱问心有愧，她也在心里有了新的打算。

正巧有个化肥商联系郑冰，说请了两个山西农大和运城农学院的老师到寨子村作报告，郑冰认为这是改变农民传统想法的好机会。然而老师来了以后，郑冰才知道他们是来推销供应商的产品的，于是她便和老师商量可不可以多讲农业知识，不做产品广告，而老师是供应商请的，不做广告供应商不答应。于是，郑冰先劝说丈夫拿出1,300元人民币请老师的钱，又费尽口舌请来了农资专家办起科技讲座。专家是来了，有人来听吗？郑冰想自己是女人，就请妇女们帮忙找人更容易——从亲戚朋友处知道了一些有种地新思想的妇女的名字，好不容易在周围十几个村里联系到了80名妇女，又再通过她们联系别的村民。

就这样，讲课那天来了四五百人，其中有八成是妇女。课讲得非常成功，不少村民都问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活动，郑冰看

着他们殷切的目光，很肯定地说：“你们认为需要咱们就开！”她发现只要有人引导，老百姓还是相信科技。

不久，郑冰毅然辞去即将由民办转正的教师工作，一心一意留在店里帮忙，并取得名为“寨子科技中心”。然而，要想长期搞培训，靠卖农资的钱远远不够，郑冰带着问题和希望大胆地跑到农业局，经介绍又来到“永济市妇联”。她的想法得到了妇联的大力支持，开始每年按农民需求举办5~8次实用技术培训。村民们知道了有这么一个给农民传授知识的地方，都到中心来买农需物资。中心成了一个农民交流心得的地方，而郑冰也在村民中有了一定的地位。

历经风雨建组织

从事了13年教师工作的郑冰原本最看重的就是科技知识，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让她重新开始思考了。2000年冬，参加技术培训的妇女姐妹们强烈地提出寻求致富项目的要求，郑冰又被推上了致富带头人的路上。她跑政府，找妇联，忙贷款，挂靠公司，帮大家联系了家庭养鸡项目和15万元扶贫贷款。30户村民在信用社贷款参加了这个项目，郑冰做了他们的担保人。牛英杰市长还鼓励她拓宽思路向农民经济合作社发展，但当时的她还不太理解合作组织的意义，没有成立专人协调管理的养鸡协会。后来，鸡农们受到不法商人欺诈，挣少赔多，不到一年就只剩下一户养鸡了。由她牵头的贷款血本无归，村民不仅不出钱还对她满腹怨言。信用社来找她要钱，但那年科技中心赊出去十几万元的化肥农药，又因芦苇市场行情低落收不回账。信用社请来了律师，说收不回账就要查封她的店面。一心想为村民做好事的郑冰，真没想到市场经济风险说来就来，又为此跟丈夫吵了好几次架。内忧外患之下，她决定到山东去散心，可刚到山东又出了车祸。跌了人生中最惨的一跤，她带着心灵和身体的重创回到家里。家人的温暖重新给了她勇气，政府也出面帮她扫清社会上的不良干扰。信用社这才肯缓一缓，没有查封她的店面，让她一点点还钱。在痛苦中，郑冰开始反省自己：“我就天天在黄河边反思，出于好心没错，而且出于对农民那种责任，那种服务理念我认为我也没错。但是呢，你一片热心地去服务，老百姓如果没有一个利益的共同

体，那说瓦解也就瓦解了。”郑冰不仅意识到自己操作上的失误，更清醒地明白了一点——农民没有组织不行。



在妇联姐妹的鼓舞下，郑冰重新树立了信心，逐步开始组织农村妇女们开展活动。2001年7月的一天，她和几个村里的姐妹看电视时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单调——除了干家务就是拉些东家长西家短，她便提议大家一起来跳舞，几个姐妹都同意却不知怎么跳。她专程到市妇联请来了舞蹈老师教妇女们跳健身秧歌和交谊舞，而村子里却传出了闲话说郑冰这些人是想出风头，疯玩儿。她听到后说：“疯，咱们也能疯出个名堂来。”果然不久以后，村子里大部分妇女都参与到了跳舞的行列中来，而且越跳越有劲儿。起初因为是夏季，大家只在巷子里跳，后来，跳舞的人越来越多，到2002年元旦，跳舞的人数竟然增加到100多人。天气已经变得很冷，可大家跳舞的热情不减，郑冰就每月拿出120元钱，在村里租了3间房子供大家跳舞。因为当时跳舞的人全是女性，村民们就送了她们一个“妇女协会”的称号。渐渐地，跳舞妇女的丈夫们也说：“媳妇跳了舞后回家不骂我了！”不少外村的妇女也来学跳舞，还纷纷议论着：“寨子村的女人没有白活！”郑冰听了这些话特别激动：“咱妇女姐妹并不是生来就爱骂丈夫的呀！广大的

农村妇女渴望的也并不是一定要挣多少钱，而是渴望对千百年来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在城市，跳舞也许只是无数娱乐方式中的一种，可在农村，却意味着生活观念的改变！”看到邻村妇女们的需求，她开始组织妇女骨干们分小组去周围村子带动她们搞文艺活动。

这样，几百个妇女每天晚上都准时聚集到村子里的空地上跳舞。郑冰将她们分成九个小组，比赛哪个组跳得好，奖品是小红花。然而有一天，郑冰有事没有参加，有两个组觉得评委评判不公正，争论起来，最后还差点打了起来。这让郑冰想了很久，把妇女们组织起来以后还得提高她们的公众意识和综合素质。

恰好当时电视里播大学生辩论赛，郑冰便想到组织大家来搞辩论，不辩那些深奥的大问题，就辩一些身边的事情，比如：婆媳关系不好，究竟是婆婆责任大还是媳妇责任大；生男好还是生女好；中国加入WTO，妇女是要融入市场经济大潮还是要做贤妻良母。随着辩论次数的增多，大家觉得知识不够用了，家乡土话也不好听了，于是妇女们又开展了学习班，成立了妇女活动中心，大家分成几个小组，每天读书学习，练习普通话。渐渐地，妇女们的课程越来越规范，每天都有这样的内容：生产生活技术交流，家庭教育研讨，政策法规学习。为了让大家学的更有兴趣，还在课堂上增加了说笑话和猜谜语时间，分别叫做“开心一刻”和“脑筋急转弯”。每天下课后妇女们都精神饱满的回到家里，家庭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好。村里的很多大老爷们儿也纷纷加入了进来，村民们逐渐学习了3个代表，中央一号文件等有关三农问题的许多文件。到2002年年底，有男村民和郑冰开玩笑说，“你只关心妇女，是不是也要关心一下我们男人啊。”于是，2003年正月初一，郑冰在寨子村组织了有男人参加的大型联欢会。从那个时候起，“妇女协会”慢慢演变成了“农民协会”。

不仅妇女们舞跳得越来越好，大家的集体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姐妹们便有了出外展示的想法。2003年正月十五郑冰便组织了35个村1,000多名妇女到市里参加游行表演。农村妇女们整齐的阵容，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让市民们都翘起了大拇指，表演非常成功。结束以后，市委副书记还说咱农民给他们上了一堂课——农民组织起来这么有纪律性——以后咱农民有啥需要只管

跟政府说。2003年4月，郑冰趁热打铁，在“妇女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

走上综合发展之路

2003年底，郑冰被永济市妇联推荐参加了北京农家女培训学校举办的研修班，认识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冰心的女儿吴青，《农家女》杂志主编谢丽华等一批老师和来自全国各地致力于农村建设的姐妹，更坚定了她改变农民命运和农村面貌的决心。从北京回来后，郑冰发现寨子村存在的两个大问题：垃圾太多，道路太破。几十年来，村民们都生活在巷道极不规范又满是废水垃圾的村落里，外村都称寨子村为“猪圈巷”。

2004年初，郑冰带着协会骨干到每家每户发倡议书，宣传卫生的重要性，倡议大家一起出来义务清理堆积多年的垃圾。任淑列、牛淑琴、严精玲、李换娥、李金绒等几个女会长走南巷串北巷，指挥有方，动员有力；从70岁老人到十多岁的孩子，男的开车拉，女的抡锄挖，一家门前有垃圾，众人都上前清理。3天时间，全村213户有198户出人出车把垃圾处理掉。村貌大大改变以后，人们的心情也更加舒畅，思想观念也跟着有了新变化——迫切希望联户解决巷道排水沟问题。一些有责任心的村民自发成立了村建理事会，把治理巷道列入产芦苇前期的头等大事来干。许多村民相当支持，各家修各家门前的道路和排水沟，不少人还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义务修建公共地带。有几家不肯修，大家便一起帮忙义务给他们修，结果他们受到感染，也加入进来了。干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原计划十几天完成却用了70多天，由村建理事会修完村前村后的路。通过这件事，大家终于信服了协会。全村加入协会的户数，由修巷子前的105户增加到了175户。郑冰回想起来还说：“修巷道时，我的手上磨出了血泡，其实我已经很多年没干过体力活了。很多人看到了都说郑冰就别干了。可我就是一直坚持到底，我告诉他们别以为我是小姐的身子。大家好像那时候才发现我不只是个会用嘴巴的人，也是个能干事的……最后那一天，剩下六户，我们到哪一户都是吵架，吵吵吵。但是那天在雨中把那活干完了。哎呀，那个场面就像刻到我的脑子里面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农民，其实他也有他朴实、善良，公益事业心

的一面，就看怎么去引导。”

接下来，理事会又动员几家人把空闲地拿了出来，清理掉荒草后，修建了一个篮球场。这样一来，村子里的大型活动都可以顺利举行了。这几项工程的完工，使寨子村的面貌焕然一新：道路平整宽阔，不会再因下雨而泥泞；再也找不到垃圾闻不到恶臭了；还有了专门搞活动的篮球场。而这几项工程一共才花去3万多元，比起临近村子修路花费的14万元更是让寨子村的村民骄傲。他们又在每个巷道口上修建了垃圾桶，还组建了一支由村里老年人组成的义务卫生监督队，常常扛着扫帚在村子里转悠，监督各处卫生。

当这一切都做好后，农民们的自我求新求变意识被进一步唤醒了，改变家乡面貌和家庭状况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修路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农民骨干，而村建理事会的名字也不再适用了。在大家的呼吁和市领导的支持下，2004年6月7日，郑冰在市民政局注册了“永济市农民协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经合法登记注册并冠以“农民协会”的农民组织，法人代表是郑冰。她还将自己的小店交给协会，利润作为农会活动的经费。郑冰说当时要把小店交出来，丈夫十分反对，郑冰觉得反正钱也都给了协会，还不如将小店完全交过去，这样相持一段时间之后，丈夫也答应了。

农会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还组织了一个纺织工艺品生产小组，生产剪纸，中国节等工艺品；同时规划出小麦良种实验基地，引用西北农学院的新品种，并建起蒸馍作坊，实现一条龙生产；协会还集资建起了一个环保涂料厂。寨子村涂料厂采取的是入股的形式。而在入股问题上，郑冰和会员们发生了接二连三的矛盾。建厂资本金采取了会员入股的形式，共300股，每股300元，郑冰的想法是，每户会员最多只能入3股，如果股数凑不齐才让协会的理事、会长们入股，但分别不能超过5股、10股。讨论入股的时间是10月份，会上有人提出要控股。一人愿意出4万到6万元持有相应股份，但遭到了郑冰的拒绝。她认为要富就要大家一起富起来，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如果有人控股，那也就失去了合作办厂的意义了。同时她提议给村里的12户智障、残疾和特困户的人家每户赠一股，资金从协会经费里出。

没想到大多数会员都不同意，这让郑冰感到非常难过——自己把什么都给了农会而会员们还这么自私，她气得哭了起来。在她的坚持之下，会员们终于想通了，同意了她的提议。而涂料厂产品刚出来时又遇到一些质量问题，郑冰又专门派出10名年轻人到北京学技术，准备学成后重新投产。接下来，郑冰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土地产出不均衡的问题，集中了寨子村及周边175户1,000亩，大约合66.67公顷的土地搞规模化“生态园”，选出了20个种田能手来统一管理，大刀阔斧地搞起了“试验田”……

年轻一代 留守发展

郑冰的精神还感召了不少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其中7位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自愿留在了寨子村，成为她的左膀右臂。在推广农业科技的过程中，她最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就是缺少专业人才，而她曾教过的学生张万侠在农学院上学时，每到假期都来科技中心帮忙。经过郑冰的耐心说服，张万侠决定放弃出外的工作机会，留在农村学习致用。但张万侠的哥、嫂坚决反对：“家里供你上大学，就是为了能让你跳出‘农门’，不再受苦，你怎么能又回到村里来呢？”父母更是苦口婆心地劝导：“你看，咱隔壁的孩子学校毕业后，在城里打工，工资高，活儿还轻松。你回村就说明我们无能力，给你找不下工作，让我们在村里咋抬头？”“爸，妈，我大了，就让我自己做主吧。”顶住来自家庭的压力和村里人的风凉话，张万侠来到了寨子村。有了第一个榜样，同样毕业于运城农学院的宋洁、冯丽丽、薛红旗、景晓辉、王淑敏、孟艳丽相继加入这个团队。期间，从西安财会学校毕业的段改丽，也留在了这里。和张万侠一样，她们的选择普遍遭到了家庭的反对，但通过努力，一一取得了家人的理解。她们自豪地说：“现在，家里人对我们的选择非常支持，庄稼有了问题，还常找我们咨询呢！”她们给农民讲解农业知识，教大家合理施肥用药，还给村里的青年人做思想工作。虽然每人每月只有200元生活费，但她们却一点也不后悔。在与寨子村男青年的接触中，张万侠、冯丽丽、段改丽分别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心上人，其他几个也在农村找下了对象。村民们再也不担心这些给他们带来快乐和财富的女大中专生们远走高飞了。当我们问到这些女孩们时，她们笑着说：

“都是学习郑老师，希望能学以致用。”还说，“看着自己的知识转化成了村民们的收入，我们有很大的成就感！”

几年来，协会不断健全发展。如今协会有 11 个部门；1997 年成立的科技服务中心、果树协会，2004 年春成立的大学生爱心之家，2004 年 6 月成立的计生协会，2003 年 11 月成立的青年服务中心，2003 年 3 月成立的环保协会、物流服务中心，市场策划中心、粮农经济合作社、老年协会。其中科技服务中心还在外村社有 4 个点，外乡有 1 个点。各部门都有专人负责，各自独立有紧密合作。现在协会的宗旨是：通过组织农民参加技术培训、学习研讨、外出参观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为发展农村播撒希望火种。协会理念是：把我们的协会办成一所学校、一座桥梁、一个家庭、一个品牌。郑冰解释说：“作为家，我们会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解决一些自己的问题；作为桥梁，我们是连接政府和群众的一条纽带；作为学校，我们将教给农民一些科学文化知识。至于这个组织的作用，我没有仔细想过，但我始终觉得，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盘散沙是不行的。”

目前，农民协会的会员已达 3,800 人，来自 35 个村。“我暂时不想再扩大了，要提高农民的素质有很多工作要做，先把这些人的工作做好。”郑冰说，“我们协会原来有 14 个副会长，现在剩下 8 个。6 个副会长因为违反了制度，被免去了。我们原来有个制度，就是例会如果三次不到，就算自动除名，当时那 6 个男副会长开会不积极，好几次都没到，我和到会的副会长就商量，不能老这样下去，于是就把他们除名了。这说明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背后的酸甜苦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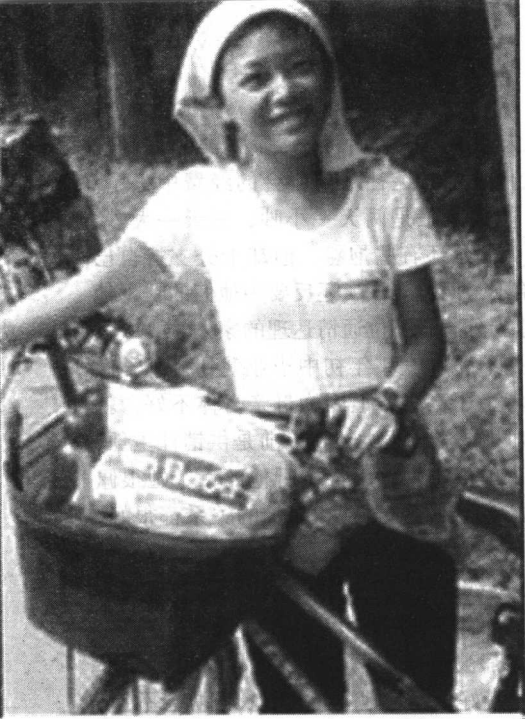
因为有了这些红火的事业，村子里几乎没有外出打工者。农民们的收入一天天提高，不少人家已经建起了漂亮的新房。村子里好多年纪大的妇女告诉我们：“我们都心疼冰啊，她在协会里忙，常常是一早就出门，深夜才进家门。”任淑烈的家就在郑冰家斜对面，她说：“这好几年我都没见她正点吃过饭啊。”

因为搞协会，郑冰几年来几乎没有时间打理家庭。郑冰告诉我们，现在家里的收入来源就是公公的退休工资，公婆在黄河滩

上承包土地种植芦笋和丈夫谢福政摄影所得，还有家里鱼塘承包出去的钱，而且这些钱大部分也已经补贴到协会的经费中去了。刚开始丈夫不支持自己，两人几乎是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不过如今丈夫已经想通了，偶尔还有些抱怨，但却十分支持自己的工作。“我一分钱都给不了两位老人，还反要用他们的钱，他们却还是很支持我。”郑冰十分感激几位通情达理的家人。

郑冰谈到自己的学历并不高，1984年初中毕业就到村小学做民办老师了。当时她虽然考上了高中，但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就回家照顾母亲了。她父亲对她的影响很大，他以前是供销社主任，很正直，在当地很有威信，单位难管的人都会听他的话，她很佩服父亲。而她在学校工作的13年里和学生和家的关系都很好，一些家长喜欢把不听话的孩子交给她管，她辞职后，他们的父母有时还找她与孩子沟通。这些年来，她一直在不断地读书充实自己，每天睡觉前至少要看一个小时的书，12点之前很少能睡觉。也有人希望她出来当村长，都被她拒绝了。她虽然相信自己如果一心扑在村里能将一个村子带好，但是她不能放下农民协会不管。她认为自己的优点就是认准了一个事情就往下干，这一辈子就没想过要干什么大事，只不过是尽全力做事。她说：“其实我开始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家和万事兴，想不到会将这个事情越做越大，竟成了一种事业。如今我只希望带动农民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裕，还包括精神上的富裕。尽管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协会撑过来了。农村才是农民的天地，我们将在这个天地里大显身手。”

现在农会的目标是10年后把寨子村建成全国第一村——包括村民的素质、法制意识的提高等，在综合素质建设上成为全国第一村。著名的三农专家温铁军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农民问题是“农民最懂”。郑冰的故事，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身为女人的她最能体会妇女姐妹们的情感与需要——女人都不愿白活；身为农民的她最懂农民到底缺什么——她一直在顺应农村的实际和社会的发展趋势，最终把农民们组织联合了起来，发挥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把农村变成了“希望的田野”！



赵玲
当农民之子

文：王平

从前看到的社会弱势群体，也会产生同情，对他们的是一种爱心；可现在，我总觉得为改变他们的现状而作的努力是我的责任。

人民内部的各个群体，以及为所有人服务的草根组织能团结起来，消除矛盾，共同发出人民自己的声音。无论其身份如何，所有的民众、草根组织与政府和社会各阶层都能公平地对话，共同完善人类社会。

乡情

年轻的赵玲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存在的很多问题和面对的困惑；年轻的赵玲又像是一簇火苗，她想带动和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去认真思考和书写他们这代人的历史。

几乎把所有的 T 恤衫上都写上“农民之子”或“乡土建设”

的赵玲，其实是个生长在大城市里的女孩。和大多数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样，她是父母的独生女。在上大学之前，她的生活和所有生于80年代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父母细致入微的宠爱呵护带来的优越感，以及对她过高的期望带来的压力。她不知道庄稼是如何播种和收获，不辨五谷，远离自然，唯一被允许和鼓励做的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像她所描述的那样：就像重庆那阴雨绵绵的天气一样，是灰暗而压抑的。

赵玲的生活发生变化是上大学之后。1999年，她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原本单调而沉闷的生活一下子丰富多彩起来，她开始有机会独立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个性也慢慢舒展开来。但是她也开始第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优越感，因为上海是一个地方主义盛行的城市，上海人每一个毛孔洋溢着优越感和排外情绪让赵玲开始有了异乡人的感觉，也开始让她隐隐地觉得自己和那些在上海打工的人们有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近。

她和同学们一样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但是当时的大学校园内物质主义、拜金主义风行，身边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羡慕奢华的物质生活，人生的最大目标就是找一份好工作，努力做有钱的城里人。赵玲从心底里觉得这种物质欲望统领一切的生活不属于自己，但又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像所有的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一样，她感到迷茫和郁闷。

转折点是在2001年上大学二年级的暑假，当时渴望走出狭窄校园的赵玲碰到了一个机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组织到江苏无锡南泉镇做“苏南农村社会变迁口述史访谈”的课题，留在学校的赵玲成了课题组成员之一。

这是赵玲第一次走进农村，她平生第一次看到了贫穷、艰辛和无助。她碰到一个因为父母交不起学费而只上到三年级就辍学的大眼睛女孩，由于缺乏营养，这个15岁的女孩看上去只有8、9岁的样子。女孩的一家因为家乡穷得过不下去，4年前从南京溧水县背井离乡来到无锡，她的父母亲想方设法贷了款在郊区承包了一片田。他们种过蔬菜，水稻，西瓜等，父亲把产出的东西挑到镇上廉价卖出去。但父母的辛勤节俭还是不能维持家用，以致没有钱供7岁的妹妹上学。他们每年还要交暂住证的钱，当初的贷

款一直没有能力还上，租不起房子，就住在地边的茅草棚子里……。

沿途所见的人和事，让赵玲再也不能平静；社会的崭新而陌生的另一面，令她痛苦和深思。她再也忘不了乡下孩子那纯真的、让她怜悯和同情的眼神，再也不能忘掉老乡们谈到的苦难和希望。也是从那之后，生长在大城市的赵玲和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志

2001年秋天，赵玲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交换生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北师大她选了很多课，每天认真听课学习。有一天，赵玲回到宿舍，看了一个同学带回来的光盘，里面是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刚刚做的一期节目，介绍了北师大的“农民之子”这个社团的活动。看着“农民之子”的大学生志愿者在北京郊区的打工子弟学校做支教活动的艰辛和曲折，看着屏幕上打工子弟学校艰苦的环境，看着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和博士研究生们在社团换届选举中的慷慨陈词，他们流露出来的理想和抱负以及对现实的关注，赵玲心中的某种情结深深地被触动了。

那年的9月18日，发生在北师大校园里的几件事情同样让赵玲感到震撼。在“9·18”这个在上海几乎完全被忘却、甚至连电台都取它的谐音“就要发”以恭喜各位发财的日子，“农民之子”在校园里拉了一个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勿忘国耻”；几个爱国的社团成员甚至组织到日本大使馆前示威。这些大学生在这一天的激愤让赵玲猛然觉得这个国耻纪念日距离自己不再像从前那样遥远，她甚至为自己这个历史系的大学生感到愧疚。

赵玲逐渐走近了这个学生社团，开始参与“农民之子”针对打工子弟的支教和调查等活动，接触到了由“三农”^①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发起并资助（那时温教授的女儿在山东大学读书，假期回来后告诉父亲有些来自农村的同学因为没有路费，经常寒暑假不回家，温教授有感于此，想出了这个有意义的活动），由天津

^① “三农”指农业、农村和农民，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提出，而“三农”问题则指中国大陆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核心问题分别是农业不赚钱、农村经济不发达和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悬殊。

大学的刘老石负责带领在校大学生在假期的回乡支农调研活动。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农村的大学生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审视和关注自己的家乡，那些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第一次知道下雨后道路会泥泞难行，第一次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就存在激烈的城乡群众之间的矛盾，他们接触到了社会的贫穷落后和苦难的另一面。他们下乡回来后，回来把自己的见闻和思考写成论文，汇集起来，由关注农村问题的专家评议，评出一、二、三等奖。这些带着稚气的笔触记录了发生在中国各地农村各种变化、矛盾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取向，使得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壮年劳动者涌进了城市，很多劳务输出大省里，成千上万的农村成了空心村，留守在家里的只有妇女、老人和孩子。人力和经济等资源从农村无止境地被抽到城市，农村的医疗、教育、卫生等条件日益凋敝，农村早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它像一个被时代遗弃的老人，贫穷、落后，而又满是病痛。这样的时代，养育的是发奋读书为了离开农村跻身城市的年轻人，城里的孩子则把车子房子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

在北京的学习很快结束了，可是赵玲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有信念、有尊严的生活。在北京经历的一切，都让赵玲有一种思想获得新生的感觉，从前那种对生活和社会感到迷茫和淡漠的时期，从此远离了她。她和一群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农村，这种对贫穷和落后的审视，不仅让他们思考人生和社会，同时让他们在彼此之间找到了支撑和动力。

回到上海，赵玲仍然和北京的大学生保持联络，也知道了北京其他院校关注农村的学生社团，大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去关注农村，想为农村做点什么。在华东师范大学接下来的一年多里，这个身材娇小的姑娘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和发动上海其他高校的大学生参加支农调研活动。在努力发起支农学社社团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一些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有一段时间，国家安全部对各个学校的学生社团很敏感，所以这些组织社团的大学生经常会经常被学校保卫处或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叫去谈话，询问关于社团的情况。

但是，每次一放假，赵玲还是会跑到北京，参加各种大学生支农活动以及支农调研的培训活动，她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大学生，听了很多学者的讲座，她开始对从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

进行反思：比如“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

责任

培训之后，赵玲就和来自全国各个高校的青年大学生，在刘老石的带领下，坐没有空调的硬板车奔向全国各地的贫困农村。这些下乡的大学生，一律在左臂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下乡后和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为老乡们演出文艺节目，帮助组织老年协会和文艺队，给孩子们带来在大学生校园里募捐的文具书籍，给他们辅导功课讲故事，帮助老乡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协调村里的干群矛盾。大学生支农调研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①，不受老乡的任何馈赠，临走交齐所有的吃住费用。

赵玲第一次在农村过春节，听着在城里听不到的鞭炮声，看着红红的春联上淳朴的祝福和希望，感受着乡亲们的质朴和亲情，赵玲“真的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在真实地回归。”赵玲到安徽阜阳下乡，碰到了她的“安徽妈妈”。而他们所到之处，老乡们在久违的幸福中尽情释放着他们的淳朴、热情和快乐。这些可爱的年轻人们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气息，更带来了活力和希望。

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什么香车美女，什么声色犬马，简直就是一个荒诞而浅薄的梦。这些支农调研的伙伴们为着彼此自豪着，骄傲着，也互相感召着。他们中的“村长”，是大学毕业后在南方找到一个收入不菲的工作，但是参加了几次下乡支农调研活动后，就毅然放弃了工作，跑到湖北的一个山村里搞组织农民和培训农民的事业；还有一个女大学生，做出了一个让她的老师和同学吃惊的决定：休学一年，下乡支农……



^①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1947年10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纪律，“三大纪律”包括“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包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和“不虐待俘虏”。

2004年6月，几个大学生支农调研队的骨干队员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们说：“每一代人都有其历史使命，每一代大学生都有其进入历史、书写历史的方式。在今天，大学生如何健康、积极、理性地投入到恢弘的历史创造中去？我们志愿地选择了支农。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三农’是具有历史的深度、厚度和强度的问题。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的投身其中。这是我们真诚的呼唤，也是向所有大学生的呼唤。‘改造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农村。’是农民的豪情壮志；‘关注农民，塑造自我，建设新农村。’则是我们不变的誓言。”

赵玲说：“从前看到的社会弱势群体，也会产生同情，对他们的是一种爱心；可现在，我总觉得为改变他们的现状而作的努力是我的责任。”

本科毕业后，赵玲被保送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她正式成为“农民之子”的一员。后来赵玲在“农民之子”的换届选举中通过竞选成为会长。2004年10月，“农民之子”组织了第一届北京市打工子弟作文竞赛，这些被社会淡忘的农民工的孩子们，他们上的学校隐藏在北京郊区的角落里。由于政策的不完善，这些学校大多没有正规的注册登记，条件设施极为简陋艰苦。这些孩子的父母亲在北京从事着各种收入低下却十分辛苦的工作。他们没有城市孩子那么多漂亮衣服，每逢节假日父母亲也没有时间和余钱带他们去公园书店游玩，这些稚嫩的心在想些什么？这些天真的眼睛看到的北京，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这一次作文竞赛，这些异乡的孩子们内心的表达感动了赵玲和其他为竞赛忙碌的大学生志愿者，感动了每一个参加活动的记者和专家。受“农民之子”的邀请，北京大学的著名学者钱理群欣然应允作为竞赛的评委，在新闻发布会和颁奖联欢会上，70多岁的白发老人热情洋溢地做了两次发言。领奖台上的孩子们也是平生第一次被闪烁的镁光灯照亮了欣喜的笑脸。

在频繁而扎实的社会调研中，在艰苦而朴实的农村生活中，赵玲真正体会到了乡土中国的国情；在打工子弟学校的支教调研当中，她开始对自身所处的教育体制产生反思；在与城市农民工的深入交流中，她逐渐把眼光从狭隘的自我转移到整个社会的弱

势群体……

爱情

赵玲的爱情也是令中国的上一辈知识分子感到“昨日重现”般的感动和亲切的故事。在和打工群体及农村的频繁接触中，赵玲认识了来自河南农村专门为农民工唱歌的孙恒。孙恒毕业于河南省的一所音乐学院，开始在河南的一个县城的中学教音乐，后来这个不甘平庸的年轻人辞去工作，背了一把吉他，到了北京，追求自己的艺术梦。那时的孙恒留着长发，满身的“歌手”气质。

可是，在这个繁华的现代化都市里，孙恒感到别人投向他的目光有些异样，他有了一种异乡人的孤独和落寞。后来他背着吉他，走了几个城市，慢慢地明白，自己根本不是一个歌手，而是和千千万万到城市里找生路的人一样，是个打工者。从此，他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这些受着城里人歧视的农民工，他看到他们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不屑于干的苦活、脏活、累活和危险活。这些人在城市里洒下汗水，建成了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和漂亮宏伟的立交桥，可是他们却是和很多人挤在一间没有暖气和风扇的简陋的工棚里，很多人和家人常年分离，只在春节时挤火车回老家看看。他们吃得极为简单，除了干活和睡觉，几乎没有任何娱乐。孙恒开始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些农民工弟兄做些什么，于是，他先到打工子弟学校支教，用歌声和琴声带给这些孩子快乐和关爱。

后来，孙恒和几个从外地来北京的文艺爱好者，组成了一个专门为农民工演出的“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们先和北京各个建筑工地的负责人联系，经过一番解释和说服，得到同意后，就带着乐器按约定的时间到工地演出。他们演出的，是自己创作的歌唱打工、歌唱劳动的歌曲，以及表现打工生活的文艺节目。每一次，他们几乎都被工地上的工友们表现的快乐和陶醉所感动和鼓舞。几年来，孙恒他们的“打工青年艺术团”义务演出几百场，给千万的工友带去了快乐和温暖。

“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年轻人还开展了针对农民工的各种培训，到打工子弟学校去支教。目前还在北京的几个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密集的社区成立了“打工者文化站”和“工友之家”，举办

“工友论坛”，现在正发起成立“同心实验学校”。

最近的两三年中，越来越多有着共同关怀和责任感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他们中有大学生，有大学教师，有知名学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

2005年元旦这天，在北京郊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里，“打工青年艺术团”和很多工友，以及学校里的孩子们在一起联欢。赵玲和孙恒，这两个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中，却有相同关怀和志向的青年也在这天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告诉朋友们，他们从此将要在—起生活了。

新娘坐的不是像现在的姑娘们互相攀比的奔驰或奥迪这样的豪华轿车，而是一个朋友开来的旧面包车；新娘穿的不是婚纱不是旗袍，而是家常衣衫；招待大家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简单的饭菜。但是，所有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们都会被这个场景深深地感动，因为，这场婚礼让人们怀疑它发生在现实中的还是在理想中。这种在艰苦岁月中才有的婚礼仪式竟然在这个大都市里进行着。

几天后，这对新人被请进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这期叫做“春天的约会”的节目在两会之前，反映农民工在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送给赵玲和孙恒一大束鲜花，并问新娘：“作为一个城里的姑娘，而且有着研究生的学历，嫁给孙恒这样普普通通的、朴朴实实的从农村来的年轻人，你愿意吗？”赵玲回答：“我非常愿意，因为我也是一个农民之子，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祖辈都是农民。”

643

痛苦

赵玲不再用流行在同龄人中的一个词——郁闷，但是她却有痛苦：看到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孩子们的窘迫，可自己的力量却那么微薄；看到偏远的农村里的人们贫困的生活，自己的帮助显得如此微不足道；看到打工者工资被拖欠，自己的呼声那么微弱；很多的同学加入到“农民之子”中，在做一段支教支农的活动后，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们又回到了那个芸芸众生之中去了，毕业、找工作、为生活奔波、在城市里麻木地生存着……每当这时候，赵玲就真切地感到内心的痛苦。

从2005年上半年开始，赵玲所在的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承担了北京师范大学与密云县政府的“校县联手，共育英才”的共建项目。国际儿童节的前一天，赵玲和其他的同学在密云县不老屯镇不老屯兵马营小学支教时，认识了当地农村山区一个身患白血病的12岁小学生穆玩宇。

他们通过穆玩宇的家人了解到，玩宇6岁时就出现了白血病症状：身体发生轻微碰触就会出现青肿，鼻子一旦流血就无法止住。后来经过多方诊断，北京市儿童医院的专家确诊小玩宇患的是骨髓异常增生（MDS）白血病，这对穆玩宇的家人来说像是走进了一场噩梦之中。

据当地的老乡们反映，这个地方在大约10年前开采过一种重金属矿，后来因为环境污染等问题被明令停止开采了。大家怀疑穆玩宇的病和这种矿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当地，除了玩宇，得白血病的孩子还有十几个。

为了给小玩宇治病，在家务农的父母倾其全力，几年来已经花掉了15万元，欠了亲戚朋友6万元。半年前，医院通知玩宇的父母，玩宇的配型已经找到，但是，给他做骨髓移植手术起码需要40万元钱！

现在他的家人、亲戚朋友以及当地学校捐助共筹款18万元，可仍有22万的差距。现在玩宇7天就得输一次血，内脏器官经常处于缺血状态，急需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此情此景，深深地触动了赵玲他们，他们绝不能漠视这么鲜活的一个生命的存在。于是赵玲和同学们主动承担起了给穆玩宇募捐医药费的任务，募捐过程困难重重，他们看到了很多的制度缺陷，忍受着冷漠，但他们也时时受着感动。

北京树仁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听了穆玩宇的故事，主动发起给玩宇写信、叠纸鹤和捐零花钱的活动。这些自己尚处在需要救助的孩子们，在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个未曾谋面的伙伴的关爱。

这条路行不通，赵玲他们就去找基金会。可是这笔钱毕竟不是个小数目，很多基金会或者只负责救助自己项目点中出现的个案，或者基金要定向发放，根本不会、也没有实力救助这样的单独个案。与此同时，赵玲联系几个大学的学生社团，在大学校园

里发起募捐。

几经周折，他们联系到了台湾的慈济医院，得知这家医院有这种救助项目，但是需要大陆的主治医生和他们直接联系。赵玲和几个同学就去人民医院找玩宇的主治医生。找到这位医生说明情况后，这位医生的态度非常冷淡，连话都懒得和这几位热心的大学生说。而这在如今的医院却极为普遍，凑不够住院费，即使有天大的危险，医院也绝不会收治病入。并且赵玲他们还得知，其实玩宇的手术费用总共需要25万，但是医院怕病人家属到时交不起后期的医护费用，就要求必须交够40万才给玩宇做手术。

赵玲和几个同学通过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找到了人民医院的院长，据说这位院长还是一个台湾人，人很不错，可是他却说他们院方已经有了亏空，因为有病人住进来，交不起医疗费就赖着不走，可是国家又没有给他们拨款，而白血病的花费又很大，所以院方是有难处的。

这一次的辗转周折，让这群大学生看到了中国医疗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而由于现在环境和食物的安全问题，白血病似乎变得很常见。在“农民之子”为玩宇募捐的那段时间，《新京报》就连续报道了好几个病例。人们似乎对这种悲惨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到没有同情心的地步了。

是啊，不要说这样几个满腔激情的青年，即便是什么样的社会名流，凭他们的影响力和财力，也许能救助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孩子，可是天下那么多的“小玩宇”靠谁去救助？赵玲了解到就在穆玩宇家的附近，就有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同样得了这种可怕的疾病，因为没有钱，她的父母只好放弃了给她的治疗，就在不久前，女孩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她还没有太多涉足的人世。

赵玲他们为救助玩宇组织的募捐活动，仍在进行中，善款已经达到5万多，可是距22万的目标仍然那么遥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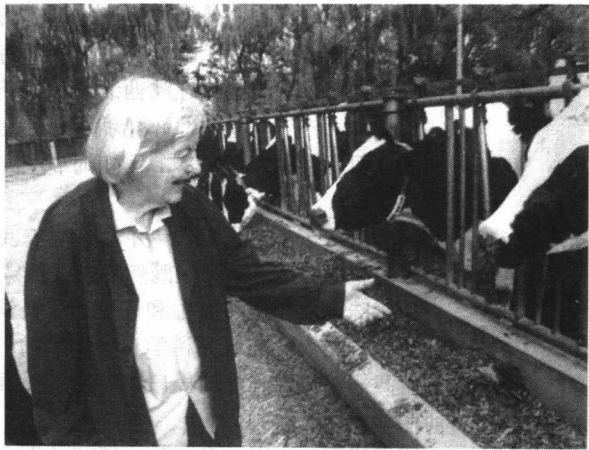
希望

这几年，赵玲走的路很艰难，在社会的这一面，她寻到了自己的“根”，她的脚不再有悬空的感觉，可是每走一步，赵玲都觉得那么痛苦，因为不论是她所面对的苦难还是不公，对这个年轻的姑娘来说，都太强大了，每当自己觉得很难的时候，赵玲就

想起自己在农村和一群孩子唱的一首叫“再见萤火虫”的歌：“燃烧小小的生命在夜里，为迷路的旅人照亮方向；短暂的生命默默地发光，让漆黑的夜晚充满亮光。”她也会想起“农民之子”的同志们一句座右铭：“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

赵玲相信，自己心中的和平景象总有一天会成为现实：“人民内部的各个群体，以及为所有人服务的草根组织能团结起来，消除矛盾，共同发出人民自己的声音。无论其身份如何，所有的民众、草根组织与政府和社会各阶层都能公平地对话，共同完善人类社会。”

实现这样理想的人类社会，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和团结。



文：薛翠

647

发挥你的力量，想尽办法，积极推动和平，反对战争。凡是有战争，科学永不置于度外。

作为人民科学家，寒春渴望这样的世界：“人人全力创造，为人民建造好房子，消除水灾，稳住粮食生产，使用机械，使一块充满绝望与贫困的土地，改变为繁华昌盛、启迪文明之地，一群科学家都为人类的福祉而辛勤工作。”

从制造原子弹到饲养牲畜，寒春彰显有机的女性知识分子如何扭转科学知识，甘为和平及人民殷勤一生。

“不”——

最初，寒春（Joan Hinton）一口拒绝参加“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计划，因为她对其中一项的评选准则不以为然，即“她采取积极的、非暴力的方法，缓解冲突及建制上的不公正”。寒春在电邮反驳：“我不会接受提名。因为最鼓吹暴

力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他们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打击那些只剩下自己的生命杀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战争一定要武力对付攻击他们的人。当年在陕西北部，那帮盗贼快要杀进来的时候，他们（共产党同志）也不给我一把手枪，因为他们说我连一只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实，我随时都能够开枪打死扑进来的盗贼！”

寒春直截了当说“不”，并没有浇熄我们的热情，却勾起我们去采访她的兴趣。估计她既然赞成以暴易暴，性情可能挺刚烈、凶悍的，殊不知她是那么温和、风趣。笑谈之下，寒春打开那记忆的宝藏，娓娓道来研究科学、参加革命的经历。后来，她矫捷地领着我们参观她心爱的黑白花奶牛，还有细心讲解农场上她精心研制的设施配套。

临走之前，我们一再阐释争评活动的意义，寒春这次终于应允，而且还推荐和她一样早年便来中国参加革命的柯鲁克教授（Isabel Crook）。

“她采取积极的、非暴力的方法，缓解冲突及建制上的不公义”

寒春，1921年10月20日生于美国。从小热爱科学，立志长大当科学家。可是，迈进尖端科学的殿堂后，寒春却变得越来越苦恼。

上初中，寒春斩钉截铁地跟老师说，坚决不念拉丁文，要念英国科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1791 - 1867）的《蜡烛的化学史》（*The Chemical History of a Candle*）。上高中，寒春迷上了化学，别的课都置之不理。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寒春动手建造威尔逊云室（Wilson cloud chamber），整天观察带电粒子；还有，经常跑去康乃尔大学跟那群钻研回旋加速器（cyclotron）的师生讨教。大学毕业后，寒春在威尔康辛大学念了两年研究生，然后去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当研究员。

后来，寒春加入“曼哈顿工程”，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曼哈顿工程”不只是美国第一个大规模的科研工程，更是制造世界第一批核武器的“残暴的”计划。“曼哈顿工程”始于1942年6月，历时3年，参加的总人数达15万之多。“曼哈顿工程”下设16项分支工程，由顶尖的科学家带领。获得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费米（Enrico Fermi, 1901 - 1954）领导的小组，负责生产一

个受控制的、自我持续的核链式反应 (nuclear chain reaction)。费米的小组里有研究生，也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寒春是其中一个。寒春被安排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 (Los Alamos) 实验室工作，负责研究沸水锅反应器 (water boiler reactor)。

1945年7月16日，美国研制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绰号“大男孩”，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试验核爆炸。寒春和几个研究人员违规，偷偷去看。寒春描绘当时令人瞩目的“爆炸”情景：

我们被四面八方的光浸泡着，就像在一片汪洋的光海底下。那颗原子弹好像在吸吮光一样，光急速进入。然后，那颗原子弹变成紫色、蓝色，往上高升，高升，再高升。我们悄悄说话的时候，那块大云团不断高升，直到被升起的阳光撞击，而天空中自然的云都消退了。我们看见的那块大云团，底层是黑红色的，而顶层全是日光。突然，一声巨响，刺耳非常，把山峰都震撼得隆隆作响。我们突然要大声说话，而且，感觉曝光于世界之中。

不久，寒春原来对壮观的核爆怀着的激动之心，很快就消失无踪了。1945年8月，美国装扮文明与正义的姿态，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造成15万人死亡。对寒春来说，“这是一个梦想的破灭和另一个信仰的开始。”寒春不但对核武器的破坏力感到极度震惊，而且深切体会到科学无法逃避伦理的问题。她甚至发现自己的奖学金是由美国军方赞助的。顿时，寒春陷入道德的困境，内心被磨噬着。

在现实中，纯科学不得不直面伦理的挑战，寒春痛心说：“他们给我们看了飞机上照的相，可是这个爆炸跟美国的试爆不一样，那可是日本人民的血肉，你怎么想，那都是人，跟你和我都一样。”寒春对纯科学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并且不留余地地批驳纯科学背后的伪善与暴力：“我把核物理当作一门纯科学来研究，一门非常有趣的纯科学。但是核爆炸成功以后，军队就完全控制了它，而我们科学家却对此束手无策，如果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反对的话，军队当然不能得逞。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让所有的人都反对使用核武器。美国政府做了大量宣传，大肆宣扬使用原子弹可以挽救多少多少美国士兵的生命，这不是事实，他们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寒春放弃高级科学人才所享有的名利，选择抗议政府挪用科学研究成果，甚至跑到华盛顿游说，推动和平运动。可是，寒春发觉美国上下自我沉溺于不被质疑的、自以为正义的道德感与军事优越感：“不管转到哪里去，到处都听见战争、秘密情报、海军、军队，还有，那些疯子把自己锁在实验室，冥顽苦思更新的、更好的、彻底毁灭的方法”，“我到一位参议员的办公室去找一些数据，那位秘书屈尊地打量着我，然后问：‘这跟学校有关吗？’——我，身为原子科学家，老远跑到华盛顿争取科学自由与世界和平——她，紧张兮兮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天我是多么的沮丧。”

寒春眼见美国政府挪用科学成果作为杀人武器，对垂败的日本“多此一举”地投下原子弹，而民间又无法掌控核能的应用，寒春感到非常失望，转而在1948年远赴中国，参加共产党革命。1953年7月，美国《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把寒春描述为逃跑的原子间谍。但是，寒春坚决否认自己参与中国的核武器，相反，她帮助中国推动农业机械化。寒春说科学家应该有社会良心：“我不想花时间去杀人，相反，我想让人民过上不是更糟的，而是更好的日子。”

寒春在1951年写给原子科学家联合会的回信，题为《为什么中国想要和平》，一再提到广岛惨剧：“杜鲁门条约、马歇尔计划、联合国原子能机构都软弱无力——我们怎么能够干坐在实验室，沉思统计机器的深度？广岛的记忆——15万条人命。1、2、3、4、5、6……15万人，每一个都是有生命、会思想的人，满怀希望与欲望，也承受起落成败，每个人都有属于他或她的生命意义，可是，15万人就这样全没了。”

最后，寒春呼吁科学要为和平工作：“发挥你的力量，想尽办法，积极推动和平，反对战争。凡是有战争，科学永不置于度外。我们是那些穷尽一生甘为企图毁灭世界的疯子所奴役的科学家吗？”；“我们能不想象明日之世界？它会否是毁灭与悲惨之世界，承受辐射带来的、痛苦的死亡，或者，它会否是一个山峰被原子弹摧毁，引致河流改道，沙漠上丰饶的田野都被炸毁的世界呢？我们的想象力跑到哪里去？”

1948年，寒春离开美国，也扬弃为军队所挪用的核子研究，

远赴延安，参加中国革命，后来与阳早（Erwin Engst，1918 - 2003）共同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寒春对这段人生的转折，执意强调一点：“有人说我是追随未婚夫阳早来延安的，这不对。”寒春郑重地说：“我和阳早已经有了很好的感情，这不错；但他不是我的未婚夫。假如他不是延安而是在别的国家，我是不会奔他去的。”深藏在寒春的心里，更重要的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信仰，当时的延安正红红火火地开创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生活，而阳早和寒春的哥哥韩丁（William Hinton，1919 - 2004）早已被吸引过去了。对寒春来说，信念从来是坚定的，而人与地，只是碰巧而已。

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寒春再次对广岛表达“深切之悔恨与羞耻”，同时斥责原子弹是“灭绝人性的罪行”，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广岛与长崎的悲剧，提倡科学要为和平服务。后来，寒春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和平”。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印度发生边界的纠纷，寒春特别强调友善地谈判的重要性：“世界和平可能建基于不论是大国或者小国的尊严、平等以及权益……显而易见，中印边界问题可以友善地谈判来解决。”

融入人民生活的科学

1949年4月，寒春在延安和阳早结婚，自此以后，他们过着俭朴、充实，又充满挑战的生活。早期，他们住在窑洞，在内蒙古和西北的西安农场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工具、电力、邮政等，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全心全意创造新中国。寒春回忆如何向老百姓学习把杀人的武器变成有用的生活工具，使日子过得更好：“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陕西省深山里的钢铁厂。他们（共产党）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把美国制的手榴弹、炮弹，或者从美国运给蒋介石的、已经被撞击的飞机机翼，或者美国人运过来的、用来杀他们的钢铁和铝合金武器，全部转化成煮食锅子、犁耙、锄头。他们把毁灭人类的东西转变为生活的工具，例如四轮运货车、抽水机与门闸都用来建设灌溉管道，从而建设全新的、繁盛的中国。”

寒春到中国以后，从不染指毁灭人类的核子研究，而是踏实地推动民众科学，使精英的科学知识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寒春曾经在陕北、内蒙古的农牧场工作几十年，负责养牛，利用当地有限的资源，研制农具，像风车、提水机、两轮驴车，还有设计挤

奶系统、农用机械、灌溉系统。在这个改变自己、贴近平民的过程中，寒春幽自己一默，举了一个犯“小”错误的例子：“有一次，我亲自设计一个风车，当时全工厂除了大约有40名工人，其他什么都没有。我设计和制造风车的每一部分，可是我设计的时候，忘了万一风大，要有一个闸，可我没有搞出来。当时三边牧场那里风也很大，3月份刮大风，好家伙，它（风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砰，就爆炸了，那是我头一个的教训。”

寒春希望靠着技术改良与机械化，减轻农民的劳役，寒春在1963年写的《寄自西安附近的农场》谈到如何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研制自动牛奶低温杀菌系统：“现在我重新研制早在1958年就开始研究的自动牛奶低温杀菌系统，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减轻奶牛场工人的负担，现在他们每天用人手抽取上千磅的牛奶，1958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停止用机器，因为那些配件实在太难买到，不过，现在的条件越来越好了。我可以进城去买各式各样的配件，以前根本买不到的。”



寒春1982年调入北京昌平区沙河镇小王庄的中国农机院农机试验站，专心从事养牛机械化和牛群改良工作，使小王庄成为中国早期机械化养牛的示范奶牛场，其出产的牛奶以质优、纯净而远近驰名。寒春精心设计鱼骨式挤奶台、奶牛青饲料铡草机，坚持用良种公牛精液和优质胚胎改良牛群。她记录了1963年至今各种挤奶器的功能，她设计的牛情表格让畜牧研究所专家汗颜。中国农机院为了表彰寒春为奶牛质量改良和养牛机械化事业做出的

杰出贡献，特授“中国农机院金牛奖”。

寒春与阳早以身作则，律己爱牛。1958年，渭河洪灾，洪水冲毁了送奶必经的桥，他们就把空汽油桶和床板绑在一起当桥。整个汛期，他们就这样准时无误地把牛奶送进城。寒春认为爱牛的人，做一切事都会以牛为先，这样的人不会在岗位上出纰漏，出纰漏的都是不爱牛的人，因此，寒春断言：“牛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细菌含量高的牛奶源自人的不敬业。”

寒春珍惜与农民、工人一起创建社会主义的世界，承认“人民的双手”的力量：“每个人都能够竭尽全力，每个人都能够发挥力量，每个人都很忙碌，每个人都有工作，人与人之间不会互相剥削。”作为人民科学家，寒春渴望这样的世界：“人人全力创造，为人民建造好房子，消除水灾，稳住粮食生产，使用机械，使一块充满绝望与贫困的土地，改变为繁华昌盛、启迪文明之地，一群科学家都为人类的福祉而辛勤工作。”

若要数对寒春影响至深的人，那非她母亲辛顿夫人（Carmelita Hinton）莫属。她母亲在美国维尔莽州（Vermont）创办一所进步学校，叫做普特尼学校（Putney School），着重劳动与教育的结合，并且强调集体精神与自力更生的意识。辛顿夫人认为：“一个人若不从事体力劳动，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就是在剥削别人。农场成为学校的中心，我常感到人们与生产他们食物的地方脱节。”普特尼学校的上课时间是早晨8点到中午，然后午饭、休息或自修，下午是运动或者劳动，例如在农场干活、打扫校舍，晚上做作业、做手工等。寒春小学二年级，和老师、同学共同建造小城镇，里面有学校、邮局、商店等，他们不但学会造房子，做家具，也学会接驳电线。寒春回忆说：“有多少人还记得小学二年级学的东西？我却永远都不会忘记。”另外，辛顿夫人认为“行万里路”是让儿童从生活实践中学习的教育方法，例如寒春4岁的时候，母亲带着她、哥哥韩丁、姐姐韩青（Jean Hinton）徒步到墨西哥“探险”，中途他们为了逃避盗匪，骑着驴子穿越热烘烘的森林，最后，大家安然无恙，但却带了一身虱子回家。

寒春回顾一生，说自己经历过20世纪两个最重要的事件：原子弹爆炸与中国革命。从制造原子弹到饲养牲畜，寒春彰显有机的女性知识分子如何扭转科学知识，甘为和平及人民殷勤一生。

“幽默感、历史感、斗争感”

2005年，炎夏，我们带着寒春和母亲的合照、和平妇女的汗衫，再去小王庄农机站探访寒春。

寒春仍然住在农场旁边的小平房，客厅的柜台上，耸立着两座剽悍的战士头像，一女一男，由菲律宾民间组织组成的《菲律宾国际斗争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hilippine Struggle*）颁发，女的给寒春，男的给阳早。两座头像下铭刻相同的赞词：“阁下作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与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成就卓越，永远铭刻于中国、美国、菲律宾，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之心中”，两座头像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寒春那座刻有：“GABRIELA”（菲律宾全国妇女组织联合会，*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s Organiza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我请教寒春：“可否再深入谈一谈‘和平’的理念？”寒春稍为思索，给了一个干净利落的答案：“消除资本主义，战争皆因资本主义而起。”当代的战争像科索沃、波斯湾战争、美国出兵阿富汗与伊拉克等，无不与掠夺石油有关，寒春的答案明显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批判当代的金融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正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忽然，寒春兴奋地拿给我一篇文章《委内瑞拉：这革命使妇女苏醒》，刊登在《绿色左派》期刊（*Green Left*）2005年3月9日，重要的部分都着重地画了底线。文章内容主要说委内瑞拉执政党“第五共和国运动（MVR）”在全国大会、地区及市议会选举中，预留50%名额给妇女，还有，2001年成立的妇女发展银行，专门低息贷款给赤贫的妇女成立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借以提高妇女地位、推动小区发展及提倡“集体”精神。还有，文章批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Grameen Bank）的小额信贷计划失败，因为他们浪漫的以为借钱给贫困的农村妇女各自做小生意，就能够解决贫穷，但是8年以后，有55%的妇女仍然得不到温饱，很多妇女都把借款拿去买食物。文章最后总结，委内瑞拉另辟蹊径，

全力动员更多的妇女参与政治，并且鼓励赤贫的人民自发组织起来，寻找民主/民生的另类实践。

翻开资料，1998年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的查韦斯开宗明义，以“建设21世纪新社会主义”为己任。查韦斯宣言：“我们要开辟另外一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否则我们将被资本主义吞噬掉。”查韦斯追求的是“国际主义”，第一步是希望委内瑞拉能与其他拉美国家一起，消除国家界限，建立新的统一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哈瓦那召开的第4届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会议上，查韦斯指出，要以“玻利瓦尔美洲”取代美洲自由贸易区，所谓“玻利瓦尔美洲”是一项旨在消除贫困的互助计划。例如，古巴可以低廉价格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而委内瑞拉则换来古巴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如果资本主义是以国际形式发展起来，那么能够牵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必然有着国际的面向。

我看了《委内瑞拉：这革命使妇女苏醒》以后，与寒春相视而笑，大家都感到振奋，在世界的另一端，委内瑞拉同志（寒春最喜爱的“名称”）正在联合基层，特别是妇女的力量，改写历史，开创新局面，与《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计划的宗旨不谋而合，可以说，这计划是以基层妇女为主体的国际行动。寒春一再展开她的国际视野，除了重提中国革命传统，狠批美国自二次大战以来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还有赞扬当前委内瑞拉推动“妇女革命”。简言之，寒春一直是扣紧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者。

同行的60多岁的印度社会学者沙丹那教授（Denzil Saldanha）问寒春：“有什么话要对像我，或者像薛翠更年轻的人说？”寒春笑了一笑，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毛泽东的格言。”

沙丹那教授再问：“我们如何继续投身社会主义革命？”

寒春如斯说：“要有‘幽默感’，笑口常开，懂得开自己玩笑，才不会那么自我中心；要有‘历史感’，资本主义的历史才不过几百年，封建历史却是千年以上；要有‘斗争感’，想去改变世界，就要不断斗争。”

临走之前，寒春把委内瑞拉的材料复印一份，郑重地送给我。我接过以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背包。

黄美英
跨族群寻根
——
重塑社运



文：郑空空

地方扎根工作，是锁定足以对文化、政策的议题提出缺失和检讨，以小搏大；噶哈巫族（Kahabu）就是国家政策及学术研究上的一个大漏洞，因为这群人不论在历史或现实上都没有被看到。

现在我们面对的暴力是来自国家强权与政策的暴力，同属弱势族群，彼此间没有相互压迫与冲突的条件，反而应该结盟，共同思考政治经济对我们的剥削与伤害。

我们现在面临未来传承与重大的考验……所以要练功，活到100岁，才能长期抗战。

黄美英，人类学工作者。1975年进入台大，毕业前后几年

间，一连串政治事件发生^①，对她造成很大的冲击，毕业后，她到报社工作，投入报道文学，这些直接的经验使她较为真实地看到社会底层的样貌，社会关怀意识逐渐萌芽。

政治氛围的影响

当时，一些旧识筹组党外编联会^②，他们也结合已觉醒的原住民^③知青，如胡德夫^④等，在编联会下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黄美英与胡德夫原本熟稔，她支持胡德夫等人成立独立于编联会外的原住民自主性组织，因而筹组“台湾原住民族权益促进会”（简称原权会）；过程中，包含黄美英与王志明（汉族，黄美英的学长）在内，大家论及必须先“正名”，遂将联合国的“indigenous peoples”译成“原住民”一词。往后十年陆续推动的“正名运动”、“还我土地”、“反吴凤神话”等原运中，黄美英始终协助幕后工作，并一起走上街头。

1984年，原权会假马阶医院正式成立，“成立大会时，外面镇暴部队伺候，风声鹤唳”。黄美英描述当时的情形。之后原权会

① 1978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蒋经国发布紧急命令，停办台湾地区立法委员及国代选举；1979年，台美断交，断交前夕，因台大哲学系事件遭解聘的副教授陈鼓应与记者陈婉真联手参选立委、国代，支持群众挤满台大校门前广场，甚至地下道入口顶端都站满了人。演讲时，电线一度遭人剪断，沿着新生南路、罗斯福路停着好几辆镇暴车；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行“人权大会”，群众游行，治安单位以强大镇暴警力封锁群众去路，紧张气氛升高，造成上百人受伤的警民流血冲突，事件后，媒体形容参与群众为暴徒，宪警人员为受害者，政府透过这次事件将党外领导分子进行扫荡逮捕，多人被控以“叛乱”罪。

② 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大批当年借着省议会等公职舞台各领风骚的党外菁英锒铛入狱，党外势力一度出现真空。一群青年新秀以犀利的文笔与理论，主张街头运动式的激进立场，传承了党外薪火。这批年轻人于1983年9月组成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会长为丘义仁。

③ 当时政府称为“山胞”，学界称为“高山族”，甚至社会歧视称为“番仔”。

④ 卑南族，被誉为台湾原住民民谣之父。早期参与民歌运动，而往后在一次次为原住民发声的活动场合中，胡德夫也将他们的诉求及理念，融入了自己所创作的歌曲并将它传唱出来，借此希望社会大众能开始去正视原住民问题。

创办《原住民》通讯，凡编写、寄发等工作都一起动手，由于当时尚处戒严时期^①，通讯寄发出去后遭到拦截，他们遂以各种方法突破障碍，将刊物传递出去；除此之外，黄美英也曾帮其他党外杂志写稿，而这些杂志同样遇到查禁、拦截等问题。

为了加强知识、更深入了解台湾，1984年，黄美英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参与多项原住民调查计划，特别是都市原住民，在当时尚未获得重视，黄美英却早已关注。借由调查机会，她对原住民状况有更清楚的认识，同时将相关资料提供给原运朋友，与原运里应外合。



1987年，台湾解严，随着报禁^②解除，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不论是在报端或在街头，民众要求改革，范围包含各个层面，在这段期间，黄美英经常针对社会、文化、弱势议题在报上发表论述，月旦时政。

^① 台湾自1949年5月20日起宣布实施戒严。戒严期间，人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此一戒严长达38年，为世所罕见。在前辈们冒着付出生命与自由的危险下，不断冲撞争取，终于在1987年7月15日终止戒严。

^② 指1948年开始长达40年不能增加新的报社、现有报纸发行页数、不得增加版面、印刷厂设立地点、贩售价格等的限制。

不同于一般学界的不问世事，黄美英的研究调查始终与行动联结，如1988年5·20农民事件调查^①、1994年抢救核四厂区凯达格兰族遗址^②行动，或是1998年后至埔里噶哈巫（Kahabu）^③农村蹲点；而她关注的不仅是一般在现实制度下被牺牲的群体，尚包含在漫漫历史中直至今日都被忽略、在社会与文化上未受尊重、在政策上未获公平对待的弱势族群。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同时改选国代。有感于过去社会运动与民进党联结太深，社运界与弱势团体认为社运应重新出发，要与政党划清界限，因而成立“台湾绿色本土清新党”，并联合推派政治代理人参选，透过选举提出社会议题，黄美英为参选人之一。当时，黄美英认为社运发展及路线已遇瓶颈，因此在选后，她决心离开台北、到偏远地区进行长期扎根工作。

① 1987年5月20日，来自全台各地数千位农民载着一车又一车的白菜前往台北请愿，要求政府正视长期以来农业政策失当的问题，但是原本和平请愿的活动，却演变成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此一事件震惊了国内外。宪警指称请愿农民预藏石头在某车下方预谋暴力，然而从镇暴警察执行公权力的方式与立场，乃至事后整个侦察过程，都显示当中问题重重。为了敦促政府重视农业问题，学界首度连署发出呼吁，此外为了还原事件真相，中研院副研究员许木柱与清华大学傅大为开始进行事件调查，黄美英协助进行5·20事件调查报告的调查访谈、撰写与学界连署工作。

② 早期台北盆地附近为凯达格兰族居住与活动范围，根据日人伊能嘉矩于1900年的资料，他认为三貂社的凯达格兰族人是由现今核四厂址附近登陆的，由于该处存有凯达格兰族遗址，并经当地族裔指出，因而发动了一系列抢救考古遗址及凯达格兰族文化探源活动。

③ 早期台湾平原地区居住许多不同的原住民族，在历史文献上称这些居住于平原地区的原住民族为平埔社番，现称为平埔族。自明郑开始，不断有闽粤移民移入台湾，他们与平原地区的原住民族争夺土地，之后随着移民人数日渐增多，致使这些在平原地区的原住民族迁移他处，或被汉化。面对汉人的强势文化与经济势力，绝大部分的平埔各族文化逐渐消失，隐匿在汉人社会当中。噶哈巫即为平埔族中之一族，其祖先居住于现今台中县新社、石冈一带，因粤籍移民迁入争夺土地，而迁移至埔里地区，但是不论在历史文献、学术论述或是当地的文史调查，皆把他们归为另一族——巴宰族（Pazeh），然而噶哈巫人却有清楚的主体意识，认为他们不是巴宰，而是噶哈巫。

到地方扎根

1997年，在偶然的机会上黄美英造访一个被学界、文化界称为巴宰族（Pazeh）的农村，实际上当地人却自称噶哈巫族（Kahabu）。回研究室后，她翻遍历史文献、学术论文、在地文史资料，都缺乏深入的调查，几经思索，1998年，她带着孩子来此蹲点，“地方扎根工作，是锁定足以对文化、政策的议题提出缺失和检讨，以小博大；噶哈巫族就是国家政策及学术研究上的一个大漏洞，因为这群人不论在历史或现实上都没有被看到。”黄美英解释说。

初到时，长期的人类学田野经验，使她很快与村民建立关系、进入在地的关系网络，并成立了四庄^①文史工作室，与族裔逐步进行文史与组织工作。1999年9月20日晚上，黄美英参与噶哈巫协会的筹备会议，会后她与几位族裔回到工作室继续讨论，时间指向次日凌晨1:47，突然间，天摇地动，芮氏规模7.3的大地震来袭……

强震后，埔里地区满目疮痍，她的租屋在强震中坍塌，她与孩子侥幸逃过一劫。面对残破景象与灾后一片兵荒马乱，黄美英决定留下来，协助村庄重建，并计划透过重建过程，凝聚灾区草根力量。

首先，她设立重建工作站，抓住公共议题，引入经费和专业者，进行社区环境改善、重建人文环境；黄美英推动的角度并非以单一社区和村里为考量，而是以整体眉溪流域平埔聚落群为区域范围，使区域内各社区的发展能建立联结与合作关系。

透过人类学的知识理念和实践方法，黄美英将传统文化意义转化成现代行动，如举办噶哈巫传统祭典，以凝聚族群意识、进行组织操作；重建精神标志物（如望高寮^②）并将其转向，让族

^① 噶哈巫族自台中东势迁移至埔里眉溪流域，建立了牛眠山、守城份、大滴、蜈蚣仑四个主要的村庄，俗称四庄。

^② 指高耸的瞭望台，过去在部落相互冲突的时代，部落中人在瞭望台上居高临下，注意周围环境，以防敌对部落的攻击。

裔从历史脉络中了解祖先曾有过“以番制番”^①的无奈处境，进而不再被政治利用，并转变成弱勢族群相互支持、结盟的意义。

在重塑社区人文环境方面，除了重建望高寮之外，她引介董俊仁、陈惠民等专业社区规划师和蔡慈鸿建筑师，协助向文建会提出蜈蚣社区枫香公园、守城社区生活广场与文化馆的规划设计案，打造社区独具特色，各社区结合起来，又具有噶哈巫族群的整体意象。配合规划过程，协助社区筹划各种活动，使组织在运作中学习，唤起居民爱乡、参与的共同意识，并思索未来的方向。“对土地的情感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将来他们所有的运动会变得利益取向。”黄美英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凝聚与运作之后，她协助族裔成立跨社区的噶哈巫文教协会，（此协会在地震前即已酝酿，因地震而中断筹组）。对于这个协会，黄美英的思索，除了在地的经营发声之外，尚有未来各地串联、运动与组织得以持续的前瞻观点，因此她特别强调，协会必须具有各社区的代表性、公平性，代表产生过程与组织运作必须民主化，同时也以此为标准，审慎选择结盟对象。

对此，她以过去许多社运团体的问题为例加以说明，“过去的社会运动大部分是针对议题开始发起，各团体连署、行动，但是在议题喊过、政策改变之后，却是少数人抓住最后的权利，由于组织不健全，使得议题风潮过去后，组织瓦解；因此要避免犯下过去的错误。”

重塑对土地的感情

协会成立后，族人学习推动各项传统文化复振工作，如开办母语歌谣、传统民俗技艺课程；进行团队培训，如四庄导览解说培训、举办噶哈巫文化系列活动、噶哈巫家族史与老照片搜集；并跨出社区，寻求结盟发展，如2003年举办“噶哈巫祖居地寻根”，参与平埔各族发起的“正名运动”与“平埔族会亲”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祖居地寻根”是噶哈巫族裔重返祖先居住过的台中县新社乡，拜访现居当地的客家族群；百余年前，粤籍

^① 指殖民者利用原住民之间的敌对关系，相互制衡，以抵消对强势族群的威胁。

移民增加，争夺土地的冲突不断，噶哈巫祖先因而迁徙至埔里眉溪四庄；百余年后，四庄族裔追寻历史足迹，由祖先“番太祖”^①领队，带领后代子孙重溯迁徙的道路，返回祖居地，而当地居民沿路欢迎，双方热情互动，透过认识过去，重新建立彼此关系，进而相互疼惜。

有关对外串联工作，则是以噶哈巫四庄为基地，由点而线而面的结盟，即先与埔里地区其他平埔族群接触，就共同关注的议题结盟，再逐渐如同心地扩大出去。

除了协助噶哈巫四庄草根经营之外，黄美英还参与社区总体营造工作。有别于官方的操作，她持续以整体区域为考量，协助社区整合力量，彼此支持，发展合作关系。

问她如何看待目前从事的工作，黄美英认为“现在我们面对的暴力是来自国家强权与政策的暴力，同属弱勢族群，彼此间没有相互压迫与冲突的条件，反而应该结盟，共同思考政治经济对我们的剥削与伤害。要摒弃先民时代的斗争，走出族群冲突，变成携手合作的关系；族群的多元与和平，我们很具体的在做。”

回顾六年多来的草根工作，黄美英表示“草根经营很孤独，因为需要帮忙时，朋友远在天边，只能自己孤军奋战，没法向地方上的人抱怨苦衷，虽然过去经验丰富，但来到这里后，必须放缓步调、顾虑到社区，草根工作要以社区为主，因此我是在旁边催化、组织、联结他们。”

对于未来，黄美英最忧虑的是城乡差距造成人才外流的传承问题，“我们现在面临未来传承与重大的考验……所以要练功，活到100岁，才能长期抗战。”她说。

^① 指噶哈巫祖先，由于今日的噶哈巫族裔受到汉人影响，有多种民间信仰，因此他们亦将祖先塑像奉祀，称为番太祖。



肖
井
荣

春
风
化
雨

润
物
无
声

文：赫海凤

没有疾风骤雨般的改革创举，只有和风细雨般的细致周到；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普普通通的细琐工作。这就是肖井荣，一个中国农村最基层的普通干部。

她们默默地耕耘于各行各业，做着看似平凡但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没有炫耀没有抱怨，几十年如一日，服务一方造福一方。和平时期的“和平”不再是参与战斗、驱除鞑虏，而是维护权益、营造和谐。

这是个和平年代，和平年代的和平工作不再是参与战斗、驱除鞑虏，而是维护权益、营造和谐。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有众多女性默默地耕耘于各行各业，做着看似平凡但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没有炫耀没有抱怨，几十年如一日，服务一方造福一方。肖井荣正是众多基层平凡女性中的一员，为维护着现代的“和平”奉献着自己的人生，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工作，我想，

这正是“和平妇女”的可贵之处。

肖井荣是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桥头镇七大份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见到她时她正在镇政府给村民清算退耕还林补贴款。七大份村8个村民小组绵延分布在10多公里的山脚下和丘陵间，气候干燥，全村370余户，1,500多人，各组人均7-13亩耕地不等，和赤峰市大部分农区一样，七大份村民主要以种粮营生，于是水便成为这里关系民生的重要因素。

1974年，时任教师兼村支部委员的肖井荣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那时起，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她这个支部书记一干就是32个春秋。

农村基层的工作琐碎庞杂，从夫妻吵架、邻里纠纷到会议传达、政策落实，1,500多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找她。如果说市县乡镇的干部工作主要是上传下达，那么肖井荣似的村官就是行政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他们从群众中产生，与广大群众鱼水相交，是所有政策措施的真正落实者和群众工作的真正实施者，是整个国家行政大厦的基础，对地方安定和社会和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没有疾风骤雨般的改革创举，只有和风细雨般的细致周到；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普普通通的细琐工作。这就是肖井荣，一个中国农村最基层的普通干部。

665

找水打井 贫水区解水之困

肖井荣上任时，当地归属辽宁省区，七大份村被沈阳地质勘察中心确定为“贫水区”，还是“三靠”型特困村——群众年年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肖井荣跟新的两委一班人很快形成共识：要想脱离贫困求得发展，必须先解决水的问题。

当时镇里也正在选点打井，肖井荣知道后立即跑到镇里，请求在七大份村试打。经过再三请求，镇里终于同意。为了寻找水源，肖井荣同勘探队走遍了全村的山山岭岭。不久，一台重型钻井机开进了七大份村，一个多月后，打了80多米的井终于流出水来。

当时打一眼井包括配套需要资金约5万元。在七大份村的经济条件下，筹集这么多钱，实在是困难。为了筹措资金打井，

她同支部一班人跑完镇里跑旗里，跑完部门跑各户。1975年，通过贷款、集资等多方渠道，终于筹措资金5万元，在沟西小队打出了第一眼深水井。这一口井就扩大水浇地面积300多亩，当年全村粮食产量就增加了40多万斤。看到了收效尝到了甜头，村民们的热情开始高涨，各个村民小组都要求打井。那段时间肖井荣马不停蹄，跑遍了全村的沟沟寨寨。1976年到1978年的3年间，七大份村先后打了11口井，除了上台、下毛泊罗和于家沟3个地质特殊的小组外，每个村民小组都有了大水量的井，基本解决了全村的耕地灌溉问题。到1982年全村水浇地已扩大到1,000多亩，实现了人均1亩水浇地的愿望，全村粮食总产量由原来的50万斤一下子增加到200多万斤。

到2000年，地下水位普遍下降，原来的井已经不能供应灌溉的需求，甚至出现了饮用水危机。肖井荣再次多方筹措，在全村干部群众的支持下，重新打了5口100多米的深水井，埋了6,000多米长的爬坡水管，保障供用。

分产到组 特困村脱贫之路

1980年，七大份村还在吃集体大锅饭，种种抵触情绪开始滋生，偷懒怠工的行为像瘟疫一样蔓延，百姓生活饥寒交迫，这种体制已经走到了末路。肖井荣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

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安徽凤阳小岗村的20户农民以订立契约的方式分产承包到户，第二年获得了粮食大丰收。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安徽省两位农民的来信，题目是“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肖井荣看到报纸后心情久久不能平息，她觉得问题关键一下子明了了，她佩服小岗村农民的勇气和魄力，思忖着七大份村的出路。

1980年年初，肖井荣揣着一份土地分产到组承包方案先后找到镇里、旗里的领导，说明情况，恳切地申请支持。尽管当时中原地区分产承包的方式已在农村大面积铺开，但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领导仍然明确反对这种做法，指出“必须坚决纠正”。所以肖井荣的方案只得到了同情，却没有许可，“这个事情得谨慎，还是观望一下好。”这是她听到的最值得安慰的一句话了。

可是肖井荣并没有一味地等待观望，她回到村里和干部群众

商议，最后，80年春种之前，决定在上毛泊罗村民组进行试点，细分成6个小组，将土地承包到组，分组生产。旗里派来工作人员蹲点观察。结果上毛泊罗小组当年实现粮食自给，不再吃返销粮。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就农村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一下子扭转了乾坤。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中央于1980年9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后，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中国农村贫困的问题，联产承包终成定局。



七大份村成为桥头镇第一个实行分组生产的行政村，1981年全村包产到户，彻底告别了吃返销粮的特困历史。

调解纠纷 不找分管找书记

30多年来，无论村里发生什么大事小情，群众都来找肖书记。大到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小到邻里纠纷、婆媳吵架、夫妻离异，群众都找她调解、解决。仅最近几年，由肖井荣调解的要求离婚的和离婚的夫妻最后言归于好、破镜重圆的就有20多对儿，挽救了20多个家庭，现在他们的日子过得都很好。在很多村民眼里，肖井荣更像一位知心的大姐，有什么委屈愁肠、怨恨心结，都愿意跟她说说，肖井荣也每次都耐心开导、悉心调节，从没有不耐烦过。她细致周到的工作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多年来七

大份村没有发生违法犯罪行为、没有打架斗殴行为，也没有偷盗丢失现象发生，桥头镇 23 个行政村，每年评先进都少不了七大份村，少不了肖井荣。

村民毕文军提起肖井荣，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去年以前，因为生活上的不如意，毕文军开始喝酒，渐渐酗酒成性，妻子多次劝说无效，不知因此吵过多少次，夫妻关系渐渐紧张。去年下半年他感到身体不适，被妻子拉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酒精肝”，妻子以离婚相威胁要求他戒酒，但他似乎已经对酒产生了依赖，欲罢不能。最后被逼无奈，妻子到法院起诉离婚，并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没有了妻子和孩子，毕文军的家里显得空荡荡的，死一般沉寂，这样一个人过了半个月，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他想念以前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觉得因为自己的消沉堕落才把妻儿赶走，才把幸福生活搅乱，想到这里他深感内疚和懊悔。他深怕妻子与他离婚，那样幸福的生活就真的离他而去了。焦虑中他找到肖井荣，请求帮忙把妻子找回来，劝她撤诉。

肖井荣了解情况后，先是对毕文军一顿发自肺腑的批评规劝，然后赶去他妻子的娘家，说明他家里的情况和他的悔意，从感情、孩子、家庭多角度劝他妻子回家生活，最后他妻子提出，只要他戒酒，她就撤诉并带着孩子回家过日子。肖井荣马上返回村里向毕文军说明情况，严正强调必须戒酒，并让他写了保证书，警告下不为例，然后催他亲自向妻子诚挚地道歉并把她接回家。毕文军样样照办，把自己和家里收拾干净后，顺利地接妻子回了家。现在一家人和和睦睦，彼此倍加珍惜，生活过得很不错，养了不少羊和鸡，搞起了家庭副业。

2006 年 5 月 4 日，一村民在车祸中丧生，剩下妻儿无依无靠。经当地交管部门鉴定，肇事车辆为一辆前 4 后 8 大型货运车，而该村民是被车后轮碾过压死的，司机咬定他是自杀行为，不肯赔付，交管部门无计可施，死者家属准备向法院诉讼，但也没有打赢的信心，同时诉讼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肖井荣知道后，先是安慰这妻儿一番，然后找到交管部门，又通过交管部门找到肇事司机，进行赔偿和解谈判。她据理力争，一方面说明死者没有任何自杀迹象和动机，相反一系列事务安排

证明他不可能自杀；另一方面申明，如果进入诉讼程序至少需要3个月结案，这期间肇事车辆无法运营，会对司机造成更严重损失。她连续跑了3天，最后终于达成和解，司机赔付11万元。不但遇难家属和司机双方都很满意，连交管部门的同志都称赞她工作做得细致到位，令人佩服。

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在任32年来，她自己都记不清做了多少次劝架、接媳妇、调解纠纷、争取权益的事情，给村民挽回多少经济损失更是无法估计。每个村民小组都有负责调节的组长，被称为“分管”，村民有什么事通常不找分管，而直接去找肖书记，他们觉得找她才牢靠才能解决问题。

其实在肖井荣那里，你会自觉地放弃用数字去衡量这位村官的“政绩”，你会自动走进村庄户院，端起水杯和那里的乡亲们一起聊一聊这位老书记那些讲也讲不完的故事，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她走村串户看她做些琐碎细致的工作。你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会让你和村民有同样的感受，她哪里是个“村官”，分明就是一位知心的大姐。而她和蔼的笑容、沉稳的语调和厚实的身體就让人有种安全、温暖的感觉。

工作心得 呼吁增加农村基层女性工作者

当被问及这么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感受，她长长地吁了口气，好像是在回顾这30多年的工作史，她说：“感受太多了，什么经历都有过，一时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女同志工作和男同志工作的差别。”

她接着说，男同志通常缺乏耐性、性子急、粗枝大叶，只关心大而化之的东西，不关心细枝末节，作风粗放，在统筹和力气方面存在明显优势，但在细节工作方面显得马马虎虎。另外，男同志办事通常要喝个酒，喝完了要办的事也差不多忘光了。而农村基层的工作就是细琐繁杂，零零碎碎不成体系，张长李短需要耐心，所以在这方面男同志的工作通常停留在做表明文章上。

而女同志恰好发挥优势，既耐心细致又认真负责。她说，女同志责任心强，事情做不完不休息，更不喝酒“惹那么多毛蛋事”，工作不推不拖不出格。“村两委应该增加女同志名额。”她接着说，山东省2002年农村基层女性工作者比例达到20%以上，

北部省份还达不到，2006年农村基层换届选举国家要求每个村至少要有1名女同志，“我看这还是少，有一半是女同志农村的工作就做好了。”

她说出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在广大农村地区女同志参与工作的难度，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上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点在很多人的思想中还存在，“女子无才便是德”和“女人不宜抛头露面”的认识还根深蒂固，妇女还不能走出家庭的束缚，在家庭、社会的地位还没有真正实现平等，男权思想还相当严重。另外就从政的氛围讲，社会上对支持妇女从政的舆论和呼声还不高，对女性从事基层工作的优势还没有足够认识，当然，这正是因为没有给予女性工作展示的机会。

工作团队 两委班子一条心

“找准位置，做好事情，落实政策，不违反原则”是肖井荣经常在支部会议上强调的。七大份村的两委班子团结融洽，服务意识强，多年来从未发生过干群矛盾，在各项工作上配合默契，在群众中口碑良好。

肖井荣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她说：“温总理惠民政策特别多，不落实怪可惜的。”多么实在的话啊！听了让人心头一热。不必询问太多，也可以想见她 and 村两委班子在落实政策上的工作力度。

她的工作原则是尽量杜绝形式主义。无论是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讨论，还是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修改村规民约，都实实在在，针对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和村里的实际情况展开，让党员学习有收获，让村民讨论有结果。肖井荣还特别强调发挥全村27名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事事严格要求、认真落实。

村党支部严格执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财会账目做到日清月结，一季度一公开，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工作透明度极高。这顺应了民意，多年来，全村未发生过一起群众上访事件，连续五年村委会换届选举都十分顺利。

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农村工作就做好了一半。在桥头镇多次优秀党支部的评选中，七大份村党支部都名列其中。2006年6月3日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原支部成员都获得全票通过，村民们

都说：“就用他们，放心。”

经验总结 积极态度防患未然

谈到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肖井荣就一句话：“不等不拖，以积极的工作态度提前介入。”村里有什么事肖井荣总是比其他两位成员提前知道，也通常比他们快两拍采取行动。她就像在心里装着个村庄事务罗盘一样，370 多户每家有什么难处什么动向她都一清二楚。

比如前面提到的车祸事故，如果肖井荣不提前介入进行调节，进入冗长的诉讼程序，对双方当事人都会造成精力财力的损耗，有可能还会使事态恶化。但反观之，这件事情本不是一个村支部书记分内的工作，她完全不必插手，但她就是心里时刻装着百姓，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才让很多损失和不必要的麻烦防患于未然。

这是一个农村基层工作者的优秀素质。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工作。我深深感动于这位普通农村妇女，这里没有耀眼的政绩和光辉的荣誉，但我想，这正是“和平妇女”的可贵之处。她们默默地耕耘于各行各业，做着看似平凡但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没有炫耀没有抱怨，几十年如一日，服务一方造福一方。和平时期的“和平”不再是参与战斗、驱除鞑虏，而是维护权益、营造和谐。肖井荣正是众多基层平凡女性中的一员，为维护着现代的“和平”奉献着自己的人生。

后记

肖井荣任支部书记 30 年所走过的人生经历，有苦也有乐，有坎坷也有坦途，其中滋味只有她自己最清楚。今年 58 岁的肖井荣身体已有多处不适，尤其是血压高，已经影响了她的工作。同时她还伺候着 87 岁的公公，悉心地照顾着老人的饮食、起居，“不然怎么跟别人做工作？”

问她这个工作打算再干几年，她说：“试试看，再干个两三年，不行就撂挑子。”话虽然这么说，但她更清楚，不管是不是在岗，她都闲不住，心里也放不下全村的老老少少。



马庆荣
愿所有人平安

文：尚荣才

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为怜惜老人，团结邻居，以仁爱之心待人，这些在马庆荣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她不识字，但却比我们这些识字的人懂理。

她平日是不怎么说话，因为对一个人的爱是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

一个马庆荣发挥的作用可能看不到，但千千万万个像马庆荣这样的农村妇女，她们的存在却为真正的和平和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像阳光像空气，平凡得不为人知，可没有她们，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谐。

我们都不是伟大的人，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来做生活中每一件最不平凡的事。

——德兰修女

又一次踏上了去马庆荣家的路，从市区出发坐半小时的公交车，下车再走20分钟就能到她家。慢步走在湿润的乡村路上，抬

望眼，远处的高山上的积雪还恋恋不舍地在山的最高峰逗留。这已是初春，清凉的晨风中隐隐有丝丝的凛冽。两旁的小麦地里的麦苗正欣欣然张开了眼，微风和露珠携手为它们洗去昨夜的睡意，抖擞精神迎接新的一天。大自然真是了不起，一草一木都让人兴奋，我贪婪地呼吸着早晨的清新空气，感受着初春的气息，昨日的沮丧一扫而空。

提起昨天，是一个让我灰心丧气的日子，满怀着激情从昆明赶到西昌，一路过来马不停蹄，就是为了采访当地的一个妇女，她叫马庆荣。早听说她在这20多年间，靠自己的微弱之力，帮助了当地的无数穷人，使她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心想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为家乡有这样的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去西昌的车上，我独自静坐窗前，心中一直在想，马庆荣是怎样的一个老人呢，有多高，什么样子，她的家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见面时又会是怎样一个场景。怀着种种疑问和想象，一下车我就急急忙忙地打听问路，想马上就见到这个令人尊敬的老人。

就在当天下午，在一好心村民的指引下，我终于到了马庆荣的家门外，那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子，说是小院实际上那围墙早已破损得只剩下半截矮土坯。带着我来的那人冲里面喊道：“马庆荣，有人来看你了”，只见从厨房里蹒跚走出来一人，她看上去精神还不错，头上戴着小白布帽子，那是回族特有的打扮，腰上围着一个围裙，上面印着几个大字：中国邮政。一眼见到她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完完全全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

第一次见面，还没来得及介绍，她紧紧抓住我的手，久久不能言语，却分明感到她的眼里闪着泪光，晶莹的泪光。我不知这代表什么，我当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说是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她把我让进厨房里，当时她正在做饭，我放下包便去帮她烧火，乘这空儿，我简单地说明了来意，随后便开始询问起她家的基本情况。

她今年已63岁，她有3个女儿，2个儿子，女儿都已出嫁。大儿子也早成家并单独过日子。还有一个小儿子，大专出来后，就在一个小学教书，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平常就只有她和丈夫两人在家。她们家所在地叫兴富村一队，共有51户人家，约300人口，绝大部分是回族（只有4户是汉族），回族都信仰伊斯兰教。

当天下午，我就在她们家吃的晚饭。饭桌上我问了一些马庆荣过去20多年的情况，主要想了解在过去这些年里，她做过哪些好事，得到过那些表彰，在维护妇女权益，争取男女平等上都做过怎样的努力，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交流中我明显感觉到她们没什么可说的事，一问到曾经的事，马庆荣都说没什么可说的。这种交流曾一度陷入僵局，大家都没话可说，我只好以聊天的方式来获取信息，最后还是得出一些概念性的认识。在当地男女平等，都一样地下田干活，没有女人干活而男人休息的情况，一个家庭生男生女都一样对待，男人无端欺负老婆和女儿的事，也几乎没有；这样妇女的权益没有被侵犯，也就无所谓的维护妇女权益了。既然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没事可做，马庆荣老人也应做了不少好事吧，在与马庆荣老人的单独交谈中，也丝毫感觉不到她那做过好事后本应有的自豪感，她没有像我给她展示的那云南退休老人为穷人捐钱，也没有大家可见的修桥补路的善举。这样的结果让我大失所望，我有些泄气了。那她为什么会被这么多的人关注，甚至曾到访过的刘健芝老师也特别推崇她，

为什么呢？我想不通。

就这样，怀着激情而来，满怀失望而走，结束了对她的第一次访问。

此时，我又踏上了去兴富村一队的路，希望这条路能带我通向疑惑的尽头，找到问题的答案。进了村子沿着弯曲的巷子往里走，这次一下就找那熟悉的半截矮墙，我走了进去。不巧的是马庆荣今天外出帮忙了，因为过两天是村里的清真寺的落成典礼，很隆重，有很多外宾要来参观，现在正宰牛杀鸡，而且男女各有分工，不能混杂，我也就不能到她们中间去了解情况。只好就和她丈夫聊聊，想不到柳暗花明，从他的口中我看到的是另一个完全真实的农村妇女的形象。

他们一家共有5个孩子，3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儿子是30多岁了才结的婚，所有的开支主要是他们两个老人出的，为了这件事，他们存了两年多的钱，还卖了一头小牛才够，1,000多元卖的，也卖了一些大米，当时米价是7角钱一斤，共卖了900多斤。好不容易凑了钱来给儿子结了婚。

大儿子结婚后七八个月就分家。这下家里又少了一个劳动力，而且当时小儿子还在读书，未出嫁的小女儿到电池厂打工，后来

女儿也出嫁了。又花了1,000多元做嫁妆。也是卖米凑的钱,5亩多的田全种上谷子。而米此时也还是7角多,又卖了近2,000斤米才够,所种的其他作物只能够买化肥农药和种子。当时的水稻亩产是900斤多一点。

当时正在读书的二儿子花钱最多,初中时每次交钱都是300元左右,到了高中时,每学期要600元,而上了大专则是每次要2,000元。到儿子上到大专,这时他们就得到外面去借钱,等以后慢慢还,一年还一点。那时儿子正在西昌新村读大专,直到他大专毕业后,才算结束了这借钱的日子。在电池厂打工的女儿也把工钱拿一些来供上学。有时还会去马庆荣的姐家借,总之能借的都去借,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在孩子读大专期间,他们最多的一次是借了1,000多,最后也是卖米还上的。大概每年还200元到300元。

现在儿子读完大专出来当老师了,当老师刚开始时每月只有300元,现在有800元了。每年他都会给家里一些钱,去年总的给了500元,用来修牛栏,请人干活时用来支付工钱。儿子还只是29岁,没有结婚。

1999年,最小的女儿也出嫁了,家中就只有马庆荣和丈夫两人。而今年翻新房子,她们自己也花了700多,二儿子出了大部分。虽然也请了几个亲戚来帮忙,但自己也要跟着一起干,村里的简易路也没有通到门,还得运30米左右。所有的建筑材料,像空心砖沙石之类的材料,都得要人去一挑挑地挑回来,空心砖一个大约是40斤,每次挑两个就是80斤,这参与搬运的行列中,当然也有马庆荣在内,比起男人,她一点也不弱。

现在已是60多岁的马庆荣一辈子没生过什么大病,但小病却天天有,听她丈夫说,她经常会感到头痛,腰痛甚至全身痛,经常感到不舒服,都已成了老毛病。平时不严重时也没在意,农村人那个不是如此,照样下地干活,外出浇水回家做饭一样没耽误。但有一次实在不行了,那是2004年的一天,她先是在感冒,有点不舒服,也没太在意,还是下地干活,可慢慢地不行了,头重脚轻,可也只是买了一些药吃。最后实在不行,病情不见好转,这时一向坚强的她才屈服了,到村里的卫生院里输液治疗。

马庆荣很少外出,最远的只是去西昌,那是在2004年和她的姐姐一起去的,也只是去西昌的公园里逛了逛,这也是她出得最

远的一次门。平日也没时间去玩，乡里的集市，她也不去，有什么要买的一般都是丈夫去买回来。她衣着简朴，现在身上穿的衣服还是7年前买的了。其他的东西也是，能用的坚决不换，很少主动想去买衣物。

家中唯一用电的机器，除了那个电话，就是一个老式电视机。那是2000年才买的，当时儿子已出来当教师了，“家中没电视就要去别家看，时间长了也不好”，所以最后商议买一台。于是卖了七八只鹅，当时是11元1斤，卖了700多元，又借了700多元凑足了1,450元，终于把电视搬回了家。看电视也是家中唯一的娱乐项目，可偏这唯一的项目却和马庆荣无缘，听不懂也不会看，每晚只有早早休息。

由于信仰伊斯兰教，马庆荣每个星期五都要去村里的清真寺礼拜。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所以她的行动路线就是简单的三角形，家里到地里和清真寺三个点围成的三角形。但就在这三个点上单调地往返的她，却有着一个天大的心愿。

无法用言语陈述的爱

这是在晚上她回来后，我从她的众多话语中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所有的人都一生平安，身体好。”

说这话时，她神色庄重，像在回答我的问题，更像是在对真主安拉祷告。一个不会“说话”的普通妇女，一个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付出全部的妇女的形象。这一高大的形象并没有在我们之间产生距离，而是更让人感到真实和亲切。

这还不是她的全部，在和马长华（曾担任过清真寺的“阿訇”，管理教务）的交谈中，我深深地感到了她生命动力的源泉所在。

马庆荣，回族人，信奉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使她对伊教规严格遵守，有了这样的信念，就有了“道德底线”（马长华语）。以后不管做什么都不会越过这个底线的，这也是所有伊斯兰教徒应有的一个底线。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为怜惜老人，团结邻居，以仁爱之心待人，这些在马庆荣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作为妇女在对真主的虔诚上要付出更多，伊斯兰信徒每天要做五个礼拜，农忙时也不放弃，有一次家里正晒稻谷，马庆荣在家做礼拜，没有好好晒谷子，为此还受到丈夫的责问，两人之间还产生了一些小矛盾，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可每次他们都以宽

容之心来化解了，因为伊斯兰教讲求的是和谐，马庆荣对此深信不疑。她不识字，但却比我们这些识字的人懂理。

在平日里，马庆荣的为人也很好，有人粮食不够吃，她有的话就会借给人家，而不会想此人是不是还得上。不管是谁，她会一视同仁，小到食盐，大到钱物。只要是她家里有的，都会有求必应。她平日是不怎么说话，因为“对一个人的爱是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

除了坚定的信仰支撑她做了这一切，她的童年经历，也让她对贫苦的人有了道义上的情感。马庆荣出生贫困，4岁时，父亲被国民党抓壮丁拉走，剩下母亲和一位姐姐。为维持生计，母亲出外打工，艰难支撑着。马庆荣年龄稍大一点，便上山摘松树叶去卖；11岁时参加儿童队，协助当地村公所；16岁时，加入农村专业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庭的变故，生活的困苦让她更懂得生活的艰辛。也坚定了她摆脱贫困和帮助别人摆脱贫困的决心。

她做的这些事，村里的人也都看在眼里，但你去问别人时，大家不会觉得她很特别，因为村里像这样仁爱的人还有很多。当晚我就住在马庆荣家，通过一天的了解和感受，此时的我心里平静了许多，马庆荣一个平凡的村民，所经历的也都是平凡的事。一个马庆荣发挥的作用可能看不到，但千千万万个像马庆荣这样的农村妇女，她们的存在却为真正的和平和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们可能是老奶奶了，却都在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撑起了半边天。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力量，像阳光像空气，平凡得不为人知，可没有她们，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谐。

最后马庆荣奶奶还不忘向真主祈祷，希望所有人平安。

我在心也向真主祈祷：愿真主保佑马庆荣奶奶幸福安康，愿所有的农村妇女平安快乐！

后记

我迟迟不敢下笔，马庆荣的事例，她的经历太平凡了，平凡得像一潭水。本人的写作技能也不足以使之变成壮阔的波澜，只能把这一平静的水面呈现给读者。越平静的水面越能倒映出美丽的景色，但愿通过马庆荣的故事，能让人们看到一个平凡人的“润物细无声”的牺牲，看到千千万万个平凡妇女对和平的贡献。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未来掌握在群众的手里。



刘凤兰
叫人感动的平凡农民

文：黑妹

争取做主人；我们的权利不是别人送来的，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要想保护自己的权益，就得主动去争取，不能等。

她在自家房顶上架起了大喇叭，把自己在报纸、书刊上搜集的法律条款、政策条文以及农业科技信息念给乡亲们听。

当我提笔写下“刘凤兰”这三个字的时候，头脑中思绪奔涌。我感觉如此荣幸，有机会亲口讲述她的故事；我又感觉如此惶恐，以我这支笨拙的笔能否真实地刻画出她本人的形象？不管怎样，我都尽我所能，将我了解到的这位普通农村妇女展现给读者。我必须首先声明，我要写的这个人是中国农村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位女性，如果非要说她有什么不同的话，也许就是她比一般人多了那么一点善良和那么一点信念。

儿子的述说

平凡的人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事儿。我从记忆中择取出十件这样平凡的小事儿，列出提纲，准备动笔。动笔之前，我又给刘凤兰的小儿子刘展志发了一封电邮，请他谈谈母亲给他最深印象和最深感触的事儿。他的回信不长，却坚定了我对他母亲的印象，也改变了我的写作计划。他在信中说：“从小到大，妈妈给我的影响最大，关于她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每件事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但要说印象最深的，我还真难以区分。就说一件小事吧，这件事发生在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没觉得什么，可后来我经常回想起来，每每都有很多新的感触。我小的时候正是那个饥荒年代，经常有些三三两两结伴涌进村子讨饭的乞丐。别人家听说来要饭的了，不是把狗拴在大门口，就是赶紧锁上门说家里没人。而妈妈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她总是有求必应。至今总有一幅图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两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蹲在脚地上狼吞虎咽地扒着碗里的饭，妈妈坐在他们对面的小板凳上疼爱地看着他们，一边不停安慰：‘慢点吃，还有呢。’”

乡村“女博士”

刘凤兰，山东省招远市辛庄镇白石柞村人，1947年出生，汉族，初中毕业。父亲早年含冤去世，母女俩受到了种种不该有的待遇，倔犟的母亲带着年幼的她四处奔波，要为父亲平反雪冤。经历了种种磨难，也惊动了有关领导，两年后她父亲的冤案终于平反，母女俩自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她又回到了久违的学校。或许是这段特殊的经历，让刘凤兰从小埋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相信党，相信政策和法律。同时也激发了她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从初一开始她就经常替乡亲们写信、写起诉状，至今她家里还经常有人来咨询法律问题、请求帮忙出主意，因为她是这十里八乡公认的最懂法、最有办法、最热心的人。为此，她被乡亲们亲切的称为“女博士”。

不知多少次，她留远道来求助的乡亲吃饭、住宿；不知多少次，她给前来哭诉的姐妹添衣送物。她探望过失学的孩子，给村

里的孤寡老人送过棉衣、吃食，甚至还给在外面遇到了困境的陌生人垫路费。她承受不住她周围的人身处困苦，经常为别人流眼泪、因为别人的事儿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为别人做事时常表现出一种不顾一切的劲儿。

白石芥村自1982年以来，土地从来没有重新划分过，致使村里有全家7、8口人只有两口人的地，而两口人却有7、8口人的地的状况，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由于村里宗族势力的影响，几届村委重新划分土地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不但土地不均，苛捐杂税还极不合理，即使没有地也按人口缴税。乡亲们怨声载道却无可奈何，很多年轻人都离开村子到外地谋生路，村里大多剩些老人、妇女和孩子，村庄日渐衰落。为了让更多的乡亲知法懂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刘凤兰用尽了各种办法向乡亲们宣传法律和国家最新政策，她把国家政策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贴在自家的墙上，供乡亲们参看，可是很快就被人撕去了；她又把法律条文复印下来做成宣传板，供乡亲们查阅，但不久宣传板被人砸烂丢进了井里；这一次，她在自家房顶上架起了大喇叭，把自己在报纸、书刊上搜集的法律条款、政策条文以及农业科技信息念给乡亲们听。这其中她和她的家人遭遇过种种迫害，她的这些事被《中国改革·农村版》的记者写成文章发表，说她是“用大喇叭宣传‘三个代表’的女博士”。

竞选村委会

2004年11月24日，白石芥村第八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刘凤兰当选为村委会委员。当初她决定参加竞选的时候，很多亲戚朋友劝她放弃，说在这个复杂的村子里会招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连一直支持她的老伴儿也说：“都50多岁的人了，还折腾个啥？还嫌家里麻烦不够多吗？”但她毅然决绝，最终说服了老伴儿，她说：“我参选不是为了当选，我就是想通过这件事儿让乡亲们明白，这村官儿不是天生的，连我这五六十岁的老婆子都可以参选、争取做主人；我们的权利不是别人送来的，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要想保护自己的权益，就得主动去争取，不能等。”

自当选为村委会委员起，她用一个笔记本记录了上任以来的每一次工作情况。其中有一段她这样写：“2005年元旦，新年的

开始，也是我工作的开始，能给村民们办点好事和实事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1）我要争取村委办公室开门，让村民们感到是自己的家；（2）争取村务、财务公开，让村民们知道自己是村子的主人；（3）让村民们知道选票的重要，增强他们参与村务的意识。”

2005年6月初，村长召集刘凤兰等几个人商量秋后分地的事儿，主张机动地以招标的方式分给有意愿的村民，在没有达成共识后约定过些天召开村民代表会讨论。回到家里，刘凤兰连夜拟定了一份在村民代表会上的发言稿，发言稿上这样写道：

“这次分地，就是土地承包法的落实——按法分地。土地是咱农民的命根子，农民承包的土地，既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最重要的生活保障，党的农村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稳定和完善的土地承包关系，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2002年8月29日《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颁布，2003年3月1日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共5章65条，规定立法的目的、调整范围、承包方式和期限、承包地的保护以及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目的就是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咱农民的法宝，也是农村干部做好土地承

包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在农村土地承包工作中，任何有法不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搞法外特权的行为都是法律不能允许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制订坚持以下原则：一是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第四条）；二是规定土地承包要尊重大多数农民的意愿，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第六条）；三是规定在稳定承包的基础上，支持和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第九条）。《农村土地承包法》必将使党在农村的一系列土地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特别是咱村多年来土地的遗留问题非常严重，自留地等主要是没有按照政策办事，我不必细说大家都明白。”

“我提以下几条意见，要在分地前解决，以防增加不必要的矛盾：（1）从长计出发，规划好村道和机耕路及浇水、排水通道；（2）要兴修水利，聘请水利部门勘测、确定位置，规划出土地；（3）终止多年来的无效合同，并研究采取相应合法的处理方式；（4）地面上的附着物应如何处置？料田、树木等，村民都有发言权，自己当家做主，咱们是大家的事情大家办；（5）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让村民们享有同等的土地使用权，保护土地，合理合法地利用土地。”

原则凤兰

村里有个叫刘恒军的汉子，6、7年前曾因为村里人打抱不平而惨遭毒打，落下了个“心瓣膜裂变”的严重病症，为了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留下了债务，但病情没有得到丝毫控制且日渐恶化，刚上初中的女儿刘文娟几乎要辍学。这些年来刘凤兰对他家的帮助已经难以枚举，她把小文娟当作自己家的孩子对待。支农调研的大学生来到村里，她首先把刘恒军家里的事情告诉他们，请求他们为他家想想办法、为即将辍学的小文娟想想办法。但所有的努力都没能挽救住刘恒军的生命，2004年11月24日——村委会选举的当天晚上，他永远离开了妻子和女儿，也解脱了病痛。那天晚上，刘凤兰一直陪着母女俩到天亮，不停地安慰。接下来一连几天，她不停地给母女俩送吃的，有时候放下自己家里的事去照顾这悲痛欲绝的母女，一边安慰一边鼓励，还一边向来过村里的大学牛求助。通过她的努力，《烟台日报》记者报道

了刘文娟家里的情况，有很多好心人资助小文娟继续读书，辛庄中学也免去了她的部分学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这个不幸的家庭。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很多好心人，包括在校读书的大学生，不断给小文娟家里寄钱，文娟妈有些不知所措。她找到刘凤兰，让她不要对村里人说有人资助文娟，说一旦让乡亲们知道会有很多人上她家来讨债。刘凤兰听了很生气，她说：“文娟妈，做人可不能这么自私，人家把钱给咱，是想让咱感受到人间这份真情，希望你们娘俩儿坚强地生活下去。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咱不能让不幸成为咱苟且的理由。”几句话说得文娟妈面红耳赤。

凤兰的苦恼

自从文娟得到众多社会热心人的资助以后，很多本村的甚至外村的村民来到刘凤兰家里，有的向她哭诉不幸请她帮忙，有的向她借钱，甚至有的要她帮忙贷款做生意。刘凤兰苦于应付，她说：“我家不是银行也不是福利机构，又不富裕，我上哪儿去给他们弄钱？”

很多农民搞不清楚，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整天宣传法律和政策，国家一个月发给你多少工钱？”当被告知不发工钱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哪有这样的事儿？不给你发钱你宣传它干啥？这不是有病吗？”事实上，不单宣传法律和政策不发工钱反而还得自己搭钱，她组织文艺活动所需要的乐器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对于类似的事儿，她的老伴儿颇多抱怨，他说：“自从你做这些事，你看看，你都得到些什么？自己搭钱不说，三天两头别人来找，不是要这就是要那，我们得管吃管喝不说，给他帮不上忙他们还不乐意，你图的啥？你说这么多年你过过消停日子吗？”刘凤兰深感对不起老伴儿，这个时候她总是一句话不说，任凭老伴儿唠叨下去。她知道，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伴儿还是会义无反顾地支持她。

农民的梦想

刘凤兰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都是这样琐碎，又都是这样让人不得不感动。她是中国农村妇女的一个典型，一个善

良妇女的典型，并且把她的所学所感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她周围的人。问她的梦想是什么，她想了半天，说：“要说我有什么梦想，就是当一个合格的农民。我上初中的时候在一篇作文里曾经写道：‘我梦想着有一天，驾驶着拖拉机奔驰在肥沃的土地上……’可是，我却一直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很多干部说我整天告状、挑事儿，是个十足的‘刁民’，唉！谁能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呢？”

李春霞
与磨难一起成长



文：李春霞

残疾和阅读让我获得了一个特别的视角。

我为女儿取的名字是李强，自尊、自强，是我生活中最首要的信条。

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我可以成为更多年轻人的“妈妈”，至少是成为他们的朋友。

能够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为他们提供一点指导，不也是为未来贡献吗？

2005年是我人生之中非常特别的一年，发生了两件特别的事。5月份，我得到通知，已经获得了“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8月份，终于完成了我的书稿。

完成的书稿有30万字，是我6年努力的结果，也是我半生心愿所系。这是我在人过半百之后审视自己的人生，有我以高位截瘫的残疾之躯自尊自立的过程，回顾了时代变迁中我的家族、父母、师友、工作和短暂的婚姻，记录了我与女儿共同成长的经历。

残疾和阅读让我获得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既是这个变革动荡的时代的一分子，又因身体情况只能有限地参与其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阅读者、观察者、思考者和记录者。完成这本书，是我这些年来一直盼望和期待的成果。

而入选诺奖则是一个意外。尽管去年填表时已经了解了有关情况，但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可能入选。全世界几十亿妇女才选1,000人，有多少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哪。而我，我太平凡、太平常了，我只是在走我的生存之路。如果说额外的话，那就是因为我有了一个女儿，我要把她教养成人，这是我的责任。然而今年5月份得到通知，得到了自己入选的消息。想想为什么会入选，也许就是因为我的平凡，因为我在平常的日子里尽到了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母亲做人、做母亲的责任。

在残障中自尊自立

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祖居西安，父亲曾在旧军队中服役，1948年我出生时，他正驻守汉中，我的生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七。那年汉中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从母亲的产房望出去，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开得如锦如霞，所以我的名字叫“春霞”。刚满周岁，正在蹒跚学步，一场大病击倒了我，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却落下终身残疾，高位截瘫的我不仅胯部及双腿畸形、萎缩，就连脊柱也呈S形弯曲，想独自坐稳都很艰难。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残疾画地为牢，将我拘在屋檐下的小板凳上，直到六七岁时才学会将身体在两个小板凳间挪动，但当我无比艰难地“走”到院门口的时候，又要面对过往路人好奇的眼神，忍受别人对我的指指戳戳。

但这一切都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我不能和同龄的小伙伴一样上学。不能上学，也就意味着我无法拥有和别人一样的人生，不能得到自食其力的工作，不能自己养活自己。

从小，爸爸就对我疼爱有加，为我治病、为我成长操碎了心，我的倔犟执拗的个性让他忧心忡忡，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我，对家里兄弟姐妹要和蔼，要学会谦卑让人：“你身体不行，将来得靠他们管你养你，你对他们好，他们才能爱你、照顾你。”我听了感到非常委屈：“作为姐姐对弟弟妹妹好是应该的，但我绝不指望依

赖任何人。我虽然腿不能动，但还有健全的大脑和一双灵活的手，相信能自己养活自己。如果养活不了自己，那就是寄生虫，还不如死了好！”听了我的话，父亲竟生气了：“你说话也太绝，不给自己留一点后路。这样对你没好处！”我明白他是为了我好，但心里还是不服气，知道自己离不开人们的帮助和照顾，但这绝不等于依赖，若是寄生在别人身上我宁死不干。

我无缘走进学校，但家里来来往往有许多亲戚家在西安求学的孩子，有小学生，也有中学生、大学生，哥哥、姐姐们给我带来了小学课本和许多书，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学会了识字，囫圇吞枣读了大量的书，从中国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青年进卫军》，还有《古代笑话集》、《警世通言》、《非洲内幕》等书和《人民文学》、《电影文学》、《收获》一类文学刊物。

哥哥姐姐们惊异于我的过目不忘，他们的赞扬更助长了我上学的想法，转眼到了1961年，当时同龄的孩子都该上初中了，我瞒着家人，给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写了一封信，倾诉了自己想上学的愿望。

那是一封改变了我的人生的信，“知心姐姐”将我的信转到了西安团市委。1961年6月27日下午6点，我永远记得那个时刻，在我结束了又一天望眼欲穿的等待准备转身回家的时候，西安团市委少年儿童部的田润德大哥哥来到我面前。田润德是我一生中接触的第一个陌生人，他那低沉、轻快、温文尔雅的谈吐，他那和蔼、稳健、平易近人的神态永远融入了我的灵魂，他是我心目中的幸运之神。田润德大哥哥不仅给我带来了上学的喜讯，还像对大人一样，与我握了手，对我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礼仪，更是一份人格的享受。

为了满足我上学的心愿，《中国少年报》、西安团市委和东厅门小学都做了极大的努力。196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在我家的小院里举行了一个特别的入队仪式，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成了东厅门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学生。这对健康儿童来说，也许是一件极平常的事，可它对我却是盼望已久、来之不易的大事。它是我生命中一个特殊的日子，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它意味着一个残疾少年的命运靠自

我拯救获得的成功，也标志着我的生活将要迈出新的步伐。

为了实现我上学的心愿，学校的老师付出了太多代价，小学五年级是由东厅门小学的老师上门辅导，考入初中，二十一中的老师又上门辅导一年，所有的老师全都是义务工作，我父亲想请他们吃顿饭都不接受。升入初二之后，我开始跟班就读，在同学们的帮助之下，度过了两年难忘的住校生活。

1965年我初中毕业，本想继续求学，那时处在“文革”前夕，阶级斗争抓得正紧，因为父亲有旧军队背景，我继续求学的路被堵死了。从中学的4楼突然回到我家那3间阴暗的大上房，就像从天堂落进了阎罗殿。离开了学校、老师和同学，我感到一种可怕的孤独，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刚刚从梦中回到了现实。我毕业回家的日子正是七月流火的盛夏，但是每每回想起来却都是满目清冷，在记忆中我想不起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只有空荡荡的堂屋和悲凄的我。当田润德大哥哥再一次来到我家的时候，我哭喊出来的是4个字：“我要工作！”

然后，“文革”铺天盖地地来了。曾经给了我最有效的支持和帮助的团市委被冲击，瘫痪了，具体负责我工作的公社党委也岌岌可危。我在动荡、焦虑和恐惧中度过了一年，因为我坚持不懈的努力，柏树林人民公社（是当时城市的最低权力机关，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事处）终于为我安置了一份工作，去西三道巷装订社上班。

这是几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创办的街道小厂，挤在一所四合院两边的厦房里，主要是手工作业，跟理想中的工作氛围相去甚远。说心里话，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在那种环境里工作，一群家庭妇女围着一个大案子，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不时开一些粗俗到不堪入耳的玩笑，屋子里弥漫着浆糊的酸臭味，恍惚高尔基《在人间》里描写的面包作坊。但这毕竟是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啊，我急不可待地赶去报到上班，唯恐因为残疾遭到拒绝。

我收敛了自己高傲的个性和长期阅读中得来的欣赏品位，虚心学习，仔细琢磨手工装订工作方法，结果不但和大家都能和睦相处，技术方面也提高很快。在车间里我最年轻又最有文化，师傅们不管指使我干啥，我都尽力干好，记产量画考勤，凡是动脑动笔的我都有求必应。我拼命工作，和大家同工同酬，甚至还会

在心里暗自算一算，我利用自己能写会算的优势比别人多做了一些什么，就会感到格外欣慰。大家对我也像小妹、像朋友，除了正常的照顾和帮助没有一点怜悯和歧视，这段日子是我在工作生涯中最自如的美好时光。

如果说这段时间有什么缺憾的话，那就是对家人、对给我送饭的弟弟妹妹的亏欠，虽然我也在努力尽自己作为家庭成员的职责，却总感觉弥补不了亲人们对我的无私奉献。我只能在休息日尽量帮家里人多干些活，利用休息时间帮家里人织毛衣做针线活，心中暗暗希望能在此后的日子里回报这份亲情。

但没有想到，我会为自己的婚事伤了全家人的心。

1977年秋，白师傅为我介绍了位盲人按摩医师，尽管他几乎没有文化，我却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结婚可以不再拖累家人，还能够互相弥补。1979年春天，我不顾全家一致反对，开始了自己的婚姻生活。

结婚的时候，我想的是他看不见，我可以做他的眼睛，我走不了，他可以成为我的双腿，期望能够两个人共同搀扶着走完人生之路。当时根本没有想过我们会有孩子，本以为我的身体都残疾成这样了，是不可能有个孩子的。没想到我们结婚后很快怀孕了，由于身体严重变形，加上剧烈的妊娠反应，整个孕期让我痛不欲生，但是现在想来，我真的应该感谢上帝，把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女儿——给了我。

我们的婚姻只持续了2年零7个月，就因教育理念的巨大分歧同意了丈夫的离婚要求，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独自担负起教养女儿的责任。

说实话，离婚的时候我很迷茫：我的路该怎么走？是幼小的女儿给了我答案：我的路就是和她一块走，跟着女儿的成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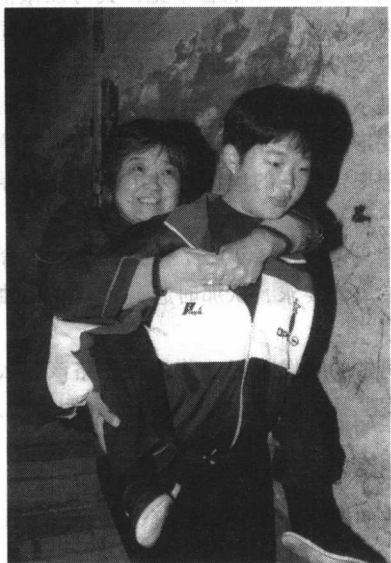
自尊自强 和女儿一起成长

我为女儿取的名字是李强，自尊、自强，是我生活中最首要的信条。

记得《林海雪原》里有这样一首诗：“我们应该赞美她们妇女，也就是母亲。如果没有她们，既没有英雄，也没有诗人！”当时我认为是英雄和诗人造就了母亲的伟大，而在成为母亲之后我

才明白，母亲的伟大是用为孩子牺牲自己的一切换来的，她对孩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从我身边的很多人和事，我体会到要养活一个小孩不算难，但是要教养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好青年，却需要长久地、耐心地、朝朝暮暮地观察、熏陶和教导。

女儿很小就被送进托儿所全托，周末才接她回家，我们母女之间的交流从小就非常好，只要有时间单独在一起，她会情不自禁地把她新学到的本领一点一点地炫耀给我：“小白兔，蹦蹦跳跳……”要不就给我讲各种动物喜欢吃的食物，学不同动物的叫声，把她认为新鲜有趣的事转达给我，和我共同分享她的美好和快乐。看着她天真可爱的动作，让我想到《红字》里的“A”。离婚后我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心里总有一种自卑感，如果有人认为我结婚离婚是一个错误和耻辱，那么女儿就是我面前那个跳跃的“A”，是我错误的结晶、我耻辱的化身，更象征着我的生命和未来，我要像那位受辱的母亲一样，用我的努力，为这无辜的小生命承担一切精神和生活的压力，换得人们对我们母女的尊重。



那段日子是我们家的多事之秋，女儿4岁那年，父亲因脑血栓一病不起，不久，我因人员调整离开了厂子，吃劳保。一方面，我为自己离开集体，提前向单位索取劳保金而感到失落，与此同

时还要面对更加严峻的现实问题。那一年，我只有30多岁，十几年工龄，面对卧病的老父，携带稚龄的女儿寄居娘家，那点劳保工资根本无法满足生活需求，如果连自立都做不到，还提什么自尊和自强呢？

那是一段苦不堪言的日子，我为了生活，四处联系承揽誊印蜡版的业务，后来，买来一台二手打字机在家里靠打字挣钱，我拼命干活，这样一来，比上班时还强些。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个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来我们住在大杂院里，人多嘴杂，女儿年纪小，又好动，经常惹事闯祸，赶上别人心烦了看她更不顺眼，动不动就想训她，女儿却越训越皮。处于那种复杂的环境，我的个性又强，没有少打孩子。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感到内疚，感觉自己就像《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打贾环，不是教子而是在撒气，更显得自己无能。

那段时间我的心里极其矛盾，既恨女儿不争气，又担心不给她因势利导的机会，会使她的性格发展受到压抑，心灵受到伤害。我买了大量的儿童读物，见缝插针给她讲故事，为了让她活泼开朗，也为了给我们母女创造单独生活的空间，只要我手中没有活干，就摇着我的残疾人车把她带出去活动，一旦走出小巷，世界就成了我们母女的天地，女儿像一只快活的小鸟趴在背上唱歌给我听，我则趁机教给她许多小知识，到了公园，鼓励她爬山、过独木桥、荡秋千，还把出行当成培养和锻炼她生活能力和意志的机会，在路上只要遇到上坡就让她下来帮我推车，让她从小就知道，我们母女是在共同应对生活的艰难。

女儿上学后，我和女儿共同的活动增加了一项：玩学习。我们一起把学习当成了玩，我们一起，比赛写字，比赛做算数题，比赛做手工，我还跟着她一起学英语，每天晚上我们母女都是笑声不断。

父亲去世后我们这个家就散了。女儿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工作机会，离开西安来到被认为是中国飞机城的阎良镇，在一家新开办的结晶硅厂做打字员。当时之所以去阎良，就是要让李强离开那个憋屈的大杂院，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能够痛痛快快的，想干啥就干啥，不再像高尔基的童年一样孤苦无依。

一年以后，我却再一次带着女儿搬家，又离开阎良回到了西

安。当时离开是为了女儿，回来还是为了她。在阎良虽然可以自由自在，但厂子面临倒闭，那里的教育质量也太差，眼看女儿就要上五年级了，再不回来就跟不上重点小学的课程了。

我一个重残之人一再搬家，难度可想而知，而这样搬家的经历，却只开了一个头。回到西安之后，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一再搬家，从这个亲戚家搬到那个亲戚家，从农民房搬到过渡房，从过渡房再到农民房，让人欣慰的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李强已经慢慢长大。记得为了联系过渡房，女儿一次次在夜间推着我去找人，时值11月中旬，街道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闪烁着几盏昏黄的街灯，一派凄凉景象。为了壮胆，也为了驱走心中的苦闷，我们唱起《十字街头》里的歌“……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做那怪模样！……贫穷不是从天降，生铁百炼也成钢。只要努力朝前闯，曙光在远方！”唱着唱着，母女两人一起笑了，非但不沉重，倒显得有几分浪漫。

女儿长大了，我愿她生活得浪漫、随意、快乐、开朗，她偶尔去溜冰、游泳、划船，我都支持她，虽然我的经济状况一直都不宽裕，但我们在清贫的生活里照样有自己的享受。

每到考试成绩揭晓，邻居总是很奇怪：“怎么老看到强强和别人一样疯玩，还能考得那么好？”他们只见到李强玩的时候，不知道晚饭后我们母女在做什么。

平日里女儿上学时，我读书做饭干家务，每到晚上，女儿先帮我料理好自己难以胜任的琐事，然后我们就开始共同的学习。为了提高她对学习的兴趣，我和女儿一起学起了中学的课程，每次遇到难题我俩总是共同研讨，这样一来老师布置的作业她从没有落下过。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许多难题全班只有她一个人做出来，慢慢地，女儿对作业里的难题也越来越感兴趣，老师布置的作业里的难题她都有信心在当天晚上想办法钻研出来。

也许是因为建立了和女儿良好充分的沟通，李强从没有为一个重残的妈妈觉得难为情，从她很小的时候就推着我上街，路上遇到同学就大声打招呼，把我介绍给他们。拥有一个这样的女儿实在是上帝的厚赐，一方面我努力用丰富的家庭生活感召她，使她热爱家的环境，同时我也得不断打造自己，提高自己来适应女儿成长的需求。

1999年，女儿考上大学，推着我走进了陕西师大的校门。李强“和残疾妈妈一起上大学”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学校为了在当代青年中提倡热爱生活、乐观向上以及关爱父母和他人的美德，不仅免去了她第一学年的学费，还免费提供了一间住房方便李强照顾我的生活。

师大学生处处长马晓雄说：“许多孩子做不到的事，李强做到了，这对母女的确不容易。她们既然来到师大，我们学校就会管。学费我们免，房子尽管放心住，……希望李强将来还能在这里读硕士、读博士。”

后来，我们母女的故事被报社和电视台介绍出去，社会上的许多善良人读了报道都非常感动，写信鼓励我们母女，并从经济和生活上帮助我们，寄钱资助我们的生活和李强的学习。这些人大多数都来自工薪阶层，是从他们的衣着和伙食里节省出来的生活费接济我们的；有的大学生寄来了他们打工挣的钱；有些解放军战士还把他们的积攒下来的津贴寄来帮助我们。众多好心人寄来的钱有1万8千多元，正好是李强此后3年的学费。

在师大的日子可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没有生活的压力，白天在家扫扫地，擦擦桌子，干点能干的家务，然后就是看书。想看什么书，李强都可以从学校图书馆给我借。

我支持李强住进学生宿舍，不进集体宿舍就不能体验真正的大学生活，她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她一般是用中午时间回来帮我买饭、打水、倒便盆什么的，晚上帮我料理一些琐事后就回宿舍。

结束了大学学业之后，女儿又考取了研究生继续深造，如今，我们已经在风景优美、人文气息浓厚的师大校园度过了6年的快乐时光。

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电脑打字和上网，还交了一批大学生朋友。

这些大学生多数都是李强的同学，参加了班里的马列小组，一开始到我们家来，是为了帮助我，后来时间一长，都成了我的朋友。说起来，能够考进这所西北有名的大学，同学们都是很优秀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一定都为他们的成长付出了很多，但是我惊异地发现，相对于我与李强无话不谈的朋友式关系，这些孩子

的心灵与他们的父母都隔着很远的距离。

这些年来，我成了孩子们的大朋友，他们遇到什么问题都爱来找我，毕业离校以后，还跟我保持联系，写信一写就是三四篇，甚至男孩子交了女朋友，女孩子交了男朋友都带来给我看。

后来我被推举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说实话这让我想了很多，我读过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书，也读过一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人的传记，他们真的都是些为文化事业、为和平，为人类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人，我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无愧于这样的提名呢？以我的情况，要和和平做多大的贡献是不可能的，但是，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未来的较量就是母亲的较量。”作为母亲，就应该为儿女负责，教育孩子，同时也是为社会尽责。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我可以成为更多年轻人的“妈妈”，至少是成为他们的朋友，还可以与孩子们的父母沟通，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与李强一起成长的经验。能够用这种方式帮人们排解一点困惑，能够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为他们提供一点指导，不也是为未来、为和平的贡献吗？

李强进入大学以后，我还开始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

写这样的一本书，与中国青年报记者董月玲有关，1999年她来采访我，她热情、真诚，给了我理解，也给了我支持和鼓励。我们谈到了当时的“自传热”，我认为许多热销作品内容贫乏，不过是“天赋加机遇”，如果我写一本自传的话，一定会沉重得多，也丰富得多。董月玲说相信我会写出一本好书，并在文章里提到了我的计划。她的文章见报以后当时就有许多读者给我来信说，你要写出来自传我们都愿意看，好多妈妈写信告诉我特别想知道是怎么教育孩子的。报纸一发就等于是一种承诺，第二年我就着手干这件事。

写这本书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更是一个回顾和思考的过程。50多年人生，我有幸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半个世纪，不论是我的经历、家庭的命运还是周围的亲朋好友的人生经历，都深深地打下了这个时代的烙印。当我只是想到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觉得是一段自尊自强的经历；当我想到自己和女儿的人生的时候，我想到我所做的不仅是带大了一个优秀的女儿，也是用我自己方式为这个社会做出了一份属于我的贡献；当我想到

所有这些人的人生的时候，我是如此真实地感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处在这个时代中的人，尽管渺小，但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在时代中的位置，让我思考以后怎么办，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生命。

附：李春霞自传后记：

感悟和感激

残疾的一生，使我体味到一个健康人难以想象的人生。疾病夺去了我的自如行动的权利，却使我在特殊的环境中养成了思考的习惯。我意识到自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他人的关怀和爱护，在爱的甘露养育中，我的身心里也承受着无以回报的重负。这次动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把我的一颗心奉献给大家，补偿我对人们对社会的亏欠。

我首先感谢我的亲人，他们在我的残疾生涯中百般呵护却又不怜悯，在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激励的过程中，培养我形成了自立自强的性格。其次是感谢社会，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为我开辟了人生的航线，帮助我经历了一段学生的历程，还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式不断地关心着我。

感谢我的朋友和那些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帮助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以及下一辈的甥侄们，他们在热情帮助我的同时，尊重我爱护我，和我平等相处，使我的生命充满了自信、活力和激情，并且意识到一个人首先要自爱自尊，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爱护和帮助。

我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师大接纳了我这颠沛多年的残疾的学生家长，自从走进师大，我们母女的所有生活问题便迎刃而解，6年来再也没有为房子问题、学费问题和吃饭问题发过愁。使我在温馨秀美的校园里，充满人文的环境中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美好时光。生活在校园里，没有生活压力，还可以自由地读书和学习，我甚至感到自己也像大学生一样享受着人格平等，享受着社会对我的理解和爱护。在和女儿的同学交往中，我感受着他们的青春气息，生命也更有活力。总之是师大给我带来了幸运，它使我的人生又一次地发生了改变，让我走向了一生中的又

一个里程。

感谢《中国青年报》记者，是她的真诚打动了我，打开了我心灵的窗户，让我有了充分的自信，并在报道中逼了我一把，使我完成了自己多年来想着手又没有勇气和信心实施的事情——撰写自己一生的经历。当她采访完走后，我认为作为记者她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我们母女对他来说自然会是过眼烟云。令我吃惊的是她至今还没有忘记我们，以她一颗仁爱的心，在暗中关心和帮助着我们母女，这一点使我不胜荣幸。

我还要感谢我的女儿，自从她来到我的怀抱，我的生存就变得有了意义，有了光明，有了未来。

其实，在每个人的一生中追求的不一定能得到，得到的不见得就能拥有，拥有的也不见得就能保持，人只要一生中能认真地做自己能够并且想要做的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得能够承受，而且不能承受也得承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主人公的一生经历，就生动地阐明了这一真理。他会心安理得地迈进天国的大门。

黄秋香
走上工运的不归路



文：钟秀梅

我跟那些女性争议的却是大家的事情，我们站在旁边，那倒不如我们就听从工会的指挥，我把这个队伍整理起来。

秋香的关于组织的观念其实很容易。比如说，一支筷子一折就断啦！但一把就折不断呀！我觉得一定不能单打独斗，一定要团结大家。

黄秋香她代表的，不是她个人，她代表有意识的劳工，因为劳工局长期就是习惯劳资争议做和事佬，我是他们的绊脚石。

黄秋香介入工会运动时才34岁，1989年的远东化纤事件，引发她走上工运的不归路。黄秋香回忆道：“我的成长过程是在一个客家乡下长大的，家庭也非常保守。我从高中7月份一毕业，9月份就到新竹新埔远东化纤工作。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问同事说：‘你在这里做几年？’那个同事告诉我说他

做3年半，那我就觉得说：啊！他怎么这么有耐心可以做3年半！真的是我的话，就没有办法。没有想到，就发生在我身上。从民国67年9月5号（西元1978年）进去，一直到今天已经迈入第28年，说实在，我觉得有点不敢想象，就是在那个烟囱里头，每天这样子来来回回走28个年头。”

远东化纤纺织厂是国民党搬迁来台后所扶植的上海私人资本，这座庞大的工厂，坐落在位于山区的客家农业镇——新埔的进出口。秋香学生时代，每天都要搭公车经过，这个工厂废气常外泄，空气中弥漫臭味，秋香发誓以后绝对不要进入这家工厂，没有想到，因为孝顺，不忍心爸妈留在老家，那时候兄弟姐妹都到了城市，所以秋香必须要留下来，因为农业出路越来越困难，新埔地区的工作出路有限，许多年轻人高中毕业只好留下在这个工厂工作。

工厂恋情

透过爸爸关系进去远东化纤的头几年，秋香还保有农家刻苦耐劳的性格，根据规定，工厂一年会有特休7天，但是，秋香一直卖命工作舍不得请休。这样的表现，让她在民国75年的时候（1986年）当选单位的模范劳工，后来经过票选为新竹县总工会模范劳工。

秋香分析道：“我今天会岔入工运，除了我自己的个性，就是说我比较耿直，看了较不合理的事情，我可能会跳出来，但是环境也影响了我。”秋香在远东化纤所接触的工会，有心想要为员工做一些事情，工会干部不断地跟外界做接触，其中跟秋香接触的就是工会领导人之一罗美文，在耳濡目染之下，秋香受他的影响很大。

罗美文对秋香一见钟情，秋香甜蜜的回忆起：“我认识罗美文的第三天，罗美文就在走道对我说：‘我觉得，你很适合我的家庭，我决定要娶你’。”可是保守家庭出身的秋香，怕消息传到拳脚师父的父亲那里，腿会给他打断。半年后，罗美文正式见未来老丈人，未来老丈人第一眼看到秋香口中的又老又丑又矮又小的未来女婿，竟然以“罗美文你为什么非要娶我女儿”做开场白。后来，秋香述说着：“我觉得家庭父母管得严吧，所以交男朋友对我

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害怕的事情，都不敢！然后也不敢给家人知道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是说把他当男朋友这样子，只是说他人这样觉得非常好，他觉得对的事情，他绝对会排除万难。即使我们的交往过程，从提亲到结婚，真的碰到很多阻碍，但是他觉得对的，他都会排除万难去做。我就觉得说这个人，不要说是男朋友，应该说会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吧！”

其实让秋香真正动心的，是罗美文在工厂为工人服务的心。民国67年左右（1978年），一个工人一个月才领5,000多块，因为工厂设备较老旧，如果生产线的丝缠带，工人叫做结苞子，它会愈缠愈大就会影响到其他的丝，导致其他的丝会断掉，工人就要很辛苦的重新接头，再严重一点，机台都会全面停机，罗美文会在此时帮工人的忙。秋香继续回忆道：“我就是看到他在工厂帮工人这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在丝厂，那时候如果夹棉厂的穿丝的钉子掉了，就要扣50块，如果说车子走的不顺的话，你一天上一个8小时的班会掉好几十枝也可能，他觉得这个不合理，他做随班保养，他当然反映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他看到那个飞到哪里去都不知道的钉子，工人为了不被扣钱大家都在地上找啊。因为一天上班才多少钱，一枝钉子就要扣50块，很多会飞到地下室，地下室那是暗蒙蒙、都是油，很暗而且空气也非常不好，然后要下去找，但是因为要跑下去找，生产线的事情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他看到同事这个样子，他一定会去帮他找，他觉得一天赚多少钱，一下就要被一枝扣掉50块，他不管是谁，他都会帮他找。”就这样一个值得依靠的人，秋香跟罗美文终成眷属。

从模范劳工到工运流氓

秋香万万没想到，由工人票选出来的模范劳工，后来会变成所谓的工运流氓，她觉得对比很大。“工运流氓”产生的背景是因为从1987年政治解严后，国民党威权式的统合主义的松绑，一方面是外在环境受美国保护政策的影响，要求台湾劳动条件改善与劳基法的立法，二方面内部环境是因台湾劳工意识的提升，要求经济分配的力量升高，所以国民党政府于1984年订定劳动基准法，于1987年将内政部劳工司升格为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处理日益严重的劳资争议的阶级矛盾。

1986年和1987年之间就发生了劳资纠纷，有组织的台湾工人行动在1987年底至1988年春天，如雨后春笋般冒起的“争取年终奖奖金”、“追讨积欠工资与加班费”、“发给退休金与资遣费”等运动，打破了过去国家只维护资本家利益的立场，后来1988年接连发生桃园客运、台铁火车驾驶及苗栗客运等集体罢工、怠工事件，这些运动全面地让台湾劳工权利意识抬头。

台湾工运的转折点是远东化纤罢工事件，远化工会在秋香的丈夫罗美文、曾国煤等人的经营下，有较强的集体意识，也成为国家的眼中钉，因为他们是台湾工运的火车头。郝伯村担任行政院长时，以经济发展为由，祭出“流氓管训条例”，以强硬的手段对付“工运流氓”，并将工运问题治安化，用法律镇压工运人士，将北部工运领袖曾茂兴、南部工运领袖颜坤泉先后因远化和十全美鞋事件被判入狱，劳工运动面临重挫，劳工运动的怒火暂时熄灭。

这段时期，秋香记得罗美文和工党（后来是劳动党）接触很深，罗美文在外所结交的一些朋友，特别是白色恐怖被抓去关的政治犯^①，对秋香夫妻影响也很大，罗美文所接触的朋友完全透明化，可以让秋香了解外面的世界。秋香感觉罗美文之后的生活，是一直做工运的事，秋香坚毅的神情说道：“我就想说：都是做那个没有钱的工作。我心里想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我们的收入也不高，他为什么这样上南下北，他这样协助人家？那协助人家又没有什么回报，车资啊、各方面还要自己掏腰包，后来我就从周遭的朋友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我从以前的反对，到支持，到自己投入，我想这个是我一个转变，就是说见了周遭的朋友都做同样的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之前还没有投入，我自己再三跟他讲过，你只要外面有这些正事，你尽管去做，家里我会照顾得让你没有后顾之忧。我得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样的坚持，我不但支持他，我现在自己也跳进来做这些事情。”

秋香介入的远化罢工有三次，在1988年有两次罢工，1989年正式罢工，在这三次的工潮里头，秋香认为自己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她能够拿起麦克风在公众演说，私底下，扮演女性工人的

① 白色恐怖是指蒋介石统治期间对左翼分子的捕杀与逮捕。

头头。她说：“像第一次罢工的时候，那在中央厂房里头的中央走道，由工会的一些干部号召罢工，很多人响应但是不敢，就是说谁也不愿意走第一，然后就是说靠在边边。因为里头都是女孩子，所以就由我来号召，我跟那些女性争议的却是大家的事情，我们站在旁边，那倒不如我们就听从工会的指挥，我把这个队伍整理起来，这是第一次的经验。我觉得我可能在组织扮演这一方面比较好一点，在三次罢工中，我好像几乎都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担纲的角色

秋香在罗美文让公司开除后，在工会的角色就越来越吃重。秋香回忆：“对！从他被革职之后，由我来领导这个远化工会，我在那一次的改选，也是全场最高票，因为很多人虽然不敢正式投票，还是觉得说我是精神指标，所以几乎历次的选举里头，我就一直担任工会干部，到后来大家都说，公司对于员工就有一些甜头给他们尝，比如说你不吃槟榔，你就会有有什么奖金，然后我们去升旗，就会有一笔什么奖金。其实那时候是有一段蜜月期，那我应该有5年的时间我都没有考绩。”



罢工后，公司告工会17个干部，求偿4,700多万，秋香也

是被告之一，这个告诉最后公司是败诉的。但是对秋香最大的考验是如何整顿工会，因为工会受到一个重创之后，每个人不敢做任何事情，虽然那时候的工会里12个理监事有10个属于劳方，才2个属于资方。秋香的做法是，巩固10个还非常坚定的工会干部，当时资方切断工会跟外界关系，但是工会有共识，就是用自己的假期出去声援外界的社会运动。

另一方面，工会还面临如何不被公司消灭，因为公司要工会成为御用工会，所以从理监事各个击破，手段就是扣帽子，或者是调到经理室，让工会干部跟所有的工人脱离，这样就没有办法去接触工人了。罢工之后，保全有好长一段时间，监视领导罢工人员的举动。就在秋香的厂区内头，警卫监控着当时领导罢工、但还存留在工会里头的人。秋香也受主管指派监控，她度过一段白色恐怖的煎熬，一度想要离职，但是每一次的改选，如果秋香参选，资方都要花费大笔的钱，秋香心想自己存在工厂一天，公司就会更痛苦，所以秋香就坚持要留下来，离职的念头就打消了。

秋香继续帮工人争取福利，不惧恶势力，继续为工人争取福利。后来当选台湾省人造纤维业联合会理事，在那里担任了两届的理事，因为这个会由国民党“生产部党部”控制，没有实质作用，她就离开了。之后，参与自己所属的新竹县县总工会的选举，秋香高票当选。秋香分析自己当选可能是劳动党在新竹的经营，工人推她出来的信任票，再来，她经常去声援劳资争议，获社会大众的肯定。秋香自信表示，她接触了比较积极的工人，会把他们集结起来，然后建议成立联谊会，这就是变成产总的前身。

社会科学谈组织行动，往往谈的复杂又不清楚，秋香的关于组织的干念其实很容易。她说：“我觉得像这个很容易吧！我的想法是很简单啦！比如说，一支筷子一折就断啦！但一把就折不断呀！我觉得一定不能单打独斗，一定要结合大家。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新竹县总工会的理事，每次的县总工会的改选，我一定被头号打压，只要黄秋香，就绝对一定要打压！因为黄秋香她代表的，不是她个人，她代表有意识的劳工，因为劳工局长期就是习惯劳资争议做和事佬，我是他们的绊脚石，对他们来讲，他们是超级不喜欢的。所以你别看我在外面是这么活跃，其实在县总工会，我是很孤独、很寂寞的。”

继续战斗

问起秋香对劳工运动如何反思？她说：“我觉得我的生活非常单纯，我想到的事情就是昨天、今天跟明天，我不会多想事情，所以我经常说，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之前我的生命都是这样子。后来参与这些事务，让我有更多担忧，虽然是更多担忧，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我觉得要是自己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不就这样平平淡淡，然后跟朋友的交往，或是说相处，要说完全没有自己的思考，我觉得也不会受到别人的重视。参与这些活动，让我们有了自己的想法、有思考，尤其在生命当中比较有意义吧！我不会担心我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我只会尽力去做，我能力所及的，我会尽量去做。”

秋香觉得她的领导能力的特质跟她的出身有关：“因为我们是工人出身，我的家庭也是务农，务农还有工人这个阶级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我们自己是工人，我们下一代是工人的机会特别高，我们没有更大的能力让小孩补习或更好的，所以我的下一代也是工人。我们了解工人阶级的困境、问题在哪里，我们要设法去改变它，要不然我觉得这样一直下去，永远都不会改变，所以这是我的想法。”

703

附录：台湾工会运动史^①

解严前

• 1920—1930年 日据时代，劳工和工会介入台湾共产党所主导的抗日为主的民族主义运动。

• 1949年 国民党退守台湾，实施戒严法。

• 1984年 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成立。1984—1988年处理劳资争议个案达两千多件。（劳工法律支援会于1988年改名为台湾劳工运动支援会，1992年再度易名为台湾劳工阵线。1984年劳工运动开始萌芽，1987年工党成立后已正式的政治团体展开劳工运动。）

^① 参考颜菊莹整理的大事记

•1984年8月1日 劳基法开始实施（劳基法实施原因：美国劳工联盟基于美与台的贸易逆差，美国工人失业问题严重，反制台湾大量倾销美国而祭出301综合贸易法案，对台要求改善劳动环境。）

•1986年12月 电信员工王聪松，徐美英分别当选立委、国大代表。（民进党籍默默无闻的候选人击败了国民党籍的工人团体代表。）

•1987年7月15日 宣布解严。

解严后

•1987年8月1日 行政院劳委会成立。

•1987年11月1日 工党成立（劳工阶级为诉求对象）。

•1987年底至1988年春天，台湾各地陆续爆发劳工“争取年终奖金”、“追讨积欠工资与加班费”、“发给退休金与资遣费”等劳资争议案件。

•1988年台湾工运狂飙年，全省共发生近32起的重大集体劳资争议事件。（桃园客运、台铁火车驾驶、苗栗客运等大规模罢工、怠工事件，二法一案大游行。）

•1989年罢工潮，包括几件发生在公营和民营大企业及跨国公司蔓延的罢工，罢工风潮从福特六和、台塑、台泥等公司开始。

•1989年5月 远东化纤事件。（资方、官方联手强力镇压劳工罢工，并开除公会领导人等。）

•1990年5月 官商联手出击展开一连串打压工会行动，台塑仁武厂工会干部被资方非法解雇。社运界合组“反军人干政”联盟，展开反郝行动。郝强力打压社运祭出“流氓管训条例”。

•1992年 北部工运领袖曾茂兴、南部工运领袖颜坤泉先后被判入狱，台湾工运进入冬天。

•1992年11月 工人斗争大游行——工人团结表达对修订中的劳动三法及基客事件一案的关切。

•1996年5月1日 劳工阵线主办顾饭碗大游行。要求通过失业保险法，催生全国产业总工会。

•1996年12月6日 劳基法依体是用修法通过，服务业劳工近300万人纳入保障。

常玉珍
幸福着你的幸福
快乐着你的快乐



文：周丽婷

“我要让各个历史时期的功臣品尝到改革开放的果实，我要让改革开放的果实服务于军人回报于社会，造福人类，不把它作为私有财产传给子女。”

她对孩子们说：“人人都会享受生活，但真正懂得怎样生活的人还需要境界和素质。妈妈给你们留下了一种创业的精神，一种无私的精神，有了这两样宝，保你们踏踏实实过上好日子。”

初秋的上半，木桨划过水面，我坐在养鱼人的木船上横穿河北唐山丰润区境内的邱庄水库，到对岸的山上采访女界强人、常记幸福院院长常玉珍。对于花前月下的年轻人来说，这里真的是个浪漫处所，青松翠柏满山，蛙鸣鸟歌萦耳。但对于已是近60岁的常玉珍，却不是来享受这番山水美景的。这里是她抛洒心血和汗水的又一“人生战场”，将近五年的时间，在吃用都很不方便的情况下，她几乎“厮守”在这里，开山修路，通水通电，和工

人们一起整饬山地，构筑她的常记生态园，哪怕一处细节，她都要亲历亲为。

听人说过，常玉珍有一段很有哲理的自创座右铭：“人是三位一体的结晶，生命受之于父母，营养受之于自然，知识受之于社会，所以我们应当孝敬父母，保护自然，回报社会。”这个为社会公益利用的园区是她人生理念的又一践诺。

换下劳作的工装，穿上干净的红毛衣，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太太站在我的面前。我惊诧：她矮小的身躯里究竟蕴集了多大的能量，不仅让自己的人生绽放出灿烂的光辉，更为社会奉献了许许多多。

她慈祥地问候着我，笑眯眯地对我说，“工人们都叫我常妈妈，你也这样称呼吧。”

“常妈妈，您现在也该享天伦之乐了，为什么不停下忙碌的脚步？”

“就像爬山，过了一道眼前又出现一道，我停不下来。有时候想，老天爷应该给想做事的人增加些时间长度。”她摘下戴着的帽子，捋捋满头花白的头发，自我解嘲说：“我是累到了极点，苦到了极点，也快乐到了极点。”

就在山风的吹拂下，秋虫的飞舞中，我聆听了她人生的悲欢离合，感受到了一个个体生命积极融入社会的伟大与光荣。

她在苦难人生中奋起

1947年，母亲在流浪中把常玉珍生在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东缸么上村。她的父亲是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为躲避敌特工和汉奸的残害，她出生不到20天，就被母亲抱着东躲西藏。对于常玉珍，童年的天空是灰暗的。她清晰地记得那时候很羡慕人家穿秋衣秋裤。因为她家穷四季轮换只有一身衣服，冬天的棉袄棉裤，到春天抽出棉絮，到深秋再填充进去。为了生计，她小小的年龄就开始出去捡破烂。

苦难是对人生的磨砺。

到了“文革”年代，常玉珍更是背负了巨大的心灵磨难。因为父亲是党地下工作者的特殊身份，在“文革”中被冤打成了特务，常玉珍也就成了“狗崽子”。看着一天天挨批斗的父亲，回

到家中跪在毛主席像前忏悔；看着父亲无处申辩无以找回清白的无奈，她说真希望天下有一场战争。父亲没等到平反就去世了。她曾经问病榻上的父亲：“干革命工作最后却落到这步田地，后悔吗？”父亲目光炯炯、语气坚定地说：“我一点也不后悔，我毕竟看到解放了，而有多少同志为了今天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身首都不知何处啊！”父亲临终前嘱咐她：“我走了，一要好好赡养你母亲，她一辈子跟着我担惊受怕；二是不要忘了为祖国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呕心沥血的革命老前辈，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

父亲的遗言铭刻在常玉珍的心中。父亲的乐观豁达也在她心中植下了生命的亮色。她暗暗决定，等自己富裕有了条件，就在家办个托老养老所，侍奉一些老军人，就像侍奉父亲，让父亲的生命在心中延续。

1979年，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像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常玉珍凭借直觉感到摆脱贫困的机会就在眼前。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顾单位领导和亲人的劝阻，毅然决然辞去了供销社的“铁饭碗”，拿出家里的5公斤黄豆和两缸麦子垫本，摸索着卖起了豆腐脑、炸油条。在以后的10年里，她贩玻璃、卖虾、卖服装，最后经营家具和皮货。这当中，常玉珍赔过钱，受过骗，尝尽人间酸甜苦辣：卖玻璃第一车就在路上翻车，卖虾到东北让人家给关起来，24小时连轴转是家常便饭，不止一次边输液边与客户谈生意。但她都挺了过来，因为父亲生前的一句话给她力量：“没有什么困难比献出生命大，咬咬牙就能过去”。因此她的买卖也一步步从地摊做到了商店，从街边做进商场，从给别人承包到自己做老板，逐步发展到现在拥有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的常记商场小山总店、常记家居新华道分店、常记家居玉美分店、常记家居西站分店、常记家居丰润店5个店。

事业成功，经济的改善，让埋藏在常玉珍心底的心愿浮涌上来，她要建一座幸福功臣院，赡养一些在战争年代立过功没儿女的老人。

这个想法遭到了家人的反对。母亲说：“你有钱就供养几个大学生，以后还有个知恩图报。养一些孤老头子啥时候是个头？你真够糊涂的！”4个孩子也是哭着求她：“您从小受苦受穷，好不容易现在条件好了，自己享享福吧，别再给自己找苦吃、找罪受

了，听姥姥的话吧！”

常玉珍则慢声细语地开导起母亲和孩子们：“做人不能只图享受，不讲奉献。想想咱家的好日子是从哪儿来的，是靠什么来的。爸爸走时嘱咐的话我还记着，我要回报国家和社会。”

她的这种坚持付出更大的代价，不能够理解她的丈夫反对她扩大经营，反对他做公益事业，最终两人分道扬镳，常玉珍选择了事业。丈夫和4个孩子走的那天，面对空落落的家，她把所有带声响的东西都打开，痛哭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她漂漂亮亮地化上妆、照了一张照片留念后，继续她的公益事业。

给功臣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1995年6月6日，“常记功臣幸福院”奠基。1996年7月，在唐山市小山繁华商业区，一座占地2.6亩，投资460万元的“幸福院”竣工典礼。在大门两侧，常玉珍亲手写上了一幅“保家爱国尽忠孝，忠臣孝子人人敬”的对联。

这座拥有2,700平方米住房的小楼镶嵌着白色瓷砖，显得格外气派。院内餐厅、浴室、娱乐室、保健室一应俱全。



常玉珍接收功臣的条件是：必须是经市民政局和老干部局等

部门推荐的战争年代立过功、后退伍回乡的孤寡老人。常玉珍在协议书上注明，功臣的衣食住行与养老送终都由她承担。为了找寻这些功臣，炎炎夏日，常玉珍乘坐她那辆破旧旧面包车穿行在唐山市丰南、遵化、迁西等区县的十几个光荣院之间。

7月19日，幸福院披上了彩装。9时，9辆披红挂彩的小轿车载着9位共和国的功臣来到了“幸福院”，他们年龄最大的93岁。常玉珍忙碌地张罗着，她把一只只气球递到老人的手中，说：“气球上有房间号码房间里有为你们准备好的大小96件日用品。从今往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我就是你们的亲女儿。”老人们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

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战功的王贵老人总说，那一天就像是昨天，他推开房门，看见漂亮的红木家具，冰箱、大彩电和收音机，比宾馆还要气派！方便使用的日常用品都备好了，剃须刀、电褥子、电暖气；保温杯、手杖、茶色眼镜，就连指甲刀、掏耳勺、“老头乐”^①也都预备了。

几年来，“幸福院”的老功臣由9位增加到56位，已去世了37位，去世一位进一位，永远保持19位。每人每月除了300元的伙食费外，还可领到300元的零花钱。

一天，常玉珍听说老人们想念牺牲的战友，想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寄托哀思。她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定要让这些打天下的共和国功臣，到天安门上走走看看！”1996年11月11日早晨，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时候，幸福院的老功臣们情不自禁地举起右手，向国旗敬礼！接着，常玉珍又安排老功臣们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新一代英模麦贤得、李国安等相见。看到老功臣们激动的神情，常玉珍说她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2001年是“常记幸福院”最轰动、最喜庆的一年。这年的3月和8月，“闺女”常玉珍给这些最小也是知天命之年的功臣老爸们征婚找老伴。这成为全国数家媒体上最抢眼的新闻。说起征婚，常玉珍说是因为自己的事情触动了她。“我有过失败的婚姻，但我对幸福、美满的婚姻始终抱有希望。2001年5月我通过媒体公开

^① “老头乐”是一种用来挠痒的工具，约一尺长，多以竹子做成，尖端蜷曲。

征婚。结果应征的人很多，那段时间爱外出散步的老爸们也不出去了，都站在院里像检阅新兵似的看着应征者，这个个子不行，那个模样不行，他们一旁议论着。从他们眼神中，我看到了羡慕、遗憾和沮丧。我想，夫妻间的感情是世界上任何感情也代替不了的，老功臣们如果享受不到家庭的温馨，就会留下终生的遗憾。我决定把自己的婚事先搁置起来，开始为老功臣们物色老伴儿。”

一天上午常玉珍把老功臣们叫到一起开会。常玉珍说“你看你闺女征婚好不好？”他们说“好”，常玉珍接着说“我想先给老爸爸们征婚”。突然鸦雀无声。常玉珍说：“我给你们征婚咋不吭声，也不笑了？”一会儿85岁的徐明远老人说，“不征了，养着我就不易。”而另一位老人（已过世）说：“要说结婚谁不想，我们白来世一趟，连个女人的肚脐都没见过。”说完大哭。常玉珍听着心里很难受，她说：“征，哪怕是享受一天。至于花销什么的，你们就甭操心了。女儿既然给你们找老伴儿，就负责给你们养着！”

给老功臣们征婚绝不是儿戏，也不是哗众取宠。常玉珍想到如果这次征婚失败了，对他们是一种打击，会给他们的心灵带来创伤。所以在征婚启事中特别加上了一条：只要跟老功臣结婚，负责养老送终，跟老功臣一样待遇。2001年3月26日《唐山晚报》头版二条发出一条新闻“常玉珍为老功臣征婚”，9位老人的简历公布出来，很快有了回应，幸福院陆续续来了十几位老妈妈。老功臣们因此焕发了青春，顿时年轻了许多。常玉珍为每位老人洗印了十张照片，让老妈妈们选，然后老人们见面接触聊天。最后有八位配对。常玉珍又带着他们到度假村“恋爱接触”一个多月。2001年5月17日，一场倾城婚礼在唐山举行。老奶奶秦若秋对我说：“我第一次结婚时坐的是一头跛脚驴。而这次彩车礼花、化妆婚纱照，就像年轻人。婚后，玉珍还给我们每人做了3套夏装，我到各地做报告时一天换一套，外边的人可羡慕我了。”正说着，老伴张玉田从外边回来，老奶奶牵牵他的手让他坐在床边。

2001年8月16日，幸福院又推出6位老人征婚。两年多时间里，常玉珍先后3次为老功臣们征婚并操办了隆重、热烈的集体婚礼。

老人们婚后也有磕磕碰碰，但更多的是彼此体贴和牵挂。老人王志才和老伴王桂花形影不离，以前爱闹病的王志才在王桂花的精心照顾下，健朗了许多，逢人就比划着说：“我长了10斤肉了。”另一位功臣袁宝林与王淑敏结为连理，一个月后，他带着“新娘”回老家与老哥们相聚，突发心急梗塞倒在王淑敏的怀里，幸福地离世。

目前，幸福院里仍住着19对老人，十多个服务员照料着他们的生活起居。走进幸福院，一幅祥和美好的晚景图会映入眼帘：身着军装的老爷爷，大红大花的老奶奶，或牵手散步、或下棋听戏，生活得悠然安逸。

同样，常玉珍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2002年8月16日，常玉珍和为人厚道，学识渊博，与52岁的太原人石明星结为伉俪。两人3年来携手常记生态园区的建设。在生态园的施工工地，常玉珍曾向老石袒露心声：“对社会我要奉献，对我的丈夫，我要索取。你接受我的同时，还要接受我们这个有着19位革命功臣和14位孤儿的大家庭。你会不会像对我一样地对他们好？如果你能理解我的意思，你会庆幸找到了天下最好的女人。”老石说：“在我眼里你早已是天下最好的女人！”

把爱和呵护送给老区孤儿

常玉珍对老人们体贴入微，一些细小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挂在心上。一次学校的孩子们来慰问老功臣，她发现这些老功臣跟孩子们在一起，一个个变成了老顽童，“幸福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突然一个想法跃上心头：为什么不能认养一些孤儿来为老人们作伴，既为国家减轻负担，又给老人们带来快乐呢？

1997年6月，常玉珍先后把24名革命老区的孤儿领进了“幸福院”，承担了他们的衣食住行和上学的一切费用。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7天、20天、40天。她给大一点的联系了附近的中小学校，安排专人接送。而3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常玉珍聘请了保姆，可太不容易喂养，一周换了五拨。常常是一个闹病，连着另外两个都得上医院。没办法，常玉珍和她的3个女儿开始带孩子，两个多月，她们娘4个顾不上生意，也顾不上吃顿热乎乎的饭菜，白天黑夜的轮流看护，慢慢地孩子们适应了这个新家。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为了庆祝纪念，常玉珍给他们分别起名叫党庆、党港、党归。常玉珍赋予他们母爱。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常妈妈，孩子们哭了她会马上跑来嘘寒问暖，孩子病了她马上送到医院找专家诊病，有时昼夜守候在床边，一口一口地给孩子喂饭，喂药。有人问她，“你花这么多钱，受这么多的累，养活这么多的孤儿你图个啥？”常玉珍坦诚地说：“不图啥，就是想为国家尽点心，为社会分点忧，我看见这些没有父母的孩子欢天喜地时，我也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快乐。”

在孤儿们的房间里，每个孩子的床头都挂着用精美镜框镶着的孩子生身父母的照片。对此，幸福院工作人员小秦给我讲起了这些照片的来历。有一次常玉珍偶然看到一名还不懂事的3岁孤儿拿着生身父母的合影撕着玩，常玉珍一把抢下来，看着照片掉下了眼泪：将来他长大了该多后悔啊！常玉珍说，“虽然他们管我叫妈妈，但我永远替代不了他们的亲生父母”。她吩咐小秦负责为孩子们制作生身父母的相框。为找齐这些照片，小秦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大部分孩子父母的照片是从亲戚朋友处找来的，有的没有合影，就把两张单人照通过电脑制作成合影。

孩子们一天天成长，快乐无忧地生活在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家庭里。清晨，爷爷、姐姐们送他们上学，下午放学回来，他们会跑到爷爷奶奶的房间里问声好，会把好吃的水果送给各屋的爷爷奶奶；他们也会在爷爷奶奶面前折腾撒娇。每年的春节，孩子们天不亮就跑到各屋去磕头拜年，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们都会派发压岁红包给他们。孩子们给老人带去欢乐，老人们也享受到了天伦之乐。李彩方老人乐呵呵地说：“说没女儿，也有女儿；说没孙子孙女，也有；虽没血缘关系，但比亲的还亲。”

当初，常玉珍领养孤儿时也与他们的亲人约定，抚养到18岁成人。如今，这些孩子中一个已应征入伍，一个考入河北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还有两个送到了唐山市凤凰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我去采访的时候，一个学习美容美发的孩子正让常玉珍担忧不已。她说：“这孩子两天没有回家了，正是不知深浅的年龄，这一脚走叉了怎么办，我担心呀。我已派人去找了。”说着，她抹起了眼泪。“这些孩子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你就是他们的亲人，拉扯这十多年不容易。经常给他们开会，不停的劝说，告诉他们要

规规矩矩做人。你听我这嗓子，已做过3次手术了。哎，虽说操心、累心，但我还是要管。”她对我说，她打算在生态园区建个饭店，让学成手艺的孩子们在这里就业。“在我身边，我看着他们放心。”

留一笔精神财富给儿女

凡是对国家、对社会、对军队有利的事，不管大小常玉珍都满腔热情地投入，一个心眼地办好。难怪有人称她是唐山的“公益明星”，有人称她是文明新唐山的“一张名片”。

1994年，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她投资160万元兴建了一座常记戏楼无偿交给唐山评剧团使用。

1996年，她投资30多万元在“幸福院”建立了480平方米的国防教育展室，对青少年进行国防教育，被唐山市命名为“国防教育基地”；1998年，她又在军事博物馆的帮助下，创办了展面660平方米的爱国主义教育展厅，成为商场和唐山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河北省命名为国防教育基地。

1996年，为繁荣小山市场经济，常玉珍先后投资42万元建起两个能够容纳上百家商户的大型批发市场无偿交给当地政府。国家利用这两个市场，3年来收税650多万元。

1997年张北地震，1998年南、北方发生水灾，她先后捐资6,000多元。

1997年7月9日，在风光秀美的迁西大黑汀水库旁，她投资300多万元，建筑面积1,500多平方米的“军人度假村”和“功臣疗养院”落成。在鞭炮声中，常玉珍迎来了第一批前来度假的戍边将士。这些将士都是二等功以上的功臣，他们带着家人免费吃住3天。常玉珍常说：“没有老一辈革命功臣浴血奋战，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没有新一代军人保家卫国，就没有我们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她心中装着打天下的老功臣，也惦记着保江山的一代，每年八一她都到部队慰问。1996年，为纪念唐山抗震20周年，她给唐山驻军送去猪肉、鲜鱼还有9,999元的礼金。10年来共接纳老功臣和现役军人度假疗养23,000多人次。

常玉珍有着浓厚的拥军情结，1996年她鼓励自己的儿子应征入伍。12月18日她正在石家庄，得知12月20日全市最后一批

355名新兵入伍，她立即给商场打电话，要马上赶做355个花环欢送这355名新兵。常玉珍当夜赶回唐山，带领百余名商场职工和幸福院的功臣们乘4辆卡车和4辆小汽车高举“保家卫国，参军光荣”的横幅敲锣打鼓到火车站广场为新兵送行。

相识的、不相识的，只要有难，常玉珍都会尽心相助。1996年腊月，她得知在河北医科大学上学的李媛媛因其母患脑瘤造成家庭生活困难而辍学，于是她先后拿出4,000元支持李媛媛继续上学。她为地震失去腿的郭娜安上了假腿，使她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本商场职工张绍海因母亲早逝，父亲因病不能劳动，家境贫寒，常玉珍出资7,000多元帮他盖了房，还为他找对象成了家。

在2000年1月24日，常玉珍又作出惊人举动。她来到唐山市路南区公证处办理了一项特殊的公证手续，把功臣幸福院和度假村、军人疗养院作为公益事业留给社会。她说：“我要让各个历史时期的功臣品尝到改革开放的果实，我要让改革开放的果实服务于军人回报于社会，造福人类，不把它作为私有财产传给子女。”她对孩子们说：“人人都会享受生活，但真正懂得怎样生活的人还需要境界和素质。妈妈给你们留下了一种创业的精神，一种无私的精神，有了这两样宝，保你们踏踏实实过上好日子。”

如今，正在建设中的常记生态园又是一处公益性质的设施。这里不仅是一个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的宣传教育阵地，还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阵地。一场大型展览正在筹备中。另外，还是一处为失足青少年提供维权、教育和就业的场所。还建起了复员退役军人就业基地、军人蜜月山庄、妇女庇护所。

常玉珍“致富不忘报国、爱心奉献社会”的种种义举感动了社会，党和人民给了她崇高的荣誉：河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曾授予她“爱国拥军模范”、“河北省第一届十大女杰”并荣立一等功。199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拥军优属先进个人”光荣称号；1998年全国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2000年11月被评为“第三届中国十大女杰”；2003年1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年12月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命名为“爱国拥军模范”。2004年被评为全国首届孝亲敬老楷模，

2006年被评为第二届中华慈善人物和中国经济女性年度人物公益奖。

在常年的奉献中，常玉珍总结出自己的快乐定理：幸福在老人们的幸福中，快乐在孩子们的快乐中。她的大女儿艾红说：“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4姐弟深深地懂得了妈妈。我们是‘幸福着妈妈的幸福，快乐着妈妈的快乐’。”



张吕萍

四百多个孩子 一个女人和她

文：蒋子丹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张吕萍的动物救助工作终于得到政府和民间的肯定，国际上最大动物保护机构和基金会也对张吕萍的出色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在眼下的中国，张吕萍几乎已经成为知名度最高的民间动物保护人士，她曾经孤助无援的事业也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知和支援。

我们权且把 1991 年某天当成这一切的开始。

36 岁的张吕萍怀着忧伤的心情躺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手术台上。这一天刚好是她本命年的生日。当然，这些事并没有几个人知晓和关注。那时候，她还没有露出任何与众不同的秉性，甚至没有任何太过特殊的经历。她只不过是众多在改革开放以后先富裕起来的中国公民的一员，也是众多年华正好美貌宜人的妇女中的一位。纵使她的婚史过于短暂，纵使她在下海经商的几年里便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终究构不成太值得琢磨的谈资。用当下流行的话语来概括她的身份和特征，她只不过是一个年轻富有的女企业家。

她是一个在部队营房里长大的孩子，戎马一生的父母给了她一副较好的皮囊，却也给了她果敢的性格。当她还是个11岁的小女孩，就怀揣着全家数额不小的生活费，代表远在下放地的父母亲行使起家长的职责，把3个哥哥一个弟弟的生活起居安排得妥妥帖帖。吃饭吃饭菜管够，想哄骗出一分钱去没门儿。对这样一个人心大宽的姊妹，兄弟们在外边上天入地，回家照样莫奈她何，直到15岁当上文艺兵离开家，她什么时候不是这个大家庭的轴心人物？她好像从来没怕过什么，包括眼下正要进行的这台治疗乳腺癌的大手术，医生告知以实情，她想也没想就自顾自把字签了。那毅然决然的气度，不是大丈夫，也该称之为独行侠吧。

缠绵病榻的日子漫长而单调，身体器官缺失后的痛苦，在日复一日的单调中越来越明显地凸显。恢复期中的一场重感冒击倒了张吕萍，高烧不退让她几度误以为自己八成是上了黄泉路去喝孟婆茶了。不知昏昏然到底睡了多久，醒来时发觉有一个毛茸茸的小东西靠在她的肩头，拼命贴紧她的脸。保姆说，自打她高烧昏睡，菲菲就一直守在床头不离左右，连尿都憋到非撒不可，才下一回地，饭也早就饿了好几顿了。这只叫菲菲的灰色皮毛的俄罗斯迷你贵宾犬，被狗贩子从俄国走私入境，辗转经历了七八个主人以后，传到张吕萍手里。收下它，张吕萍也没有多想，只是觉得它可怜罢了。现在，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反倒来怜恤自己了。顾不得病体倦怠，也顾不得平素的洁癖，张吕萍将这只善解人意的小灰狗搂在隐隐作痛的胸前。是小灰狗菲菲开始了她与小动物一生一世的缘分。

一场病后踩进一个动物世界

那时候，张吕萍并不曾意识到，她不仅仅是把一只小狗拥入了怀里，而是一脚跨入了一个另类的世界。这个世界宛若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地，一不留神你迈了进去，也就没有回头的可能了。不光是张吕萍一个人，几乎所有介入了动物救助活动的人，对此都有大同小异的说法，她们收留一只两只三只小动物的当儿，只看到眼前这个小家伙的可爱和可怜，没想过它们只是流浪动物汪洋大海中的水珠几点，没想过水珠们是可以汇成汪洋大海把深入其中的人生完全淹没。换言之，当这些人面对小动物弱小的个体时，她们感觉到的是一种身为庇护者的强大，而面对小动物的庞

大群体时，她们的感觉就陷入了力不从心与欲罢不能交织的大网里。说后悔，她们不愿意，说无悔，显然也底气不足。在拯救与被拯救所构筑的循环中，一方正在分分秒秒地消耗着属于自己的时日，另一方却以生命个体的接力组成了延绵不绝的索链，把对方引入与她们自己的岁月等长的迷途。

12年过去，她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本命年。

跟当年一个人与一只狗相依为伴的环境大不相同，今日，张吕萍已经收养400多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和猫，她所负有的责任，也就不仅仅是一个非非的去留。为了这几百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居有定所，她卖掉了自己大部分家产，调动了多方面社会关系，在京郊昌平的小汤山，建立一个有着40多亩的范围，十几栋犬舍猫屋的基地，命名为“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教育中心”，以每月近10万元的开销惨淡经营着。为了保证这个中心的运作，张吕萍的大部分生意萎缩了，包括在1989年投资600多万人民币开办的粤菜酒楼和美国某电器公司在中国的独家销售代理业务，只剩下小部分房地产项目还在艰难持续。张吕萍本人的生活更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从1990年中期开始，城区的两处住所对于她已经成了名分上的家，或者是当基地财政紧张需要向银行贷款时最可靠的抵押。

我去过她那所位于北京市中心永久民居保护区内小巧玲珑的四合院。虽然经过多年空置之后到处落满了灰尘，略显寥落和荒芜，但精致的窗棂门扉，宽大的沙发和书案，以及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不算过时的灯饰和用具，都表明着它的主人当年的生活水准和生活方式。院子里一棵合抱的香椿树在晚春应该抽芽的季节，还死气沉沉地将光秃的树枝伸向暮色已深的天空，嗅不到任何与春天和生长有关的气息。张吕萍有些担心地敲敲粗大的树干说，可能是没人给它浇水枯死了。当助手林楠用桶子提了水来浇，她赶紧上前接过去说，还是我来。三大桶水浇上去立即被大树喝得精光，张吕萍仰头看着高高的树梢，半天楞着神不知在想什么。一个星期之后，张吕萍接到四合院所在居委会的电话，说大香椿树长出满树的芽，远远近近的大人小孩都上了她家的房顶采香椿，再不管屋顶踩塌了事小，招来贼人事就大了。张吕萍放下了电话只得立马派基地的小伙子去城里，吩咐他们把香椿苗一次打干净，运回来给食堂炒鸡蛋。然后她对我笑道，看见没有，

什么好东西到了我这儿都成了麻烦。

人们总有些疑惑，什么力量让她这样毫不留恋地放弃了大多数人正在拼命争取的一切？对她的作为，张吕萍或者根本回避对它的解释，或者只能用诸如“上辈子我可能是一只狗”、“上帝派我来这个世界就是来干这一行的”一类玄说，来说服自己也说服他人。同时申明，没有谁强迫我，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人与动物的感情纠结

张吕萍救助动物的初衷，一直被人们用各种推测解释着，似乎非得给出一个合乎理性的结论不可。对人们的好奇心，张吕萍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感。她说，现在这个社会太功利了，只要你做的事情，不能按大众行为逻辑做出解释，就会引出无数莫名其妙的结论，不是说你精神变态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就是说你精于算计等着放长线钓大鱼。我觉得张吕萍行为的种种，说到底只是情感使然，更多理性分析反而会使问题变得庞杂无比纠缠不清。尽管在分析某些事情的时候，人们更崇尚的是理性，但我们完全无法否认，人的情感在许多问题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在某些重大事件中影响过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

资料显示，像张吕萍这样投身伴侣动物保护的人，在中国还有很多，由于个人能力和财力的不足，大都比她的处境更加困境。这类民间动物保护者，几乎百分之九十是女性，其中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出于同情而不是理智——因为跟一只或数只动物的情感瓜葛——开始了她们不胜其重前景堪忧的救助生涯。可以这样说，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从来就是一项感情先行的事情，虽然当事人的境遇各不相同，对动物的感情在倾向、强度和起点上都因人而异。就像一个笑话：养狗的哲学家都说狗有灵魂，不养狗的都说没有。

我以为要关注的，并不是这种感情本身，而是现代都市生活在人与动物的关系方面，究竟折射出多少其实属于人类本身的问题。很可能这些问题，在极大程度上正关乎人们的情感的饥渴和心灵的焦虑。

张吕萍在北京远郊动物收容基地的小平房里，已经住了7、8年时间。眼下属于她的一间15、16平方米的屋子，永远趴着躺着站着跑着20、30只老弱病残的小狗小猫。每天深夜，不管在市区的事务办完后时间多晚，她也要驱车上百公里回到这间小屋子里

去。只要她的脚步声临近，那些昏昏欲睡的残猫病狗们，就堆在门前迎接她，欢快的叫声一直要延续至它们一一都被抚摸过招呼过。我观察过这个时刻的张吕萍，实实在在是被幸福包裹着，抱这个亲那个，乐呵呵忙得不可开交。欢迎的高潮过去，小动物都各就各位，心满意足趴进墙根的一溜筐子，几个病重的小狗，还能在张吕萍的床上赖上一会儿，得了脊椎炎腰里捆着纱布的格格，双目失明的黄毛毛，当然还有常常要发哮喘的菲菲。那只叫宝宝的小花猫是新近才被送来的，暂时还不能送进大猫屋，先在大立柜的顶上安营扎寨。每天晚上要等熄了灯，满地小狗都安静下来，它才敢顺着家具的梯级，悄悄溜到张吕萍的枕头边上来跟她亲近一会儿，一旦小狗儿们有点动静，就噌的一下跑回柜子顶上去了。这些年，张吕萍夜夜与小动物共眠，要是半夜里有哪个受伤的哼哼，或者有哪个生病的呕吐，她都得披上衣服起来照看，甚至要抱在怀里坐到天亮。因此，她所有的衣服、被褥、床罩，时常要用消毒剂浸泡，全都泛白褪色。她曾经是一个有洁癖的人，而现实的生活，她以最大毅力克服洁癖。



这一切让人们包括她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不可思议。跟其他任何一种事业的开创效果都大相径庭，长时间的坚持固然让她得

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但是人们对她伸出援手未必就增进了对她的理解，甚至于她坚持得愈久对她的揣度和传说就愈加五花八门。2002年夏季里的某一天，身体对张丽萍发出了警报，因她本人并不知晓的高血压病，她一头栽倒在地被送去急救，关心她的人就更有理由对她本人前景，对这个靠她独自支撑的基地的前景无比担忧。她的哥哥们警告她，独身一人无儿无女，等老病在床动物们不能来捧汤侍药，总要给自己养老资金准备一点钱吧。她的回答是，我准备的是安乐死。她的朋友们提醒她，是不是该寻找一个异性的肩膀，来分担她的责任和负荷？她的回答则是，谁愿意找一个带着400个孩子的老婆？

这些回答听起来很有几分潇洒，但其中还是透着前途的迷茫、悲观以及对宿命的无奈。但在每次消沉的慨叹之后，她又颇为满足地说，比起那时候，现在的情况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她所说的那时候，指的是她作为违法者私自豢养小动物的时候。

1994年11月，有关部门出台了措辞相当严厉的《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也就是后来在被媒体一再提到的“限养法”。这个地方法规的出台，对不养狗的家庭来说，是件不足挂齿的甚至根本不关心的小事情，对养狗的家庭来说，却是不得不关注甚至是休戚相关的大事情。按这项直到2004年9月才进行了修改的规定，北京市区每个家庭只能喂养一只狗，需要登记注册领取养犬证，首年登记费为5,000元人民币，以后每年注册费为2,000元。被老百姓俗称“狗税”的政府收费项目由此生产，成为多年来众说纷纭的焦点。此外，这个规定的条款中，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市民遛狗的时间只能在晚上8点之后早晨7点之前。

到限养法已经施行了7年之久的2001年，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曾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对此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民近半数养狗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为500元以下，但家养犬只的数量却比限养法出台之前增长了一倍以上，以每年百分之八点二的年增长率增长，结论是以高额“狗税”限制市民养犬数字的目的并未得以实现。因为交不起狗税，不少市民家庭喂养的无证“黑狗”，遇到执法检查的时候，只有3条出路：被执法人员没收，施行“人道毁灭”；设法转移暂避一时；遗弃街头或乡村。

收留救助被弃小动物

张吕萍救助的小动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迅速增长，到了1997年10月，已经达到八、九十只狗。她收养的当然都是无证的“黑狗”，并且收养之后也只能让它们继续“黑狗”的身份，她自己也因此成了一个违法豢养犬只的公民。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她带领着这些非法生存的小东西，在北京城的四郊八乡东躲西藏，一旦发现自己已经在当地引人注意了，立即转移。

那个独自在山坡上看星星的夜晚，张吕萍每每忆及都显出少有的伤感。

昨天的大风已经停止，山区的夜温度却更低了，她坐在小板凳上，看着满天低垂的星斗，又一次问自己，小动物逃亡的路哪里是尽头？扔了它们不可能，带着它们出路在那儿？难道以后多少年就在这山沟里窝着，直到跟它们一块儿死在这儿？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把这件事坚持下去？天是冷冰冰的深蓝色，星星闪着冷冰冰的亮光，没有月亮。张吕萍从心底到身体感到的全是彻骨的寒意，甚至已经觉察不到气温有多低了。她朝着无动于衷的星星们大喊了几声：冻死我呀！冻死我才能一了百了！走投无路的悲怆随着泪水喷涌而出，她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在行善，怎么好生生的就从一个体面的良民变成了“逃犯”。

经过近10年的努力，张吕萍的动物救助工作终于得到政府和民间的肯定，国际上最大动物保护机构和基金会也对张吕萍的出色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被美国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授予“模范动物保护基地”称号，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的主席彼得·戴维斯亲自赴京为中心颁发了姊妹证书，是RSPCA在世界范围内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私人创办的组织。2003年8月30日，张吕萍被美国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授予“动物保护杰出个人奖”。2003年12月，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被北京市政府正式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是，已经过去的那些日子张吕萍无法忘记，更让她无法忘记的，当然还有非典时期的经历。

2003年4月下旬，北京的老百姓已经被非典疫情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天气也助纣为虐，从早到晚阴沉沉的，还时不时下起大雨。坏消息似乎是被雨水浇灌着，蓬蓬勃勃生长出无数

乱糟糟的枝丫。据《北京晚报》的一则报道，4月26日下午，有人在西外大街发现两条无主流浪犬突然口吐白沫倒在路边，西城公安分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在怀疑两只病犬可能感染了非典病毒后，对病犬和周边地带实施了警戒，并进行了紧急处理。犬尸立即被火化，现场进行了严格消毒。另一户已经出现非典病人的家庭中，饲养的宠物狗也出现不适症状，有关人员怀疑它也已经感染非典。

第二天，北京市公安局向下属各分局局下达了《关于对可能感染非典病毒犬只进行处理的通知》。中心任务只有一项：灭杀。两只因不明原因倒在路边的流浪犬，导致了全北京城的猫狗劫，然后又由首都波及到其他被非典困扰的城市。

街头的流浪动物明显增多了。在菜市场或者垃圾桶这些有可能找到食物的地方，那些肮脏不堪的小灾星们饥不择食，争抢可以果腹的任何东西。张吕萍的收容基地猫和狗的数字急剧上升。朋友送来求她养的，动物主人抱着绝处逢生的希望摆在大门口的，好心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捡来的，更有一些是她自己开着车出去收的——从动物医院，从小区物业管理处，还有高速公路的车流里。这些可怜的家伙，不是病着就是有伤，个个惊恐万状，对接收它们的人既深有戒心又满怀期待。看着它们，张吕萍真不知道该怎么办。400只大呼小叫的活物，天天要吃要喝要治病疗伤。动物主人所有的伎俩，在她这儿都无法施展。不可能把它们转移出去，没有任何地方容得下它们；不可能让它们集体安乐死，既然把它们救回来，就是希望它们活下去，而不是死在自己手上；不可能再一次遗弃它们，她一分钟也没有忘记自己活着是干什么的。抢购了大量食品药品，给每个员工注射据说可以预防非典的胸腺五肽，谢绝了最铁杆的志愿者前来探望，张吕萍给收容基地的大门加了大锁，打定主意跟与这四百只落难的小动物同舟共济，死扛。等到这一切都成为往事的时候，张吕萍说：我算是亲身体会过精神崩溃是怎么回事了。我最害怕的事，是几百双无辜懂事的眼睛全都盯着我，而我自己完全束手无策。

在眼下的中国，张吕萍几乎已经成为知名度最高的民间动物保护人士，几十家主流官方媒体轮番对她进行各种形式的采访，她曾经孤助无援的事业也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知和支援。但愿她今后的路越走越宽，再也不会被完全束手无策的心情所困扰。



丽君

『为着团仔，
咱就爱牺牲啊！』

文：庄妙慈

我今天会站出来，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背后的100多名姊妹站出来……

她有一份可靠性工作养活自己的自尊和自重……她经常挺在队伍的最前头……努力的“拓荒”，在面对外界的歧视和误解时，站直了身子，为大家辩解和澄清。

问丽君后不后悔从娼，她不假思索：“没！光明正大、不偷不抢、不拐不骗，我有能力给我的团仔和别人一样……”

荒野大镖客

1999年3月28日，公娼1年7个月的抗争终于走到了终点，赢得了缓冲两年。然而，3月28日那天，公娼姊妹在文萌楼前举行最后一场记者会时，心中除了喜悦的情绪之外，却别有一份感伤，这份感伤不是来自别的，正是在抗争里替大家出力最多

的副会长，丽君，在抗争结束前夕，发现罹患了乳癌。

在抗争的500多天里，丽君曾参与40、50场座谈会、媒体、小区卖书、街头演戏，平均每10天就有一场，她对抗争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更令人佩服的是，她参与抗争付出如此大的心力，并不是为了她自己：

“我今天会站出来，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的会钱^①、房贷都刚好在废娼前缴完了，我也50多岁了，再做也不能做多久。可是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幸运呢？所以我是为了我背后的100多名姊妹站出来，她们都还有孩子要养、有沉重的房贷要付，你（台北）市政府这样两天就拿掉我们的工作，她们以后能去哪里？”

就因为认为自己在经济上已经不像其他姊妹负担如此重，比别人更有条件付出心力，同时，她有一份可靠性工作养活自己的自尊和自重，于是她经常挺在队伍的最前头，像是荒野的大镖客，努力的“拓荒”，在面对外界的歧视和误解时，站直了身子，为大家辩解和澄清。就像抗争初期，她也会邀协同抗争的组织工作者跟学生，“你们来我家看看嘛，你们一定都没有看过一个公娼的家是怎样，其实我家跟别人还不是一样普普通通，也没有比较奢华……”

是的，她就是这样，永远在她认为“我应该……”的地方，扮演着她“应该”扮演的角色：出席联合国在菲律宾举办的“亚太爱滋会议”，连陪同翻译的工作者都快睡着了，丽君依然精神抖擞；抗争期间大家怕上媒体怕曝光，她戴着墨镜依旧在摄影机面前侃侃而谈；也正是这种负责任，虽然她早发现乳房有硬块，却因为抗争尚未结束，她不愿让大家分心为她担心，于是拖到缓冲结束才去检查，当时，已经是第三期了。幸亏，开完刀后情况良好，否则，这场抗争真的负她太多。

事实上，丽君为弱势、为集体的、从阶级出发的对抗性，并不只是在公娼抗争上促使她上前，抗争结束后，她一面做乳癌治

^① “会”，是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非正式的民间储蓄互助组织。

疗，一面仍然不食言的到女线^①、日日春^②来帮忙。甚至，有一天早上，她还打电话给我们：“你们没有去无壳蜗牛^③的抗争吗？”“有啊，不是前天晚上吗？”“喔，我现在才看到电视，我还以为他们是现在跑去街头呢，我本来发烧好几天，今天好了，我还想出门散散步，去他们那里帮他们加油呢！”

除了身为抗争队伍里的勇将，丽君也是一个照顾大家的好妈妈，总是悉心照顾年轻的组织工作者和学生。抗争里，经常早上9点半在市府门口集合时，会看到她拿着新鲜的三明治准时出现，然后一一问大家吃过早餐了没，总是盛情的拥抱、挤眉弄眼的微笑，驱走冷冽的空气。对晚辈总是相当疼爱，有一回大伙一起去乌来洗温泉，她会教大家：“呐，清洗阴道要这样这样……”

这就是她，一个朴实、勤俭，总是坚持做好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的公娼妈妈。

洗衣烧饭、饲鸡饲猪样样来的童年

丽君一家靠山吃山，在台北县的山区，以种竹笋、种茶为生。吃番薯粥，配番薯叶，是很平常的事，偶尔猪油拌饭加酱油，就是很丰盛的一顿。丽君是长女，4、5岁时，失去了母亲，和父亲、阿公3人在山上相依为命。

后来，亲友以“家里不能没有女人”为由，介绍了一个来自宜兰的女人给丽君的父亲，并住进了她们家。二妈为丽君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丽君年纪小小便背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8岁我就会煮饭，每天醒来睁开眼睛就要捡柴，背着弟妹，洗衣烧饭、饲鸡饲猪样样来，很行的！偶尔作团仔工^④，才有钱买衣裤。”

丽君形容着当时生活的困苦：“小时候拢嘛是赤脚，没穿过布鞋，不识布鞋生作啥米款^⑤直到14岁，才捡了一双亲戚家里不

① 女工团结生产线，成立于1991年6月，为从事女性劳工运动的团体。

② 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是一关注性工作者权益的团体，成员包括学生、性工作者及许多其他人。前身是台北市公娼自救会、大同区公娼自治会。成立于1999年五一劳动节。

③ 无住屋者。

④ 童工。

⑤ 小时候都是打赤脚，没穿过布鞋，不知道布鞋是什么样子。

能穿的布鞋来穿。”

丽君的二妈与前夫本来就育有一子一女，还有一个童养媳，曾经来山上住过一段时间，丽君目睹二妈的差别待遇：“自己生的都不打，不是自己生的就打得狠，还故意挑洗澡时脱光衣服才打！”令丽君非常忿忿不平，有一次看不过去，出来阻拦，二妈竟然连丽君都打。这个经验对丽君影响很大：“所以我很反对孩子送人，够卡安呐艰苦，嘛爱自己养。^①”这也是丽君日后做单亲妈妈时不管再怎么辛苦，也要自己养小孩的原因。

贫苦家庭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也同样出现在丽君的原生家庭中。“阿公阿妈常说：查某团仔读册要作啥？^②还不是要嫁人，在家煮饭、带孩子。”丽君对于这样的性别歧视所带来的不公平，并非逆来顺受，只是习以为常，也无力对抗。而且对丽君而言“哼！破病都没人顾啊，哪还会想到要读册！^③而且要走一个多钟头才有学校可读。”念书这个名词从来不在丽君的脑袋中闪过，更遑论读书的欲望了。

16岁那一年，丽君第一次离开山上，在大姑姑的介绍下，去军人家中帮人煮饭，这是丽君第一份工作，使用的就是她在山上生活的基本能力。

“为什么没有到工厂去？”

“有啊！卡早当时很多查某团仔拢到工厂去做，山上的茶拢没人采，所以后来都没种了！我嘛曾到过工厂，在泰山、新庄地方，纺过纱，但是咱脚手太慢，太过饭桶，做不来！”^④丽君自嘲地说。

18岁那年，父亲再娶，后母生了3个弟弟和3个妹妹。同一年，丽君因为急性盲肠炎开刀，回到山上静养。之后便没有再外出工作。“一方面厝内需要脚手，加上我阿爸、后母嘛好有3个人

① 不论日子如何艰难困苦，也要自己带孩子。

② 女孩子读书要做什么？

③ 生病时都没人理会照顾了，更别说让我去上学。

④ 早期很多女孩都到工厂去工作，山上的茶都没人采，所以后来没种了。我也曾到工厂做过，在泰山、新庄等地方纺过纱，但是手脚不够利落，比较笨拙，做不来。

在做，一方面嘛没人再介绍。”^①

这就是丽君的少年时代。

面对不幸福的婚姻……归去离离咧……

长大的丽君，自然开始面临攸关男女的婚姻大事。当时是民国 50 几年，虽然也有人自由恋爱结婚，不过丽君还是经过传统的相亲跟丈夫结成婚配。丽君 22 岁嫁人，婚后与公婆住在一起，并生了两个孩子。

由于丽君丈夫家里是属于过去很富裕，但是后来因生意失败而家道中落的典型，在这种环境下，丽君的丈夫虽不是什么纨绔子弟，却也无一技之长。丽君形容：“没一项专长啦！跟人合伙做生意拢失败，没一项做得起来！还好，厝是自己的。”所以，虽然生意没成功，但还好还能维持温饱。

十几年的时间，丽君就在家带小孩，当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偶尔，她会到丈夫开的餐厅去帮忙，却被嫌帮倒忙：“乎人嫌说拣菜拣的太干净，没通呼吃！”^② 丽君又再次自嘲。

然而，好景不长，先生开始不回家，而且越来越离谱，有一次一出去就是半年，也没拿半毛钱回家。小孩念书需要学费，丽君拿了一条链子去抵押 8,000 元，再向朋友借了钱，才勉强撑过。外面都传说丽君的先生有了女人，不过就跟大多数的男人一样，丽君的先生并不承认外遇，到有一次被丽君在街上撞见，先生还在辩解，“一开始我嘛无疑误^③，后来是要求他‘人哪没回来，钱也要拿回来！’”，丈夫不拿钱回家，丽君过着向人借钱的生活，为了孩子的学费，婆婆帮忙借钱，却被公公骂鸡婆，说这是年轻人自己的责任。丽君心想：“没错，这是少年人的责任，但是不回来的是你儿子，不是我，现在却不怪儿子怪媳妇！”

至此，丽君看破这个婚姻，心想既然不拿钱回家，也不要再和丈夫纠缠，“归去离离咧……卡清心，卡快活！”^④ 于是，丽君

① 一方面家中需要人手，加上我父亲、后母，正好有 3 个人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人再介绍工作了。

② 被嫌弃菜挑得太干净，赚不到吃饭的本钱。

③ 我也没有怀疑。

④ 干脆离婚，比较不会因不幸的婚姻而陷入无止境的烦恼。

主动向先生提出离婚。离婚后，丽君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夫家。“一个查某人带着两个团仔，没有存钱，要付房租，孩子要读册，干嘛没留个半仙钱……”^①面对人生巨大的挑战，丽君用一贯平淡的语气述说着。

“当时怎么那么大胆敢带着孩子，孑然一身就出来了？”

丽君用一句当时听过的简单俗语回应：“有听人病死，没听人饿死”。当时的丽君可能没想到，日后她会为了生计的问题而被迫从娼。

背着单亲妈妈的重担作私娼

离婚后，由于二姑的收留，丽君并没有立即面临现实生存问题。

丽君带着两个孩子暂时寄居在二姑家里。丽君到别人家里帮忙煮饭，一天两顿饭，一个月工资7,500元，省下了吃饭和房租的钱，这半年多，让丽君有了一些积蓄。

但是，寄人篱下的日子终究不能长久，二姑的孩子开始有意见，丽君也不想为难二姑，于是，带着两个小孩搬离，自己到外面租屋。一个月6,000元的租金负担，以及两个孩子的学费，让丽君开始入不敷出，不到3年的时间，便坐吃山空、花光仅有的积蓄，这时，生活的压力开始来了。

丽君开始尝试自己创业，摆路边摊卖小吃，但是，做了两次都不成功，那些工具、碗筷到现在都还在丽君的家里摆着。“后来，听人家讲才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头路，有一个算命仙告诉我，我就是不适合生炉火的行业。”丽君用这种宿命论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她做生意失败的原因。

自己创业失败了，也曾试着找头路。在亲友的介绍下，丽君到一户人家去做打扫家里的工作，却遇到一个俗称“坏头家娘”。她对丽君工作要求非常严格，每件家具、物品都要擦拭干净，甚至检查有没有用菜瓜布刷过的痕迹。丽君不仅要去做打扫清洁同时也要兼洗衣服。这样一天工资150元。

^① 一个女人家，带着两个孩子，没有存款，要付房租，孩子又要上学读书，先生也没有留给我半毛钱。

“不曾剃头，就睹着胡须仔！不曾做过头路，就睹着这款头家娘！当时的心情实在没地方讲起。”^① 这是丽君对这次工作经验的形容。

然而，即使丽君再怎么努力工作、忍气吞声，仍无法维持家计。

一个年近 40 的中年妇人，不识字，带着两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小孩学费一期将近 4 万块，一个月的房租就要 6,000 元，一个家庭打扫兼洗衣的工作，就要耗掉半天的时间，所以她顶多只能做两份工作，一个月收入才 9,000 元，“剩下 3,000 元能够作啥？”

对丽君而言，在娼妓还在社会里蒙受这么重的污名时，做公娼当然并不是为了这钱赚来容易、轻松，“细汉割稻仔的艰苦代志拢能做，为啥米未当吃苦？只是生活没够用啊！我不识字，嘛没功夫，只会煮饭、洗衣，能做什么其他的头路！”^②

“当时，有钱借到没钱，最后连 300 块都没块借，孩子学费就要三四万块，是要去叨位借？也没留半仙钱。想说巴肚都顾不饱了还顾啥米面子，但是又想到熟识的怎么办？为着这件代志，我想很久，想着就很歹势……”^③

虽然当时听说可申请公娼牌照，但是丽君几度在公娼馆前徘徊，就是不敢鼓起勇气进去，因为公娼馆都是门户洞开，灯火通明，从外面看人看得很清楚。丽君怕做公娼容易遇到熟识的人，于是选择了到万华当私娼：“门是半遮掩的，比较看卡没……”^④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40 多岁、不识字、没有一技之长、又

① 从未帮人理过头，一做就遇到个大胡子，从未受雇，一做就遇到这样的老板娘。当时的心情真不知从何说起。

② 小时候，像割稻这样的辛苦工作我都能做，我哪会不能吃苦？实在是因为所得不足，生活难度啊！我不识字，也没有专长，只会煮饭、洗衣，还能做什么其他的行业？

③ 当时四处借钱，到后来连区区 300 元都无处可借，孩子的学费就要 3、4 万元，要到哪儿去借？先生也没有留半毛钱。于是，我想连肚子都顾不饱了，还顾什么面子问题？但是又想到，万一遇到熟人怎么办？为了是否要从事这个行业，我左思右想，困窘不安，十分为难。

④ 门是半遮掩的，比较看不到里面。

带着两个孩子的丽君，只能在“到这个时阵，是爱顾肚子还是顾面子？”^①的现实考虑下说服自己从娼，用身体来赚取丽君与她的两个孩子在这个社会生存的机会。

“为着团仔，咱就爱牺牲啊！”^②语气中透露着些许无奈，但却也令人动容。

我觉得公娼卡有保障，卡安全

刚到艋舺做私娼，“当时，一天做1,000多元就觉得很好了！但是，好景不长，被警察抓到两次，被抓到第二次时，派出所里有一个送公文的人告诉我：‘你不可以再被抓第三次哦，不然就要被关半年！’”丽君语气仍然平和、缓慢。

“我惊一咧，心内想怎么可以被关半年？我每天五点下班要回家煮饭给小孩吃，我不可以被抓去关！”^③，于是丽君开始打听，有没有可以不被抓的方法，有人告诉她，如果现在单身，可以到公娼馆打听看看。

虽然申请到公娼馆当公娼，需要拿户口簿证明，等于公开曝光自己的从娼，相较于之前的犹豫，对丽君而言却是值得：“后来我觉得公娼卡^④有保障，卡安全，觉得较安心，有定期的健康检查，身体有保障，遇到歹人客^⑤，叫管区^⑥来处理，随时有人保护。”

作为一名公娼，对于婚姻制度带给女人的桎梏，丽君倒有很“传神”的描述。

“做公娼都是艰苦的查某人，不是死尪、就是离婚，我们里面嘛有曾嫁乎警察^⑦，你讲警察是不是最好的饭票？结果还不是吃

① 到了这个地步，是要顾填饱肚子还是顾面子？

② 为了孩子，我们就必须要牺牲。

③ 我心里一惊，心想被关半年还得了，我每天5点必须下班回家煮饭给孩子吃，我千万不能被抓去关。

④ 比较。

⑤ 遇到坏客人。

⑥ 辖区警员。

⑦ 做公娼的都是苦命的女人，不是死了丈夫就是离了婚，我们当中也有曾嫁给警察的。

喝嫖赌样样来！不拿钱回家，只好作私娼，离婚以后才转入来做公娼。”

丽君觉得这个社会如果真的要拯救女人的话，应该去救那些被婚姻暴力所害的女人，而不是公娼。“我们很自由啊！可以挑客人，遇到歹人客，管区会来保护我们，如果嫁奘，哪有这好康？”^①

一个人没走到那里时，唔知影那个过程是怎样的艰苦……

原本丽君也是打算房子贷款缴完，会钱纳完，再做个两年就不做了。不料，台北市政府却在此时仓促废娼。“但是算起来我卡好运，贷款刚刚缴完，1986年（1997）9月4日废娼，最后一个会钱刚好在八十六年9月20日纳完，所以，我卡有时间出来抗争。”丽君借此说明出来抗争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128个姊妹及她们所背负的家庭。

为什么要喊“缓冲两年”？这是一个很多人心里的问号。

“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巢，我们不是做大生意的人，起会跟会^②互相帮忙，是很正常的，结果台北市政府不到40小时就宣布废娼，本来收入和支出都算得好好的贷款、会钱怎么办？更甭说还有多少人要吃饭！”

丽君说，有的姊妹来向她诉苦：“我连房租都缴不起了，怎么办？”这位公娼姊妹是个原住民，带着两个小孩，一个念国中，一个读幼儿园，最后她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对这个社会表示抗议。还有一位姊妹，家里有3个生病的人要照顾，包括父亲和哥哥，“健保^③也不是不用钱，有很多是要自己负担的钱，因为废娼没收入，这一年来，3个人都死了！”

说到这一段，丽君一反被访问时的常态，平淡的语调突然哽

① 我们很自由啊，可以挑客人，如果遇到不好的客人，辖区的警察会来保护我们，但是如果嫁人，遇到不好的先生，哪有警察会来保护我们那么好的事。

② 参考注释。这种储蓄互助组织是由几人发起，发起此一互助储蓄活动，称为起会。愿意加入称为跟会，参与者必须按月缴纳储蓄金，称为会钱。

③ 全民健康保险。

咽了起来：“一个大男人都担不起的责任，今天叫一个查某人要担这个，我很佩服她的勇气！”，丽君所指的这位姊妹，因为要照顾家庭，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抗争行动。

丽君举这位姊妹说过的话来形容很多公娼的处境：“我敢搁走得落去？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①，但是，丽君并不怪她：“我觉得她的选择是对的。”



“我觉得还有一口气替众人说话，就感觉很光荣，谁都不喜欢这款曝光，乎人家吐口水。”^②这样理直气壮的话，在丽君的语调中仍是平淡的。

不过对于那些辱骂公娼的人，丽君有着她另一番的诠释。

丽君觉得这个社会很多骂人的人，都不经过大脑。“我嘛是希望出世在有钱人的家里，当有钱人的查某团仔啊！但是，一个人没走到那里时，唔知影那个过程是怎样的艰苦……”^③

① 我怎有办法走上街头？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啊。

② 谁都不喜欢这样曝光，被人吐口水。

③ 我也希望生在富有家庭，当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啊，但是，人没有走到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境地时，无法体会走上这条路的过程有多艰苦。

“像那天去菜市场找阿扁，被人家笑说这么老了还出来上班，其实，我会替这骂人的人觉得歹势，他们的子孙要行到什么路还不知道，人在还没死之前，后壁要出啥米代志拢不知咧！”^①

回首来时路

问丽君后不后悔从娼，她不假思索：“没！光明正大、不偷不抢、不拐不骗，我有能力给我的囡仔和别人一样，囡仔念书不用向别人借钱，能读到五专毕业，没饿着，想和同学烤肉也能去，买了一间厝，虽然没盖美，但是有三间房，嘛很温暖，不用缴房租，这就是生活的改善。”^②

也许这是丽君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感，她完成了做母亲的使命，把孩子像正常人家的孩子一样养大。

走过这样的历程，再回头问丽君对结婚的看法。

“没结婚当然好，依我看，现在这个社会，一个人最好。本来跟你困同一个枕头的人应该是最亲的，但是嘛是最有可能直接威胁自己生命的人，一个人卡自由，也可以到处交朋友，当然目精要金，哪没……捡到林投、竹刺也很惨。”^③没想到丽君的想法如此开放。

但是宿命论的调调还是在丽君的身上存在着：“不过，人说‘落土八字命’，夫妻就是相欠债。”^④

“这一路走来，有没有痛苦？”

① 那天去菜市场找阿扁抗议的行动过程中，被人讥笑年纪那么大了还出来从娼，其实我为这个骂人的人感到遗憾，他们的子孙未来会走上什么路还不知道呢，人在还没死之前，难料会出什么事。

② 不会！我光明正大，不偷不抢，不拐不骗，我有能力让我的孩子和其他人一样，不用向人借钱缴孩子的学费，读到五专毕业，没饿着，想和同学去烤肉也能去，买了一间房子，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有3个房间，也很温暖，不用缴房租，这就是生活的改善。

③ 没结婚当然很好，依我看，现在这个社会独身最好。照说，跟你同床共枕的人应该是最亲密的，但他却也有可能直接威胁你性命的人，还是一个人比较自由，可以到处交朋友，当然眼睛要放亮一点，要不然哪……遇人不淑也很惨。

④ 不过，俗话说，呱呱坠地时，生辰八字就注定了这一生的命，而会结成夫妻啊，是前世相欠。

“没感觉!”丽君倒是回答得很干脆。“拖到现在,团仔已经大汉,所有的艰苦都已经过去,我很开化,昨天的事情今天就会把它放乎抹记,想的很开,总讲一句,人歹命就歹命,想卡开就好!”①

面对人生中过重的悲苦,也许是这种从宿命论发展出来的豁达乐观,让丽君可以减轻痛苦、支持着她一路走来吧!否则,这一世的苦难叫人如何承受的起呢……

“后不后悔生小孩?会不会觉得他们是人生的负担?”

“生小孩很痛苦,病子艰苦,月内也艰苦,饲嘛很艰苦,②所以小孩不要生多,一个就好,本来生小孩就是留种的。”丽君用传宗接代的观念来解释人为什么要生小孩。

“不过痛苦是一时的,幸福却是永远的啊!”此时突然想起丽君老是频频询问这些年轻的已婚社运工作者怎么还不生小孩的关心,觉得有点矛盾,忍不住要挑战一下。

“啥米③是幸福?”丽君反问。

“有小孩啊!”回答得理直气壮。

“哼!加人骗!”④丽君并不同意这种论点。

“如果时光倒流让你再选择一次,你会生小孩吗?”丽君对这种虚幻的问题,拒绝进入想象:“时光倒流?这是不可能的代志⑤!”

再进一步用她宿命论的观点追问:“如果是下辈子呢?”

丽君有点迟疑:“可能不生。”

最后问丽君:“有没有想过要翻身?赚更多钱,或不要做公娼这一行?”

丽君不改乐观的本性,笑笑:“何必那么麻烦?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把孩子养大了,现在要换他们养我啦!”

犹记丽君的一句话:“为着团仔,咱就爱牺牲啊!”,此时的

① 行至今日,孩子已经长大,所有的艰苦都已过去,我不会钻牛角尖,昨天的事情今天就把它忘了,想得很开,总归一句,就是命不好,想开点就好。

② 生孩子很痛苦,怀孕喜事很辛苦,坐月子也辛苦,养孩子也辛苦。

③ 什么。

④ 骗人。

⑤ 事情。

丽君应该是她苦尽甘来的时候了。然而，就在公娼抗争近尾声时，丽君经医生诊断后，宣布罹患乳癌。

此时，让人似乎不得不相信起丽君的宿命论了。

附录：

尊严·力量·日日春

文：丽君

八十七年（1998）5月，公娼自救会、女线、粉领主办“第一届性工作权利与性产业政策国际论坛”上，丽君代表公娼自救会做“台湾废娼事件报告”的发言。作为公娼自救会的大将，这篇发言很能反映她对政府废娼的看法，所以特别摘录于此。

我是公娼自救会的代表丽君。今天很高兴有外国朋友来参加这个会议。所感谢的是，这些台北市议会的议员给我们这些公娼的支持，我们要谢谢这些议员。

从废娼到抗争

我今天要报告真人实事的事情。社会上很多人都在笑我们，笑我们没尊严。依我的感觉，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年纪做公娼的人若不是死了丈夫就是离婚，养育父母就别说了，后面都要养两三个孩子。你想想看，这些小孩不是念小学，就是念国中、高中，依我们这种年纪的女人要负责这个家庭是不是很辛苦？请大家体谅我们想想看。所以说（哽咽）……现在若再说我就很激动……这些小孩跟在后面要吃饭、要念书，家里没收入的时候，这些孩子要吃什么？要怎么念书？我很相信大家很了解，孩子要念书你没办法给他念书，大家心里会多痛苦？而且有一个朋友说，“生活都已经过不下去了，还顾什么面子？”所以你没办法，还是做下去，不管那么多……若不做下去有什么办法？幸好我贷款已经缴清，我今天出来不是为了我个人，是为了我后面百余位的姊妹争取。很多小姐后面都有很多贷款没有办法还。

我有一个同事，她死了丈夫，要独自带3个孩子。她是为了要生活，才来做公娼。做没多久，她认识一个男人，他很诚恳要养她母子，结果结婚后经过不到一年，竟然虐待她们母子！（哽咽）打妈妈的时候，小孩就来救；打小孩的时候，妈妈就来救，

你想想看，这款的生活，你叫她怎么过下去？所以之后有一天，她跟他离婚，她说，“我还是靠自己来养这3个小孩”，不然她这种日子艰苦过。

可是现在公娼已经要废掉了，之后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以前我要来做这个行业之前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虽然不偷也不抢，但是大家还是会笑我们。所以那时候只会做什么？透早^①上班，晚上回去顾小孩，煮饭给小孩吃，什么地方都不会去。

虽然靠自己赚钱，但是社会上还是对我们“叽叽诛诛”（意指闲言闲语）。现在已经废娼了，以后我们这些女人不知道要怎样才好。还有好多很“高尚”^②的、念很多书的妇女团体叫阿扁一定要来废娼，就是说，怕我们这些女人被男人欺负。但是，我想的不是这样。她若要去救，应该去救那些嫁丈夫却被丈夫欺负、丈夫若喝醉酒或心情不好回来要找她（求欢），他不给他的时候，打她、虐待她……她们应该是要去救这些，不是救我们。（群众鼓掌）我们想想，靠自己赚的，比靠别人养的更有尊严。依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听说香港警察抓我们这些妓女的时候都会欺负她们，“又要吃又要拿”。我觉得这有些不一样，因为她们是不合法的，所以只能让警察随便对待。

为了要抗争，我们出来，去到很多地方，也认识、了解了很多。以前，就像会长官姐讲的，“我只会看歌仔戏，剩下的就不知道了”，什么社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啊；现在，为了抗争，大家都会看新闻了，而且会看很多台，这是因为我们说的话、我们的需要，媒体都没有报道，它（媒体）自己想要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这是我们这八九个月来抗争的经验。我们现在很了解“社会”是什么东西、什么叫做政治，我们现在已经分得很清楚了，以后也绝对不会再被人骗了。（群众鼓掌）

社会局的人都跟我们说得很好听，说要给我们辅导（转业）、给我们怎样，我有一个姊妹就跑去问转业辅导的事，结果社会局问她“你有没有读书？”她说没有，社会局说：“你没读书要怎样

① 一大早。

② 指高社会地位，自以为很高尚的。

辅导？我们这个计算机得要国中来才能学。”这个学出去也不一定是社会上能够使用的。你想想看，阿扁仔（陈水扁）这些人讲的话是不是骗社会？害我们被社会上的人骂，是不是？请你们大家想想看。（群众鼓掌）我说的这些，都不是骗人的，是真实的、正港^①的。

性工作身份的认同

我有一次出国，去菲律宾，看到有人做到老师、读到大学，也是来做这个行业。因为她说：“只要赚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不要杀人放火、不要害人就好，什么都可以做”。当到一个老师条件很好了，对不对，读到大学，她要找工作还会找不到吗？什么好的工作都找得到。而且她背后又没有负担。一开始我也很怀疑：妳念到大学、当到老师，为什么还要来做这个工作？之后我就想开了，哦，原来她们也是一样，要自己赚钱养自己，不要被别人养，对不对？比较省麻烦、比较不会被人虐待。这很有道理。（群众鼓掌）

什么叫做不要脸？以前古早的女人走上街头就会被人说不要脸；现在是自由的社会，你看现在三更半夜女人在街上站，还有人笑她们不要脸吗？没有！自由的社会嘛！所以我们以后不能再说自己不要脸、不能再这样想了。

对了，有一次我们去（台北）市政府抗议，有一个女人来骂我们，她说，“你们这些不要脸的女人，来这抗争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些人很生气，追去打她，有没有打到我是不知道。之后我回去想很久，喔，不可以，不对，我们打她不对，以后如果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形时，我们应该围成一圈，把她围起来，我要问她，为什么不要脸？我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吗？没有嘛！你为什么骂我不要脸？如果要说不不要脸，就是有一些很富有、背景很好的，丈夫不顾了，“讨客兄”^②，跟“客兄”^③走，放着丈夫、孩子四处跑，这种才叫做没尊严、不要脸。这是我的想法，

① 千真万确的。

② 红杏出墙。

③ 外遇对象（男性）。

大家怎么想我是不知道啦（群众鼓掌），这是我的意见。

抗争是为了争取弱势生存的空间

人不一定是水平很好、背景很好、书念很高，做的就一定是好事情喔，他后面做的事情说不定是不可见人的。这个大家都不会了解。所以陈水扁就任市长以后，台北市的市民不好过的人很多。我相信是这样的。因为，我上个月14日，欸，我跟你们讲，我是为了这次的抗争，才很好命地去坐出租车，不然我都是自己骑机车，我报告给大家知道，上个月我坐出租车的时候，有一个运匠（司机）也跟我抱怨，他说现在台北市民过得很痛苦，这就是我们的市长造成的。（群众鼓掌）他这样说，不是我说的，我也没告诉他我是什么人。

司机先生说：“台北一些‘艰苦人’^①都要被赶出台北市，像十四号十五号公园，这都是一些‘艰苦人’住的，他就把它拆掉，要那些老人、‘艰苦人’去住哪里？社会局并没有好好照顾；像台北市的公娼被废掉，一些没娶老婆的人你是要他去‘撞壁’^②（台语），他要怎么过日子？”我很认真听。他又说“阿扁都不管别人的生或死、要怎样就怎样”，这些说给你们做参考。

以后日子要怎么过我不知道，公娼已经废掉了。请问这些国内外朋友，台北市长将公娼废掉以后，日子真的什么都会变得更好吗？大概不可能！这个大家都知道。什么环境更好、什么更好、要学哪一国……今天每一国都来了。我看鸭霸^③阿扁要怎么对台北市民交代？要怎么对外国朋友交代？

我们这些姊妹，我们众姊妹，我们难道不希望也能像一些上班的小姐，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吹冷气、过一个好日子、领一个较高的薪水，是不是这样？可是很可惜，我们没念书，所以我们要认命，过痛苦的日子，继续过下去。日子痛苦也是要过下去。大家不要灰心，不要再想自杀。这是我拜托大家、拜托众姊妹的。

我要请问陈市长的是，现在台北市大学毕业的失业有多少？

① 泛指底层的人。

② 撞墙，指走投无路去自杀。

③ 蛮横无理的。

一句话就够了，剩下的不用再说。（群众鼓掌）现在阿扁被人捧得很高，可是我不了解，我相信大家也不了解，到底他是市长还是神？还有他的手下，有一些博士、书念很高、盖高尚^①的妇女团体都替他说话，说要把我们“从良”。这些都不是为我们的，这都是要把我们害死的，叫我们 128 个人用绳子绑一绑从淡水河丢下去！

我相信他不是要帮忙我们，今天若是要帮忙我们，不是说这种话。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牺牲这么多是为了什么，我也不了解，不过只好继续抗争、继续抗争下去！（群众鼓掌）为了我们的尊严、为了我们继续生活的力量，大家要抗争喔！

最后要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议。谢谢。

公娼后面还有很多问题，请大家多多支持。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① 指高社会地位，自以为很高尚的。

纪爱恩
随心，按感动而行



文：罗婉祯

对于姊妹来说，修女们以同行者给予的平等关系、情感支持和肯定，才是她们一直最渴求的东西。

741

若教会传福音为的是将天主的爱带给人，应该是切身处地为她们着想，而不是执意要改变对方行为或生活方式来迎合社会。故此，她认为关注姊妹的工作首要是尊重她们的意愿。

相信每位初认识这位能操异常流利广东话又笑容亲切甜美的外籍人士——纪爱恩修女，总会感到一份意外和欣喜。纪修女来自苏格兰，已在香港服事达21年，是香港首批开始关注本地性工作者的志愿人士，亦是关注性工作者组织“青鸟”的创办人及前总干事。

虽然每当提及关注性工作者问题，会令人联想起另一个组织

“紫藤”^①，然而，在“紫藤”未成立之先，纪修女这群人已默默地走进旺角、油麻地、深水埗一带的街头巷尾，与性工作者打交道，试着了解她们的需要来服务她们。在开创本地关注性工作者（以下简称“姊妹”）的工作上，纪修女和她“青鸟”的同胞都是勇敢的先驱者。

在约定的下午，笑容灿烂的纪修女亲切地回答我们各样的提问，分享她为何来港工作、如何在情感的推动下孕育“青鸟”，使她成长，及振翅高飞的历程与挣扎。

回应内心的感召

纪修女来自苏格兰传统天主教家庭，父母关爱他人的身教自幼便成为她的榜样。纪修女常记起父亲年轻在酒吧工作时，有露宿者进来酒吧，他便为他们带上食物或请他们喝啤酒。她自小便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相信能够与有需要的人一起分享会是更大的幸福。

1985年，纪修女接受了英国圣高隆庞传教女修会安排来港工作。修会的创会神甫对她影响很深远，她相信我们每位都是也应该知道自己是天主的儿女，无论何事，我们的身份和价值都不会被改变。为了与更多人分享这份信念，纪修女与其他修女便受感召愿意背井离乡，前往他国为边缘及弱势社群服务。而纪修女因为有一次遇见了在“企街”^②的姊妹，看见她们如何被街上的男士轻视或侵犯，触发她去关注姊妹的需要，希望能透过交往能让她们明白不论遭遇何事，她们的工作是否被社会接纳，与生俱来的价值和尊严都不会变，天主也会完全地接纳她们。

纪修女刚到香港的2至3年时间，都用在学习书写中文及应用广东话。有一次，她的朋友陪伴她到旺角、油麻地一带逛街，当时她看见很多妇女站在街头巷尾，她的朋友解释她们是姊妹并正在“企街”谋生，有好些男士经过都会向她们投以目光，但眼光并不友善，似乎是在选购商品般向她们评头论足。纪修女忆述

① “紫藤”，香港关注性工作者组织，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倡议性工作者的正名和工作者权益的工作。

② “企街”，即站在街上等男性客人光顾她们的性服务的性工作者。

当时的情况时，夹杂着不少愤慨，她认为那些男士的举动完全没有顾及他人的感受，令她感到很难过，从那一刻起，她便下了决心希望能与这些姊妹在一起。

没有流逝的感动

两年后，纪修女开始与教会商量在香港的工作方向。她提出自己对关注姊妹的感动，但教会认为她因为刚到步并未了解其中的危险及复杂性，故未有为她作安排。后来，她被安排前往教学，并在教会的堂区里作牧养（关心教会信徒）工作。她很满意教会的安排，可以熟悉香港的情况和多与本地人沟通。这样，她在柴湾海青堂的堂区工作了4年。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纪修女微笑低头细诉：“我在那里做了四年多的牧养工作，期间亦不时去探访亲友和参与青少年及歌咏团的活动，虽然作了不少事情，但我一直未有忘记对姊妹的感动。”

1991年，由于英国修会的总会长的要求，她与其他在港工作的修女需要在香港物识未有接受服务的社群并去服务他们。于是，她们成立了研究小组探讨当时香港的社会情况，了解其他修女正在或已有开展的工作，例如释囚、艾滋病人、青少年及弱智人士等，当中亦有人进入学校担任教师。她始终发现姊妹这个敏感团体仍是一直被人忽略，未有任何团体接触她们，因此纪修女便游说其他组员作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本港的姊妹的处境及面对的困难。她想起研究小组的情况，笑说：“她们常说我如何地影响着她们的研究，哈哈，因为我很想了解关心这些姊妹。”调查预期地针对香港的姊妹的情况作研究，调查结束后，小组获得修会的支持进行为期一年的试验计划。

走上街头

获得修会批准进行一年的试验计划，她们希望透过相处让姊妹体验平等、被尊重和肯定自己的价值。于是这几位修女便开始跑到姊妹活跃的街头与她们接触，进行观察，认识、了解她们的需要，摸索下一步可以怎样做下去。

在旺角、深水埗、油麻地一带姊妹常常出没或工作的地方，出现了3位经常在街上流连的金发碧珠的外籍人士，可以想象当

时一定会引来街头上不少目光。开始时，纪修女和另外两位修女是一鼓劲的去干，每星期都在那些固定地区出现，但遭遇的困难并未因此而减少。纵使她们早已预料的冷淡和拒绝，但碰上鼻子上一层层的灰，在试验着她们的爱心和耐性。“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去，当时我们继续在深水埗街上走，那些姊妹初时不接受我们，可能她们很怀疑，不知我们想做些什么，我们试过很多次，她们都会赶我们走，她们有时会很矜（生气）……赶我们走，最初几个月都是这样。”

遇见受伤的灵魂

由于长年面对街头上同行竞争、地方势力的争夺、还有便衣警察的陷阱等，加上纪修女一行外籍人士，姊妹对纪修女一行人一直存有戒心。回想过来，纪修女认为关注姊妹的工作最困难是建立关系，若能顺利地建立互信关系，工作便能陆续地展开。日子有功，经过数个月的坚持，姊妹的态度慢慢软化，习惯了每星期纪修女她们的探访队出现，简单的对话展开了，部分人也愿意向她们透露心事及需要。

在那一年试验计划未完之前，一夜有位姊妹主动地与纪修女谈起来。那位姊妹好奇为何每次遇见纪修女时，她总能面带笑容，纪修女说看见她们便感到高兴，想不到，却令那位姊妹哭起来。原来她刚自杀获救，从医院回来，但仍苦于很多生活中的无奈，与纪修女倾诉后，才能稍感平静。另一夜，纪修女遇上一位“等死”的姊妹，她因为藏毒被捕，正等候被传召上法庭，她相信自己将会被判入狱，但心里很记挂寄住儿童之家的一对子女，她深深内疚于自己未能照顾他们。纪修女安慰她出狱仍可以重新开始，她稍得安慰。离开现场后，纪修女对这位“等死”的姊妹的遭遇及说话久久未能忘怀。

经过数月的观察接触，纪修女她们对姊妹的需要也越见能掌握，原初以为她们首要处理的是健康问题，后来才发觉她们更需要法律咨询。以深水埗“企街”的姊妹为例，她们经常被警方拘捕，时常急需要找律师帮助及陪她们上法庭。若她们在“企街”时被捕，便不能申请当值律师服务，但她们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去请其他律师帮忙，上法庭时如没有代表律师在场，面对繁复的法

律程序，对她们非常不利。因此，纪修女与其他修女便开始联络愿意义务帮忙的律师，及陪伴有需要的姊妹出入法庭处理诉讼，给予情绪支持及协助。若不幸姊妹被判入狱，她们也会帮助一些善后工作。“如果不幸，法官判（姊妹）她们坐牢，有时她们需要我们代为通知她们的家人，她们会叫我们说她们去了大陆旅行，因不想她们的孩子、丈夫或者妈妈知道她们坐牢。”同时纪修女亦邀请一些律师合作，尝试争取改变政策，让姊妹面对被警察拘捕时，也能得到合理的法律保障。结果，由1995起，纵使“企街”时被捕，姊妹也可以申请当值律师的服务。

后来，关注姊妹的工作开始发展成型，如有了个别的个案跟进，法律咨询等。然而，对于姊妹来说，修女们以同行者给予的平等关系、情感支持和肯定，才是她们一直最渴求的东西。访问期间，当纪修女说到这里时，先静默了片刻，才说：“很多时候，她们只是很孤独，需要别人聆听她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因为没有人会跟她们倾谈，没有人会睬她们，那她们也很多事都不会问朋友，所以我的工作很多时都很简单的，只是‘企街’当个聆听者，给予她们分享的机会。”

“青鸟”——姊妹们的同行者诞生

一年的试验计划在缺乏资源的艰难环境中进行，直至得到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以下简称“女协”）的支持，成为当中称为“Concern for Prostitutes”（关注娼妓工作）的项目，才能在有稳定的资源下继续运作。1993年，纪修女她们因渐见有成绩便正式成立“青鸟”。“青鸟”是在中国传说中的一位神的使者，她喜欢与人分享由神而来的幸福，纪修女盼望姊妹们也知道，她们跟其他人一样也可以成为神的使者，与其他人一起分享幸福。所以，“青鸟”除了是承载着修女们的祝福和盼望，更包含对姊妹的尊重与肯定。

“青鸟”成立的初期，一直面对资金和人手的缺乏。因为姊妹当时是极敏感的社群，一直被严重忽略，加上成立的目的并非要令姊妹“改邪归正”，不会要求她们转行，而是尊重她们的选择，因此在成立初期未能得到任何机构的援助。纪修女的母亲在故乡苏格兰知道她们的需要后，在其他的朋友帮忙下在小区义卖

饼干得到不少支持，终于为“青鸟”筹了足够的启动基金，慢慢地，“青鸟”也开始申请一些基金提供基本的经费去支持运作，也得到一些机构的支持，陆续地在她们刚成立的中心开展了基本的服务。

“青鸟”刚起步时与女协保持伙伴的关系，但也逐渐意识独立的需要。纪修女与姊妹经常在街头谈话时，因街上人流密集难以深入交谈，有必要物色地点接近姊妹工作地点，让她们有个共同的空间能更自在地分享倾诉。不久，她们在油麻地砵兰街成立了第一个基地，也能方便姊妹们落脚。独立初期，“青鸟”工作员会陪伴姊妹去看医生或前往法庭；在中心内，姊妹们可以带孩子或朋友前来，孩子可以在中心内做功课、玩玩具，姊妹也会在不适或需要时进来休息倾谈，然后再去继续工作。因此，“青鸟”便成为了部分姊妹的避风港或加油站。大部分的姊妹收入并不稳定，常遇经济问题，故此“青鸟”也会为她们提供一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旧衣物、食物等，帮助部分姊妹一时之急。



批判与接纳

虽然得到英国修会的支持进行试验计划，她们在开展工作时也遭受到不少阻力。香港的教会（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都鲜有

就“性”或“性工作”等敏感议题作讨论，遑论支持纪修女的试验计划，但基于英国修会的首肯，教会未有明显反对试验计划，但也未予具体支持。

相对地，当时纪修女面对最大的冲击是来自教会的教友及家人的反对。试验计划开始初期，纪修女接过不少无名氏教友的电话，劝喻她们停止接触姊妹，认为她们并非好人，会对修女们造成不良影响，一些教会朋友也表示不接受她将要投身服务姊妹的决定。纪修女争取任何前往与教友分享的机会，有好些教会堂区的分享气氛都非常紧张，教友对姊妹的印象和评价都负面，想象她们会影响社会而感到愤怒和憎恶，也不看好纪修女的工作，认为这都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教会对于姊妹的理解源自信仰的犯罪观及社会的道德对错观念，认为姊妹不单止犯淫乱罪，更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及危害夫妇关系，只有认罪悔改和尽快转业，才会被上主接受而重获新生。教会的分析容易将姊妹面对的问题简单地个人化，理解这只是她们本身的个人道德操守问题，忽视了她们身处的现实社会的大环境及当中的结构问题，亦未顾及姊妹这个社群的独特需要及限制。

另一方面，纪修女的父母对她的决定也有微言，尤其是一直支持她的母亲。她明白母亲的担心，怕她会面对危险，因为家人居住的小乡村民风简单纯朴，他们未曾接触过姊妹，加上对香港的情况陌生，自然反对她参与关注姊妹的工作。

纪修女明白教友及家人的反对是基于对姊妹误解，因此自己和其他修女的工作便更为重要，正好作为社会与姊妹之间的中介人和缓冲，也令大家可以有更多沟通了解的渠道。透过不断地在教会分享，向教友解释姊妹们面对的处境，让他/她们明白她们实在也是普通人，也在担当不同的社会角色和责任，像母亲或妻子，她们亦会照顾家庭，有一般妇女的需要，纪修女发觉这些对话能逐步改变他/她们的想法。分享后，有些教友会希望参与成为义工，个别教友会认同关注姊妹工作的重要性，愿意留下与机构一同发展，像现职的同工 Victoria 便是其中的例子。家人方面，纪修女亦会耐心地向母亲解释姊妹的遭遇，强调她们的母亲角色，部分姊妹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会为了家庭而牺牲自己人行。渐渐地，她母亲也能对她们多了理解。

肯定姊妹的尊严与价值

纪修女与姊妹们长时间接触后，发现重建她们的自尊及自信比是否带她们脱离性工作这个行业更重要。她在“青鸟”的中心内曾经听过一个姊妹跟另一个妇女诉说：“在我坏之前……”直叫她很心痛。她想姊妹若因社会不接受她从事这行业便把自己当作坏人，实是让社会似是而非的价值观打击自己的尊严，这对她们并不公平。越是深入了解，纪修女更确切地明白到姊妹面对的不单是表面的经济困难，最严重的是不能接受自己，没办法肯定自己的价值，认为不会被别人接受，所以她们也缺乏信心转业。另外，她们也有很严重的罪疚感，自觉做了很多令家人失望的事，不敢跟父母子女联络，亦没有勇气回家。有见及此，纪修女很想改变她们这些看法。

曾经不少教友或朋友会质疑，纪修女她们关注姊妹的工作，目的不是为要让她们改过自身吗？有教友参与当义工是为了向姊妹传福音使她们“回归正途”，但完成“青鸟”的义工训练后，因为不认同她们的方向而离开。纪修女明白理解这些朋友的期望和反应，对她来说，姊妹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批判或教训，因为她们自己或外界给予的道德指责已经太多。相反，脆弱的她们更需要被关怀和拥抱。若教会传福音为的是将天主的爱带给人，应该是切身处地为她们着想，而不是执意要改变对方行为或生活方式来迎合社会。故此，她认为关注姊妹的工作首要是尊重她们的意愿。“我觉得并不是用说话，亦不用说《圣经》是怎样的，我想让她们体验天主的爱是怎样的，所以并不是用口说，也因此有很多姊妹不知道我是修女或天主教徒，因为这不是太重要，最重要是给予她们（选择的）机会。”

振翅高飞的“青鸟”

“青鸟”随着姊妹的需要不断发展，近年亦联结了些律师、中西医等专业人士，发展了多项更切合姊妹日常生活需要的综合服务。现时有一批律师、医生、中医和牙医会每月按约定来中心为姊妹提供帮助。同时，“青鸟”也会与医生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如姊妹的生活素质调查，了解她们的身心健康状况。近期正在进

行的，还有一项研究姊妹遭受歧视的情况，借此知道她们整个生活如何因歧视而受影响。

碍于工作时间长，很多姊妹都未能经常或直接前来中心，故外展服务仍是“青鸟”多年来的重点工作之一。因此，“青鸟”也能亲身见证了香港性工作行业的一些更替。不难发现现时夜总会、卡拉OK或发廊等地点工作的姊妹，已多为内地自由行的妇女代替，本地的姊妹多会选择“企街”（未包括紫藤的“一楼一凤”）。而湾仔一带的夜总会，大部分是菲律宾人或其他亚洲地区人士。本来是“青鸟”工作大本营的深水埗区，因为警察进行太密集的“扫黄”^①行动，令该区的姊妹被迫躲着或迁离，曾有好几个月也无法接触到一位姊妹，故只保持与某些姊妹的基本联系。现阶段，“青鸟”的主要接触对象多是内地来的姊妹，她们以自由行来港的人数居多，其余的也会接触其他亚洲地区的妇女，她们面对被警察拘捕时，因为不认识香港的法律和自己的权益，形势比本地人更为不利。为此，“青鸟”特别印制了中文简体版、菲律宾及泰文版的小册子，向接触到的姊妹，提供一些香港情况的基本信息及关乎她们的权益。另外，“青鸟”也开始拓展接触其他新区域如元朗及大埔等。

除了日常的工作运作，“青鸟”亦会主动介入与姊妹有关的社会事件，例如早前香港警察在拘捕大批内地来港的姊妹后，竟然将她们放置在大铁笼中的事件。“青鸟”的权益主任便就此发出了一份她们的研究报告，让公众理解这些姊妹面对被警察拘捕时的经验是如何恶劣，亦借此提醒公众监察警方的滥权情况。

提及未来的发展，纪修女想到“青鸟”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但先要解决资源问题。她认为外展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不论是针对姊妹或公众。但碍于资金不足，她们一直未可安排同事主动到外界作分享交流或举办讲座，希望未来能申请得合适的资助或捐款，可多发展这方面的工作，更理想的是，加入一些适合的姊妹去做，既可培养她们自信去面对公众，又能成为其他姊妹榜样，亦令社会对这些姊妹的情况有更多、更真实正面的理解。

^① “扫黄”行动，指警方扫除色情场所的行动，因为大部分色情行业的广告牌或灯箱都是黄色，故扫除色情场所的行动被称为“扫黄”。

总的来说，“青鸟”一直以来的工作，纪修女认为不只为姊妹带来关心与支持，亦重新给予她们在社会中一个肯定的身份。比较以前，姊妹只是一个敏感的群体，没有人肯定她们的存在和需要，现在社会上承认及接纳她们存在的人多了。纪修女更希望姊妹的身份会越来越明显和被理解与接受，不用再因为别人的目光而去改变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而社会更了解她们的选择并尊重她们的生活及工作选择权，确立她们存在的价值。

鼓励同路人间互相扶持

在试验计划的初期，纪修女她们便想到关注妇女工作的发展方向，可先由修女们开始做，发展至适当时候邀请本地人士加入，等待工作发展稳定后，再交给本地人来运作，更理想是由姊妹们来运作这组织。

为了逐步去培育姊妹参与“青鸟”的工作，她们多年来不断地成立不同的自助小组，让姊妹有更多空间学习参与带领小组和发表意见，发展独立思考。纪修女兴奋地说，在小组活动中发现参与的姊妹会越来越踊跃发表意见，慢慢建立她们自己的想法和对小组发展的方向的期望，现在这些小组是由她们负责带领，部分更已成熟地自行运作。“青鸟”现在有一班成熟及已培训的朋辈教育者可以去帮助其他姊妹，未来，她们将会继续开办朋辈互助计划，让资深的朋辈教育者去训练其他朋辈教育者，令她们在机构更有归属感和信心，愿意负责更多的服务和工作，不久的将来可以接手管理“青鸟”。

自“青鸟”的运作上轨道后，前后成功邀请了两位以前曾作过姊妹的同工加入，她们在“青鸟”的角色非常重要，因为她们过去独特的经历更能明白其他姊妹的需要，补充了过往“青鸟”同工与姊妹之间的一些经验夹缝，如吸毒和戒毒等，亦让新相识的姊妹更容易接受“青鸟”。由过来人去扶持帮助其他的姊妹，慢慢由她们自己去运作“青鸟”是纪修女最大的梦想，以她最近3年的观察，这个目标是越走越近的。她说：“我也希望慢慢‘青鸟’会让以前或者目前的姊妹自己负责，这是我们长远的发展目标。初时有人说这个梦想是太理想的，无可能的，但现在我知道不只是可能，更是肯定一定会达到的。”在访问时，得知纪修女将

会暂别香港一段时间，回故乡休息，她表示已经决定现在是个适合的时间，将“青鸟”交给现在这批本地的同事继续发展。

从姊妹情谊至作主当家

“青鸟”是纪修女与其他修女及义工们间姊妹情谊的结晶。为了保守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她们彼此扶持勉励，才可以无视社会对姊妹的批判责难。凭着“姊妹同心，其利断金”的信念力量，她们才能熬过20年许许多多的灰心挫折和失败无助。她们是一群没有要成就伟大事业的人，却本着平常心走进人群里遇见了被埋藏去寻找需要帮助的姊妹，从日常生活的需要自心灵安慰，她们都用心去建立营造，这片可以让姊妹透透气、安心舒发感受的营地“青鸟”，全心全意地拥抱这群脆弱受伤的姊妹。

眼见“青鸟”的工作已上轨道，本地同工已可独立接手运作，姊妹们亦渐趋成熟，更投入委身，愿意承担更多的工作与责任，实在令人兴奋。看来，本地同工和姊妹更进一步地将“青鸟”发展，当家作主是指日可待。

“性工作也是工作。”这句口号在关注性工作者团体、妇运及社会运动人士的积极推动下，已渐入民心。“性工作者”也渐渐地取代了“娼妓”、“妓女”等昔日对姊妹们极负面的称呼。要求为性工作者正名及争取将性行业非刑事化的路上，前路漫漫，但同路人是越走越多了，前面也渐见曙光。或许每当我们站在争取的路上感到徘徊无助之时，想起纪修女她们姊妹同心，凭着良知按感动而行的事迹，将会为我们打一剂及时的强心针。

严月莲

支援性工作者 支援妇女劳工

“性權、家



嚴月蓮女士

文：李伟仪

她认为妇女劳工往往被主流劳工运动及妇女运动所忽略，社会运动欠缺性别视野。

严月莲却鼓起勇气、直接地对传媒及其他社群展现有关性工作的另一面图像，坚持性工作者应享有作为社会合法一员的法律权益，以及确认性工作为工作。

我不和平，我不是鸽子，我经常骂人，城中恶人，我算是数一数二。我总是刺激着别人，令人觉得不舒服。当然我也知道，和平并不等于不去吵，吵的人也不等于不和平。

严月莲的一生都是贡献给被褫夺和平权利的女性。过去10年，严月莲选择服务处境最困难的性工作者，她个人层面达致和平，与人本关怀的方向相缔结。

严月莲，1953年生于香港，出生于典型上一辈从内地来港贫穷家庭，她有3妹1弟，是家里的大家姊，12岁未完成小学教育

即当上工厂女工维持家庭生计。严月莲因与工友一起抗议雇主剥削及要求赔偿而投身了工会运动行列。后来她感觉到妇女劳工的需要往往在主流工人运动中被淹没，便于1989年成立“香港妇女劳工协会”，为妇女争取就业权益及保障。

1996年，严月莲与两位朋友成立了“紫藤”，一个非政府关注性工作组织，为性工作者提供直接支援服务，同时积极把性工作议题带到传播媒介及公众讨论层面，以去除性工作者受到“污名化”及社会排斥与歧视的问题。严月莲的努力让部分香港人看待“性工作是工作”（Sex work is work），并以“性工作者”或“姐姐仔”取代“娼妓”等较为负面的称呼。

性工作者的处境，不管是现在还是严月莲开始服务姐姐仔的10年前，社会仍然根深蒂固的针对性工作者作出污名化、歧视、边缘化，性工作者的处境较普遍妇女劳工更严峻。性工作者是警权所针对的目标，也受黑社会滋扰。10年后的今天，性工作者面对着警权滋扰，胁迫严重，警权具歧视性及不公义的法例，警权本身亦展示了法例上与文化上的不公义。

在法例及人权工作上，严月莲致力争取性工作“除罪化”，以及性工作者应受到公平对待。2000年，紫藤登报公开谴责有立法会议员于选举后出尔反尔打压性工作者。

2003年，紫藤要求保安局局长不得纵容警察以执法之名于放蛇^①时先享受打飞机^②、强令性工作者脱衣搜身、利用警察身份苛索免费性服务；也要求保安局正视性工作者受黑社会及客人威吓、强收保护费、讹骗、抢劫及强奸时警方爱理不理的问题。

2004年1月，紫藤举办了“性工作摄影展”，引起社会的回响。为继续争取权益，严月莲和一群紫藤同事筹募资金，开拍

① 放蛇，即做卧底。文中所提及的放蛇行动，即警察假扮嫖客，向性工作者要求性服务，在交易过程中，未与性工作者发生性行为前表露自己的警方身份，并以多种理由拘捕一楼一凤性工作者甚至业主，如“出租处所作为卖淫场所”、“住宅作为商业用途”等。至于街头性工作者，警方通常根据性工作者的表情、言语和动作，即可以《刑事罪行条例》第147条“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罪把怀疑有这动机的人拘捕。

② 打飞机，即男性的自慰，或称手淫。文中的意思是性工作者替假扮嫖客的警察手淫至射精。

关于性工作者生活和工作的纪录片。2006年8月11-13日，紫藤举办“第一届香港性工作者电影节”，透过文化观影渠道，增加社会人士对于姐姐仔和性工作者行业的认识。

紫藤成立10年，严月莲一直坚持维护及争取香港性工作者的权益。

妇女劳工运动的见证者——70年代、80年代、90年代

严月莲的故事应由20世纪70年代说起。

大约26岁的时候，严月莲与一群同事抗议老板无理解雇，要求赔偿及道歉，之后她便正式参与关注劳工权益和争取工人福利的工作。严月莲回忆，那次事件让她感受到工友的孤立无援，但她相信纵使老板有权有势，若工人能够出来争取权益的话，是可带来改变和公义的。

严月莲最初在一个教会背景的中心当义工，协助运作一条劳工法例热线。后来，她于“工业福音团契”出任全职工作，自1979年至1989年，严月莲曾于“工业福音团契”及“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两间非政府组织工作。

“那时工福团契开劳工法例，搞咨询；70年代，工厂非常蓬勃，劳工法例很差，工潮很多。我是十字牌婆（基督徒），在电子厂参加工厂团契，吃饭时间在楼梯口祈祷、唱歌，娱乐一下。人家见我虔诚，找我去做。我当时想，26岁了，做不来就没有回头路了。电子厂聘用我到26岁已是差不多，你继续做下去，人家还会勉强让你做，若离开再想回去，不太可能。我挣扎很大，怕万一做不来，怎么办？而且薪金比我在工厂少一半。我问妈妈，因我要养家，我在电子厂上班是朝七晚十一，三班制，我连做两班；我妈说家里经济情况容许，我就做吧。”现在严月莲回想，大概妈妈觉得工厂妹始终不好听，女儿有机会做写字楼，总好听的。“她让我去，宁愿家里收入少，就这样入行的。”

严月莲的外公行船，大陆解放，一船人离开大陆上海，本来想去台湾，结果来了香港。这一船人变成亲戚一样，大家在香港都没亲人，全都是上海人、宁波人。严月莲的外婆和其中一家人是很好的朋友，她的女儿对严月莲很好，不会看不起她们穷，“我从小到大，穿的衣服都是她家里穿下来的。她对我很好，她吸引

了我，我就跟了她去信教。”严月莲觉得信教挺不错，平时在工厂上班，很闷，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11点，在生产线上真是很闷。到了星期天，就完全跳到不同的环境，那教堂在般含道，去的人要么是香港大学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等“贵族”学校，严月莲这样的工厂妹，忽然和港大学生坐在一起，觉得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礼拜天我上天堂，星期一至星期六是下地狱。”信了教，有不开心的事，人家就说，你慢慢祈求，会有转变。严月莲觉得这是精神支柱，所以就开始和十字牌人交往，到工福去泡，从这一条线下来，她就做了劳工工作。

严月莲工福做了很短时间，她和同事两个傻婆子，一天到晚接到个案就往外跑，工福其他同事受不了，问为何不坐在办公室里？但做工潮，可坐在办公室里做吗？以前深水埗有很多染厂、纱厂、塑胶厂，工友下班来工福谈工潮，抽烟，工福同事又受不了。于是叫她们不要整天待在外面，要坐办公室，“我们不同意，就不干了，两个人一起辞职不干，做了大概只有9个月。”

之后，严月莲转职“基督教工业委员会”（CIC）^①，参与不少抗争行动及示威，对抗政府权威及提出工人问题。处理劳工议题让她见证了穷人如何地受到经济、社会及政治剥削。

严月莲接触的第一单个案是观塘的一间纱厂。“我刚去CIC上班，整天CIC的同事都出去工作了，只剩我一人，接着秘书接到：阿严，有个案！我接听了，说是观塘个案，我脚都发软，刚出道没多久！到了纱厂，纱厂是很大的，走进走出那些男人工友都在拍手；我心里怕得要死，不太知该怎么做。我想，不能打也要能吓退人，要死撑，我已对秘书讲了，有同事回来便马上到观塘去救我。”她在纱厂，磨蹭了好些时间，终于有同事来了。幸好工友看不出她是生手女工，浑水摸鱼混过去了。“那是欠薪个案，那时很多老板走佬^②的。接着就跟地盘工伤。最深刻有次陪人家老婆去认尸，人家老婆也没我哭得厉害，我觉得很凄凉，同事眼光光看着我，不知该怎么处理我。”

^① CIC 全名为 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

^② 走佬，广东俚语，即逃离、逃走、逃匿的意思。文中意思是老板拖欠员工薪水后不知所踪。

“CIC的同事教晓我很多，譬如做完工潮，那时很流行，工友感激你会请你吃饭；同事会说这是工友的血汗钱，不要去吃这种饭。”假期时，严月莲没事可做，就返CIC工作，怎知原来同事都在办公室！“同事真的很拼命、很主动、很投入去做，天昏地暗，这种投入，今时今日对我还是影响很大。”那时搞工潮的策略是请愿、见劳工处、睡在工厂门口、和工伤者到公司门口守候，很早就开始就巡街了。

1989年，严月莲组织了“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她认为妇女劳工往往被主流劳工运动及妇女运动所忽略，社会运动欠缺性别视野。组织成立的时候，没有获得任何拨款资助。在严月莲的决心下，找到20位支持她的朋友捐助了她的薪金及组织全年的运作支出。

严月莲第一次接触性别议题，是在新妇女协进会（下称妇妇进）听讲座，她本来想坐一会儿就走，但结果听完才走。“当时有一种很大的感觉，妇进讲的女人，好像和女工没什么关系，和穷的女人没什么关系。譬如空间讨论，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一直住公屋，睡的是迭迭床，后来更睡沙发，朝行晚拆，什么叫空间我不知道。有没有选择？什么叫选择？我不知道。12岁没有钱，就出去打工。说经济独立，是开我们玩笑吧？女人从早做到晚，回家还要做家务，上床还要应酬老公。你叫一个贫下中农女人出去工作，其实是要她们。”那时她大着胆子，想把基层女工以独立议题处理，不懂得成立团体，她记得跟当时工运的男上级讲，他还斥骂：“你真是麻烦！劳工就是劳工，还搞什么妇女劳工，讲什么月经，多脏……”朋友写计划书弄钱，社福工会借出写字台位置，后来她自己弄了些劳工法例街板，每星期摆在新蒲岗工厂区。就这样，一个人，没有钱，在街头做劳工法例宣传。

“当时背着街板到新蒲岗讲劳工法例，讲分娩，讲月经假，但没人理睬。女工反应不好，因你在工厂区讲劳工法例，工人是会有些怕的，会避开，怕老板看见，知道她们懂劳工法例会被辞退。”严月莲记得当她派劳工法例单张，不会有人敢要，她自己就像个傻婆子一样自己在叫喊。“可以理解女工为什么害怕，换转我是工友，我也一样会害怕。”但为什么工厂团契会蓬勃、又容易做？工运却难？“老板巴不得你信教，信教就会听话，和工厂没有

冲突，车衣车得快些，不会去讨价还价讲价钱，不开心就祈祷。”但搞工会却是死路一条，压力大得不得了，别人也会忌恨你，周围的人都怕你，在工厂内做关注权益跟做文娱康乐是两回事。“我明白工友为什么避之则吉，大部分都害怕，你派给她，她见你像见鬼。但却又未必每个工友都这样，有些工友会过来偷偷地拿一本。我本身是工友，容易接触工友，渐渐结识了已婚、有孩子的女工。”

1992年，严月莲揭露立法局议员对于妇女劳工处境存伪善态度，成了头条新闻。自那时开始，“香港妇女劳工协会”才获主流劳工组织确认为劳工运动中的一员。

女工协会是1989年成立，“选错了时候成立，那时是八九民运，全世界都关注伟大祖国，女工的事没法子谈。整个大形势都谈八九。”20世纪90年代女工协会正式做女工议题。第一单课题结合天时地利人和，当时立法局要通过独留子女在家，妈妈要被罚。严月莲骂：“我要上班，托儿只到5点，工厂6点多才下班，个多小时怎么办？政府要我不干活吗？立法局快要通过这例，于是我们弄个笼子，关自己在立法局门口，说：“把我们全抓去了吧……我们的孩子又怎么办呢？”因为她们做得这么特别，碰上立法局要通过法例，报纸开始报道，香港人开始知道有个女工协会。后来有其他团体加入一起反对，政府就押后法例。

台湾修读神学——体验个人空间

经过多年妇女劳工运动的洗礼，也做过很多社运工作，严月莲获得奖学金前往台湾修读神学，这是她体味人生的重要一年。

“凑巧有教会朋友推荐我，教会有项基金只要工作满7年，便可申请休息1年。我说，好呀！便找李清词写推荐信，不久我获批了，我要尽快找学校。”但到哪儿去找学校呢？只有小学毕业证书，可以读什么？经过一番迂回曲折，朋友介绍她到神学院，院长同意她作旁听。“我好想有个学校给我挂单，可以休息。10月人家开课我才去，很急。十来岁在工厂还会看琼瑶小说，打那以后，我没看过小说。不会花钱买小说，很浪费的，看完不能再用。到台湾，我很勤力（用功）一天到晚在图书馆，连图书馆管理的那个阿婶，也公开在周会称赞香港来的严月莲很勤力看书，其实

我每天躲在里面看小说，又去逛街，台南有一张票子看3部电影，很开心。”严月莲从未试过自己有一间房间，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关上门就是自己的了，很过瘾。台北有劳工游行，我还会乘火车北上，跟他们游行。”

生命力强而韧的紫藤

自台湾返港后，严月莲加入了“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一个倡议女性主义神学及社会公正的基督教组织，她亦在这个时候开展对性工作者的关注。后来有关性工作者的工作终止了，她离开“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加入“香港职工会联盟”（下称工盟）从事地盘工人工会权益工作。

1996年，严月莲与朋友组成关注性工作者团体“紫藤”。她认为性工作者的议题必须受到重视，而且它亦会为社会运动带来新视野，严月莲一直在紫藤工作至今。

其实在女协工作的时候，严月莲已有机会认识阿姐。“我以前住城寨，住一间大木屋，隔开一间房，尾房有一家人，有三四个孩子，大女儿和我差不多大，常常和我抢公仔书看。有一天我妈说：你命好，你要好好听话，否则像尾房那个女孩子，多可怜。我问：你说什么？但我妈没再讲，听同屋的后来讲，那女孩的爸把她卖了去做阿姐。”小学时候，严月莲上学要从城寨穿过去，城寨有些草棚，有人用来吸毒；又有些地方，付一块钱就能看脱衣舞，她们经常撩开那些草棚偷看人家跳脱衣舞。“以前九龙城有些公寓，下面有阿姐企街，有次我爸带我到城南道买东西，他走在前，我走在后，一个阿姐挨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是谁教我的，我马上走上前，抓住我爸。”工盟位于砵兰街，但她从没留意砵兰街有马夫，因每天上班只是想着返工盟，其他什么都看不到听不到。“碰巧那段时间，结识一个好友，她入了行做阿姐，她亦令我更快明白到底这行有什么问题……是姐姐仔带我入行的。”

最初做义工，到深水埗元州街做企街^①阿姐的义工服务，观察到警察会随时抓姐仔。“有一天，有个姐仔适逢月事，没有开

^① 企街，即在街上等待嫖客向她们购买性服务的性工作者，她们被捕的风险比“一楼一凤”和“夜总会小姐”都大。

工；但警察认得她，她当时正好买完菜回家，警察问她拿身份证，叫她上警车，其实是明‘屈’她。她走来对我讲，有没有搞错，真是讨厌极了……我说，那打官司吧……”那时严月莲渐渐发觉，做姐仔的工作，要和警察周旋，在法庭跟法官争论，是不太可能的。“我不忿气，于是就找了几个女人商量值不值得去做；如果要去做，又该走哪个方向？酝酿很久，谈的过程，我知道自己不会死心，就申请成立团体。”

这可能和严月莲的性格有关，若她决定要做一件事，她很少会管别人怎么看，反而是一门心思去找想要的东西。“我会去看书、问人，我以前学的是劳工法例，但现在刑事条例，于是常到北九龙法庭去听审，因为是广东话，当时的企街阿姐都是本地阿姐，有个翻译，翻给姐仔听，翻译讲话声音很响。到底那些官在说什么呢？再去问人。”这样严月莲学会跟姐仔有关的刑事条例，慢慢处理个案，学法例，整年不停在做这些，不停地栽跟头，发觉输掉官司的比赢的多。

“当好友第一次告诉我她做这一行，我第一个反应是：你急等钱用吗？我借你……接着她对我说，除了钱，她有这个需要；我完全不经大脑就说：那你找个男人结婚吧……”严月莲一直看女性主义之类的、讲女性自主、婚姻不能解决女人的问题……她竟说出了这句话！她听到自己说的那句话觉得很刺耳。“我当时完全是为了人家好才说的，这才要命呀！原来自己很相信这些。”那朋友不觉得她讨厌，继续和她有来往。她自己倒烦恼了，怎么和朋友交谈呢？她不要做，但找不到理由。“我就开始问，你做的工作是怎样的？她讲一些，保留一些。”

“她朋友做一楼一^①，直到有次她介绍拍档给我认识，我自以为是，问她：为何要入行？结果被那位阿姐骂了5分钟：你觉得我们做这一行有什么不妥？我说没有不妥，我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她问我：赚多少钱一个月？我说几千块。她说：你知道我一个月赚多少吗？几乎是你一年的收入！她接着说：你也工作，我也工作，分别只是你坐着做，我躺着做！像是给她一下子打醒了，下次见到人家，不再自以为是了。”这次之后，严月莲才懂得去问朋

① 一楼一，全名为一楼一风，指在住宅大厦提供性服务的性工作者。

友，她会碰到什么事、会担心什么；她就说，不能让儿子知道。因为这件事，因为这个朋友，因为被阿姐骂，严月莲真的开始谦虚地去了解人家到底在做些什么，需要些什么。

“紫藤成立时有遇到困难，我过往的经验都是做劳工，但做阿姐的工作是完全另一回事，我要去学，除了陪她们企街之外，实在不知如何入手。劳工运动的经验还是有用的，譬如要教晓她们法例，于是我走去印法例书；还有，一开始我们就写，关心你们的职业健康，我打开报纸的风月版，有很多一楼一广告，我就想做一楼一吧。”那时开始，她们挨家挨户走访一楼一，也去马槛^①。她们开出了新路，一楼一和企街是完全不同的工种。今日回望，严月莲觉得当时的决定是对的，这个行头本身实在太大了，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大家不用重叠资源。

紫藤令社会对姐仔多了认识，是选举的时候。她们出了声明，要求政客不要利用姐仔作政治本钱。那次，无论对紫藤或社会，都打开第一扇门。“我本以为，这样出声明，会被人骂得要死，我怕没人联署。心想，死就死吧，就去试了，反应竟然不错，真是意料之外！”联署的人不少；也引起公众讨论。那一炮打响，壮大了我们的胆子，对紫藤的肯定多了。”



^① 马槛，原为马圈用语，即马的栅栏，后黑道分子以赛马术语借代色情生意，故马槛现在一般指卖淫场所。

“最初走访一楼一，了解到差佬^①会用枪夹着甘蚊（二十元），告诉阿姐，我用甘蚊来嫖你，你能把我怎样！”时至今天，警察不敢再这样做了。还有，当警察一听到阿姐说要找紫藤，就会皱眉头。据内部消息透露，入境处和警处开内部会议，扫黄行动之类，他们会说，千万不要让紫藤抓到话柄。对警察来讲，紫藤某程度是很大的威胁。对阿姐来讲，紫藤打开了一条路，教会她们一些法例，阿姐现在会说，以前阿 Sir 上门查牌，她们觉得是奉旨的；但现在阿 Sir 上门查牌，有部分阿姐会说，你客气些好，这是我的私人地方。这是多年来紫藤的同事们落区（实地走访）、开法例班之成果、功劳。

2003 年，紫藤要求保安局局长不得纵容警察以执法之名于放蛇时先享受打飞机、强令性工作脱衣搜身、利用警察身份苛索免费性服务；也要求保安局正视性工作受黑社会及客人威吓、强收保护费、讹骗、抢劫及强奸时警方爱理不理的问题。反映后的情况非但没有改善，更因为警方高层随后公开表示容许警员作“有限度身体接触”，在高层的无理“支持”下，紫藤于 2004 年 1 月至 10 月共收到 120 宗投诉，较 2003 年增加 4 成。警察放蛇时免费嫖的投诉增加（共有 35 宗），特别是放蛇打飞机（共 15 宗）增加一倍。投诉还包括警察在查牌时经常出言侮辱（11 宗），迫迁（10 宗）及赶客（12 宗），性工作亦经常被迫签文件（23 宗）及甚至强迫拍照（4 宗）。她们在警署的权利亦受到剥削，包括被打（16 宗）、禁止打电话（25 宗），被迫签口供（28 宗）、剥光猪搜身（6 宗）等。严月莲及“紫藤”锲而不舍向传媒及公众展示警方的不合理行为，虽然性工作仍受到欺压，但社会人士已关注于性工作遭到不平等对待的问题。

“对抗警权时要很小心，差佬很贱，不是直接找紫藤麻烦，而是去骚扰姐仔。最近有个姐仔从大陆来，她很本事，也相信我们所讲，如果不是在床上被捕，她只是走在街上，警察没权抓她上差馆、没权告她。她到差馆之后，坚持要打电话给我们，坚持不作口供，结果她就被四个差佬按着殴打，殴打完她仍坚持，一定要找紫藤。我们找了律师去，律师到了只能指出她有权不作口供，

^① 差佬，即警察。

但仍要把她送去入境处。”从警处到入境处，足足有五天时间，期间严月莲她们根本不可能找得上她，她们约了几位立法会议员，请他们帮忙把这些打姐仔的人追回来，最后姐仔放了出来。过程中，姐仔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她是弱势，就要被4个警察按着来殴打。这正反映了她们面对暴力，不正义。

“以前我们学劳工法例，人家欺负我时，我懂得用法例保护自己。”但在现实架构中，工人永远是最弱势的，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和老板斗争的过程，其实很痛苦的。“以前做劳工法例倒还好，我可以陪工友到劳审处去吵，但现在我们没资格进入警署，紫藤算是老几？警方根本不会怕你，你一定要靠律师。还有，有太多事我们接触不了，但当我们跟议员讲，10个有9个议员会说：很想帮你，但没有办法。”紫藤有个案也交不了给议员，拳头近，警察会去找姐仔报仇，她们就处于两难。当警方发狠反咬姐仔，她孤独地在差馆（警署）中和警方斗，严月莲的心情很难受。“差佬会知道我们这班八婆很麻烦，时常惹他们，但还不致令他们真的怕了我们，未到制衡的状况。权力制衡是我能跑去差馆叫他们把姐仔释放，我不必把差佬放在心上。他们现在可以半夜三更去破人家的门，人家在睡觉，他去抓人。”

反歧视教育

与性工作者共同争取权利，对严月莲来说，既是人本的呼唤同时也是她个人学习和反省的过程。与困苦者与行，向社会展现她们的困境，严月莲对社会公正及公平有着强烈的信念。自严月莲当工会组织者开始处理劳资纠纷的时候，她擅于建立人际关系以及协助伙伴展现自助组织的才能。她明白到需要一个友善的外在环境以改善性工作者的处境，因此政治倡导及公众教育是必需的。但同时透过个案工作帮助有需要的性工作者也是核心的工作。她主张外展工作是最有效接触社群的工作。若果没有接触，便难以明白性工作者的处境，而为她们提供及时及适当的协助是非政府组织必需的工作。

考虑到这一点，严月莲的主要工作策略为提供服务及政治倡议以保障性工作者的权益。严月莲亦会透过另类的文化运动、普及教育、尤其针对改变公众对于性工作的看法。紫藤成立近10年

来独排众议，坚持维护、争取本港性工作者的权益。为继续争取权益，亦为筹募资金，紫藤开拍反映性工作者生活和工作的纪录片。早前于2004年1月，紫藤举办了“性工作者摄影展”，引起社会的回响。严月莲说：“有人说我们很有计划，把小姐的生活变成一个文化展览。其实当时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只是简单地想：与其让人拍你，不如自拍。拍了以后，我觉得不应浪费小姐的心血，所以我们就花钱放在我们平常都不会去的地方——所谓高尚的地方进去展览，但就是想不到有人会觉得小姐的摄影不能登大雅之堂，社会这种普遍的成见，我认为不妥当，所以就冲过去。”（《明报》2004/10/19）

严月莲另一工作特色，就是她维持与敌视性工作者人士的对话。由于公众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依然于很大程度上误解性工作者为衰败、不合法及不道德，而导致性工作者被排斥于社会之外。严月莲却鼓起勇气、直接地对传媒及其他社展群现有关性工作的另一面图像，坚持性工作者应享有作为社会合法一员的法律权益，以及确认性工作为工作。社会中部分人士因而消除了他们对于性工作者根深蒂固的偏见。

严月莲的身份亦经常令她遭到敌视者的辱骂。例如某次严月莲在油麻地一间茶餐厅吃早餐。奶茶还未喝上一口，就听到身边有3位女士甚不友善的你一言我一语：“肯定她系做那一行啦，她的阿妈都是啦！”严月莲没有回应，心里只是希望她们千万不要拿起奶茶泼到自己身上。3位女士足足数落严月莲15分钟，待她们终于停口，严月莲冷静的问：“阿师奶^①，你闹完喇，我食得早餐未？（我可以吃早餐了吗）”紫藤的工作具争议性，严月莲相信她因为不久前做过《城市论坛》嘉宾，在电视上曝光，而被人牢牢记住了她。

又有一次在大学演讲完毕，一位教授趋前问她：“你的口才真好，你读书读到几年班呀？”严月莲每天接触这么多人，绝对懂得鉴貌辨色，她知道教授话里有刺，礼貌背后是羞辱多于欣赏。

“我去大学做讲座，也带姐仔一起去。从此，姐仔开始面对性

^① 师奶是粤语对已婚女性的称呼，带有贬义，多指不懂礼貌、说人是非者。

行业以外的人，她站在讲堂里讲性工作。我想，这是很好的公众教育过程。当然也有姐仔去过一次大学，说以后再不去，因为那些学生不长进，什么鬼话都说得出口，姐仔会受不了。譬如大学生问她们：觉不觉得自己没有尊严？但大部分姐仔透过讲座活动，认识多了行外的人，这对她们来讲是开心的。维持与姐仔的关系，就等于我们很艰苦的经营和维持拍档关系，我和她们一起经历过一些事，她们对你的印象就会较深刻，她有什么特别需要，你陪着她一起经过，关系就会较稳固。”

“性工作者这个称谓……公众或身边的人在这10年间……不断见到效果，例如报纸也跟了紫藤用性工作者，是有进步的，虽然真的很慢。这个名词，在某时某刻松开了人的思维，要花很多气力，但当能够梳理时，又会很高兴。去大学上课，开始时，学生用的词语都是鸡、鸭、鹅；但到了下课时，有些学生勉强会用性工作者。真的接受不了的，也会叫声阿姐，不再鸡、鸭、鹅的叫她们，这是好事，只是费解何以连这些基本尊重也要花那么大气力。”

姐仔令我们对性与情欲有深层反省

“当有阿姐说，我要打救世人，想社运里的人都会帮忙，我们都是超人，来打救世人的。但如果有个阿姐说，我想学习如何留住客人的技巧，那就未必个个接受得了，特别当碰上挚爱亲朋光顾姐仔的时候，就更接受不了。”严月莲说这是最深层的挣扎，涉及我们如何看待性、看待两性关系、多元关系，那一篮子的东西，实在太复杂了。“我希望透过T-shirt，当然这也是赚经费的，人们可以把一些平日讲不出口、不能做的事情，表达出来。照片展是另一种方法，让姐仔拍自己的事，我没想过出来的效果会这么好。”照片展过程中，严月莲觉得很有趣，不是阿姐拍照的过程有趣，而是把这些相片放在公众地方，看到人们的反应。“我们去租场，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那负责人说，我们需要摆一个牌，写明未够十八岁要有家长陪同，于是我又要和他吵：为什么要摆这个牌，又没露毛，又没露胸，什么也没露……他说，因为涉及‘性’字。”荒天下之大谬。当严月莲在照片展场地看场，人们走过来说，原来阿姐会照相……严月莲就答：是呀！阿姐还会吃饭

哩！有些人又说，阿姐很有艺术细胞，这个镜头拍得很美，懂得曝光。“……很好笑，那张照片正因那位阿姐不懂摄影，跑去照镜子，一下子光都散了，他却竟说懂得曝光。那些人的脑袋在诠释什么？还有人走上前，问我可否介绍阿姐给他认识、到哪里可以光顾……”展出的过程很有趣，严月莲坐在那里想，人的思想是多么古怪。

紫藤举办大型研讨会，令姐仔知道原来外面有很多人支持。“我们要做法例上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开阔社会空间，这才能推动修改法例，改法例非一朝一夕，我想到我死那天，那些法例大概也未改。”

“紫藤也要和保守团体和政客打架，譬如明光社、冯检基……我从十字架开始，但现在要和部分十字架对垒，当他们讲圣经时，我知道那是哪一章哪一节，立法会议员也知道那段经文的原文不是这样解释的，这对我有帮助，我会用他们的术语，和他们对话。但当然，他们不是在讲圣经，只是在讲自己的保守看法。”严月莲对他们没什么寄望，以前做劳工或妇女事务为紫藤带来良好的社运网络，紫藤是会刺人的东西，有些团体接受不了，但团体中可能会有个别的人觉得这是需要再思考的问题。紫藤的存在，对别人而言，是不舒服的。紫藤不出现，就不会挑战到大家对性的看法。“我的性格讨人厌，会刺人，令人反思多些。我记得当初和被虐待妇女组织同台的时候，那个女士死瞪着我，我根本不知发生什么事，还以为自己什么时候开罪了她；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恨我，而是阿姐，其实也不是真的恨阿姐，她和老公之间出现问题，并不是阿姐的问题，而是另一些问题。”严月莲说。

严月莲对性的看法，也因服务性工作者而改变了。“我曾劝朋友找个男人结婚，做了10年，我个人最大得益是，我不断问自己，其实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接受不了的原因是什么？何春蕤说很好，我们从小到大，主流社会教导我们一对一关系，重新学习不只是头脑里的学习，而是真心去学，去反思。”严月莲明白，无论是阿姐还是客人，都有不开心的事。譬如那些男性客人，社会上觉得男人该是如何如何，当有些男人不是如此，例如有些男人比较被动，他无法在主流社会刚强的去追求女孩子，他追不到，人家会说他差劲；又有些男人认为，如果没法在性方面满足老婆，

是男人最大的伤害。“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但他们和姐仔相处，反而会很舒服，因姐仔会主动和体谅。做了姐仔服务这10年，我明白多了人受传统影响之深。和姐仔谈起，客人一定会问：我厉不厉害？当初我会笑他们傻瓜，行不行还不一样要付钱？后来明白主流社会压得男人透不过气，他没办法对老婆讲：我很累，不想做。他不敢，怕老婆说他没用。真有老婆会这样讲！”现在严月莲明白多了，现实中很多性事是被扭曲了的。

要看到改变，路仍漫长

严月莲希望人们不要歧视和自己不同的人。但过程要有多长时间？要付多大代价？“这是我最于心不忍的，第一线受压迫的是姐仔，我们总觉得这是很大的痛苦。我不和平，我不是鸽子，我经常骂人，城中恶人，我算是数一数二。我总是刺激着别人，令人觉得不舒服。当然我也知道，和平并不等于不去吵，吵的人也不等于不和平。”

“我之前做劳工，相对现在做阿姐，要容易得多。”对严月莲来说，20世纪70年代争取分娩假期，要争取30年，但过程相对不那么难。“别的我不知道，但分娩假期，我是看着它立法的，真的没那么困难。你去游说别人支持孕妇，真的相对容易得多。”但做紫藤的10年，严月莲发现原来真的很困难！困难是即使是以前的盟友，或朋友，最后也会因为性工作议题而跟你分道扬镳，接受不了你，“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善待性工作者这回事这么难明白，性工作是工作，这是姐仔的工作，但人是很奇怪的，过不了就是过不了，这令我很费解。”

“我最初很天真，主流社会、社运和政治都在讲警权，于是紫藤也讲姐仔面对警权；但人家说，我们不讲这个。我说，大家都是人，应有基本权利，这是大原则。放在良家妇女、一般人、外劳身上，大家能接受，但一放到阿姐身上，就会出现‘但是…’。”10年间严月莲看到太多这种事。用实际例子来讲，讲人权有两种，一种是姐仔被警方困铁笼那种，由人权延伸出来；另一种是工作权，非刑事化，这也是人权的一种。“人权已分了两种，一种是你作为受害者，会有人同情；但若你很强自去喊，这是我的工作，就少人支持了。”

“阿姐只不过要大众给她空间，让她去讲，现在她做这份工作有什么开心和不开心，客人对我好或不好，差人对我滥用力、我赚钱是为了养家。”紫藤关注的是她们的职业健康、安全。“如果说我们是鼓励她人卖淫，我就再跟你辩论，我们很清楚自己是在讲姐姐仔的权益。姐仔绝对有权入行或不入行，但女人入行就不应被惩罚。姐仔继续做的时候，在行内要面对的问题，也需要有人去关心。”

总结——性工作，是工作

严月莲于成立紫藤之前，十分关注劳工议题。她投身非政府组织工作前，自己也曾遭受过雇主剥削，她关注的议题广泛，包括劳工权益及保障、妇女劳工分娩保障、托儿服务、失业妇女权利、维护工人权利等。

在妇女劳工的议题上，严月莲争取法律改革和劳工保障，让社会确认及明白妇女劳工的困境和需要，已成为关注劳工权益运动中，不可或缺而又独特的一环。

然而，对性工作者来说，至今仍未见任何法律改革。紫藤成立，严月莲为维护性工作者的工作权利和保障，带来了很大的贡献。现存法律问题已开始获得一些社会人士讨论和醒觉。紫藤亦于香港女性主义运动中，引进了性工作议题，并作为性别平权论述中的反思。严月莲与亚洲及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团体之间的联结，亦有助于把各地性工作者团体及支持者的团结力量提升至亚洲及世界层面。

严月莲主要服务的目标社群是劳工及性工作者。明显地，由于她及其组织把这个社会上被边缘化及被剥削者的情况加以呈现出来，让公众看到弱势者的情况，支持者及志愿工作者亦因严月莲的信念与热诚而得以启发及动员。

如果说和平是彰显公义以让每一个人于和谐、尊重别人和受到尊重的环境下生活，严月莲的一生都是贡献给被褫夺和平权利的女性。过去10年，严月莲选择服务处境最困难的性工作者，她从个人层面达致和平，与人本关怀的面向缔结。

后记——

2005年10月10日，香港一名性工作者李婉仪身怀6封遗书，

写下“还我清白”、“讨回公道”字句跳楼身亡，以死控诉警方滥权。紫藤和李婉仪的家人为死者鸣冤，要求严惩滥权警员，对死者家人作出合理赔偿和道歉，修订“放蛇”指引，列明警员在行动中不可“免费嫖”。可惜，数月后的死因庭上，陪审团在法官的引导下，对案件不作出任何建议，裁定李婉仪死于自杀匆匆结案。紫藤谴责警员于死因庭的作供是有所隐瞒和包庇。2006年6月，紫藤发出联署声明，要求香港政府遵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停止暴力对待性工作者。

王莉文
知恩与知足



文：赵玲

为着最需要帮助的人们四处奔走呼吁，办起幼儿园、老年公寓和家政学校。……一直抱着知恩与知足的平常心，为着平常百姓的困难与需求不断行动着。

769

今年 62 岁的王莉文曾担任过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乐山市委主任。退休后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公益性事业，当上幼儿园总监、老年公寓院长、家政学校校长。多年以来，王莉文在认真完成政府工作的同时，为着最需要帮助的人们四处奔走呼吁，尽管付出了很多很多，她却一直抱着知恩与知足的平常心，为着平常百姓的困难与需求不断行动着。

王莉文和丈夫是四川外语学院的同班同学，两人大学毕业就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场劳动锻炼。白天他们和农场工人一起从猪圈挑粪到土里种猪饲料，晚上睡在猪圈一间简陋的小屋里。两年的劳动锻炼虽然艰苦，但王莉文每当回想起这段日子给她的磨炼，心中总是充满感激。后来王莉文又被分配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

年轻活泼的王莉文当了体育老师，常常教孩子们打篮球，去河里游泳，后来又上起外语课，孩子们特别喜欢她，学生们放学都来帮捡柴，还从家里拿来木板为她建一个挡风的小厨房，令她十分感动。那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每月42块5，她俩要拿出其中40元分别寄回重庆和沐川老家。他们经常处于借钱与还钱的处境中，一年也没买过一个鸡蛋，有了孩子以后生活就更加艰难了。两年后赶上原单位复办，她背着年幼的孩子一次次去请求调动工作，经过了很多困难挫折才调回来。她说，正因为有着这段经历，一直到现在她都特别能体会最基层的老师和群众的难处，能帮他们解决的问题一定尽量去解决，即使解决不了也会跟他们讲清楚道理，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希望。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两年也在王莉文的心中流下了深深的一份情结。在她后来无论是担任市长或人大代表她总是尽力多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鼓与呼、多办一些实事。1991年她就操办建立了自己所在的民主党派与马边彝族自治县民族小学的对口联系帮扶制度，向马边彝族自治县民族小学提供了大批的教学设备和生活用品及各类教学扶持，为民族地区免费培训师资骨干。

新区儿童 幼有所学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乐山城市迅速向外扩张，城北出现了一片新区，城内单位向新区搬迁，新区人口的急剧增长给财政吃紧而还未来得及完成配套工程的市政府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有一天清早，下着大雨，王莉文坐在轿车上看到一个妇女冒雨蹬着自行车带孩子进城上学去，母子俩浑身都湿透了，孩子还在瑟瑟发抖。这一幕场景在她的脑海中仿佛定格了一般，令她十分心疼，众多新区儿童到哪里上学的问题开始在她脑中盘旋。正好她被市长叫了去，市长对她说：“王市长，新区儿童上学的问题已成燃眉之急，我们政府建一所中学、一所小学，给你五亩地，你想办法找钱办一所民营幼儿园。”这是一项令人感到突然而又十分刺激的任务。王市长没有思想准备，对从没有过“空手道”经历的自己是否“白手起家”心中无数，但她还是喜欢接受挑战，更喜欢为儿童们的成长做点什么。她没有犹豫，当即向市长口头立下了军令状：“我要像母亲为孩子办事一样，把幼

儿园尽快建起来，还要把它办成一流的幼儿园。”

说干就干，一周里她亲自跑完了立项、选址等工作。接着5次去成都找专家研究方案、搞设计。一个月后，设计出来了，城建部门很满意，工程队愿垫资修建，于是工程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全面铺开了。接下来，王莉文又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化缘”历程。第一站是民盟乐山市委，她请求盟员同志集资、捐款，首战赢得了1万元资金。听说佛教协会首领们在峨嵋山开会，她立即驱车前去游说。她告诉他们：“今天我不是以市长的身份来向你们搞摊派的，我是同你们一样要做好事、善事。请你们帮助解决孩子们上学难的问题。”她的诚意和对孩子们的爱打动了老人们，他们从自己的化缘钵里慷慨地拿出了10万元，为工程垫定了第二笔款项。



11万虽然已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但对一个需要二三百万的工程而言，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工地不断告急。无钱买不进钢材、水泥。不得已，她把目光投向北京。到了北京，见到了财政部副部长，部长说：“怎么连建幼儿园也来找我？”她说：“我是响应您在山东开会时讲要扶持社会力量办学的号召来。”部长笑了，

说：“好吧，让我想想办法。”回到家，眼巴巴地望着部长给钱，一等便是两个月。眼看9月开学，幼儿园才刚刚修好了教学楼，工程队因为资金不到位就不干了。王莉文心急如焚，买了机票又准备上北京。当机票拿到手时，她却因四处奔波、游说而病倒了。她爱人说：“那还上北京？赶快住医院吧。”可是，她实在顾不上，强拖着病体还是去了北京，又见到了部长。部长请她喝水，可她竟虚弱得连杯子也拿不起来，坐在椅子上直打晃。大概是受她的精神感动了，部长第二天就批给了50万。有了这笔钱垫底，她更加来劲了，随身背着工程计划、设计图纸和远景规划，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就这样，1万、2万、3万地“乞讨”。1993年王莉文硬把这个幼儿园建了起来，并取名“乐山艺术幼儿园”，突出艺术教育对幼儿智慧的启迪。

民盟里面大多数人都是教育界人士，他们非常希望能把乐山艺术幼儿园办成教育的实验田。作为民办公助、自负盈亏的幼儿园，王莉文在此推行了全新的体制和教育理念。幼儿园园长、教师都是聘任的，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0%，而且给每一个人都买了养老保险。王莉文还利用去北京开会邀请到新西兰学前教育专家来乐山合作，开展“中国——新西兰学前教育科研项目”，让新西兰的专业人士来幼儿园的“中一新班”实习半年，并有两个本地教师辅助——更好地学习新西兰先进的学前教育理念。实验一年以后召开家长会，由王莉文的丈夫做翻译，家长和老师们反映都很好。回想起这些年的艰辛，王莉文自己都难以相信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去干这种自己从没做过的事情。也许正是一颗母亲的心为孩子们的成长而跳动得特别激烈的缘故吧。

“夕阳红老年公寓” 老有所依

作为长寿之乡的乐山是中国的老齡化城市之最。王莉文喜欢孩子，也喜欢老人，因为他们跟孩子们一样，需要照顾，而且更需要精神慰藉，于是她找了民盟的同志商量——民盟里有许多老同志，他们都认为给孩子办了好事，也该为老人办点好事了。王莉文提出现在幼儿园已初具规模，收入除了还账和应付日常开支，已有了些结余，能否把这些结余拿去为社会多做点好事，多办点实事。她的建议得到了民盟乐山市委的支持，大家都把钱投入到

老人公益事业，去帮助政府解决正面临的社会老龄化问题。事实上，打从幼儿园开始招生起，王莉文就在考虑下一个好事做什么。几年来，她无论是外出开会还是学习，都特别留心各地对老弱病残开展人道主义活动的情况，收集了不少数据。从各地的经验中她了解到，办老年公益事业，难度远远超过办幼儿园或别的什么学校，后者容易得到政府支持，家长也舍得为孩子花钱，而老年公益事业说起来是“夕阳无限好”，但那毕竟是已近黄昏的事，国家经济情况还不可能有大投入，也难伸手化缘。要搞得像中国老龄协会会长张文范所说，走建立市场机制的路。即使这样，很难说能把投入的钱找回来，然而，此事又非得有人去办不可，而且需要热心的人用热情去办。女市长协会有个会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养育千家儿女，孝敬万户爹娘”。此时此刻，王莉文已感到义无反顾了，于是又展开了自己的第二个战役——建一所老年公寓。

又是一番道不完的千辛万苦、呕心沥血。1998年，老年公寓建成，几千平方米的花园、避雨的回廊、宽敞的多功能厅等设施齐全，非常适合老年人的生活起居。现共接待休闲娱乐和居住的老人10万人次。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缓解了因老年公益设施不足给政府造成的压力，在民办老年性公益事业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然而由于当前许多人的思想观念跟不上，工薪阶层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每月600元的费用还是有很多人接受不了，所以颐园的长年入住率并不高。王莉文只能也把公寓作为对外开放的宾馆，更多地利用内部的活动场所为老人们开展各类健康公益讲座。她现在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开展多种经营来保住这一份老年产业。

女子家政服务 学技艺讲理论

四川大部分山区人均耕地面积很少，种地仅能维持温饱，许多农民只能靠外出打工挣钱。本世纪初，在“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之下，王莉文更深刻地感受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的疾苦。2002年，作为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副会长的她，常常思考着怎样把家政服务这个新兴产业在乐山发展壮大，为农村妇女和下岗女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她先后考察了北京、深圳、

成都的许多家政公司，在许多大城市，家政服务员已不再是私人介绍的保姆或佣人，而是堂堂正正的家政公司职员。她们的工资不找主人要，每月按时由公司发，该休假就休假，不休假则会领到加班工资；保险由公司买，如有扯皮官司，一律由公司替她们出面打理。有些大的家政公司还对成千上万的家政服务员实行电脑管理；每个月和家政服务员通多次电话，关心他们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并一一记录在档案中；凡家政服务员有正当理由提出更换服务对象的，都能及时提到满足。王莉文回到乐山后，积极奔走、多方联系，仅两个月时间便促成民盟乐山市委和市妇联联合办起了“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乐山培训中心”，她担任中心主任，不失时机地动员区（市、县）政协、妇联、民盟基层组织以及新闻媒体为全市妇女就业鼓与呼。仅一年时间，中心先后送出6批近100名妇女到北京家政公司。为了更好地给做家政服务员的妇女们服务并提高她们的工作水平，她又开始筹办“乐山德艺女子家政学校”。

王莉文曾说：“我办这样一所学校，目的就是要帮助这一急需帮助的社会群体，我要让她们学习谋生知识和技能，走出穷山沟，走出下岗后度日维艰的困境。这所学校，不望把学员培养成科技工作者，也不旨在造就企业家。学校的宗旨就是努力使农村妇女和下岗女工通过学习和培训，成为有觉悟、有知识和技艺的新型保姆—家政服务员。”她深知，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勇气和智慧去克服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可能来自物质，来自精神，来自社会大环境。对物质的困难，她说：“过去当市长，在第一条线解决实际问题很锻炼人，我已经被磨炼得很坚强，很能想办法去应对；今天，要把长期为社会不屑一顾的‘保姆’一下变为堂而皇之的家政服务员，社会认可吗？受训者认可吗？她们最终能昂首挺胸地以家政工作者的身份跨进用户的大门并不卑不亢地留下，完成自己的使命，托起‘家政业’这块金质招牌吗？”要真正让贫困姐妹自信、自强起来，她需要做许许多多的细致工作。

王莉文做的第一件事是争取免费招生。她知道，要让山沟里的妇女和下岗女工缴了钱来学做家务，根本不现实；但不收学费，又怎能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和保证高质量的教学与培训呢？她又想到依靠她的民盟组织和政府的支持。她向民盟市委汇报了自己

的想法，再次获得了组织无私的支持，把校牌直接挂在了民盟创办的老年公寓，为学校的开办解决了基地和部分设备及软件问题。接着，她踏上了过去自己创办幼儿园和老年公寓时的“老路”，开始了四处游说募捐的征程。凭着为百姓做好事、办实事的一番热忱和执著，她说动了市长、农工办、扶贫办、劳动及社会保障部门，为学校争取到了增添设备的经费，为学员们争取到了基本的培训费。

农村姐妹和下岗妇女们终于带着希望来了，王莉文亲自给她们讲课，鼓励她们自尊、自强。她认为，对家政服务员的培养，首先是心理素质的培养。为了消除学员的自卑心理，她甚至把她们带到自己家里实习，告诉她们“市长”也是人，他们的生活应同常人一样，别看他们住得比你家宽敞，因为公务的原因，他们的家务往往一塌糊涂。许多类似的家庭，需要你们的帮助。当市长、当家政服务员，这只是社会分工的问题。全社会对家政服务员和公务员的认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为职业平等的最终实现贡献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她让姑娘们去买菜、做饭，同她们一道品菜，一顿在“市长”家里的家常饭，拉近了“平民”与“官员”的距离，为山里妹子长了不少自信。几个技术提高比较快的下岗女工后来还成为公司的老师。

王莉文十分重视教学和培训的各个环节，一心要让妇女们学到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从学员进校到上火车奔赴工作岗位，她都守在学校，亲自组织安排教学活动。她就这样连家也不顾地成天扑在这份不收取报酬的工作上，以自己行动感动了市里的领导、众多行业的专家、学者。市委书记、市长表态，让学校把在外的优秀家政服务员请回来给新学员现身说法，发挥榜样作用，政府给她们出路费；市卫生局为学校派来了妇幼保健站的医生，教给学员们婴幼儿保健的知识与技能，还让学员们免费去保健站实习，观摩接生与护理；夕阳红老年公寓为学员们请来了插花艺术家，派出了最好的厨师和客房部经理，为学员们示范烹饪技术和卧室整理技术、衣服熨烫技术。由于注重了教学与培训质量，“德艺”培养出来的学员成了北京、上海、深圳几家家政服务公司追逐的信得过人才。在最近举办的四川省首届农民工技能大赛中，“德艺”女子肖娟以其扎实的家政服务理论知识和娴熟的技艺一举赢

得第三名，被四川省妇联抢先直接送到了中央首长家工作。

武装了思想，学好了技艺的学员，学校得把她们送出去，在新的岗位上留得住。王莉文通过对全国多个大城市家政业情况的调查，发现大多家政服务员去到一个新的家庭，都有一个心理和生活适应期。在这一时期，如果她们得不到足够的关心和温情，便会动摇而流失。这种流失，少则两成、三成，多则百分之七十、八十，甚至有时会成批走掉。为了家政服务业在我国的发展，她决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出校门，延伸到家政服务员上岗后的继续教育。这几年，她每出差去北京，都要到中青公司等用人单位了解家政服务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收集打工妹们正反方面的典型材料。她希望，从她学校走出去的学员，个个都能成为爱岗敬业的优秀家政服务员。中青公司经理对此颇有感触，说：“王市长，像您这样关心家政服务员的领导，我还没有见过。‘德艺’送来的人，有您我们省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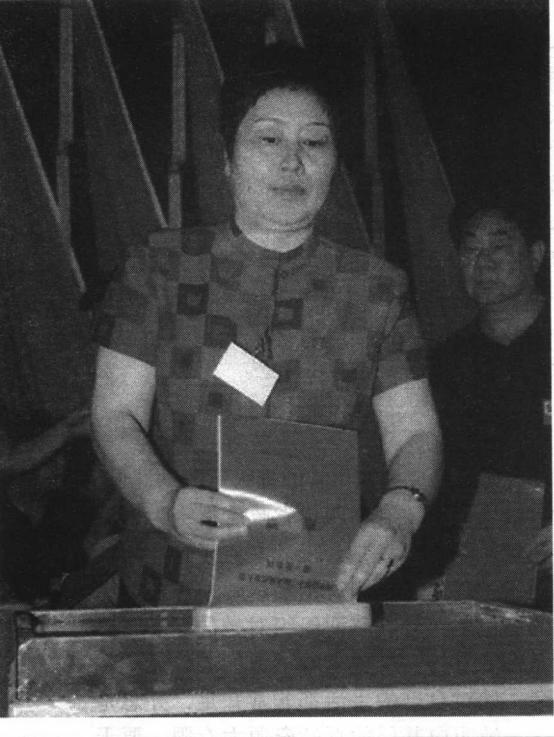
学校还对毕业后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学员承诺“三保”：保证为她们找到可靠的家政公司，保证为她们办理上岗所需的一切合法手续，保证为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而永远负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诺，它是一粒消除家政服务员后顾之忧的“定心丸”。特别是在维权方面，学校长期跟学员保持热线联系，随时有义务向学员们提供咨询和帮助。这些年来，王莉文和她的学校为此付出了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心血。单亲母亲李叶英去上海做家政，留下了家里住房产权问题和上大学女儿假期的落脚处问题，学校的热线电话一直关心和帮助着她的问题；彭兰芬大专毕业却无钱缴纳学费，拿不了毕业证，王莉文亲自给校方联系，保留她获取毕业证的资格，一个个热线使她在北京家政公司工作愉快；李艳红希望边打工边读书，王莉文恳请中国国家协张会长帮助小李落实一个有条件的家庭……。对学员们离校后的人文关怀，是乐山德艺女子家政学校对学员们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它对家政业的健康发展，至少提出了一个供所有热心者思考的问题：家政服务员需要人性化的教育与管理。

王莉文对家政学校出去的学员的关心远非承诺所限，只要到北京都会挤时间带上小礼品去看望她们，甚至在参加“两会”期间也是这样。为了给在外打工的姐妹更多的关怀与鼓励，她还

止一次地恳邀国家协张会长、全国妇联的刘部长、民政部阎司长、乐山的市长、书记甚至四川省的省长同赴家政服务员茶话会。自己忙着，还动员他人跟着忙，她知道，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努力。她更希望通过长期的努力，改变社会对“保姆”工作的偏见。为此，她已不止一次地深入边远山村，给妇女们讲课。2004年，她的手臂在一次下乡讲课的归途中因车祸而粉碎性骨折，至今一块钢板还留在身上。

后记

十几年之后的艺术幼儿园已经成为四川省的省级示范幼儿园，今天的德艺女子家政学校被乐山市政府和四川省政府指定为“劳务输出培训基地”和“川妹子”培训基地。王莉文对于这些年的付出一直无怨无悔，她说做人就应该知恩、知足。她一直非常感谢自己丈夫、亲友对她的体谅与关怀，感谢组织对她的培养，感谢平凡的百姓对自己的帮助和支持。带着这颗感恩的心，无论在领导岗位上还是退休以后，她对自己的生活都非常知足，并总是关心着社会的公益事业——她明白基层的百姓资源太有限，要干一件事太难了。因此只要是百姓需要的，她就一定要尽力为他们去干，而且干一件事就一定要干好！



朱晓霞
丹霞一片映民心

文：薛夏原

同情心与谦虚是相通的，我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可以当一个倾听者，并尽所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与群众同乐同悲，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解决好，是朱晓霞的心愿和为政之道。

美国电影《费城故事》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艾滋病患者汤姆·汉斯会见黑人律师时，律师对他的遭遇虽然十分同情，但在跟他握手时仍然充满疑虑。人们对律师疑惑的目光之所以印象深刻，源自于对艾滋病知之甚少而产生的恐惧心理。然而，在河南省西华县的两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人们经常看到一位40多岁，仪态端庄、秀外慧中的女同志走家串户，与艾滋病患者亲切交谈，询问用药和身体情况；对患者家属嘘寒问暖，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她，就是中共西华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朱晓霞。

倡导婚育新风 改变落后面貌

1997年岁末，组织上一纸调令将时任周口地区乡镇企业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的朱晓霞调到淮阳县人民政府，经县人代会选举担任副县长，分管计划生育、卫生和人事工作。

拥有120多万人口的淮阳县，经济基础薄弱，计划生育工作当时处于全市的“锅底”。人口的过快增长，严重制约着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历届县委、县政府最头痛的问题。

“哼！男的还干不好呢，又换个女的，能行吗？”上任伊始，有些干部群众流露出明显的不信任。面对异样的目光，朱晓霞没做任何解释，甚至连一个简单的就职演说都没有，而是不断深入乡村，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

通过调查走访，朱晓霞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固然是影响淮阳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传统生育观念的根深蒂固。要彻底扭转落后面貌，仅靠行政命令和罚款只能治标，思想观念的彻底改变才能治本。她召集县计生委领导班子及中层领导开座谈会，统一思想，提出了以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为龙头，把深化计生宣传工作，转变群众生育观念，作为扭转全县计划生育工作被动局面的突破口。

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朱晓霞决定选择有代表性的白楼、临蔡和刘振屯3个乡镇为试点，以村村建立婚育新风理事会为载体，大力宣传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男女平等和计划生育丈夫有责等新型婚育观念，普及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知识，传播科技致富信息，引导群众少生快富，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倡导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婚育新风理事会成立后，管自己、教子女、帮亲戚、带邻居、走千家、讲政策、送资料、传信息，广泛开展各种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很快就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刘振屯乡农民张某，儿子、媳妇在外地打工，已生育一子。张某认为一个孙子太少，瞒而不报，鼓动儿子和媳妇再生一个。朱晓霞了解情况后，登门做老汉的工作，给他讲党的计划生育政策，讲多子并非多福和少生快富的典型事例，使老汉打消了多要孙子的念头，打电话给儿子，要他们在外安心打工，

早日致富。在她的带动下，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在试点乡镇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试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朱晓霞建议县委、县政府召开现场会，动员全县20个乡镇的509个行政村，全面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达到了“让万家人知道，让万家人参与，让万家人支持”。2001年，淮阳县被评为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先进县”。

朱晓霞在全县计生干部中的影响来自于她的工作思路和创新，更来源于她的亲和力和身先士卒。局面打开后，她又把心思用在推进全县计生工作的台阶上。2000年国庆节长假期间，朱晓霞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外出旅游，而是带领县乡计生干部到冯塘乡葛庄村，为全县集中治理计划生育工作后进村搞试点。天不作美，阴雨连绵。通往葛庄的乡间土路被雨水浸泡，车辆无法通行。朱晓霞和同行的计生干部毫不畏缩，她们穿着深腰雨靴，踏着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地进村了。

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该村“两委”工作室院子里杂草丛生，房屋年久失修，村里计生台账未建，资料没人管，人口底子不清。“这样的条件和状况，怎能搞好工作？”朱晓霞组织大家对村室院里的杂草进行了清理，找来村里的会木工活的对房屋门窗进行整修。工作队员们挨家挨户对全村育龄人口及生育人数进行了登记造册，短短7天时间，查出漏报、瞒报100多人，澄清了全村人口底子，帮助建立了台账，调动了村干部的积极性。群众为工作组的精神感动，主动参与到计划生育工作中，很快改变了该村计划生育工作落后的状况。

试点成功后，朱晓霞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建议，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后进村集中整治活动。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对全县排出的100个计生工作后进村，进行集中整治。这一做法在河南省计划生育工作现场会上作了经验介绍，受到肯定和推广。

通过“婚育新风进万家”和“百村集中整治”活动，淮阳县计划生育工作落后的面貌得到了彻底改变，由三类县跃入二类县行列，不少单项工作还名列全省前茅，甩掉了多年来制约淮阳经济发展的计划生育工作落后的帽子。

传承伏羲文化 打造旅游品牌

2001年3月，市委调整淮阳县领导班子，朱晓霞被任命为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分管文化旅游和教育工作。她调整工作思路，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淮阳古称宛丘，历来被誉为“华夏先驱、九州圣迹”之地。6,000多年前，伏羲就在这里建都，创造了华夏远古的灿烂文化。199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到淮阳视察，挥笔题写了“羲皇故都”4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并指示有关部门拨出专款230万元用于太昊陵的整修经费。

淮阳县新一届领导班子决定把淮阳强大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打造旅游品牌，让有5,000年文明的人祖伏羲太昊陵及风光秀美的万亩龙湖走出河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当时，令朱晓霞揪心的是太昊陵的管理问题。她忧心如焚地说：“我最大的心病就是太昊陵的管理和整修问题。”的确，随着一年一度的太昊陵庙会不断扩大，其内部管理混乱和外部环境的脏、乱、差问题日益凸显。更有甚者，由于太昊陵博物馆人员内部不团结，造成一些工作不能正常开展，用于修缮陵区的经费眼看就要到期，再不动工就有被收回的可能。朱晓霞怎能不心急火燎？她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了派工作组进驻太昊陵博物馆，查找矛盾症结，对症下药的建议，得到了常委们的一致赞同。

在派一名宣传部副部长带人开展工作的同时，她多次赴郑州邀请省文物专家和古建筑能工巧匠到淮阳设计太昊陵整修方案，最后确定7项重点工程。到2001年底，经过近9个月的严格施工，7项工程全部完成，是新中国成立后，太昊陵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

硬件改善后，朱晓霞又协调工商、公安、城建、卫生等部门对太昊陵周边环境进行了治理，对个体商户进行了整顿，对坑蒙拐骗行为进行了打击。在2002年的庙会期间，陵区内无垃圾、无纸屑、无坑蒙拐骗现象发生，接待人数高峰期一天达20万人之多，当年收入298万元，是上一年的两倍多，创历史新高。员工的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成为旅游的一个亮点，被晋升为国家4A景区。香港《文汇报》、《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均进行了报道。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的6大要素，县城的环境卫生、文明程度直接关系到淮阳的声誉。一次，朱晓霞在太昊陵检查工作，听到群众议论说：“啥时候把咱淮阳大街扫得像这儿一

样干净，来旅游的人才多呢！”群众的议论使朱晓霞受到启发。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近年来，淮阳的城市建设欠债多，投资少，管理跟不上，街上垃圾随处扔，个体商贩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秩序混乱。在历次的全市“三优杯”检查评比中都是倒数第一。打造旅游文化品牌，不光是打造一两个景点，而是要提高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文明程度，县里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宣传部。朱晓霞想，淮阳缺少资金，但并不缺人，任何事情都是要人去干的，只要把人发动起来，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她请示县委召开大型动员会，发动县直机关和城关镇每周五进行义务劳动，县四大班子领导和各局委分包路段的做法，狠抓城市卫生状况的改善，每周五下午，她都带着县文明办人员和县电视台记者上街督促检查，现场录像，当晚在电视台播放，对好的单位表扬，对不到位或到位后敷衍塞责的单位通报批评。有人开玩笑地说她是“扫大街的部长”，而她却不以为然地说：“能把淮阳的大街扫干净，也不是易事。”一次县委常委会议开始前，时任县委书记递给朱晓霞一张纸条：“城湖内有漂浮物。”不言自明，朱晓霞当即通知有关单位组织打捞，防止了湖水污染，净化了龙湖环境。

淮阳县主干道北段有一个小吃夜市，每到下午5、6点钟，60、70户小吃摊主们在马路边支起摊点，开张营业，烟熏火燎，直至深夜，收摊后留下的是满地油污和垃圾，不仅严重影响交通秩序，造成交通堵塞，而且给环卫工作带来难度。县委决定对这个小吃夜市进行搬迁，并划定新的经营场所，实行统一管理，由宣传部协调公安、工商、城管、卫生等有关职能部门做好这一工作。搬迁通知发出后，由于原位置地处闹市，摊主们怕搬到新址后利益受损，抵触情绪很大，个别人想借此要挟政府，要求给予经济赔偿。其中有3户摊主认为在原址经营了几十年，家就在附近住，就是不同意搬迁，并煽动愿意搬迁的摊主说：“就是不搬，看他们能坚持到啥时候。”

朱晓霞得知这一情况后，分头找到这3户主谈话。每到一户，她不温不火，拉家常式地给他们讲“酒好不怕巷子深”的道理，只要做出的小吃有风味有特色，只要诚信、守法经营，就不怕没有人登门。以小见大，说淮阳目前的发展现状，谈淮阳以后的发展远景。朱晓霞以女性的平和、认真、执著和善解人意，使3位

摊主心悦诚服，心平气顺地搬迁到了为他们划定的新的经营地点，使主干道从根本上得到了优化。

在淮阳县召开的全市城镇“创三优”现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淮阳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上创造了一个先例，淮阳的经验值得借鉴。

当年，在全市“创三优”活动检查评比中，淮阳县由原来的倒数第一名，一跃成为全市正数第一名，并连续保持两年。

巩固基层组织 帮扶共建小康

根据工作需要，朱晓霞于2005年6月调到西华县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角色变换，一切从零开始。朱晓霞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她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再创辉煌。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朱晓霞的足迹踏遍了西华县的100多个村村落落，基本摸清了全县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实际情况，为该县成功开展“创双强建小康”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培养典型，探索多种创建模式，该县相继打造了红花镇龙池头村的林果和绿化苗木育苗、田口乡滩上村的食用菌栽培、大王庄乡的规模化种植、迟营乡花园村的大棚蔬菜种植、李大庄乡二台村的品种猪养殖、黄桥乡黄桥村的个体企业、逍遥镇常村的皮革和麻辣汤料加工、叶埠口乡上徐村的铁业加工8个“双强”工程示范基地，对全县“创建”活动的成功开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在西华县聂堆镇惠楼村更为突出。该村交通闭塞，自然条件差，群众生活困难。朱晓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朱晓霞深知要改变此村的现状，首先必须尽快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她一方面给群众讲外地农民发家致富的例子，调动村民求富求变的积极性；一方面针对该村道路状况不好的问题，四处筹集资金10多万元，帮该村修出一条长1.6公里的出村柏油路。同时，她还积极引导群众靠种植果树和饲养奶牛发家致富，使群众有了希望，有了奔头。

2004年是全市“项目建设年”，市委、市政府明确要求，全市上下要紧紧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坚定不移、千方百计地大上项目，上大项目，上好项目，上强项目，上科技含量高的项目，上经济效益好的项目，上市场前景广阔的项目

目，以项目拉动经济增长，以项目扩大招商引资，以项目优化经济结构，以项目推进协调发展，以项目培植发展后劲，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闪光点。朱晓霞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她了解到聂堆镇有一个民营水泵厂，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和资金不足等问题，面临倒闭。朱晓霞认真分析了该厂的发展前景和广阔市场，多方论证，认为该厂可以重点扶持，遂决定由政府部门介入，让该厂所在地的村两委作担保，进行融资。由于背后有政府撑腰，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可信度，在很短的时间内，村民融资近100万元，使该厂起死回生。

胸怀为民之心 关爱弱势群体

朱晓霞为人谦虚，处事低调，一如她平时总是朴素的装束；她温良谦恭，把女性特有的细致与关怀渗透到领导艺术中；富有同情心的她常说：“同情心与谦虚是相通的，我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可以当一个倾听者，并尽所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在淮阳，朱晓霞兼任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救助失学儿童的“春蕾计划”发起后，她倡议县委四大班子成员每人资助一位贫困学生，使17名贫困学生得到了救助。淮阳中学高二学生小曹，父亲因做生意血本无归，欠下巨额外债，无力负担继续读书的费用，面临辍学。而刻苦勤奋、成绩优良的小曹不甘心就此放弃，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他省吃俭用，有时一天只吃两顿饭。朱晓霞把小曹作为资助对象后，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生活上

给予关心，学习上给予鼓励，逢年过节，买衣服都是两套，儿子一套，小曹一套。在她的关爱下，去年，小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到校后，他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是给“朱妈妈”的。他在信中写道：“朱妈妈，我一定不辜负你对我的关怀，更加勤奋努力，掌握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报答你，报答社会……”

在西华县，有两个省级艾滋病疫情高发村，艾滋病致孤儿童的学习、生活情况一直牵挂着朱晓霞的心。按照省、市委部署，她号召全县组织、人事、老干部系统开展“献爱心，救助艾滋病致孤儿童”活动，对12名艾滋孤儿开展救助。朱晓霞经常到这两个村庄，了解孤儿的生活、学习情况。其中一个村里有一位14岁的女孩，父母因患艾滋病双亡，和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生活和心理的压力，使她产生了辍学的念头。一次她在村里听到女孩哭着说：“我不想上学了。”女性特有的恻隐之心被女孩的哭声深深刺痛。她把女孩揽在怀里，动情地说：“孩子，你年龄还小，来日方长，一定要坚持完成学业。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帮你。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次日，她为女孩买来衣服和学习用品，托人给女孩捎去，使女孩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与群众同乐同悲，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解决好，是朱晓霞的心愿和为政之道。一天下午，已在基层连续忙碌了几天的朱晓霞，拖着疲惫的身体迈进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她刚想休息一下，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来者是西华县物资局一位离休干部的家属。她一见朱晓霞用近似哀求的口气说：“朱部长，我爱人是物资局的离休干部，为党工作几十年，如今已经去世10年了，当时有几百元钱的药费没报，按政策应该给我的3,000多元安家补助至今没有落实。为这事，我没少跑腿，就是没人管。这回算我求你了，你可要管一管，为我做个主啊！”看着老人期盼的目光，朱晓霞安抚老人说：“只要情况属实，要求合理，这事情我一定管。”在她的过问下，老人很快领到了拖欠近10年的3,400多元钱。

离家抢亲百愧 博大胸怀为民

作为一名基层女干部，朱晓霞对工作、对事业、对周围的人是无愧的，而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她愧疚的心情却是永

远不能释怀的。在县里工作8年多，她与家人聚少离多，每每想起年过七旬的老母亲替自己带大儿子，操持家务；深爱自己的丈夫在工作上给予理解和支持；儿子从小就锻炼得到较强的自理能力，她心中是既欣慰又歉疚。欣慰的是她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歉疚的是她陪他们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2000年7月份，周口遭遇多年不遇的大水，横贯周口东西的沙颍河告急。上级要求沿河乡镇，严阵以待，抗洪抢险，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朱晓霞和男同志一样，分包堤段，日夜坚守在抗洪大堤上。她身先士卒，跳入齐腰深的水中挥锹大干。无声的行动带动在场的干群纷纷跳入水中堆石、打桩，加固了堤防。恰在这时，喜欢踢足球的儿子在与同学的一场比赛中，突发阑尾炎，急需手术，但险情不排除，她怎能下大堤，就打电话给妹妹，要她帮助母亲照顾好儿子。出了手术室，儿子委屈地流着泪对姥姥说：“我妈回来，你一定要狠狠训她一顿。”姥姥只好哄他说：“不是你妈不回来，是河堤上手机信号不好，联系不上。”一个星期后，险情消退，朱晓霞才急匆匆赶回家。儿子看到她满脸的倦容和身上还带着泥水印的衣服，未等妈妈开口，先问候一声：“妈妈，你辛苦了！”朱晓霞望着仿佛一下子长大的儿子，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去年，儿子考上天津一所大学，高兴地对妈妈说：“开学时，你一定要去送我。”为了让儿子高兴，朱晓霞欣然答应了。可开学日期临近，朱晓霞却对儿子说：“对不起儿子，妈不能送你了。”原来，去年夏秋之交，雨水不断，从西华县穿境而过的贾鲁河发生漫滩。朱晓霞帮扶的聂堆镇境内严重受灾，几百户人家房屋倒塌，近2,000亩农作物被淹，群众生产、生活出现困难。当时，民政部门拨的2万元救灾款，对于几百户人家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朱晓霞忧心如焚。她对儿子说：“你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我当然很想送你，可现在我分包的乡里，有几百户群众房屋倒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能走吗？再说，能早一天给他们争取到救灾扶贫资金，也能让他们早一天重建家园呀！”儿子理解母亲那为大家的博大胸怀，次日在父亲的陪同下登上了北上天津的列车。

在朱晓霞的多方奔走下，受灾群众的家园很快重新建起来了，而她又开始为改善聂堆敬老院21名孤寡老人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安度晚年而忙碌起来……

李军

『小巷总理』

无悔的追求



文:尔密

以人为本、不等不靠、共建共筑、敢为人先。

“社区是我家，情系你我他，建设靠大家”的社区理念。她的工作方法是，到哪去专找一把手，工作谈不透不撒手，社区理念谈不清，人家听不明白不能放他走。

“你这个‘小巷总理’比我还风光嘛！你做了那么多好事，我代表党和人民感谢你！”朱镕基

“小巷总理”——

这位被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誉为“小巷总理”的人，是沈阳市大东区万泉街道永丰社区的主任李军。全国有多少万个社区，就有多少万个社区主任，就有多少万个“小巷总理”。为什么李军独领风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赞扬？“悟道是在任何情况下心胸宽广地活着。”我对她的采访，实际上是一次悟道。

走进永丰社区，一眼望去，新粉饰的住宅楼。这种楼群，比

比皆是，司空见惯。我们脚下的柏油马路，也不算新鲜。但，有人告诉我，我脚下的街道，眼前的楼群，6年前还是一片破旧不堪的棚户区。泥泞的土路垃圾成堆，随便一阵风，就会飘起一群无家可归的破旧纸屑和塑料口袋的残骸。破损的马路龇牙咧嘴坎坎坷坷，下水道说堵就堵，堵得一口水也不能吞咽，随便一阵雨，就会出现泥泞和积水。老舍先生形容解放前的龙须沟说，下雨是墨盒子，刮风是香炉。用在这，不算夸张。

谁愿意在这地方住啊？只要有半点能耐，就要想办法离开，流着无奈的眼泪离开，离开这穷得叮当响，致富没有路的鬼地方。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离开，上哪？祖宗留下的土窝窝，怎肯轻易放弃？鸟儿不忘它的故枝老巢，鱼儿总要恋着童年的小河小溪，1,300余户永丰巷的老居民，还是如期回迁了。还有几百户居民，随着商品房的开放，也住进了永丰。这就是永丰社区的群众基础，也就是社区干部的上帝。“上帝”有“三多”：“下岗的多，贫困户多，残疾人多”。整个社区7,000余人，下岗失业人员就有600多，低保对象240余人。改变这些人的生存环境，提高这些人的生活质量，是6年前，李军走马上任的时候立下的誓言，是李军退休以后再次寻找她人生价值的生活目标。李军，她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三头六臂？手眼通天？在商海浊浪把每个人的物欲都翻动到空前绝后高涨的时候，她坚守着少女时代的单纯与信仰，用青年时代燃烧不尽的激情，打造年过半百后的一片精神与理想的平台。我决心走近她，走进她的广袤深邃的内心世界。

李军1961年参加工作，至今已有40多个年头。是由一名营业员逐步走上处级领导岗位的。1979年，从她入党的那天起，她就下定决心：“我是党的人，就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在岗期间，她牢记党的教诲，时刻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她的各项工作任务，多次荣获省、市、区的荣誉称号；连续4届当选为区人大代表，两届区人大常委，2003年光荣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她又是一个3次大难不死的人。一次1976年车祸，她在无轨电车轮胎下被拖出去11米远，造成左足开放性骨折，伸趾肌腱、足背动脉断裂的终身残疾。一次是1992年末的结肠癌，肠子截去一尺半。还有一次是在2003年6月份脑出血，经抢救，现已康复。因此，她认为她的生命是党给的，没有党和

人民就没有她的三次死里逃生。也就更没有她的今天。她相信一个人的生命之花，只有奉献于为党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才会永远蓬蓬勃勃地开放。

艰辛跋涉拓新途

1999年3月，为了加速领导班子年轻化进程，她积极响应区委号召，提前两年从区科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冷静思考自己的一生，总感到党和人民给予她的太多太多，而她对党、对社会贡献太少，她觉得她的工作还没干完，也没干够。她虽然退休了，但不能忘了党的恩情，离岗不能离党，退休不能褪色。当时好多同志找到她，又打电话的，又到家谈的，又要和她一起搞项目开发；有要与她合作，让技术转变成巨资的；还有的不用她上班，光出点子就给钱的；当然也有请她到居委会的。她左思右想，从自身的成长和工作经历考虑，毅然选择并下定了竞聘社区主任的决心，心甘情愿地争当居民百姓的领头雁，愿用她的余热来回馈社会，奉献给她居住的永丰社区的父老乡亲。

决心归决心，现实工作给了她一个严峻的考验：她面对的社区是由原来4个居委会合并的，以产业工人和动、回迁的普通居民为主体的棚户区改造的老居民区。居民构成复杂，道德水准、生活水平不一，需求差异很大，存在着下岗的多，困难户多，残疾人多，遗留问题多，热点问题多。如马路损坏，垃圾成堆，房子漏，下水堵，暖气冰凉造成管道冻裂、跑水、挨淹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人们形容社区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臭，赚钱没出路，好人不爱住”。从委员会自身工作看，既没有办公用房，也没有基础资料，委员会的干部全是新上来的，就一个老人，因此业务生，手头儿慢，包括她本人，要进入角色还要有个过程，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尤其是有的个别居民不理解她们，把社会上的热点、难点问题全都发泄到她们身上，把她们当成了“出气筒”，有管她叫妈的，“妈呀，下岗了没有饭吃你管不管”，有骂娘的，有把她们修路说成“整景”的，又要砸居委会的，还有祸害人的（往居委会门锁塞牙签、火柴棍的）此情此景使人心寒。因此，要当好这个居民百姓的头，实在是难上加难，怎么办？好心的人都劝她别干了，放着自家太平日子不过，何必要自讨苦吃呢！

实事求是地讲，从她们家看，可以说是孩子省心、丈夫温心、生活舒心，没有什么愁事。满可以不去干这种最没有职、最没有权、最没有钱的苦差事。但她想，她能活到今天，全是党的恩情、社会哺育的结果，在社区成立大会上领导的鼓励与希望，居民们给她投上信任票的情景，老居委会主任的楷模，白秀彬、杨桂玉老大姐扶危济困，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总是浮现在她的眼前。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她不但没有退缩，更没有推脱的理由。她下定决心，绝不能动摇自己的选择，绝不能有困难面前低头，一定要把这担子挑起来，从开创从零开始的新事业上迈出第一步。她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她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直到成功。用自己的光和热，为党分忧、为民解愁。

李军知道，群众反映的问题，是现实的。人平不语，水平不流。老百姓是水，领导干部是船，水可以载船行舟，也可以把船淹没。社区不是一级政府，主任不是政府官员，李军给自己定位：你是群众的头，不是政府的腿。群众的头，联结着群众的心、群众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李军的身边还有一伙人，这伙人来自方方面面，干什么的都有。但都有一颗热爱社区的心和为社区居民忠诚服务的雄心大志。在工作中，李军坚持四个原则：“以人为本、不等不靠、共建共筑、敢为人先”。做到四靠：一靠党和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二靠为居民百姓做好事，办实事的实际行动；三靠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教育群众；四靠塑造和完善自我的人格魅力感染教育群众。从改变社区面貌入手，发扬“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和“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的精神，凭着一颗妈妈的心，一张婆婆的嘴和跑不断的两条腿，不管严寒酷暑，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走访社区单位；一次又一次协调各方面有关部门，感动了这些单位的领导，增强了“社区是我家，情系你我他，建设靠大家”的社区理念，从而达到了认识社区、支持社区、建设社区的目的。她的工作方法是，到哪去专找一把手，工作谈不透不撒手，社区理念谈不清，人家听不明白不能放他走，直到表了态，下了决心达到敲钟问响的程度才罢休。从而先后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 550 多万的资助。550 多万元是什么概念，她们计算过，就是说：假如李军每月的

工薪是1,000元,她需要500多年不吃不喝,才能攒足这500万,这是个天文数字啊!李军她们太敢想了,太敢做了。但如果你看见过去尘土飞扬的永丰巷真的变成了花园小区,你会怎么想,怎么说呢?你也许会查遍《辞海》找寻选择最美的辞藻语言刻在这历史的丰碑上。她说干就干,解决了办公用房,购置了办公桌椅,配备了686微机、喷墨式打印机、投影仪、摄影机、数码照相机、扫描仪、传真机等现代化电教设备。整个小区道路5,595平方米,铺彩砖2,796平方米,修建了5个大门,安装了有线广播,两处灯饰阅报栏,6盏路灯和18栋楼道安装了亮化灯。3处共30米长的科普画廊,3,750平方米的绿化带,新栽“龙爪槐”等乔木近千棵,水腊绿篱、宿根花卉近万株;改建了一个110平方米的社区活动室,600平方米的多功能办事大厅,新建三处5,000平方米31件健身器材的室外体育休闲活动广场,今年为了建和谐社区又筹集资金20余万元启动了地下车库,将地面上原有的3个破旧自行车棚,全部拆除改建了绿地,对小区内17栋楼的楼道重新粉刷、刮大白和外墙粉饰,小区道路和楼体亮化也正在进行中……。她还协调供暖公司、自来水公司为进一步改善居民冬季供暖条件,将多年细管线改成粗管线,将原来的旧水表全部更换成新水表,变二次加压水为电脑控制的循环水,让老百姓喝上了放心水。通过共筑共建,资源共享,在6年多的时间里,现已建起电教室、阅览室、警务室、活动室;建立了先进的卫生医疗站,生活求助站,法律咨询站,便民服务站;建立了社区党校、文明市民学校、家庭美德建设学校、经营文化学校,她们还与沈阳大学、沈空训练大队联合创办了以“全面、全员、全程”为特点的永丰社区学院,成立了社区科普大学。满足了社区居民求知、求学的愿望,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了社区功能,彻底改变了永丰社区的面貌。使一个旧小区一跃成为省文明小区、全国文化先进社区。

心牵百姓 性系千家

6年多来,李军把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她们社区下岗职工多、困难户多的实际,积极带领社区一班人,坚持把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作为社区的重要工作,提高到民心工程、党心工程、稳定工程的高度来认识,

力求做细、做好、做实，使社区内低于最低保障标准的109户241人及时得到了生活保障，使失业下岗人员中有再就业要求的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她们自身创办的社区服务网点就安置了91人。特别是每当年节，当她们身背肩扛地把近万斤米、面、油分送给社区特困户、伤残军人家中，换来了居民百姓对党对政府的感激之情的时候，她们打心眼里高兴。但她毕竟是年近60岁的人了，不服老不行，2005年“五一”前夕，天下着雨，她们刚刚把困难户的米面送完，听说残疾人洪文秀生病了，她和班子成员前去看望途中，不听使唤的脚踩空了，一头摔倒在泥水中，大伙连拉带拽才把她扶起来，一身衣服全是泥水，来到洪文秀家感动了他们全家，他们虽然智残，但心不残，只要社区有义务劳动，都积极地参加。



社区特困户白盛友患上了恶性细胞肿瘤，手术费需要1万多元，这个数目对每月只靠政府救济的他来说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她和班子成员研究决定，在社区党员和群众中开展了“救助白盛友”的行动，在她们班子成员的带动下，全社区有400多人参加了救助队伍，他们当中有年已八旬的老人，有手捧储蓄罐的4岁儿童，有不曾相识的过路人，有驻社区单位的职工，也有靠政府补贴的困难户，仅一天时间，捐款就达7,180元，从而延缓了白盛友的生命，充分体现了“社区是我家，情系你我他”的伟大情怀！

待业青年夏万成系沈阳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没有找到合

适的接收单位。父亲又因车祸造成全身胸部以下高位截瘫，母亲脑出血，肢体活动受限，家中生活十分困难。为了生存，他和他的女朋友来到社区想开办个复印社，李军知道他的困境后，和班子成员一起从房屋到办执照，帮助他开展了业务，还作为证婚人帮助他操办了婚事，温暖了他对生活已失去了激情的冰冷的心，他的父亲眼含热泪激动地说：“是你们社区救了我的孩子，也救了我们全家，就为这，再难我也要争取多活几年，让孩子好好干，来回报社会。”现在小夏焕发了青春，成为社区团支部书记，被评为市再就业标兵，于2003年“七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小夏的入党在社区居民中、个体业户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现在要求入党的人越来越多，目前又有两名同志先后入党。

社区居民王学奎一度思想消沉，情绪低落，认为退休了没有什么用了，在家眯着就得了。李军知道后多次找他谈心，用社区的人、社区的事、社区的变化启发他，激励他一定要搞好心理调试，迎接人生第二个春天。只要社区有活动，就动员他参加，使他非常感动。他再也不愿沉默了，他把怀揣了几个月的党组织关系主动交给了党委，并发自肺腑的写了一首“回家有感”的诗：“社区党委是我家，相见恨晚方识她，感慨万千掏一句，扑进家门叫声妈。党是母亲谁不晓，你不叫妈你叫啥，豪言壮语不曾有，惊天动地咱更差，愿做慈母有心儿，党让干啥就干啥。”现在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主动帮助社区写板报、扫雪、扫楼道、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样样走在前，他还主动承担了由李军主编的25万字的《永丰社区工作简编》一书的校对任务。他写的关于“挽救白盛友生命”的演讲稿，受到广大居民特别是区委书记的称赞。

社区70号楼居民郝向阳家半夜失火，家里烧的一干二净，女主人长期在外地经商，男主人吓傻了，干躺着不起来，儿子也不知道应该干点啥，李军听到信儿以后，立即和班子成员一起前去探望，不但帮助协调因救火给邻里之间造成的损失，还亲自动手帮助清理灰烬，同时也把党员和群众带动起来了，他们纷纷捐款购买锅、碗、瓢、盆、米、面、粮、油等，帮助他暂时渡过了难关。这充分体现了“一人有难，八方支援”的浓浓亲情，使他家非常感动，还给社区送来了表扬信。这次海啸发生后，他家主动到社区捐款，他说：“我家最困难的时候，社区帮助了我，这回印

度洋地区发生了灾难，我也要尽一点微薄之力，献上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来回报社区对他的关怀”。

中捷友谊厂下岗女工季萍，几次到社区吵着闹着要离婚，硬说他爱人窝囊，没有能耐没本事，几经调解无效，到底离了婚。事后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谁叫门也不开，又因为自己娘家妈改嫁，她恨得咬牙切齿，断绝了母女之情。针对她的实际情况，李军多次到她家跟她谈心，有时一谈谈到下半夜。在交谈中发现她心中迷恋在工厂期间的一位领导，她母亲每月支助她的300元生活费，她却认为是意中情人暗中相助。经过多次交谈发现她是患上了心理障碍症，及时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治疗，现已康复。现在不但母女相认了，她还积极参加了社区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她妈逢人就说，是社区救了她的孩子，今后一定以实际行动支持社区工作。现在社区一有什么事、有什么活动，她们娘俩都积极参加。

社区居民戴雅清，一天来到社区找李军打听办离婚的事情，原来是因为老人房产继承的事与兄弟之间闹起了纠纷，而导致要离婚，李军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开导她，帮她学习继承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能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使她心里开了窍，现在小两口和好如初，并主动放弃了二胎生育指标。类似这种情况，经过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先后挽救了60多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其中，居民段宝骏离婚已6年的媳妇又回家门，照顾年迈多病的公公这件事，在社区里已成为广为传颂的佳话。

为党分忧 为民解愁

祥发二期供暖问题，是几年来社区居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过去是油炉供暖，费用高，效果差，室内温度只有7-8℃，白天在室内都要盖棉被，有的居民发高烧住进了医院，甚至有的居民搬走了。居民上访、堵路、砸锅炉房等过激行为频频发生。李军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找专家咨询，找明白人打听。结果什么招法都不行，只有挂热网。可是要改油炉为热网，谈何容易，不但要改变原供暖单位的隶属关系（447户居民全部重新签订供暖合同），还需要一大笔资金，不是几万、几十万能解决的问题。她利用人民代表的身份，多次向市长、区长写信求援，给2211、市区

供暖办打电话，不止一次地找供暖单位商量，但资金问题，始终没有着落。怎么办？她想，要解决这道历史遗留下来的大难题，必须让每个受益者自己承担一部分改造费用，才好向别人伸手求助。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社区党委的一把手，必须挺身而出，替民做主，做群众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于是她大胆提出在居民中筹资 50 万元，作为工程改造费用的补贴。她的大胆设想得到了区人大和区长的重视和支持，几经研究确定，采取“自己拿点、政府补贴点、供暖单位让点”的办法，由油炉改为热网供暖。可方案的确定，离供暖时间只有 2 个月，她必须在这期间，将她们自己在居民中应缴纳的钱筹集上来。可是居民反应是强烈，一到动真格的，就不想掏钱了，说咸道淡，理由一大堆，就是不交钱。有的认为不合理，有的认为是白交钱，这是个马希尔计划^①，根本不可能实现。一个月下来，光打电话就花了 299 元。到后来是叫门不开、电话不接，再不就推脱大人不在家。说实话，她自己心里也没底。怎么办？她首先在社区党委会上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咬住青山不放松，要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办成！她们连续召开党员、居民组长会议，发动党员、骨干，包楼包户，一次、两次……有时入户动员到晚上 11 点多钟。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先后筹集上来 30 多万元。没达到 50 万，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供暖单位。供暖单位被她们的工作态度和韧劲感动了，在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昼夜施工，新建成了一个换热站，全部检修了破损的管线，11 月 10 日正式开栓。当区人大主任和“二热”的经理共同拧开开栓阀门的那一刻，老百姓奔走相告，自发地燃放起“违规”的鞭炮，敲锣打鼓地给社区送来了“心牵百姓寒，情系千家暖”的锦旗。看着老百姓那股高兴的劲儿，李军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这是激动的泪、饱尝酸甜苦辣的泪。从而开创了由社区委员会与供暖单位签订供暖合同的先河。现在的室内温度达到 20℃ 以上，老百姓说，这么些年，头一回儿住上这么暖和的屋子。

祥发三期 423 户居民住上新房已经 4 年了，但煤气迟迟没有

^① 马希尔是埃及外长，希望以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解决以巴危机，在中东实现“真正的和平”。

开控。由于开发单位的工程款不到位，施工单位没有积极性，给开控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她通过给省、市领导写信，多次与开发单位和煤气公司协商，在市、区建委的督促下于2001年8月份开始动工，在动工的过程中，由于有的居民进驻装修时把主管线给封在了天棚里，给工程进度带来了困难，她和班子成员不厌其烦地挨家挨户做工作，终于使423户居民一户不落地全部开控，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2005年12月底，在她多次登门拜访督促下，又解决了久托7年的423户动迁费25万元，老百姓拿着钱高兴地说：“这回可以过个顺心的年了。”

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

几年来，李军同志坚持用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武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几乎走遍了全市高标准社区，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参观，考察别的社区的好经验，指导本社区的工作，开创了新模式和新经验。在工作方式上，她力求做到“四个到位”，即党的工作要定位——领导核心；社区工作要复位——群众自治；全面工作要升位——争当全市的排头兵；为人民服务要到位——做到“八到家”，即新婚喜事祝贺到家、办理丧事慰问到家、家庭纠纷调解到家、有病住院看望到家、新迁居民走访到家、两劳人员帮教到家、生活保障发放到家、下岗待业安置到家。在工作的作风上力求民主、扎实，从不计较工作时间的长短，可以说没有星期天，也从来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社区内所有的重要材料、资料，包括在省、市、区介绍经验的材料以及各种会议的讲话材料等十多万字，还有各种宣传版面的设计，由她主编的《永丰社区工作简编》一书近25万字，全拿到家里来写，而且几乎全部是用夜间完成的。家里成了她的第二办公室。为了社区工作，家中米饭焖糊过，炖的排骨烧焦过、水龙头忘记关闭放水过。人们都称她是锁头将军，手里的钥匙好几十把：有社区大门的，有报廊的，有单元门栋的。因为她家离社区委员会最近，所以，居民中结婚的、离婚的、出殡的、生小孩的、打证明开介绍信的，一有事全都喊她，根本没有时间概念。就为这，女儿心疼、儿子不理解、丈夫常抱怨：“忙了一辈子，从来不管家，本以为退下来能借点光，结果比上班还忙，

而且是没早没晚，没年没节，没完没了，做好了饭都不回来吃，身体还有病，能吃得消吗？在外边逞能，回家耍熊，晚上自己不睡觉，还影响别人，谁能受得了……”她非常理解儿子、女儿、丈夫的心情，特别是当她看到自己的女儿每天忙于学习、事业、家庭、孩子的弱小身影，在她自己有病时，一个人在医院打点滴却舍不得告诉她，小外孙女在幼儿园有时没人接，她却帮不上一把的时候，她从内心感到愧对她的子女、家庭。她觉得做人母、为人妻，确实有不称职的地方，她没有尽到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好在她与丈夫35年的共同生活已经是水乳交融，当他和她的孩子们真正了解她的思想以后，他们又很谅解她、支持她，使她非常欣慰。说老实话，有时她也确实感到很累，一天忙到晚，回到家腰酸、腿麻、脚肿，全身就像散了架子似的针扎一般疼痛。但是，当她看到永丰社区的变化，看到老百姓对她满意的笑脸，她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她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因为她找到了回报社会的空间，找到了为人民服务的空间，她与人民群众的心贴得更近了，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思想在社区这个大舞台上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几年来，她所在的社区先后获得全国文化先进社区、省文明小区、省精神文明建设文明社区标兵单位、省先进党委、省先进妇代会、省模范退委会、市红旗社区党组织、市高标准示范社区等各种荣誉称号79项。代表省、市、区接受了全国各地来访（包括国际友人）380多批，4,000多人次，并光荣地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向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民盟中央名誉主席费孝通、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等国家领导人汇报了永丰社区的工作。接待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接待了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危、顾秀莲、蒋正华以及国家民政部、全国工商总局、全国总工会、国家计生委、中国科协、团中央等领导的视察和英国副首相兼内阁首席大臣约翰·普雷斯科特的来访。她本人也荣获了全国优秀社区干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省“三八红旗手”、市劳动模范、市社区工作者标兵等荣誉称号。她感到很幸福，也很充实，特别是每当她想到她这个小小的社区主任，能向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汇报工作，握过手，

这真是她一生的幸福。必将在她生命的长河中留下永久的、甜蜜的、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也必将激励着她与时俱进，再创佳绩，她深知成绩的取得是党组织上的帮助教育，是她们的班子成员的密切配合、社会上有关部门和居民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的结果。在这里，她真诚地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帮助过永丰社区的所有领导、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说实话，没有你们的鼎力相助，李军浑身都是铁也捻不出几根针啊！”她愿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题写书名，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文信同志作序，由她主编的35万字的《社区工作的实践》一书和永丰社区画册——温馨的港湾，幸福的家园，奉献给社区工作者。她知道社区工作刚刚开始，她的工作与党组织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她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她要像孔繁森那样，做一颗革命的火种，点燃广大党员的心灵，为了永丰社区美好的明天，她愿做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继续耕耘在永丰社区这片沃土上。面对各级组织、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和鞭策，面对社区百姓的企盼和希望，她将一如既往，再接再厉，把她的全部真情一腔热血，奉献给党、奉献给她所热爱的永丰社区的父老乡亲。

2005年6月29日，李军和她的“永丰社区”成了中国人的骄傲——在由瑞士和平基金会全力支持的“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联会”组织的提名行动中，她被提名为候选人之一。而“联会”之所以选中李军，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方面鉴于她长期以来对社区工作的热爱与付出，并且又确实是来自于基层的干部，最终才做出推荐的，不想一荐成功。“中国的一位社区干部——小巷总理和其他99位妇女一同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无论成功与否，她都将成为我国在此方面迈出脚步的第一人。李军的诺贝尔之旅，说明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世界对中国居民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一位社会学家如是说。

有人说：“做你自己的，是你能给别人最好的建议。”李军的创业史，李军事业的成功，是对逆境中奋斗着的人们最大的鼓舞、最好的建议。现在，她虽然已是60岁的老人，却仍然以旺盛的精力和昂扬向上的斗志，为构建和谐社区而奔波、而努力。她认为，社区是一个社会的窗口，把握了社区就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社会，

建设和谐社区，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社区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包含了社会的基本信息、社会的生活需求，利益关系、群体矛盾、阶层结构和运行逻辑等在社区中都有相应的体现。因此，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我们相信，在李军同志的带领下，一个安宁稳定、环境优美、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管理有序的和諧社会就在眼前。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张
锦
明

实践的最前端 走在中国民主建设

文：敬明

在最后审定她本人的故事时，经过反复考虑，张锦明提出不拟发表其故事，原因是她认为她的工作更多由集体共同完成，不想突出个人在其中的作用。

我们认为集体与个人对于和平的贡献同样重要，但是尊重她的意愿，在此仅保留她的名字，故事从略。

我们感谢张锦明在整个活动中的参与，并对她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敬意。也向本故事的撰写者敬明完成了六千多字的故事表示深切的谢意。

编者



王建华
教人求真
学做真人

文：王平

没有考上高中又没有找到工作的女孩子们，只要你想学习，就到行知女子学校来读书，入学完全没有分数限制。

行知从不论资排辈，而是完全的任人唯贤，否则我们怎么能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为学生定的目标是自食其力，毕业一个学生脱贫一个家庭。

我们见到王建华的那天中午，她刚刚在操场上开完全校师生的动员大会，在太阳下面晒了一个上午，看上去红光满面的。她的丈夫亲自开车去杭州接我们到衢州，在路上给我们看了一本行知学校的彩色宣传册，上面的王建华和很多大集团大公司的女老板差不多，与政界要人握手、到其他国家参观。可是当我们面对面时，王建华给我们的感觉却和所有的女能人、女老板完全不同，40多岁的王建华一脸素面，除了腕上的一块手表，没有戴任何首

饰，即使是那块表也十分普通，一定有不少年头了。她的身上透出的是宁静、自信和沉着，没有一丝金钱与利欲的气息。

她的气质更像一个清纯的女教师，和更多的自信。

一个下午，王建华带我们走过了她的少年、青年和成年，体验她的挫折和成功，希望和憧憬。王建华的事业和生活看上去波澜不惊，宁静而又平凡，但是却时时闪烁出生命的真谛。她更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她所经历过的年代里中国一个江南小城的变迁和故事，她的事业更是对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一个尖锐的讽刺……

“行知”的种子

王建华生于1960年，1966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她的整个学生时代都是在中国“文革”期间，曾在样板戏里扮演过小常宝、李铁梅。她的父母有5个女儿，尽管现在说来，王建华猜想父母要这么多孩子有可能是在等待一个男孩，但是她的父母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女儿们有过这种感觉。

高中毕业到1978年参加工作的两年时间里，王建华每天去她父亲的企业里做泥水工的小工，干些拎泥桶、扛毛竹、挑土的活，做一天可以挣8毛钱，她们这些小工被叫做“八角头”。

零打碎敲地当了两年“八角头”后，王建华到了她们当时所在的衢州市一家蜡纸厂工作，她在工作岗位上，决心也一定要像在中学时代一样，做得优秀一些。在王建华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向上的力量牵引着她，总觉得不能虚度一生。

刚到造纸厂的时候，王建华是一线的烘干工人，一天三班倒，常常半夜起来上班。因为年轻，不管怎么累，王建华还总是感觉有一股力量没有释放出来，所以就给单位抄抄黑板报，写写文章，当职工教师，是个很活跃的年轻人。

和王建华一起进厂的，总共有好几十个青年人，厂里就把原来的团支部改成了团委，由于王建华表现出宣传能力和与大家的亲和力，就被选为厂里的团委书记，到办公室工作了。后来她还负责仓库管理，然后又到科室里搞制图、描图等。

年轻的王建华热情而又精力充沛，在单位里表现出色，赢得了很多荣誉称号。1985年，王建华作为培养对象被衢州市委组织

部推荐去读大学，同时和已经相识相爱的徐飙结了婚。

1987年，王建华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原来的蜡纸厂，一年后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丈夫的爷爷、父亲和他，都是家里的独子，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王建华的公公婆婆一定十分盼望王建华能生个男孩。可是王建华生了女儿之后，婆婆奖励了她一台缝纫机，当时的缝纫机还是比较奢侈的东西。婆婆抱着孙女说：女孩子好，咱们可以给她做一些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这样的家庭里，王建华根本没有意识到生女孩有什么不好。

在休产假的时候，王建华每天抱着孩子在当时住的市政府大院里认识了很多。慢慢地她开始觉得人们在闲聊时有些不对劲，人们看着她抱着孩子，总会闲聊几句：男孩还是女孩？王建华就幸福地回答：女孩。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女孩啊，也好也好。”可王建华留心人们听说人家生的是男孩时却总是说：男孩，很好很好！王建华开始变得敏感起来，觉得他们的言语中总有一些看不起女孩子的成分。心里很不舒服，就不知不觉地开始留意起社会上的性别问题了。

没想到，她这一留心，发现这个社会竟然存在那么多重男轻女的现象，并且其严重程度令她吃惊。当时是20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高中还很少，由于没有充足的高中学校，好多孩子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去读高中了。并且在这件事上显出了严重的男女不平等：在录取的时候，男孩的录取分数线比女孩子的低。这样女孩子在发展的机会就永远比不上男孩子。王建华记得当时衢州有一个技工学校，定的分数线男生是200多分，女生是400多分，所以招到的女生很少。

当时在百货大楼当经理的婆婆也讲了这样一个事，她说招营业员时他们也喜欢招男的。王建华非常奇怪，她觉得女孩子比较适合当营业员，因为她们有耐心、笑容好看，可婆婆说女孩子太麻烦了，要结婚、生孩子，孩子生病了要请假，自己又容易身体不好，啰嗦的事情很多。男的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假如家里和孩子有什么事情，老婆会去做，他该上班还可以上班。所以，尽管这个工作很适合女孩子来做，但他们还是更喜欢用男的。这种种现象开始让王建华感觉到女孩子在这个社会上好像是多余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这种感觉把她内心深处一种不服气、不服输的

细胞给激活了。

她的丈夫当时在衢州日报社工作，下班回家后，王建华就和他探讨一些性别歧视的问题。他就说起在团市委有一个内部通报，破获了一起名叫“采花会”的流氓团伙作案问题。因为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很多初中毕业生升不了高中、又不到工作年龄，只能暂时在家里等着到了年龄再去找工作，或者等到父母退休了去接班（这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是很普遍的）。这些精力旺盛的女孩子在家里待不住，就到处乱跑，让父母很担心。这个“采花会”就专盯这群十六七岁刚刚初中毕业的女孩子，把她们拉进去糟蹋了，然后又让这些女孩子去引诱其他的女孩子。

王建华听说了这件事感到十分痛心，想如果这些女孩子能去读书，就不会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了，因为最起码她们白天在学校里，晚上在家里都有人看管，总比她们无所事事地乱逛安全。

这就是王建华想办一所后来命名为“行知”的女子职业学校的种子。

离职办学，从理想到现实，其实并不遥远

从小性格外向，在每一个环境里都能够出色地表现自己，个性能够得到比较充分而舒展的发展，可能是王建华敢想敢做、想了就做的性格根源。

1989年8月，王建华的女儿刚刚14个月，她休完了产假本来该回单位上班了，可是，有一天丈夫下班后，王建华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我不想回单位上班，我想办一个女子职业学校。并且如果办停薪留职（工资停止，职位保留），就给自己留了退路，这样的话肯定会给这件事打折。”丈夫听了她的想法之后居然很支持，并且开玩笑说，“如果辞了职，学校也没办成，就当我要了一个农村老婆。我还有工作嘛，也照样给你饭吃。”

丈夫的支持给了王建华一个定心丸，她马上就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从此就不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公职人员。她把女儿放到婆婆楼下的一个退休工人家里，然后去找当时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王建华把自己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以及她为了办成此事给自己断了后路辞职的事都告诉了他。副市长说：“这件事情就我个人来说应该是件好事，我个人支持你（他

讲的是个人的态度，没有以组织、市长这样一个身份来说)。”

得到副市长的支持，王建华就去找教育局的相关人员办手续，但是分管教育的科长却接受不了这个做法，他说：“上世纪50年代我们好不容易公私合营，把私有的学校改造成国家的学校，现在你怎么会想办私人的学校呢。”当时衢州市只有一所党校办的高考复习班，被称为社会力量办学。王建华此举在整个浙江省里来说，尚数首例。虽然这个科长认为太不可思议，但是因为有副市长的肯定，就在申请表上签了字。但是加了一句：“你办是可以，但是不可以发毕业证书。”这倒不是故意为难王建华，因为直到现在的民办私立学校也很难取得颁发毕业证的资格。王建华接受了，因为她担心如果晚办一年，就有可能让一些孩子学坏或者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手续办齐了，接下来是学校的定位问题，王建华心里很明确的是要为初中毕业后没学上的女孩子办个学校，那教学内容是普通高中的课程还是其他的课程？王建华就想：这些女孩子从我这里读了两年书以后，最好的结果就是都能有一份工作，那就应该给她们一些职业的知识。于是就确定办职业学校。然后她找来一大堆关于教育的书，看了很多国内外的教育家的介绍，当她翻到“职业教育”中陶行知的时候，心里一亮：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和王建华的想法契合了，那就是“生计教育”——职业教育就是一个生计教育，学了之后就能够养活自己。然后她又看到陶行知的招生不设置门槛，不看学生考试的分数和家里的贫富。这些做法都太让王建华认同了，于是她即将诞生的学校就有了名字——行知女子职业学校。

心到手到。王建华很快就租好了教室、桌椅凳，定了第一年的招生目标：两个班，一个班50人。就买来大张的彩纸，丈夫帮忙用毛笔在大纸上写好招生广告：“没有考上高中又没有找到工作的女孩子们，只要你想学习，就到行知女子学校来读书，入学完全没有分数限制。”

报名的第一天，王建华坐在租赁的教室门口，等了一上午也没有人来报名，快吃午饭的时候来了一个老先生，来替他初中毕业后待业在家的女儿了解一下情况。等到后来，人就慢慢多起来了，并且是一天比一天人多，最后竟然有176人报了名，远远超

过了招生计划。王建华就给前 100 人发了录取通知书，给另外的 76 位发了一封歉意书，并且请他们到学校取回 5 元钱的报名费（为了让学生家长报名后能不失约）。但是最后来上学的只有 70 人，王建华的行知女子学校就此开张了。

教育的力量

王建华对行知学校的教学和考试进行了改革。她自己既当班主任负责所有的管理协调工作，也给大家讲课。70 个学生分成市场营销和公关文秘两个专业班。王建华决定不请在学校里的老师给学生讲专业课，而是请在该职位工作的人员。她请来了政府的秘书、劳动局的秘书、报社记者、百货公司的经理、商业局、财会科的科长等来做行知女子学校的专业课老师，美术课就到画院去请一些专业的画家来当老师，还请来部队的人给她们军训。

刚进行知学校的女孩子们的纪律性很差，老师上课她们不但不爱听，还要挑老师的毛病，说老师课讲得不好，普通话不准确，后来她们看上课用的案例比较生动有趣，慢慢的这些女孩子就“收心”了，这些女孩子在各方面都进步很快。

王建华反对一张试卷决定学生成绩好坏的做法，设计出一种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考试：公关文秘和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应该有和别人打交道、沟通的能力。所以就让学生每人设计一个活动，要求活动要有意义，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要把所学的知识揉合进去，最后要给评委讲得出来。评委有老师，也有同学，大家决定活动的成绩。

结果，这些原来的“野丫头们”在考试中表现出的创造力令王建华吃惊，也让她由衷地感到自豪。其中两个学生设计的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到现在王建华都记忆犹新。

按说学雷锋做好事是一个老掉牙的主题，但是学生却能够做出新意，把推销、宣传、为人民服务等几个方面都揉合进去了。这个活动的地点是在火车站，选择的服务对象是停靠在火车站台上来往的旅客，做好事的内容就是给他们送开水，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能做得出色，是需要动些脑筋、足够的机智和灵活。

设计活动的两个女孩子就先去找本市不锈钢器皿厂的厂长，可在门口就被门卫阻拦说厂长不在。为了能见到厂长这两个丫头

就去和门卫套近乎，聊天聊熟了之后又问厂长办公室在哪里，最后，门卫告诉她俩厂长的车牌号。这两个女孩子就到进厂必经的路口等着，终于等到了厂长的车，她们就站在路中间把厂长拦下车来，微笑着说明了来意：我们想免费用你们厂的不锈钢水壶到火车站给旅客义务送开水，这样就给你们的产品作了宣传推销。厂长被这两个女孩子打动了，欣然同意。

按照王建华事前给学生们的规定，学生搞活动过程中学校不出介绍信，并且老师也不会出面。这两个女孩子为了进入火车站站台，就找到火车站的站长，说自己是行知女校的学生，要为火车站义务搞卫生、到站台上为过往的旅客免费送开水，站长听了非常高兴，一口答应了下来。

在正式搞活动那天，她们做了两个写着“行知女校”大字的大牌子。在不锈钢的水壶上也设计了一面写着校名、一面写着不锈钢厂名字的牌子。她们还买来一些皱纹纸，做了绶带披在身上，把校徽别在绶带上，十分漂亮。这次活动的反响很大，效果极好，两个女孩子大获成功。她们在向评委叙述这件事的时候还提到一个细节，说每一个接受她们服务的人都会问一句话：多少钱？她们都会微笑地回答：我们是志愿者，不收费。

评委为这两个女孩子打了优秀，王建华心里第一次感到一种收获的喜悦和幸福，她没有想到自己的学生会如此自信、有活力和在活动中展现如此的机智和灵敏，哪里还有从前“野丫头”的影子啊。王建华真正开始体会到“教育改变命运”这句话的分量和内涵。

“行知”的被阻拦

行知女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时社会上还没有实行推荐就业，但是行知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些知名度，有企业主动和王建华联系，想从行知学校招办公室人员、销售人员等。当时有一个劳动管理局的领导就把自己的一个亲戚放到了这里，想和行知的学生一起面试找到工作。结果行知女校派了7、8个学生去一个单位参加面试，里面有那个领导的亲戚，在面试中那个女孩表现得和其他人悬殊很大，她胆怯，眼睛不敢看人，回答问题声音小。面试结束后用人单位向王建华反映说：其他的女孩子都落落大方，怎

么某某那个女孩和其他人相差那么多？这个学生在学校里表现怎么样？

王建华听了这些话感到特别高兴，这就是社会对行知最好的评判，行知女校这些落落大方的女孩子让她信心倍增。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充满着喜悦，行知女校的学生要毕业了，可毕业证却成了让王建华头疼不已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正进行着一场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讨论，每一个人在做或碰到任何事时都会问问：这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是姓资还是姓社？行知女子职业学校这个新生事物自然会被别人用同样的眼光审视。教育局分管行知学校的王科长认为这个学校是姓资的，所以就觉得这个新生事物是倒退的，坚决不支持。教育局还专门为此召开两次严肃的大会，讨论行知女校的文凭问题。后来决定让行知学校的学生参加全市统一的职业学校文凭考试，考试合格后发给统一的毕业证。



可就在行知女校的学生去参加统一的文凭考试时，却发生了很多意外的事情。监考的老师对行知学校的学生十分苛刻，有一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思考问题时把头稍微扭了一下，就被监考的老师以作弊的借口把这个学生的卷子撤掉了。那个孩子就因此没有拿到毕业证。自己的学生如此受刁难，令王建华心里十分气

愤。尽管行知女校的学生非常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和好评，但整个社会挑剔和对立的眼光却给王建华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后来，随着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衢州市又有了几所私立学校，行知女校的口碑也越来越好，这个问题才不那么突出了。但是为了让学生参加市里统一的考试，拿到毕业证，王建华不得不把一些学生将来工作时非常有用的课程压缩了，加入应试的内容。

另一样令王建华头痛的，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对行知学校的收费问题。当时社会上一种普遍的想法：办私立学校的目的就是赚钱，所以，主管部门每年都要向行知学校收1万元左右的管理费。

还好行知学校的口碑在家长和用人单位的赞扬中树立起来了，所以招生的规模在不停地攀升。到1992年，行知学校的招生规模已经到了靠王建华一个人的管理难以应付的局面，让谁来帮助自己呢？王建华想到了事事给予自己支持的丈夫。

王建华的丈夫徐飙当时在衢州日报工作，是该报的三个创办者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报社栋梁。因为他是组织部第一个认定的衢州日报人，把他从青年报社调去创办衢州日报。他一个人既当编辑，又当记者，又是编审、美编，几乎参与这张报纸的所有流程。为了支持王建华的事业，徐飙还是最终辞掉了深爱的记者工作，衢州日报自然非常不愿意让他离开。当时已经开始住房改革，人离开原单位，单位不收回分给职工的住房。但徐飙辞职后，报社就把分给他们的房子收了回去。所以，从1992年丈夫辞职到1994年，王建华的一家只好租房子住了。

中国的很多事情如果有领导的支持，不管他是凭政策还是出于个人的支持，那很多事情就会顺利办成。但也有例外。

1994年，浙江省委书记到衢州来，他在省里听说有一个行知女校，就专门了解一下这件事。省委书记对行知女校这个新生事物充满了兴趣，问王建华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王建华就直言不讳：最大的困难是社会环境不宽松，像行知这样的新生事物发展很困难。我们做的事业是为国家做贡献，可是却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

省委书记听了王建华的话之后很同情，可是当他们的谈话内容被反映到教育局时，教育局的领导居然表示：好啊，我可以不收管理费，但是我要收教育发展基金——名目变了，费用还是照

收。看来姓资和姓社的问题被很多人看成一个原则，不再顾及上级领导的意见。这样过了大概两年时间，直到社会环境变了，这些收费才不了了之。

还有一件事情是行知学校成立团委遇到的困难。王建华本身就干过八年的团委组织工作，觉得应该让学生过一种组织生活，但是申请成立团委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总之，行知学校在办各种各样的手续的时候总是碰到相似的问题；他们被拒绝和拖延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先例、没有依据。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行知人

王建华喜欢用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比喻农村劳动力过剩造成的贫困。中国农村劳动力大大过剩，一个人的事情3个人干，所以，王建华深信农村要想真正脱贫，就需要让一些有知识有技能的年轻人到城市里就业，以增加社会资源向农村流动，同时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也可以相应提高效率。

王建华给行知女校的定位是平民教育。行知主要面向农村招生，95%以上的学生都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村。这些贫困家庭一旦经济紧张，首先想到的就是让家里的女孩子辍学。比如家里的大儿子要结婚，女方会要彩礼，家里的钱不够就会想到让女孩子停止上学，到外面打工。近几年开化县盛行六合彩赌博，有好几家都因此倾家荡产了，行知学校有一个女学生的家庭因为赌输了，家里的东西都被搬走了，这个学生得到外面去打工。

这种事情活生生地发生在王建华的身边，刺激着她在学校的制度上给这些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行知学校现在给学生设计的是“零投资”学习，就是把教育部规定的三年学制安排成前两年在学校学习，最后一年在用人单位实习，实习期可以带薪，这样学生第三年就把前两年的学费挣回来了。行知女校为学生定的目标是自食其力，毕业一个学生脱贫一个家庭。要求学生参加工作后挣的钱要先管家里买化肥、买种子。

对行知学校王建华能做的还有尽量压低学费，降低支出。学校的收费每学期900元，一直远远低于同类公立职业学校的1,500到1,600元的水平。学校招生从来不做花费大的电视广告。学校的教师和资金的效率都是最高的，学校的行政工作都是

由每一个教学老师来做，教室几乎没有空置率。在全市几十所民办学校中，行知学校最后一个买车，直到2004年年底才买了一辆公务车，一辆拉教材、设备的小面包车。有了车后办事的效率高了，王建华他们到杭州开会当天可以返回衢州，省下了住宿费。衢州市几十所民办的学校中，只有行知学校有自己的校舍。

行知学校从70人扩大到了2,700人的规模，也开始由女子学校变成男女混校。1998年，王建华向当地政府提出，打算借鉴企业管理的模式组建行知职业教育集团。政府经过反复的论证，批准了职业教育集团的成立。于是，王建华成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职业教育集团。不过，直到现在，王建华仍然坐公交车上下班。王建华说“我们就是利用有限的资金为办学做更多的事，我们办的是一项事业，我们有理念，跟以营利为目的的办学思路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行知学校的制度都是尽心设计，体现着效率和理念。其他的学校每学期向每个学生收50元的水电费，行知为了培养学生的节约意识，就把这个规定按实际消耗的数量收取。每年9月份新生来了后，学校就要乱一阵子，因为从农村来的学生很多习惯都没有养成，比如不关水龙头、乱扔垃圾、教室和宿舍乱七八糟，学校团委就组织高年级的同学进行“你扔我捡”的活动，学校用整整一个学期对新生进行养成教育。学校还有给学生教理财。很多孩子工作后领到工资，只留下自己吃饭的钱，其余的全寄回家里。学校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是生动、活生生的德育。在主流的价值观中，行知很多学生本来的价值观都是上高中、考大学，他们来到行知学校以后，老师们对他们关怀入微，为他们一点一滴的成长做详细的记录，这对学生成长后的价值观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王建华为真正优秀的教师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实行真正的优胜劣汰，所以尽管在这里工作压力比较大，但是大家都觉得公平。行知学校也对教师进行考核，但是完全不同于其他学校的考核。行知从不论资排辈，而是完全的任人唯贤，“否则我们怎么能打造出自己的品牌。”所以尽管行知学校的老师们工作量很大，但是正是这些与学校共同呼吸、被王建华称为“行知人”的教师和学生们，和王建华共同打造了行知学校和行知精神。

行知学校教师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多，他们一边工作、一边

学习，学校每个学期会请人给老师们讲国内外最新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动态、理念和技能，每年暑假统一派教师到外面进修。因为“提高老师才能提高学生”。和其他的学校不同，行知学校非常支持老师们去提高和深造，行知学校不仅会为每一个考上研究生的老师缴纳学费、住宿费，还照发给他们工资和奖金。但是也有的老师研究生毕业后马上跳槽的，王建华并不计较，因为她对自己的原则很自信，“就一个人来说，学校似乎吃了亏，可是对于留下来的更多的人都会觉得很安心，因为他们觉得学校大度，不计较这些。”衢州市第一次公务员考试时，行知学校的老师有7个人报名，其中4个人考取了第一名，5个老师后来进入了公务员序列。王建华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在衢州市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单位能一下子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行知学校有一个非常健全的工会，负责12套教师住宅的分配及其他教师组织的事情。王建华总是尽量让老师们感觉到学校离不开他、他离不开学校，让每个人都有主人的感觉，他们敬业、努力是为了行知学校，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和学校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而不是王建华和他们每一个人的雇佣关系。

王建华应该感到骄傲的，因为行知学校现在真正的是桃李满天下，毕业出去的“小知行人”经常传来捷报。这个和现在中国普通大学不断走低的就业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生活中的王建华

王建华现在除了她的学校之外，还有很多需要关心的事情。她现在还是浙江省民办职教协会会长、衢州市政协常委等。她还积极做老百姓的代言人。她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机会了解民意，公交车上、平常开会以及和别人交谈中她都会留心听取老百姓关心的话题和意见。

比如当她看到衢州日报上的一篇批评报道，说衢州市的某一所民办职业学校体罚学生，并为此专门设了一个职业学校投诉电话。报道没有点学校的名字，王建华认为这篇报道有误导的作用，因为即使现在，民办学校也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那这篇报道不是更加深了人们对民办学校的不认同吗？于是王建华马上打电话给相关的单位反映这件事。建议应该设一个针对所有教育问题

的投诉电话，接受所有学校中的乱收费、体罚等各种问题，这样才是公平的。她接着给教育局打电话要求知道这所对学生实行体罚学校的名字，还说既然是党报写批评报道就要起到积极的作用。当我们问：16年对人的一生来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期，这么多年的努力，无论是受到误解还是遇到挫折，你觉得是哪些人感动着你并给你坚持下去的力量呢？

没有想到，一直表现得坚强而自信的王建华说了一句：“还是我的学生……”突然捂着嘴不说话了，接着眼泪涌了出来。原来，王建华的丈夫和搭档，昨天晚上突然肩膀疼得一点都不能动，被连夜送到了医院。“他从6月1号开始就说肩膀疼，可我只顾忙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平时那么皮实的人，一点小病小痛根本不当回事，昨天晚上却喊了一夜。”此刻的王建华，这位一心扑到自己的事业中，又幸运得令人羡慕的女强人的心里，充满了对丈夫的歉疚。

她又说到今年读高三的女儿提出自己要高考了，请妈妈今年不要出差了。“那怎么可能！”她对我们说，女儿有一天不高兴地说：我们班主任说，全班只有3个学生的家长没有和老师见过面，而另外两个学生的家长后来也和老师联系了，只有我的家长从来没有和老师联系过。

王建华提到这些，又说不下去了。

等了一会，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平常遇到家庭里烦恼的事情，只要看到学生就把那些事淡忘了，恰好今天学生都出去实习了，没有看到他们。没有情感寄托了，所以就显得很脆弱。

其实王建华的丈夫在接我们的路上就说他们的女儿特别让他们省心，但是他说的是“我们的女儿很会为我们省钱。”从1岁多一点时，王建华就开始筹办行知学校，根本没有时间管女儿，女儿几乎是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女儿上学以后每次考试都能凭自己的分数升入重点学校，小学升初中和初中升高中，女儿都是凭自己的考试分数考到市里最好的重点中学，没有像有的孩子那样为了上重点让父母又托人走关系又要交几万元的赞助费。

但是细心的父亲还是感觉到这样的家庭仍然给女儿的成长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女儿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没有足够的时间互相沟通交流。父亲一直觉得女儿和别人的孩子相比，总

有些缺乏自信。

丈夫直言不讳，说自己的家没有家庭气氛，他讲了一件和王建华之间的趣事：王建华开始办学校时，丈夫在报社工作，两个人都非常忙。丈夫深夜赶完稿子回家时王建华已经睡着了，一大早王建华去学校时，丈夫还在睡梦中。就这样，两个人竟然有3个月没有讲过话。必要时就留一张纸条。

为了办学，王建华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去，甚至把家里的国库券都翻出去兑了现。女儿小的时候身体素质不太好，有一次生了重病，那时王建华已经把家里和双方父母那里的积蓄都拿去办女子职业学校，家里居然一点钱也拿不出来了。王建华是个特别乐观的人，她带着女儿去医院，觉得在排队挂号时肯定能碰到熟人借到钱。现实生活往往是充满戏剧性的，直到轮到她挂号的那一刻，王建华才发现了自己的姐姐也在医院，赶紧向姐姐借了钱，给女儿看了病。

这样的细节如果有时间，王建华的丈夫肯定能讲几天几夜。是啊，16年不短暂，王建华的故事和她的家庭和事业的插曲太多太多了。王建华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诱惑和其他的机会，毕竟，一个行知学校已经证明了她的能力和价值，而这件事对她来说却时时存在着挑战，但是王建华没有动心过，“因为我的初衷很明确，并且不会改变。”



张淑琴
让孩子活在太阳下

文：余旻

将关注罪犯子女这一人之举、民间之举，转变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并最终建立健全合格规范的机构，使每一个无人抚养、无人照看的罪犯子女都能得到关爱。

我希望这里充满阳光。这些孩子应该在阳光下，应该在阳光下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里走出他们的阴影。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在平静和愉快中健康成长，但是并不是每个儿童都能够享受到阳光和雨露。在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因为触犯了法律法规被判刑或者劳动教养，甚至伏法。不幸的生活对这种家庭中的孩子，在他们尚无自理能力的时候就过早地饱尝了生活的磨难和艰辛，命运让他们沦为孤儿、流浪儿，这些孩子是无辜的，也是不幸的。他们也需要一个温暖的家，需要与别的孩子相同的教育，同时他们比别的孩子更需要爱护，更需要关心。

今年58岁的张淑琴，是有着一级警督警衔的人民警察。当过

知青、做过赤脚医生，1985年开始在陕西省监狱局从事报纸编辑记者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她与大墙内的服刑及劳教人员和他们的子女有着许多近距离的接触。1995年，张淑琴从陕西省监狱局机关调到陕西省少年犯管教所担任助理调研员，从事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1995年8月发起成立了陕西省回归研究会，这是一个帮助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回归善良人生，帮助回归人员安置就业的民间组织；1996年5月，张淑琴自筹经费，在陕西省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替罪犯代教代养代管子女的儿童村，主要为服刑人员无人抚养的未成年子女进行特殊教育、心理辅导、权益保护以及职业培训，被称为“世界第一村”。

筹办儿童村——扛起救助罪犯子女事业

谈起当时对儿童村的构想，张淑琴希望的是给这些孩子们一个家的感觉，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没有很多想法，只是想让孩子们不要再受罪，他们的父母能够安心，不要越狱，不要自杀，不要在监狱胡打胡闹。

张淑琴如今是北京市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的负责人。她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和爱心，在救助罪犯子女的艰辛历程中，在抚慰了一个个幼小心灵的同时，也为改造罪犯，使罪犯真正从精神深处洗刷罪恶，重新走向新生，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和途径。

张淑琴萌起救助罪犯子女这个念头，最早是在1987年，是从“管闲事”开始的。当时在陕西省监狱采访时，被采访的一个女犯人跪在地上，求张淑琴帮她办一件事，她家里有5个未成年的孩子，进监狱时都丢给了年迈的老奶奶，从此以后音信皆无。张淑琴扶起了痛哭不止的女犯人，答应了她。

张淑琴利用公休日，坐长途汽车来到了县里，又从县里步行到了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感动了，带着她穿山越岭，来到了一个山沟沟里，在几孔破窑里，张淑琴见到了女犯人的几个孩子和年迈的老奶奶。眼前的情景令张淑琴的心战栗不止，枯瘦如柴的老人坐在土炕上剧烈地咳嗽不止，她的旁边是一床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破被子，被子下面蜷缩着4个孩子，最小的孩子一只脚上是红凉鞋，另一只是绿凉鞋，还有一个女孩胳膊畸形，原来是骨折后未得到基本医治而自然长成的。而大女儿因生病早已死亡。剩

下的这4个孩子，最大13岁，最小的只有4岁，其中3个学龄儿童全部失学。

张淑琴肝胆俱裂，随后，她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妥善安置了这家老小。也就是从这件事开始，张淑琴似乎步入了一个轨道中，像中了魔一样，开始救助那些因父母入狱而无人照管或遭遗弃流落社会的孩子。因张淑琴职业的缘故，她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有深刻的认识。她说，犯人犯罪，服刑、伏法是罪有应得的。但对大多数犯人来说，他们都还有未泯的人性，还有一根最敏感和最脆弱的神经。而对女犯而言，那很可能就是孩子。孩子是没有罪的，不能因为父母犯了罪，就人为地把孩子逼上绝路，这样极有可能使他们的孩子成为第二代罪犯。张淑琴还说，把孩子的问题解决了，更能促进犯人的改造。



在陕西女子监狱，有个叫王素清的罪犯，因推动罪被判15年徒刑，此前她丈夫也因杀人罪被处决。家中留有3个孩子，年迈多病的外公无力管教。王素清的大儿子小小年纪，便经常扒火车、追汽车，打架生事。王素清闻知后，因忧虑过重，导致脾气暴躁，在狱中常与人打架滋事，并且经常寻死，多次被严管。自从张淑琴把她的孩子接到儿童村后，不仅止住了孩子下滑，而且王素清也像换了个人一样，再没有违反过狱规，而且还成为生产上的一把好手。她经常和孩子们通信，互相勉励。另外，一个叫王忠侠

的服刑犯，得知孩子因自己入狱无人教育而在社会上偷窃时，整日焦虑不安，心神不宁。后当她得知孩子到了儿童村，并且逐步改掉盗窃习惯时，激动得放声大哭。解决了后顾之忧的王忠侠安心服刑，由于表现积极，监狱一次为她减刑两年。还有一个叫王清的服刑女犯，当她得知自己在儿童村的儿子被西安翻译学院录取，并且由儿童村免费资助读大学时，王清泣不成声地说，我就是不服刑也没有能力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更不用说能供他上大学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改造呢。

当听到筹办儿童村的消息时，无论自己的孩子入村与否，陕西省的女子监狱的女犯们都欣喜若狂，她们自发地捐钱购买毛线，一针一针地为第一批进儿童村的20名孩子织了20件镶有红心的毛衣，并捐款600元。当女犯代表们来到儿童村，看到了孩子们快乐的脸庞，她们喜极而泣，回去后，纷纷写信，表达她们痛改前非的决心和对政府的感激之情。当张淑琴看到这些后，她更加坚定了办回归儿童村的决心。在此基础上，她先后创办了6所儿童村，先后替陕西、新疆、甘肃、宁夏、河南、河北等地的罪犯代养了1,000余名无人抚养的1-18岁的未成年子女。

让孩子活在阳光下

张淑琴是个不怕挫折的坚强女性，更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女性，她觉得只有让更多的人明晓这个特殊领域的重要性，才能使关注罪犯子女的这一工作走向社会化和正规化。1995年，张淑琴在西安发起成立了回归研究会，并在研究会的旗下，成立了“回归儿童村”，专门代养那些无人照管的罪犯子女。张淑琴深知“我”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只有“我们”的力量，才能唤起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一“特殊领域”。这也正是她成立“回归研究会”的宗旨。

产生这一想法的直接原因，源于人们对她的不理解，有人说她爱出风头，有人说她怀有其他目的，甚至还有人说她是在捞取政治资本，有野心，打电话到她家，指责她说为什么不去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帮助烈士的孩子，反而去管罪犯的孩子。2001年，她的原单位停发了她的工资，理由就是她“不务正业”。还有在争议中起步的回归研究会和儿童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费的不足，因为属于民间组织，所以没有任何财政拨款。为了筹措

经费，当时身为一级警督的张淑琴抛下面子，四处化缘。当她四处募捐为建儿童村筹资时，许多人向她投来疑问的目光，还有个别人一开始叫她“丐帮帮主”，后来把儿童村办成的时候，说她骗钱。对于社会的误解和个人所受的委屈，张淑琴无所谓，她依旧我行我素，她坚信一切行善的行为最终会获得人们的理解。张淑琴的动机很单纯，而她最大的“野心”，就是将关注罪犯子女这一人之举、民间之举，转变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并最终建立健全合格规范的机构，使每一个无人抚养、无人照看的罪犯子女都能得到关爱。

2000年，在陕西创办了3家儿童村之后，张淑琴把儿童村办到了北京，地点设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新的儿童村取名为北京市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步入太阳村，孩子们常常簇拥着这所儿童村的创办人和负责人张淑琴，还亲切地唤着“张奶奶”。谈起为什么要叫“太阳村”，张淑琴说：“我希望这里充满阳光。这些孩子应该在阳光下，应该在阳光下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里走出他们的阴影。”太阳村的门口有一株漂亮绿树，闪亮的村名就镶嵌其中。村子里的道路旁种满鲜艳的太阳花，映衬着同样色彩斑斓的“爱心小屋”，小屋的墙壁上绘着活泼可爱的卡通人物。远远地，就能看见这座绿野里的美丽童话世界。

目前，这里有120多名1至18岁的孩子，这些孩子来自全国的不同省份，按年龄和性别分别居住在一些慈善人士捐资兴建的爱心小屋内，他们在当地的中学和小学插班读书。每年他们有两到三次去监狱看望父母的机会。在儿童村，他们可以免费生活到父母刑满释放，父母刑期较长的，可以生活到16到18周岁，由儿童村和当地政府共同给予妥善安置。

然而特殊的成长环境造成了这些孩子特殊的身体状况和性格，所以，在太阳村的孩子很多体质较弱并有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对于这些有着不幸身世和心理问题的孩子，教育起来显得压力更大。张淑琴对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不仅请来美国的心理辅导师给孩子们进行心理辅导，而且时时从点滴的生活小事上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太阳村没有单独办学，张淑琴说这就是要让孩子们融入到主流社会当中，平等地和其他孩子走在一起。

由于社会筹措缺乏保障，太阳村期望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一部分经费，从2002年4月开始，太阳村租赁了260亩土地，种植了枣树、花生、玉米、黄豆等农作物，通过“认领枣树”来自己创收。在假期里，孩子们也到枣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为将来走向社会做准备。儿童村还给他们进行创业培训，就是请来光华基金会免费培训12岁以上的孩子，什么叫成本，什么叫利润，什么叫经营。他们还定期搞小集镇，有小商品一条街，小吃城，茶社，修车、补鞋、擦鞋，都是所有的孩子在运作，他们有自己的小摊位，把他们的玩具、菜、水果卖出去。还有过渡性安置，就那些成年后的孩子们的过渡安置，按规定18岁要离开，可有好多孩子到18岁他们的爸爸妈妈还有好多年的刑期，怎么忍心一下就把他们推向社会去。儿童村还要进行培训，这个培训有可能是木工，有可能是电脑，有可能是拖拉机驾驶，有可能是服装，将来他走出儿童村，得再帮他们一程，帮他们一阵子，叫他们稳定下来。

个人使命 服务社会

张淑琴曾经说：“做这项工作非我莫属。因为我在监狱系统工作过，所以我了解犯人的心思，熟悉他们的孩子，我搞过新闻，有对事物的敏感性，知道怎样借助媒介把这项事业传播开去；我早年插过队，能吃苦；我离婚20年了，两个孩子都大了，我无牵无挂；再有我是女性，我是母亲，我了解母亲和孩子的心理。想来想去呀，干这项事业绝对是我张淑琴的使命！”她将社会责任自觉更欣然地扛在了自己作为女性柔弱的肩膀上。

问起张淑琴希望大家如何评价她和她做过的事情，答案仅仅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张淑琴做了一件好事，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做了一件应该继续做下去的事，就行了。”她是一个不要任何回报的好人，她唯一要的就是希望社会能对她所从事的这项特殊教育给予关注和支持。可以令我们感动欣慰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阶层的人们开始走进了儿童村，开始为这项事业呐喊和资助。再过10年，也许是20年，或许是不太长的时间，救助罪犯子女这项事业，将步入正常的社会运行轨道，将成为一种社会服务体系，将成为与改造罪犯相联合的一个体制。到那时，张淑琴的名字将嵌刻在这项事业的丰碑上。

夏晓鹃 我们在同一个圆里



文：罗婉贞

外籍新娘缺少的，只是一个信任她们的环境，一种愿意与不同文化共存的氛围。

她想做的，并不是同化她们，而是让“我们”能真正看见“彼此”，她说，“我们本来就互为主体”，没有谁该适应谁。

夏晓鹃，1968年生，社会学者，是幕后的重要推动外籍新娘人权的推手，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夏晓鹃从国际分工无情的经济逻辑中，看到东南亚女性移民的弱势处境，当这群流离寻岸的女性移民在台湾上岸后，更令她思索全球移民共通的历史情境。夏晓鹃与外籍新娘结缘，是关怀社区运动的延伸，在移民的沧桑交会中，外籍新娘是供台湾深省的一面镜子。

外籍新娘识字班

最近几年，这块土地上，有个族群总能触碰我们是否真正认

同“多元”的敏感神经，这族群，是“外籍新娘”。媒体上，她们被建构成是来台捞金、教育程度低且没有教养能力、会造成国力下降的“一种人”。比起其他弱势，她们似乎是极需被教育、被提升的一群。我们从没想过，能从她们身上学到什么。如果有人站出来说，“让外籍新娘来教我们”，所引发的恐惧力量，恐怕足以比拟爆炸威力。

夏晓鹃就是一个敢于点燃火苗的人。1995年，她在美浓创办了“外籍新娘识字班”，成功的经验，逐年推广到了整个台湾，我们以为，10年后的今日，我们会看见一群中文说得流利至极，行为与我们愈来愈像的一群女人。但，事实并不如此。那天，访谈之中，夏晓鹃提起她前天收到的一份文件，“那是识字班姐妹寄给我的教案，最近，她们要在永和社区大学开课，介绍东南亚文化。看到内容我真的吓了一跳，她们要从东南亚被殖民和战争的历史，向社大学生介绍她们故乡的运动及文化，完全跳脱了一般观光的角度……真的很佩服她们。”

一直以来，外籍新娘向来是被认定为“没有能力的”，但，夏晓鹃却说，那取决于我们站在什么位置来看她们。在夏晓鹃眼里，外籍新娘缺少的，只是一个信任她们的环境，一种愿意与不同文化共存的氛围。一旦跨越语言的障碍，她们绝对有能力，可以跳脱媒体的刻板印象，自己发声，自己来决定别人怎么观看她们。因此，10年来，她想做的，并不是同化她们，而是让“我们”能真正看见“彼此”，她说，“我们本来就互为主体。”没有谁该适应谁。

多年来，许多地区明显地开始懂得用真诚的眼光，来看待身边这群新移民女性，这批女性也逐渐自组团体，有所发展。夏晓鹃无疑是这波运动的主要推手。很多人问，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心力，在这群看起来跟她无关的“少数”上头？夏晓鹃说，自己从没能力帮某个族群“代言”，因为，她们是靠自己的力量才有所改变的。

一切由身份、阶级认同开始

夏晓鹃在大学毕业那年，她因缘际会参与一项中研院的研究，随着3位在美浓生长助理，一同重返美浓，参与了当时的反水库

运动。

那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客家村落里，它触发了我心中压抑已久的客家认同和阶级认同。”

来此之前，面对自己的客家身份，她从来是暧昧而尴尬的。她说，母亲是客家人，小时候，她常看见母亲毫不避讳地向身边的人说自己的客家身份，但在成长过程中，夏晓鹃逐渐了解，母亲其实是特别的。“小学时，我曾经很兴奋地用客家语跟一个老家也在苗栗的同学交谈，他那瞬间转为恐惧的眼神，让我不能理解……一直到上了高中，一个不知道我是客家人的学姐告诉我，他哥哥说‘阿客很坏’……我被羞辱得半句话都答不上……”

原来除了成绩之外，世界还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方式。日后，她逐渐理解了小学同学当年的反应，也不想主动跟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客家身份。直到在美浓，她深入客家农民的生活，她才发现，有些身份或阶级的原罪，是被建构的。不过是在某种主流价值之下，弱者被扭曲与掩盖，强者被巩固或夸大。而当她看见还有3位热情的年轻人，愿意努力地替这边缘族群建立遗失已久的自我认同……那份压抑似乎也获得了释放。

此外，也是在这项参与之中，她深切地感到“菁英”的苍白与不足，“到了那儿，发现我其实什么也不会，谈起农运、工运、客家……我都只是听过，却没有感觉。反倒是在学习过程充满挫折的客家朋友，谈起自己参与农工运的过程，分析得相当深刻。我开始怀疑，自己一路是受什么样的教育？”

她说，在美浓，常听当地居民对菁英的批判，菁英在他们眼里，是一群“抬面很风光，却不愿蹲下来做事，觉得做事就等于没脑袋的人”。日后，她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变成这样的人。“大学时，我也以为，社会运动就是要跟政治结合，该搞个议题，或办办记者会……到了美浓才发现，那样的运动最大的问题在于，运动的主体不见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为某个族群代言，重要的是主体自己内在的改变，一个运动到最后，成就的不该只是一个菁英！懂得向草根学习才是最重要的！”

而也正是在美浓，她发现了当地有一群从外地嫁过来的女人，不识字、也不擅与人沟通，生活得相当辛苦，缺少资源，却被社会视为劣等民族和麻烦。她当下便决定要为这群边缘者做些什么，

于是，日后前往美国求学，夏晓鹃着力展开“外籍新娘”的研究。

在美浓，夏晓鹃重新颠覆了自己的认同和主体性，正待重新建构之时，她却也得立刻面对另一个挑战，就是在美国生存。美国，从小曾是令她钦羡不已的国家，她还曾喜欢在嘴里胡乱讲着一些自以为是英文的东西，想让大人以为，自己会讲英文。因为，小时候，在她认知里，英文是个优良民族的语言，会讲的人是聪明的。

直到真正走向这印象中的“优秀民族”，夏晓鹃像是逐步揭开自己在这环境中的弱势位置。刚到美国，班上没什么人会主动找她交谈，直到发现她成绩相当优异，她的朋友才多了起来，许多老师也对她称赞有加，认为她是个“很不一样的中国人”。只是，时间久了，她发现自己逐渐走进一个陷阱里：“我是先被预计成一个不优秀的少数民族的，只是我跟这个族群大部分人不太一样。”



她自觉地开始质疑某些教授的论点，当然，众人又开始转而认为她是个“爱惹事的少数民族”。后来，在学术研究的过程里，种族歧视的问题不断迎面而来，某次更因与指导教授意见分歧，几经争论，夏晓鹃希望能争取多一位协同教授指导。“那天，教授就当着我的面说：‘难怪人家说中国人很 crafty（阴险）。’”

好像当年听见那位说“阿客”的感觉，她一样羞辱得说不出话。“我被界定在一个族群里，除非我与这族群脱离关系，否则我必须永远背负着歧视。”

甚至，到了后来，她在大学部讲授“多元族群”的课程，向系上争取多两位少数民族的助教带领课堂讨论，系主任告诉她：“雇用外国学生是很危险的！”她说，自己再也无法忍受，“已经有太多的少数民族学生遭受这样的对待……我不想让它重复发生。”于是，她一状告到校长，而学校处理的态度亦是不了了之，摆明是“误会一场”，但同意再给夏晓鹃教别的课程。夏晓鹃并不愿意，因此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环境。

从她们的实际问题和感受出发——

回国后，她实践自己当初的梦想，以美浓为起点，全力投入“外籍新娘识字班”的推动。她从出国那一刻即是决定要回来的，只是没想过这一遭是这样经历的。然而，这一遭却也成为她日后行动的动力来源，在她书里（《流离寻岸》）曾经这么写着：“每回看到初来乍到的‘外籍新娘’因语言不同而被当成无知的孩子对待时，便想起那段被美国人当成次等研究生的经历。‘外籍新娘识字班’似乎亦成了自己治疗自己当年被不当对待的痛苦记忆的行动。”

曾被当过“无知的孩子”，让夏晓鹃在回国后推动识字班时，永远记得“要从她们的实际问题和感受出发，而不是自己想好一切，以为自己有能力去改变谁”。

于是，识字班从1995年开办起，课程内容便不断地在调整与更改。最原始的问题，就是围绕在“到底要教什么？”

“外籍新娘不识字，寸步难行，但我绝不是想教她们专业的中文，或者让她们可以在孩子的联络簿上签出漂亮的字体。我希望借识字引发出来的，是意识，而不是适应。”于是，最初几次的工作坊，她曾经和剧场工作者钟乔一同设计许多肢体解放的课程，企图带领外籍新娘慢慢表达自己。然而，许多外籍新娘表示，她们都是放下家里工作、排除万难来上课，不是来玩的，她们想学一点“有用”的东西。或者，央求夏晓鹃采取考试的方式，她们才会“进步”。

夏晓鹃说，这群外籍新娘，早已经习惯别人看待她们的方式，也内化了别人对她们压迫，就好像当年许多人想学点实际的“英文”一般。于是，当你问她们意见，她们习惯说不知道，来上课，就是希望学一些“有用”的中文，能写对、说对最重要，即使，那些语言，与自己的生命感受或经验完全无关也无所谓。

但她不放弃，她认为，“教育不是这样，它应该是让人愈来愈敢于表达自我，懂得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对自己愈来愈冷漠，对他人的适应力却愈来愈强。”于是，她不断地在课程中做改变，从她们“实际”的生活经验去练习会话，间接带出她们的感觉；在识字过程里以图片、造句的方式，询问她们对事件的看法……或者，请她们回忆自己的故乡，回想自己初来台的感受……拿报章媒体对外籍新娘的报道，让大家一起讨论……

她们的中文是这样学的。没有什么专业的问题，重要的在于是不是发自内心，以及学习信任自己。夏晓鹃说：“她们害怕说错话，一开始，你会发现她们很习惯跟你说：‘我不会，你帮我解决。’她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过程中，我们总是告诉她们：‘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来解决！’然后，常问她们感觉而不是答案，因为感觉这种事没有对错。一次、两次，她们慢慢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敢走出家门跟人聊天，她们的先生也很惊讶。甚至，她们会渐渐敢自己去积极处理事情，或帮助别人的家庭。”

而社区，也开始对外籍新娘伸出双手，用比较友善的态度对待这群原本很陌生的族群，特别为她们举办活动……夏晓鹃提到，这个运动从一开始没人理、甚至表明不要看到这一群人，到这两年已有许多官方与民间单位纷纷释出资源进行抢救，足见台湾社会本身的反省与思考。就这样，美浓经验，后来更成为政府规划外籍新娘识字教育的基础模范，逐渐在全台各地推广。10年来，直到现在，夏晓鹃仍在不断地调整教学方向和内容，例如开始着手讨论外籍配偶两代教育的问题等。此外，这群曾在媒体面前吓得直发抖的外籍新娘，也逐渐自己集结成团体，互相帮助，甚至，走出来面对社会，在社区大学开课，讲授南洋文化。

她说：“她们一旦有了自信，便会知道原来自己还可以再多做点什么。”而这是她从最初来到美浓至今，一直没有忘却的——让运动的主体自己发展改变的力量。

我们同在一个圆里——

社会运动之余，夏晓鹃也教学。她的课程总是能让学生觉得“好玩”。因为，每堂课几乎都有些大大小小的活动。比方说，有一次，她拿着一颗篮球进教室，告诉学生，只要投得进前面的篮框，就加5分。结果，有学生说不公平，因为她坐在比较后面，怎么样投进的几率都比较低，夏晓鹃仍执意如此，直到那学生感到非常的生气。夏晓鹃问她：“你为什么如此气愤？”学生说这不公平，夏晓鹃再问她：“那么，你常说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努力，现在，你觉得呢？”

还有一次，是夏晓鹃在美国教书时，她和助理刻意在上课前挡住门口，帮进来的学生分好位置，比方说，“你是白人，你坐这一区；你是黑人，你坐那一区。”学生开始有各种反应，有的无奈，有的生气，有的莫名其妙……最后，她一如以往地问他们的感觉。“很多人听到‘种族隔离’是没有感觉的，这样的经验，能让他们深刻地体验他们的感受。”

她的课程，一如她推行的运动，永远致力让学生“有感受”，而不让他们成为啃蚀书本的苍白菁英“只会念书是不够的，那会让人愈来愈以自我为中心，没有感受，看不到跟你不一样的人存在。”她记得，她常会在黑板上画一个阴阳两极的太极图，告诉学生：“我们同在一个圆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凝视彼此的焦点应该在于看到我与他人的‘关联’，而不是‘差异’。”

王行娟 作妇女的同行者



文：王平

女性如果自己不出来呼吁、呐喊，解放后中国女性获得的政治参与与权利可能会得而复失。同时，在妇女参政的问题上意见的分歧，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要在社会上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需要很多人做很多努力。

妇女热线的开通是妇女所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打开了一扇了解社会、了解妇女的窗口。

1998年5月的一个周末俱乐部庆典会上，因为要见老朋友，王行娟先睡足一个午觉，之后穿了一件新做的旗袍，还淡淡地化了妆，自我感觉很不错，不像平日那么疲惫，看上去应该精神焕发的。可是见到一位老相识后，老相识是一脸的难过与惊愕，脱口喊道：“王老师，您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

每一个女性都是爱美的，何况像王行娟这样的有着良好修养的职业女性。这几年王行娟每次见到老朋友几乎都会看到这样的

表情和听到类似的评价，她每次都会泰然处之，因为她知道自己衰老得这样快是因为太操心、太劳累。操心和劳累不是因为工作，因为她在1988年就离休了；也不是为了家庭，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老伴和她的感情一直非常好；她是为她在离休后所开拓的事业——一个草根的民办妇女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而呕心沥血。

王行娟的履历足以令很多女性感到羡慕，早年，她就读于金陵大学中文系。1949年到《南京新华日报》做记者，1951年到北京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报》，后来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在北京出版社工作，绝对是一名知识女性。

最初的王行娟根本没有很强的性别意识，她觉得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比男人差，虽然在她身上也有女人常具备的弱点：自卑、依赖，但她从来没有因满足于家庭的小日子而影响过工作。她认为自己的确是个实现了个性解放的妇女。所以，王行娟那时关心的是国内外的大事，唯独不关心妇女，认为妇女工作就是街道小脚老太太们的事，与她无关。

在“文革”动乱的10年中，王行娟强烈地感受到做女人的苦涩。那时她是一名普通干部，无官无职，没有招来革命的烈火。但她的丈夫在“文革”初期就被当做叛徒看管起来，她就成了叛徒家属，并受到了连累，被抄家、被审问、被歧视。一双双充满轻蔑、仇恨的目光，像一支支利箭刺伤了她的心。她第一次感到传统观念对女性的不公。

女性意识的萌芽

吸引王行娟关注妇女问题的，是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组织一本叫《少女必读》的书稿。这位编辑找到了当时在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工作的王行娟的老朋友楼静波，于是，楼静波就邀王行娟一起合作写这部书稿。在写书的过程中，她们搜集了很多关于青春期少女的资料，有正面的典型，也有她们自杀、犯罪的反面材料，翻阅着这些材料，王行娟的青春时代又浮现在脑海里。

王行娟生长在一个有着两个母亲，九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她排行老四，又是个女孩，所以她是在不受关注的状态下悄悄长大的。王行娟的母亲是个“妾”，家庭地位很低，再加上家里的

孩子多，生活不富裕，她的心情长年极度压抑，无处宣泄，就拿年幼的王行娟出气，所以，儿时的王行娟挨打挨骂是常有的事。到了青春期，少女的自尊心使王行娟不愿再忍受这样的生活，甚至萌生过自杀的念头。

带着这些回忆，王行娟把自己作为一个比照物，倾注了满腔的真情写这本《少女必读》，她写的每一篇文章都凝聚着自己对少女们的爱护和同情。

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此以后，王行娟就开始了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从关注青春期少女转变到关注妇女的命运，契机是1985年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要创办一个刊物《婚姻与家庭》，王行娟应邀参与了创刊的工作，并担任这个杂志的副主编。在此期间她亲手编发了许多女性为了婚姻自由（包括结婚、离婚的自由）而苦苦挣扎的稿件，接待了许多因婚姻问题而来访的女性。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修改过的第二部《婚姻法》公布实施。一时间中国家庭的离婚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第三者插足”成了婚姻研究领域的热点。一些由于丈夫升官发财、移情别恋提出离婚而上访求助的妇女，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前相互结识，组成了“秦香莲”上访团，她们上书当时的党中央最高领导，要求政府出面干预，惩罚变心的“陈世美”们。她们甚至还打算到天安门游行，制造声势。在社会上，人们对新公布的《婚姻法》也议论颇多，有不少人认为，新《婚姻法》的有些条文过于超前了，以感情作为婚姻的基础，感情破裂就可以离婚，正是导致离婚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现象使王行娟感到很困惑，难道没有感情作基础可以维持婚姻吗？今日的女性难道还要走“秦香莲”的老路吗？她忍不住写了一篇小文章登在《新观察》杂志上，题目是：《“秦香莲”们要自强》，奉劝妇女朋友们要做个现代的女性，不要依附于婚姻，不要依附于男人。

社会经济变革下 职工被剥离 女性首当其冲

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女性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从共和国建立之时就获得层层保护和与男性平等待遇的女

性，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出现了许多处于劣势的妇女群体。当时在中国社会上发生了两件轰动妇女界的大事：第一件事是国务院在13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工作。所谓优化劳动组合，就是实行经济制度转轨中厂矿企业改革用工制度，剥离剩余人员。在试点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被剥离的首当其冲者是女职工。

全国妇联的机关刊物《中国妇女》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热点，在刊物上开展了一个长达一年之久的题为“1988：妇女的出路”的大讨论。一些被优化下来的女职工也在这个讨论中谈了自己的苦恼：失去工作之后，有的受到婆婆的歧视，挨丈夫的打骂，有的甚至想跳河自杀。而社会上“妇女回家”的老调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当时有人估计，全国将剥离3,000万职工，其中60%—70%会是妇女。王行娟忧虑地看到，妇女就业的权利将受到损害，她们的前景将会很艰难。今后，不仅在农村有7,000万、8,000万贫困人口，其中大部分将是女性；在城市中，也将会出现一大批穷困的失业女性，成为城市的新贫民阶层。她们将会失去原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甚至由此失去原有的家庭地位。这些妇女都将面临着如何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如何跟上形势，重新寻找到自己位置的问题。

另外一个深深触动了王行娟的事件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各级党政机关从政的女性数量出现大幅度滑坡的局面。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是：1988年国家采取了领导干部任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于是大批的女领导干部就被“差”下去了。在这个时候，《中国妇女报》在第一版开辟专栏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一些男权中心的卫道士甚至在讨论中发表了很多谬论，诸如攻击妇女从政是“母鸡司鸣”等，重弹“女人是祸水”的老调。王行娟深深地感到，女性如果自己不出来呼吁、呐喊，解放后中国女性获得的政治参与权利可能会得而复失。同时，在妇女参政的问题上意见的分歧，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要在社会上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需要很多人做很多努力。

1988年初，王行娟离休了，经过一番考虑和选择，她决定把自己离休后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于办一个民间妇女研究所，研究新时期的妇女问题。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伴，得到了老伴的大

力支持。他说：“你一生都听党的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离休了，你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以后，他就把大部分的家务都挑起来了，没让王行娟因为家务事分过心费过神。

于是，1988年2月7日，王行娟邀请了十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到她家里开了一个座谈会，探讨成立一个民办妇女组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家情绪高昂，积极支持创办一个民间妇女研究所，并出了很多好主意。那天之后，民间妇女研究所筹建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经过8个月的筹备，1988年10月7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宣告成立了。这是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机构。

民间妇女研究所

在热热闹闹的庆祝成立大会开过以后，就开始了妇女所创业的日子，王行娟艰难的创业史也就正式开始了。既然是一个研究所，就该有个办公的场所。大的漂亮的办公室她们租不起，北池子小学传达室旁边的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就成了妇女所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屋里摆了从旧市场买来的两张桌子，3把椅子，到了冬天还得再生一个炉子，屋子里满满当当的，来一个人都进不了屋，只能站在门外说话。这间屋子，冬天透风，夏天漏雨，一场大雨过后，脸盆都会漂起来，得用脸盆往外泼水。就是这样简陋的办公条件也难以以为继，因为妇女所是非营利性质，它搞课题搞活动，都需要支出。王行娟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经费问题。她们先后设计生产过一些新式毛衣、女式套装、儿童记高牌、折叠脸盆等妇女用品，但都没有挣到钱。

1989年“三八妇女节”，北京市妇联在北京展览馆组织了一个妇女用品展销会，为了给妇女所挣些经费，王行娟也去租了一个柜台，通过熟人找来一些台布、围裙、毛衣等进行代销，想挣一些批零差价。展销会的时间是半个月，在这段时间，妇女所只好锁了门，王行娟和副所长梁正宇带着两个临时工天天起早贪黑地去站柜台。人手不够，王行娟就把休假的女儿也动员来了。每天的工作不仅要站10个小时的柜台，还要不断地联系货源，收摊后还要进货、取货。她舍不得花钱雇汽车运货，就自己用自行车推，用手提。为了挣到一点钱，王行娟不仅把北京的亲人都动员

起来了，连她的远在广州的姐姐和弟弟，都为她跑批发市场购买新潮的儿童衣物，并用快件把货运到北京。展销会结束后，把租柜台的钱付掉，代销商品的成本费返还厂家以后，只剩下了300元，这点钱连支付两个临时工半个月的工资都不够。疲惫不堪的王行娟捏着这300元钱，真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笑好。

这条路走不通，王行娟就分析自己的优势，她想既然一些单位请她给妇女讲课很受欢迎，为什么不能办培训班扬长补短呢？

妇女所是以研究当代妇女问题为宗旨的，开展研究就要有课题费，由于没有经费的支持，她们就在开展的活动中搞调查、去搞研究。于是从1990年到1992年，王行娟和她的同事们连续办了很多妇女干部培训班，她们办培训班既是为提高妇女干部的素质服务，也为妇女所筹集经费。她们的培训班收费不高，花销也是精打细算。



1988年以后的几年时间，各级党政机关出现参政女干部大幅度落选的现象。这种现象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女领导干部素质低，不能适应现代化的管理水平的问题。于是妇女所与中国妇女杂志社合作，在全国首先创办了女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而且把培训班与研究妇女参政问题结合起来。王行娟和她的同事们在培训班中发了1,000多份调查问卷，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在培训的同时完成了大型社会调查以及“局以下女领导的工作和生活调查”这些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但是好景不长，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办培训班可以成为赢利的手段以后，全国各地的各种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且良莠不齐。而且有的单位以行政命令下达培训指标，王行娟她们这个民办单位招生就困难了。这意味着她们又没有了收入的来源。王行娟重新陷入了迷茫和困惑中。

这时，妇女所的外国朋友帮助王行娟把筹款的眼光引向了国外的基金会。1990年，奎克国际事务计划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Quak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ogram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的两位社会工作者 Barbara B. Bird 和 Donna K. Anderton 女士应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王行娟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青教授接待了她们。这两位外国朋友也是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大家在一起谈得很投机，当她们得知王行娟的困难时，深表同情。她们第二年再来时，带来了1,100美元的捐款，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民间的草根妇女研究所收到的第一笔来自国际的捐款。

之后，王行娟在一位有向国外基金会申请资助经验的美国姑娘的帮助下，向美国全球基金会提交了要开办一条妇女热线的申请报告，这个申请获得了成功。有了美国全球基金会的资助，中国内地的第一条妇女热线在1992年9月1日得以开通。以后，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又陆续开通了妇女专家热线、第二条妇女热线和老年妇女热线。

研究与决策 二为一的结合

那段时间，王行娟为妇女所筹款而不停地奔波，身体的劳累和心理的压力之外，她内心还有更深刻的痛苦：她原来认为，妇女所选择的关于当时妇女问题的调查报告都是她和同事们花了巨大的时间、精力和物力完成的，她觉得自己做的调查结论看来是正确的，所提出的建议是有价值的，有现实意义的，并且调查报告还在全国妇联主办的《妇女工作》杂志上发表了，她本来认为这个研究课题就已经结束了。可是有一天，一位美国朋友和她聊天，听完王行娟介绍了她们做的研究课题后，问了她一个问题：“你认为做这样的调查研究有用吗？对中国的妇女有用吗？”王行娟一时被问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开始了痛苦地反思：是呀，这些调查报告虽然发表了，但它究竟对今日的女性有多少实际的

用途呢？要使自己的研究对改善妇女的状况有所帮助，只有影响决策，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意见、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以便制定出有利于妇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那么，这些对策性的研究能被决策者认同和接纳吗？它对改善妇女的处境有用吗？它能否起到服务于妇女的作用？

带着这些思考，王行娟决定，一是要把研究与服务结合起来，更直接地服务于妇女，促进她们的提高与发展；二是要想尽办法影响决策，引起有关领导的关注，以推动政策的制定。正是这两个决定，促进了这个草根的民间组织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妇女热线的开通是妇女所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说，开通了妇女热线，王行娟找到了直接为妇女服务的渠道，同时热线也为王行娟和同事们打开了一扇了解社会、了解妇女的窗口，给她们提供了很多值得研究的一手线索与素材。妇女热线的开通也为王行娟的第二个决定——影响决策——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妇女专家热线法律专线上，经常有妇女来电话咨询维护权益的问题。王行娟觉得有必要对这方面的电话进行专题研究：妇女咨询的都是哪些法律问题？在她们咨询的法律问题中，有哪些是有法可依的，有哪些是法律的盲点？哪些属于执行上的问题？执行难的关键又在哪里？于是王行娟和她的同事们把法律专家热线的律师、法官们组织成课题组，把自开通以来有关法律方面的电话挑出来，重新进行处理，最后写出一个研究报告：《妇女热线法律咨询电话研究》。报告完成后，她们把这个研究报告送交全国妇联书记处，并直接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妇女儿童小组。该小组负责人王立威女士收到报告后，还给妇女所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妇女热线的调查给予了肯定。

1997年，中国政府决定修改《婚姻法》，王行娟和她的同事们又根据热线咨询中了解到的情况，撰写了《让“新婚姻法”成为受虐妇女的保护伞》的报告，送交有关部门参考。

这个草根的妇女组织的道路上充满着让她的每一个成员骄傲的成绩，也满是她们费尽艰辛的困难和挫折。

困难接二连三

按照中国的惯例，民间组织都要有一个挂靠单位。妇女所在

1988年筹建的时候，就申请挂靠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下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是个民办科研机构，成立于1987年。它是经国家科委批准成立的，挂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下面，它的下属有地方分院及100多个研究所，王行娟的妇女所是其中的一个。

为了同时能得到全国妇联的支持，王行娟以妇女所所长的名义，上书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提出妇女所作为全国妇联团体会员的申请。她的要求得到了当时全国妇联几个领导的支持。

有了挂靠的上级单位和全国妇联的支持，妇女所开始时期的工作开展很顺利。可是好景不长，中管院的领导与挂靠的上级单位国务院发展中心的的关系不知何故竟处于破裂的状态，国务院发展中心一个文件单方面宣布终止了与中管院的挂靠关系。这样，中管院就成了一个没有上级的单位，它的所有下属单位，也跟着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了。妇女所的日子也开始难做起来。

从此妇女所不仅再也听不到任何中央精神的传达，耳目闭塞，难以把握很多热点问题的政治敏感度，导致了后来的政治性的误会，而且碰到了外事活动上的困难。因为妇女热线的开通，使得妇女所与国外一些学者、妇女组织的合作和交往多了起来。这就涉及一些诸如由于没有外事权和挂靠单位而发不出邀请函，给妇女所的正常国际交流合作带来很多困难和极大的不便。

一个民间组织的生长除了挂靠问题以外，还需要一个适合于它生长的社会环境问题，也就是说，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理解。由于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妇女所被政府和社会误解了。

事情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引起的。本届联合国妇女大会要在中国召开，而且在政府会议的同时，在怀柔还有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活动，这对中国的妇女界来说是天大的喜事。王行娟她们的妇女所是一个民间组织，当然希望参与这个千载难逢的盛会，她们向中国非政府论坛组织委员会提出要组织“妇女群体与社会救助”工作坊的申请。这个申请得到了中国组委会的批准，于是妇女所的工作人员就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

这时，为了配合世界妇女大会的宣传，国外的新闻记者、电视台、电台记者络绎不绝地来到北京。他们来访的对象当然是中国的妇女组织，像妇女所这样纯民间的草根组织，更是他们访问的主要对象。王行娟是记者出身，知道宣传媒介的作用。她希望

妇女所能够被世界更多国家的妇女组织所知晓，扩大交流范围。因此，王行娟对蜂拥而至的境外记者基本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

在世妇会召开前后的一个时期，宣传媒介比较集中地报道了王行娟她们的妇女所和妇女热线，引起了安全部门的关注，并被反映到了高层。他们需要了解这个民间妇女研究所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活动内容是什么？结果查到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头上，这才发现这个有着庞大下属机构的民间组织居然没有上级挂靠单位，于是在责怪他们对妇女所管教不力之余，对这个组织的状况也颇有微词了。

一时间，妇女所面临着沉重的社会压力，尤其她又是接受外国基金会的资助才得以开展活动的，这些钱来得是否正当，有没有政治的目的，都会引起人们的疑虑。社会上一时间流传着各种关于妇女所的谣言，甚至有传言说，王行娟已经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了。

与妇女所一起感受到沉重压力的当然还有妇女所的上级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了。原来他们无主管上级的现象并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还可以悄悄地、心安理得地搞自己的活动，现在由于妇女所的事被张扬了出来，面临着整顿社团，由于是无上级主管的单位面临被清退的危险。迁怒之余，中管院在1996年7月16日，用平信给妇女所发来了一个单方面解除挂靠关系的通知，理由是“妇女所的活动与研究院的宗旨不符，以及超越院规定的工作范围之处，并在涉外活动中，违反外事纪律，造成不良影响”。

与中管院不得不解除了挂靠关系以后，妇女所就成了一个无上级、无挂靠的单位了。问题远不止于此，这预示着妇女所不能再使用中管院的名称了。妇女所要继续开展活动，就必须改名。王行娟到北京市社团办咨询，得知要重新注册一个组织必须要有上级主管单位。刚刚因为这些问题被上级单位单方面解除了挂靠关系，哪里再去找另一个挂靠单位呢？

在社团之路走不通的情况下，王行娟决定到工商局去为妇女所注册一个社会服务性质的企业，要重新注册就要为妇女所起一个新的名字。当时正是深秋的11月，百花凋零，只有红枫在吐艳，大家就为妇女所起了一个新的名字——红枫。就这样，这个没有“婆婆”、没有任何政府背景的纯民间的草根妇女组织又一

次获得了新生。

“红枫”再生

通过这次风波，王行娟想：要让这样一个民间的草根妇女组织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光有组织者良好的愿望和献身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得到社会的理解，包括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才可能办好。中国的政治体制从来都是强调条条块块，一切要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本来就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中国的环境对它的生长还是非常艰难的。王行娟开始觉得有必要向政府和社会主动宣传自己，说明自己，以取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和理解。于是王行娟直接给国家安全部当时的部长贾春旺写了一封申诉信，希望消除对自己本人和她所领导的妇女中心政治上的误解。她还把信寄给北京市委政法委书记，要求会见并当面陈诉自己的意见。

王行娟的这两封信很快得到了答复，北京市委政法委的一位负责人会见了她，在详细听了王行娟对妇女所的介绍后，对她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一次会见，改变了妇女中心“风雨飘摇”的局面，妇女中心从此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王行娟感觉自己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就是加强沟通来消除分歧。而这种沟通对于消除误解、增进了解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现在，红枫的妇女热线开通十几年了，只要能排开时间，王行娟仍然会坚持上线值班，她愿意直接听到妇女们的倾诉，了解她们的困难和烦恼。每当来话者满意地挂上电话时，她都会产生出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

十几年来，王行娟参与的妇女所的课题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过，研究的范围涉及卖淫嫖娼现象，妇女权益的维护，女科技人员成才的特点及规律性的探索，婚姻与家庭问题，家庭暴力，性骚扰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的热点问题。

十几年来，这个以“妇女研究妇女，妇女教育妇女，妇女帮助妇女”为己任的民间的草根组织，帮助了无数不知姓名、未曾谋面的妇女，她努力唤起她们的主体意识，给她们心灵和精神的安慰和鼓励，引导她们走出困境，走向自立自强。同时，王行娟在这十几年来，不知疲倦地为女性服务，做妇女的同行者，知心人。



周
圣
心

女性， 和平运动的 关键力量^①

文：周圣心

当我们站在“生命”最核心的价值和意义上时，我们才有可能知晓“和平”的珍贵。而这普世的、生命最底层、最核心的价值和意义便是：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是平等、值得珍惜的。我相信所有关怀弱势与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运动，也是出于这种对全体人类生命的情感和使命。

作为一个平凡渺小的个人，我们或许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侈言世界和平的康庄大道，但至少我们可以为非战和平的愿景尽一份心力，期盼每一个人都能在更好的环境中成长，成为真正的自己。

有一句广告词说，“我是当了爸爸，才开始学当爸爸”。作为

^① 此文部分文字发表于2006年台湾国际和平研讨会《和平工作坊I——女性与和平》。周圣心，非战家园行动联盟召集人。

一个母亲，我倒是预先做了很多的自我教育，勉强算得上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但是作为一个和平运动工作者，我则是一点儿也没有准备，甚至不曾预期。

教育资源与正义和平

1990年我在经历教职和儿童报纸的工作之后，来到甫正式成立的第一个台湾民间教改团体——人本教育基金会。开始长期从民间的角度，对台湾各种保守的、违反人权的、高压管理的教育现场进行关注和批判。

在那个时代，“禁止体罚”还被视为一种道德高调，是不可能也不可行的，更遑论学生人权的维护。学校里的训导人员甚至会用手铐将学生铐在训导处铁窗上（1994年，台北市某国中），未经学生同意就直接剪短学生的头发、搜查书包、强迫晚自习、因成绩未达规定而体罚成伤，至今仍普遍存在于国中校园之中。

凡此种种，可以总结归纳到两个核心问题：升学主义和权威管理。民间教改团体十多年前即提出，要解决这两个紧箍咒，最核心的关键作为便是“落实小班小校”和“推行12年国教”。

但是，小校要地，12年国教要钱，从上一个执政党到这一个执政党，虽然政党轮替了，但政府仍旧一贯的说法：没有钱、没有地。于是，台湾的教育改革十数年来只能在课程统整、教材编纂、师资培训、入学方式等枝节问题上打转，挖东墙补西墙，无法解决教育资源问题、无法深入教育问题核心。

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孩子从牙牙学语而今亭亭玉立已是个高中学生，但台湾的升学压力未曾减缓，校园里的权威管理依旧存在，教官每天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各种处罚屡见不鲜。痴痴企盼的12年国教仍在遥远的幻境中。

谁在乎小孩的快乐成长？谁在乎对年轻人的尊重？谁又真正在乎每一个孩子的适性发展和需要？

2004年5月底，6,108亿军购特别预算案在行政院会通过，拟以出售国土、举债和释股方式，来进行这项超级军购计划。

十多年来，没有钱没有地可以进行教改工程，原来竟是一纸谎言。因为没有钱，可以卖地；没有钱，可以发行公债；没有钱，可以释出公共事业股权。没钱、没地，都不是问题，只要有决心。

但是，这决心为什么不是用来彻底解决并提升台湾的教育问题？为什么不是用来思考台湾的永续发展？为什么不是用来深化我们的文化？

起因于对国家资源分配的公平与正义的单纯信念，我和一些社运朋友们，决然挺身对 6, 108 亿特别军购预算案提出强烈质疑，从而展开一连串过往生命中不曾接触的领域——国家安全与国防政策——的挑战和学习。而当我越深刻去思辨：国家与个人、安全与占有、战争与生命、武器发展与人道维护……我也开始体悟所谓“全体人类生命”的意蕴；当我们站在“生命”最核心的价值和意义上时，我们才有可能知晓“和平”的珍贵。而这普世的、生命最底层、最核心的价值和意义便是：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是平等、值得珍惜的。我相信所有关怀弱势与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运动，也是出于这种对全体人类生命的情感和使命。

为女性和平事业重新定位

在推动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不论是 2004 年筹组“非战家园行动联盟”，推动“军购公投”公民运动，或是 2005 年于 20 县市/离岛进行的“非战行脚——台湾民间和平深层对话”，乃至 2006 年与十个 NGO 共同筹划“台湾和平季”系列活动，或是在海外留学生的协助下于联合国前广场举行“台湾要和平”街头记者会（2004. 11），或是到中国昆明参加亚洲和平妇女生活交流会（2005. 12）……每一次的参与过程中，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女性常会习惯性地自身排除在和平运动之外，认为“和平”是男性社会的议题，女性若从事和平运动，通常也都从个人领域出发，强调奉献付出，很少会去触碰核心问题，更不愿意去挑战充斥于主流社会与国家机器中的扩张、侵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意识形态；而轻忽了这扩张、侵略、对立的意识形态，常是破坏“和平”价值的根源。

一如面对环境的破坏，我们总是采取补救性的消极方法，很难转换为开创性的积极作为；女性在面对和平议题时，向来也多在抚平裂痕的位置上贡献一己之力，很难站到更宏观的位置上，进行更具开创性与主体性的反思与行动。

在 2005 年 20 场非战行脚“和平深层对话”的小型座谈会上，

我们也发现，女性对“和平”议题的思考，多偏重于家庭亲友等私人领域；对国家政策、制度、安全等公共领域事务，多采自动回避或不予评论的态度，“这种国家大事，不是我们可以评论的”、“就算我们不喜欢战争，又能怎么样”、“我从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我想起未参与和平运动前的自己——虽然长期参与台湾的教改与小区教育：关心义务教育、反对体罚，致力开创成人高等教育新契机……却从未意识到这些公共事务与政策，都和国家资源的分配紧密相关，而国家资源的分配，则来自于国家的定位与发展、来自于对弱势的关怀与照顾、来自对人类社会更美善的想象和追求。不能意识到这些根本的问题，所有改革的努力，都只能事倍功半，疲于奔命。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从事社会运动的前辈们，最终都得进行立法或修法的游说，甚至需要透过政治的手段，来进行资源的重分配。



作为一个平凡渺小的个人，我们或许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侈言世界和平的康庄大道，但至少我们可以为非战和平的愿景尽一份心力，期盼每一个人都能在更好的环境中成长，成为真正的自己。这个世界是否美善、公平、正义？不只是男性的责任，（许多时候，他们甚至是和平的破坏者）而是你与我共同的责任。尤其，

女性特质本来就蕴涵着较丰富的“和平”天性，参与和平工作也常能唤得许多“自助，助人”的愉悦感受，如何让这“和平的能力”，不被外力，例如：扭曲的性别教育……限缩在狭窄的范围里，而能从根本处观看整体，产生宏观的视野，这是每一个女性自我觉察与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课。

附录

记：昆明“生活·文化·妇女”交流会（2006. 2 原刊载于《非战行脚》第七期）

2005年12月16日至20日，我参加了一个在昆明所举行的“生活·文化·妇女”的交流会。这项由香港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所主办的交流会，主要邀请的对象为2005年“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中的蒙古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妇女代表。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是由瑞士国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 Ruth-Gaby Vermont-Mangold 博士所发起的一项全球妇女和平运动。透过全球各地区民间组织网络的串联，共同推举出999名在各地从事草根和平运动的各领域妇女，涵盖的范围包括：生态、环保、司法、人权、教育、消弭战争、族群、艾滋病等各领域，第1,000名是为无名氏，代表999位之外，散居世界各地源源不绝投入和平工作的无数妇女朋友。

2005年共计有199个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全球千名和平妇女”正是199个中的“一个”候选人。“千名和平妇女”作为“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意义和实践精神，虽然最后并未获得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团的青睐，但是千名妇女在这次选拔过程中，已汇聚出一种具全球性的民间串联和草根行动，各地妇女代表不约而同的孕育着各式各样的连接和交流。而负责蒙古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提名作业的香港岭南大学，则极力想促成更多亚洲华人地区和平妇女的交流。12月16日至20日在昆明举办的交流会于焉产生。

999名妇女中，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蒙古等地共有117位

女性获得正式的提名，包括中国大陆 81 位，香港 9 位，蒙古 9 位和台湾 18 位。

2005 年中的某一天，同为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常务理事的林孝信打电话给我，说有人委托他做和平妇女的推荐工作，问是否可以推荐我，电话中他的说明不很清楚，但我很感谢他的推荐，因为那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非战”过去一年多所努力的工作的肯定。那通电话之后，我亦曾提供了一次关于非战和我素来所关注议题的说明和一些照片档案。一直到 10 月间我收到了香港岭南大学寄来的各种书面资料，包括“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缘起说明、遍及 15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 999 名妇女名单、诺贝尔和平奖的甄选进度，和各区域陆续将举行的各种串联行动等。

我们在台湾所进行的非战运动，竟然就这样和诺贝尔和平奖发生了某种关联，说起来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台湾从来就不是国际和平议题的一环，国际间只有中国问题、西藏问题、两岸关系，没有台湾和平问题；而“非战家园行动联盟”在台湾各种 NGO 或 NPO^① 组织中，又是这样一个年轻、特立、小众的“团体”！

成为千名和平妇女之一，最重要的收获是：给了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跨海去到对岸，和同样在推动和平工作的妇女进行双向交流。12 月 16 日至 20 日为期 5 天的交流会，在我所工作的永和社区大学张长义主任的大力支持下，不仅协助分担了台北往返香港的旅费，工作伙伴们对我无法共同分摊大量工作也给予极大的谅解和包容。

抵达昆明机场，我终于见到了所有与会的台湾代表：许金玉、冯守娥、高金素梅、王清峰、夏林清、丽君、贺德芬以及负责台湾地区行政联络的钟秀梅，和陪伴许金玉和冯守娥两位阿妈一起出席的两位朋友，连同我共计 11 人。我们分别搭乘 3 辆出租车来到位于滇池旁的“煤矿工人昆明疗养院”。据主办单位说，选择这个地点办交流会的花费比较便宜，连同协助交流会进行的大学

^①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简称，即非政府机构。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 简称，即非营利组织。

生志愿者在内，整个活动将近有 100 人，前后 5 天的活动，经费开销的确是一个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疗养院和台湾的各种职训营区很类似，住宿开会休憩都在园区里进行，我因为一心要来进行交流，和其他和平妇女交换推动和平运动的心得和经验，当然，更是要将非战的终极目标——促成两岸民间的和平对话和合力——让中国民众知悉，并进行游说和组织结盟，因此，除了落地第一天的傍晚曾到滇池旁散步，并在晚间和 3 位同自台湾来的朋友一起到昆明街上逛逛之外，几乎每一场座谈、对话、交流，皆全神投入，毕竟我是在极为困难的时间、工作和经费的三重压迫下，抽出这珍贵的 5 天时间来到昆明，总要有具体行动和收获，才对得起自己和所有支持我可以参加这次交流会的朋友们，尤其是辛苦筹办这次活动的每一个朋友。因此，每一场交流会对我来说，都极重要而丰富，唯一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号称春城的昆明，那几天却气温极低，在没有任何暖气设备的室内空间，虽然我穿戴上所有的衣袜帽子和暖暖包，臃肿的像个球，仍旧手脚冰冷，头顶直打颤。

第一天全员出席的大会上，顺着引言人论及交流会之核心精神以及和平作为一普世价值，和战争对和平的破坏……我亦举手起身响应，并诚挚提出对所有与会和平妇女的呼吁：“如果战争仍旧不能避免，那么我要请在座的和平妇女们，那一天，让我们手牵手一起站出来，说‘我们不要战争’，因为战争带来的是生命的残害，在战争中，没有人是赢家。”这是民间和平交流，一次小小的成功！

交流会后感

5 天紧密的相处和交流，让我有幸近距离接触许多了不起的妇女，她们在无比艰难的环境里，凭借着无畏的勇气，甚至是她们的生命，全力以赴，在贫穷的中国农村里，她们甚至没有任何支持，仅仅凭着女性坚毅不屈的韧性，迎战恶势力，坚持自己的信念：有人从豆蔻年华就苦守窑洞十数年，为了是不想牺牲任何一个村子里孩子们的受教育权——类似的故事曾被张艺谋拍成感人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有人在回族村落里，为失学女童办学一办 20 年；有人凭借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在沙漠里治沙，成

功开辟出 600 亩的葡萄园；有人因为女儿的冤情，跟不公义的司法体系对抗，同时协助和她同受苦难的家庭一起奋战；有人在男女不平等的农村里，不顾家庭反对，组织妇女工作队，进行上千场的剧团表演，四处鼓吹男女平等进步思想……

这些令人敬佩的女性朋友，散居在中国各个角落，或许她们没有很高的知识水平，或许她们影响所及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但每一个都是珍贵和平种子，因为她们深刻地了解生命的尊严和可贵。

正是这种对生命尊严的坚持和信仰，“非战”选择了一条困难的道路：站在台湾主体位置上，要在求战和投降的两端，找出非战和平的第三条路。非战之路迢迢，但它值得追求、必须追求，因为任何人若侈言要捍卫任何价值与意义，那么他不能逃避一个更根本的责任：捍卫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因为，生命是所有意义与价值的源头。

和平妇女宣言

我们是一群和平妇女，在不同领域里坚持和平的信念：

- 一、我们追求和平，致力于全体人类的幸福和谐；
- 二、我们反对战争，以及所有形式的暴力与胁迫；
- 三、我们期盼更多人与人的、生命对生命的交流和关照。

因此，我们呼吁：

国际间不再进行军备竞赛，所有敌对的双方，包括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个人与个人之间，能展开和平对话，共同为追求世界和平而努力。

We are women who insist on the peaceful faith in different domains;
Firstly, we pursue peace and devote ourselves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whole human being.

Secondly, we oppose wars and violence and menace in any form.

Thirdly, we expect tha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 and that they can respect each other.

We appeal, therefore,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more arms race and both sides in the enmity including states, races, and individuals can start the peaceful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to pursue world peace.



贺德芬

与参与者 一个公共事务的观察者

文：张育燕

那尤其我所学是在宪法、国家民主或者政府体制跟人权观念上面，就觉得如果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促成民权的观念普世化，这件事情就值得去推广。

贺德芬提醒，其实会侵害民权的，都是拥有权力者，也就是政府，因此政府要受到人民的约束之后，才会努力去保障人民，这也是台湾推动民主制度所得到的成果。

一生投入公共事业的女性

贺德芬，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现为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台大教授联谊会、大学教育改革促进会、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等民间团体的创办人，1990年3月成为野百

合学运的教授顾问团核心成员；活跃于台湾的人权运动近二十年。

贺德芬投入的公共议题十分广泛，然都与她一生所坚持的民主、人权的理念有关。其专长包含宪法、著作权法、传播法规、高等教育、女性主义法学理论，等等，她也常是议题团体的发起人与召集人，对台湾社会中的政治、法律、性别、媒体与教育有着敏锐深刻的观察。

她曾于“2002年世界公民人权宣言”会场受访时表示，一个人应该在有能力的时候，贡献所学，“尤其我所学是在宪法、国家民主以及政府体制跟人权观念上面，如果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促成民权的观念普世化，这件事情就值得去推广”。贺德芬除了“说”、“写”，也努力地去“做”，其实单从她惊人的经历里，就足以感受到她的才华，与其投入公共事业的热情，也让人了解到，她之所以获得“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联会”提名，并非没有原因。

法律与经济关系的观察

贺德芬对法律和经济的关系有着敏锐的见解，曾提出著作权与智财权乃是保护创作人、促成文化创新与增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的观点。其所著的《文化创新与商业契机》一书中，第一章、“文化创新与法制化——著作权法的现代意义”，与第二章“智慧财产与国家发展”中，均论述了她对著作权法制意义的看法。

按照贺德芬的意见，著作权法的社会意义在于其为文化创新的护身符，因此在现代民主国家，以法治来统协社会成员的潮流下，为了促进社会有更丰富、更具原创力之创新文化，订定合乎时代潮流的著作权法正是必要的条件。也唯有在这样法制化的体系下，文化创新者才有具体合理与最起码的创作诱因之保障。

另外，“智慧财产与国家发展”一文中，贺德芬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引进外资和技术为首要之务，因此，对外资和技术的保障制度成为法制因应改变的急先锋，智财权法制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她引用日本工业发展与智慧财产保护的例子，认为完整的智财权建制即是造成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人民主权：媒体观察

当今台湾媒体所衍生出的议题及乱象令人不敢恭维，但早在1999年，贺德芬便以召集人身份，聚集学术界与新闻文化界人士，成立“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并担任第一届董事长，现为第三届董事。

这是台湾第一个建制化的媒体监督暨改造团体，内部由学界、媒体实务界以及关怀媒体环境的公民所组成。致力于媒体识读教育的推广、媒体公民权利的维护、媒体劳动权益的伸张、媒体公共性格的确立、媒体多元结构的建制，认为透过公民的集体力量必能创造合理、尊重、公义、多元的媒体公共空间。并以“维护新闻自由、落实媒体正义、促进媒体自律、保障人民知之权利”为成立宗旨。

台湾的无线电视台与有线电视台的背后，大多具有明显的党派色彩，或是代表重大的商业利益，而1998年7月1日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简称公视，贺德芬为第一届常务监事）的成立，则以建立为公众服务之大众传播制度为目的；虽属一股清流，但仍不无问题。

虽然大法官第364号解释，宣示人民有“接近媒体”的权利。有线电视广播法，也曾有过公益频道的规定，但现实社会里，却从未见过政府能约束媒体巨霸，认真保护过人民使用媒体的权利，甚至有有线广播电视法的规定都在民国88年（即1999年）予以删除。贺德芬认为，公视既然是属公众所有，便成了唯一保护媒体上的弱势，充分实践人民的媒体近用权的机会。

但是贺德芬却观察到，公视董事会曾将媒体识读列为重点节目，也曾通过“公众近用时段使用办法”，可惜的是，执行单位将媒体识读做成了如何做小记者的儿童节目，公众近用时段的比例，仅占总首播时数4.61%，预算仅占1.29%（2000年），而大部分归属于公众近用的节目，事实上应仅是“公众参与”（如民意电堂），并非由公众全然主导，自由使用频道的“公众近用”。同时，这类类归为“公众近用”的节目，质量粗糙，时段极差（星期日上午），难以吸引收视，而且使用办法，要求先缴交完成的制作带，对真正的弱势族群，并不容易做到，多数弱势团体对

之颇有微词。

贺德芬更进一步提出质疑，认为公视对近用时段的规划，除了最新的“高见亭”影音留言系统的设置外，并无长期构想，更无设定应该达成的目标，总之，目前绝不是企划单位的重点，故若不从观念上改变，提升更宽广的使命感，公视真正属于国民全体的理想，显然还有漫漫长途。



媒体需要受到监督，但新闻自由也要受到保护。2005年新闻局一度以停止发照手段，令七家有线电视频道停播，舆论大哗。贺德芬表示，新闻自由是凌驾治权之上的基本民权，行政权岂能介入操控，“这是政府滥权所导致的媒体寒蝉效应”！由此可见，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不论是批判媒体，或是反抗政府滥权，其出发点都是为了阅听人可获得健全的媒体环境，紧扣贺德芬等人的初衷。

民间力量与政治关系的观察

贺德芬既重视人权，也了解人民集合起来的力量。她曾于受访时表示，人民不能够将全部的力量都仰望在政府身上，因为人民和政府本来就存在紧张对立的关系。政府希望权力越大越好，人民也希望能够有更大的权利能够监督政府，不能让公权力腐化。例如政府之所以成立人权委员会，也是来自于民间的声音才能够

实现，所以不管政府怎么做，民间的力量都不能松懈，必须持续地监督。

贺德芬提醒，其实会侵害民权的，都是拥有权力者，也就是政府，因此政府要受到人民的约束之后，才会努力去保障人民，这也是台湾推动民主制度所得到的成果。贺德芬也认为，能够体会民间要求、接受人民指正与真正为民牟利，并继续推动民主化的政府，恐怕才是人民比较能够信赖的政府。

2000年，台湾首度实现政党轮替，是台湾政治民主化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华人世界的重大成就。然而这个成果却在经济低迷、政党恶斗以及连连弊案之下，离贺德芬心目中的理想政府，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2005年8月22日爆发“高雄捷运外劳弊案”，高雄捷运工地的泰国外籍劳工暴动开始，揭露了外劳引进政策的剥削与外劳政商勾结黑幕。该弊案是台湾人权记录的一大污点，也严重冲击执政的民进党“清廉执政”与“人权立国”的形象，并且被认为是民进党在2005年中华民国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中失败的重要因素，更使总统陈水扁开始遭到民众质疑。

之后陈水扁周遭人士也陆续传出了多起弊案，舆论称之为“一妻、二秘、三师、四亲、五总管”，主要有总统女婿赵建铭涉及的内线交易案、总统夫人吴淑珍被控收受Sogo百货公司礼券并介入该公司经营权之争、炒作股票、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案等，让陈水扁的声望不断下跌。

在野党立委提出“对陈水扁总统罢免案”，虽超过提案门坎，交付立法院表决，却在2006年6月27日表决时，民进党动员党籍立委不进场投票，台联则集体投废票，致未能超过三分之二同意之法定门坎，该罢免案不能成立，也因此无法再举行罢免总统之公民投票。体制内的制衡，至此已完全无法发挥功能。

在这段期间，贺德芬积极劝说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出面领导人民运动，行使宪法所保障的最高人民主权，以政治力量来挽救台湾的民主危机。

贺德芬认为，施先生为推动台湾民主，曾做过二十五年的黑牢，是民进党的老前辈。后来又曾做过民进党的党主席，在党主席任内提倡大和解，具有崇高的理想性，和宽阔包容的胸襟，是

真正能为台湾前途着想的人。而且民进党执政后，施先生是少数未曾和民进党人分享荣华富贵的在野人士，由他出来号召，应能获得蓝绿双方有识之士的认同，借以泯除意识形态的对立，共同为扫除贪腐、实现台湾最根本的民主来努力。

8月7日，施先生写了一封《给总统陈水扁的信函》，公开发表在中国时报，希望陈水扁能主动辞职下台，以尽其最后的忠告，并对他们两人间原有的革命情谊作了交代。

陈水扁并未有积极的回应。

于是，倒扁总部，在8月12日于台北市228和平纪念公园宣布“百万人民反贪倒扁运动”，同时呼吁民众每人捐新台币100元，以承诺授权给总部采取行动，对抗政府的贪腐。当捐款达一亿元时，即表示有一百万人同意并支持这样的理念，活动也因之取得正当性。

活动还未开始，既获得远远出乎意料的热烈响应。8月14日开始，三个“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承诺金账户”不到十天即突破一亿元，并于8月25日停止接受汇款，最后统计的结账金额为新台币111,211,563元，这就是贺德芬所说的“民间力量”。

倒扁总部的30多天

在这次重要的公共议题中，贺德芬成为“倒扁总部”的对外发言人，与施明德并肩作战。

贺德芬在1950年随父母播迁台湾，生长在一个保守的国民党家庭。又在封闭的教育体制下完成大学教育。因此，贺德芬与国民党关系深厚。甚至在留美期间，深受西方民主启迪后回国，仍想自体制内改革着手，来促进台湾的民主。贺德芬不只是资深的国民党员，并获国民党积极培植，曾在革命研究院受训，如能驯服听话，成为权力核心，是指日可待的事。

1979年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贺德芬还应同事要求，在学者发出的联署声明中签名，批判美丽岛事件中包括施明德在内的叛乱者，声明还写道，“看到黄信介等叛乱案，深感忧心忡忡，犯罪的人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为他们的误入歧途惋惜，他们受到国法制裁，绝不是因为主张民主改革，而是他们假借民主，破坏法律。”

然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贺德芬就洞识了一党专政，是民主发展的最大障碍。国民党这些年在民主上的改革，并未能令人满意，因此就挺身而出，先在台大校园筹组教授联谊会，要求校园民主，大学自治。并成立大学教育改革促进会，在89年教师节，领道台湾教授和学生携手的第一次游行，再历经七、八年的努力，全力监督大学法的修改，一步步的从大学校长民选、军训课程改选修，落实了现在大学自由的面貌。就因为这些活动，贺德芬和国民党从此分道扬镳，甚至更投入社会运动，也积极协助当时的党外，帮助许多人竞选，包括陈水扁在内。茁壮在野党，才能使政党政治趋于成型。直到民进党取得政权，各党应可在公平的基础上，各凭政绩赢取人民支持，不应再仰赖学者的背书时，贺德芬即不再偏袒任何政党，摒除个人的意识形态，回复纯粹就事论事，扮演好知识分子只为社会，只为人民提出净言的本分。

20多年之后，贺德芬再度选择站在了昔日被她骂过的施明德身边。被问起这段历史，贺德芬表示，年轻时候在党国体制下，信息并不流通，还觉得国民党可以改革，但“后悔吗？不会，一个阶段，一个心路历程，我觉得非常骄傲，因为我从未被‘权力’所惑，也从未屈服在‘权势’底下，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捍卫民权。”

贺德芬表示，她一辈子追求民主价值，认为倒扁活动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另外一个阶段。过去我们只追求选举权，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现在大家发现选票其实是很脆弱的，不见得能反映真实的民意。例如人民直接的“罢免权”就被政客完全剥夺了。当罢免案尚在讨论时，民进党内颇多检讨改革之声，陈水扁担心难以完全掌控，也不确知台联的意向，所以忧心得坐立难安。在罢免没有通过的时候，陈水扁忘情的喜悦“溢于言表”。可见，当时若非民进党动用党机器，以反民主的方式来操作，罢免案并非没有通过的可能性。现在徒有民主的形式是不足的，现在要努力的是落实民主实质的内涵，实践社会的公平正义。

倒扁行动受到政府打压，被内政部质疑“倒扁账户”违法，活动必须向内政部登记。贺德芬则指出，政治团体是要永续经营、有政治理念、参与政治与竞选活动，有野心最后取得政权的政党。反贪团体只是结合共同心声的民间团体，可能连申请书都还没送

出，就达到陈水扁下台的短期目标，活动也就结束、解散。贺德芬也强调，民众捐款100元并非政治献金，倒扁活动要展现民主力量，证明人民不是被操弄、没有自主性的工具，因此绝不可能登记成任何政治团体。她也说，如果内政部要开罚单，“请便”，但他们会打官司，宁可把钱还给人民，也不愿给国库去浪费，给少数人去贪污，展现了对法律的娴熟及不畏强权的精悍。

后来，由于发言期间直言直率，引起不少风波。当时，贺德芬即曾给施先生一封信，特别提出最关键的两点，一是，以颜色区隔民众，易形成他我对立，红色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大忌；二是财务要绝对清楚公开，以召社会大信。遗憾的是，红衫军果然就败在这两个问题上。

贺德芬更不同意，人民运动与特定政党结合，终被政党吸纳，成为政党的附庸，使反贪腐运动模糊了目标与主题，也授予执政党攻击打压的口实。原本要借反贪腐的社会共识，打破蓝绿的对立，结果，因为大量蓝营政治人物的介入，使得台湾南北的对立，更形尖锐。

由于触恼当时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并在围城策略上与同阵营的广告人范可钦意见不合，贺德芬以理念不合，要自行引退。施明德虽曾表示会“没有二十四小时期限”全力慰留，却仍在身边政客的压力下，撤换贺德芬发言人一职，自行戳破学界与政界合作的美梦。算一算，从8月到9月，最多也不过30多天。

坚守学者的岗位

日后倒扁总部还是不断有成员出走、内讧，凯道前的满满人潮也演变至火车站前的稀少人丁，看在曾经也是倒扁决策核心的贺德芬眼里，对动能丧失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最好的时机早就错失。贺德芬说：“运动需有论述基础，需要妥协空间，绝不是‘你倒我亡’的零和革命。15日（围城）的空前成功，就是最好的时机。当凝聚的能量达到最高潮时，就是谈判的时候。当时若能提出非常具体的政治主张，给予下台的空间、时间，要求陈水扁回应，相信执政党也不敢蔑视不理。

她也认为，当初反贪腐的内涵早已不在，剩下的只有空洞的口号：“只看到非常花哨的一个作秀舞台，成就了一个人的独角

戏。恐怕，台湾社会再也无能号召人民的力量，未来的执政者，只要厚着脸皮，熬过人民的抗议，便什么污都敢贪，什么坏事都敢做。光是期待司法，即使有迟来的正义，对民主发展，都是最大的讽刺。我觉得真的是很对不起百万的人民。”

至于活跃在倒扁活动会场的各类型政客，她也批评动机可疑，尤其是阻挠国庆节庆祝活动，更是荒腔走板，贺德芬批评立法委员不过是“有缝就钻，有舞台就来，只要有镁光灯就在那里秀，忘了他们的职责应该是在立法院里。”道不同不相为谋，退出倒扁总部回到学界的贺德芬说，白白遭塌了人民澎湃的热情，和人民主权的一丝契机。只有叹息，还是把这些历程作为最好的民主教材，比较实在。

倒扁总部后续发展

待国务机要费转由司法审理，倒扁总部暂时休兵，转为监督司法执行，红衫军民众，则移至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141号的室内，作为倒扁总部会场，并取名“红衫军之家”。

施明德本人在2006年12月5日宣布自囚直至陈水扁下台、或卸任为止，然至2007年2月15日，施则悄悄去了美国，接受肝肿瘤的检查治疗；就在同时，红衫军之家拉下铁门，把聚集的民众赶出去，铁门遂遭喷漆大骂“施明德骗人”，待施3月回国，以不屑口气指责“红衫军成天待在总部前喝酒泡茶”，让死守倒扁总部的红衫军在好不容易等到精神领袖回国后，却狠狠挨了一巴掌，让人难过、生气，更加愤怒，部分红衫军预计要联署上法院，控告施明德骗钱。

对照贺德芬与施明德，两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民间力量的态度与看法。施明德曾明白指出“贺德芬是我这次行动最大推动者，也是对我压迫最大的人”，然而，这次的倒扁行动到底是“施明德的行动”还是“人民的行动”？曾有红衫军受访时明确地表示，倒扁红潮的成果是来自于人民的团结。而昔日拥有丰富群众运动经验的施明德，似乎还想再创造出“社运英雄”。

反观贺德芬，由于了解台湾民主进程不是靠一、两个人作成，而是靠着全体人民的努力才有今日的成就，她追求的是民主价值，不是掌握发言的权力，她反而常常用她的力量去挑战权威，只要

是对人民好的，就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且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这就是持续身为一名公共事务观察者与参与者的真正能耐。

附录

贺德芬参与公务：

南华大学国际关系暨大陆事务学系/公共行政与政策研究所
教授

倒扁总部发言人

台湾大学名誉教授

经济部电源开发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

财团法人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委员

公共电视台常务监事

台北市文化基金会监事

首创文教基金会董事

王玉珍文教基金会董事

内政部著作权审议委员会委员

经济部国营事业委员会睦邻工作小组委员

公共电视台筹备委员会常务筹备委员

救国团咨询委员

民进党仲裁委员会委员

泛太平洋暨东南亚妇女协会理事长

台大教授联谊会创会召集人

大学教授改革促进会创会会长

台大镜社创会会长

自立早报、台湾时报主笔

东森文化基金会董事



文:张育燕 钟秀梅

一个成功的治疗案例与一场成功的社会抗争，主要依赖的是当事者与其生命因局缠斗的力量，“对抗”是必然的，只是其对抗之表现形式风貌不一。

‘教育者’比治疗者、谘商师四通八达，它可上山下海地在人们熟悉的文化角色中推进关系，开展生命变化与学习的历程。

夏林清，青年期投入青少年工作，美国留学期间受左翼思维影响，毕业返台投入工运。此外，她投身性工作者的平权运动和小区成人的解放教育等。戒严期间，她结合各种资源，鼓励年轻人关注社会，创造社会运动空间。

书香世家 运动家庭

夏林清，1953年生于台湾阳明山，父亲是资深媒体人夏晓华，曾创立“正声广播电台”与《台湾日报》，大哥夏铸九目前担任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教授，二哥夏禹九则为东华大学自然

资源管理研究所教授。夏林清自政治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出国进修，取得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谘商教育硕士，及哈佛大学谘商与咨询心理硕士、博士，现为辅仁大学心理学教授兼系主任。

夏林清在年轻时受哥哥影响，又在国外接触左派思想，对基层劳工产生热情，曾一度在论文未完成时，就冲回台湾到大园当女工。日后她也影响了丈夫郑村棋踏上工运之路，自1978年结婚后，展开两人一起求学、一起从事劳工运动的生活，郑还戏称：“我搞工运，都是老婆‘害的’”。待女儿长大一点，夏林清也会带着女儿“跑场子”，听演讲、看左派电影，要是开会时女儿哭了，夫妻其中一人便把她带出会议室安抚，可说是全家动员投入运动。

实践与行动：对社会运动的关怀

20世纪70年代，在大学校园骤起迅落的保钓运动，启蒙了她的政治与社会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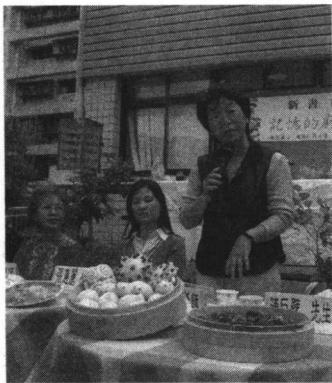
1976年她前往美国进修，到过费城、纽约参加海外保钓学运尾声零星的演讲活动。回想过来，她发现：“保钓的震慑源自对体内政治恐惧的感应觉察，禁制的区域却也正是探头松动手脚的发展地带！”1977回到台北，碰上乡土文学论战，让她有机会见识政治运动与文学运动间的张力。后来她短暂地做过纺织女工与电子女工的工作，这构成了她日后的专业实践中某种特定形式的粗胚。

1981年，夏林清开始在辅仁大学辅导中心工作。三年后，当各种外来治疗风尚正在兴起时，她却决定逆势而行，选择作教育工作者。她认为：“‘教育者’比治疗者、谘商师四通八达，它可上山下海地在人们熟悉的文化角色中推进关系，开展生命变化与学习的历程。”

一直参与社会运动的同时，她亦对自身的行动、经验组织整理，成为行动实践理论的架构，她说：“愈来愈觉得，我其实参与在一个以实践行动生产知识的社会历程中。当你投身在一个实践历程中一段时日之后，你会发现当你需要对别人说明你做了什么，又发生了什么，而你必得叙说一个复杂的故事时，你实已立足于在地脉络化的知识之中了。”

1986年前后，台湾不少工厂不明不白地倒闭了，失了工作的

工人只有自力救济，各个工会重组的抗争事件一件跟着一件冒出来（如中时工会成立抗争、新光关厂抗争、远东化织工会抗争……）。面对这种情势，夏林清亦开始介入工人运动之中。她找上几个伙伴，带着学生下田野了解实况，分辨个人、团体、组织与集体行动的不同层次，摸索工作方法，要能帮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又要一起在劳、资与官方的仗战中不被打败，这种辛苦无比的工作如同一场接一场的社会斗争。



这些经验在她 1998 年参与的反对台北政府废公娼的运动有所继承，她跟受影响的性工作者共同进退，对抗主流社会剥夺了性工作者的生存权。夏林清曾经指出，bell hooks^①的“对抗点”概念曾协助她理解公娼抗争的社会意义。她认为一个成功的治疗案例与一场成功的社会抗争，主要依赖的是当事者与其生命困局缠斗的力量，“对抗”是必然的，只是其对抗之表现形式风貌不一；工作者与当事者生命的结盟就是一个‘对抗点’的展现。”

理论服务行动：对行动科学的推崇

专业上，夏林清也致力推动行动科学和行动研究，特别是成人教育方面的。行动科学的核心概念是研究者同时是教育者及介入者。行动研究是社会情境的研究，是以改善社会情境中行动质量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研究取向。这个简要的定义明确引出了从事行动研究最基本的条件，那就是反省能力和改革的愿望。她说：“如果我们不能反省自己，我们基本是不能做到‘行动研究’！”

对夏林清而言，行动研究主要关切的是“变革”，此一观点根植于“发展与创新是专业实践（professional practice）中一个重要部分”的想法。例如在实践成人教育的过程中，她发现教育的

^① bell hooks 为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者。

核心问题之一，是社会互动的复杂性（通常涉及较大的群体），而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中通常存在着改进的机会。然而，人们倾向以例行化的实务工作来减低互动的复杂度，以避免处理诸多决定和行动，但这却抑制了人们了解自己的动机及实作后果的能力。

在不遗余力地推展行动科学上，夏林清除了有大量实践经验外，还有许多学术出版社^①，这些著作作为有兴趣进行行动研究的教学和研究者提供丰富的资源。

知识分子的良知

“当穷人受苦时，当他们的温柔与生命
已耗损殆尽时，你做了什么？
我甜蜜国家的政治性的心理学者
你将无能回答。
沉默的秃鹰，吞食你的勇气
你的悲惨，啄食着你的灵魂
然后，你将在羞愧中沉默！”

夏林清曾在第四届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华人心理与行为科技学士研讨会上，发表《社会力场中的对抗点启动人的发展完成式》，开头就节引了 Fred Newman 改写危地马拉诗人 Ana Castillo 之诗作《去政治性的知识分子》，显示了她对知识分子应具社会正义及社会参与的认知。这位研究实践者的记录与反思提供我们尊敬与榜样之外，我们也应该了解到，这位女性其实是在研究、家庭、社会参与、教学的多重压力之下，完成了种种实践，并勇于挺身多人忌讳的公共议题，真正为有需要的人服务，这是夏林清的可贵之处。

^① 夏林清译作有《Change：与改变共舞》（与郑村棋、陈文聪合译，台北：远流，2005），《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与翁开诚、成虹飞、刘惠琴合译，台北：远流，2004），《反映回观：教育实践的个案研究》（与洪雯柔、谢斐教合译，台北：远流，2003），《行动研究方法导论：教师动手做研究》（与中华民国基层教师协会合译，台北：远流，1997），《行动科学：在实践中探讨》（与郑村棋合译，台北：张老师，1989）等。

成露茜
勇者的故事



文：钟秀梅

知识分子就要知民间疾苦，不要眼高手低，只会说不会动。

她帮助弱勢者争取发言空间，训练并鼓励年轻人投入社会运动，让进步的声音在单一的政治文化中有发声的机会，坚持并维系另类媒体的独特风格，不向主流妥协。

成露茜，1939年生于香港，著名报人成舍我之女。《台湾立报》发行人，台湾立报暨破周报发行人兼社长、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传记文学出版社社长、美国加州大学 UCLA 终身教授。她曾在北京、香港和台湾受教育，1958年赴美深造，先后获文学及新闻学硕士学位，夏威夷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过去30年，积极参与社运和妇运，以学术介入社会运动与教育，培养社会运动的能动者。

逃亡与求学

自从1935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西方几个帝国角逐，试图通过侵略垄断对中国的殖民，中国人民几经日军摧残，许多的家庭离散，无数冤魂在中国土地上飘荡，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树立了外部的敌人，其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矛盾加剧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大陆内部军阀割据处于内战状态，创造了主要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在此动荡的年代，成露茜出生于香港。

露茜的家庭与家国的命运休戚与共。父亲成舍我于1935年在上海办了“立报”，是著名的报业家，因为抗日战争，1938年移至香港，但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立报》停刊。成舍我出席重庆参政会未归。”^①露茜随母亲萧宗让、哥哥成思危、姐姐成嘉玲四处逃难，先后到桂林、重庆，抗战胜利到了北平，后来又到了香港。露茜回忆起：“母亲在法国念书，回国也没有做事就结婚了，然后生下我们3人，然后就没做什么事，一生好像就这样没了。可是后来我想一想，我父亲是现代史上很有名的人，可是他每一次都是抗战、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来时他就被抓，他就总是跳上车，带把牙刷就跑了。只有我母亲带着我们3个小孩逃难。”

1952年，露茜举家搬到台湾，有好几年，父亲的状况是“本拟在台北复刊《世界日报》因国民党政府实施报禁，办报计划搁置，成舍我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几年中，我就断绝了办报念头，一面教书，一面写点评论或专栏之类的文章’（马之骥，《新闻界三老兵》，页309）。这时她决心兴办新闻学校，培训一万名新闻干部回大陆。”^②没想到这一留，成舍我竟在台湾度过五十几年的光阴。

成舍我教育子女的方式很民主，从小给孩子自由的环境，并培养他们独立的个性。成舍我也教导小孩用钱的态度，从很小的

^① 资料来源同上。

^② http://csw.shu.edu.tw/timeline/view.php3?order=YEAR_NO&limit=10&view=all.

故事就可看出，露茜在她的回忆中提到：“小学时，如果替我父亲做点事情，比如说，我父亲有剪报的习惯，他剪了报以后，都是我再把它裁了，然后贴在他那5×7的白纸上，这个工作，基本上是我跟姐姐承担，贴一张给一分钱，长大一点，我们就替他抄稿子，抄100个字一毛钱，他弄一个存折，上面写父亲银行，下面有我们的名字，他给我们记账。”^①

完成高中学业后，露茜考上了台大外文系，后来听了圣公会的建议到夏威夷念书。父亲反对她选择音乐为专业，支持她的母亲卖了钢琴，加上她自己的全部积蓄，才筹了100美金，她就这样远离台湾，负笈他乡。

美国学术生涯

露茜成为社会学教授，事出于偶然。刚到美国读书的第一年，她打5份工，维持学习生计，一年下来积劳成疾，在一个圣诞节晕倒在百货店，才知肾脏出了问题，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手术中失去了一个肾脏。愈后，她的体力无法负荷专业必需的高强度音乐训练，她才便把音乐变成辅修，主修社会学。

露茜大学毕业后，同一位日裔美国人结婚，他正在服兵役。露茜在芝加哥读书时，丈夫被派往韩国，她病倒后，有人建议她去要求调回她的丈夫，露茜就大胆的直至找到一位夏威夷的参议员，据理力争，要求把丈夫调回芝加哥，没想到竟获成功。此事件让露茜获得了一个感悟，她说：“只要你知道你的权益所在，你就去争取，不必一定要忍气吞声。”

露茜在美国的学习生涯中，经历了独立思想、勇于表达自己想法的训练。露茜曾因为对英文没自信，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个老师一度认为这个学生像个小偷，到课堂偷听大家的想法，然后变成自己的想法，后来，露茜克服种种困难，在课堂大声说出自己看法时，这名老师便表示非常欣赏露茜的分析能力。

在芝加哥生病期间，母亲在台湾过世，露茜住在医院，没接到家里的消息，没能参加母亲的葬礼，这成了露茜一生的大遗憾。

^① 关于成露茜教授的访谈，均参照翁秀琪教授在1998年的访谈整理，经成露茜教授同意运用。

露茜觉得亏欠家里，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后，她回到台大教授大众传播，陪伴父亲过了一年。之后，她获得夏威夷大学博士班的录取，几年后，露茜成为夏大第一个博士生。此后，她接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开始了她人生中一个长长的战斗的段落。

露茜在芝加哥的学习生活中，强烈地感觉到种族歧视的存在。到了洛杉矶，在学校中，她又是弱势身份：非名校毕业生、女性与少数民族，而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兴起的年代，在美国争取种族平等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同时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给露茜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露茜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任教期间，历经艰辛，同时，“战！战！战！”，成为她在美国社会的座右铭，期间种种磨难，一言难尽。经过多年努力，露茜破天荒的被录用为亚美研究中心（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主任，打破了这个职务由终身教授担任的惯例。

作为学者，露茜不但主张研究必须与社区结合，关注长期被忽略的弱势社群如旅美华人，尤其是华人女性面对的问题。露茜不理睬学校的规定，她组建了3~4人的核心教授群，配合一些对少数民族运动有承诺的学生，展开族群教育与研究，震动了美国当时整体上相当保守的学院。

这个研究中心也参与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同时介入了对越南战争的分析，研究团队认为，参战的美军多为黑人，黑人死伤最多，令美国种族矛盾外化。中心办了《亚洲行动》（Asia Action），是美国唯一的亚洲学术刊物。露茜还展开了亚洲妇女研究，把学生带到唐人街做调查。她引以自豪的，是关于在美国早期华人妇女的研究，她花了许多时间在图书馆、唐人街、墓地等，寻找第一手资料，最后勾画出4,000多个离乡背井到美国讨生活的华人妇女的故事。

露茜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分析资本流动与世界体系的关系，特别是亚洲作为国际分工的一环，其劳力密集产业的基础，是建立在大量从农村到城市的廉价女工之上。这一研究方向也是斗争得来的，曾遭到当时保守的区域研究者的反对。露茜强调：“我的研究不是地域研究，它研究的是关系，是研究太平洋地区所

有国家的互动、货物的流通、移民、资本的流动。”^①

社会介入

露茜是学院中的行动派，她反对知识分子无视国际间的权力关系，奢谈世界公民，因为学院教授可以实现无国界流动，但并非每个人都做得到。1972年加州的唐人街成衣业很发达，有两个重要的社会团体在里面活动，一派主张要组工会，一派要搞合作社，露茜带着大学生挨家挨户做调查，才发现成衣业的社会关系网络都是亲族关系，搞工会会有困难，露茜就建议他们搞合作社。“后来我们就下去跟他们一起组织，一开始很顺利，因为我们做了研究，所以知道这个地区需要什么，我们做了家庭讯息数据，有英文、中文、西班牙文，还给他们编读物，讲防止家庭暴力，另外，我们帮助合作社卖菜，通常早上四点到菜场把很便宜的菜买进来，在唐人街卖出去，合作社也组织做成衣，接回来，大家一起做。”^②



^① 关于露茜教授的访谈，均参照翁秀琪教授在1998年的访谈整理，经成露茜教授同意运用。

^② 关于露茜教授的访谈，均参照翁秀琪教授在1998年的访谈整理，经成露茜教授同意运用。

合作社的盈余分配由大家开会决定，一开始还好，但是赚了钱后集体的公共性不见了，居民宁愿买电视，也不愿办公共托儿所。这次的受挫，露茜并不气馁，她觉得知识分子就要知民间疾苦，不要眼高手低，只会说不会动。

1972年对成家而言是重要的一年，受父亲的托付，露茜只身前往北京看望离散多年的哥哥成思危。“成思危的逆境一直到1972年才有所转变，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紧张的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此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移居台湾的成舍我先生感到寻找多年来日夜牵挂的儿子的机会有了。他派在美国留学的四女儿成露茜专程回中国寻找哥哥，同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给成露茜接风，并称成舍我是“民族资产阶级斗士”。随之，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兄妹见了面。接下来，成思危获得平反。再接下来，又从沈阳调入北京，到化工部石油科学研究院工作。”^①

在面见哥哥之前，露茜就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因为她在课堂上批评国民党，一直到1975年因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台湾有行政的关系，她才得以回台。虽然哥哥在大陆的遭遇和自己被台湾当局的迫害，露茜对两地的热情依旧，她说：“我不是国族主义者，我相信人民自决。”^②

回台办报与办学

1991年因为父亲年事已长又生病，露茜答应他接下台湾《立报》，此后十几年的岁月，露茜奔波于美国和台湾，就因为这样，她的第二任丈夫无法接受在台湾生活而离异。

台湾《立报》是众多商业报纸之外的另类选择，它表达批判的、多元观点的、教育的、性别的与社运观点的报纸，《立报》如实的报道，成为台湾媒体界的异类。《立报》承接了成舍我在上海办报的传统，有三大目标，实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理念、发扬公正独立的媒体传统、不依靠庞大的资本为后盾。

^① 华南理工大学建校50周年的专文《从书生到副委员长——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

^② 资料来源：翁秀琪教授访谈。

《立报》是一份四开的小型报，这份资金常常短缺的非主流媒体，在20世纪90年代多变的台湾社会，为如实报道各种各样人民自发的运动与想法，露茜几乎每天下午到报社，要忙到夜里一点才结束，现在台湾许多优秀的媒体工作者，都曾在此锻炼过。

1996年露茜又办了《破报》，其宗指示：“有立必有破，有破才有立，世代的交替，在立和破的辩证轨迹上滑行。没有一个世代保有完全和永恒的优势，‘破’和‘立’也不会是任何一个世代专利。”《破报》和《立报》的创立是要在参与这个过程的人，留下一些种子，能够在台湾这片土地发芽茁壮。^①

推动世新大学成立社会发展研究所，也是露茜重要的成就，这个研究所鼓励学生参与社会的另类发展研究。几位老师都是行动派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别介入学运、工运、移民权等运动，带领学生进入批判的、互动学习的、基层实践的行动研究方法。在接手世新大学后，她当了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并随即开办了世新社会发展研究所，作为鼓励学生介入社会的一种教育模式，致力于推展另类媒体的教育与养成工作，培养另类的学生，造就新形态社会运动。世新社会发展研究所推行的一系列跨界别、信仰宗派的多元媒体教学，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关注社会的人士参与。在“社会关怀·全球视野”的号召下，社发所就吸引了一些身份奇特的学生，例如关怀生命协会的理事长释悟泓法师，还有比丘尼自淳法师，还有来自自淳及香光寺“派来”专门学习组织工作和小区发展的。此外，学生有原本学医技、美术，还有学航业工程的，具有运动和基层组织经验的人更不在少数；师资方面亦有剧场工作者钟乔、纪录片导演吴乙峰，还有“美丽岛事件”时著名的美籍民主运动人士艾琳达……她说：“我们相信学是‘有学有术’的。”这就是成露茜口中的一个“另类的”社发所。

关注性工作者

近年，成露茜从事台湾色情业的研究，并联合其他学者与性工作者争取性工作者权益。1998年5月在台湾，她与台北市公娼

^① 参考《立报》与《破报》简介。

自救会、“台湾粉领”等妓权争取组织，举办性工作权利与性产业政策国际论坛，从国际政策、人权、妇女劳工等角度及面向观点看性交易问题及性工作者的权益，与会者来自11个国家及香港地区，包括性工作者、妓权运动组织者、性产业政策制定者、行政官员、作家、律师及人权工作者。为争取性工作者权益建立夸界别、地域的合作平台。翌年，她与熊秉纯合作出版《妇女、外销导向成长和国家：台湾个案》《赋社会以社会性别》及《现代化之下的色情业》，肯定性工作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贡献，指出台湾“官方虽然公开谴责从事特种营业的女性，并且定期逮捕无照娼妓，但同时又鼓励继续以色情业吸引观光客”的不义。

成露茜与台湾关注性工作者的学者的努力，成功令政府延援了废公娼两年，虽然之后台湾政府仍然实行废公娼，但她们仍与这群性工作者站一起，以各种文化活动及讲座，继续吸引公众注意，争取性工作者权益。

露茜常想为何我们会对强者认同，对弱者无所感觉？露茜过去所做的努力，打破了这个常规，她帮助弱勢者争取发言空间，训练并鼓励年轻人投入社会运动，让进步的声音在单一的政治文化中有发声的机会，坚持并维系另类媒体的独特风格，不向主流妥协。露茜的勇气与眼界，为她所努力的多个社会留下无形的资产。

何春蕤
语不惊人死不休



文：何春蕤

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因为社运的机缘而接触到各种平凡人生中的不凡世界，所以不能也不愿对保守团体消灭异己的做法保持沉默。

偶尔陪伴并声援她们的何春蕤被那种坚韧震慑住了，原来，基层的卑微生命可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她开始学习女工们那种打不败的精神。

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你再性骚扰、我就动剪刀、把你剪光光。

何春蕤所做的工作就是用她的学术研究、社运写作、和社会参与来挑战那些封闭和成见，透过挑战传统的社会阶序以及挑战自以为是的道德，来促进平等、和平、公义。

自从1987年台湾解严以来，台湾社会就很难被称为是“和平”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台湾没有参与在战争中，没有明显

的内外分裂，应该算是和平吧！不过，这样的和平却掩盖了许多东西，而这些被压抑、被掩盖的东西都要在解严后的氛围中才慢慢得到伸展、得到滋养、得到刺激，进而抬起头，挺起胸的冒出芽来。

戒严体制是一个敌友分明的世界，没有中间，没有灰色，非善即恶、非统即独，非友即敌，不爱国即共产党，非主流即有问题。这种对立的世界，就算后来解严，戒严体制所形成的黑白二分思考模式还会不时被各种政治力量呼唤出来，对任何在自己眼界和经验之外的事物表达敌意和焦虑。在这个两下敌对的世界里，想要引入任何新的议题、新的眼界、新的思考，想要抗拒简化的敌我观点，就会立刻被戒严所形成的对峙和猜忌着色，被长久以来弥漫台湾的恐慌情结所缠纠。

在这种情境和情绪之下的台湾社会，说是和平，却是一直进行着各种沉默的、无言的、含蓄的战争，排斥异己。要是有人揭开这个和平的假面，指出其下进行的污名杀戮或制度排挤，立刻就会被视为制造纷乱、丑化社会、误导大众；若是仍拒绝收敛，执意高亢的要求公义平等，那就等着接受这个社会的制裁吧。

在台湾，何春蕤就是这么一个人。

她“语不惊人死不休”

在过去十多年里，她曾经参与许多社运行动，从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到逐渐成形的妇女运动，从摸索现身的同志运动，到高亢发声的公娼运动，以至于各种迂回浮现的其他边缘运动，何春蕤总是其中十分突出的发言者和写手，不断以其锋利的、淋漓的言语和分析冲撞成规，打开社会空间。“惊世骇俗”、“语不惊人死不休”是媒体对她的封号。

有媒体曾经问过何春蕤为什么那么有勇气，总是说着各种惊世骇俗的论点。何春蕤的回答是：“老实说，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其实是个蛮平凡度日的人，和一般人一样对于 SARS、水资源、垃圾、政客口水战感到忧心，也和一般人一样爱逛夜市、吃小吃、收集消费信息等。我可能只是有时提出了一些和别人长久习惯的常识不太一样的说法，因而被视为惊世骇俗而已。如果大家觉得惊世骇俗，那恐怕是因为大家真的不知道“世”和“俗”到底是怎么样，有时还得在某些搜奇八卦的

电视新闻或平面媒体才看得到这些不凡人生的侧影掠过。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因为社运的机缘而接触到各种平凡人生中的不凡世界，所以不能也不愿对保守团体消灭异己的做法保持沉默。”

那么，到底何春蕤是接触到了哪些凡人的不凡生活呢？

1988年，台湾解严后一年，何春蕤兴奋又好奇地回到生长的地方。在美国攻读了两个博士学位，一直没有想到归化，也一直没有回到台湾，在这个解严的时间点，被数十年高压政治扭曲了的社会形貌将会如何变化呢？以博士论文专攻文化批判理论的何春蕤决定打起行李回到台湾，投入观察这个前途变化未卜的社会。

虽然在中央大学任教，何春蕤的生活却没有局限在中坜。当时有一大批在美国求学的进步知识分子也同时回到台湾，大家都觉得情势大有可为，因此对于台湾社会的脉动也极有兴趣观察，大家都想集结力量对局势有所投入。朋友们由于各种因缘际会进入了不同行业，有些在大学教书，有些进入研究单位，有些则进入媒体，或者和各行各业的工会开始合作，这些触角后来也都会成为这些知识分子声援运动的入口。

1989年可以说是台湾工运最蓬勃也最惨烈的一年。其实解严并不是政治开明化而已，更重要的是，解严是松开政治的钳制，好让台湾已经绕道香港大量出走的经济投资能够更为顺畅，化暗为明；也让台湾多年累积的财富能够透过股市和六合彩、大家乐等上冲下洗，重新分配，以便快速推动产业升级，从劳动密集的产业转向资本密集的产业或投机。这个历史现象听起来是开明的、活泼的，然而对那些用血汗换来台湾经济奇迹但是在资本出走、产业升级中被遗弃的劳动工人而言，解严却正是他们悲惨命运的开始。1989年前后台湾工人运动的蓬勃，正标记了劳动阶级在资本出走转型中的痛苦觉醒和积极抗争。在这个动荡的时刻，进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缺席，他们三三两两的参与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工运抗争。

何春蕤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刻首度接触到新光纺织厂的女工们。台湾在经济起飞的年代最为人称著的工业就是纺织业，这些或老或少的女工都是其中的支柱，然而新光财团却决定放弃基础产业转向地产投机，撇下这些用劳力替它打造财富王国的女工（现在的新光贵族医院和新光三越摩天楼阴影下都是这些女工的血

汗)。一般工人可能叹口气就离开即将关掉的工厂，另外寻求出路，但是新光纺织厂以台湾原住民为大宗的女工们却埋锅造饭，固守工厂，团结起来捍卫她们的生路和生命。为了维系长期的抗争，她们把原住民的歌曲改编成抗争歌曲，她们集体围住新光财团大楼要求对话。偶尔陪伴并声援她们的何春蕤被那种坚韧震慑住了，原来，基层的卑微生命可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她开始学习女工们那种打不败的精神。虽然后来抗争最终失败，这些动员却为后来的社运打开了更广泛的抗争形式和奋斗的表率。

她发声批判文化

进步学者们在1990年前后集结到台湾各大平面媒体的副刊和文化版面上，用他们的批判论述来对抗岛内沿着族群分野发动的政治策略，他们的文化批评带动了整个世代的思想路数。何春蕤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在平面媒体上撰写对台湾性别文化的分析及批判，从表面的现象中阅读着台湾已经无法遮掩的蓬勃欲望，也期望这些分析能去除伪善所形成的罪恶和羞耻，让性成为女人正面积极的力量来源。让女人壮大得力，这正是基本的女性主义运动立场。

媒体投稿的限制很快的就不能满足这些机动的写手，他们讨论着建立自己的刊物，经过多次聚会讨论，左翼的《岛屿边缘》杂志于1991年诞生，串联起许许多多当时不愿随主流起舞的知识分子，也借着这个刊物引介各种进步议题和眼界，更自觉的颠覆和批判着知识分子的优势地位。何春蕤当时也是《岛屿边缘》的一分子，在每次的开会讨论中交流着不同领域进步分子的洞见和经验，这个刊物可以说是台湾解严后最彻底的文化批判刊物，影响至今不减。

2003年何春蕤受张老师出版社之托，主持一个“性心情工作坊”，有机会用12周的时间和8个差异极大的女人一起交谈个人的性经验。这个讨论的开阔和坦然使得何春蕤充分见识到女性情欲的多样性和社会建构，对于讳言情欲的社会是如何深刻的局限女人整体发展也有了第一手的观察。这个工作坊的具体经验后来构成了她对情欲议题的基本论调，也成为她参与推动岛边女性情欲专栏“妖言”的动力。

1994年可以说是台湾妇女运动的转折点。默默进行的性革命已经在满街的宾馆、大学附近的同居街、性书籍的翻译出版、社会版的乱伦故事、女性的衣着和身体上发出了明显的宣告，然而女性主义却还提不出一个因应的性别分析，危险、罪恶、羞耻还是大众思考性的角度。3月8日在台大举办的女性主义讲座中，何春蕤以“女‘性’解放”为题发表了20分钟的演讲，不但抛弃了一般人的守贞论，反而还鼓励大学女生打破处女情结，积极掌握自己的身体和欲望，锻炼经营性的主权。这个演讲拉开了女性主义的情欲观点，在台湾引爆了和医学及公卫人士的辩论，也使得主流女性主义者感到不安。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在以她们的身体实践自主的女性而言，这样开阔的论点却使她们可以坦然的面对身体的事实，练习掌握自己的情欲；对于整体文化而言，这样的说法更有对抗压抑的效果。



1994年的师大教授性骚扰女学生案爆发了妇女团体的愤怒和恐惧，5月22日台北街头的反性骚扰游行盛大举行，队伍中对于众多性骚扰的悲情控诉使得整个气氛甚为低迷。在中途休息时，何春蕤走上宣传车，开始一段对于性骚扰的社会分析，指出那是性封闭和压抑的社会才有的制度性问题，而对抗的方式不是更为严厉的管理男性的情欲表达，而是开阔女性的情欲力量和坦然沟通。接着她喊出了“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你再性骚扰、我就动剪刀、把你剪光光”的趣味口号，使得队伍中的情绪一时高

涨，兴奋和力量取代了悲情和无助。何春蕤幼年总是背着父母偷偷读武侠小说和章回小说，这种经验使得她对语言的节奏和对仗有着过人的敏感，对于运动队伍中喊出响亮动人的口号大有帮助。

女性情欲、女性自主的执持

女性情欲运动的风潮对于社会中的其他性弱势、性边缘有着一定的鼓舞力量，特别是当时已经开始骚动的同志人口。《岛屿边缘》从1994年开始和女同志杂志结合，更以专号引介酷儿理论以带动同志认同和运动集结。其后10年中，同志运动的场合中总是可以看到何春蕤爽朗的身影：她以鞭辟入里的分析揭露故示包容的施恩派，她在女性反抗性暴力的夜间游行中凸显也同样承受夜行暴力的同志，她用个人的联系邀来同志运动前辈参与台北同玩节的同志公民论坛，她在同志认同的各种辩论中总是把讨论带往多元的、前瞻的观点，她在同志色情文化的议题上毫不回避全力支持。台北的同志团体呢称何春蕤为“同志教母”确实是有其渊源的。

1997年台北市政府快速废娼。出人意料的，128位失学的中年性工作者没有默默消失，反而团结起来和市府缠斗。在这个历史节点，女性主义者面对了一个真实的考验：到底女性自主的底线在哪里？女人真的可以充分自主的活她们选择的人生路程吗——即使这个选择是大多数人反对的、谴责的？有关性工作的社会批判同样可以适用到外遇的女人、劈腿（多伴侣）的女人、性活跃的女人……台北公娼的抗争于是再度使得1994年以来女性主义内部因着女性情欲而展开的大辩论浮上台面。

在一次座谈会中，一位公娼现身说明自己为何反对废娼，为何选择做娼妓。那份坦然、那份自主、那份力量，使得在场的学者、律师、工运人士大大动容，从此开始了一段很长的再学习过程，那些被认为社会地位最低、污名感染最深的公娼姊妹反而成了重新认识社会成见和压迫的导师。在公娼抗争的两年中，何春蕤出没在公娼的队伍中，总是以最强势最高亢的语言和理论作为公娼们的后盾，和主流的妇女团体进行激烈的辩论，她也积极用个人的学术专题研究来描述性工作者的主体性，以对抗主流对工作者的罪犯化和病理化。废娼之后，公娼自救团体转化为性工作

者关怀团体，何春蕤仍然参与每年的性工作除罪化游行，并带领学生投入帮忙翻译的工作。2000年开始，何春蕤组成了台湾第一个跨性别的支持团体，让所有的变性人、跨性人都能够在群体的聚集和讨论中得到支持，得到信息，也逐渐形成有主体性的运动组织。

何春蕤曾经说：“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她们能不能用论述力量来打开眼界，冲破成见和封闭。”在过去15年中，她用犀利的笔锋，深刻的分析，彻底质疑常规的观点，为边缘议题争取了很多空间；面对擅长运用污名来炒作新闻的媒体，她也总是及时的投书，破除成见，声援弱勢。

由于何春蕤的社运参与和学术研究都围绕着污名的主体和议题，但是她的方法却总是高亢的、挑衅的，因此很容易引来保守团体和个人的攻击。从1994年开始，她就不时收到黑函，寄信的人也总是用明信片做出公开的攻击和侮辱，有时还会有人打电话去她任教的学校放声痛骂，或者要求学校将这位一向排名优秀教师的学者解聘，以免她“带坏”学生。好在何春蕤在研究和教学上一向出众，深受同事和学生的爱戴，因此总是能够化解危机。除了这些来自大众的反扑外，何春蕤也面临女性主义组织的放逐。1996年开始，女性学者组织就逐渐排挤何春蕤，公开与她划清界限。在特别有争议的议题上，例如女同性恋、跨性别、性工作、代理孕母、青少年情欲，何春蕤都被迫必须同时与女性主义者、保守分子、传统左翼分子激辩。

何春蕤的积极行动更使得她成为保守宗教团体的眼中钉。一位修女曾经抱怨何春蕤的言论使得她们的工作功亏一篑，听到这个说法时，何春蕤微笑的说，“那就表示我做对了事情。还有什么比让保守派不爽更能让我觉得有成就感的呢？”在对立辩论多年后，2003年春天，11个从言论检查到儿童保护到家长团体，联手向台北地方法院告发何春蕤在她的动物恋网页上提供两个连接可以进入不堪入目的图片，她们也用舆论向何春蕤任教的大学施压，希望能把她解聘。在此同时，另外十余个边缘的性权人权妓权团体联手举办座谈会，积极主张捍卫学术自由，并发起全球联署声援何春蕤，有两千多名学术人士、社运人士、专业人士、学生和民间团体加入联署。奋战到2004年暑假，地方法院做出无罪判决，虽然检察官声请上诉，高等法院却也判决无罪，认定学术

自由的价值和可贵。

挑战封闭成见 走向和平正义

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把人权当成核心议题的年代，但是何春蕤的经验却显示，对某些人而言，基本人权是极为遥远的，特别是那些边缘的主体，那些被人视为不配享有人权的主体，那些被羞辱、被放逐、被迫害、甚至受伤受害的主体。何春蕤所做的工作就是用她的学术研究、社运写作和社会参与来挑战那些封闭和成见，透过挑战传统的社会阶序以及挑战自以为是的道德，来促进平等、和平、公义。当然她在这个过程中也承受了保守团体的攻击和告发，但是她仍然没有放弃对人权的信念。她认为，压迫总是建基于常识中：“所谓‘成见’，往往就是出于‘常识’看法。正是因为太不反思个人习以为常的观念，所以才形成成见，而且还自以为是的用这些成见来批评别人。其实，出于自己的常识（成见）而不同意别人的说法和做法，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像保守团体那样，把个人的常识（成见）推动成为立法，然后要求政府严厉执法，以便禁绝别人的说法和做法，还要惩罚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的实践，这样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这么强大的权力欲当然会造成很多的歧视和不公不义。”

难怪何春蕤会被保守团体视为挡路的大石，因为她使得后者的保守价值观不能依赖常识而顺畅的形成道德政权，她的努力也使得无数污名缠身的主体得以感受安慰、支持、鼓舞。如果说，让受压迫的人有力量抗拒压迫是一种和平的努力，那么，何春蕤的每一份努力都是和平的努力。



谭深 深深的敬意

文：薛翠

谭深追求社会公正的热情以及思考知识分子与研究对象关系的谨慎，在那般热情与谨慎之间，流露对平民百姓深深的敬意。

我对那些磨砺中成长的打工妹，充满了敬意。她们的顽强和坚韧，是这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所在，也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

在家庭决策或打工妹自觉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性别分工的迹象，暗含的是两性不平等的发展权利，它将男性个人的发展与家庭利益一致起来得到鼓励，而将女性的个人发展与家庭的利益对立起来受到贬抑。

有一次给大学二年级学生讲课《性别与中国》，以1993年深圳致丽大火作例子，再谈知识分子的角色，教材是谭深两篇研究成果，即《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1998）、《泣血追踪：原深圳致丽玩具厂11.19大火

受害打工妹调查纪实》(2001)以及火灾幸存者陈玉英的纪录片《小英的故事》(2003)。我引用谭深的话：“作为研究者，不能够止于同情和沉痛”，应该有所行动，一张一张的小脸似懂非懂，若有所思。

致丽玩具厂大火的反思

我向学生讲解：“根据资料，深圳市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坐落在龙岗镇，乃港资企业，‘香港致高实业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之一，主要生产意大利 CHICOO 公司品牌的玩具。1989 年建厂，1993 年 11 月 19 日发生特大火灾，当时厂内 400 多任务人，结果死难 87 人，有名单的伤者 51 人。死者中，有两位是男工，其余都是打工妹。谭深不是打工妹，却站在打工妹的立场，控诉社会如何不公平对待打工妹，又以研究者的身份，组织北京高校的研究生下乡追查致丽大火受害者的名单，协助香港的劳工组织向意大利玩具公司争取赔偿。谭深代表打工妹发言，为她们讨回公道。例如在《泣血追踪》中，谭深难掩心中的沉痛和愤怒，把矛头对准跨国资本与当地势力：“在致丽大火受害者悲惨的诉说中，一个不平等的、不人道的结构越来越清晰地被我意识到了。在这样的结构中，外来的打工者既是底座，又是边缘……在外来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与外来打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当地势力为了自身的利益，拿出‘经济发展’的堂皇理由，往往将打工者的权益作为代价置若罔闻。”

不论在会议上听谭深发言，或者阅读她的文章，总是感到一种张力：追求社会公正的热情以及思考知识分子与研究对象关系的谨慎，在那般热情与谨慎之间，流露对平民百姓深深的敬意。谭深非常重视自己与打工者的关系，不论是被活活烧死的打工妹，或者受辱而集体抗争的韩资工厂女工，在她的口中和笔下，都是那般“善良、坚强、刚毅”，她并没有像一般袖手旁观的、自视高人一等的学者，把她们当作“一堆冷冰冰的数字”或者描写为“素质低、愚昧、悲惨的可怜人”等。谭深的讲解与笔触没有廉价的同情，也没有伪善的怜悯。反而，谭深时刻提醒自己要慎重地“代言”：“我并不是认为代言人本身有什么不好，只是反对带优越感的、武断的代言人，你要代表别人说话，要特别小心才是。

因为每一个群体的经验都是独特的，丰富的，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

谭深小心翼翼地塑造打工妹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并且是知识分子要虚心学习的对象，而谦虚的态度源自对打工妹深深的敬意：“我不敢说，如果要我像今天的打工妹这样自己闯天下，我有没有勇气。从这一点上，我对那些磨砺中成长的打工妹，充满了敬意。她们的顽强和坚韧，是这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所在，也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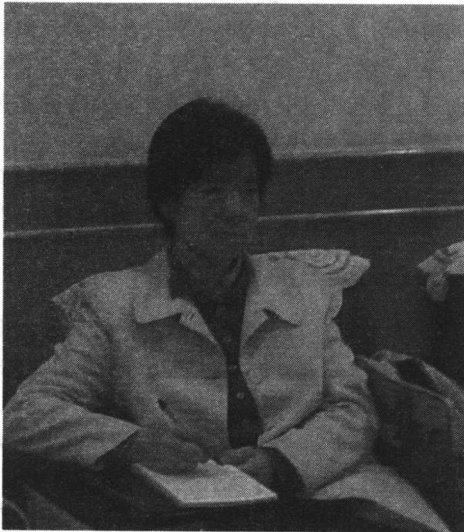
不过，谭深并没有一味浪漫地讴歌打工妹，而是从中发掘“性别的问题”：女性“主动地”、“心甘情愿地”为家庭牺牲的“美德”却往往是社会变革的“障碍”，在这一点上，谭深挑战那种“女性是天然受害者或者受害的客体”的论调。在采访的过程中，谭深发现打工妹出来打工的钱主要供弟妹上学，看见“做姐姐的脸上露出的，是庄严成熟之色。也许，打工妹从来不认为这是牺牲，自己能为父母分担责任，与兄弟能上大学为父母争光一样具有某种成就感。”谭深理解这种成就感之余，却批评传统不公平的性别分工在作祟：“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兄弟外出打工，供姐妹们上学的例子呢？为什么如果机会有限，这机会总是给男性；如果需要有人做牺牲，做牺牲的又总是女性呢？在家庭决策或打工妹自觉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性别分工的迹象。这种性别分工表面的出发点是家庭整体的利益，但是暗含的是两性不平等的发展权利，它将男性个人的发展与家庭利益一致起来得到鼓励，而将女性的个人发展与家庭的利益对立起来受到贬抑。”

从性别研究到推动社会变革

说到萌生性别意识，谭深回忆自己18岁第一次那么急切地、执著地、奋战不懈地塑造“女人”为懂思考、有行动、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年轻的谭深喜爱爬树，干事有点莽撞，性格坦率、豪爽，屡屡被喻为有“男子之风”，经常和男性高谈阔论。有一次，谭深和一群男青年聊兴正浓，忽然有男青年攻击同村的女性，并殃及所有女人说：“女人都没用。”谭深听后觉得对方言语中带着挑衅意味，甚是怒不可遏：“最后这一句话激怒了我，我真觉得他是天下最可恨的人，我动用了自己最尖刻的语言和他争执，直到

他败阵方休。可以说这是我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萌生，以后谁敢在我面前贬损女性，我必严阵以待。”而真正促使谭深从性别角度思考和研究，却始于认识李小江。1986年，谭深刚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社会学研究》的编辑不久，参加一个妇女研讨会，认识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先驱的李小江。她被李小江的魅力所感染，而李小江也对她感觉良好，于是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谭深也因此成为比较早的妇女研究者之一。

谭深从1986年开始做妇女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是妇女就业，1993年，因为参与致丽大火的调研，开始从事农民工特别是女工的研究。谭深研究妇女问题，但归根到底是推动社会变革：“我更愿意做的，是对妇女的研究作为一个切入口，观察和解释社会的变化”。“我从不认为仅仅‘男女平等’就能给妇女带来‘解放’，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平等’。只有妇女是作为‘主体’而不是‘客体’，尽可能地参与而不是‘出局’，这样带来的社会进步才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我选择了与社会参与最密切的‘就业’和就业为目的的‘流动’作为我的研究领域。”



有人说，谭深不是通过理论认识社会，而是通过行动感知社会。谭深自己也认可这一说法。她把自己的关注投入在农村外出女性这个群体和她们流动的全过程，十几年来，她在自己主持的

项目中，设计并参与了若干调查。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流动农民工调查”（1993）、“外来工需求调查”（2002）、“北京市乡镇企业外来女工调查”（1994）、深圳市“因公伤残农民工调查”（1999、2000）、重庆市与河南省“原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受害打工妹追踪调查”（1999、2000）、深圳某外资厂搜身事件中的女工调查、广东和北京“公司的社会责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调查”（合作，2002）、在四川某县“工商返乡打工者调查”（2003、2006）、“为农民工服务的经验调研”（2005）、“外来女工与NGO的关系调查”（2005）、“留守和留动儿童调查”（2006、2007）等；此组织并参与过若干调查，从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回馈打工群体的理念出发，谭深在项目尽其可能地进行了一些小型社会实验，比如在四川某县与广东之间建立跟踪研究和试验的基地，尽力动员当地的社会资源，进行了多项对打工者的支持项目。

谭深以身作则，带动一批年轻人参与劳工研究，推动社会变革，提名谭深当和平妇女的正是她的学生余晓敏，现在余晓敏是研究劳工问题的年轻学者。从她们两人身上，可见薪火相传的是追求社会公正的情感与动力：“1998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的时候认识了谭深老师，后来又有幸成为谭深老师主持的外来工项目的研究助理。多年以来，谭深老师严谨的研究作风和广泛的社会关怀一直激励着我和我身边的许多同学——我们每个人，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还需要关注社会，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需要为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和“打工妹”一起休戚与共

谭深不但激励学生，也鼓舞听众和读者，时刻反省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我的博士论文是做农村妇女特别是打工妹的研究，回顾文献，从阶级和性别角度研究中国劳工的汗牛充栋，但是，唯一打动我的只有谭深。尽管我觉得她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彻底肯定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而忽略了现代化中被贬抑的农村/民的重要性，但是，我还是感受到她那力透纸背的、对工人阶级由衷的“尊敬、欣赏与爱护”。有几次见面，话题总离不开打工妹，她眼神时而闪亮，时而忧愁，声调忽高亢忽低沉，都与打官司抗争的、在流水线上猝死的、在生死边缘顽强生存的打工妹相关。我没法

在其他的劳工研究者找到这般朴素的感情和厚重的爱。

谭深行事刻意低调，深怕过分的张扬，损害与打工妹的关系：“我几乎没有接受过记者的采访，对电视台的邀请也是一律拒绝，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成为公众人物”，原因是“过于张扬就会失去亲和力”，但有时遇上不平事又不得不发言/代言，因为怀着“对打工妹命运的深切的关心和永远的热情”，以及“对这一群体的关心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虽然自觉不符合当和平妇女，但却又认同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理念，勉为其难接受提名；虽然不想接受采访，却又担心笔者交不了差，百忙中和笔者通电话，谈了整整一个小时，过后又仔细寻找相关的材料。谭深把“自己”看得很“淡”，处处为人着想，我认为这是毛泽东时代良好传统留下的烙印。

谭深是“老三届”。1951年生于中国广西，1958年上小学，亲眼见老师在校园“大炼钢铁”；20世纪60年代因营养不良和大人一样患过浮肿病，而后学雷锋、当“红卫兵”，1968年北京初中毕业后，到山西省农村插队当知青，70年代进入大学当“工农兵大学生”，先后做过县政府干部、工厂工人、报社记者等。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一代，身上似乎铭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烙印。当有人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价值，谭深却坚决肯定那段与农民工人打成一片的知青经历：“我不认为那一段历史已经随风飘去，也不认为她留下的只是‘愚蠢可笑的’、‘盲从的’、‘失落的’话柄。我们曾经真诚地追求过，今天还需要更严肃地反思。”知青的经历使谭深对农村有着某种挥之不去的情感，她这样梳理知青的经验：“40年前，作为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我在农村生活了几年。这几年泥里土里的生活，铸造了我永远的平民意识，我最关注最动心的，是普通人的地位和变化。因为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稳定，只看少数人不行，还要看作为底座的多数人怎么样……当时，我有很多的农民朋友，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令人难忘的。今天，我看到那些年轻的打工妹成群地从老远的家乡出来打工，总感到特别亲切，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我下乡的那年，正是17岁。不过我们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少，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当年是有组织的，有人管的，至少不会受到公开的歧视或排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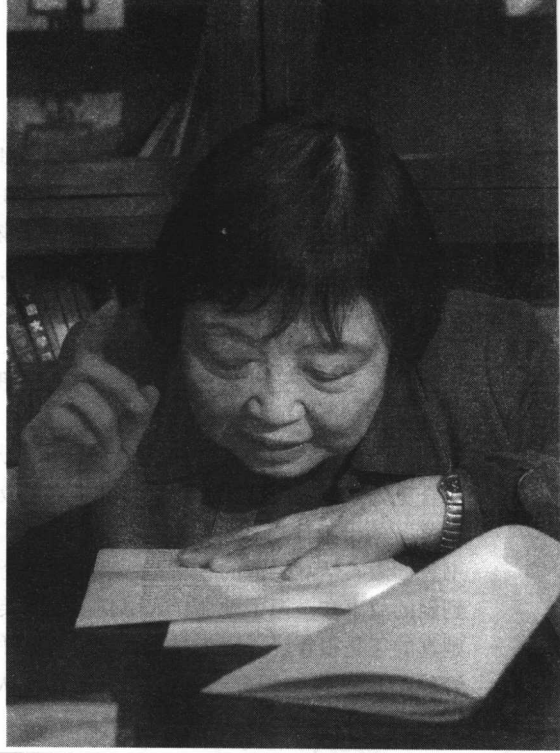
忧国忧民 追求大同

谭深认为自己“难以摆脱我们那一代‘忧国忧民’的特别心态，不论它是激进还是迂腐。”她这样剖析自己：“我是一个不怎么‘自己’的人，尽管在不同的年龄，总有人说我‘个性强’。但说到底，我的精神历程已不可救药地融入了我们国家和时代的风风雨雨之中。我想，这也许是我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我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满脑子是“中国前途”、“世界革命”，视个人的一切为不足挂齿，相信经过人类的奋斗定能达到世界大同的纯正境界。我把敬业、勤奋、诚实公正、热爱人生、对人的善意，全都与政治的理想连接在一起，作为我心中最神圣的部分。”

谭深全心全意投入打工妹的研究，经常没时间陪丈夫和女儿，幸好丈夫鼎力支持，女儿又懂事，这都让谭深感到很欣慰。既有家人的支持，又在书写学术文章与实践社会行动的动力下，谭深继续探索女性、中国、世界的未来。她指出，世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商业化潮流的侵蚀，大规模失业的威胁，两极分化的加剧，城市和农村女性同样陷入困境，呼吁女性主义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坐而起行：“在再就业的现实压力下，城市女性整体不得不向非正规行业，向低工资工作转移。农村外出女性想摆脱纯粹廉价劳动力的可能更加渺茫。女性刚生长出来的自主性和发展欲望遇到了现实和传统的双重夹击，一种要求女性从主流中‘出局’的呼声再次理直气壮地走向前台。这一切，使我意识到，新的妇女问题正在出现，或者说，对妇女问题的新的观察角度正在出现。她们是哪些？趋势如何？正等待我们去看，去研究，去探求解决。”

乐黛云

直面充满暴力的世界的一份坚持



文：陈顺馨

885

以空泛的政治理念或阶级斗争之名把人二元对立地划分为“敌人”与“朋友”，进而以“阶级敌人”的“罪名”，剥夺了作为女人的政治、工作以至哺育孩子的权利，是一种暴力。

引入电影、大众文化、媒体、女性主义、全球化等重要文化研究范畴，进一步把当代重要的文化议题放在急剧变化的中国语境中加以研究，作为与国际对话的基础。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文化多元的发展，保持世界的均势，能互相制衡，而不要被一个单边主义所统治，这其实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和平。

2005年8月，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来到深圳，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下称学会）纪念创会2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她以为可以卸下担任了16年的会长一职，怎料，她再一次被选为会长。

乐黛云教授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中无可取代的“江湖”地位，除了因为她是学会的创办人和一直是这个在中国只有20年历史的学科的带头人，也有她那份愿意承担和开拓的精神，让身边的人感觉到她永远年轻，虽然今年她已经76岁，并且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下称“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主持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

乐黛云教授是我的老师。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选修过她教的“比较文学原理”课，并且参加过不少“研究所”的活动，因此，我一直称她为乐老师。毕业离开北大后，也在一些会议的场合见到乐老师。这次为了“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出版计划，我特意到北大朗润园访问被提名的她。在那书香四溢、恬静舒适的客厅里，我第一次亲自从乐老师的口中听到她的故事和重温了她那让人感到亲切的笑容和言谈。在我眼中，她真的还是很年轻，因为她仍然那么真诚和对未来充满期待，尽管她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是从充满暴力的历史走过来的。

“我就是我”——面对精神暴力的策略

访问乐老师之前，我已读了她的个人传记《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和一些回忆性的文章，大概知道乐老师在被打为“右派”到“文革”时的经历，但当真的面对面倾听她在述说可能已经覆述多次的经历时，仍然强烈感觉到她作为一个年轻革命老师和一位年轻母亲曾面对的精神暴力，在她心灵深处留下的痕迹。1931年出生于贵州贵阳的乐老师，虽然在一个温馨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但由于战争临近，局势动荡，家庭经济出现问题，因此，乐老师在初中时候经历过一段艰苦的日子，也看到老百姓艰难的生活。这样，她从那个时候便向往提出“山那边有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的理想的共产党。1948年她考上了北大后，非常兴奋，因为除了读书之外，可以北上参加革命。到了北大后，她真的很快就参加一些革命青年组织，继而投入地下工作，并于194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感到自己是以新中国的“天使和英雄”的身份，“宣告旧社会的垮台，新社会的来临”。在学期间，她也参加了她后来形容为“第一次灵魂的搏斗”的“土改”，目

睹一位终身省吃俭用而在晚年买到一块地作为晚年依靠的老裁缝，因雇用农村劳动力超过规定限量很少一点而被划为“地主”阶级，在她的奔走后仍然逃离不了被枪毙的命运。她当时内心感到很矛盾：“我以‘阶级’之名，企图说服自己去原谅种种非人的暴行。但是，我亲眼看到这种划分完成是人为的，既非道德标准，又不是价值标准。”^①

但当时她万万想不到，这种毫无标准可言的人为划分暴力，在几年后降临到她头上。1952年在中文系毕业后，作为第一批“喝共产主义奶水长大”的革命接班人，乐老师被留在北大中文系文学教研室工作，同年她与也留校教书的哲学系学生汤一介结婚。由于北大向来是政治敏感的地方，1952年到1955年之间排山倒海而来的政治批判运动，使乐老师头脑那根“阶级斗争的弦”拉得很紧，加上她丈夫的父亲、解放前当过北大文学院院长学者汤用彤过去与胡适关系密切，胡适批判运动发生时，她更感到家里所受的压力。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的时候，曾经给过乐老师带来一阵的兴奋，因为她认为共产党让人民说出心里话是正确的路线。然而，没几个月，形势急转直下，“反右”运动一下子把很多人打成右派，作为一个支部书记，乐老师需要面对划谁成右派的讨论，并发表了她认为哪些年轻人不应划成右派的意见，最后，当她因筹办一份被认为有反毛泽东思想内容的学术刊物（尚未出版）而被划成“极右派”时，其中还有一条罪状是“包庇右派”。不过，正如她自己一样，那些她试图保护的北大中文系年轻教员，都逃离不了被批判和处分的命运。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乐老师仍然认为“反右”是她一生中最震撼的经历：“反右对我最大的震撼是，在中国，你可以朝为座上客，然后下午就成了阶下囚，这种大的转变是非常震撼的。”

像任何一个“极右派”，一直全心全意投入革命的乐老师当年被开除了公职和党籍，一个月只有16块钱的生活费，还要马上离家，下放到农村进行监督劳动；精神上，她由改造别人的革命干部，转变为要接受思想改造的对象。但这个时候，乐老师刚生

^① 乐黛云（1995）：《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台北：正中书局，页45。

了她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她公公便请求了北大校长，让她喂奶喂到8个月才下乡，她也觉得这是她当母亲的权利。不过，虽然她获得了这个“特权”，这段时间所承受的精神压力，转化为体内的火，孩子吃她的奶老是泻肚子。乐老师回忆说：“我觉得精神的影响很奇怪，怎么也不好，孩子很可怜，就一直泻，后来脱水，送到医院……后来老人都说，是因为奶不好，后来连西医也说，可能是精神因素，对你的奶不好。”

这样的处境不仅影响孩子的健康，还影响了她和她大女儿的关系。8个月后乐老师下乡时，丈夫也下了乡，她不得不把刚断奶的小儿子和4岁大的女儿留给婆婆及一个保姆照顾。这一去就是两年多，1961年年底回到北京时，孩子已经觉得她很陌生了，特别是女儿。谈起这段经历时，当母亲的乐老师还是眼泛泪光，遗憾地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孩子们小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我常劝那些忙得要命，但有小孩子的，他们老是发牢骚，说小孩子麻烦死了。我说你们就该珍惜这段时间，过去就过去了，孩子很快就长大，长大以后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就不是小时候你看着他们长大那么亲密的感觉；可是我失掉了这个东西，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而且没法补偿的，就过去了……特别是女孩子，后来就变成是朋友了，不是那种母女关系……很少有母女情深度那种，跟小的关系要好一点。精神上的暴力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比真的打你一拳踢你一脚，可能要严重得多。”

在这次访问中，乐老师用了“精神暴力”或者是“社会对灵魂的暴力”来形容她被划为“极右派”后所受到的痛苦，这在她写过的回忆文字中没有出现过的。或许，这次从和平的角度去思考她自己的过去时，她会想到暴力。的确，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以空泛的政治理念或阶级斗争之名把人二元对立地划分为“敌人”与“朋友”，进而以“阶级敌人”的“罪名”，剥夺了作为女人的政治、工作以至哺育孩子的权利，是一种暴力。然而，对于当时的乐老师来说，虽然对社会不满，但她仍然怀疑自己，问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因为她想：“毛主席是不会错的，他统一了中国，这么大的天才、伟人，他怎么会错呢？要错就是我错，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想不清楚，所以我一直不认罪。”

或者是乐老师的不妥协精神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让她没有

认同那个充满暴力的年代加给她的“反党”罪名，而是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那不需要审判而已定罪的惩罚——劳动改造。北京远郊门头沟的崇山峻岭中，她要把五六十斤的石头从山里走很远的路背下来，作为修水库和垒猪圈之用；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期，她被要求以“大跃进”精神，创造奇迹，在连人没有粮食的情况下，把一群猪养大。面对这类她今天称为充满“暴力”的任务，乐老师以中国传统的随遇而安精神，自得其乐，不仅真的能完成任务，还打下了日后的英语基础，并且激发了另外一种精神：“饿就饿着好了，心里头要找到自己的平衡，所以那时我一边放放猪，一边唱唱歌，翻翻英文字典，有一本小小的字典带去了，所以也就过去了。劳动本身是很艰苦的，可是劳动让你忘掉很多东西，劳动完了回来一睡，就什么都忘了，我觉得也很好，而且劳动把你的另外一种精神调动起来。”



乐老师讲的那种被劳动调动起来的精神，主要包括对于那些自食其力、感情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更切身的体验和认同，以致对于那些为了自我保护而出卖他人的知识分子的厌恶，而这些都跟她那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清晰的“人民”定位有关，以致到了“文革”这另一个她再次面对被抄家、被批斗、母亲因为误诊而死亡、女儿参加了红卫兵的派系斗争而终日提心吊胆等暴力的年代开始的时候，她还是感到兴奋：“说来别人也许难以相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我是翻天右派，我丈夫是走资派黑帮，我们转瞬之间

就被‘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不但家被查抄，每天还要在烈日之下‘劳改’挨批，但是我们真的从心里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尤其是得知这次大革命的伟大统帅下令从上到下撤销各级党组织，并且说，你们压了老百姓那么多年，老百姓起来放把火，烧你们一下，有何不可？这真是大快人心，我似乎预见到中国即将有天翻地覆的大改变了。当时还广泛宣传巴黎公社原则，这就是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民平等。我们都想，如果国家真的能这样，在这新生命出现的阵痛中，个人受点苦，甚至付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后来才明白，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幌子，和以往一样，我们又受骗了。”^①

我想，当年有这样想法的人，可能不仅乐老师一人，她们那代人对社会主义理想的那份真诚，以致不惜牺牲个人以促进国家走向民主和平等的道路，是基于对于中国人民过去经历的苦难与混乱的记忆，以致对新中国未来的良好愿望。“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可以说很好地概括了乐老师这一代在中国经历剧烈的历史变迁中成长起来的女性知识分子，如何在磨掉个人的年代中，以一个独特的自我，面对各种各样的暴力，不怨天尤人，反而以自己的意志、信念和劳动力，见证这个不寻常年代的荒谬性。虽然乐老师觉得在“文革”又一次受骗，但她仍然以积极的态度，在新的历史机遇到来时，开拓新的工作领域。

一个新学术空间的开辟——中国比较文学

乐老师在1985年能够创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可以说跟她前一段经历分不开，也再次展示了她对困难的不屈精神。随着“文革”的结束，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很多意识形态上的禁忌被打破了，包括在各方面的对外开放。北大在这段时间开始招收包括欧美学生在内的外国学生，但中文系内的老师大多不愿意给这些学生上课，除了还没有完全走出“文革”的阴影这样的意识形态因素

^① 乐黛云（1995）：《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台北：正中书局，页54。

外，缺乏合适的教材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这样，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乐老师就被安排去教这个留学生班，怎料这个安排全然改变了她的后半生的学术道路。乐老师回忆说：“为了给外国学生讲课，我不能不突破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僵死模式，否则就不会有人听我讲课。我大概是北京大学第一个在文化大革命后敢于讲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资产阶级’作家的教师。反正我的学生不会去打‘小报告’，也不会苛求我有什么‘正确的政治观点’，我可以比较自由地讲述我对这些作家的看法。为了让我的学生较深入地理解他们的作品，我不得不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国传播的情形。这一在学术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开始系统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乐老师不仅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还开拓了自己新的研究领域，于1980年便出版了自己编选的第一本集子研究现代作家茅盾提出批判地吸收外来的东西而发展中国文学的重要性《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而这本集子也成为了刚成立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出版的书。1981年她继续发表了一篇当时引起强烈反响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这篇论文，“不仅引起很多人研究尼采的兴趣，而且也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空间……后来，它又被选进好几种论文集，并译成英文和朝鲜文。”^② 20世纪80年代初乐老师个人在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努力，虽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都打开了视野，看到了文学生成的多元文化因素，但她不满足于此，认为中国比较文学需要学科化。因此，1984年从美国访学3年后回到中国时，在深圳大学校长的邀请下，乐老师在那里担任了中文系主任，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所，也于1985年夏天，和36个大学的同行一起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举办了首届中国

^① 乐黛云（1995）：《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台北：正中书局，页74。

^② 乐黛云（1995）：《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台北：正中书局，页83。

比较文学讲习班。这个会议和讲习班，成为了日后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基石，并初步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国际地位。

同年，乐老师返回北京大学，准备在那里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然而，北京的学术界还没有追上深圳的开放步伐，她面临意想不到的障碍：“人家到北大就骂我，这个人，外国文学不行，中国文学不行，走投机路子，搞什么比较文学。我那个时候要是听了那个话，就不做了，那就完了，但那时坚持了……我们没有房子，也没有编制，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到处乱转。后来就是不断说服那些领导，当然还有老先生（指季羨林先生）在里面说很多话，最后就给了房子，也给了编制。经教育部批准，我们正式设立一个和系平级的研究所。”

可以看到，乐老师仍然以她一贯的态度面对困难。她坚持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并且再次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工作目标，更创造了条件让比较文学在中国更好的发展下去。在这段时间，不仅她自己的学术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她和她的同行推动下，比较文学在中国也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生的学科，受到研究者和学生的欢迎，并在国际上开展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例如1988年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提交的论文《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卢卡奇对布莱希特；胡风对周扬》，乐老师把比较文学方法，从影响研究推到平行研究，即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文学或文化如何影响另一国的文学的发展，而是针对同时间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文学现象作宏观的历史把握。这篇论文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在1987年及1988年连续出版的两本专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原理》，也成为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教科书，孕育出一批一批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乐老师除了一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外，还担任过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并出席不同的会议，把中国的文学与文化议题，带到国际的视野中去。也是由于乐老师的文化视野，中国比较文学的关注点也不仅是文学作家作品本身，而是转向不同的文化现象与意识的研究，因此，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中易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引入电影、大众文化、媒体、女性主义、全球化等重要文化研究范畴，进一步把当代重要的文化议题

放在急剧变化的中国语境中加以研究，作为与国际对话的基础。

可以说，那个改变了乐老师的学术道路的偶然机会，能够开辟成为一个新学术空间，除了她那份坚持外，更重要的是她拥有广阔的视野与胸怀，对后“文革”中国文化重整有所承担，以致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视。

在跨文化交流中建立和平

乐老师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退休后，“研究所”所长的位置就由别人来担任，而她在另一个平台上，继续推动跨文化交流的工作。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跨文化研究中心”，目的在于“通过互相认知的过程，推行多元文化的发展、全球新秩序和新文化的建构”。虽然成立这个中心没有成立“研究所”时那么困难，可是经费很少，不过，这不会难倒乐老师的。作为主任，她以不同的方式为中心的研究和出版项目找经费，例如已经出了 17 辑的《跨文化对话》丛刊得到了国内外的一些团体资助，持续地发挥了其影响力。乐老师跟她的国际合作者在第 17 辑“中法文化年专号”的卷首语中写道：“文化上的真正交汇和对话，原本是一颗心灵，满腔挚情，两种语言的会通与交流，从而对这位‘奇异’的、汇通中西的探索者、创造者有着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并从中受到深刻启迪。”^①

893

的确，如果文化可以通过交流和对话而多元共存时，误解、歧视、纷争、霸权就不会出现，但这是谈何容易的事。从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工作几十年的乐老师，面对发生在 21 世纪的种种国际冲突，非常清楚她推动的跨文化对话工作跟反霸权意义的和平息息相关：“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文化多元的发展，保持世界的均势，能互相制衡，而不要被一个单边主义所统治，这其实是我一直在追求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和平的保障，如果单边统治，我们看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像美国极右派的主张，就是要保持极强的军力，要先发制人，要否认国家主权，然后忽视联合国机构的作用等……所以我想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① 乐黛云、（法）李比维主编：《跨文化对话》第 17 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 4 月，卷首语。

为了维护文化生态，共同发展，都是有关的……我觉得自己做这些还是挺有意义的，当然力量可能很微薄，小小的力量，但总是做我心里觉得应该做到事情。”

出版《跨文化对话》丛刊、《承接古今，汇通中西文学个案研究》丛书、《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丛书等庞大计划，正是乐老师所说的“小小的力量”。要完成这些计划，她需要动员她身边的人，包括她的学生和圈里的人参与，更需要维持自己的动力。除了是出版了的书刊得到了正面的响应而让她感到鼓舞外，乐老师知道文化工作是点点滴滴的积累，只要她对文化、国家和世界的爱还在，她就一天一天的做下去，永不言累。

正是这一切，让我感到乐老师永远年轻，永远对暴力不妥协的那份精神。和平工作在于她，是停不了的文化实践与推动工作，这不仅是在北大朗润园书房里的笔耕，或者是继续以会长的身份维系“学会”的组织，更是以那颗正义的心灵和满腔的挚情，直面这个仍然充满暴力和霸权的世界。

伊莎白
『革命是由此地的
反叛者进行的』



文：刘健芝

伊莎白对姑娘说，有更多年轻人参与社会活动，才能阻止由追逐利润推动的全球化对我们的地球、对我们的社会所造成的破坏。

伊莎白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衡量任何“发展”，必须考虑社区；要看所谓的“发展”究竟是促进了社区还是破坏了社区。

伊莎白喜爱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一段话：“房子是用此地的石头砌成的，画是用此地的颜色画的，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

两次拜访伊莎白·柯鲁克 Isabel Crook，都有一位小姑娘同行。一次是赵玲，一次是游丽金。让她们与前辈见见面、听听前辈的故事，也许会让年轻有志的姑娘走在漫长人生路上有更多的乐观和勇气。

伊莎白对姑娘说，有更多年轻人参与社会活动，才能阻止由

追逐利润推动的全球化对我们的地球、对我们的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伊莎白握着姑娘的手，看着那诚恳淳朴的脸，显得十分高兴。她是看到四十载执教生涯中无数年轻学生的脸庞？还是，她看到了大半个世纪前的自己——1939年，一个22岁姑娘带着梦想，无畏地在中国农村闯荡的影子？

当个“人类学家”

伊莎白给我们沏了茶，坐下来，开始讲她的故事。父母是加拿大传教士，伊莎白·布朗 Isabel Brown 生在四川，在中国度过童年少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修读完儿童心理学硕士课程后，22岁的她，向往着要当上人类学家。人类学，不就是要去参与、观察、感受吗？天真的伊莎白，先不报读博士课程，而是要亲身体验一下，做做“田野调查”。跑回中国，父母仍在四川，父亲是华西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他的美国传教士朋友带着伊莎白到彝族农村去。

“我当时很傻，以为不懂游泳，被扔进海里，就会学懂；不懂当地语言，被扔进不说英语的环境里，也就会学懂用土话来沟通。”但是，完全不懂彝族土话的她，虽然能与当地妇女简单交往，毕竟无法进行人类学的访谈。3个月后回家，她垂头丧气，躲在房里哭，想着，做不成人类学家了。刚强的母亲叹道：“我像母鸡生了小鸭，教不了你游泳，你要自己去试！”

父亲的一个藏族朋友说，来我的村里住吧。于是，伊莎白背着背包，再次上路。从都江堰出发，攀了两个山头，走了5天的路，到了山上阿坝藏族的一个小村落。她到了才发现，那人是人赘了这村一个豪富人家，从杨姓改为罗姓，严格来说，不是他的村，是他妻子的村。那人把伊莎白留在妹妹家，便走了。

伊莎白住进这个“家”，才发现，这是一处“鬼屋”。那是1939年9月。1934年，红军曾经到过，国民党告诉罗氏，说红军将至。罗氏便跑到红军徐向前那里，假装同情革命，欢迎红军到他村里驻扎，想让妻家亲朋动手铲除红军。村民哪里敌得过红军，杀红军不成，反被杀，村里一片萧瑟。就在这个鬼地方，伊莎白与罗氏妹妹同住，平常少见邻里，只有当那女人酿了美酒，招呼乡亲们来家喝酒跳舞时，才欢快一时。红军走后留下的反军阀标

语，直到1976年伊莎白回村里探望时，仍在原处。

就在这个局势动荡、权力交错的环境下，伊莎白接触到中国另一种现实——底层社会。尽管她还未修读人类学课程，但志向已为人知晓，这位“没有文凭的人类学家”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受聘于中华基督教联合会，卷入当时教会与晏阳初合力推动的合作化运动。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国民党政府迁至四川重庆，当时，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运动人士来了大后方，晏阳初在重庆歇马乡设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育才院。中华基督教联合会也把总部从上海搬到重庆，当时，新教教会自认不及天主教教会那么成功，觉得要改变策略，从以往着重3大工作——医疗、教育、宣教，改为面向大众最关心的议题——贫穷问题。为了建立典范以便在全国推广，教会与晏阳初合作，选择了重庆璧山县兴隆乡作为试点，先做好社会调查、掌握情况，再协助民众组建合作社。村内一所教堂充当项目总部，歇马乡派来两人，伊莎白与一位年纪较长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一起，负责到1,500户逐户做家访，了解农户拥有多少土地、种什么农作物、收支如何、困难在哪，这些资料用来评估分析哪些人会有动力参与、合作社可以怎样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伊莎白和同事到村里，不可能一坐下来便问数据，所以，要先到村里探访、和人闲聊、在幼儿园教孩子们，慢慢熟悉环境，建立联系。她的人类学“专业”可派上用场了。

这个时期的经验，让伊莎白对合作社组织有深入的了解。经由他们推动，中国第一个不靠外来资金扶持、全由社员入股的合作社诞生了。这个合作社秉持民主开放包容原则，地主、佃农、贫农都可以参加，一人一票。歇马乡的专家为合作社做各项培训，教社员如何管账、营运，还让小学六年级学生到处宣传合作社的好处。接着，村民入股了，合作社成立了，一切似乎顺利、美好。选举的结果却如晴天霹雳。一人一票选出的主席，竟是垄断盐业、哄抬盐价、贩卖鸦片的冯姓恶霸土豪。歇马乡急派人来，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合作社，股金退还社员。

伊莎白边谈边笑。原来，在“民主开放”原则下，冯霸为了操控合作社，串谋地主出钱让佃农入股，令其投票给冯霸。这次

伟大的合作社实验，戛然而止，但也给伊莎白留下宝贵经验。执教40年后，伊莎白回到她的人类学，整理当年的珍贵家访材料、日志，2006年她觅得一家出版社，愿意将原素材翻译后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英文原稿则放在网上供公众查阅。

“发展”是促进还是破坏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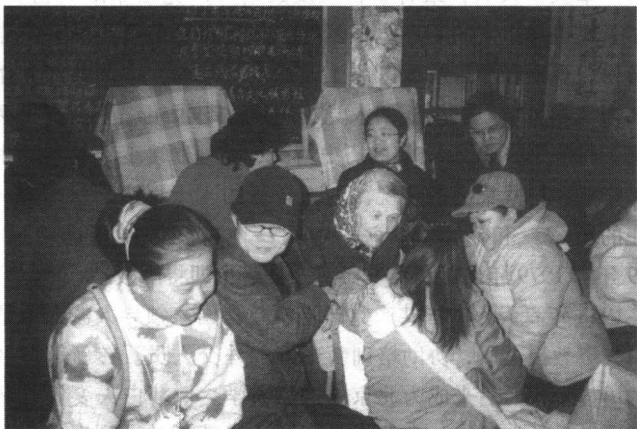
除了整理资料，伊莎白还将这段经验，写成40万字的专著；出版社说太长了，只能出10万字。大幅删减后，集中探讨的主题，是乡村社区的蜕变。故事尽管发生在60多年前，但在剧变时代一个乡村社区既要面向内部的贫富分化、资源使用、日常生活文化、伦理关系等问题，也要回应外来的冲击。当时，遭到冲击的两个例子，一是20世纪4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改革地方行政的新县制，一是教会推动的合作社运动。伊莎白在书中探讨的，是在强调国家富强和经济发展、忽略社会和人文发展的历史大潮下，一个社区的历史。有教授说不知这本书是社会学研究还是人类学研究，但伊莎白关心的不是学科的分类，而是在今天急剧的全球化进程中，在这种城、乡社区均遭毁灭性冲击的时候，这段60年前的小小的历史经验，能否为保护和重建社区的努力提供参考。伊莎白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衡量任何“发展”，必须考虑社区；要看所谓的“发展”究竟是促进了社区还是破坏了社区。1981年，伊莎白与当年的调研同事回到兴隆乡看望乡亲，当时开放改革还未波及当地，毛泽东时代的制度与关系仍存，也并非绝对负面。2005年10月，伊莎白带着儿孙，一行八人回去看望她助学的儿童，看到的却是更多贫穷和沮丧。村民告诉她，这里将建坝，农田将淹没。村民并不激愤，只是无可奈何。后来，伊莎白从《纽约时报》得悉当地人广泛动员抗议贪污和搬迁，尔后中央勒令暂停工程，惩处了一批贪官。

早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凋敝，民不聊生，合作社运动试图通过农民的合作，较好地面对外来的冲击。日本占领中国时期，内陆对日常必需品和简单工业品的渴求，促进了工业合作协会的开展。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辖下地区的内陆合作社提供国际支援。1949年后，“工合国际”解散。而1983年，开放改革之后，中央批准各地成立合作

社，但良莠不齐，真假难辨。1987年，一批退休人士要建立合乎国际标准的合作社，申请恢复工合国际，获批准。又一次，伊莎白成了其中的志愿者，后来被推举当了两届、为期10年的理事会成员。

伊莎白更愿意多谈对合作社的经验总结，我们也留心聆听。她认为，国际上最著名的合作社，是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它不仅是生产组织，更是一所学校，培训社员的文化与伦理，为的是建立更好的社区。所有合作社都应该如此。中国今天不少合作社，要不是企业家、经理层用来掩人耳目以减低政治风险的幌子，便是为求取得资金的手段，几乎没有基层劳动者的积极参与。要搞合作社，不能靠由上而下的政府或企业的推动，而要靠由下而上的动员。以资金拨款作为诱因而成立的合作社，几乎都不能成功；要推动合作社运动，要从教育、培训入手，并切合当地实际情况。此外，一方面要得到当地乡镇政府的支持，也要参考国际经验。国际合作社运动宪章新加入了第七项条文，就是合作社必须促进社区发展。伊莎白强调，关键的理念是，健康的社区，基础不是相互竞争的个人，而是合作的社区。真正的合作社，要抗衡商业化的大潮流，要对抗汰弱留强的市场竞争逻辑。

伊莎白再次强调：和平的希望在哪？就在于建立健康的社区。“我是共产主义者”——伊莎白平静地说。



回去中国

经历了1940年合作社运动的伊莎白，接触了错综复杂政局下

的社会底层，对社会变革有了新的体会。传教士父母与晏阳初、梁漱溟等的主张接近，反对激烈的阶级斗争，主张感化地主让他们自愿交出土地。“我父母可喜欢甘地呢！”有一次，在南京大学教书的妹妹病了，请她代课，在办公室遇上了戴维·柯鲁克。戴维已经是一位左派“老将”了，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过1936年的国际纵队英国旅，在西班牙内战中反对法西斯主义。兴隆乡合作社解散后，伊莎白跑到英国与戴维结婚，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戴维参军，伊莎白认定共产党人应该到工人中去，于是就在一间制造子弹零件的工厂做工，后来加入加拿大军队服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再回到中国是颇为偶然的。伊莎白要完成她读人类学的心愿，报读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课程，取得了奖学金。戴维在排队办军人复员手续时，听到前面排队的人说，可以有机票让复员军人和家属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会去缅甸。戴维灵机一动，这样，他们夫妻俩可回去中国啊！

1947年11月1日，伊莎白和戴维，用英国政府的复员军人机票付交通费，用伊莎白的奖学金付生活费，回到中国，伊莎白还穿着加拿大军大衣，跟着联合国发放给共产党根据地的物资船，到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共产党根据地，并且以兄弟党英国共产党党员身份，观察和参与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当时，中国共产党派了两名当地党员与他们组成四人党小组，过起了组织生活呢。两人收集了村庄1937—1947年的历史情况、土地制度变革材料，也观察工作队和村民集会的情况。两人合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在1959年和1979年出版了英文版，中文版也即将出版。

194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即将掌政，国家领导人派人邀请伊莎白夫妻教授英语，协助培训新中国的外交人员。在新解放区建立的语言学校，后来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伊莎白夫妻俩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直到退休。几十年来，教导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上百人在世界各地的中国领事馆工作。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伊莎白90岁寿辰，隆重举行庆祝活动，

感激她的奉献。

“我的角色是两种文化的中介——在中国教学生学习英语和西方社会与文化，在外国宣传中国人民如何努力创建更美好的社会。我在中国的经验是正面的，我被当成同志，我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基层党员的考核，有一张证书呢。不过，我的身份是英国兄弟党党员。像所有人一样，我也经历了顺境逆境、起起落落。”

“那么，文革呢？”我轻声地问，怕触动了伤口。一阵朗笑，我放心了。“文革时，所有与外国人有联系的，都被打为特务。外国语大学当然遍地特务了。有一位老先生，被同时扣上四个国家特务的帽子，包括了苏联、美国、英国、日本。”真的，要同时为英美和苏联做特务，是不简单啊。伊莎白笑着说这个故事，仿佛她自己的际遇相比之下算不了什么。她简单地说——戴维被单独监禁在最高设防的秦城监狱，5年；她被关在大学一个小楼房里，3年。当局怕她自杀，影响国际关系，所以派人看守。每次两人，看守两周，再换人。伊莎白谈这段经历时，不带嘲讽，不含苦涩。

“看守的人是学生或老师，有人认为我是特务，有人不认为。不认为我是特务的，会来打开房间的小窗，让我看到外面的蓝天白云，听到鸟语蝉鸣，也会给我好的饭菜。认为我是特务的，会把窗关严，两周伙食都是煮白菜。但她们都是普通人，都要过日子。她们会闲聊，也要处理生活上的问题。我就像一只墙上的苍蝇，做我的人类学观察。”例如，一名女生的男朋友的朋友是上海人，在北京找不到女朋友，因为人们认为上海人太滑。她们便谋划怎样把男孩介绍给另一女孩，但隐瞒他的上海人身份。一次，一名看守的朋友的母亲去世了，朋友来到这个小牢房，寻找慰藉。有些看守是老师，成为伊莎白的好友，还帮她带信。更有一次，楼上着火了，住在一层的她，对看守说，我们去帮忙扑火吧。于是，在楼梯上，看守在后，军人在前，把一桶桶的水递过去。火熄了，军人才诧异发现，他一直是特务手中接水桶。伊莎白心里却感激看守，不怕犯忌，让她参加扑火。

“我有许多美好的回忆，经历了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有些人爱回忆的是生活中美好的事，其余的都过去了。

有些人回忆的是伤心事，成了不能承受的包袱。能回忆美好事物的人，会有更多快乐、健康。我就是这样。”

“你不觉得苦吗？”我问。“我只能说我没有遗憾。很难说，如果我的孩子受到伤害，我会怎么样。但是，幸运地，我的孩子们不无艰苦的‘文革’经历，让他们变得更成熟，少了优裕中的骄纵。我们家是极为幸运的。”

伊莎白有3个儿子，在中国出生，母语是中文，常笑父母中文不标准。他们总是引来奇异的目光——明明看上去是外国人，怎么中文这么地道？

1972年，伊莎白被释放，翌年，戴维也回家了。1973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大会堂向被冤枉为特务的英国共产党员赔礼道歉。伊莎白说她很感动，因为周恩来本人也受了不少冤屈，但道歉的人竟是他。

至今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出路的伊莎白，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怨恨失望。“我觉得我的生命丰富多彩。我在中国的经验，显示了中国人民如何接纳一个愿意参与革命的外国人。这是很了不起的。在外面，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很多，有一些也是事实，但却未触及事情的核心。我想，我丈夫和我的经验，有起有落，当然有逆境了，但是，我们得到的同志关怀，尤其是在非常艰苦时期的同志关怀，也应该让人知道，以便抗衡对中国的宣传，例如关于人权，我的意思是，人权不仅是由上而下的问题，也是由下而上的问题。我在基层的草根生活经验，是很正面的。有许多伟大的普通人，事情进展可能缓慢，但我的故事显示，在基层有另一真实存在。”

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

伊莎白喜爱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一段话：“房子是用此地的石头砌成的，画是用此地的颜色画的，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伊莎白说，“这首现实主义诗，是关于革命的。革命不由天使来进行，革命是由追求公义社会的普通人来进行的。他们当然会犯错误。这是学习过程不可缺的部分。”

与伊莎白聊天，如沐春风。她的宽容、仁厚、坚定、平实，是她的革命实践的最佳诠释。

我庆幸有缘认识伊莎白。人生，就是有着这么多偶然的相遇。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在中国开展，有人提名寒春，因为听过她的国际主义事迹。寒春获悉后，拒绝被提名，她说她是不排除暴力革命的。是否一定要寒春参加这个活动，并不重要，但活动侧重交流，于是，2004年初秋，我到北京拜访寒春，交流对和平的看法，解释活动的旨趣。我们一见如故，一席话后，寒春欣然接受被提名，还说，她想提名伊莎白·柯鲁克，她也是国际主义者，也是努力寻求人类美好和平生活；寒春更立即打电话给伊莎白，介绍我给她认识。伊莎白的说法，与寒春非常相似：“如果没有公义，便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如果被压迫人民要推翻压迫他们的政权，我会支持。这种政权不被推翻，便不可能有和平。但我也认为，在世上许多地方，问题是人民如何组织起来解决社会上的问题。”我两次参加她们多年来不间断的每周聚会——逢周四在北京友谊饭店，在京的一些外国人共进简餐，然后借用饭店地方，讨论国内国外大事。一次，她们商讨如何举办活动，募捐赈济斯里兰卡海啸灾民；一次，讨论联合国应如何改革，并约制美国的霸权，要美国军队撤出伊拉克。

“革命是由此地的反叛者进行的。”布莱希特也是我喜爱的剧作家。看着温文、坦然、忠诚于革命的伊莎白，我想，让她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也许并非如她谦说是丈夫戴维的影响；与戴维相遇，促使她加入英国共产党，也体验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风风雨雨。但伊莎白父母亲刚强的性格、乃役于人的实践，无疑培育了她的执著与人文关怀；20多岁到30来岁与中国边远农村底层人的共处，不论是夭折的盐业合作社，还是充满矛盾的土地改革，也许，都让她看到在残酷的、诡诈的阶级对立下，对社会变革有强烈需求和诉求的“普通人”，尽管有脆弱、怯懦、恐惧、自私、执迷的一面，却也有刚正不阿、择善固执、无私奉献的一面。在惊天地、泣鬼神、动干戈的年代，又或是房子歪斜要推倒重建的年代，大历史褒/贬的，是伟大/狰狞的建筑师。然而，石的雕琢、

人的磨炼，是长期的、不起眼的，可也是不可缺少的。有怎样的石、怎样的人，就会有怎样的房子、怎样的革命。

伊莎白让我想起与她同龄的我深爱的母亲。母亲对我的谆谆教诲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几个“不能”，对抗着名利带来的诱惑、卑贱带来的屈辱、强权带来的恐惧。从伊莎白身上，从寒春身上，从我的母亲身上，从千千万万的和平妇女身上，我看到了对美、善、爱的革命追求，我看到了不移、不淫、不屈。

第四部分

文化光谱



II 跨越区隔

吴南燕真书韵谱丛

吴南燕

吴南燕，女，汉族，1952年10月生，浙江杭州人。1978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1986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1990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1995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1998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2002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2005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2011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2014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2017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2020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2023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2002年，吴南燕教授出版了《吴南燕真书韵谱丛》一书，这是她多年从事真书韵谱研究的心血结晶。该书共分五卷，分别介绍了真书韵谱的源流、真书韵谱的构成、真书韵谱的演变、真书韵谱的鉴赏、真书韵谱的临摹。全书图文并茂，文字优美，是研究真书韵谱的权威著作，也是广大书法爱好者不可不读的一部好书。

金梅花 吴南清真寺的梅花丛



文：薛翠

金阿訇反复解说《古兰经》宣扬男女平等，根据《古兰经》第2章《黄牛》第187节：“她们是你们的衣服，你们是她们的衣服。”说明男女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和谐共处。

根据穆圣教育思想，求学是男女穆斯林的主命，女人应该享有与男人同等的权益。我教导不识字的妇女念《古兰经》，希望她们思想开阔，学会思考。

金阿訇从性别的角度诠释《古兰经》，指出妇女识字的重要性，并且在伊斯兰教社会中创造独特的“女性”空间。

2005年，7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访谈前一天晚上，大约9点，我给金梅花阿訇（即伊斯兰教老师）打手机，想确定见面时间，可是手机老是打不通，心里有点焦急，难道金阿訇不在吴忠市，出差去了？幸好到了10点多，手机终于接通了，金阿

甸笑着解释：“我上课时间关掉手机。”

第二天，我和同伴罗婉祯坐车从银川来到吴忠市利通区上桥乡吴南清真寺。金阿甸戴着白头布，个子高大，嗓子嘹亮。她领我们到礼拜堂右边的小课室，几位老、中年妇女热情招待，沏了两碗八宝茶，又劝我们多吃水果。金阿甸平常在这间小课室，专门给农村妇女讲解《古兰经》，教授圣训和教律。那天，黑板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文的经文，金阿甸和她的女学生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农村妇女怎么样透过宗教改变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为什么？”——“女孩子不能出去！”

金阿甸本身是上桥乡前锋村的农村妇女，1964年2月20日出生，从小喜欢读书，由于家境清贫，兄弟姐妹多，尽管小学成绩非常好，也上不了中学。年幼的金梅花感到非常失望、沮丧，不断反问自己：“为什么？”这股不甘心的悲愤化为日后探求学问与教授妇女知识的巨大动力。

在父母主张、朋友介绍下，金梅花“糊里糊涂”18岁就结了婚，现在有2个女儿和1个儿子。金梅花努力去当贤妻良母，种田、带小孩、煮饭、洗衣服，什么家务活都尽力做好，可是这种单调而枯燥的婚姻生活并不能满足心灵的需要。“难道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她感到很痛苦，忍着泪水把理想的死灰掩埋在心里某个幽暗的角落。

金梅花回忆说，小时候最想当运动员和军人，上初二的时候，宁夏体育学校选拔运动员，她个子高大，身体结实，爱打排球、篮球，在25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可是父亲反对，硬生生把她弄回家，还下了死命令：“女孩子不能出去！”，为此，金梅花连续哭了好几天。又有一次，新疆兰州军区招收女兵，她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进入文艺宣传工作团，负责表演唱歌、跳舞。“那时候，我特别想当一位军人，因为军人的质量特别高尚。”可惜，顽固的父亲撕破金梅花的“军人梦”，喝斥：“一个女孩子，跑出去那么远干什么？”

金阿甸一针见血地批评父权思想：“我父母重男轻女，丈夫的封建思想也特别严重。”结婚以后，有一次小学校长找金梅花去当

民办老师，丈夫极力反对，怒骂：“你出去工作，孩子那么小，谁带？”另外，金梅花身为共青团员，工作比较突出，被选上村妇女主任，开会工作都把孩子带上，但是丈夫不体谅，百般阻挠，甚至发出最后通牒：“女人要留在家，不能出去，否则，家庭破裂！”金梅花担心夫妻整天吵架，家庭破裂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唯有屈服下来，重过平淡苦闷的生活，不是种田，就是做家务活。“那时候，心里觉得特别纳闷、委屈，愿望与理想都没法达成，对自己和社会完全失却信心。”

有一天，幽暗角落的死灰忽然间复燃了。1994年，村里的清真寺鼓励女人去听课、学习，金梅花重燃读书的希望，不但招自村民的挖苦，更惹来丈夫的嘲讽：“清真寺全是男人，你一个女人家去干什么？”这一次，金梅花没有逆来顺受，心里反而认清目标：“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我要抓住这个机遇！”她咬紧牙关，背着小孩，跑到清真寺认真真地听课。金梅花如饥如渴地扑进伊斯兰教的精神粮仓中，追寻人生的意义。虽然中国宪法订明妇女的权益，可是在现实中，男女依然不平等，传统的父权思想依旧在日常生活中兴风作浪。丈夫多次命令她留在家里，并且放弃任何读书进修的念头。不过，金梅花暗下决心，排除万难：“我要读书，妇女必须与男人享有同等的权益。”《圣训》中也明言：“谁的妻子若请求去礼拜寺，不得阻止”。

“谁的妻子若请求去礼拜寺，不得阻止”

金梅花32岁才开始学阿拉伯文。一次偶然的机，金梅花旁听一位60岁老阿訇的课，深受启发。从此，她铁了心自学阿拉伯文版《古兰经》，每天晚上干完繁重的家务活后，抽出最少1个小时念《古兰经》，严格规定自己会念会写一段经文才去睡觉。如果遇到困难，想不明白，便虚心向老阿訇请教。金梅花刻苦求学、坚毅刚强，老阿訇很受感动，尽心教导金梅花。最初有30多个女人学习，最后只剩下金梅花一个人。金梅花在前锋清真西寺学了1年便毕业，留寺担任阿訇，给妇女讲授《古兰经》，同时继续自学，向阿訇们不耻下问。金阿訇回忆这段克己苦学的经过：“我觉得如果不明白《古兰经》，就无法当真正的伊斯兰教徒。我渴求念经学习，经常请教老阿訇，后来他准许我留在清真寺学习。一

般只有男人去清真寺，女人是不去的。刚开始，老阿訇觉得我年纪不轻，又带着3个小孩，这样子念下去挺辛苦的，但是，1年学习下来，我的成绩有目共睹，连其他的清真寺也非常支持我。”金阿訇在先锋清真西寺教了4年，先锋清真大寺1年，王国稍清真寺2年，2002年来到吴南清真大寺，直到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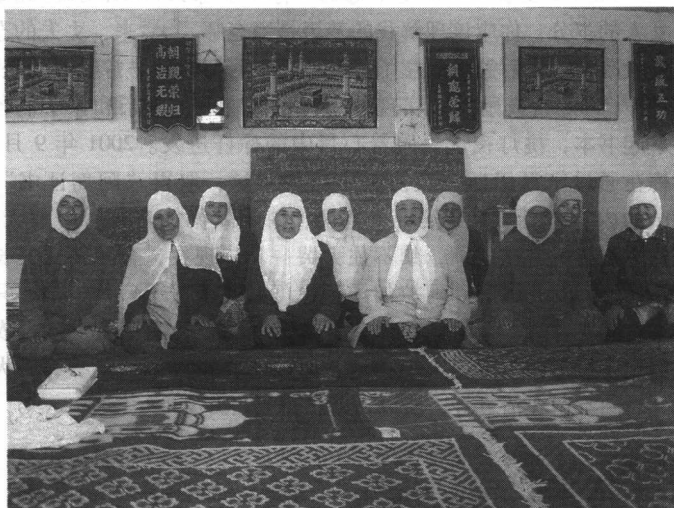
在漫长的求学岁月里，金阿訇丈夫从不支持，又不断嘲笑她，可是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我什么都不怕，每天晚上苦修，丈夫不让我学，我多次跟他做思想工作。”她跟丈夫争辩：“《古兰经》说男女在求学上都是平等的。你不要那么自私，我已经尽了女人的本分，你应该理解我的梦想是当老师。”后来，丈夫的态度慢慢改变，最后勉强同意了。另外，金阿訇感到非常欣慰的是，3个孩子都非常鼓励她去实现梦想，每天晚上，母亲和孩子们各自拿起书本，挑灯夜读，向着心目中的标杆进发。2001年9月，金梅花通过宁夏伊斯兰教协会举行的考试，取得“阿訇证书”，考试的内容包括《古兰经》、圣训、穆罕默德箴言录等。那天，金梅花刚接过考试成绩，禁不住大哭一场。现在，金阿訇丈夫长期在外，大女儿远嫁到阿拉伯国家也门，儿子去了广州发展，只有小女儿在身边。金阿訇选择留下来，继续在吴南清真寺教授农村妇女，虽然偶尔觉得家中冷清，但她全心投入伊斯兰教育，大部分时间都留在清真寺，所以常常忙得不可开交。

女阿訇

在伊斯兰教社会里，女阿訇十分罕有，她们大部分懂得念经，却不懂得讲解经文，也不懂得宗教礼节的意义。妇女多数在家做礼拜，一年才一次去清真寺听课。宁夏回族自治区有1/3的人口是回教徒，根据伊斯兰教协会统计，注册阿訇有5,000人，但是女阿訇大约只有30人。宁夏吴忠市仅有8位女阿訇，金阿訇就是其中一位。宁夏伊斯兰教协会秘书长黑富礼说：“女阿訇目前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独创’，这在阿拉伯国家是没有的，但这反映了宗教与时俱进的发展趋势，正因为信教群众有了这种需求，女阿訇才出现。女阿訇的出现改变了很多回族女性的生活，从女性担负的社会角色来说，她们比男阿訇的影响更大。”

金阿訇的教学赢得清誉，村民渐渐肯定她的成就，其他乡村

的清真寺也常常邀请她去讲学。除了讲授《古兰经》，金阿匄还主持宗教仪式，例如为死者洗净，很多人都害怕，不敢做，但金阿匄却愿意承担厌恶的工作。金阿匄举例说，有一位年轻的回教徒姑娘，因为婚姻问题，一时想不开，跳沟自杀，结果淹死了，8天后才被人发现，那时尸体已经发胀了，没人敢碰，在举行洗净仪式的时候，她家人也戴着口罩和手套，另有8个人仅仅负责盛水，“当时是我亲自为死者洗净，总之，为大家服务，也不怕得传染病，这是安拉为你安排的工作，也就是安拉的意愿。村民以前对我百般挖苦，现在不但十分尊重，而且离不开我呢。”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法律系 Khalid Abou el Fadl 博士认为，女阿匄的出现其实是激活了伊斯兰教女法学家的传统。在《承认妇女》(In Recognition of Women) 一文中，Khalid Abou el Fadl 博士讲了一个优秀的女法学家的故事，从前著名伊斯兰教学者 Zuhri 领袖向《古兰经》专家 Qasim ibn Muhammd 表示渴求知识，Qasim 便建议他去听名震天下的女学家 Amara bin Al-Rahman 的演讲。Zuhri 马上跑去参加，听完以后，就把 Amara 形容为“学海无涯”。Khalid Abou el Fadl 博士指出，像 Amara 的例子并非特殊异例，因为在伊斯兰教历史中，确实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女法理演说家，第一位便是穆罕默德妻子 Aisha。据保守估计，在漫长的历史中，至

少有2,500位杰出的女法学家、女圣训演说家以及女诗人。

对文本不同的解读,就产生不同的世界观。金阿訇反复解说《古兰经》宣扬男女平等,根据《古兰经》第2章《黄牛》第187节:“她们是你们的衣服,你们是她们的衣服。”说明男女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和谐共处。第4章《妇女》第8节,说明男女在继承遗产的权益是一样的:“男子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女子也得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无论他们所遗财产多寡,各人应得法定的部分。”此外,《古兰经》强调男女只要行善,谁都可以得到安拉(即伊斯兰教真神)的恩赐,例如第4章《妇女》第32节:“男人将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报酬,妇女也将因她们的行为而受报酬”,第124节:“信士和信女,谁行善谁得入乐园,他们不受丝毫的亏枉。”还有第195节:“他们的主应答了他们:‘我绝不使你们中任何一个行善者徒劳无酬,无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男女是相生的——迁居异乡者、被人驱逐者、为主道而受害者、参加战斗者、被敌杀死者,我必消除他们的过失,我必使他们进那下临诸河的乐园。’这是从安拉发出的报酬。安拉那里,有优美的报酬。”

金阿訇觉得有责任传递《古兰经》的真谛:“根据穆圣教育思想,求学是男女穆斯林的主命,女人应该享有与男人同等的权益。我教导不识字的妇女念《古兰经》,希望她们思想开阔,学会思考。一般来说,小孩的第一位老师是母亲,母亲给吃给穿,又教孩子说话、走路。我希望广大妇女都获得伊斯兰教知识,对家庭、社会、人类都有好处。为了解除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我特别鼓励女儿读书学习。”金阿訇认为妇女必须学习成为思想开明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上桥乡村民种玉米、大豆、麦子,每逢主麻日(星期五),吴南清真寺安排人到附近的村庄像新民村、中华村和花寺村挨家挨户,请教徒捐献东西,比如粮食,维持村社日常的宗教信仰活动。在这间小课堂,几十个农村妇女经常聚会,谈天说地。她们笑说:“我们很开心,常常见面,念经文,做礼拜,谈谈家里事情,孩子啊、丈夫啊,还有讨论社会新闻、世界大事等。”

当地妇女都珍惜学习的机会,几乎天天来女寺谨守拜功,每天做5次礼拜,借以尊重安拉,感谢安拉。金阿訇说:“她们来这

里做礼拜、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还有交流对生活的感受和分享各自的经验。有些妇女遇到学习的困难，例如家务繁重，抽不出时间，或者记忆力减退，老是记不住，但是她们很虔诚，学习的态度也挺认真。”以下是她们的作息、念经、做礼拜的时间表，十分有规律：

- 4点：起床，做礼拜
- 5点半：回家，做家务活
- 7点：上课、学习
- 10点半：回家，做家务活
- 12点半：做礼拜
- 13点半：学习
- 15点：休息
- 17点半：做礼拜
- 18点：回家，做家务活
- 19点半：做礼拜
- 20点半：上课、学习
- 22点：做礼拜，回家

从识字开始 创造女性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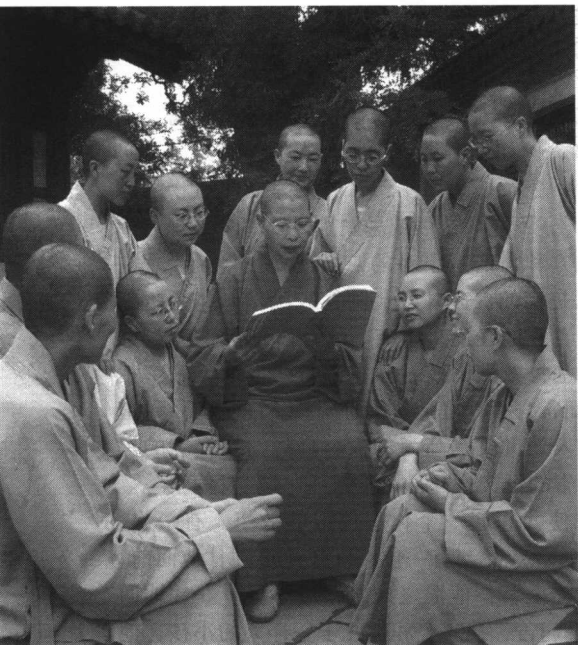
翻开《古兰经》第1章《开端》，虔诚的信徒高声赞颂，决心追随安拉：“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众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谴责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金阿訇解释所谓正路，就是人要懂得“感恩”与“敬畏”：“‘他已为你们创造了大地上的一切事物，复经营诸天，完成了七层天。他对于万物是全知的。’（第2章《黄牛》第29节），感谢安拉真主，安拉创造世界、宇宙万物、太阳月亮、天空陆地，大海大山都是安拉创造的；还有，安拉创造每一个人，人人的长相不一样，都有独特的地方。”金阿訇阐明人要学习欣赏万物奇妙独特之处，还要心存敬畏之心，学习谦卑、虚心，不目空一切，也不狂妄自大。正如《古兰经》第17章《夜行》第37节：“你不要骄傲自满的在大地上行走，你绝不能把大地踏穿，绝不能与山比高。”

金阿匍力言《古兰经》导人向善，教导信徒作善不作恶，不作对人、社会有害的事，例如上舞厅、酒吧，喝酒、打群架、吸毒等，还有，她劝勉伊斯兰教徒要团结：“穆民确如建筑物的砖块，当彼此牢结在一起”，不应该仇恨或忌妒别人，每个人都有生活模式，霸占别人的地方和财产是不对的，金阿匍举例说，现在美国占领伊拉克根本就是错的。此外，金阿匍鼓励信众，超越狭隘的族群与宗教的界限，互助互爱，团结一致：“不管你是汉族、满族、维吾尔族，或者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家人，一个祖先，是一个根。”金阿匍常言相处之道贵乎忍耐，不乱吭声，讲道理，化解矛盾，这样做人处世就是高尚的人。金阿匍在女寺的黑板上写下这一句发人深省的经文：“爱人如爱己，才是真信士”。

金阿匍的一番话，使我想起一个化解仇恨的故事，有一次，印度圣人甘地为和平斋戒，忽然，有一位印度教徒走到甘地面前，哭诉他儿子被伊斯兰教徒杀害，他恨之入骨，渴求报复。甘地回答：“如果你真的想抚平痛苦，找一个和你儿子一样大的小孩，他的父母被印度教徒杀死，你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那样抚养，但是以伊斯兰教的方式抚养小孩，唯有这样，你才会发现你能够克服苦痛、怨恨、报仇的欲念。”

在自学的旅途上，金阿匍不断与封建父权的思想周旋，改变自己之际，同时改变世界。金阿匍从性别的角度诠释《古兰经》，指出妇女识字的重要性，并且在伊斯兰教社会中创造独特的“女性”空间。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批评一个现代的神话，那就是说作者在书写的时候具有明确的意图，能够掌控所有意义的流传，巴特则呼喊必须破除这个神话，并且突出读者的巨大潜量：“读者之诞生必定以作者之死亡为代价。”如何诠释古老经典，赋予新时代的意义，这是读者潜在的力量。这股力量不得不从识字开始，因为识字就是解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之开端。从识字开始，金梅花一直追求诠释《古兰经》的力量，而且，培育更多的农村妇女成为《古兰经》的读者，激活《古兰经》在当下的意义。

金阿匍满怀信心一展抱负：“带动妇女思想，让更多的妇女站出来”。以后，各地清真寺会绽开更多挺拔的、美丽的梅花。



释如瑞
法师的身业、语业、意业

文：薛夏原

如瑞法师认为，作为佛子，一定要勇于承担、为法护法、主持正法，积极向上，奉献进取。“无尽众生无尽愿，一肩挑起莫踌躇”。

出家人要报国土恩、父母恩、师长恩和众生恩；有国才有教，有教才有我们出家人。

飘去的是云，留下的是天，天是那么湛蓝；流来的是水，流去的还是水，一切都顺其自然。没有得就没有失的痛苦，要求自己的只是奉献。

如瑞法师^①出家20多年来，追寻一代宗教大师赵朴初“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教诲，亲近当代两位尼众高僧隆莲法师和通

^① 释如瑞尼。俗姓索。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历。1981年出家为尼。1981—1983年在四川尼众佛学院读书。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山西省政协委员；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五台山普寿寺尼众佛学院院长。

愿法师，恪守自撰“惭愧、忏悔、敢当、敢为”的座右铭，释、俗两界，事业有成。

五台山普寿寺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于1908年来五台山时的驻锡之地。“文革”中，寺庙被公社卫生院占用，殿宇佛像毁坏殆尽。五台山当代高僧通愿法师，生前一再申请恢复重建普寿寺，兴办五台山僧尼佛学院，以培养僧尼，光大佛法。

如瑞法师的身业

作为中国佛学院所属五台山尼众佛学院院长，如瑞法师的身业显现于僧俗两界。

1981年，如瑞法师出家，作为当代第一比丘尼隆莲法师的助手，筹办四川佛学院。随后，又追随师范人天的通愿法师来到五台山。

1990年通愿法师圆寂后，如瑞法师继承愿公遗愿，在当地政府和佛教协会的支持下，以150元起家，通过募化布施，引进资金，在原来普寿寺废墟上，新建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文殊殿、云水堂等殿宇厢房200余间。如瑞法师坚持边建寺，边办学，于1992年成立了五台山尼众佛学院，招收全国各地500多女尼来五台山学习佛经。此举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赵朴初会长知情后，不顾病体初愈，欣然为普寿寺写下大字匾额，并精心构思楹联一副。上联为“恒顺众生究竟清净普贤道”，下联为“勤修梵行愿生安养寿僧窟”，并题“三宝弟子赵朴初，佛历2540年，丙子腊八”。这是一副嵌字联，上下联嵌“普寿”二字，不仅构思巧妙，对仗工整，字字珠玑，而且弘扬佛法妙理，体现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一贯主张。2003年，海外曾专门组织了300多位青年尼众来普寿寺安居学习3个月。

如瑞法师认为，作为佛子，一定要勇于承担、为法护法、主持正法，积极向上，奉献进取。“无尽众生无尽愿，一肩挑起莫踌躇”，是她信念的基础，更是她救助社会、救助众生的动因。

她倾心倾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尤为关注山区农妇、农村失学儿童、孤寡老人。多年来，一介贫尼，主持佛学院和寺庙的事务已然竭尽全力，但襄助社会公益事业依然孜孜不倦，勤勉有加。近年来，募化布施，救助社会近百万元。她常常说，出家人要

“舍一人之父母为天下父母，舍一人之小孩为天下之小孩”。

如瑞法师对生活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儿童的成长、教育在于心。多年来，她募化布施，为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古寨村个人捐资人民币30万元，修建了一座吉祥幼儿园，又自己出资3万元帮助五台县石嘴村小学，还资助了五台山东庄村3名失学儿童。农区的孩子由是接受了正规的启蒙教育，贫困地区的孩子由是而获得了学习的机会。

生活在山西省东南一隅太行山麓的壶关县桥上乡大河村村民，因山区交通不畅，生产、生活多有困难。如瑞法师携弟子以佛学院财力为村民捐修桥梁，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多年来困顿的生存状态农业生产。村民专为此桥而取名“报恩桥”。

如瑞法师极为关注老年人的生存状态，地处太行山主脉西侧的革命老区左权县，位于太行山主脉西侧，旧称辽县。1942年，为永远纪念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军事家、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殉国而易名左权。左权县地势高峻，气候寒冷，孤寡老人生活很是困苦。如瑞法师捐资救助老人的善举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极大赞赏和支持。部分孤寡老人的晚年生活因此而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如瑞法师的语业

作为中国佛教协会唯一的女性副秘书长，如瑞法师感到自己有很大责任。她常常说，妇女在社会上是半边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佛教界，尼众能够也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瑞法师特别注重僧伽教育，注重尼众的培养和素质教育问题。她常说，办好僧伽教育的前提是必须明确办僧伽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如瑞法师认为，引导佛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不仅要在外在的教育和活动中加强，与现在社会相适应，也要加强内在佛学的修证。唯其如此，五台山普寿寺尼众佛学院对戒律的学习始终给以极大重视，并为国内佛学界和其他的佛学院校所推崇。

如瑞法师认为佛教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传统民族文化的底蕴，佛学也绝不可能修成。鉴于一部分家尼众文化素质偏低，也为了让这些比丘尼承担佛学院更多佛学事务，培养更多的工作人员及佛学教师，弘扬佛法，光大佛教

事业，如瑞法师得到香港如日集团杨钊资助，成就其学业，现有64位具备初中或高中文化水平的学子在太原市尖草坪区的妙吉祥寺学习大学文化课程。如瑞法师对现代科技和电脑网络也很重视，普寿寺佛学院建有专门的电脑机房，可供尼众学习和上网。

现在，普寿寺佛学院已发展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律学院，十数年来，培养弟子2,500多人，遍及全国及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此举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影响。

普寿寺佛学院念佛，学戒道场，清净如法，甚为难得。这与如瑞法师的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她们每天早晨3点起床，晚上10点熄灯。凌晨3点半，当茫茫群山还隐没在夜色中时，如瑞法师就携普寿寺全体僧俗一起去上早课了。身穿褐色袈裟的尼众和身着海青的居士神情肃然。长长的队伍蜿蜒而行。

在普寿寺，劳动已成为必需。如瑞法师亲自带领全体学员打井、拔草、盖楼。整座普寿寺都是如瑞法师和尼众以及来修行的居士一砖一瓦亲手建起来的。



如瑞法师的意业

身在佛门，如瑞法师却始终以佛的慈悲、慈爱直面社会和芸芸众生。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热爱大众，献身佛教事业，是她

秉持的行为准则。她说，“出家人要报国土恩、父母恩、师长恩和众生恩；有国才有教，有教才有我们出家人”，“每个生命都有可能我们往生的父母，我们对待任何人或动物都要友善。”“天、地、人三才，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中间是‘我’，作为一个人，就要顶天立地”。她的床头，贴着的是“三省”两个字。

如瑞法师的父母也先后出家，两个弟弟都是计算机高级人才，分别在北京和广东工作，20多年来，一家人从未团聚过。她也从未回过俗家。但每每外出开会办公，她总是关心着孤儿和老人。

1998年，有感于洪水的肆虐，她创建了报恩会和菩提爱心协会。2005年，出于对老弱孤寡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为他们的晚年提供生活救助和精神抚慰，她又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政府的大力协助下，在该地大乘寺附近修建一所占地300亩的“清泰安养园”（“清泰”，意为西方极乐世界），以弘扬佛教护国民、慈悲济世、造福社会与人民的精神。让老人们在安度晚年的同时，感受到人生的快乐。并从宗教的角度推动福利工作的社会化，推进社会保障事业。

释如瑞一直以特殊的身份为国家和民众做着特殊的贡献。她创办五台山普寿寺佛学院，致力于僧伽教学；她为贫困失学儿童捐修吉祥小学，为山区民众修桥铺路，为残疾人捐助善款，为老弱孤寡等社会弱势群体修建清泰安养园。

飘去的是云，留下的是天，天是那么湛蓝；流来的是水，流去的还是水，一切都顺其自然。没有得就没有失的痛苦，要求自己的只是奉献。

驾大般若之慈航，越三有之苦津。这是如瑞法师的追求，也是她的实践。

日本作家池田大作称当今时代是“自私与不负责任的时代”，战争与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物质的丰富、精神的空白是社会通病。邪教盛行。人心平，世界才会和平；人心善，社会才会美好。

附录：

五台山普寿寺简介

如瑞法师的三业

如瑞法师追寻一代宗教大师赵朴初“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教诲，亲近当代两位尼众高僧隆莲法师和通愿法师，释、俗两界，事业有成。

如瑞法师强调，妇女在社会上是半边天，在佛教界，尼众也应该并且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她特别重视尼众的培养和教育问题。作为业已圆寂的通愿法师的衣钵弟子，她通过募化布施，引进资金，在原普寿寺废墟上，新建殿宇厢房 200 余间，坚持边建寺，边办学，于 1992 年创立了五台山尼众佛学院，招收全国各地 500 余女尼来五台山学习佛经。此举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影响。已故赵朴初会长专此题写匾额。

如瑞法师恪守自撰“惭愧、忏悔、敢当、敢为”的座右铭，奉献进取。一介贫尼，救助社会近百万元，倾心倾全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多年来，她募化布施，为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古寨村个人捐资人民币 30 万元，修建了一座吉祥幼儿园，又自己出资 3 万元帮助五台县石嘴村小学，还资助了五台山东庄村 3 名失学儿童。贫困地区的孩子由是而获得了接受启蒙教育和学习的机会。

她为地处山西省东南一隅的壶关县桥上乡大河村捐修桥梁，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多年来交通不便的状况。村民专为此桥而取名“报恩桥”。

如瑞法师极为关注老年人的生存状态，捐资救助地处太行山主脉西侧的革命老区左权县的孤寡老人。并正在积极筹建占地数百亩、服务于孤寡老人的“清泰安养园”。善举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极大赞赏和支持。

李清词 深耕牧者



文：罗婉贞

李牧师真切盼望，每位教会中的女性，无论是牧师或同工，都能有所贡献、声音能有人听到。

李牧师理解到信仰、知识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安排除了减少师生对教会学校泛宗教仪式的抗拒外，更让师生跳出传统认定的信仰框框，反思信仰生命与生活的关系。

大家都是平等的，应该平起平坐，虚怀的分享己见。

面对社会的不满，有人会选择轰轰烈烈地冲击及推翻建制，或推动一波又一波的制度改革，亦有一批人选择在自己的岗位上静静地革命，默默播种、深耕，寻求人内在生命实体的更新。过去40多年，李清词牧师在教会牧职和学校教育等岗位上，都坚持耕耘、撒播和平希望的种子。

李牧师是中华基督教会在香港第一位接受按立的女牧师，当年是1966年。自1968年起，李牧师获选做普世教会协会（WCC，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①)的中央委员,连续6年出席普世教会协会大会,这工作开阔了她的国际视野。1977年,她接受世界传道会的邀请,任该会宣教教育干事,在4年任期内,走访多个第三世界国家,致力于普世关怀事工,这些难得的国际工作经验也开启了她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李牧师自师范学院毕业后,先后任教于英华女校及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达30多年,她任职英华女校期间,推动课程及考绩制度的改革,先见地为当时的教育系统引入不少新元素。1981年李牧师从英国回港,出任中华基督教香港区会副总干事,结合过去海外的工作经验及国际视野,服务本地教会团体,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香港女性教会领袖。

当生命与上主遇上

李牧师出生自香港富裕大家庭,祖家3代都在香港成长。祖父为香港开埠初期的富商,当年有“当铺王”之称,拥有传统的大家庭,家有妻妾4位,其他亲属更是众多。李牧师的父亲性格独立,很早便脱离大家庭,独力创家立业,因经商得宜,一家仍享受富裕舒适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日军炮轰及侵略香港,为香港和李牧师一家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在日军进驻香港之前,李牧师母亲已过身,她与弟妹在家人安排下,在黑夜乘坐机动渔船逃往广州。初到广州,家里仍能维持着富有生活,有家佣伺候。但好景不长,战后因父亲在日治时代服务于汪精卫的伪政府,背负了卖国罪名,被关进监牢,所有财产被充公。此后,家道中落,李牧师和弟妹分别投靠父亲的不同朋友家,各自生活。

与家人分散的日子,她幸运地得到两位小学老师收留,但跟之前的生活相去甚远,心里总有寄人篱下之感。那段艰难岁月,锻炼了她独立自主、乐观坚忍的性格。目睹当时周围生活更不堪的人,她学会乐观自处。然而,战后漂泊离散的生活,令她倍感思家念亲,渐渐她也不自觉地向那当时未识之神祷告。随后进入

^① 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是一全球性教会的团契组织,努力拆毁教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篱墙,并见教会是“一个,圣洁,大公和使徒”的本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普世事工委员会《普世教会组织简介》:台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普世事工委员会)

有教会背景的英华女校就读，使她对信仰加深了认识，开展了与上主相遇交心的岁月。

中学毕业后，李牧师信主受洗加入教会，并回到母校英华女校任教。在母校工作的断断续续的20年中，分别在1958年及1964年两次前往英国进修神学，第二次进修时，更在英国些利溼学院当导师，与学生一起听课后作研讨，加强学生的普世教会运动^①意识及分享第三世界的观点。

从寰宇之旅看教会的性别不平等

1966年，李牧师接受了按立，成为香港第一位女牧者。两年后，李牧师被普世教会协会选任为中央委员，由1968—1977年间，连续6年出席协会在不同地区举办的会议，与会者包括各地教会领袖、大主教及东正教人士，与其他国家的牧者彼此分享讨论，观摩交流。普世教会协会在1968年举办的第四届大会，讨论应有青年和妇女参与的前所未有的议题；这对李牧师影响很大，使她眼界大开，她在当中知道了青年和妇女一直未有获得公平的参与机会，这无疑是一种不平等。经过了6年参与普世教会协会周年大会的经验，她注意到妇女及青年人在教会面对那么多困难、挣扎。因此，当她20世纪80年代回港工作后，特别关注在教会内妇女及青年人的参与情况。

1977年，李牧师获邀到世界传道会（CWM,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② 出任宣教教育干事。该会乃一世界性支持基督教教会宣教工作的机构，自1975年教会会员大会检讨后，认为他们从西方国家到亚洲、非洲、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等发展中国家的宣教工作，倾向于强调已发展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教会之间的施与

^① 普世教会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是现代基督教内提倡所有派别重新合一的运动。（资料来源：陈铨盛：《什么是普世教会运动》，网址：<http://www.pcchong.net/4Heresy1.htm>）

^② 世界传道会（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CWM）是个源自英国宣教团体的一个海外宣教组织，1977年6月改组成为拥有22个会员教会的国际宣教组织，致力促使所有会员都能参与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普世事工委员会《普世教会组织简介》：台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普世事工委员会）

受关系，忽略了教会的宣教乃建基于各方相互合作同工的精神，应让每位会员教会的恩赐、资源、财力得以适当配合发挥。李牧师负责出访世界各地，尤其前往第三世界国家，向当地教会宣传教导如何借调动自身的资源，建立独立自主的意识，发展自助或自治的系统，鼓励他们摆脱受惠者的身份，也与世界传道会互相合作，不分贫富强弱，尽本身的力量去分享资源，完成教会的宣教使命。

1977 - 1981 年间，她走遍欧洲、中美洲、非洲、南北印度、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区等地的教会，大部分以第三世界地区教会为主。这 4 年的寰宇之旅，可以说是惊险刺激、险象环生，亦看见很多感人的见证：她探访过贫瘠的孟加拉国；当年入夜后便实行宵禁的东北印度；游击队枪林弹雨下的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亦看见在印度加尔各答德兰修女创办的“垂死者之家”在缺乏资源下，仍尽心为贫病者服务；到达韦尔斯，匍匐爬行人地底 2, 600 多尺的矿场，为要聆听矿工们的怨屈。令她记忆犹新的有当年探访南太平洋的教会时，她必须乘坐由一名土人掌舵的独木舟，穿插来往当中大大小小的岛屿，随身文件护照等要放进胶袋内，挂在颈项上，准备应付随时会坠海的可能。

探访的过程中，李牧师发现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亦有贫富非常悬殊的情况。当中有些教会本身穷困又设在贫穷民众中，像孟加拉国及印度的贫民窟。也有教会因早年接管了差会撤离时的产业，拥有美轮美奂的大教堂，同时仍在接受西方相属教会的资助，他们对于世界传道会的新理念并不热衷。然而，她亦遇上一些“四面受敌而不被困，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的忠心无私的教会领袖，在支持教会自力更生，也与其他教会共享资源去发展支持整体宣教工作的发展，这都令她得到不少激励。

周游列国，李牧师也对性别问题有更深刻的体会。如在非洲和印度看见女性走路时把一袋袋行李放在头上，男性却什么都不做，甩着两手跟在后头。“这对我来说，真的眼界大开，我察觉到女性在人的心目中没地位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到南太平洋群岛中参与会议。当地领袖得悉世界传道会的高级干事将会来，打算到机场准备了人迎接。但下机后李牧师等到差不多所有人都走了，还不见有关人士来接。最后，机场内只剩她一人，才有位

男士前来问她是否来自伦敦的李牧师。经过再三确认后，当地人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实，因为他们心目中只有男士才能当牧师。到了开会场地，大家席地而坐（当时太平洋岛上没使用桌椅的习惯），她穿了裙子，却没有人注意到她面对的问题，最后她只好扭着双腿坐。会议开始时，走来了十多位女士，每位都紧握着一把大芭蕉叶，站在那十多位与会男士背后，替他们赶走蚊虫。看见这个景象，幽默的李牧师想到：“我忽然明白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意思。”

现在听来似乎是趣闻，但当地的妇女当时是天天过着没有地位的生活，彻头彻尾是男性的附属品。各地的切身的经验不断地冲击着李牧师，对于自小未受过别人半点气的她，来了个当头棒喝，开始醒觉到男女的不平等以及女人在教会没有地位的情况。所以回到香港之后，她便留意妇女在教会的参与问题。

潜移默化，逐步慢慢来打开教会保守思想

1981年李牧师回港后，投入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作副总干事的工作，正式发现和接触到香港教会存在的问题。她看见一些在教会工作的较初级的女性同工如宣教士及传道，工作多年，再资深或努力，都一直不获提升，不受重视。对于教会内的权力严重失衡的情况，她曾抚心自问，如何改变？但总觉得并没什么可作，因为她相信“教会里面很难起革命的，再说我又不太喜欢集合一群人去打倒什么，而当时潮流也不兴举起这样举起那样来抗议，都是乖乖的……静中进行无声的改革，是比较困难，但慢慢地我们也设法去做。”因此，她选择先观察，静待机会。

李牧师看到香港教会的决策也完全缺乏女性与青年的参与。她曾花两年时间，引用了她在西方得到的经验，说服教会的高层作出一些小的变革。“我告诉教会，说我们再这样下去很落伍……每年选一个执委会，但选出的30位代表都是男人。我说没理由这样，这样让人家看见很‘羞家’、‘丑怪’。”就这样慢慢说服了一些掌权者。她当时建议说：“那30位代表，可以10位男的、10位女的、10位青年人，然后在那30位代表里再选出10位……但结果还是不行，未被接纳……第二次修改的动议终于成功，我说可以仍是10位男的、10位女的及10位青年人，然后每个组别一

定要选出3位，这样起码有3位女性，男人最多4位，青年人中也有女性。”

1998年她从副总干事的岗位退下时，她高兴看到教会在慢慢的改变。她看重的并非女牧师被按立，而是所有人都得到平等的看待。“若有一天香港有一个女主教，我并不认为是很大的成功，如果有一天香港教会里所有女性都享有平等机会才行，而不是只选一个人当主教或牧师。”李牧师真切盼望，每位教会中的女性，无论是牧师或同工，都能有所贡献、声音能有人听到，这才是最重要的。



与宗教团体的合作方式

虽然李牧师未曾长驻某个地方教会（堂会），她一直未间断地前往神学院及个别教会分享，也活跃于宗教团体的活动。她曾多年成为“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及“基督徒学会”等机构的顾问。她愿意成为教会和妇女之间的桥梁，推动教会内的性别平等。当她看到一些宗派里有女性遭受歧视的情况，她会如实将自己观察所得，与教会或后辈分享，互相警惕，寻求改善；不过她不会选择正面挑战教会或个人，或标榜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直接与当权者提出批评，反而会在教会可容许的范围内，提携后起女性，鼓励她们发掘潜能，贡献教会。

不过，一向坦率直言的她，指出香港大部分教会都过分保守：“最大问题是教会思想太狭窄。只要过于狭窄已经是死路一条，对宗教或者对社会太狭窄……看不见旁边的人，基本上便是错了。”

她举例说，去年数个教会宗派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闹得满城风雨，她认为这些教会狭隘无知。“不是说同性恋是对的，但怎么听听对方的说话都不愿，这样不可以，那样也不成。那有那么多不能够的……若你要看圣经也不能只守旧约里的律法哩，看看耶稣……他何时曾排斥低下阶层、道德败坏的人？耶稣作什么我们便跟着去做，就这般简单。旧约有的地方可以刺激我们的思想，但只跟着旧约的规条会很糟。时代不同了，耶稣做的事要我们要刻板地跟着做也不可能，因为时代已改变，我们不是要按旧规，而是守精神。”

愿意直言无讳地指出教会的问题，也不介意被作援引的牧者，实在不多。李牧师的直言，是一种真我的表现，也是出于对教会的深切关注，希望教会中人能真诚检省，从自我迷雾中清醒过来。

重塑教育使命：以学生为中心，活化知识，与生活接轨

李牧师的和平事业，在教育工作中开花结果。中学毕业时，为了回馈多年来良师的教导与培育，她决志献身教育行业。1953年罗富国师范学院攻读教育文凭毕业后，她便前往圣士提反学校任教，一年后再回到母校英华女校任职，展开了前后20年的春风化雨。

在英华女校任教期间，她曾两次前往英国进修，加上参与普世教会协会的会议及4年走访列国的游历经验，她将累积了的国际视野和经验带到工作岗位上。她看准了当时宗教科是教署、校董会及家长都不爱管，当她接管宗教科时，便尝试进行一些突破和更新。她说服一些同工，把“圣经知识”（Biblical Knowledge）改为“宗教教育”（Religious Education），放弃用现成的主日学教材，尝试自己及鼓励其他同工编制课程。“我第一年进修时是主修宗教教育的，就学了一些新方法回来。当时20世纪70年代，有许多民歌，天主教的修女也唱歌，弹吉他，就用那一种方法，早会就用一些新的诗歌。”课堂多以讨论方式进行，不再采取那“过时”的主日学课本作教材，不再用单向式讲课和说教式宣道。

她说：“那时开始采用讨论式的，大部分是根据报章。譬如有一车祸撞死人，车主不顾而去，这类事情，也可以讨论生命、责任的问题。”李牧师的改革主旨，是让课堂更切合学生的需要，更人性化及生活化，让学生的生活与知识从自我提问和反思中得以结合。

李牧师利用工作位置赋予的权力，曾一度废除了校内“宗教教育”科的考试。她坚信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尊重学生的个别需要，认为教师不应只看学生的表现来给予评分，“（成绩表上宗教科）那一栏便让它空着。因为要评分的话会很很不公道，既然没有考试，那是否留心听课的就给 A，上课调皮些的就给 B？但可能调皮的那个是因为在想问题所以调皮，有很多原因的，所以很难决定，既然如此，又何苦弄个假的 ABCD，索性不要算了。”结果，发现学生们比要考试时还要用心上课。她重申能顺利地带来一些校内的改变，与她当时身兼校牧及副校长有很大关系，“你没有权力的话，就改变不了事情。如果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卒，怎么吵都没有用，因为有十个八个老师教宗教，他们一起反对，我也没办法。但幸好我当时已是所谓副校长……我们开小组……觉得宗教科是要活泼的，和童心有关的。”

后来，她更进一步地将学校的活动走得更贴近师生的生活。教会学校一般都会在上课前举行早祷会（Morning Prayers），她将早祷会改为早会（Morning Assembly），由全校所有老师共同负责，使之除了有宗教信息外，也包括不同老师的生命经验和体会，令内容更多元化。至今，她仍有满足感地提起，“你现在去问那些学生，她们都还记得。她们不一定记得圣经课所讲的，但最深印象是早会对她们思想启发良多。”李牧师理解到信仰、知识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安排除了减少师生对教会学校泛宗教仪式的抗拒外，更让师生跳出传统认定的信仰框框，反思信仰生命与生活的关系。另外，她也开展了另类形式的“宗教教育”。她邀请将要毕业离校的中五、中六和中七的同学，在校内她的副校长宿舍内聚谈，与她们一起分享生活与信仰带来的冲击，让学生的知识及信仰更生活化、更接近生命。

作为教育工作者，李牧师深信亦坚持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需要提供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提供资源及空间，将知识与学生的生命与生活接轨，培养学生有反省生活和响应社会的能

力。她倡议教育是生命教育，是一个可以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去启发学生思想自身的生命问题。努力播种，潜移默化，逐步改变是李牧师一向工作的信念和手法，不论是教育工作还是教会工作。

退而不休，继续深耕撒种

1997 - 1998 年间，李牧师先后从英华女校及中华基督教会各职位退下，但现年 75 岁的她，实是退而不休，每天仍持续着充实又繁忙的生活，约会好友旧生来个午聚闲聊，前往神学院授课，参与各大小教会的聚会分享，为她的生活继续增添色彩。

仍然记起，李牧师在 2005 年的和平妇女“冲破分隔的灵性力量：妇女、宗教与和平”工作坊上，与我们分享她的四大坚持。“我之所以能坚持下去做了那么些工作，并非因为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因为）我有四大坚持，第一：我不会推辞；第二，我不会放弃，即使很辛苦，我也要努力到底。第三，我永远不会感到绝望，失望是会有有的，但不会绝望……第四，我不会惧怕，可能我天生性格如此，什么都不怕，只怕那一位上帝。”她还再三勉励我们这些后辈要多坚持，不用惧怕，人家声音大，你要比他的声音更响那就行了，大家都是平等的，应该平起平坐，虚怀的分享己见。

退而不休，独身的李牧师仍然非常享受她忙碌的日常生活。精力充沛的她每天大清早便出发，相约不同的朋友见面，继续参与不同的组织聚会，努力在各大神学院的课程中接受邀请为讲课、在教会崇拜中分享从上主而来的讯息，将自己一直以来的经验、识见教导提携后辈。因着对教会现况不满，便更有动力去多做点盐和光，坚持继续在人群中努力播种，努力深耕。

辛淑雯
从这里开始



文：陈惠芳

929

从主流教会安全的庇荫，跳到被边缘被排挤的同志教会，辛淑雯毅然站在性别与信仰冲突的火在线，与饱受歧视与排挤的性小众同行，尝试用实际的生命经验，化解性别差异与信仰诠释差异之间的矛盾与暴力，创造一个公义、共融与和平的社会。

女性神学有一句：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另一样就是：个人的就是社区的。

我的图画是：和平工作是一条链，一个紧扣一个，这条链会越来越长和阔。

在基恩之家 13 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千来平方尺的礼堂挤了百来个信众，一个挨一个的，没有一张空座位。聚会进行期间，还是陆陆续续有信众到场，使已经坐得满满的会堂，得再挤一点再挤一点。现场演奏的音乐，配合会众的歌声，把温煦的感恩气氛和情绪一路路牵引提升。

基恩之家是香港首间也是唯一一间同志教会，由一群同志基督徒组成，参加者包括不同性取向的人士，他们来自各基督信仰宗派，包括天主教。在传统教会的理念中，所有非异性恋的行为，包括同性恋，都是罪，是神不容许的。基恩之家在这个大论说之下，难怪被认为是异端。

13周年庆典中的一个高潮是播放两辑幻灯片：《回忆篇》之爱的季节，以及《喜乐篇》的明日恩典。幻灯片中的照片是一个个欢乐的笑脸：不同年代的信众，不同组合的活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回忆、13年的爱与企盼凝聚在闪动的光影间，以会场满溢的笑声回应。一时间，似乎忘掉了也看不出这一个另类教会曾经历过，那许多个年月日日夜夜所面对所承受的压力与困难。

两年后才成为基恩之家全职牧者的辛淑雯牧师静静的坐在最前面的一行，整个过程中都面带微笑。13周年庆典的大部分活动都是由会员负责，她只是在末段时带领会众祈祷并为新一届同工祝福。在这个饶有意义的日子里，她安详地坐在会众中间，跟他/她们一起享受那份平安与喜悦。两辑幻灯片的照片中有一组是辛淑雯跟同工跟信众们揽头贴脸的合照，照片中的她笑得像小孩般毫无保留。

是因性别道德惹的祸

辛淑雯爱笑，笑起来声音响亮，能把人的心一下子打开，就像她的笑脸般灿烂、阳光好像从里边透出来，照得人暖暖的，让人感到舒舒服服、亲亲贴贴、胸怀适展。不说话的时候，辛淑雯很多时仍然保持着微笑，让人感到舒服泰然。她研习神学，专研的课题包括旧约圣经和女性主义神学。一直在教会工作，是传道人。成为基恩之家的专职牧者与按立牧师前，她曾担当菲律宾外籍佣工与华人教会的牧民工作，此外，也参与推动小区的妇女充权项目。

一路走来，从读书到工作，教会是辛淑雯最主要的庇荫。她做传道人和牧民的工作、自己不断进修，受到别人对传道人与牧者预期的尊重和尊敬，感觉就像活在温室里：每一步都是安安全全、平平稳稳，那条生命的轨迹好像一早就已经写好，可以预计。

但对于辛淑雯来说，这份安稳与保障却不是她对生命的终极想象与想望。在新千禧的时候，她毅然辞掉传道人的工作，去寻找那些能够让她实践神学理念的人群。如是，她走进了小区里的妇女当中，走进了基恩之家，走进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走进因性别角色因保守的偏颇的宗教诠释而滋生与肆虐的不公义与暴力中去。

“女人面对的暴力，除了可见的，还有不可见的。怎么说呢，正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所以对于一些不可见的暴力，我能看到，油然而生的是一种同情心。譬如在家庭的角色中，很多时候要扮演一个非你所愿的角色，这明显地是一种暴力。”辛淑雯说。来到基恩之家，她也看到性别与性别角色的角力。“这影响着这群性小众基督徒的个人成长，包括怎样看自己，自我价值等问题。他们其实处于不知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就好比男人或女人被定型所带来个人的张力，比如说一个男人，他很有感觉、很有感情、很容易流露，但文化告诉他：你是一个男人……外表上我是的，但里面我有另一个我，那我如何去表达自己？”

辛淑雯会把性特质 (Sexuality) 与灵性特质 (Spirituality) 看作是一个整体的两面。但她观察到教会在这方面的看法一直是很割裂，将性、性别和心灵归属三方面割裂开来。“教会一直实践的或传讲的一套意识，都是很割裂的。但偏偏我从小到大，在现实生活里看到的都并非这样。我们要找一个聚合点，这个点无法抽离大社会的文化加诸于人身上的暴力。”辛淑雯认为灵性特质是一个人个体的整合。她观察到许多人的心灵与个体，无法整合一致，或潜意识里抗拒一致。然而，许多人都不自觉这对自己造成多大的暴力，也不自觉地把这种暴力加诸在别人身上。她所认识的同志信徒当中，不少对教会上帝都是很虔诚的，不过他们接受不了自己是同志。她说：“他/她们亟欲像脱衣服那样把这个性身份脱掉，这是非常痛苦的，却又是不可行。就这样我看到社会的暴力。”

“同志信徒的两难就是：要在信仰与性身份之间作取舍。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始终两者都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毋庸作取舍。这可说是来自教会的暴力吧！第一是认为同性恋是罪，第二是认为这是可以改变的，但改本身就是一种扭曲。第三是用道德判断去践踏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和个人成长，包括感情的发展……”

辛淑雯形容有的同志信徒自觉是上主创造中的次货，潜藏于心中总有洗不去的污点。经传媒的描黑，使同志更感自惭形秽。同志在建立亲密关系上也殊多避忌，他/她们不可以在街上跟男或女朋友拖手、拥抱或亲吻等这些很普遍地出现在情侣间的亲密行为，也没法向家人透露半点，在欠缺支持网络下，恋情也只好转移到地下进行，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容易陷入死胡同里。教会的访客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有威胁，他们怕会被认出来，担心会碰上熟人。“为此，我感到莫明的凄凉，对一般人只是普通不过的事，对同志来说，却带来如此的威胁性和恐惧。”

主流教会怎样看基恩之家？辛淑雯说没有做过调查，所以不知道。“但听一些兄弟姐妹讲，有些认为基恩之家是异端，即不遵守或宣讲不合正统基督信仰体统的异己。一般主流教会认为，同志根本不能是信徒，哪又何来教会呢？我需要补充一点，主流教会这个名称太笼统了，涵盖面太阔，我认为不理解同志的信友比较正确和持平。”

是信仰与性别道德的桥梁

教会认为同性恋是罪，所有非异性恋的行为都是违反自然，都是不道德的。主流社会对性小众抱持同样偏颇的态度。但在过去10年，情况似乎有了改变。香港政府在1996年进行一项调查，研究公众对不同性倾向及反歧视立法的意见。调查以引导性的问题进行，^①结果是超过85%的响应反对立法保障不同性倾向人士免受歧视。2002年理工大学再探讨市民对同志平权的态度，结果显示有7成到9成受访者认为同性恋者应该与异性恋者享受同样权利。

2005年，香港特区政府计划草拟性倾向歧视条例。一下子，无论在教会以及同志群体里都掀起了很热烈的讨论，把一直潜藏在教会和社会中的矛盾与差异，压迫与暴力，明明白白的摆在桌面上，清清楚楚的凸显出来。当中，反对的与支持的阵营楚河汉界，敌我分明。

^① 邵国华，“性倾向歧视立法——需要与误解”，《思》，香港基督徒学会，第93期，2005年1月，第6页。

教会中的反对声音非常激烈，一轮接一轮的公开表态声明，在机构内的（立场）审查，无论对支持或反对的人都造成莫大的压力，滋生一份胁惧的情绪。作为香港唯一一间同志教会，基恩之家站在风浪的前哨，首当其冲。基恩的存在，就是挑战主流教会性道德价值伦理的一份宣言、一个活生生的体现：体现信仰、性特质与道德之间共生共容共融的依存关系、宣示性别身份的丰富多元姿采。

“（基恩之家）作为香港首间也是唯一一间同志教会，在同志的议题上，成为其他教会认识同志基督徒的渠道，以及讨论这个议题的桥梁，基恩之家理应责无旁贷地成为当今同志社群、社会和教会生命与信仰见证，以先知的使命和角色来为这个充满歧视和纷争的世界，活出融和的生态。”辛淑雯说。



前身为香港十分一会宗教组的基恩之家，于1992年7月创立，直至2003年都没有专职的牧者。因此，一直未能建立清晰明确的教会形象，缺乏固定的发展方向，教友的出席率不稳定，半数参加者都抱着过客心态，财政方面亦因而匮乏。教会以至社会人士对同志根深蒂固的歧视态度，使同志教徒在生活的每个范畴

都感受到莫大的心理压力。基恩之家一直不对外公开会址，对来访者非常审慎，教友甚至难于跟其他教徒明言自己所属的教会。

基恩之家选择了辛淑雯，辛淑雯选择了基恩之家。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94年，由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下称女协）一手促成。当年，女协与基恩之家合作，开始在同志基督徒团体的崇拜中举行圣餐。辛淑雯被邀请襄礼。2002年，基恩之家成立10周年，辛淑雯参加这次庆祝活动，恩缘再续。当时，基恩之家邀请她做关顾工作的培训，为了加深对基恩之家的认识，她参加他们的崇拜、团契和小组等活动。2003年辛淑雯正式成为基恩之家的牧者，2004年基恩之家按立辛淑雯成为牧师。

“基恩之家吸引我的地方，是其超宗派的特性，天主教与更正教的兄弟姐妹能够抛开历史的包袱，走在一起崇拜以及共享圣餐，实践了普世运动的精神。第二个特性是他们能坦然的做自己，同志身份在这里不再是禁忌或令人尴尬的事。第三个特性是冲破了在教会中谈论宗教与性意识的桎梏，而勇敢地将性意识这个议题，在信仰与神学反省中曝光。以上3个特质，让基恩之家成为一个使人得到整全照顾的信仰团体，不单让每个人都能拥抱真实的自己，也让教会回归本来的身份，也就是基督的身体。”

从主流教会安全的庇荫，跳到被边缘被排挤的同志教会，辛淑雯毅然站在性别与信仰冲突的火在线，与饱受歧视与排挤的性小众同行，尝试用实际的生命经验，化解性别差异与信仰诠释差异之间的矛盾与暴力，创造一个公义、共融与和平的社会。

是同行

“我们的开始是一起生活、一起痛快的玩闹。我志在做我自己；我希望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存活。相对于一个异性恋的世界、异性恋教会，可能这个障碍不明显。但在这里，很多人都将自己分裂开来，并且没有意识到这种分裂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包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信仰……我要把他们从逃避的世界拉出来。你可以逃避一阵，但不能逃避一世。我要他们面对自己，积极面对痛苦……”

辛淑雯时常记得女性神学有一句：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不是要先处理这个，后处理那个，而是两者一并处理。另一样就是：

个人的就是社区的，我一个人痛苦，整个小区都痛苦；小区痛苦，其实也联系了我个人。这不单是整个社会建构的意识形态，基本上信仰告诉我们的，也是这样。”

“和他们同行是我牧养的一个理念。”在一般人心目中或一般教会的想法中，牧者应是信众的领袖，牧养就是从上而下地看顾大家、主导会众的思想，但辛淑雯一直的神学建构都不是这样的。“人间世事，应容许有神秘不可知之事、不可明之事、不可解之事、这包括我对上主的理解，有太多的事我不能理解、不明白、人生也一样，对我自己如是、对他人亦如是……”

“与他们一起去发现，一起去体验，这是很重要的。假如大家觉得可以这样做，那好，就一起错吧。”从她的专业角度看，可能会觉得是行不通的，或者会兜多一些路，“但不要紧，我们一起去经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俯就卑微的人。另外还有一句话，也是一位前辈老牧者讲的：勉强甘心，甘心勉强。他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个牧者的心肠，有些事，你未必愿意去做，未必愿意扮演那个角色，但你就是甘心去做。”

辛淑雯要面对反对的声音，面向公众对这个群体的不明白、很多的误解，她要公开讲她的立场、她的想法。“我会用很平常的态度，所谓的平常心，使用和善而温柔的心态去处理，这就是主耶稣处理事情的心态。行动才是实际，不需要讲太多，我们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限制。作为一个牧者，我的呼召就是去行道。这个道不是讲道传道，那是很狭窄的。道要行出来，一直发现下去。你一旦踏入信仰就是踏入了一个冒险之旅。”

辛淑雯这个人比较批判，比较有自己的看法。“我会对主流的事物，包括我自己的文化，我身处的环境，都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当人人都那样做的时候，我就会质疑，我不认为非得那样做不可。在‘不认为’之下，我会从根本去思想，究其所以然，才采取我认为是对的行动。”她也是一个很富创意的人，她不认为只有某几套方法是最好的，世界上没有一套方法是最好的。譬如在主流中，做事一定要有效率、要快，那她就会想，为什么要快？为什么不能享受过程？为什么要有效率？可以有不同的……”

从个人的教会的到社会的实践

2005年，基恩之家踏入第13个年头。在过去两年参加基恩之

家的人数稳步递增，每星期参加崇拜的人数由2003年平均约40-50人，增加到2004年的70-80人。这一群遭受巨大而深重的家庭、教会与社会歧视与排挤，饱受性身份困扰的信众，需要很大的动力，才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肯定自己。基恩之家是同志教友的特区，给他/她们一份安全感、一个团队的支持与力量、让他/她们有决心和勇气，慢慢从桎梏成长的衣柜走出来。而除了个人与群体的努力，也存在需要相应的外在环境的转变，他/她们才可以真正地走出困局。

作为基恩之家的牧者，辛淑雯除了辅导同志信众的个人成长及自我接纳，整合信仰与性身份的裂缝，发展整全合一的生命之外；也加强与其他教会及其他社群的沟通，平等对话，建立一个共融的社会关系。在过去两三年，基恩之家与外界的接触和联系较过去紧密，他们接受传媒访问、投稿报章和教会刊物等、到不同群体去介绍基恩之家的的工作、并举办工作坊和讲座等，大大开展了对话与交流的空间。

在这次特区政府性倾向歧视立法的咨询过程中，基恩之家相对地更活跃参与教会以外的同志平权运动，积极投入由社会各界组成的联席。2005年3月基恩之家和香港基督徒学会出版“同志心。牧养情”，探讨同志基督徒与他/她们的家人朋友的经验。6月，基恩之家跟不同宗教信仰人士一起，在报章联署刊登的支持立法的主祷文。同年7月，香港同志小区联席（下称联席）出版了《同志E道》。从基本人权、从社会运动、从宗教、从政策制定、从性别及跨性别角度探讨同志平权运动的种种。联席在1999年成立，由十多个本地性小众/性别认同为对象的团体组成，基恩之家也是联席的成员。

辛淑雯形容基恩需要包扎伤口的人很多，其中家庭、教会、社会的不接纳，而引致的种种心理压力，实非为外人道；而这种困扰和恐惧感却是无日无之的。“鼓励受性身份困扰的人坦然面对自己，对他们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挑战，要坦然跑到上主面前来承认这一点，谈何容易！”在这个教会的工作，不光是做牧养的工作，她经常强调要两条腿走路，教会里的牧养工作固然要做好，同志运动也不能抛诸脑后。“如果教会只是单单成了兄弟姐妹的安乐窝，另一条腿却一动不动，他/她们始终没办法以一个整全合一

的人去成长。无论你如何虔敬，你始终觉得自己有点‘跛’，这是很痛苦的。”

辛淑雯认为需要慢慢逐步处理的障碍，是如何带领这里的群体去意识到“两条腿”走路的重要性。“这是挺困难的事。我们不能有太多假设……怎么说呢，教会中大部分都是政治冷感，如我所说，敬敬虔虔，做好自己的本分，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态。我该如何慢慢去培养一种思想，就是我們也需要去看顾社会上的其他人，虽然你的处境不是很有利，但如果我們不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如果我们只是着眼教会内部的事，而忽略了其他性别小众的朋友，这并不是我们的信仰。”

是在孤独中与边缘者与同道人前行

“跟我们合作比较多的是香港基督徒学会，很开心能有这些合作。”另外，辛淑雯来到基恩之家结识了很多不同范畴的人，包括同志运动活跃分子，还有一些同志友好机构。所以她不会因为不在主流教会之内而感觉孤单，反而有另一些体会：不只是她一个人看到事情应该这样做，有共鸣的人也不少。从她/他们身上学了，身边像多了许多师傅。……透过在生活社会的边缘者之中，被他们服侍、被他们牧养、上主亦借着他们来开拓我的信仰和人生界限。我指的他们，不单是基恩之家，其他团体、组织、或服务社会边缘群体的朋友，跑社会运动、公民责任的朋友，亦是我的信仰和神学对话的启蒙老师。”

有时候辛淑雯也会有一闪而过的孤单感。“较多是在牧养的层面上的，在这里牧养只有我一人，没有人会理解同志信徒的挣扎，没人能分享我牧养的理念。对于我，并不造成太大的困难。随着时间的验证，经验的累积，问题将自然解决，问题也将不成问题了。”但话说回来，孤独是辛淑雯的导师，这种感觉，既是平常，又是一种特别的礼物和恩赐，是她很好的朋友与导师，它既会在一些特别的时刻和她一起度过，也教她如何陪它一起度过，这个过程是人生中很精彩的火花。“我不是自我安慰，很多时候能领会到孤独本身是一位智能的开导者，开导我看到另一些事情，另一些角度。”

是在日常的生活点滴中体现

“我的图画是：和平工作是一条链，一个紧扣一个，这条链会越来越长和阔。世界上每一个女人，也包括其他参与和平工作的男人或女人，不同界别的人士，不同的人会慢慢加入，我很幸运成为这个组别中的一员。”辛淑雯这样形容和平工作。

辛淑雯认为和平工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范畴，不同的层面，可能连自己都不意识到，原来自己正做着和平工作。“譬如从起初我只是想到如何认真地响应在牧职上的呼唤，想不到我竟可以在教会的层面做着和平的工作，还影响着主流教会和社会。”她说和平不是一个口号。“我很开心能用自己的行动，去表达和平。我亦很开心能影响身边的人，让他们看到，在一个社会行动中，在高举和平的同时，是如何与基督信仰结连，以及和我们整全的个体结连。我想，和平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因此，对辛淑雯来说，和平不一定要做大的事。若能在每天的生活中，认真而敬虔地活现生命的本质，你就是一个和平使者。“例如在买卖的过程中，对方是你不认识的，但你如何在买卖货品中做到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再说，尊重与我们共生的大自然与人类，以它们为自己整全的部分这样的话，就已经是和平的开始。”

是和平

笑容是辛淑雯的标记。她说话不多，总是想得清清楚楚才细细的讲出来。她相信实践，认为语言和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她相信真理是体现在人群中，尤其是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如是，她走进了备受歧视与排挤的性小众群体，走进了备受信仰与性身份困扰的性小众信徒群体中去，与他们同行，一起画出公义、共融与和平的社会。

胡露茜 与自己和解



文:陈惠芳

其实人类社会里面，基本上就存在差异，不同背景的人，有着多元的身份。一个生态环境，经常是在一种多元、复杂，但却在互相依存的关系中生长。这一个状态本来就是多姿多彩的，异常丰富的；我们可以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互相整合，公平的生活。

教会里面出现的暴力不是赤裸裸，而是一种操控，把你边缘化。

Rose 一直秉持基督徒的身份，推动不同界别、不同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认识、互动、连接和合作；连接既是策略，也是目标。

妇女运动或妇女解放运动、就是人类合一，是整个生命的重新炼合。包括环保与生态的公义，不同宗教对话平等的公义与和解。

2005 年的春夏之交

每年的春夏之交，是香港大中小学学期结束的季节。胡露茜这天约了中大神学院女性主义神学课的学生到她家里，分享期终论文。中午的阳光颇为炽热，十来个人挤在胡露茜3层高的村屋的天台，兴致勃勃地介绍他们的论文和学习感受，享受荫蔽处的清凉、习习微风，还有心灵和思想的流动。全职是香港基督徒学会（下称学会）总干事的胡露茜，除了忙于参与各项社会事务外，这几年更在神学院兼教女性主义神学和社会牧职课。她喜欢交流和分享，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最自然而然的大伙儿聚会的主催人。

新世纪之初，胡露茜积极参与香港民间民主运动，成为其中的领导人。她参与推动的社会民主运动，成为香港人民力量的一座里程碑。

2005 年的春夏之交，胡露茜刚从民间人权阵线（下称民阵）的火线上退下来，又赶上了来自教会内部以至社会各阶层冲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下称特区政府）性倾向歧视立法咨询而来的一波接一波的反对浪潮。

在这次针对性倾向歧视立法的风波中，胡露茜就像过去 10 年 20 年以来，多次参与不同社会事件时一样：一头栽进去，义无反顾，把不同界别的人士与组织拉在一起，透过协商对话、了解之间的距离和限制、增加谅解、包容和接纳、进而建立互相合作与支持的平台；她在前线和后方，站好岗位，发挥协调和推动的力量。“一个人做不到什么，我经常都要有人在旁边。我这样不时找人，找朋友，帮这帮那。叫人开会，走在一起，比如民阵就是这样叫人走在一起的。”胡露茜说。2002 年的民阵如是，2005 年针对性倾向歧视立法也如是。

制造暴力的分隔

2005 年，胡露茜 54 岁，1951 年在香港出生。人们爱叫她 Rose 的胡露茜脸上常带微笑，说话温婉有礼，很少疾言厉色，在严肃紧张的会议桌上，总给人祥和安恬的感觉。她是一个耐心的聆听者，遇上同道，常会热情拥抱；有不同意见的，却绝不会回

避自己的观点，磊磊落落的放在桌面上，互相观照。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也勤快努力地把她的观点用文字记录下来，为历史作证。

出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香港一个小康家庭的 Rose，经历了半个世纪香港的起落：相对匮乏的年代、经济起飞与转型，社会、政治、民主和民生各方面迂回发展等不同阶段。胡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Rose 5 岁的时候，妈妈就拖着她上主日学。教会对于 50 年代从中国逃难到这南方一隅的草根阶层来说，是一个既慷慨、又有资源、而且宽容博爱的新家庭。妈妈很希望女儿得到最好的教育，像男孩子一样，将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Rose 被送到教会小学读书，好有更大机会考上教会的名校。因妈妈而跟教会结下的这个缘，萦系 Rose 一生。她的工作，她的学习，她对生命的追求，都是以她的基督信仰为轴心而铺开的。

“我是一个颇为起伏不定的人。可以很棒考第一，可以突然间好多科不合格。” Rose 中学没有被派到名校，这个经验叫她觉得人生不是一帆风顺，要面对不同的挑战。事实上，无论在教会内部以至在不同的社会事务的参与中，Rose 都会站在风浪的最前线，冲着挑战走去。而在主流教会的眼里，她一直是极少撮的异数。

2005 年，特区政府再次就性倾向歧视条例立法进行咨询。香港政府在 1995 年首次提出为性倾向歧视立法，当时反对声音不绝。10 年过去，社会上支持不同性倾向人士拥有平等权利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Rose 早于 1988 年就开始关心同性恋这个议题，从非刑事化到今天的反歧视法的讨论。传统教会认为同性恋是罪，是不道德的行为。Rose 对此有不同的诠释。2005 年 1 月，Rose 在她担任总干事的香港基督徒学会的机关刊物《思》中，清楚阐述当代同志神学的另类观点，质疑圣经的权威性解释和以异性恋为中心的偏见，再一次表明自己对同性恋的肯定。主流建制教会这次作出了猛烈的回击，更与社会上一些组织连成一线，大力反对立法。

“其实人类社会里面，基本上就存在差异，不同背景的人，有着多元的身份。一个生态环境，经常是在一种多元、复杂，但却互相依存的关系中生长。这一个状态本来就是多姿多彩的，异

常丰富的；我们可以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互相整合，公平的生活。”Rose认为世界是多元丰富的，在同性恋这个议题上，从理性上的支持到感性上的触动，更巩固了她这个想法。

“但从人类的经验来说，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或者在宗教的建制过程中，加上经济及文化等发展，让人与人之间的多元变成了分隔，变成一种冲突，甚至一种征服，互相残杀这样的暴力。”这阵子教会内部就性倾向歧视立法的回响，对经历不少风浪、坚韧的Rose来说是一个颇大的震撼。

“他们这个反击，在教会里面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恐惧。这种恐惧感的蔓延会使人极度不安和变得非理性。”这次，教会在不同的系统内推动广泛的表态行动，某些机构更开始进行（立场）审查。教会一些保守刊物针对性地响应Rose的观点，更组织了一次较大型的对话会，邀请Rose和一些持相反意见的人参加。“去之前，整个感觉是他们好像要围剿我一样，但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提醒自己不要活在这样的恐惧里面，我不要把对方妖魔化。所以我只以平常心去（参加）了。教会这种恐同（志）的气氛，让人们不能理性的平和的去思考论述。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这一种敌我分隔，制造了一种恐惧。我最后说即使反对（立法）的朋友，我看他们也感到很辛苦，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以为自己是上帝。我说我们是人，不是上帝，我们可不可以以平常心面对一些差异，以对方作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不要排除对方在社会里得到平等地看待的权利。”

“整个感觉很不舒服，离开的时候，我就马上哭了。我是为教会哭的。”Rose忆述当天的情景。“这个经验让我更加深刻的体会这个分隔，人与人的分隔原来可以到这样的状态。这本身已经是很暴力。教会里面出现的暴力不是赤裸裸，而是一种操控，把你边缘化。”

暴力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分隔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也同时是不同的暴力的根源。过去二三十年以来，Rose一直秉持基督徒的身份，推动不同界别、不同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认识、互动、连接和合作；连接既是策略，也是目标。她深信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消解暴力、冲破分隔、建立公平和谐与和平社会的愿景。

建立和平的结连

“一个和平的运动，需要几个层面，一是冲破分隔，二是尊重差异，然后迈向缔造公义、平等共融的公民社会。”打从1971年Rose投入社会工作开始，如何在社会上不同社群之间建立互相关怀、互相补足、互相团结、互相充权，尊重差异，而又包容、公平的生活关系，就已经是她生活和生命的主调和面向。

有人认为，香港很幸运，除了在二次大战日本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阵子的动乱以外，就再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流血暴力冲突事件。内部的民主民生事务，一直以比较温和、小规模和以不同议题为轴心的民间运动方式推进。英国殖民地政府后期推行的代议制政治制度，以及相对（中国大陆）开放的公民社会空间，或多或少让一些不满情绪得以宣泄，一些反抗力量在不知不觉中被消减、吸纳与化解。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整体包括整个公民社会在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大背景下，重新拟定自己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生态位置与身份。在经济、社会与民生方面，则是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个中，有大环境的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催化，也有源自特区政府各种剥夺性的现代化发展理念主导的政策措施而深即植的恶果：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特别是针对一些边缘群体，包括低收入人士、不同性倾向人士等。整体气氛一片抑郁，尽管民间社会仍然努力寻找突破和另类发展的可能性，但那保守的二元的以经济发展为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运作模式，依然霸道，一点都没有改变。暴力与分隔，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形式滋长肆虐。

Rose在接受神学训练之前是一位幼儿园校长，学校位于香港一个贫困旧区。“每天我看到的都是贫穷困苦与不公义的事情，我尝试将我的信仰付诸行动，因此积极参与教会的社区发展工作。”从这里，Rose开展她结连教会与社会以及社会中不同群体，在生活中打破因族群、因宗教、因性别、因国族的差异出现的分隔的社会行动之旅。

在20世纪80年代，Rose参与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抗争运动。90年代初，她正式全身投入香港社会运动，站在运动的前线，出任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下称女协）总干事。这个时

期，女协主要集中探讨妇女神学、关怀教会与社会中的边缘妇女：包括性小众、性工作者、单身妇女和离婚妇女等，以及妇女与政治等议题；此外，也积极参与推动其他妇女以及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无论在主流教会，以至整体妇女运动方面，女协都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她们勇于挑战教会中的性别主义，也积极参与推动各项妇女平权运动的工作。1994年，女协启动香港第一个同志基督徒项目，1995年女协与其他7个基督教与天主教组织成立联盟，发起“71连系”，在1997年回归前夕，致力提高香港人在政治发展方面的参与，并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团结网络。

2000年（到现在）Rose出任香港基督徒学会（学会）总干事，致力提供一些另类的课程，鼓励年轻人参与公民社会的建设。期间，建立宗教团体与民间组织的合作网络仍然是主要的策略。2001年“9·11”事件后，在全球反恐的阴影笼罩下，Rose协力联系各个不同宗教团体，促成之间的对话、建立理解、打破成见、达至合作与共融。2003年，Rose当上了民阵的召集人。2005年，因为性倾向歧视立法，Rose又投入串联各界一起合作争取的行动中去，推动不同社会运动的连接，冲破分隔，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去争取建立一个公义与公平的社会，达至和平，成为了Rose的标记。

一路一路走来，温厚的Rose总是给人无限信心，年月积累的经验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更叫人有一份稳实的感觉。学会坐落在九龙闹市一幢商业大厦内，小小的会议室经常是民间社会结连运动的活动和会议场，晚上不时灯火通明，挤满来自各方参加活动的有心人。Rose的办公室挨着会议室，房门阻隔不了访客的热情，在那一排排放满书本和文件的书架中间，Rose划出一个小小角落，作为她日常冥想的空间，在繁忙的工作中，她可以回到自己的灵性家园，寻找心灵的平安与宁谧。对Rose来说，分隔与和平最核心的部分，还得进入她那基督徒和女性这两个终极身份来解构。2005年这次性倾向歧视立法在教会内部所出现的阻障与困难，那正统与非正统的争辩，再一次引证了Rose对暴力、分隔与和平的另一个面向的思考。

冲破灵性的分隔

“讲到和平好像是很世界性的，但到了最后，我们每个人不同

的身份之间，如何界定，又或是这些身份背后不同的要求，对人类、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与所谓创造者之间的关系，都很息息相关。”人人有不同的身份，Rose 就形容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一个基督徒，一个社会活跃分子，一个人。和平就是要打破种种因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宗教信仰导致的人际关系中出现的矛盾、冲突与分隔，最终达至和解。Rose 的宗教身份，和她作为一个女性的身份之间所出现的冲突与矛盾，是她面对的最核心的议题。

在芸芸社会事务的参与中，Rose 选择从妇女、以致更切身的从基督徒妇女为起点开始讲述。而冲破分隔的灵性力量，则是来自她那“生活实践的”神学。

“作为一个女性，在建制、在那么父权形态的教会体系里面，其中要冲破的就是如何从一个失声的女性历史，到一个能发声的生命。我指的并非是一个人，而是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在教会里的身份，从失声到发声。我觉得这和如何去寻回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但同时是一个能发声的女性的基督徒身份的主体性很有关系。”女协的成立，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寻溯的空间。“我们有没有机会讲我们想讲的话，我们有没有机会演绎我们的信仰经验，用我们的角度、我们的眼界、我们的经历，去诠释我们所认识的上帝的福音的意思。这和一个很父权、建制化了的教会的规范的诠释是很不同的，而这个不同，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处理的分隔。”Rose 和她的姐妹们从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妇女，或不同宗教的妇女的抗争经验中得到这种冲破分隔的力量。“并不是说之前的基督徒妇女没有这份力量，但可能只是个别的人自己去冲破分隔。我想女协的象征意义是一群基督徒妇女走在一起的那份力量，声音虽小，但这是凝聚力量的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对我自己来说，我需要很多同行者。”她们一起发声，质疑教会诠释圣经的传统权威，重组和重塑女性失落的经验。

Rose 认为，在这个发声的过程中，如何“化诅咒为祝福”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女性有很多经验，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群体的，在传统历史中、在人类历史或宗教历史中多被视作一种羞耻、一种不光彩的事。我觉得女协早期，或一直以来的挣扎，就是如何去表达女性的经验不是诅咒、不是不光彩、不是羞耻，而是光荣。

光荣不是指我们很了不起，而是一种祝福。”女协在1995年出版《女人的解咒》一书，里面有离婚妇女、流产妇女、女同性恋者、挣扎要堕胎的女士、弱智儿子的母亲、被虐妇女、性工作者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的重述，就是一次再受辱的过程。“这些故事要冲破什么？我们称其为出埃及，在埃及处境中的妇女都是处于奴役中，埃及在圣经中象征被奴役，要出埃及就是要得到释放、解放。当时这本书的力量，就是要摆脱不光彩和羞耻，我们要站出来，这是我们的福音。”Rose是故事的主人翁之一，她离过婚。她在某学术机构工作期间，曾被性侵犯，但在提出控诉和争取公义的过程中，她却遭到否定。这个经验被压抑了好几年，有些时候在梦中惊醒，Rose总会不能自己的哭出来。“教会基本上没有一个空间让这些妇女好自在好自由地抒发自己，并去找寻帮助。我想女协一方面在行动上支持争取妇女权益，但其实最重要是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妇女走在一起，肯定自己，也看到自己的挣扎不是个别的、孤独的，而是有其他人一齐同行，感到姐妹团结的力量。”

创造一个发声的空间，集结力量，无惧地提出被忽略被压制被践踏的经验和想法，是一个跟自己和解的关键一步。“女性要争取的平等，指的不只是地位、身份的平等，而且是经历不会被否定、被扭曲。这是很重要的。这个（重述痛苦经验的）过程释放的力量很大，给了我们一个豁出去的力量。在教会里，重要的是你是否是一个听话的女人、道德的女人、没有污点的女人。当你有过污点，更将之张扬，那你就有问题。但当你走过了这段路，回头再看，已豁出去了，你还要怕什么？”Rose认为，跳出恐惧，就能够达至真正的释放。“我看到一些勇敢的妇女，都有这种力量。我觉得当你豁出去，你就会明白与被边缘者同行的意思。我们不再害怕被标签为坏女人、有问题女人或不道德的女人。我不是说道德不重要，我想讲的道德是另一种道德。”

例如对被踏在社会底层的性工作者，Rose很早就提出跟教会不一样的道德观点。在传统基督宗教里，性工作犯罪是不道德的行为，违背了一夫一妻异性恋婚姻制度的伦理规范。但Rose认为，在性工作这个议题上，罪是以父权、以跨国资本主义、以军国主义、以性旅游、以法律等种种制度的形式出现。不道德的是

这些制度，性工作者只是被这些制度压制的“被罪者”。不道德的是把性工作者定性为罪人，把她们的声音强暴地消灭掉的行为。Rose 的道德，或者是她的道德勇气和力量，来自她对主流父权霸权二元对立压迫性的建制的挑战，也来自她所说的深植于生活实践，对弱势对边缘群体的关爱与同情心。“我好感觉到他们的痛。这可能是天生的。但另外我又觉得可能是家里一些经验帮了我。家里有亲人患了精神病和智力迟缓。从他们身上，我学会怎样以谦卑的心去面对生命与生活，我体会到他们在香港生活所面对的压迫和歧视可以有多深，可以是多么无助。”

生活实践的灵性与道德力量，跨越阶级、性别、国族和宗教信仰。在“9·11”之后，我觉得整个妇女运动的起点，包括基督徒妇女运动的起点，都是一个合一运动精神的基础。妇女运动或妇女解放运动、就是人类合一，是整个生命的重新炼合。包括环保与生态的公义，不同宗教对话平等的公义。所以我自己近年参与不同宗教、全球化、人类和平运动等增加了，超越香港的，也不只是妇女运动的。我觉得妇女运动的基础就是和这些运动的连接，而非分隔。”从妇女、从基督信仰、从香港出发，Rose 为冲破分隔、为连接工作、为和平与公义迈开一个更整全的跨度。

扎根生活的结连

947

每趟有大事发生，Rose 都会毫不回避地站在最前线，好像从来没有疲累的感觉。眼下，跟她一起经历十多年斗争的活跃分子，不少都有身陷困局的感觉。尽管早年以前 50 万人上街游行，挑起了社会上一些骚动，出现了一些响应；但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还是有限，各个组织仍然是在各自小小的角落里，胼手胝足的艰苦经营，挥不掉那份郁闷，那种寸步维艰的感觉。

“香港的公民社会还是很分散，资源有限，真的还有好多困难。我觉得香港人始终是很自我自利的，只有到关键时刻，与自己有关，才会去理会。香港现在一个困局是公民社会运动与民主运动混淆。回归前后，我们一直活在一个不民主的特别行政区这个阴影下。民主运动长此以来都不能很成功的跟那个大的公民社会里面的反压迫、反专制、反独裁、反分隔的运动结连，或者某程度看到彼此的关联，又或者当结连到时，就被那很狭窄的民主运

动‘吃掉’了。”

“但我觉得公民社会、个别大多数的小团体或年轻的一代，其实开放性是提高了。反而在有权力的建制里面，是越来越保守。我觉得现在的公民社会是有点不一样：香港的公民社会中不同的民间团体其实可以团结一起去燃放一些好美丽的火花。我觉得香港人在某些时刻是可以承受这样美丽的彩虹行动，包括民间团体的合作，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另一方面，我看到例如在女协与学会中、在神学院、在民主参与和教学中，愿意站出勇敢地发声的人是有的。虽然压迫的势力越来越强，但我觉得先知的声音不是完全没有的。我觉得可能在最恶劣的情况下，这些声音会越茁壮。”总是乐观积极，能够在平凡中看到色彩看到希望的 Rose 说。“我希望这次全球化^①的影响，可以慢慢在新一代中建立那种跨界的串联。我觉得新一代好重要。”

“未来我们要去冲破的方向，就是要壮大公民社会运动本身，及回到日常生活抗争的议题中去，成为我们大家能互相充权、互相团结、互相并肩作战的一种公民运动，是属于所有人的，属于少数族裔的、属于妇女的、属于年长人的、属于少数性众的、属于街坊的、属于贫穷人的、属于年轻人的、属于儿童的。”

“我觉得公民社会在今日香港要走向一个更深层的、人类之间团结的运动。现在如民阵等阵营，是很外在的，而且是很行动的，很被政治形势主导的，还未能去到内化的一种连接的运动。我们应该深入考虑用一种和平、非暴力抗争的面向，去探讨公民社会运动。这可能要回到比较宗教性的属灵的问题上去。到最后，就是我们大家如何认识人与人是一种什么关系，人与整体人类生命共同体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去。”

2005 年的春夏以后

此刻，在 2005 年的春夏间，或是在更早的时候，在新一代传承的思考中，在一贯繁忙的公民社会结连的推动参与和神学实践中，Rose 静静地做了一个决定，要作另一次生命的跨越。“我们

^① 2005 年 12 月，世界贸易组织在香港召开部长级会议。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在社会上越来越热烈。

这一代妇女运动与民主运动的人都可能慢慢变成历史。当以前的轨迹走到某一个地步，当它越来越窄的时候，一个停顿、一个破折号、一个沉默……然后重新开始，可能是需要出现的。”

Rose 过去参与社会运动的形式在别人眼里，一直是很前线的，过去十几年不断有新的领域刺激她，但这样形式的参与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我想有一个转变。我想退下来，做一个学生，重新学习另外一些我不认识的东西、认识我没有接触过的人、做一些我没有做过的事情，例如离开香港回中国大陆或到亚洲其他地区、例如农耕。”

她认为这是跟自己和解的过程。“自己里面有一种向往和理想，我不能因为外在的使命理想而压抑自己另外一部分的需要。此外，我想未来世界与社会的和解的起点，可能是人类要学习谦卑地从新学习，认识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生态，生态环境与人的关系。我一直生活在城市，对我来说是足够了。人类学习谦虚的与生态环境共存，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存，可能比我们追求科技的不断卓越、比追求经济的蓬勃发展，更加重要。”Rose 也想重新认识中国大陆，好谦虚的去生活去体验去学习：“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都是很抽象的一个母体，如果我跟它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那其实也是一种分隔的状态。”

2005 年的春夏以后，分隔、和解、串联、跨越与和平，在 54 岁以后的 Rose 身上又会多了一种两种多种色彩与姿态。

第四部分

文化光谱

III 彩绘丹青

周广仁 断指琴艺入百家



文：薛翠

周广仁总结：“教学是另一种形式的学习，它逼着你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它使你不断提高和充实自己。教学的对象不同，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学生来因材施教，因此教学是一门学不完的艺术。所谓‘教学相长’，真是一点也不错。”

周广仁用钢琴抒发情感，表达憎爱，诉说真、善、美的故事，并由此演绎着自己完整而极致的人生追求。

周广仁的琴艺动荡血脉而终和正心，让人主动学习聆听与耐心等待。

周广仁一辈子与钢琴莫失莫忘，不离不弃。

琴缘起

周广仁，1928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汉诺威，5岁随家人回中国。周广仁从小就立志当钢琴家。10岁开始到私立上海音专

学习钢琴，后来考入国立上海音专学习音乐，跟随着丁善德、杨嘉仁、李翠贞、梅·帕契、A. 马库斯、R. 柯纳、贝拉·贝拉伊、魏顿堡等中外名师学习，奠下扎实的基础。

周广仁为了钢琴义无反顾。父亲认为靠音乐是养不活自己的，反对她以音乐作为职业。周广仁却一意孤行，后来跟家里闹翻，父亲不给她交学费。16岁的周广仁倔强地说：我自己管自己。“那时候，请外籍钢琴教师每个月要花费20美元。我是依靠教比自己更小的孩子来支付这笔费用的。”她带了20个学生，其中有的比她的年纪还大。那时，不论是严冬酷暑，刮风下雨，她都骑着自行车满上海跑，到学生家去上课，给自己挣学费。在那艰苦的日子里，周广仁学习十分起劲：“那是我进步很快的一段时间。”

当时，最让周广仁苦恼的，是没有一架属于自己的钢琴。可有一天琴缘忽地牵动起来：“有一天，祖父突然打来电话，叫我到他一个德国朋友家里。”忆起旧事，周广仁仍是一脸兴奋，“那个女主人让我弹首曲子给她听听。于是，我弹了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和肖邦的《叙事曲》。女主人非常喜欢。她说，你弹得这么好，我把钢琴送给你吧。”原来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祖父的朋友全家要返回德国。女主人平日最珍惜的就是这架钢琴。她带不走，又舍不得扔掉，于是想送给一位有天赋，又真正喜欢钢琴的人。“这是一架非常好的德国产的三角架钢琴，叫做‘布绿特那’。我一生的钢琴事业，与这架钢琴是分不开的。”当周广仁调到中央歌舞团工作时，这架钢琴又跟随她从上海来到北京。由于长年用琴，琴键的象牙将片掉了，50年中就翻修了3次。“我要像传家宝一样把它传下去。”直到今天，周广仁仍然像宝贝一样护着这架钢琴。

20世纪50年代，“布绿特那”一路保佑周广仁登上国际音乐舞台。1951年3月，周广仁作为中国音乐家代表团成员参加捷克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之后，又赴德国东柏林参加第3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并荣获钢琴比赛三等奖，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奖项。1951年至1952年，周广仁参加中国青年文工团赴东欧各国巡回演出。1953年，周广仁参加第4届世界和平友谊联欢节演出，访问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家。

1956年，周广仁参加第一届国际舒曼钢琴比赛，获第八名。1952年至1959年，周广仁成为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钢琴独奏家。1955年10月至1957年，周广仁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受教于苏联专家塔图良教授，并开始担任钢琴教学工作，后任教研室主任、钢琴系副主任、主任。

断指琴声

尽管钢琴带来磨难，可是周广仁并没有因此垮下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周广仁来到农村，掏猪圈、挖厕所、种庄稼，弹钢琴的双手不再修长柔韧。1968年，丈夫陈子信（原中央乐团办乐队队长）含冤自杀身亡。

1982年，5月14日，周广仁搬动钢琴的时候，为了保护钢琴，右手3根手指全被砸烂。做了接指的手术后，周广仁忍着剧痛不停练习。后来周广仁想出减轻痛楚的办法：戴上指尖处垫上棉花的手套练琴。就这样，周广仁慢慢开始练琴。她恢复弹奏的曲子，是肖邦的摇篮曲，虽然只有7分钟的长度，却凝聚了她半年的心血。



翌年5月16日，周广仁的双手重新在琴键之间跳跃、飞扬。她在台上演奏肖邦的摇篮曲后，向观众讲述手指被压断，强忍疼痛，刻苦练习的故事，并说：是李延妮大夫给了我第二次艺术生命！1995年，周广仁接到了英国的邀请：到伦敦演出莫扎特的

《A大调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讲求手指力度的曲子，对断指再接的周广仁来说，是很大的挑战。自从出事后，她再也没有弹过与乐队一起合作的大型协奏曲。但她还是答应了。钢琴系同事李其芳老师积极为她找乐队，并请来“爱乐女乐团”和指挥郑小璜与她合作，在北京音乐厅出国前预演一场。届时，周广仁如约去英国伦敦演奏两场，非常成功。

元代名医朱震亨说：“乐者，亦为药也”。周广仁在琴声中重拾自信，展开艺术生涯新一页。

教学相长

现年79岁的周广仁是中央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仍然辛勤教学，工作量是每周20节课。从1983年，周广仁陆续创办了两所儿童钢琴学校——“星海青少年钢琴学校”和“乐友钢琴学校”。学校虽然是业余的，却受到欢迎。在校学生最多的时候达到100多人。“最初，以为自己在手指手术后不能弹钢琴了，所以，我就希望能帮助更多的孩子学钢琴。”

周广仁在《钢琴艺术》发表《和青年教师的谈话》（1998.2.25），与钢琴教师共同探讨教学相长的重要性。周广仁回忆教学的经验：“我热爱教学，16岁就开始教学生，那时我在上海跟杨嘉仁先生学琴。杨先生留学美国密西歌大学音乐教育系。他说，‘你应该教学生，通过教学你能学到很多东西’。他指导我怎样教小孩子识谱、弹音阶、琶音、讲乐理、表现音乐等。他有一套先进的钢琴教学法，我虽然只跟他学了6个月，但他那套教学体系，我用了一辈子。”

周广仁谨记老师几个基本观点，并且觉得一生受用无穷：

(1) 在教和学两方面，教师起主导作用。教师必须在课堂上把一切给学生讲清楚，甚至预先把乐曲的难点指出来并告诉学生具体的练习方法，使学生回家后知道怎么练；

(2) 留新作业时，就告诉学生正确的指法。不要等学生练了一个星期后，再改指法。把一堂新课变成改错课。每堂课应是建设性的，不是返工活；

(3) 教学要有步骤，每堂课突出一两个重点，因为学生不可能一下子做到所有要求；

(4) 教师不要责怪学生，首先检查自己是否给学生讲清楚了。

周广仁总结：“教学是另一种形式的学习，它逼着你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它使你不断提高和充实自己。教学的对象不同，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学生来因材施教，因此教学是一门学不完的艺术。所谓‘教学相长’，真是一点也不错。”她以自己为例说明：“我年轻时教过一位比我大的学生。那时，我自己的弹奏方法还不够好，有些紧，而那个学生比我还要紧。我千方百计地设法解决她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不知不觉地也松下来了。”

在教学中，周广仁不但注重学生技术，也非常注重对学生心理的辅导。“我不仅要了解学生的心态，还要改变他们不良的心态，让不够大胆的孩子勇于表现自己。”周广仁笑着说，“自己原来还是个很好的心理大夫啊。”周广仁觉得好老师不但是好的心理大夫，而且“善于等待”：“我有过一位德国老师，他问我：‘你知道什么样的老师最好吗？告诉你，善于等待的老师最好。’我琢磨了很多年，才悟出这个道理。‘等待’当然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积极地引导和帮助学生达到目标。‘等待’的意思是容许学生有一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应该耐心而不要急躁。”

周广仁把精力全放在学生身上，不知不觉冷落了自己的子女。周广仁对此感到遗憾。“后来，儿女陆续做了教师，他们开始慢慢理解我。”周广仁欣慰地说，“儿子回国前在美国一所学校教书。离开美国时，学生们送了他一本相册，写着‘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这让我儿子特别感动。”

周广仁被誉为“中国钢琴教育的灵魂”。她培养了许多专业钢琴人才，其中包括逢勃、盛原、刘宁、杨鸣、王笑寒等中国知名青年钢琴家，著名钢琴教育家但昭义也出自周广仁门下。此外，周广仁致力于钢琴音乐的普及和传播。周广仁把普及钢琴教育的重点放到少年儿童身上。她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到普通学校举办钢琴讲座，进行钢琴启蒙和音乐启蒙教育，举办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钢琴知识讲座，在北京音乐厅进行“打开音乐之门”普及音乐会。

周广仁也非常看重中老年群体钢琴和音乐普及的事业，支持

北京青年宫老年班的活动，为中老年人学习钢琴举办讲座，并且帮助选择合适的教材。她支持许多全国规模与地方的少年儿童钢琴比赛，为规范成年人钢琴教育和提高学习质量，都起到非常好作用。还有，周广仁在中央电视台讲“音乐知多少”节目16课，在卫星电视台讲“钢琴演奏基础训练”20课，自1996年起她出任《钢琴艺术》杂志主编，1994年她创办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并连续三届担任评委主席。

1980年以来，周广仁远赴世界各地讲学和演出，介绍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并多次应邀担任国际钢琴比赛评委。每次到国外进行钢琴表演，她总是半场演奏外国曲目，半场演奏中国曲目。“我想让外国人也多了解一些咱们中国的优秀作品！”

和正心也

与周广仁多年的好友白淑湘，在和平妇女提名表格上这样写道：“周广仁用钢琴抒发情感，表达憎爱，诉说真、善、美的事，并由此演绎着自己完整而极致的人生追求。她的琴声包容着上下天地，吞吐着自然古今，也沟通着海内、海外。更由于周广仁是一个中国人的缘故，所以她的音乐尤其能表现那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神圣境界，体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由理想，她身上的那种坦荡自然，深沉饱满，刚柔相济的气质精神，更给予后辈以悠远的影响。”

史学家司马迁说音乐：“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周广仁的琴艺动荡血脉而终和正心，让人主动学习聆听与耐心等待。

资料来源：

(1) 《指断琴悠扬》，央视国际，2003年8月19日。

(2) 《钢琴演奏家周广仁：生命因你而动听》，央视国际，2006年7月24日。

(3) 周鲁，《用指尖弹奏人生——钢琴演奏家周广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1月14日。

郑小瑛
和者日众



文：薛翠

交响乐是阳春白雪，但是应该和者日众。

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别人说我们的乐队好，指挥好，要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音乐，还是要通过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风度的音乐作品。

郑小瑛说：“急社会之所需，不知疲倦地尽自己之所能，为人们奉献美好的音乐与和平的人生。”

战国时代，楚襄王问宋玉：“你的言行举止是否有问题？为什么民众对你有意见呢？”宋玉辩驳：“啊，是这样的。请大王宽容一下，先听我说故事。有客人在都城郢地高歌，开始唱的歌曲《下里》、《巴人》，跟着和唱的有数千人，接着客人唱《阳阿》、《薤露》，跟着和唱的也有数百人，可是轮到唱《阳春》、《白雪》，跟着和唱的只有数十人，最后，客人唱的歌曲难度极高，跟着和唱的寥寥无几。歌曲那么高深，和唱者自然少。这就像圣人的品

行超然独立，凡夫俗子当然不明白啊。”^①

宋玉把音乐分类为高雅/通俗，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划清界限，那道界限维系精英阶级的品位与社会地位，也巩固原有的层级关系。同属精英的郑小瑛却和宋玉立场不同，她一生的抱负是“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郑小瑛，1929年9月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永定龙寨村。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合唱女指挥，中国的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教授，“爱乐女乐团”的音乐总监，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现任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

郑小瑛尽心尽力向民众教授阳春白雪的精髓：激发大家的音乐想象力。“我们从没有见过交响乐团的演奏者穿得五彩缤纷，也没见过她们戴得珠光宝气。而我们的音乐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使人身心愉悦，这正是现代人所需要的。我们的音乐不分国界不受语言的隔阂。听到《斗牛士进行曲》，你不会感到悲伤痛苦；听到《梁祝》，即便你不了解它们所诉述的故事，也能感受到不可言传的美妙和舒展，即便你不了解它们所诉述的故事。这就是严肃音乐的魅力所在。不错，交响乐是阳春白雪，但是我希望‘和者日众’。”

干革命去也

郑小瑛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早年毕业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体育高等师范班，父亲是1916年考上第二批庚子赔款的公费留美学生。抗战爆发后，他们举家迁到重庆。1947年，郑小瑛以优异成绩考入协和医学院，到金陵女大生物系读医预科。正值解放战争最激烈的时期，郑小瑛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在校园里组织民歌社，教唱苏联歌曲，还和同学们上街游行，一次，她还扛着横幅标语走在队伍前面。“不是我的思想最革命，而是因为我身材高大，有力气。”

郑小瑛的回忆夹杂着对母亲之爱恨：“南京临近解放时，妈妈从上海赶来，要求我回家去。妈妈早年接受新派教育，原是个思

^① 译自战国·楚·宋玉《对楚王问》。

想开放、敢作敢为的女性，可做了母亲后，爱女心切的她认为时局动荡，女孩子跟随在父母身边比较安全。而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留在南京，迎接解放，所以我得知妈妈即将到校找我的消息，一大早就躲到玄武湖去了。”

“躲到天黑了，我再没地方可去，也不敢乱跑，不得不回校。可我不敢回自己的宿舍，而是躲进了一个同学的房间。她一把将我拉进屋，连声训斥我鲁莽之举，她说：‘你躲起来了，你母亲却在校园里到处大喊小瑛小瑛的，影响多不好……’”正说着呢，她一把拉开衣橱的门，让我钻了进去。可是来不及啦，妈妈已追来站在了屋中央，‘别再躲了，我在镜子里早看到你了！’”

郑小瑛的母亲是个好强的人，在她的头脑里从来都没有女子不如男的想法，她常常对郑小瑛说：“如果我有你父亲一样的学识，我就可以当总统”，“但是我不喜欢她，因为她对人苛刻，对我也管理的非常严，而且非常武断。所以最后我叛逆了她。”

郑小瑛为了干革命，就像易卜生笔下不愿受摆布的“娜拉”逃离家庭，远走他方。“妈妈不让我留在学校，我就从家里逃出来，可是让妈妈抓了回去。”尽管身子被关起来，但却笼不住她向往革命的心。她说服了妹妹帮助她逃跑，“我给爸爸妈妈留了封信放在钢琴凳子下，让妹妹两个钟头以后才去发现它。”小“娜拉”终于逃走，奔向解放区。



郑小瑛剖析与母亲之间的复杂感情：“后来我对母亲的感情就比较淡薄，很少想念她。我是她剖腹产生的，那个年代剖腹产是很少的，因此我也知道母亲非常爱我，关心我，给我全面的教育，但是我被她一些过分的约束惹恼了，那时就看不见这些。当她去世以后，我常常想念她，她在世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向她表述我对她的爱，这是我的一个遗憾。”

巧拾指挥棒

1948年底，郑小瑛到了解放区，被分配到开封中原大学文工团。大军渡江南下时，文工团接管了艺专，有了钢琴。久违钢琴的郑小瑛随手弹奏了一曲，令众人十分惊讶。“当时我没敢多说，学生时代，我就能弹奏肖邦乃至贝多芬了。”

郑小瑛成为指挥家，可说是机缘巧合。每次大家学唱群众歌曲，逢有附点、切分音符，总是唱不准，郑小瑛听得别扭，有一天忍不住指点了几句，大家高兴地说：“你还挺棒的，来，给大伙打打拍子吧！”就这样，开始了她的指挥生涯。

1952年底，郑小瑛被送进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读书。1955年，中央歌舞团合唱队要去参加波兰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文化部邀请了苏联合唱指挥专家杜马舍夫前来指导。他不仅指导合唱队，还为中国开办了第一个合唱指挥班。学院领导推荐郑小瑛去参加苏联专家的面试。没想到，杜马舍夫一眼就相中了郑小瑛。郑小瑛自豪地说：“那个时候班里一共差不多20来个学生，我是唯一的女生，所以我就成为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合唱指挥。”

1960年郑小瑛又被中央音乐学院选送留学苏联国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前苏联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是享誉世界的音乐艺术学府，曾经培养新中国最早的著名指挥家，像李德伦、韩中杰等。教授们十分欣赏郑小瑛，虽然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她的导师安诺索夫教授为他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剧院举行了她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资深歌剧指挥家拜因又特意为她安排了一场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的公演。一般留学生是只能在音乐学院的歌剧馆里进行指挥实习，而没有资格在歌剧院里指挥大型歌剧的公演的，但郑小瑛却指挥了

意大利歌剧《托斯卡》，成为中国指挥家登上西方歌剧院指挥台的第一人。

郑小瑛留学苏联3年，始终牢记老师的教诲：“在你指挥的音乐会里，一定要有自己民族的东西”，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里，她总是把中华民族优秀的乐曲融入自己指挥的管弦乐队和交响乐队曲目之中，许多中国作曲家谱写的民族乐曲，都是郑小瑛首先指挥公演的。她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能推向国际的只有《梁祝》、《二泉映月》等为数不多的具有民族风情的乐章。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别人说我们的乐队好，指挥好，要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音乐，还是要通过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风度的音乐作品。”

郑小瑛在舞台上成功地挥动指挥棒，划破了以男性为代表的精英音乐文化的格局。“‘指挥’这块领地，我们女性是在20世纪初才闯进去的。”1985年，郑小瑛去美国讲学，拜访过一位80多岁的前辈女指挥，她问郑小瑛：“你们国家歧视女指挥吗？”当郑小瑛告诉她自己是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时，她说：“你很幸运，在美国，人们对女指挥是有很深偏见的。”后来老人家去世，当地一篇悼文写道：“如果她是一位男性，她应当属于世界一流，她是一个没有被认识的天才！”又有一次，郑小瑛在日本观摩一场交响乐演奏的现场拍摄。除却那位女指挥，演奏者都礼服笔挺，再一看，才发现原来镜头根本不拍摄女指挥。郑小瑛感慨地说：“比起那些异国女同行，可以说，全世界，我的社会地位最高。”

郑小瑛亲切的笑容总是透着豪气，那一身黑长裙乃是自信十足的象征。“指挥是一个音乐集体表演中的司令员，有一个庄重的形象这很重要。一般来讲，西方有一些女指挥比较追求男性化，也许是对自己性别不够自信，他们喜欢穿男士的燕尾服、长裤，但我没有这种负担，我的演出服就是黑色长裙。”

曲高和“众”

郑小瑛说：“急社会之所需，不知疲倦地尽自己之所能，为人们奉献美好的音乐与和平的人生。”

郑小瑛被誉为音乐社会活动家，她采取多种形式向民众介绍

音乐知识。1978年，中央音乐学院复排《茶花女》时，很多观众听不懂，于是，郑小瑛就在每场歌剧开演前，在观众休息厅给大家进行20分钟歌剧音乐知识讲座，她把歌剧音乐主题抄写在一大张纸上，还带上播放主题音乐的小录音机，深入浅出地给观众宣讲欣赏歌剧音乐的知识。这种做法好评如潮，被新闻媒体称为“郑小瑛模式”。她时刻不忘社会责任，教学之余全心投入普及高雅艺术的工作。

1989年末，郑小瑛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女音乐家发起并组建了由志愿者组成的“爱乐女室内乐团”，5年里她们不计报酬地把300多台中外经典室内乐送到了60多所学校中去，辛勤播撒优美健康的音乐种子，把被遗忘的经典音乐重新展示给青年人。1995年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郑小瑛又利用机会把“爱乐女”扩充成有女性管乐手参与的交响乐团，以打消我国女孩子吹奏管乐器的思想顾虑，也是向世界各族妇女展示我中华女性的现代文明风采。她仔细地从中学生的女乐手中挑选优秀者，进行强化培训，最后，在世界妇女大会上，以108位女性乐手的规模登场，使来自世界各地的3万名妇女代表感到十分惊讶：“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规模这么大，又那么有气势的女子交响乐团，这不仅仅是中国妇女的骄傲，也是世界妇女的骄傲。”

1978年以来，郑小瑛经常担任国家重要演出活动的指挥，并指挥演出了《护花神》、《第一百个新娘》、《茶花女》、《卡门》、《蝴蝶夫人》、《魔笛》等中外歌剧；曾与中央乐团、上海和中国广播等10余个交响乐团合作，演出歌剧和音乐会近千场。吴灵芬、陈佐隍、高伟春、胡咏言、王进、吕嘉、俞峰、彭加鹏、张铮等多名曾受业于她的青年指挥，现已在国内外乐坛上担纲。郑小瑛1981年获文化部直属文艺团体评比优秀指挥一等奖，1979年、1983年、1995年四次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和全国先进女职工称号，1985年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1989年、1991年、1994年多次受到国家表彰，1997年获“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1999年获“全国老有所为贡献奖”和俄中友谊勋章。

1998年，69岁的郑小瑛本着“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的生活坐标，她作了大胆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厦门，应厦

厦门市政府邀请组建“民办公助”性质的全职“厦门爱乐乐团”，此乃目前为止全国唯一的民办乐团。为了培养提高厦门市市民的音乐素养，乐团每周推出一套“周末交响音乐会”，每年举行10余场针对青少年学生的“音谱工程”和在海边山下，面对大众的“山海交响”免费音乐会。

郑小瑛说：“厦门爱乐交响乐团每天排练5小时，每个礼拜推出一套交响经典新节目，队伍从一开始的30人到现在80多人，多是全国各地的音乐院校的优秀毕业生，是一个真正的移民乐团，为厦门引进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才，现在我们已经可以3、4天就拿一部交响乐了；乐团成立8年来已积累了160多套音乐会节目，演出600余场了。‘辛勤耕耘，精益求精’是我们的口号，‘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是我们的目标”。2001年由郑小瑛策划推动、刘漫作曲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荣获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唯一金奖，郑小瑛旋即在30余市及日本、香港、美国、金门、台湾成功的指挥了这首乐坛杰作，2002年郑小瑛率乐团成功地完成了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大赛的协奏任务。2006年又担任了第四届世界合唱比赛的艺术总监。她先后获得厦门市政府授予的“杰出贡献奖”，厦门市文化局的“特殊贡献奖”、中国金唱片“指挥特别奖”、2003年感动厦门十大人物之一等荣誉。为增进各族人民的了解，2007年她又将率团远访欧洲。郑小瑛踌躇满志，为把厦门建成“音乐之岛”尽献力量。

此外，郑小瑛通过音乐为海峡两岸的和平作出了贡献。她曾经多次到访台湾作文化交流，自2003年金门学子就往来金厦接受乐团音乐家的指导，2004年郑小瑛也曾经“小三通”管道到金门，指导当地暑期青少年管弦乐夏令营。2005年春，又携《土楼回响》赴金门，秋又赴台湾进行了极为成功的演出。郑小瑛满怀深情说：“希望音乐交流能沟通两岸同胞的亲情，促进和平、统一。”

抵御风雨的劲草

一位小学老师在郑小瑛的纪念册上写了这句训言：“温室里的花朵永远不能成长为抵御风雨的劲草！”郑小瑛谨记在心头。

郑小瑛和唯一的女儿郑苏像那抵御风雨的劲草坚韧、独立、

执著。有一次，郑小瑛带着两岁的女儿去天安门看焰火。晚了挤不上公共汽车，母亲哄着女儿走一会儿，跑一会儿，走走跑跑，终于走了7、8里路才回到家里。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郑小瑛还鼓励女儿参加最后一期下乡锻炼，因为她认为“艰苦的生活可以锻炼出平和的心态和面对一切困难的勇气”：“这样的苦都吃了，将来还怕什么样的困难呢？”

1980年，郑苏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理论系，后来又赴意大利、美国留学，并先后获得了纽约大学音乐学硕士、威斯康大学音乐博士和副教授的职务；并担任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专家小组成员和美国民族音乐学协会理事等职务。

郑小瑛忙于事业，没多少时间陪女儿，母女之间缺少亲情的自然交流。她说：“第一次得到女儿真情爆发，是8年前我被证实患上直肠癌的时候，当女儿听到我的电话后，连声说‘不可能！不可能！’当时，我心里感受到的是巨大的幸福，这是我第一次得到来自女儿的亲情爆发。后来她还给我发过一次E-mail，她说：妈妈你一定要认真的保重身体，要知道你对我是多么重要。”

郑苏说自己深受母亲的影响：“回想起来虽然我从小跟妈妈一起度过的时间挺有限的，但是我妈妈非常看重做人原则，我相信还是给我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说我妈妈说一个女人要靠自己的事业自立，事业要摆在第一位。虽然在我的生活中，并没有做到一直把事业摆到第一位，甚至有时候还反其道而行之，不过我想今天我能成为唯一在美国获得终身教授地位的从内地出来的民族音乐学家，这些原则毕竟是很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我要谢谢妈妈。”

结语

《阳春》和《白雪》相传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齐国的刘涓子所作。据《神奇秘谱》解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凜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郑小瑛穷一生引领平民百姓聆听“和风淡荡”、“雪竹琳琅”，悠然熏陶下，那道界线渐渐淡化。

资料来源：

- (1) 杜蕾《艺术人生：指挥家郑小瑛》，中央三套，2005年9

月8日。

(2) 《一位英俊的女指挥郑小瑛》，央视国际，2005年9月8日。

(3) 《郑小瑛的抗癌故事》，央视国际，2005年5月27日。

(4) 高琨，《交响乐的传播者指挥界的女大师——访著名指挥家郑小瑛》，2004年4月10日。

(5) 《中国著名女指挥家郑小瑛和她的厦门爱乐乐团》，三峡·宜昌网，2005年4月10日。



宁瀛 用影像重筑记忆

文：李阳 张慧瑜

宁瀛与拍摄对象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关联……“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我周围其他人的影子。我们都是历尽艰辛要追求幸福的人……我们在充满了希望的旅途中，我们都是‘在路上’的人们。

无论拍摄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都不应该是拍摄“别人”的故事，与自己无关，反而要有“跟自己休戚与共的因素驱使着”，以达到与拍摄对象产生共鸣。

创作的过程是认识自己的过程，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震撼心灵的诗一般的时刻。

宁瀛，生于北京，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执导了“北京三部曲”：《找乐》（1992年）、《民警故事》（1995年）和《夏日暖洋洋》（2000年），从不同角度呈现了这个巨变中的城市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2005年拍摄了《无穷动》，展现了与导演同代的几位女性对成长的记忆和对女性生命

的特殊体认，这些影片在国内外电影节上多次展映并获奖，另外，宁瀛还拍摄了《希望之旅》、《让我们自己说》、《进城打工》等多部关注社会底层的纪录片，其中《希望之旅》荣获2002年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可以说，宁瀛以纪实风格的影像方式，再现了转型时期普通中国人如退休老头、民警、出租司机等的“真实”生活，思考都市人在这个日益变化的时代中所遭遇的情感与创痛。

上大学之前一直学提琴的宁瀛，1978年考入了中国唯一的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在录音系学习，当时，年轻的她并没有把电影当回事，经常在宿舍楼里练琴。3年后，宁瀛考取公费奖学金赴意大利留学，在罗马电影试验中心深造。由于留学的时候没有带提琴，就经常跑去电影院看电影，几年的留学生活几乎天天在电影院中度过，观看了大量世界电影史上的名片，尤其是德·西卡、威斯康帝、费里尼、戈达尔、特吕弗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时期的作品，这为她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底色。从1985年开始跟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托鲁奇作助理拍摄《末代皇帝》，任该片副导演，这次经历使宁瀛学会了如何拍电影：从剧本调研到选演员一直到拍摄完成。1987年她学成回国，被分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1990年，宁瀛独立执导商业片《有人偏偏爱上我》，获得了市场上的成功，但这并不是她想要拍摄的电影。在宁瀛看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在骤变过程中我们刚刚经历的现实就迅速变成了记忆”，因此，用影像来重筑这些记忆，就成为宁瀛拍摄电影的情感动力，而“使用记录风格来表现真实，用电影写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历史”也成为宁瀛选择的电影风格。

“我们是自己建造的监狱的囚徒”——

对于宁瀛来说，最为切近而可以触摸的真实便是她所置身的北京以及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1992年，宁瀛改编了陈建功的小说《找乐》，使用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相结合的方式拍摄了同名电影。影片讲述了京剧院看大门的老韩头退休后无所事事和一帮京剧票友组织老年京剧活动站的故事，最后活动站因拆迁而解散，以一种喜剧而温情的基调探讨了变革肇始处所遇到的问题：一个业已被旧有价值观念塑造成型的个体如何展开新的生活，或

许“我们既是监狱的建造者，我们又是自己监狱的囚徒”。该片获日本东京电影节金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青年导演尤斯卡大奖、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金球奖等。

而在3年后的《民警故事》中，由对《找乐》中祖辈生活的关注转移到了父辈身上。影片讲述了一个派出所的民警发现了一只疯狗，为了居民的安全，民警们将疯狗打死，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狂犬瘟疫，民警们必须把自己管辖范围内所有家畜统一处理掉，因此民警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在一次争执中，主角片警动手打了一个养狗的群众而受到处罚，这是一个为老百姓打疯狗而最后自己变成疯狗一样的人的故事。在这个充满黑色幽默的寓言式故事里，宁瀛全部使用了非职业演员、大量的长镜头等营造纪实风格的元素。影片延续了《找乐》中处理制度与人的关系的主题，只是《找乐》中解散后的老韩头对活动站依然存有某种怀念，而《民警故事》中则是普通人在体制或制度中的异化，这部影片被法国《电影手册》认为带有“卡夫卡式的荒诞、谐趣”。该片获得了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和国际影评人奖、意大利都灵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银球奖、中国大学生电影界最佳故事片奖等。



经过《找乐》和《民警故事》的创作，宁瀛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美学观念。“纪实风格”、“新现实主义”成为人们指认宁瀛电影的方式。对于宁瀛来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不是把现实加以分解，然后以某种世界观和道德观去评判现实，而是导演通过意识“过滤”现实。在这种创作中，导演“拒绝对人物及其动作进行政治的、道德的、心理的、逻辑的、社会的，或人们所能想到的任何其他方面进行解析”。因此，新现实主义带给宁瀛的并非新的表现手段，而是对于“真实”的全新理解：拒绝将真实作为理性随意拆解的素材，而将真实重新归于活生生的、令人感动的、一掠而过的平常故事，归于那些我们所置身又可能为我们所忽略的过程，所以，宁瀛的影片更趋于一种主观的真实，是导演眼中的真实。在每次创作剧本之前，她都要和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姐姐宁岱做大量的社会调查，从生活中捕捉未来电影的细节。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城市的不断的拆迁与重建，北京在短短几年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宁瀛看来，熟悉的家园正在消失，旧有的记忆被逐渐涂抹，那些称北京是“家”的人们穿梭在消费主义的国际化都市中，“曾经熟悉的一切正在变得陌生”，正是这种“陌生感”使宁瀛选择年轻的出租车司机作为《夏日暖洋洋》的主角。影片使用大量的运动镜头和并不突兀的跳切镜头，以在漫游中猎艳的出租车司机德子的视点组合起“一处被破碎与挫败所充满的都市景观”。如果说《找乐》中的老人为了共同钟爱的京剧每天步行来到活动站，《民警故事》中的民警从第一个镜头便骑上了自行车，而《夏日暖洋洋》中的德子每天开着出租车在城市中飞驰，这种速度的变化所带来的城市规模的飞速增长和漫游城市的震惊体验。德子的生活从离婚开始，到成功地与东北打工妹、教授之女建立情感联系，到被教授之女抛弃，德子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如同反打出租车的后视镜所拍摄的急速后退的风景，德子先后遭到黑社会毒打、乡下父子白搭车、打工女友自杀等一系列厄运，正如一位影评人所论述，这正好吻合德子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急速下降的阶级身份。

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休戚与共

《找乐》、《民警故事》、《夏日暖洋洋》分别讲述了变革中的祖辈、父辈和年轻一代的故事，呈现了整个90年代属于他们的或

许业已消失的情感历程。正如宁瀛坦言“我曾经熟悉的一切正在变得陌生，我爱过的人正在离我远去，我们经历的是一次失恋的过程”，于是宁瀛把这三部电影称为“我爱北京三部曲”，用以救赎现代都市人流逝的记忆和家园。这三部影片在法国著名电影杂志《电影手册》的主编夏尔·戴松看来，是一种“喜剧和笑声逐渐逝去，有序化的故事逐渐被无序化的状态所取代，都市在宁瀛的心中逐渐由家园变为一个怪物”的呈现。

拍完“我爱北京三部曲”，宁瀛为公共机构创作了几部纪录片，包括1996年为意大利都灵市政府举办欧共体首届会议拍摄的宣传短片《都灵》、2001年和2003年分别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拍摄的系列短片《让我们自己说》、《进城打工》，2002年为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拍摄的宣传片《长城脚下的公社》，其中拍摄于2001年的纪录长片《希望之旅》获得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正如法国《世界报》的评论：“独立导演宁瀛在纪录片领域显示出了与执导故事片时毫不逊色的才华”。《希望之旅》展现的是火车上的四川农民经过三天两夜到新疆收割棉花的旅程。如果说任何一部纪录片必然携带着拍摄者的态度，《希望之旅》并没有掩饰这种态度，反而故意暴露导演/摄影机对现实的介入。影片除了运用长镜头来突现其记录特征外，还不断插入一般很少在纪录片中出现的拍摄者的问话，比如提出“你认为什么是幸福？”、“生活中什么最重要”等问题，这些问题表达了宁瀛更想关注他们的情感生活，而不仅仅呈现一种生存状态，法国真实电影节评审团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影片令人立即投入到人物故事和生机勃勃的生活中去，其内容远远超出影片长度所展现的希望之旅”。在这个意义上，宁瀛与拍摄对象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关联，她在该片的导演阐述中写道“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我周围其他人的影子。我们都是历尽艰辛要追求幸福的人……我们在充满了希望的旅途中，我们都是‘在路上’的人们”。

宁瀛始终坚持无论拍摄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都不应该是拍摄“别人”的故事，与自己无关，反而要有“跟自己休戚与共的因素驱使着”，以达到与拍摄对象产生共鸣。拍摄于2005年的《无穷动》也是这种共鸣的产物。为了反思消费主义建构出的平面化的青春美少女，宁瀛决心拍一部讲述女性的电影，片名“无

穷动”借用古典音乐术语表达一种女性不断涌动着的欲望。这是4个成功女人的情感故事，时尚杂志出版商妞妞发现丈夫有外遇突然离家出走，于是请3个最值得怀疑的女友到家里过春节，在这个除夕之夜的四合院中，妞妞开始调查她们哪个偷了自己的丈夫。随着女友们的故事逐渐展开，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自我。她们因为同一个男人，互相成为朋友又互相背叛。在她们成功自信的外表下，是那些过去年代遗留下来的不可弥补的情感歉疚，是那些内心深处无穷动的欲望体验。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生命的寓言，一个曾经被旧有之父所雕刻的女性主体在全新的生活中应该如何以及怎样自我诠释，影片结尾给出了果断而响亮的回答：几个女人走在一条新建的大路上，一边是尚未拆除的四合院，一边是即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她们带着既往被压抑的记忆和对未来的困惑，生活在继续。

后记

十几年的创作历程，导演宁瀛始终用自己的影像来关照中国社会巨变过程中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用朴实的镜头语言书写她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和认识，正如她所说“创作的过程是认识自己的过程，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震撼心灵的诗一般的时刻”。



董秀玉
文化品牌的捍卫者

文：许王丽

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界，一直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两种功能的巨大混乱中拉锯。启发知性的出版物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而商业利益亦是企业发展必备的动力。出版者必须在不断抗拒一元化及平庸化的压力中，紧跟时代与社会，寻求持续的突破和发展。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他的书，他的事业发展，就是出版人的追求和理念的写照。

“我一生的愿望就是出好书、出漂亮书，一辈子为优秀文化的传承努力。”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总编辑的职务退下来的董秀玉，对自己的工作做了这样的总结。

一位在商业大潮中孤独而倔犟地坚守着文化品格的女性。

“我没有做什么大事，我只是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也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性别差异在我们的工作中并不重要。”谈到自己所做的贡献时，董秀玉淡定而谦逊。然而，她在学术文化出

版领域中坚守文化品格的足迹却镌刻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为这份淡定和谦逊的人生态度做了一个别致的注脚。

董秀玉从事出版和编辑工作 50 余年，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在她所喜欢的图书出版事业当中，她从基层工作开始，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直至担任三联书店香港和北京的总经理兼总编辑的职务。出一本好书容易，坚持一辈子出好书很难，然而，董秀玉在她的出版事业中，却从一而终地捍卫着文化品牌，倾注着她全部的文化关怀。

文化品牌：生活·读书·新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简称三联书店）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出版社。它的前身是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先辈邹韬奋先生等人在上海创立的三家书店，即成立于 1932 年的生活书店、1935 年的新知书店和 1936 年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有人说，一部三联的历史就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在金钱与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三联在中国不仅意味着一家出版社，而且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公共的知识精神。董秀玉继承了三联书店的优良传统，十分珍惜这个老字号的品牌，在学术文化出版领域，一向坚守品质，领风气之先，其积极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深受推崇，在出版界享负盛名。

1986 年的新三联创业至今，记载着董秀玉每个奋斗的脚步，执著而真诚。她说过：我不喜欢坐享其成，我喜欢做开创性工作。这个人称“开荒牛”的女性以其坚毅的个性，数次在三联危机时力挽狂澜，扭亏为盈。对于她而言，每次创业的终点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1956 年 7 月至 1979 年初，董秀玉在人民出版社做过校对、出版部副主任、编辑。这个来自上海的女性用她的踏实和勤恳书写着出版生涯的每一笔，也为接下来和三联书店结下不解之缘埋下了伏笔。

1979 年，她开始参与创办《读书》杂志，任编辑部副主任。在《读书》杂志创办之初，负责具体工作的只有两个人。董秀玉一个人承担起了文史哲经等全部的组稿和采访任务，为杂志的发

展做了很多重要的开创性工作。

1986年1月，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人称新三联，董秀玉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30万元，五六间房，十几个人，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董秀玉和大家一起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创业历程。短短两年，出版了《西方学术文库》、《文化生活译丛》、《研究者丛书》、《新知文库》等丛书，开始得红红火火，在当时极具影响。她编的《巴金随想录》还得了国家图书奖。

1987年，董秀玉被聘赴香港三联，面对着10年的亏损和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董秀玉也曾犹豫过，然而倔强和喜欢接受挑战的性格不允许她退缩，于是她毅然选择了留下，并着手开始市场和公司内部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到问题在于经营管理模式的落后，她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虽也因此遭到质疑，但她顶住了压力，组织了新老干部和员工的认真研讨和投入，推动了改革方案，也制订了发展战略，同时也加深了对她的认同感。在她的带领下，香港三联在她正式上任的第一年就开始营利，利润年年翻番。原来士气低落的员工都变得意气风发。谈起这个，董秀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仿佛还在品味着当时的喜悦。她说：“其实也不是钱赚多了就好，只是每个人都有荣誉感，如果老是亏本大家也会失去信心。而赚钱则意味着再发展，每个人都希望有发展空间。”对员工心理的把握可见一斑。

生活似乎在考验着董秀玉迎接挑战的热情与魄力。1993年，怀着对三联特殊的感情，她放弃了去一个外贸机构的“肥差”，回到了北京三联，面临着又一次的生存危机。当时摆在面前的第一个课题是卖书号救穷还是在发展中求突破。她选择了“清高”，坚持着对三联品牌的维护。因为她知道，当时的北京三联，地无一分，房无一间，账无现金，剩下的就只有一块牌子了，如果连这牌子都掰碎卖了，她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坚信，只要有这块牌子，依靠着这个品牌，大家共同努力奋斗，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度过的。就是在这样的信念下，坐在地下室里勾画出的理想蓝图记录了董秀玉的第三次创业历程。

出好书让她赚钱

“我反对卖书号不仅仅是道德要求，更主要是，我认定卖书号

是无法解决三联的发展问题的。”作为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和总编辑，董秀玉最早认识到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又极善于运用无形资产。她又说，“我不仅要出好书，而且认定好书一定会赚钱。”

作为一个经营者，她深知发展战略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她如数家珍似的讲述着三联“一主两翼”的战略思想，以出版社为主体，努力发展期刊群和连锁书店。她认为三联学术文化的出版，永远是根本，必须放在主体的、中心的地位。而在香港创业的经验告诉她，要做好出版，通道很重要。因此要迅速扩张自己在主渠道的销售点，做好服务工作；同时又试着发展自己的连锁书店，开拓与读者直接接触的窗口，同时保障学术文化图书的基本销量。而期刊，不但有发行利润还有更大的广告利润，是营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增长点。

董秀玉兴奋地说起杂志的架构，规划中的3种杂志和其店名一样，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的需要，高端的学术杂志《读书》，中间层次的为《新知》，大众层次的是《生活》。“三个层次的读者和作者都有了，我就不相信出版社还能做不好。”董秀玉的嘴角露出自信的微笑。她强调她要办的是完全三联性格的刊物，内容和编辑一定要自己把关。当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周刊，选择办周刊就需要很大的魄力，但她说，“三联就是从生活周刊起家的，作为后人，一定要把她恢复，且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办得更好。”这是她的一个大心愿。但1994年，她接任的第二年，三联的经济刚在起步，立即要办这种需大投入的刊物完全没有能力，但她向社委会承诺一定不花社里一分钱，出了问题她自己一人承担。就那样干开了。创办的过程困难重重，经济的、政治的、团队的、经验的、合作上的等等，光是投资者和主编就有四五任，然而她总是告诉自己，坚持，坚持，再坚持一下就好了。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生活周刊开始营利，并持续增长，极大地扩大了三联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就这样，三联在她手上办起了连锁店，虽都不大，但开了书业连锁店的先河。也是在她手上，没有投资一分钱，但却在坚持三联特色，把握编辑权的前提下办成了生活周刊，而且真是成了中国周刊中影响力最大的第一大刊。当然，这其中的波折与艰辛或许只有身处其中的董秀玉本人才体会得最深刻。

董秀玉是一个很有长远眼光的经营者。在三联的发展中，办刊、办店、投资，都有一个成长期，好几年账面上不好看。但只要对三联的长期发展有利，她就会做。盖大楼，批准4层，她却要打10层地基，为以后方便长高。办《生活》刚营利，她就决定正式转周刊，又接着亏损，但她已看到一年后的大营利，不怕自己账面暂时不好看。光盘生产线投入，借了1,000万，她承担下来，在她任内消化，但以后的利益却是长期的。她说，企业发展一定要长期着眼，最怕的是短期效益。道理都懂，但能做到的人却不多，董秀玉是确实做到了的。



在创业和盈利的过程中，坚持文化品牌是一个持久战。在董秀玉的经营理念中，读者的利益和需要是第一位的。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她选择的都是品牌和品位，是文化尊严。在1994年《新闻出版报》的一篇文章中，她说：“人以品为重。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结晶的图书，品和格则更至关重要。这在当今出版界，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认识问题，面对市场，它已演变为一场

实实在在的人格搏斗和实力较量。市场诱惑是巨大的。抵不住诱惑，一味的屈就，被剥夺的只能是文化的尊严。市场又是冷酷的，你不积极面对，不了解和掌握它，没有巨大的实力带领它，它一定对你翻脸无情。作为良心事业的出版工作，我们的选择只能是‘留住尊严，增强实力’，这也是三联书店的基本方针。”

社里经济最困难时，有员工拿来一本气功书稿，作者付给三联两万美金。以当时三联的经济状况，两万美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但是当董秀玉看完这本书稿的内容，讲述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所谓冥想术，作者往那一坐，告诉你一万年 before 世界怎么样，一万年 after 怎么样等。出版这样的书籍，如何负起文化的责任，如何向读者交代？董秀玉抵住了诱惑，在金钱面前选择了文化的尊严。

两条腿走路：学术与文化普及并重

学术书是三联的根本。三联出专业的书，学术的书，也出文化普及的书，如金庸的书，黄仁宇的书，但是董秀玉强调，做大众的书更要做一流的，不能将通俗做得流俗。金庸作品集是由董秀玉第一个正式引进版权、成套推出的。董秀玉说当时可以选择的著名武侠小说还有不少，不过实在不敢多选，金庸小说的文学性和历史感最强，它能真正进入文学殿堂，就只敢选这一套。它应该既符合国内读者的口味，也符合三联书店大众读物的定位。董秀玉很会选书，尤其是选书的理念十分清晰。她说，光是好书还不行，还太多，出不过来，还必须牢记自己的出版特色、品位和选题结构，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书，这样精选，逐年积累，才能一以贯之，凸显自身的品牌。

1989年，当时还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董秀玉，第一个将蔡志忠古籍经典漫画引进大陆，她说，刚一看到就觉得非常有新意，蔡志忠用漫画的形式诠释了中国古代经典名著，这是一件极有文化意义的学术普及工作；而且用漫画的形式更利于吸引青少年，甚至一般成人。对当时处于非常低迷状态的国内漫画来说，也找到了一种表现的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则是大大解放了漫画的生产力。两者结合，董秀玉觉得这将会带来经济和文化的双重价值。事实上也证明董秀玉的判断是对的。董秀玉说那时候港台的漫画有很多种，不仅仅是蔡志忠，但像他把文化品位和轻松阅

读结合起来的却绝对少有。

问起畅销书，董秀玉笑说她实在并不善于做畅销书。那为什么黄仁宇、二十讲、蔡志忠、金庸，尤其是《我们仨》等书都那样风靡一时，就是学术著作也比别的社销得多？董秀玉说，她选书的着眼点首先是好书、有创见和新意的书，还必须符合三联文化特色的书，然后把它们认真做好，很少到处去找畅销书。她认为既是好书，就应该有畅销的潜质：“因此这些书畅销是应该的，销得不理想却是我们工作的问题了。关键就在于我们的编辑和营销工作。”当然，畅销的量也跟定位有关，有的100万是畅销，有的5万10万也是畅销，每种不同的书都做足最重要。遗憾的是太多的书没做足，太匆忙太浮躁，浪费了太多的资源。

抓好原创图书是董秀玉更为关注的工作，近年来出版的二十讲系列、乡土中国、考古人手记以及三联哈佛、经济学家手札、大众经济学丛书等都是她着力推出的。她认为出版作为创意产业，最为重要的还是原创书，这才可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积累和版权积累。

市场已高度分层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亿读者的大国来说，每一层次的读者哪怕是知识精英，其绝对人数也相当庞大。一个出版社如果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拥有自己众多的忠实读者和市场份额，就需要有独特的出版风格和文化品牌。风格和品牌不是文化产品，并非一夜之间可以获得，它们是一种文化传统或文化精神，需要一代乃至几代出版人的努力方能形成。

读书人相知相惜

但是，在如今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不少出版社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效益，纷纷放弃了原来的出版风格和文化品牌。也曾有人问董秀玉，在这样的物质利益当前的环境下坚持文化品位是否觉得孤独。董秀玉说，还好，出版界对这些已有越来越多的共识。当然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但是社会责任感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不允许她背弃文化良知，而文化人之间相知相惜的情感和对文化品位的认同和鼓励更是她不懈工作的精神动力。她讲了吕叔湘参加“读书服务日”和拜访施蛰存的两个故事。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艰苦环境和对知识的执著追求，刺激和鼓励着董秀玉要为知识分

子做出一个最好、属于他们自己的书店。她说她太想给读书人创设一点交流与学习的环境。在建设三联图书大楼时，有人建议用自动电梯，而董秀玉怕太过商业化而选择了环形楼梯，这以后，在这楼梯上满满坐着的读书人便成了京城一道令人心动的文化风景线。董秀玉在她的整个出版生涯中都渗透着这样浓浓的文化关怀。

董秀玉长期在图书行业默默工作，但到处都留下她工作的足迹及弥足珍贵的良好口碑。她一贯的敬业和尊重知识的精神，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和大家的信任，都和她有着亲密的书谊。

而且，不仅知识分子和她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她的三联情结中，一直贯穿还有对同事和员工的真情。她说过，平等待人是《读书》的一条家规，可以说，也是她的人生守则。她和在三联一起并肩作战的同事和员工有着血浓于水的感情。回忆起离开香港三联时，全体员工都来送行的情景，董秀玉充满了深情，她一直强调，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是什么也做不好的。在艰难的创业过程中有无数的人在做着努力和牺牲。北京三联创业时，连办公楼都没有，60多人在5个地方上班，通知开会3天都很难将人叫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三联员工以大局为重，艰苦创业，董秀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答应业务一好马上解决员工的住房问题，而员工也让董秀玉倍加感动，他们选择了在地段比较便宜的天通苑购买宿舍楼，也因此基本上全部解决了员工的宿舍问题。

投之以李，报之以桃，董秀玉也用自己的平等态度和努力工作回报着员工的支持与尊重。董秀玉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优良的民主作风。三联员工与她无话不谈，可以直接到她办公室提意见，没有森严的等级观念，工作气氛融洽而自由。她经常询问员工：你们开心吗？时时关注着员工的感受。因为她知道不开心的单位很难出好书。在她的影响和领导下，三联员工有着极强的认同感，焕发出高度的工作热情。

编辑情结

董秀玉谈起自己在任时面对的压力，历历在目。当时她整夜整夜地失眠，积劳成疾，当检查得知自己患了癌症，11天后必须做手术时，她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而是紧赶慢赶地安排着工作

上的事情。住院那天，医生打电话提醒她，她才想起来。在连续开了两个会、交代完工作后她才回家拿东西，告诉母亲要出差十来天，母亲要洗澡，她帮母亲洗完赶去医院。住了院办完手续她才告诉丈夫说自己住院。她不想让任何人为自己担心。手术后，度过最基本的休养期，她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一边化疗，一边每天上班，仍然最晚离开办公室。10年来，唯一不变的是她的车和最后一个离社下班的习惯。可以说，她把全副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到了三联书店的发展上。

董秀玉有着浓厚的三联情结，她做过编辑，又当了二十几年的总编辑，但她最想做的还是编辑。两者之间有共通的地方，但终究还是有相当的差别。总编辑要定发展战略，规划选题定位、方向和结构，每年新系列的开发策划等，虽然还有审大纲、审样稿及终审，定开本、定价、封面等一些较具体的工作，但终究不像编辑那样从发现、捉摸每一个选题开始，可以细细地跟作者讨论，一字一句地看稿子查资料，可以跟美编一起研究最符合内容的装帧形式，更要了解市场做出统盘的营销方案，出书后还可以从容地读书评、听反馈，对比自己的审稿过程，总结得失，实在是一个最佳的学习和享受知识的过程。因此董秀玉一直在说，编辑实在是一个太好的职业，永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完全是创意的行业，一辈子都做不腻。做一个好编辑并不容易，董秀玉说关键是编辑要不断地学习，了解并敏感于时代的变化。她是一个很敏感又很善于学习的人，而且似乎更重要的，她还是一个很挑剔的人，熟悉她的人都说，她的选题永远都是想摘皇冠上的那颗最亮的明珠。

当然，现已退休的董秀玉觉得自己的工作也有一些遗憾，比如《新知》没有办成；任内本来想把通道进行公司化改造，也没有来得及；还有虽然编辑队伍很好但编辑的专业知识覆盖面还不够宽……但回顾整个编辑生涯，她更多的是一种无悔和自豪。退休后的她觉得压力少了，轻松多了，然而她还是放不下她所热爱的编辑事业。

一个自信而执著的女性，留给我们一个淡定而从容的背影。

66岁了，花甲之年，她还在努力……还在进步……

余范英
肩负『公与义』



文：倪炎元

“唯有透过不断讨论的民主程序，才能激发并结合更多力量”。

……我们强调分享，一方面呼吁人们重视专业伦理、弱势权益、资源的落差分配、家庭与社会失序，另一方面则要努力丰富艺术人文的素养，造就自我完成的生涯规划。

“真正的战争，只存在于保守与开明之间，但这却是文明与进步的必然过程”。

“那和平是什么？和平就是理性、成熟，不采取激烈的手段以求达到目的”。

因为抱着这样的信念，让余范英从担任工商时报发行人时即勇于突破、向传统挑战，不断开创新局，为当时的台湾专业财经媒体找到新出路；转任时报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后，更全心投入环保运动、民主运动，以及族群和解工作。

拥有多元的国际视野与知识背景的余范英，努力致力于财经媒体专业的经营上，她同时也付出相当心力，投注在两岸交流、社会公正、关怀河川生态的议题上。

坚持，让她的脚步，从未稍歇。

高瞻远瞩，综观全局

出身文人世家的余范英，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并取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理学和企管硕士；直到今日，每天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华尔街日报》以及《经济学人》，了解日本、美国金融和经济走向，以及国际财经趋势，站在世界的高度俯瞰台湾。

1988年，中时报系创办人余纪忠在工商时报创刊10周年的庆祝酒会上，宣布成立“时报文教基金会”，针对社会大众关心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文化等层面的公共政策进行研讨，有效沟通国人观念、凝聚国人共识，为台湾今后诸多重大政策确立方向，而基金会的执行长就是余范英。

时报文教基金会的成立，成为余范英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人生又有另番风景，也显现出她人文与社会关怀的一面。

作为一位财经报导的主持人，余范英一直是高瞻远瞩，综观全局，她的实践方法就是讲求“一步一个脚印”，不躁进也不盲从，为工商时报开出灿烂新局，她在两岸关系解冻初始即预见两岸经贸互动的前景，也很早即以报纸为交流与对话的平台，主办一系列的研讨会与论坛，让两岸的学界与财经界得以直接的交换意见。从“大陆经济改革与台湾经济发展研讨会”、“两岸智慧财产权管理与科技发展交流研讨会”、“台湾当前经济情势研讨会”到“创新前瞻科技领袖论坛”等，先后曾对两岸经贸发展的障碍与机会，提出无数洞察与建言，也替国家经贸政策的制定，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促进两岸精英相互了解上更是重要。

在余纪忠先生过世3周年时，余范英遵循老先生在生命结束前，未完成的心愿和想法，以两岸经贸关系为主题擘画“余纪忠先生纪念研讨会”，参与者都是台海两岸经贸界一时之选，如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励宏以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

定等。在研讨会论文集结集出版的书页中，余范英表达了她对推动两岸互动的看法：“……今天，两岸关系依然严峻、两岸竞合日趋复杂，然台湾对大陆经贸依存的逐年提高，如何借由宏观调控、加速制度结构的因应与产业分工的互动，是双方都亟须要思考的课题；又如何扩大合作双赢的机会，减少摩擦扞抗的疑虑，更有待两岸学界与智库之间晤面与对话，增加彼此的了解与信赖……”这些话正是余范英本人在实践促使两岸彼此对话上所依循的基调。

借由时报文教基金会的平台，余范英启动了她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与实践。有鉴于台湾在经济起飞后，开始透支社会成本之际，环境污染日渐恶化，政府却迟迟没有有效的具体对策，而这个问题意识也让余范英找到她的施力点。她的关怀基本上分两轨进行，一个环节是围绕着公共政策与社会公正，另一个环节则是河川与生态保育。借由“公共政策研讨会”、“社会重建”系列研讨会的举办，余范英陆续提出关怀社会、拯救环境计划。



河川生态的关怀

河川保育部分，最基本的理念在于开展人和土地、和大自然的对话；除针对淡水河流域进行调查工作，并邀集环保学者专家参与成立“河川保护小组”，透过专业的调查，推动整治和保护台湾河川，促使政府和民间积极有效维护我们所居住的土地。

此后更是每年针对河川各种问题，诸如因工商业发展造成水质劣化、生态体系遭破坏，连带导致近海污染，渔业和养殖业生产力受到冲击等，设定不同主题举办河川研讨会、听证会和座谈会，整合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意见，并提出具体建言，余范英的基本想法是：“唯有透过不断讨论的民主程序，才能激发并结合更多力量”。

集水区和河川两岸长久以来的不当开发利用，历经近年频繁的地震、台风天灾后，令台湾人顿时尝到苦果，动辄暴发的土石流和淹水，都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台湾在步入新世纪时，所面临最严苛的考验。

余范英和在她号召下集结的精英智囊，一方面引进国外经验和政府对话，检讨水利结构和政策的错误，着手国土规划和复育，一方面走入小区进行扎根工作，从倡导“河川与小区”，将保护河川观念带入小区，到前往遭九二一大地震摧毁，百废待举的和兴村，陪伴村民给予他们新生和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在探讨人与人之间和平的可能时，余范英更将在台湾推动水资源保护的经验和政策带到中国大陆，邀集两岸和国际学者，以及从事实务工作者多次举办研讨会，通过她的努力，让当时正致力长江南水北调的大陆，开始注重种植树木和水土保持；从推动文化、教育到水资源保护等，增进海峡两岸彼此了解，因为她深信，唯有了解才能发挥力量，携手创造双赢局面。

山水河川，在这17年来，一直是余范英心中最深的牵挂，但随着台湾政党体制的更换，政经情况愈趋混乱，也促使她思考：当从土地回归到人和人之间时，台湾的公与义在哪里？台湾的未来又在哪里？在1990年于焉而有“迈向公与义社会”座谈会的诞生，从“全民政府为台湾打造公与义的社会永续发展”，一直谈到“知识经济时代的教改与资源分配”，参与的专家学者无不倾囊相授，希冀为台湾建构一个美丽新世界。

对“公与义”的执持

时报文教基金会一直致力“公与义”，以发挥民间正道力量，但台湾在总统大选中，因政党刻意操控，以致族群严重撕裂，不

但蓝^①与绿^②严重对立，连亲朋好友都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反目成仇；“战争”，就在你、我和他之间、在心和心之间，随时可能爆发，令余范英决定采取行动。

她和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执行长简锡《土皆》合作，仿效族群冲突最激烈的以巴地区，也就是世人所熟知的“世仇”——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所采用的开放空间概念，促成双方对话。

让外省人、本省人坐在一起，从相互认识了解到，让因“先来后到”而分裂的族群，从对立到握手，在族群议题上，也为受到政治激化成二元对抗的台湾，开放多元的可能性；并将所有过程拍摄成《来自民间的声音》纪录片，让这份感动不断传递出去，也传递“和平的珍贵”讯息。

余范英和参与的一群年轻学者的努力，犹如一记警钟，提醒世人族群和解的关键，原来就在心门，只要打开门，手就有可能紧紧握在一起，即使是对立场迥异的人，如能多一份同情心和互谅，也许能找到彼此共同的愿景。

余范英对实践公与义的关怀，从下面这段她本人在2004年出版《面对公与义》一书时所讲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一个适当的脚注：“……我们强调宏观，因为台湾正处于全球化、在地化的互补和矛盾中，也正处于中国大陆快速崛起，带来一连串经济、文化、政治的冲击环境中；我们强调包容，期盼以沟通、超越，来面临历史记忆与族群意识，也期盼提升法治观念、价值伦理，以重建民主社会的素养，更期盼理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界限，实践公民社会的精神；我们强调分享，一方面呼吁人们重视专业伦理、弱势权益、资源的落差分配、家庭与社会失序，另一方面则要努力丰富艺术人文的素养，造就自我完成的生涯规划。”同时，时报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面对公与义”座谈会，也从“思考未来”一路谈到“台湾前途与两岸未来”，并从根本检讨台湾的租税以及金融体制改革，下一步更要谈“全球化下的发展与分配”。

不论从关注河川山水，到追求公与义，余范英所踏出的每一

① 蓝，指“泛蓝联盟”或“蓝营”，非正式组织，包括中国国民党、新国民党与新党及其支持者，至2007年为止，代表中华民国的大多数在野党。

② 绿，指“泛绿联盟”，也称“泛绿阵营”、“泛绿军”，非正式组织，主要包括民主进步党、台湾团结联盟、新国家。

步，其实都有一贯脉络可循，也就是“放眼全球、在地扎根”，如此地孜孜不倦，从不稍有懈怠或放慢脚步，其实和她的内心深处潜藏着紧张和不安有关；这样的紧张和不安，来自于她对国际情势和亚洲动态的掌握，从此看出台湾所面临的危机。

台湾，在国际价值变迁下，处境愈来愈困难是毋庸置疑的，不断消耗历届世代累积的成本和储蓄，“全球化下的发展与分配”，要谈的就是从全球化浪潮下的危机，台湾到底该如何应对？从不管是被视为政治实体或组织，到底占有何种地位谈起，其次是，当台湾社会因经济倾斜，已趋向两极化的 M 型社会时，该有何种制度机制与政策论述，第三则进一步落实到公共政策的主张。

后记

无论是对“发展与分配正义”的检讨，检讨社会资源配置、检讨教育资源和人力培养，以及公民社会扮演的角色，每一个主题，都在突显余范英所扮演“敲钟人”的角色，高瞻远瞩，发挥媒体人应有的功能，自始至终，她都是个时时将“公与义”扛在肩膀上、放在心里面的媒体人，发出引领时代巨轮滚动的“先声”。

从工商时报发行人到时报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兼执行长，余范英和她所带领的团队，不但从旧时代超脱，更创造新时代的价值观；对新旧之间、保守和开明之间引发的战争，她下了个批注，“台湾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没有一步是百分之百错误，当然，也没有一步是完全对的”。

“台湾因为地方小，就像个实验场，凡事都可以试试看，但若要以今日去论断昨日，就要以当时的时空来分辨是非对错，甚至从世界趋势下加以检视”，余范英如此说。

余范英不变的使命感是：结合岛上的内聚力，理性面对问题、讨论问题，乃至解决问题，不论是人和人，抑或是人和大自然间，甚至是相隔超过 50 年的此岸到彼岸，宏观、包容、分享成为她引领时代最有利的凭借。

在她身上，让“和平”有了更不同的面貌。

陈道馥 她和她的女朋友们



文：薛夏原

面对中国最底层劳动妇女琐屑生活中的默默劳作，面对她们的艰难困苦，你能无动于衷吗，这不是新闻的真实，这是对生活的冷漠。描述生活的艰辛，正是为了激发人们改变落后生活的热情。

新闻的生命在于求真，社会的和谐在于求善。

作为记者，她坚守事在人为为真善之事、境由心造无我之境的心态，努力去做生活细节的渲染，以使生活跌宕起伏。

跟所有新中国的同龄人一样，陈道馥也经历了共和国 50 年的风风雨雨。伴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的经济复兴、60、70 年代的文化骚动、80 年代的政治平靖，陈道馥度过了清纯的中学时代，完成了在中国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插队和工作和精神洗礼，继而接受了恢复高考以后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地理专业的教育。

陈道馥上祖系颍川堂湖南陈氏望族。祖母徐绪芹，系民国总

统徐世昌之侄女，因聪慧过人，深得徐世昌钟爱，视其己出并收为女儿。徐世昌之母亲，则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刘大魁之女。刘大魁所谓“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之义法，代代相传，嬗变为“做人之道，神为主，气辅之”之族训。开蒙伊始，陈道馥便接受了厚重之家学。

浓厚的家学渊源积淀而成的人文修养，和对中国数十年历程的切身感受，使陈道馥极为崇尚精神生活贵族化和物质生活平民化二者合一的境界，恬雅、幽媚、超脱、鲜明、快利、纯熟，浑然一体，个性由是而成。正曾外祖父所谓“流水静时鱼见月，乱峰缺处雁随云”。

这性情，存在于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此时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意识形态领域的兼容并包，和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是改革的渐次深入和亟待深化、广泛存在的社会浮躁心态，和民众对社会正义的渴求。

陈道馥于此接触甚深。她以为，作为新闻工作者，就必须始终关注这火热的时代，关注这时代的大众生活，恪守新闻源于生活的原则。

这些美丽的女人

陈道馥对中国农村妇女有着真切的关爱。这关爱不仅缘自于曾经在底层的切肤经历，更是发自内心对她们的尊重。她常说，“工人农民姐妹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对他们，我们永远要抱有感恩之心。”

摩梭女张国英

次尔多玛，汉语名张国英，宁蒗县城关镇一位极普通的摩梭女。

陈道馥与张国英的相识缘于她第二次泸沽湖之行。

此前，1981 年，取得理学学士学位的陈道馥，工作伊始，就参与了曾经盛名一时的《旅行家》杂志的复刊工作。其时，社会万众腾欢，经济勃然而兴。1984 年，陈道馥来到了川滇两省交界处的云南省宁蒗县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木楞房里。

其时，摩梭人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部分生活形态，具有

极高的社会学意义。陈道馥采写的通讯《泸沽湖畔阿夏婚姻》，是改革开放以后较早报道摩梭人的文章之一。该文笔调平实，绝无日后诸多类似采访文章的猎奇色彩，而是将笔触投向了摩梭女平和、朴实、安逸的生活，描述了她们对外在世界的憧憬、关注。文章在《旅行家》杂志发表后，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祖国各地”节目全文播发，并编入丛书，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生活在宁蒗县永宁镇的摩梭女由此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随之兴起的旅游热，使摩梭人与现代社会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接触。

12年后，几近天命之年的陈道馥，不顾高原反应、险恶的交通和饮食风俗的差异，再次和同行一起来到宁蒗县，结识了张国英。

张国英，黝黑的肌肤、健壮的身躯，住在海拔近4,000米的木楞房里，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嗜酒的丈夫从不过问家务，自己只能依靠几亩薄田种植土豆和苦荞麦为生，供养着两个尚在读书的孩子。

然而，对着她第一次见到从北京来的记者，张国英坐在火塘边侃侃而谈，讲述着她呆板而艰辛的生活。豁达的性格、朗朗的笑声、对未来的憧憬，绝无做作，从心底迸发出的是对生活的激情。

陈道馥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最聪明的女人，也是给我教育最深的女人。从张国英身上，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女人，真正懂得了劳动者确实是最聪明的，这聪明就是，认真生活，努力生活，即或生活是那样的艰辛。这教益是永生的。”

拾花女李华和她的儿媳妇们

陈道馥始终秉持实地采访以获取最真切信息的新闻记者的职业良知。她认为，新闻的生命在于求真，社会的和谐在于求善，生活的真谛在于求美。求真，就需实事求是，求善，就要亲近生活，求美，则需品味劳动。这在她的河南、新疆采访中，在她和48岁的河南扶沟县关帝行政村农村妇女李华的交往中，有着真切的体现。

2003年，河南省周口市委、市政府为了农民的增收问题这一中国“三农问题”的难点，组织近5万名以妇女为主的农民工赴

新疆摘棉花。10月，陈道馥先后在河南和新疆实地调研。她放弃了国庆节黄金周长假，冒雨采访了河南省周口市5个县的数十户农家。随即，她又奔赴新疆。

在新疆期间，陈道馥先后采访了兵团4个师共20多个连队的周口籍摘棉妇女。出于对美就在劳动中，生活就是美的信奉，陈道馥每到一块棉田，都坚持和农民姐妹一同摘棉、搬运棉花包，一起在地头吃饭，手上磨起了一样的血泡。

当她听说农8师150团河南摘棉妇女的成绩时，并不满足于当地领导提供的各种材料，坚持要前去实地调查。她在戈壁滩上驱车200多公里近3个小时，于傍晚时分在棉田里找到了李华。李华和她的两个儿媳妇还有一个侄女，两个多月一些的时间里，4个人累计摘棉花近6,000公斤。这是其时在新疆摘棉花的妇女平均摘棉数量的近一倍。陈道馥以自身一天的劳作体会，和对其他拾花女的调查核实，证实了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并以此为依据，协助带队的乡镇干部共同为农民工核算工钱，保证了农民工的收益。

李华握着陈道馥的手动情地说，“以前儿女们在外打工，经常拿不到工钱，这回有了政府的组织，我们很放心，收益也有了保证。光知道有不少记者来新疆，但像你这样，都跑到沙漠边上了，跟俺们干一样的活儿，吃一样的饭，真是高兴。经济日报是中央的报纸，对俺们农民这样关心，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陈道馥对随行的其他同志说，新闻的真实，取决于材料来源的多方面。作为记者，一面之词是最忌讳的。

新疆归来，陈道馥陆续写成了《摘棉摘出“周口模式”》、《中西合作，农民增收》、《摘棉回来说周口》、《图木舒克：从经营农业到经营城市》、《口内外五城散记》等，先后发表于《经济日报》。适逢中央正在解决农民工劳动收益被恶意拖欠的问题，这一系列报道，对探索劳务有序输出、解决贫困地区富余劳动力尤其是低素质农村妇女的增收，和保护农民工合法收益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and 切实可行的模式。经济日报为此并刊发了评论员文章和记者调查手记。

有感于陈道馥在河南和新疆近20天的采访并因此而身染疾痛，有感于她为了农民增收问题所付出的艰辛工作和敬业精神，

河南省周口市委、市政府专此致函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经济日报给予表彰。

湘女李雪珍

祖籍湖南的陈道馥一直为 50 多年前“八千湘女上天山”的业绩感怀不已，为这批被称作新中国屯垦戍边第一代母亲的献身精神而崇敬有加。在新疆采访问隙，她深夜驱车百公里采访了家住五家渠市的湘女李雪珍。

1950 年初，新疆生产健身兵团从湖南征招女兵进疆。正如杜甫所谓“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于是有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华夏壮举，有了共和国西部的第一代母亲。

李雪珍，湖南湘潭人，那年 17 岁。从西安乘汽车进疆，历时数月。不仅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还有落魄逃亡之残匪。这一去，便是终生。

陈道馥每每回忆起李雪珍的话语时，总是动情不已。“住地窝子，一住就是近 30 年。谈恋爱嫁人，两床棉被权作妆奁，相夫教子，便也罢了。人啊，在哪儿也是一辈子。苦吗？真正的苦哇，思恋湘水湘情的苦，怀念父母姊弟的苦，就那样了。戈壁滩上，就像李颀《古从军行》说道，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这诗我记得很死。挖沟开渠，采摘棉花，没明没夜，那个累呀，排着队出工，能睡着觉走路，你说石河子漂亮，不！不止是漂亮，那是我们的血汗，是我们的年华，是我们的家。”

“但我还要回去，湖南老家！”那句发自肺腑、沉闷压抑的话，陈道馥也同样记得很真切。还有李雪珍 50 年前参军时的照片，一种文静、淡雅的美。陈道馥说，就像刚刚绽开的棉花，细、白、嫩，真是可人得很。这就是我的偶像，这就是我工作的动力，这就是我必须为之奋斗的“这一个”。

《口内外五城散记》的写作，陈道馥是在泪水中完成的。她说，不错，记者必须秉持客观冷静的眼光，忠实于事实，忠实于真实。但是，客观不能没有观点，冷静更不能冷酷。与采访对象的距离感，只能存在于事实和自己的理念之间。当你面对像李雪珍、张国英、李华这样的女人时，心和心的沟通，应该是零距离的。面对中国最底层劳动妇女琐屑生活中的默默劳作，面对她们

的艰难困苦，你能无动于衷吗，这不是新闻的真实，这是对生活的冷漠。描述生活的艰辛，正是为了激发人们改变落后生活的热情。

经营企业的女人

同为女性，陈道馥对女企业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她是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的发起人之一。由是，她结识了诸多经营企业的女人。她们是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兼中国女企业家协会会长银重华、北京市医药经济技术经营公司总经理陈济生、藏族优秀女企业家其美、北京兆泰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穆存于、山西离石聚富焦化厂民营企业家傅俊兰。她们当中，经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都有。对陈道馥而言，这是无所谓的，因为，对于她们，陈道馥从不称其“女强人”，而是更喜欢把她们描述为“快乐工作着的美丽女性”。



1996年三八妇女节期间，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召开全国优秀女企业家表彰大会，作为这个协会的理事，陈道馥采访了这些“快乐工作着的美丽女性”。短短的10天时间里，推出了《中国企业家·女企业家》专号，集中报道了银重华、陈济生、其美、穆存于、傅俊兰等数十位全国优秀女企业家。她特别为这些报道构思了极富女人气息的标题，《工作是美丽的》、《三个女人一台戏》、

《农家儿女的自述》、《追忆逝水年华》、《穆存于印象》。撰写了“三月三日天气新，北京城里多丽人”的导语。

她在采访手记中写道，“和她们谈及自己的事，多是家事，谈得开心、爽朗，透出一种满足和幸福；谈及事业成就，淡淡的，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平平静静；谈到坎坷，有泪，也还是淡淡的泪，但让你感到沉重；谈及国事、天下事，则是各有远志，殊非泛泛，使你汗颜惭愧。”

这就是陈道馥的采访艺术。正是在这种贴近采访对象心灵的对话中，陈道馥和她的采访对象成为了朋友。

农民企业家傅俊兰从小以乞讨为生，12岁作了童养媳，改革开放以后劳动致富。但她满足于既有的家族经验式管理和造福乡里的淳朴心态，喜好别人称她为“女强人”。陈道馥对她说，女人首先要有女人的个性和魅力。真正的企业家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体现，应该是善待自己、善待人生、善待家庭、回报整个社会，尤其是女企业家的魅力，应该是女人的魅力和人文素养、人格魅力的结合，企业家的成长在于他的创新精神。

1996年4月的《中国企业家·女企业家专刊》，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报道女性企业家最集中的刊物。时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袁宝华同志，专此而撰写了《再论企业家的修养》一文。

作领导工作的女人

1985年，《中国企业家》筹备伊始，“企业家”称谓就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陈道馥始终坚定支持袁宝华同志所提“中国企业家”的观点。在主编《中国企业家》十余年间，策划组织了“中国企业家的历史方位”“名作家写名企业家”等栏目。累计采访企业家达数百人之多，撰写各类文章数十万字。她认为，忠实记录这个阶层的成长，是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

1986年，陈道馥结识了时任北京燕山石化党委书记的吴仪同志。

在对吴仪同志的工作、生活跟踪采访的基础上，陈道馥体味到，作为党委书记的吴仪同志的魅力，是公职中的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细腻，是女性特有的对同志的关心、体贴。在此基础上，

她从当代理论物理学的社会学实践角度，将吴仪同志其时的工作升华为报告文学《女党委书记的协同学和创造学——访燕化党委书记吴仪》。

这是国内外媒体最早介绍吴仪同志的文章。时任中国石化领导的陈锦华同志号召石化系统从事党的基层工作的领导同志，要从这篇文章中学习“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相结合的方法”。

这个美丽的时代

陈道馥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同时对职业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常说，这是一个云蒸霞蔚的大时代，生活在这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时代，作为一个记者，她的特殊身份注定了，一定要以出世、旷达的心态，面对斑驳陆离的社会，面对五色缤纷的工作，关注国家的经济改革，关注社会的进步。这缘于她对普通劳动者生活现状的深切了解。

1992年，在黑龙江哈尔滨采访时，陈道馥发现日伪时期遗留的棚户屋依然在使用。许多家庭几代人困居一间狭小、仄憋、低矮的棚屋中，棚户之间间隔不足1米，居民区垃圾如山，消防车无法驶入，一遇刮风，连煤炉也不敢使用，怕引发火灾，无法逃生，生存状态极为恶劣。陈道馥写成情况反映及内参呈报有关部门。棚户区被彻底拆除，100多户居民得以重新安置，几代人的居住条件得以大大改善。

关注经济改革

1987年，陈道馥与中央电视台等新闻界的朋友共同策划、组织了“全国经济改革人才奖”，遴选了100位优秀企业家予以表彰，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快速推进给予重要的影响。2004年，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世纪伟人邓小平——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展览会上，参加这次活动的100名企业家集体签名赠送给邓小平同志的“改革的总设计师”条幅，被置于醒目的位置。国内外100多家媒体均给以极大关注和报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有感于中国女企业家的出现已经然成为中国经济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在袁宝华同志的关心和支持

下，陈道馥和各界同仁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并担任理事，坚持在《中国企业家》开辟专版，并推出“女企业家专刊”，社会反响甚好。

20世纪90年初，在极端困难的条件和复杂的局面下，陈道馥仅用20多个小时采写成《来自四通的报道》一文，并发表于同年2月16日《经济日报》头版。该文被国外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媒体评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止步不前”。

为了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经济贸易往来的趋势，1990年，陈道馥直接参与了海峡两岸经济日报组织的“首次两岸工业界交流”活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对随后兴起的台商投资大陆热潮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关注企业家阶层

陈道馥对中国企业家，尤其是女企业家阶层的成长，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职业经理阶层初步形成，市场经济体系初步确立。但中国企业家阶层人文素质的欠缺，诸如政治、文化素质的欠缺，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不足，陈旧的家庭式管理方式，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陈道馥在数十年的采访调研中深深感受到，国家在经济工作上几十年的摸索、实践、经验，几十年的挫折、失误和教训，给予的启迪就是：中国经济的振兴，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是关键，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方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根本。这一切的核心，是企业管理尤其是作为实施着这一管理的企业家。

陈道馥亲历诸多企业家由盛而衰的经历。因而她在讴歌企业家的同时，从来不忌讳企业家的缺陷。她认为，企业家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自身修养的欠缺，创新能力、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的不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适逢社会呼吁人文精神的重建。陈道馥以为，企业家人文素养的提升，更是刻不容缓。

为此，1997年，她与国内著名学者陈炳富、崔青田两位教授共同主编了《企业家人文修养丛书》。在这套丛书中，几位主编呼吁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珍惜今日经济建设的大好时光，要自持、自牧、自重、自律，要锲而不舍、锐意进取。丛书一套8册，书

名体现了编者的期望：《回报社会》、《迎接挑战》、《求知超越》、《善待人生》、《生生和谐》、《无形权威》、《人际沟通》、《临变善应》。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完备的同类丛书。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袁宝华同志的高度赞赏。袁宝华同志在专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出，“我真诚地谢谢他们在我们的企业家最为艰苦卓绝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套好书”。

此前，作为对企业家人文素质的长久思考，陈道馥在她任主编的《中国企业家》杂志所开设的“知名企业家谈企业家”“名作家写名企业家”等栏目中，便约请了数十位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从自身的成长过程中来谈企业家的修养。袁宝华同志曾专此撰文《论企业家的修养》，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先生也撰文《全社会都来保护企业家》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因应。

关注社会的进步

陈道馥坚信社会的进步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尤其对环境问题极为关心。1988年，她采访曾于1971年登月的美国宇航员J·欧文，并与欧文就世界和平、环境保护等问题作了深入交谈，在许多问题上形成共识。有感于此，欧文将自己在月球空间拍摄的并亲自签名的照片赠与陈道馥。在此基础上，她写成《爱护我们的地球》一文，在同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发表于《经济日报》，引起极大反响。

20多年来，陈道馥始终恪守以塑造崇高为新闻的使命的观念，在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她所写的一系列报道，诸如《药石之言》中呼吁尽快实施药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1995年），《大事在农》中提出农业企业化（1995年），《锻炼金石》中提出能源问题（1995年）等，较早提出了一系列在今日已经成为社会热点的问题。

这个快乐工作的美丽女人

陈道馥常说，新闻的生命在于求真，社会的和谐在于求善，生活的真谛在于求美。这追求充溢于她的工作和生活中。

作为记者，她坚守事在人为为真善之事、境由心造造无我之境的心态，努力去做生活细节的渲染，以使生活跌宕起伏。

作为女人，她同样有着女人的温婉、感伤。

她侃侃而谈的神态中，丝毫掩饰不住淡淡的忧郁，她为陕西咸阳农家媳妇刘小样的落寞而动情掉泪；她为那些生平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坐火车走了数千公里、曾经赖以谋生的劳动第一次被称为技术、第一次获得了社会的认可、相片生平第一次被挂在了光荣榜上、第一次像男人那样有了想家感觉的河南拾花女而感佩而唏嘘不已。她为付出了青春、爱情的湘女而失声恸哭；她深深体会到了河南桐柏山区那些独女父母，虽然60岁可以享受领取养老金优惠政策，却依然企盼着生育一个男孩的自尊、快感，依然吞咽着没有生育男孩的农村妇女的悲凉。

作为女人，她同样有着女人的遐想。

她甚是喜好五台山如瑞法师“流来的是水，流去的也是水，一切顺其自然”的生活真言。

她为自己这么多年来所结识的那些富有生活激情、充满幻想、达观务实的姐妹们而自豪。

1997年香港回归，陈道馥和全国人民一样兴奋不已，回归当日连夜写下了《莺啼序》，并在经济日报发表。

红船几番濯雨，返乡多璀璨。九龙寨，橘颂黄钟，绿绮丝竹铺染。新界翠，丹青写意，蓝塘水胜真清淡。媚珠旋起舞，紫荆绽开嘉典。

曾共风流，并耦耕猎，铸金甌一片，也共有。三代夔纹，秦砖青皿刚健。忆难穷，壬寅静海，含诟耻，港城沦陷。又庚申、戊戌京师，几多昏暗。

炎黄裔胄，个个儿男，骁勇更劲健，共奋厉，南门御辱，虎门销烟，大角鏖兵，沙角血战。今来古往，先贤史传，侯官少穆英雄泪，邓江宁，共矢多留恋。关提督兵连升，壮志捐躯，英名今日扬显。

经历奕世，万里江山，眷念心如箭。又欣幸，经年判袂，落月停云，多少思量，邓公挥染。陈言两制，发抒胸臆，乾坤正是公撑住，便同舟同德同心干。待看统一功成，笑慰先驱，太平澹澹。

这词尽见陈道馥女性特有的情愫和感恩之心。

孙敏 湮没不了的声音



文：晋群 梁萍

当她在为这些人们争取说话的权利，也是在为他们、为自己寻找一种力量，在日趋麻木的现实中，保持一种清醒，一种警觉，一种对历史、对子孙的责任感。

在个人的征服欲望和世界、文化、宗教、民族的传统面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情不自禁地低头，这种力量，只会来自信仰。这信仰来自历史、来自传统，也来自对大自然的热爱。

留住一个真实的、美丽的、有着辉煌的昨天以及充满希望的明天的世界，是孙敏理想的“和平世界”。在这传统和历史饱受挑战的时候，孙敏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唤起人们的理智、良知和爱的情感，作为这个和平世界的脊梁，在历史的洪流中挺立，孤独，但永不妥协。

夜幕降临，澜沧江在云南的群山间流淌着，与它一样不肯停歇的，是仅次于三峡电站、全国第二大的在建水电站——小湾电

站工地隆隆的机器声。

此时，孙敏和同事们正打算离去，电站移民挡住了她们：“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走？现在能听我们说话的人只有你们了。”

走过云南多个在建水电站的孙敏，心里很矛盾。她知道，如果留下来，似乎会给他们某种希望，但实际上，她们的能力在水电站如此强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是极其有限的。

抬眼，新修的移民房映入眼帘，钢筋混凝土搭建起一个个“火柴盒”，每个“火柴盒”之间，那些像巷道一样的1.5米的间隔，就是他们的“农家小院”。这奇怪的空间肯定会让农民的生活不知所措：粮食该在哪儿？牛可以拴在哪里？又到哪里养鸡养猪呢？传统的乡村社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之后，这些一辈子靠耕田种地为生的农民，会面临怎样的困境。

孙敏的心在痛，这片崭新的村落何以让人“安居”。她决定留下来，只是作一个倾听者，听听这群诉说无门的农民的声音。

即使只是听听别人说说话，有些时候也会很难很难。

当地大坝管理局工作人员来了。一个充当翻译的大坝工作人员，宣称曾就读于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一上来就是那一套：“修电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移民是与扶贫相结合，农民生活可以由此得到极大的改善……”

见过众多电站移民生活变迁的孙敏问他：“这些话，你自己相信吗？20公里外的漫湾电站你去过没有？电站建了20年，当地移民捡垃圾捡了20年，你知道吗？”

“经济发展过程总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清华大学”回答。

“这是什么话？一些人受益了，为什么一定要让另外一些人付出代价？尤其他们是少数，是弱势群体！”

“清华大学”摆出一副高深的样子：“你们的学历背景是什么？”他的言下之意是，你们这些学民族学、社会学、中国语言文学的人，不足以理解经济发展这样如此重大的课题。孙敏感到了深深的悲哀，人文关怀，正是我们文化中的缺失，所谓的科学技术，我们有的是技术，但却缺少了真正意义的科学。

在后来那些被人检查的日子，孙敏从愤怒到无奈，再到习以为常，不就是你还有一点同情心吗？如同她笔下一个个不同的人

生境遇，面对历史变迁、面对商业社会的经济利益，个体的生命虽弱小，但却在顽强而艰难地维持着一种真实，一种正义，一种信仰，一种力量。

“男人的眼泪让人心碎”

孙敏说话温和，做事低调，不爱张扬，但她很容易爆发出一股激情，作为一名用文字工作的人，她的笔尖流露出的，分明是女性的细腻与感性。她说：一个尚存基本良知的人不可以对生活视而不见。在说起她曾经走过的地方，她曾经采访过的人，以及她曾经耳闻目睹的生活变迁，她会很动情，这份感情如同涓涓细流，虽然没有澎湃的热浪，却有着滴水穿石的坚毅和力量。

也许，正是这两种性格的结合，倔犟并柔韧，才有了她笔下无数个普通却个性鲜明、平凡却承载着某种力量的人物，用他们的故事，讲述一段历史，记忆一种感情，呼唤一种精神，代表一种文化。

从怒江到澜沧江，对于“反坝”这个词汇，孙敏并不接受：“我不是反对建坝，而是建坝的同时如何兼顾原住民的利益，特别是在多方利益的‘争夺’中，人人都宣称为了当地人民，但是，他们真实的声音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听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农民的声音。”

这群因为外界原因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影响无不清楚、只能被动地接受改变的农民，常常让众多关心他们的人士感到悲哀。孙敏跟随怒江的农民到澜沧江访问时，她与他们一样地震惊，漫湾移民捡垃圾的生活不是他们想要的未来。

访问者问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最担心什么？那孩子说：“担心不让我们捡垃圾。”孙敏说：“那种难受不是你能用语言表达出的。而更难受的是，你见过女人们流泪，见过孩子流泪，而男人的眼泪，那些家庭的支柱，那些平日干起农活一人当几人使的男人流下眼泪，足以让人心碎。他们指着一片茫茫水面告诉你，他们家的田在哪个位置。”迁离故土让他们数百年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一夜之间崩溃了。隔着数百公里，隔着一年的时间跨度，她的眼前，依然清晰地站着那些垂泪的男人。

于是，在2004年的《凤凰周刊》上，有了一篇名为“怒江民

间反坝行动”的文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大坝移民的生存状态，关注大坝经济可能给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2004年的秋天是一个多事之秋，不同的声音介入了“建坝”的讨论，民间环保组织的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了自己的声音，以至于国外媒体发现，以NGO（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力量正成为有着越来越强大话语权的“第三力量”，参与到中国的政治决策中；但另一种声音却在指责建坝引起的争议，将NGO置于方方面面的焦点之下。

争论转入了沉寂，孙敏承认，以媒体的手段影响公众，很难说能对调查对象达到立竿见影的改善或改变，但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字工作者，她相信，那些失去话语权的农民会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而获得社会的关心。

“我不属于任何一个NGO组织，但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我发现，NGO毕竟是一股力量，由于它的工作方式，总能听到最底层的老百姓的声音，而使它能够成为政府作用的补充。”

20年来孙敏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做社会、历史、民俗及口传文化的调查，多年出任《山茶·人文地理》（后更名为《华夏人文地理》）的副主编，以基本的良知关注民生，关注生态，关注每一个生命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她触得到这块土地上普通民众的心，听得到他们的呼唤，因此，当她在为这些人们争取说话的权利，也是在为他们、为自己寻找一种力量，在日趋麻木的现实中，保持一种清醒，一种警觉，一种对历史、对子孙的责任感。

1001

记录真实的历史

对于自己20年的田野考察经历，孙敏怀有一种庆幸与珍惜，因为可以与那一些亲历历史的人亲身接触，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耳朵，“看”到和“听”到历史，只是，这一些人在飞快地逝去，在他们身上所能找寻到的那一段历史，也正随之走出世人的视线，让孙敏每一次回访，都充满难以名状的遗憾和痛惜。

正因为如此，孙敏深知“真实”的分量，在她的职业训练里，严谨、真实是一个做文字的人的基本素养。说来简单，这个过程却考验着一个人的良知和道德原则。

在孙敏的文章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都与一个战场有关。

这是一块被“遗忘”的战场，它位于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之下，这里曾经有过一场极其惨烈而不为人知的战役——怒江战役。在这个战场上，有着一把把几个国家拖入战争并导致一个帝国覆灭的著名公路——滇缅公路，作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唯一的外援物资通道，“为了截断它，日本不惜发动缅甸战役；为了保住它，中国出兵10万人入缅作战；为了替代它，美国空军开辟了闻名世界的‘驼峰航线’；为了重新打通它，美国出动工兵在中国驻印军协助下开辟了史迪威公路，几十万大军从缅北和中国滇西同时发起反攻。”（孙敏：《在滇缅公路的前方》）在这个战场上，日军抛尸18万，留下了3个全军覆没的阵地。这也是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的反侵略战争中一次前所未有的战役。但这个战场连同那些为它付出血与生命的人们一道，在战后几十年，悄无声息地被遗忘了；60年代后期，当这里重新被关注的时候，却有了一个新名字：“东方诺曼底”。孙敏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她更关注这场战争中的人的命运，知道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与在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多年来，孙敏走访了几十位战争亲历者，记录了几十万字的口述历史。“这段历史，一定要公正地告诉后代，为了我们的良知，还他们一个公道。”孙敏这样对自己说。



于是，她一次次踏上这块曾经的战场，一次次循着曾经被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车队遮盖的滇缅公路，找寻历史的证据，历史的见证者，抓住这些正在消逝及即将消逝的记忆，尽可能地记下一段历史。为此她与同事们在抗战纪念的2005年里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将他们多年来的考察和思索反馈给公众，这一切都是她走过无数村庄在那些风烛残年的老者一字一句的交谈的结果。眼下，她正着手完成一部名为《寻找1944》的纪录片和一本还未定名的书，以那些战争亲历者的记忆片断，拼接起一段历史的真相。

对真相不懈坚持的性格，使她对谎言极其痛恨。一家主流媒体曾经这样报道：滇缅公路还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战争就结束了。“怎么能这样说呢？在中国抗战最黑暗的时期，中国全部外援物资都来自这条公路。”在某一个场合，孙敏拒绝了这家媒体的采访。她说：“不接受说谎者采访。”

在昆明美丽的翠湖湖畔，有一座土黄色的中国传统走马转角楼式建筑，这里是在辛亥革命起过重要作用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这里曾产生过朱德、叶剑英等杰出将领。孙敏的祖辈也曾经是这里的早期学员，并居“护国运动”发起人唐继尧麾下四大军长之列。

问孙敏，她的性格，以及对这个战场的情结是否渊源于此？她说，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但从她简单提及祖辈早年的种种经历——一个波折的生命，正是那个动荡年代的缩影。也许吧，从祖辈到今天，他们骨子里流淌的应该就是那种不屈不挠的血液。

1003

找寻缺失的信念

与现实的博弈有很多种方式。有一种方式是用民间的口述历史告诉人们，一个伟大民族曾经的生活历史和文化传统。

2003年早春，三峡即将容颜尽改的前夜，孙敏静静而来，“在乡野间阔，在长江两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民间话语里的三峡”（孙敏：《三峡记——“川江的英雄时代”》），她与从前的老船工彻夜交谈，在三峡上，老人推着一叶扁舟带她探访正在消失的“川江英雄”。

英雄的产生，缘于他生活的土地，缘于这片土地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信仰，因为英雄的存在就是要让人们知道，我们应该崇

拜什么，应该敬畏什么。只是，如今这个时代，还需要英雄吗？还会产生英雄吗？或许，“英雄”的定义早随着商业利益的洪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雄的产生总与信仰相伴。那场发生在滇西的战争，日本人搞不明白，如今的很多中国人也不特别明白：是什么力量支持着这些破衣烂衫的中国兵，吃着粗糙的食物打败了强大的敌人？但是，他们就是英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忠孝节义”……这些在教科书上抽象的名词，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最准确的表述；这些词，就是他们的信仰，且融入他们的血液，刻进他们的骨头。

只是，被时间销蚀得所剩无几的历史和信仰，在贪得无厌的商业竞争面前，总是消失得过快，甚至连滇缅公路上仅存的最后两座老铁桥，也将被澜沧江上一个90万千瓦的大型水电站全部淹没。淹没的何止是两座历经日寇炮火也没有倒塌的铁桥？从三峡到澜沧江、怒江，在势不可当的经济开发的浪潮里，人们不得不离开家园，从此失去祖祖辈辈曾经拥有的东西，比如生活方式，比如土地，甚至比如信仰。孙敏说：她大学毕业以来所从事的工作被称作抢救民间文化遗产。20年，这是一代人长大成人的时间，她发现好艰难，你在与经济建设的速度赛跑，你得赶在这一切都被摧毁之前尽可能地记录下来。

传统与一个民族的生活非常密切，割裂了这种传统，生活秩序就会陷入混乱，而这结局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和难以消除的。当有人期望用现代化来“改变”一个地方的贫困，用历史、文化来促进地方旅游时，孙敏却说：“历史是有感情的，而感情不是为游客准备的。”（孙敏：《神山卡瓦格博》）孙敏在那篇文章里写道：山峰除了自然属性，是否有文化属性？登山除了海拔高度，是否存在文化的尊严？

没有信仰，意味着无所敬畏，意味着无谓崇高。在个人的征服欲望和世界、文化、宗教、民族的传统面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情不自禁地低头，这种力量，只会来自信仰。

这信仰来自历史、来自传统，也来自对大自然的热爱。为那些关注环境的人们搭建说话的平台，是孙敏这些年做杂志编辑的

责任之一。1998年以来，她撰写和编辑了一批有影响的环境方面的稿件：1998年《从生命之湖到死亡之湖》和《禁伐的森林》（作者孙敏）、1999年《长江源头》（作者徐治）、2002年的《山告诉你》（作者章东磐），2003年的《吉沙——我们有一个梦》（作者李波、谢鸿妍），探讨了现代人“回归自然”对以森林和草地为福祉的当地人生活关系的入侵，对许许多多的人产生了影响。那些在一线做项目的年轻人，在这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孙敏总是被他们所感动。孙敏喜欢用“拥有坚强的神经”来评价他们。正是他们，让人重新看到信仰生长的土壤。

心痛，是因为没有麻木；愤怒，是因为尚存良知。

一个人的人生际遇也许只有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发现它的意义。眼下，孙敏与同事们在“人文地理研究中心”——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即“中国脑库”）的研究机构——致力于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护文化和传统的研究和探索，为地方政府的经济改革提供建设性意见，以期减少发展带来的损失，积极倡导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什么是人文关怀？就是用我们的良知告诉人们，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孙敏笔下的世界，也许会在机器的隆隆声中渐行渐远，但是，它们会在水下，在很多人的心里默然地注视着这个重新模造的世界荡向未知的将来。那时，哪里能寻找奔流不息的悲恸与激昂？

留住一个真实的、美丽的、有着辉煌的昨天以及充满希望的明天的世界，是孙敏理想的“和平世界”。在这传统和历史饱受挑战的时候，孙敏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唤起人们的理智、良知和爱的情感，作为这个和平世界的脊梁，在历史的洪流中挺立，孤独，但永不妥协。



常沙娜
敦煌奇女子

文：路佳坤 张志改

我用了几十个春秋寒暑不间断地绘录了一批“花”的形象。她们与人一般，有着各自的性格和容貌，有清淡素妆的，也有艳丽浓妆的；有纤细秀丽的，也有粗犷浑厚的。这大自然纯真的写照，是我思绪变化的记载，也是我对大自然美的憧憬。

我们的民族有我们的传统和特色，这些永远都不能丢掉。“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我会始终记着父亲对我说的这些话。

常沙娜，1931年出生于法国巴黎，其父常书鸿是我国著名的画家、敦煌学学者，母亲陈芝秀当时也在法国国立启莱美术学校学雕塑。

1936年，塞纳河畔，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常书鸿走出罗浮宫，步履从容地穿过圣杰曼大道。

9年前，常书鸿从西子湖畔漂洋过海到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

校求学，经过四年苦学，他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在著名的油画大师劳朗斯门下深造。翌年，他在巴黎画界声名鹊起，连续四年捧走了当时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得到“不轻易以一字许人”的世界级艺术批评家莫葛雷破例撰文推崇。人们预言，这位中华学子只要在巴黎住下去、画下去，世界艺术大师的伟人祠里便会刻上他的名字。常书鸿对自己的前程也踌躇满志。然而，就在这个秋天，一个傍晚的奇遇改变了他的一生乃至一家人的生命轨迹。

一册《敦煌石窟图录》

“先生，请看看这几本画册吧。它们来自古老神秘的东方。”旧书摊的主人向常书鸿推销道。

常书鸿好奇地打开一部从未见过的书盒，眼前突然一亮：《敦煌石窟图录》。一个新奇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向他洞开了，那是从北魏到大唐时代的佛教艺术图画，其恢宏磅礴的构图和笔触，足以与拜占廷基督绘画媲美，其奔放的风格比西方现代派还要粗犷，彩绘人物更是画得细腻生动。

“先生，您是日本人？”旧书摊的主人被如痴如醉的青年画家吸引了。

“不，我是中国人。”常书鸿头也不抬地答道。

“哦？中国人……”旧书摊的主人炫耀道，“这是我们法国英雄伯希和博士探险时从贵国的沙漠中发掘出来的。”

“你说什么？”常书鸿悚然一惊。“这是从贵国敦煌的千佛洞里拍摄而来的。”旧书摊主人的语气不容置疑。

“敦煌？”常书鸿的心底顿时涌出一种莫名的悲凉和怅然：自己身为炎黄子孙，竟然不知道敦煌位于何方。他深感惭愧地说：“中国的国宝为什么自己都不知道，而让法国、英国捷足先登了呢？”

“前边不远处有个吉美博物馆，其中展示着书中介绍的贵国敦煌的许多绢画。您一定会感兴趣的。”旧书摊的主人热情地继续说。

“谢谢！谢谢！”常书鸿离开了旧书摊。

次日早晨，常书鸿迫不及待地赶到吉美博物馆，流连忘返于

伯希和1908年从敦煌掠夺来的大批的唐时代的大幅绢画、绣品和经卷等珍贵文物的展览里。他发现，这简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藏经洞中奇迹，尽管历史已过去了近千年，可其艺术形式和内容，简直无法与现代艺术相比拟。他顿悟到自己的艺术之根在中国，就在敦煌遥远荒凉的沙漠里，而非在柴巴那斯大街！

苦难深重的中国，呼唤着这个学贯中西的海外游子。

古老的祖国文化，诱惑着这位功名垂成的艺术大师。

走出吉美博物馆，常书鸿的胸中奔突着两个字：敦煌。他不再犹豫，决心离开巴黎回祖国去！

“书鸿，你会不会是大脑一时发热？”听到丈夫常书鸿的重大发现和打算回国的决心，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班求学的陈芝秀十分不解地问。

“芝秀，我很清醒。如果真的是大脑发热，那也是被古老的敦煌艺术感染的。”常书鸿一字一顿地回答。

“你得好好想一想。你在巴黎已非常被看好，连巴黎近代美术馆也收藏了你的油画，你还是巴黎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这份殊荣，是众多海外学子难以比肩的。可一旦回到那块军阀混战、血腥杀戮的土地，国运衰微，岂有艺术的昌明？”妻子恳请丈夫慎重考虑。

“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烟云，真正的艺术家并不看重这些。”常书鸿坚持己见。

陈芝秀见功名利禄都打动不了丈夫，搬出了另外的理由：“我离毕业还有一年，沙娜也不过6岁，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这都不是理由。我可以先走嘛……”“你！”陈芝秀负气摔门而去。

一切都缚不住常书鸿那早已飞回祖国、飞到敦煌的艺术之翼，1936年他只身提前回到了阔别9年的祖国。

1941年夏天，正值抗日战争动荡时期，常书鸿一家终于结束了迁徙漂泊，在重庆安顿下来。这时，他们的长子嘉陵降生了。

家安顿了，子女有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可常书鸿的心怎么也安定不下来，因为他还未见到让他魂牵梦萦的敦煌！不久，机会终于来了：1942年当时国内的学者们如张大千，徐悲鸿，梁思成，向国民政府发出呼吁，务必保护敦煌石窟，当时国民政府监

察组的于佑任亲临敦煌莫高窟，也感慨地写下：“秘藏尽，宝库仍在。”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积极参与了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在艰苦的筹备过程中，被正式任命为敦煌研究所所长。

常书鸿把举家迁往敦煌的决定告诉妻子陈芝秀，这位刚刚适应了山城生活的江南才女忍不住哭鼻子，与丈夫大闹了一场。已初晓人事的沙娜吓坏了（在她的记忆中，爸爸妈妈从没有这样激烈争吵过），跑去卧室问蒙着被子啜泣的妈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爸爸疯了。”母亲泪眼汪汪地说，“他嫌我们的苦受得还不够，非要将一家人搬到那荒凉彻骨的敦煌去不可。嘉陵才两岁，体弱多病，到了那天寒地冻的鬼地方咋活呀？”

回到中国 走进敦煌

1943年10月，走马上任国立敦煌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携带妻子女儿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从重庆出发了，一路风尘跋涉了一个多月，终于抵达兰州。在古朴的西北城市里，陈芝秀更显得摩登了，她身穿棉旗袍，头烫着20世纪40年代国际流行的鬈发，脚蹬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高跟鞋，成了一道时尚风景。此时，黄河已结冰，陈芝秀那身时髦装束难以抵御大西北的风寒霜雪，常书鸿便给冻得直打哆嗦的妻子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陈芝秀嗅着羊皮袄上的羊膻味，直感到一阵阵恶心，但最后还是噙着泪水无奈地把它穿在身上。

常书鸿开始在兰州招兵买马，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集聚到他麾下。他们师徒4人加上陈芝秀、沙娜、嘉陵，一行7人坐着敞篷大卡车，顶着凛冽刺骨的朔风，踏上了从兰州到敦煌的2400里路的漫漫旅途。

翻越乌鞘岭，女雕塑家举目远眺，苍茫大地，只有几株干枯的红柳在寒风中抖动，一股怆然的悲壮涌上了这位江南才女的心头：今后寂寞凄苦的“流放”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啊？

到了敦煌，这位留法女雕塑家被莫高窟斑斓璀璨的彩塑像和壁画震撼了，在常书鸿的鼓励下，她开始拿起雕塑刀，临摹复制唐代的彩塑，沙娜则送到酒泉中学念书，每次寒暑假回来时她主动到洞中与大人们一起学习临摹。这时，当年常书鸿麾下的高足

董希文、张琳英等人纷纷从北平、南京、杭州辗转而来，与老师一道治理洞窟黄沙，现场临摹，研究和保护文物。

受父母影响，小沙娜从小就对绘画特别痴迷。到莫高窟后，那些色彩斑斓、天衣飘逸、栩栩如生的飞天、菩萨、供养人、佛陀的壁画深深吸引了她。大人们在洞窟里观察、临摹，小沙娜也在一旁专心致志地跟着画。

每年，她都盼着寒暑假，只有在那时，又能拿起画笔，一头扎进莫高窟去临摹她朝思暮想的壁画。

两年时间过去了，家中突然出现变故，母亲再也忍受不了敦煌生活的艰苦和清寂，狠心抛下丈夫、沙娜和还不到4岁的幼子，离家出走了！悲愤和痛苦并没有击倒常书鸿，他为了心爱的敦煌艺术，不得不让14岁的女儿中途退学，担起照料年幼弟弟的担子。这或许对常沙娜是个转机，决定了她一生的艺术之路。

父亲为沙娜安排了周密的学习计划。规定每天必须早起，先练字后学习法语，请董希文先生辅导语文和西洋美术史，苏莹辉先生辅导中国美术史。除此之外，还要求她与大人们一样每天去洞窟临摹壁画。冬季来临时，洞窟内无法作画，父亲就在室内指导她画素描、速写，这一切为常沙娜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

1945年，常书鸿父女敦煌画展在兰州举行，引起巨大轰动。从加拿大来甘肃山丹培黎学校（这是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创办的福利技术学校），当时在那里任教的犹太人叶丽华女士看了沙娜的敦煌临摹壁画作品后惊叹不已，径直找到常书鸿，热情地说：“常先生，您女儿小小年纪竟这么有才华，她应该像您一样到国外去接受正规的艺术教育。我女儿在美国工作，如果您信得过我，我聘期两年后届满，可带她到美国去读书……”“谢谢！谢谢！”常书鸿感激地说，但他并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后来，叶丽华女士真的找来了，说要带沙娜出国留学。

1948年夏天，常书鸿带着沙娜和嘉陵来到南京，在举办敦煌画展的同时，顺便为女儿出国做准备。沙娜被爸爸送到他当年旅法的同窗吕斯白、马光璇教授夫妇家里暂住，并由干妈马光璇教她英语，同时为女儿出国做准备。在敦煌那片荒漠沙海里蛰居了近五年的沙娜发现，自己就像刚刚走出原始部落的土著，完全失去了在城市的生活能力，一坐公共汽车就晕车呕吐，长途旅行只

能坐敞篷的卡车或马车，最可悲的是连花钱买东西都不会。

一天早晨，马光璇教授急急忙忙出门上课，走之前给沙娜递过一沓钱，叮嘱道：“沙娜，干妈今天有课，不能陪你逛街，你去给自己购买合适的衣服和布料吧。”沙娜微笑着点了点头。

干妈出门不久，沙娜就怯生生地出门了。她一边打听一边往闹市走去，然而，她走进商场后居然不懂得如何拿钱去买东西，傻愣愣地望着别的顾客来来往往、潇潇洒洒地提着东西离去。她几次想张口问，又吓得把话咽了回去，最后怏怏不乐地空着手回到干妈家里。

晚上，马光璇回来了，关切地询问：“沙娜，今天买了什么好衣服？穿给干妈看看。”

“干妈，我真没用，不会花钱买东西，今天什么也没有买到……”话未说完，沙娜的泪水便流了出来。



“唉！”马光璇长叹一声，把沙娜搂进怀里，泪水潸然而下，“沙娜，我可怜的孩子，你可是生在巴黎，喝洋奶、吃洋面包长大的洋娃娃啊。刚回国那会儿，你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连一句中

文也不会说，怎么在敦煌才短短的5年就变成这样啦？常书鸿，你造什么孽！你只顾自己的事业，竟把两个孩子全耽误了……”

“干妈，别怪爸爸。他过得挺孤独，挺不容易的。”沙娜为父亲辩解，“为了敦煌，连妈妈都弃他而去了……”

是年9月，常书鸿带着儿子来为沙娜赴美送行。他为女儿买了一只随身携带的牛皮小箱子，并亲自用油画笔在箱子上写上S. D.——“常沙娜”名字。

在出关的一瞬间，沙娜蓦然回首，发现爸爸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他才45岁，可一头发丝已经花白，神情枯槁，原本挺拔魁梧的个子也开始有些驼了。相依为命的弟弟哭成泪人似的大声喊：“姐姐，别忘了我。千万别扔下我，姐姐……”沙娜听了，禁不住流出郁闷的泪水。直到飞机腾空而起，她竟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使叶丽华惊愕不已。

含辛茹苦将她带大的父亲远去了，孤苦伶仃的小弟也远去了，还有那莫高窟的壁画，那曾经温馨的黄泥小屋……一切的一切都远去了，她将在波士顿博物馆的美术学院开始新的留学生涯。

出国留学 返国献艺

在美国著名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两年学习中，常沙娜受到了系统、正规、全面的美术教育，借此也在博物馆内看到了希腊、埃及、罗马诸多的古代艺术杰作，也使他们大大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世界的古代文化艺术史。同时她在波士顿时有幸地再赵元任家中遇见了一些爱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从他们那里得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还经常参加一些学习、文艺活动，及时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在回国的大潮中，她再也坐不住了，未及学业完成，就毅然决定于1950年底回到了祖国。

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对常沙娜的艺术才华，特别是敦煌艺术方面的造诣赏识有加，他们不拘一格地将其举荐到清华大学营建系任教。从此，改变了父亲让女儿终生从事绘画的初衷，常沙娜走上了一条终身为祖国从事艺术设计和艺术教育之路。

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设的百废待兴，为常沙娜的艺术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她先在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工艺美术教研室，随林徽音先生工作，在恢复并推陈出新我国优秀传统工艺方面，

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景泰蓝的新设计，在当时的工艺美术界产生了影响。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常沙娜与高庄先生等一起，来到了新建的学院，从此她与这所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一个年轻的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她随老一辈艺术家参加了许多著名的建筑的装饰设计，当时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实施时期，首都十大建筑的兴建，不但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大事，也是艺术界的大事，在社会主义中国新的意识形态下，如何创作出既要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又要反映时代面貌的作品，这是从旧中国过来的艺术家所面临的新课题，常沙娜参与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的建筑装饰设计，她作为主要设计者的人民大会堂的墙楣设计、宴会厅的天顶灯饰设计，民族文化宫的大门设计，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天顶的彩画设计等，充分体现了她的良好的传统修养，以及将它们与现代建筑风格结合的能力。这一时期，常沙娜还参与了有共青团团徽的设计、元帅服及勋章的设计等。当年的设计活动，尤其是这种政治性质很强的设计，都是以一种集体创作的形式进行的，也没有个人署名的习惯，大家都是为了能参加政治任务的设计而感到光荣。

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林徽因的亲自指导策划下，常沙娜设计了不少送给外国首脑的创新的景泰蓝、头巾等多项礼品。当这些散发着浓郁敦煌艺术气息的礼品被周总理、陈毅元帅带到万隆时，亚非国家领导人爱不释手，被称为是“新中国的礼物”。

在常沙娜先生的艺术生涯中最有光彩的一页是80年代初，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几个著名前辈艺术家的推荐下，出任学院的领导，开始了她在工艺美术教育事业的阶段。1984年，陈叔亮、庞薰琬、雷圭元、吴劳4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德高望重的老院长，在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年轻化的精神背景下，郑重选择常沙娜为接班人，她在初时的彷徨、担忧，到后来一步步成熟，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院长，为学院的建设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正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生活的变化日新月异，从“文革”十年禁锢中走出的中国人民，对生活美化的提高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作为当时全国唯一的艺术设计高等

院校，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开放的中国，使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大量的进入，在国际艺术设计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的消费文化趋向面临着种种问题，经济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它本身的事，而关涉着民族文化的建设和意识形态。这时期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就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它的原来的体系是以装饰绘画风格见长的，70年代末期的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的创作，曾在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美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开创了一代美学新风，然而，“装饰”在工业化社会中，与生活的结合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而不是全部，并且，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设计的因素大大增强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面临着转型，它的办学方向、培养人才的模式、教学方式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发展。常沙娜先生在老一辈艺术家的帮助下，团结学院的专家教授、广大员工，在系科设置方面，保存传统艺术精华，注重面向现代“衣、食、住、行”日用设计，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为当时全国系科设置最为完整的高等艺术设计学府；她主张加强基础教育，淡化专业界限，拓宽专业知识面的教育方式，成立基础部，形成了适应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体系；她还提出“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努力加强了学院与国外同类院校的学术交流，为艺术设计这门在国际上发展最快的学科，及时了解最新动态，保持与国际同步，为学院及时吸收最新成果，以形成中国自己的设计体系，创造条件。

这一时期，常沙娜先生为大量的行政事务占去了创作时间，但还是结合国家的任务主持和参与了一些重要的设计，如中央政府送给香港特区政府的礼物的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的项目，她从组织、安排，到雕塑的形态的创作，甚至基本形的草图，都亲自动手。她还应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的邀请，参加他提倡的“科学与艺术”的活动，创作了《雷神引能》、物质的探索《创天》等作品，作为高能物理所的年会的主题招贴。由此也聘请李政道先生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名誉教授。她此时已担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的职务，在国家的文化政策、文物保护等方面，都认真做出提案，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1998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了15年领导职务的常沙娜先生，因为年龄的关系，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原以为从此可安心

艺术创作了，但是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使她更忙，立法的审议、考察和调研，她从少年时期就已根深蒂固形成的使命感，决定了她那一代人的人生价值观。

常沙娜在考察之余，总是见缝插针进行沿途写生。作为女性艺术家，她有她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审美趣味，她喜欢花卉是有名的，当年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始教学生涯，是在染织美术系，她有在敦煌时养成中国传统图案的深厚功底，又有在雷圭元先生影响下的现代图案学体系的滋润，她的以花卉为主的绘画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她对花卉有着深刻的认识，正如她在《花卉集》中所说：“为了捕捉大自然中形态各异花的风姿和色彩，留下各种绮思的记忆，丰富我对装饰图案的情趣，我用了几十个春秋寒暑不间断地绘录了一批‘花’的形象。她们与人一般，有着各自的性格和容貌，有清淡素妆的，也有艳丽浓妆的；有纤细秀丽的，也有粗犷浑厚的。她们都毫不掩饰地真诚地展示着自身的特征，为我提供了再现美的灵感和素材，这大自然纯真的写照，是我思绪变化的记载，也是我对大自然美的憧憬。”

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常沙娜先生的花卉创作，跨越了30余年的时光，不但在出差会余、课间示范和业余时画，甚至在70年代初，下放河北农村劳动时，也背着人画，她回忆，“在那个生活枯燥、感受迟钝的年代，我竟在野地里、菜园里惊喜地发现了一些不起眼、不知名、兀自绽放的极可爱的小花，还有我们常吃的土豆、扁豆、花生……却从未见过她们的花和叶，她们为人类孕育着果实，做出了这样大的贡献，人们却从不认识她们的姿色，这些花儿默默无闻地开得这样纯真好看，花、叶的形态和色彩配置的如此得体，富有天然完美的装饰性。所有这些激起了我动笔的念头”。

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常沙娜艺术作品展》中，有许多素不相识的观众，母亲带着孩子，老师带着学生，她们是来感受这些作品中的自然之美，一叶一花总关情，在当代信息社会的快节奏中，这种赞美自然美的作品，无疑有她更深一层的价值，现代都市中不乏有温室里养成的鲜花，但是那些大自然淳朴的花草已经变得奢侈，观者怀旧和向往的心情，都是为了未来。

对美的坚持

回顾常沙娜先生几十年的艺术道路，虽然她的生活和艺术更多地服从于党和国家整体需要并受到深深的影响，但是，可以看出，作为常书鸿先生的后代，她的艺术思想与她的父亲一脉相承，这是一种精神的呼应，是对工作的执著、负责，是对美好的始终坚持，在当代艺术人生剧烈的变革背景中，是有不平常的价值的。

1982年，常沙娜担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1983年任院长，直到1998年退出工作岗位。她同时还曾担任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在教育岗位，她以严格著称，对学生的学业严格，品行严格。她在带研究生的同时，还始终为本科生班上课，坚持每个学期在教学第一线，通过上课了解教学实情，这不仅可把自己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也可最直接地了解学生，与他们融为一体。对社会工作，她始终抱着认真、饱满的态度，体现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良心和责任。

1983年至1998年期间，一直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职务。从1973年起，她在中央工美从事建筑装饰设计、印染设计教学达40年之久。近年来，她还参加了奥运会会徽中国印“吉祥物”——福娃、福牛等设计的评选工作，对奥运精神有着浓厚的感情与深刻理解。

1997年香港回归，她主持并参加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赠香港特区政府的纪念物“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以及有关敦煌风格的壁画创作和花卉的刺绣挂屏等。

常沙娜先生非常注重祖国的传统文化。她说：“我认为国家文物局应该和电视台合作，拍一些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电视片，介绍一下意大利、希腊等国家保护、开发文化遗产的经验。譬如希腊有很好的文化遗产，他们也存在旅游带来的问题，他们也进行开发，关键是怎么开发。对中小学生也要宣传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最近听说，当向小孩介绍孔子的画像时，小孩就说‘这不是圣诞老人吗？’你看，我们的孩子对传统文化已经陌生到了这个地步！所以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在‘文化遗产日’应该开展相关活动。”

“中国文化无论怎样与外国交流，但我们的根、我们的文化与

传统，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的“中法艺术交流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上，常沙娜的发言意味深长。“我们的民族有我们的传统和特色，要以‘特色取胜’，这些永远都不能丢掉。”

常沙娜常说：“我这一生深受父亲的影响，他永远是我做人的榜样。父亲 88 岁时，曾写给我几句话‘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决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父亲在 1980 年的 8 月说‘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应该是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我也赞成‘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的说法，会始终记着父亲对我说的这些话。”



齐心 古城守护

文:吕频

以历史本来的面目保护文物。

齐心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拓展了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倡导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她认为只有东西方文化的良好融合，才是人类未来真正走向和平的渠道。

1961年，齐心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北京市文博系统工作，先在首都博物馆工作，从事考古发掘，室内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齐心一直在该系统领导岗位，担任了北京文物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会长、中国文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她领导、组织、策划并长期亲自参与了北京地区的大部分考古工作，齐心用她生命中最多的精力来研究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和演化进程，她的研究方式主要是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组织多学科专家进行综合研究，将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过程脉络清晰地呈现出来。

著名的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的墓葬就是她参与清理，并和同事们一起撰写了发掘清理报告。她在担任首都博物馆副馆长时，正

逢文化大革命结束，她设计组织领导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展陈，也是首博第一次将曾经在北京地区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契丹、女真这两个民族出土的文物摆放到了显要的位置，特别在北京房山金皇陵出土的镏金面具，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并通过这次长达5年的展陈，使人们认识到，北京在900多年以前，作为南北两个王朝北方王朝的首都，影响到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后来北京长期成为中国的首都，和这两个民族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齐心在实际工作中重视考古研究技术的逐步现代化，对科学考古和传统考古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运用。

1985年开始，她领导了对女真族的皇帝陵墓的调查，使用物探手段，静电方法，对地下遗存文物进行无损探测。经过这次探查，基本将金皇陵的范围、主要墓葬位置、陵区建筑遗存都调查清楚了。为了验证物探结果，她成功地组织了试掘，将睿陵（金太祖完颜阿古达的墓葬）陵道打开，接近墓门，将验证结果得出科学结论后回填。后来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取得了重大突破，被评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遍地是宝的北京

北京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文化融汇交流的中心。对于这样一个看起来显而易见的命题，齐心要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她已经带领她的同事们在整个中国大陆深挖考证了整整34年。在这34年中，齐心和她的同事们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物研究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证实，并对古代胡汉交流和融合的方式与区域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根据齐心和同事们的发掘研究发现，胡汉文化交流融合主要在3个区域：西辽河、永定河流域，晋北地区，黄河以北地区。这一发现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赞许和普遍认可。

齐心说，通过考古发现，北京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的特色，也有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特色。北京是辽代以来的都城，是契丹、女真、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的重要活动地带。齐心和她的团队发掘了在北京的辽、金、元等朝代的墓群，齐心说，这些少数民族墓群及其中的文物，说明当时这些民族已经与“老家”决裂，与汉文化融合。这是北京建都850多年的最重要意义，在这850多年中，汉族和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在这座城市里共同生存并逐渐融合。

门头沟龙泉窑发现的辽代瓷窑，说明瓷器技术在逐渐向北发展，辽代的北京不仅有了瓷器，而且还发现了辽三彩，而“三彩”曾是汉族的独特工艺。

而事实上，北京的历史远比其作为都城的历史久远。齐心和她的团队发现，北京建城已经3,000多年，在成为都城之前，北京就是边陲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关外民族要入中原，必先夺北京；关内民族出关，也必先夺北京。

经过齐心的倡议、策划和组织，1995年，为了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北京举行了燕文化国际大会；2003年，又举行了纪念北京建都850年国际文化大会。这两次大会都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使北京作为燕文化的中心在国际上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和地位上。

而这些，都是建立在扎实的考古和研究的基础上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齐心亲自参加了许多考古发掘。比如大宝台的西汉墓、前面提到的金皇陵。

20世纪80年代，考古的条件很差，设备落后，资金紧缺。那时交通也不方便，由于路况等原因，乘汽车还常有生命危险。队员们经常风餐露宿，很多人都患了关节炎。但是，对任何一处古迹、墓葬、遗存都要进行彻底发掘整理，找出内涵的文化。齐心深刻地记得，有一年腊月，她所带领的考古队在北京郊县昌平发掘元墓，到了大中午没有饭吃，周围没有饭馆。最后只有到农家买了几个凉油饼，就蹲在墓后面吃了。通过齐心的组织领导发掘，北京的历史文化遗存已经成为系统，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代表性遗址和文物，北京地区系统地建立了自己不断代的历史，是和齐心的工作分不开的。

以历史本来面目保护文物

齐心说北京遍地是宝，强烈主张在任何基本建设，如房地产开发，社区改造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文物勘探。根据对历史和文物线索的把握，齐心和她的团队会进行主动挖掘。但是很多时候，不得不进行被动挖掘：北京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经常会在施工的时候发现地下文物，这时就需要抓紧发掘、保护。在当时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文卫体委委员的齐心和众多人大代表的共同努力，得以切实贯彻执行关于在各种建设中必须首先进行文物勘探的规定，北京的公路建设、东西两厢的建设、天然气管道建设等，开

工之前文物单位都要先探测、发掘。

2004年，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修建五棵松体育中心，在挖地基的时候发现了古墓，经过考古挖掘，发现了40余座古墓和其他文物，当时齐心曾对发现的文物进行鉴定并通过电视台宣传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当然，在被动发掘中，齐心和她的团队经常遇到困难。虽然事先发掘对施工单位也有好处（比如地基的牢固程度等），但是在利润驱动下，有的施工单位经常对考古队进行催促、阻挠，有的单位甚至发现文物不报告。而且，还有的人隐藏甚至哄抢文物。

但是在齐心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北京的大量文物得到了发掘和保护。考古的成就和技术的进步让齐心感到欣慰。“现在武装起来了”，她说，设备、交通、工具都有了很大改善，队员的待遇也要好多了。

在考古的设备和技术上，齐心下了很大的工夫。“现在我们发掘文物，不再仅仅依靠洛阳铲^①了。”齐心说，“这些年我们引进了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基本上跟上了步伐。”齐心并没有丢弃中国的洛阳铲，而是结合国外的物理、化学技术，中西结合。

通过对考古技术、设备的运用和思考，齐心对考古学进行了全新的定义。“事实上考古是多学科的结合，是一门边缘学科。”她说在进行实地考古研究的同时，要对学科进行拓展。

由于在考古学上的卓越贡献，齐心被委以重任，她不仅是文物研究所所长，还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文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考古学会会长。由于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增多，加上年龄不饶人，齐心近几年主要是从事策划等指导性的工作，比如学术论坛、科普讲座。

2002年，已经66岁的齐心往返北京市城内外投入更多的精力保护文物。她提倡以历史本来的面目保护文物。出于职责和对文物的热爱，齐心为保护北京的文化遗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对北京市文物保护的政策和措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她为保护文物专门设计了图文并茂的书籍，并亲自撰稿。《图

^① 洛阳铲，又叫探铲，是考古学的工具，是一个半圆柱形的铁铲。有柄的一段可以连接长的白蜡杆。要探测地下文物，可把洛阳铲垂直向下戳击地面，将地下的泥土带出，挖出一个直径约十几厘米的深井，探测土质。

说北京史》一书获得国家图书奖，她编撰的《北京名匾》、《老北京城与老北京人》也都是保护北京文物的力作。

考古见证文化的融合

齐心在学术界备受尊敬。她孜孜不倦而又无私奉献。她经常把自己搜集的资料无偿提供给其他研究者，论文经常也是她一字一句修改的，有时候，一篇论文的修改要占用她很多时间。而通常她并不在这些论文上署名。

齐心乐于为他人做嫁衣裳，她经常为别人的论文和著作作序，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推介。特别是对年轻人，她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指导。单是为这种考古文物著作作序文，齐心就写了100多篇。她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生，帮助了众多的同行。

齐心参与撰写纳兰性德基志的研究。纳兰性德是满清贵族，却对汉文化有着极深的造诣，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大词人之一。纳兰性德的经历和成就体现了关外游牧民族和汉族文化的融合，这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演变的重要历程。

齐心也是满族人，她也是中国民族文化融合、古今文化融合、中西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注脚。面对如今东西方文化冲突严重，不断引发暴力事件和战争，齐心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拓展了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倡导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她认为只有东西方文化的良好融合，才是人类未来真正走向和平的渠道。她论证了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原的汉族也曾经将北方等少数民族作为夷狄，甚至要扫荡消灭。但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后，主动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推广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延续和发展了华夏文明，齐心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少数民族有许多长处，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汉族一样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现在，56个民族和平相处，共谋发展，是一条积极的政策，会将曾经领先的中华文明坚持下去，并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外文化，东西文明的碰撞、融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文化将是主要的话题，在无战争的情况下达到共同进步，是各国和各民族最正确的选择。考古的发现和历史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附录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探询和平： 和平妇女的相关讨论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王康文集卷之六

在寻常中闪耀的和平的希望 ——妇女的不言之教^①

文：刘健芝

甘地说，以眼还眼，我们将全都成为瞎子。仇恨、贪婪、盘算、忌妒，犹如瘟疫蔓延般，把越来越多的人卷进暴力诅咒的瞎子命运中。

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的小说《盲》（又名《失明症漫记》），说了形形色色的盲带来更多更深的盲的故事：不知名的病毒在城中传开，患者突然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看”见一片厚实的白，与患者接触的人迅速被感染，于是，家人、医生、小偷、警员……陆续被送入隔离患者的集中营。营中，突发的盲给患者带来的“平等”与“相怜”只能是短暂的，抢掠、欺诈、霸道、残暴以加倍的力度掌控着、压迫着这个空间。过了一段时间，集中营已无人看管，也无人照料，因为全城的人都盲了。意识到无人看得见，几乎所有人的自律都崩溃，到处是不忍卒睹的抢掠、欺诈、霸道、残暴，只有唯一没有失明的人——医生的善良妻子——见证着暴力如何既出于不同的执著的盲，又引发不同的执著的盲，让仁慈施与的心失落。

暴力是来自死亡、封闭的国度的使者，在无名的恐惧和无穷的欲望所主宰的执著推动下，蚕食心灵的自由，蚕食让仁慈施与成为可能的智慧和勇气。在暴力主宰的世界里，“和平”成为延续暴力建构的体系的一个主轴，让暴力最终自毁的命运可以延缓。要打破暴力的主宰和诅咒，我们必须把“和平”从其体系释放出来，让暴力建构的体系所压抑的角度和经验能够发挥作用，为生命带来和平的希望。

盲目的暴力 暴力的盲目

20世纪在暴力和盲目中终结。

^① 此文章曾发表于《读书》2005年10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用上发明了才10年的轰炸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岛、长崎上空的蘑菇云宣告了军事科技嚣张的胜利。生态经济学家萨斯 Wolfgang Sachs 指出，1945年5月4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认为要结束战争和暴力，唯有全人类携手走上“发展”和“进步”的康庄大道；统率着这支浩荡队伍的，是科技、市场、国家、理性、自由。传统理念相信公义的果实是和平，如今取而代之的理念，是唯有西方理性带来的大一统的文明，才有和平。空间的多元文化，被诠释为时间上的阶段进化，野蛮人（或谓之落后、发展中、不发达）要在西方老大哥提携下，走向文明，走向和平。我们今日的两难悲剧是：追求和平意味着要消灭多元，消灭差异；追求差异意味着要爆发暴力。萨斯说，要走出这个两难，只有将“进步”与“和平”分拆开。^①

以“小的是美的”（small is beautiful）这个深睿主张闻名的经济学家苏马赫（E. F. Schumacher），在一篇题为《暴力之根》的文章中说，炸弹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但现代文明不仅不制约我们诉诸暴力的倾向，反而激励这种倾向。对客观和理性的盲目执著，是现代文明的罪魁祸首，导向无穷无尽的暴力（征服太空、征服自然、征服市场、征服他人），反过来主宰我们的心性和灵性的力量，使之无法克制现代文明不能自制的无穷欲望和恐惧。我们要自我拯救，便要培育非暴力的力量，它源自对生命尊重，源自谦卑节制，源自对公义的不可抗拒的追求。心性强于理性，暴力才可被制约。^②

21世纪在暴力和盲目中拉开序幕。

种种有形无形的暴力，通过媒体展现的既近又远、既似真实又像虚拟的暴力，不停迎面袭来，让我们反应不过来。

电视上播放的9·11事件中客机撞楼、人们从高处跃下的场景，与好莱坞的惊栗灾难片无异；影片《卢旺达酒店》重现了卢旺达种族冲突厮杀3个月内80万人死亡的恐怖；轰炸伊拉克的美军战机带着记者从现场传回类似游戏机荧幕上歼敌毁城任务完成

^① 参看萨斯：《发展辞典》，Zed，1992，英文版，103~105页。

^② 参看苏马赫：《我相信的是这个》*This I Believe*，Viveka，2003，英文版，189~193页。

的影像；互联网上可以目睹伊拉克蒙面枪手手起刀落、人质人头落地的“直播”；而全球每天有3万儿童因贫病饥饿死亡，只能成为一个数字，一个已经去掉震撼、伤痛的数字，尽管每天仍有3万儿童死亡。

让我们惊惶、恐惧、焦虑、不安的“深刻”经验，越来越建基于我们对日常生活里发生的种种的恶的无知；我们的无知竟然和资讯年代制造的广泛的“知”成正比，“知”得越多，经验越贫乏，以至“深刻”的不能是切身的。

以眼还眼的暴力既好像情有可原，却又无法为人接受。强权者的不公正，并不自动地赋予被压迫者更大的公正，即是说，并不因为对方邪恶，我便代表正义。弱势者的暴力反击，往往让压迫者更有借口滥用暴力，强弱更加悬殊。可是，反对暴力就等于反对革命、反对变革吗？就等于让弱者忍气吞声、接受现状吗？拥抱暴力就能推进革命、促成变革吗？就能解除强权恶霸的武装吗？怎样才可以走出暴力的恶性循环，有效地促进社会公正、深化社会革命，让平民百姓在面对似乎无尽的暴力与灾难的时候，不再无奈无力、犬儒卑躬，让“发展”“进步”等词不再为剥削、掠夺遮羞。

平凡的妇女 现实的反抗

越过主流传媒传播的根基于无知的资讯，越过眩目的暴力张扬的威霸四方的强权逻辑，如果我们能聆听和感触生命那孕育于同情、共鸣、相互依存、协力的悸动，以化解现代理性独语的孤寂和执著，我们可以看到，在并不轰天动地、显赫一时、名载史册的平常生活中，在似乎无尽的苦难、痛楚、郁结中，却有着惊人的生的智慧和勇气，有着情的不屈和创造力。

发起“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瑞士国会议员兼欧洲议会议员维尔莫-文高博士，以人道关怀访问中东、中亚、非洲多个曾被战争冲突蹂躏的地区，但她惊觉，富裕安逸的欧洲人，不是要居高临下赈济可怜的难民，而是要向灾难处境中表现坚强生命力的无数妇女学习。她感悟到，无论是战乱前后的蹂躏，还是长期困厄的折磨，社群得以存活下来，靠的不是国家元首、政坛权贵、富商巨贾（他们反而往往是剥夺平民百姓存

活条件的元凶)，而是默默无闻的平凡妇女那看似微弱的却锲而不舍的努力。

她想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10年之后，最好的纪念是让全球各地千千万万平凡妇女的不平凡事迹呈现世人眼前，让世界看到希望所在，让世界向她们致敬。就让全球千名妇女代表着千万妇女争评200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于是，一个寻觅和彰显平凡妇女的不平凡事迹的活动，从2003年开始，在全球各地陆续展开。在大部分地区，这个活动不为主流传媒追捧，不为精英阶层侧目，不为基金会、赞助商以至政府、非政府组织青睐。因为在趋炎附势、利欲熏心的“现代”社会，许多人即使对灰姑娘有兴趣，也只是对唯一一个能穿上玻璃鞋、摇身变成皇后的幸运儿有兴趣。千千万万穿着粗布灰衣的平凡的妇女，在穷乡僻壤，在边远社区，在艾滋病人、传染病人、罪犯、孤儿、穷人和各种暴力的受害者中间，不计成效地劳累苦干，不仅不引起人们的关心，反而被嘲笑为不识时务、螳臂当车。更不用说，她们做的尽管是小事，却可能踩着权贵集团的大利益，受到打击报复。

尽管如此，这个活动的理念，还是很快为基层实干者和追寻不同可能性的有识之士理解，在资金紧缺、信息难传的情况下，凭着朴实的理想和信任，活动开展。经过征集提名、核实身份资料、国内顾问审阅推荐、国际评委商议遴选之后，一个有代表性的千人名单，在2005年年初提交到奥斯陆，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千人来自超过150个国家，年龄从20多岁到80多岁，从社区和谐到种族和解，从自足生计到生态环保，从性别平等到弱势社群自强，从文化艺术到教育宗教信仰，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平凡妇女不离不弃的情怀、不可计量的承担，在她们留下的血泪印迹中，有着为自己为别人维护尊严、争取幸福的在时空中连绵回荡共鸣的会心之笑。

1027

净心明目 打破魔咒

千人中，108人来自中国地区。今年8月27日，在北京三联书店的会议室，21位“和平妇女”聚首交流，说着自己的故事，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时百感交集，潸然泪下，一时道破世态，开

怀大笑。会上心的共鸣、情的交流，难以言传，但还是想节录一些发言片段：

谢丽华：“我经常在各种评比活动中呼吁大家重视中国作为农业人口大国的实际情况，重视农家女的贡献，但一般的农家女获评奖的比例很小。这次，我非常欣慰的是，中国大陆 81 人中，15 人是农家女，在农村基层工作，显示出这次活动对基层妇女贡献的重视。”

徐凤翔：“我觉得我们这次活动非比寻常，在全球范围内，是一个大的理念上的突破，因为过去和平奖好像只局限在反战、政治上，我们这次是对和平的很全面、很完整的诠释。什么是和平？是人与自然如何真正和谐共处，是人的社会的各个层面如何和谐建造。我以前想，人家一个人得奖，我们要 1,000 人来作为一个提名，我们是不是以人数来凑数？再想想，我们 1,000 人，是代表全球千万妇女，不是个体，而是群体，像山峰，不是孤峰，而是群峰；所以，我们一定要争评，一定要评上！我们妇女在全球捍卫和平，是默默无闻但无处不在。不仅要讲国内的妇女的故事，还要讲全球各地妇女的故事。”

董秀玉：“这次活动重要不在结果，而在过程。这个过程让我们妇女的自尊、自强的意识加强了，也是妇女互相学习和自我学习的好机会。在三联，大家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不可救药。我今天听到那么多的发言，你们更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让我们这些理想主义者坚持自己的理想，为美丽的、公平的理想社会一起奋斗。”

张淑琴：“我为服刑人员无人照顾的子女办儿童村，孩子叫我张奶奶，有人叫我张主任、张村长，社会上更多人叫我丐帮帮主。开始办儿童村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指责我：你为什么不去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烈士的孩子，却要去帮助罪犯的孩子。我说，这么大的国家，我愿意帮谁，你管得了？我只是老百姓，我们努力要改变一个弱势中最弱势的群体的命运，帮助这些孩子度过最困难的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日子。当中的甜酸苦辣，我们都遇到。我们不光是理想主义者，我们还是务实主义者，真正做具体的工作。我们社会上很多人，指责腐败，指责这个那个，但很少从我做起。我们租了两百亩农场，种了 3 万棵枣树；我天天带着孩子除草，

为了能生存下去。早上5点，8岁以上的孩子全部下地，送到地里的饭，只是馒头和咸菜。我对孩子说，你们是苦孩子，我们是穷人家，穷人的孩子要早当家。有一个几个月的孩子，父亲是逃犯，落网了，孩子一个月送不出去，就转给我。去年11月4日凌晨4点，我在福州火车站接过孩子，抱着这个10个月的孩子，我在月台上放声大哭。我们的社会丢掉了善良和爱心，我们要寻找回来的是中华民族的善良和爱心。”

看似微弱、看似孤单的个人故事，汇集成百人千人的故事时，让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真实的拼搏真实的哭笑中，培育切身的、深刻的体验，体验到强权暴力的虚弱，体验到看似无关痛痒、无足挂齿的平凡人的作为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让我们驱赶恐惧、净心明目，打破暴力和盲目的魔咒。

我不奢望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把诺贝尔奖的神圣光环摘下，让光点散落在千名平凡妇女身上。但我朴实的愿望，是每个人学习用另一种心去看周围的抗击暴力、建设和平的人，并非伟大得我们无法仰望，而是平凡到我们身边的母亲、老师、同事、邻居以至我们自身，都有能力做出一点点的事，让世界多一点点的温暖和希望，如小说《盲》里面的善良的医生妻子般，呵护着仁慈施与的心。

温柔的挑衅

——象征与真实的行动^①

文：戴锦华

象征性的社会行动

于我，“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其本身，便是某种另类的社会构想与社会行动。这不仅关乎战争与和平、男人和女人、主流和边缘、压迫与反抗、暴力与抗暴，而且关乎令沉默发声，令阴影闪耀，令别样的世界、别样的生存、别样的想象成为可能的努力。

这无疑是一次有着充裕的象征性的社会行动。尤其是那第1,000名：一位无名氏、一个空位。它不仅象征着挂一漏万的提名、评选活动中必然遗漏或忽略了的候选人，它更象征着占人类总数一半以上的女人，尤其基层、或底层妇女面对艰辛的日常生活时的顽强、执著与刚勇。这第1,000名，犹如此前的999名，可以是任何一个女人：任何肤色、任何年龄、任何国别或任何身份；“她”也可以是你或我。这一全球性的提名与评选活动，并非为了筛选或命名出1,000名女人，而是一次更深刻的显影的努力；然而，它所显影的却不仅是某些边缘和角隅，甚至也不仅是妇女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或妇女在（后）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而是显影另一个世界：一个遭遗忘、被抛出世界经济版图之外的世界，一个承受苦难、负重前行，却生机勃勃、色彩缤纷的世界。不仅是拾遗补阙，不仅是琐屑平凡。

于我，这次“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行动，是一次公开的挑战或挑衅。借用墨西哥恰帕斯州原住民运动的修辞：“温柔的狂怒”，我愿将其称之为“温柔的挑衅”。此处的“温柔”，并非反讽或正面凸显“女性特质”，而是旨在强调它的别样

^① 此文章曾发表于《读书》2005年10月。

和不同。并非剑拔弩张、摇旗叫阵，亦非正邪不两立，以悲情的正义张扬着敌手的邪恶。不，这份温柔的挑衅，只是借重显影，尝试呈现，柔声讲述：“我首先要你们看见。”透过1,000个女人的故事，看到那“颠倒的太平盛世”背后的景色，看到一份平常心下的平常人，看到迫近中危机和救赎这危机的微小却倔犟的奋争。如果你看了，并且看到，你眼中的世界会因此而不同；如果可能，“她”寻求的是一次边缘与中心的相遇。相遇，意味着相互的发现；而发现意味着彼此的改变。

温柔的挑衅

这份温柔的挑衅，首先挑衅着诺贝尔和平奖。不仅是挑衅其间昭然若揭的男性主导的世界：自1901年创立以来，在百年的时段中，只有区区12名女性获奖者；更是挑衅于类似奖项所呈现的世界图景与历史范式：那是为某些要人执掌着舵柄的世界，那是某些“决定性的时刻”——伟人们决定并拯救着人类的命运，那是精英间的对话，权力格局内部的纷争。它间或来自抗争强势的一方，但那常常是在旷日持久的对峙，巨大的流血和牺牲，无穷的承受和隐忍之后的、太迟的“追认”。即使抛开冷战和冷战逻辑的产物不论，在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名单上，不乏刚刚放下屠刀，却未必立地成佛了的屠夫。仿佛我们该感激他/他们的垂怜，令我们——手无寸铁、且无能为力的平头百姓免于再遭屠戮。

这一次，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纪录，甚或其提名人的历史纪录是如此不同：不是一个、三个或一个群体，充当着“改变了历史方向”的人物；而是1,000名——来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的，尤其是来自基层、来自民间、来自无声的深处的女人。以1000对1，并非以她们的微末和无名叠加来对抗伟人的崇高和英名，而正在于以1000之数，呈现多数与群体。那是象征秩序中的集体对个人，草根对精英。那无疑是些“小写”的历史，但它间或是“历史”的原意：不是决定性的时刻，而是绵延不绝的努力、建设、挣扎和抵抗。

这份温柔的挑衅，同样面对着和平的理念。和平，直面的不仅是战争；和平的定义，也并非“两次战争间的暂歇”。和平，意味着生命与人类生存自身。它因此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暴力：贫

穷、饥饿、瘟疫、犯罪和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的破坏，面对着今日世界的冷漠、遗弃、偏见和歧视。和平的努力固然在尝试制止战争的时刻；和平的努力，更在于为人类呼吁、争取并保有一个安全的世界。威胁这安全的，不仅是战争，而且是间或曰发展、曰开发、曰效率、曰利润的“现代”逻辑。我们去寻找、讲述、书写全球1,000名女人和她们的故事，不仅在于展现或改写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而且在于展现一个我们置身其间的隐形的世界：一个处在几乎不间断的“区域性战争”中的世界；一段处于和平年代，却缺少安全的生存环境、宁谧与和谐的世界；一个空前富足、却在急剧而巨大的贫富分化间岌岌可危的世界；一个过度开发，以致资源行将殆尽的世界。

这份温柔的挑衅，同样面对着女性主义自身。面对着全球女性主义自身的机构化、学院化、“NGO化”，面对着迟到、却相当迅速、有力的女性主义学者的精英化与启蒙姿态。我期待着1,000名女性的“一长串名单”和她们的故事展现一个并非局限在“女性主义”视野中的世界，我们会看到那世界不仅是女人的世界，那微末却巨大的努力不仅关乎女人。这一行动的象征意味正在于，女性或许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被主流固执地指为弱势群体的符号，“她”可以是女人，也可以是任何一个长久地被无视、被轻蔑、遭放逐的社会群体。尽管如此，她们却未必真的在这遭压抑、放逐的历史中变为弱小、无助、异样或孤独。这些来自基层、来自草根处的女人的故事，将拓展我们的视野，撼动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种种观念的藩篱。面对着全球化的世界，女性主义应该、能够也必须成为一份别样的思想资源，前提是它不为新的女性精英主义所覆盖，不为狭小却强力的权力空间所污染，不为诸种国际基金会的寥寥金钱所淹没。它的生命与成长在女性群体和众多主流视野之外的社会群体的互动与抵抗之中。

真实的行动

这是一次象征性的行动，更是一次真实的行动。借助提名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组织、动员，实现着一次久遭搁置的全球性的妇女间的互动与相遇。以一次共同的行动为媒介，遥遥相隔，被种种藩篱、雾障所隔离的女人们得以相遇。如果她们尚

不能因一次行动而彼此相逢，这一行动至少可以令她们彼此相知，并超越国家、地域、语言、肤色的间隔，彼此注目，获知自己并不孤独。在这强强联手的世界里，这是别样的结盟。

作为一次真实的行动，其意义并不意味着争评活动的成功，即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降落凡尘。若果然如此，当然大可称幸：因为那如果尚不意味着转变的发生，至少意味转变、或称某种松动的开始。于我，对诺贝尔和平奖的选择若非纯属偶然，或温柔的挑衅，便仅仅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理由或借口。借此，一个全球妇女间的行动得以发生、得以展开、得以延续。无论成败，这行动都不会终于颁奖的时刻。

不论在名单产生的过程之中，还是在颁奖时刻之后，于我，这一行动最为真实和重要的构成，便是书写那全球千名、中国区108名候选人那千人千面、又心意互通的故事。讲述自己的故事，记述他人的故事，令这些平凡女人的故事在全球流传，其自身，便是一次至为真实的社会文化行动。因为故事、讲述、口耳相传原本是古老而有效的传承知识、累积智慧的方式，而且是遭到现代文明、工具理性直接压抑的方式。这一次，我们正是要以故事直面资料，以情感、爱、梦想的逻辑直面所谓理性，以具有充裕象征性的千名妇女的生命际遇面对钢筋水泥的现代丰碑。讲述或吟唱，微笑或泪水，那其中是血与希望的潮汐。

1033

那故事已由无数正获命名、或有待去命名的女人的生命写出，它们正在被讲述和记录，它们正在为无数同样有名或无名者书写，它们将以口耳相传的速度传播开去。当然，我们不会拒绝现代媒介为这故事插上或许是电子的翅膀，但它寻找的是人类的眼、耳、口、心为其落脚、栖息之所。

在遥远的墨西哥恰帕斯州，一个携枪蒙面的说书人曾写道：“灰色可能获胜。急需彩虹。”千名妇女那长长的名单，她们那令你赞叹、令你落泪、令你微笑的故事，将是一道彩虹，一抹别样的色彩，一个开启想象的入口。

妇女、和平与女性主义^①

文：陈顺馨

一听到“和平”，你的脑海是否马上出现“战争”？还有男人？

的确，对很多人来说，“和平”是一个相对“战争”的概念，因为我们在传媒看到的“和平”事件，大多是一些国家元首签署和平协定和握手，或者是联合国某大使在发生冲突的民族或国家之间斡旋，而这些元首和大使，大都是男人，好像男人在缔造战争的同时也缔造和平。

妇女与和平

因此，200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肯尼亚的妇女运动与环境运动推动者马塔伊（Wangari Maathai）的时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不是因为马塔伊是个女人，而是认为“环保”与“和平”风马牛不相及。就此，马塔伊回应道：“很多战争都为争夺资源：中东战争为了争夺石油、水源和土地，非洲战争为了争夺矿产、木材。我认为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眼光已超越了战争本身，已到达如何防止战争发生的层次上。”她还精辟的说：“善用资源，我们便播下和平种子。”（“和平奖得主、肯尼亚“树女”绿色抗暴—Wangari Maathai”，《明报周刊》1875期，16/10/2004，50页）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更为马塔伊对于和平的理解，加上一层性别色彩，说马塔伊是“用神圣的方式让可持续发展与民主人权，特别是女性权利，拥抱在一起”和“把科学、社会责任与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她的策略远不止于保护环境，而是确保并强化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非洲环保女斗士夺和平奖”《明报》A20，9/10/2004）

马塔伊不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而是100多年历史上的第12位。在这12位女性当中，有不少政治精英，如

① 此文章部分内容曾发表于《读书》2005年10月

1991年获奖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 (Aung San Suu Kyi)、1976年获奖的反对北爱尔兰宗派暴力的威廉斯 (Betty Williams) 和科雷根 (Mairead Corrigan) 等, 也不乏个别出名的妇女领袖, 如2003年获奖的伊朗人权律师伊巴迪 (Shirin Ebadi)、1979年获奖的印度扶贫工作者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等, 而从国籍或族裔看来, 早期的获奖者还更多是来自欧美国家的, 如分别于1931年和1946年获奖的阿扎姆斯 (Jane Addams) 和鲍尔奇 (Emily Greene Balch) 均为“促进和平自由国际妇女协会”的组织的美籍成员。不过, 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由男性和精英主义主导的诺贝尔和平奖所体现的和平概念, 大多离不开防止国族、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战争, 以至修补这些冲突和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 如地雷、疾病、不安全、冷战等。虽然偶尔出现一些如德兰修女、无国界医生这样的获奖者, 但也难突破主导的“和平”概念。这次马塔伊获奖, 虽然仍然带有某种精英色彩 (她是肯尼亚的副环境部长和生物学博士), 却打开了“和平”工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即把保育环境和提升权益意识作为防止一般为争夺资源而发动的战争的策略, 而环保工作与妇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结合的, 而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所指出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 必然包括种树运动带来的人文生态改变, 即妇女从运动中获取的人权和妇权意识, 将成为她们持续这些工作的动力。

妇女与战争

在女性主义和平论述的脉络里, 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发展轨迹。女性主义的和平论述, 始于对“战争”的批评。“战争”在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是实存意义的战争或冲突, 无论是国家、种族之间或者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 第二是抽象意义的“战争”, 包括用一些具性别主义色彩的“军事”术语或战争语言。女性主义对于实存战争的批评, 首先是针对战争或冲突发生时对于女性所造成的伤害, 包括性侵犯、强迫性性服务或逃避外族男人的侵犯而自尽, 例如二次大战中的“慰安妇”、1947年印巴分治时的妇女集体自杀、1999年的印尼种族冲突中被集体强奸的华裔妇女等 (详情可参看《读书》1999年3月由刘健芝、戴锦华、陈顺馨、孙歌写的一组有关“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其次, 女

性主义针对战争武器制造过程中对于女性、儿童、少数民族、贫
穷者以至生态环境的伤害，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铀矿工
人主要是印第安人，而大量放射性强的铀废料也弃置在印第安人
的土地上，以致当地年轻人患上生殖器官癌的比率是全国平均的
17 倍。第三，女性主义批评指出女性在反战活动中所扮演的积极
角色，例如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运动的参与者，20 多年来没
有停止过逢星期四在广场集会，要求寻找在独裁统治时期失踪的
孩子，争取民主政治。在批评“战争”的象征意义方面，后现代
女性主义者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战争化语言，例如把女性的身体/生
育书写为男人的性战场等，是建构和巩固战争的“自然性”的
重要元素。此外，“策略”/“战略”作为一种战争语言的日常化，
巩固了我/他者、同盟/敌人的二元对立思维，因为我/同盟时常要
找出一个需要征服的他者/敌人。生态女性主义者更进一步批评这
些象征性语言不仅把女性放在被男性“征服”的位置，还把大自
然“女性化”，任由人类“征服”，例如美国称拒绝核武器或核舰
艇进入其海域的新西兰为“核处女地”和称印度首次试爆核弹为
“失去了贞操”。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者来说，把征服他人/他邦/他
族或大自然视为常态的“战争主义”，与视征服女人为理所当然的
父权意识是相通的，因此，如用女性主义的眼睛来看和平，任
何人都不应在不考虑妇女和大自然的利益下鼓吹战争、暴力、军
国主义、地区冲突和民族矛盾。

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女性主义者和平论述，并不意味着女性
必然是“不战主义者”。意思是说，有些女性主义者赞同参与
“正义战争”，例如一些民族解放战争被视为有助于解除危害女性
的家庭和国家利益的外在力量，但另一些女性主义者则指出这样
的战争伦理不是没有矛盾的，即以暴力来解决问题仍然是一种
“男性”的角度和方法，因此不应参与。然而，把女性本质化地
理解为和平主义者也有其问题，因为堕入了定型化的性别化想象，
即女性天生是“自然”的、母性的、只停留在“私”领域的。不
过，一位女性主义者罗迪克（Sara Ruddick）提出了一种“母性和
平政治”概念，认为来自母职（照顾者）的母性不仅包含爱、关
心和责任感，还有抵抗，因为母亲必然经历与孩子、家人或社会
发生冲突或产生矛盾，那么，关心孩子的母性必然成为重建和平

关系的重要力量，例如阿根廷的五月广场母亲。推广至国际问题上，“母性和平政治”则意味着“自我克制、抵抗、和解与和平共处”，而“和平工作者需要制造和平的土壤——对于暴力的怀疑的共识，以及推广学习和实践非暴力抵抗与和解策略的生活方式。”罗迪克的“母性和平政治”也受到另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质疑，例如母职的实践为何最适合于发展国际间的关怀伦理？母亲与孩子之间是否不存在权力关系等。

和平妇女——平等、公义、权利

上述的女性主义和平论述，仍然倾向把“和平”跟防止“战争”或改善国际关系扣连在一起，而未能触及日常生活的层面。1999年，“美国和平学院”曾经召开一个有关妇女与和平的研讨会，与会者提出这样的观点：“把和平定义为‘非战争’，所忽略的是妇女在非发生政治暴力冲突或者是冲突发生后的时期所面对的各种暴力，包括家居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暴力……也未能针对构成暴力冲突背后的不均权力关系问题。”（Donna Marshall 2000: *Women in War and Peace: Grassroots Peacebuilding*, Peace works 34, US Institute of Peace）她们认为，和平应该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文化与生活方式包含对平等、公义和权利的尊重，让所有人（特别是最容易受到暴力冲突所伤害的基层妇女）都能够享有一个安然的生活环境与发展机会。马塔伊的工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和平理念，而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计划所提名的千名妇女的实践经验，将更全面地和有力地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和基层妇女的经验出发，改写和平的概念与和平工作的性别内涵。

虽然像马塔伊那样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地推动和平工作的千千万万妇女，不需要诺贝尔奖来肯定她们的贡献，但诺贝尔奖作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象征意义的奖项，的确可以引起较大范围的关注与讨论，有助新的方向的和平工作的推进。不过，“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并不是以是否获奖来衡量这个活动的成败，而是着重推动提名与研究记录工作过程所产生的讨论、关注与投入，以至日后中、港、台和平妇女的联系、互动、交流以至合作，以实际的行动推动和平文化的建设。

希望的土壤^①

文：刘健芝

我带着12月昆明“和平妇女”聚会的激动，走进2006年。

2006年，似乎没有迹象显示新世纪头5年的动荡、苦难、暴力、疯狂有所减缓；相反，延续了5个世纪的殖民历史仍在肆虐。一方面，今天资本主义的特色是金融资本投机；每天全球流通“交易”的资金达15,000亿美元，95%以上与实体经济无关。然而，这不意味对资源的抢掠已近尾声。占全球人口4.5%的美国，单是石油便每天耗用2,200万桶，占全球用量的1/4；对产油国的侵略与操控，是美国的基本国策，尽管它以各种口实为其军事和经济霸权辩护。还记得，BBC英国广播电台播出了2003年美军攻陷伊拉克时，美国总统布什对伊拉克民众作电视讲话，又散发阿拉伯语传单，说：你们从侯赛因独裁中解放了，你们自由了，我吁请你们好好保护你们的石油，不要让人破坏。美国似乎觉得无须掩饰垂涎伊拉克油田的真情。

2006年，伊拉克已经进行了大选，袭击美军和警察的自杀式炸弹事件几乎每日发生，侯赛因的法庭审讯开始了，美国大企业包揽了巨额的“重建”合约，伊拉克的石油产量稳定在每日生产200万桶。美国尽管有来自多方迫其从伊拉克撤军的压力，却又在准备舆论，为攻打伊朗造势。

9·11事件，一度为美国政府肆意利用，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缩减社会福利，加强对少数族裔和异见人士的监视和拘禁。联合国人权报告公开抨击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岛非法关押及虐待囚犯——布什在9·11事件之后破天荒地不是向任何国家而是向“恐怖主义”宣战，被美国政府不经审讯长期关禁的“嫌疑恐怖分子”，被冠以“战俘”之名，“正常”的法律程序赋予的有限权利被剥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支持报告的建议——审讯或释放被囚者，关闭关塔那摩营。美国的回应是，报告不实。

① 此文章部分内容曾发表于《读书》2006年5月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但是，9·11事件在民间引起了广泛的反思。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国一名帝国“经济打手”珀金斯（John Perkins）无法再忍受沉默，撰写了一部自传，述说他亲身参与的美国帝国侵略行为，成为高踞《纽约时报》排行榜榜首的畅销书。如果说，著名拉美作家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以史实描画了五百年的拉美血泪史的话，珀金斯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则以平实语言说了他自己的故事。他从来只受雇于美国工程顾问公司，没有直接收受中情局或美国政府的俸禄，但是，他的确服务于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企业的利益。此书成为畅销书不无理由，它的真人真事情节比侦探小说的情节来得更蛊惑惊心。珀金斯出身卑微，妻子的叔叔任职国家安全局高层，把他训练成为第一代的“经济打手”，以一家大顾问公司 MAIN 的经济顾问角色，被派往全球各地完成被指派的任务。例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哈图在 1965 年发动政变，屠杀了估计 50 万的共产党人和异见者，得到美国大力支持，成为亚洲反共先锋。1971 年，珀金斯被派往印度尼西亚，任务是搜集资料数据以论证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如果广铺电网以进行现代化（尤其是供电给石油开发和运输管道），印度尼西亚未来 25 年的经济预测是每年增长达 17%。结论先行，资料数据以“专业”经济统计数字加上“大胆推算”，象征性地“说服”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作大笔贷款（条件是工程合约批给美国企业，亦即贷款实际给了美国企业），这种工程对印度尼西亚是肥上瘦下，欠下的巨债确保了印度尼西亚的资源（石油和森林资源）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上，政治上也当然只能成为美国亲密盟友。珀金斯以相若的手法，在沙特阿拉伯、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完成了“企业帝国”的现代殖民大计，直到 1980 年，他因内疾把灵魂卖给了金权魔鬼，而辞去经济顾问一职。9·11 事件之前，他多次想撰写这段故事，但或被人高价收买、或恐惧遭遇报复而罢休。9·11 事件让他看到美国这个全球帝国如何招惹了被经济殖民的民众的公愤，他撰写这本书，是要吁请美国人起来阻止企业帝国的扩张。

珀金斯引用了多个例子，说明经济杀手的伎俩无效时，军事

狙击手如何出动：不愿就范的厄瓜多尔总统洛尔多斯和巴拿马总统托里霍斯在1981年相继在5月和7月飞机“意外”中死亡，许多线索显示是中情局的杰作。暗杀行动也不能得逞时，如1989年的巴拿马和2003年的伊拉克，便是公然的出兵。珀金斯列举的许多事实，其实不是新鲜事。众所周知的是世界银行总裁麦克纳马拉曾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也曾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时期的国防部长；国务卿如舒尔茨，国防部长如温伯格，都曾任美国十大企业的总裁；布什家族的石油生意，自不待多言。但仍有人拒绝正视世界银行、美国政府与石油、工程、军工企业共建的军事、政治、经济帝国，宁可相信美国代表人权、民主、法制的现代文明正是范本。

也许，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人们何以不愿正视摆在眼前的事实——美国的骄人成就，是用血腥暴力的现代殖民手段建立与维护的；二次大战后联合国声称的所谓通过经济发展达致全人类进步，所谓彻底地消灭暴力与战争，只不过是推行以西化为典范的单向发展模式，以“自由市场”的专制把人和物变成予取予携的资源，可尽情盘剥也可任意淘汰。在所有国家，人们似乎别无选择地要走现代化道路，超英赶美，稍有能力，跻身加入抢夺石油矿藏、商品市场、金融投机的“现代”空间，而且也是别无选择地师从美国的霸道逻辑；稍欠能力的，便只能接受被遗弃的命运。今日，在人均产值成为衡量社会的发展和福祉的重要指标的同时，抽象的指标所不能道出的浪费、破坏、不公，便成为在所难免的牺牲，成为“我们”“必须接受”的代价。这样的衡量标准不但在沾沾自喜中淡化社会分化展示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公、伤害，而且要承受代价的“我们”一词，巧妙地避开了以下问题：是谁付出了幸福？是怎样付出的？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环境破坏、大量人群被排斥到起码生活保障网之外，冲突、矛盾、战争的威胁渐次加剧。但是，为什么，人们仍会有那份信心去肯定国民产值所标示的“发展”呢？着了贪婪的魔，任由贪婪驱策，只能看到心魔准许看的东西，这自然是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心还有一个靠山，就是相信现代西方模式的“发展”是人类走向和平、维系和平的道路。

珀金斯的自白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故事，但他的自白不仅仅是忏悔，也是醒觉，因为他没有放弃，他要扭转他有份参与制造

的命运，所以，他返回南美丛林的原住民部落，协助那里的人们抵抗贪婪的魔手对部落的侵犯，也在原住民部落的生活智能、取舍价值中看到希望。

的确，全球范围以至各国内部的贫富分化有增无减，饥饿贫穷每年吞噬超过一千万人的生命，但在同一天空下，是对贫穷与死亡视若无睹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在人均国民产值上升的数字装饰下，金钱至上、经济至上、物质至上、消费至上，象征了“文明人”的自由、身份和尊严。经济利益、经济考虑高踞一切，傲视一切，排斥一切。伴随着现代发展，渗透到所有“现代”社会的“文明”之中的，是无穷的贪婪自私、残暴不仁。

如果我们“理性”地放眼世界上强权肆虐的大逻辑，看到人类整体越来越深陷泥泞不能自拔，那么，似乎没有理由不悲观犬儒、沮丧沉溺。然而，希望却顽强地陪伴着苦难中的人们，孕育着生之勇气。于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中，往往开辟出现实中新的可能性，出其不意地超越“理性”的逻辑。

相信善良 实践仁爱

12月昆明和平妇女聚会引发的激动，正是“理性”的逻辑所不能解释也不能理喻的。

昆明聚会是在众多与会者噙着泪水相互拥抱中闭幕的。那说不出的感动和静静伴着这感动的希望，带着我走进2006年。马素密 Brian Massumi（德勒兹和加塔利著作的英译者）说得很好：希望与悲观乐观无关，希望深植于当下，让我们重新相信世界。聆听和平妇女的故事，与她们相处，尽管只是几天，但已让我深深体会到：希望不在于未来，而在于现在，在于当下正发生的人与事之中。来自香港协助组织昆明聚会的志愿者，兴奋地对我说，“和平妇女”真人比照片更美！是的，她们很美，我说。

美在哪儿？我想，是她们焕发着一种神采，不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大时代英雄那种壮烈崇高，而是让人感到亲切触动的、过人的坚忍执著，刻苦但不苦涩，在现实那往往让人以为昏天黑地、前无去路的时候，却充满创意，就地取材，另辟蹊径。这些和平妇女的故事不同于艰苦创业、终能飞黄腾达、衣锦还乡的名人故事的，是她们有一个“欠缺”：她们欠缺了对社会主流名利权势逻辑的拥抱。社会上，不难看到被金权魔鬼收买了灵魂的、像名

利兼收的经济杀手珀金斯之流，但如珀金斯般终于内疚忏悔、表白行动的，凤毛麟角；社会上，不难看到极尽能事、阿谀谄媚、心狠手辣、唯利是图的人，弄得头破血流惨淡收场的也不是少数。

但是，昆明聚会上，与会者相互感动的，是自己那平凡的生活实践出来的人生哲理，竟遇到那么多共鸣。尽管境遇不同，哲理却如此相近；要表达的话，也只能找到最为普通的、毫不惊人的语词——相信善良，实践仁爱。

仁、爱这两个字，在道学的圣贤书中，在媚俗的电视剧集中，在虚伪的政治家演说中，都不难找到。它们也难逃被高度异化的社会包装成商品在超市、在商场、在酒店，或廉价或高价地消费。可是，置于和平妇女生活中的实践，仁、爱，是以血以泪来呵护着的；以下的片段说起来好像没什么，长年累月挑的担子却是千斤重。

马志英，宁夏的回族妇女，下岗前是清洁工，收入微薄，先后收留 80 多位女孩在家，供养她们读书。每天只够得上吃白饭酸菜，现时家中仍有 14 位女孩；

张华，初中毕业后坚持留在山里小学教书，要等到最后 4 名学生毕业后，才自己上路；

殷玉珍，嫁到内蒙古几十里内无人家的大沙漠里，靠两口子经年劳动，治沙造林 6 万亩；

李春霞，下身瘫痪，中学寄宿时，晚上上厕所用小凳子帮助移行，得上两三个小时；自己坚持读书，也为女儿读书费尽心思；女儿现已硕士毕业；

徐纪英，几十年钻研茶树花，心里想着花，也想着艰苦的茶农；她的茶场免费让茶农来学习，她的茶树花是和平花；

陈玉英，十来岁在深圳致丽工厂打工时，在火灾中大面积烧伤，她咬紧牙关强忍痛楚存活下来，拄着拐杖，为工伤民工的福利奔走；喜闻她结了婚，生了小孩；

许金玉，在国民党监狱坐了 15 年的牢，无委屈无愤慨，争取社会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信念不改；出狱后用赔偿金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今年 75 岁，青春的笑容青春的心；

王树霞，五次高考都差几分进不了大学的农家女，白天种 20 亩果园，午睡时间在全村推广太极拳、经络疗法，晚上组织妇女文艺队，至深夜仍读书写日记；村民终于不再说她神经病、傻瓜，

反而推选她为妇女协会会长和合作社监督长；

丽君，为大家唱一曲闽语《幸福》——“你若问我什么是幸福，叫我怎么样讲，阮若是千金小姐，好命搁嫌不够，你若问我什么是人生，叫我怎么样回。阮不是在家闺秀，幸福欲叨位找。啊……啊……阮是野地的长春花，幸福是风中的蜡烛，咱要用双手捧，啊……啊……阮是野地的长春花。人生是暗夜的灯火，带咱行向前。虽然是给人看轻，行着这条路。阮嘛是饲家赚食，有什么通见笑。红灯路头街巷暗暗孤单行。唉呦换来一家的吃穿，我的人生呦。”深沉美丽的歌声告诉大家她如何顶着社会歧视妓女的眼光和举措，活得有尊严……

这些女性，在各种现实的限制中以智力毅力打造生机。她们不以“成功”“失败”来衡量自己的努力；或是挫折重重，或是柳暗花明，前路并无蓝图标志，但无限创意在发挥。

昆明会上，大家互通有无，依赖的是自身的力量。那是快乐和欢愉的时刻，一座座宝库之门打开。环保大使田桂荣把她的肖像权供大家使用，她希望大家协助她把污染村变成生态村。香港女工合作社的小黑和小孔说，她们开设的社区互助超市可以销售妇女的农产品工艺品。杨海澜可以传授在沙漠种植有机葡萄的经验，她希望以生态建筑方式造房。徐纪英可以传授茶树花开发技术，可用她的专利权协助妇女创业。王霞可协助推广妇女文艺演出队。王华连和许国兰，从江西扛来几十斤妇女互助储金会种植的有机百合，赠送给与会者。王选说她愿意提供国际间和平理性对话和解的策略。高金素梅以行动传暖意，在昆明气温骤降时送出棉大衣，又提出开演唱会为和平妇女活动筹款。瑞士联会的代表文哲博士也不甘后人，她的顾问公司可联络欧洲处理土地污染的技术。蒙古和平妇女更即时敲定协助中国农村妇女发展的项目。台湾和平妇女介绍她们反对台湾政府军购的行动，倡议两岸三地妇女携手反对全球的军备竞赛。

1043

孕育和平的土壤

我们知道，我们珍惜的这份相互间的信任和尊重，不是出于抽象的女性特质或姐妹情谊；我们呵护的善良仁爱也不是什么普世的、浪漫的价值。它是在相互关系中形成的生活实践态度，它让心灵相通并从中得到养分滋润。我们在苦难困境中挣扎着、坚

毅力寻找着出路的当中，我们感悟到如置身汪洋大海般渺小，事态十之八九非我们所能掌握，但每每渡过难关之时，我们又如沐浴在恩典中，因为当中依靠多少因缘巧合，多少善心的扶持相助。尽管在众多走出当前困境的实践中，因人因地因环境的不同而走出了不同的合作群体，孕育了不同的尝试，但众多不同的轨迹在相遇时却能闪耀着心灵相通的喜悦和鼓舞。在拥抱中，大家在拥抱着体悟渺小的智慧及从中生出的毅力。我们在拥抱中感受到让我们心灵相通的仁爱之心，是缘于对我们的渺小的体悟，它让我们懂得尊重生命及让生命成为可能的条件，它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因渺小生成的恐惧，懂得通过互相依靠和信任去安抚恐惧，避免让自己陷于恐惧的泥淖中，不能自己地要以排斥、控制、征服的手段去求安稳。

从文化角度来看，今天的全球化可说是美式生活的全球化，即身体是为了消费存在，美其名是现代文明的成果，高科技为我们带来了舒适的生活、健康的保障、长寿及层出不穷的新经验；但和平妇女通过各自的努力和实践，对这样的全球化说不。她们用她们的身体，跟大地——地球的身体、大自然——缔结了不一样的关系，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泛起了越来越广的涟漪，在缔造着不一样的全球化，缔造着互相尊重、对大地的尊重，成就了不问回报、只因感动而施予的心灵相通。这样的心灵相通为大家带来了新力量新启发，开创出之前不能、不敢想象的可能性，让当下的困境、苦难的经历不致凝固为怨愤的历史包袱，而是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希望的土壤。

是的，我们从人生的挣扎、经历的苦乐、执著的实干中，在活生生的个人和社群的历史中，在无法理性地、有先见地、有计划步骤地筹划未来的不确定中，就在每日由偶然因素碰撞出的我们立足的错综纠缠的现实中，因为我们有行动的能力，这些行动有牵引、碰撞、激发其他行动的可能性，于是，我们不断培植着希望由之产生的土壤。微弱的星火似瑟缩着，燎原时刻这星火也许已无迹可寻；但星火坚持存在，是要给自己、给自己的族群一点光和热。这一丁点儿的光和热，燃着希望。昆明会议后，来自香港的一行7人，到金沙江畔探望高龄80的白族和平妇女王品松。金沙江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民风淳朴；如果虎跳峡建起水库，将淹没十万村民万亩良田的家园。开发商要他们开出条件，

当地村民的回答是，我们的土地是无价之宝，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没有条件。王品松的长孙萧亮中，学有所成在北京做人类学研究，不忘乡亲的哺育，奔波反对建水库，于2005年1月5日32岁英年猝逝。我们在亮中坟前放上鲜花，在火塘边无言地伴着品松奶奶。我们渡江离去之处，村民竖立的“金沙江之子”纪念碑，守护着静静的金沙江，守护着淳朴的人民。当地妇女每天晚上排练歌舞，朗读的诗句萦绕在耳：“这里的土地/养育了这样的一个您/这里留下了/永远说不完的故事/太多的人/习惯了把欢乐和愁伤/种进了/肥沃的泥土”。

后记：

2006年，“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联合会，不因未获奖而解散，而是改名为“全球和平妇女”联合会 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继续推进活动。4月初，我参加了联会在瑞士召开的第一次委员会议。会上，瑞士的委员报告，我们的和平妇女活动，成功地引起全球社会极大关注，取得了不少奖项，包括颇负盛名的西班牙“格尔尼卡”Guernica和平奖，定于2006年4月26日颁奖。毕加索名画“格尔尼卡”就是悲愤地描绘1937年纳粹军屠杀格尔尼卡小镇的情景，今天的“格尔尼卡”，成为欧洲不忘战争灾难、力求和解和平的象征。千名和平妇女图片展，也在全球各地展开，今年2月底在纽约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大会开幕时，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夫人及多国政要出席了展览。

联合会制定了未来五年的计划，除了要把《全球千名和平妇女》一书译为十余种语言、促进和平妇女间的交流分享、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之外，还筹备一个“从千名到百万和平妇女”的全球计划，推动各地各界以各种语言书写百万和平妇女的故事。缔造和平的妇女就在我们身边，是否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承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活动的本意：让妇女的努力得到全球各地社会大众的认同，激起更多建设和平实践的涟漪。

生态是永恒的经济^①

文：钟秀梅

和平社会的酵母

大约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非洲肯尼亚的绿带运动与印度的 Chipko “抱树运动” 成为妇女运动与环境运动互为辩证的典范。非洲肯尼亚的绿带运动，为肯尼亚马塔伊教授眼见村子薪材短缺、沙漠化严重和土力流失，1977 年发起一千棵种树运动。运动以农村妇女为主，着重于妇女草根运动的培力教育，提高她们在健康、生计与环境的经营能力，在村落设立育苗场，建设让妇女方便取水的设施，提供妇女就业的机会。

马塔伊教授是第一个东、西非出产的女博士，她的千树运动，已在肯尼亚的村落、学校与教会等种下 3 千万棵树。她不仅建立了泛非洲绿带网络，也建立了国际绿带运动网络，为第三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做出具体的承诺。马塔伊认为树就是和平，与其花费大量经费购置武器，倒不如投资在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因为贫穷的成因在于发展模式的错误与资源分配的不均。她通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非洲人民只有投资、拥抱和支持行得通的解决方案，而这方案非依赖外力。”

很不幸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马塔伊反对开发商强占公有地，曾遭到肯尼亚当局监禁与鞭打，但打击不了她的意志，到了 2002 年，来自基层的力量，把她推上国会议员的宝座。她也是“非洲减债运动联盟”（Jubilee 2000 Coalition）的重要发起人，联盟要求取消富国对非洲穷国的债务。2004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马塔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认为她有两大贡献：推动环境的友善治理和草根自治力量的经营。

1973 年 4 月，起源于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抱树运动，是因为印度的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取而代之的是种下商业用途的油加

^① 此文章部分内容曾发表于《读书》2006 年 5 月

利树和松木，剥夺了妇女依赖原始森林所提供家庭生计的能力，于是她们采用甘地非暴力运动的方式，由村民抱住大树集体阻挡伐木行为，这个运动成功向政府索赔被夺走的原始森林的损失，印度政府也承诺在15年内禁止伐木。

抱树运动以乡村妇女为主，在1980年已发展为上百个基层村民自治的社会网络，这个运动保护了喜马拉雅山区5千平方公里的森林。抱树运动的活跃分子巴亨甘那（Sunderlal Bahuguna）定义“生态是永恒的经济”，参与运动的基层妇女直截了当地说：森林提供了干净的空气、水与土壤。联合国环境计划非常认可这个运动，因为抱树运动从少数官僚手中拿回森林资源经营的权力，这个运动的推动者在进行一场社会经济革命，这些方案建立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重新看待发展是要满足在地居民的基本需要，达到和平、愉悦与兴旺的文化生活。

另外两个世界上著名的环境运动与反核废料有关。1979年，在美国的尼加拉瓜瀑布旁的工人社区，因为三哩岛核能反应炉的设置，约2万吨有毒核废料就地埋藏在社区，导致社区大量妇女流产、生育率降低或胎死腹中，地方居民吉博女士站起来组织居民，揭发事实并要求政府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1998年，澳洲南方空卡（the Kupa Piti Kungka Tjuta）的几个原住民中年妇女，担心在她们民族的土地上，核废料掩埋厂所排出毒物与放射线，污染了她们生计来源的动植物与地下水，她们与蜜雪尔修女讨论反对核废料，后来得到地球之友与澳洲保育基金会的支持，这几名空卡妇女成为“毒物，远离我们”运动的尖兵，她们以坚持不懈的勇气与毅力在澳洲各地串联，到过堪培拉、悉尼、鲁卡斯、海得、墨尔本、阿得雷、斯勒渥顿、波特奥古斯、塔洛克斯比镇、爱里湖等地，风餐露宿，仅有的旅费只足够付冷饮，但是6年了，她们存活了下来，迎接胜利的果实。

节录一段她们在2004年发给各界的公开信：

“人们说你不可能战胜政府，因为只有区区几名妇女。我们只是滔滔不绝的告诉他们，耳朵不要放在口袋里，要听听我们的声音。我们不轻言放弃，政府花大钱买通各种环节，但我们从不放弃，我们告诉何华德（澳洲总理），你该照顾我们，不要密谋杀了我们。我们毫无保留，我们总是直接讲出我们的想法，最后他

失去权力，我们得到权力，他空有金钱，钱不能赢得一切。

现在可高兴了，空卡人民赢了。我们是胜利者，乃因我们的心，而非写在纸上的文件。关于这个民族、食物采集者、传统药草和歌舞，我们兴高采烈地赢了，胜利的我们一路战斗，我们的家与孙子辈们高兴无比，我们将自由活动于大地，孩子们于此成长，子嗣生生不息，我们的战斗传奇永传下去。”

空卡女战士的心路历程与绿带运动和抱树运动，以及世界各地就地战斗的妇权与环境运动分子有相同的特质，她们义无反顾、突破种种重围，通过战斗，建立了信任、互助、和善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她们是和平社会的酵母，就像许许多多在全世界各地就地战斗的反军备扩张、反种族主义运动、绿色运动与平权运动的运动者一样，她们意图要建立人与自然、性别、族裔和阶级的和平与平等的社会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

女性主义运动与环境运动的相互对话与支持，在30年间已发展出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资源，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在此社会运动脉络下诞生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个词是在1974年由法国女作家弗朗莎斯·德布克（Francois d' Eaubonne）在《或者女性主义或者死亡》一书中创造的。后来美国一些自然与女性书写作家如金（Ynestra King）、雷德佛（Rosemary Radford）、摩肯（Carolyn Merchant）、得利（Mary Daly）书写女性与生态、女性与科学革命、自然之死等议题。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出现要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学者如麦尔斯（Maria Mies）、席娟（Vandana Shiva）、莎雷（Ariel Salleh）、尬德（Greta Gaard）、菩朗伍德（Val Plumwood）、史德娟（Noel Sturgeon）和瓦兰（Karen Warren）等人，她们都有跨学科与跨国际的研究背景。麦尔斯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学，她从德国到印度参与多年的抱树运动，并与印度女科学家席娟合写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著作。菩朗伍德有类学的背景，莎雷是精神分析，她们除了活跃于国际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外，更进一步理论化生态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阿噶瓦（Bina Agarwal）归纳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有四个特点：

(一) 认为西方男性中心宰制是性别的压迫与环境的恶化的共同根源；(二) 否定文化专属于男性，女性不再被归类成未驯服的自然环境。过去自然环境与女性属于低下的，该被有文化的男性驯服；(三) 对妇女与对自然的剥削同时发生，妇女有责任终止男性对这两者的压迫；(四) 生态女性主义结合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思考，向平等与非等级社会的实践目标迈进。总言之，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是改变生态与发展危机的动能。

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与理论思辨带出三种意义：(一) 寻求另类的发展模式；(二) 展开南北对话；(三) 寻求社会主义实践策略。传统发展的模式为经济挂帅，因为强势的西方科学知识与技术理性所建立的法则变成普遍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使得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朝向前进的、发展的和现代化的目标发展，这种社会等级的、发展主义的与国族主义三位一体的父权资本经济霸权，按照华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说法是：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规则引领着世界的生产，世界的生产首要考虑的是组织那些拥有或控制生产手段的人，它是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

过去 50 年间，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已造成世界财富巨大的分配不公，另一方面，也排除了妇女、生态、可持续生计、少数民族与移民的发展。关于妇女与发展的课题，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博舍阿匹 (Ester Boserup) 著书《妇女在经济发展的角色》，倡导妇女加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以解放自身，但是博舍阿匹并没有挑战现代化理论的父权结构，因为现代化理论鼓吹所有的人都需要参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西方女性主义倡导者意识到，妇女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角色已经充分的整合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具体表现在联合国于 1975 年墨西哥召开的“妇女与发展”会议，宣示了妇女与发展的 10 年计划。主导这个计划的意识形态是接近于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考，批评者认为，女性参与经济生产的过程，反而加重生产与再生产的重担，非技术的和低工资的女工是经济的弱势，家务劳动又变成妇女成为经济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评论联合国的“妇女与发展”的 10 年计划是新的殖民主义计划。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如席嫫和麦尔斯认为

西方女性主义并没有认识到，在全球生产关系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由父权和资本积累造成的，反思另类发展模式，才能与资本主义脱钩。联合国妇女10年计划问题重重，直到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关于性别与发展计划，重视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才将社会主义经济方案与生态因素考虑进来，生态、分配与性别平等的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

1991年在美国迈阿密召开“健康的地球世界会议”（World Congress for a Healthy Planet），群聚了各种派别的环境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的与会人士，生态女性主义派、深层生态女性主义派、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派和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派等联合一起，进一步检讨可持续发展的议题。这个会议冲击联合国的发展计划，后来在1992年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会议，将生态女性主义的命题纳入联合国计划，可持续发展成为这个会议的共识。

生态女性主义的差异与运动策略

大体上，生态女性主义关注全球环境的恶化，首当其冲的是经营家务劳动与生计的妇女。当水资源污染或干枯了、树木不见了、土地因为气候变迁造成耕种的困难，妇女在食物、医药与教育上承受更重的负担。因此，可持续生计发展、森林保护、安全的水、土地权与土地经营、再生能源、企业对环境的责任、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反对工业废弃物等诉求，成为生态女性主义实践的方案。

可是，生态女性主义存在着差异，自由派生态女性主义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与哲学的基础之上，她们理想化的社会是因己之私，向往争取个人更大的自由空间，因此自由派生态女性主义对自身利益的权力意识为重要的考量，她们用理性与科学的观点来经营生态，并不反对市场与父权资本主义。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父权文化定型化了妇女与环境的关系，由于二元论的价值观，认定男性联结理性、心灵、文化，女性等同于情绪、肉体、自然，后者是属于较低等的。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自然化了妇女与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像吉林甘（Carol Gilligan）的论点就认为因为社会化与生物性的差异，妇女更应扮演照料与

养育的责任。

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较有批判性的看待社会生产关系与环境的联系。麦尔斯认为女性主义运动把对抗父权当成普遍的运动策略是误导的，因为父权不能是空泛地无的放矢，而必须置放于资本主义的相互连接和世界规模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中。莎雷采辩证的立场，认为当北方环境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欢呼胜利之时，西方强势文化与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人民与环境的剥削却变本加厉，例如自由贸易区的设置对第三世界妇女与环境的剥削，因为广大农村男性因为经济因素外移都市，使得农村妇女与小孩加重负担。

莎雷反思过往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过于强化生产力的提高，忽略了生态、少数民族与妇女的照顾。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的庞大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和意识形态，所进行的大型建设、绿色革命方案、基因食物等摧毁了第三世界人民的生计，所以生态女性主义的任务是对准北方世界教会、国家、市场与科技的共谋关系。

莎雷强调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思考与行动的争辩是辩证的，所以她主张工人群众要重思这两者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的运动主体是由下而上的，它接纳各种新社会运动如同性恋、动物权、和平、生态与少数族裔运动。长期在印度蹲点的麦尔斯从抱树运动的经验，总结出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运动策略，应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建立自给自足的社区经济。

1051

结语

2000年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分子像印度的席姆，活跃于世界或区域社会论坛，向世人展现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总的来说，由于过去生态女性主义近30年的实践，她们在政治培力、性别发展、健康、环境和反对所有对妇女的暴力等的努力，为人类未来和平之路奠定了基石。

2000年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也登上了主流的世界舞台，当200多个团体/个人竞夺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时，“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团队就更凸显和平的真正意蕴。千人中，超过一百人从事与环境生态直接相关的工作，前述的澳

洲空卡女战士——Kupa Piti Kungka Tjuta、印度抱树活动分子（如芭特 Radha Bhatt）、席娟等人都在被提名的行列。

2005 年底，“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主办单位突破种种困难，组织两岸三地和蒙古地区的和平妇女在昆明齐聚一堂，有些和平妇女默默的在古老或新生的土地上战斗，她们的故事是动人的诗篇，像大陆田桂荣和殷玉珍的种树行动、汪永晨与史立红的保护河川行动、台湾许兰香反农药厂行动等。如何总结她们的实践经验，在更多地方发酵，让我们的社会有更少的暴力？如何建立华人与蒙古以至亚洲地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队伍，提出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另类发展方案？是寻找问题的开始，也是朝向共同合作的过程；“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工作连接了这些可能性。

女性与差异政治的实践^①

文：陈顺馨

妇女和平运动中的差异政治

约 50 名在“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活动产生的中国地区和平妇女，不久前（2005 年 12 月）齐聚于春城昆明，与其他朋友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交流会。虽然不是全部 100 多名的和平妇女都能够出席，但当中有大陆偏远山区的教师，也有台湾的大学教授；有在渺无人烟的宁夏沙漠中进行绿化工作的，也有在车水马龙的香港市区从事二手物回收的；有揭发日本在华遗留下来的战争罪行的，也有要求日本政府直面对台湾原住民曾经造成的伤害的；有在宁夏教育女孩子读可兰经的女阿訇，也有在香港维护性少数权益的女牧师；有为死去的女儿争回一个公道而与大陆司法制度周旋了几年的母亲，也有帮助台湾慰安妇争回赔偿与名誉而长期作战的律师，等等。几天难得的相遇、相聚与相知，使得一个一个不同的动人故事通过真情的述说，溶化了大家可能由于年龄、生活环境、工作性质、宗教信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语境、面对的暴力、组织经验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上的差异带来的陌生感，打开相互沟通、理解和支持的可能性，也使得一个一个姐妹情谊式的拥抱，化为日后各自面对困难时的无名精神力量；糅合了欢笑、泪水和思考的生命碰撞，在妇女之间如此神奇地擦出了火花。

这次交流会，让我反思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差异政治在这次以“妇女”与“和平”名义组合起来的、但又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的群体的意义在哪里。大家本来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大部分互不相识或不经常往来，现在多了一个名曰“和平妇女”的组合，要真的能够把这个松散的组合所产生出来的精神力量或认同感，转化为日后和平运动的基础，首先需

1053

① 此文章部分内容曾发表于《读书》2006年5月

要的是我们对差异的尊重，甚至以差异政治作为和平妇女推动人类走向和平的纲领。文化研究把“政治”理解为“可能的艺术”（art of the possible），如果借用这个理念，和平妇女运动的差异政治便可以表述为从妇女的差异性中创造和平的可能性，即展示个别妇女或妇女群体在具体的、在地的生活环境或局限中，如何以她们认为需要的、可行的方式冲破那些环境或局限，创造让自己及其他人能过较为安然生活的条件。

女性主义理论中，“差异”其实是一个比“平等”更为重要的概念。就差异文化进行深入探讨的著名法国女性主义者依利格瑞（Luce Irigaray）曾经指出，“对我来说，作为女人争取平等似乎是一个真实目标的错误表述。争取平等要预设一个比较点：女人应该跟谁或跟什么平等？男人？工资？工作单位？什么标准？为什么不是以女人自己为标准？……如果缺乏一种建基于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理论，以及重写两性因生理差异而衍生的权利与义务上的差异的努力，男人与女人在社会权利与义务上的平等是不可能达到的。”^① 这是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针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批评观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作为最早期出现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潮，争取的是女性享有男性已经在公众领域中所享有的权利，如教育权、就业权、投票权等，所以出现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所批评的以男性为标准的妇运目标的问题。要注意的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并不是认为这些权利不重要，而是进一步质疑这是否妇女运动应有的终极目标，这既是针对妇女取得跟男人相同的权利后，并没有改变她们作为“第二性”的命运这样的现实的反思，也是在理论层面上质疑一种标准化的、也就是男性文化所主导的对人的理解。更需要注意的是，依利格瑞提出对生理性别差异的重视，绝对不是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维护男权的“生理决定论”，即不是把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以致不同的成长过程本质化为所谓“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或把性别角色定型化，而是把性差异看成为人类与文化能够延续的基础，因为不尊重差异会导致某一性别的文化的衰败及另一性别的文化的全面

^① Irigaray, Luce (1993), *je, tu, nous...Toward a Culture of Differ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p 12 - 13.

操控，造成同质化或单一化的问题，例如父权制所维护的父子承传文化取代了不同的母女承传文化之后，女性丧失了独立的身份，成为“非男人”。

女性主义者对于差异政治的讨论，并不局限于女性与男性之间，还是在同一个性别中间，例如“妇女”并不是同质的一个类别或身份，不能一般化加以概括，而是落实到不同群体、不同个体的语境中去，去理解“妇女”身份的多义性或差异性，以致不同行动中的妇女在改变她处身的现实状况时所产生的意义的多样性。以中国地区的“和平妇女”这个新类别为例，要理解两岸四地的不同妇女在缔造哪种意义的和平时，必须回到她生活的语境中去，才能把表面看来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及策略，放在同一个“和平工作”框架上加以理解，或者看到面相似的工作，会因不同语境而产生不同的意义，特别是“和平”在这里已经超越单一的国族战争想象，回到日常生活中种种可见与不可见的暴力中去。在这里，我尝试讨论香港和平妇女是在怎样的语境下处理家庭暴力和生计受到破坏的问题，带出和平运动在香港地区的在地性及具体性。

针对家庭暴力的和平工作：语境与实践

让妇女就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暴力而进行抗争的，莫过于直接危害她们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的家庭暴力。香港妇女受丈夫的暴力虐待，不限于身体和性方面，还有精神方面的，如语言暴力和每天的担惊受怕。可以说，家庭对于一些妇女来说，像一个真实战场那般恐怖。“群福妇女权益会”的廖银凤与四位“和谐之家”妇女大使，全部曾经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们之所以被提名，是因为不仅拥有离开暴力环境的勇气，还通过组织的力量，帮助其他被虐妇女，懂得保护自己和争取有尊严的生活。

“嫁鸡随鸡”、“从一而终”等传统思想是妇女哑忍暴力对待的部分成因，例如银凤成长于香港一个围村，从小就受到女人低人一等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婚姻也是她脱离父亲的严厉管治的途径，因此，她一直哑忍那暴力的前夫长达20年之久。来港跟丈夫团聚的其中一位妇女大使阿梅（化名）在被丈夫暴力对待后也曾经这么想：“当时我很彷徨，不知所措，自己还没有拿到永久居

留权，只好忍气吞声，以泪洗面，敢怒而不敢言，怕逃不出他的魔掌。”可以看到，无论是在香港或者是在大陆长大的妇女，都倾向以自己婚姻的忠诚或为父系家庭延续后代作为自己换取男性的保护或尊重的代价，然而，在仍然顽强的男权文化中，这样的努力是徒然的。不同的是，阿梅作为新移民，更没有讨价还价的条件。不过，当妇女醒觉到要逃离暴力的处境时，是否得到社会应有的帮助？香港不少社工和警察等前线人员，在处理家庭暴力的过案时，会以保存一个家庭的表面和谐为目的，或者是认为家庭暴力是“私事”，最好在家庭范围内处理，少占公共资源。更有效地唤起妇女本身正视及处理发生在身边的暴力，是过来人的各种努力。

银凤她们像火凤凰一样再生，不仅拯救了自己和孩子，还积极地参与了防止家庭暴力的工作。她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活教材，有力地指出 21 世纪的香港中的男权仍然直接威胁妇女的生命安全外，还让更多仍然困在“战场”的妇女，看到突围的可能和希望，更迫使社会“看见”她们，为她们做些事情。她们走的第一步，是提起勇气，踏出夫家的门，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跟人家讲述自己的困境和寻求帮助。第二步就是不怕在公众面前讲述自己那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曾经接受不少传媒采访的彩虹（化名）忆述说，刚开始的时候，每次讲完自己的故事都多晚哭到睡不着，但多讲一次，哭的次数就少一些。她坚持这样做，就是要让其他受害的妇女能够跨出第一步。可以说，彩虹通过媒体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身份已经由受害人/求助者变为教育者，而她所讲述的个人故事以及她的行动，不仅教育了遭受同样暴力对待的妇女，也教育了社会。提名活动的一位评审委员陈惠芳认为，讲述是重要的和平策略：“当我们谈妇女与和平，我们是要将以往从未被重视、从未在历史舞台被讨论过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放在台面上，让我们去认识，是什么制造了冲突，是什么制造了我们恐惧的事情，是什么制造了很不和平的处境。”的确，很长时间，家庭暴力被视为“个人”的事情，因为发生在被界定为“私领域”的家庭内部。不仅警察等社会部门会抱这样的态度，不少妇女也相信“家丑不可外传”，因此，以个人能量去“哑忍”好像是她们唯一的出路。然而，当她们以个人勇气和其他力量的支

持下把所谓“个人”或“私人”的问题在公众场合讲述出来时，家庭暴力便成为政治问题，需要社会的关注及面对。这是女性主义的一句重要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一种实践。

不过，“讲述”若要发挥实际的重整生活的力量，则需要组织的支撑。银凤的和平工作，也始于讲述，但她的故事随着组织参与的经验的增多而变得越来越丰富，显示出一种从“自救”到组织同遭暴力对待的姐妹，共同争取应有权益的重要过程。她们通过记者招待会、游行、座谈会等形式，在不同的事件中，为妇女争取应有的权益，包括申请综援、房屋、子女教育等单亲妇女的基本需要，以致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等。至于“和谐之家”的妇女大使，虽然不像银凤那样站在前线，跟政府和平抗争，但能以其他方式，服务和教育社区的被虐妇女和大众，例如共同灌录本港首张表达受虐妇女的心声的激光唱片《齐迎挑战》，让音乐抚慰受伤的心灵和激励前进，并推动建立非暴力的社会。

部分香港妇女除了活在家暴等可见暴力的阴影外，不少需要面对另一些隐性的暴力，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业北迁后工厂女工面临的失业、开工不足等问题。中国大陆经济开放是吸引香港资本家把资金和厂房调往工资比香港低很多的中国地区的主要因素，然而，香港政府并没有拿出鼓励厂家留港投资的政策，以解决工人失业或半失业的问题，只是指出香港经济转型是“自然”的，工人有责任自己转行，适应这样的经济变迁。集体被提名的女工合作社的成员，大多数是这类中年女工，例如现年45岁的小黑，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大部分时间从事车衣，后来却面对几年的“吊盐水”^①之苦，要靠做两三份兼职来维持生活。但是，对于小黑这一代女工来说，转行谈何容易，因为大多家庭中的女儿，特别是长女，都需要很早出外工作而没有机会受高度教育。小黑于1993年尝试转向做中文打字，怎料发展急速的计算机科技很快便把中文打字这一行打垮了，小黑只好又学计算机，但已界中年，难能以依靠入门技术支撑生计。可以看到，不断发展的经济和科技把年龄和性别上均缺乏竞争能力的女工甩出去，

^① “吊盐水”，文意指随着工序北移趋势，香港工友开工日数减少，收入不足维生，却又难以转行和辞职的情况。

将她们被边缘化，她们唯一可以转向的服务行业，例如清洁工，都是最没有保障、工资被压到最低的。

女工合作社与其他从事基层妇女生计重建的机构一样，首先让妇女知道贫穷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结果，也是社会不尊重妇女的劳动的问题，因此，解决的方法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以公民的身份争取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例如推广贫困家庭和失业妇女领取“综援”以保障最基本的生活是权利；二是通过社区的力量，把妇女的劳动价值得到肯定和获得回报。女工合作社采取的是第二种方式。她们在劳工团体“劳资关系协进会”的协助下，经营两间位于香港最贫穷的地区的二手物店和一间互惠超市。二手店的运作方式是从社区回收各种对于物主已经无用的物资，翻新后以廉价卖给区内需要的人。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一方面为合作社成员提供市场以外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为社区提供一个平价消费点。从环境的角度看，这个过程也发挥了善用资源的功效，减低堆填区的压力和地球的污染。正如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塔伊所说，“善用资源，我们便播下和平的种子”，因为争夺资源是不少战争的发动原因。此外，女工合作社除了在二手店的买卖中结合生产者的劳动与消费者的需要外，还加入互惠超市这个元素和发行社区货币，使参与各项工作的劳动者的付出，公平地换成生活必需品，或其他服务，达到她们制定的“自主消费、共同购买”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消除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隔，建立一个她们称之为“生活消费合作社区”的平台，实践“劳动有价、消费增值、互惠互信、社区共进”的理念。另外，她们突出工作的集体性，即成员是一个集体，不分彼此，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例如女工合作社成员之间、个别成员与劳资关系协进会的组织者之间是平等的，无论在决策权或收入方面，工作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这正是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一种暴力，那就是分隔的暴力，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女与男的、领取综援的与不领取综援的、新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等的分隔。

总的说来，女工合作社等推动的和平工作，是在建设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保育，前者包含对大自然和生活资源的珍爱，后者包括对平等、自主、互助、合作

等价值的尊重和培育。

香港和平妇女实践的独特性与意义

香港和平妇女的故事，让我们看见香港社会那“颠倒的太平盛世”背后暴力的一面。妇女面对的暴力不仅来自男人，还有政府的各种政策、高度强调经济效应的发展模式、保守的教会等导致的种种失衡和分隔。从妇女的日常生活出发所推展的和平文化，不仅能够发挥团结互助的精神，也能让平等、尊重差异等价值能够得以彰显，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和平共处。社会真正的和谐，是来自不怕面对冲突和矛盾，并且以多元的和平策略加以解决，而非压抑一部分人的需要、压制一些人的声音。

可以说，和平是一种生活态度，即我们如何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而这些矛盾可能来自政治、经济、男权文化、习性等方面。因此，另类的和平政治是去检视那些失衡以致变得暴力的生活环境，以致以不同工作方法恢复应有的平衡与和谐，并使维持这样的平衡与和谐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向。妇女在这方面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们是日常生活压力的重要承担者，但她拥有知识、能量、勇气、智慧和创造力，如果能够进一步互相支持、加强连接，并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她们将发挥更大的效用，成为建设和平的基石。

在香港，实践上述的另类和平政治可以说是非常迫切的，因为社会变得越来越分化、隔阂、暴力，这样的和平政治延伸的价值，是抵消男权价值、发展主义、恐惧政治等的希望，也应该是一种希望的政治，带给我们能获得安然生活的愿景。这些实践经验可能是跟大陆、台湾和澳门的不一样，但又息息相关的，因为两岸四地存在某些共同的文化源头，并且面对着共同的生存危机，而中国地区的妇女，可以在求对和平向往的“同”，存策略的“异”的前提下，为这个地区的和平，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和平的真义^①

文：戴锦华

2005年10月6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公布了2005年的评审结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因“防止核能被用于军事目的并确保最安全地和平利用核能而共享这一荣誉”。对这具有超多被提名人/团体——199“名”的一年，评委会称和平奖得主的产生“没有特别困难”；国际舆论称“不出所料”。似乎只有欧洲网站上押宝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好事者，为最终爆出这么个大热门而黯然。

然而，这一如此“名正言顺”的结果，与其说是出自众望所归，不如说出自“别”无选择。因为不同于诺贝尔的其他奖项，和平奖始终是对本年度全球境况、大都是危机境况的一份曲折回应。若将诺贝尔和平奖视为一扇窗或一面镜，那么它经常展现的，是一份全球张力、一场现在进行时态中的危机状态，此番则更是一场微妙而尴尬的国际政治力量间的较量。

国际政治与和平

关于这一得主的产生，最为重要的参数，是2005年，正值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60周年。自那一世纪的梦魇时刻之后，超过半个世纪，地球和人类始终笼罩在核威胁与核恐怖之中。于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为“防止核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所做出的长期努力，弥足珍贵、宽慰人心。然而，似乎没有太多的质询：如果说，广岛、长崎悲剧60年是本届和平奖得主产生的重要参数，那么，它显然无法说明：这一年另一“位”更为直接而正面的被提名团体——日本原爆受害者团体、本年度另一个热门候选人——何以不曾获奖。

日本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的成员称：其未能获奖的原因是和平奖评委会惧怕“开罪美国”。这一说法尽管多少出自落选者

① 此文的部分内容曾发表于《读书》2006年5月

的“抱怨”，但这份“抱怨”却远比另一种解释：不曾授奖给日本团体，是为了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更接近事实。因为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东亚，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的忧心，并非由于日本都市街头不时出现那些一身黑色学生装、驾着如灵车般的黑色旅行车、间或使用暴力的极右翼激进团体；甚至不完全出自前日本首相小泉一次再次犯亚洲社会众怒参拜靖国神社，或“历史教科书事件”，而在于日本国民自卫队已两度扬帆出海，参与到美国统领的联合国军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之中。而后者却无疑是禀美国和欧盟的圣意而成行。

从另一个角度望去，若以某些地名来提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绝人寰的悲剧，那么它们间或是奥斯威辛、南京、广岛。但众所周知的是，除了奥斯威辛所提示的纳粹灭绝犹太人的罪行受到了清算、并在此后的60余年间被反复言说，南京大屠杀的惨剧或则因“死难者人数”成为“悬案”，或者索性“蒸发”为一团暧昧不明的历史烟云。而广岛，则成为被无数悼亡哀歌、和平祈愿所笼罩的一处无名废墟。如果说，南京大屠杀的罪人，事实上因冷战的开启、“亚洲”的位置而悄然从历史的审判台上逸走；那么，广岛悲剧的主犯，则始终成为历史叙述的乌有空间中的一处悬置。历经20世纪60年代，已有足够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当事人披露的资料，粉碎了“被迫动用原子弹以结束世界大战”的“神话”，于是，广岛、长崎，便成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使用原子弹，而且是用于一次空前（但愿）绝后的巨型人体试验场。那不仅是一处一次性的杀戮与毁灭：在冲击波、光辐射的平民大劫难之后，是放射性沾染的、悠长的灾难回声。还记得读到的一则细节：广岛、长崎浩劫之后的遭受严重放射性沾染的幸存者，在其漫长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中，周身的散射着荧荧磷光，如幽灵般地，甚至可以在暗夜的墙壁上投下苍白可怖的影子。然而，更发人深省的是，无论是作为是南京大屠杀中的加害者还是广岛浩劫中受害者，都未曾影响日本与二战的胜利者：美国、西欧一道，成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一次将人类的大半卷入的“战争”——冷战的胜出者。于是，联系着二战和冷战的历史，便不难看出，二战暴行史上南京元凶的暧昧与广岛罪人的缺席，在国际政治牌局上，原本是同一张纸牌的正反面。

而挪威诺贝尔奖的评选委员会将2005年授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直接动因，则如评委会主席米约斯所言，是“全球核威胁正在升级，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化解”。似乎无须多言，此处提及“升级”中“核威胁”，其所指正是近年来牵动世界瞩目的朝鲜和伊朗“核危机”。似乎稍加细查便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如此真切却又荒诞不经的国际政治焦点：制造了全球“核威胁”的，不是总储量足以30次将整个地球化作焦土的既有原子弹，不是现今拥有核武器的不足10个国家，尤其不是拥有数量惊人的毁灭性原子弹与可用于“常规战争”的核弹头及最先进的运载导弹的若干大国，而是被“推测”、怀疑已“具有核武器制造能力”的两个亚洲中、小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如此“巧合”地刚好是美国政府所确认的“邪恶轴心”三国：古巴、朝鲜、伊朗之二。此外，关于此次授奖的真义，在国际社会上远非窃窃私语、而几乎成为共识的是，授奖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首先是出自一番不便明言的褒扬，一份并不十分曲折的鼓励，旨在表彰其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与美国的对抗。在美国出兵伊拉克之际，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巴拉迪不断申明：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伊拉克已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求将核查延长“数月”时间；继而又未能配合美国对伊朗“核威胁”的判断，不时“还伊朗以清白”。为此大感恼火的美国曾动用合法、非法手段阻挠巴拉迪第三次连任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总干事一职。而中国多家传媒也曾引证了巴拉迪获奖之后的表态：继续“不偏不倚，刚直不阿”。——尽管米约斯直接出面“澄清”/否认了这一授奖动因。在此，或许需要赘言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始终不同于其他诺贝尔奖项之处，首先是其他各诺贝尔奖项固然从不曾真正受制于国际政治格局与意识形态争端，但毕竟多少受制于不同专业领域的游戏规则；而和平奖却始终始终是风云突变的国际政治局面的动态回应。其次，不同于由瑞典主持的、各专业专家评审产生的其他奖项，诺贝尔和平奖是由挪威国会——挪威各政党间的联合机构组织评审。于是，和平奖，这一似乎关乎人类生存的议题，便首先基于挪威这一民族国家内部的权力格局，并进而成为这一权力格局与国际政治情势间的对话。而在后冷战这一最切近的坐标之上，由诺贝尔和平奖所呈现的挪威的国际立场与姿态，

首先联系着欧盟——这一在柏林墙倒塌、冷战终结之后，重新集结、崛起中的新的一极，以及欧盟与美国这一新帝国间诸多联手与争端。

至此，围绕着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诸多议论，无论是其历史参数、现实坐标，字面之意或弦外之音，都一如今日重要的国际事务，并非隐约地指涉着一位重要的缺席之在场者：美国——二战、冷战一以贯之的胜利者，后冷战年代的世界霸主；指涉着一个间或在国际政治中延伸的冷战结构；或许更为重要的，则是指涉着后冷战世界最为重要、真切的事实：能源危机与能源争夺战。如果借用美国主流外交史学家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肩负其为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谋求福利的重担”，那么，冷战终结后，美国显身“护法”之处，则无一不是石油产地、石油通道之所在。而此间的匡复人权、维护和平、制止屠杀等说辞，甚至不再是必需的借口。

他们的“和平”的借口

2005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一部关于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影片《四月的某时》(*Sometimes in April*)的首映，引发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影片中，在疯狂的大屠杀进行的当口，主使这场屠杀的胡图族军官如是回答美国官员：“你们不会插手的。你们怎么会来呢？我们没有石油，没有钻石，没有任何你们需要的东西。”彼时，柏林的放映大厅的观众席上掌声雷动。笔者也加入了百感交集的鼓掌之中，在罕有地用力鼓掌的同时，眼中是干涩烧灼的泪。是的，1994年，卢旺达。这仅有800万人的国土上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种族屠杀。在100天之中，近100万图西族人被杀，200万人流亡国外，200万人流离失所。而屠杀伊始，原本已驻扎于此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因英美的观望态度，以不“越权”为由拒绝行动；而长达3个月内，整个国际社会置若罔然，袖手旁观，尽管只需出动约5,000名联合国维和部队，便足以制止这场人间惨剧。如果说，那曾在柏林电影节上引发意味深长之掌声的对白，原本出自编剧导演的创作，那么，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之时，美国高层官员确曾表示：“我们并不在乎卢旺达或布隆迪发生了什么，美国的利益不在那里，不能把这些无聊的人道主义问题和诸

如中东、北朝鲜等重要问题混为一谈。”致使哈佛大学教授萨曼塔·帕沃尔在《地狱难题——美国和灭族时代》一书中写道：“美国的习惯思维是利益，这利益体现在石油和选票上。”（转引自李新峰《“非洲人的命不值钱”，卢旺达大屠杀谁之过？》）

也正是在能源危机和争夺的意义上，美国和欧盟有着共同、却裂隙渐广的利益诉求。在柏林墙的创口上尝试弥合的欧洲/欧盟，尽管不时尝试在这新一轮的环球争霸中小试刀锋，但毕竟在更多的时候只能将自己荫蔽在影片《三色·蓝色》式的哀悼、歌吟与祈愿之中。或许这便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巴拉迪一经获奖，法、德首脑即刻致电祝贺的微妙之处。

若说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真义正在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巴拉迪在伊拉克战争问题正面抗衡美国政府、军方，那么，相当反讽的，却是近年来国际原子能机构所重点核查的对象，却始终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关注点高度同步。最富反讽意味的，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绝大部分“合理”依据，正出自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联合国的多达数十页的报告书，辅以之英美情报机构的（现已证明为“有误”的）谍报。换言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政府的冲突，并不在于是战争与和平，并不于是否可以以“人权高于主权”、或以“国际安全”为名，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而仅仅在于是否“师出有名”。其冲突，毋宁说是分歧所在，只是该机构的运作程序与美国军方的作战时间表之间的吻合程度。若借用传媒用语说，该机构一直在伊朗问题上出演着“青天”的角色，那么，2006年伊始的一则新闻，相对和平奖而言，可谓“耳光响亮”：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报告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其含义众所周知：相对于美国，这便是并非必需、但不无益处的战争背书。风暴尚未平息的波斯湾再度战云密布。

和平妇女——一个疯狂理念的实践

在此，笔者讨论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寓意，并非旨在尝试质疑或论证这一颁授的“正确”与否，亦非出自笔者参与的“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行动落败的怨声——因为介入之初，我所瞩目的，正在于这是又一次“注定失败的事

业”，或者用行动的发起人、瑞士国会和欧洲议会议员维尔莫的说法，是实践“一个疯狂念头”。于笔者看来，尽管在百年诺贝尔和平奖那一长串名单上，有着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纳尔逊·曼德拉、戈韦塔·门琴等屈指可数、名副其实的和平斗士的名姓，但一般说来，正是2005年的和平奖得主，更具代表性地呈现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现代世界主流的和平理念。和平，只是战争的对立项，甚或是暂停键；和平的努力便是与战争相推移；和平的赢得，只能是延迟的战争，或胜利者稍感满足的片刻，或各种势力达成某种岌岌可危的平衡或制衡的瞬间。而战争或暴力，却是现代社会逻辑内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中注定的劫数。面对这样的主流逻辑与和平理念，“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只能是“疯狂的念头”，是幻想，乃至梦呓。然而，尽管在诺贝尔和平奖的结果颁布，本该尘埃落定的时刻，围绕着“千名妇女争评活动”仍是噪声纷扬；但我们毕竟完成了这次行动。超越政治精英主义逻辑、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一次不可能的汇聚达成在一份长长的名单之中，达成在一个迫使主流世界侧目的行动之中，达成在一卷2,200页的巨书（此书赢得了瑞士文化部颁发的“年度最美图书奖”）之中。在此，汇聚起的是一个集体，一个由形象各异、独立而平凡的个人汇聚起的群体，一个种族、年龄、宗教、政治立场、政治信念、性取向千差万别的群体；但是，这不是任何意义上利益的结盟，或为分享、猎取权力而集聚起的力量；这只是迥异其趣的另一扇窗、另一面镜：令世界看到为全球化的大屏幕所略去的画面。一幅幅日常生活的画面，为生命而抗争的画面，自救而至助人的画面。迥异的和平理念：不是、不只是相对于战争与暴力的和平，而是相对于生命、人类生存和明天的和平。不是、不只是战争、灾难、浩劫过后的橄榄枝，或无助、祈祷的黄丝带，而是无言而倔强地站立着的生命之树。

在中国区，北京、香港和昆明举行的和平妇女聚会上，一向耻于真情流露、泪水轻弹的笔者，一次次地泪流满面，乃至不能自己。但那泪，是为动乎于衷而淌，是为终于窥见了希望而流。如同面对意气勃发的王选，深深地知晓这美国人口中的能“令日本沉没”的“中国女人”，不仅是在为日本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

讨还公道，不只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尊严而战，而且是在为人类的尊严、人类记忆的权利、书写记忆的权利而战；为了“活着，并且要记住”。如同面对俊朗热诚的高金素梅，体会着她带领台湾原住民、自己的泰雅族人前往东京靖国神社讨还祖灵，将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小泉告上大阪法庭；和自己的族人前往纽约，向联合国控诉日军对台湾原住民犯下的种种暴行；不只是在国族的意义伸冤雪耻，也是在向日本、向世界昭示原住民——这一在现代世界上饱受苦难与剥夺的群体的存在与力量。还有“天国的女儿引我与和平妇女相遇”的黄淑华，她在泪水和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为我们背诵食指《相信未来》的农村妇女王树霞、英气勃勃的农民演出队的领头人王霞、用阿拉伯文引证着《古兰经》讲述和平道理、男女平等的女阿匍金梅花、香港女工合作社那些充满活力、不屈不挠的女人们……108位，108个故事。讲述着和平的真义。另类的和平或朴素真切的和平。

或许，便从这里开始，寻找并构筑别样的故事，别样的世界。我感到欣悦，我参与了成就这场梦，我参与了尝试开启别样的现实。

从下而上造就社会和平发展^①

文：刘健芝

“从下而上造就经济与社会发展”，这是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表扬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及其创办人穆罕默德·尤纳斯的赞词。“持久的和平不可能实现，除非大量人口找到方法脱贫。”继2005年的奖项把和平与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联系起来，今年的奖项把和平与物质匮乏、生计危机联系起来。肯尼亚玛塔伊种的树和孟加拉尤纳斯贷的款，固然远谈不上针对今日全球严峻的生态和生计危机的根源提供什么长治久安之法，却不失为一服止痛剂，协助被危机深深伤害的人群舒缓痛楚。

无论如何，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昭示了以下关联：问题——有贫穷就没有持久的和平；目标——大量人口脱贫；手法——利用小额贷款“自力更生”经营生计。

关于对“问题”的认识，即对全球占大多数人口的穷人而言，生活窘迫何来安然和谐，本来是简单不过的常识，但要诺奖评审委员会说出这样的“大道理”，却非易事。关于扶贫灭贫“目标”，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几十年来不知重申了多少回的决心，所以也非新鲜事。也许，2006年诺贝尔奖引人注目的，还是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方法——不是靠来自上面救济的款项和物资，而是通过5人小组组员间相互扶持、监督、贷款、还款的方法，自主经营小生意小生计活动。

奖项颁给一个组织一个人，银行家尤纳斯既代表本人也代表了乡村银行，传媒重点突出他的生平事迹，是意料中事。尤纳斯一名副手德朴·巴路亚说的话——“奖项表扬了让这经验得以实践的千百万贫穷妇女”，只能作为不起眼的陪衬。尽管就生态和贫穷危机颁发的和平奖显示了对和平的理解不再只限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但焦点仍是放在以个体为英雄的习惯上，这与从下而上的自立运动还相去甚远。乡村银行营作的35,000个村落的

1067

^① 此文章曾发表于《亚洲周刊》2006年10月29日

200万借贷者（九成以上是妇女）全部加起来，肯定不及尤纳斯这些年来一人获颁的27个荣誉博士学位，但传媒镁光灯余晖所及的背幕处，如果我们用心去看，还是能看到那在实践上成就了乡村银行独特经验的、带着自信尊严的农村底层妇女。

向底层人学习

既然诺贝尔和平奖把社会目光引向贫困国家的广大底层平凡人的实践，那么，让我们把目光再放远一点，以谦卑之心向底层人学习。

如果有人问我，以“从下而上造就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准则，我会推荐那个经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印度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简称KSSP）。在新世纪的头3年，我6次访问喀邦，惊异于40年来默默耕耘的民众科学家们，身体力行，推进一场并不轰烈却意义深远的民间运动，大量参与运动的人，是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退休科技人员，农村妇女和青年，教师和医护人员。

稍举几个例子吧。

乡村图书馆与出版事业：喀邦人口3,300万，农村人口占80%，有990个乡，全邦有9,000多间图书馆，12,000多间阅览室。图书馆藏书有5,000册到25,000册，就是说，每个乡大约有人口25,000人，图书馆8间，阅览室10间。喀邦有3,000多份报刊，民间出版事业十分蓬勃；1945年，12间出版社集资120卢比（相当25港元），成立“知识出版合作社”，从1960年到1975年，该合作社每天出版一本书！

卷烟工人的读报故事：印度手卷烟行业约600万全职和兼职工人，生财工具只要一把剪刀、一个竹盆、灵巧的手、专注的精神，一天可卷600支至2,000支烟，人息微薄，卷1,000支烟相当于3港元。这是低贱的行业，辛劳的活。但是，一些卷烟工人几十年来有一个习惯：工人分成30-40人一组，每组由一人轮流专责朗读报纸和书本，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听读报念书，一边讨论。每天晚上，各人把一些卷烟交给读报工人，让他有同等收入。宁可减少3%的收入，也要听读报。这是“穷人”的选择。

全邦扫盲运动：KSSP 1978年在全国600个乡，成立“农村科

学论坛”，与村民一起尝试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每个村庄有两三名 KSSP 的活跃成员。1989 年组织文艺演出队，巡回全邦宣扬与扫盲、发展、自治相关的理念，动员 30 万志愿者协助扫盲；1991 年 4 月，喀邦成为全民识字邦。接着的几年，在印度全国多个邦约 400 个区推行扫盲运动，报名参与扫盲运动的学员有 1.2 亿人，义工有 1,000 万人。数字固然可观，但扫盲运动的真义不在量，而在质。

资源谱图运动：识字运动不是形式上让穷人脱盲，而是让他们有机会有能力参与社区建设。识字运动完成之时，社区具备了两大资源：有一大批愿意做公益事业的社区精英，与底层人建立了友谊和信任，也增加了对底层人处境的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社会的底层人在识字班上交流对社区问题和自身处境的想法，形成了某些共识；这些共识不是刻意去追求的，也不为政党利益或政府政策服务，而是零碎地表达了普通人对生活的看法和期盼。KSSP 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资源谱图”（resource mapping），就是由乡民参与，记录和了解本乡的各种资源，谱制成图，再在此基础上筹划建设方案。谱图工作通过“集体梦想”来让现实的矛盾展现，也让未来理想的图景出现。在几个试点乡，他们不企求政府、企业或 NGO 任何财力物力支持下，以自身的力量，作出本乡未来 15 年民间规划以及实践的方法。

“人民计划运动”：上述活动，全由几万名 KSSP 志愿工作者与大量村民合力进行。就是这种自力的实践，对政党有所启发，1996 年，普选上台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I (M)] 借鉴 KSSP 的经验，以执政党的力量，推行了一场虽不为全球注视但可说是轰烈的民主实验——邦政府把相当于邦总财政预算的 20% - 25%，交由村民讨论需要什么发展，如何排优先次序，自行筹划地方发展项目。是之为“人民计划运动”（People's Planning Campaign）。如果没有 KSSP 的民间实践经验，“人民计划运动”不可能开展；但执政党的政府行为，又把民主进程大力推前。邦政府新修订的乡、镇地方自治法，规定乡之下成立村自治组织，每年法定召开村大会；乡议会不能直接使用发展项目经费，必须由村大会提出项目方案，提交乡议会会同专家小组审批；所有档案、受益人名单、项目详情和数额、乡议会收支账目，都要公开，

任何人有权查阅和复印，并监督贪污腐败。1996年8-9月在全邦召开的村大会，有200万人参加，即四户有一户参与。这种热情几乎史无前例，但参加的人并不是凑热闹，而是为一种真实的驱动力推动。

这里无法细说运动的始末和进程，只引一些数字：

运动仅在1997-1999年便兴建了10万间房屋、24万个厕所、5万口井、17,000多个公众水龙头、8,000多公里道路，清洗了16,000个池塘，把30万英亩土地改为耕地。上述数字不过让我们窥见运动的规模。但是，运动最可贵的，是提供了条件，让每个普通人活得有自信、有尊严，活得丰富、充实。生活离不开社会生活，离不开在特定社会领域活动的群体关系；没有群体的认同和鼓励，自信和尊严是很难建立起来的。“人民计划运动”为社会生活的参与提供场地，让人们有积极参与的心，通过建立丰富多元的社群关系，使互相认同和鼓励的力量不断滋长，让大家之间不同之处成为创建更丰富充实的群体关系的推动力，而不是制造矛盾的分化力量。自足、自信和尊严，充盈地定义了什么是和平生活。

民间妇女的和平光芒

学懂欣赏底层人的坚毅实践并向他们学习，是不容易的事。这需要我们培育不同的心态，不同的眼光。2004年开始，我参与了一项名为“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香港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是中国和蒙古地区的统筹处。这项活动记录了全球千名妇女（尤其是基层妇女）的事迹。2005年，瑞士外交部长和国会议员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推荐提名千名妇女；2006年，德国国会来自所有政党的15位国会议员再次支持千名妇女的提名。尽管落选，作为一次努力丰富“和平”的内涵、引领大众探求民间自救之路的尝试，它不会止于奖项的得失。

千名妇女来自150个国家，年龄从20多岁到80多岁，从社区和谐到种族和解，从自足生计到生态环保，从性别平等到弱势社群自强，从文化艺术到教育宗教信仰，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平凡妇女不离不弃的情怀、不可计量的承担；在她们留下的血泪印

迹中，有着为自己为别人维护尊严、争取幸福的在时空中连绵回荡共鸣的会心之笑。

发展不在于以生产利润的钱为标准的财富增长，这样理解的钱和财富只是某些特定的社会形态的工具；诺贝尔奖关于“和平”理念的转化，说明了这些工具不能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和快乐，这正是从下而上的自主运动生发的光芒的精要所在。

附录



II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 诺贝尔和平奖』及『全球和平 妇女』 中国地区活动记录

2003年3月（瑞士）“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联会在瑞士成立，理事有六人，主席是欧洲议会和瑞士国会议员维尔莫一文高博士（Ruth-Gaby Vermont-Mangold），副主席是苏黎世市议会社会福利部部长莫利加一斯图嘉女士（Monika Stocker）。瑞士联会开始推动“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

设立 www.1000peacewomen.org 网站。

2003年9月（中国香港）瑞士联会邀请刘健芝参加国际委员会，并担任中国和蒙古地区统筹。

2003年11月28日（中国香港）瑞士联会代表丽碧嘉·维尔莫女士（Rebecca Vermot）来港与刘健芝会面，详细介绍活动内容，并一同拜访瑞士驻中国香港总领事。

2004年2-5月（中国香港）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与发展部“妇女与日常生活”项目，负责中国和蒙古的统筹工作。陈顺馨为负责人。

组成中国工作团队，印制宣传单、海报、提名表格等，邀请荣誉顾问，筹组“港澳台蒙古”和“中国大陆”评审顾问团。

设立 www.1000peacewomen-hk.org 网站。

2004年2月12-15日（瑞士）刘健芝出席“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第二次国际委员会会议。

2004年5月25日（中国香港）在岭南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提名细则及表格。

（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同日开展提名活动。

2004年6-7月（中国大陆、港澳、台湾）接受电台、报刊、网络上的采访及派发新闻稿，宣传和平妇女活动，征集提名。

2004年8-10月（中国香港）志愿者将提名表格内被提名者资料翻译成英文，送交瑞士。

2004年8月10日（中国大陆、港澳、台湾）截止提名（原定为7月25日）。

2004年8月16日（中国香港）港澳台蒙古地区评审顾问第一次会议。

2004年8月25日（北京）中国大陆地区评审顾问会议。

2004年8月28日（中国香港）港澳台蒙古地区评审顾问第二次会议。

2004年9月18日（中国香港）港澳台蒙古地区评审顾问第三次会议，审定港澳台蒙古地区推荐提名名单。

2004年9月20日（北京）中国大陆评审顾问审定大陆地区推荐提名名单。

2004年10月13-16日（瑞士）刘健芝出席“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第三次国际委员会会议，会议审定全球千人提名名单。

2004年11月28日（中国香港）在城市大学举行“妇女、社区经济、和平文化”工作坊。

2004年12月30日（北京）举行中国地区组织者工作及妇女与和平交流会。

2005年1月23日（中国香港）在城市大学举行“性权、家庭暴力与和平”工作坊。

2005年1月26日（瑞士）瑞士国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维尔莫-文高博士（Ruth Gaby Vermot-Mangold），欧洲议会议员沙菲尔女士（Rosmarie Zapfl），和瑞士外交部部长米甚琳·卡尔弥-雷女士（Micheline Calmy-Rey）举行了提名的签名仪式，瑞士驻挪威大使亲自将候选名单送交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

2005年2月26日（中国香港）在城市大学举行“冲破分隔的灵性力量——妇女、宗教与和平”工作坊。

2005年3月-7月（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收集及编辑108位和平妇女分别100字、300字及1000字中文资料及译成英文，用作制作明信片、《全球千名和平妇女》（1000 Peace Women Across the Globe）书籍及瑞士英文网页千名和平妇女资料。

2005年3月20日（中国香港）在岭南大学举行“妇女、人权与公民社会”工作坊。

2005年4月（中国香港）获得岭南大学学术研究经费资助，进行“从日常生活再思妇女与和平——以‘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香港被提名者为案例”研究。

2005年4月6-8日（瑞士）刘健芝出席“全球千名妇女

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第四次国际委员会会议。

2005 年 6 月 29 日 全球（超过四十个国家）同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全球千人名单。

（中国香港）在岭南大学举行“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地区提名发布会，公布中国地区的 108 人名单。瑞士驻香港总领事 Dr. Barras 和瑞士联合会理事 Dr. Menz 出席发布会。

2005 年 6 月（中国地区）开展各地访问、书写工作，筹备出版中国地区 108 位和平妇女的故事。

2005 年 7 月 13 日（北京）韩晓宁参与环保团体“记者沙龙”聚会，介绍和平妇女活动。

2005 年 8 月 27 日（北京）与“三联书店”及《读书》杂志合办大陆地区被提名妇女的交流会，有 21 位和平妇女出席。

2005 年 10 月 1 日（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 10 月号，刊登戴锦华、刘健芝及陈顺馨的一组有关妇女与和平的文章。

（中国香港）陈顺馨、刘健芝应邀参与牛棚书展 2005 年“妇女、身体、暴力与国家”讲座作主讲嘉宾。

2005 年 10 月 3 日（中国香港）岭南大学举行“妇女和平革命”讲座，邀请了陈顺馨和和平妇女代表胡露茜和黄惠琼主讲，介绍她们的工作与和平妇女活动。

2005 年 10 月 7 日（中国香港）岭南大学举办“不会终于颁奖的和平运动——‘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座谈会”，就当日和平奖结果的公布作出回应，并对如何继续推动和平运动进行交流。

2005 年 10 月 9 - 30 日（中国香港）在岭南大学图书馆举行和平妇女资料展及书展。

2005 年 10 月 11 日（中国香港）和平妇女特辑在香港无线电视时事节目“星期二档案”播放。

2005 年 10 月 17 - 20 日（瑞士）刘健芝出席“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第五次国际委员会会议。

2005 年 11 月 11 日（中国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举行《全球千名和平妇女》（1000 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新书发

布会。

2005年11月11-19日（中国香港）岭南大学艺术廊举行全球千名妇女图片展览。

2005年11月27日（中国香港）屯门仁爱堂社区中心举行全球千名妇女图片展览。

2005年12月（瑞士）《全球千名和平妇女》一书获得瑞士文化部颁发“2005年瑞士最美图书奖”。

2005年12月17-19日（昆明）举行蒙古及中国地区“妇女、生活与文化”交流大会，有46位和平妇女出席，全部出席人数超过100人。瑞士联会理事 Dr. Menz 代表瑞士联会出席。

2006年1月（瑞士）“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联会修改章程和注册，改名为“全球和平妇女”联会，重组理事会，刘健芝被邀为理事。

（中国香港）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妇女及日常生活”项目，负责东亚的统筹工作。

2006年1月18-21日（马里）刘健芝和戴锦华出席世界社会论坛非洲分会，作和平与妇女演讲。

2006年2月（瑞士）“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获得瑞士 Ida Sommazzi 和平奖。

（德国）15名德国国会议员支持提名“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争评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2006年2月12日-3月11日（中国香港）在湾仔集成展廊举办“全球千名和平妇女”图片展。

2006年3月30日-4月2日（瑞士）刘健芝出席“全球和平妇女”联会第一次理事会会议。

2006年4月26日（西班牙）“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颁发西班牙“格尔尼卡”Guernica 和平奖。

2006年5月1日（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5月号，刊登戴锦华、刘健芝、陈顺馨、钟秀梅的一组有关妇女与和平的文章。

2006年6月（中国香港）开始制作纪录片《不可能之可能：和平·妇女·诺贝尔奖》，记录中国及蒙古地区提名过程及香港和平妇女的故事。

(中国大陆)开始制作纪录片《让世界看见》，记录中国大陆和平妇女的故事。

(中国香港)开始进行《全球千名和平妇女》(1000 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 (2200 页) 翻译成中文版的工作。

2006 年 7 月 (中国地区)“全球和平妇女”活动的组织者、志愿者、和平妇女之间开展多项互助、互动的活动，包括募捐资助张华完成大学课程、募捐资助马志英的女学生、技术支持杨海澜的生态建筑、构思印度开发徐纪英的茶树花项目等。

2006 年 7 月 16 - 19 日 (瑞士)刘健芝出席“全球和平妇女”联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

2006 年 7 月 18 - 20 日 (英国)陈顺馨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社会政策研讨会”上发表论文“Peace and Gender Politics Across Borders—Implications of the 1000 PeaceWomen Project”(陈顺馨、刘健芝合写)

2006 年 8 月 1 日 (翟城)岭南大学“全球和平妇女”活动中国大陆联络处设在河北定州市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设立 www.1000peacewomen-china.org 网站。

2006 年 8 月 2 - 5 日 (北京)瑞士三位国会议员维尔莫一文高 Gaby Vermot, Doris Stump, Pia Hollenstein 与北京的和平妇女和“全球和平妇女”中国组织者、志愿者进行座谈会，并前往北京五位和平妇女的工作地点探访。其后，维尔莫一文高在瑞士为北京太阳村儿童中心募捐经费。

2006 年 9 月 21 日 (瑞士)“全球和平妇女”联会在世界和平日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在全球展开“伙伴计划”(Partnership Project)，邀请社会上的个人和团体记录百名妇女的故事，让更多妇女事迹显影。瑞士网站提供链接。

(中国地区)开展“伙伴计划”。

2006 年 11 月 14 - 16 日 (南韩)刘健芝和 Christine Menz 代表“全球和平妇女”联会出席顺天市议会主办的“妇女与地方自管”研讨会，刘健芝演讲题目是“Women and Peace Work Rooted in the Ordinary”，Christine Menz 演讲题目是“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1000 Teachers and Guides”。

2006 年 12 月 (马尼拉) Isis-International 刊物 Women in

Action (2006: 2) 发表陈顺馨文章 “Women, Peace and Feminism”, 和刘健芝文章 “Hope for Peace Embedded in the Ordinary”。

2007年1月17-19日 (肯尼亚) 刘健芝出席“全球千名妇女”联会第三次理事会会议。

2007年1月20-24日 (肯尼亚) 刘健芝和戴锦华出席“全球千名妇女”联会在世界社会论坛的活动, 刘健芝主持全球千名妇女图片展览开幕式, 戴锦华作演讲。

世界社会论坛上播出《不可能之可能: 和平·妇女·诺贝尔奖》和《让世界看见》两套纪录片。

2007年2月25日 (中国香港) 香港和平妇女举行新春团拜, 观看《不可能之可能: 和平·妇女·诺贝尔奖》和《让世界看见》两套纪录片以及讨论未来交流活动。

2007年5月26-27日 (筹备)

(中国香港) 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妇女及日常生活”项目举办学术研讨会: “Peace, Women and the Everyday: Across Borders, Beyond War and For Change”, 正式公开首播《不可能之可能: 和平·妇女·诺贝尔奖》和《让世界看见》两套纪录片, 并发布《多彩的和平: 108名妇女的故事》一书。

附录



III 作者简介

Cao Shuying 曹疏影，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从学生时代开始诗歌创作。现居香港。

Chan Shun Hing 陈顺馨，任教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也是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性别及日常生活”研究项目统筹。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香港的妇女运动，研究兴趣包括性别与叙事，和平、日常生活与女性主义等。

Chan Wai Fong 陈惠芳，自由工作者，曾当过记者和发展工作者。喜爱文字，喜爱图像。

Chang Yu Yan 张育燕，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硕士生，专注日据时期反抗日本殖民作家。

Chen Chi Ping 陈志平，台湾联合报资深政治版记者。

Chen Zhijian 陈志建，1983年出生，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人。200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主修交通工程，目前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攻读硕士。大学期间，参与大学生下乡支农调研实践活动，并形成建议性的调研报告，希望为农村社会的发展尽一份心力。热爱自由、平等；相信人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幸福。喜欢诗歌，以及感性并且哲理的文章。

Cheng Kung Kung 郑空空，全球邵族之友会联络人，长期在台湾九二一灾区协助原住民重建家园。

Choi Yuk Yuk 蔡毓毓，从事中国民工维权工作，长期参加香港社会运动，经常接触内地女工。

Chow Yuk Chu 周玉珠，曾任职新闻记者及翻译。直至加入扶贫机构工作，在前线学习中，对女性被边缘化的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Chu Caixia 褚彩霞，1986年出生，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三年级，是“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成员。对社会性别、农村问题很感兴趣，希望致力于推进社会公正。

Chuang Miao Chi 庄妙慈，曾任自主工联执行长、粉领联盟秘书、芦荻社区大学讲师，长期为弱势群体说话。

Chung Hsiu Mei 钟秀梅，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助理教授，曾任美浓爱乡协进会总干事。

Dai Jinhua 戴锦华，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教授，博士导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曾在美国、欧洲、日本、港、台数十所大学任客座教授。从事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专著 10 余卷，著作被译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韩文、日文。

Er Mi 尔密，沈阳市业余作家。

Han Xiaohong 韩小红，《中国妇女报》山西记者站站长，关注社会新闻、妇女权益领域，多写作人物通讯类文章。

He Huili 何慧丽，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任教，研究领域为城乡关系和农村发展。曾于 2003 年至 2005 年间在河南省兰考县挂职副县长，其间发动了“以政府为主导，以知识分子为参与，以妇女文艺队为突破口，以农民为主体，以合作为核心”的新乡村建设试验。

Hei Haifeng 赫海凤，内蒙古赤峰农村人，2006 年毕业于烟台大学法学院。大学期间创办烟台大学心系三农学社，参加过多次支农调研活动，2004 年暑假带队骑单车行千里进行中原地区农村综合状况调研，结合调研编辑写作近 10 万字报告集《回归乡土》。2004 年被授予烟台大学“十佳青年志愿者”荣誉称号，2005 年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2005 年被授予“感动烟大十佳学子”荣誉称号，2006 年被评为山东省高校优秀毕业生。

Jiang Zidan 蒋子丹，1954 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国家一级作家，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海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天涯》杂志首任主编。现为广州市文联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黑颜色》、《左手》，散文《一个人的时候》、《岁月之约》。

Jin Qun 晋群，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新华社从事记者工作数年后，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留学。新闻专业的教育背景、记者工作的实践以及国外求学的经历，给了她一个广阔的视野，一种对事物的敏感，以及一份对社会的责任。从英国获得跨文化交流硕士学位后，目前在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并参与多项国际项目及项目评估，内容涉及艾滋病防治中的媒体角色、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农民工防艾工程等。

Koo Chin Liang Cultural Foundation 辜金良文化基金会成立于 2002 年，由许金玉女士以丈夫之名开办，是以推动两岸青年文化

交流与举办艺文活动为宗旨的民间团体。

Kou Yanding 寇延丁，1965年出生，自由作家，纪录片独立制片人，2005年起成为和平妇女写作志愿者。

Lau Kin Chi 刘健芝，任教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全球和平妇女”联合会理事，负责协调东亚地区工作，以及联合会研究工作。

Lee Wai Yee 李伟仪，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博士生，在香港参与妇女运动及性权运动多年。著有《情色都市》等书。

Li Yang 李阳，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2005级博士研究生。

Li Ying 李莹，律师。毕业于杭州商学院工商管理系，1998年获律师资格，并获北京大学民商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政府部门的法律机构工作。任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现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任研究部主任、法律援助律师，有丰富的维护妇女群体权益的经验和前瞻的理念。

Liang Ping 梁萍，《中国妇女报》云南记者站记者。

Lo Kin Ling 卢健凌，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毕业生，现职记者。新妇女协进会《女流》季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Loh Yuen Ching 罗婉祯，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执行干事，曾协助“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及蒙古地区提名的组织工作。

Lu Jiakun 路佳坤，河南师范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学生会主席，社会工作专业，致力于儿童/青少年/艾滋病/团队建设等公益事业。

Lu Ping 吕频，曾任《中国妇女报》记者，现从事自由职业。

Ma Hongping 马宏萍，1972年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1995年毕业于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现北方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作品《一切为了群众的利益》获宁夏好新闻特别奖。在中国妇女报宁夏记者站驻站，采写大量反映宁夏妇女事业发展和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闻稿件。喜欢用自己手中的笔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还喜欢旅游。

Ng Mei Ling 吴美玲，从事国内农村发展工作，同时是一个关注国内妇女健康发展的非政府组织成员。

Ni Yan Yuan 倪炎元，现任中国时报总主笔，政治大学政治所博士，铭传大学、文化大学传播学院兼任教授。曾先后获得曾虚白新闻奖新闻评论奖、卓越新闻奖新闻评论奖、曾虚白新闻学术奖、吴舜文新闻奖新闻评论奖。著有《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1995）、《再现之政治》（2003）等。

Qiang Hong 强洪，回族，1966年出生，大学学历，文学学士，2002年担任中国妇女报驻湖北记者站站长，从事新闻工作10年，2004年荣获武汉市“武汉市三八红旗标兵”称号。

Shang Huihui 尚慧辉，70年代中期出生，籍贯山西，在山西师范大学就读。1996年在洪洞县委党校参加工作，1999年考取山西省委党校读研究生，2001年考取山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工作，2002年考取山西日报编辑记者工作，至今在山西日报政法部工作。

Shang Rongcai 尚荣才，1984年出生，就读于重庆社工学院，于2005年8月参加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人才发展培养计划第一期，到农村进行社会实践工作，在多个地方农村调研支农。现在广西南宁进行有机农业项目的推广，尤其关注农村区域发展、留守儿童。

Shen Baoqing 沈宝庆，1983年出生，江西省瑞昌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学士，南开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Shi Xiaoming 时晓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保部副研究员，中日关系协会会员，欧美同学会会员。

Sit Tsui 薛翠，1971年出生。2005年毕业于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获哲学博士。现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研究领域：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理论、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与翻译、性别与发展等。

Su Jianjun 苏建军，《中国妇女报》河南记者站站长。

Sun Yangli 孙央丽，1957年出生于西安，西安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学士，该市作协会员。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高陵县插队，1979年参加工作，2000年应聘中国妇女报陕西记者站从事新闻采写。曾多次获报社及地方好新闻奖，被陕西省《红风工程》授予“红风知音”称号和“杰出贡献奖”。

Tong Jiqing 佟吉清, 1964 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2002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吉林师范学院、核工业管理干部学院任教, 1999 年晋升为副教授。现在中国妇女报社权益部任工作, 主任编辑、记者。除了对弱势群体心存体恤和悲悯之情外, 似乎没有太多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因为如此, 才更加喜欢这份经常要和妇女权益打交道的工作, 虽然常伴艰辛, 但意义深远。

Wang Ping 王平, 1972 年出生, 籍贯河北。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农村综合发展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乡村建设长期志愿者。曾任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的编辑记者, 在此期间, 接触到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社会问题, 后矢志于与乡建同仁一起, 探索中国及中国农村发展的另类道路。

Wu Weijuan 吴伟娟, 80 年代出生, 陕西华县人。现就读于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对“三农”特有感情, 关注农村问题, 尤其是农村的经济及教育方面, 农民工及留守儿童问题。曾多次参加下乡支农支教活动。如,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调查, 青海省平安县平安镇调查活动, 青海省大通县支教活动等。人生信条: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Wu Zhenxing 吴振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研究生, 致力于中国被压迫群体的教育工作。

Xiao Liangdong 萧亮东,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现称香格里拉县)金江镇车轴村人。

Xu Wangli 许王丽, 福建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 2003 级文学院本科生, 学校“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社团的成员。

Xue Xiayuan 薛夏原, 经济日报《经济月刊》编委主任。

Yan Yu 燕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06 级硕士生, 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社团 - 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老会员, 参加过北京市社科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子课题“北京外来人口精神文化生活现状、问题与需求”部分的调查研究工作。热爱教育, 关注农村, 关注性别平等。

Yang Lu 杨露,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005 级本科生; 北京

师范大学“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成员。农民之子社团自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农民组织化问题，并在全国各地农村协助农民建立发展草根组织。

Yao Xiaoxiao 姚晓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3 级学生。大学期间加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农村发展促进会”，热心于各种志愿者活动，曾到过河北、河南、吉林等地的农村和北京郊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支教活动，参加校内工友培训活动，为白血病小孩募捐等。

You Lijin 游丽金，中华女子学院 2006 届本科毕业生，从大学入学参加校社团“农村妇女发展研究会”起便作为志愿者进行下乡支农支教、农村文化建设活动，因着女校的特殊性而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希望为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妇女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尽最大的努力。

You Xiazi 游侠子，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供职于出版社。关注点为妇女权益和社会。

Yu Huaiqing 于怀清，《中国妇女报》社主任记者，北京市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中心成员。

Yu Min 余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4 级硕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成员。2005 年初参加和平妇女的事迹采访和撰写工作。2002 年本科二年级至今，她在北京“蓝天”、“同心”等打工子弟学校长期义务支教，积极参与有关城市流动儿童的就学、社区成长等问题的调研及活动。

Zang Jian 臧健，1951 年出生，现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从事妇女研究和性别史研究。从 1993—2006 年，未间断对中国西北、西南贫困地区女童教育的调查与研究，已出版、发表了大量有关女童，尤其是大龄女童的研究论文与调查报告，作为负责人承担过各类全国妇联、教育部、联合国儿基会的女童研究项目。

Zhang Dongqing 张冬青，生于 1968 年 12 月，1992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地理教育专业，之后任教于陕西安康水电三局中学。1994 年调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民声报》社，任记者，编辑。2000 年调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法治与社会》杂志

社，任记者，编辑。长期关注民主与法治，环境与人类自身发展的关系等社会问题。

Zhang Huiyu 张慧瑜，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2005级博士研究生。

Zhang Qi 张祺，文学硕士（新闻学），专业方向：媒介与社会发展。先后服务于中国妇女报社和中国妇女杂志社，从事妇女权益方面的报道，现供职于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关注领域：针对妇女的暴力，媒介与性别。

Zhang Zhigai 张志改，河南师范大学公共事务学院2005级学生，2005年秋担任公共事务学院女生部干事，2006年春担任公共事务学院女生部部长。自入校以来一直担任教务处助理，对农村发展极为关注。同时担任新农村建设学会会长。

Zhao Ling 赵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3级硕士生。毕业后参加河南妇女口述史工作。

Zhou Liting 周丽婷，36岁，现任中国妇女报河北记者站站长。河北大学新闻系毕业，从事报纸编采工作已14载，采写的新闻稿件多次获得河北省好新闻、华北地区好新闻等多种奖项。热心公益，乐于享受因帮助别人而得到的快乐。愿意与崇高的心灵对话，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提升。

Zhou Xinjing 周心静，毕业于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西部两年，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

Zhu Qian 朱谦，共和国同龄人。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现任中国妇女报陕西记者站站长，主任记者。由下乡知青到企业生产工人、宣传干部再到新闻记者，走过了20年的艰辛路程。1990年从地方新闻单位转投妇女报，是人生的一大转折，从此与妇女运动、妇女事业结缘并一直为维护妇女权益、推动妇女发展而竭尽全力，所有的影响尽在稿件中。

鸣谢

出版中国地区 108 位和平妇女故事的构思，在 2005 年萌生，在经费人手均缺的情况下，得以在两年内完成，有赖于近三百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荣誉顾问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教授、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墨美姬教授和陈清侨教授，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和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的同事们，给予了莫大精神与工作上的支持，同时，百名和平妇女以及近两百名协助收集资料、进行联系、撰写故事、采访摄影、打字校对、技术操作的志愿者的无偿工作，赋予了这次活动一个集体创造的特色。在此，向以下人士及机构衷心致以万分谢意：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和平妇女

撰写和平妇女故事的作者（参看附录名单）

捐款资助出版经费者：

和平妇女

廖银凤

辛淑雯

黄惠琼

胡露茜

王清峰

许金玉

冯守娥

何春蕤

杨祖珺

许兰香

刘忠训

杨海澜

王选

王霞

周广仁

陈明侠

其他

岭南大学

Meaghan Morris

Markus Reisenleitner

许宝强

陈清侨

李小良

叶荫聪

梁旭明

陈顺馨

刘健芝

林瑞含

何超琼

刘健真

戴锦华

贺桂梅

钟秀梅

瑞士一友人

提供行政及各种协助者

罗婉祯

赖家莹

徐惠璇

卢德文

曹文傑

钟彩莲

梁晋荣

范佩华

刘莉莉

薛翠

陈惠芳

宋红梅

杨爱媚

廬亦瑜

吴育建
曹疏影
袁小仙
郑空空
冯媛
游丽金
韩晓宁
寇延丁
张峻峰
驿寒
贺桂梅
钟帆
温铁军
陈晨
黄国良
潘家恩
刘海英
朱清
杨雷
易锐昌
余春江
刘老石
焦霖
黄慧
王雪冬
王亚琼
卢杰
张军
狄金华
柏亮
李强

(未能一一尽录，如有遗漏，请见谅)

最后，此书得以跟读者见面，有赖中央编译出版社协助出版，特此鸣谢。

索引

- Anonyma 无名氏 / 418
Chang Shana 常沙娜 / 1006
Chang Yuzhen 常玉珍 / 705
Chen Daofu 陈道馥 / 987
Chen Mingxia 陈明侠 / 209
Chen Yue 陈月 / 115
Chen Yuying 陈玉英 / 366
Cheng Lucie 成露茜 / 862
Cheng Wei 程炜 / 470
Chou Sheng-Hsin 周圣心 / 840
Crook Isabel 柯鲁克 / 895
Dong Xiuyu 董秀玉 / 972
Fan Qionghua 范琼花 / 483
Feng Shou-E 冯守娥 / 14
Gray Elizabeth Ann 纪爱恩 / 741
Guo Jianmei 郭建梅 / 136
Guo Xinzhi 郭新志 / 407
Hinton Joan 寒春 / 647
Ho Chuen-Juei 何春蕤 / 870
Ho De-Fen 贺德芬 / 848
Hong Jianjun 洪建军 / 441
Hsia Hsiao-Chuan 夏晓鹃 / 822
Hsia Lin-Ching 夏林清 / 858
Hsu Chin-Yu 许金玉 / 27
Hsu Lan-Hsiang 徐兰香 / 255
Hua Meiqing 华美清 / 178

- Huang Chiu-Hsiang 黄秋香 / 697
Huang Mei-Ying 黄美英 / 657
Huang Shuhua 黄淑华 / 96
Jin Meihua 金梅花 / 906
Kao Chin Su-Mei 高金素梅 / 44
Ku Yu-Jane 顾玉珍 / 123
Lee Ching-Chee 李清词 / 920
Lei Kun 丽君 / 724
Li Chunxia 李春霞 / 685
Li Guilian 李桂莲 / 456
Li Jiyue 李继跃 / 392
Li Jun 李军 / 787
Li Tete 李特特 / 505
Li Xiaoliang 李晓亮 / 399
Li Xiaoxi 李小溪 / 334
Li Xuebo 李雪波 / 479
Liang Jun 梁军 / 617
Lin Shu-Ying 林淑英 / 291
Liu Fenglan 刘凤兰 / 678
Liu Ngun-Fung 廖银凤 / 167
Liu Zhongxun 刘忠训 / 68
Long Sihai 龙思海 / 186
Ma Qingrong 马庆荣 / 672
Ma Xinlan 马新兰 / 539
Ma Zhiying 马志英 / 547
New Territories Female Indigenous Residents' Committee 新界原居民妇女委员会 / 105
Ning Ying 宁瀛 / 966
Niu Yuqin 牛玉琴 / 221
Qi Xin 齐心 / 1018
Shang Xiuyun 尚秀云 / 148
Shi Lihong 史立红 / 355
Shi Rurui 释如瑞 / 914

- Su Yanxia 苏艳霞 / 460
Sun Min 孙敏 / 998
Sun Shuk Man Selina 辛淑雯 / 929
Tan Shen 谭深 / 878
Tian Guirong 田桂荣 / 279
Wang Ching-Feng 王清峰 / 128
Wang Dianmin 王殿敏 / 78
Wang Guilan 汪桂兰 / 557
Wang Hualian 王华连 / 420
Wang Jianhua 王建华 / 802
Wang Liwen 王莉文 / 769
Wang Pinsong 王品松 / 323
Wang Shuxia 王树霞 / 581
Wang Xia 王霞 / 607
Wang Xingjuan 王行娟 / 829
Wang Xuan 王选 / 2
Wang Yongchen 汪永晨 / 300
Women Workers' Cooperative 香港女工合作社 / 429
Wong Wai-King 黄惠琼 / 343
Wu Jiuhua 吴玖华 / 495
Wu Meirong 吴美荣 / 196
Wu Lo Sai Rose 胡露茜 / 939
Xiao Jingrong 萧井荣 / 664
Xie Lihua 谢丽华 / 592
Xu Fengxiang 徐凤翔 / 269
Xu Jiying 徐纪英 / 446
Yang E 杨娥 / 491
Yang Hailan 杨海澜 / 245
Yang Tsu-Chuen 杨祖珺 / 37
Yim Yuet-Lin 严月莲 / 752
Yin Yuzhen 殷玉珍 / 234
Yu Fan-Ying 余范英 / 981
Yu Guixin 于桂新 / 157

Yue Daiyun 乐黛云 / 885
Yun Jianli 运建立 / 314
Zhang Guimei 张桂梅 / 530
Zhang Hua 张华 / 517
Zhang Jihui 张积慧 / 383
Zhang Jinming 张锦明 / 800
Zhang Luping 张丽萍 / 716
Zhang Shuqin 张淑琴 / 816
Zhang Wenqing 张文清 / 375
Zhang Youyun 张幼云 / 58
Zhao Fenglan 赵凤兰 / 572
Zhao Ling 赵玲 / 636
Zheng Bing 郑冰 / 626
Zheng Xiaoying 郑小瑛 / 957
Zhou Guangren 周广仁 / 951
Zhu Xiaoxia 朱晓霞 / 778
Zhu Yinxiu 朱银秀 / 87